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7](#_Toc54780124)

[導讀　焦慮的聯盟 8](#_Toc54780125)

[縮寫說明 15](#_Toc54780126)

[導言 17](#_Toc54780127)

[第一部分　危險的崛起，1859—1871 26](#_Toc54780128)

[第一章　初逢：容克貴族與猶太人 26](#_Toc54780129)

[第二章　俾斯麥的生存斗爭 40](#_Toc54780130)

[第三章　寶座和絞刑架間 62](#_Toc54780131)

[第四章　銀行家與俾斯麥的勝利 88](#_Toc54780132)

[第五章　俾斯麥的錢袋和布萊希羅德的地位 99](#_Toc54780133)

[第六章　第三場戰爭 119](#_Toc54780134)

[第七章　凡爾賽宮里的狂妄 138](#_Toc54780135)

[第二部分　帝國的銀行家 147](#_Toc54780136)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147](#_Toc54780137)

[第九章　政治和經濟上的帝國風格 161](#_Toc54780138)

[第十章　貪婪與陰謀 199](#_Toc54780139)

[第十一章　第四等級 228](#_Toc54780140)

[第十二章　發財的親王 242](#_Toc54780141)

[第十三章　銀行業與外交界 292](#_Toc54780142)

[第十四章　羅馬尼亞：權宜的勝利 328](#_Toc54780143)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360](#_Toc54780144)

[第十六章　俾斯麥的倒臺 391](#_Toc54780145)

[第三部分　融合的痛苦 409](#_Toc54780146)

[第十七章　作為愛國新貴的猶太人 409](#_Toc54780147)

[第十八章　新反猶主義的人質 435](#_Toc54780148)

[第十九章　苦澀的結局 464](#_Toc54780149)

[后記　家族的衰敗 472](#_Toc54780150)

[注釋 479](#_Toc54780151)

[致謝 591](#_Toc54780152)

[參考書目 595](#_Toc54780153)

[關于作者 600](#_Toc54780154)





(美) 弗里茨·斯特恩　著

王晨　譯

金與鐵 : 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與鐵 : 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 /(美) 弗里茨·斯特恩著 ; 王晨譯.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20-10618-7

Ⅰ. ①金… Ⅱ. ①弗… ②王… Ⅲ. ①德意志帝國－歷史 Ⅳ. ①K516.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306492號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成都槐樹街2號

　　網址：http://www.scpph.com

責任編輯：張丹

特邀編輯：吳曉斌　唐海濤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陳基勝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焦慮的聯盟

許知遠

一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蓋爾森·布萊希羅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再度被這樁丑聞困擾。

一切源起于一樁從未被正式確認的偷情行為。1868年，一位名叫朵蘿提·科洛納（Dorothee Croner）的柏林女人聲稱，因為布萊希羅德的存在，她與丈夫離婚了。44歲的布萊希羅德是普魯士最富有、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他還有著一般商人難以企及的特權，盡管他是個猶太人。

這樁丑聞很快被壓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統介入其中，布萊希羅德也付出了一筆賠償款，安排這個女人離開德國。在這短暫的插曲后，布萊希羅德的財富、聲名、權勢即將因與俾斯麥的特殊關系，迎來戲劇性的提升。

這個女人并未消失，幾年后，她重回柏林，開始持續不斷地騷擾布萊希羅德，威脅公開丑聞，不停地索要金錢。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統，也拿這個女人沒有特別的辦法。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Schwerin）加入了這個女人的隊伍，與她聯手敲詐這位銀行家。他們的無恥與勇敢背后，是一股越來越強烈的反猶風潮。在歐洲，對于猶太人的歧視由來已久，即使在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股“解放”潮流，但猶太人從未被真正平等地對待。當1873年的經濟危機爆發后，富有的猶太人再度成為標靶，似乎是他們的貪婪、投機造就了蕭條。再接下來，這個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繼續指控，并迎來了新的同盟，一位反猶領袖。這樁私人丑聞有了更為明確的時代意義，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布萊希羅德被描繪成一個不僅榨干了德國經濟，還代表著“縱欲、作偽證、腐敗的故事”。兩年后，他們又在另一本小冊子中寫道：“德國人已經如此接受一個腐化千年的外來種族，他們以錢袋為上帝，以欺詐為信仰。德國人，團結起來，為德國的法律體系而戰，否則你們將再無出頭之日。”

這種赤裸裸的攻擊也與俾斯麥在1889年的下臺相關。即使在位時，首相都未必愿意為他的猶太朋友提供保護，更何況失去了權力。布萊希羅德最終在這一片中傷、聲討之聲中離世。在逝世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飽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這起如影隨形的丑聞，自19世紀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著助手匆匆赴約。他的財富與榮耀每增加一分，公眾的憤怒與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況，他努力效忠的對象——不管是俾斯麥還是皇室、權貴們——從未對他表現出真心的尊重。他們需要他的金錢，借重他對商業變遷的判斷，甚至給予他勛章、贊揚，卻從未真的把他視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詛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著他的公眾角色，繼續與貴族、內閣部長會面，商討德國經濟還有他們的個人財務。

對我來說，再沒有什么事比這個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現出這個猶太銀行家的個人困境與它背后的時代氛圍。他一定是個倍感孤獨、壓抑之人，才會因某次突然的沖動而與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發生了關系。而且據說，這個女人“完全不具備美貌、魅力和地位”，根據她的言行判斷，顯然她頗有精神問題。可以想象，布萊希羅德一定對此既羞愧又懊惱。接著，他的猶太身份、他的金錢，更重要的是時代情緒，使這個偶然的錯誤演變成摧殘他終生的傷口。那是個焦慮的德國，迅速擴張的工業與金融力量，既象征了這個國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滿，那些被發展拋棄的普通人心生怨恨；那也是一個新聞業爆發的德國，各種報紙、小冊子需要各種能引誘公眾想象力的題材，猶太銀行家的陰謀最符合這一需求；它還是一個時刻處于性焦慮的時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們尚不知如何正視自己的欲望，這種壓抑滋生丑聞、更滋生人們對丑聞之熱愛……這一切也與他的保護人俾斯麥有關。這個19世紀最令人贊嘆的政治強人既造就了一個統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國，卻也給新生的德國人帶來不快樂的時光。他對自由有著天然的不信任，更沒有興趣建立一個能保護基本個人權利的制度。他對權力的絕對崇拜、他那強硬的個人作風，都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緊張感。長期積郁的緊張，增加了褊狹與憤怒，而布萊希羅德將成為這種種復雜的、糾纏在一起的力量的替罪羊。

二

在我的書架上，這本《金與鐵》已經放了七年。忘記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書店，我無意中發現了它。那時，我迷戀大書，就是那種動輒上千頁、體積與內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這一本無疑如此。它肅穆地插在歷史區上，封面已丟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裝，書脊上燙金的標題“金與鐵”，發出特別的誘惑。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標題“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盡管甚至念不出布萊希羅德的發音，更不知道他是誰，但篤信這一定是本氣勢恢宏的著作。我也喜歡“金與鐵”這個漂亮的標題。“當前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是靠鐵與血”，我記得俾斯麥斬釘截鐵式的判斷。把“鐵與血”替換成“金與鐵”又有何種意味？

這位叫布萊希羅德的猶太銀行家與他的庇護人俾斯麥的交織關系，構成了這本書的雙重傳記，在他們背后，是德意志帝國的轟然崛起。

七年來，我常鼓起勇氣翻開它，但隨即又放了回去。我對于猶太人話題缺乏興趣。它或許在歐洲歷史中占據著中心的位置，我卻缺乏這種與宗教、文化相關的敏感性。我對俾斯麥與德意志的興起充滿興趣，卻又常為當時復雜的政治關系所苦惱，普魯士與其他公國之間的關系，統一后的德國與歐洲列國的紛爭，一個俾斯麥的“鐵與血”的神話無法涵蓋這種復雜關系。

不過，它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卻從此進入我的視野。出生于1926年的斯特恩，于2016年5月去世，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或許也是我最鐘情的一種類型。他用典雅、雄辯的語調寫作，同時穿梭于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之中。他還有一個或許過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出生于一個杰出的德國猶太家庭，僥幸逃脫了希特勒的統治。在美國，愛因斯坦曾勸他學習物理學，他卻選擇了歷史。他趕上哥倫比亞大學的黃金時代：他的年輕導師中有文學批評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導師告訴他歐洲知識分子的悲觀意識；他的論文指導者，則是文藝復興式的人文學者巴贊（AndréBazin）；在宿舍里，與他進行過爭辯的同齡人則有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當他留校任教后，又與天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成了同事，后者對于政治、社會心理的洞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歷史觀。他在英語世界奠定了聲譽后，又重回德國，與施密特（Helmut Schmidt）總理縱論20世紀，并成為柏林墻倒塌后的美國駐柏林大使的顧問，參與重建德國的商討。在20世紀的最后一年，他成為了聲譽卓著的德國和平書業獎得主。盡管一些人批評他的虛榮、他對于名利世界的迷戀，但沒人否認他對于人們重新理解德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讀過他的一本專著《文化絕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一本文集《愛因斯坦恩怨史》（Einstein’s German World），很是被他理解歷史的新穎角度所吸引。他曾說，因為希特勒在20世紀歷史與他個人經歷中的絕對性主宰，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身于理解第三帝國如何興起、它的歷史根源何在。他也試圖在19世紀的政治、社會心理中尋找這場災難的源頭。他相信，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與俾斯麥的德國間，存在著強烈的連續性。德國的政治文化、大眾心理，為理解德國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我也知道，在他的著作序列中，出版于1977年的《金與鐵》是最重要、規模最驚人，或許也是最能表現他的歷史哲學的一部。在它的中文版即將出版前，我知道自己終于要閱讀這本書了。

三

1858年，布萊希羅德結識了俾斯麥。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貴族頭銜、占有土地為榮；另一個則來自猶太銀行家，他們被歧視的身份已持續了幾百年，但他們又因為專門打理金錢而富有。

羅斯柴爾德家族促成了這次會面。當俾斯麥需要一位值得信賴的私人銀行家時，36歲的布萊希羅德獲得了這個機會，他剛剛執掌了父親創辦的私人銀行，這家銀行也一直以無比恭敬的態度追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43歲的俾斯麥是普魯士官僚系統中的新興一員，他即將出使圣彼得堡。像當時很多類似的案例一樣，他們最初的關系再簡單不過，俾斯麥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錢，后者需要這樣的客戶，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歷史潮流很快將他們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們的合作隨即演化為一個更復雜的故事。先是1866年，長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麥陡然間成為了新帝國的締造者，普魯士統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著在1871年它擊敗了法國，躍升為歐洲大陸絕對的新強權。而作為帝國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麥則成了神話式的人物，他的鐵腕、精明、威懾力，在歐洲政治舞臺中占據的中心角色，更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重塑了國內政治。

布萊希羅德的地位隨著俾斯麥迅速提升。在兩次并無把握的戰爭中，他都是俾斯麥最熱烈、忠誠的支持者，主動為此籌措資金。他也獲得了相應的回報，不僅與俾斯麥更為密切，還覲見了新皇帝與皇儲，參與了諸多決策。他在49歲成了德國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唯一受頒鐵十字勛章的猶太人，接著，又獲得了貴族冊封，名字中可以加入“馮”，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承認。他還受惠于鐵路、鋼鐵、海外貿易造就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他在其中獲得了巨額財富，這些又給他增加了新的虛榮與影響力。

他甚至跨入了歐洲最顯赫人物的行列，被稱作“柏林的羅斯柴爾德”。英國首相迪斯累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麥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說真話的人。外交團體都討好他，他最終還出任了英國柏林總領事這樣的榮譽職位，為此，他還推掉了奧匈帝國總領事的頭銜。而他的家則成為德國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憶：“幾乎柏林的所有貴族和政府要員都會前往……整張宴會桌上擺滿了精品中的精品。人們使用銀質餐具，面前擺放著最奢華的東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羅·德（Pablo de Sarasate）和（宮廷鋼琴家）埃西波夫（Essipoff）開始表演，隨后是舞會。”

他不僅追求這表面的虛榮，還參與新帝國的冒險。與同時代中最杰出的歐洲銀行家一樣，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滯后的俄國，還是陷于衰落的奧斯曼帝國與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這些新國家，以及非洲，它們因為缺乏完善的金融體系而需要這些外國資本。布萊希羅德借債給土耳其政府，試圖修建連接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的鐵路。他投資墨西哥債券。他還試圖進入中國。一群德國銀行家建立非正式的“中國研究組”，但他們總體上是保守的，放棄了這項投資，“因為激烈的外國競爭（特別是美國），因為中國業務總體上不夠安全和可靠”（引自本書頁570）。

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獲得的新經驗，也增加了他的個人影響力。俾斯麥給他庇護，他也拓展了俾斯麥對于這個時代的理解。俾斯麥不僅經常依賴于他的情報，銀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謂之“早八天”；俾斯麥也學會了通過銀行家的眼光來理解世界，金錢、技術、貿易構成的新世界，它不同于一個容克的世界。俾斯麥對金錢之迷戀，他的精明與錙銖必較甚至讓布萊希羅德吃驚。

他們的內在沖突也一直存在，這是舊精英與新富之間矛盾的象征。他們從來是不平等的關系，即使在最受寵的時代，布萊希羅德也僅僅是從俾斯麥家后門進入的人。權貴們在金錢上求助于他，卻從不會真正尊重他。在他的著名的宴會上，俾斯麥從不出席，即使名流云集，也很少出現德國軍官的身影——他們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贊過他的宴會的名媛同時也說，他的宴會雖然奢華卻“有欠素養”，參與者們都“事后表示后悔”。

這種不平等既顯示猶太群體強烈的身份焦慮，也同樣顯示了容克掌權者們對一個正在興起的由金錢、工業、高度流動性構成的世界的焦慮。俾斯麥也知道，自己的權力既非神賜，更非民眾的支持，全賴于皇帝的給予，倘若皇帝變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萊希羅德更深知，自己對于俾斯麥的依附性。

還好，他們都有獨特的性格特征來彌合這種緊張。俾斯麥用他的傲慢、權力控制欲來維持這種自我中心，布萊希羅德則是借助遲鈍——“對許多輕視不敏感，滿心以為他的財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擋來自下層的攻擊。”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之間是兩個焦慮者的同盟。

同盟必有終結一日。1889年是他們的轉折之年。在一個咄咄逼人的年輕皇帝面前，俾斯麥輕易丟掉了權力，陷入一種可怕的孤立。他退隱到自己的家鄉。而布萊希羅德龐大的金錢更為脆弱，他無力面對時代的敵意。

死亡更使得這種同盟關系變得脆弱、涼薄。當布萊希羅德去世時，他在短期內激起了一片的哀悼與贊揚，葬禮的盛大程度堪稱國葬。一貫刻薄的新聞界也發出了這樣的措辭：“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國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隨即，他被迅速地遺忘。這遺忘與金錢相關，更與德國政治與社會上的迅速變遷有關，與羅斯柴爾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萊希羅德家族的金錢未能持續太久。猶太人從俾斯麥時代進入了希特勒時代，從一個身份焦慮時代進入一個被清除的時代。

這種刻意遺忘更與俾斯麥相關，在他生前出版的氣勢恢宏、事無巨細的兩卷本個人回憶錄中，他甚至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盡管后者長期為他打理個人財務，為他的外交政策和戰爭尋找財政支持。布萊希羅德不僅與俾斯麥，還與他的家人、當時歐洲的主要權貴們，都有大量的書信往來。俾斯麥的刻意忽略，也影響了日后的歷史學家。

當弗里茨·斯特恩在20世紀60年代發現關于布萊希羅德的海量個人通信與檔案時，這個猶太銀行家已基本被遺忘。與之相對的是，至少有7000本俾斯麥的傳記、研究作品被出版。在這些檔案中，不僅有他與俾斯麥，也有與俾斯麥的家人、德國皇帝、英國外交官、巴黎的羅斯柴爾德的通信，它們幾乎構成了當時歐洲最顯赫的關系網絡。利用這些信件，斯特恩試圖用一個視角來重新理解19世紀的德國歷史。在對于19世紀德國的主流敘述中，占據一切的是俾斯麥的個人風格、皇帝的選擇、強大的官僚與軍事系統，一部純粹的政治、外交史。盡管身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銀行家，深刻地卷入了俾斯麥的個人世界與德國公共生活的布萊希羅德卻很少被提及。他的猶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錢力量，不僅是理解第二帝國的重要維度，還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興起提供了新視角。

在斯特恩筆下，德國人對于布萊希羅德的刻意忽略與沉默，或許正暗示了歷史的趨勢。即使身為那個時代最有權勢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也從未擺脫傳統、德國社會非理性思潮的壓力。猶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沒有得到任何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必須依賴于掌權者與社會情緒的狀況。巨大的金錢只是暫時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從未解決其困境。

但歷史證明，傲慢的權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麥被威廉二世羞辱，囂張一時的威廉二世也最終因為戰爭失敗，進入流放生活，只能在回憶錄中繼續詆毀俾斯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一種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這種非自由化，不會尊重個體價值，難以理解自由之意義，它崇拜權力、渴望強人，最終所有人都淪為犧牲品。

這是一次大開眼界且疲倦不堪的閱讀。除去這位天賦異稟人物的故事，這本書所展現的時代畫卷——他對于柏林的興起、時代的氛圍、帝國的殖民經驗的種種描述——都讓你感到暢快異常。它印證了我七年前對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確是一本“big book”。

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羅斯柴爾德是他的先知。

——海因里希·海涅

對世界史而言，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歷史比薩克森王國的歷史更重要；這是一個德國猶太人的歷史，我們對此能無動于衷嗎？

——特奧多爾·蒙森

今天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決定所能解決的——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錯誤——而是要靠血和鐵。

——奧托·馮·俾斯麥，1862年

事實上，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煤和鐵，而不是血和鐵。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 縮寫說明

檔案

AI：巴黎以色列聯盟（Alliance Israélite，Paris）

BA：哈佛大學貝克圖書館布萊希羅德檔案（Bleichröder Archive，Baker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BLHA：勃蘭登堡州首府檔案，波茨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archiv，Potsdam［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DZA：德國中央檔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s Zentralarchiv［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A：俾斯麥親王檔案，弗里德里希斯魯（Fürst von Bismarck Archive，Friedrichsruh）

GFO：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波恩（German Foreign Office：Politisches Archiv，Bonn）

HHSA：維也納家族、宮廷和政府檔案（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

HN：保羅·馮·哈茨費爾特遺稿，巴德內恩多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Paul von Hatzfeldt Nachlass，Bad Nenndorf［German Federal Republic］），格哈德·埃貝爾博士（Dr.Gerhard Ebel）保管

HS：霍亨索倫親王家族和領地檔案，齊格馬林根（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ürstliches Hohenzollern Haus-und Domänenarchiv，Sigmaringen［German Federal Republic］）

MAE：巴黎外交部政治通信（Ministè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Correspondance Politique，Paris）

PRO/FO：倫敦公共檔案局/外交部文件（Public Records Office，Foreign Office files，London）

SA：舍恩豪森檔案（Schönhausen Archive），不同于弗里德里希斯魯的俾斯麥親王檔案

RA：巴黎羅斯柴爾德兄弟檔案（Archives de Rothschild frères，Pari）

出版物

AHR：《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P：帝國歷史委員會，《普魯士的外交政策，1858—1871》（第i—vi卷和第viii—x卷，柏林，1932—1939）（Historische Reichskommission，Die Auswärtige Politik Preussens，1858–1871［Vols.i–vi and viii–x，Berlin，1932–1939］）

CEH：《中歐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DDF：法國外交部，《法國外交檔案》，第1輯，1871—1900（16卷本，巴黎，1929—1959）（Ministè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1st series，1871–1900［16vols.，Paris，1929–1959］）

DPO：海因里希·里特·馮·斯爾比克編，《奧地利的德意志政策探源，1859—1866》（5卷本，奧爾登堡，1934—1938）（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ed.，Quellen zur deutschen Politikösterreichs，1859–1866［5vols.，Oldenburg，1934–1938］）

FBPG：《勃蘭登堡與普魯士歷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GP：約翰內斯·萊普希斯等人編，《歐洲內閣的重大政策，1871—1914》（40卷本，柏林，1922—1927）（Johannes Lepsius and others，eds.，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1871–1914［40vols.，Berlin，1922–1927］）

GW：赫爾曼·馮·彼得斯多夫等人編，《俾斯麥全集》（15卷本，共19冊，柏林，1923—1933）（Hermann von Petersdorff and others，eds.，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15vols.in19，Berlin，1923–1933］）

GWU：《作為科學和教學的歷史》（Geschichte als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HZ：《歷史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

JEH：《經濟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MH：《近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BY：《萊奧·拜克學會年鑒》（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OD：法國外交部，《1870—1871年戰爭的外交根源》（29卷本，巴黎，1910—1932）（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Les origines diplomatiques de la guerre de1870–1871［29vols.，Paris，1910–1932］）

SBHA：《議會下院商談速記報告》（Stenographische Berichte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Landtages，Haus der Abgeordneten）

# 導言

這是一本關于德國人和猶太人、關于權力和金錢的書。這是一本聚焦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書，前者是容克貴族和政客，后者是猶太人和銀行家，兩人的合作超過三十年。本書的背景是兩個世界沖突中的德國：資本主義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舊世界；一個更廣泛的新精英階層逐漸崛起，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成了這種重組的縮影。這是關于新德意志帝國建立的故事，在此過程中，身為少數族裔的猶太人上升到飽受爭議的顯赫地位。這是對一系列事件和促成這些事件的利益與情感的記錄；記錄主要出自當時人之手，來自數以千計未被披露過的書信和檔案。這個故事也描繪了那個帝國及其統治者的脆弱，講述了它隱藏的沖突，以及用光鮮外表掩蓋殘酷真相的虛偽。這份記錄包含財富的兩面性——既威脅到傳統，又提供社會流動的希望；也包含猶太人的成功令人唏噓的兩面性，他們的成功如此驚人，如此矚目，但又如此虛妄。這是對變化中的社會的研究，社會流動性是它的本質和痛處。

俾斯麥代表作為貴族、農業和等級社會的老普魯士，但正是他尋求將現代社會元素與君主制的古老傳統相結合。為了這個目標，他需要布萊希羅德。兩人代表老貴族與新勢力的歷史性相逢，前者出身高貴，后者則擁有財富和抱負。兩人與他們的合作形式還象征著德國現代化的過時形式。他們的工作反映出19世紀的重大主題：資本主義的沖擊，民主與威權、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斗爭，猶太人的崛起以及對這種崛起的報復——新的反猶主義。兩人的人生交匯提供了關于他們所在時代的新視角，也呈現了一個活生生的社會，而不是流行觀念中的概括與抽象。

俾斯麥的工作廣為人知，至少被認為是這樣。作為豐碑式的英雄和許多代德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形象，俾斯麥是研究的熱點，但直到最近，他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卻無人問津。布萊希羅德的名字在當時家喻戶曉，代表著巨大的財富、權力和神秘的影響。不過，隨著布萊希羅德的死亡，他淡出了人們的腦海，盡管他的職業生涯對俾斯麥的人生和德國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布萊希羅德是俾斯麥與實務世界的私人紐帶，俾斯麥則是布萊希羅德與高貴的普魯士政治世界的首要聯系。

作為首相的銀行家，蓋爾森·布萊希羅德從無籍籍名上升到德國社會的頂峰：他經常被稱作德國的羅斯柴爾德，是第一位沒有皈依基督教就獲封貴族的普魯士猶太人。他的崛起演繹了金錢的力量和那種力量的局限性，展現了金錢和地位變遷招致的敵意。他逐步確立自己的地位，首先仰仗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親密關系，然后通過為俾斯麥、政府和德國精英提供專業的和私人的服務，他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

布萊希羅德的職業生涯反映出資本的無處不在：資本不僅影響政策和輿論，也吸引似乎鄙夷它的精英。作為心腹，布萊希羅德可以隨時聯系到俾斯麥。他掌管首相的財富，還因為兼具專業和審慎而被委以（有時也主動請纓）需要這種特質的政治任務。歐洲人都知道他是俾斯麥的秘密代理人，他的不同角色讓我們能從新的視角看待俾斯麥的統治，看待德意志帝國成為歐洲主導力量時的德國統治階級。布萊希羅德的職業生涯照亮了俾斯麥的統治中曾被輕視或忽視的方面。它表明，無論在公共還是私人領域，俾斯麥都完全理解金錢的力量。甚至在他引以為傲和被廣為研究的外交領域，用經濟武器作為政策工具的想法也從未淡出他的頭腦。他很早就有過教訓：發動統一德國的前兩場戰爭需要錢，他所鄙視的議會拒絕撥款，是布萊希羅德幫他籌到錢。

布萊希羅德還為俾斯麥的身邊人乃至整個老普魯士精英階層服務。那些精英向他承認自己的需求、胃口和野心。他們這么做時非常小心，因為金錢仍是重大禁忌。他們有求于他的影響力，但也厭惡這樣做。他既提供便利，也令人難堪；他本來也可以發出感慨：“為什么人們這么喜歡我們做的事，卻如此討厭我們的行當？” [[1]](#1_42)  俾斯麥對于自己關心金錢則滿不在乎：他應該能理解，為何歷史學家關心他作為德國最大地主之一的身份，關心他投資政治上敏感的證券，關于他對他自己的納稅者角色諱莫如深。根據歷史記錄，他既不像德國歷史學家所描繪的那樣無比單純，也不像帝國的詆毀者所指責的那樣牟取暴利。他沒有非法牟利，但也不認為利用公職獲得的情報不能被用于投資參考。

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反映出政府與資本、外交與金融、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聯系。布萊希羅德的客戶包括德國的精英階層，他與他們的關系并無明確的公私之分；這是一張互利、互惠和互助的大網。這些聯系被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所察覺，馬克思的分析也對其做了精彩推斷——但只是分析式的推斷，而非經驗的記錄。這些聯系還被主要當事人和那個時代的風氣所掩飾、否認或貶低，也被后世的歷史學家忽視。因此，德國歷史非正統的這一面很大程度上一直無人問津。

在布萊希羅德的故事中，我成功重建了這些聯系中的一部分。它們彰顯出經濟的權力，但不同于近年來對經濟權力的假定或教條化描繪。我們不僅驚訝于經濟權力的滲透力和無處不在，還同樣吃驚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在政府權力面前的相形見絀。布萊希羅德的職業生涯當然只是例證之一，雖然這個例子來自德國政體的最高層；猶太人身份讓銀行家對那位獨一無二的英雄和獨裁者特別俯首帖耳，這個例子因而變得更為復雜。該案例在許多方面都顯得不尋常和極端，但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關系的歷史暗示，政治而非經濟才是第一位的。俾斯麥居于支配地位，布萊希羅德提供幫助：按照自己的意志，俾斯麥接受布萊希羅德的建議，考慮他的愿望，并為其提供庇護。這也是德國政府的一貫做法。布萊希羅德的故事印證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1_1)  的觀點：“受經濟制約的”權力當然不等同于純粹的“權力” [[2]](#2_42)  。

布萊希羅德對權力和利潤如饑似渴，并渴望兩者能讓他獲得尊敬和接受。在19世紀中期的新世界，成功的標志同樣發生改變：銀行是那個時代的宮殿和神廟，它們由石頭和大理石建成，散發出可靠和權力的氣息。布萊希羅德屬于那群為19世紀重大進步成果籌資的商業銀行家。他為礦井、鐵路和圣哥達隧道（St.Gotthardtunnel） [2](#2_1)  融資；他的慷慨資助讓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 [3](#3_1)  得以將對結核桿菌的新發現用于治療病人。他為政府提供貸款，還參與少量殖民地事務。他的客戶和合作者包括許多歐洲的商業和政治精英，他的興趣遍及各大洲。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都屬于顯貴統治的世界，但那個世界正在遠去，即使在經濟領域，布萊希羅德的風頭也開始被股份制銀行和工業大亨的成長所蓋過。隨著現代政府找到自己的籌款方式，他作為政府債權人的傳統價值也逐漸減弱。

盡管對俾斯麥和新帝國忠心耿耿，布萊希羅德從未忘記（或者被允許忘記）自己的宗教出身和責任。十年間，他一直試圖組織西歐猶太人發揮影響，讓各個大國迫使羅馬尼亞授予當地猶太人平等的公民權。此舉記錄了他的使命感，他的成功和最終的失敗。

布萊希羅德同時生活在多個世界。在某些世界，成功的代價是審慎和隱姓埋名；在另一些世界，他需要曝光和聲望。他營造了一種高調的神秘光環。社會功能和地位決定他的行為，但就像大多數成功人士那樣，他的角色恰好滿足自己的激情。

他行事隱秘，但也尋求認同。他不知疲倦地追求頭銜、聲譽和榮耀；他本能地感覺到，金錢需要尊敬，尤其是猶太人的錢。他并不比同時代的人、比任何地方的暴發戶做得過分。在富豪手中，這種對尊敬的追求常常淪為令人瞠目的粗俗，成為缺乏品位的證明。布萊希羅德的人生描繪出這種對于被接受的渴望，他的社會存在顯示了中產階級社會本質上的焦躁和勢利。

布萊希羅德的職業生涯把我們從俾斯麥的內閣帶到德意志帝國所滲透到的最遠邊界—中國和墨西哥，但故事的核心是他的猶太人身份，這種身份決定他的人生，增加他的痛苦，并造成他與同輩和后代的隔閡。就像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 [4](#4_1)  對年輕猶太知識分子的評價：“這些不安分的異類，他們既不討好也不滿足：但這終究不是問題的關鍵。” [[3]](#3_40)  他的職業生涯表現出猶太人成功的兩面性：憑著財富和服務，他被允許上升到頂層；按照王室許可和從紙面上看，他與普魯士貴族平起平坐——但到了晚年，他成了德國社會所涌動的全部怨恨、沮喪和憎惡的矛頭所指。

他的人生顯示了反資本主義和反猶主義影響深遠的結合。德國還有其他富人，但布萊希羅德成了財富的象征。對許多人來說，他還象征著一個充滿社會矛盾的體制下的不平等。1889年，在交給參議員同僚里徹博士（Dr.Rittscher）的私人備忘錄中，呂貝克（Lübeck）警察局局長對俾斯麥的壓迫性新法案提出警告，因為：“它會擴大對現狀的不滿，甚至是在中產階級圈子和自由化市儈中間，并令我們以無法接受地加速做出那個該死的決定：應該由誰來統治，倍倍爾 [5](#5_1)  還是布萊希羅德？我認為這個決定終須做出，因為從格拉古兄弟（Gracchi） [6](#6_1)  的時代開始，財產或貧窮就是關鍵問題。” [[4]](#4_40)

一直以來都存在著所謂體面的反猶主義，這也許不過是對一個以牟利為目的、以金錢為中心的小團體的諂媚行徑的偏見。但在德意志帝國，布萊希羅德讓這種潛在的情感走上前臺。此外，他手握秘密權力，同時在社會上行事高調，這激怒了19世紀70年代的新反猶主義者。與更加謹慎的傳統反猶主義者不同，這些人相信猶太人的力量已經對德國人的生活構成致命威脅，政府應當取消或限制猶太人的權利。在19世紀70年代初史無前例的經濟蕭條中，伴隨著腐敗和欺詐的指控，持眾多不同觀點的德國人都堅稱，猶太人是一場國際陰謀的核心，旨在腐蝕德國人的性格和破壞歐洲的秩序。布萊希羅德成了新反猶主義的主要犧牲品，他既手握大權，又如此脆弱，甚至最富想象力的反猶主義者也無法創造出這樣的人物。財富和聲望是他的動力，但也腐蝕他的后代。布萊希羅德的故事既描繪了德國猶太人的崛起、奮斗和最終的衰敗，也反映出多種形式的反猶主義是德國社會所特有的。法律上的解放恰逢新經濟機會的到來；擺脫桎梏的猶太人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他們帶來無限的幫助，也遭到無限的憎惡。在布萊希羅德的時代出現的模式和開始的沉默將持續很長時間。

不過，本書的中心主題是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共同成就。兩人的合作范圍廣泛；在德國強勢崛起的時刻，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決定那個國家的命運。他們的人生和職業生涯向我們展現新社會的特征和運作。他們是那個社會的代表人物。

無論他多么重要和有聲望，布萊希羅德在德國史學中仍然是個“無籍籍名者”。俾斯麥則變得如超人般高大，根據近來的統計，關于他的作品超過七千種。本書是第一部布萊希羅德的研究作品。甚至可以夸張地說，布萊希羅德是被德國歷史遺忘的一切。

很長時間里，關于布萊希羅德的記憶都令人難堪。他代表如此之多揮之不去的禁忌：斂財、以權謀私和猶太人身份。甚至在他生前，大肆宣揚他的角色和權力的也是他的詆毀者；他所服務的精英階層則道貌岸然地保持沉默。俾斯麥為此做了示范：盡管有過三十年的合作，有過無數的對話和大量的通信，他卻沒有在回憶錄的前兩卷里提到布萊希羅德的名字。在直到威廉二世去世后才付梓的第三卷里，布萊希羅德的名字只被提到一次，還是作為某人的使者。

當然，生前的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地位懸殊，但這種不平等在他們死后被放大了。德國歷史學家為其中一人封神，讓另一人被遺忘—這兩個過程相互聯系。俾斯麥作品集的編輯沒有收錄任何一封俾斯麥寫給其銀行家的信；那位銀行家很少被提到，即使提到也是一筆帶過。在披露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聯系時，編輯們似乎受到限制。刪除過程一直持續到1945年。

無論具有何種信仰或意圖，歷史學家都反映出他們所在社會的價值，俾斯麥死后五十年間的德國歷史學家有各種理由忽視布萊希羅德。在那些年里，史學的首選關注點局限于政治和思想領域；社會和經濟史長久以來都不受德國學術重視。德國史學家很少觸及猶太人問題 [[5]](#5_40)  。即使俾斯麥擁有一位猶太人銀行家和心腹，那也僅僅屬于他的私人生活，與他的公眾人物身份關系不大。忽略的意愿很容易滿足：因為難以找到關于布萊希羅德角色的記錄，可以體面地忽視他。

近年來，德國歷史學家開始轉向社會和經濟現象研究，該學科某些最重要和最有前途的工作正是來自這個領域。當代史學家不再對銀行家或經濟胃口的存在感到尷尬，缺少這些東西反而會讓他們警覺。但今天的歷史學家有其他的興趣，也許還有其他的禁忌：他們試圖超越歷史中的個體和實用元素，尋找社會結構，尋找那種結構中出現的與其基本要求和約束相應的廣泛和無名的力量。他們回避傳記，對結構的迷戀常常導致他們漠視為那種結構帶去生命的精神，而且社會的精神無法量化。對個體歷史角色的信仰今天已經過時，對精英階層的研究逐漸讓位于此前被忽視的階級和動因研究。

在現代歷史學家的描述中，布萊希羅德和其他銀行家成了某種經濟利益的代表。作為個人，他們仍然被冷落或類型化，以便實現讓歷史成為科學的新努力，去除無形而短暫的東西，去除讓社會獨具特色的習慣、態度和道德立場。

不過，布萊希羅德還可能出于另一個原因而被繼續冷落。盡管在過去八十年間，歷史學家研究他的興趣有所升溫，但他的生活痕跡大多卻已消失。相關記錄散落各處，埋藏在經常無法獲得的檔案里。直到許多不同素材被發現、許多零星證據被拼接起后，他職業生涯的部分輪廓才呈現出來。

追尋布萊希羅德和他與俾斯麥早就被遺忘的關系非常有趣，值得簡要回顧。追尋的起因是紐約發現了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部分私人檔案；這份商業檔案由該銀行的雅利安人繼承者于20世紀30年代接管，在二戰中遺失。檔案中包含數千份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時間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到1893年他去世，還有若干此前和此后的文件。這些材料此前從未被披露過，通信中有許多來自俾斯麥的家族和秘書，其余的來自重要的政客和外交官，來自德意志帝國的重要官員和銀行家，來自迪斯累利 [7](#7_1)  和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8](#8_1)  ，來自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奧本海姆家族（Oppenheims） [9](#9_1)  ，來自雅西（Jassy） [10](#10_1)  的猶太人和威廉一世，來自友人和求助者。這些坦誠的信，布萊希羅德是它們唯一的讀者。信中充斥著各種消息、恐懼、希望、流言、影射和對不祥事件的暗示：它們真實記錄一代歐洲人與自己銀行家的對話，他們對他的正直、審慎和智慧寄予最大的期待，指望通過他的樂善好施獲得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并非全部書信都是重要或有研究價值的，也許只有一小部分如此。但必須把它們讀完，而且整體可以說明個別）。但有一個聲音幾乎不見蹤影：布萊希羅德本人。可以推斷出他的核心角色，但缺少其工作的真實記錄和人格印記。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檔案是令人著急甚至沮喪的開端，布萊希羅德仍然是個謎。

對布萊希羅德的追尋就這樣開始：就像我在書末的致謝中將更清楚指出的，追尋工作最初由大衛·蘭德斯（David S.Landes）和我共同負責。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渠道：布萊希羅德與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大量通信。這些書信涵蓋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但其中最坦誠的是寫給雅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1868年去世）的早期私人信件。信件存放在老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閣樓里，被非常慷慨地交給我們使用。第二個重要來源是各種檔案，其中包含布萊希羅德的信件和他提供給俾斯麥及其家族的結算單，相當一部分存放于俾斯麥親王在弗里德里希斯魯（Friedrichsruh）莊園的馬棚樓上。

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的全部通信（一部分當然也保存在政府檔案里）遠遠超過一千封，只有極少數曾被披露過。大部分書信事關日常業務，雖然布萊希羅德經常在關于俾斯麥財務狀況的普通報告中混入對德國和歐洲政治經濟的觀察，混入關于他本人活動或意圖的報告，混入他從其他許多渠道獲得的政治情報的摘要。通信涉及大量主題，包括私事和公務。這是揭示19世紀德國歷史的最重要記錄之一。

令人稱奇的是，這兩處最豐富的材料仍然留在它們具有歷史意義的地點：拉菲特街（rue Laffitte）和弗里德里希斯魯，布萊希羅德曾經常常光顧那里。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俾斯麥：他生命中炫目的兩極。

不過，光有這些記錄還不夠。個人的歷史雖然浮出水面，但沒有全面或連貫的故事。我可以在東德和西德的檔案里找到布萊希羅德活動的回響和痕跡，警方記錄也能提供信息。他的朋友中包括法國和奧地利駐柏林大使，這些人未發表的報告對故事做了補充。同樣有用的，還有他與迪斯累利的通信—來自迪斯累利的老家休恩頓莊園（Hughenden Manor）。甚至巴黎以色列聯盟（Alliance Israélite）的檔案也提供了有價值的東西—至少本書是唯一使用該聯盟檔案的俾斯麥相關作品。我還有過其他發現，但因為材料遺失或無法接觸某些檔案，偶爾也會遭遇失望。

我不斷搜索剩下的痕跡。每個線索都會暗示新的搜尋地點，而最終我也可能忽視某些隱藏的寶藏。我逐漸拼出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關系的某些元素。有的方面仍然模糊不清，許多證據在二戰中丟失。我閱讀大量的書信和檔案，出于對讀者的尊重，我沒有把更多東西放進本書。我的首選是未披露的內容，并始終試圖采用能給人啟示而非慣常的材料。沒有人比我更清楚記錄的不完整：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隱秘，角色的履行也是通過談話。我們偶爾能聽到這些談話的回響；事實上，令人吃驚的反倒是，那么多來信者要求焚毀的信件被留存下來，那么多幕后謀士的痕跡被重新發現。

歷史學家必須整合現有著作和他的新材料。通過這種方式，材料獲得意義，流行的學術觀點得到必要的修正。關于俾斯麥和歐洲歷史的作品數量龐大；就像我的注釋所暗示的，這些了不起的記錄為我提供莫大幫助；但我也遺憾地意識到，許多東西不得不被省略。

我們最后發現，最好的書信和最完整的文件在某些方面語焉不詳。它們想當然地省略了特定背景（共同的假設，與時間相聯系的傳統），歷史學家必須從這些聲音中挖掘背景，同時把這些聲音放回背景下。用楊（G.M.Young）的話來說，我試圖聽見過去的聲音。

除了規模龐大的無價學術作品，我還可以求助別的東西。我感覺自己的主題和材料組成了一個本質上辛酸和戲劇性的故事：布萊希羅德的崛起，他努力把難以想象的財富轉化成尊敬，他在公開場合的榮耀和私下的羞辱，他追求的德國人身份和無法擺脫的猶太人身份，以及他家族的迅速衰敗。這是布萊希羅德在新德國節節勝利的背景下崛起的故事。這是一個漫長的故事，也是一幅圍繞著這位沉著銀行家的群像，他的人生包含許多個世界。想要回顧這些世界，僅僅靠事實本身是不夠的，我還試圖推斷或想象這些事實曾經的意義。對于我工作的這個方面，我必須承認自己從19世紀的偉大小說中汲取靈感，因為就像萊昂內爾 [11](#11_1)  所說：“小說是對真理的永恒追求，它的研究領域永遠是社會世界，分析材料永遠是作為人類靈魂方向標識的習慣。” [[6]](#6_38)

本書的結構反映了它的特點和范圍：第一部分描繪兩位主人公的崛起，講述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統一德國的大膽政策中的作用。第二部分再現兩人如何合力確立這個新德國的政策。他們的合作通過具體細節演繹不同領域和主題間的聯系：金融和政治、國內和對外政策、私人和公共顧慮、個人野心和歷史潮流。這部分內容涉及歐洲外交、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重要方面。在第三部分，我關注布萊希羅德的故事中無處不在的元素：他的猶太人身份與德國社會、德國政治、猶太人群體、他的家庭乃至他本人的關系。他描摹了猶太人成功的頂峰：在晴朗的日子里，峰頂顯得雄偉壯觀；但在暴風雨中，它將第一個被閃電擊中。兩種景象都真實存在，都值得深思。

我希望本書不僅能提供新的事實或修正原有印象，它還應該表現出德意志帝國的氣氛，表現出經歷只能依稀理解的社會變革時，突然陷入陣痛的社會將做何反應。本書的目的不僅是描繪社會的運作，不僅是俾斯麥喜歡說的“禮尚往來”（do ut des），社會精神的某些內容也應被呈現，包括態度、各種觀念與偏見、展現習慣的行為舉止、如同布道文和愛國演說般表達價值觀的沉默。德意志帝國的氣氛似乎散發出一種多愁善感的自負、深深的虛偽和痛苦的奴性，雖然我們故事中的人物也許已經對這些特點司空見慣，以至于視而不見。與當時的人相比，我們可能對其更加敏感。尼采 [12](#12_1)  說：“我的記憶說：‘我做過這事’；我的驕傲說：‘我沒做過這事’，并毫不讓步。最終，記憶屈服了。” [[7]](#7_38)  社會可以屏蔽記憶和現實，本書記錄屏蔽的內容與方式。

我擔心存在對本書與生俱來的偏見：由于關注金錢和猶太人，它觸及德國社會的敏感神經。也許金錢和猶太人能夠暴露那個社會最壞的東西。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都不是美德和善意的焦點，在極少的情況下，布萊希羅德的部分客戶將更多以債務人和投機者的角色出現，盡管他們也是著名的外交官和公職人員。俯視社會并不總是令人高興。布萊希羅德的職業生涯顯示了德國社會某些深層次的兩面性，它們在許多記錄中只是被一筆帶過，甚至完全被忽略。在20世紀后半葉，談論資本主義的勝利司空見慣，而德國社會的特異之處在于，資本主義侵入某些領域，在另一些領域則遭遇阻力。談論德意志帝國的反猶主義并不少見，但本書描繪德國猶太人崛起背景下反猶主義在政治上的出現，并回顧猶太人在19世紀取得的不遜于歐洲歷史上任何少數群體的重大飛躍。

這個故事寫起來并不輕松，也無法為思考他的人帶來教益。后來的事態發展讓它承載過多的悲劇。我試圖聆聽那個社會當時的聲音，聆聽它私密地、坦誠地和近乎天真地揭示自己。那個社會存在不祥之兆，我如實記錄它們。我相信，即使我們不是事后把它們看成災難的征兆，它們也會被視作不祥。我們還聽見罪惡開始前的巨大沉默，它將伴隨20世紀上半葉德國的可怕墮落。本書也許有助于解釋造就我們自身歷史經驗的大災難，但這并非它的首要意圖。最后，我們必須注意到，德國人與猶太人的關系研究被籠罩在巨大的尷尬中，而且無法改變。由于兩者的各種對立，很難再現德國人與猶太人共享同樣的利益乃至態度的日子。德國猶太人經常被描繪成受到歧視的無辜受害者，怯懦地服從威權。但在某些時間和地點，他們中也有成功的例子，和基督徒同胞們一樣驕傲自大。

在趾高氣揚而又飽受爭議的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其他社會也表現出類似的特點，或者就像易卜生 [13](#13_1)  、蕭伯納 [14](#14_1)  和更早時代的偉大小說家的巨大義憤所記錄的。一代人之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15](#15_1)  寫道：“美國的傳統表現出對平等主義民主的強烈偏好，但這是貪婪而非友愛的民主。” [[8]](#8_38)  在德國，一定程度上出于本書所暗示的原因，我們看到的是沒有民主的貪婪，因此缺乏來自政治領域有益的或改革的動力。

生命并不像蕭伯納曾經說的那樣，是善與惡的力量涇渭分明的“道德健身房”。歷史學家也不是某種道德裁判。但區別的確存在，歷史學家必須將其指出。“我們無法靠真正的清點證明，某個時代現實生活中的惡人比另一個時代更多。但我們可以說，在某個時代，不懷好意的偽裝的確更有理由和實用價值。” [[9]](#9_36)  這不是一本關于惡人，而是關于一個自以為是的虛偽個體行為變得如此司空見慣的社會，以至于暗示這些行為模式已經上升為支配體系的書。虛偽變成自欺，在共同努力和相互關系中，德國人和猶太人的自欺對世界產生可怕的影響。本書記錄了這個社會的某些特點：這里有那個時代率直和未加反思的聲音，但同樣昭示不幸。它記錄了人們種下風，卻不知道一代人之后將收獲暴風 [16](#16_1)  。

[1.](#1)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譯注（本書頁下注，除特別注明外皆為作者原注）

[2.](#2) 建于1871—1881年，全長約15千米，隧道穿越圣哥達山口，連接格申恩（Göschenen）和艾羅洛（Airolo）。——譯注

[3.](#3) 羅伯特·科赫（1843—1910），德國細菌學家，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獲得者。——譯注

[4.](#4) 托斯丹·凡勃倫（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譯注

[5.](#5) 斐迪南·奧古斯特·倍倍爾（Ferdinand August Bebel，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譯注

[6.](#6) 指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平民派政治家提比略和蓋烏斯·格拉古兄弟，兩人先后擔任保民官，因為改革觸犯保守勢力而被殺害。——譯注

[7.](#7) 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譯注

[8.](#8) 利奧波德二世（1835—1909），比利時國王。——譯注

[9.](#9) 科隆銀行家。——譯注

[10.](#10) 羅馬尼亞東北部城市。——譯注

[11.](#11) 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國文學家，社會文化批評家。——譯注

[12.](#12)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哲學家。——譯注

[13.](#13) 亨利克·約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劇作家。——譯注

[14.](#14) 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愛爾蘭劇作家。——譯注

[15.](#15)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國社會學家。——譯注

[16.](#16) 《何西亞書》8：7，他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譯注

# 第一部分　危險的崛起，1859—1871

## 第一章　初逢：容克貴族與猶太人

哲學家必須無情、頭腦清晰和摒棄幻想。成功的銀行家擁有取得哲學發現所需的性格特點，即看清本質。

——司湯達，尼采引述

在[勃蘭登堡]侯國，一切都事關錢，因為只有錢能讓人或事變得神圣。

——特奧多爾·馮塔納，《施臺希林》（Der Stechlin）

異性相吸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互補性。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和蓋爾森·布萊希羅德（Gerson Bleichröder）的出身截然不同，原先分別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向往不同的地位，但他們的人生發生交集，并在三十五年間相互幫助。作為各自領域的翹楚，他們互相改變對方的人生：一方的影響可見而強烈，另一方的雖不可見但同樣深遠。政客為了支持保守君主制而試圖繞過普魯士憲法，他需要天才猶太人銀行家的幫助，而后者為了獲得貴族地位也必須跨過當時的社會等級。合作逐漸變得類似友誼，他們的不尋常關系將是本書的核心。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出生時社會地位的差異不能更大了。但他們都超越所處的地位和先人的偏見，最終創造了一個讓兩人的合作成為現實并逐漸開始依賴這種合作的世界。

1815年，正值滑鐵盧戰役打響前幾周，俾斯麥出生在老勃蘭登堡侯國 [1](#1_3)  的世襲產業舍恩豪森（Schönhausen）莊園。俾斯麥家族在侯國已經生活了幾個世紀，遠遠早于霍亨索倫家族成為那里的統治者。奧托出生前一個世紀，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曾警告繼承人，某些容克家族可能會不服管束，俾斯麥家族就是其中的“最桀驁不馴者”之一 [[1]](#1_43)  。就地位或財富而言，俾斯麥家族算不上普魯士最顯赫的家族，但他們世代高傲，屬于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

1822年，布萊希羅德出生于柏林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十年前，政府敕令承諾讓普魯士的猶太人馬上獲得解放，但這個承諾直到半個世紀后才在俾斯麥主政時完全實現。幾個世紀的壓迫經歷（壓迫者認為，這證明了自己的高貴和受害者的卑劣）無法被三心二意的政令所消弭。走出猶太人隔離區的步伐是緩慢的，曾經維系著隔離區的觀念也將繼續存在下去。蓋爾森所在的社會群體幾個世紀來一直受到壓迫，并被民眾認為是墮落的。不過，就像蓋爾森自己的人生將要展示的那樣，這個群體將上升到無法想象的高度。俾斯麥來自社會頂層，但在之前的二十五年間，他的階層在歐洲各地遭到猛烈的挑戰，并將繼續受到19世紀工業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威脅。如果沒有俾斯麥的拯救（經常是違心的），這個階層的衰敗將更快和更明顯。后來，俾斯麥把布萊希羅德擢升進普魯士貴族的行列，而布萊希羅德則幫助俾斯麥在一個物質主義日益盛行的時代成了富有的人。成功對兩人而言都來之不易。

與那位更著名的同輩相比，蓋爾森的少年和青年時代也許要輕松些。他的生活受到各種確定性的支配：信仰命令他恪守孝道，競爭激烈和充滿敵意的世界要求他必須努力工作，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前途。在過去的傳統社會中，人的前程通常取決于他的家世，社會地位的突然改變非常罕見，這就是為什么拿破侖自封為皇帝成了19世紀重大的象征性傳奇。很少有猶太人了解自己的先人，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祖輩和作為共同祖先的亞當與亞伯拉罕，兩者之間是模糊不清的大流散。

和許多德語地區的猶太姓氏一樣，布萊希羅德很可能源于鎮名，即普魯士薩克森州（Saxony）哈爾茨山（Harz）的布萊希羅德鎮（Bleichrode）。該鎮位于哥廷根（Göttingen）以東幾英里處，按照今天的政治地理，它緊貼東德邊境的內側。無從得知布萊希羅德家族最早何時和從哪里來到哈茨山；18世紀前，大部分猶太人沒有姓氏，而是作為他父親的兒子為人所知。我們對這個家族在蓋爾森父親之前的情況只知道一星半點。布萊希羅德家族中第一個出現在國家檔案上的是蓋爾森的祖父蓋爾森·雅各布（Gerson Jacob），他生于18世紀40年代，年輕時來到柏林，因為猶太社區需要掘墓人而獲得了居留權。他還嘗試過其他行當，但都以失敗告終。他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娶了一位柏林的受保護猶太人（Schutzjude）之女蘇西·阿隆（Suse Aaron）。為了理解這次飛躍的意義，我們需要簡單回顧一下猶太人獲得解放前極其復雜的狀況 [[2]](#2_43)  。

當時，封閉而等級森嚴的基督教社會把猶太人看作宗教和社會的毒瘤，當局的行動也反映了民眾的情感。猶太民眾生活在社會邊緣，他們居住在自己的社區，說自己的方言，穿特別的服飾，吃特別的食物，并遭受特別的限制。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只能提供非猶太人不愿做或做得不夠好的服務。于是，大部分猶太人從事放債業務和沿街兜售各種商品，不斷買進和賣出—賣家和買主、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永遠彌漫著懷疑的氣氛。基督徒指責猶太人只關心錢，著名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為此憤怒地高聲反駁說：“他們捆住了我們的雙手，然后抱怨我們不會用手。”雙方都認識到彼此間存在鴻溝，就像一位當代歷史學家所說：“猶太人的頭腦并不過于關心外部世界。” [[3]](#3_41)

少數猶太人獲得比廣大底層同胞更高的地位。由于對國家有特殊價值，他們被授予受保護猶太人的身份，得以免除國家對其他猶太人的許多限制，雖然并非全部。受保護猶太人的稅賦較輕，并享有更大的流動性。一些猶太人的地位還要更高，他們的特殊服務（通常是銀行家和向王朝貸款者）為自己贏得宮廷猶太人（Hofjude）的地位。蓋爾森·雅各布娶了一位受保護猶太人之女，他的孫子蓋爾森則經常被視為最后的宮廷猶太人 [[4]](#4_41)  。

在蓋爾森·雅各布的四個孩子中，薩穆埃爾（Samuel）從母親的家族獲益最多。1803年，他在位于柏林一個非常偏遠角落的羅森塔爾街（Rosenthaler Strasse）開設了兌換鋪。作為東西方之間貨物的集散地，柏林總是充斥著大量不同的貨幣。昔日的神圣羅馬帝國境內有各種貨幣流通，而自從1806年法國人占領柏林后，對于兌換機構的需求變得更大。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的鋪子還是彩票站，從事彩票銷售和贖兌。發行彩票是國家為光榮費用（比如付給士兵遺孀和殘疾士兵的撫恤金）籌資的主要手段。薩穆埃爾逐步擴張業務，像當時的許多猶太人交易商一樣，他開始給自己標上銀行家這個更加響亮的頭銜。蓋爾森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是嶄露頭角的商業銀行家。19世紀20年代后期，薩穆埃爾開始與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建立聯系—這些聯系注定將讓薩穆埃爾和后來的蓋爾森獲得遠超其他柏林銀行家的地位。一代人之后，正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讓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走到了一起。

自從滑鐵盧戰役或者1812年邁耶爾·阿姆歇爾（Meyer Amschel）去世后（他留下巨額財富和五個將讓財富倍增的能干兒子），羅斯柴爾德家族便成了傳奇。邁耶爾·阿姆歇爾曾是法蘭克福猶太巷（Judengasse）的一名錢幣、獎章和古玩交易商。在革命的動蕩歲月里，他拯救了黑森親王威廉（Prince William of Hesse）的財富。他的兒子們開創了一個國際銀行家王朝，在維也納、巴黎、倫敦和那不勒斯建立“宮廷”，長子則留在法蘭克福管理祖業。羅斯柴爾德家族將國際銀行業制度化，在他們的支持下，歐洲資本實現了完全流動。他們自己的財富超過所有對手，并可以據此操控更多資金。他們在五座城市扎根，說著帶有同樣意第緒語口音的各種外語，同時團結一致，相互在對方的產業投資，并與彼此的家族通婚。他們建立了商業世界的拿破侖王朝，后者同樣從社會邊緣發跡，同樣依賴兄弟間的忠誠統治帝國。這個商業王朝無疑不如拿破侖帝國那么輝煌，但也沒有那么血腥，而且延續得更久。在整個19世紀，它象征著童話般的財富和奢華，代表優雅和權力。羅斯柴爾德家族演繹了富豪統治的巔峰，并被模仿、嫉妒和憎惡 [2](#2_3)  。羅斯柴爾德家族至今仍活躍于巴黎和倫敦，雖然勢力已經不如當年，但他們的業務仍然遍及全球，他們的歷史仍能激發大眾的想象 [3](#3_3)  。

薩穆埃爾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首次合作的確切日期已經無考；有一種說法認為，1828年，安塞爾姆·馮·羅斯柴爾德（Anselm von Rothschild，維也納的所羅門男爵之子）在訪問柏林時將布萊希羅德加入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利益的可接受代理人名單 [[5]](#5_41)  。我們從布萊希羅德寫給巴黎和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信中了解到，19世紀30年代初，薩穆埃爾已經從羅斯柴爾德家族定期接受傭金，并逐漸疏遠早前那些更值得尊敬的通信者，比如門德爾松家族。

我在這里不分析薩穆埃爾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四大分支的關系（那不勒斯分支在柏林幾乎不被提及） [4](#4_3)  。19世紀30年代，柏林市場開始煥發生機，薩穆埃爾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買賣證券。他們的命令中經常明確要求他低于市價買入和高于市價賣出—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把這種結果看作理所當然。他還是他們在巴黎或倫敦與柏林間開展套利業務的代理人。套利（在多個市場上買入和賣出證券或貨幣，以便賺取價差）取決于對市場的精準了解和對時機的完美把握：最微小的變化都可能讓獲利變成虧損。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歐洲消息最靈通的人士，他們收集情報的速度超過本國政府。這需要在收集和發送消息時一絲不茍。人們必須在各地認識合適的人，而在尚無快速通信手段的時代，他們還必須建立自己的信使和信鴿系統，以便在各地間快速傳遞消息。于是，薩穆埃爾在19世紀30年代經常請求羅斯柴爾德家族讓自己加入他們的快速消息網；他抱怨說，他們從巴黎發來的信函耗時六天，而通過不同途徑可能只需五天。羅斯柴爾德家族慢慢地意識到柏林市場的重要性。

薩穆埃爾竭盡所能引發他們的興趣，特別是德國鐵路問題。鐵路在19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引發柏林市場的第一波繁榮—不可避免的是，第一次崩潰隨后到來 [[6]](#6_39)  。薩穆埃爾也沒忘了提醒羅斯柴爾德家族自己日益提升的重要性：1838年9月，職員為他簽發了一封信，并解釋稱布萊希羅德覺得“不得不接受”參加柏林到波茨坦鐵路開通儀式的邀請。第二天，薩穆埃爾親自報告說，從波茨坦到策倫多夫（Zehlendorf）的兩英里旅程不如預想中快捷，來回分別耗時三十分鐘和二十六分鐘。不過，薩穆埃爾仍然很樂觀，并無疑對受邀參加普魯士王國首條鐵路的開通儀式感到榮耀。他鼓勵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波茨坦到柏林鐵路的股份；但幾個月后，他開始試圖拋售他們的持股，因為他的樂觀預想并未實現。公司沒能像預期那樣分紅，反而面臨額外支出。薩穆埃爾沒有氣餒，試圖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資金引向其他德國鐵路—這為他在一到兩個董事會中贏得顯要地位 [[7]](#7_39)  。布萊希羅德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信還反映出早期股票市場交易的另一個方面：適度的收益預期。薩穆埃爾正確地估計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將對短期承諾1%或者在幾個月內承諾3%到4%收益的交易感興趣。當時的信條更接近中國諺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非美國人快速致富的希望。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他們的代理人薩穆埃爾）不愿走錯一步。

從19世紀30和40年代的這份早期記錄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羅斯柴爾德家族各分支都是傲慢得令人無法忍受的王朝；他們清楚，自己的慣例對于一位在柏林苦苦打拼的銀行家而言是無價之寶。薩穆埃爾不得不處處乞求恩惠和分一杯羹，并奉上各種好處。更糟的是，1836年內森·邁耶在倫敦去世后，巴黎的雅姆斯男爵（Baron James）成為家族的主導者，他時而指責薩穆埃爾忽視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利益，并總是含蓄地威脅說，家族可以在柏林找到別的代理人。薩穆埃爾向他保證，自己只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效勞（而不像別的銀行家那樣）。因此，即使是出于一己私利，他也會完全致力于他們的利益。當柏林市場在1840年遭受重挫時，為了執行雅姆斯的命令，薩穆埃爾主動犧牲自己的一部分傭金。三年后，在又一次遭到嚴厲訓斥后，薩穆埃爾抱怨說，自己不僅因為思考雅姆斯的愿望而度過許多不眠之夜，還為取悅他而放棄傭金并倒貼了錢 [[8]](#8_39)  。

現存的幾封書信展現了薩穆埃爾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的其他服務。早在1831年，他就向他們傳遞政治動態的消息，適時解釋他們在市場上的處境。他報告荷蘭國王關于五國對新獨立的比利時所做決定的預期回應 [5](#5_3)  ，并通報俄國對1831年波蘭叛亂的處置 [6](#6_3)  。他還報告霍亂的肆虐狀況，并于1848年向法蘭克福分支提供柏林革命的消息。在極為準確地描述柏林當日的革命戰況后，他向他們保證，自己為他們購買的證券和黃金安然無恙：“尊敬的先生們無需擔心，因為沒有理由為私產憂慮。” [[9]](#9_37)  這句話既精明又一針見血：私產的命運對革命和羅斯柴爾德家族至關重要。

書信還揭示薩穆埃爾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另一條紐帶：他們都不以猶太人身份為恥。在薩穆埃爾寫給倫敦分支的第一封信最后有一段希伯來文的附言；書信和附言都使用德語，但這是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所說的德語，帶有濃重的意第緒口音。薩穆埃爾（以及他之后的蓋爾森）將一再故伎重施，這種方法既能保證消息的機密（當時的審查者應該相當原始），又重申通信者之間的特殊親緣關系 [[10]](#10_36)  。薩穆埃爾想當然地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與猶太人相關的一切都特別感興趣。1840年7月，他向巴黎分支報告說，普魯士新任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親切接見柏林猶太人社群的執委會，聆聽該團體發言人“非常優美的演講”，然后做了大致這樣的回復：“我很高興地發現你們屬于我最好的臣民，我永遠不會忘記猶太人如何愛國，特別是柏林猶太人—我并非來自某個黑暗時代，你們將總能從我這里得到公正的獎懲。” [[11]](#11_36)  不同國籍的猶太人間經常存在難以言明的矛盾，仿佛他們在對彼此說：我們的異教徒至少和你們的一樣好。

其他服務則順理成章。羅斯柴爾德家族希望薩穆埃爾四處搜尋可能符合他們品位與荷包的藝術品。當薩穆埃爾派女婿沃爾夫（B.Wolff）向雅姆斯男爵呈上“一小桶最新鮮的魚子醬”，請求他“賞光”收下時，男爵沒有拒絕 [[12]](#12_34)  。羅斯柴爾德家族喜歡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果是免費或廉價的就更好了。

羅斯柴爾德家族造就了薩穆埃爾；他清楚這點，而且永遠不被允許忘記。身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人或聯絡人不僅是對薩穆埃爾智謀的挑戰，讓他本人有機會獲得更多回報和獎賞，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對他過去成績和品性的認可。薩穆埃爾以正直和智慧著稱 [[13]](#13_30)  。與所有嚴苛的王朝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要求臣屬既像奴隸般忠誠，又伶俐和有魄力。僅僅順從并不夠，必須說到做到，而薩穆埃爾在言行兩方面都很擅長。他嘗試過優雅的表達，比如向正好在巴黎的維也納安瑟爾姆·所羅門男爵（Baron Anselm Solomon）介紹自己17歲的兒子蓋爾森時，他表示：

……請允許我簡短地向您呈上我最深切和最誠摯的謝意，感謝您善意賜予我的仁慈，因為正是您，最尊貴的男爵老爺，從最底層提拔了我：最高貴的您讓我有能力養活一大家人。

因此，只要我活著，您的音容笑貌就會活在我的心里，我的最后一息將獻給您，我的恩主。

愿您也將恩惠和仁慈轉賜給我的兒子…… [[14]](#14_30)

在當時的私營銀行業，個人關系至關重要。共擔風險取決于相互信賴，而這種信賴的基礎是對個人的直接了解。

1839年，蓋爾森加入父親的生意。我們對他在公司的最初歲月知之甚少。他工作勤奮，到了1843年已經獲得代理公司簽署文件的權力（Prokura）。薩穆埃爾向巴黎的雅姆斯男爵保證，這樣做是因為蓋爾森“公正而且努力效忠您的崇高利益” [[15]](#15_28)  。蓋爾森于1847年成為合伙人，并在1855年薩穆埃爾去世后出任公司的掌門人。他的弟弟尤里烏斯（Julius）同樣在這家銀行工作，但在1860年退出家族生意，成立了自己的銀行。兩兄弟各自在對方的銀行擔任隱名合伙人 [7](#7_3)  ，這種聯系維持了幾年，直到1870年終止。

總體而言，蓋爾森事業起步趕上了好時光。19世紀中期，得益于鐵路、冶金業和日益豐富的資本，普魯士經濟經歷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繁榮。19世紀50年代，德國工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這十年見證了德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決定性突破。” [[16]](#16_28)  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股份公司成為增長的最佳載體。19世紀50年代，股份制銀行首次出現，最終在實力上超過最大的私有銀行。不過，股份制銀行與私有銀行長時間保持合作。巧合的是，蓋爾森一生的合伙人和朋友（有時也是對手）阿道夫·漢澤曼（Adolph Hansemann）在1856年進入父親的股份制貼現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比蓋爾森的獨立事業起步晚了一年。

蓋爾森幫助19世紀50年代的大擴張融資，并從隨之而來的繁榮中受益。他最重要的財產仍然是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他為增進這種關系所做的努力甚至要超過其父。但他也逐漸讓自己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強勢人物。他與其他銀行聯合組建新的投資公司，用同樣的方式進入冶金業并推動若干條鐵路的建設，包括圖林根（Thuringen）鐵路。他被任命為科隆—明登（Cologne-Minden）和萊茵鐵路的官方銀行家。1859年，普魯士攝政親王（后來的威廉一世）邀請他參加著名的科隆跨萊茵河鐵路橋的開通儀式—蓋爾森參與了該項目的融資 [[17]](#17_22)  。

他開始越來越多地與科隆的小所羅門·奧本海姆銀行（House of Sal.Oppenheim Jr.and Company）合作，該銀行由極具膽識的亞伯拉罕（Abraham）和西蒙（Simon）·奧本海姆兄弟經營 [8](#8_3)  。1853年，在法國資本的幫助下，奧本海姆兄弟違背普魯士政府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法蘭克福分支的意愿，與杰出的企業家古斯塔夫·梅維森（Gustav Mevissen）一起帶頭創立所謂的達姆施泰特（Darmstädter）銀行，這是最早的股份制銀行之一。兩年后，亞伯拉罕敦促蓋爾森與達姆施泰特銀行合作創建另一家銀行，并提出也許可以讓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來經營。奧本海姆還表示：“無論如何，這個提議將向您證明，我對您本人和您的能力抱有無限信心，而且我毫不懷疑，在這件事上我的同事和我想的一樣……”蓋爾森謝絕了這份討好的邀請，但奧本海姆兄弟繼續對“您的智慧、洞察力和處理此類事務的方法”表達敬意 [[18]](#18_22)  。1859年，在法奧戰爭期間，蓋爾森與漢澤曼家族合作成立所謂的普魯士財團（Prussian Consortium），組織這個銀行聯合體的目的是為普魯士征兵籌集3000萬塔勒 [9](#9_3)  。另一方面，政府也開始認識到布萊希羅德的重要性 [[19]](#19_18)  。

人的外在事業往往比他們的內在成長得到更好的記錄。對商人而言也許尤其如此，他們總是被假定沒有情感生活，比如托馬斯·布登勃洛克（Thomas Buddenbrooks）的朋友誰會想到在他冷靜沉著的外表下涌動著痛苦？我們對蓋爾森的內心生活知之甚少，只有幾封書信留存下來，信中是受妻子去世和老年孤獨驅使而寫下的關于19世紀80年代的幾段懷舊式回憶。誰能保留青年蓋爾森可能寫過的私密書信？我們知道，在仔細考察一批符合條件的年輕女子并遵循父親的意愿后，他決定娶銀行家之女艾瑪·古騰塔格（Emma Guttentag）為妻。艾瑪來自布雷斯勞（Breslau），該城擁有龐大而杰出的猶太社群，其中有許多薩穆埃爾的熟人。即使蓋爾森對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 [10](#10_3)  有所動心，不愿成為體面的“畢德邁耶爾派”（Biedermeier） [11](#11_3)  ，希望沿著新的道路打拼，他的民族和時代精神也不會鼓勵他沉湎于這樣的感情。工作被認為可以治愈一切；托爾斯泰的列文（Levin）曾說：“我想要給醫學添加一個新詞：工作療法（Arbeitskur）。” [[20]](#20_18)  蓋爾森讓自己沉浸在工作中，為此幾乎犧牲了一切，甚至可能包括他的健康。我們將會看到，俾斯麥為尋找自我付出了閑暇和努力；而蓋爾森則早早地受到責任的眷顧，回報就是他的成功。

但有一個弱點是蓋爾森無法回避的：猶太人身份讓他永遠易受攻擊。事實上，他越成功，不確定性和受到的攻擊就越多。他追逐著異教徒世界，也被后者所追逐；他越是深入那個世界，就越是意識到自己缺乏那個社會最為推崇的傳統和特質。猶太人身份界定了他的人生—遠比容克身份對俾斯麥人生的影響更大。因此，下文中蓋爾森的生平將被置于德國人和猶太人關系的背景下，我稱之為融合的痛苦。

俾斯麥的青年時代則更加動蕩。他一頭扎進生活，對約束感到不耐煩，對自己的階級及其理想心懷蔑視，對身邊人感到困惑。他的出身讓布萊希羅德永遠無法企及：貴族的遺產，社會的最高階層立即毫無疑問地向他敞開大門。不過，猶太中產階級對這些優勢的艷羨要遠遠超過俾斯麥對它們的看重，他的野心超越自己的出身。他秉性浪漫，深受莎士比亞和拜倫熏陶，擅長尖刻譏諷，渴望某種崇高的目的或英雄式人生，但在等待過程中把時間浪費在粗俗的放縱中。1838年，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的野心更向往命令而非服從。”這種野心和權力意志讓他憎惡并放棄在普魯士官僚體系中的前程 [[21]](#21_18)  。他還拋棄宗教約束，終結了從孩提時代開始的晚禱習慣。所愛慕的年輕女子（他最好朋友的妻子）的去世和1847年與約翰娜·馮·普特卡默（Johanna von Puttkamer）的結婚讓他冷靜下來。同年，普魯士的政治生活從死氣沉沉中走出，俾斯麥帶著興奮和出色的人脈踏入這個競技場。

他嘗試過鄉紳生活，但覺得乏味得無法忍受。但終其一生，每當陷入暴怒和絕望，他總是夢想著退隱祖產舍恩豪森莊園，享受田園生活的快樂。他對舍恩豪森以及后來的伐爾岑（Varzin）與弗里德里希斯魯（Friedrichsruh）莊園懷有真實和持久的依戀。他熱愛自然，熱愛身為自己土地的主人和一群農民的領主，熱愛那種生活的獨立和其樂融融。不過，管理莊園是項單調乏味的工作，而且回報常常非常有限。他在1847年寫道：“經驗讓我遠離對典型地主的阿卡迪亞式幸福幻想，這需要掌握復式記賬和研究化學品。” [[22]](#22_18)  有時，他會故作高尚地表示對金錢無所謂，并在為自己揮霍無度和不負責任的習慣道歉時流露出明顯的驕傲。但這只是亢奮之舉，在他婚后出現得越來越少。大多數時候，他非常看重金錢，就像其他地主那樣。甚至在年輕時他就認為自己需要“大筆財富才能享受為國效力，以便隨意以我認為得體的光彩形象出現，而當發現職務不符合我的信念和品位時，我也可以輕松地放棄官位的所有便利” [[23]](#23_18)  。

擔任公職后，他對金錢的需求更大，但打理它們的時間卻減少了。他過去對金錢的蔑視消失了，與之相伴的反商和反猶情感也不再那么強烈。他曾把猶太人與不擇手段地斂財畫上等號，當他試圖向友人赫爾曼·瓦格納（Hermann Wagener）討債時，他為自己“猶太人般的算計本性”（Berechnungswesen）道歉 [[24]](#24_16)  。他寫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書信證實了這種很容易產生的偏見；但他并無關于猶太人的特別意識形態，當他在1847年的統一議會（United Diet）上 [12](#12_3)  對他們加以阻撓時，他只是在為現狀辯護。他認為，猶太人不應在基督教國家的公共行政體系中扮演任何角色。此外，他不喜歡他們，并對此相當自得。這是反自由主義立場和口無遮攔的又一種表現。

1848年，俾斯麥的世界幾近崩解。此前也有過零星的革命震感，復辟時期的歐洲曾受到雅各賓主義幽靈復活的困擾。但到了1848年，在米蘭、巴黎、維也納乃至柏林，革命力量四處取得勝利。和其他德意志邦國一樣，在普魯士，民眾的主張是兩方面的：統一和自由，人們希望可以設法通過和平而慎重的手段同時滿足兩者。他們在所有具體問題上存在不確定性和分歧（比如奧地利及其非德意志領土的角色，或者投票權的性質），只有理想中唯一、統一和實行自由憲政的德國成了行動的燈塔。對俾斯麥而言，上述理想及其自由主義和反普魯士意圖令人憎惡，實現它的革命道路同樣如此。

在俾斯麥的回憶錄中（可謂他自己的《詩與真》 [13](#13_3)  ），1848年革命被置于其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位置。革命對他而言是一次情感激蕩的經歷，在他的記憶中留下熾熱的印記。當歷史學家忙著糾正他敘述中熱烈的夸張時，他們忽視了這場起義對他的心理影響。革命帶給俾斯麥（和馬克思類似）新的沖動和方向。心愛女子的離世帶給他一種對生命宗教般的新承諾；他的王國的幾近死亡帶給他一種新的政治決心。前者教會他所有人的無能為力；后者讓他見證大多數人的脆弱。兩者的結合讓他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和命運 [[25]](#25_16)  。

革命考驗人們的堅韌和遠見；它們創造權力真空，讓超出想象的新選擇一度顯得可以實現。它們打破包含一個民族恐懼和憧憬的模式。它們讓政治戲劇化，讓政界與臣民和公民日常生活間的聯系得以顯現。革命獎賞不循規蹈矩的人。無論俾斯麥在途中干過什么蠢事，他在1848年的第一個沖動就是沖到柏林，設法接近國王，主張自己的意志，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一切都是在無視通常的禮儀和約束下做出的，旨在讓國王變得堅定。他將從暴徒和君主本人手中救下君主制。

我們在這里不分析革命或者俾斯麥在革命期間的思想和行動。他震驚于對公共秩序的輕蔑，以及對那種秩序實際和象征性的違反。最令他痛苦的是權威的突然退卻；在革命爆發兩周后的第一次議會演說中，他表示：“過去被埋葬了；由于君主制親手在自己的棺槨上撒了土，沒有人能使它復活，與你們中的許多人相比，我對此更感切膚之痛。” [[26]](#26_14)  至少，他拒絕像國王的許多臣下那樣，慶祝所謂的君主與人民的新聯合。他在回憶錄中記得自己曾威脅殺死一個同為地主但搖擺不定的家伙，記得對像恩斯特·馮·波德爾施溫格（Ernst von Bodelschwingh） [14](#14_3)  這樣被嚇破膽的部長的鄙視，記得向自己的君主強調國王必須要做到安枕無憂。他也許美化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堅定，可能他本人也在不切實際的反革命計劃和暴怒失態（比如導致他議會演說終止的那次失態）間搖擺。但難以否認，經過1848年革命的俾斯麥強大了無數倍，他有了更清晰的自我意識，對他人則更為不屑。（當虔誠的岳母表達了對某些被處決的匈牙利革命者的憂慮時，他如此大膽地在信中表示：“我最親愛的媽媽［Mutschchen］，您的頭腦中仍然縈繞著盧梭式的教育原則。因為它，路易十六不愿依法處死一個人，卻為此要對幾百萬人的消失負責……對罪犯人身的軟弱同情導致了過去六十年間最可怕的殺人罪。” [[27]](#27_10)  ）俾斯麥沒有感到同情。他發現自己的冷酷無情。現在，他感到（并表達）對議會和議員的憎惡，這將成為他后半生的標志。他從自己在革命期間的激情洋溢中意識到，如果時間和地點合適，自己將在政治戲劇中迎來巔峰時刻，實現才盡其用并感到不虛此生。但他同樣明白，革命的失利只是緩刑，作為保守君主制國家的普魯士將會再次打響生存之戰，并通過更加大膽的不同方式取得勝利 [15](#15_3)  。

革命助長俾斯麥的野心，也造就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他攻擊國王在街壘面前的怯懦。他對法蘭克福議會（Frankfurt Assembly） [16](#16_3)  只有鄙視。但1850年12月，他為國王向奧地利和俄國的軍事力量屈服辯護，并因此放棄自己的統一德國計劃，這震驚了左右兩翼。他并未感受到他人所稱的“奧爾米茨之辱”（humiliation of Olmütz） [17](#17_1)  ：“在我看來，普魯士的榮譽不在于它為了議會里那些受辱的名流而在德國各地扮演堂吉訶德的角色……我認為，普魯士的榮譽在于它在一切情況下都要避免任何與民主的可恥聯姻……” [[28]](#28_4)  當時，很少有人為國王辯護。

185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委任俾斯麥為普魯士在法蘭克福德意志邦聯議會的代表。俾斯麥早已適應政治生活，但在履新的最初幾個月，他仍然對自己的不安分感到擔心。他在寫給妻子約翰娜的信中表示：“你是我在安全河岸邊的錨；如果錨斷了，那么只能愿上帝憐憫我的靈魂。”這具錨安然無恙—雖然他在同一年向密友漢斯·馮·克萊斯特·雷佐夫（Hans von Kleist Retzow）透露說：“罪惡襲擊我的主要武器不是對外在榮耀的欲望，而是一種野蠻的感官欲望……每當我獨處和無所事事時，我不得不與來自墮落幻想的深淵景象斗爭……” [[29]](#29_4)

在法蘭克福的七年間，他變得更加嚴肅，不再縱容自己的精神怪癖。在那座擁有深厚傳統、歷史財富和大都會氛圍的貴族城市里，他開始安心致力于長期責任，并拋棄波美拉尼亞 [18](#18_1)  鄉紳的面具。他現在正在更大規模的觀眾面前演出—賭注也更高。

抵達法蘭克福幾周后，俾斯麥受到阿姆歇爾·邁耶爾·羅斯柴爾德（Amschel Meyer Rothschild）的款待，后者年近80，是五兄弟中最年長的一位。俾斯麥向妻子取笑羅斯柴爾德的口音和猶太人式的德語句法，但他很高興受到邀請，羅斯柴爾德“這個真正詭計多端的老猶太人（Schacherjude）”和“成噸的白銀，金質的勺和叉”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仍然認為羅斯柴爾德是“一個自己宮殿里的窮人，無子，鰥居，受到身邊人的欺騙，遭到法國化和英國化的優雅侄子與侄女的惡劣對待，他們繼承他的財富，卻全無感激和愛意” [[30]](#30)  。羅斯柴爾德對猶太教正統的信守得到俾斯麥的贊許，因為這表明他的誠實，不愿掩飾自己的真實身份。不過，俾斯麥還是告誡妻子：“不要擔心這座城里的杰出人物；就財富而言，羅斯柴爾德首屈一指，并取走他們所有人的錢和薪水。然后他們就會看到，自己本質上根本算不上杰出。錢無法讓人杰出。此外—愿上帝讓我謙虛，這里讓人自滿的誘惑特別大。” [[31]](#31)  對同僚謙虛從來不是俾斯麥的特點，但他的不安分讓他只能享受到最短暫的自滿。他自認為在上帝和歷史審判中顯得卑微。不過，即使在與上帝的關系中也是他說了算：他唾棄教會和教士的中介。但終其一生，盡管在向自己的健康和國內政敵焦慮地發難時有過各種放肆之舉，他還是保留了一定的節制，并在國務問題上保持清晰的責任感，特別是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以奧地利為首的邦聯議會沒有向普魯士及其代表提供俾斯麥認為他們應得的權力和威望；他對奧地利的虛偽感到憤怒，對每一次輕視反應過度，無論那是否有意。但作為外交官的他處于從屬地位，他在柏林的上級對他采取更果斷政策的請求不屑一顧。政治上的怒火也許影響了他對法蘭克福生活的個人觀點，他覺得這段日子“沉悶得可怕”，并認為外交是一場駭人的騙局 [[32]](#32)  。沮喪之下，他繼續騷擾和挑釁奧地利同事，嘲笑較小邦國的代表（“即使只穿著襯衫，他們也不忘自己是邦聯議會的特使”），并抱怨法蘭克福那些更加世俗的婦女道德敗壞 [[33]](#33)  。權力和智慧一直吸引著俾斯麥，但在邦聯議會或者法蘭克福政界，前者不見蹤影，后者蹤跡罕見。阿姆歇爾·邁耶爾和他的養子卡爾·邁耶爾（Karl Meyer）兼具兩者，并擁有無可匹敵的財富和國際關系網。難怪俾斯麥把他們當做值得關注的對象，而他們也尋求栽培俾斯麥。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整部歷史上，他們一直以自己能在贏家尚未浮出水面前就押對寶為榮。他們已經選擇了迪斯累利（Disraeli）和海涅（Heine）。后來，他們還將發現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但在幾個月的熱情之后，俾斯麥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發生了激烈爭吵，導火索是后者的邦聯官方銀行家身份。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與奧地利政府保持最為密切的關系，正是后者最早給予他們家族榮耀和利益。1852年，因為一件相對不大的事，奧地利和普魯士在邦聯議會發生沖突，羅斯柴爾德家族也被卷入其中。邦聯議會急需籌款支付一支德意志小艦隊船員的薪酬—它承載著對1848年自由主義希望的模糊記憶 [19](#19_1)  。不顧普魯士的反對，奧地利代表邦聯要求羅斯柴爾德家族立即貸款6萬萊茵盾（gulden） [20](#20_1)  。老阿姆歇爾·邁耶爾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俾斯麥的怒火立即降臨到他頭上。在俾斯麥與奧地利代表隨后展開的唇槍舌劍中，后者反復指責普魯士“訴諸最為下流和可恥的手段—伙同猶太人反對邦聯”。俾斯麥則馬上反擊稱，如果“邦聯因為與猶太人的談判而被拖進泥沼”，那么錯誤不在普魯士，而在于奧地利違憲向猶太人求助。意味深長的是，我們注意到普魯士和奧地利多么迅速地把可敬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降格為“猶太人”：顯然，與猶太人的親密關系仍帶有潛在的可恥意味。

俾斯麥的怒火沒有平息，他懷疑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加害怕奧地利而非普魯士。他無視他們的懇求，拒絕了他們的邀請；他還上書普魯士首相奧托·馮·曼陀菲爾（Otto von Manteuffel），要求委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基督徒競爭對手貝特曼（Bethmann）家族為普魯士的宮廷銀行家。普魯士財政部比俾斯麥更加謹慎，他們不敢得罪曾為其提供過貸款幫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34]](#34)  。幾個月后，奧地利大使離開法蘭克福，俾斯麥認為自己是勝利者。他很快反轉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政策，開始爭取他們。他對他們與拮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特殊關系感到遺憾，意識到奧地利為法蘭克福猶太人所做的努力鞏固了這種關系。當下一次機會來臨時，他將把普魯士描繪成這些猶太人的庇護者，并一再建議政府迫使羅斯柴爾德家族這個南德“最有勢力的金融集團”為普魯士效力—這讓不喜歡他們的普魯士財政部長卡爾·馮·波德爾施溫格（Karl von Bodelschwingh）非常惱火 [[35]](#35)  。

1853年，俾斯麥對政府委任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普魯士宮廷銀行家的提議表示支持。此外，他還要求授予卡爾·邁耶爾男爵普魯士三級紅鷹勛章。他在寫給曼陀菲爾的信中表示：“我經常有機會讓自己相信，這個金融集團的領導者將珍視普魯士授予他們的榮譽，因為他們不僅很歡迎個人榮耀，而且還把受政府青睞的官方標志視作對他們信譽的重要支持，特別是那些財政狀況良好的政府。”羅斯柴爾德家族得到覬覦的頭銜，卡爾·邁耶爾男爵獲得紅鷹勛章—不過是為猶太人特別設計的樣式。傳統上，鷹的底座是個十字，但授勛處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后來的猶太人受勛者）設計了橢圓形底座。俾斯麥對這種歧視性裝飾提出警告，因為“所有或多或少獲得解放的猶太人—除了太老的阿姆歇爾，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屬于此列—對于佩戴一件將成為猶太人標記的飾物全無興趣” [[36]](#36)  。卡爾·邁耶爾的反應就像俾斯麥預見的那樣：他拒絕佩戴猶太版紅鷹勛章。不過，俾斯麥與卡爾·邁耶爾的私人關系仍然熱情，未受影響。

1858年，普魯士攝政王（后來的威廉一世）委任俾斯麥為駐圣彼得堡大使。俾斯麥雖然對自己在法蘭克福不滿，但對攝政王將自己派到天寒地凍的北國仍然感到惱火，而且接替他在法蘭克福職位的是無能的烏澤多姆伯爵（Count Usedom） [[37]](#37)  。在1859年3月離開法蘭克福前，他請求卡爾·邁耶爾男爵推薦一位可靠的柏林銀行家。根據傳說，他特別提出必須是猶太人銀行家。也許俾斯麥的確這樣說過，因為他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不太可能推薦其他人，他還清楚，柏林猶太人已經是銀行業的佼佼者。此外，容克貴族經常吹噓自己結識猶太銀行家。也許俾斯麥認為猶太人是獨一無二的天才銀行家，都受到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樣的野心驅使；無論如何，他想要一個完全不會影響自己同羅斯柴爾德王朝密切關系的銀行家。

卡爾·邁耶爾推薦了家族在柏林的效忠者和成功的代理人蓋爾森·布萊希羅德。俾斯麥接受了推薦，在啟程履新前正式委任布萊希羅德為自己的銀行家 [[38]](#38)  。他無疑聽說過布萊希羅德，可能早在1851年就有所耳聞。作為普魯士議會成員和某個議會委員會的報告起草人，他在當時檢視了海貿銀行（Seehandlung） [21](#21_1)  的業務和他用輕蔑口吻所稱的“海貿猶太人”（Seehandlungsjuden） [[39]](#39)  。兩人甚至在19世紀50年代還見過面。俾斯麥對普魯士的金融業肯定有所了解；1856年，他曾被詢問是否愿意出任財政部長。帶著特有的謙遜，他暗示自己無知，但心中卻認為自己能和時任部長波德爾施溫格做得一樣好 [[40]](#40)  。

俾斯麥沒有理由為自己的新銀行家感到有失身份。1861年時，布萊希羅德已經在柏林最核心區域的貝倫街（Behrenstrasse）63號購置了優雅寬敞的宅邸，距離作為俾斯麥未來官邸的威廉街（Wilhelmstrasse）上的城堡只有幾分鐘的步行路程。俾斯麥和父親曾經住在60號，與布萊希羅德的銀行隔街相望 [[41]](#41)  。雖然仍然比不上某些更資深的柏林銀行家（如門德爾松家族），但隨著布萊希羅德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變得日益重要，他的地位正在冉冉上升。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客戶（都是些擁有權勢、財富和才干的人）在柏林時，他們會在位于貝倫街的布萊希羅德府上辦理銀行業務。即使像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和他未來的妻子柯西瑪·彪羅（Cosima Bülow）這樣后來的知名反猶主義者也在那里辦理業務。柯西瑪通過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柏林的布萊希羅德接受父親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禮物。到了19世紀60年代初，布萊希羅德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寧靜辦公室已經名流云集，包括來自宮廷、外交界、藝術界和國際商界的顯要人物 [[42]](#42)  。

布萊希羅德立即開始為俾斯麥服務 [22](#22_1)  。他為俾斯麥收繳官俸和其他收入，償付國內債務，并為其在國外建立賬戶。他還從俾斯麥仍然微薄的資本中拿出一部分進行投資；一部分收入被布萊希羅德轉至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俾斯麥在那里仍然保留著賬戶。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還開始相互通信。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所有理智的銀行家一樣，布萊希羅德對政治消息極為渴求，而俾斯麥不時會幫他的忙。這是布萊希羅德服務的回報。下文將討論他們最初的關系（對兩人都不是特別重要）。他們的人生道路有了交集，但直到1862年俾斯麥返回柏林前，兩人仍在追尋各自不同的野心。不過，他們都明白自己找到了有用的合伙人。

1862年之前，對布萊希羅德最重要的是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親密關系，特別是法蘭克福和巴黎分支，僅這一點就讓他與柏林的其他銀行家有所不同。這種關系證明他的誠實與智慧，而聲譽顯然有助于業務。終其一生，布萊希羅德都在為那個苛刻的王朝服務。正是通過那種服務，他學會了熱情但絕不過分屈膝的效勞和忠誠，這將成為他與俾斯麥關系的特征。

普魯士政府也開始承認布萊希羅德的價值。1858年，他被授予四級紅鷹勛章 [23](#23_1)  。1861年，普魯士商務部長提議授予布萊希羅德“商務顧問”（Kommerzienrat）的頭銜—該頭銜被用來獎賞杰出商人；據我們所知，19世紀60年代有31名柏林商人獲此榮譽，盡管可能遺漏了其他幾個人。作為此類提拔的慣例，部長要求警察總局提交一份秘密報告。通過報告，部長完全證實自己的估計。報告詳細指出，布萊希羅德是一家大型銀行機構的唯一所有人，雇有22名職員。他屬于第17類收入群體，年收入23333又1/3帝國塔勒（約合當時的1.6萬美元），年繳稅700帝國塔勒。報告總結說，布萊希羅德先生“道德品質無可指摘，在政治上是忠于國王陛下的忠誠市民，在各大圈子里享有最高的名譽”。部長的提議獲得批準 [[43]](#43)  。39歲那年，布萊希羅德已經獲得自己的第一個勛位和頭銜。他贏得作為所有公共榮耀來源的王室的青睞。他已經超越自己的父親。

布萊希羅德當然是王室的忠實臣仆。普魯士王室和普魯士猶太人一度相對融洽；王室保護和容忍猶太人，猶太人也容忍和服務于王室。但到了19世紀40年代，猶太人問題開始與普魯士逐漸覺醒的政治生活交織在一起，而猶太人也在1848年德國革命和隨后的德國自由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處于19世紀50年代經濟擴張的最前沿，在某些領域和地區（比如柏林的銀行業），他們為自己贏得顯赫的地位。普魯士實力的發展為猶太人提供巨大的機遇。通過迅捷地利用這些機遇，他們又反過來加速普魯士的發展。

布萊希羅德明白，自己和猶太人同胞的福祉與他們同普魯士國家的關系密不可分。東歐猶太人的動蕩和貧困狀況讓這一切變得非常明顯。于是，布萊希羅德成了普魯士國王的忠實臣民，盡管普魯士官方仍然對猶太人施加種種社會限制。不過，布萊希羅德也有其他效忠對象。幸運的是，直到19世紀60年代中后期，它們很少發生沖突。他更加狹隘和強烈地忠于自己的猶太人同胞，并仍然深切地感到自己屬于一個不同和不平等的群體，正是對這個群體的歧視激發了團結感乃至一絲優越感。19世紀60年代，他當選為柏林猶太人社團的執委，正式展現他對猶太人的忠誠。對猶太人強烈而毫無疑問的認同和忠誠推動他的跨越國界的忠誠，在布萊希羅德身上，這表現為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19世紀60年代初，這三種忠誠仍能和諧共處，但普魯士和歐洲的逆流讓它們面臨撕裂的危險。

[1.](#1_2) 勃蘭登堡侯國最初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為抵御斯拉夫人而建的邊區（Mark）。1356年，查理四世將勃蘭登堡領主提升為選帝侯。1415年，勃蘭登堡被封給霍亨索倫家族的腓特烈，成為普魯士王國的發家之地。——譯注

[2.](#2_2) 憎惡者包括各式各樣的人。早在1832年，激進的德國詩人路德維希·伯爾訥（Ludwig Börne）就在巴黎暗示，羅斯柴爾德家族應該正式加冕歐洲的君主；這會讓他們的無形帝國變得可見，而且作為君主，他們不會再發放苛刻的貸款。他寫道：“羅斯柴爾德家族總是玩弄同樣的把戲，犧牲被他們剝削的國家利益來增加自己的財富。”Ludwig Börne，Sämtliche Schriften（Düsseldorf，1964），III，482-491.

[3.](#3_2) 關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書籍種類繁多，出版動機通常是獲利（該家族應該會贊許這點）。最著名的作品仍然是Egon Corti伯爵的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1770-1830和The Reign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1830-1871（New York，1928），更通俗的作者從中借鑒大量內容。學術性經濟史見Bertrand Gille的Histo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2vols.（Paris，1965-1967）。該題材具有天然的戲劇性；電影和音樂劇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娛樂價值，Virginia Cowles的The Rothschilds：A Family Fortune（New York，1973）對這個家族故事做了精彩描摹。但以現有檔案資料為依據，描繪該家族在歐洲的政治和經濟角色、社會地位以及不同國家對他們的反應的全面歷史仍然尚未面世。這是個浩大的題材。

[4.](#4_2) 此類分析見大衛·蘭德斯對布萊希羅德銀行史的研究，這部分內容我參考了他關于該銀行1845年之前狀況的章節草稿。

[5.](#5_2) 1830年8月布魯塞爾人民舉行起義。同年10月開始的倫敦大會上，英、法、俄、普魯士和奧地利五國宣布承認比利時從荷蘭獨立。——譯注

[6.](#6_2) 1830年11月，一批華沙青年發動起義，翌年宣布波蘭獨立。1831年9月華沙被沙俄軍隊攻陷，起義失敗。——譯注

[7.](#7_2) 隱名合伙人（silent partner），指合伙方出資但不參與實際業務。——譯注

[8.](#8_2) 所羅門·奧本海姆銀行成立于1801年—4年前，新的法國統治者取消了實施350年之久的關于猶太人不得在科隆居住的禁令。奧本海姆銀行很快成為科隆首屈一指的銀行；到了19世紀中期，由于大力推進新的工業冒險和本身的國際聯系，該行成為具有全歐洲影響的企業—就像19世紀70年代的布萊希羅德銀行那樣。Dr.Alfred Krüger，Das Kölner Bankiergewerbe vom Ende des18.Jahrhunderts bis1875（Essen，1925），pp.64-72.

[9.](#9_2) 塔勒（taler）是一種在歐洲流通達數百年的銀幣。1857年，德意志諸邦和奧地利開始使用統一塔勒（Vereinsthaler）。1普魯士塔勒等于30銀格羅申（Silbergroschen，相當于12芬尼，后改為10芬尼）。德意志帝國建立后，1塔勒等于3個金馬克。——譯注

[10.](#10_2) 18世紀60到80年代在德國文學和音樂界出現的變革運動，提倡自然、感情和個人主義。——譯注

[11.](#11_2) 1815—1848年間德國的一種文藝流派，被批評有脫離政治和庸俗化的傾向。——譯注

[12.](#12_2) 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召集，參加者為來自普魯士所有八個省的議會代表。——譯注

[13.](#13_2) 《詩與真》（Dichtung und Wahrheit）是歌德晚年的自傳。——譯注

[14.](#14_2) 波德爾施溫格（1794—1854），普魯士政治家，曾任財政部長和內務部長。——譯注

[15.](#15_2) 他在回憶錄中補充說：“1848年到1866年，我們不得不偏離正途，腳步沉重地穿過國內沖突的荒野，就像抵達福地之前的猶太人，這對我們的未來也許更好。”將不團結的德國人比作大流散中的猶太人，這在此處的背景下頗為有趣。GW，XV，33.

[16.](#16_2) 1848年在法蘭克福圣保羅教堂召開的國民議會，討論以民主方式統一德國。由于沒有實權，加之保守勢力的反對，議會以失敗告終。——譯注

[17.](#17) 1850年5月，奧地利提出恢復邦聯議會并由其和普魯士輪流擔任主席，而普魯士則希望成立以自己為首的埃爾福特聯盟。在奧地利和俄國的施壓下，普魯士被迫簽署《奧爾米茨條約》，放棄領導權。——譯注

[18.](#18) 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位于今天德國和波蘭的北部，歷史上曾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一個省，后并入普魯士。俾斯麥的出生地舍恩豪森莊園即位于那里。——譯注

[19.](#19) 即國民議會艦隊，由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1848年革命期間組建，曾在黑爾戈蘭島附近與丹麥海軍交戰。——譯注

[20.](#20) 哈布斯堡王朝在1754年到1892年間發行的一種貨幣。——譯注

[21.](#21) 設立于1772年，原為普魯士政府為推動海外貿易而成立的公司，1845年開始轉型為國有銀行。——譯注

[22.](#22) 正當俾斯麥離開柏林前往圣彼得堡時（即他把個人事務托付給布萊希羅德之時），一位截然不同的銀行家對他進行了游說。這個名叫列文斯坦（Levinstein）的人—可能也是猶太人—奉上每年3萬塔勒的赤裸裸賄賂，條件是俾斯麥在新職位上同時代表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利益。俾斯麥試圖索取書面憑據，但沒能成功，于是他命令列文斯坦離開房間（事實上是威脅把對方扔下樓梯）。奧地利政府顯然與行賄事件有牽連。俾斯麥意識到，可靠的銀行家可以為其在政府的庇護人提供許多幫助。GW，XV，142-45.

[23.](#23) 亞伯拉罕·奧本海姆曾詢問布萊希羅德，他的勛章是不是為邁耶爾·卡爾男爵特別設計的樣式。布萊希羅德的回復沒有保存下來，但很可能勛章上的鷹采用同樣的非基督徒版本。畫像上的他佩戴者勛章緞帶，但沒有看到勛章本身。奧本海姆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1858年9月27日，布萊希羅德檔案。

## 第二章　俾斯麥的生存斗爭

孩子！孩子！夠了！時間的日駒仿佛被不可見的精靈鞭笞，拖著我們命運的輕車前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勇敢地緊握韁繩，時而向左，時而向右，讓車輪避開這里的懸崖和那里的巖石。誰知道它趕往何方？它幾乎不記得自己從何而來。

——埃格蒙特伯爵，歌德《埃格蒙特》（Egmont），第二幕

帶著對上帝的信賴穿上馬刺，讓生命的野馬和你一起飛躍礫石和藩籬，做好折斷頭頸的準備，但首先不要害怕，因為終有一日你將與大地上一切親愛的東西告別，盡管不是永遠。

——俾斯麥寫給新娘約翰娜的信，1847年3月7日

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相會于他們祖國命運的關鍵時刻。19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普魯士（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積聚了新的能量。民族主義勢力再度興起，而在俄國和美國則開始新的解放斗爭。以新的統治者、新的熱望和決定性戰役為象征，歐洲正上演戲劇性的變化。創立于1815年并在1849年勉強恢復的舊秩序似乎再度岌岌可危，沒有人知道新秩序將會是什么樣。只有歷史學家能在事后看到邏輯和必然性（常常還是錯的），當時的人們只能摸索、隨機應變并做出反應。對于發生巨大流動和變化的時代尤其如此，比如俾斯麥上臺時的普遍狀況。

但那個時代的人對某些東西再清楚不過。19世紀50年代末，作為中歐舊秩序堡壘的奧地利一再遭遇挫折。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對俄國的不幸干預導致它在外交上被孤立，并讓施瓦岑貝格親王（Prince Schwarzenberg）在1849年的警告早早提前變成現實：奧地利對俄國的忘恩負義將震驚世界。 [1](#1_5)  1859年，奧地利又在與新生的意大利（得到拿破侖三世軍隊的支持）的爭奪中失去倫巴第（Lombardy）。這個多民族帝國與新的民族主義顯得格格不入，它的經濟發展也陷入緩慢而不均衡的節奏。北方的較小鄰國正在穩步趕超奧地利。這個古老帝國從19世紀中期開始衰敗，但其間經歷幾波復興和文化大繁榮，并仍有足夠的力量維持古老的榮耀—因此，它長達幾十年的衰敗并不狼狽，有時還被掩飾。

德意志人沒有無視意大利的統一。到了1859年，德意志各地的不同團體（主要由中產階級組成）開始呼吁統一，最好是在自由的普魯士王室的領導下。人們提出大量方案，大多反映出新的現實主義，與催生新一輪民族主義的強大經濟動力保持一致。統一和自由是戰斗口號，自由通常代表對憲政法治國家（而非議會主權）的期望，它將保護公民免受各種國家專制行為之苦。許多團體還呼吁工業自由，并徹底終結對各行業的所有行會限制。支持者堅稱，經濟自由將打破個人的枷鎖，徹底釋放他的潛力，就像一代人之前人們對精神自由的期望那樣。

普魯士的形勢似乎印證了改革派民族主義團體的美好愿望。自從1858年起任兄長威廉·腓特烈的攝政王和1861年正式登基后，威廉得到普遍贊許，被認為開創普魯士歷史的又一個“新時代”。威廉是一位樸素和極為務實的統治者；普魯士軍隊的精神塑造了他的思想和人格。他似乎深諳新的現實主義，并疏遠了兄長神秘和反動的親信們。但幾乎在一夜間，新時代就在舊沖突中終結，國王和議會陷入爭執。

引發憲法沖突的正是威廉的務實：他決定大幅重組普魯士軍隊，因為后者在1859年的奧法戰爭中準備不足。在戰爭部長阿爾布萊希特·馮·羅恩（Albrecht von Roon）的支持以及極端保守的軍事內閣負責人埃德溫·馮·曼陀菲爾（Edwin von Manteuffel）的鼓勵下，威廉要求以削弱大受歡迎的國民軍為代價提升常備軍的規模和重要性。溫和派和自由派都難以接受對國民軍的打壓—自從半個世紀前偉大的改革家博因（Boyen）和沙恩霍斯特 [2](#2_5)  創立新的軍事制度以來，國民軍一直是中產階級的特別驕傲。常備軍是封建特權階級的領地；而在國民軍中，無頭銜者和中產階級子弟可以贏得軍官委任狀并穿上軍官制服。事實上，舊體制已經變得低效，但威廉不僅希望借機強軍，而且還要加強軍國主義元素。

改革的核心是把在常備軍的服役時間從兩年延長到三年—這個改變將產生高昂成本。反對派議員同樣想要一支強大的普魯士軍隊，但錢讓他們望而卻步，而且他們也不愿拆毀早前的體制。他們正確地覺察到，國王的計劃將讓普魯士變成比現在更專制的國家。威廉承認，自己關心的不僅是軍事效率；他在1859年解釋說，新兵只有在第三年才能“理解軍服的尊嚴，命令的嚴肅性，［只有到那時才能］領會等級精神（Standesgeist）” [[1]](#1_44)  。但議會溫和派不想讓士兵們領會的正是這種等級精神（充滿各種狹隘的傲慢）。

最初，政府和反對派都做出妥協。1860年，政府撤回軍隊法案，請求議會通過一份“臨時”法案，為改革提供必要資金，但并不具體授權改變軍隊體制。大部分議員同意了。這份法案的通過被稱為“德國歷史上的決定性事件之一，它讓普魯士的專制和軍國主義國家身份又延續了半個世紀” [[2]](#2_44)  。但妥協無法消弭雙方都不愿看到的沖突。1861年，更堅決的自由派組建進步黨，并在12月的選舉中取得史無前例的勝利。受此鼓舞，他們拒絕通過包含為三年兵役撥款的政府預算。他們依仗錢袋子的傳統力量，政府沒有預算就無法統治。而威廉則抓住槍桿子，他解散下議院，罷免自己的溫和派部長們，并尋求解決方案。前景很不樂觀。3月11日，在寫給巴黎的雅姆斯男爵的私信中，布萊希羅德提到自己之前發去的一封關于解散議會的加密電報：

我從心底確信，這個國家在此次議會解散后仍將保持完全平靜，但如果可能的話，新議會將包含甚至更加民主的元素。如果像我擔心的那樣，在軍隊問題上無法達成妥協，那么三個月后議會將被再次解散，最終選舉法將被修改，反動內閣將上臺，或者議會被整個取消……過去幾天我沒見過財政部長，但在恰當的時候我會這樣做，以便打聽出可能的財政行動，然后立即向您報告。 [[3]](#3_42)

布萊希羅德的總結簡明而富有遠見，并顯示了他本人的保守傾向。

沖突愈演愈烈。國王堅持自己對軍隊的絕對特權，反對派則堅持自己的預算權利不可侵犯。此外，自由派還意識到這場沖突將決定普魯士社會在未來的具體性質。自由派議員大多是律師和官僚，他們的選民是受普魯士三級投票體制青睞的有產階級。企業家把票投給自由派，因為他們想要民族統一、經濟自由和溫和君主立憲制。與查理一世和“長期議會” [3](#3_5)  的類比在當時非常流行，而威廉也毫不懷疑國王和他的臣民“截然不同”。然而，他的對頭們對任何帶內戰味道的東西都鮮有胃口。為此，他們對現有社會抱了太大期望，希望通過法律手段、抗議和拒絕通過預算取得勝利。外國革命的血腥成功（無論英國或是法國）令大多數普魯士自由派恐懼。

他們的猶豫無疑還有另一個理由。自由派很滿意政府的商務政策，在法普商務條約正式簽字前，他們以近乎全票通過了它 [[4]](#4_42)  。查理一世與長期議會在每個問題上都有沖突，威廉和他的議會則至少在經濟問題上達成共識。這點共識削弱了威廉反對者們的動力，但他們還是發現自己陷入僵局，盡管肯定是無心的，不過仍然絕望 [[5]](#5_42)  。

1862年9月，沮喪和絕望的國王威脅退位。羅恩說服他讓俾斯麥來做最后的努力。威廉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羅恩發電報要求俾斯麥從法國返回，后者從1862年春起擔任普魯士駐法大使。那年夏天，當普魯士局勢幾近崩潰時，俾斯麥正沉浸在與年輕貌美的俄國駐布魯塞爾大使夫人卡特琳·奧洛夫（Katherine Orlov）的戀情中，并因此恢復健康與活力。接到羅恩的召喚后，俾斯麥帶著罕見的好情緒回到柏林。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外交工作增進了他對歐洲事務的了解，但自從在法蘭克福起，他便向往著普魯士最高的職位。早在1851年，他就寫信給路德維希·馮·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 [4](#4_5)  ，表示普魯士的外交過于循規蹈矩，只有國王、副官長或外交部長的職位可以滿足成年人的能力和野心 [[6]](#6_40)  。多年來，他更渴望的并非職位，而是獲得權威與合法權力，用更加智慧和直接的方式主導普魯士的命運。47歲那年，這個長期懷有遠大抱負的人物終于從普魯士政治的邊緣進入風暴中心。

在危機的頂峰受到權力的召喚，這對俾斯麥再合適不過。他更善于和對手而非同僚或地位相當者打交道，而議會的反抗甚至限制了國王的選擇自由。俾斯麥相對自由而且鮮有盟友—但他需要干什么呢？

尼采說，一切深奧之物都喜歡面具。而一切偉大統治者都有點像戴高樂（De Gaulle），認為權力應該包裹在神秘中。俾斯麥是個真正復雜的人物，雖然令人困惑的更多是他的直率而非偽裝，但在同時代人看來他卻莫測高深。大多數歷史學家也覺得他無法理解，最糟糕的是，從成功開始回顧他的人生。因為這種視角忽略了他的斗爭歲月，當時他正在摸索解決之道—那些年對他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也特別重要。

很難簡短地概括俾斯麥在成為國王首席大臣時的目標或希望 [[7]](#7_40)  。與所有偉大領袖一樣，性格和政策密不可分；人不是由獨立的部分組成，特別是像俾斯麥這么卓越的人。1862年，他的成就即將實現，造就其偉大的是他打破常規的智慧、隨機應變的能力、強烈的自信、無限的能量、唯我獨尊的意志和百折不撓的勇氣。盡管如此，他的品行上也存在缺陷：在政治生涯的開始，他傲慢而且以嘲諷世人為樂；在最后，他鄙視他人，憤世嫉俗，喜歡把人當做工具，用完了就一棄了之。最重要的是，他極為看重現實主義。他從生活和政治中獲得大量實用知識，無論是理論家或多愁善感者，還是目光偏頗或僵化者都令他厭惡至極。正是務實天性讓他欣賞那位利益超越國界但目標專一的銀行家 [[8]](#8_40)  。

1862年上任時，俾斯麥并無具體計劃。他試圖維護普魯士君主在國內的權威，提高其在國外的影響力，因為他把強大的王權視作阻止革命和混亂反復發生的保障。他在法蘭克福時已經深信德意志邦聯的無能，邦聯由奧地利主導，因此對普魯士的利益有害。1856年，他致信普魯士首相，表示“由于維也納的政策，德意志無法同時容下我們兩國” [[9]](#9_38)  。但他也意識到，奧地利的力量已經無法繼續讓它在德意志頤指氣使。

俾斯麥對利用奧地利的弱點和孤立處境毫無顧忌。他也明白，奧地利正在為走出孤立做絕望的努力。普魯士保守派—比如利奧波德·馮·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此人是俾斯麥在宮廷最早的庇護人，在宗教和政治原則上毫不妥協—他認為，德意志邦聯和1815年的決議是阻止德意志革命者的神圣堡壘。當時，大多數人認為，分歧的焦點在于，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希望統一，而普魯士君主制勢力則想要維持現狀。俾斯麥改變了這種等式：也許民族主義可以被用來為君主制服務。通過實行他所謂的“令人不快的利益政治”（ungemütliche Interessenpolitik），通過取代奧地利成為德意志的主導力量—也許可以通過此類方式讓普魯士的貴族君主秩序得以留存 [[10]](#10_37)  。這是他的總體方向，他原則性的無原則做法是疏遠昔日的盟友和爭取過去的敵人。時勢無疑有利于他的計劃：奧地利正在衰退，德意志民族主義正在興起。不過，也許沒有人能和他一樣靈巧地利用當時盛行的風向和潮流 [[11]](#11_37)  。

1862年秋，俾斯麥可能選擇任何道路—只要它們可以立竿見影地讓普魯士強大起來。他對自己不合常規的觀點毫不在乎。履職幾周后，他告訴迪斯累利：“我會抓住第一次最好的借口向奧地利宣戰，解散德意志議會，降服小邦國，實現普魯士領導下的民族統一。” [[12]](#12_35)  1862年11月和12月，他又重申這些警告。他告訴奧地利外交官，自己對“手足相殘之戰”這樣的字眼并不感冒，奧普關系必須改善，否則就會惡化甚至可能兵戎相見。“我們必須為自己的政治存在爭取必需的空氣（Lebensluft）。” [[13]](#13_31)  他對自己可能意圖的另一次坦誠預言震驚了法國大使塔列朗伯爵（Count Talleyrand）：普魯士寧愿離開邦聯，也不允許奧地利將邦聯用作反普魯士的工具；這樣的決裂將導致戰爭，“只要戰鼓響起，我們就會派兵占領它們［漢諾威、黑森和薩克森］。我們將在南北德之間畫出分界線，在那條線后站好陣腳”。當被問及如果德意志形勢“激化”，拿破侖會做何反應時，塔列朗回答說，自己將難以“保持冷靜” [[14]](#14_31)  。

俾斯麥理解當時德意志社會特有的大量期望。他意識到經濟利益的政治重要性；早在1851年，他就在寫給朋友利奧波德·馮·格拉赫的信中表示，普魯士應該及時關注德國的物質問題：“在這些問題上首開先河的權力機構，無論是邦聯議會、關稅同盟（Zollverein） [5](#5_5)  或普魯士政府，都會在爭取受惠群體的同情時大占優勢……” [[15]](#15_29)  他相信大多數人把物質考慮放在政治忠誠之前，并很可能認可蘭克 [6](#6_5)  關于人“總是首先追求兩件東西—榮耀和財富”的觀察，盡管蘭克認為生命中應該有更高的目標，但俾斯麥可能會視其為純粹的虔誠 [[16]](#16_29)  。俾斯麥敦促普魯士應該支持“通過物質利益的紐帶鞏固健康的北德元素”，甚至不惜犧牲關稅同盟中南德成員的利益 [[17]](#17_23)  。他對奧地利嘗試加入同盟并使之滿足其保護主義需要的舉動提出警告，并反對奧地利人將德意志商務政策置于法蘭克福議會多數派之手的一切企圖。他贊同歷屆政府的主流觀點，即普魯士應該致力于實現對外貿易的更大自由，并大力支持1862年的法普貿易條約，該條約促進貿易自由，還讓普魯士進一步融入西歐充滿活力的經濟生活。他一眼就看出與法國簽署這份條約的政治意義，并在1862年圣誕節起草的備忘錄中向威廉陳說其優點 [[18]](#18_23)  。俾斯麥特別關心統治階級的經濟需求和欲望，這些人大多擁護條約。他知道物質繁榮能增強國力，并弱化有產階級的革命熱情或意識形態。

與俾斯麥本人和后來的德國歷史學家的慣常描繪不同，他并非對經濟一無所知。作為容克貴族，他曾經打理自己的莊園，總是對獲得更大利潤和擁有更多土地保持適度胃口；作為外交官，他曾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共餐，見證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力量。誠然，與稅收和關稅問題或市場波動相比，他更關注歐洲的外交形勢。但他并未忽視19世紀的現實，以至于輕視物質元素在他和國家生活中的角色。

除了國王看似絕望的要求與對手們的舉棋不定，俾斯麥幾乎沒有什么可仰仗的。很少有人認為他能堅持下去，大多數人相信他會因為自己的魯莽而倒臺。他向威廉承諾不放棄軍隊法案（包括三年制兵役條款），哪怕沒有足夠授權的預算也要推行政令。但從一開始，他就在幕后尋求妥協。盡管經常對議會加以威脅和抱以鄙視，但如果能夠避免的話，他不希望訴諸赤裸裸的專制。他并不覺得有必要實行三年制兵役，上臺幾周后，他似乎開始傾向于朋友羅恩試圖推行的巧妙方案：允許一些士兵“買斷”第三年服役期—法國有類似制度。該計劃的狡詐讓深入研究過它的一位學者懷疑俾斯麥參與其中：一方面它讓議員保住臉面（他們的兒子如愿縮短了服役期），與此同時它還帶給政府完全不受議會干涉的大筆額外收入。不過，總是得到極端反動的朋友曼陀菲爾支持的威廉駁回了這個方案。俾斯麥不得不尋找其他解決辦法 [[19]](#19_19)  。

俾斯麥的朋友或盟友寥寥無幾。國王對這個暴躁而善變的家伙心存懷疑，他在一天里產生的想法和計謀讓威廉用一年都無法消化。王儲也和大部分自由派一樣不信任俾斯麥，他表示：“可憐的媽媽，她的這位死敵得到任命會讓她多么痛苦。” [[20]](#20_19)  俾斯麥的許多同僚也害怕他，不知道這位跋扈的上級將把他們引向何方。

俾斯麥和羅恩是朋友，但對自己身邊的其他人抱以鄙視，無論是能干的對手、無能的同僚還是議會中礙事的理論家，并輕蔑地稱國王的一位首席外交官為“烏澤多米婭”（Usedomia） [7](#7_5)  。不過，盡管與同僚關系緊張，他不得不等待差不多十年之久才能安插自己的人選（即使到那時，他仍然承認自己情愿與任何敵對外國勢力商談最棘手的問題，也不愿與普魯士的戰爭部長達成協議） [[21]](#21_19)  。在此之前，他需要來自政府慣常渠道之外的專家建議。他需要視野廣闊和智慧出眾的人，他們既樂于效勞又不會取代自己。

這種需要成了布萊希羅德的機遇。但在1862年9月和后來的一段時間里，布萊希羅德完全沒有預見到自己（或俾斯麥）即將面對什么。他仍然謹慎而多疑。他主要關心自己的生意，而俾斯麥的看似魯莽可能會激化憲法沖突和傷害經濟。

布萊希羅德在憲法沖突的雙方都有朋友，對雙方都抱有同情。幾名議員領袖是他的朋友和主顧；他的猶太人同胞通常傾向于議會和反對國王，并不特別認同黷武派不合時宜的觀點，即軍隊及其封建特權是最神圣的。普魯士猶太人信奉自由主義：在1858年到1866年間選出的160位猶太選舉人（Wahlmänner） [8](#8_5)  中，92%把票投給自由派 [[22]](#22_19)  。俾斯麥在議會的反對者是利益與社會休戚相關的有產者—于是布萊希羅德的某些天生的朋友和伙伴不情愿地成了當局的反對者 [[23]](#23_19)  。另一方面，布萊希羅德與內閣乃至宮廷關系密切，他的主顧中包括一些血統最高貴的貴族 [9](#9_5)  。與大多數銀行家一樣，布萊希羅德天性親近、支持并忠于政府。當他因為可靠和杰出而成了俾斯麥的選擇后，這種天性變成固定策略。

在俾斯麥上臺后的最初幾個月里，布萊希羅德是得天獨厚的觀察者—對后世而言幸運的是，他把自己的印象和俾斯麥的內幕消息分享給自己最看重的聯系人：巴黎的雅姆斯男爵。除了貝倫街和拉菲特街（rue Laffitte）之間的每日商務信件，布萊希羅德還用自己的華麗字體親筆寫私信。這些信件有時用密碼寫成，或者為逃避無處不在的監察而將關鍵字詞或名字轉寫成希伯來文。它們向雅姆斯男爵提供一位銀行家和政客看重和可以利用的那類情報—他從世界各地居于重要位置的人那里收到的正是此類情報。布萊希羅德寫給雅姆斯男爵的密信是分析他對俾斯麥的早年時運以及他與這位首相關系看法的重要依據。它們是一位銀行家對動蕩時代印象的獨一無二的記錄。它們還反映出布萊希羅德與邁耶爾·阿姆歇爾五個兒子中碩果僅存的那位的不平等關系，并暗示他將逐步全盤接受俾斯麥的主張 [10](#10_5)  。

1862年9月24日，幾乎就在俾斯麥剛回到柏林后，布萊希羅德致函雅姆斯男爵：

我們陷入內閣危機！作為首相的馮·俾斯麥—舍恩豪森先生正在忙著組建新的內閣。戰爭部長羅恩留任，這足以證明議會與國王的沖突不會因內閣的改組而被解決……伯恩施托夫伯爵 [11](#11_5)  和馮·德·海特 [12](#12_5)  已被罷免。關于新內閣，沒有任何確切消息，但似乎我們將迎來一個完全反動的內閣。波德爾施溫格經常被提及將出任財政部長…… [13](#13_5)

他補充道，危機讓市場蕭條，特別是普魯士證券市場 [[24]](#24_17)  。

一周后，俾斯麥出現在議會預算委員會面前，并暗示自己的行動方向。他將用對外勝利來贏得國內的默許。他談到普魯士一再失去外交政策的“有利時機”，為了增強祖國的實力，必須要抓住這些時機：“維也納條約劃定的邊界不利于這個國家的健康存在。今天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決定所能解決的—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錯誤—而是要靠血和鐵。” [[25]](#25_17)  對俾斯麥而言，這是從他經驗中提煉的自明之言；但對自由派議員和他們在公眾中的支持者而言，這是尋釁之詞。俾斯麥開始被視作反動和黷武的“權宜人選”。當時，沒有人能預見到這個“反動”政府的大膽和革命性特點。

在一段時間里，布萊希羅德仍對俾斯麥的立場頗有微詞。他看不到解決日益加深的危機的辦法，和所有人一樣，他也聽說了大量常常自相矛盾的流言，比如新內閣可能被罷免，議會將被解散和宮廷搖擺不定。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布萊希羅德很少見到俾斯麥，因此幾乎不比大多數柏林消息最靈通的人士知道得更多。普魯士政治的不確定讓曾經活躍的商界陷入沉寂，布萊希羅德苦惱不已。

不過，到了1862年底，布萊希羅德已經獲得接近俾斯麥的特別機會，他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信也開始反映了俾斯麥的內幕消息。這些信件無疑也是為了讓雅姆斯男爵認識到布萊希羅德新的重要性—因此，信中對俾斯麥內閣即將倒臺的一再預測就有了特別意義。如果布萊希羅德能讓雅姆斯男爵相信自己的新消息源在一定程度上穩定，這本該對他的利益更有好處。

1862年12月末，布萊希羅德報告說：“根據來自馮·俾斯麥先生的私人消息”，同議會的沖突將不會在下次開會時解決。1月18日，議會重開幾天后，他又堅稱“人們對改組內閣做了大量討論，但并不朝著有利于自由派的方向。俾斯麥辭職似乎近在眼前，馮·德·海特（俾斯麥拒絕了他）正被醞釀作為財政部長進入內閣，但體系不會改變”。他報告說，國王仍在生病，并正比以往更認真地考慮退出國家事務。一周后他寫道：“我們的政局看上去不樂觀……現任內閣的不受歡迎程度是普魯士歷史上所罕見的。”如果俾斯麥不被罷免，那么議會就將被解散，隨之而來的是新的限制性選舉法，那將標志著與憲法的最終決裂 [[26]](#26_15)  。布萊希羅德早早地正確預見到，俾斯麥正試圖擺脫三級選舉制度。在該制度下，以犧牲下層階級利益為代價，有產者（恰好是自由派）的代表占據著優勢。布萊希羅德的信件印證了俾斯麥同時代人的不確定和迷惘，和首相一樣，他們也不知道政府如何讓自己或普魯士走出當下的僵局。

1863年，又一場危機爆發：長期受到俄國嚴苛統治折磨的波蘭人揭竿而起，俾斯麥馬上尋求幫助俄國人鎮壓叛亂。俾斯麥迅速征調部分普魯士軍力和與俄國人達成協議（所謂的《阿爾文斯勒本條約》［Alvensleben Convention］）的舉動觸怒了法國人和英國人；此舉還激怒了普魯士自由派，他們不愿看到本國為虎作倀，幫助俄國鎮壓尋求自由的勇敢的波蘭人。另一方面，俾斯麥擔心的卻是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可能屈服于俄國改革派并向波蘭人讓步，從而鼓勵后者在普魯士占領的波蘭省份中制造麻煩。與大部分德國人一樣，俾斯麥特別仇視波蘭人。

這場危機期間，布萊希羅德定期向雅姆斯男爵提供關于普魯士軍事和政治動向的消息。“與我談過話的馮·俾斯麥先生”是此類權威報告通常的來源。俾斯麥沒有預料到西方強國或國內政敵會發起如此猛烈的抗議浪潮，他利用布萊希羅德安撫法國人，并表達對拿破侖三世居然會把《阿爾文斯勒本條約》視作“宣戰理由”的驚愕 [[27]](#27_11)  。俄國人最終取消了條約的軍事條款，獨自鎮壓波蘭人，但俾斯麥的地位已經發生動搖。2月21日，布萊希羅德預言危機將導致政府在幾天內垮臺。他援引“靈通的消息來源”，表示俾斯麥并非條約的始作俑者，條約是威廉的軍事內閣在俾斯麥“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的。這種很不可信的說法也許來自俾斯麥本人。2月27日，俾斯麥對英國大使安德魯·布坎南爵士（Sir Andrew Buchanan）說了同樣的謊言 [[28]](#28_5)  。危機期間，俾斯麥遠沒有像后來在回憶錄中或者歷史學家直到最近還常常做的那樣對條約感到得意 [[29]](#29_5)  。俾斯麥利用波蘭起義贏得俄國人友誼的企圖常常被稱為他的高明一擊，但此舉幾乎讓他職位不保。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承諾，自己將用復雜密碼寫成的電報告知俾斯麥辭職和替代者（無論是反動派還是自由派）的消息 [[30]](#30_1)  。根據布萊希羅德從“國王私人內閣”獲得的消息，俾斯麥已經遞交辭呈，并正在被認真考慮。他接著說，如果俾斯麥走人，市場將出現積極反應。布萊希羅德還報告說，議會抨擊了《阿爾文斯勒本條約》，并以246票對57票否決了俾斯麥的政策 [[31]](#31_1)  。俾斯麥反過來指責反對者無知和叛國。他想要讓議會休會，但內閣拒絕了他；只有羅恩對他表示支持并寫來一封信，信中充滿了對內閣分裂和E（內政部長弗里茨·奧伊倫堡伯爵［Count Fritz Eulenburg］）的絕望，認為E或者對事態不夠重視，或者不愿“切斷所有退路”。總有一天，奧伊倫堡的朋友們“諾亞（Noah）、沃爾夫斯海姆（Wolfsheim）、雅各比（Jacobi）和其他混蛋，無論是否受過割禮 [14](#14_5)  ，都會背叛他并讓他舉步維艱”。羅恩最后表示：“你、我和波德爾施溫格在這件事中牽涉最深，如果我們因為無能而失敗，我將不愿茍活下去。” [[32]](#32_1)

俾斯麥的倒臺似乎近在眼前，但布萊希羅德知道，如果罷免首相，國王將不得不同時放棄自己的政策：“沒有人能像現任首相那么服眾。” [[33]](#33_1)  布萊希羅德的報告足夠清楚地指出，俾斯麥犯了錯，一度讓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也許他已經讓情況變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國王找不到其他人收拾殘局。隨著俄國人無情地鎮壓了波蘭人，眼前的危機得到緩解，威廉保住了他四面楚歌的首相。

布萊希羅德關于危機的報告迅速而準確。他提供給雅姆斯男爵的情報與柏林各大使館提供給本國外交部的一致，而且至少同樣迅速 [[34]](#34_1)  。對于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在危機的那幾周里，俾斯麥開始把布萊希羅德當成心腹和特別渠道。他們定期“會談”，經常每周數次。布萊希羅德沒有隱瞞自己的新關系，他得意洋洋地對雅姆斯男爵說：“為了摸清外交政策，我借機拜訪了馮·俾斯麥先生”，“今天我借機與我著名的消息源做了長時間交談”，或者更簡潔地表示“內閣今天未收到值得注意的信件” [[35]](#35_1)  。

布萊希羅德開始把自己看作俾斯麥的秘密合作者，看作普魯士政府首腦的特別顧問。反過來，俾斯麥清楚自己傳達給布萊希羅德的任何信息都將很快流傳到巴黎和倫敦，于是向后者提供經過選擇的零星真相。全部真相只有他本人知道。他把布萊希羅德與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法國政府關系密切）的聯系視作同巴黎的常規外交關系之外的有用補充，特別是因為他不把駐巴黎大使羅伯特·馮·德·戈爾茨（Robert von der Goltz）當成朋友。戈爾茨伯爵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對普法關系也有自己的理解—這是俾斯麥無法原諒的兩項死罪 [[36]](#36_1)  。

到了1863年春，普魯士的憲法沖突變得更加激烈，布萊希羅德也因此變得更加悲觀：“從中立者視角出發，只能說我們的國內政治非常糟糕。”僵局在延續；國王不愿放棄軍隊改革，議會則拒絕批準授權改革的預算。議會以壓倒多數否決了內閣的提案—1863年5月的一次重要投票的結果是295比5—“國王對這些情況感到憤怒，他的親信則鼓動他無視民眾的代表。” [[37]](#37_1)  俾斯麥希望自由派議員會厭倦他們的反對立場，特別是如果他能夠證明，脫離民眾的是他們而非政府。與此同時，他公開指責議員，并在私下向朋友約翰·羅斯洛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 [15](#15_5)  抱怨這個“充斥陳詞濫調的議會”：“我不得不提出抗議，這些空談者實在無法統治普魯士，他們沒什么頭腦卻過于洋洋自得，［他們］愚蠢而又專橫。” [[38]](#38_1)  到了1863年春，俾斯麥已經確立實質上的獨裁。他無視議會，騷擾自由出版物，并尋求清洗官僚隊伍；他向友人吐露心聲，認為也許必須完全拋棄憲法 [[39]](#39_1)  。與此同時，他為了自己的目的濫用憲法，憑著牽強的合法性借口就決定政府可以繼續像過去那樣收稅，即使議會沒有批準預算。他正在玩一場大膽和高深莫測的游戲，期待同時贏得多重優勢。通過使國內局勢無限復雜化，他讓自己變得對威廉不可或缺；想要犧牲俾斯麥，國王必須同時犧牲自己的原則。至于議會，俾斯麥對議員抱以鄙視，希望這樣能讓他們變得可鄙。此外，普魯士在德意志的角色也正在削弱。如何結束這場讓國家元氣大傷的沖突呢？國王和議會最終會接受他嗎？

當時的俾斯麥冒著巨大風險。在回憶錄中，他想起1863年春朋友們曾建議他應該把克尼普霍夫（Kniephof）莊園轉讓給兄弟，因為議會的正式強制令規定，違憲支出要由部長本人及其財產承擔 [[40]](#40_1)  。反對派無疑希望剝奪俾斯麥的職位和財產—如果他們能找到有效與和平的方法。

對布萊希羅德和當時的大部分觀察者而言，普魯士政治似乎注定將進一步變糟。形勢似乎毫無希望。他在5月17日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說：“請允許我為您簡短描繪一下我們國內的嚴峻狀況，這種狀況不幸地有利于為外敵打開大門，并［將］削弱普魯士的國力，如果它長時間持續下去的話。”議會與國王的沖突上升到新的高度，但政府既不愿面對也不愿解散議會。通過無視議會，政府“希望贏得公眾的支持。我認為政府在相當拙劣地自欺欺人，因為八分之七的民眾站在議會這邊，渴望內閣發生改變”。但這樣的改變不太可能，因為國王相信議會已經走得太遠，“和解等同于示弱”。出路就這樣被堵死了，“在上述狀況下，貿易和商業無疑受到重創” [[41]](#41_1)  。

隨后的幾周里，雙方的立場變得更加強硬。5月22日，議會在向國王上奏時抗議政府一再違反憲法，并警告說“普魯士在德意志甚至在歐洲都幾乎被孤立……每次［同內閣］的談判都讓我們進一步相信，國王的顧問和國家間存在著鴻溝，只有通過人事乃至體制改變才能消除” [[42]](#42_1)  。而俾斯麥則無疑認為，鴻溝存在于議會和國家間。即使溫和的自由派也發出激進論調，赫爾曼·鮑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6](#16_5)  致信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表示反對派過于溫順：“必須讓鄙視憲法、法律和理性的人發抖。我們必須喚起他們的恐懼，讓他們知道自己終有一天將像瘋狗那樣被殺死……讓俾斯麥得意一小會兒吧，我認為革命也將不可避免。”西貝爾回信稱，能夠震懾內閣的不是話語而是武力，是不忠誠士兵的威脅 [[43]](#43_1)  。

5月24日，布萊希羅德再次送給雅姆斯男爵一份對這場沖突的小結，因為就像他所說（很有預見性！），普魯士的國內狀況“將在歐洲政治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議會對軍隊改革的苛刻行為讓政府變得強硬，而在反動派顧問的包圍下，國王也選擇了極端封建反動的方向，盡管他的性格無比正直”。（“盡管”后面的話含蓄地區分了封建反動和正直性格，這是布萊希羅德本人立場的少數例證，他保守但愿意妥協，而非反動和好戰。）布萊希羅德還表示，政府堅持自身的違憲立場，但在國王決心推行新的選舉法之前不愿解散議會，“當前尚無法說服他這樣做”。布萊希羅德的書信暗示俾斯麥試圖說服國王頒布這樣的法律—這進一步表明，1863年春，俾斯麥正在考慮政變 [[44]](#44)  。俾斯麥如實告訴布萊希羅德，議會將不會被解散，而國王正就采取何種政策與其展開“激烈斗爭”。布萊希羅德可能低估了他這位可敬朋友的力量和智謀，他寫道：“普魯士的命運掌握在國王手中。”

布萊希羅德還認為，“很大一部分民眾站在議會這邊，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慎重的人覺得議會走得太遠” [[45]](#45)  。如果精明的市民（布萊希羅德很可能將自己歸入其中）覺得對普魯士憲法的合法、非暴力和頑強的捍衛都被視作走得太遠的話，那么議會中的自由派將注定失敗。與此同時，自由派領袖維克多·馮·翁魯（Viktor von Unruh）批評“富裕的中產階級對政治漠不關心……但如果富裕的中產階級和富有的公民缺乏政治神經和堅定立場，那么顯然政治壓迫將不斷加強，直至下層階級揭竿而起” [[46]](#46)  。與西貝爾和許多自由派一樣，翁魯擔心如果自由派失利，國家和自由派將面對專制主義或革命的可悲選擇。另一方面，俾斯麥指望依靠民眾的保守態度，希望孤立自由派議員，向國民證明他們的代表事實上多么不具有代表性。

當時的普魯士自由派令人同情地指望沖突自然解決，寄希望于威廉的駕崩和自由派王儲腓特烈·威廉的登基（他迎娶了維多利亞女王之女），這充分展現了他們的政治觀。但布萊希羅德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公眾普遍相信王位繼承者持徹底的自由主義立場，但他和妻子卻在圣靈降臨周期間 [17](#17_3)  穿越阿爾特馬克（Altmark） [18](#18_3)  ，前去拜訪當地的封建反動派領袖” [[47]](#47)  。

5月27日，議會開始休會。6月1日，盡管國內完全風平浪靜，國王卻行使緊急權力，發布旨在讓所有反對派報紙閉嘴的出版法令。甚至王儲也被驚動——但很快遭到噤聲。在王儲對出版法令提出抗議后，俾斯麥告訴布萊希羅德，王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重申反對。布萊希羅德同樣感到吃驚。他認為，“相當嚴格的出版法”之后將很快出現限制憲法規定的集會權利的法令，最終則將是“針對公務員的綜合性懲罰程序”。下次開會時，議會將否決這些壓迫性法規；然后議會將被解散，選舉將在國王推行的新選舉法下舉行。“如果這都不能成功，那么我們可以大膽地相信將發生政變。盡管發生了這些事，國家仍然完全風平浪靜，就像人們經常提到的，違憲只存在于外部事件中！” [[48]](#48)  另一些人希望平靜只是欺騙性的，甚至像海因里希·馮·特萊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這樣的溫和自由派也相信“現在，革命只是……在等待合適時機……蒙神恩的王室需要有益的、嚴肅得可怕的懲戒” [[49]](#49)  。

布萊希羅德關于國內沖突的報告既準確又極其公正。他的書信還反映出其本人的觀點。和俾斯麥一樣，布萊希羅德也是個務實的人，不相信抽象原則。根據布萊希羅德的教育和經歷，沒有什么能讓他承認預算權斗爭和個人自由間存在聯系——即使他特別看重后者。對布萊希羅德和其他有產者而言，這場斗爭是少數人的野心和頑固對公眾的妨礙。布萊希羅德認為，政治是個人的斗爭；決定君主政策的總是國王的傾向及其謀士的陰謀，很少是關于問題的沖突。他反對議會的阻撓和極端的封建反動。他很可能也不認可政變。和其他許多商人一樣，他希望沖突能得到解決，讓國家重新向繁榮進軍。

布萊希羅德比大多數人更清楚，俾斯麥致力于推動向繁榮進軍。他了解俾斯麥對經濟的興趣（無論是個人還是作為政府首腦），知道俾斯麥關心自由貿易和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商業霸權。俾斯麥把普魯士的繁榮視作權力工具，布萊希羅德則把它當成目的本身。但俾斯麥的政策和他對經濟顧問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支持讓大多數商人高興，甚至連最直言不諱的自由派也支持俾斯麥的經濟政策。俾斯麥和對手間既有沖突，也有共識——這既鼓勵俾斯麥，也削弱他的對手 [[50]](#50)  。

布萊希羅德是個愛好和平的人，因為和平是繁榮的先決條件。他也是個精明的人。俾斯麥的繼任者會給予他同樣的獨家信任，就像俾斯麥在第一年任期內所做的那樣嗎？還有哪個猶太銀行家如此頻繁和熱情地受到普魯士首相的接見？布萊希羅德很可能是最受政界青睞的商人——這并非沒有理由。

1863年6月，布萊希羅德報告說，國王將很快前往卡爾斯巴德（Karlsbad），很可能在那里會見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ph） [19](#19_3)  —他的確這樣做了 [[51]](#51)  。在那個多事之夏，布萊希羅德似乎中斷了與雅姆斯男爵的私信往來，兩人很可能分別去了某個著名的溫泉浴場，在當地的自然風光中，歐洲的精英們正忙著調養身體和籠絡關系 [20](#20_3)  。

普魯士的國內危機加劇了，就像布萊希羅德預料的那樣，來自國外的壓力讓情況可能變得更糟。1863年夏，察覺普魯士弱勢的奧地利開始推行在奧地利人領導下加強德意志邦聯的計劃。作為第一步，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邀請其他德意志邦國的君主在法蘭克福開會商談奧地利的提議。威廉認為自己有義務參會，但俾斯麥——這是他政治生涯早年的最大危機之一—堅決認為國王不應該去。俾斯麥擔心普魯士在法蘭克福受到孤立和被迫屈從，于是說服國王謝絕邀請，并針鋒相對地提出自己的計劃，要求確立普魯士和奧地利的雙頭領導，并建立民選的民族議會。他仍然堅持早前的理念，即奧地利必須為與普魯士合作付出代價，否則就免談。與此同時，他試圖通過民族議會的提議拉攏德意志民族主義支持普魯士。兩大強國的角力進入新的關鍵階段，在與俾斯麥會談后不久，布萊希羅德于9月28日報告說：“德意志問題仍然留待未來解決，但普魯士目前對德意志，特別是對奧地利的立場從長期來看行不通，必將造成混亂。” [[52]](#52)  引發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提出警告的很可能就是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奧地利王室關系密切，對財政狀況搖搖欲墜的奧地利帝國而言非常重要。最好盡早和時常提醒他們，普魯士試圖利用奧地利的虛弱實現自己的霸業。經過這場危機，俾斯麥變得更加強大，甚至他的某些國內政敵也不情愿地支持他對奧地利的蔑視，至少他保住了普魯士的行動自由 [[53]](#53)  。

不過，隨著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危機的爆發，俾斯麥被迫陡然改變計劃。1863年3月，丹麥國王腓特烈七世（Frederick VII）頒布憲法令，試圖把石勒蘇益格進一步拉向丹麥，盡管他一再保證這兩個公國不會被分開。此舉讓關于這兩個公國由來已久的問題再次被放到聚光燈下。這些公國的命運曾在1848年點燃過德意志民族主義情感，但革命的失利導致自由派在北方遭受嚴重挫折。1852年的《倫敦條約》恢復丹麥對兩個公國的統治，但規定兩者特殊的聯合狀態應該被保留，而荷爾斯泰因則仍然是德意志邦聯的成員。盡管《倫敦條約》做了如此安排，但丹麥人還是希望創立單一的國家。1863年的整個春天和夏天，在較小德意志邦國的推動下，法蘭克福議會對該問題表達了擔憂。布萊希羅德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提到該事件：5月1日，他向雅姆斯男爵透露，“我們的內閣計劃發行5000萬塔勒公債用于海軍，但后來……改為用于波羅的海防務，數額減少到3000萬”。政府推遲向議會的申請，因為它知道肯定會被拒絕。布萊希羅德感到新危機的嚴重性，他報告說，俾斯麥告訴他，丹麥事件可能“在未來引發嚴重糾紛”，但三個月內不會有事，因為軍隊還沒準備好 [[54]](#54)  。這個警告一語成讖。

關于兩個公國的危機在1863年秋加深。9月末，布萊希羅德報告說，法蘭克福議會準備對違反《倫敦條約》的丹麥發出軍事威脅。他預測丹麥不會讓步，并表示市場受到打擊 [[55]](#55)  。11月，丹麥議會通過憲法法案，將石勒蘇益格并入丹麥。兩天后，腓特烈七世意外去世，沒有留下直系繼承者。現在，即位問題和關于兩個公國的爭端被攪在一起。民族主義情感被完全調動起來的丹麥人擁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為新國王，后者馬上簽署吞并石勒蘇益格的憲法。另一方面，大多數德意志人堅稱，按照他們的古老法律，親德的奧古斯騰堡（Augustenburg）親王最有資格成為兩個公國的統治者 [21](#21_3)  。這個錯綜復雜的問題給歐洲的和平投下陰影。

布萊希羅德報告說，奧古斯騰堡親王已經造訪柏林，但沒能贏得俾斯麥的支持。此外，“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事件在證券市場引發一波巨大的恐慌，股價下跌3.5%，但仍然無法提起任何買家的興趣” [[56]](#56)  。商界擔心出現軍事糾紛，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在像當時那樣的太平年月里，上述跌幅相當可觀。

1863—1864年冬，布萊希羅德經常與俾斯麥見面，但他向雅姆斯男爵的報告大多集中在俾斯麥對錢的需求上。布萊希羅德很少提及首相的復雜政策—也許因為他對此知之甚少。很少有人能猜到俾斯麥的意圖。對俾斯麥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困難時刻，他必須在不損害普魯士有利外交地位的前提下打擊丹麥人，必須同德意志民族主義和所有站在奧古斯騰堡那邊的較小德意志邦國較量，必須擊退奧地利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聯盟。他還必須爭取威廉的支持，后者傾向于奧古斯騰堡，而俾斯麥則認為在北方鄰邦扶植一位自由派親德親王全無益處。眼前需要避開的礁石，比作為目標的海岸更加清晰。他逐步設計讓奧地利人與普魯士結成統一陣線，使他們疏遠別的德意志邦國。兩個公國的最終命運仍然不明，也許由普魯士吞并它們是俾斯麥早期的目標。他的成功取決于每一步表面上的明確和有邏輯，以及最終目標的不可預測。

危機期間，俾斯麥在國內沒有盟友，普遍受到懷疑。大多數德意志人傾向于奧古斯騰堡即位，但俾斯麥表示反對。如果不選擇奧古斯騰堡，大部分普魯士人希望普魯士吞并兩個公國，但俾斯麥絕不會公開承認這個目標，因為那將危及奧地利的支持并招來歐洲的敵意。俾斯麥一度以《倫敦條約》的捍衛者自居—該立場讓他在國外贏得好評，在國內卻并非如此。這場風波中，俾斯麥遭受從未有過的對其錯誤的譴責。他甚至無法為自己辯護，因為那將減少他成功的機會。他拒不辭職并堅持自己的政策，當勝利最終浮出水面時，他的命星因為曾經晦暗而更顯明亮。

俾斯麥的對外計劃需要錢—這個真理對他不言自明，卻被后世的歷史學家完全忽視。普魯士政府在預算未獲授權的情況下繼續征稅，但與丹麥迫在眉睫的戰爭和戰后可能的動蕩（只有俾斯麥能依稀預見到）需要額外的資金，無法靠常規收入滿足。當時的戰爭已經非常昂貴，而就像我們將看到的，俾斯麥在外交上同樣喜歡吹噓國庫充足。俾斯麥認為，對外勝利可以成功地削弱國內的反對聲音，但持續懷有敵意的議會威脅剝奪他所需的資金。他決心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在找錢過程中，他需要幫助和建議。他自己的內閣出現分裂，大部分閣僚聽從卡爾·馮·波德爾施溫格的無用主張，反對任何超越憲法授權的行動。波德爾施溫格老邁怯懦，而且死守原則：難怪俾斯麥對他越來越不耐煩。他在回憶錄中表示，波德爾施溫格和商務部長海因里希·馮·伊岑普利茨伯爵（Count Heinrich vonItzenplitz）“無法領導自己的部門……從個人信仰來看，波德爾施溫格屬于內閣的極右翼，但他在投票時經常站在極左翼那邊”，因為此人依賴其自由派顧問的建議。“我無法指望我的政策得到這兩位部長的支持，因為他們既對我的政策一無所知，也對我這樣一個比他們年輕而且原本不屬于該領域的首相全無好感。” [[57]](#57)

俾斯麥決心盡其所能籌錢，并不在乎法律細節。他所關心的是，國家的命運不能取決于某種設計糟糕的法律或憲法，而是取決于權力。換句話說，在俾斯麥看來，考慮權力和考慮法律處于不同和不均等的層面。他愿意求助未授權的發債或者同樣違憲地變賣國有財產。關鍵在于如何調動必要的資金，以便利用俾斯麥察覺到的國外存在的重大可能性。

在急需用錢的那兩年里，俾斯麥對布萊希羅德的依賴越來越大。他尋求后者的建議并利用后者的關系。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俾斯麥特別重要。俾斯麥可能曾希望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遷往柏林（對于那個金融王朝的成員來說，柏林是德意志最合適和最有前途的地方），但他愿意信賴布萊希羅德，后者還與科隆—明登鐵路存在正式關系—這條鐵路對政府具有重要的財政意義。俾斯麥對布萊希羅德的信賴越來越深，關系日益親密，主要原因是他對這位銀行家的判斷和智慧的信任。作為俾斯麥當時的主要助手之一，羅伯特·馮·科伊德爾（Robert von Keudell）寫道：到了1864年，布萊希羅德“這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已經屬于助理的內部圈子”。“他的頭腦活躍而犀利，記憶可靠，內心堅定而忠誠。”俾斯麥要求科伊德爾向布萊希羅德簡要通報“外交政策的情況，只要不涉及機密，以便他能夠快速和正確地理解”俾斯麥當面向他所做的“那些暗示”。首相希望許多此類信息能被傳遞給雅姆斯男爵，按照科伊德爾的說法，男爵“總是可以暢通無阻地見到拿破侖皇帝，并被允許就財政乃至政治問題暢所欲言。這讓通過布萊希羅德和羅斯柴爾德向皇帝傳遞信息成為可能，而官方渠道則顯得不合適”。于是，布萊希羅德曾經幾乎每天都要拜訪科伊德爾，他開始感覺“自己仿佛是外交部的助理，開始稱俾斯麥為‘我們極受尊敬的首長’” [[58]](#58)  。

布萊希羅德在那兩年里定期與俾斯麥會面，經常達到每周一或兩次。科伊德爾不可能知道兩人在俾斯麥辦公室密談時發生的一切。除了國事，他們也談論俾斯麥的個人投資—這個主題將在第五章再展開。布萊希羅德既接收也傳遞政治消息。沒有關于他們談話的記錄，唯一的蛛絲馬跡保存在布萊希羅德寫給友人特別是給雅姆斯男爵的書信里。在那關鍵的兩年里，俾斯麥在柏林待的時間比后來要長，布萊希羅德每當有要事都能見到首相；因此直接通信反而少了 [[59]](#59)  。俾斯麥把助手分派到不同部門，只有他本人了解自己政策的所有方面。科伊德爾不知道（或者在1901年寫回憶錄時不愿承認），從1863年11月起，布萊希羅德不僅偶爾代表俾斯麥展開外交活動，還在為俾斯麥的冒險籌資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1863年11月，布萊希羅德第一次向俾斯麥建議，普魯士政府可以將薩爾（Saar）地區的富饒煤礦出售給一家私人公司 [[60]](#60)  。普魯士政府控制著國家煤產量的很大一部分，擁有薩爾的大部分煤礦和西里西亞（Silesia）一些最大的煤礦。薩爾的自由派商業社群反對壟斷，出于實踐和理念原因希望弱化政府的角色。關于出售薩爾煤礦的傳言早在1861年就已出現，據說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為它們開價2000萬塔勒。傳言很快被否定，但總是特別頑強地卷土重來。

俾斯麥知道拿破侖覬覦薩爾煤礦盆地。1862年10月末，法國皇帝在俾斯麥來訪時明確提到該問題。俾斯麥此行的目的是探聽皇帝的口風：如果德意志戰爭爆發，法國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開價是多少。俾斯麥不太可能把拿破侖的這些夢想告訴任何人，因為他無論如何都會立即拒絕，堅稱威廉永遠不會同意讓出德意志的哪怕一個村子 [[61]](#61)  。威廉偶爾會成為俾斯麥計劃的頑固障礙，但更多情況下，他成了俾斯麥藏身其后的巨大擋箭牌。

沒有證據表明，1863年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薩爾煤礦感興趣。這個話題只是無意中出現在布萊希羅德與雅姆斯男爵的通信里。不過，許多德國公司將會歡欣鼓舞地從普魯士政府手中買下煤礦，讓政府獲得足夠的資金繼續其違憲的運作方式。另一方面，出售煤礦將減少政府的年收入。在憲法沖突中，政府提高煤產量，每年從中獲利200萬塔勒 [[62]](#62)  。但流言仍然甚囂塵上。1864年，法國報紙多次報道稱，薩爾煤礦將被出售。令威廉煩惱的是，奧地利報紙也開始熱炒該流言，試圖通過暗示德意志邊境的這些煤礦將落入法國人之手來抹黑普魯士在德意志人眼中的形象。作為一個榮譽問題上的直性子，國王對這些報道勃然大怒，因為它們暗示了另一個普隆比埃爾（Plombières）—為了換取拿破侖的幫助，意大利割讓了尼斯（Nice）和薩瓦（Savoy） [22](#22_3)  。煤礦問題暫時被擱置。1866年，俾斯麥重新開始考慮該問題，部分原因是他認為，為了戰勝奧地利，普魯士將不得不對法國做出補償。但那還要再等兩年，并在一場戰爭后才會發生。

不過，俾斯麥仍然需要為同丹麥日益臨近的戰爭籌款。1863年12月7日，布萊希羅德致信雅姆斯男爵，表示政府將向議會提交1000萬塔勒的發債申請，議會很可能會拒絕。那樣的話，政府將請求自愿貸款。兩天后，政府果然為了與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事件相關的可能軍費支出向議會提交1200萬塔勒的申請。政府承認自己擁有2100萬塔勒的戰爭儲備，但為了防備同丹麥戰爭之外的其他可能沖突，不能動用這筆儲備 [[63]](#63)  。在研究了政府的申請后，一個議會委員會提出首先應該提交請愿書，提醒國王俾斯麥的“反德意志政策”。委員會還狡猾地表示，國王可能被蒙在鼓里。俾斯麥警告議會不要提交這樣的請愿書，并威脅議員們說，如果在接下來的戰爭中，普魯士軍隊不如小國丹麥，那么議員們要對此負責。12月18日，議會通過向國王上奏的決議，批評俾斯麥可能堅持《倫敦條約》，并提醒國王小心“可能長期危害我國的政策。鑒于內閣的立場，我們必須擔心所申請的款項在它手中將不會被用于那兩個公國或德意志，不會造福王室或國家” [[64]](#64)  。俾斯麥在1864年和1866年取得的驚人成功讓上述大膽言詞成了笑柄。難怪自由派的自信在那兩年里完全崩潰。

12月21日，布萊希羅德寫信給雅姆斯男爵，表示議會可能拒絕發債，這將令政府“顏面大失”。議會委員會暗示政府可以靠國庫滿足需要，但布萊希羅德指出，這樣做“將給政府造成沉重負擔” [[65]](#65)  。委員會還建議，政府可以靠變賣自己的部分資產獨立生存下去—這種想法后來由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實現。

委員會提交給議會的報告援引俾斯麥的話稱，他希望為同丹麥的爭端尋求合法撥款，“但如果撥款請求遭絕，那么他將不擇手段地籌款” [[66]](#66)  。議員們被激怒了，因為他們尚未適應俾斯麥粗魯的直截了當。

1864年1月22日，議會以275票對51票拒絕發債，理由是不認可政府的政策構想，認為它不符合其他德意志邦國的意愿，這場戰爭只會導致普魯士再次將兩個公國交還給丹麥。更加好戰的議員們也斷然反對俾斯麥。投票前四天，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 [23](#23_3)  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他覺得讓俾斯麥“這個骯臟和火爆的笑柄（Spottgeburt）”繼續執政將令人無法忍受，并表示如果那樣的話，自己很可能會辭去在普魯士的教職 [[67]](#67)  。其他議員暗示，政府可能會隨即提出為吞并籌款的“更具民族主義”的政策。無論如何，議員們錯算了俾斯麥。恢復原狀只是他的選擇之一。他們不夠靈活的頭腦永遠無法理解俾斯麥同時準備多種選擇，希望實現政治形勢所允許的最有利的那個。

議會拒絕發債有更深層次的理由，奧地利大使卡羅伊伯爵（Count Károlyi）向本國報告稱，政府與反對派的沖突反映了——

政治乃至社會分歧這個最大痛處，這是普魯士國家的內部生活所固有的，即不同等級和階級對彼此的強烈仇恨。這種敵對并非源于這三年的斗爭，而是遠遠早于1848年，它把軍隊和貴族歸到一邊，把其他所有的勤勉公民歸到另一邊，讓兩者產生激烈的對立。這是普魯士王國狀況中最顯著和最黑暗的特征之一。 [[68]](#68)

即使在當時，這兩個國家仍在期待對方的政治破產。

關鍵問題還是：俾斯麥能從何處找到必要的資金？戰爭的可能性逐步增加。12月末，布萊希羅德還能向雅姆斯男爵保證，自己的“好線人（他總是這樣稱呼俾斯麥）不認為會開戰，除非奧地利外交部長萊西貝格伯爵（Rechberg）被自由派取代”。威廉和普魯士保守派普遍希望和平。他們不愿因為看似無關普魯士的目標而被拖進與丹麥的戰爭 [[69]](#69)  。一個月后，俾斯麥告訴布萊希羅德，“外交形勢不樂觀而且非常撲朔迷離，沒有人能肯定地預測結局” [[70]](#70)  。當時的俾斯麥以現狀維護者自居，但他威脅說，如果歐洲列強干涉奧普即將對石勒蘇益格的占領，那么他將毫無顧忌地采取更激進的策略。通過看似保守的立場，俾斯麥讓英國更安心地滿足于偽善地支持丹麥的聲明。巴麥尊勛爵（Lord Palmerston） [24](#24_1)  支持普魯士，但氣勢洶洶地表達了英國對弱小丹麥的關心。巴麥尊的政策虛張聲勢，維多利亞女王堅決支持普魯士，而英國內閣在丹麥問題上的分歧則無法調和。結果就是英國人袖手旁觀，俾斯麥的立場讓巴麥尊可以更安心地堅持口頭道義 [[71]](#71)  。

俾斯麥討論了籌款的各種途徑，包括來自南德意志聯盟由法蘭克福銀行家拉法埃爾·馮·埃爾朗格（Raphael von Erlanger）牽頭的提議。埃爾朗格愿意向普魯士政府提供1500萬塔勒，盡管多名議員明確警告私人銀行家，議會將不歡迎在未經議會許可的情況下向政府貸款 [[72]](#72)  。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證，“埃爾朗格提出的向王國貸款的建議已經被徹底否決”。布萊希羅德似乎曾敦促政府用已被議會批準用于鐵路建設但尚未發行的債券作為抵押。債券應該被抵押給能馬上向政府提供資金的銀行家，然后再由他們將債券出售給公眾。

在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信中，布萊希羅德正確地宣稱，王儲已經動身去了北方的軍中，國王也將很快前往。他預言隨著軍事行動的展開，普魯士國內將進一步限制出版，并推行新的選舉法。

2月1日，在歐洲的有利形勢下，俾斯麥發起了普奧對石勒蘇益格的入侵。他已經說服奧地利人一同對丹麥人和試圖擁立奧古斯騰堡親王的較小德意志邦國展開鉗形進攻。為了讓英國保持中立，兩國援引《倫敦條約》作為聯合進攻的基礎。與俾斯麥共同作戰的奧地利在傳統上實力更強，但在同盟中只是次要角色，因為該國沒有明確目標，而且哪怕想實現這些目標也希望渺茫。俾斯麥踏上了通往成功巔峰的道路，雖然他無法預測沿途的危險和曲折。

2月3日，布萊希羅德再次與俾斯麥見面，并在羅斯柴爾德的授意下再次警告后者注意埃爾朗格。整個羅斯柴爾德家族都憎惡這個埃爾朗格，“他早年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雇員，后來成為家族的秘密代表”，隨后他自立門戶并取得成功，在19世紀50年代經常和優先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對手和仇敵合作，比如佩雷爾家族（Péreires）和富爾家族（Foulds） [25](#25_1)   [[73]](#73)  。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所有成為對手的前雇員懷有無法平息的仇恨。為此，布萊希羅德似乎曾建議俾斯麥在普魯士報紙上發表針對埃爾朗格的“挑釁文章”。俾斯麥拒絕了這個夸張的想法，但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證，“無論如何，我已經小心地向［政府］通報了埃爾朗格的情況” [[74]](#74)  。

但俾斯麥仍然需要錢。在同一次會面中，他告訴布萊希羅德，波德爾施溫格還是反對發債，而他則希望從某處獲得1200萬塔勒。決定將很快做出。波德爾施溫格還是害怕發行未被授權的公債，特別是因為他堅稱自己有“5000萬塔勒可供支配”，雖然那筆錢的來源仍然不明。與此同時，柏林市場死氣沉沉，布萊希羅德相信，“目前，這里的資本家手握2000萬到2500萬塔勒的可用資金，在等待形勢的明朗” [[75]](#75)  。這些錢將被用于第一波新發行的誘人公債，比如當時羅斯柴爾德家族正翹首以盼的新一輪俄國公債 [26](#26_1)  。

在丹麥戰爭最初幾周的忙亂中，俾斯麥經常與波德爾施溫格和布萊希羅德見面 [[76]](#76)  。俾斯麥后來堅稱，他把經濟事務全部交給了部長們。這只是裝腔作勢，事實上，他非常關心普魯士的后勤保障 [[77]](#77)  。

2月25日，布萊希羅德報告說，普魯士和奧地利已經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舉行國際會議的提議，但軍事行動將會繼續，普魯士希望取得某些“矚目的戰果，比如突襲杜普爾要塞（Düppel trenches）……軍隊的‘榮譽’似乎需要這些”。布萊希羅德再次正確地體察到普魯士統治者的心情，因為兩周后羅恩向國王諫言，指出軍隊必須“在這場行動中贏得某場重大勝利”，而曼陀菲爾則直截了當地表示：“在當前的戰局下，沒有什么軍事目標比普魯士軍隊的榮譽更重要。” [[78]](#78)  對“榮譽”的需要出于國內考慮。他們希望民眾會支持勝利的軍隊，拋棄作為阻撓者的議員。

布萊希羅德預測，在計劃中的會議上，普魯士將支持由丹麥國王兼任兩個公國的統治者，而非像其他德意志邦國希望的那樣支持奧古斯騰堡的主張。他還表示，來自法國的信函“令人樂觀，與法國的關系再次變得非常友好，因此法、英和瑞典的聯盟已經變得不可能”。他還用剛剛見過面的“首長”的口吻說：“雖然對奧普政策不滿，但德意志諸邦將平靜下來，最多表示抗議。” [[79]](#79)

不過，每天仍有新的消息和危險到來。布萊希羅德偶爾會以書面而非口頭形式向俾斯麥傳達某些緊急消息。3月中旬，他告知俾斯麥，奧地利報紙表示“丹麥已經拒絕了會議！！！據報道，加里波第 [27](#27_1)  昨天從卡普雷拉島（Caprera）失蹤。他的失蹤如果屬實，將產生重大影響” [[80]](#80)  。布萊希羅德對加里波第的消失做了正確的判斷—三周后，加里波第將在英國露面，并代表“可憐的小國丹麥”在英國各地展開大獲成功的巡回演講，這讓維多利亞女王很不高興 [[81]](#81)  。加里波第的計劃很清楚：從奧地利手中奪回威尼斯，因此奧地利的敵人是意大利的朋友。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是否曾討論過利用加里波第對付奧地利的潛在可能？若非如此，為何要忙著報告加里波第突然神秘失蹤的消息呢？

3月初，普魯士的海貿銀行似乎向埃爾朗格提出了一份秘密協議。雅姆斯男爵勃然大怒，在另一封言辭激烈的信中申斥布萊希羅德。3月14日，布萊希羅德在回信中做了詳細解釋，并表達自己的無辜。甚至俾斯麥都不知道與埃爾朗格的協議，他“非常惱火”，準備找波德爾施溫格算賬。此外，布萊希羅德還遵照雅姆斯男爵的指示試探法蘭克福分支對俾斯麥提議的口風，即以已獲授權的2000萬塔勒公債作為新公債的抵押。法蘭克福分支回復稱，巴黎對這樣的冒險“仍然完全不感興趣”。

為了您的利益，也為了不傷害我國政府，我沒有把拒絕的結果告知我的好線人[俾斯麥]。相反，我試圖讓他相信，您的尊貴家族將很高興在財政事務上支持普魯士。如果我在這件事上做錯了，我可以預見來自好線人的不滿，但您肯定會感謝我保護了您的利益，在您的聲譽和我的好線人之間，我沒有片刻猶豫。 [[82]](#82)

可以想見，這樣做的另一個理由是，承認羅斯柴爾德家族拒絕幫助將有損布萊希羅德本人的地位。羅斯柴爾德家族很少樂意為戰爭出資，但他們同樣不樂意看到被自己拒絕的買賣受到對手們的追捧。

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證，自己再次告知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反對普魯士政府與埃爾朗格進行任何交易。俾斯麥理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嫉妒，他指責波德爾施溫格進行那些談判，但也提到埃爾朗格的新提議，也就是以議會今后可能會批準的一項公債為抵押，籌資1500萬到2000萬塔勒作為預付金。布萊希羅德回復說，如此過分的提案“再清楚不過地暴露埃爾朗格的詭詐”。此外，埃爾朗格和他的金融家盟友顯然對普魯士議會的明確警告（上文已經提到）不屑一顧，即議會將否決所有未經其批準的情況下簽訂的私人向政府貸款協議。我們知道，俾斯麥認真考慮了埃爾朗格的提議，并將其通報給內閣 [[83]](#83)  。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最終他從其他地方籌到了錢—也許他夸大了埃爾朗格的熱心，以便挑起金融大鱷們的內斗，就像他喜歡在歐洲列強間挑起和利用爭端 [28](#28_1)  。

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繼續向人數遠處劣勢的丹麥人發動進攻。4月18日，聯軍突襲石勒蘇益格東部的杜普爾要塞，終于獲得了“光榮”的勝利。兩代德意志人都為這第一次勝利歡欣鼓舞，但他們仍然對俾斯麥神秘的外交政策抱有懷疑。杜普爾之捷一周后，倫敦召開國際會議，希望找到能滿足沖突各方的解決方案。外交無功而返，6月末戰火重燃。到了這時，丹麥戰敗的結果已成定局。

對俾斯麥而言，這是需要最復雜謀略的時期。1864年春夏，他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政治問題的壓力，還要擔憂自己各種戰略的物質基礎。他需要錢和幫助，即使當丹麥人在7月被打敗后。當時很少有人（后世的歷史學家就更少了）意識到，為戰爭籌資給違憲的俾斯麥政府帶來的沉重負擔。“整個1864年夏天，部長們都在為如何應對丹麥戰爭造成的流動資金減少而憂心忡忡。” [[84]](#84)

5月初，俾斯麥告訴布萊希羅德，內閣在繼續抵押早前發行的利率為4.5%的普魯士公債問題上陷入僵局 [[85]](#85)  。國外更高貼現率的不利影響令布萊希羅德不安，他敦促俾斯麥“盡可能快地”展開必要行動 [[86]](#86)  。盡管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俾斯麥和波德爾施溫格幾乎每天都要會談，但仍無法做出決定。

在6月12日的部長會議上，內閣一致決定，在支付戰爭高額開支的其他所有手段用盡前既不重開議會，也不請求發債。但在其他所有問題上，內閣出現了分歧。多數閣員（5票對3票）決定取消當前的稅收減免，從而在議會召開前籌到錢。另一些占多數的閣員則認為，發行已被議會批準用于建造西里西亞鐵路的公債并將其挪作他用將“不切實際”。大部分閣員還決定拒絕嘗試在未獲議會授權的情況下發行公債。他們也沒有決定，當時機到來時，更應該召開老議會還是選舉新議會 [[87]](#87)  。

辯論在第二天的御前會議上繼續進行。波德爾施溫格首先宣布，截至5月底，丹麥戰爭的開支已達1700萬塔勒，由往年盈余（1863年達530萬塔勒）和國庫（1600萬塔勒）承擔。波德爾施溫格還提到其他可能的收入來源，比如在前一天討論過并被否決的方案。不過，他要求在國庫徹底空虛前，應當提請議會批準發債，用于支付丹麥戰爭的額外開支。內政部長奧伊倫堡伯爵在1864年4月提出過類似的計劃 [[88]](#88)  。

該計劃遭到俾斯麥和羅恩的激烈反對。他們希望訴諸緊急權力，在未經議會授權的情況下發行公債。俾斯麥明確提到多位銀行家的提議，并堅持要求接受其中某一位：他們只要求財政部長簽字，至多要求整個內閣同意。大戰可能爆發，“憲法條款不能意味著在這樣的狀況下，國王要么被迫接受議會的條件，要么拱手把國家交給敵人”。簡而言之，他希望在未來的戰爭中能確保政府繞過議會獲得必要資金，而不必滿足議會的要求。波德爾施溫格和大多數部長拒絕接受對1850年憲法又一次明目張膽的踐踏。作為財政部長，他強調這種做法還違背了1820年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國債法，該法規定發行新債需要議會批準。“只要陛下的部長們仍需遵守捍衛憲法的誓言，未經議會授權發行國債就有違誓言。”波德爾施溫格還有反對俾斯麥的另一個花招，即將已授權用于鐵路建造的公債挪用到完全不同的目的上。大部分與會者似乎支持波德爾施溫格反對俾斯麥。會議無果而終，但國王下令收回尚未支付的稅收減免，并利用其他可用的資金 [[89]](#89)  。

不久，俾斯麥試圖通過裁減軍隊在三個月內節約450萬塔勒。這樣做可以避免訴諸其他手段，外國輿論也會對普魯士通過常規收入支持一場重大戰爭的能力印象深刻。“再沒有人會對普魯士財政力量說三道四。普魯士財政的信譽將大大提升，政府的地位也將再次增強。” [[90]](#90)

俾斯麥擔心外國對普魯士償付能力的猜測，這充分體現在下面的舉動中：御前會議無果而終后的第二天，他召見奧地利代辦肖泰克伯爵（Count Chotek），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普魯士的財政狀況做了樂觀的描繪。俾斯麥承認，就像到處傳言的那樣，他的某些同僚希望再次召開議會并請求發債。他對此表示反對：“首先，財政需要并不存在。”即使沒有國庫中的4000萬塔勒（俾斯麥表示這筆錢尚未被動用），“內閣還有3500萬塔勒可用，甚至不必請求任何人”，他還詳細羅列了各種儲備。除了這7500萬塔勒（顯然是俾斯麥的幸福幻想，波德爾施溫格對此肯定一無所知），他還夸口說，德意志西部與荷蘭的私人銀行家愿意向普魯士政府提供“可觀的資金”。

他承認，不召開議會也出于政治動機：“俾斯麥悄悄地表示，‘啊，如果能擺脫這個名為議會憲政的骯臟勾當就好了’。”在這席如此直率但又如此詭詐的談話最后，俾斯麥向肖泰克保證，如果因為戰火重燃而必須召開議會，如果議會再次拒絕發債，“立即修改憲法將顯得順理成章。他滿意地得知，在這點上所有同僚都和他觀點一致，甚至包括特別令人頭疼和循規蹈矩的司法部長” [[91]](#91)  。俾斯麥與肖泰克精心準備的對話證明他希望讓奧地利對普魯士的軍事和財政力量留下深刻印象。在這個奧普關系錯綜復雜的時期，從結盟到戰爭的所有外交策略被同時考慮，俾斯麥試圖通過展示普魯士的力量和主動來震懾與迷惑奧地利。他意識到，普魯士雖然較小，但在潛力上要比看似更富有的奧地利帝國更加強大。俾斯麥對奧地利的勝利有意識地利用了經濟優勢。

但俾斯麥內閣仍然擔心錢。7月6日，當首長在卡爾斯巴德陪伴威廉和弗朗茨·約瑟夫時，普魯士閣員們再次開會。奧伊倫堡報告說，儲備減少的威脅迫使他前往卡爾斯巴德，請求威廉盡早要求議會批準發債。國王的回答帶有俾斯麥式風格，他表示如果要召回議會，自己將不得不回到柏林，盡管醫生警告他不要中斷療養。因此，內閣必須在國王和國庫的健康間做出選擇，他們一致選擇了前者。波德爾施溫格繼續憂心忡忡。他害怕政府將拖到最后的儲備耗盡 [[92]](#92)  。

內閣重新討論了之前提出過的所有主張，羅恩代表缺席的朋友和首長發言。他堅稱“如因戰爭持續而出現緊急［財政］需要，可以根據憲法第63條和103條，以臨時法令的形式發行國債，該法令甚至無須議會批準，但在憲法上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羅恩的主張遭到在場所有人的否決，他們決定最晚8月召集舊議會。到了那時，政府將申請發債用于支付戰爭開支，但拒不參與議會就其他所有問題展開的討論。他們還將為議會設定行動的最后期限，時限一過就將其解散。羅恩同意了這個如果實施可能招致慘敗的計劃。波德爾施溫格和同僚們對憲法的捍衛看上去反而讓憲法有徹底被毀的危險 [[93]](#93)  。7月12日，奧伊倫堡向內閣提交了關于重開議會的御覽備忘錄草案，但局勢已經有所緩和 [[94]](#94)  。

在這兩場內閣會議之間，對丹麥的戰爭進入最后階段。6月26日，停火結束，奧普聯軍重新開始入侵丹麥。7月8日，出于明確的求和目的，哥本哈根組建了新內閣。在8月1日與維也納達成的初步和約以及10月30日的最終和約中，丹麥國王將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與勞恩堡（Lauenburg）割讓給奧地利和普魯士。

丹麥戰爭結束了。俾斯麥取得自己的第一場大捷：他既臣服和打敗了丹麥，又沒有破壞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 [29](#29_1)  。他把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目標綁在一起，使其遠離僅剩的天然盟友—南部和中部德意志邦國。兩個公國的解放令俾斯麥深得德意志愛國者的歡心，削弱和分化了國內的反對力量。但對丹麥的勝利，依然無濟于事。最棘手的問題仍然存在：應該對這兩個公國做什么？對德意志邦聯做什么？如何解決普魯士的國內矛盾？

俾斯麥曲折、精彩而驚險地贏下了第一個回合。國內矛盾激勵他繼續在國外冒險，但也阻礙了他的外交追求。他的統治仍然違憲，沒有得到授權的開支預算。他的處境仍然危險而孤獨，受到的憎惡遠遠超過愛戴。他仍然迫切需要錢。與此同時，他找到布萊希羅德這位精明強干的參謀，后者也覺得身處俾斯麥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間讓自己居于獨一無二的有利地位。布萊希羅德將不遺余力地保持和加強這種地位。

[1.](#1_4) 施瓦岑貝格親王（1800—1852），波西米亞貴族和奧地利政治家。俄國曾在1849年協助奧地利鎮壓匈牙利革命。——譯注

[2.](#2_4) 利奧波德·赫爾曼·路德維希·馮·博因（1771—1848），普魯士戰爭部長，軍事改革家。格爾哈特·約翰·大衛·馮·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軍事改革家，普魯士總參謀部的奠基人。——譯注

[3.](#3_4) 1640年11月3日，為應對蘇格蘭起義，英王查理一世重開議會，這次議會一直持續到1653年4月20日，史稱“長期議會”。其間，資產階級反對派議員通過了處死國王寵臣的決定和限制王權的《大抗議書》（Grand Remonstrance），激化了議會與國王的矛盾。——譯注

[4.](#4_4) 路德維希·馮·格拉赫（1795—1877），普魯士保守派法官、政客和編輯。他的長兄利奧波德是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副官長和顧問，也是著名的保守派。——譯注

[5.](#5_4) 1834年在普魯士的倡議下創建，旨在消除德意志諸邦間的貿易障礙，形成緊密的貿易和經濟共同體。——譯注

[6.](#6_4)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國歷史學家。——譯注

[7.](#7_4) 指普魯士外交官卡爾·格奧爾格·路德維希·圭多·馮·烏澤多姆伯爵（Karl Georg Ludwig Guido von Usedom，1805—1884），女性化稱呼表示輕蔑。——譯注

[8.](#8_4) 普魯士從1849年起實行三級選舉制，即按照納稅額的高低將選民分為三級，議會下院選舉時，每個等級分別投票選出三分之一的選舉人，再由后者選出議員。——譯注

[9.](#9_4) 早在1861年，腓特烈·威廉三世之子卡爾就不斷找布萊希羅德要錢，卡爾王子是柏林一個極端保守集團的成員。Kühlow記錄，布萊希羅德檔案。

[10.](#10_4) 羅斯柴爾德經常委托布萊希羅德一些特殊的小任務，比如推薦特別好的園丁或者尋找雉雞專家，專家被要求能夠收集布拉格附近的最佳品種并將其用火車送到巴黎，路線和所有細節均由布萊希羅德負責。作為對其辛勞和花費的補償，布萊希羅德偶爾會收到一份優質鵝肝醬或其他美味。對他而言，在19世紀中葉那個歡樂而一絲不茍地禮尚往來的世界里，選擇合適的禮物和執行委托一定是項耗時的工作。

[11.](#11_4) 阿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托夫伯爵（Albrecht von Bernstorff，1809—1873），曾任普魯士外交部長。——譯注

[12.](#12_4) 奧古斯特·馮·德·海特（August von der Heydt，1801—1874），普魯士銀行家，曾任貿易和工業部長以及財政部長。——譯注

[13.](#13_4) 從9月27日波德爾施溫格的一封此前未被注意的書信（很可能是寫給俾斯麥的）可以推測出他如何看待入閣邀請，他在信中回答了是否樂意為新政府效力的問詢。他滿意事態的變化，認為這“清楚地體現了堅決抵制民主和議會制的意志—愿上帝保佑。形勢的嚴峻和議會面目的徹底暴露無遺旨在為了恐嚇人們不要入閣，或者讓他們出于自身和家人的考慮而不這樣做……但感謝上帝，國王有權期待所有忠誠的臣民服從上帝的命令和意志”。梅澤堡民主德國中央檔案局：Zitelmann遺稿。

[14.](#14_4) 受割禮者指猶太人，奧伊倫堡以對猶太人自由派寬容著稱。——譯注

[15.](#15_4) 約翰·羅斯洛普·莫特利（1814—1877），美國外交官，時任駐英國大使。——譯注

[16.](#16_4) 赫爾曼·鮑姆加騰（1825—1893），德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譯注

[17.](#17_2) 圣靈降臨節（復活節后第五十天）起的一周，尤指前三天。——譯注

[18.](#18_2) 德國歷史地區，位于今天薩克森—安哈特州北部，是勃蘭登堡侯國最初的領地，被稱為普魯士的搖籃。——譯注

[19.](#19_2) 奧地利皇帝。——譯注

[20.](#20_2)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和雅姆斯男爵的合伙人維克托·貝納里（Victor Benary）曾敦促他去奧斯坦德（Ostend）拜訪男爵：“你知道時常與雅姆斯男爵交談的好處與必要性。這比二十封信對買賣的幫助更大。”貝納里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8月1日，布萊希羅德檔案。

[21.](#21_2) 奧古斯騰堡親王來自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宗德堡—奧古斯騰堡（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家族，為奧登堡（Oldenburg）家族的分支。自從奧登堡家族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一世（1426—1481）繼承石勒蘇益格公國和荷爾斯泰因伯國（1474年升級為公國）后，丹麥國王一直作為君主兼任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不過，與丹麥不同，這兩個公國實行薩利克繼承法。由于腓特烈七世沒有父系繼承者，在父系血統上與王室最為接近的奧古斯騰堡對丹麥王位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提出主張。1863年，奧古斯騰堡家族的腓特烈八世自封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譯注

[22.](#22_2) 1858年7月21日，撒丁王國首相加富爾與拿破侖三世在法國南部小鎮普隆比埃爾簽訂協議，由法國出兵將奧地利逐出倫巴底和威尼斯，而撒丁王國則將尼斯和薩瓦割讓給法國。——譯注

[23.](#23_2) 蒙森（1817—1903），德國歷史學家。——譯注

[24.](#24) 巴麥尊勛爵（1784—1865），時任英國首相。——譯注

[25.](#25) 均為19世紀巴黎著名的金融世家。——譯注

[26.](#26) 俄國公債引發了布萊希羅德和雅姆斯男爵間最激烈的爭執之一。2月23日，雅姆斯男爵指責布萊希羅德在這件事上過于輕率。兩天后，布萊希羅德回復說：“無論在這件事還是其他關系到您家族利益的事上，我從不輕率—我對此發下過最神圣的誓言。”他敦促雅姆斯男爵把其他銀行家列為泄密的嫌疑對象，比如圣彼得堡的卡普赫爾（Kapherr）和柏林的羅伯特·瓦紹爾（Robert Warschauer）。

[27.](#27)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統一運動中的著名將領，曾組織紅衫軍遠征。——譯注

[28.](#28) 布萊希羅德一定讓雅姆斯男爵相信了自己的無辜，因為他們很快恢復了無與倫比的親密關系。為了進一步證明自己的忠誠，他于1864年5月購買了一件特別稀有的15世紀珠寶，作為“我深切謝意的小小象征”奉獻給巴黎的恩主（巴黎羅斯柴爾德兄弟檔案，1864年5月5日）。這樣的禮物可以增進哪怕最親密的商業關系。不過，它們所反映的不僅于此。除了完美的形式，布萊希羅德的信也有實質內容，他對雅姆斯男爵即將造訪德國溫泉表示歡迎，因為這讓布萊希羅德有機會“當面證明我的愛和忠誠”。

[29.](#29) 指拿破侖戰敗后，歐洲列強推行的協商解決歐洲重大問題的機制。——譯注

## 第三章　寶座和絞刑架間

1866年，他[布萊希羅德]把戰爭的必要資金交到我手中。此舉讓我不得不心存感激，因為在當時的情勢下，我與絞刑架和寶座幾乎一樣近。

——隱退后的俾斯麥

戰爭給普魯士帶來榮耀，也讓俾斯麥從幾位昔日的對頭那里獲得一些不情愿的贊美。但戰爭并未解決他的任何困難，反而造成新的困難。它沒有解決憲法沖突，也沒有解決德意志兩強并立的局面，而且耗盡普魯士的國庫。不僅如此，戰爭讓德意志兩強解決沖突的時刻提前到來：如果和平手段無效，那就只能付諸戰爭。丹麥戰爭讓對立的德意志兩強走到一起；如何分割戰利品將決定這次聯手是進一步讓德意志走向某種形式的和平重建，還是僅僅推遲了手足相殘的戰爭。兩個公國被割讓給奧地利和普魯士，對它們的處置不可能永遠拖延下去。軍事行動并不復雜，后續工作則困難至極。

1864年夏，俾斯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辦—盡管后來的歷史學家賦予他先見之明。他的目標仍然不變：擴大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勢力（吞并兩個公國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作用），并保留普魯士的社會和政治體制。他的手段永遠靈活而迷人。他作為政客的偉大之處正是在于其見機行事的能力，尋找（有時是營造）正確的時機和突然的機會，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和技巧利用它們。長期規劃必然導致選擇面縮小。俾斯麥將不愿做選擇這一典型的人類特點提升為一種至高的政治優點。發明“多重選擇戰略”（strategy of alternatives）最能體現他的天才 [[1]](#1_45)  。

俾斯麥統治的早年也是最困難的時期，對他提出最多的要求，因此也顯示出他人格的不凡。雖然可能有些牽強，但在思考處于人生那個階段的俾斯麥時，濟慈 [1](#1_7)  曾經提到過的一種特質發人深省。在與迪爾克 [2](#2_7)  一起探討各種話題后，濟慈說：“有幾件事在我頭腦中吻合起來，我突然明白是什么特質造就了有成就的人，特別是文學領域，莎士比亞在這點上就非常突出—我指的是‘負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能夠生活在不確定、謎團和疑惑中，絕不急躁地尋求真相和理由……” [[2]](#2_45)  俾斯麥的頭腦分為確定和不確定的部分，但很少有政客能像他一樣在那么多危險的不確定中生活那么久。

根本問題是德意志的重建—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1848年，身處法蘭克福的俾斯麥在19世紀50年代便認清了它，但圍繞著1863年諸侯大會的矛盾耽擱了它。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問題在于：德意志的重組是否應該將奧地利排除在外？奧地利會因為自己的虛弱和與馬札爾人沖突的加劇而接受普魯士在德意志北部的霸權嗎？或者它的衰弱會給普魯士提供開戰良機嗎？如果是后一種情況，那么俾斯麥必須確保維持有利的外交局面，保證拿破侖三世不會趁普魯士發動進攻之機提出割讓萊茵河畔的土地作為“賠償”，保證英國和俄國不會干涉對歐洲秩序如此重大的一次洗牌。如果必須攤牌，那么普魯士的外交和軍事準備必須完備，而且要比奧地利做得更好。此外，當國內的議會與政府仍然劍拔弩張，憲法沖突也遠沒有得到解決之時，穿越歐洲政治的雷區并不容易。

歷史學家們承認這些。但他們忽略了憲法沖突對俾斯麥政府造成的一個具體后果：他總是擔心錢。普魯士國庫由于丹麥戰爭的開支而縮水，但議會頑固地拒絕了充實國庫的請求。1864年到1866年間，是俾斯麥政治生涯中最困難的兩年，他需要為普魯士政府籌錢以備戰爭，并試圖不讓錢流向奧地利，以便阻撓其準備工作。關于俾斯麥的主要作品忽略了這個世俗事實，因而更容易忽略布萊希羅德的關鍵作用 [3](#3_7)  。

俾斯麥極具魄力但又謹小慎微。在與奧地利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時退時進，恩威并施，抓住時機或靜觀其變—直到一切水到渠成。與奧地利打交道時的這種靈活手段被形象地稱為“魔鬼般的多管齊下” [[3]](#3_43)  。金錢并非這樣做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關鍵因素之一，他永遠無法公開承認這點，否則必將暴露普魯士的弱點。他無疑希望能擺脫那種額外的煩惱。也許他有時覺得這有失體面，就像詩人可能會憎惡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迫不得已。但俾斯麥明白，違憲的歷史代價就是財政上的捉襟見肘，在克服原因前，他需要一直應對結果。

1864年8月1日，丹麥將兩個公國交給奧地利和普魯士。俾斯麥希望把它們納入普魯士，并覺得支持奧古斯騰堡的德意志民族和自由主義情感是惱人的大麻煩。早在1864年5月，布萊希羅德就在信中告訴雅姆斯男爵，雖然兩個公國的命運仍然“完全不明朗，但人們正在努力操縱輿論，民眾請愿書被呈送給國王，提出石勒蘇益格最終應當被交給普魯士” [[4]](#4_43)  。他還表示，如果此事成真，普魯士的國內局勢將會改善，議會將向政府大幅讓步，“特別是批準貸款” [[5]](#5_43)  。

不過，兩個公國的未來只能與奧地利共同解決。奧地利在何種狀況下和需要何種條件才會繼續同普魯士聯盟？呼吁保守勢力團結一致對抗“革命”是俾斯麥的老生常談，這樣做能否再次與奧地利言歸于好？或者說，德意志長久以來的雙雄并立，邦聯內部兩強的對立最終不得不由鐵和血來解決，就像俾斯麥從在法蘭克福的歲月起就常常預見的那樣？

俾斯麥手握大部分王牌。他咄咄逼人，奧地利則處于守勢。他清楚自己希望得到兩個公國，確立普魯士在北德的霸權。奧地利對兩個公國沒有計劃，并覺得那個時而討好、時而威嚇自己的盟友反復無常，令人難以捉摸。俾斯麥試圖讓奧地利一直依賴普魯士，同時發展普魯士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系。拿破侖三世是關鍵人物，他支持民族國家，但也被認為阻撓德國統一：俾斯麥能否說服那個“沒有秘密的斯芬克斯”為了完成意大利統一而延續反奧路線，同時接受普魯士在美因河（Main）以北的霸權？1864年夏，普魯士的朋友比奧地利更多，敵人則更少。此外，奧地利正處在崩潰的邊緣，而普魯士則有大量潛在的財富，只要俾斯麥能找到利用的辦法。孤立無援和囊中羞澀的奧地利不得不面對一位足智多謀的挑戰者的狡猾伎倆。

1864年8月，在著名的美泉宮會議（Schönbrunn Conference）上，俾斯麥突然提出奧地利應該同意普魯士吞并兩個公國，作為回報，普魯士將在可能的適當時機幫助奧地利奪回倫巴第 [4](#4_7)  。這將是一個龐大的反動計劃，它會傷害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但符合俾斯麥對未來的預期之一：德意志兩強結成保守同盟（很可能得到俄國支持），奧地利安于在東南歐施展拳腳，普魯士則稱霸北方。在美泉宮，奧地利外長萊西貝格伯爵把俾斯麥的話當真，為了防止普魯士違背承諾，他要求在奧地利得到回報后再把兩個公國交給對方。這并非俾斯麥的意圖：他認為奧地利應該立刻踐約，普魯士的承諾則留待以后，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話。當奧地利人對此不愿接受時，俾斯麥拋棄了那個方案，隨后的兩年間未能達成任何有關兩個公國的明確解決辦法。

和平與延續同盟是人們對美泉宮會議的期待。兩個公國仍將處于奧普共治之下。但布萊希羅德對此表示懷疑，會議結束兩周后，他警告雅姆斯男爵：

與奧地利的極度親密已經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將是嚴寒。石勒蘇益格的未來仍然撲朔迷離。我的好線人仍然認為，我們必須同他們[法國人]達成共識，讓普魯士得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俄國不會反對，奧地利和英國將保持沉默，無論它們多么不樂意。這種理想狀況現在因為國王的想法而遭受挫折，因為太子妃，他傾向于奧古斯騰堡公爵。 [[6]](#6_41)

這是典型的俾斯麥式消息，既坦率又別有用心：俾斯麥希望讓法國人相信，他與奧地利的聯盟已經發生動搖，他對兩個公國虎視眈眈，需要法國人的幫助—但擋在他和兩個公國間的不僅是一位在英國兒媳慫恿下感情用事的國王。當然，和俾斯麥的同僚們一樣，國王也需要教訓。

布萊希羅德的判斷很快被證實。商務問題突然威脅到俾斯麥對奧地利的平衡政策。6月末，一些中部邦國同意延長關稅同盟；奧地利感到懊悔，希望正式確認自己最終加入同盟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原因，俾斯麥希望在形式（雖非實質）上安撫奧地利，如果奧地利看重“這個烏托邦”（他甚至對萊西貝格伯爵這么說），那么俾斯麥愿意假裝該問題還有一線生機 [[7]](#7_41)  。在實質問題上，俾斯麥毫不讓步：他不顧奧地利人的沮喪，堅持與奧地利簽署商務條約，因為在這件事上“政治考量不應損害未來的物質利益” [[8]](#8_41)  。俾斯麥決心鞏固普魯士在德意志的經濟領導地位，因為這既能進一步削弱奧地利的地位，又為普魯士中產階級帶來物質利益，從而可能降低其對憲政的熱情。與此同時，他希望與奧地利保持協作，希望萊西貝格伯爵這位親普魯士的保守派繼續掌權。他敦促萊西貝格把政治利益放在物質利益之上，維持奧普同盟：以防“我們的君主們在才智上可能比不上自己的臣民” [[9]](#9_39)  。俾斯麥本人并不相信君主們高人一等。

但俾斯麥的同僚們讓他失望了：當他在比亞里茨（Biarritz）休假，與拿破侖斡旋和與卡特琳·奧洛夫調情時，他們關死了奧地利加入關稅同盟的大門，連今后舉行談判的可能性都徹底斷絕。10月末，萊西貝爾伯爵因此下臺，成了維也納反普魯士派的犧牲品，他們宣稱萊西貝格的政策全無效果。

萊西貝格的被黜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延續同盟的可能性減小了。維也納變得焦躁不安，俾斯麥同樣如此。不過，當時他是否想要與奧地利最終決裂，就像許多歷史學家所聲稱的那樣？或者他是否滿足于不訴諸戰爭而獲得眼前的和最低的目標？歷史記錄模棱兩可。一方面，我們看到俾斯麥對奧地利態度蠻橫，符合與他經常表達的觀點，即德意志兩強的最終攤牌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他大費周章地避免引發戰爭，用各種手段試圖達成和平方案。一些歷史學家聲稱，后者是故作姿態。也許的確如此，但俾斯麥在做這些事時非常認真，而他在隨后兩年間的重要角色也證明，他本來滿足于不訴諸戰爭贏得兩個公國，將德意志重建的問題留待未來。

國內事務同樣需要布萊希羅德。無論俾斯麥最終選擇和平或戰爭作為對外政策，無論他試圖通過收買或武力贏得兩個公國，他都需要錢。如果他需要錢，那么他就需要在整個金融界人脈廣泛的布萊希羅德。俾斯麥還開始把其他任務委派給布萊希羅德，他更樂于這樣做的原因是：他的官方部屬（包括大部分重要大使）幾乎在蓄意破壞他這段時期的努力。特別是巴黎的戈爾茨伯爵和佛羅倫薩的烏澤多姆伯爵，他們對俾斯麥的政策和他本人都表示反對。忠心耿耿、頭腦精明和擁有國際人脈的布萊希羅德成了大受歡迎的補充。俾斯麥需要布萊希羅德調動普魯士的資金，還利用其阻止奧地利獲得資金。他雇傭布萊希羅德參與可能是他實現最低目標的最佳方案：從奧地利手中購得石勒蘇益格，此舉既壯大了普魯士，又羞辱了奧地利。有時，布萊希羅德也會主動提議，希望為某些有望兼顧利益和愛國的計劃贏得俾斯麥的支持。

丹麥人簽署維也納和約草案兩天后，布萊希羅德寫信給俾斯麥：“值此勝利之日，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您和祖國安康幸福，這些勝利是憑借著國王陛下的決心、閣下的智慧以及團結一致的德意志大國的英勇壯舉取得的。”為了給剛剛獲得解放，長期受到剝削，被丹麥人“視作法拉欣 [5](#5_7)  ”的人民帶去繁榮，布萊希羅德請求成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方銀行，主要目的是提供便捷貸款。該行還有權發行貨幣，可以幫助募集預期的戰爭賠償金和修建重要的北海—波羅的海運河（Nord-Ostsee Canal）。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漢堡的所羅門·海涅（Salomon Heine）家族已經承諾支持，因此該銀行（對普魯士很有用，對贊助者也似乎非常有利可圖）可以馬上被組建起來。布萊希羅德請求俾斯麥推薦“合適的地點，以便我的計劃順利執行” [[10]](#10_38)  。該銀行最終沒有成立，但這次嘗試讓貼現公司的漢澤曼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走到一起，盡管他們不久前還是死對頭。布萊希羅德的書信再次顯示出他對互惠互助的期待。不僅如此，布萊希羅德的建議顯然源于這樣的信念，即物質上的主動將讓普魯士在兩個公國獲得政治上的優勢 [6](#6_7)  。

戰爭剛結束，普魯士內閣就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財政來源這個棘手的問題上。1864年夏天和秋天，俾斯麥大部分時間不在柏林，政治事務的重擔也落到羅恩的肩頭。財政問題成了他的沉重負擔，特別是因為他發現波德爾施溫格無能得令人惱火。7月，羅恩請教最好的朋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佩特斯（Friedrich Perthes），詢問政府是否應召集議會和請求戰爭補貼。“俾斯麥和我堅決反對這樣做，因為我們不能讓國王第二次請求那些人給錢；如果同意給錢，這些人就有機會在頭腦簡單的公眾眼中恢復形象；如果拒絕給錢，他們將嚴重傷害普魯士的政治信譽和財政信貸。”羅恩還表示，其他部長希望召集議會，他們猜測反對派不敢拒絕，如果仍然頑固不化，“議會制在普魯士將永遠被毀滅” [[11]](#11_38)  。羅恩最終占了上風，因為政府無需任何緊急貸款或信貸。布萊希羅德寫道，政府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國庫儲備，“由于高稅收，我們國庫充盈” [[12]](#12_36)  。一個月后，羅恩提出逐步裁軍以便減少開支，“從而避免讓我們受制于無法無天的議會” [[13]](#13_32)  。在準備1865年的預算案時，羅恩再次與波德爾施溫格發生爭執。1864年秋，他考慮辭職。布萊希羅德聽聞議會的嚴重分歧，他在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表示，波德爾施溫格的辭職近在眼前 [[14]](#14_32)  。兩位部長都沒有辭職，繼續不情愿地合作 [7](#7_7)  。

1865年1月，議會的常規會期開始。戰線仍然不變，但力量和威信發生決定性變化。“許多議員渴望和解”，俾斯麥和羅恩也愿意試試妥協的可能性 [[15]](#15_30)  。關鍵問題仍是兩個：軍隊改革和議會對預算的控制。軍事勝利讓許多議員震驚，他們的決心發生動搖，而國王則變得比以往更加頑固和不容妥協。反對派議員仍然不愿放棄他們從憲法沖突伊始就堅持的一項基本權利：調撥資金和批準其支出的權利。批準政府貸款將進一步削弱議會名義上的控制。自由派再次勇敢地對許多暴政和專制舉動提出抗議，但他們卷土重來希望渺茫。在沮喪和頻頻的情緒失控中，議會不出意外地拖到了解散。會期無果而終，除了讓議會變得更加無效和無用。

由俾斯麥起草和宣讀的國王開幕致辭在口吻上有和解之意，在實質上卻并非如此。國王聲稱那些重大勝利得益于他對普魯士軍隊的重組（更糟糕的是，他還相信這點）。事實上，新規尚未實施，軍事勝利是舊軍隊的功勞。現在，國王敦促議會接受那些改革，讓它們的實施符合憲法，從而結束憲法沖突。但占多數的自由派在這點上拒絕讓步，雖然他們在其他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專橫的曼陀菲爾的適時慫恿下，威廉拒絕羅恩和俾斯麥所傾向的真正妥協，比如放棄三年兵役制。3月27日，議會以絕對多數否決了1865年的預算案，并接受了議會委員會的結論，即減少計劃中的軍費撥款，而社會和教育支出則需要增加。一個月后，議會全盤否定了軍事重組法案。羅恩一度陷入絕望，被所有無效的抗爭弄得精疲力竭：“我感覺，毋寧說確信，我們必須采取行動。”如果行動失敗，那么“我只能預言自己將與斯特拉福（Strafford）同病相憐［斯特拉福是查理一世的大臣，1640年被處決］，洶涌的革命將淹沒旗幟……那將是普魯士的末日……我耗盡的不是力量，而是耐心和冷靜。因此我并非不可或缺，是到了該離開的時候” [[16]](#16_30)  。

4月初，作為海軍部長的羅恩提交法案，要求授權政府在今后六年間有1900萬塔勒用于海軍，包括基爾（Kiel）的防御工事，其中1000萬將來自新的貸款。從1848年開始，海軍就是自由派愛國主義者的夢想計劃。俾斯麥再次把一個兩難選擇放到自由派對手面前：要么放棄夢想，否決海軍提案；要么放棄原則，批準政府貸款，即使政府的政策違憲。多數議員不情愿地準備拒絕為海軍撥款，于是俾斯麥得意洋洋地指責他們失去了“海上雄心”，指責他們沒能利用普魯士的勝利，這場勝利讓普魯士獲得基爾的共管權，但只有普魯士愿意保衛那里。俾斯麥還嘲笑了議員們的“消極無能……如果否決我們當時提出的發債請求讓你們征服了杜普爾，那么我希望，你們現在拒絕貸款將帶來一支普魯士艦隊” [[17]](#17_24)  。

5月，波德爾施溫格向議會提交了丹麥戰爭期間巨額支出的紀要。總金額達到2250萬塔勒，只有不到一半來自國庫，其余來自收入盈余。政府要求議會追溯授權使用國庫資金，議會先前拒絕政府的貸款申請讓此舉變得必要。議會不得不再次在放棄原則和拒絕支持勝利間做出選擇，和廣大民眾一樣，這場勝利也大受議員們歡迎 [[18]](#18_24)  。

議會固執地拒絕所有對錢的要求。它以絕對多數否決了海軍撥款和用于軍事改革的資金，并于6月13日宣布，政府在未經議會授權的情況下動用國庫的行為屬于違憲，內閣應該為這些錢負責。同一天，俾斯麥向反對派發起猛烈攻擊，隱晦地指控議員們叛國，因為他們阻撓國王的外交政策，有助于普魯士敵人們的計劃。他知道，許多自由派議員對普魯士的勝利歡欣鼓舞，指控他們缺乏愛國心將傷害他們本人及其政治前途。6月17日，俾斯麥結束議會，他遺憾地表示“議會沒能取得渴望的和解，會期的結束再次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被召集起來合作的兩派力量仍然相互疏離” [[19]](#19_20)  。

會期在特別劍拔弩張的氣氛中收場。兩周前，俾斯麥向著名科學家和自己的主要敵人之一—魯道夫·菲爾肖（Rudolf Virchow）發出決斗挑戰，因為菲爾肖質疑他的誠實。甚至布萊希羅德也對這種過時的夸張舉動感到震驚。他向科伊德爾表達自己的擔心，后者交給他幾份關于取消決斗的復雜的幕后斡旋的記錄。決斗剛被取消，布萊希羅德就趕忙告知雅姆斯男爵 [[20]](#20_20)  。俾斯麥的暴躁反映了其對持續沖突的不安。他已經贏得一場勝利，但議會仍在抵抗；1865年夏，俾斯麥無法確信，在沒有議會財政支持的情況下，自己能否取得另一場大捷。還要多少場勝利，議會才會接受軍事改革，并對其他要求做出妥協？俾斯麥的兩難處境在繼續：為了在國外取得勝利從而最終迫使國內的議會讓步，他需要錢，但議會不愿滿足這個要求。與此同時，為了籌措新的必要資金，他能夠拉著怯懦和缺乏想象力的閣僚們繼續在違憲的道路上走下去嗎？

俾斯麥的籌資行動是在與奧地利關系不斷惡化的背景下展開的。1864年11月，缺乏經驗的奧地利新任外交部長門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認為可以強迫俾斯麥接受自己的方案，他提出把兩個公國改組成新的公國，最好由奧古斯騰堡擔任統治者；如果普魯士政府不愿放棄吞并的打算，那么奧地利將要求獲得同等的土地作為賠償：西里西亞或者霍亨索倫家族在符騰堡（Württemberg）的領地 [[21]](#21_20)  。在幾周乃至幾個月的時間里，俾斯麥不愿給出明確答復，希望奧地利喪失耐心，或者國際局勢變得更有利。與此同時，他還提出能夠幫助奧地利貨幣恢復元氣的“巨額等價金錢” [[22]](#22_20)  。但他堅稱對土地賠償不予考慮，因為威廉不會接受。2月，他終于提出讓普魯士接受奧古斯騰堡統治的條件。新公國將作為普魯士的受保護國，它的陸軍和海軍將并入和服從普魯士軍隊。在提出這些苛刻條件前兩天，他寫信給戈爾茨，為自己試圖維持普奧同盟的政策做了辯護。同盟仍然有利可圖。

盡管雙方有些小齟齬，我覺得最好還是暫時延續目前的婚姻，即便離婚變得必要，最好留待迫不得已的時候，而非現在就斬斷紐帶，因為赤裸裸的背叛全無益處，現在也無法確信今后的新關系能帶來更好的狀況。 [[23]](#23_20)

爭執變得愈發激烈。奧地利覺得俾斯麥的條件和現有的共治局面都難以接受。如果奧地利人有任何自主行動—比如允許（更別說慫恿）奧古斯騰堡在荷爾斯泰因進行煽動—一貫傲慢無禮的俾斯麥就會以受害者自居。面對如此狡猾和無情的配偶，婚姻的確很難延續。俾斯麥時而恐嚇威脅，時而勸誘示好，有時表現出神秘莫測的曖昧，有時則是令人疑惑的坦誠。奧地利駐柏林的外交官卡洛伊和肖泰克伯爵始終無法真正摸清俾斯麥的把戲。他們是理性和循規蹈矩的人，完全不是詭計多端的俾斯麥的對手。如果要形容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政策，那么可以把他比作一位讓妻子惴惴不安的丈夫，他時而獻上擁吻，時而無情拒絕，時而誓言忠貞不渝，時而佯裝放縱調情。由于缺乏俾斯麥那樣的咄咄逼人和足智多謀，維也納只能將主動權拱手相讓。

奧地利對俾斯麥要求的第一反應是驚得目瞪口呆。弗朗茨·約瑟夫告訴普魯士大使維特男爵（Baron Werther），這些條件“完全無法接受” [[24]](#24_18)  。與此同時，內閣不管部長 [8](#8_7)  ，因政治頭腦敏銳而極受尊敬的莫里茨·埃斯特哈齊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azy）向維特透露，普魯士吞并兩個公國似乎不可避免，而且更希望正大光明地吞并，而非像奧地利人建議的那樣遮遮掩掩，盡管這會讓奧地利蒙羞。當維特提及不可能有土地賠償，只能指望金錢賠償時，埃斯特哈齊回答說，如果后者“很高，他將不會反對”，盡管皇帝覺得這樣做有失顏面 [[25]](#25_18)  。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與維也納的一位有影響力的朋友—莫里茨·里特·馮·戈德施密特（Moritz Ritter von Goldschmidt）展開秘密談判。1820年，17歲的莫里茨·戈德施密特陪同遠親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從法蘭克福前往維也納，在半個多世紀里一直擔任維也納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高級合伙人。作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最親密的合作者，戈德施密特獲得梅特涅 [9](#9_7)  的特別優待和豁免權，并經常與后者見面。他還從宮廷獲得豁免權，若非如此，猶太人在維也納的生活仍然相當艱難（他的兒子記憶尤深，父親被豁免佩戴猶太人仍然必須戴的黃色標志）。戈德施密特與所有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關系密切，他的許多親屬也在各地的羅斯柴爾德銀行工作 [[26]](#26_16)  。他和布萊希羅德是多年好友；兩人都是上流社會成員，出入各自國家的宮廷，有機會接觸到歐洲的國際精英。他們還都是虔誠的猶太人，把猶太血統看作彼此間的特殊紐帶。2月末，布萊希羅德找到戈德施密特，兩人試圖想出某種“賠償方案”，既滿足奧地利的要求，又讓普魯士得到兩個公國。

俾斯麥了解并鼓勵布萊希羅德的計劃，甚至可能是它的委托人。布萊希羅德的行動得到充分授權，是俾斯麥戰略的一部分。俾斯麥同時開辟多條戰線：上述計劃是其中之一，如果那位愛好和平的銀行家弟兄能夠想出在不訴諸戰爭的情況下滿足俾斯麥最低野心的方案，那將是很受歡迎的權宜之計。關于這場交易的流言甚囂塵上：“關于金錢交易的想法從［1865年］1月開始就出現在各家報紙上，它變得日益流行，特別是在銀行家圈子里。” [[27]](#27_12)

布萊希羅德和戈德施密特保持了長期而親密的書信往來，不幸的是，只有戈德施密特的信件留存下來。1865年3月1日，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他認同“最可敬的朋友”，維也納和柏林間因為兩個公國而產生嚴重難題，“我不知道這些難題如何解決，無論你多么深信我們（！！！）彼此誠心地在這件事上展開合作。親愛的朋友，我們的合作在這樣的世界性問題中能有何作用？” [[28]](#28_6)  他抱怨布萊希羅德對物質賠償的暗示過于模糊，“你必須清楚地表達觀點，因為這樣的事不能含糊其辭。請清楚地告訴我，你想要什么。我會用正確的方式轉告正確的對象，沒有人會過問，我可以極為確信地向你保證”。布萊希羅德很快打消戈德施密特困惑的懷疑—顯然他提到，他的“好線人”就是該計劃的主使人。

一周后，戈德施密特表示，如果成功談判的機會存在，他愿意前往柏林。他想要知道布萊希羅德所謂的“巨額”賠償意味著什么，“用錢解決問題很不光彩，因此數額必須高到克服由此產生的巨大不適感”。他再次告誡布萊希羅德不要表現得那么“外交式的不可捉摸”。就像布萊希羅德所暗示的，區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對奧地利全無用處。“用西里西亞作交換更能被接受。” [[29]](#29_6)  3月9日，戈德施密特寫道：“親愛的朋友，我正在上帝的葡萄園中勞作！我們很快會知道是否可行！氣氛緩和了！” [[30]](#30_2)  絆腳石是皇帝的榮譽感。戈德施密特與維特男爵進行商談，并扮演起他和奧地利財政部長伊格納茨·馮·普萊納（Ignaz von Plener）的中間人。維特提出“4000萬弗洛林（florins） [10](#10_7)  ，這是他本人的意思，未經政府授意”，而戈德施密特則認為6000萬是可商量的金額。無論如何，他要求布萊希羅德說服“他足智多謀、無所不能和手段層出不窮的主人”放棄霍亨索倫（普魯士在符騰堡的天主教飛地），但不包括王朝城堡 [[31]](#31_2)  。威廉會同意放棄王朝的祖籍地—就像維克多·伊曼努埃爾（Victor Emmanuel） [11](#11_7)  將薩瓦割讓給拿破侖嗎？

3月14日，科伊德爾在信中告訴布萊希羅德，維特報告說已經和戈德施密特見過面，并提到了“3000萬到4000萬”，但他被要求今后不要提及任何金額。布萊希羅德顯然懇求科伊德爾要更積極地推進談判，卻被告知“開價不能來自我方。如果對方想要金錢賠償，應由他們開價” [[32]](#32_2)  。俾斯麥是個精明的談判者，似乎不愿通過金錢開路讓奧地利放棄土地。

維特向柏林報告說，得益于戈德施密特的斡旋，他與普萊納討論了金錢等價物的問題。雙方沒有提到金額，但普萊納表示，賠償必須比奧地利的戰爭成本（約2500萬弗洛林）高得多，包括戰前開支。

普萊納首先感嘆，通過金錢賠償達成妥協會在奧地利和整個德意志引起抗議，并表示因此賠償額必須很高……金錢賠償的想法在這里正日益流行，特別是在金融精英中間，他們知道奧地利國庫空虛，必須經常施以援手。

讀過維特的報告后，威廉說：“如果皇帝知道領土交易有損我的榮譽，那么金錢賠償一事就能更進一步，這是榮譽與榮譽之爭—金子無疑比人權更有可塑性。” [[33]](#33_2)  按照維特的暗示，戈德施密特向普萊納開價4000萬弗洛林，但后者回復稱：“太少了。”戈德施密特擔心，維特給柏林的報告可能掩飾了這個金額是維特自作主張的事實 [[34]](#34_2)  。

在維也納發出上述試探的同時，俾斯麥也在柏林做出和解的姿態。3月11日，他漫不經心地提到，西里西亞的格拉茨（Glatz）伯爵領地是可能的賠償籌碼，雖然威廉表示反對，而且轉讓必須得到當地議會的同意 [12](#12_7)  。幾天后，他再次提及這個話題，并告訴卡洛伊，自己傾向土地賠償，甚至不惜放棄格拉茨，但威廉“在良心上有點感情用事”，因此反對割地。不過，他建議奧地利人煽動當地人對割地的熱情。“我將樂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35]](#35_2)  不過，兩國君主都是真正的固執之人，特別是當他們覺得自己的榮譽受到威脅時。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報告說：“他們的個人關系非常好”，但在兩個公國的問題上誰都不愿讓步 [[36]](#36_2)  。

與卡洛伊的友好談話后不久，維也納的風向變了，俾斯麥氣得目瞪口呆。奧地利人開始傾向奧古斯騰堡。俾斯麥對這個暗中違反奧普合作的舉動感到憤怒，布萊希羅德和戈德施密特的談判戛然而止。三周后，卡洛伊向俾斯麥抱怨說，羅恩在普魯士議會面前堅持基爾永遠是普魯士的基地，俾斯麥反擊稱：“我可以向你保證，普魯士不會退縮；只有戰爭失利，只有30萬人的奧地利軍隊勝利開進柏林才能改變我們的決心。” [[37]](#37_2)  普魯士和奧地利朝著戰爭更近了一步，甚至威廉也開始感覺被他的帝國盟友背叛了。不過，俾斯麥的工作做得過于好了。1865年春，俾斯麥還在猶豫是否把普魯士引入戰爭，但國王的立場變得甚至比他更加強硬。在5月28日的御前會議上，俾斯麥甚至提出去掉2月提議中某些容易引起麻煩的內容，也許是考慮到普魯士財政尚未達到理想狀況。但威廉拒絕了。俾斯麥6月初對肖泰克伯爵所發的感慨既夸張又不無道理：“我不是普魯士，維也納千萬不要在這點上自欺欺人。” [[38]](#38_2)

1865年6月，俾斯麥同奧地利和普魯士議會的關系到達新的谷底。兩種矛盾有了交集：隨著兩國朝戰爭越走越近，普魯士需要遠遠超過丹麥戰爭的財政力量。由于堅決拒絕提供幫助，議會于6月中旬被解散，這凸顯了威脅的同時性。6月19日，在威廉前往卡爾斯巴德進行那次關鍵性的度假的兩天前，御前會議上討論了如何應對議會。國王提出三種方案：立即解散；等1865年秋天再解散；召回現在的議會，如果它拒不從命就立即解散。羅恩傾向于盡早解散，然后由國王發表告國民書，如果這同樣無效，那么就必須推行新的選舉法。奧伊倫堡警告說，這樣的方案可能削弱王室權威，招致普選權的危險。沒有萬全之計。

俾斯麥表示，“他早就深信，用現有憲法無法長時間統治普魯士，對其做出重大和廣泛的修改不可避免” [13](#13_7)  。唯一的問題在于何時出手。他要求繼續讓議會“自生自滅”，同時騷擾反對派和譴責自由派議員。過多的選舉只會煽動反對派的情緒，暗示政府依賴自己青睞的多數派。因此，俾斯麥希望在1866年1月重新召集現有議會，一旦抗命就立即解散，并盡可能推遲下次選舉。最后，俾斯麥“提到了國外形勢的錯綜復雜可能帶來的機會，指出也許可以通過合適的金融運作削弱目前貨幣市場對奧地利貸款的偏愛”。威廉支持俾斯麥的主張。簡而言之，在俾斯麥不得不決定是否主動與奧地利撕破臉前，他必須再次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內閣，應對所謂憲法與預想中的普魯士命運的格格不入，以及國內僵局導致的嚴重財政后果 [[39]](#39_2)  。

整個6月和7月，俾斯麥都在同時追求兩個目標：一方面為普魯士籌款，另一方面不讓錢落入奧地利手中。1864年，一筆巨額貸款幫助了接近破產的奧地利，貸款主要由阿道夫·漢澤曼籌辦，并得到柏林市場的支持 [[40]](#40_2)  。俾斯麥不希望1865年再出現類似的操作，他認為兩國很可能開戰，也許戰端迫在眉睫。6月初，他告訴布萊希羅德，“與奧地利真正撕破臉”可能在幾個月中都不會發生。普魯士將不會主動發難或者發出最后通牒；不過，如果奧地利想要開戰，那么普魯士也會做好準備 [[41]](#41_2)  。這些警告可能會讓布萊希羅德或羅斯柴爾德家族不敢幫助奧地利。幾天后，俾斯麥會見了柏林的一位重要銀行家保羅·門德爾松—巴托爾迪（Paul Mendelssohn-Bartholdy），表面上詢問商界對與奧地利的戰爭會做何反應，但更可能是在警告他，如果爆發戰爭，普魯士可以在四周內打敗奧地利 [[42]](#42_2)  。

俾斯麥對普魯士的財政越來越不耐煩，這反映了他咄咄逼人的意圖。7月初，他致信羅恩，表示“［我們需要］通過自己的金融運作挫敗奧地利想要展開的運作，從而維護和平”。他談到幾種籌款方案，但都遭到波德爾施溫格的反對，因為此人“對議會心慈手軟”。如果籌不到錢，“我只能向陛下解釋，不得不暫停我們的外交計劃” [14](#14_7)  。戰爭的危險越來越近，新的奧地利政府不愿示弱：“和我們一樣，對內愈加保守的立場要求愈加強硬的對外態度。” [[43]](#43_2)  這是俾斯麥罕見地承認自己政府的對內鐵腕和對外黷武間有密切聯系，這種聯系將是隨后幾十年間德國政治生活的特點，并對其產生不利影響。

從6月末開始，威廉和俾斯麥待在卡爾斯巴德（位于奧地利國土上），而戰爭的危險則與日俱增。決戰前的局勢對普魯士格外有利：其他大國不愿干涉或無暇旁騖，奧地利的財政狀況一團糟，不得不裁撤軍隊，沒有足夠的錢來打一場戰爭 [[44]](#44_1)  。國王也最終下定決心，認為奧地利在兩個公國問題上的阻撓已經是足夠的開戰理由。那么，為什么一向主戰的俾斯麥在隨后的幾周內產生猶豫，為再次和平解決沖突保留了可能？這是俾斯麥相關作品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最近的一個新答案印證了我的觀點，即在俾斯麥與議會斗爭的四年間，政府能否獲得信貸是他最擔心的問題 [[45]](#45_1)  。整個7月，俾斯麥都在試圖“不通過貸款為可能的征兵籌措必要資金” [[46]](#46_1)  。他接二連三地給羅恩和弗里茨·奧伊倫堡寫信，要求他們采取行動。同時威嚇波德爾施溫格和伊岑普利茨，抱怨說自己早前的警告被當成耳邊風。和所有重要的問題一樣，俾斯麥在這件事上同樣試圖多管齊下，并不考慮這些計劃是否違憲，他會向奧伊倫堡夸口說，國王同樣需要錢，同樣認為更有職責維護王室，而非遵守憲法。此外，“如果憲法在任何問題上站不住腳，那么［在國王看來］違反憲法規定就是在為廢除它做準備” [[47]](#47_1)  。

在那幾個忙亂的星期里，是戰是和的問題懸而未決，一定程度上將由信貸流動決定。正是在這段時間，布萊希羅德證明自己對俾斯麥極其寶貴。他與俾斯麥在卡爾斯巴德舉行重要會談，這體現他的巨大價值。不幸的是，我們對那次會談的了解僅限于俾斯麥當時寫給奧伊倫堡的信。俾斯麥提到一種可能的操作：布萊希羅德將動員羅斯柴爾德家族牽頭組成財團，財團借款給海貿銀行，再由后者把錢交給政府 [[48]](#48_1)  。

不過，布萊希羅德也報告說，他成功完成了那些年來最重要的工作。7月中旬，政府與科隆—明登鐵路公司簽訂協議，為政府提供大筆資金。協議的達成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布萊希羅德不僅作為鐵路公司的銀行家和董事之一（就像他的父親那樣）參與其中，也是俾斯麥的心腹。這個故事足夠復雜和重要，有必要簡短概述。

這條鐵路擁有不尋常的歷史，反映了德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修建計劃于1833年提出，目的是將廉價的魯爾區煤炭運往烏珀塔爾（Wuppertal）。1859年鐵路竣工，布萊希羅德為其提供了決定性的幫助，在那個深陷危機的年份里籌措必要的資金。鐵路的建成還要歸功于奧古斯特·馮·德·海特男爵的推動，這位魯爾區的銀行家長期以來都對鐵路感興趣。1848年擔任商務部長后，他是國家控制和最終收購整個普魯士鐵路網的主要支持者。海特與科隆—明登鐵路簽署一系列協議，政府為鐵路債券提供3.5%的利率擔保，還購買七分之一的原始股份，并有權分期購買更多股份，從而讓國家最終成為鐵路的唯一股東。1854年，政府同意分期購買權推遲到1870年。19世紀50和60年代，鐵路是德國最重要的投資領域；這些鐵路大多盈利，它們的股票主宰了德國證券市場 [[49]](#49_1)  。

隨著“新時代”（New Era） [15](#15_7)  的開始，海特推進國有化的政策受到個人利益和廣為接受的曼徹斯特自由經濟主義的挑戰 [16](#16_7)  。在政府內部，海特遭到從1851年起擔任財政部長的內閣同僚卡爾·馮·波德爾施溫格的反對，兩人總是意見相左。海特尚在任時，他的政策就已經開始失去市場，隨著1862年他退出權力舞臺，德國鐵路政策出現暫時的反轉。1862年12月，察覺到這點的布萊希羅德向政府提交長篇備忘錄，建議政府終止擔保和放棄最終收購的權利，以換取公司的立即賠償。布萊希羅德稱，政府不應等到1870年用貸款收購鐵路，而是應該馬上放棄這些權利，從而能馬上自由支配1400萬塔勒。他總結說，這些錢“現在可以找到更有用的途徑，或者拿來充實國庫” [[50]](#50_1)  。

布萊希羅德的備忘錄是向商務部長伊岑普利茨伯爵提交的，后者將其轉交給自己的首席參事沃爾夫（Wolf）。沃爾夫指責布萊希羅德的建議可能以損害國家利益為代價讓股東受惠。沃爾夫宣稱，放棄各種權利將導致國家損失3000萬塔勒，而布萊希羅德方案只能提供1000萬塔勒的賠償和立即解凍400萬塔勒的國家資金。沃爾夫認為賠償和可能損失的差額懸殊，請求駁回該提議。1864年7月，伊岑普利茨要求重新審閱布萊希羅德原先的方案。1865年春，他再次征詢和聽取專家意見，并制定新的支付方案，新方案將為國家帶來1700萬塔勒的現金。這樣的安排很常見，最后的談判由布萊希羅德和科隆銀行的奧本海姆（A.Oppenheim）主導，進展非常迅速。1865年7月18日，政府與鐵路公司簽訂協議（需由國王和股東批準），前者放棄收購鐵路的權利，從而換取1300萬塔勒 [[51]](#51_1)  。此外，政府不必再為與科隆—明登鐵路相關的某些小鐵路維持擔保基金，可以出售組成該基金的可轉讓證券。在公司需要支付的1300萬塔勒中，300萬應在1865年10月1日以現金支付，其余部分為新設立的股票 [[52]](#52_1)  。

協議可能沒有波德爾施溫格和伊岑普利茨希望的那么理想，更別提兩位部長對于簽署這樣一份他們懷疑違憲的協定心存不安。但協議正當其時，讓俾斯麥和羅恩欣喜不已。7月21日，在前往加斯泰因（Gastein）途中，威廉在累根斯堡（Regensburg）召開決定性的會議，再次評估普魯士的對奧政策。由于財政狀況大大改善，俾斯麥可以提出更強硬的主張。同一天，他在發給王儲的電報中表示：“陛下在累根斯堡會議上做出決定后，全軍動員和一年期軍事行動的資金已經有了著落；金額在6000萬塔勒左右。” [[53]](#53_1)  一周后，羅恩興奮地對俾斯麥的老朋友莫里茨·馮·布蘭肯堡（Moritz von Blanckenburg）表示：

我們有錢了，足夠讓我們在外交政策上自由地施展拳腳，如果需要的話，也足夠動員全部軍隊和支持一次完整的軍事行動。這讓我們在奧地利面前能夠表現出必要的從容不迫，從而寄希望于他們接受我們的合理要求，避免我們都不想要的戰爭……錢從何而來？并沒有違反法律，主要是通過與科隆—明登鐵路達成的協議，我覺得非常合算，甚至波德爾施溫格也這樣認為。 [[54]](#54_1)

奧地利代辦肖泰克男爵致信門斯多夫伯爵，表示盡管存在戰爭可能，但普魯士并沒有異常的軍事舉動；只有在金融領域，該國政府才做了不尋常的準備，主要舉動是科隆—明登鐵路協議。“這些金融運作……只能從迫切的政治必要性而非經濟角度解釋，議會是否會批準它們［令人懷疑］。”普魯士國庫已經積累了“通常只為戰爭準備的大筆資金” [[55]](#55_1)  。政府把協議視為憲法沖突的一部分，特別是由于早前與多位銀行家的談判已告破裂，因為他們要求貸款必須符合憲法。

事實上，出售未來的國有資產已經違反作為國家最高法律的憲法，議會后來也的確抨擊了該協議。不過羅恩的熱情也許足以抵消波德爾施溫格的不安。當俾斯麥和羅恩的糾纏不休現在終于可以停歇一會兒，波德爾施溫格感到的應該只有如釋重負。

經過與奧地利人的最初幾天談判，俾斯麥發現他們在真心尋求戰爭之外的解決方式。他同樣表現出和解姿態—同時他意識到，科隆—明登協議帶來的真金白銀不會馬上到賬，事實上該協議甚至尚未得到股東的批準。與此同時，國內的消息繼續讓俾斯麥失望。布萊希羅德報告說，7月17日，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卡爾·邁耶爾男爵與海貿銀行行長奧托·馮·坎普豪森（Otto von Camphausen）就收購900萬塔勒的1859年普魯士債券展開商談，這筆債券仍然留在海貿銀行的金庫里沒有發行。羅斯柴爾德也是布萊希羅德的代表，他先后提出98折和98.5折購買，最后提出以99折甚至99.5折購買一半的債券。令布萊希羅德沮喪的是，坎普豪森堅持按面值出售。談判破裂了，坎普豪森將債券分成小份，以平價出售給柏林的銀行家。布萊希羅德告訴俾斯麥，他覺得拒絕外國幫助、傾向本國資金是“金融錯誤”，因為從政治危機角度考慮，本國資金應該被留作儲備 [[56]](#56_1)  。直到8月8日，俾斯麥仍然從加斯泰因往柏林發來電報，焦急萬分地詢問金融運作進展如何以及“錢何時到位” [[57]](#57_1)  。

8月10日，俾斯麥致信奧伊倫堡，表示自己正努力與奧地利達成妥協，特別是因為如果關系破裂，“我們需要時間籌錢和穩住法國”。他希望獲得“可以接受的喘息之機……讓我們暫時有尊嚴地生活，但又不讓戰爭［的可能］離我們遠去……”他對與奧地利達成妥協很有信心，以至于他讓奧伊倫堡轉告布萊希羅德，“不知道我在他那里的賬戶是否仍有一部分被投資于證券，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完全不應該出于對戰爭的過早恐懼而拋售它們” [[58]](#58_1)  。這個聯系很不尋常，特別是對習慣于政客假裝回避任何“利益沖突”的我們而言。如果俾斯麥試圖與奧地利講和，他肯定不愿無意中因此損失自己的錢。他要求奧伊倫堡向布萊希羅德轉達那條消息，這證明他覺得求和的想法完全無可厚非。

8月中旬，俾斯麥取得了外交勝利。利用奧地利的無心開戰，他終于達成可接受的協議。這份后來被稱為《加斯泰因條約》（The Convention of Gastein）的協議對“不可分割的兩個公國”做了分割，普魯士獲得石勒蘇益格的管轄權，奧地利得到荷爾斯泰因。在奧地利的要求下，兩國維持了共同主權；雖然沒什么實際意義，但這讓俾斯麥有無數機會干涉荷爾斯泰因（該公國位置較南，普魯士人必須穿過那里才能到達石勒蘇益格），從而挑釁奧地利。勞恩堡公國被賣給普魯士，后者還在荷爾斯泰因享有特別的陸軍和海軍權。

條約不過是又一次權宜之計，它讓普魯士有所獲益，而奧地利除了時間一無所得 [17](#17_5)  。許多普魯士人把《加斯泰因條約》看作為奧爾米茨雪恥，而奧地利的同情者則哀嘆，奧地利“完全為了普魯士的利益簽訂了《加斯泰因條約》” [[59]](#59_1)  。8月中旬，兩國統治者和大臣們在薩爾茨堡（Salzburg）和伊舍（Ischl）聚會，營造出條約簽署后兩國君主團結融洽的氣氛。但普魯士的胃口已經因為吞下勞恩堡而被吊了起來。

在寫給同僚們的密信中，俾斯麥強調，財政上的不確定是和解政策的重要動機：“我們的財政和軍事準備讓提前主動撕破臉變得不可取。” [[60]](#60_1)  這無疑是實情，就像他的所有籌錢活動所顯示的—但該解釋也別有目的。雖然奧伊倫堡是俾斯麥忠誠的朋友，但他并不總是支持后者的籌款計劃，所以應該讓他（更別提奧伊倫堡的同僚們）明白財政窘迫的后果。戈爾茨同樣應該告訴法國人，錢是達成《加斯泰因條約》的重要考慮—免得法國人以為俾斯麥突然接受了親奧的全新政策。

在條約簽訂前的幾周乃至幾個月里，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四處奔走。作為回報，俾斯麥委任他為普魯士向奧地利購買勞恩堡的資金過戶代理人。條約規定的金額為250萬丹麥塔勒，由普魯士國庫以普魯士銀幣的形式支付給布萊希羅德，后者再將其過戶給奧地利方面的代理人—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61]](#61_1)  。戈德施密特鼓勵布萊希羅德索取1%的傭金，并恭喜他獲得豐厚的利潤和“額外的獎賞” [[62]](#62_1)  。

中歐的緊張和不確定沒有因為條約的簽署而結束，布萊希羅德的服務仍然非常有用。普魯士和奧地利都清楚，條約只是推遲了戰爭，是最終解決前的暫時和解。雙方抓住這個喘息之機，都尋求在國內外扎緊籬笆。

在加斯泰因，俾斯麥保留了對奧政策的兩種基本選擇—妥協或戰爭。他樂于靜觀其變，看看奧地利是否會和平地讓步。雖然也可以通過暴力實現目的，但那樣做不無風險。他很可能察覺到，在大多數方面，時間對普魯士有利，因為僅憑本國物質上的力量和優勢就能削弱奧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 [[63]](#63_1)  。但俾斯麥傾向于加快這個過程，特別是因為普魯士的國內狀況要求盡早取得對外勝利。

俾斯麥一度希望從加斯泰因開始，奧地利人可能會繼續悄悄地讓步。早在加斯泰因時，他就認為出售勞恩堡可能成為有用的先例。他沒有和奧地利使者討價還價，但樂于接受所有要求，因為“財力允許我們一次性付清全款，我希望向你證明，可以和我們做成好買賣” [[64]](#64_1)  。他致信波德爾施溫格，暗示奧地利人可能像出售勞恩堡一樣賣掉荷爾斯泰因 [[65]](#65_1)  。

但形勢不斷在變化。條約簽署一周后，布萊希羅德的合伙人尤里烏斯·施瓦巴赫（Julius Schwabach）致信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表示“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友好關系似乎已經嚴重受損……短時間內重新開始沖突并非不可能” [[66]](#66_1)  。9月中旬，俾斯麥向烏澤多姆承認，《加斯泰因條約》只是“權宜之計”，兩個公國的問題尚未解決，普魯士必要和不容商榷的要求沒有被滿足 [[67]](#67_1)  。

在整個危機重重的夏天，俾斯麥一直不安地觀望著杜伊勒里宮（Tuileries）。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加斯泰因突然握手言和讓法國人震驚和憤怒，俾斯麥不得不立即著手恢復與法國的親密關系。他知道拿破侖是自己未來計劃的關鍵。當英國和俄國把精力放在歐洲之外時，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敵對關系讓拿破侖成了隨時可以拉攏的那種仲裁者。拿破侖沒有否定任何選擇，俾斯麥知道，皇帝也會玩高深莫測的把戲，為自己爭取最有利的條件。

離開加斯泰因后，俾斯麥回到自己最喜歡的療養勝地比亞里茨，與皇帝一起享受政治休假。他與拿破侖的談話涉及方方面面，但他不太可能尋求法國人承諾在未來的德意志戰爭中保持中立。提出如此要求的時機尚不成熟。在比亞里茨和后來的圣克魯宮（St.Cloud），俾斯麥回答了皇帝對荷爾斯泰因未來的具體問題，表示普魯士將通過“經濟賠償或貨幣等價物”的方式從奧地利手中得到它 [[68]](#68_1)  。

俾斯麥足夠現實地意識到，拿破侖只有得到某種賠償才會接受普魯士的吞并要求。墨西哥的潰敗讓拿破侖損失慘重 [18](#18_5)  ，他希望借這筆賠償挽回自己的威望。俾斯麥暗示，比利時或盧森堡等法語區領地可能是合適的賠償。

返回柏林前，俾斯麥參加了雅姆斯男爵在費里埃爾城堡（Ferrières）舉行的狩獵，兩人私下交談了兩個小時。顯然，俾斯麥也告訴雅姆斯男爵，自己希望購買而非征服荷爾斯泰因。向法國的兩大權勢人物做了如是保證后，他返回柏林 [19](#19_5)   [[69]](#69_1)  。

在比亞里茨休假期間，俾斯麥收到布萊希羅德的一封緊急長信。信的意思很清楚：奧地利的財政危機比通常所知道的更嚴重，應該和平地將其變成普魯士的優勢。布萊希羅德描繪了奧地利的慘淡局面：新的開支已經超過預期中的“巨額赤字”；向國際銀行界求助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因為金融家們對奧地利的可靠性和匈牙利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效忠“心存疑慮”。潛在的貸款者們本身也深陷“當時歐洲主要貨幣市場的巨大危機中，一方面是由于出口加工業的繁榮，一方面是對跨大西洋基金和原材料的過度投機……”

因此，布萊希羅德提出驚人的想法：普魯士政府應該幫助奧地利，“通過最急需的金錢幫助，為了德意志的福祉而推行崇高的政策，把它的南方盟友更緊地與閣下綁定起來……由于最近的金融運作，普魯士王國政府目前手握必要的資金”，即使不動用國庫也有4200萬塔勒，其中3000萬來自科隆—明登協議 [20](#20_5)  。這個數字看上去也許不夠，但即使只有一半：

只要在合適時機奉上，也會在外交禮儀的無情算計中點燃溫暖的感激火光，讓[奧地利]內閣下定決心心甘情愿地就割讓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兩省展開談判。我已經可以在腦海中預見，維也納的內閣不會容許北方問題繼續懸而不決，因為這將危及其國內的統治；南方邊境的問題復雜得多，它必須在南方問題迫在眉睫和成為心腹大患前先解決北方問題。

布萊希羅德表示這席話“出于愛國情感”，他最后指出“德意志輿論界已經洗心革面，認識到民族原則比任何特定利益更重要，況且被民主煽動推上臺的覬位者［奧古斯騰堡］完全無法代表特定利益”，現在是“徹底”解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最佳時機 [[70]](#70_1)  。

布萊希羅德的信（俾斯麥的回信沒能留存下來）有幾點不同尋常之處：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慣常的經濟—政治分析，他把兩者視為不可分割；它還暗示作者強烈的和平傾向，并以為俾斯麥持有同感。布萊希羅德的建議巧妙而大膽，如果被采納，它無疑將是俾斯麥對和平解決方案感興趣的最好證明。也許布萊希羅德對他為俾斯麥籌得的錢懷有些許所有者的感情，希望確保其投入和平而非戰爭用途，“用來收購奧地利” [[71]](#71_1)  。俾斯麥從未試圖證實奧地利是否愿意以區區2100萬塔勒出售在德意志的權力主張。無論在某些方面顯得多么合理，這個想法還是反映出布萊希羅德也許過于相信金錢的力量。

布萊希羅德對奧地利需求的診斷是正確的。奧地利政府正在大力削減開支和降低赤字，以期為必要的貸款創造合適的條件。1865年秋，維也納并未準備向普魯士求助。它嘗試更有希望的對象，但還是面對回絕和不可接受的條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維也納分支斷然拒絕，倫敦分支也一樣。雅姆斯男爵同奧地利人進行一段時間的談判，但堅持附加苛刻的經濟和政治條件—比如奧地利應該對意大利采取更緩和的政策。奧地利人傾向于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對手財團（由哈貝爾家族［Habers］銀行、土地信貸銀行［Crédit Foncier］和貼現銀行［Crédit Foncier］組成）達成協議，這需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但不附加政治條件。奧地利人得到9000萬萊茵盾，不過利率很高，每100盾的本金到手的只有61.5盾。不過，即使這個計劃也取決于法國政府在法國市場上貸款的許可；拿破侖的許可被廣泛視作重要的親奧舉動 [[72]](#72_1)  。確保這筆貸款后，維也納對出售荷爾斯泰因不再那么感興趣。獲得拿破侖批準三天后，戈德施密特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對收購荷爾斯泰因一事已經徹底無能為力” [[73]](#73_1)  。

1865年秋天和冬天，奧普關系再次惡化到了戰爭看似不可避免的程度—除非奧地利接受普魯士蠻橫的要求。維也納對國內的舉步維艱感到沮喪，特別是與馬札爾民族主義的沖突，俾斯麥時不時的耀武揚威也使其不再抱有希望。門斯多夫感嘆道：“我們的外交政策在這片貧瘠土地上難道什么都長不出來嗎？” [[74]](#74_1)  奧地利人知道，俾斯麥決心攤牌，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行動中，也反映在他們偶爾截獲的書信里 [[75]](#75_1)  。

但俾斯麥同樣面對巨大的障礙。到了12月，羅恩相信戰爭已經變得不可避免，并認為自己和俾斯麥“可能在這條危險的道路上摔斷脖子” [[76]](#76_1)  。在深陷國內沖突的同時，冒險發動對外戰爭的確非常危險。國內沖突與對外侵略的關系密切而復雜。國內的對立無疑促使俾斯麥決定在對外問題上采取強硬的態度，但首要問題仍然是，一個除了渴望和平而在所有問題上都存在分歧的民族能否面對戰爭，而最要緊的是，一個被社會上大量富有階層痛恨的違憲政府能否找到冒險發動戰爭的必要資金。普魯士國內輿論在這點上分歧嚴重。

事實上，自由派反對者在政府的對外政策上的確存在分歧，一些議員已經向權力和成功的誘惑屈服。10月，肖泰克伯爵報告說，“更為明智的多數普魯士人”現在支持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一個月后，他遺憾地評論道：“在國內問題上，俾斯麥伯爵正節節勝利。” [[77]](#77_1)  不過，俾斯麥一再違反憲法，讓即使是最溫和的自由派也很難完全站在他一邊。

1866年1月15日，俾斯麥再次召集議會，但和解希望渺茫。政府沒有重新提交軍隊法案，因為經過之前的“無果協商……現在無法指望任何滿意的結果” [[78]](#78_1)  。政府當然堅持新的軍隊制度。另一方面，議會指派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科隆—明登鐵路協議中的違憲行為。調查負責人是反對派最犀利的法律專家之一，布萊希羅德的朋友愛德華·拉斯克（Eduard Lasker），結果不言自明。允許政府在未經議會批準的情況下出售國有資產無異于讓議會的預算權成為一紙空文。調查報告毫不含糊地指出：“協議被視為非法，因為政府在未經議會批準的情況下出售國有資產，以便為可能的沖突籌款；一位成員聽說，薩爾地區的煤礦也將遭遇同樣命運。” [[79]](#79_1)  委員會認為，協議參與各方都要負責，因為其中的法律問題非常清楚，以對法律無知為借口行不通。報告提交二十四小時后，俾斯麥突然結束議會 [[80]](#80_1)  。

在他看來，大部分議員仍然堅持“不讓內閣得到一分錢”的誓言已經足夠糟糕，更別提內閣還可能要吐出剛剛未經議會批準得到的數百萬錢款 [[81]](#81_1)  。有傳言稱，如果議會正式取消科隆—明登鐵路協議，奧本海姆將要求政府返還相關錢款 [[82]](#82_1)  。

政府和反對派的沖突也涉及其他問題。絕大部分代表認定購買勞恩堡違憲，因為憲法規定，國王需要得到議會批準才能成為外國土地的統治者。俾斯麥的反擊是用嘲諷把水攪渾的經典之作，旨在再次暴露反對派的無能。雪上加霜的是，普魯士高等法院也借機發難，推翻下級法院的決定，判決議員們要為在議會的言論負責。這個判決與憲法格格不入，令議會生活遭受重創，可能帶來合法面紗下的專制統治，摧毀自由和對法律的敬畏。隨著卡爾·特維斯騰（Karl Twesten） [21](#21_5)  因為在議會發表反對司法腐敗的言論而被起訴，反對派的怒火達到頂點，政府的形象則墜入谷底。難怪布萊希羅德報告說：“普魯士的國內形勢很糟糕，政府和議會的鴻溝正變得越來越大。高等法院最近的判決……在所有的相關圈子里引發最痛苦的感受。” [[83]](#83_1)  結束這個最短的議會會期時，俾斯麥再次把持續的僵局歸咎于議會，并警告說議會走上的道路“將會引發更嚴重的沖突，并讓現有沖突在未來變得更加難以解決” [[84]](#84_1)  。

但沖突終須解決。沖突損害了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威望，而且每當需要巨額資金時，俾斯麥就只能面對不確定和采取權宜之計。國王的支持者沒能就如何結束沖突達成一致。曼陀菲爾等人仍然傾向于政變；戈爾茨等人則希望改變體制：建立更加自由的政府（也許可以由他擔任首相），并采取能夠吸引各地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政策。俾斯麥看到另一種道路的可能性：他可以通過激化與奧地利的矛盾來轉移國內情緒。他能夠將兩者合而為一，希望它們相互抵消。事實上，這個計策由來已久。早在1862年12月，當俾斯麥談到自己的民族理想對自由派的吸引力時，他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他曾在議會斷然否認自己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是對付議會的一種手段，但這種否認本身暗示雙方都意識到那條道路的誘人之處。

議會休會幾天后，在一次關鍵的御前會議上作出加緊備戰的決定，除非奧地利人愿意讓步。之前，俾斯麥曾告訴議會：“對外交政策而言，某些時機一去不復返。”他最終說服國王，眼下正是這樣的罕見時機：一方面有望與意大利結盟，另一方面法國有望保持友好中立 [[85]](#85_1)  。俾斯麥和他的支持者表示：“強有力的對外形象和為普魯士榮譽而進行的戰爭將有利于解決國內沖突。”波德爾施溫格表示同意，但希望避免戰爭，王儲也警告不要手足相殘 [[86]](#86_1)  。外部條件有利于解決德意志問題，但俾斯麥下定決心抓住這些條件是因為他確信，對維也納的勝利也將帶來柏林的勝利。隨著議會的災難性休會，俾斯麥突然加快步伐：現在他力促馬上作出決定，需要立即取得勝利。他和他的國家的政治未來懸而未決。

隨后的四個月對俾斯麥極其艱難，他的神經幾乎崩潰。既要繞過普魯士與奧地利攤牌，又要避免外國干預的風險（特別是法國人），即使是俾斯麥無可匹敵的智謀也感受到最大壓力。他必須孤立和挑釁奧地利，但又要給維也納留下一絲余地，以防自己的外交策略不能奏效。他的計劃隨時可能被否定和摧毀，危險來自敵人與貪婪的中立力量的聯手，成功的國內陰謀，或者國王信任和決心的減弱。這是一段險象環生的日子，俾斯麥注定要以毒攻毒。為了達到目的，他愿意冒險嘗試一切，使用各種手段，無論是否離經叛道。與此同時，他遭到國內昔日朋友們的拋棄，甚至包括他最好的容克貴族朋友，他們對他大膽而沒有原則的政策感到震驚。他的自由派老對手們則憎惡他復辟專制主義，盡管其中一些人被他的新德意志政策所吸引，還有許多人對他的能力與天才贊嘆和驚異不已。5月，自由派作家魯道夫·海伊姆（Rudolf Haym）寫道：“無論他多么傲慢和輕浮，誰會無視他的運氣和才干呢？” [[87]](#87_1)  不過，國內輿論一邊倒地反對戰爭和俾斯麥。

俾斯麥的政治策略立足于普魯士的軍事準備—在這點上他可以仰仗羅恩和普魯士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Hellmuth von Moltke）的得力支持。但政治和軍事的巧妙安排還不夠。軍隊仍然需要填飽肚子才能作戰，需要調動的除了人員還有資金。俾斯麥在這方面的把握不如在政治事務上那么大，因此波德爾施溫格的無能和吹毛求疵令他更加惱火。1866年3月末，當內閣再次集會時，羅恩表示，“俾斯麥的神經質焦躁和波德爾施溫格的官僚式嚴謹與審慎導致不和無法完全消失” [[88]](#88_1)  。由于波德爾施溫格，“普魯士在財政準備上遠遠落后于軍事準備” [[89]](#89_1)  。波德爾施溫格的任務非常困難，因為議會的反對立場毫不動搖，而隨著戰爭的臨近，受到全球緊縮沖擊的柏林貨幣市場變得焦躁不安。俾斯麥需要找到新的資金來源，在這點上，他同樣需要嘗試各種途徑后才能找到正確選擇，但他對該領域并不那么熟悉。

就這樣，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生命中最艱難的這幾個月里向他提供巨大幫助。戰前的幾個月里，布萊希羅德四處奔走，參與“首長”的和平與主戰方案。和德國乃至歐洲的商界一樣，布萊希羅德應該傾向于和平解決危機，但他為人銘記和獲得榮耀的卻是幫助戰爭籌款。

從1866年2月中旬開始，布萊希羅德與戈德施密特的通信反映了對可能的戰爭重新產生強烈不安。2月18日，戈德施密特安慰他說，戰爭不會那么突然地爆發，但附上電報號，以便布萊希羅德可以在形勢有任何重大發展時立即通知自己。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你必須永遠努力推動和解，我也一樣。請隨時寫信給我，告知你那里的情況。你清楚我的謹小慎微。” [[90]](#90_1)  安塞爾姆男爵也向布萊希羅德打聽消息。2月末，這位柏林銀行家比維也納的朋友們悲觀得多，他的擔憂一定程度上印證這樣的故事：2月28日的御前會議結束后不久，他警告自己的朋友薩克森駐柏林大使霍亨塔爾伯爵（Count Hohenthal），表示會上討論了突襲薩克森的問題，但決定將入侵推遲到“原則上決定立即開戰后和開始動員軍隊前” [[91]](#91_1)  。如果布萊希羅德的確發出警告，他是在俾斯麥授意下這樣做的嗎？雖然沒有明確證據，但布萊希羅德無疑非常不安。

最后時刻，布萊希羅德和戈德施密特恢復早前的希望，認為可以達成關于兩個公國的賠償方案。這種想法也出現在其他地方，甚至俾斯麥在3月也時而提到它。他還荒謬地建議奧地利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賠償要求，從而有可能動搖威廉的固執反對 [[92]](#92_1)  （奧地利人很可能疑惑，這是為威廉還是為他們設的陷阱？）。大部分時間，俾斯麥推行主戰方案。不過，因戰爭威脅導致業務癱瘓的兩位銀行家仍然抓住一切機會推動和平。3月，他們為門斯多夫的避免開戰政策尋求支持。戈德施密特建議，如果在現金方案之外加上某些土地（如格拉茨），奧地利人可能會接受交易。他敦促布萊希羅德“竭盡所能……戰爭過于罪惡，將是對德意志的詛咒”。戈德施密特承諾將任何認真的金錢和土地報價（即使是非正式的）直接呈交給皇帝 [[93]](#93_1)  。幾天后，戈德施密特對自己的作用感到絕望：“我們倆過于人微言輕，無力介入這種局面。”

隨著和平的希望變得渺茫，此前一直非常客觀和冷靜的書信也開始受到民族主義激情的影響。戈德施密特對咄咄逼人的普魯士感到憤怒，對手足相殘無法釋懷。“我國公眾對這些絕望狀況的始作俑者［俾斯麥］的怒火與日俱增，如果爆發戰爭（但愿不要這樣），那么我國將奮勇作戰和同仇敵愾，即便我們身無分文。”盡管布萊希羅德試圖辯解，戈德施密特還是堅稱，一切挑釁都來自俾斯麥。他否認奧地利已經開始調兵。“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俾斯麥在有意謀劃戰爭和讓世界陷入不幸……我們這里沒有人會屈服于威嚇，他本來可以通過耐心得到他想要的。” [[94]](#94_1)  戈德施密特的信中充斥著驕傲、恐懼和憤怒—他的怒火發泄到同一個人身上。

在歐洲和普魯士也有許多人對俾斯麥的挑釁游戲感到同樣的義憤。3月末，一個被稱為“科堡陰謀”（Coburg intrigue） [22](#22_5)  的國際陰謀集團（包括部分俾斯麥的同僚）試圖說服威廉罷免那個正在誤導他的膽大妄為的家伙 [[95]](#95)  。約翰·羅素勛爵（Lord John Russell） [23](#23_5)  對維多利亞女王說的一句話表達了該集團的核心訴求：“唯一的補救辦法—唯一確保維持和平［的方法］—是國王罷免俾斯麥伯爵。” [[96]](#96)  作為陰謀的一部分，4月1日的《科隆報》（Kölner Zeitung）暗示，普魯士將用格拉茨交換荷爾斯泰因 [[97]](#97)  。這個想法在許多普魯士人那里立即得到積極響應 [24](#24_3)  。關于俾斯麥將被罷免的傳言再次流行起來，人們開始留心他的強大敵人。比如，4月4日，國王的兒子致信俾斯麥的一位部長，表示“羅斯柴爾德正處處與俾斯麥為敵，金融家們都顫抖了” [[98]](#98)  。俾斯麥有足夠的理由珍視布萊希羅德的忠誠：這在當時是罕見的財富。

2月中旬，布萊希羅德再次開始籌款，他首先找到自己最有權勢的關系人：雅姆斯男爵。如果羅斯柴爾德家族采取親普魯士的策略，那么其他銀行家也會跟風。但這樣的信號并未出現。布萊希羅德希望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否愿意牽頭或加入財團來收購普魯士政府準備出手的價值800萬塔勒的科隆—明登鐵路股份。羅斯柴爾德家族拒絕了，因為他們明白，任何此類行動都是在充實普魯士的戰爭儲備。大約四年前，在涉及普魯士人早前的一次游說時，雅姆斯男爵已經向布萊希羅德解釋過，“不為戰爭出資是我們家族的原則，即便我們無力阻止戰爭，但沒有為它火上澆油至少能讓我們心安” [[99]](#99)  。

但和平主義情感并非全部。全球市場陷入蕭條，各地股價都開始動蕩，每當有戰爭傳言，股價就會暴跌。雅姆斯男爵對經濟停滯和拿破侖的故作姿態頗有微詞。他戲稱“帝國就是下跌”（L’Empire，c’est la baisse），暗諷拿破侖的著名承諾“帝國就是和平”（L’Empire，c’est la paix）。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分支強烈反對向普魯士提供任何幫助，巴黎和柏林的大部分銀行家也認為如果開戰，奧地利獲勝的機會比普魯士大得多 [[100]](#100)  。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碰了一鼻子灰。

在2月中旬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一封信中，布萊希羅德還隱晦地提到薩爾煤礦：“薩爾布呂肯一事沒有得到最高層［布萊希羅德通常用這個詞表示國王］的支持，因此不太可能成真。” [[101]](#101)  這句話暗示，在與雅姆斯男爵的對話中，布萊希羅德已經提到過出售國有煤礦的可能性，買主很可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像從1月開始傳言的那樣 [[102]](#102)  。一周后，卡洛伊伯爵報告說，一位并非來自柏林的大銀行家（可能是科隆的奧本海姆男爵）告訴他，普魯士將很快強行通過與奧地利開戰的決定，那位銀行家被要求為政府持有的科隆—明登鐵路股份尋找買家。那人還略帶神秘地提到“有人打算出售屬于普魯士政府的另一項重大資產。他還用極為機密的口吻補充說，整個談判由俾斯麥一人進行，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并不知情” [[103]](#103)  。俾斯麥親自負責談判的另一項“重大資產”正是薩爾煤礦。

3月9日，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可以馬上提交財政備忘錄 [[104]](#104)  。3月12日，波德爾施溫格召見布萊希羅德討論備忘錄，不幸的是，備忘錄似乎已經佚失 [[105]](#105)  。提交和討論備忘錄后，布萊希羅德馬上返回巴黎 [[106]](#106)  。3月16日，柏林有傳言稱，政府正在商談出售薩爾煤礦，布萊希羅德前往巴黎很可能是為了與雅姆斯男爵討論此事。與此同時，亞伯拉罕·奧本海姆出現在柏林，商議建立有政府參與的新公司，用于接手這些煤礦 [[107]](#107)  。第二天，普魯士部長們開會評估與奧地利日漸惡化的關系。他們被告知，“奧地利不會接受用錢交換那兩個公國”—此事被視為重要新聞，這反映了柏林曾相當看重金錢解決方案。“資金來源遇到困難。出售科隆—明登鐵路的股份必將導致損失。有人建議出售薩爾布呂肯。第三種可能是召集議會尋求貸款，但條件是大德意志計劃和德意志議會。” [[108]](#108)  最后的辦法是用自由和民族主義計劃勸誘議會服從。俾斯麥無疑更希望不通過再次游說議會就籌到錢。

3月23日，戈爾茨對俾斯麥推進戰爭政策提出強烈警告。普魯士的國內分歧和歐洲的敵意讓這場沖突變得危險重重。在巴黎，親普魯士的氣氛突然消失；除了皇帝，所有人都反對普魯士。戈爾茨還表示：“你肯定比我更清楚—我相信我只是揣測—羅斯柴爾德拒絕與你做薩爾布呂肯煤礦的買賣。” [[109]](#109)  俾斯麥在備忘錄中寫道：“我沒提出把煤礦賣給他。”

戈爾茨的信是對俾斯麥一封來信的回復。首相在信中解釋說，普魯士沒有做出與奧地利同等的軍事準備，因為它希望“在金融運作完成前”避免調兵，“以免我們的軍事準備造成的巨大壓力讓這些運作變得更困難”。俾斯麥還秘密地透露，自己曾與羅斯柴爾德男爵展開商談。男爵向俾斯麥的“代理人”（布萊希羅德）解釋說，如果是幾周前，他很樂意與普魯士達成交易，但在當前的緊張狀況下他不愿這樣做—特別是當他和戈爾茨談話后！俾斯麥提醒戈爾茨“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維持與羅斯柴爾德的關系” [[110]](#110)  。難怪戈爾茨在回信中略帶激動地表示，同羅斯柴爾德的談判失敗與他的談話全無關系，而是不可信任的布萊希羅德為了掩蓋自己的失敗而散布的謠言，這個結果與布萊希羅德早前的樂觀形成鮮明反差。羅斯柴爾德很久以前就告訴過戈爾茨，只要普魯士的憲法沖突持續，他只有在王儲副署的情況下才會提供貸款。雅姆斯男爵還說，他最近的拒絕反映了他不愿“為戰爭提供資金”，特別是為一場明顯將損害他本人利益的奧普戰爭 [[111]](#111)  。布萊希羅德的巴黎之行顯然空手而歸，只是多了戈爾茨這個敵人，戈爾茨對這個人的“莽撞干涉”非常厭惡。

隨著軍事準備的深入，對錢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3月28日，經過漫長的斗爭，俾斯麥終于說服威廉加強軍隊實力，并為一半的野戰炮兵購置馬匹 [[112]](#112)  。外交人員仍在努力尋求日益渺茫的和平可能，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奧地利和普魯士軍隊（意大利人也將很快加入）開始浩浩蕩蕩地向指定地點開拔。隨著戰爭的臨近，俾斯麥擴大了沖突所涉及問題的范圍。兩個公國的命運已經毒害奧普關系，德意志民族的未來組織形式將成為戰爭的動機和意義 [[113]](#113)  。在3月31日的會議上，普魯士內閣獲悉“俾斯麥將推動德意志問題”。4月9日，他提出革命性的建議，要求重組德意志邦聯，并設立普選的民族議會 [[114]](#114)  。前一天，他與意大利結成反奧軍事同盟，盡管對方算不上保守勢力。在將普魯士推向戰爭的過程中，俾斯麥采用一系列革命性的手段，既觸怒保守派朋友們，也讓自由派對手們疑惑和常常感到恐懼。

在那幾個動蕩的星期里，布萊希羅德特別努力地收集和傳播信息。與意大利簽署同盟協議的前一天，法國代表埃杜阿爾·勒費弗爾·德·貝埃納（Eduard Lefebvre de Béhaine）回答了布萊希羅德的質詢：“我們的中立充滿好意，我們完全不會損害你在此事中最終將獲得的利益……你經常見到俾斯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當前和未來形勢的關鍵。” [[115]](#115)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向倫敦的羅斯柴爾德男爵發去報告，報告中解釋的問題包括：普意同盟被認為引發了倫敦市場的恐慌，但這種恐慌為時過早，因為目前雙方剛剛交換同盟的草案。他還表示，人們正力圖把俾斯麥趕下臺，但這些努力很可能失敗，因為它們意味著國王的道德失敗 [[116]](#116)  。

在俾斯麥推行革命性政策的同時，他的財政部長只能亦步亦趨，怯懦使其舉步維艱。3月末，波德爾施溫格開始在公開市場上出售政府持有的科隆—明登鐵路股份，但如果想馬上脫手肯定會造成損失。事實上，他為戰爭籌款的努力正好趕上一波嚴重經濟緊縮的開始，表現為生產衰退、股價下跌和信貸日益緊缺 [[117]](#117)  。3月24日，他告訴同僚們，他也許可以籌得4000萬塔勒，但此后政府將需要貸款，可能要得到議會批準 [[118]](#118)  。與此同時，法國駐柏林大使樊尚·貝內德蒂伯爵（Count Vincent Benedetti）認為，在金融運作完成前，普魯士政府將不得不遵循謹慎的路線。貝內德蒂預計，如果這些運作成功，國庫中將擁有1億法郎，足以發動戰爭 [[119]](#119)  。

與此同時，市場開始下跌，部分原因是戰爭的威脅。對布萊希羅德而言，這是段艱難的時光。雅姆斯男爵曾授意，如果覺得“戰爭將要到來”就拋售他的普魯士證券；普意同盟結成后，布萊希羅德開始出售羅斯柴爾德的持股，但遭到雅姆斯男爵的激烈反對，理由是他的行動和他令人安心的消息有矛盾：“你沒有證明你在保護我們的利益，希望告知我們你為何拋售。我們今天上午給你發去電報，表示不接受你的最后一筆賣出。”4月18日，布萊希羅德報告說政局有所緩和，他因此完全停止出售雅姆斯男爵的持股 [[120]](#120)  。

俾斯麥仍然想著出售薩爾煤礦。4月3日，薩爾的商人們請求威廉不要批準這樣的舉動。第二天，政府否認考慮過這樣做，但沒有回應請愿 [[121]](#121)  。事實上，俾斯麥突然變得對這個計劃更感興趣，并援引全新的理由。現在，他擔心普魯士目標的擴大會刺激拿破侖對土地賠償的胃口，特別是對薩爾。4月20日，俾斯麥提議將普魯士的薩爾煤礦出售給一家由政府作為主要股東的股份公司。4月30日，他知會其他部長，表示如果開戰，法國可能會索要補償，無論是當普魯士遭受挫折時出手相助，還是當普魯士勝利后的獲益超過那兩個公國時保持中立。拿破侖可能要求恢復1814年的邊界，包括薩爾在內。“他從未表達對這些邊界之外的德意志領土的欲望。”由于軍事變遷可能導致割地，政府必須確保不同時失去煤礦資產（俾斯麥對其估價6000萬塔勒）。因此，他要求對煤礦資產“做出變更，即使土地被割讓，它［煤礦］仍將留在我們手中” [[122]](#122)  。

在5月2日的內閣會議上，俾斯麥重復了變更產權的理由，以便當土地被轉交給法國后，作為主要股東的普魯士政府不會失去這筆資產。俾斯麥為自己的計劃辯護，即便潛在買家的出價低于應有價值。此舉可以被視作避免全損的保險，鑒于這筆資產的價值和暴露位置，溢價不會太高。羅恩表示同意，但其他部長一致反對，特別是波德爾施溫格和司法部長利奧波德·馮·里普伯爵（Count Leopold von Lippe），此事就此作罷 [[123]](#123)  。包括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在內的德國民族主義史學家曾堅稱，俾斯麥永遠不會把一寸德意志的土地割讓給拿破侖。這次內閣會議證明事實恰好相反，特別是因為俾斯麥應該不愿隨便提及割讓土地，他明白自己的對頭（尤其是戈爾茨）正是由于這種可能而反對他的政策。如果想要，他本可以堅持用最初的財政動機來解釋出售煤礦的想法，但他卻為這種變更采用重要得多的政治動機 [[124]](#124)  。俾斯麥知道，自己的大膽政策涉及的風險遠遠超過可能割讓一塊德意志的土地。

他還試圖打消一位極端保守的薩爾礦主施圖姆（C.F.Stumm）的疑慮，后者在5月8日對出售煤礦或割讓土地提出反對。俾斯麥告訴施圖姆，政府從未考慮這樣做，他自己似乎也相信這個謊言 [[125]](#125)  。但傳言沒有平息，5月中旬，布萊希羅德從戈德施密特那里獲悉，維也納相信薩爾煤礦已經被以9000萬塔勒的價格出售 [[126]](#126)  。

5月3日，在另一次御前會議上，威廉評估了普魯士與奧地利的關系。自從2月28日的上次會議以來，兩國關系不斷惡化。在聰明的導師點撥下，他指責奧地利的黷武態度要為此負責，并敦促采取相應措施保護普魯士免遭突然危險。他提議總動員；毛奇和王儲表示同意，但奧伊倫堡等人提出反對，理由是“出于政治考慮”。最后的決定是部分動員 [[127]](#127)  。奧伊倫堡的反對有充分的理由。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Rudolf von Delbrück） [25](#25_3)  寫道：“幾乎整個國家都反對戰爭。自由派對政府深惡痛絕，指責其推行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而對許多保守者而言，普魯士與奧地利的同盟被看作信條。” [[128]](#128)  俾斯麥被痛斥為暴君，試圖通過手足相殘的戰爭逃避國內矛盾 [[129]](#129)  。

5月2日，股市因為普魯士即將展開動員的傳言而陷入“恐慌” [[130]](#130)  。傳言被證實后，市場進一步下跌。5月12日是“黑色的一天”，而更黑暗的日子即將到來 [[131]](#131)  。普魯士人的痛苦正好趕上法國和英國的經濟衰退。5月11日，普魯士不得不將貼現率提高到9%。幾天后，惡劣的天氣毀壞部分作物 [[132]](#132)  。企業和公民團體向柏林提交請愿書，請求維護和平。作為受人尊敬的重要團體，柏林商會也請求國王不要冒險毀了“幾十年和平局面的物質果實……普魯士的榮譽、外部威脅或是國家的經濟未來都不需要戰爭” [[133]](#133)  。

布萊希羅德很可能認同這些觀點，但他明白為時已晚。5月初，他致信倫敦的萊昂內爾 [26](#26_3)  ，表示由于擔心奧地利的攻擊，普魯士將繼續動員。國王和王儲已經放棄反戰立場，熱情也不會再受到抑制。議會將很快被召回，并很可能批準撥款。6月2日，他報告說，“好線人”向他暗示，戰爭已經不可避免 [[134]](#134)  。

他的朋友們無疑希望和平。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寫下辛酸的書信，哀嘆俾斯麥煽動的內戰即將到來，并反駁了布萊希羅德的指責，表示他的信并非出于奧地利人的愛國主義：

我在這個我所摯愛的國家已經生活了四十五年，我的兒子們都出生在這里。你呢？你碰巧親奧地利嗎？讓我們像誠實和務實的人那樣通信，每人都寫出真正的所感所思。我不責怪你認同普魯士和為它著想，但我們倆必須公正，我們正在遭受不公……[由于普魯士聲稱奧地利好戰]整個歐洲都明白和在談論，你們的首相希望壯大普魯士，把我們和德意志拋在后面；只是他沒有明說而已。從幾個月前我就看清了這一切，但我無法想象內戰的可怕。

幾天后，他再次打開心扉。為什么如此輕率地無視歐洲的福祉？“有人正利用人類激情玩一場危險的游戲。一旦戰爭爆發，我擔心我們將見證可怕的東西；一旦戰爭奪走暴民的面包，代之以貧窮和饑餓，君主將無法再控制他們。”唯一能獲益的將是“該死的拿破侖……那個臭名昭著的斯芬克斯” [[135]](#135)  。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從維也納得到其他消息，曾與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共事，現任奧地利信貸機構（Austrian Creditanstalt）董事的維克托·貝納利（Victor Benary）給他“可敬的朋友”寫信，表示“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的財政狀況看上去糟透了，我相信他實際上已經破產”。后來的書信顯示，戈德施密特暗指奧地利，施瓦巴赫暗指普魯士。貝納利一定也覺得奧地利的審查機制非常愚蠢。5月22日，他在信中表示，他不認為最后的和平努力能成功，并補充說：

作為愛國者，如果你的朋友在最后關頭選擇妥協，我將感到遺憾。我相信，經過這場戰爭，普魯士的強大將變得無法想象。正如你所知，我是民主派，并非俾斯麥的支持者。但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將在選舉和其他一切事上支持他。結束割據狀態和把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奧地利]逐出德意志的機會不會再有。 [[136]](#136)

整個5月和6月，貝納利不斷向布萊希羅德發來對奧地利財政狀況最悲觀的報告，其中一些被轉交給俾斯麥 [[137]](#137)  。布萊希羅德的信息加深俾斯麥對奧地利軍事準備受困于資金不足的懷疑。這個懷疑在戰場上得到充分印證 [[138]](#138)  。

5月7日，一個名叫斐迪南·科恩—布林德（Ferdinand Cohen-Blind）的人近距離向俾斯麥開槍，但首相大難不死，他認為這仿佛是奇跡。兩天后，議會被解散，普魯士全國彌漫著焦慮感。只有最堅強的神經和最堅定的自信才能承受如此的動蕩和敵對。俾斯麥的神經已經恢復；他整個人進入完全的專注，就像經過長期籌備，運動員終于為那場將決定一切的賽跑做好準備。

對波德爾施溫格來說，事態發展過于迅速，危險過于巨大。羅恩向他遞交對可能花銷的預計：動員全部九個兵團將花費2400萬塔勒，每月還要再支出600萬塔勒 [[139]](#139)  。波德爾施溫格感到恐懼，不知所措的他心不在焉地在蒂爾加滕（Tiergarten）徘徊；最終，他頻頻拜訪貼現公司的老板阿道夫·漢澤曼，以尋求慰藉和建議 [[140]](#140)  。

波德爾施溫格終于接受了兩項緊急措施。為了應對嚴重的信貸短缺，政府于5月18日宣布成立公共信貸機構，旨在以各種商品為抵押，提供高達2500萬塔勒的貸款。政府還取消了對利率的現有限制 [[141]](#141)  。前一項措施顯然違憲，而且兩者都無法恢復商業信心。信貸憑證的印制被推遲到6月末；此外，使用這些憑證引發大量反對，不時還有人疾呼“不要接受不合法的錢” [[142]](#142)  。難怪波德爾施溫格在5月20日致函俾斯麥，表示他沒有足夠的錢支持戰爭，甚至無法保證兩個月后有足夠資金 [[143]](#143)  。

蕭條的市場讓政府很難出售持有的證券，把它們拿到國外貼現的努力也失敗了。海貿銀行的一位代表試圖在巴黎安排這樣的交易，但就像戈爾茨在寫給俾斯麥的信中所說（他沒能很好地掩飾自己的得意），沒人愿意接受普魯士人的提議。戈爾茨本人曾與雅姆斯男爵有過商談，后者拒絕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投入自己的流動資金，并表示他認為該提議旨在回避議會。他推斷，普魯士的信貸一定已經捉襟見肘。戈爾茨也提醒俾斯麥，談判顯示出“王國政府獲得對戰爭不可或缺的貸款多么困難” [[144]](#144)  。俾斯麥不需要戈爾茨或羅斯柴爾德男爵的建議，雖然他需要后者的錢。

雅姆斯男爵的不悅也傷及布萊希羅德。5月末，雅姆斯男爵嚴厲指責布萊希羅德更樂于提供政治消息，而不是保障羅斯柴爾德的經濟利益。這封信的言辭一定非常激烈，布萊希羅德的回信體現了前所未有的自尊 [[145]](#145)  。

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隨著普魯士離戰爭越來越近，隨著它的信貸危機似乎愈演愈烈，布萊希羅德與科隆—明登鐵路所簽協議帶來的那筆錢將成為政府的最后依靠。它為戰爭提供了動力。

[1.](#1_6) 約翰·濟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譯注

[2.](#2_6) 查爾斯·溫特沃斯·迪爾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1789—1864），英國作家和文藝批評家。——譯注

[3.](#3_6) 比如奧托·貝克（Otto Becker）著，亞歷山大·沙夫（Alexander Scharff）編校和增補的《俾斯麥的德意志形態斗爭》（海德堡，1958年）［Bismarcks Ringen um Deutschlands Gestaltung（Heidelberg，1958）］。這部832頁的權威著作描繪了俾斯麥從1862年到1870年的政策，卻幾乎完全沒有提及艱難的籌款努力。書中只提到布萊希羅德一次（第797頁），稱其為19世紀70年代初的轉讓代理人！

[4.](#4_6) 早在1864年1月，他就有過類似建議。2月末，俾斯麥派馮·曼陀菲爾將軍前往維也納，對東道主表示：“放手把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交給我們，我們將在下一次戰爭中幫助你們奪回倫巴第。”卡洛伊致萊西貝格，1864年2月28日，HHSA：PA.Preussen。關于美泉宮會議的最佳分析，見瓦爾特·利普根斯（Walter Lipgens），《1866年之前俾斯麥的對奧政策：1864年8月美泉宮條約草案的發起人身份》，《歷史世界》卷10（1950年），第240—262頁［“BismarcksÖsterreich-Politik vor1866：Die Urheberschaft des Schönbrunner Vertragsentwurfs vom August1864，”Die Welt als Geschichte X（1950），240-262］。

[5.](#5_6) 法拉欣（Fellah），指在基督教和阿拉伯文明統治下的古埃及人后裔，他們身為佃農，被統治者視為異族。——譯注

[6.](#6_6) 幾個月后，布萊希羅德就類似的計劃請求國王支持，這次的地點是普魯士的波森省（Posen），那里生活著普魯士的大部分波蘭人臣民。該計劃要求建立農業銀行，通過發行股票籌資購地，再把土地出售給農民和佃農，或者代表當地村鎮修建道路和運河。他在請愿中強調，該計劃“旨在增強波森大公國的普魯士民族元素”。布萊希羅德的請求被認為證明了他推動波森日耳曼化的愿望，但強調民族元素也可能是為了爭取國王支持這項有利可圖的計劃。無論如何，他知道在有潛在麻煩的地區建立銀行會帶來有用的政治結果。布萊希羅德致威廉國王，1865年1月19日，柏林—達萊姆，普魯士秘密國家檔案，Rep.90，no.1186。

[7.](#7_6) 1864年10月30日，羅恩致信曼陀菲爾，表示自己可能辭職，并暗示應由曼陀菲爾接替自己。曼陀菲爾拒絕了，理由是自己早就有機會從政卻沒有那么做，因為他只有在與現代憲政格格不入的條件下才會接受那些職位。“除此之外，閣下和陛下一同上了小船，現在必須幫著掌舵，而我則樂于繼續劃槳。”《戰爭部長，陸軍元帥馮·羅恩伯爵回憶錄》，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勞，1897年），第二卷，第300—301頁［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300–301］。

[8.](#8_6) 不管部長（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指沒有專管部門的內閣部長，但出席內閣會議，并參與政府決策。——譯注

[9.](#9_6) 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奧地利首相。——譯注

[10.](#10_6) 即萊茵盾。——譯注

[11.](#11_6) 維克多·伊曼努埃爾（1820—1878），撒丁國王，后來成為意大利統一后的首位國王。——譯注

[12.](#12_6) 切斯特·克拉克（Chester W.Clark）認為，俾斯麥在出售公國的談判順利進行的同時提出支持土地賠償，此舉只是詭計。通過搬出格拉茨，他讓奧地利皇帝不太可能接受金錢。通過同時提出兩種賠償形式，他也許想要讓自己顯得通情達理，將不得不采取金錢方案的責任推給國王。但他不太可能出于真心地同時提出兩種可能性。《弗朗茨·約瑟夫和俾斯麥：1866年戰爭前的奧地利外交》（馬薩諸塞州劍橋市，1934年），第226頁［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The Diplomacy of Austria before the War of1866（Cambridge，Mass.，1934），p.226］。

[13.](#13_6) 6月20日，肖泰克男爵分析了普魯士的政治麻煩。他表示，政府和上議院的政策不符合“憲政國家中這些機構的慣常做法”。不過，他也指出，普魯士遠不是憲政國家。肖泰克致門斯多夫，1865年6月20日，HHSA。

[14.](#14_6) 幾周前，俾斯麥獲悉奧地利官員的一句話，大意是“由于信貸缺乏，奧地利政府將暫時放棄大國地位”。他對此非常重視，堅決不想重蹈覆轍。引自魯道夫·施塔德爾曼，《1865年與俾斯麥德意志政策的問題》（慕尼黑和柏林，1933年），第17頁［Rudolf Stadelmann，Das Jahr1865und das Problem von Bismarcks Deutscher Politik（Munich and Berlin，1933），p.17］。

[15.](#15_6) 指1858年秋到1862年初，擔任攝政王的威廉一世標榜溫和自由主義的時期，對應之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動時代”。——譯注

[16.](#16_6) 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指19世紀源于英國曼徹斯特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支持者認為，自由貿易能帶來更加公平的社會。——譯注

[17.](#17_4) 不過，俾斯麥的一些批評者（如戈爾茨）認為，該條約對奧地利更有利。見奧托·施托爾貝格—維爾尼格羅德伯爵著，《羅伯特·海因里希·馮·德·戈爾茨伯爵》（柏林，1941年），第172頁起［Otto Graf zu Stolberg-Wernigerode，Robert Heinrich Graf von der Goltz（Berlin，1941），pp.172ff］。拉多維茨（Radowitz）甚至覺得《加斯泰因條約》“糟透了……是奧地利的勝利”。見哈約·霍爾伯恩編，《約瑟夫·瑪利亞·馮·拉多維茨大使生平記錄和回憶》（斯圖加特，1925年），第一卷，第76頁［Hajo Holborn ed.，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des Botschafters 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Stuttgart，1925），I，76］。

[18.](#18_4) 1864年，拿破侖三世扶植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建立墨西哥帝國。1866年，在墨西哥人的游擊戰和美國的施壓下，法軍損失慘重，不得不撤出墨西哥。翌年，馬克西米利安被推翻。——譯注

[19.](#19_4) 幾周后，他收到費里埃爾之行的美好紀念。雅姆斯男爵在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寫道：“俾斯麥伯爵最近來訪時稱贊我的一些葡萄酒，于是我自作主張，把一箱勃艮第和一箱波爾多送到你那里，請你以我的名義把它們交給俾斯麥伯爵。”雅姆斯男爵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11月18日，BA。

[20.](#20_4) 按照最初的協議，鐵路公司應支付1300萬塔勒；布萊希羅德提到的另外1700萬塔勒可能來自政府擔保基金鎖定的錢，設立該基金是為了償付鐵路債券可能的利息。由于已經不再承擔意外責任，政府可以將擔保基金減少到200萬，并任意處置其余部分。

[21.](#21_4) 卡爾·特維斯騰（1820—1870），德國政治家，國民自由黨創始人之一。——譯注

[22.](#22_4) 該集團的主要人物，如維多利亞女王、奧地利外長門斯多夫伯爵（維多利亞的表親）和普魯士王儲腓特烈·威廉（維多利亞的女婿）都與科堡家族有親緣關系。其成員還包括戈爾茨和伯恩斯托夫等。——譯注

[23.](#23_4) 約翰·羅素勛爵（1792—1878），英國首相，輝格黨和自由黨政治家。——譯注

[24.](#24_2) 甚至連羅恩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佩泰斯（Friedrich Perthes）也敦促普魯士在現金方案的基礎上考慮這種交換的可能性：“奧地利想要的不就是一塊遮羞布嗎？大到足夠遮蓋一筆真金白銀。”普魯士應該提供遮羞布，無論是霍亨索倫還是格拉茨。羅恩，《回憶錄》，第二卷，第409—410頁。但俾斯麥尋求遮羞布的唯一目的是：掩蓋他的侵略想法和最后向奧地利攤牌的企圖。他當時的主要目的是表現得像吃虧的一方。

[25.](#25_2) 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1817—1903），普魯士商務部長。——譯注

[26.](#26_2) 萊昂內爾·內森·德·羅斯柴爾德（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1808—1879），英國議員、銀行家。——譯注

## 第四章　銀行家與俾斯麥的勝利

如果要有革命，我們寧愿做發起者而不是受害者。

——俾斯麥，1866年

1866年是俾斯麥的勝利之年。對普魯士、德意志和中歐來說，這也是決定性的一年。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戰役摧毀了奧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讓普魯士獲得德意志的霸權。一位代表黷武君主的保守政客讓歐洲腹地發生革命性變化。在歐洲的中心，一個專制而過時的政府同時掌握如此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這將對世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下一個對德國歷史具有如此決定性意義的年份是1945年—在帝國的殘骸中，普魯士將被徹底毀滅。

幾十年來，1866年一直被稱頌為俾斯麥的功業之年—但這種稱頌也產生不良后果。差不多從十年前開始，貶低俾斯麥的角色甚至抹去他的痕跡成為潮流，1866年的結果也被視為廣泛和無名的力量作用的高潮，這些力量讓經濟上進步的普魯士從落后和分裂的奧地利手中奪得領導權。這一系列力量無疑存在，讓普魯士戰勝奧地利的條件并非俾斯麥所創造。但他營造的局勢讓普魯士敢于投入這場戰爭，并成功地吞下勝利果實，而且沒有引發外國干涉。他必須應對此類干涉的威脅，就像他必須應對威廉和軍方想要羞辱奧地利和向其提出更多條件的愿望（不僅是完全退出德意志）。

在真正到手前，壓倒性的勝利只是不確定的幻象。在那場決定性的戰役前，整個歐洲都認為普魯士將遭受潰敗，俾斯麥必須避免這種結果。他再次用謹慎緩和魯莽，用節制緩和粗蠻。他愿意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不惜與他人結盟，迎合曾經令他討厭的想法，這讓他變得更加靈活。

在這場重大考驗中，俾斯麥需要通往新世界的橋梁，甚至是革命者的秘密世界。布萊希羅德成了連接議會中某些俾斯麥昔日對頭的橋梁，他與俾斯麥的關系象征和加深了后者對經濟力量影響力的理解。但這位忠誠的銀行家暗中也和革命者保持聯系，為其提供所需的秘密資金。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以此前無人理解的方式幫助俾斯麥—這反映了俾斯麥毫不顧忌地探索和利用一切通往成功的手段。取得勝利后，布萊希羅德被允許分享部分果實。

所有人預料中的手足相殘姍姍來遲。兩方面都仍有強勢人物呼吁和平與妥協；即使是認定戰爭已經不可避免的少數領導人（特別是俾斯麥）也不得不為和平留下退路，無論如何，他們都尋求挑動未來的敵人走出發動戰爭的致命一步。

在是戰是和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的最后幾個忙亂的星期里，俾斯麥已經感受到即將到來的戰爭對他本人和他的國家的可怕影響。5月份那顆幾乎要了他命的子彈引發關于他本人生死的思考，隨后的幾周里，他一再承認，自己寧愿選擇死在戰場上也不愿失敗。死亡的暗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夸張之詞，而且并不新鮮。俾斯麥上臺幾天后，國王就曾對他說：“在我窗戶下方的歌劇院廣場（Opernplatz），他們準備割下你的頭，過一小會兒再割我的。” [[1]](#1_46)  俾斯麥認識到面前的危險，明白自己正走向最大的危機。為了確保最終無虞，他萬分小心，并鼓起自己百折不撓的勇氣。他知道自己正拿霍亨索倫王朝的未來冒險。如果他勝利了，王朝的未來就有保障；如果他失敗了，奧地利就已經有了肢解普魯士的計劃。如果他勝利了，他可以決定中歐的未來，可以約束（也許是控制）現代革命力量；如果他失敗了，他擔心當無能的反動力量面對來勢洶洶的革命時，局勢將陷入混亂。

因此，即將到來的沖突被押下無法估量的賭注，俾斯麥決心尋求各種形式的支持。多年來，他旗幟鮮明的反動觀點令自己的國王和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印象深刻。自從上臺以來，他一直警告所有愿意聽從的人注意“革命”，（他認為）這個寬泛而邪惡的字眼涵蓋了從社會主義到溫和制憲主義的大量罪惡。他一再強調君主團結的原則，主要是為了盡可能久地穩住奧地利這個盟友。但在戰爭爆發前后的幾周里，為了震懾敵人和加強自己的力量，他向自己曾經表現出憎惡的勢力伸出橄欖枝。

俾斯麥曾多次試圖利用德意志民族主義來實現自己的目標：1866年4月，他提出新的德意志邦聯計劃，包括普選的國民議會（按照1849年法蘭克福議會所設計的選舉權）。此舉未能如愿——大多數人覺得，俾斯麥從議會的壓迫者搖身一變成為其倡導者，這種做法露骨得可笑。不過，自由派對俾斯麥的好感還是有所增加，因為他變得更加迎合他們團結德意志的目標，他的經濟政策也滿足自由派的利益和理念。阻撓俾斯麥與自由派反對者合作的是他對下院預算權的藐視：即使是最容易被誘惑的自由派也對該原則毫不讓步，因為如果沒有對錢袋子的控制，議會將失去全部存在的理由。

俾斯麥需要分化反對派的堅固陣線，因為他意識到，只要與商界關系密切的自由派拒絕在議會中支持他，借款就總是困難重重。他還需要靠自由派來爭取德國輿論，讓自己成為實至名歸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代言人。與來自同一階層和持有相同信念的人不同，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眼前的危機，而是意識到未來擴張后的普魯士或統一后的德國需要這些人來治理。現代國家需要某種形式的代表性。

他逐步接近普魯士自由派，希望吸引和分化一部分人，讓他們脫離總是與他為敵的理論家。在被掩蓋的戰鼓聲中，他為溫和派奏響甜美的序曲。也許他希望通過擁抱來殺死自由派。

銀行界總是擔當政府與自由派商界的調解人。與其他群體相比，銀行家更渴望國內和平。隨著危機的臨近，一些銀行家開始向雙方施壓，以便結束沖突。比如，5月中旬，亞伯拉罕·奧本海姆告訴俾斯麥，萊茵蘭人想要和平，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么應該首先實現國內和平。就像奧本海姆馬上告訴布萊希羅德的那樣，俾斯麥回答說，他表示同意，并為此請求國王罷免自己，因為招人怨恨的他阻礙了和解。他已經提議由霍亨索倫親王接任，請求只讓自己擔任外交部次官 [1](#1_9)   [[2]](#2_46)  。俾斯麥的說法包含了他的夸張想象，但這種夸大證明他有意與自由派議員結束沖突。隨著俾斯麥與交情最深的容克朋友們關系的破裂（5月16日，慈父般的朋友路德維希·馮·格拉赫與他一拍兩散），他開始試圖彌合憲法沖突的裂痕。

5月29日，俾斯麥見到幾個月前他曾經試圖送進監獄的卡爾·特維斯騰。五年前，特維斯騰曾將奧地利描繪成德意志統一的最大敵人，并承認在外交政策上，“國王臣民們智力有限的普遍觀點有一定道理”。他比俾斯麥更迫切見到對方。他告訴俾斯麥，如果政府承認議會對預算擁有完全和不可侵犯的控制權，那么議會將愿意提供所有必需的資金 [[3]](#3_44)  。很快，撥款之于自由派將變得比接受這些錢款之于政府更加重要。自由派必須在未來的勝利中分得一杯羹，否則就將一敗涂地。俾斯麥需要防備普魯士的失敗，自由派則需要防備普魯士的勝利。

與特維斯騰的談話兩天后，俾斯麥（終于）收到波德爾施溫格的辭呈，他表示自己為此準備了一整年 [[4]](#4_44)  ！波德爾施溫格無法為他憎惡的戰爭籌款，為此精神崩潰。俾斯麥立刻任命波德爾施溫格的老對頭馮·德·海特接任。1862年，俾斯麥曾告訴國王，這兩個人如此痛恨對方，以至于不愿在同一個內閣待上一天 [[5]](#5_44)  。海特曾經是自由派，后來轉向保守，因此受到兩派的猜疑，盡管他在商界特別是銀行界人脈深厚。面對海特的一位自由派對頭，俾斯麥為自己的選擇做了辯護：“那個人會給我們籌到錢，我們需要錢。” [[6]](#6_42)  晚年的俾斯麥稱他為“金叔叔”（Gold-Onkel）。1862年，海特曾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因為他不愿容忍違憲提議。作為重新出山的條件，他要求在預期的戰爭結束后請求議會為所有未授權的政府支出提供免責。俾斯麥同意了，于是海特開始為即將到來的戰爭籌措必要資金。他意識到，在未獲議會批準的情況下發債仍然非法，如果戰爭失利或國王失勢，負有責任的部長將面對嚴重的個人后果 [[7]](#7_42)  。

海特從一開始就向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征詢意見。他與布萊希羅德相識多年；最近，兩人都是計劃中的波羅的海—北海運河的董事會成員，該項目旨在推動貿易和普魯士的海軍實力 [[8]](#8_42)  。（俾斯麥是最早認識到這條運河在政治和經濟潛力方面的人之一，并大力促成了這潛力的實現 [[9]](#9_40)  。）重要得多的是，在獲得任命前僅僅兩周，海特曾詢問布萊希羅德，“目前的形勢下”，他在埃爾伯費爾德（Elberfeld）的公司能否獲得10萬到15萬塔勒的貸款，因為公司現有的信貸已經耗盡。“目前的形勢”指市場突然遭遇的一場嚴重危機，特別是棉花貿易，導致埃爾伯費爾德的經濟幾乎“完全停滯” [[10]](#10_39)  。布萊希羅德馬上允諾提供資金，海特對他的幫助深表感激 [[11]](#11_39)  。海特經歷過信貸短缺對企業家造成的困難，他發現政府也面臨類似問題。他兩次都向布萊希羅德求助。

獲得任命后第二天的御前會議上，盡管面對這些困難，海特仍然敦促盡快開戰。他擔心進步人士和教皇至上主義者（ultra-montanes）的持續反戰煽動可能會影響民眾。國王和俾斯麥表示同意，但強調必須讓奧地利扮演侵略者的形象 [[12]](#12_37)  。于是，海特請求漢澤曼組建財團，購買財政部中最大的一筆單獨資產—科隆—明登鐵路的股份。漢澤曼馬上找布萊希羅德商量，兩人的親密合作已經超過十年。他們的銀行幾乎毗鄰，兩人每天見面，漢澤曼對這位同行懷有最深的敬意。漢澤曼的官方傳記作者寫道：“布萊希羅德是那些年里的所有私人銀行家中最聰明的一個。” [[13]](#13_33)  兩人愿意向政府開價110；這些股份當時很搶手，市價為117 [[14]](#14_33)  。財團的其他成員則試圖利用政府的急迫需求，堅持105的報價。漢澤曼不得不硬著頭皮告訴海特，只有他和布萊希羅德愿意提出合理的報價。海特決定分批出售股份，在普魯士取得最初的勝利后，通過海貿銀行不斷提高價格。布萊希羅德最初安排簽訂科隆—明登鐵路協議的策略現在帶來必要的資金。俾斯麥從未忘記，除了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普魯士銀行家在戰爭前夕都拋棄了他。1889年，在哀嘆德國資本家缺乏企業家精神和愛國主義時，他回憶說：“那時，幾乎不可能用國家資本償付普魯士的戰爭貸款，就像1866年的例子所證明的；在資本問題上，柏林的金融精英無法鼓起足夠的勇氣，為國家犧牲他們自己的財產。” [[15]](#15_31)

海特正確地指出反戰煽動的影響。隨著戰爭的臨近，反俾斯麥的情緒開始升溫，市場暴跌。和平請愿書從除布雷斯勞之外的普魯士各大城市涌入柏林，在5月的戰爭動員中，和平意愿制造了某些非常有違普魯士特點的事件 [[16]](#16_31)  。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言將發生柏林革命和軍隊嘩變 [[17]](#17_25)  。俾斯麥一定感覺到特萊奇克對他所言不虛：“我覺得可怕的是，幾十年來普魯士最重要的外交部長同時也是在德意志最受憎恨的人；我覺得更糟糕的是，普魯士政府提出其有史以來關于邦聯改革的最有希望的想法，卻遭遇到這個國家如此可恥的冷漠。” [[18]](#18_25)  5月末，布萊希羅德收到鮑迪辛伯爵 [2](#2_9)  從石勒蘇益格寫來的怒氣沖天的書信，信中警告說：“總督［埃德溫·馮·曼陀菲爾］對首相的敵意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不僅如此，曼陀菲爾政府損害普魯士的利益，擴大對普魯士的仇恨。鮑迪辛接著說：“所有人都認同，偏執狂必須辭職離開政治領導層，有‘十字報黨’（Kreuzzeitungspartei） [3](#3_9)  的首腦在，任何重大計劃都無法執行。” [[19]](#19_21)  這個封建黨派對“新的”俾斯麥正在失去信心，開始對其設置障礙。

6月初，兩強終于投入戰爭。奧地利向邦聯提交關于兩個公國的問題，俾斯麥稱此舉違反《加斯泰因條約》，下令普魯士軍隊開進荷爾斯泰因。與此同時，他提出披著民主外衣的統一德意志方案，將奧地利排除在外。14日，邦聯議會接受奧地利的提議，為對付普魯士展開動員。兩天后，普軍入侵漢諾威和薩克森。木已成舟。

戰爭爆發的那一刻，焦慮變成擔憂和恐慌。普魯士公民不希望戰爭，各地很少有人認為普魯士可以戰勝奧地利。普魯士已經半個世紀沒有參加過重大戰役；它的國內矛盾尚未解決，現在又要同一個看上去仍然令人生畏的帝國開戰。戰爭打響前幾個小時，亞伯拉罕·奧本海姆寫信給布萊希羅德：

既然戰爭看上去已經不可避免，我們必須面對悲哀的可能性：我們在最初階段可能遭遇不幸，奧軍可能一直推進到柏林，那樣的話這座城市可能遭到劫掠。親愛的朋友，如果你擔心那樣的不幸，請把你為我們持有的價值2萬塔勒的證券郵寄給我們，但一定要確定柏林到科隆沿途尚未被戰火波及時才這樣做。

一周后，隨著奧地利人在一些小規模交火中取得勝利，奧本海姆的來信變得更加不安。他寫道，奧地利人正在散布關于普魯士人在敵國領土上劫掠的“無恥謠言”，顯然這是事先為“他們踏上帝國領土時展開燒殺劫掠”找的借口。“親愛的朋友，所以我請你做好一切防備，你比任何人更危險，因為人們知道你和俾斯麥的關系。”這次，奧本海姆還要求俾斯麥在下一批郵件中送來他們的證券（價值2.5萬塔勒），假如道路仍然安全的話。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加上任何他自己的證券。最好當天晚上就派信使送來：“啊！時局真是糟糕！” [[20]](#20_21)

時局還非常艱難，特別是對俾斯麥。布萊希羅德敦促他不遺余力地在國內講和。戰爭爆發兩天后，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約定，由后者安排俾斯麥與自由派議員維克多·翁魯會面。布萊希羅德向翁魯保證，俾斯麥希望會面，因為他決心通過和解手段結束憲法沖突。但和主人一樣，布萊希羅德也認為強有力的威脅可能有助于妥協請求。于是，他警告翁魯，繞開議會調動戰爭資金意味著強制貸款和貨幣貶值等極端措施，這“將摧毀普魯士的工業，可能影響一代人”。最初，翁魯懷疑是布萊希羅德而非俾斯麥提出這次會面，但俾斯麥匆匆寫給布萊希羅德的親筆信打消了他的疑慮。布萊希羅德承認，自己曾急切地建議俾斯麥與自由派領袖溝通。根據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的報告，疑慮解除后，翁魯迫不及待地接受邀請。兩人于6月20日見面，俾斯麥對翁魯無法抑制的求和欲望做好了準備 [[21]](#21_21)  。

由于戰爭已經爆發，翁魯只得強調自己對普魯士的無條件忠誠，并抱怨民眾的“極度冷漠”。他提醒俾斯麥，在1859年兩人的那次對話中，俾斯麥表示普魯士被完全孤立，唯一的盟友是德意志人民。現在，為了保住這個盟友，必須恢復憲法。俾斯麥表示同意，就像之前與特維斯騰的對話一樣，但抱怨說“所有人都認為他無所不能，而他只是凡人”。國王已經拒絕特維斯騰的提議，不愿通過認可議會權力來結束沖突，但俾斯麥知道，“盡早結束沖突是必須的”。即使取得軍事勝利后，他寧愿辭職也不愿繼續和議會沖突（決定性的克尼格雷茨戰役結束后的第二天，他向王儲重申這個承諾，并在一個月后將其兌現）。就像他對特維斯騰所說的，他也告訴翁魯，要是能找到合適的繼任者，他早就樂意辭去首相職務。翁魯認同沒有合適人選，因為“從1849年到1858年，再從1862年至今，反動政權成功地確保官僚體系高層中沒有既具備必要的能量和耐力，同時又享有公眾信任的自由派” [[22]](#22_21)  。事實上，翁魯告訴俾斯麥，他是不可或缺的—翁魯此舉讓俾斯麥預見了所謂的民族—自由主義思想的無意識服從性。在隨后的幾十年里，俾斯麥都將利用這點。

布萊希羅德對這次對話感到滿意，他立即致信雅姆斯男爵：“關于國內問題的決議尚未達成，但已經有了初步行動。” [[23]](#23_21)  顯然，俾斯麥希望國外知道，他正在與德意志的所有派系溝通。

事實上，布萊希羅德一直在向雅姆斯男爵傳遞積極的消息—我們無從得知，他是否真的如此自信。6月19日，他致信雅姆斯男爵：“本國民意在過去四天里向政府大幅傾斜，即將召開的［新］議會并非不可能向政府提供必要的資金。” [[24]](#24_19)  （事實上，自由派開始感到和夸大自己的無能；現在，他們認為俾斯麥可以拋開議會發動一場戰爭，“不止一年……運氣都在專制主義者和容克貴族那邊” [[25]](#25_19)  ……）幾天后，布萊希羅德向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交備忘錄，并對普魯士政治和財政做了展望。他預測國內斗爭將提早結束，議會將授權戰爭信貸。他還敦促羅斯柴爾德家族，如果債券向外國人開放就趕緊購買，因為普魯士的財政狀況非常好，相比政府龐大的資產，公共債務比例很小 [[26]](#26_17)  。

6月30日，俾斯麥和國王離開柏林，前往波西米亞與普軍會合。俾斯麥做了所有可能的準備，現在將取決于戰場上的運氣。他離開時既非全無煩惱，也不兩手空空：前一天，俾斯麥交給他一堆金幣，包括50個金腓特烈（Friedrichs d’or）、50個金拿破侖（gold Napoleon）、50個奧地利達科特（Austrian ducat） [4](#4_9)  和足夠的銀幣，總價達1000塔勒。走上戰場時，俾斯麥口袋里裝著7500美元（按照今天的價值） [[27]](#27_13)  。此前或此后，布萊希羅恩都沒有給過他這樣一堆形形色色、馬上可以使用的貨幣。也許俾斯麥想做好準備面對各種不測。一個確信能取得速勝的人不會在口袋里裝滿金幣出行。他夢見自己被俘，或者擔心自己像腓特烈二世那樣在凄涼的戰場上獨自游蕩嗎？金子能派上用場，也給人安慰。

懸念很快結束。通過革命性地使用近代通信手段，毛奇為這場決定性的戰爭做了一絲不茍的細致準備。但他和俾斯麥仍然相信，“無論應用于外交還是軍事行動，戰略并非精確的科學” [[28]](#28_7)  。7月3日，在克尼格雷茨周邊，近50萬人展開殊死搏斗。夜幕降臨時，奧地利人已經損失了四分之一兵力，余者正向維也納撤退。

俾斯麥整天都惴惴不安。他后來承認：他感覺自己正在玩一場賭注達到百萬美元的紙牌游戲，但他并不真有那么多錢。終于贏得賭注后，他卻感到沮喪而非興奮。在騎馬穿過遍布死傷者的田野時，他疑惑如果他的長子躺在那里，自己會作何感受。到處都找不到為他準備的營房，在找地方睡覺時，他滑倒跌入糞坑 [[29]](#29_7)  。

這是世紀中葉的一場決定性戰役。無論在德意志還是歐洲，一切都不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告知發生什么后，教皇國務秘書安東內利樞機（Cardinal Antonelli）恐懼地驚呼：“世界崩塌了。”（Casca il mondo.） [[30]](#30_3)  1815年，通過限制革命力量，人們千辛萬苦地恢復由哈布斯堡王朝稱霸中歐的世界，現在那個世界被摧毀了。

勝利令普魯士陶醉，但也產生可怕的影響 [[31]](#31_3)  。7月4日，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對勝利大加溢美之詞。他的信可以被視作普魯士人卑躬屈膝的象征：

我斗膽在此刻用這些文字打擾您，熱烈的感恩祈禱已經傳到全能的上帝耳中，感謝他對我們祖國的仁慈，讓陛下的雄師戰勝我們世代的敵人。我心中充滿對閣下最深切的贊美之情，借著真摯預祝閣下取得下一次政治勝利，我斗膽向您表達此情。我還要請求您將我最卑微的祝賀放在國王陛下的腳邊。為了顯示我的感激，我將盡心為我們的傷兵效勞。 [[32]](#32_3)

即使考慮到當時的修辭，考慮到這個時刻的非凡意義，考慮到布萊希羅德感覺自己參與了這次壯舉，這席話仍顯得過于夸張。布萊希羅德的信可能也是某些普魯士猶太人無比強烈而又相當外露的愛國情感的早期例證，他們對新國家的熱情忠誠超過基督徒同胞。愛好和平的布萊希羅德為普魯士的勝利祭臺奉獻了自己的祭品。

布萊希羅德的信也有實際的一面。他報告說，柏林一位重要的法國人（可能是貝內德蒂，他是布萊希羅德的客戶，直到7月8日才離開柏林前往普魯士司令部）說了些“令人擔心的話”，暗示法國人“嫉妒我們的勝利果實，害怕世界史上的最新一頁可能威脅到他們對‘榮耀’的壟斷”。布萊希羅德預計法國人將很快有所行動—預言在當天晚上得到印證。他還預見了俾斯麥的回應，即必須拒絕法國人的這些“傲慢要求”，并指出俾斯麥本人將用來威脅法國人的力量：“我們的民族意識大大提升，面對任何試圖阻撓這場運動目標的人，人民將斗志昂揚地撲向他們。”

俾斯麥的確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滿腔怒火威脅拿破侖。為了擊退所有外國干涉，俾斯麥決心動員德意志和歐洲的各種革命力量。當俄國朋友問他對革命持何種態度時，他給出獨特的答案：“如果要有革命，我們寧愿做發起者而不是受害者。” [[33]](#33_3)

早在戰爭爆發前，俾斯麥就與外國革命者結盟。除了與“革命的”意大利結盟（這已經激怒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他還同匈牙利革命者關系密切。俾斯麥致力于動員和發動衰弱的奧地利帝國境內的一切顛覆力量：仍未從1849年失利中恢復過來的匈牙利流亡者最有希望成為對付奧地利的盟友。事實上，俾斯麥上臺不久就和他們取得聯系 [[34]](#34_3)  。到了1866年3月，俾斯麥的駐佛羅倫薩大使烏澤多姆伯爵已經與匈牙利運動的領袖們（包括著名的路易斯·科蘇特［Louis Kossuth］）展開頻繁接觸，計劃在普魯士或意大利的土地上建立匈牙利兵團，以便直取奧地利帝國的“心窩” [5](#5_9)  。俾斯麥還直接與匈牙利民族委員會（Hungarian National Committee）的幾名代理人進行磋商。整個6月，在意大利和普魯士建立匈牙利兵團的計劃穩步進行，盡管俾斯麥在6月10日向烏澤多姆抱怨說“他沒有那么多錢”，因此意大利政府應該提供必要資金。事后，普魯士政府將返還一半 [[35]](#35_3)  。

布萊希羅德看到這種武器的潛在重要性。就在克尼格雷茨戰役打響前，他致信雅姆斯男爵，表示雖然普魯士占據上風，但戰爭可能要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奧地利無法再承擔另一次妥協，除非“匈牙利爆發革命，就像某些跡象所表明的” [[36]](#36_3)  。7月5日，當克尼格雷茨戰役剛剛結束，當奧地利提出停火和拿破侖令人厭惡地提議斡旋后，俾斯麥在霍里茨（Horitz）接見匈牙利運動的兩位領袖：薩基伯爵（Count Czaki）和馮·科瑪洛米少校（Major von Komaromy）。（俾斯麥利用匈牙利人對付拿破侖的威脅，這種做法可謂因果報應。1859年的法奧戰爭中，拿破侖本人也曾鼓勵在意大利領土上建立匈牙利兵團。在這件事和其他更重要的問題上，俾斯麥是拿破侖的好學生 [[37]](#37_3)  。）他向流亡者提供40萬塔勒的支票，支付人為維特男爵，他在柏林的外交事務代表。10萬塔勒來自王室公使基金，30萬塔勒由俾斯麥的助手洛塔爾·布赫爾（Lothar Bucher）向布萊希羅德收取。按照俾斯麥的命令，布赫爾將把這筆突然到手的巨款交給以化名入住一家柏林旅館的兩位領袖 [[38]](#38_3)  。這筆錢將專門用于招募匈牙利兵團，兵團會被派往匈牙利，在帝國造成混亂。（與此同時，俾斯麥還敦促意大利人幫助加里波第的志愿軍登陸達爾馬提亞［Dalmatia］，在奧地利的南斯拉夫人中煽動革命 [[39]](#39_3)  。）

7月8日，布萊希羅德確認俾斯麥的命令，表示自己已經支付所要求的金額，并暗示他會把薩克森的軍稅作為抵押 [[40]](#40_3)  。6月20日，普軍要求被打敗的薩克森人繳納每天1萬塔勒的軍稅，作為換取后者持續的財政自主權的條件 [[41]](#41_3)  。布萊希羅德收取了這筆錢，并以其為抵押支付俾斯麥的匈牙利人秘密資金。幾周后，俾斯麥通知海特，薩克森軍稅已被用于匈牙利兵團，因為“兵團給奧地利帶來的壓力將對戰爭進程與和平非常重要，不能拖延支付” [[42]](#42_3)  。布萊希羅德參與匈牙利冒險計劃一事從未被披露。這次共謀很可能讓他在維也納的朋友們非常痛苦。

布萊希羅德還卷入俾斯麥的德意志戰爭中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對法蘭克福的處置。這座與奧地利并肩作戰的城市遭到普魯士官員和威廉本人的痛恨，因為他們把它視作民主和反普魯士主義的溫床。事實上，法蘭克福報刊的確以丑化普魯士當局為樂。7月16日，普軍占領該城。第二天，普軍統帥提出600萬萊茵盾的懲罰性賠款，要求在兩天內付清。賠款付清后，俾斯麥又于7月18日提出被認為是額外的2500萬賠款，而威廉原先想要的更多。

同一天，布萊希羅德請求俾斯麥任命自己為這筆賠款的轉賬代理人，就像他曾受托為薩克森軍稅所做的那樣 [[43]](#43_3)  。與此同時，法蘭克福的新統帥曼陀菲爾試圖通過威脅或暗示劫掠來敲詐該城。法蘭克福公民感覺“新的匈奴人襲擊開始了，法蘭克福將注定毀滅” [[44]](#44_2)  。7月22日，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發去電報，表示3100萬賠款在南德意志各地引發“驚恐的呼號”。他警告說，賠款金額太高，而且“對真正的作惡者影響不大”，因為付錢的人想必是富人，而不是記者和煽動者 [[45]](#45_2)  。布萊希羅德還致信科伊德爾，指出賠款“太高了點” [[46]](#46_2)  。法蘭克福的命運—巨額賠款和被普魯士劫掠的威脅—激起外國的不滿，由此產生的抗議浪潮令俾斯麥頗感尷尬 [[47]](#47_2)  。7月25日，他在電報中告訴布萊希羅德，該城的賠款只有2500萬，因為已支付的600萬將被算在總額里 [[48]](#48_2)  。

同一天，卡爾·邁耶爾男爵率領的法蘭克福公民代表團抵達柏林展開談判。男爵試圖將此行通知布萊希羅德，但遭到法蘭克福普魯士當局的禁止 [[49]](#49_2)  。不過，柏林的接待相當周到，卡爾·邁耶爾男爵第二次回到柏林，于8月6日和7日見到俾斯麥。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報告說，如果法蘭克福自愿被普魯士吞并，俾斯麥愿意放棄賠款和做出其他讓步 [[50]](#50_2)  。俾斯麥還向自己在法蘭克福的代表送去表達這種意向的便條 [[51]](#51_2)  。

布萊希羅德在這樁可恥交易中扮演了可敬的角色。出于為俾斯麥效勞和私利的考慮，他曾希望由自己收繳和匯付第一筆賠款。但當第二筆賠款被提出后，他毫不猶豫地警告俾斯麥不要做得過分。公然反對普魯士和為法蘭克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說話一定需要相當的勇氣，因為在大多數普魯士人心中，兩者是一樣的。俾斯麥的下屬并不被鼓勵批評他的行為。布萊希羅德顯然沒有獲得收繳賠款的委托。

7月18日，俾斯麥從布爾諾（Brno）向布萊希羅德發來電報，請他提供普魯士塔勒兌換奧地利貨幣的公道比價 [[52]](#52_2)  。這被認為將幫助俾斯麥決定奧地利的戰爭賠款數額。第二天，科伊德爾從尼克爾斯堡（Nickolsburg）給“尊敬的朋友”來信：“我個人已經預見到和平時光，也許你對此感興趣。事情還沒塵埃落定，但似乎進展順利。但當一切塵埃落定之時，公眾幾乎肯定也知道了；到那時再通知［你］將沒有價值。” [[53]](#53_2)  這條消息比奧普停火早了四天，在當時的確很有價值。對一位銀行家來說，獲悉俾斯麥的親密謀士認為和平即將到來非常重要，盡管對方警告說判斷可能有誤，“戰火”可能繼續燃燒下去。布萊希羅德感謝科伊德爾的“寶貴消息”，并告訴對方，股市已經進入“和平市場”，和談破裂必將導致股價暴跌。他請求科伊德爾隨時提供最新消息 [[54]](#54_2)  。

布萊希羅德總是禮尚往來。他送給俾斯麥及其朋友精致的雪茄，并詢問他們還有其他什么看得上眼的“提神之物”。他樂于為大佬朋友提供異國的奢侈品，特別是當他們面對無情的戰爭時 [[55]](#55_2)  。對于不太幸運的人、受傷者及其家人，布萊希羅德表現出不尋常的慷慨—他因此結識了約翰娜·馮·俾斯麥，后者正組織救助她丈夫所發起的戰爭的受害者 [[56]](#56_2)  。她變得非常了解布萊希羅德，一年后已經開始調侃他的夸張言詞 [[57]](#57_2)  。

7月末和8月，俾斯麥只有一個目標：在各條戰線上以勝利者的身份實現和平，或者消滅所有阻撓他獲得這種和平的人。自從與特維斯騰和翁魯談過話并向海特做出承諾后，他便決心結束憲法沖突。在恰好與克尼格雷茨戰役同天舉行的選舉中，進步黨遭遇失利，這可謂好兆頭。選舉結束后，布萊希羅德馬上致信俾斯麥—信中既有恭維，也提出建議：“所謂的進步黨已經氣餒，因此解決［憲法］沖突只需陛下仁慈地做出少許讓步。” [[58]](#58_2)  盡管遭到保守派的反對（他后來夸大了反對者的力量），俾斯麥還是說服國王和內閣：他請國王在8月5日的新議會開幕式上親自發表和解性講話，并要求為政府支出免責，這筆錢并未獲得議會授權，因此“沒有法律基礎” [[59]](#59_2)  。在志得意滿的時刻，俾斯麥與溫和自由派分別做了讓步：明目張膽的違憲行為得到承認，國王不顧議會反對而推行的軍事改革則完全沒有被提及。俾斯麥需要普魯士自由派的支持，以便在外國干涉的持續威脅面前，他可以依靠和炫耀德意志民族的全力支持。

俾斯麥向議會伸出橄欖枝，后者只需要這個姿態就會向他臣服。與此同時，他還處理完對外事宜。他接連與北德諸邦簽訂聯邦條約，與三個南德邦國組成軍事同盟，并與奧地利達成明確和約。普魯士還吞并漢諾威、黑森—卡塞爾（Hesse-Kassel）、拿騷（Nassau）和法蘭克福，盡管威廉對俾斯麥推翻德意志最古老的王朝—漢諾威的圭爾夫家族（Guelphs） [6](#6_9)  感到不安。作為極端保守派，俾斯麥卻肆無忌憚地推翻或威脅推翻王公世家，這是任何德國革命者做夢都想不到的。他被迫尊重薩克森的獨立，但通過粗暴的談判，他向這個領邦索取巨額賠款，并要求其接受普魯士在北德的霸權。普魯士就此成為整個德意志的霸主。

在完成建國的過程中，俾斯麥必須對付拿破侖不時提出的領土賠償要求。直到與奧地利簽訂初步和約前，俾斯麥一直試圖點燃奧地利帝國的所有民族主義火藥桶。現在，他又用德意志民主民族主義運動的浩大聲勢威脅拿破侖（布萊希羅德警告雅姆斯男爵，柏林“不愿讓出哪怕一寸德意志的土地”。事實果然如此） [[60]](#60_2)  。俾斯麥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er）稱為“白色革命家”，他抓住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力量，利用那種力量為普魯士的保守目標服務，由此挫敗拿破侖的賠償愿望，令其威名受到重創 [[61]](#61_2)  。19世紀60年代的俾斯麥展現出不同尋常的果斷、靈活和極為開明的現實主義。

普魯士的勝利看上去如此輕而易舉，這讓俾斯麥突然獲得難以置信的名望。可恨的暴君成了國家的最大偶像。面對這種轉變，普魯士議會很快舉手投降。自由派發生分裂—超過一半的昔日反對者向俾斯麥的成功屈服，為了掩飾自己的投降，他們辯稱權力和團結優先于自由，“事實和事件的邏輯”優先于理念和理想。其他自由派議員則記得俾斯麥曾經推動自由派的經濟利益，并促成新資本主義秩序的自由發展。1866年9月初，普魯士議會以230票對75票接受政府的免責提案。憲法沖突結束。非政治的德國人開始扮演他的決定性角色 [[62]](#62_2)  。

剩下的工作是讓普魯士在北德獲得永久的霸權。新的邦聯必須滿足普魯士國王、他的親信和他坐在北德小國寶座上的姑表兄弟們，必須滿足被公認為恭順的民眾的愿望，還必須能吸引南德意志人：南德人對褊狹的普魯士人抱有疑慮，但最終還是不得不加入一個更大的類似聯盟。1866年秋天，盡管之前承受精神崩潰，俾斯麥還是成為新的北德邦聯的主要構建者。邦聯憲法將被1871年后的新帝國沿用，堪稱復雜晦澀的杰作。簡而言之，新邦聯將由普魯士主導；作為邦聯的代議機構，國會采用民主選舉，但幾乎沒有民主功能，甚至它的預算權都受到嚴格限制。主權所屬仍然沒有確定。新成立的民族自由黨希望議會權利至少有一點實質內容，并成功地讓俾斯麥做出稍許讓步。

最重要的是，作為教育和財富（Bildung und Besitz）的代表，民族自由黨歡迎憲法中的經濟條款。俾斯麥特別重視這些條款，以便它們能“消除政治上的不統一對德意志人民的物質福利造成的損失” [[63]](#63_2)  。邦聯提供統一的經濟秩序；俾斯麥和民族自由黨共同（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后者）創造不受束縛的市場經濟制度，它將為德國資產階級帶來繁榮，為國家帶來工業力量。

俾斯麥有理由對這部憲法感到高興，因為它將讓俾斯麥獲得比在普魯士大得多的權力。在新的邦聯中，他將是唯一的部長，不受潛在異議者組成的內閣掣肘 [7](#7_9)  。沒有人對北德的新結構完全滿意。只有俾斯麥沒什么怨言。

然后，俾斯麥對普魯士政體做了現代化改造，但保留其過時的保守特點。在自由派看來，與1848年的希望或者甚至1850年的普魯士憲法相比，1867年的憲法是倒退的。但它在物質方面有所進步。憲政專制和民主外衣、政治的幼稚和經濟的成長實現決定性的和史無前例的結合，這將成為一個強大而褊狹的德意志的發展特點。

俾斯麥在德意志和歐洲取得完全的勝利。他分化國內反對者，為自己的統治打造新的多數派。他無視或愚弄整個歐洲；他創造新秩序，但沒有徹底摧毀舊秩序。他認為，沒有人能及時猜到他的把戲，他歡呼：“我把他們全都打敗了！全都！” [[64]](#64_2)  被打敗的還有自由和仁愛之德意志的夢想，誕生的是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它崇拜權力，即便那種權力不受思想或道德現實主義的約束。

我們也許會對俾斯麥將勝利與自己畫上等號感到吃驚，這種等同成了對俾斯麥崇拜的首要幻覺。沒有哪個人能決定歷史，但俾斯麥、拿破侖和列寧的確徹底改變了本國歷史的進程。大多數時候，俾斯麥對于靠人力影響命運的機會很沒有信心，但在1862年到1866年，他感受和經歷了一位沿著危險道路發動未知冒險的孤獨領袖所受的考驗。他的追隨者寥寥無幾，因為很少有人理解他；許多人反對他，因為他們因循守舊。他的敵人數目眾多，支持者卻寥寥無幾，只有像羅恩這樣的朋友或者像科伊德爾和布赫爾這樣的工具。就像我所暗示的，他清楚地意識到失敗的可能和懲罰。他表示，懲罰將是死亡：可能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樣死于戰場，也可能因為發動不成功的革命而被處以死刑。或者這些只是緊張過度的頭腦的夸張臆想，失敗至多意味著丟臉或政治生涯的終結。但那樣不也無異于死亡嗎？無論如何，在后來更加安定的歲月里，他津津樂道于曾經逃脫死亡，并對少數幾位在這個危險時期幫助過他的人懷有特別的感激 [8](#8_9)  。布萊希羅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布萊希羅德如期完成服務。1866年，戈德施密特在寫給布萊希羅德信中說：“人們都說，戰爭讓你獲得一大筆錢。” [[65]](#65_2)  戰爭的確讓他發了大財，但遠不止于此。過去的五年間，他干得很出色，借助“好朋友”的光芒傳播自己的聲望，那位朋友同樣收獲頗豐。在這個成果豐富的時期，最重要的成就是與俾斯麥建立的特殊關系，這種關系注定將延續和加深。

[1.](#1_8) 早在1866年2月14日，俾斯麥就告訴法國大使，普魯士可能會迎合德意志民族主義，呼吁成立德意志議會。如果這樣的話，他將推薦國王任命以戈爾茨為首的新內閣。晚些時候，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報告說，市場已經被流言驚動：戈爾茨將接替俾斯麥，后者則轉任駐巴黎大使。OD，II，299；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2月28日，RA。

[2.](#2_8) 沃爾夫·海因里希·馮·鮑迪辛（Wolf Heinrich Graf von Baudissin，1789—1878），德國外交官、作家和翻譯家。——譯注

[3.](#3_8) 即1848年誕生的普魯士保守黨。弗里德里希·施塔爾以及利奧波德和路德維希·格拉赫兄弟創辦的《新普魯士報》（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該黨喉舌，因為報頭有鐵十字圖案，也被稱為《十字報》。——譯注

[4.](#4_8) 金腓特烈是1741年開始鑄造的普魯士金幣，名義上價值5個銀帝國塔勒。金拿破侖是拿破侖一世時期發行的金幣，面值為20和40法郎兩種。達科特是歐洲中世紀后期開始流通的金銀幣，奧地利從1511年起鑄造金達科特。——譯注

[5.](#5_8) 在6月17日致意大利將軍拉·馬默拉（La Marmora）的信中，烏澤多姆用“直取心窩”這個著名的表述鼓動意大利人在匈牙利革命者的幫助下突襲奧地利。1868年，烏澤多姆的信件在意大利被公開，俾斯麥試圖與烏澤多姆和匈牙利行動劃清界限；后來，他謊稱自己在7月4日拿破侖進行干涉后才鼓動匈牙利革命者。《俾斯麥全集》，第七卷第401—409頁和第十五卷第271頁［GW，VII，401-409，XV，271］；另見愛德華·馮·維特海默，《政治戰中的俾斯麥》（柏林，1930年），第280—281頁［Eduard von Wertheimer，Bismarck im Politischen Kampf（Berlin，1930），pp.280–281］。

[6.](#6_8) 德語作韋爾夫（Welfen），德意志傳統貴族世家，曾是施瓦本、勃艮第、巴伐利亞、薩克森和漢諾威等地的統治者，英國的漢諾威王朝也是它的一個分支。——譯注

[7.](#7_8) 北德邦聯沒有正式內閣，各部主管稱為秘書，由首相任免。——譯注

[8.](#8_8) 從1866年6月26日羅恩寫給佩特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這種身處極度危險的感覺多么普遍：“我經常覺得自己（這里的‘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現政府的人格化）是個走鋼絲的演員，頭頂著搖搖晃晃的重物穿越尼亞加拉大瀑布。我知道，出現任何的失足或打滑，甚至只是重物失去平衡，我就會墜入深淵。我知道，一切取決于強大的神經和穩健的步伐，但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意志，他讓神經和肌肉保持效力，沒有他，連只麻雀都不會從屋頂墜下。”《戰爭部長，陸軍元帥羅恩伯爵回憶錄》，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勞，1897年），第二卷，第141頁［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141］。

## 第五章　俾斯麥的錢袋和布萊希羅德的地位

波美拉尼亞地主都有為他們家族服務的猶太人。作為波美拉尼亞地主，我有布萊希羅德。

——俾斯麥

“你最痛恨哪種惡習？”“奴性。”

——卡爾·馬克思，19世紀60年代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都是1866年勝利的受益者。在私人領域，兩人都覬覦對方所擁有的東西：俾斯麥想要足夠的錢，以便滿足自己對土地的狂熱；布萊希羅德想要在普魯士傳統的等級社會中獲得穩固的地位。俾斯麥幫助布萊希羅德提高社會地位；布萊希羅德則提升俾斯麥的財富，并讓他對現代經濟世界有所了解。就這點而言，他幫助俾斯麥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現代化推動者。

兩人的合作在1866年后成為被認可的事實，象征當時德國社會在更大范圍內的重組。經濟正經歷變革，貴族們試圖擴張或者至少保持自己的經濟地位，而商人們（有很多暴發戶）則尋求穩固的社會地位。在私人生活中，俾斯麥取得不次于公共領域的成就：有布萊希羅德在身邊讓他認識到商業世界的重要性和價值，為此他推動農業和資本利益、貴族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和解。俾斯麥為資本主義創造有利條件，布萊希羅德則幫助保留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里，俾斯麥經歷更多的是應付債務，而不是選擇投資。公職讓他贏得聲望，也讓他獲得財富。1866年的勝利標志著俾斯麥在公共和私人領域的轉折點。

作為19世紀一項受人歡迎的慣例（沿襲自更早時代），勝利的政客和將領應該得到獎勵，以示國王和國民的感激。美德的獎勵可能只是它本身，成功則會帶來更多獎賞。贊譽稍縱即逝，世襲頭銜或大筆賞金則是長久的紀念。剛剛“逃脫絞刑架”的俾斯麥現在獲得榮耀和財富。

丹麥戰爭結束后，俾斯麥被封為伯爵。1866年的六周戰爭結束后，俯首帖耳的議會（代表感激涕零的國民）投票決定獎賞俾斯麥40萬塔勒（按照1974年的比價，略多于200萬美元）。這是一筆慷慨的獎賞；羅恩和毛奇也獲得較少的獎賞。對俾斯麥來說，這是他巨大財富的發端，盡管若干年后他表示自己并不情愿從議會手中接受那筆錢：“我與這些人激烈爭吵了那么多年，不想從他們手中接受任何錢……但最終我還是向誘惑屈服。” [[1]](#1_47)

俾斯麥從不否認自己愛財—這樣做在他看來顯得虛偽而愚蠢。但考慮得更周到的后世歷史學家把他的這一面抹去了，就像他們抹去他親口提及自己放蕩的青春或對母親的“仇恨” [[2]](#2_47)  。金錢能提供獨立、舒適和私密；他很可能會認同海因里希·海涅的說法，即金錢應該被視作獲得自由的唯一手段 [[3]](#3_45)  。青年俾斯麥欠過債，這也是其他許多容克貴族的命運。俾斯麥不愿怠慢投資或產業，與大多數經歷過貧窮痛楚的人一樣，他永遠無法允許自己懈怠，把自己看作承擔得起損失、重稅或管理不善之后果的百萬富翁。和對待權力與外交一樣，俾斯麥對金錢的態度也極為務實。他還認為，財產是“參與政治事務的最重要的合法條件” [[4]](#4_45)  。理財反映出性格：節制是美德，揮霍或怠慢是惡習。對俾斯麥來說，做貧窮的貴族或傲慢的有錢人同樣沒有吸引力。

他體驗過艱難。19世紀30年代末，父親的欠債和他本人訂立的各項高額債務迫使他退出官場（盡管他完全不喜歡官場生活），重新開始打理負債累累的祖產 [[5]](#5_45)  。1845年父親去世后，俾斯麥繼承舍恩豪森和克尼普霍夫莊園。他把克尼普霍夫租給佃戶，進入政界后又出租舍恩豪森。到了在法蘭克福任職時，他的債務狀況似乎已經有所好轉，并在羅斯柴爾德的幫助下第一次投資股票市場。

1859年，布萊希羅德開始為俾斯麥服務，但居于從屬地位。他為俾斯麥收繳作為駐圣彼得堡大使的3.3萬塔勒薪水，后者的大部分交通和娛樂開支都來自這筆錢 [[6]](#6_43)  。難怪俾斯麥抱怨說，政府任命新外交官無異于強行向他們貸款 [[7]](#7_43)  。在最初的這些年里，布萊希羅德本質上充當轉賬代理人，負責接收和支付錢款。他把任何收支盈余匯往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俾斯麥在那里仍然保留著一個大賬戶。從所謂的舍恩豪森檔案（目前被存放在現任俾斯麥親王 [1](#1_11)  的馬棚閣樓上）中留存的記錄來看，布萊希羅德當時似乎不太可能投資俾斯麥的任何資金。當時的賬目大多是日常內容，記錄顯示，最初的求助者是布萊希羅德，而俾斯麥則施以各種恩惠。

在我們手里布萊希羅德寫給俾斯麥最早的一封信中，他感謝后者提供關于即將發行俄國債券的信息。1861年1月，他再次感謝俾斯麥的信息，并對使用平郵寄信表示遺憾，“鑒于這些信的內容常常很寶貴，似乎不應該總是［用平郵］” [[8]](#8_43)  。這是老話重提：布萊希羅德需要快速而秘密地傳遞專業消息。

不過，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很快變成互惠互利。1861年，俾斯麥第一次尋求布萊希羅德的建議。非常反諷的是，鑒于他以后的成功，這次的建議可謂糟糕。俾斯麥希望知道是否應該出售自己持有的柏林釀酒廠（也被稱為蒂弗利［Tivoli］）股份。布萊希羅德建議不要賣，因為他預測一旦正式上市，股價將大幅上漲。酒廠運營“完全健康”，可能有6%到7%的股息 [[9]](#9_41)  。不久，布萊希羅德又向朋友亞伯拉罕·奧本海姆保證，他預計股息為5%到6%。11月，奧本海姆在信中對布萊希羅德大發雷霆，責問股價為何突然暴跌（一天內從75跌至50），并表示管理層一定有違規行為瞞著布萊希羅德。情況“糟透了”，令奧本海姆憤怒的是，公司正要求大股東們增加資本，而僅僅幾個月前，有人還向他們保證，公司的財政狀況完全沒有問題 [[10]](#10_40)  。

1862年1月，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寫去一封5頁的長信，告訴他那家公司沒有支付股息，以后也不會支付，它的“最大問題”實際上是資本短缺。公司將很快召開會議，原始大股東們將被要求按照原先投資金額的比例投入更多的錢。如果提議被拒絕，“公司將陷入破產”。作為主要股東，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科隆的奧本海姆和法蘭克福的戈德施密特同意額外注資；另一位大股東，圣彼得堡的君茨貝格（S.E.Günzberg）則表示拒絕。“閣下，如果您出于自己和其他股東的利益而召見君茨貝格先生……并敦促他改變拒絕的立場，我將不勝感激，因為這會毀了一家本質上健康有序、只是需要些額外幫助的企業。”布萊希羅德還表示，他自己的專家已經宣布，再融資的公司前景健康。他請求俾斯麥原諒自己的“大膽”求助；他這樣做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幫助與否仍然取決于俾斯麥 [[11]](#11_40)  。我們無從得知，普魯士公使是否在辦公室召見君茨貝格。但那家公司活了下來，俾斯麥也原諒了布萊希羅德的預測，盡管在他看來，這也許只是某人又一次牟取私利 [2](#2_11)  。

1862年，俾斯麥在柏林就任首相，薪水不到擔任大使時的一半。現在他每年收入1.5萬塔勒，再加上一棟不起眼的官邸。布萊希羅德負責打理俾斯麥家的日常賬戶，每次匯出500或1000塔勒用于支付常規家庭花銷。俾斯麥的薪水入不敷出，除了家庭需要（他有三個孩子），還要不時幫助岳父和其他親屬。當時，布萊希羅德似乎沒有為俾斯麥收繳來自舍恩豪森約3500塔勒的收入，或者克尼普霍夫那筆小得多的收入 [[12]](#12_38)  。我們知道俾斯麥在娛樂上頗為節省，但他喜歡有品質的生活。比如，1863年7月，布萊希羅德為酩悅香檳（Moët et Chandon）賬單支付了203塔勒。兩年后，布萊希羅德列出從俾斯麥賬戶向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支付的各種款項，俾斯麥親筆確認這筆錢是在比亞里茨的花銷。度假共計花費10550法郎（按照1974年的比價，合2萬美元）。盡管比亞里茨之行是政治度假，但沒有證據表明，俾斯麥這筆相當奢侈的花費得到任何報銷 [[13]](#13_34)  。根據布萊希羅德的賬單，1866年俾斯麥的總花費達到2.7萬塔勒，盡管其中某些項目可能是資本支出或貸款。

布萊希羅德最初的角色主要是私人出納。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負責俾斯麥的投資；根據留存的少數幾張來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賬單之一，1863年6月30日，俾斯麥在該家族戶頭上的余額為82247萊茵盾 [[14]](#14_34)  。俾斯麥將賬戶留在法蘭克福一定有理由；在憲法沖突的高峰，他可能覺得審慎起見，應該把流動財富放在安全的地方，即普魯士以外。另一方面，布萊希羅德一定渴望取代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俾斯麥的投資顧問。盡管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著商業和效忠關系，他還是覬覦成為俾斯麥的親信。他急于證明自己的特別熱心，急于奉上老銀行可能不再愿意提供的好處和服務。其中一項特別的“好意”（也可以用更加難聽的表述）是向俾斯麥提供免費期權，讓后者不必承擔成本或風險就有很大機會獲利。比如，1863年5月，他致信俾斯麥，表示在9月30日前他將“為閣下持有”價值1000塔勒的柏林—安哈爾特鐵路股份，價格為148又3/4，以及另外1000塔勒的萊茵鐵路股份，價格為102又3/4。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提供以固定價格購買這些股份的五個月期權。俾斯麥婉拒了 [[15]](#15_32)  。十一個月后，當俾斯麥存入2.7萬塔勒現金時（這筆錢的來源沒有說明，但布萊希羅德指出他將提供5%的利率，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只愿給俾斯麥4%），布萊希羅德再次奉上價值4萬塔勒鐵路股份的六十天買入期權，而俾斯麥再次給出“否定”答復 [[16]](#16_32)  。1864年9月，他奉上價值2萬塔勒的普魯士銀行股份的一百天期權，俾斯麥在10月1日接受期權，并于八個月后售出，獲利1100塔勒 [[17]](#17_26)  。布萊希羅德的殷勤和俾斯麥對股市的興趣還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到了1863年冬，除口頭報告外，布萊希羅德還不斷在書信中通報市場狀況；1863年12月，他向俾斯麥的內務文書卡爾·路德維希·齊特爾曼（Carl Ludwig Zitelmann）送去類似的報告 [[18]](#18_26)  。無論是在俾斯麥的公共抑或私人角色中，市場的健康以及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商界的看法通常都對他非常重要。

對俾斯麥的私人財產和布萊希羅德為其提供的理財服務而言，1866年是關鍵的一年。布萊希羅德的年度結算單反映出那一年的極端動蕩：俾斯麥的賬戶波動巨大，布萊希羅德向他提供的利率（與官方貼現率成比例）同樣如此。從5月11日到7月13日，利率為9%；到了12月，利率已經下降到4%。1866年12月，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做了第一筆重要投資：他購買了21623塔勒、利率為6%的美國債券，24875塔勒、利率為5%的薩克森債券（布萊希羅德幫助該債券上市），16075塔勒腓特烈·威廉北方鐵路（Friedrich Wilhelm Nordbahn）的股份 [[19]](#19_22)  。南北戰爭的結束標志著投資美國的良機，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大多購買了大量美國證券。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當年最重要的變化是俾斯麥決定關閉在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那里的賬戶。具體日期并不清楚；將資金從羅斯柴爾德家族轉到布萊希羅德的銀行一定是逐步進行的，最后一筆5.7萬塔勒的轉賬發生在1867年7月。我們無從得知，為何俾斯麥最終從羅斯柴爾德家族轉向布萊希羅德，但轉變發生在普魯士的憲法沖突結束之時，正值法蘭克福剛剛失去獨立地位，這肯定不僅僅是巧合：隨著俾斯麥志得意滿地穩固在柏林的地位，把自己的錢存放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可能的優勢。現在，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的關系更加親密。

俾斯麥對布萊希羅德的信任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1867年7月，從巴黎返回后不久，俾斯麥詢問了市場前景。布萊希羅德回答說，由于來自巴黎的好戰流言，柏林市場已經變得不安，“開始出現危言聳聽者”。他還表示，無論這些報告的政治意義如何，他都認為市場將陷入蕭條。因此，趁著還能賺錢或“損失不大”，他敦促俾斯麥賣掉證券 [[20]](#20_22)  。收到這封信后，俾斯麥馬上授意普魯士首席銀行（Prussian Hauptbank）行長赫爾曼·馮·戴程德（Hermann von Dechend）出售該行持有的俾斯麥名下的剩余證券（可能來自當年的官方獎賞）。

雖然我不相信會有任何危險的政治后果……但我相信有影響力的巴黎人正在做空，那里的急性子正寫信和鼓動報紙發文。因此，我不排除我們正面臨市場的動蕩時期，在此期間賣掉股票可能要費點勁，而我也很可能想要些現金。 [3](#3_11)

7月中旬，布萊希羅德更具體地重申自己的警告：他報告說，法國政府已經決定，即使沒有議會授權也要進行重大軍隊改革，奧地利人同樣在訂購新的軍備。他抱怨說，到處陰云密布，冷淡的市場很快將陷入蕭條，是到了拋售的時候。兩天后，科伊德爾送來俾斯麥出售其所持鐵路股份的許可。7月中旬，當戴程德和羅斯柴爾德匯來他們的資金和布萊希羅德出售俾斯麥的股票后，俾斯麥在布萊希羅德那里的賬戶達到19.4萬塔勒 [[21]](#21_22)  。

在上述重大投資變更發生的同時，俾斯麥已經搬入在伐爾岑的新莊園。在將被馴服的議會投票同意獎勵的40萬塔勒交給俾斯麥時，威廉敦促他用這筆錢購買一處有限定繼承權的地產，它將永遠屬于俾斯麥家族，并成為其偉大成就的紀念 [[22]](#22_22)  。俾斯麥很樂意地接受。1867年4月，他從布魯門塔爾伯爵（Count Blumenthal）手中買下位于波美拉尼亞省科斯林（Köslin）附近的伐爾岑莊園。由于國家獎勵不夠買價，布萊希羅德不得不預支額外款項 [[23]](#23_22)  。預支款為短期，似乎布萊希羅德沒要利息就把錢借給俾斯麥—這是他個人的孝敬。當年晚些時候，俾斯麥將父親家的老產業克尼普霍夫莊園賣給侄子，親情沒有過分壓低價格 [[24]](#24_20)  。

伐爾岑莊園面積很大：購買時達22500摩爾干（約合14171英畝），一半為森林，許多已被砍伐。莊園還包括七座村莊 [[25]](#25_20)  。但這還不夠，俾斯麥馬上開始尋求“擴張”自己的土地。他向一位朋友承認，自己每晚都會產生吞并毗鄰莊園的強烈渴望，但早上就能平靜地看著它們 [[26]](#26_18)  。他又逐漸購買了大約相當于原先一半面積的土地。首相貪得無厭的習慣令布萊希羅德也開始擔憂他的財政狀況。

俾斯麥把心放在自己的莊園，他以生病為借口，在那里一住就是幾個月。他對美國人炫耀說自己成了“伐爾岑的鄉紳”，并邀請朋友莫特利前往距離柏林只有半天火車車程的“鄉下”（backwoods）見他 [[27]](#27_14)  。不過，這樣的邀請寥寥無幾，大多數時候俾斯麥只和家人在一起。他寫道，對自己而言，樹木比人更重要。他粗魯地告訴部長們，“別他媽來煩我”（de me f...la paix） [[28]](#28_8)  。1867年夏，俾斯麥獨自在伐爾岑露營，沒有帶家人或家具。在保存于布萊希羅德檔案里的一封動人書信中，俾斯麥的岳父老普特卡默（Puttkamer）承諾送去干凈的床單和餐巾，以便當家人前往時“不致短缺” [[29]](#29_8)  。

但伐爾岑不僅有騎馬、打獵和無邊的山毛櫸林。俾斯麥很重視自己土地的商業方面，抱怨“有產者不得安寧的生活” [[30]](#30_4)  。他有兩個目標：擴大自己的土地，讓土地帶來收益。他的護林員回憶說：“一切都必須精打細算。” [[31]](#31_4)  由于來自佃農的收入微薄，他總是意圖開辦有利可圖的制造企業。從購買新土地到如何有利可圖地開發它們，俾斯麥都會尋求布萊希羅德的建議和幫助。1868年，俾斯麥與科斯林的莫里茨和格奧爾格·貝倫德（Moritz and Georg Behrend）兄弟簽訂協議，將一座被燒毀的磨坊（俾斯麥買下它，想將其改建成造紙廠）出租給對方，為期二十一年 [[32]](#32_4)  。一年后，布萊希羅德接受俾斯麥的命令，向貝倫德兄弟貸款2.5萬塔勒。俾斯麥提供的貸款總額遠不止這個數字 [[33]](#33_4)  。后來，俾斯麥還把其他商業冒險托付給貝倫德兄弟，但與他們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張，布萊希羅德常常被要求直接同他們接洽。貝倫德兄弟是猶太人，或者是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19世紀60年代末，“布萊希羅德和貝倫德談生意時不得不在那里吃飯”，約翰娜對此不無微詞 [[34]](#34_4)  。

俾斯麥對土地如饑似渴，認為地產可以變成有利可圖的買賣。布萊希羅德對此表示懷疑。1868年秋，當俾斯麥再次計劃在伐爾岑附近購買更多土地時，布萊希羅德告誡說：

盡管我有幸打理的只是您的資本投資，我還是恭敬地指出……這些地產雖然購置價格便宜，但收益只有2又3/4個百分點，因此在財務上絕對有必要讓用于證券投資的資金獲得盡可能高的收益率……如果允許我對購地提出建議的話，我希望不要出售任何現有證券，而是以4%的利率把它們抵押給我。這樣的話，閣下將不會損失那些股票帶來的高收益。 [[35]](#35_4)

一年前，他曾提出以4又1/2個百分點的利率提供4.5萬塔勒的抵押貸款 [[36]](#36_4)  。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保證，按照現行的2到2又1/4個百分點的貼現率，這樣的抵押不會對貸方造成負擔 [[37]](#37_4)  。值得注意的是，布萊希羅德認為有必要做出這個保證，言下之意是上述條件并非對首相的特別優惠。他是否有理由認為，俾斯麥可能會覺得欠了自己的銀行家太多人情，或者擔心別人會盯上自己？

布萊希羅德希望俾斯麥明白，他為滿足自身對土地的強烈饑渴而做出的舉動并非“經濟人”的行為。就像19世紀的絕大多數貴紳那樣，他看到土地的特別價值，卻造成特別的負擔。經濟學家衡量那種特別價值的方法是比較土地與其他（風險相似的）投資在回報率上的差異。對俾斯麥來說，如果布萊希羅德的數據大致準確，投資土地和“流動”財富的收益差每年可達好幾千塔勒。根據布萊希羅德的大致數據，伐爾岑每年應該可以帶給俾斯麥約12500塔勒的回報。但非經濟因素戰勝了上述考慮：對俾斯麥而言，“流動”財富無法像有根基的財富那樣提供有形的快感和心靈的安全感。包括俾斯麥在內，德國地主總是試圖盡可能地從自己的土地上榨取利潤，常常不惜損害國家和其他國民的利益。他們決心既要獲得成功，也要堅守與自己的地位密切相關的過時方式。

在俾斯麥的堅持下，布萊希羅德出售了他的部分股票（包括蒂弗利釀酒廠），但反過來做了些重要的說教：“我們這個物質思維主導的世紀傾向于從資本中榨取盡可能多的收益……”布萊希羅德的措詞有時無意中惹人發笑，他用對財神略帶輕蔑的口吻說出這條普遍法則，這一定讓俾斯麥忍俊不禁。他繼續說道：“抵押債券的時代在我看來已經結束，我們高收益的鐵路債券也將遭受與收費關卡同樣的命運，收益率將僅有3到4個百分點。”他還表示，俄國金融專家們已經明白這點，正在以更高但完全安全的利率吸引外國資本（主要是法國）建造本國鐵路。

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俾斯麥能夠以真正低廉的價格購得新的土地，那么土地也會升值—因為國王最終對馮·贊夫特—皮爾薩赫男爵的 [4](#4_11)  計劃給予了某些鼓勵。該計劃經過布萊希羅德及其合伙人（特別是科隆的奧本海姆和柏林貼現公司的漢澤曼）的修改，意圖通過成立一家公司租借或購買“王國土地”來抬高地價。布萊希羅德承諾，從巴黎回來后，他會在造訪伐爾岑時向俾斯麥透露該計劃的更多細節 [[38]](#38_4)  。他的巴黎之行（與漢澤曼和奧本海姆同行）和成立德國的土地信貸銀行有關，旨在調動大筆資本，讓農民和地主們可以購買、出租或改良土地。該計劃遭到許多官員的反對，但布萊希羅德早就不動聲色地喚起俾斯麥對這項令其也能受益的計劃的興趣。一年后，俾斯麥的堅決支持對普魯士中央土地信貸股份公司（Preussische Central-Bodenkredit-Aktiengesellschaft）這家普魯士抵押銀行的成立起到決定性作用 [[39]](#39_4)  。

從1866年到1870年，布萊希羅德最關心的是俾斯麥的證券組合。他在首相的許可下購入和出售—這項工作讓兩人有了日益親密地接觸和交流的機會。俾斯麥批準布萊希羅德建議的保守組合。布萊希羅德開始逐步更新俾斯麥的投資。1868年，他出售價值近0.6萬塔勒的蒂弗利釀酒廠股票和近7.7萬塔勒的波美拉尼亞抵押債券。與此同時，他還把2萬塔勒轉賬給俾斯麥的法律代表古斯塔夫·馮·維爾莫斯基（Gustav von Wilmowski），這筆錢可能用于購置新地，也可能是給貝倫德兄弟的貸款。此外，布萊希羅德大幅增持俄國抵押債券，并在隨后的幾年里反復將其更換為新發行的同種債券，貼現率為3%到5%。頻繁換手帶來不錯的收益 [[40]](#40_4)  。布萊希羅德還通過其他投資為俾斯麥贏取一些短期收益。比如，1869年7月，他以49725塔勒購入價值4萬美元、利率為6%的美國債券；五個月后以52874塔勒售出（這意味著五個月內取得6%的資本回報和6%的利息） [[41]](#41_4)  。我們在下文將看到，普法戰爭期間，俾斯麥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表現出不尋常的欣賞，這可謂奇特的巧合。

俾斯麥的投資組合在內容和價值上發生變化—后者取決于他的其他需要。1869年，組合價值138500塔勒；1870年2月，暫時縮水到86023塔勒，很大一部分資金流向貝倫德兄弟或被用于購買更多土地。19世紀60年代末，俾斯麥常常大額透支在布萊希羅德那里的賬戶，有時達到5萬到8萬塔勒。俾斯麥的證券當然不夠滿足這些透支。但布萊希羅德似乎向俾斯麥提供了短期無息貸款，這種恩惠不太可能給過別人。布萊希羅德的任何書信中都沒有提及該話題，我們可以假設，雙方當事人對此心照不宣。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經常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展開商談。除了會面，他們也直接或通過俾斯麥的助手進行書信交流。從布萊希羅德寫給俾斯麥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中，我們知道他們談的不僅是俾斯麥的私事。事實上，公共和私人領域間并沒有明確的分界線。他們討論的話題和交流的消息必然涉及所謂的歐洲政治經濟—這正是作為政客和投資者的俾斯麥所關心的。他們談論的不僅是戰爭與和平、股票市場的前景，也包括具體問題。比如1868年，俾斯麥就對“物價上漲和工業就業數據下滑也開始在普魯士盛行”惴惴不安，表示“天氣一好轉，政府就將大力推動鐵路建設，并設法降低面包價格” [[42]](#42_4)  。

那些年里，俾斯麥的眼界日益開闊，他對經濟學的理解（即事物的相互聯系）也加深了。布萊希羅德向他傳遞當時最出色的金融情報：通過布萊希羅德的投資，俾斯麥不由自主地關心起美國、俄國和德國鐵路的盈利進展。他了解資本市場，作為普魯士最大的地主之一，他還了解持續波動的市場中的土地信貸、木材銷售和紙張制造。在專業指導和最強烈的誘因（他本人的收益）驅使下，首相開始認清農業—商業世界的復雜本質。

有時，俾斯麥假意倦怠國事，退歸伐爾岑休養生息。俾斯麥遠離狂躁的柏林，在心愛的莊園和美麗的花園里享受田園之樂—這樣的日子過得越久，與布萊希羅德經常見面就顯得更加重要。當國事令俾斯麥煩惱，他在柏林的下屬們被授意扣下令其不快的書信時，他仍然保持著對自己私人事務的關心，精心檢視布萊希羅德的賬單。當時的人知道，他對私人事務的興趣一絲不茍而且始終如一。1869年，當俾斯麥將因為健康不佳辭職的流言甚囂塵上時，奧地利代辦明希男爵（Baron Münch）致信本國外長：“但所有報告都顯示，俾斯麥伯爵正在伐爾岑盡心盡力地打理自己的財富，讓自己的地產收益更高。” [[43]](#43_4)

危機到來時—在歐洲，還有誰比俾斯麥更能分辨真正的和謠傳的危機呢—俾斯麥試圖保護自己的資本，采取更加保守的行動。當然，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自己的消息（尤其是后者）能幫助他做出投資決定。這種做法在俾斯麥看來無可厚非。如果他覺得有何不妥—或者別人會對混淆公私事務感到不安—他就不會在加斯泰因時要求奧伊倫堡向布萊希羅德轉達對自己證券的安排，而是親自通知；1867年7月，他也不會根據政治解釋對戴程德下達市場指令。我們將看到，普法戰爭爆發時，他對打理自己的資金表現出同樣的關切。幾個月后，他對利用政治消息賺錢的想法表示不屑。在某種程度上，他所言不虛：他僅僅是用這些消息省錢，他總是對那些讓政策為投機服務的政客嗤之以鼻，比如法國外長格拉蒙（Gramont） [[44]](#44_3)  。

只有非常幼稚的觀察者（或者假裝對財富不屑的德國歷史學家）才會驚訝于俾斯麥在重大政治危機面前還有時間考慮自己的投資。他在利用自己獨一無二的位置獲利，從而保護自己的財富嗎？俾斯麥會認為，無視自己的地位帶來的情報等于自殘。權力必須絕對與利益脫鉤，公共和私人利益應該涇渭分明，因為后者可能影響前者—俾斯麥和19世紀的偉人們可沒有這種想法。他們明白，權力會招致痛苦和折磨，也會帶來興奮和可能的名譽；權力無疑應該得到尊敬和效忠，如果這些有利可圖就更好了。利益不會威脅他們的誠實，貧窮也不是為國王和國家效勞的應有回報。

對布萊希羅德而言，與俾斯麥日益親密的關系是無價的。成為俾斯麥的銀行家和親信—并獲得他人認可—證明布萊希羅德的特殊地位。但布萊希羅德也能從這種密切關系中獲得某些眼前的和實際的利益。與羅斯柴爾德和任何金融家一樣，布萊希羅德特別重視了解重大事件的最新進展，比競爭者早幾小時或幾天知道市場的可能風向。他扮演著俾斯麥投資者和顧問的雙重角色，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不斷向首相提供歐洲政治經濟的消息。在對話或通信中，俾斯麥必然會加上某些個人評論，對報告加以確認或否定。簡而言之，通過向俾斯麥傳遞消息，布萊希羅德也不斷從前者那里套取消息。對他而言，了解歐洲舞臺上最具影響力角色的想法或傾向具有無法估量的重要性。兩人對彼此關系中的這一面毫不諱言。比如，1869年末，布萊希羅德建議俾斯麥不要賣掉證券，但別有深意地表示：“不過，如果閣下認為近東問題或其他政治糾紛會引起麻煩，那么我將賣掉閣下的全部證券。” [[45]](#45_3)  俾斯麥同樣直言不諱；當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駐柏林大使奧多·羅素勛爵（Lord Odo Russell）被要求確定英國政府是否應該把布萊希羅德當成消息靈通的線人時，俾斯麥描繪了自己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俾斯麥說：“你知道布萊希羅德在打理我的私人財產嗎？如果知道，你相信我會誤導他嗎？” [[46]](#46_3)

漸漸地，一種超越商業關系的東西開始成熟。布萊希羅德不僅高效而成功，熱心而樂于獻媚，他與俾斯麥也一定意氣相投，而且因為兩人的關系在那些年里更加深入，甚至約翰娜都和他有了私交。俾斯麥家族的一些人聘請布萊希羅德為私人銀行家和投資顧問，比如奧托的堂弟與合作者俾斯麥—波倫（Bismarck-Bohlen）。其他人也不得不與布萊希羅德打交道，因為俾斯麥把一切財務事項都交給他。俾斯麥偶爾還會把自己的家書交給布萊希羅德，頁眉標著撥款指示。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有兩封老普特卡默寫給“愛婿”的信，信中充滿愛意，表達在伐爾岑見到他和孩子們的渴望，但也提到自己需要17600塔勒，愿意支付5%的利息。布萊希羅德為中間人 [[47]](#47_3)  。這個家族很可能覺得布萊希羅德和金錢一樣是“必要之惡”。約翰娜的堂弟伯恩哈德·馮·普特卡默（Bernhard von Puttkamer）在寫給俾斯麥的信中提到繼承權問題上的某種妥協，他表示：“我非常高興這樣做，因為該死的財神而引起家庭爭端與不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這更令人討厭了。” [[48]](#48_3)

布萊希羅德寫給俾斯麥的信—總是兼有坦誠與諂媚，實質內容與空話—印證這種日益親密的關系和相互關心。雙方都對彼此的健康表示擔憂。在那四年里，俾斯麥反復遭受神經衰弱或易怒發作，按照當時的流行做法，患者需接受艱苦的療法或長期在鄉下休養。這位鐵血宰相在當時就頻繁受精神疾病折磨，軒昂的外表和明晰的頭腦掩蓋了脆弱的神經和不安的靈魂 [5](#5_11)  。布萊希羅德的憂慮令人動容，他的表達則顯得恭維過度或奇怪——即使考慮到當時更加夸張的文風：“關于閣下狀況的消息帶給我無窮的興奮，我和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一起，每天向造物主祈禱閣下健康好轉。”一年后，他又表示：“愿造物主聽到我每天的祈禱，愿他很快讓閣下完全康復，體力復原—這將讓一個高貴的家庭及其友人高興，也是我們祖國的福祉。” [[49]](#49_3)  與祈禱相伴的還有旨在加速俾斯麥康復的各種合適的美食：一盒盒魚子醬、鱘魚和鵝肝醬被絡繹不絕地專程運來，不時還有與那些食物相配的葡萄酒。布萊希羅德還安排醫生直接通過電報從伐爾岑發來關于俾斯麥健康的快報 [[50]](#50_3)  。1869年秋，布萊希羅德做了一次眼部大手術，在隨后的一段時間里罹患眼部感染。他用身體有恙解釋自己那段時間的銷聲匿跡。此后，俾斯麥總是詢問他的健康。至少在病痛上兩人扯平了。那些年里，布萊希羅德于1868年和1869年秋兩次在伐爾岑住了些日子，很可能還有過較短的造訪。這些造訪是秘密的，但布萊希羅德對它們并不諱莫如深。

俾斯麥在1866年的勝利也改變了布萊希羅德的生活。他是俾斯麥在黑暗和不確定的日子里的幫手。隨著俾斯麥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政客，布萊希羅德的聲望也水漲船高。

布萊希羅德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有利形勢的際會。1866年后，柏林成了德意志的民族中心；俾斯麥非常希望看到這種結果，他憤怒地拒絕了宮廷提出的在波茨坦或法蘭克福召開國民議會的建議。只有從自己的首都，普魯士才能調集足夠力量，讓德意志接受自己的霸權 [[51]](#51_3)  。在新近變得重要的柏林，布萊希羅德以財富著稱，因此在一定范圍內很有勢力；他以俾斯麥的親信身份著稱，因此被認定可靠和消息靈通；他以同羅斯柴爾德家族關系密切著稱，因此享有國際聲望。他不斷取得更多的財富、人脈和名望。但這一切都不是自動或不費力的。他必須不停地努力贏得自己的地位。

1866年后，布萊希羅德的崛起戲劇性地描繪了德意志新秩序相互關聯的性質。布萊希羅德的威望來自他在不同領域同時取得的成功—銀行世界，俾斯麥的世界，歐洲財政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世界，普魯士宮廷秩序森嚴的世界。他幫助這些世界走得更近，他在某個領域的成功加強在另一領域的威望。錢帶來的不僅是錢，還是影響力和某些有限形式的權力。但對布萊希羅德乃至廣大歐洲金融家而言，光有財富還不夠；在傳統等級社會，地位和公眾接受才是關鍵。布萊希羅德擴大的重要性象征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勝利，但他的故事也顯示了那種勝利的局限和痛苦。

1866年后，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的親密關系成了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廣為人知的事實。他被視為一個擁有精明的判斷力、誠實、審慎的人，具備點石成金的能力。甚至民眾已經在想象中開始夸大布萊希羅德的影響力。他被恰如其分地譽為柏林消息最靈通的人，因為他在如此之多的不同領域中生活和工作。他的朋友、客戶和走卒無處不在。他編織起人脈網絡。他可以給予很多，也需要大量回報。他有時具有影響力，但從未擁有過政治權力。為了階梯上的每一級，他都必須拼搏或欺騙。資本家的權力是司空見慣的主題，但人們常常忽視，在某些社會中，他們的成功背后險象環生。

布萊希羅德重要性的基礎是他的銀行，這家銀行在整個19世紀60年代欣欣向榮。它的歷史不屬于本書的范圍，只需指出幾個主要事實就足夠了。它仍然屬于普魯士財團，一個由頂尖銀行家組成的團體（包括漢澤曼的貼現公司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常常在國家貸款和其他事務上進行合作。該行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變得日益重要，布萊希羅德逐漸擺脫僅僅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依附者的身份。布萊希羅德銀行獨自或與其他銀行合作建立或資助各類其他企業，從釀酒廠到鐵路再到普魯士抵押銀行，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合作的最重要項目之一，是為極其重要和昂貴的圣哥達隧道融資 [[52]](#52_3)  。到了1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這種推動注定將變得更加重要和有利可圖。

蓋爾森是銀行的主人，這里是他的帝國和職責所在。以曾為蓋爾森父親效力的忠誠的萊曼（Lehmann）為首的職員們是他的幫手。1868年，蓋爾森讓表弟尤里烏斯·施瓦巴赫（Julius Schwabach）成為合伙人。從1855年老布萊希羅德去世到1870年，除了經營自己在柏林的小銀行，蓋爾森的弟弟尤里烏斯也參與家族生意；兩兄弟都是對方公司的隱名合伙人。尤里烏斯寫給蓋爾森的幾封信讓我們對19世紀60年代布萊希羅德銀行的年利潤有所了解。1863年的凈利潤是18661塔勒，1867年為43464塔勒，1868年為54940塔勒，1869年為80761塔勒 [[53]](#53_3)  。七年間，利潤增加了超過三倍，增長率相當可觀。60年代末，兄弟倆原先的合同到期。尤里烏斯想要繼續這種關系，但蓋爾森決定終止各自的參股 [6](#6_11)  。銀行的利潤只是布萊希羅德收入的一部分；1861年，警方估計他的私人收入為23333塔勒 [[54]](#54_3)  。60年代末，他每年可能至少賺10萬塔勒。

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是布萊希羅德的榜樣和最看重的合作者。盡管布萊希羅德也與倫敦和法蘭克福分支不斷接觸，但雅姆斯男爵仍然地位特殊。除了經常合作，布萊希羅德還向雅姆斯男爵提供來自“好線人”的秘密消息。

他還為男爵奉上禮物。1864年，雅姆斯男爵一定提到自己中意的某件古玩，布萊希羅德馬上將其當做禮物送給男爵。“我非常喜歡這種古玩，”雅姆斯男爵在回信中寫道：

親愛的布萊希羅德先生，我承認，若非如此我不會接受它，因為它真是太珍貴了。我幾乎不敢再命你為我買東西，否則我現在就會請你留意古畫或古玩，因為對可憐的丹麥的戰爭很可能讓許多美麗和有趣的作品流入市場。 [[55]](#55_3)

1867年，兩人在維爾德巴德（Wildbad）見面。同年，布萊希羅德向雅姆斯男爵提供了一批稀有藏畫的期權，包括幾乎落入奧洛夫親王之手的克拉納赫家族（Cranachs）和勃魯蓋爾家族（Breughels）的作品 [[56]](#56_3)  。布萊希羅德仍然努力取悅雅姆斯男爵，但過去的奉承姿態逐漸消失。1868年，雅姆斯男爵去世，布萊希羅德趕忙前往參加葬禮。作為傳奇人物，雅姆斯后來也相信自己的傳奇，他曾是蓋爾森父親的庇護人，因此兒子向長者表現出敬意甚至奉承似乎很自然。布萊希羅德與雅姆斯男爵的兒子和繼承人阿爾方斯男爵（Baron Alphonse）的關系就不再那么受卑微的出身之累。布萊希羅德變得日益獨立，并沉浸在普魯士的榮光中，有時這會讓羅斯柴爾德家族惱火。

羅斯柴爾德家族沒有理由喜歡俾斯麥，但他們不得不重視和尊重他（很難想象羅斯柴爾德家族會喜歡任何人，利用價值是他們的唯一標準）。甚至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也開始認可這個強力推動自己的國家躋身歐洲第一流強國的可怕天才。1866年8月，他寫道：“毋庸置疑，憑著自己的能量和精神力量，你們首相已經成為當世豪杰。” [[57]](#57_3)  俾斯麥的健康欠佳總是許多流言蜚語的話題，布萊希羅德不得不提供真實信息。1866年11月，他否認俾斯麥像盛行的流言所說的那樣患上了“不治之癥”。一個月后，他又報告說：“首相狀態好極了，但非常忙。” [[58]](#58_3)  1868年，他再次發出這條典型的布萊希羅德式消息：“今天我拜訪了好線人，他的狀況大有好轉，盡管他仍然非常虛弱，不接待任何人。” [[59]](#59_3)

羅斯柴爾德家族也許已經厭倦布萊希羅德的炫耀，但他們知道可以利用他的人脈牟利。奧普戰爭的余波進一步證明這點。俾斯麥對不得不讓薩克森保持獨立大光其火，向這個奧地利的盟友索要巨額賠款。薩克森財政部長和首席和談代表馮·弗里森男爵（Baron von Friesen）的所有請求都沒有效果。他辯稱薩克森已經為被普魯士占領的所謂特權支付了250萬塔勒，但根本無人理睬；他堅稱薩克森在新的北德邦聯中的軍費開支將超過戰前的預算，但普魯士談判代表干脆地回答，支付軍費是薩克森的特權 [[60]](#60_3)  。難怪布萊希羅德不久之后在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表示：“在薩克森這種被吞并的土地上，可以想見人們對普魯士心懷怨恨，需要很長時間才會變得友好些。” [[61]](#61_3)  10月18日，布萊希羅德拜訪無助的弗里森 [[62]](#62_3)  。令弗里森驚訝的是，布萊希羅德知道和約即將簽訂。在雅姆斯男爵的授意下，他表示可以提供預付款，條件是以今后為支付賠款而可能發行的貸款為抵押 [[63]](#63_3)  。四天后，和約草簽，薩克森同意支付1000萬塔勒賠償，其中900萬為現金。雅姆斯男爵急于獲得這筆貸款，于是布萊希羅德匆忙趕往德累斯頓（Dresden）為羅斯柴爾德報價，但遇到阻力和當地的競爭 [[64]](#64_3)  。布萊希羅德希望以95折獲得貸款再加上傭金，他認為這將是“出色的安排” [[65]](#65_3)  ；他顯然成功了，并把俾斯麥自己的錢也投入貸款。薩克森人也很高興：1870年2月，國王授予布萊希羅德高級獎章，弗里森也發來祝賀，感謝“您提供的重要幫助，特別是1866年薩克森貸款的相關事宜” [[66]](#66_2)  。布萊希羅德幫助薩克森政府提前支付賠款，從而促成普魯士和薩克森的快速和解，薩克森成了新邦聯的重要支柱 [[67]](#67_2)  。

布萊希羅德的名字經常與1866年戰爭另一受害者的命運聯系起來：他顯然負責打理或幫助打理漢諾威王朝被沒收的財產。財產的利息構成一筆巨額秘密資金—韋爾夫基金（Welfenfond），使用該基金時，俾斯麥只對國王負責。外交部是基金收益的最大受益者，直到1872年，布萊希羅德的朋友科伊德爾一直負責監管韋爾夫基金在外交部的支付。由于包括公使基金在內的全部記錄都在二戰期間丟失，我們無法再現布萊希羅德代表俾斯麥所做的大部分秘密支付 [[68]](#68_2)  。

俾斯麥的各項利益總是緊密相關，但并不總是讓布萊希羅德滿意。布萊希羅德知道，自己直接或間接為整個銀行界代言，因此當他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時，他會毫無顧忌地向俾斯麥抱怨。無意之中，他一定還認為對布萊希羅德銀行有利也對普魯士政府有利。

僅舉19世紀60年代末的一個例子就足夠。1869年，為了籌集新的資本和吸引外國資金，貼現公司（可能與布萊希羅德合作）計劃成立財團，代表德意志最大的四家鐵路公司（俾斯麥是其中三家的股東）發行1億塔勒的彩票。這樣的冒險計劃遭到議會的強烈反對，于是布萊希羅德催促俾斯麥返回柏林 [[69]](#69_2)  。然而，俾斯麥的缺席是故意的；為了避免政治上的不愉快，他把健康不佳當做擋箭牌。他向莫特利解釋自己的缺席：“我倒要看看議會能否幫忙干掉我的一些同事；如果我在那兒的話，他們也會受益于我所享有的免責。” [[70]](#70_2)

提案失敗。布萊希羅德怒不可遏，他用罕見的夸張修辭向俾斯麥抱怨說：“導致計劃失敗的元兇是典型的嫉妒和教條式的理論空談，但罪魁禍首還是主管部長的軟弱……［議會］兩院被賦予介入具體政府事務的權力，因此對主管部長們取得上風，這將很快在預算問題中顯露出來。” [[71]](#71_2)  擴大議會權力是罪不可恕的罪行，對俾斯麥的部長們提出這樣的指控需要勇氣。幾天后，布萊希羅德在伐爾岑見到俾斯麥。當月末，海特被罷免，此前一直擔任海貿銀行行長的坎普豪森被任命為接替者。布萊希羅德報告說，對坎普豪森的反響“非常非常好”。新任財政部長原來就支持彩票貸款，他將捍衛該計劃，哪怕只是為了阻止議會權力擴大。但即使是坎普豪森也無法拯救這個計劃，按照布萊希羅德的說法，它已經被議會“啰嗦的空談理論”（俾斯麥也一直對此非常厭惡）所扼殺 [[72]](#72_2)  。

在另一些問題上，布萊希羅德更加幸運地獲得政府支持。同樣在1869年，很大程度上由于布萊希羅德不懈的幕后活動，政府與沃爾夫通訊社（Wolff Telegraph Bureau）—相當于路透社—簽訂秘密協議。布萊希羅德為沃爾夫提供資金，作為交換，他有權優先獲得新聞。這份政府協議和布萊希羅德角色的細節屬于他與整個第四等級（Fourth Estate） [7](#7_11)  廣泛關系的故事，我們將在第十一章加以討論。

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只要條件有利，布萊希羅德對再小的官方業務也來者不拒。即使日常交易也會帶來傭金和一些收益。19世紀60年代末，布萊希羅德變得越來越富有。他還獲得某種權力：他的資源允許他向政府、公司和個人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或者拒絕這樣做。并非所有的錢都一樣：布萊希羅德的錢具有特殊的聲望，因此特別有價值。事實上，他可以決定一個人、一家慈善機構甚至一家公司的命運。但這一切都有命門：他同樣依賴政府和社會知名人士的首肯。這種依賴讓他的權力搖搖欲墜。因此，他總是不斷地追求財富和聲望，不知疲倦和相當謹慎地前進。所有的收益、頭銜和朋友都幫助確立或維持布萊希羅德在世界上的地位。沒有固定的目標，也幾乎沒有時間滿意地回頭看一眼已經走了多遠，遠到無法測量。

對布萊希羅德而言，光有財富還不夠，追求財富也不是最終目的。財富是讓他被德國統治精英所接受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沒有社會地位的財富算不上完美的成就。反過來，社會地位在商業中的價值不可估量。追求財富和地位是一致的，并相互促進。新的大筆財富總是在追求地位—財富越新或者所有者的社會出身越低，追求就越急迫和絕望。在德國，這種追求也許比在其他地方更困難，因為那里的封建和反資本主義情感比在法國或英國更加根深蒂固，更別提美國。對于一個德國猶太人來說則無疑再困難不過，他們與生俱來地帶有崇拜新老財神的印記。反諷的是，當許多猶太人嫉妒基督徒（特別是貴族基督徒）生來享有的尊重時，許多基督徒貴族也暗中嫉妒猶太人的財富（他們似乎特別善于積累錢財）。共同的欲望促成親密合作乃至友誼，有時還會產生敵意和妒忌已經完全消失的幻覺。但老家族無法丟掉對新財富的鄙視，后者令他們縮水的祖產相形見絀。

布萊希羅德獲得的尊重和他為社會地位所做的奮斗只是讓新財富合法化的普遍努力的一個例子。19世紀的大多數偉大小說家—如巴爾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特羅洛普（Trollope）和特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把這種奮斗當成他們作品的中心主題，而社會科學家最近也重新發現了它。在布萊希羅德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舞臺內外的奮斗過程。我們擁有的真實記錄顯示了一位柏林的猶太銀行家如何在某些方面理想的環境下確立自己的地位。他的一生都受到猶太人身份影響，由此產生的特殊負擔將在本書最后一部分討論。在這里，我們將通過一系列畫面描摹布萊希羅德這個富人和為國效忠者如何獲得正式認可，如何通過認可獲得更廣泛的客戶和可靠的朋友，如何又通過這些人讓自己的生意獲益，從而贏得更高的社會聲譽和政治名望。對普魯士保守派來說（也許也適用于許多歐洲的道德家），這個故事既反映了人與社會的無限腐敗，也反映了無限的虛偽：邊哭泣邊攫取。但布萊希羅德不是道德家，他滿足于向上攀爬，完全不費心思考這種攀爬的內在價值。

若干世紀以來，通過發放作為正式認可象征的頭銜和獎章，心懷感激的政府已經放寬富人進入上層社會的通道。普魯士政府系統地利用臣民對勛章的渴求。政治上可靠的人得到獎賞，異議者一無所有。憑借向公共慈善進行大量捐贈，富人可以加速晉升（也有人會說是買到）。這類別有目的的慈善是一種自愿稅。政府仔細審查布萊希羅德在上述所有方面的資質 [[73]](#73_2)  。1866年元旦，布萊希羅德被授予樞密商務顧問（Geheimer Kommerzienrat）的頭銜，這又一項罕見的榮譽意味著今后他將被稱作“樞密顧問先生”（Herr Geheimrat）。獲獎前，柏林警方仔細調查布萊希羅德的記錄，警察局局長撰寫長篇報告支持授予新頭銜。他解釋說，因為蓋爾森父親的誠實，羅斯柴爾德家族任命其為他們在柏林的代表；蓋爾森繼續扮演這個角色，但取得“更大的自主權”。布萊希羅德銀行“現在已被視為柏林最大的銀行……從政治上說，布萊希羅德屬于嚴格的保守派，忠貞不渝地效忠王室；他在柏林商人元老會中很受尊敬”。這句話的其余部分“豐富的感情讓他與眾不同”很可能出自商務部部長伊岑普利茨，他必須批準警方報告，然后將其交給俾斯麥。（伊岑普利茨是否認為，銀行家沒有感情，尤其是猶太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的愛國善舉特別受到稱贊，他在丹麥戰爭期間向普魯士士兵的家庭提供慷慨援助。報告最后說：“如果蓋爾森·布萊希羅德還有機會對王國政府做過什么貢獻，閣下肯定會知道。”關于布萊希羅德“其他貢獻”的細節由最權威的來源—俾斯麥本人—向伊岑普利茨提供。在一封正式書信中（俾斯麥親手修改關鍵段落），首相肯定布萊希羅德的這個額外特質，因為“自從我擔任現職以來，布萊希羅德商務顧問為我提供了值得贊許的政治服務”。布萊希羅德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聯系讓俾斯麥獲得“可以讓我用來為國家謀利的情報，他的人脈為我提供傳遞絕密信息和施加絕密影響的渠道。因此我認為應該授予他這項榮譽以示嘉獎”。俾斯麥還向伊岑普利茨保證，威廉一世也會贊同這項嘉獎，因為“今年在卡爾斯巴德休假期間，［陛下］反復召見布萊希羅德商務顧問，屈尊聽他對金融和股票市場問題的看法” [[74]](#74_2)  。

1867年，國王準備授予布萊希羅德另一枚勛章，于是再次向消息靈通的警方征詢意見。新的報告表揚布萊希羅德向一個援助1866年被征召士兵家屬的委員會做了許多貢獻，并強調“他在柏林金融界地位突出，他非常可觀的財富讓他可以實現自己的慈善意圖。除了所有的慈善團體，他還非常積極地參與所有的愛國活動”。布萊希羅德為慈善做了“犧牲”，報告最后說：“這個在所有意義上都無可指摘的舉動為他贏得最廣大圈子的尊敬，并讓他配得上另一枚勛章。因此我建議授予他三等王冠勛章（Kronen Orden）。” [[75]](#75_2)  國王照辦了。包括內政部部長奧伊倫堡在內的許多人向布萊希羅德發來熱誠的非正式祝賀 [[76]](#76_2)  。這是商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級勛章 [[77]](#77_2)  。

外國政府也紛紛效仿。1869年，意大利國王授予他圣毛利齊奧和拉薩洛騎士團（St.Mauritius and Lazarus Order）十字勛章；俄國沙皇授予他二等斯坦尼斯拉夫騎士團（Order of Stanislav）勛章，感謝布萊希羅德對成立俄國抵押銀行的幫助。布萊希羅德的每一枚外國勛章都需要并得到威廉的批準 [[78]](#78_2)  。

布萊希羅德的新頭銜恰如其分和令人滿意地認可了其重要性的提升。它以正式的威嚴性確認歐洲銀行界和外交界早就知道的事實：蓋爾森·布萊希羅德已經成為柏林新的權力中心的重要人物。普魯士給予他一名商人（更別說猶太商人）在當時所能憧憬的一切。在正式場合，他的胸前不再絕望地空空如也，來信中現在可以稱呼他為“高貴的騎士”或者“最高貴的騎士”，盡管僅憑普魯士勛章是否有資格獲稱“騎士”存在一些疑問 [[79]](#79_2)  。在社會名望的危險長梯上，他攀上好幾級臺階。

布萊希羅德在幕后不知疲倦地追逐頭銜或獎章 [8](#8_11)  。我們必須記住，這種追逐司空見慣，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會的容許，只有最驕傲和最獨立的人才能免俗。俾斯麥早在19世紀50年代就發現，即便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新富貴族中的翹楚也渴求勛章。這種欲望從未減弱。在俾斯麥檔案收錄的布萊希羅德文件中，有兩封來自法蘭克福分支當家人卡爾·邁耶爾·馮·羅斯柴爾德致俾斯麥的書信（日期為1863年11月和12月），請求得到國王封賞。第一封信的開頭表示：“閣下清楚我對您久經考驗的無限忠誠，知道我總是如何致力于普魯士的利益，盡管我長期以來的重要服務完全沒有以任何引人矚目的方式得到認可。”然后，他又回憶起為了支持在法蘭克福很不受歡迎的法普貿易協定，他如何投入全部“力量和經歷，并動用［他］廣泛的影響力”。他還羅列自己的其他努力：“現在我向您求助，我完全相信閣下是一位高貴、大度和無所不能的代表，也不懷疑如果您公正評價所了解的事實，閣下將對我心生好感，授予我高貴的紀念品作為無上的認可……沒有人更值得接受這樣的榮耀，并對此更加感激涕零”，因為他對普魯士始終懷有無法超越的忠誠。幾周后，卡爾·邁耶爾又在新年之際表達自己的愿望：“愿上帝永遠庇佑閣下，愿您家人的每天都享受到最大的快樂和無限的好運，愿我總能有幸受到閣下的青睞和恩庇，躋身您最忠誠的崇拜者和仆從行列。”未來的授勛典禮將是國王授予他榮譽的合適時機，“我如此看重這榮譽，認為它完全物有所值”。他提到自己最近的貢獻，請求授予他更高級的勛章，能夠配得上德意志邦聯內外的其他所有君主給予他的榮耀 [[80]](#80_2)  。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世界性的力量和受到普遍承認的王朝，許多君主都對他們加以封賞。但他們仍然小心翼翼地請求下一枚最高等級的獎章 [9](#9_9)  。相比之下，布萊希羅德只是暴發戶。求封者私下請賞，在公開場合則常常否認對這些東西感興趣。即使在奴性的社會中，卑躬屈膝也被認為是缺陷。

財富、大銀行、與俾斯麥的親密關系、頭銜和獎章—這些都為布萊希羅德進入普魯士社交界打開大門。他的外表配得上他新獲得的地位，可謂相貌堂堂。他身材高大，長著碩大的腦袋和睿智而開朗的面龐，身材壯碩但不臃腫。他的衣著和舉止完全符合保守標準，他的觀點當然同樣如此。他的外貌散發著正氣。他的談吐缺乏幽默和火花，但體現受所有同時代人尊敬的智慧。他的發言辭藻華麗，還不時使用警句。他的詆毀者們只看到和聽到自己希望看到和聽到的，他們聲稱他長著猶太人的面相，堅稱他會暴露德國猶太人的口音，哼哼唧唧地混雜著意第緒語。但事實上，他似乎完全沒有通常所謂的“猶太人特征”；興奮的時候，他可能會流露出年輕時的表情，但總體上他的儀表莊重得體。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他的視力逐漸衰退直至最終失明，但并未因此退出社交舞臺。

19世紀60年代末，他已經建立起客戶和朋友的網絡；他向他們提供物質好處，他們則常常按照更古老社會的貨幣制度報答他：接受他的邀請，回請他，鼓勵其他人拜訪銀行家的府上，接受一位猶太人的熱情款待。

舉幾個例子就夠了。顯然，俾斯麥的隨從們不得不尊重布萊希羅德。一些人很樂意這樣做，并從中得利，比如羅伯特·馮·科伊德爾。另一些人則不太情愿 [10](#10_9)  。但布萊希羅德的人脈無處不在，甚至包括俾斯麥敵人的陣營。比如，從1868年到1876年，布萊希羅德將自家的一個房間租給與俾斯麥關系平平的王太子內廷總管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Count August Eulenburg） [[81]](#81_2)  。后來，奧伊倫堡成了他的朋友和客戶。在普魯士宮廷，俾斯麥最害怕奧古斯塔王后（Queen Augusta），但布萊希羅德與她的宮廷總管內塞羅德伯爵（Count Nesselrode）關系密切，而俾斯麥則非常討厭此人 [[82]](#82_2)  。1867年，內塞羅德以5%的利息借了5萬塔勒，為期三個月。一年前，在奧普戰爭期間，他曾告訴布萊希羅德，“在皆大歡喜中”，王后已經提名他加入某個戰爭慈善機構的董事會。后來，他又向布萊希羅德提供其他密報。比如，1867年5月，他在信中表示，剛剛抵達柏林的普魯士駐巴黎軍事專員洛埃男爵（Baron Loë）可能散布“關于法國軍備的惡意謠言”，因為“我認為他似乎急著想要開戰”。內塞羅德要求獲得相關消息，以便阻止這個陰謀。書信的其他部分談到他的投資。1867年7月，他從溫莎堡（Windsor Castle）來信，再次談到自己的投資，并表示：“這里的人相信和平將會延續，盡管我認為當地的國內形勢非常嚴峻，因為社會和工人問題必將導致嚴重沖突。”三天后，他報告說，法德關系似乎已經惡化，一些英國人認為應該利用普魯士擊針槍對夏斯波步槍的優勢 [11](#11_9)  ：“請您自行判斷在當前形勢下是否應該賣掉我的股份。”他還指出，一些英國人害怕本國發生革命 [[83]](#83_2)  。我們不知道布萊希羅德是否同樣悲觀，但內塞羅德來信時，布萊希羅德正出于政治原因要求俾斯麥賣掉證券。此外，內塞羅德的信清楚地證明，普魯士宮廷成員覺得利用政治信息滿足個人財務的目的無可厚非，他們同樣認為戰爭可能導致市場蕭條。

另一些高管則用秘密信息回報布萊希羅德的個人友善，這些信息對他的商業利益有直接幫助。這在帝國時期成了慣例，但甚至在此之前布萊希羅德就有自己的特殊線人。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是A.馮·勃蘭特少校 [12](#12_9)  ，據瓦德西伯爵 [13](#13_9)  回憶說，此人“樂天而隨和”，因此顯然特別需要布萊希羅德的幫助 [[84]](#84_2)  。勃蘭特稱他為“我尊敬的朋友”，非常詳細地在信中描繪政府即將在柏林房地產市場采取的行動。勃蘭特寫道：“我確信可以隨時獲得信息。只要在恰當的時候向我提出具體問題即可。” [[85]](#85_2)

布萊希羅德還與自由派議員們保持著關系。他與拉斯克建立友誼，這位小個子的猶太議員憑借智慧、勤奮和口才在德國政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克尼格雷茨戰役結束后的十年間，他和民族自由黨的同僚們先后幫助俾斯麥建立北德邦聯和德意志帝國。布萊希羅德和拉斯克相互以朋友相稱，柏林的傳言顯然認為兩人有密切的商業關系。1869年12月，拉斯克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談到這些傳言，他表示：“據說因為我也不知道的服務，我每年從你那里得到數以千計的錢，據說我還特別關心你的財務運作……我一直將我們的關系看作完全私人的，并總是以個人友誼的紐帶為榮。”他愿意繼續在純粹的私人問題上提供建議，但希望避免任何可能暗示“與［我的］議會活動有關的偏袒”。與布萊希羅德的某些保守派客戶相比（包括俾斯麥在內），看上去拉斯克更加小心，堅持區分公職和私利。幾周后，布萊希羅德向拉斯克提供一個收入豐厚的職位。拉斯克顯然曾對其有意，但這次他婉拒了：“這樣的職位將限制我的自由，而完全不受限的自由是我的生命。” [[86]](#86_2)  拉斯克的拒絕讓布萊希羅德避免潛在的尷尬，因為幾年后，俾斯麥將如此痛恨拉斯克，以至于兩人間的任何親密聯系都會危及布萊希羅德與首相的關系。

19世紀60年代中期，布萊希羅德已經與某些國外的普魯士外交官相當熟悉。其中一位重要的關系人是普魯士駐伯爾尼大使馮·羅德（von Röder），此人是科伊德爾的朋友，在某種程度上布萊希羅德還是他的恩人。1867年5月，羅德從伯爾尼寫信給布萊希羅德：

尊敬的朋友，您總是如此對待我和我的家人，直到現在我才有機會全心全意地感謝您在我們停留柏林期間所展現的全部善意、恩情和真正的同情。我希望您足夠了解我們……知道我經常想起您和您在黑暗的日子里出于友誼而鼓勵我的同情話語。愿上帝為此祝福您，就像我感謝您那樣。

我們不清楚羅德遇到什么困難，但顯然布萊希羅德幫助了他，并成為他的朋友。這封信暗示布萊希羅德的另一面：對于需要他幫助的中等地位的人，他可以非常熱心，幾乎稱得上慈愛。1870年，布萊希羅德做出更加親密和切實的舉動，他主動向羅德提供幫助，承諾雇用他的兒子，后者剛剛畢業而且運氣不佳，顯然遭遇了當時年輕貴族的某種職業危機 [[87]](#87_2)  。

最初，布萊希羅德的回報是羅德的感激。但從1868年開始，羅德開始積極參與圣哥達隧道建設的相關談判。1870年，羅德語帶雙關地表示“我們正像圣哥達般勇往直前”（Wir gehen Gotthardlich hier wacker vorwärts），布萊希羅德無疑很歡迎這條消息 [[88]](#88_2)  。受到布萊希羅德恩惠的人常常出現在有用的地方和重要的崗位。

對奧戰爭和對法戰爭之間的那些年里，布萊希羅德的家已經有外國外交官光顧，和銀行家一樣，他們也需要“了解情況”。但與銀行家不同，他們是引領潮流的貴族和社會名人 [[89]](#89_2)  。他們讓布萊希羅德獲得更多尊重。

柏林外交界將布萊希羅德視為重要線人，因為他能夠見到俾斯麥。由于俾斯麥有很多個月不在柏林，外交官們非常渴望獲得消息。比如，1868年10月，布萊希羅德前往伐爾岑拜訪俾斯麥，并馬上把簡要情況告訴外國朋友們。奧地利大使維姆普芬伯爵（Count Wimpffen）向本國政府全面匯報布萊希羅德對首相健康和傾向的印象 [[90]](#90_2)  。布萊希羅德還通知法國軍事專員德·斯托費爾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e Stoffel）—此人憑借智慧和魅力在俾斯麥家中和柏林社交界贏得獨一無二的位置，他是布萊希羅德的客戶和債務人，后者體貼地不提醒他償還所欠貸款。斯托費爾將布萊希羅德的情報轉交給朋友—路易·拿破侖三世的秘書弗朗切絲基尼·皮埃特里（Franceschini Pietri）。他首先描繪布萊希羅德的情況：

他是柏林的一位重要銀行家、羅斯柴爾德的聯系人和俾斯麥的親信商人。他出身低微，憑借毅力和務實感贏得可觀的地位。他是俾斯麥唯一親密接見和愿意共同進餐的猶太人。他雇傭布萊希羅德搜集消息，還委派給他一些秘密任務之類的事。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百年間的歷屆普魯士政府幾乎都雇傭猶太人（早在西哀士 [14](#14_9)  的時代就這樣）作為某種程度上的秘密工具。布萊希羅德不是陰謀家，他希望扮演自己的角色和繼承前輩們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猶太人埃弗萊姆 [15](#15_9)  。我還要指出，他是一位舉止友善的紳士，我和他長期保持著熱誠的關系。 [[91]](#91_2)

擁有最高層次的朋友、財富和影響力還不夠，布萊希羅德必須公開展示自己的社會地位。世界必須知道布萊希羅德已經到來 [16](#16_9)  。這樣的野心并非首創：不是有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光輝先例嗎？整個世界都驚嘆于羅斯柴爾德家宴的優雅和奢華，王室和貴族與富人和才俊比肩而坐，舊世界歡快地與新世界相會，也許還別有目的 [[92]](#92_2)  。吸引名流并奢華地招待他們是富人的夢想。布萊希羅德開始實現那個夢想。他的崛起并不快，而且爬得越高就越不穩當。他周圍從不缺少對他的過失喋喋不休的毒舌。

困難首先來自家中。他的妻子既不漂亮也不聰慧，也不像蓋爾森那么習慣于上流社會。猶太人身份使他們更容易受到社交界輕視，讓他們更加不安，盡管19世紀60年代相對波瀾不驚，老式的反猶主義偏見正在式微，而新的反猶主義理念尚未成型。在這個風平浪靜的年代，布萊希羅德和其他一些信仰猶太教的銀行家共同踏入柏林社交界。

布萊希羅德利用所有對手都不具備的獨特優勢。作為俾斯麥的親信，培養和他的關系特別有價值。畢竟，正常的社交生活不是為了找樂子或灑脫的閑談，而是情報網絡的關鍵一部分，暗地里還是某些種類任命的交易場所。

1868年1月，布萊希羅德夫婦打響在社交界的第一槍：他們為俾斯麥和柏林最重要的外交官舉辦正式午宴。俾斯麥很少前往私宅，約翰娜通常婉拒邀請。宴會開始前是復雜的協商，僅座位排列就是一個大問題。科伊德爾建議布萊希羅德把首相安排在所有大使之下，旁邊是維姆普芬伯爵夫人 [[93]](#93_2)  。貝內德蒂夫婦和意大利大使勞納伊伯爵（Count Launay）也參加宴會。這是一次歡樂的活動，很好地反映了布萊希羅德在國內外的地位。難怪，外交界更加關注布萊希羅德。難怪俾斯麥的部長們（如奧伊倫堡伯爵）也反過來邀請布萊希羅德赴宴 [[94]](#94_2)  。

午宴需要大量幕后幫助。這些運作的記錄正好被保留下來，向我們呈現了布萊希羅德的社交網絡。稱布萊希羅德為“我最尊敬的朋友”的科伊德爾是籌備者。因為一副新的野外雙筒望遠鏡和被羅斯柴爾德邀請參觀里昂鐵路，科伊德爾在芒通（Menton）的假日變得更加愜意，兩者都來自布萊希羅德的安排 [[95]](#95_1)  。對于禮儀問題，科伊德爾需要王室司儀馮·羅德的幫助，后者正好是布萊希羅德的朋友—普魯士駐伯爾尼大使的哥哥。這仍是一個很小的世界—社會頂峰就是宮廷。

布萊希羅德的社交生涯繼續快速發展著，有人稱贊，有人恐懼，但從未被默默接受。布萊希羅德對“正確”的采購毫不吝嗇。1868年，他以150金路易的價格從布倫瑞克公爵種馬場購買兩匹拉車的馬 [[96]](#96_1)  。1870年2月，符騰堡首相法恩布勒（Varnbüler）非常聰明的女兒—也是該國駐柏林大使之妻—馮·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Baroness von Spitzemberg）在日記中記錄到：

在銀行家布萊希羅德舉辦的舞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夫婦倆。舞會在他們位于貝倫街的裝修氣派的新宅[她指的肯定是剛剛翻新]舉行，受邀者幾乎都來自社會頂層，連他們自己的親屬都被排除在外，這真是糟透了。黃白色的長方形舞廳是跳舞的好地方，各扇門通向沙龍和一條偽裝成冬景花園的走廊。大批又大又美的花束，沙龍舞中的其他驚喜，再加上奢華的晚宴共同造就一場最歡樂的盛宴，人們興致高昂地一直跳到凌晨三點。 [[97]](#97_1)

到了帝國時期，布萊希羅德的舞會將變得更加奢華和排外，但舞會上的主人是否感到自在呢？

[1.](#1_10) 俾斯麥于1871年獲得“親王”（prince）世襲頭街，現任親王為其長曾孫斐迪南（Ferdinand von Bismarck），自1975年繼承此頭街。——編注

[2.](#2_10) 六年后，布萊希羅德送給俾斯麥幾桶蒂弗利啤酒，希望它們不會“回味不佳”（Beigeschmack）。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8年10月12日，SA。

[3.](#3_10) 奇怪的是，《俾斯麥全集》的編者將這封信的日期標為“伐爾岑，1867年6月6日”。當天，俾斯麥正在巴黎參觀世界博覽會。根據7月4日布萊希羅德的來信、7月8日戴程德給俾斯麥的回信以及7月11日俾斯麥給戴程德的另一封信，似乎幾乎可以確定，俾斯麥這封信的日期應該是7月6日，當時他在伐爾岑。《俾斯麥全集》，第XIV2卷，第725—726、730—731頁。

[4.](#4_10) 恩斯特·馮·贊夫特—皮爾薩赫（Ernst von Senfft-Pilsach，1795—1882），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總督，《十字報》的創始人之一。——譯注

[5.](#5_10) 俾斯麥的家人本能地察覺到他病痛的源頭。在一封寫給俾斯麥的半私人半公事的信中（因此最終落到布萊希羅德手里），約翰娜的堂弟伯恩哈德恭喜他健康好轉，并表示：“上帝保佑，但愿你回到柏林后還能保持這種狀態。那時你將置身于對國事的操勞中，夸夸其談的議員們將想方設法地激怒你。如果我是你，我干脆就讓他們喋喋不休，用鄙視懲罰他們。”俾斯麥試圖那樣做，但他對大部分反對派的強烈怒火也懲罰了自己。伯恩哈德·馮·普特卡默致俾斯麥，1868年11月25日，BA。

[6.](#6_10) 為了說服蓋爾森繼續這種關系，尤里烏斯寫道：“我們如此深愛的父親死后，我倆有了各自的活動范圍。我不敢說，仁慈的父親在晚年是否有意把我們分開，讓你獨自代理布萊希羅德銀行的業務，從而在財務和社會地位上也把我們分開。無論如何，我相信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找到了讓自己滿意的方式，我希望無論未來發生什么，我們親愛和可敬的先父都能滿意地垂視他的兩個兒子。”尤里烏斯致蓋爾森·布萊希羅德，1869年11月29日，BA。

[7.](#7_10) 指新聞媒體。托馬斯·卡萊爾在《論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援引埃德蒙·柏克的話說：“議會中有三個等級（教士、貴族和平民），但在那邊的記者席上坐著比他們重要得多的第四等級。”——譯注

[8.](#8_10) 1865年秋，作為勞恩堡交易的轉賬代理人，他請戈德施密特為自己謀求奧地利勛章。戈德施密特告誡他不要得寸進尺：“請允許我真心誠意地告訴你，勞恩堡交易完全不夠申請勛章。”安塞爾姆男爵不推薦這樣做，但布萊希羅德可以嘗試通過肖泰克伯爵或俾斯麥達到目的。戈德施密特表示，他本人“無意追求頭銜或勛章”，布萊希羅德不必代表自己向普魯士政府申請勛章，而是應該為他的兒子謀求駐巴黎領事的任命。最終，戈德施密特的兒子成了駐巴黎領事，布萊希羅德則在1872年獲得奧地利勛章。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9月25日，BA。

[9.](#9_8) 但他們對此并不總是滿意。1861年，雅姆斯男爵獲得一枚普魯士勛章；他對布萊希羅德的祝賀表示感謝，但表示：“不過，我請你務必答應，不要在報紙上過多提到我作為猶太人獲得勛章，因為那會引發對猶太人的口誅筆伐，有害而無益。”雅姆斯男爵致布萊希羅德，1861年11月19日，BA。

[10.](#10_8) 1866年4月，普魯士駐圣彼得堡軍事專員和威廉的特別副官洛塔爾·馮·施魏因尼茨（Lothar von Schweinitz）帶著亞歷山大二世的急信返回柏林，希望阻止奧普戰爭。他首先覲見威廉，然后去找俾斯麥：“當我來到威廉街時，我首先只找到科伊德爾和與他在一起的布萊希羅德先生，這一幕令我覺得怪異而失禮。當時，布萊希羅德占據著俾斯麥親信的位置，盡管俾斯麥后來曾告訴我：‘我和他的想法從不相同。’”《馮·施魏因尼茨將軍公使生涯回憶錄》（柏林，1927年），第一卷，第202頁［Denkwürdigkeiten des Botschafters General von Schweinitz（Berlin，1927），I，202］。

[11.](#11_8) 實際上，法軍在普法戰爭中使用的夏斯波步槍大大優于普軍的德萊賽擊針槍，射程幾乎是后者的兩倍。——譯注

[12.](#12_8) 馬克西米利安·奧古斯特·斯基皮奧·馮·勃蘭特（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德國外交家。——譯注

[13.](#13_8) 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國元帥，八國聯軍總司令。——譯注

[14.](#14_8) 埃馬紐埃爾—約瑟夫·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1748—1836），法國天主教會神父，大革命時期的理論家和活動家。——譯注

[15.](#15_8) 法伊特爾·海涅·埃弗萊姆（Veitel Heine Ephraim，1703—1775），腓特烈二世的宮廷銀行家和鑄幣主管。為了幫助七年戰爭籌款，他主持鑄造不足額的貨幣。——譯注

[16.](#16_8) 布萊希羅德的發跡史可以寫成小說，此類主題司空見慣。安東尼·特羅洛普的《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首版于1874—1875年）描繪了奧古斯都·梅爾莫特（Augustus Melmotte），他來自外國（還是猶太人），擁有數不清的財富（“……錢就是梅爾莫特鼻孔里的氣息，因此他的氣息都要錢”），甚至最高層的人物也想聽命于他—直到他被發現是個破產的騙子。但梅爾莫特發跡的復雜過程和各個階段讓人想起布萊希羅德的奮斗—波莫娜夫人（Lady Pomona）說，“人們對他趨之若鶩”，并列舉變成傀儡的各位權貴。正如特羅洛普所說：“誠然，這一切都是跳躍式獲得的，所以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常常不知道那位偉人現在正站在哪處窗臺上……那位偉人也經常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但大部分世人知道，世人崇拜梅爾莫特先生。”（倫敦，1969年）第295、190、299—300頁。

## 第六章　第三場戰爭

人們終將認識到，這三場[戰爭]在多大程度上歸咎于國內政治的原因。全世界都相信只有路易·拿破侖會出于國內原因而發動戰爭，七年以來，人們一直享受和利用這個巨大便利。純粹從自保的視角出發，發動這三場戰爭正當其時。

——雅各布·布克哈特，1871年10月12日

北德邦聯是通向德國統一道路上的中轉站。在不冒險與法國開戰的情況下，這是俾斯麥在1866年所能做到的極限。但將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三個南德邦國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大廈略顯缺憾。1866年被得意洋洋地引入中歐的民族主義原則強烈要求建立更廣泛的聯盟，建國邏輯和經濟利益的力量同樣指向更大的德意志國家。俾斯麥始終明白—并在1864年和1866年有了重新體驗—沒有什么能比對外戰爭的火焰更快地締造團結的紐帶。拿破侖三世在之前的兩場戰爭中為他做了很多，超過他曾經的期待；現在，法國已經堵住北德進一步擴張的任何可能。拿破侖能幫的忙只剩下一個：在對俾斯麥有利的時機扮演（外交上被孤立的）入侵者，成為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對象。

這一切的發生既無時間表也不確定。但在19世紀60年代末，歐洲彌漫著對戰爭的預期，各方面的軍事準備讓戰爭的前兆變得更加緊迫。歐洲人知道，俾斯麥已經發動和贏下兩場戰爭，并在此過程中確立普魯士在北德的霸權。有理由擔心，在正確的時間他可能發動另一場戰爭，以便把整個德意志統一在普魯士的權杖下。反過來，拿破侖可能會試圖恢復在國內遭到重創的威望，重塑法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法國的盟友可能是奧地利，后者總是被懷疑心懷復仇之念。

俾斯麥樂意等待，1867年，他否決了毛奇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愿望。不過，很少有人懷疑，為了完成德國的統一和建立歐洲新秩序，他同樣認為普法必將在某個時間開戰。但他并不著急，而是希望鞏固之前的戰果，并確信時間對己方有利。因此他竭力對歐洲保證，自己向往和期待和平。

布萊希羅德在這點上又一次幫助他，并采用多種方式。布萊希羅德本人和整個銀行業的利益傾向和平。但當戰爭真的來臨時，他表現得極為隨機應變而且特別愛國。

在和平年代，布萊希羅德的活動和廣泛的通信反映了國際局勢的不確定。他的書信折射出德國人普遍推崇“外交優先”（Primat der Aussenpolitik），對于同外部世界保持商業關系的他來說，這顯得理所應當。不過，當新的北德邦聯真正的制度正在被確立時，他對外部事務的關心默示德國人同樣普遍輕視國內政治。政治現實、金錢私利和某種虛榮心讓布萊希羅德開始培養與“大政治”（Grosse Politik）的關系。

第一場重大危機的導火索是盧森堡的未來—這個小公國由奧蘭治家族（House of Orange）統治，由普魯士軍隊駐守。普奧戰爭期間和結束后不久，先后遭到俾斯麥誘惑和拒絕的拿破侖曾希望為法國贏得某些補償。但當和平恢復，當普魯士吞下勝利果實后，俾斯麥馬上對拿破侖的提醒置之不理，無視對于1814年邊界乃至吞并比利時的模糊暗示。惱羞成怒的法國人決定解決盧森堡問題。俾斯麥拐彎抹角地表示鼓勵，但假裝在國內遭到阻力。布萊希羅德心知肚明，1867年3月，他在危機處于最高峰時致信雅姆斯男爵：“這里的上層圈子對交出盧森堡一事裝聾作啞。” [[1]](#1_48)  這條信息一定是為拿破侖準備的，后者一定疑惑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中誰才是柏林更好的消息來源。幾周后，布萊希羅德收到來自巴黎的消息，那里的所有人都認為俾斯麥將發動另一場戰爭。來信人還表示，法國人試圖讓戰爭延后，因為他們的新槍還沒有準備好 [1](#1_13)   [[2]](#2_48)  。

維也納的戈德施密特也警告不要發動另一場戰爭；4月末，他報告說，俾斯麥接受召開國際會議來解決盧森堡問題，這讓奧地利人感到高興 [[3]](#3_46)  。作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德意志事務文書和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埃米爾·布蘭代（Emil Brandeis）從巴黎發來警告：法國人正如火如荼地重整軍備和進行巨額軍購。他認為，一切取決于5月7日將在倫敦召開的會議 [[4]](#4_46)  。當天，科伊德爾交給布萊希羅德一張秘密字條，要求他讀完馬上毀掉。這次會議“肯定有望”帶來和平，但“［普魯士］加強軍備有戰爭傾向的假設讓俾斯麥受傷”，軍隊僅僅是恢復正常的力量 [[5]](#5_46)  。會議批準事先做出的決定：盧森堡將繼續由奧蘭治家族統治，但不會有普魯士駐軍。當俾斯麥的其他承諾落空后，拿破侖一無所得，他連這個寄托最后希望的安慰獎也沒得到。5月末，布蘭代寫道：“公眾對法國遭到的羞辱非常惱火……很快將尋求復仇，時間是今年秋天或最晚明年初。” [[6]](#6_44)

同樣在1867年夏天，布萊希羅德從馬林巴德（Marienbad）給俾斯麥發來對國際局勢的長篇盤點。他強調拿破侖在國內地位的動搖，收成欠佳的預期令其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奧地利政府處在大破產的前夜……延緩破產的唯一方法是讓奧地利暫時降格為小國，但人們普遍相信這不可能。有人傾向于求助印鈔機，但那樣做隱含著更大危險……鑒于這些悲觀的前景，難道他們不會冒險團結法國，與普魯士殊死一搏？難道在國內焦頭爛額的拿破侖不會張開雙臂歡迎這位盟友嗎？

布萊希羅德在信的最后哀嘆道：“歐洲股市被普遍不信任的陰影籠罩，我擔心貿易和工業將長期受此影響。” [[7]](#7_44)  今天的歷史學家常把國內動蕩和對外黷武的密切關系看作新發現，但對布萊希羅德和他的朋友們來說這司空見慣。深受布萊希羅德信任的助手弗里德里希·萊曼（Friedrich Lehmann）表達類似的擔憂，并警告說：“因此，我只把目前的上漲看作清倉良機，而不是投入更多［資金］的保證。” [[8]](#8_44)

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所做的快速盤點基本正確。作為俾斯麥在1867年和1869—1870年兩次成功的受害者，奧地利和法國似乎接近結盟，空氣中充滿時斷時續的恐懼。布萊希羅德還正確地指出，經濟氣候將受到影響，因為市場和人一樣厭惡不確定性。

1868年10月，布萊希羅德試圖說服俾斯麥做出和平姿態—即使沒有這樣的姿態，他也向外國外交官保證俾斯麥具有和平意圖。從巴黎回來后，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在當年保持和平的前景很好，但法國仍然群情激奮，因此“如果我們很快解決北石勒蘇益格問題，更持久的和平將指日可待” [[9]](#9_42)  。德國人曾同意法國人的要求，丹麥與石勒蘇益格的最終邊界將由全民公投決定，現在法國人希望德國人遵守和約中的該條款。俾斯麥無意接受這個帶有民主意味的要求，而布萊希羅德反復提醒說法國人很看重這點，他對此一定煩惱不已。

幾周后，布萊希羅德造訪伐爾岑，此行受到很多關注。俾斯麥極力強調自己的和平意圖，即使其中不包括石勒蘇益格的公投。奧地利駐柏林大使曾向維也納報告說：

在伐爾岑與俾斯麥伯爵一起度過幾天后，布萊希羅德先生昨晚偷偷告訴我，首相非常看重和平，并相信能把和平維持下去。[但]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的健康一點也不滿意，特別是因為他的神經非常敏感。他相信，首相對和平的極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疾病造成的心理影響來解釋，比如，這完全是出于個人靜養的需要。 [[10]](#10_41)

通過法軍駐柏林專員斯托費爾，拿破侖收到同樣的消息：布萊希羅德為斯托費爾帶來秘密消息，表示俾斯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向往和平，普魯士目前滿足于北德邦聯，德國的統一遲早會水到渠成，無須特別推動。報告繼續說，俾斯麥正尋求重建法普兩國間最充分信任的方法，認為威廉與拿破侖的會晤可能會有助于這個目的，并“讓歐洲人安心，結束當下令人苦惱的商業停滯”。斯托費爾無法確定，這條消息究竟代表俾斯麥的真實心聲，還是“他的猶太人被對政治角色的熱情沖昏了頭腦” [[11]](#11_41)  。

三年后，斯托費爾的信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被刊發—這讓布萊希羅德陷入尷尬，讓他的敵人幸災樂禍 [[12]](#12_39)  。這封信的實質是什么？顯然，從伐爾岑回來后，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的和平愿望印象深刻，這迎合他本人的利益，即恢復和平，讓生意重新興隆起來。俾斯麥“命令”他與維姆普芬和斯托費爾談話了嗎？或者只是寄希望于通過布萊希羅德有分寸的泄密將消息傳遞給合適的人—由于來自私人渠道，消息可能會更顯權威？俾斯麥無疑知道，自己與布萊希羅德的親密關系將引起外交反響，也沒有證據表明他介意布萊希羅德的國外關系—事實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對布萊希羅德而言，扮演這種特別信使的機會無比寶貴。

也許不只消息，布萊希羅德在金融市場上的舉動也被人仔細琢磨。1869年3月，他選擇做空。奧地利駐柏林代辦明希抱怨說：“首先在市場上拋售股票的是布萊希羅德銀行。眾所周知，該行行長與俾斯麥伯爵關系很好。”布萊希羅德向明希承認，他在突然拋售之前和之后見過俾斯麥，首相兩次都在他面前“對世界和平信誓旦旦”。但來自倫敦和巴黎的報告令人不安。明希認為，政府與此事無關：“《十字報》上一篇顯然是半官方的文章譴責了這種做空行為。”但令他失望的是，布萊希羅德賣掉的主要是奧地利股票；價格的突然下跌將“對我國的經濟形勢產生很嚴重的影響”。他還警告說，此類投機下次可能被用于政治目的 [[13]](#13_35)  。也許布萊希羅德想要暴露奧地利的虛弱，以此作為有說服力的證據，阻撓一再被提及的法奧同盟陰謀。

但1869年在許多方面都是多事之秋。就像德國歷史上常常發生的那樣，不切實際的樂觀讓位于極度的悲觀。由于地方主義在南德的回潮以及各地民主派對普魯士容克統治的持續敵意，1866年對完成德國統一大業的熱望遭受打擊。1868年的關稅同盟議會選舉對民族理想是個災難，而一年后的巴伐利亞選舉則證明反普魯士情感的力量 [[14]](#14_35)  。這些挫折都可能損害俾斯麥的地位。1871年，他不得不向北德國民議會提交新的軍隊預算，即使在普魯士，失望之情也可能產生令人不安的影響。

布萊希羅德還略微牽涉進一次試圖恢復德意志動力的有爭議行動。1869年10月，愛德華·拉斯克計劃在議會提出讓巴登提前加入北德邦聯的計劃，巴登是最支持普魯士的南德邦國。他請求布萊希羅德征詢俾斯麥的觀點，布萊希羅德將此事委托給正要前往伐爾岑的科伊德爾。就像科伊德爾告訴法國專員勒費弗爾·德·貝埃納的那樣，俾斯麥明白無誤地表示反對：“巴登問題免談。北德邦聯的內部事務已經夠多，我們對巴登或其他南德邦國的加入不感興趣，更別說計劃這樣做了。” [[15]](#15_33)  1870年2月，拉斯克發起關于巴登加入邦聯的質詢，俾斯麥的回應非常激烈：他怒斥拉斯克干涉外交，并對巴登政府惡語相向，仿佛它與拉斯克勾結。他的暴怒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不愿讓議會介入自己專有的對外政策領域 [[16]](#16_33)  。早前的德國歷史學家常常把俾斯麥的拒絕作為他本質上向往和平的證明。不過，他有充足的理由避免利用這次機會打破僵局：巴登的加入將會疏遠巴伐利亞，而違反《布拉格條約》則將導致整個歐洲聯合起來與普魯士為敵。最重要的是，俾斯麥知道，有用的戰爭必須看上去像是防御性的；如果要開戰，必須挑動普魯士的敵人打響第一槍。巴登并非有利的時機 [[17]](#17_27)  。

從1870年1月開始，首相就秘密謀求讓普魯士國王稱帝，這反映出他擔心自己的機器熄火太久。5月，奧地利大使報告說，由于南德的反對，俾斯麥的帝制計劃已經被擱置。但他又表示：“我不排除意外的可能，首相的政策中肯定會有出人意料之舉。” [[18]](#18_27)

歐洲的和平的確即將被俾斯麥的一次出人意料之舉打破。緊張的氣氛已經醞釀一段時間，科伊德爾告訴俾斯麥，國際商界對不確定感到厭倦。俾斯麥回答說：“布萊希羅德不久前甚至［已經］請求他發動戰爭，以便讓形勢明朗化。不過，這種觀點應該被譴責……沒有人能夠承擔挑起這樣一場沖突的責任，它可能只是一系列種族戰爭的開始。” [[19]](#19_23)  布萊希羅德此舉似乎不太符合他的性格，而且我們的證據只有俾斯麥的話。也許布萊希羅德只是說，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么越早打完越好。但與此同時，俾斯麥警告他的駐巴黎大使，如果德意志民族的發展需要徹底變革，那么它就不能受制于現狀。如果這樣的話，“外國干涉對我們將是不可接受的”。為了不阻礙民族意志，哪怕冒戰爭之險也在所不惜 [[20]](#20_23)  。

1869—1870年冬天，俾斯麥對德意志政治的舉步不前憂心忡忡。他在尋找危機—無論通過戰爭或者外交，危機的解決將為普魯士贏得又一場勝利。西班牙提供了可趁之機。在1868年的革命中，伊莎貝拉女王（Queen Isabella）被推翻 [2](#2_13)  ，西班牙國會難以找到繼承人：這個王位的威名更多來自昔日的榮耀，而非當下的權力和穩定。對法國人來說，王位空缺總是令人難堪。拿破侖一邊推行帝國的自由化，一邊努力保持自己的權威，無法承受外交上的又一次挫折。他沒有自己的人選，但共和派或奧爾良派（Orleanist） [3](#3_13)  上臺對他將是災難 [[21]](#21_23)  。西班牙國會的人選令他更加難以接受：1869年9月，臨時攝政者們選擇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利奧波德（Leopold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他的妻子是葡萄牙國王的妹妹，他的弟弟卡爾（Karl）剛剛成為羅馬尼亞大公 [[22]](#22_23)  。但無論是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還是該家族名義上的族長威廉一世都疑慮重重，利奧波德也知道羅馬尼亞王位給弟弟帶來的麻煩；已經有傳言說他將厭惡地拒絕登基 [[23]](#23_23)  。他們的父親卡爾·安東（Karl Anton）意識到，為窮國提供君主會令家族財富損失慘重 [[24]](#24_21)  。

但西班牙人沒有輕易放棄。1870年2月，他們找到俾斯麥這個強大的盟友。俾斯麥不顧本國君主的愿望，支持西班牙人的選擇—這個事實毫無疑問，但動機仍然存在爭議。根據一位現代歷史學家的說法，俾斯麥“故意制造沖突，意圖挑起戰爭或者引發法國的內部奔潰” [[25]](#25_21)  。也許吧，但我們所能確定的只是他不惜觸怒威廉也要支持該人選，想來是因為這樣做可能傷害法國和讓普魯士受益。但西班牙的水域能夠再次托起德意志這艘船嗎？麻煩在于，柏林和巴黎都從各自嚴峻的國內局勢出發看待西班牙問題。

俾斯麥試圖掩蓋他對該人選的支持，終其一生，他都撒謊否認這點。他的主要助手科伊德爾、布赫爾和赫爾曼·馮·蒂勒在這場危險但秘密的游戲中扮演重要作用。與某些歷史學家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所做的斷言不同，布萊希羅德似乎沒有暗中參與此事 [[26]](#26_19)  。他的朋友勃蘭特少校在春天就向他透露了人選，但布萊希羅德沒有意識到消息的重要性。1870年5月，當勃蘭特突然向他詢問匈牙利兵團的基斯少校在1866年接受大筆普魯士援助的方式時，他也并不擔心。勃蘭特還表示，自己將以“最秘密的身份”前往巴黎 [[27]](#27_15)  。布萊希羅德對普魯士官員間這種密謀式的口吻習以為常 [4](#4_13)  。

6月末，他兩次向阿爾方斯男爵保證，“政治問題上沒有新情況” [[28]](#28_9)  。6月26日，他給俾斯麥寫了一封關于各種金融操作的長信，包括幾天后在巴黎發行新一期的普魯士抵押銀行債券。信的開頭說：“政治領域沒有令人不安的理由。” [[29]](#29_9)  俾斯麥在“沒有”下面畫了線，并在頁邊打上問號。他很清楚，西班牙這顆炸彈隨時可能爆炸。在快速回復中，俾斯麥沒有透露自己的任何疑慮；相反，他寫道：“如果我們能把可觀的法國資本吸引到這個國家，我認為那將是重大成功。這在萊茵河沿岸早已實現，而且頗具規模，令工業企業大為受益。”他感謝布萊希羅德送來的啤酒和香檳，但表示目前的溫泉療養讓自己感到疲勞和睡不著覺，而且暫時強迫戒酒。最后，他提出在結束療養后，希望布萊希羅德來伐爾岑拜訪自己一家 [[30]](#30_5)  。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離西班牙問題激化只有幾天時，俾斯麥如此迫切地想要把法國投資吸引到普魯士。也許他希望讓法國資本流入普魯士，避免其落到法國的潛在盟友手中，比如奧地利；也許他希望把法國資本截留在普魯士，以便爆發戰爭的情況下更容易收繳賠款。無論戰爭或是和平，掌握法國的資本投資對普魯士都是有利的。后來，俾斯麥即使在私下也總是假裝對戰爭的爆發感到完全意外。幾年后，他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表示：“我想向你重申，1870年6月時，天邊仍然全無陰云。” [[31]](#31_5)  但就像頁邊的問號所顯示的，當時他心知肚明。

最晚在7月5日，布萊希羅德開始察覺到戰爭的威脅。他給阿爾方斯男爵寫了一封私信，報告說西班牙人選擇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德國人擔心法國人可能會反對 [[32]](#32_5)  。布萊希羅德一眼就看到威脅，這證實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預測法國人對南方邊界出現霍亨索倫君主的反應既不需要專業知識也無需天才。因此，俾斯麥從2月開始就必定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拿破侖已經將此事告知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后者立即開始發動所有的關系，試圖拯救和平。他們把拿破侖的消息轉達給格萊斯頓 [5](#5_13)  首相，并多次告誡布萊希羅德形勢嚴峻 [[33]](#33_5)  。7月8日，布萊希羅德知會外交部，并直接寫信給俾斯麥：“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寫信給我，仿佛普法之間戰爭已經爆發。”他還援引法國的報告，表示英國、奧地利和意大利都認同法國對西班牙的政策 [[34]](#34_5)  。不過，他在信末的慷慨愛國陳詞可能會讓他的巴黎朋友失望：“這里群情激昂，如果西班牙議會選擇霍亨索倫親王，我懷疑與法國開戰將不可避免，因為沒有人愿意接受法國的條件和做出讓步！” [[35]](#35_5)

法國人的表態同樣充滿民族主義豪言。7月6日，法國外長德·格拉蒙公爵（Duc de Gramont）向普魯士和西班牙提出嚴厲警告，強調法國不會容忍自己的南部邊界上出現敵對君主。甚至在這番言論發表前，柏林市場已經大幅下跌。布萊希羅德在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中表示，股價在6日已經下跌2% [[36]](#36_5)  。對銀行家來說這是段艱難的日子，布萊希羅德試圖尋找權威的行動建議。7月9日，他寫信給消息最靈通的客戶俾斯麥，信中充滿對其物質利益的關心：“我本人不相信政治局勢極其嚴峻［俾斯麥在這個從句邊加了感嘆號］，因此還未出售閣下賬戶上的任何股票。但如果我錯了，如果閣下認為有更多不好的事將發生，那么我恭請您示下只言片語。” [[37]](#37_5)  第二天，“只言片語”以約翰娜從伐爾岑來信的形式送達。信的開頭說：

我先生正忙于加密和解密信件，他請我用這種方式回答你今天的來信：他并不真的相信會有戰爭，因為盡管某些人唯恐天下不亂，但他不認為會有人因為西班牙沒有按照他們的意愿投票就突然襲擊我們。但他覺得，未來的某個時候，相信將要開戰的想法會比現在更強烈。由于他現在畢竟需要錢，最好賣掉他的鐵路股份。但你比我先生更善于判斷股市，也許市場并不像某些外交官那么草木皆兵。不過，就像預測天氣那樣，預測神經緊張的男人或女人所做的政治決定也不可能。 [[38]](#38_5)

普魯士政府沒有也不愿干涉他人事務，但如果法國武裝自己，那么普魯士也將效仿，如果法國發動進攻，那么普魯士將不得不保衛自己。在這封奇怪的周日書信最后，約翰娜提醒布萊希羅德，信是她先生親自口述的—其間不停地被打斷，每次只說幾個詞。事實上，布萊希羅德獲得的消息幾乎與俾斯麥當天發給外交部的加密電報完全一致 [[39]](#39_5)  。

布萊希羅德的信和俾斯麥的回答都很好地體現了他們的性格。獲悉俾斯麥對局勢的估計后，布萊希羅德可以全權處置首相和他自己的資金。第二天（周一），布萊希羅德向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報告說：“所有報價都快速下跌。” [[40]](#40_5)  同一天，他似乎還授意在倫敦的代理人沃爾姆斯（Worms）虧本賣掉自己持有的股票 [[41]](#41_5)  。

在最后的太平日子里，布萊希羅德收到大量消息，他一定就像當時歐洲各國的政府那樣，被局勢的加速發展和混亂搞得暈頭轉向。比如，7月10或11日，他從朋友勃蘭特（現在是總參謀部的陸軍中校，駐扎在比利時）那里收到一張普魯士駐巴黎軍事專員瓦德西伯爵的手寫便條。7月8日，在從埃姆斯（Ems）返回巴黎前幾個小時，瓦德西把便條交給勃蘭特（俾斯麥命令瓦德西回到巴黎，讓他給巴黎大使館那些受驚嚇的普魯士外交官打氣，并仔細監視法軍的動向，特別是在鐵路上） [[42]](#42_5)  。瓦德西告訴勃蘭特，“巴黎仿佛變成了地獄”，他必須趕緊回去：“對我來說，現在要做的就是睜大眼睛。請務必把B和S留給我［可能是勃蘭特手下的特工］。”他還需要確保獲得足夠的資金—勃蘭特能保證這點嗎？“……我不相信會發生戰爭，但［預計］隨后的幾周將非常動蕩。”勃蘭特在這封信的底部留了言，要求布萊希羅德收到信后將其毀掉：他請對方借給自己1萬法郎，將其存入科隆的奧本海姆銀行。勃蘭特告訴布萊希羅德，他已經向長官（毛奇？）和科伊德爾詢問自己是否應該回德國。他還談到瓦德西的信：“你還記得我在幾個月前告訴和提醒過你這個計劃嗎？你和S［施瓦巴赫］當時還不相信。” [[43]](#43_5)  7月12日，威廉的宮廷總管佩彭謝—澤德里米茨基伯爵（Count Perponcher-Sedlimitzky）從埃姆斯致信布萊希羅德：“形勢仍然很嚴峻，還看不到解決辦法。” [[44]](#44_4)

俾斯麥沒有為拯救和平做任何努力。7月10日，他寫道：“從政治上說，法國人的進攻將非常有利于我們的局面。” [[45]](#45_4)  不過，他意識到威廉和利奧波德親王可能會在法國人的壓力下放棄霍亨索倫家族的候選資格，把他的大膽游戲變成一場慘敗。為了避免普魯士遭受羞辱，他再次采取至今仍令人感到高深莫測的行動，并尋求布萊希羅德的幫助 [[46]](#46_4)  。7月12日，他發電報給外交部，表示利奧波德親王可以體面地保住候選資格，但必要條件是：如果法國攻擊德國，西班牙將在未來的對法戰爭中與德國站在一起。外交部（通過布萊希羅德）應該通知媒體，利奧波德已經接受這個條件，并計劃照此行事。布萊希羅德收到了消息，幾家報紙也刊載了這個意圖不明的故事 [[47]](#47_4)  。這是為了震懾法國人，還是為了給利奧波德體面的臺階，讓西班牙來承擔在法國威脅面前退縮的責任？

同年7月12日，威廉命令俾斯麥前往埃姆斯；俾斯麥中途在柏林停留，并馬上召見布萊希羅德。在柏林，俾斯麥獲悉利奧波德放棄了資格，而且威廉已經把該決定告訴法國大使。這與俾斯麥的預期完全相反，震驚之下，他拒絕相信這是真的。但布萊希羅德證實了該消息。俾斯麥的親信聚集在他身邊，包括他的兒子赫伯特（Herbert），還有羅恩和毛奇。根據赫伯特的日記，毛奇氣得滿臉通紅，“因為他白跑了一趟［柏林］，戰爭曾經清晰地呈現在他眼前（den er schon fest ins Auge gefasst hatte），現在卻似乎再次遙不可及……老羅恩也灰心喪氣”。俾斯麥表達了這群人的糟糕情緒：“直到剛才，我還以為自己身處最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夕，但現在我感受到的只是突然中斷溫泉度假的不快。”他用法語對當時正在參軍的赫伯特說：“我要求你努力工作，因為不會有戰場上的晉升機會。”晚上，在官方發布棄權消息的同時，布萊希羅德也被授意散布同樣的信息 [[48]](#48_4)  。

對俾斯麥來說，7月12日是混亂的一天。他時而想要辭職，時而計劃繼續羞辱法國或挑動其開戰。13日，局勢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利奧波德的退出本來可以帶給法國一場相當可觀的外交勝利，但法國人還要求威廉保證未來不再重新提出霍亨索倫家族的候選人，此舉無意中讓俾斯麥有機會把受羞辱的威脅變成再次向法國挑釁，迫使其對普魯士發起進攻。威廉拒絕法國人的要求，俾斯麥對威廉的措詞做了修改，讓它看起來像是在侮辱性地蔑視法國。但僅憑俾斯麥傳說中的電報風格不足以讓他逃離陷阱，這個陷阱本來是他為法國所設，在7月12日和13日卻險些抓住他自己 [[49]](#49_4)  。拿破侖的不自量力將俾斯麥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就像一位研究普法戰爭的最出色的當代歷史學家所說：“在霉運、愚蠢和無知的可悲結合下，法國莽撞地與歐洲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開戰，它動機糟糕，軍隊尚未做好準備，而且沒有盟友。” [[50]](#50_4)

由于擔心任何妥協都將在國內引發波瀾，拿破侖給了俾斯麥他早就覺得必不可少的東西：法國的攻擊將鼓舞德意志民族，團結德意志和加強普魯士的領導權。和德國人一樣，整個世界也把這場戰爭看作法國人的侵略之舉，因此外交前景將對德意志有利。但很少有人認為，結局早已注定。

戰爭的爆發令柏林股市幾乎陷入恐慌。與7月1日相比，科隆—明登鐵路這樣的堅挺股票下跌了近30%，其他股票同樣表現慘淡。政府通過公開認購方式發行1億塔勒債券的努力沒能成功；盡管漢澤曼提出過警告，貸款的條件（票面價格的88折和5%的利率）仍然不夠吸引人。已經上市的其他國有債券售價更低，因此更有優勢。債券沒能實現計劃的認購額。后來，民族主義政論家們攻擊布萊希羅德和其他銀行界缺乏愛國心，把錢投在外國證券上（據說甚至包括法國的），而不是購買新的德國債券。10月末，漢澤曼籌建財團，向柏林和倫敦公眾發售2000萬塔勒債券（漢澤曼的貼現公司包銷430萬，布萊希羅德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各自包銷300萬）。這次發行取得巨大成功—但它經過精心的準備，而且普魯士在之前已經取得大捷 [[51]](#51_4)  。

布萊希羅德討厭戰爭，與同胞相比，他更沒有理由對戰爭的爆發感到興奮。他最親密的海外關系人來自法國，和廣大中歐資產階級一樣（特別是猶太人），他很可能也對法國的東西贊賞有加。但隨著德國人取得大捷，愛國熱情開始高漲。8月13日，奧地利大使維姆普芬伯爵哀嘆柏林陷入“過度的勝利情緒”，讓一切政治理性消失。“在這個自信變得日益引人注目和觸手可及的地方，民族特征今天已經變得如此鮮明，旁觀者很難想象它將進一步提升，更別說忍受它了。” [[52]](#52_4)  在當時和隨后的幾個月里，戈德施密特懇求布萊希羅德提醒普魯士人保持克制，否則奧地利的中立將受到威脅 [[53]](#53_4)  。

9月初，在色當（Sedan）被攻陷和拿破侖投降后，大部分德國人開始覺得勝利是上天的決定，上帝因為邪惡的法國人的罪惡而懲罰他們，終于即將走向統一的德意志民族顯示了無與倫比的道德優越性 [[54]](#54_4)  。布萊希羅德也被這種驕傲所感染，民族主義狂熱有時甚至沖昏他清醒的頭腦。他變得越來越像保守當權派，難怪他開始擁護保守當權派的意識形態。他還對德國的成功頂禮膜拜，猶太人身份也許讓他表現得更為夸張，因為異族必須時時重新證明自己的愛國。戰爭完成了他向民族主義的轉變，特別是因為他從這個新國家的勝利中獲利。

在使許多人遭受痛苦和一無所有的同時，戰爭通常也向少數人提供巨大的機會。被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稱為第一場全面戰爭的普法戰爭也不例外。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人才，有魄力的人可以比在和平時期崛起得更快。布萊希羅德在奧普戰爭中已經顯露身手；在兩場戰爭之間的四年里，他獲得影響力和信任，或者說某種“起飛”點，讓他能夠在這場新的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可以輕松地見到俾斯麥及其手下，輕松地出入威廉國王的宮廷，這為他提供無與倫比的運作基礎。戰爭結束時，他在各個領域都取得巨大的進步。

整個戰爭期間，他的身影無處不在。他慷慨地向權勢人物饋贈禮物，還大方地捐助窮人和喪親者。他扮演某種私人紅十字會的角色，幫助約翰娜·馮·俾斯麥組織戰時慈善活動，并幫助英國大使照顧法國戰俘。普魯士政府的各個部門和其他德意志邦國宮廷也有求于他。整個戰爭期間，俾斯麥和他的高級助手們都在戰場上；布萊希羅德試圖填補柏林的真空，他提供消息和服務，并扮演中間人。盡管戰爭造成通信困難，盡管站在普魯士一邊，但他仍然保持著與國外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聯系。他在普魯士司令部的朋友們充當線人，而他在戰時事業生涯的頂峰是被俾斯麥召到凡爾賽宮。

從戰爭伊始，他就不時承擔最秘密的使命。我們有關于這些任務的暗示，但它們很少被付諸文字。布萊希羅德在奧普戰爭期間就執行過類似的任務，而這場更長的戰爭需求更大，布萊希羅德也已更為知名，他的朋友科伊德爾正是俾斯麥與間諜和其他秘密工作打交道的左右手 [[55]](#55_4)  。布萊希羅德成了向愿意為普魯士效勞的個人和團體轉賬的有用的秘密代理。通過私人渠道匯款顯然是更好的選擇—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類似行為的例子也不少見。布萊希羅德的錢通過公使基金償還，監管該基金的科伊德爾小心地毀掉大部分記錄 [[56]](#56_4)  。布萊希羅德與韋爾夫基金的聯系是他成為合適代理人的另一個理由。

布萊希羅德的使命證明，俾斯麥決心不惜任何手段削弱敵人和限制潛在的敵人，比如奧匈帝國。8月初，布萊希羅德受命向一位匈牙利記者雅各布·科恩（Jacob Cohn）支付3000盾，科恩則向普魯士駐布達佩斯總領事承諾“執行約定的計劃” [[57]](#57_4)  。8月中旬，科伊德爾指示外交部，要求讓布萊希羅德極其秘密地向一位意大利間諜或職業革命者支付10萬法郎，用于展開針對尼斯（1860年被法國從意大利人手中奪走）的行動。外交部最初表示異議，但到了10月，布萊希羅德還是收買了一些可靠的意大利鬧事者，讓他們在尼斯開展反法活動。作為俾斯麥最喜愛的年輕外交官之一，弗里德里希·荷爾斯泰因（Friedrich Holstein）調查了意大利革命者的實力，這為布萊希羅德重新與地下革命世界建立聯系鋪平道路 [[58]](#58_4)  。同樣在8月，普魯士駐倫敦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轉交給外交部一封來自阿爾及爾（Algiers）的信，信的署名只有首字母：一個反對法國統治的委員會已經成立，但需要資金，“好機會，幾乎沒有留下［法國］軍隊。錢！錢！” [[59]](#59_4)  。我們不清楚是否匯了錢，但這個請求和伯恩斯托夫的轉交暗示，人們再次相信，俾斯麥準備引爆敵方陣營所有可能的地雷。無論如何，地雷爆炸了：9月中旬，阿爾及爾爆發起義，法國人沒有足夠的兵力鎮壓 [[60]](#60_4)  。

作為普魯士的代理人，布萊希羅德最重要的戲份包括參與俾斯麥與巴伐利亞復雜的戰時斡旋。巴伐利亞是南德最大的王國，擁有最古老的王朝和最驕傲的國王，如果要讓它同意德國統一，如果要說服路德維希國王同意威廉稱帝，那么俾斯麥必須付出特別努力。俾斯麥認識到，他不僅需要同精于算計的巴伐利亞政府打交道，還要面對當時年僅25歲但神秘、古怪而且已經出現精神失常癥狀的國王。

戰爭伊始，巴伐利亞政府急需要錢，于是授意駐柏林代表佩格勒·馮·佩格拉斯男爵（Baron Pergler von Perglas）詢問俾斯麥，普魯士是否能秘密借款300萬盾（170萬塔勒），用于幫助巴伐利亞動員軍隊。佩格拉斯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巴伐利亞首相的朋友，對普魯士心存疑慮。7月29日上午9點，慕尼黑以最急迫的措詞重申命令，但佩格拉斯覺得當時不可能拜見俾斯麥：“上午9點我應該無法見到俾斯麥伯爵，他熬夜到很晚，因此通常要睡到接近中午。”于是，他給布萊希羅德寫了急信，請求馬上見面討論“政府機密”。布萊希羅德同意了，并承諾扮演俾斯麥和佩格拉斯的中間人。此外，他還表示如果俾斯麥拒絕借款，他將對巴伐利亞施以援手。當天上午11點20分，布萊希羅德通知佩格拉斯，俾斯麥已經同意借款—8月1日，一列全副武裝的火車運送價值3萬盾的銀條和銀幣從柏林駛往慕尼黑。我們不清楚布萊希羅德是否墊付了這筆錢。不過，路德維希國王在9月3日授予他“皇家騎士十字勛章”，表彰他對獲得這筆貸款的幫助，并“鼓勵今后的類似行為” [[61]](#61_4)  。

11月中旬，普魯士駐慕尼黑大使發給俾斯麥一封“絕密”電報，報告說由于熱衷宏大建筑和劇場，路德維希國王“陷入嚴重的財政困境”。在沒有告訴政府中任何人的情況下，國王派私人使者馬克斯·霍恩斯泰因伯爵（Count Max Holnstein）前往凡爾賽宮，商討自己的財政需求。如果需求得到滿足，路德維希將接受威廉稱帝。俾斯麥許諾每年給國王10萬塔勒，霍恩斯泰因得到其中的10% [[62]](#62_4)  。布萊希羅德把這筆錢轉給路德維希國王和霍恩斯泰因，后者在他那里開有賬戶。公使基金從韋爾夫基金里支款償還布萊希羅德 [[63]](#63_4)  。收到霍恩斯泰因的通知后，路德維希馬上給威廉寫了那封著名的“勸進信”（由俾斯麥為他起草），敦請普魯士國王即德意志皇帝位（路德維希發出那封“想要的”信后，向俾斯麥通告此事的郵件絕不能被威廉看到，國王可能無法接受這種手段）。顯然，轉賬代理人必須守口如瓶：在整個俾斯麥時代，普魯士每年送錢給路德維希一事始終被嚴格保密 [[64]](#64_4)  。

直到20世紀50年代，保守的德國歷史學家對于贈送給君主的這筆錢（君主助手也分得一杯羹）仍頗有微詞。奧托·貝克爾（Otto Becker）寫道：“他［霍恩斯泰因］毫不遲疑地接受這筆饋贈，完全與超越世俗的理想信仰背道而馳。不過，因為提出給錢的是俾斯麥，這種無可否認的不良印象得以減輕。” [[65]](#65_4)  布萊希羅德或俾斯麥是否對這個安排有過類似的不安則令人懷疑。他們知道貴族也要生活，對獲益的預期能加速（也許還能促進）重大政治抉擇，但很少起到決定性作用。

整個戰爭期間，布萊希羅德扮演多重角色，而且比以往更加投入—壓力對他的健康造成損害。他需要維持在柏林和歐洲資本市場的地位，試圖保持與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聯系，并將強與俾斯麥及其身邊人的關系。他再次尋求動用在銀行界的國際關系來恢復和平—整個戰爭期間，他的公共和私人慈善顯示了他的聲望和愛國。對布萊希羅德來說，這些活動是同時進行和相互促進的；我們必須簡要地一一回顧。

布萊希羅德的熱心甚至延伸到敵人。應英國大使洛夫特斯勛爵（Lord Loftus）之請，布萊希羅德擔任被關押在德國的30萬名法國士兵的薪俸出納。每月向戰俘發放這筆錢讓洛夫特斯的助手“無暇旁顧”，對布萊希羅德的挑戰則更大 [[66]](#66_3)  。他墊付所涉及的巨額款項。洛夫特斯勛爵希望從作為法國政府代理人的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那里收到這筆錢 [[67]](#67_3)  。9月初，拿破侖被推翻后，布萊希羅德焦急地致信羅斯柴爾德家族；他估計任何法國政府都會“承認這種虔誠的善舉”，但為了以防萬一，他提醒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將要求他們承擔付款責任，并請求他們確認 [[68]](#68_3)  。1871年5月，戰斗結束三個月后，布萊希羅德請求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借款，以便繼續為20萬仍然由他照管的戰俘支付薪俸 [[69]](#69_3)  。戰爭期間，布萊希羅德所做的不止這些：“我還把來自法國各地的親屬書信和禮物交給可憐的戰俘，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委托給我的這項工作幾乎耗盡了我的資源。不過，我自愿這樣做，只要力所能及，我都會做。” [[70]](#70_3)  布萊希羅德的信被轉交給法國政府，希望對方能與新的德意志委員會合作，該委員會由拉蒂博爾公爵（Duke of Ratibor）領導，旨在幫助在法國的德國戰俘。

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通告洛夫特斯勛爵的請求，于是，俾斯麥為洛夫特斯—布萊希羅德行動和德軍安排官方中間人。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保證，他的新職責也將為德意志的利益服務。俾斯麥很可能不這樣看。英國急于接管法國在柏林利益的舉動激怒了他，他對他們提出在巴黎接管普魯士利益的請求嗤之以鼻，而是高調地選擇美國 [[71]](#71_3)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這次善舉讓他與英國大使建立新的親密關系，并保留與法國的寶貴聯系。布萊希羅德還大費周章地為多位法國顯貴確定他們失蹤或被俘的親人下落。

保持柏林和巴黎間的通信變得困難。最初，布萊希羅德和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繼續每日通信，通過布魯塞爾和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傳遞書信，也不時發送電報。布萊希羅德繼續報告柏林股市的情況；7月和8月，羅斯柴爾德家族焦急地打聽自己朋友或親戚的下落。布萊希羅德敦促羅斯柴爾德家族賣掉一部分科隆—明登鐵路股份。色當淪陷當天和第二天，他以128馬克的價格賣掉他們賬戶上的1250股，而7月末的價格曾經只有95馬克 [[72]](#72_3)  。開戰后的最初幾周里，布萊希羅德仍然不時發送政治消息；比如，8月19日，他致信阿爾方斯男爵，表示“奧地利的立場再次變得含糊”，言下之意是奧地利仍然可能與法國一起對付普魯士。為了騙過基督徒審查員，他用希伯來字母拼出“立場”（Haltung）一詞—假定他們沒有聰明到從句子的其他部分作出正確的推斷。現在，書信送達需要三到五天，而在和平時期只需兩天。

奇怪的是，布萊希羅德對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感情很麻木。他本人與德國的利益關系密切，卻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愿意和能夠保持與他的日常業務關系，就好像他和他們站在一邊。盡管愛國熱情高漲，業務照常仍是他的座右銘。8月末，布蘭代明確告訴他，巴黎家族想要終止在德業務，也無法繼續在巴黎執行布萊希羅德的要求，因為“不知道形勢會發展到什么程度” [[73]](#73_3)  。幾天后，帝國統治被推翻，如果被發現繼續同步步緊逼的敵人打交道的話，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有足夠的理由擔心自己的安全，甚至可能激起民眾的怒火。共和國宣布成立后第三天，布蘭代寫下似乎是1870年的最后一封信：“男爵們相信你的善意，但在當前形勢下，最好什么都不做，任由事態發展。” [[74]](#74_3)

但布萊希羅德繼續寫來報告；9月1日后，他的報告通過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送達。9月20日，德國人完成對巴黎的合圍；羅斯柴爾德家族選擇留在被包圍的城中。布萊希羅德的書信被積壓在倫敦，直到來年2月才送達目的地 [[75]](#75_3)  。羅斯柴爾德家族偶爾通過氣球獲得來自外國朋友（特別是英國）的消息，但他們與俾斯麥那位驕傲的銀行家的紐帶被切斷了。在寒冷、饑餓和政局動蕩的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同胞們同病相憐，不太可能想念布萊希羅納那些不時流露出愛國熱情的書信。

布萊希羅德也試圖減輕同胞們的痛苦；他知道慈善應該從國內開始，也知道人們對他的預期。他的慷慨在和平年代便已知名，在戰爭期間更是大幅提升。需求更大，公眾情緒要求做出犧牲，但可能的回報也更大。當俾斯麥伯爵夫人贊助一個支持應征入伍者家庭的協會后，布萊希羅德成了它的財務主管 [6](#6_13)  。協會由腓特烈·威廉的遺孀伊麗莎白王后資助設立，并得到威廉的保護。會員包括顯赫貴婦、基督徒和猶太人、貴族和非貴族。財務主管這個引人矚目的職務成了布萊希羅德重要性的又一個昂貴標志。伊麗莎白王后對他的饋贈表示感謝 [[76]](#76_3)  。1870年12月，國王任命他為新設立的威廉基金（旨在幫助受傷或生病的士兵）的財務主管，布萊希羅德又獲得一項昂貴的榮譽 [[77]](#77_3)  。

沖突伊始，國王的朗讀官和侍從路易·施耐德內廷參事（Hofrat Louis Schneider）請布萊希羅德（在他的印象中，這是“一個有愛國心的富人”）出資籌辦一份單頁報紙，主要刊載寫給士兵的歌曲和詩歌，并免費發放給軍隊。布萊希羅德同意了，并提出還要贊助一本歌集。他贊助了二十三期這種短期興奮劑，施耐德報告說，它們給士兵帶去巨大的快樂。布萊希羅德要求匿名，但當施耐德向他傳達威廉的感謝，表示這“再次證明你的愛國心。國王陛下還說，他當然認識你，對你的貢獻完全不意外”時，他一定欣喜不已。國王一直想要一本永久性的詩歌集，“因為它不僅目前用得上，而且可能成為戰爭唯一留存下來的東西，永久見證今天被調動得如此高昂的精神” [[78]](#78_3)  。后來，國王還當面向他致謝 [[79]](#79_3)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虛榮而多嘴的施耐德成了來自威廉司令部的寶貴聯系人，最終還為他的愛國慷慨寫了公開頌詞 [[80]](#80_3)  。

布萊希羅德還把大量新的精力投入私人慈善。他一直向顯赫人物提供奢侈品，這些人雖然喜歡它們，但出于天性或需要而生活節儉。戰爭期間，他的圣誕老人式活動變得極其活躍，耗費大量時間。盡管德國人不斷取得勝利，但戰爭甚至給最上層也帶來困難。戰爭打響幾星期后，俾斯麥的兒子赫伯特身受重傷，在巴德瑙海姆（Bad Nauheim）治療好幾周才緩過來。約翰娜陪伴在他身邊，對他的痛苦和高燒憂心忡忡。布萊希羅德奉上別致的禮物以表示關心，約翰娜為此寫來長篇感謝信，充滿其家庭狀況的細節。9月末，她又從瑙海姆來信：

您再次給我們送來一大堆最奢華的禮物，為此我希望略表我們最真誠的喜悅和感謝……愿上帝保佑，讓巴黎很快被降服，讓和平塵埃落定，讓我們的軍隊—特別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兒子威廉—很快回家。我已經幾周沒有來自威廉的消息了，對他非常擔心。

這封長信還感謝了他為“他們”的救濟協會所做的全部工作。約翰娜最后向布萊希羅德的妻子致以真切的問候，她在這個時期總是這樣做 [[81]](#81_3)  。兩個月后，她從父親在賴因費爾特（Reinfeld）的莊園來信，感謝布萊希羅德的雪茄，表示她的父親已經領情地收下它們。她還說，她丈夫在信中報了平安，“但仍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真不幸。已經三周沒有來自威廉的消息了” [[82]](#82_3)  。

盡管戰場上捷報頻傳，但布萊希羅德也聽說了慘狀，而且人們對最終的勝利越來越不耐煩。8月，路易·施耐德從蓬阿穆松（PontàMousson）來信說：“我寫這封信時置身于可怕的環境中，周圍是16日和18日戰斗的死者和垂死者，因此如果我的手發抖，請你原諒……” [[83]](#83_3)  9月，在色當被攻陷和拿破侖投降后，人們一度看到和平的希望，但法國臨時政府拒絕普魯士提出的苛刻的領土要求 [[84]](#84_3)  。戰爭繼續，德軍首先在費里埃爾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城堡設立司令部，10月5日又遷往凡爾賽宮。對布萊希羅德來說，就雅姆斯男爵積累起來的難以置信的輝煌而言，這是多大的諷刺。施耐德第一個“從‘法國的布萊希羅德’—羅斯柴爾德男爵童話般的雄偉城堡”給他寫信 [[85]](#85_3)  。雖然布萊希羅德對恭維并不陌生，但這種夸張的表述一定讓他莞爾。施耐德等人沒有提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宮殿在征服者中間激起的刺耳的反猶主義論調。比如，各種紋章上的J.R.（雅姆斯·德·羅斯柴爾德）被惡意解讀為“猶太人國王”（Judaeorum Rex） [[86]](#86_3)  。羅恩表示，這位“猶太人國王”的鄉間別墅比他見過的任何建筑都要奢華 [[87]](#87_3)  。“但即使是費里埃爾的軒敞大廳也無法容納毛奇的手下、王室隨從、俾斯麥的官員和一群隨軍觀戰者，隨著戰爭陷入僵局，他們的人數大幅增加……這是有趣、充滿魅力和愛說長道短的一群人，但算不上快樂；隨著天氣變糟以及和平遙遙無期，他們變得更加郁郁寡歡。” [[88]](#88_3)  毛奇和他的副手認為俾斯麥愚蠢地干涉嚴肅的戰爭事務，并為此勃然大怒，而俾斯麥同樣對軍隊“半神們”的指手畫腳嗤之以鼻，氣氛變得緊張，在巴黎城外的等待也變得更加難以容忍。他們的矛盾預示著普魯士軍方和文官領導人后來更加深刻的對立。

布萊希羅德不斷盡其所能地為這些情緒不佳的英雄打氣。俾斯麥寫道：“我們饑腸轆轆，因為H.M. [7](#7_13)  禁止司令部征用一切東西，而且什么都買不到。” [[89]](#89_3)  由于威廉對本方下達的禁令，他們的酒被喝光，而且羅斯柴爾德家的管家最初拒絕從大酒窖中拿出哪怕一瓶酒賣給他們。侍從們對這位猶太富翁的不友善極為不滿。俾斯麥的手下不得不四處找酒，但其他生活必需品更難找到，因為這個國家貧窮而且充滿敵意，與德國聯系的鐵路嚴重超載 [[90]](#90_3)  。布萊希羅德試圖改變這種窘境，自告奮勇地為普魯士隨員提供美酒佳肴。他樂于看到國王、首相和他們的親信副手們品他的菜肴，喝他的干邑，抽他的雪茄—一切都品質上乘。如果通過一個人的胃能夠抓住他的心，那么布萊希羅德本應該是在司令部最受愛戴的人。

但他不是。也許他熱心過了頭。他一再追問施耐德或科伊德爾，要求知道他們各自的主人缺少什么。一旦被告知，他會立刻著手尋找和遞送（后者更困難）想要的東西。傳說中，威廉口味簡單，他想要云雀、龍蝦、大菱鲆和特制的啤酒。這些東西都會在要求提出后幾天內奇跡般送達 [[91]](#91_3)  。禮物當然有等級，級別較低的人不得不滿足于較少的禮物。不過，科伊德爾報告說，他把布萊希羅德的雪茄分給俾斯麥的助手，如阿貝肯（Abeken）、俾斯麥—波倫和哈茨菲爾特（Hatzfeldt），這些人現在“每天都會為你唱贊歌” [[92]](#92_3)  。國王隨員中的佩彭謝伯爵和安東·拉齊威爾親王（Prince Anton Radziwill），以及王儲手下的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也是布萊希羅德的受益者 [[93]](#93_3)  。只有俾斯麥的敵人（總參謀長毛奇的人）沒有收到布萊希羅德的禮物，該群體拒絕接受他。在他們眼中，他有兩個罪名：他既是猶太人，又是俾斯麥的人，兩者有時會被縮合成一種輕蔑的表述：“首相的私人猶太人。” [[94]](#94_3)

布萊希羅德的受惠者偶爾也喜歡說些反猶主義的話，但他們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回報了他的好意。他們大多加入布萊希羅德出色得難以置信的情報網絡。他收到來自戰場的書信和電報，仍然是柏林消息最靈通的人之一。其中少數人會在關鍵時刻為他的利益出力，特別是科伊德爾。

布萊希羅德和科伊德爾在戰爭期間保持活躍的通信，揭示當時的許多真相。他們的親密關系和相互尊敬，通過帶有“最尊敬的朋友”這樣親熱稱呼的書信彰顯出來。布萊希羅德談論柏林的事務、市場和民眾的情緒，以及他從巴黎或中立國首都獲得的秘密信息。反過來，科伊德爾向他全面描述戰場的情況，還常常充當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中間人，因為兩人在戰爭期間直接接觸寥寥無幾。

8月5日，布萊希羅德寫道，商業狀況堪憂，不過新發行的普魯士債券走勢良好—但后來的情況并非如此。他還報告說，奧地利和意大利仍然存在支持法國舉動的危險。8月中旬，在普魯士取得頭幾場勝利后，布萊希羅德的口氣變得更加興高采烈：“市場走勢非常好”，而在法國，“那個國家滿目瘡痍” [[95]](#95_2)  。

科伊德爾的回答向布萊希羅德展現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8月16日，科伊德爾從梅茨（Metz）附近的蓬阿穆松（PontàMousson）來信—德軍剛剛渡過摩澤爾河（Moselle），他也是在幾個小時前才抵達那里—正置身于“戰斗的驚雷中”，也就是代價高昂的維翁維爾（Vionville）之戰。他認為市場的積極表現為時過早。“在實現和平前，我們必須削弱法國，使它不會在一年后再次發動戰爭。這樣的話，如此甘愿做出犧牲的我國人民就不會對我們失去信任，不會認為王國沒能代表好他們的利益，從而產生向往共和制的沖動。”他表示，其他國家都很貪婪，因此想要實現和平必須經過“非常激烈的斗爭，不僅是面對法國人，他們畢竟可能被煽動起來反抗侵略者，而且要面對中立國，更別提路易［拿破侖］可能被廢黜而造成的困難和拖延”，“出于所有上述原因”，我們對較早或較容易地結束戰爭“全無信心” [[96]](#96_2)  。

簡而言之，這不會是1866年那樣的速戰速決，不會以勝利一方快速取得有限的目標告終。這不是布萊希羅德的朋友所乞求的，也不是他本人可能期待的“適度”。科伊德爾的信清晰地反映出俾斯麥的想法，就像8月11日俾斯麥給沙皇的消息所證明的。科伊德爾反復強調一種相當荒謬的抉擇：要么艱難地實現和平，要么國內出現共和主義浪潮，暗示這一定是當時俾斯麥的思維定勢 [[97]](#97_2)  。科伊德爾一直與俾斯麥待在一起，除了他寫這封信之后的那個晚上，當時俾斯麥獲悉兒子威廉陣亡，另一個兒子赫伯特受傷，于是星夜兼程趕去了解情況，第二天早上發現威廉毫發無損，而赫伯特受了三處傷 [[98]](#98_1)  。

科伊德爾關于戰爭將持續很長時間的警告對布萊希羅德具有即時的重要性。它還意味著即時的利益。在過去的幾年里，俾斯麥在吞并阿爾薩斯—洛林中扮演的角色再次成為爭議話題。俾斯麥同時代的人重新聞到硝煙的味道：早在8月10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就寫道，德國人陷入“民族狂怒”，“處處［可以聽到］奪取阿爾薩斯—洛林的呼聲” [[99]](#99_1)  。究竟是俾斯麥煽動這波“民族狂怒”，還是他受到后者驅使？究竟是他在官方報道中散布主張吞并者的故事，還是他不情愿地接受輿論和軍方的要求？（后來，他自稱是身不由己。）俾斯麥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此事仍然存在爭議，但很少有人會否認，到了8月中旬，俾斯麥已經最終徹底下定決心吞并阿爾薩斯—洛林，盡管必然會付出代價 [[100]](#100_1)  。

雖然俾斯麥的動機重新引發人們的興趣，但他們沒有注意到，正是在戰爭對他產生最切膚影響的那個星期，正是因為他兩個兒子的命運，他下定決心懲罰法國，并摧毀其所謂的入侵欲望。此外，8月16日和18日，德軍僥幸逃過兩次滅頂之災，但損失慘重 [[101]](#101_1)  。8月11日，他對駐圣彼得堡大使的指示仍然態度模糊。但十天后，他在給倫敦的伯恩斯托夫的便條中卻強硬地堅持領土要求：“從宮廷到平民，我國民眾遭受巨大的犧牲，英國輿論將會理解，我們必須盡己所能地避免它在不久之后重演。”—兩者在口吻和內容上有重要區別。他還表示，“即使這場戰爭后他們沒有遭受領土損失”，法國人也會懷恨在心。他最后說，必須削弱無法變成朋友的敵人，唯一的途徑是讓法國要塞投降，而不是摧毀它們 [[102]](#102_1)  。

俾斯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的斷言，即人民的犧牲激發民眾的希望，如果希望破滅，他們對王國的感情將會動搖。他盡其所能地煽動這些希望，把內閣發起的有限戰爭轉變成民族間的戰爭—直到幾個月后才有所收斂，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促成的這場戰爭過于兇殘。人們無法忽視，下一場戰爭（部分源于吞并阿爾薩斯—洛林）同樣遭遇目標危機。為了不讓故意被煽動起來的民眾失望，政府在兩場戰爭中堅持的和平條件都必將導致戰爭延長，并造成更高的損失和預期。在1864年、1866年，俾斯麥堅決反對這樣的目標升級，但在更加危險的1870年，他卻故意支持這樣做。這被證明是他最致命的錯誤。

為了這些目標，俾斯麥拒絕法國的和平提議—布萊希羅德將在這些提議中扮演自己的角色。8月16日、18日的戰斗結束后，形勢徹底變得對法國人不利，帝國軍隊跌跌撞撞地走向覆滅。9月2日，隨著拿破侖和他的軍隊在色當投降，法國遭遇漫長歷史上最慘痛的失利。俾斯麥向法國全權代表維姆普芬將軍（General Wimpffen）重復他在之前幾周內說過的話：法國人一直是有侵略野心的民族，德國人的犧牲必須要求更好地防備這樣的敵人—鑒于他過去的親法態度，我們不免覺得這些話是他剛學會的 [[103]](#103_1)  。

當局勢有所緩和時，俾斯麥會恢復政治理性，但色當戰役讓德國公眾的頭腦變得如此瘋狂，這是俾斯麥之前暗中通過媒體煽動所無法做到的 [[104]](#104_1)  。頭腦無法輕易恢復正常，就像臭名昭著的色當節（Sedan-Feiern） [8](#8_13)  或隨后幾十年中的各種令人作嘔的年度慶典所展示的。色當淪陷后，巴黎宣布建立共和國，并成立臨時國防政府。年輕而暴躁的激進派萊昂·甘必大 [9](#9_11)  是政府的領導者和啟發者，儒勒·法夫爾主管外交事務。新政府希望和平，但前提是要有尊嚴地獲得；和長期的戰爭一樣，恥辱的和平也會讓法國的社會結構陷入最危險的境地。法夫爾的著名誓言—不放棄“她的一寸土地和一塊城磚”—與德國人的目標格格不入。9月18日，法夫爾在費里埃爾拜見俾斯麥，但俾斯麥的不妥協讓一切希望破滅。作為敗局已定的一方，法夫爾清楚地意識到，剩下的唯一選擇是全力一戰，唯一希望是歐洲的干涉。

在這樣的悲觀背景下，布萊希羅德試圖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他的中間人是施瓦巴赫的丈人亞歷山大·門德爾（Alexander Mendel），此人是一位荷蘭或比利時公民，一名見多識廣的商人，在法國人脈廣泛，與甘必大關系很好。8月，布萊希羅德將門德爾的一封信轉交給科伊德爾，“這是我在巴黎最可靠的人……雖然他是荷蘭人，但在內心他是個好德國人” [[105]](#105_1)  。9月10日，布萊希羅德給科伊德爾發去電報，表示“我的線人”已經帶著甘必大愿意展開談判的指示回到倫敦。“如果首長想和門德爾面談—這樣做無論如何都是對的—請馬上發電報，并附上路線指南。”回復馬上就到了：“首長將接見你的朋友；推薦使用新的柏林通行證，經由南錫（Nancy）前往。” [[106]](#106_1)  9月12日，俾斯麥收到伯恩斯托夫從倫敦寫來的信，里面附有一份門德爾剛剛在巴黎接到的報告。報告充滿悲觀，因為現政府無法實現和平。門德爾的未具名線人預言，面對共和制的混亂，巴黎無法保衛自己，盡管“巴黎不是法國—就像紐約雖然是骯臟人群的所在地，卻沒有阻礙美國成為一個偉大而高貴的國家” [[107]](#107_1)  。俾斯麥的新聞秘書莫里茨·布施（Moritz Busch）在伯恩斯托夫來信的頂部標注“用于新聞”。門德爾的悲觀報告在德國的官方報紙上大受歡迎。

當布萊希羅德安排與俾斯麥的會晤后，門德爾再次匆忙趕回巴黎，直接打探“他們愿意接受什么犧牲” [[108]](#108_1)  。他的費里埃爾之行與儒勒·法夫爾（Jules Favre）的一樣無果而終。科伊德爾喜歡門德爾，而毛奇的人則對他惡語相向，更愿意把他看成布萊希羅德的代表 [[109]](#109_1)  。甘必大給了門德爾回巴黎的通行證，但維爾蒂·杜·維努瓦將軍（General Verdy du Vernois）勸他不要冒險前往，并交出通行證。最終門德爾同意了，毛奇的一位軍官記錄道：“我們希望讓它物盡其用。” [10](#10_11)   [[110]](#110_1)

布萊希羅德把門德爾留作后手。他的目標很簡單：他希望和平，希望第一個知道和平即將到來，希望負責收取德國可能對法國開出的賠款，后兩者意味著大筆收益。他向科伊德爾求助，比如請科伊德爾在和平臨近時發加密電報給自己。但科伊德爾提醒他，從司令部發密電是被禁止的：“我的第一封關于‘幾支雪茄’［和平前景的暗號］的電報被發送了，因為后面跟著‘首長用的’，但昨天的電報被認定無法發送而退回。” [[111]](#111_1)  10月中旬，布萊希羅德請外交部次長蒂勒（Thile）發電報給俾斯麥，表示在接受法國內政部長提出的面談后，門德爾相信“運送大批雪茄”將對法國人產生影響。俾斯麥一定對自己的親信銀行家突然胡言亂語感到奇怪，直到科伊德爾正確地解讀這條消息；科伊德爾在電報上寫道，布萊希羅德曾請求自己使用那種暗語，但他拒絕了 [[112]](#112_1)  。嚴格來說，這并非事實，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但科伊德爾很可能對只有自己理解布萊希羅德的暗語感到尷尬。就這樣，他們的密切關系大白于天下。

整個秋天，布萊希羅德不斷把門德爾的報告發給蒂勒，后者再用加密電報將其轉發給俾斯麥。10月25日，門德爾報告說：“甘必大在電報中說，說什么都沒用。法夫爾不會接受任何［領土］賠償。”但事實上，正是組織全民武裝的甘必大讓法夫爾的不妥協有了底氣。11月初，門德爾警告德國人，圖爾（Tours）政府認為和平是不可能的，裝備精良的新軍隊正在投入戰場，“絕望驅使人們身不由己地武裝自己”。那個月晚些時候，布萊希羅德發出更多法國人抵抗升溫的消息 [[113]](#113_1)  。

俾斯麥無須布萊希羅德提醒自己形勢的嚴峻。德軍已經取得一系列勝利，但和平看上去仍然杳無蹤影。等待的壓力—首先是等待拿下梅茨，然后是等待攻陷巴黎—對凡爾賽那群人的心態造成不利影響。俾斯麥與軍方的矛盾愈演愈烈，關于是否炮轟巴黎的爭論成了新的沖突焦點。

布萊希羅德不時收到關于陰沉氣氛的暗示。拿下梅茨前不久，科伊德爾在信中提到俾斯麥的指示：首相“樂意委托你收繳戰爭賠款，如果他可以做到的話，前提是局勢發展到可以展開談判的地步，但地平線上還看不到鴿子”。法國的抵抗變得更加強硬，人們做好在凡爾賽悶悶不樂過冬的準備 [[114]](#114_1)  。布萊希羅德開始和所有人一樣不耐煩起來，他在10月28日致信科伊德爾：“衷心祝賀梅茨的投降。愿上帝保佑，讓我很快可以祝賀你們舉行進入巴黎的儀式。但［即使］一切順利，我們如何實現真正的和平呢？”也許最好讓法夫爾走人（仿佛這掌握在德國人手中！），因為甘必大更溫和，而且“已經同意割讓阿爾薩斯” [[115]](#115_1)  。

布萊希羅德想要和平，想要入城式，還想要阿爾薩斯。他也被當時的沙文主義幻覺沖昏頭腦，而且嚴重到可能不再看得清自己愿望中的矛盾之處。他的朋友莫里茨·戈德施密特則完全不同，后者吹噓自己的親德情感，但懇求普魯士要有節制，并慨嘆道：“有福的‘平安’何時才會來到？” [[116]](#116_1)

雖然和平遙遙無期，但由誰最終收取賠款的問題仍被不斷提出—俾斯麥有時幾乎拿此事開玩笑。11月初，在俾斯麥的要求下，科伊德爾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提議由他們來收取法國的賠款，你對此有何看法？按照慣例，我們更傾向于選擇本土［德國］銀行……如果可以的話”。（俾斯麥在夸大其詞，因為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僅僅提議，如果巴黎分支被要求參與和約的賠款安排，他們愿意擔當中間人 [[117]](#117_1)  。）不過，科伊德爾又說，前景很不妙：“簡而言之，我沒有好消息可以報告。” [[118]](#118_1)

凡爾賽的氣氛一度仍然悲觀。12月中旬，科伊德爾承認，沒人知道巴黎可以支撐多久：“我看不到進入尾聲的跡象。” [[119]](#119_1)  更糟糕的是，從12月初開始，威廉和俾斯麥“［因為］稱帝問題、炮轟巴黎和［法國人的］突擊而神經極其緊張”。威廉不斷給俾斯麥的神經施壓，而布萊希羅德則努力減輕這種壓力。沃爾夫通訊社（布萊希羅德與其關系密切，因此希望能在戰爭期間獲得特別的優先權）把自己的報告發給施耐德，后者將其讀給國王聽，國王再就各種問題麻煩俾斯麥。俾斯麥覺得，至少可以在源頭上阻斷這個麻煩。他認為施耐德沒有為這些報告付錢，因此絕對不應該免費得到它們。科伊德爾寫道：“聯邦首相要求［像沃爾夫通訊社］這樣接受政府重要資助的組織不得找政府的麻煩。”在那幾個艱難的星期里，當威廉對俾斯麥統一德國的各種舉動加以阻撓時，首相常常試圖限制國王的消息來源 [[120]](#120_1)  。

12月中旬，科伊德爾感謝門德爾的后續報告，并承認“甘必大的確取得了驚人成績，因此耽擱了和平”。“除非我們運氣好，巴黎在隨后的四周內陷落”，不然在德國展開進一步動員將必不可少 [[121]](#121_1)  。同樣在這個悲觀時刻，布萊希羅德直接給俾斯麥寫了報告，提及甘必大可能的求和愿望，以及法國人在倫敦籌款時遇到的困難，“盡管英國對法國懷有不可否認的同情。閣下的上一份照會惹惱了倫敦……而讓本國人惱怒的是炮轟巴黎被拖延，或者就像傳言說的被完全取消” [[122]](#122_1)  。俾斯麥幾乎無須布萊希羅德提醒就能感受到所有人的怒火；他知道整個世界已經站到自己的對立面，外國人認為他頑固而苛刻，德國人（錯誤地）懷疑他對巴黎心慈手軟 [[123]](#123_1)  。不尋常之處在于，布萊希羅德毫無顧忌地把這一切都告訴他，在艱難時刻如此坦誠相見讓兩人都值得尊敬。

布萊希羅德還在信中談到俾斯麥的個人資產。戰爭初期，科伊德爾擔任首相和銀行家的中間人。早在9月5日，當普魯士的大捷推動市場上漲，當俾斯麥意識到和平仍然相當遙遠時，科伊德爾通知布萊希羅德：“首長授權你出售他持有的任何證券，只要你認為正確。”布萊希羅德賣掉俾斯麥的全部或大部分俄國抵押債券，但在11月時想要把它們購回。俾斯麥則認為不必急著購回，特別是因為他可以在1871年購買新一期的債券。科伊德爾還表示，首相不認為俄國對《巴黎和約》中黑海條款的指責會引發戰爭，但“如果他改變看法，他會讓你知道”。在談到他自己的職責，并對法國局勢做了快速盤點后，科伊德爾又說：“因此如果我也投機的話，我還不會買入。” [[124]](#124_1)  長時間以來，來自凡爾賽的消息令人沮喪。科伊德爾的書信進一步證實，俾斯麥認為讓自己的銀行家獲得正確消息是重要和無可厚非的。顯然，他不會與其分享國家機密，但也不希望其在黑暗中做出代價高昂的決定。

俾斯麥關心個人財務和布萊希羅德對其的打理，但他的關心會因為自己的情緒而變化；當他緊張和沮喪時，布萊希羅德偶爾的拐彎抹角要求會讓他發怒。俾斯麥的手下對他的糟糕心情誠惶誠恐，可能正是由于某種突如其來的不愉快讓科伊德爾在12月中旬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自己無法再就商務問題叨擾俾斯麥，布萊希羅德應該直接寫信給首相 [[125]](#125_1)  。布萊希羅德照做了，他告訴心情不佳的首相，自己暫時將俄國抵押債券的收益投資于新的德國貸款。在新一期的抵押債券發行前，德國貸款將一直升值。同樣在這封信中，布萊希羅德還宣布將運來一些啤酒和雪茄，這是心懷感激的銀行家提供的可食用的分紅 [[126]](#126_1)  。

圣誕節時，凡爾賽的火藥味變得更濃。盡管遭遇更多慘痛挫折，法國領導人還是發誓繼續戰斗。在德軍陣營，毛奇與俾斯麥的矛盾愈演愈烈。1月5日，首相早就要求的炮轟巴黎終于開始，但對于緩和怨氣與矛盾收效甚微。毛奇完全樂意打一場持久戰，只要以懲罰性的和平告終即可。俾斯麥則希望速戰速決，因為歐洲國家干涉的危險再次變得大起來。凡爾賽彌漫著不和與沮喪，甚至1月18日威廉不情愿地登基為德意志皇帝的消息也無法驅散陰云。幾天后，一位相對公正的觀察者記錄道：“我從未見過有誰像現在的俾斯麥這樣受到如此強烈的怨恨。” [[127]](#127_1)

顯而易見的是，被征服者將在勝利者的尷尬面前崩潰。整個1月，布萊希羅德一直從門德爾那里聽說，巴黎即將投降，盡管戰場上的法軍仍然是不可小覷的威脅 [[128]](#128_1)  。1月23日，科伊德爾提醒布萊希羅德，巴黎的陷落可能近在眼前：“直覺告訴我，那些人支持不了多久，但我們已經欺騙自己那么多次，沒人再相信直覺……我建議，一旦關鍵時刻來臨，你馬上給首相發電報，請求獲準到這里來。我無法向你提供想要的保證。” [[129]](#129_1)  當晚，儒勒·法夫爾現身德軍司令部，希望協商停火以緩解陷入饑荒的首都的壓力，并為和談條件做準備。

和平終于露出曙光。戰爭對法德兩國造成重大傷亡。它推翻一個皇帝，創造另一個。它讓法國顏面掃地，標志著其軍事優勢地位的終結。優勢轉移到新的德意志帝國手中—或者就像某位英國下議院議員所說：“歐洲失去一位女主人，迎來一位男主人。” [11](#11_11)  ——這讓德國人既驕傲又恐懼。這種可怕的混合是俾斯麥的第三場戰爭的遺產，在隨后的歲月里，他可以控制但無法再驅逐它。

[1.](#1_12) 在法國人害怕普魯士人攻擊的同時，英國人也擔心遭到法國人入侵。186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報》抱怨說：“法國人有了法國還想要什么？……沒有哪個國家擁有比法國更好的自然條件……即便不是裝腔作勢，法國人的焦慮也沒有真正的歷史基礎，依據的只是瘋狂而虛幻的預言。但如果我們預測遙遠的未來，只怕最大膽的預言家也不敢說德意志有侵略企圖吧？”

[2.](#2_12) 被保守派將領胡安·普里姆（Juan Prim）推翻后，女王逃往法國，受到拿破侖三世的庇護并尋求復辟。——譯注

[3.](#3_12) 18到19世紀時期法國擁護波旁家族奧爾良系的君主立憲主義者。——譯注

[4.](#4_12) 布萊希羅德多次為政治目的的秘密資金轉賬提供掩護。由于這類任務的性質，很少有記錄保留下來。比如，1868年1月，公使基金的受托人科伊德爾指示布萊希羅德將750法郎匯往巴黎。科伊德爾將“以最高的權限”和最秘密的方式在巴黎支取這筆錢。布萊希羅德銀行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任何人都應該對這筆轉賬的真實原因一無所知：“請你自行決定用什么借口掩蓋這件事。”科伊德爾還表示，今后將有類似的支付。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8年1月29日，BA。

[5.](#5_12)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自由黨政治家，曾四次出任英國首相。——譯注

[6.](#6_12) 在1870年8月和11月的宣傳單上，柏林支持應征者家庭總會（Der Berliner Haupt-Unterstützungs-Verein für die Familien der zur Fahne Einberufenen）呼吁公眾慷慨解囊，收款人為該會的財務主管、樞密商務顧問布萊希羅德。

[7.](#7_12) 赫爾穆特·毛奇。——譯注

[8.](#8_12) 為了紀念在色當戰役中擊敗法軍和俘虜拿破侖，從1871年到1918年，德國在每年9月2日都會舉行慶祝活動。——譯注

[9.](#9_10) 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國共和派政治家。第二帝國垮臺后任臨時國防政府的內政部長。——譯注

[10.](#10_10) 一個月后，俾斯麥談到甘必大的一位中間人不久前的來訪，那人向他詢問，德國人是否會承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不僅是共和國，如果你愿意，我還可以承認甘必大王朝；但它必須帶來有利與穩定的和平。”在講述這段故事時，俾斯麥還表示“是的，任何王朝，無論姓布萊希羅德還是羅斯柴爾德”，于是這兩人成了后續談話的主角。GW，VII，385.

[11.](#11_10) 亨利·布爾維（Henry Bulwer，1801—1872）語。——譯注

## 第七章　凡爾賽宮里的狂妄

征服者多么無情，像德國這樣的大國犯了多大的錯誤，將一切事務的主導權交給一個大膽而魯莽的人。

——格蘭維爾勛爵，1871年3月1日

為了法國的投降，德國人等待了漫長的五個月。捕獲皇帝和推翻帝國僅用了六周，但立足未穩的共和國拒絕德國人的條件，擔心恥辱的和平會在法國人中間喚起類似1793年的革命狂熱。對德國人來說，他們眼中的徒勞抵抗每持續一天，懲罰的欲望就更加強烈。與此同時，他們等待、謀劃和爭吵著。這幾個月令法國人痛苦不已，對德國人同樣是考驗。

巴黎城外的普魯士—德意志司令部是個奇怪的地方，與之前的任何普魯士營地都不相同。那里包含普魯士軍國主義和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新組合，飽受爭議的俾斯麥不自在地管理著這種組合。在外界看來，隨著幾個世紀以來德國的分裂局面和法國優勢地位的終結，凡爾賽的景象洋溢著勝利與榮耀。從戰火中誕生一個新帝國。

但司令部內的情況并非如此。圍城者陷入圍城心態。誕生的不僅是一個新帝國，它精神中的某些東西也得到預示。也許是因為戰爭出乎意料和令人不適應的漫長，也許是因為德國領導者面對的重重危險和抉擇，精神的粗魯化甚至某種程度上的殘酷化開始在凡爾賽的德國人中間蔓延。未來的各種仇恨突然在那幾個月里出現，又在帝國時期最初的和平歲月里銷聲匿跡。

司令部最顯眼的矛盾發生在俾斯麥和毛奇之間，一方是堅持政治優先的政客，另一方是要求戰時軍隊必須享有完全自治的戰略家。在俾斯麥看來，戰爭是政策的工具，講和是他自己的特權；在毛奇看來，政治對戰略的任何干涉都威脅到他本人負責的領域。矛盾讓司令部關系緊張，導致毛奇向俾斯麥隱瞞關鍵信息，盡管俾斯麥也試圖向威廉隱瞞信息。這個矛盾將困擾并最終摧毀兩人當時正在創造的帝國 [[1]](#1_49)  。

不過，君主和首相間也存在矛盾。當俾斯麥終于誘騙南德諸邦接受德意志帝國（普魯士的霸權幾乎未被掩飾），威廉卻不愿接受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這個新頭銜。普魯士國王只想要德國皇帝（Emperor of Germany）的頭銜。在勝利的那一刻，當威廉在凡爾賽宮的鏡廳（而不是在他自己的人民中間）被宣布為德意志皇帝后，他走下寶座與其他君主和親信副官握手—事實上，唯一被忽略的是新德國的建筑師俾斯麥。讓路德維希的弟弟，巴伐利亞王位繼承人奧托親王對這場盛大慶典發出抱怨的不僅是巴伐利亞的地方主義：“我甚至無法向你描述，我在儀式上感到多么悲哀和痛苦……一切都如此冷漠，如此高傲，如此炫目，如此賣弄、趾高氣揚、無情和空虛……” [[2]](#2_49)

當新帝國的騎士互相爭斗時，他們更容易陷入一種似乎標志著精神殘酷化的復合情感中，雜糅著沙文主義、排外主義和反猶主義。甚至俾斯麥都變了：至少在當時，1866年那個有先見之明的外交家開始相信權力的無所不能—否則如何解釋他向英國派往凡爾賽的特使奧多·羅素勛爵承認“法國被打敗得越徹底，對德國的目標就越有利，和平就越持久” [[3]](#3_47)  ？這種新觀念決定了政策：俾斯麥要求的和平將讓法國永遠無法恢復元氣。吞并阿爾薩斯—洛林不僅無法像預計的那樣終結仇恨，反而使其更加深刻。俾斯麥本人生前就對這種無情感到后悔，并小心翼翼地將其歸咎于軍方。但當時他也傾向于這樣做，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覺得對外勝利將大大提高普魯士的榮耀，并削弱普魯士威權統治的所有剩余反對者。

在凡爾賽，俾斯麥需要德國的議會派—但當他們出現時卻遭到詆毀。忠誠的民族自由黨的著名領導人路德維希·巴姆貝格（Ludwig Bamberger）立刻獲得“紅色猶太人”的綽號 [[4]](#4_47)  。凡爾賽宮彌漫著不容置疑和無情的反猶主義論調：在俾斯麥的一生中，他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頻繁、如此放肆、如此刻薄地談論猶太人的無根性、熱衷買賣和無所不在。（他抱怨說，幾乎所有或至少很多法國臨時政府的成員都是猶太人：“從面相來看，甘必大幾乎肯定是。” [[5]](#5_47)  ）在這點上，偏見再次固化為政策。

布萊希羅德對這些知之甚少。對他來說，凡爾賽宮是權力的所在，他誠惶誠恐地站在其所代表的一切面前。他很可能對德意志權力更丑陋的一面所知寥寥，而且不愿知道什么。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在分析德國的戰爭目標時加入了謹慎或節制的想法。他和俾斯麥一樣冷酷，與其他許多德國人一樣，德軍的勝利激發他對權力的無條件贊美和對一切軍事事務的可怕尊崇。

布萊希羅德不太可能聽到當時在凡爾賽宮如此常見的反猶主義論調。但他一定知道，在德國戰爭機器的某個地方存在著冷酷的反猶主義核心，存在著對猶太人和波蘭人這樣的“劣等種族”令人痛苦的漠視。他知道這點，因為受害者曾間接地請求他施以援手。這件事本身雖然不大，但具有深遠的不利影響，因此值得關注。

12月末，布萊希羅德終于發現俾斯麥的手下可以多么冷酷。23日，波恩的拉比和一家重要猶太報紙的編輯菲利普森博士（Dr.Philippson）向布萊希羅德轉交一封來自梅茨大拉比利普曼（Lipman）的信，信中報告說，梅茨的德國長官剛剛下令立即驅逐該城的所有波蘭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利普曼對這種暴行感到震驚—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12月中旬被趕出家門，而且因為正值戰爭期間缺乏交通工具—他向長官圭多·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求情，后者卻聲稱這是上級指令，并拒絕按照利普曼的要求對這些指令提出抗辯。他解釋說，政府的目標是“讓洛林德意志化”，因此需要去除“那些與德意志精神背道而馳的元素。他告訴我，沒有誰比波蘭人更與那種精神格格不入”。菲利普森請求布萊希羅德“利用他的巨大影響”，讓首相暫緩執行該命令，或者至少豁免婦女和兒童 [[6]](#6_45)  。沒有關于布萊希羅德行動的記錄，盡管后來他常常為自己的猶太人同胞請命。波蘭的基督徒當然也受到該命令的影響，因為德國人當時把波蘭人看作敵人，他們的反德意志“靈魂”為各種殘酷行為提供正當理由。這件事有一個堪稱奇異的地方：在新帝國誕生之時，沙文主義暴行的首批受害者是波蘭人和猶太人，他們也是統一德國的最后受害者 [1](#1_15)  。

整個1月，布萊希羅德都在柏林等待其他消息。28日，德法終于簽署為期三周的停火協議，巴黎城背上2億法郎的賠款，這只是開胃菜，后來的各種賠償數額要高得多。布萊希羅德渴望前往現場，以便為俾斯麥提供建議，如何最好地將這么大一筆錢收取和轉賬—并保證自己在相關金融操作中大賺一筆。他對歐洲貨幣市場無與倫比的了解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親密關系顯然受到俾斯麥的青睞。

在當時的司令部里，布萊希羅德恰好被常常提及—不僅因為他送來的某些異國風味的亞得里亞海魚類讓俾斯麥在與法夫爾的艱難談判間隙大快朵頤 [[7]](#7_45)  。在那段忙亂的日子里—就像一位將軍所看到的，“許多人試圖把這位大暴君的權力削弱到最小”—俾斯麥和他飽受爭議的親隨用基督徒的下流笑話取笑布萊希羅德 [[8]](#8_45)  。比如，1月30日，他們談到現在準備離開自己城市的巴黎人，比如據稱已經獲得安全通行證的一位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俾斯麥立即暗示（并非戲言），那人應該被當作游擊隊（franctireur）逮捕，他的堂弟感嘆道：“那樣的話，布萊希羅德會飛奔過來，代表整個羅斯柴爾德家族拜倒在我們面前。”俾斯麥回答：“那么我們就把他們倆都送到巴黎，讓他們參加獵狗。” [[9]](#9_43)  （這里影射了巴黎城內的饑荒。）兩天后，在談及巴黎城的賠償時，俾斯麥說：“好吧，首先，布萊希羅德應該參加戰斗。他必須立刻進入巴黎，這樣他和他的猶太人同胞就能嗅出彼此的所在，與銀行家展開談判……他真想來嗎？”當科伊德爾回答說他希望在幾天內到來時，俾斯麥說：“請給他發電報，我們馬上需要他。” [[10]](#10_42)

布萊希羅德的確迫切想要前往，而且是一個人。他已經忙著阻止同樣渴望這次征召的其他銀行家。對布萊希羅德來說，這次征召結合了他最覬覦的東西：收益的誘惑和權力的滋味。一旦接到命令，他就不再隱瞞自己被召往凡爾賽—盡管他隱瞞了為此進行的鉆營。他的朋友幫助安排復雜的旅行計劃。普魯士電報局主管紹芬將軍（General Chauvin）提出路線建議，勃蘭特少校（現隸屬于司令部）向他提供官方命令，要求德國軍方和文官當局為“因公務”前往凡爾賽的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兩三個同伴給予一切幫助，包括使用軍用火車 [[11]](#11_42)  。懷揣著諸如此類的命令，在小隊隨從的幫助下，他踏上前往凡爾賽的漫長而曲折的旅程。2月7日，他抵達目的地，與俾斯麥和赫伯特共進晚餐 [[12]](#12_40)  。

在凡爾賽，兩項工作被正式委派給布萊希羅德：幫助收繳向巴黎索取的2億法郎賠款，并與法國人進行談判，商談向整個國家索取的大得多的賠款。在這兩件事上，他都將與另一位專家合作，那就是大工業家和俾斯麥的朋友—圭多·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伯爵，布萊希羅德不久前剛剛聽說過此人的政治活動。2月8日，兩位專家在一個混編委員會中會見法方代表，該委員會旨在安排定于三天后支付的巴黎賠款事宜 [[13]](#13_36)  。布萊希羅德提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包括由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擔保。幾天后，馮·施托什中將（Lieut.-General von Stosch）致信總軍需官，表示“兩張各200萬塔勒的羅斯柴爾德匯票”令布萊希羅德的激動溢于言表，“他反復把它們拿給我看，問我是否存在著更美麗的東西。見到那么小的紙片代表那么多錢，他激動不已” [[14]](#14_36)  。令他驚喜很可能是因為，這兩張很容易被接受的“小紙片”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大費周章地在幾天內籌集巨款的最終成果。它們代表銀行家和金錢的力量，也代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完成交易。布萊希羅德知道，還將有數目大得多的款項被征收和轉賬，在此過程中的每一步，參與的銀行家都能大賺特賺。他從凡爾賽宮給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寫了一張簡短的商業收據，表示收到那400萬，并告訴他們自己將為這筆賠款開設特別賬戶，傭金為0.25個百分點 [[15]](#15_34)  。這又是盛宴前的開胃小菜。

早在1870年8月的最初幾場戰役勝利后，作為勝利方的德國將向法國索取巨額賠償就已在預料之中。8月13日，消息靈通的奧地利駐柏林大使維姆普芬男爵致信維也納，表示“［德方］決心向法國人索取20億戰爭賠款” [[16]](#16_34)  。法國將被迫為這場所謂由它發起的戰爭進行賠償，它的賠款將被用來說服南德諸邦：普魯士的榮耀也能帶來收益。

維姆普芬一定在柏林聽說了關于這筆賠款的權威表態。他本來還可以說，歷史上不乏好的先例。最顯而易見的模板是1815年向法國索取的7億法郎賠償，用于償付23年來革命者和拿破侖的入侵給盟國帶來的損失和成本 [[17]](#17_28)  。另一個先例是1866年的六周戰役后向薩克森征收的1000萬塔勒賠款。到了8月中旬，普魯士領導者已經在計劃利用當前的大好良機索取歷史性的賠償。

顯然，最先將賠款與割地問題聯系起來的，是以儒勒·法夫爾為代表的受害者。法夫爾希望大筆現金可以拯救法國的領土；而德國人則打定主意，他們既要土地也要賠款，雙管齊下地讓法國在今后幾十年里無法恢復元氣。這個問題在9月俾斯麥與法夫爾舉行的最初談判中首次被提出，據說法夫爾提出，如果可以保住斯特拉斯堡和阿爾薩斯，法國愿意支付50億法郎。這個數字很可能超過俾斯麥曾經的任何夢想—但在當時，他拒絕就賠款進行更多商談（如果法國人愿意談這個問題，德國人就有必要強調另一個）。俾斯麥告訴兒子：“我對他說，我們以后再談錢，首先我們希望確定德國邊界。” [[18]](#18_28)

但俾斯麥沒有忘記錢的問題—德國人被調動起來的貪婪也不會允許他這樣做。與法夫爾的談話結束三天后，他向內閣遞交官方備忘錄（奇怪的是，備忘錄沒有收入他的全集），批評過早確定方案，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們在和談中的任務是爭取盡可能多和滿足各種目標的賠款，總額必須由協商決定。”利益各方對戰利品的分配是內部事務，將在以后由政府解決 [[19]](#19_24)  。俾斯麥遞交的這份備忘錄很可能是為了讓普魯士內閣不要過早提出較低的數字。內閣反復討論該問題，并任命一個特別的下屬委員會研究德國的開支，從而決定賠款總額。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布萊希羅德也在為預想中的賠款制訂自己的計劃。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當德國向法國索取巨額賠款后，以他為首的德國銀行家應該成為德法間的中介，最好把法國銀行家排除在外。但即使在德國銀行家中間，激烈的幕后競爭也開始升溫。1870年10月，亞伯拉罕·奧本海姆致信布萊希羅德，提出兩人在“與戰爭賠款”相關的一切事務上都應該合作。布萊希羅德看上去同意了—也許是為了防止奧本海姆另謀他策。事實上，奧本海姆認為或希望的是，俾斯麥將要求布萊希羅德扮演次要和不太起眼的角色：“正因為你和v.B.間的密切關系（因為與你的這種關系廣為人知，而且可能被誤讀）。”奧本海姆要求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傳達這種意思，從而讓俾斯麥委任奧本海姆為賠款的主要負責人—特別是因為奧本海姆同巴黎的銀行世家富爾家族是親戚。布萊希羅德還應該向俾斯麥保證，“只要他一聲令下，你就會和我一起趕往司令部，口頭向他呈上我們的方案”。如果不這樣，奧本海姆提出也可以自己直接寫信給國王，后者曾鼓勵他在出現嚴重問題時這樣做。布萊希羅德不太可能感到有如此克己謹慎的必要，他也并不一定希望在凡爾賽有個同伴。另一方面，俾斯麥完全沒有奧本海姆所設想的那種顧慮 [[20]](#20_24)  。奧本海姆直到最后都以為兩人將同行，但沒有因失望而失態。獲悉布萊希羅德受邀前往凡爾賽宮后，他發來電報祝賀：“請不要再為我猶豫。祝愿你旅途愉快。請隨時通告情況。我有一封信隨后就到。” [[21]](#21_24)  事實上，隨之而來的有很多信，奧本海姆從未放棄自己將被召往權力中心的希望，無論是凡爾賽或者柏林。他的行李準備就緒。

當布萊希羅德抵達司令部時，不同的部門都在討論賠款問題，包括總額和支付方式。

2月8日，當法國人投票決定繼續戰爭還是接受包括巨額賠款在內的嚴苛和平時，普魯士內閣再次開會商討賠款應該多么苛刻。當所有要求都在會上被列出后，他們得出的數字是大約10億塔勒（或30億法郎），其中95%歸軍隊，后者不僅希望償付戰時花銷，而且想要得到和平時期的預期開支，讓軍隊再次完全做好戰斗準備，并加強德國新邊界的防衛。財政部長坎普豪森表示軍隊的估算有點高，但暗示除了德國受到的有形損失，很快還要計算其他損失。會后立即秘密提交給俾斯麥的簡短紀要表示：“德意志民族畢竟遭受那么多額外的鮮血和物質商品損失，無法用金錢衡量，因此完全有理由夸大估算戰爭代價，而且除了估算的金額，還要對無法計算的破壞追加額外要價。內閣對此意見一致。” [[22]](#22_24)  驅使軍隊的不僅是普通的貪婪，10億塔勒將讓他們在隨后的多年間無須受制于議會的斤斤計較。如果坎普豪森為有形和無形損失索要賠償的想法被公開，無疑可以免去凡爾賽各方確定德方合理損失的工作 [[23]](#23_24)  。

不過，俾斯麥的部長們僅僅提供近似清單，他本人將決定總額。他的決定不以對德國開支的估算為依據，無論估算多么夸大，而是依據他預想中法國的償付能力。不同人預想的結果大相徑庭，而且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錢款的收取方式。

布萊希羅德不時提醒要適可而止。抵達凡爾賽不久，他告訴巴登大公，“法國的財務狀況非常糟糕，他認為甚至連之前提到的40億戰爭賠款都付不起” [[24]](#24_22)  。布萊希羅德認為50億太高了，這已經廣為人知 [[25]](#25_22)  。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則傾向于更高的數字，事實上，凡爾賽周圍還流傳著高得多的天文數字。布萊希羅德告訴軍方，法夫爾已經拒絕了俾斯麥提出的80億 [[26]](#26_20)  。布萊希羅德本人的保守觀點得到2月14日亞伯拉罕·奧本海姆寫給他的一封明智書信的支持：

如果報紙現在胡謅70億到80億法郎，那還情有可原，因為這些人對什么是10億法郎沒有準確認識。但如果作為金融家的我們也跟風，而不考慮法國這樣一個富有國家現在的處境，那就是嚴重罪過。經過一場如此血腥的戰爭，財政來源又被以完全不負責任的方式使用，它幾乎滿目瘡痍。我個人的觀點是，如果我們適可而止并希望獲得中立國的感激，那么我們應該滿足于30億法郎的賠款，再加上供養戰俘的開支。但40億法郎應該是我們要求的上限，而且法國人很可能會毫無怨言地接受。籌集這40億法郎將對法國人造成沉重的負擔，讓他們每年的預算增加2.5億法郎。如果再考慮到戰爭對法國造成多大的破壞，考慮到有多少家庭失去大部分財產，考慮到一點點從戰爭的災難中恢復還需要多少開支，預測他們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恢復元氣并不為過。既要籌集如此大的一筆賠款，又不讓這個國家陷入將徹底毀滅它的金融危機，這絕非小事。 [[27]](#27_16)

布萊希羅德也從巴黎聽到類似的警告。2月10日左右，當布蘭代要求獲得柏林市場的消息時，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布萊希羅德銀行已經恢復正式聯系。施瓦巴赫同意了，并表示“布萊希羅德先生已受召前往凡爾賽，作為處理賠款金融事宜的委員會成員” [[28]](#28_10)  。2月17日，布蘭代直接致信布萊希羅德，請求提出合理要求，并聲稱甚至10億法郎都太多了 [[29]](#29_10)  。布萊希羅德回信稱，他聽說巴黎有足夠的錢，并表示“我希望很快與你會談” [[30]](#30_6)  。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收到來自親信秘書弗里德里希·萊曼的回信，同樣懇請適可而止（顯然布萊希羅德信中提到75億法郎）。萊曼認可布萊希羅德的觀點，即法國本身將從這場沉重的打擊中獲益，因為這將讓它接受和平角色并裁軍（如果結局相反，布萊希羅德是否會同樣覺得普魯士能獲益呢？），但表示：“不過，年輕的德國設定的賠償額超過彌補實際戰爭成本的絕對所需，我真心認為這不公平……如果只是考慮到實際成本，我認為8億到10億塔勒（30億到37.5億法郎）已經是很高的估算了。”向法國提出更高的要求將激怒它，讓德國置身于“危險的道路，或者永遠出于防御姿態，或者成為征服國；那樣的話，我們將無法享受和平的福祉，德國的負擔也不會減輕”。他警告不要“因為尊重輿論而走錯路，畢竟輿論是偽造的。為德國爭取應有賠償的欲望不應成為‘過度’索取的理由” [[31]](#31_6)  。奧本海姆和萊曼提供的意見有先見之明，他們擔心傲慢會導致做出不顧和平經濟后果的決定。我們不知道布萊希羅德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些明智的觀點；但即使他認同，他也不可能說服其他人。

當德國人為賠款數額爭論不休時，法國人不得不組建一個負責和談的政府。選舉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人向往和平，并希望恢復君主制。在沒有被廣泛接受的王位繼承人的情況下，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于2月18日當選法國政府的行政領導人。梯也爾是法國政治元老，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政治家—令德國人難堪的是，他們國家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人物。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他一直反對威權統治，并在他幫助建立的奧爾良派王朝中擔任過部長要職（時年35歲，36歲時又成為法蘭西學院的成員）。他的理想是以保守的社會秩序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1871年2月，作為被打敗的法國眾望所歸的救世主，他不得不與貪婪的征服者展開斗爭，并制止意圖反叛的激進派。為了阻止國內的起義，他需要與外國人達成和解。他是法國歷史的熱情記錄者，該國歷史已經展示過戰爭與革命的聯系 [[32]](#32_6)  。當時的德國人很少考慮這些問題，但到了1918年，他們將懇求適可而止的和平條件，他們威脅說，因為任何其他結果都可能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帶到德國。

就職三天后，梯也爾踏上前往凡爾賽宮的憂傷之旅。他對德國人的寬宏大量不抱任何希望，但即使是這樣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最初受到大量禮遇）也對俾斯麥的口氣和條件感到震驚。談判持續了六天，但記錄少得可憐 [[33]](#33_6)  。談判的結果并不在預料之中，盡管梯也爾求和欲望強烈，而且他的國家重新開戰的能力也幾乎為零。凡爾賽宮的氣氛經常一觸即發。俾斯麥掌握著大部分王牌，但他受到來自本國軍隊的壓力，而且擔心最后時刻的外國干涉。難怪王儲覺得他“暴躁到了極點”，害怕他“按照自己慣常的方式，再次采取導致戰火重燃的政策” [[34]](#34_6)  。

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主導著談判：賠款金額和割地范圍。梯也爾對總額的估計顯然是50億，當俾斯麥（出于戰術原因）在一張紙上寫下60億時，梯也爾嚇得不輕。他“好像被瘋狗咬到那樣”跳了起來，一長串夸張之詞脫口而出，最后激動地表示：“這是侮辱。”（C’est une indignité.） [[35]](#35_6)  這時，被激怒的俾斯麥轉而說起德語。法國人拒絕60億賠款的要求，認為這個數字大到無法計算，即使有人從耶穌時代就開始一法郎一法郎地數，他到現在也數不完60億。俾斯麥則回答說，“他已經為此做好準備”，帶來一位從創世時就開始數錢的專家（布萊希羅德） [[36]](#36_6)  。他向梯也爾保證：“我們的兩位最重要的金融家已經設計好方案，這筆賠款雖然看上去巨大，但支付時你們將感受不到。” [[37]](#37_6)  俾斯麥真認為可以割掉一磅肉而不引起劇痛嗎？無論如何，雙方必須達成一致的不僅是總額，還有德方提出的支付流程。德國人希望控制支付方式（并規定由德國銀行家扮演主導角色）；法國則擔心自己的經濟難以為繼，無法滿足盡快付清賠款的需要：從法國北部逐步撤兵將與賠款的分期支付相聯系，因此法國人有動力快速解除這個負擔。

布萊希羅德和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試圖說服法國人，放血將是無痛的。為此，2月23日，他們在特別安全保證下被送到巴黎，與法夫爾和他的專家展開談判。法夫爾后來回憶起與德國全權代表（俾斯麥對他們大加贊賞）的這次會談時說：“布萊克施羅德先生［M.Black Schröder，原文如此］和德·霍伊克爾伯爵［Count de Heukel，原文如此］的龐大財富、巨大聲望和毋庸置疑的智慧讓他們躋身第一流的［銀行家］。”但法夫爾和同僚沒有被他們提出的“巧妙安排”說服，沒有允許由兩位銀行家和他們的德國合伙人收取賠款并與德國政府達成協議。法夫爾記錄了“這兩位普魯士的金融君主”給他留下的“痛苦印象”：

他們總是面帶微笑，語氣柔和，話語中帶著動聽的、幾乎動人的禮貌，不遺余力地向我們證明他們多么希望接手我們數十億賠款的龐大業務。他們在該問題上談了很久，對每一項反對都做了回答，除了那些我們出于禮貌說不出口的。 [[38]](#38_6)

會談無果而終，亨克爾回到凡爾賽，擔心和談將徹底崩潰 [[39]](#39_6)  。布萊希羅德在巴黎一直待到與朋友埃米爾·布蘭代見面，然后也返回凡爾賽。

俾斯麥和梯也爾就賠款和新邊界的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直到和約草案簽署前幾個小時。俾斯麥對法國人的反對和拖延感到憤怒，部分原因是英國政府正在最后努力，迫使減少計劃中的賠款 [[40]](#40_6)  。梯也爾要求羅斯柴爾德男爵參加他們最后的會談，當后者最終現身時，俾斯麥把積蓄已久的怒氣都發泄到倒霉的羅斯柴爾德身上。過去幾周里，俾斯麥開始討厭這個人，無理由地憎惡他說法語和對法國忠誠（當時的俾斯麥認為，任何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都只是來自法蘭克福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后來告訴皇儲：“俾斯麥伯爵在談判中似乎表現出極度的無禮和有意的粗魯，這樣的行為特別讓巴黎的羅斯柴爾德深受震驚，他一開始對俾斯麥說法語。” [[41]](#41_6)  無論是否受到俾斯麥可怕粗魯的影響，和約草案在2月26日晚終于簽署，距離停火結束只有幾個小時。賠款額定在50億法郎，但支付方式由法國人決定。這是他們為自己爭取到的最后權利—布萊希羅德很可能對此感到遺憾。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戰爭結束的喜悅超過苛刻條件帶來的痛苦。不過，即使在德國也有不同的聲音：皇儲認為，包括賠款在內的德方條件太苛刻了—社會黨人奧古斯特·倍倍爾同樣持此觀點 [2](#2_15)  。英國人的抗議來得太晚，俾斯麥已經收到梯也爾接受條件的消息 [[42]](#42_6)  。多年后，俾斯麥告訴帝國議會，與德國人在賠款問題上的態度相比，如果再爆發一次戰爭，法國人將永遠不會如此體諒戰敗的德國：“世界上不會再有像基督徒德國人那么有節制的勝利者了。” [[43]](#43_6)  很難想象，法國人會相信這算得上節制。但無論是否基督徒，德國人都對勝利歡欣鼓舞。

布萊希羅德分享了榮耀。德國新聞界報道他在凡爾賽的活動，一份報紙寫道：“布萊希羅德先生堪稱該領域的小俾斯麥，知道如何同變得日益膽怯的法國人打交道。” [[44]](#44_5)  他讓法國人背上沉重的負擔。但他沒有為自己或德國銀行家在后來的金融運作中贏得壟斷地位。歐洲的頂尖銀行家之間隨即展開激烈競爭。

布萊希羅德又在凡爾賽停留了一周或更長時間；他在圣克魯宮大道的居所總共待了一個多月。他顯然對自己的重要角色頗為得意—也許過于明顯了。在這群基督徒和貴族中間，在平民受到輕視和猶太人受盡鄙視的軍營里，布萊希羅德一定顯得非常特別。他知道這點嗎？如果他意識到身邊充滿敵意，他會更加謙虛、更少自夸嗎？或者他是否感受到（也許是無意識的），作為一個猶太人，無論做出什么貢獻和奉獻什么禮物，無論多么低調，他都將是惡意玩笑中的笑柄？他似乎對輕視和流言無動于衷：他履行自己的工作，得意于同大人物的親密關系，也許他認為這些人會用尊敬回報他的服務，即使不是感激。

那個月里，他經常與俾斯麥一起用餐和交談。他覲見新皇帝和皇儲，會見南德意志的大臣們，甚至還冒險進入軍方“半神們”的巢穴。他自視為官場的一員，可以自由享受隨員的特權。有一小段時間，他在柏林的家被允許使用軍方電報向他發送股市報價；但后來，軍方憤怒地拒絕繼續這樣做 [[45]](#45_5)  。不過，他了解柏林的狀況，在凡爾賽有很多人私下向他打聽市場的消息和他的看法。哈茨菲爾特等人還利用布萊希羅德與羅斯柴爾德的關系送錢給巴黎的親戚 [[46]](#46_5)  。

不過，凡爾賽仍然存在強大的反猶主義暗流。毛奇的親信布隆薩特·馮·舍倫多夫（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認為布萊希羅德的存在是恥辱，他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

現在，他（俾斯麥）急不可耐地與自己的猶太人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磋商，讓他來這里參與關于向巴黎索取戰爭賠款的官方討論。令人奇怪的是，如果在國家事務中充當顧問的不是普魯士銀行的官員，而是首相的私人猶太人，我們設立這樣的機構有什么用……布萊希羅德今天早上來到總參謀部。他的紐扣孔里插著一朵經過工藝處理的多彩玫瑰，這是許多基督教軍團的騎士身份象征。和真正的猶太人一樣，他吹噓自己受到國王的私人接見，吹噓他的其他關系，吹噓他和羅斯柴爾德這樣的人享有的信譽等等。他對政治形勢和俾斯麥伯爵的意圖足夠了解；現在，他希望獲得參謀長的幫助，甚至有機會同毛奇伯爵打交道。 [[47]](#47_5)

2月25日，在與法國談判者大干一仗后，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和其他顧問聚餐。巴登首相尤里烏斯·約利（Julius Jolly）回憶這件事時說：“談話極為有趣。差別最大的觀點和欲望都得到表達：碰巧在場的勒納德伯爵（Count Renard）代表最粗暴的普魯士精神，長著無與倫比的猶太人面相的銀行家布萊希羅德代表英勇的自尊……亨克爾伯爵代表見多識廣的圓滑。” [[48]](#48_5)

2月26日，當和約草案終于簽署，梯也爾和法夫爾也已離開后，俾斯麥“興致很高地”與自己的隨員聚餐，包括巴伐利亞首相布拉依伯爵（Count Bray）和布萊希羅德。這是一場慶功宴，晚宴結束后，甚至包括毛奇在內的對手也前來送上祝賀，并與俾斯麥握手言和 [[49]](#49_5)  。這是歷史性的時刻，即便沒有布萊希羅德那么虛榮的人，也會因為當時的聚會和場景而興奮不已。

幾周前，布萊希羅德在柏林的秘書弗里德里希·萊曼抱怨他在凡爾賽待得太久，并取笑說，面對重新開戰的威脅，這次旅行不能“算作生活中的重大樂事。因此我只能希望您自愿的自我犧牲將得到大量榮譽作為獎賞” [[50]](#50_5)  。布萊希羅德無疑有類似的想法。離開凡爾賽前，他收到二等鐵十字勛章，表彰他剛剛提供的服務。在熱情地恭喜他獲得這項實至名歸的榮譽后，門德爾忍不住又表示：“愿你永遠不必佩戴不同的十字！阿門！” [[51]](#51_5)  除了公共榮譽，布萊希羅德知道自己在同輩中已經聲望鵲起。有時愛挖苦人的戈德施密特從維也納致信布萊希羅德，談到他的“這次偉大而光榮的出行，甚至可以說將被載入世界史……我相信在凡爾賽的日子向你呈現了許多最有趣的東西，讓你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只有被上帝眷顧的人才能經歷這些” [[52]](#52_5)  。盡管后來獲得許多更大的榮譽，但很難想象有什么比在凡爾賽的這個月，比身處權力和上流社會的最核心，更讓布萊希羅德得意。

[1.](#1_14) 本書寫于1977年，當時兩德尚未統一。——譯注

[2.](#2_14) 3月4日的《經濟學人》（Economist）評論道：“……勝利之后索取大筆金錢暗示這樣的想法，下一次金錢將不僅是戰爭的意外犒賞，而且還是目標。討價還價的風氣已經侵入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拉低政客的品格，遲早還會影響人民的品格。”在某些方面，賠償比討價還價更早—它涉及粗暴地利用權力，這同樣會拉低政治家的品格。

# 第二部分　帝國的銀行家

##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維尼林夫婦是倫敦一個嶄新街區一幢嶄新房子里的嶄新住戶。維尼林夫婦的一切都是簇新的。他們的家具都是新的，他們的朋友都是新的，他們的仆人都是新的，他們的門牌是新的，他們的馬車是新的，他們的韁轡是新的，他們的馬是新的，他們的畫是新的。就連他們自己也是新的，他們結婚的時間剛好夠合法生下一個全新的嬰兒。如果他們搬出一位曾祖父，他也一定是被包好從家具倉庫送來，身上沒有一點刮痕，直到頭頂心都锃明瓦亮。

——查爾斯·狄更斯，

《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統一前，各地和各公國的氣氛與生活方式是地方性和歐洲化的；統一后的變化漸進而不徹底。勃蘭登堡是個例外。對于這個普魯士的核心區域，對于這片地處邊境、土壤貧瘠多沙、城市坐落于巡閱場和稀疏松林間的貧窮平原，對于這個擁有駐防要塞以及斯拉夫短工和胡格諾工匠工作的臃腫莊園，由條頓騎士后裔統治的邊遠省份，俾斯麥的成功戰爭和帝國的奠基立刻帶來大筆金錢、大型企業、龐大建筑和宏大理念，模糊等級的界線，讓軍規和家法膨脹為瓦格納式的表演，扼殺早前的經濟傳統、簡樸和誠實。商人們開始大把賺錢，資產階級變得富有，富人變得豪富。官員的薪酬仍然微薄，但他們充滿自負。銀行家的兒子們加入近衛軍，而不是子承父業。準將的兒子們放棄軍銜，更樂意迎娶女演員或女繼承人。軍裝不再是表明職責的制服，而是變成所有者炫耀自己和吸引意中人的羽毛。人們仍在辛勤勞作，但也開始消費和炫耀。

——西比爾·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遺產》（A Legacy）

新帝國誕生于鮮血和狂喜中。突如其來的勝利和統一讓德國人對自身的力量和重要性有了新的感受。勝利披著戲劇化的英雄主義外衣，德國人覺得他們的生活和共同命運發生劇變。他們不再把自己看作詩人、夢想家和思想家的民族：19世紀70年代初，他們發現自己踏上通往權力和世界大國地位的道路，在軍事和政治上，他們不再是歐洲的鐵砧，而是成了鐵錘。

這是令人陶醉的體驗，到處彌漫著喜悅的情緒。一位年輕學者寫道：“我感到仿佛每天都是星期天。” [[1]](#1_50)  最讓當時的人興奮的是法國的戰敗，這個國家已經統一許多世紀，一直以來都以赫赫武功出現在世人面前。突然，德國人將自己的軍事勝利變成神圣正義的工具：是上帝懲罰輕浮和腐朽的法國人。對德國人來說，慶祝他們自己的政治統一就沒有那么容易了，因為這場特別的革命來自上層，并非他們的勝利，而是由俾斯麥主導，作為其象征的霍亨索倫王朝很快被賦予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fen）的帝胄光環。巴伐利亞人更愿意慶祝擊敗法國，而不是普魯士新確立的霸權。強調德國的軍事力量產生一個明顯而重要的后果：它讓政府和君主的傳統臣仆獲得新的威望。德國的軍官們是當時的英雄，但他們絕大多數來自普魯士的老地主貴族，來自容克階級。因此，在德國完成現代化的同時，現代社會中過時和經濟上處于衰退的元素再次得以興起。

新的驕傲既是自發的，也是精心培育的。經過許多個世紀的分裂，在遭受許多恥辱的失敗后，整個民族都為勝利陶醉。即使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這樣老于世故和敏銳的見證者也在1871年3月的日記里寫道：“對我們德國人來說，這是什么樣的和平啊！比我們曾經取得過的一切更加偉大和光榮！我們統一成了一個帝國，歐洲最偉大、最強大和最令人敬畏的帝國，它的偉大不僅來自物質力量，更來自其文化，來自感染其人民的精神。” [[2]](#2_50)  短短幾個月里，德國人突然長高了幾英寸，走路的姿態也更加驕傲。就在帝國滅亡前不久，馬克斯·韋伯指出，“德國人的外在舉止極度缺乏優雅和尊貴” [[3]](#3_48)  。

勝利需要得到公開和私下的頌揚。每座城市和每個成員邦爭相為這場偉大勝利舉辦慶典和留下紀念，柏林自然是第一個。一夜之間，它成了歐洲大陸的政治中心。正是在柏林，在1871年6月的一個完美夏日上演了這個國家的盛大勝利游行：展示軍威的隊列看不到盡頭，最前方是馬背上的毛奇、俾斯麥（當然身著戎裝）和羅恩，隨后是獨自一人、威儀堂堂的威廉陛下，然后依次是他的兒子們和帝國的親王—身后還有4.2萬人參加游行—花環、凱旋門和熱情的觀眾一應俱全。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回憶說：“來自全軍的士官們走在軍隊的前面，手持81面法國旗幟和鷹，對一顆德國人的心來說，這是最值得驕傲的場景。” [[4]](#4_48)  該城為游行支付15萬塔勒，但與后來不斷攀升的愛國炫耀成本相比，這不算太高 [[5]](#5_48)  。

游行結束后，除了每年為銘記法國的恥辱而舉行的色當節，德國藝術家們也用一大波紀念碑式的繪畫、建筑和詩歌慶祝新帝國的成立，一切都模仿之前的英雄風格。他們試圖讓這場勝利在民眾心中立即神化。一切散發著權力和成功的味道，新的民族浮夸掩蓋了之前的清醒和畢德邁耶爾式（Biedermeier）的節制。事實上，一個新的民族已經誕生，像尼采這樣的不合群者的擔心之音，這場偉大的勝利可能導致德意志精神的毀滅，沒人聽得見 [[6]](#6_46)  。

柏林是這個新帝國的中心。它過于突然地意識到自己新的重要性，它成了一座引人矚目的大都市。不過，就像在1870年前統一就已經不動聲色地醞釀了幾十年，柏林城也早已開始改變，但它的自我認識沒能跟上現實的變化。這座城市已經不再是以宮廷和舊精英們為主的沉寂而著名的都城。到了1871年，柏林已經清楚地象征著新社會的元素：人們開始意識到，柏林在過去和未來都是一座生機勃勃地擴張著的城市，是成長中的銀行、貿易和工業中心。一個新柏林在舊柏林的周圍和上方成長起來。

人口數字可以說明部分問題：19世紀50年代，城市人口增長20%；1861年，在兼并了幾個外圍地區后，城市人口達到52.9萬人；到了1871年達到82.4萬人，兩年后達到90萬人。到了1877年，居民超過100萬。在17年里，柏林的人口翻了一番，成了歐洲發展最快的首都之一（該城猶太人口的增速更快，1860年為18900人，1880年達到53900人） [[7]](#7_46)  。

柏林成了機會之城，數以千計的東普魯士人逃離貧窮的農村，到工廠里尋找收入微薄的工作。柏林成了吸引不滿現狀或野心勃勃的外省人的磁石，就像整個19世紀的巴黎那樣。它也是吸引猶太人的磁石，其中許多來自東歐，他們發現柏林是一座有貿易和商業發展前途的開放城市，提供給專業人員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這座城市開始感到自己的重要性。1870年，甚至在新帝國尚未建立前，流行滑稽劇《柏林成了世界之城》（Berlin wird Weltstadt）就在劇場演出季大獲成功，劇名成了城市的代名詞 [[8]](#8_46)  。城中沒有鋪過的街道、相當死板的文化生活和雜亂無序的市容揭穿世界之城的謊言；但另一方面，它成了新貴們的金錢之城（Geldstadt）。鐵路和航道讓該城令人艷羨的地理位置得到充分利用，柏林成了商業大都市，工業規模穩步擴大。帝國時期的柏林仍然是暴發戶和外省人的奇異混合體。無論多么重要，它始終沒能獲得巴黎或倫敦那樣的都市活力與優雅。

瓦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 [1](#1_17)  曾用“狂歡中的芝加哥”（Chicago an der Spree）這樣意義極其含糊的話稱呼柏林 [[9]](#9_44)  。這是大多數柏林人最不愿聽到的。他們曾喜歡被稱作北方的斯巴達；但在帝國時期，芝加哥也許更接近現實，無論對于這些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就被警告避免讓德國美國化，愿意放棄斯巴達而成為當代雅典的人來說，這種類比多么傷人。

與芝加哥類似，柏林也是一座資本主義生機勃勃的城市。但與芝加哥不同，柏林有舊階級，他們憎惡城中醞釀的變革。資本主義有自己的節奏，既能取得令人陶醉的進展，也會遭受災難性的倒退，周期性的每次轉向都讓人們相信，新的方向將注定持續下去。19世紀70年代初，勝利的激動和以賠款形式突然流入的50億法郎引發無與倫比的繁榮和投機狂熱。這是奠基之年（Gründerjahre） [2](#2_17)  ，是瘋狂推動和創造的歲月。這種新精神找到一個戲劇性的焦點：股市。建于19世紀60年代初的柏林交易所是一座新文藝復興風格的豪華建筑，19世紀70年代初，那里成了人人談論的希望與期待的裁判所。在不可避免的崩盤到來前的短暫而戲劇性的時間里，股市成了所有人的誘惑神殿。投機狂熱完善了德國人對自己的新認識：正是在這個資本主義處于夸張狀態的時期，德國人開始意識到，新的經濟制度已經主宰他們的社會。他們再也沒有從這種認識帶來的震驚中完全恢復—從此，反對資本主義一直是德國人生活中的強大力量。

隨著資金涌入柏林，它的面貌發生改變，但也開始反映出新秩序下的社會不和諧。資本家的欲望席卷城市，柏林成了極端之城：富人在城西為自己建造宮殿，而窮人則生活在被稱為“出租營”（Mietskasernen）的城東貧民區。富人的艷俗與窮人的拮據形成鮮明反差；無論在風格還是階級上，新柏林都不和諧。幾十年后，一位觀察者驚訝地看到，這座城市里可以找到“各式廉價和昂貴的丑陋……這邊的亞述神廟旁是一座來自紐倫堡的貴族宅邸；稍遠些可以瞥見凡爾賽宮，然后是百老匯、意大利和埃及的記憶—設計者酒后突發奇想制造的可怕畸形兒” [[10]](#10_43)  。但這些反差正是奠基時代（Gründerzeit）的本質，直到幾十年后，柏林人在回想起那個年代時仍然感到厭惡 [3](#3_15)  。

城市社交生活的特點是新富者和舊精英的不安互動，窮人完全被無視。宮廷仍然是社會之巔；在政府、官僚體系以及深受仰慕和頻頻露臉的軍官團體上層，老貴族們仍然保有自己的職位。他們是舊秩序的支柱。但城市的動力、力量和財富來自新階層，來自銀行家、實業家和工商業大佬。

富人覬覦舊精英的傳統，舊精英則鄙視和覬覦新富者的財富。富人希望用自己的財富套住舊式顯貴，同時通過獲得頭銜和勛章與舊精英一較高下。這是一個緊張和不安的時代，一個新舊階級逐漸融合的時代。這是一個價值觀發生變化的時代，特別是自我認識經歷痛苦變化的時代。在把自己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時，德國人學會對權力的崇拜，現在這種崇拜也以某種方式滲入他們國內的生活，與舊有的價值和利益發生沖突。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支配者，植根于自家莊園的老普魯士精英曾經奉行榮譽、節儉、責任和自律的簡單生活準則。他們無法否認權力的現實或財富的誘惑。但他們覺得新風格危險而令人反感，他們的反感既是真實感受，也出于自私心理。這讓他們一直堅持自己特權的主張有了某些理由。舊階層憎惡現代化，而德國的現代化顯得特別快速和浮夸。但他們也憎惡與現代社會制造的新精英分享權力和特權：“與全新的服務貴族（service nobility），與擁有或沒有貴族頭銜的富豪，與經過或未經洗禮的做舊衣買賣的猶太人（Kleiderjuden），甚至有時與梳過頭或沒梳頭的（gekämmten und ungekämmten）學者。” [[11]](#11_43)

總而言之，柏林是一座未完工和變化中的城市。它既不是也沒有成為資產階級的城市—就像這個帝國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無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建立自己的價值標準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貴族。在帝國時期的柏林，身份的標志不是資產階級的黑色外套，而是國王的制服；甚至俾斯麥也總是穿著胸甲騎兵的外套現身議會。1914年，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 [4](#4_15)  寫道：“不存在以自己為榮，具有獨立社會地位的資產階級。” [[12]](#12_41)  出于政治和歷史原因，即使在享有無與倫比的經濟力量的那幾十年里，德國資產階級也對早前貴族對手的價值觀俯首帖耳，盡管后者在經濟上捉襟見肘，常常依靠資產階級的財富和援手才能體面地生存。

德國沒能實現資產階級化，對該國猶太人產生了特別影響。這也許有利于他們社會地位的提升，此類提升在帝國時期非常引人注目。但這也導致他們更容易受到污蔑。與某些資產階級鄰國相比，不愿完全承認自己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身份的德國在精神上更難容忍猶太人地位的提升。

1871年3月，布萊希羅德從凡爾賽返回柏林，比威廉的歷史性入城式晚了幾天。布萊希羅德取得自己的勝利，他親眼目睹帝國的誕生，是唯一參與重大決定的猶太人。他的鐵十字勛章見證過去的激動。他的若干支持者—銀行家同行和猶太人同族—不得不對他表現出更大的尊敬。49歲時，他已經取得很多。他是柏林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也是那里最富有的公民之一，他還是俾斯麥的參謀和許多精英的顧問。

隨后的二十年里，布萊希羅德變得更加強大、著名和顯赫。在帝國時期，工業資本主義決定社會的面貌與發展；與其他地方相比，德國銀行家對主要工業企業的決策擁有更大的控制性影響。19世紀70年代初，以股市快速致富心態為象征的新經濟周期成了德國人生活中被承認的現實，盡管許多人對此表示遺憾。由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資本主義在德國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布萊希羅德自己的角色也受到更廣泛的認可和非議。

1871年后，布萊希羅德被更深地卷入現代工業世界。他幫助重組被稱為“勞拉舍”（Laurahütte）的西里西亞煤礦工業區，并推動西部的希波尼亞（Hibernia）大煤礦組建新公司。就這樣，他在采礦業這個經濟中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擁有了巨大利益。他還擴大與多條鐵路的聯系。與他關系最密切的幾家公司在1873年經濟崩潰中受到的影響比其他大部分企業小得多。他富有冒險精神但也不失謹慎，既能在好年景賺錢，也能在壞年景保住錢。他保持甚至還增加了在國際債券市場的份額。簡而言之，他是德國經濟生活各門類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以某種形式參與幾乎所有經濟領域的重大決策。

為了追逐自己的各項利益，他不得不與其他銀行家緊密合作；國家或國際層面的大型項目幾乎總是需要財團，布萊希羅德必須保持警惕，以防對手捷足先登。在法國賠款支付問題上，即使布萊希羅德最親密的合作者（比如漢澤曼的貼現公司）也試圖將他排除在一項有望名利雙收的安排之外。在關鍵的賠款談判過程中，尤里烏斯·施瓦巴赫向布萊希羅德回憶起一個故事，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習慣性的對立：銀行家施派爾（Speier）總是提到，一位經紀人賺了40盾時，他會宣稱自己賺了500盾。當有人對此提出疑問時，經紀人解釋說：我賺了40盾，其他經紀人少賺了460盾，因此我總共賺了500盾 [[13]](#13_37)  。

但布萊希羅德參與實業不僅是為了自己。就像大衛·蘭德斯所說，銀行業總是在用別人的錢，就像客戶需要布萊希羅德，他也需要客戶。他是大臣、外交官、將軍和出身顯赫者的銀行家—他們對他趨之若鶩，被他的精明、有保證、久經考驗的誠實和對政治經濟形勢無與倫比的認識所吸引。布萊希羅德為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 [5](#5_15)  在1873年說的話提供了例證：“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中，我都想象不出比最初形態更好或更成功的私人銀行。一個人在財富、誠實和能力上得到公認，鄰居們就會把大筆錢托付給他。信任在嚴格意義上是個人的。” [[14]](#14_37)

對于特殊的顧客，對于能給他幫助的顧客，布萊希羅德可以給予超常的優惠。他可以指導少數幾位如何賺錢，而其他人則需要他拯救自己的財富。所有的客戶都能指望他的建議，有的還能以較低的申購價格購買新發行的債券。他的熱心為所有人提供心理和金錢保證：他以專業的方式照管德意志帝國時期許多人仍然不屑但又離不開的東西—他們的錢。

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和利益無處不在：只有他享有同俾斯麥的親密關系，大部分有權勢或野心的德國人都不敢輕易得罪他。他自己的合作者圈子和影響范圍反映出德國精英們同氣連枝的特點。就像一位歷史學家不久前所寫的：

工業特別是銀行業的集中化和大財閥化傾向，將一小群領軍企業家、經理人和金融家放到德國經濟的指揮橋樓上，他們控制經濟核心領域的決策過程。從政治和社會史角度來看，這種傾向變得至關重要。他們融入帝國的封建社會等級，與之相對應的是他們行事和思維的威權風格。 [[15]](#15_35)

換句話說，當布萊希羅德出現在指揮橋樓上時，他擁有額外優勢，知道或者至少假裝知道俾斯麥的動向。他是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重要紐帶，而且他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這兩個領域都無能為力的人。在無能為力者和偏執狂看來（兩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布萊希羅德似乎是最邪惡的幕后操縱者。

布萊希羅德的人生描繪了19世紀的一個中心故事：資產階級富人奢華但可悲的處境。他為德國富豪的不穩定地位提供了寫照：他們苦苦追求財富和地位，但發現前者并不能帶來后者。與窮人變得富有相比，富人獲得榮耀更難。柏林充斥著富豪新貴，也充斥著作為富豪新貴中賤民的猶太人。他們受到雙重歧視，因此想要被社會接受的愿望比他們的基督徒同胞更為迫切。

布萊希羅德的人生幾乎是富豪尋求被接受的“理想類型”（不是規范性的，而是韋伯意義上的 [6](#6_15)  ）。布萊希羅德的故事也是許多資產階級富人的故事，但至少他的故事以世界—歷史為背景。在描繪布萊希羅德的發跡時，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標準評判—他弟弟尤里烏斯的生活方式更加普通，可以適用我們的標準。我們也不能忘記，布萊希羅德不是特別喜歡反思的人：他是實干家和活動家，孜孜不倦地迎合現有的狀況，有人可能會稱之為機會主義。但與其說布萊希羅德的成功依靠機會主義（這個詞總是暗示一定程度上的陰謀），不如說他發展出幫助實現自己社會目標的本能，他在經濟領域已經將其運用自如。

當然，反諷的是，布萊希羅德試圖爬得越高，他就越發清晰地成為所有嫉妒、恐懼和鄙視猶太人富豪社會地位之人的靶子。到了19世紀70年代初，布萊希羅德已經成為柏林社會各色人等中家喻戶曉的名字。在《噼里啪啦》（Kladderadatsch）上—一份在全國發行的柏林幽默雜志，供稿者大多是猶太人—布萊希羅德成了新崛起階層的象征。提及他的地方很少有恭維的意思，但比對新道德的其他大部分記錄更客氣。諷刺作家們知道，無論作為個人還是類型，布萊希羅德一眼就會被認出。19世紀70年代初，布萊希羅德終于把許多人曾經對他的恭維稱呼變成現實：柏林的羅斯柴爾德。他沒有那個家族的顯赫歷史，財富也不及他們，但他現在獲得盛名，與象征猶太人財富和神秘影響的前輩相比，他很可能對此更加在乎 [[16]](#16_35)  。

布萊希羅德的生活中有許多地方象征帝國的風格。他仍然住在位于老柏林中心的貝倫街63號，這棟龐大而裝潢華麗的宅邸既是他的私宅，也包括他的營業場所。戰前，他把一層樓面租給瑞典大使，把幾個房間租給奧伊倫堡伯爵；戰后，他需要整棟房子，把私人辦公室搬到瑞典大使曾經的沙龍，那里有一面對著貝倫街的大窗戶 [[17]](#17_29)  。

這是一條繁忙的街道，遍布巍峨的宅邸和軒敞的辦公室 [[18]](#18_29)  。西面是老宮殿和新貴宅邸林立的威廉街，俾斯麥就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布萊希羅德距離首相的辦公室只有幾步之遙。皇儲的宮殿從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延伸到貝倫街，旁邊是歷史悠久的顯赫家族所住的較小宅邸 [[19]](#19_25)  。著名猶太銀行家馬格努斯（Magnus）和瓦紹爾（Warschauer）就住在那里，而漢澤曼的貼現公司則在距離布萊希羅德家幾棟樓之外建造了宏偉的總部。往東同樣不用走很遠就是柏林證券交易所，布萊希羅德早年曾親自前往那里。就像內森·羅斯柴爾德（Nathan Rothschild）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傳統柱子那樣 [7](#7_15)  ，布萊希羅德也有自己位于交易所中央的位子。現在光顧那里的是他的合作者 [[20]](#20_25)  。

因此，布萊希羅德與東面的證券交易所和西面的俾斯麥距離大致相當。這同樣是個象征性的位置，讓人聯想起他的出身和抱負。“交易所猶太人”（Börsenjude）這個綽號在當時司空見慣，經常和出身東歐的人聯系起來 [[21]](#21_25)  。離俾斯麥越近，他就越容易進入威廉街的那些辦公室，同時更加遠離曾經代表他一切的股市。

但布萊希羅德不斷需要對自己更高聲望的更多認可；在這個各級榮耀和威望界限分明的社會里，他希望永不停步地向上攀爬。戰前，他已經贏得平民所能向往的最高頭銜：他被任命為樞密商務顧問，人們稱呼其為“樞密顧問先生”；他還得到與那個頭銜相配的必要勛章。但普法戰爭后，民族英雄們獲得特別慷慨的獎賞。威廉用新的頭銜和大筆封賞嘉獎勝利的締造者俾斯麥、羅恩和毛奇。整個在位期間，威廉只在1871年將俾斯麥一人封為親王。俾斯麥馬上抱怨說，自己由富伯爵“淪落”為窮親王。布萊希羅德夢想著類似的“淪落”。

他知道，資產階級的榮譽并非終點，下一步是躍入世襲貴族的行列。這是擁有財富或聲望的所有平民的夢想；在法律上，此類擢升將帶來與最古老的藍血貴族同等的地位。事實上，這種所謂的平等只是幻想，老貴族仍然瞧不起新貴族，而新貴族一邊仰視老貴族，一邊俯視平民。在第二帝國，社會流動性實際上意味著這種眼球的快速運動—這種可怕的仰視和俯視就是社會。布萊希羅德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兩代之前就獲封貴族。事實上，奧地利帝國早在18世紀末就將富有的猶太人封為貴族，通過說服或買通，也可以讓較小的德意志邦國這樣做。在普魯士，為國效勞和致力慈善的富豪偶爾會得到這樣的榮耀，但與法國或英國貴族相比，普魯士貴族很不愿意用如此商業化的方式擴充自己的隊伍和錢包。在普魯士，這最多只是一種罕見的榮耀，還沒有未皈依的猶太人被擢升為世襲貴族。

但在1872年，布萊希羅德獲得了這樣的榮耀。分封貴族是皇室特權，威廉很珍惜剩下的這點權力。這次的提議來自俾斯麥，他口頭要求威廉授予布萊希羅德貴族頭銜。因此，不存在俾斯麥的書面申請，我們所知道的只是1872年3月8日，威廉正式簽署封布萊希羅德為世襲貴族的證明書。對布萊希羅德來說，這幾乎算不上意外：六個月前，施瓦巴赫曾寫信給他，表示聽說他的貴族封號證明書已經在巴德加斯泰因被簽署 [[22]](#22_25)  。稍早之前，他的岳父在來信中說：“親愛的蓋爾森，我在報紙上讀到你受邀參加陛下的晚宴，我希望這些殊榮能有利于你的健康。” [[23]](#23_25)  國王和官方備忘錄與俾斯麥寫給普魯士內政部長的信宣布，阿道夫·漢澤曼獲得同樣的榮耀 [[24]](#24_23)  。（這種聯系讓包括歷史學家在內的人們相信漢澤曼也是猶太人，但事實并非如此。）正式的證明書令人印象深刻，開頭寫道“我威廉，普魯士國王，蒙上帝圣恩”，然后宣布布萊希羅德及其現在和將來的直系后代都將躋身貴族行列。作為外在標志，他的姓名中將加入令人艷羨的“馮”，此后他將與所有貴族平起平坐，包括那些天生的貴族。但皇家公告的通常措詞被做了一處特別的修改：當君主本該解釋說，他試圖向全體臣民普施恩澤，但不得不挑出那些“出身好家庭，本人又以對我的忠誠和有益效勞著稱……”時，他刪去了“好家庭”，用“公心活動”代替“有益效勞” [[25]](#25_23)  。即使國王也無法假裝布萊希羅德出身普魯士人所稱的好家庭。

敕令足夠引人矚目，某些方面甚至比當時的人所能知道的更不尋常。在19世紀70年代的記錄中，威廉總共只擢升兩位銀行家為貴族。整個在位期間，他只新封了131個貴族，大多已經與貴族有親緣關系，其中差不多90%是新教徒。有人認為，威廉的分封加強了老貴族的排外性，從而加深了階級界限 [[26]](#26_21)  。德國的猶太報紙《猶太人大眾報》（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ums）強調了這次分封的獨一無二：

有直系后代的猶太人被封為貴族，這在普魯士歷史上是第一次。無論如何，布萊希羅德的受封[僅僅]是猶太人第二次在普魯士被封為貴族（第一次是科隆的亞伯拉罕·馮·奧本海姆男爵） [8](#8_15)  。普魯士沒有個人貴族[persönlicher Adel] [9](#9_13)  。前任國王拒絕封舉世聞名的猶太人梅耶貝爾 [10](#10_13)  為貴族，盡管方式非常禮貌。 [[27]](#27_17)

布萊希羅德一躍成為德國最著名的猶太人。

反諷的是，他獨一無二的地位得益于其他貴族的危險困境。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被封為貴族是因為他們出手拯救了陷入施特魯斯貝格博士（Dr.Strousberg）的羅馬尼亞鐵路計劃破產事件中的普魯士容克貴族的財產—這在當時廣為人知，并在后來得到俾斯麥的證實 [[28]](#28_11)  。英國大使言簡意賅地告訴索爾茲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 [11](#11_13)  ：“皇帝加封他們男爵，作為對其努力的獎賞。” [[29]](#29_11)  許多大貴族—以普特布斯親王（Prince Putbus，很快被戲稱為“破產親王”［Prince Kaputbus］）為首，還包括拉提波爾（Ratibor）公爵、烏耶斯特（Ujest）公爵和萊恩多夫伯爵（Count Lehndorff）—在施特魯斯貝格的冒險中投入自己的錢，到了1870—1871年時已經處于破產邊緣 [[30]](#30_7)  。他們大多是威廉的寵臣（施特魯斯貝格和羅馬尼亞難以置信的復雜關系見本書第十四章）。普魯士貴族的資本主義胃口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為了解救他們，布萊希羅德的確賣了大力氣。

這無疑是威廉愿意放下古老偏見的主要原因。布萊希羅德之前的服務無疑讓皇帝更容易克服顧忌，但只有俾斯麥的個人介入才能真正消除它們。布萊希羅德對此深表感激：

……我心情澎湃，迫不及待地向閣下表達我的感激。因為畢竟是閣下的推薦讓我和我的家人獲得這項榮譽。我可以推心置腹地向閣下承認，這項榮譽讓我和我的家人興奮至極，但我最看重的還是閣下繼續施恩，我以至誠謙卑請求您這樣做。您的信任帶給我巨大榮譽，我將終生效忠閣下，以證明我配得上您的信任。 [[31]](#31_7)

幾個月前，在被封為親王時，俾斯麥用類似的口吻感謝了威廉：

讓陛下滿意是我內心不可或缺的需要，我需要這樣才能享受成功。我的祖先把對國家和封地的世襲統治者的個人忠誠傳給了我，但愿它也能成為我孩子們遺產的一部分，因為在這個崩潰和懷疑的時代，上帝的祝福有賴于此…… [[32]](#32_7)

這些不僅是感激涕零時的口頭表態：雖然背景不同，但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都相信這種形式的個人依附與忠誠，盡管它在當時的德國社會中已經開始式微。它加強和保護了他們之間的紐帶。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躍入貴族行列帶來無法名狀的快樂。突然，人們稱他為“馮·布萊希羅德先生”（更有甚者，德國和外國的許多人稱他為馮·布萊希羅德男爵，盡管普魯士沒有“男爵”［Baron］頭銜），“馮”這個詞在他心中一定堪比他的全部財富。他忙不迭地試圖確定這項新榮譽能讓他走多遠 [12](#12_11)  。他發出正式詢問：宮廷現在是否會接待布萊希羅德家族，即他們是否已經正式“有權進入宮廷”（hoffähig）。答復是肯定的 [[33]](#33_7)  。但從正式被允許進入宮廷社交界到被其接受仍然天差地別。即使對基督徒來說，有權進入威廉二世宮廷的人也被分成56個等級 [[34]](#34_7)  ！難怪瑪麗·霍恩洛厄王妃（Princess Marie Hohenlohe）曾經感嘆：“什么都無法超越所謂的社會這個共濟會。” [[35]](#35_7)  布萊希羅德的迫切心情還表現在他馬上提交了自己的紋章：背景為黑、白、紅三色，中央的白色部分鑲嵌著鐵十字 [[36]](#36_7)  。這些顏色象征新帝國，鐵十字代表普魯士，布萊希羅德的紋章將兩者結合起來。

1872年秋，布萊希羅德獲得又一項榮耀。由于杰出的銀行家維克多·馮·馬格努斯男爵（Freiherr Viktor von Magnus）去世，英國駐柏林總領事一職空缺。這是一個沒有報酬的榮譽職位，但它提供又一條信息通道，還能帶來很高的聲望。布萊希羅德在普奧戰爭中曾與英國大使館合作，而且已經是大使奧多·羅素勛爵的密友。作為柏林外交界的明星，羅素精明而富有魅力，是俾斯麥和宮廷的最愛（他的父親在1836—1841年間曾任英國駐柏林大使—在此之前，由于瘋狂地愛上卡爾斯魯厄［Karlsruhe］的著名猶太銀行家所羅門·馮·哈貝爾男爵［Baron Salomon von Haber］守寡的女兒，他幾乎毀了自己的生活和婚姻） [[37]](#37_7)  。1872年9月，羅素男爵致信外交部，表示雖然“沒有必要”任命新的總領事，因為大使館可以承擔所有必要的工作 [13](#13_11)  ，但他——

完全贊同格蘭維爾勛爵的觀點，即在柏林城任命一位擁有財富和威望的人對英國的工商業利益大有好處，與英國外交部相比，此人與當地官員和商務部門打交道更方便。他認為，沒有誰能比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男爵更好地實現這種好處，此人不僅是柏林的羅斯柴爾德，還是俾斯麥親王最親密的朋友以及金融和商務問題上的顧問。布萊希羅德男爵在柏林社交界擁有特別好的地位，皇帝和皇儲經常親自找他商量，普魯士的統治階層和商界普遍信任和尊敬他。奧多·羅素勛爵剛剛從私下獲悉，布萊希羅德男爵愿意接受無報酬的總領事一職…… [[38]](#38_7)

10月初，格蘭維爾授權羅素任命布萊希羅德，并“向門德爾松—巴托爾迪發去客氣的回絕信”，因為他同樣提出愿意效勞 [[39]](#39_7)  。幾天后，羅素勛爵召見布萊希羅德，“請求［他］幫英國政府一個大忙，‘接受這個職務’” [[40]](#40_7)  。

布萊希羅德不僅在英國總領事一職的爭奪中擊敗了著名的對手門德爾松，同月，奧地利政府也提出任命他為該國駐柏林總領事。他就這些富人的尷尬請示俾斯麥，表示自己已經接受英國人的邀請，但奧地利人的職位具有“顯著的優勢，能夠讓他特別詳盡地了解鄰國的金融運作”。俾斯麥建議他忠于英國人，因此直到1893年去世，他一直是英國的總領事，與英國駐柏林大使館關系特別親密 [[41]](#41_7)  。其他政府也向布萊希羅德奉上大量榮譽；從1870年到1873年，他多次向柏林警察總局申請皇家許可，允許其接受和佩戴巴伐利亞、薩克森、奧地利、意大利和巴西國王的勛章 [[42]](#42_7)  。

差不多與此同時，普魯士政府也認可了尤里烏斯·施瓦巴赫的功勞。1871年，警察總局在他的第一份授勛推薦中寫道：“在那些不但快速和沒有太多架子地做了大量好事，而且可以作為本行業可靠和得體行為之典范的人中，銀行家尤里烏斯·施瓦巴赫占據突出的位置。”六年后，在提議授予其更大的榮譽時，警察總局估計施瓦巴赫的年收入在20.4萬到24萬馬克之間。他被認為對慈善極為慷慨，各方面完全無可指摘，始終遠離“創立活動”（Gründungen）。1878年，47歲的施瓦巴赫被任命為樞密商務顧問 [[43]](#43_7)  。

我們看到布萊希羅德對自身社會地位的重視：爬得越高，他就比以往更看重合適的生活方式，更看重舉止與身份相符。冬天，他的家是柏林最豪華和被人談論最多的娛樂場所。夏天，他把家人搬到位于城郊的時髦的夏洛騰堡區（Charlottenburg），就像他的父親曾經搬到更加乏味的潘科區（Pankow） [[44]](#44_6)  。與父親不同，蓋爾森常常光顧著名的溫泉—如奧斯坦德或馬林巴德，基辛根（Kissingen）或施朗根巴德（Schlangenbad）—他的孩子們則被留給各位仆人照料，包括他信賴的助手西貝特（Siebert），此人在19世紀70年代初還曾是布萊希羅德的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安排過俾斯麥的購地操作。

1873年6月，獲封貴族后僅僅一年，布萊希羅德買下了古特戈茨（Gütergotz），這是一座位于柏林附近的古老領主莊園，曾是著名的羅恩伯爵的鄉間宅邸。剛剛收到威廉嘉獎的羅恩準備賣掉古特戈茨，在更加遠離新首都喧囂的地方買一處更大的休假地 [[45]](#45_6)  。1868年8月，羅恩以13.5萬塔勒買下這處莊園，對其進行翻新，擴大花園并修繕莊宅（也被稱為“宮殿”）；現在，他以129萬馬克的價格把莊園賣給布萊希羅德，相當于買入價的三倍。吝嗇的羅恩對房屋翻新的投入不太可能接近這個價差。盡管做了翻新，盡管房產價格在1868—1872年間有了大幅飛躍，但有理由猜想布萊希羅德付出了額外的錢，因為他買的是陸軍元帥的房子 [[46]](#46_6)  。

布萊希羅德的鄉間宅邸位于柏林西南，距離市中心約15英里，距離波茨坦皇宮約5英里。莊園的位置完美而有戰略意義，莊宅在19世紀初經過著名建筑師大衛·吉利（David Gilly）的改建 [[47]](#47_6)  。布萊希羅德購買羅恩宅邸還具有引人矚目的象征意義，是德國社會史上一個篇章的縮影：資產階級，特別是猶太資產階級—或者說，在這個案例中是一年前剛剛獲封的猶太人貴族—買下老貴族和著名武士的莊園，并繼承或效仿前主人的觀點和價值 [[48]](#48_6)  。古特戈茨交易的最后安排讓羅恩和布萊希羅德保持親切的書信往來，羅恩曾表示：“我很高興再次看到那熟悉而優美的簽名，因為我希望可以據此推斷你的眼疾已經無恙。” [[49]](#49_6)

布萊希羅德喜歡自己的新莊園，在那里度過很多時間。園中的鮮花帶給他最多的快樂，園丁對他來說和廚師一樣重要。多年間，他一直把自家花園的罕見品種送給威廉和奧古斯塔：這是一位紳士農夫送給另一位的禮物。無論是否身處古特戈茨，他總是很關心收獲，他的親信西貝特會向他報告作物是否已安全收割，特別是燕麥 [[50]](#50_6)  。但他也喜歡實施一些怪誕的計劃。他花費高價，請石匠從普軍取勝的戰場上（特別是法國）收集近2000塊石頭或石塊，將這些光禿禿的戰利品運到古特戈茨，作為怪異的愛國展示。他希望吸引威廉參觀自己的收藏—或者說皇帝來訪才是這個瘋狂舉動的真正原因？安排來訪無疑要大費周章，還必須再次動用與國王親隨的關系。威廉最初同意1875年夏天來訪，但直到兩年后才成行 [14](#14_11)  。皇帝只待了一個小時，但布萊希羅德喜形于色地告訴俾斯麥：“我必須向閣下報告，上周五陛下路過古特戈茨，我有幸接待了他。陛下看上去好極了……”兩人討論了近東危機 [[51]](#51_6)  。后來，國王的朗讀官路易·施耐德正式告知布萊希羅德，國王“很滿意你舒適的家。貴夫人的喜形于色特別令他高興……”報紙刊登國王來訪的新聞，布萊希羅德還從多位朋友那里收到祝賀，包括維也納的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 [[52]](#52_6)  。

布萊希羅德通常在古特戈茨度過周末和夏天的一部分時間。幾十年后，他曾經的助手卡爾·菲爾斯騰貝格（Carl Fürstenberg）回憶說：

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別墅非常清靜。我曾在那里見到他來自外交部的朋友，不時還有外國使節和行政部門的高官偕夫人來訪。我無數次挽著失明的蓋爾森，在古特戈茨的菩提樹林蔭道上徘徊，與他談論商務、外交或與外國的金融關系，總能感受到此人久經世故的智慧。 [[53]](#53_5)

在柏林的冬天，布萊希羅德家會舉行規模浩大的宴請活動。他們的舞會堪稱盛事，柏林社交界常常既羨慕又不客氣地談論這些奢華的宴請。那是一個爭相舉辦宴請活動蔚然成風的時代，當時的書信和回憶錄證實宴會的極度奢侈，錢不是問題，但只有錢顯然不夠。真正重要的是參加者。

早在獲封貴族前，就有不少社交界的頭面人物光顧。畢竟，他的一些客戶覺得很難拒絕他。獲封貴族后，潛在客人的圈子大大擴充。俾斯麥王妃和她的孩子們、拉齊威爾夫婦、施皮岑貝格夫婦、柏林的外國使節和其他許多人紛紛捧場，而那些沒有受邀的人則對主人和客人們憤恨不已。擁有英國和德國血統、在柏林社交界頂層如魚得水的瑪麗·馮·本森（Marie von Bunsen） [15](#15_11)  回憶起1877—1878年間第一次登上閃亮社交舞臺時說：

布萊希羅德的宴會同樣引人矚目……布萊希羅德家的社會地位可謂很高，但仍然有欠素養。幾乎柏林的所有貴族和政府要員都會前往，但事后表示后悔。整張宴會桌上擺滿精品中的精品。人們使用銀質餐具，面前擺放著最奢華的東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羅·德]薩拉薩特（Pablo de Sarasate）和[宮廷鋼琴家]埃西波夫（Essipoff）開始表演，隨后是舞會。 [[54]](#54_5)

奧特馬爾·馮·莫爾（Ottmar von Mohl） [16](#16_11)  用更加不客氣的口吻記錄同一場景，他提到布萊希羅德是俾斯麥的“寵兒”，但表示：

不過，算不上英俊的外表和社交事務上犯的一些錯，讓他在柏林的德國人圈子里不受歡迎。喜歡奢華夜宵的外國使節熱衷參加他的舞會，但本國社交界對其態度冷淡，特別是軍官群體，他們與布萊希羅德關系很不好，有的軍官把他的家看作禁區。 [[55]](#55_5)

有時，作為社交界必不可少的元素，宴會上也能看見許多身著體面制服的軍官，因為就像一位同時代的人所看到的，“皇帝的制服尤其受尊敬，沒有軍官在場的宴會都不會被看作成功” [[56]](#56_5)  。參加布萊希羅德家的宴會總會引起爭議。就像馮塔納在小說《通奸者》（L’Adultera）中對一位柏林金融家的評價：“在股市中他被無條件地看作一個優秀的人，但在社交界只是有條件的。” [[57]](#57_5)

問題在于，布萊希羅德迫不及待地想要被無條件地認同。雖然他的名望和重要性得到承認，但他也渴望被社會完全接受。他比大多數人更清楚地了解大部分貴族自負背后的空虛：他知道他們的金錢和婚姻丑聞，知道他們依賴像自己這樣的人，知道自己在財富上超過他們所有人，也許在智慧上同樣如此。不過，他傾慕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并試圖效仿。

被接受的模糊性無疑嚴重困擾著布萊希羅德，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他感受到某些容克貴族的怒火，比如俾斯麥昔日的朋友路德維希·馮·格拉赫，此人對“猶太人愛好者”的鄙視甚于對猶太人本身。格拉赫在1873年2月的日記中寫道：“最近，猶太人布萊希羅德舉辦了盛大的舞會，俾斯麥王妃以及她的女兒和兩個兒子是最尊貴的賓客，他們是五十年前的敬虔派［Stubenprediger］的女兒和孫輩。” [[58]](#58_5)  對大部分老貴族來說，這種結交帶有背叛意味，他們把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視作自己對首相不滿的原因和理由。對于19世紀70年代初形成的整個反對俾斯麥的反動“投石黨”而言，布萊希羅德象征“自由主義帝國”的背信棄義。我們將看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的新反猶主義把布萊希羅德作為顯眼的靶子，盡管俾斯麥常常是真正的目標。

布萊希羅德繼續著自己的事業，外表光鮮，但內心痛苦。對他的攻擊從未停止。他的私人生活沒有像在公共領域那樣的運氣，失望和病痛早早襲來。早在19世紀60年代末，他的視力就開始出問題；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他已經完全失明—他挽著助手匆匆赴約，或者只是沿著時髦的蒂爾加滕散步，這成了熟悉而令人同情的景象。他的私人生活變得日益痛苦。與俾斯麥一樣，他在成功的那幾十年里變得更加內向，逐漸陷入某種孤獨。兩人在公共生活的最后十年里都變得更加苦惱。他們的關系最初只是各取所需（布萊希羅德還常常扮演奉承者的角色），后來逐漸演變成兩位奮斗與勝利已成為往事的老去之人的聯系和友誼。成功變成了日常，剩下的只是工作，兩人的工作雖然不同，卻一遍遍讓他們走到一起。

[1.](#1_16) 瓦爾特·拉特瑙（1867—1922），猶太裔德國實業家、政治家。——譯注

[2.](#2_16) 指1871年至1873年德國經濟繁榮時期，與下文的“奠基時代”同義。——譯注

[3.](#3_14) 在1914年8月的狂熱中，當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戰爭也將帶來文化的重生時，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回憶道：“1870年后，國家的思想和政治生活遭到物質主義和利己主義等更粗俗元素的破壞……今天，我們懷著恥辱感回想起奠基時代平民的放蕩，回想起無價值的自由主義帶著無所謂的傲慢發動的文化戰爭，回想起人們在面對第四等級要求時常常顯得冷漠而短視，而這些要求當然也經常極其粗鄙；相當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對美感的麻木，以至于我們年輕時的那個古老、可愛而端莊的德國，我們古老的城市、花園和器具成了規模工業和大眾品位的廉價光芒的犧牲品。”弗里德里希·邁內克，《1914年的德國調查：論文與報告》（斯圖加特和柏林，1914年），第19—20頁［Die deutsche Erhebung von1914：Aufsätze und Vorträge（Stuttgart and Berlin，1914），pp.19–20］。

[4.](#4_14) 羅伯特·米歇爾斯（1876—1936），德國社會學家。——譯注

[5.](#5_14) 沃爾特·白芝浩（1826—1877），英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譯注

[6.](#6_14) 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指在分析歷史或社會現象時，主觀地強調某些特點，根據這些特點將對象納入統一的分析結構。——譯注

[7.](#7_14) 據說，內森·羅斯柴爾德在交易所時常常倚靠一根柱子。——譯注

[8.](#8_14) 指非世襲貴族。——譯注

[9.](#9_12) 亞伯拉罕·奧本海姆沒有兒子繼承頭銜。

[10.](#10_12) 賈科莫·梅耶貝爾（Giacomo Meyerbeer，1791—1864），德國歌劇作家。——譯注

[11.](#11_12) 索爾茲伯里侯爵羅伯特·塞西爾（Robert Cecil，1830—1903），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曾三度出任首相。——譯注

[12.](#12_10) 《噼里啪啦》雜志也忙不迭地取笑他的新榮譽，并諷刺他的新詆毀者。布萊希羅德獲封貴族后，《噼里啪啦》馬上刊發一小則告示，題為：“更多失蹤者：蓋爾森·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有待稍后進一步確認—毫無痕跡地從我們的圈子（Kreis，也表示國家）和團體中消失。我們對失去他們感到特別遺憾，因為他們一直是我們階級（Stand）的驕傲。”署名為“柏林全體市民”，1872年3月24日。一周后，神秘的世襲貴族“馮·馬虎男爵”（Baron von Prudelwitz）在《噼里啪啦》上對同樣神秘的“馮·糊涂男爵”（Baron von Strudelwitz）說：“終于發生了，這在由股票經紀人搭建起來的奧地利早就發生了，但在自然成長［naturwüchsig］的普魯士曾被認為是不可能的。兩個猶太人一個是天生的猶太人，一個是職業上的［Beruf］猶太人—同時被封為貴族。罪惡的開始！老基督徒的原則被踐踏，傳統被破壞，此前猶太人一直無法逾越的墻壁出現裂縫，關于‘社會賤民’中‘被詛咒民族’的信條被永遠摧毀。如果我錯了，就讓我改名為‘猶太佬’［Itzig］，但我看到這正在到來：猶太人將成為貴族，貴族將被猶太化［verjüdelt］……等著瞧吧，你將活著讀到‘往來賬伯爵’［Comtesse de Contocurrente］，讀到受過割禮的‘達科特公爵’和‘摩西親王’！騎士的黃金時代將讓位于……金路易的時代。”真正的貴族（而非自由派對他們的戲謔）很可能更多幾分尖刻和少幾分幽默。《噼里啪啦》，1872年3月31日。

[13.](#13_10) 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英國外交部對于商務問題幾乎不感興趣，作為這種忽視的眾多例證之一，“當1879年奧多·羅素勛爵提出需要在駐柏林大使館人員中安排一位商務專家時，一名外交部次長卻提出異議—索爾茲伯里解釋說，此人‘極為正統，對所有商人的看法就像老小姐對所有男人的看法—仿佛他們圖謀誘使他提供某種非法的恩惠’”。普拉特，《英國外交政策中的金融、貿易和政治，1815—1914》（牛津，1971年），第xx頁［D.C.M.Platt，Finance，Trade，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815–1914（Oxford，1971），p.xx］。

[14.](#14_10) 古特戈茨顯然是布萊希羅德的費里埃爾，雅姆斯男爵同樣曾經迫切希望皇帝造訪他的新城堡。拿破侖的來訪是在1862年12月，當時費里埃爾剛剛完工不久。此行堪稱一次盛大的國事訪問：“陪同皇帝的有富爾先生、瓦萊夫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考利勛爵（Lord Cowley）、弗洛里（Fleury）和內伊（Ney）將軍……男爵侍從們身著藍色和黃色制服，［在最近的車站］等待皇帝陛下。陛下坐上敞篷馬車，配備四匹純種馬和馬車夫……10點45分，皇帝抵達城堡，一座塔樓上立刻升起皇家旗幟。巡視城堡內部后，皇帝來到莊園散步，并種下一株雪松紀念此行。然后，他回到城堡用早膳。銀質餐盤的模具在制作完成后馬上毀掉，以保證獨一無二；瓷器餐具由著名的塞弗爾瓷器廠（Sèvres）制造，每個盤子上都繪有布歇（Boucher）的親筆畫作，帶有B字簽名……早膳過后，大批獵手侍從已經在等待客人們，準備前往龐大的莊園。莊園占地1500公頃（3700英畝），包括三個農莊，完全被步道包圍。狩獵非常盡興，共殺死約1000頭獵物。”《泰晤士報》（The Times），1862年12月10日；亦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1862年12月27日。1974年9月，我在參觀這座城堡時被告知，當皇帝踏上宏偉的樓梯時，他停了下來，嗅到某種東西—顯然是來自廚房的味道。皇帝離開后，雅姆斯男爵下令將廚房搬到城堡外的一處地下室，通過地下通道與城堡相連。不清楚拿破侖是否重新巡視過現在已經沒有異味的城堡。

[15.](#15_10) 瑪麗·馮·本森（1860—1941），德國女作家、水彩畫家和旅行家，柏林的沙龍女主人。——譯注

[16.](#16_10) 奧特馬爾·馮·莫爾（1846—1922），德國外交家，曾任日本明治時期的政府顧問。——譯注

## 第九章　政治和經濟上的帝國風格

我的睡眠不是放松，如果我真有睡著的時候，我的夢將延續醒著時的思考。有一天，我看見面前有一張德國地圖，上面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爛點，然后剝落。

——俾斯麥致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1872年

表面上，新帝國是一塊權力的磐石：快速擴張的工業和龐大的軍隊讓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統治者。但新的權力帶來新的矛盾：每座新開的工廠都會增強無產階級異議者的力量，工業財富的每一次增長都會削弱老地主貴族精英對國家政府的控制。磐石上的裂縫越來越寬，裂縫被掩飾和否認，但這導致變化迅猛的社會與相對僵化的政治秩序產生沖突。

新帝國經歷不完全的現代化過程：它的經濟發生改變，但前工業化時期的階級仍然掌握著權力，試圖通過拉攏和威逼新的工業階級來延續自己的超群地位。和所有近代社會一樣，德國也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那里的轉型比其他地方更快，但也更不完全，特別是德國社會對自身的理解不如其他社會。回頭來看，帝國的歷史進程似乎很清晰—事實上，它清晰到讓一些歷史學家忘記，對于新帝國的大部分公民而言，未來完全談不上清晰，他們正為了某種新的穩定而苦苦摸索。

19世紀60年代末，俾斯麥曾表示，只要將德國抱上馬鞍就夠了，它會知道如何駕馭。新帝國時期，他發現德國不知道如何駕馭，至少不是他想要的方式或方向。統治新國家的困難超乎預期。俾斯麥曾試圖為這個四不像社會準備四不像的憲法：新帝國無法被簡單界定，既不完全專制，也不采用君主立憲。當時的批評者和現代的歷史學家常常把俾斯麥的統治與拿破侖的統治或公民獨裁相提并論。與具體名目相比，現實更加重要。俾斯麥是政策的制定者：他在帝國的對手中沒有人擁有他那樣的遠見，像他一樣為所有的國內外政策負責；但俾斯麥需要仰仗皇帝的支持和帝國中幾個邦國的默許，他不得不應對憲法之外的壓力和陰謀。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帝國議會批準自己的國內政策。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平衡游戲，不時傳來他將辭職或重組帝國的威脅 [[1]](#1_51)  。

1871年后，俾斯麥成了大英雄，但過早被神化讓俾斯麥和國家都沒有對現代政治的固有矛盾做好準備。斗爭的歲月，從致命危險中奪取戲劇性勝利的歲月，已經遠去；矛盾的日常化被證明更令人難以忍受。19世紀60年代，他要對付的是敵人；1871年后，他不得不應對被官方劃定為友好的個人或團體，他覺得后者更討厭。1871年后，他對局勢的掌控削弱了，耐心和精力也不如從前。他反復的辭職威脅只是策略，但也反映了真正的沮喪和絕望。出于個人和實質性原因，權力的快感減弱，職位的魅力也下降了。（1880年，他抱怨說，過去十年間，自己在履行職責時完全感受不到“個人的快感”，“只［感到］對上帝和人的職責，完成這種職責并非出于任何對工作的熱愛，而是良心的強迫” [[2]](#2_51)  。）不過，他仍然緊抓權力，摧毀對手，他的領導風格加劇了各種政治沖突。

帝國時期的俾斯麥沒有宏大戰略，只是尋求自保。他的對內和對外策略大同小異，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在國內更加無情。對于歐洲大國，他懷有一些敬意，哪怕只是因為它們過去的歷史角色。但對國內的敵人就完全沒有尊敬可言：他們既沒有歷史根基，也沒有正當理由；他們是試圖阻撓他計劃的小人。他把外交政策中的不道德手段搬到國內舞臺，試圖恐嚇、操縱和打擊對手，他在對付國內對手時的殘忍和輕蔑在面對外國時很少敢使用。

帝國建立之初，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協同執政，這是議會中最大的黨派，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和理念。從1867年到1873年，政府和議會建立自由經濟的框架。帝國的政策旨在促進資產階級的經濟訴求。俾斯麥還聯合民族自由黨向中央黨（Center party）所代表的天主教政治勢力發難；他害怕德國政治中有組織的天主教勢力，決心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在所謂的文化斗爭（Kulturkampf）過程中，他讓天主教徒對自己的黨派更加忠誠。與此同時，他緊密依靠民族自由黨，將其視作暫時性的策略工具，這導致他與代表他的朋友和其他容克貴族的保守派的決裂。在回憶錄中，他把與帝國國內史相關的章節命名為“文化斗爭”、“與保守派的決裂”和“陰謀”。這些沖突中，與保守派的決裂對他傷害最深。他覺得受到背叛，如果沒有他，那群人可能早就因為自己的固執而吃苦頭了。他們的離棄令人憤恨，但又無法忽視，俾斯麥設想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需要老地主階級保持顯赫地位。

在19世紀70年代的斗爭中，政治中的經濟元素變得日益重要和明顯。那個十年的核心事件是象征德國社會勃勃生機的大繁榮，以及1873年的大崩潰和其后的長期蕭條。大崩潰過后，人們就其原因和可能的解決辦法展開激烈辯論。俾斯麥用多年時間摸索新的經濟政策，最終逐漸制定出全面的方案，并做了保守的新調整。這些變革如此激進，以至于許多人感覺帝國經歷了重生。

在經濟動蕩時期，布萊希羅德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穩步提升。無論是對德國金融業和工業的了解，還是與國內外商界的聯系，他都無人能及。他的專長是實用經濟學，并與德國的主宰者關系密切：這些成了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基礎。

掌權者喜歡聆聽有用和淵博的人，根據所代表的支持者的特點，他們也許還喜歡聆聽有影響和有權勢的人。布萊希羅德符合所有條件，他繼續享有隨時見到俾斯麥的特權。在兩人之間，公共和私人事務仍然糾纏在一起。布萊希羅德關于俾斯麥財務狀況的私人書信常常也包括對政治和經濟動態的評論。他們的對話還觸及國內外政策的所有方面。他用這種非官方的方式對官方報告和備忘錄做了補充，后者總是會處于眾目睽睽之下。

布萊希羅德有很多權力渠道。他的手下、客戶、朋友和門徒無處不在：包括政府和宮廷，議會和報界，以及除了社會黨之外的所有黨派。這些關系中有的是他業務的衍生品，有的則是他孜孜不倦培養的結果。他熱衷于成為要人和名人。羅斯柴爾德家族喜歡搜集藝術品，他則喜歡搜集秘密，兩者出于相同原因：讓同時代的人驚異。

因此，他成了人們追逐的對象。對于柏林的權勢者、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外國使節來說，他是消息的重要來源。1878年，英國大使致信本國外交部，表示“就像閣下所知道的，馮·布萊希羅德先生是俾斯麥親王的銀行家和秘密代理人，比柏林的任何人更受首相的信任” [[3]](#3_49)  。現在，所有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都感謝他的情報，并請求提供更多；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代表許多顯貴的觀點，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表示：“布萊希羅德消息異常靈通，盡管有外交式的含蓄，但他很好說話……這是一個出色的、在政治上非常敏捷的人。” [[4]](#4_49)  1882年，一位內閣部長記錄道，布萊希羅德的聯系人延伸到“陛下最核心的隨員” [[5]](#5_49)  。所有書信都由布萊希羅德親自撰寫，這本身就是一項令人驚嘆的工作：既有每天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大部分分支的信，還有寫給世界各地的商業伙伴、顧客和官員的幾十封信。布萊希羅德還要接見源源不斷的訪客，既有大臣和使節，也有經濟精英。作為慣例，布萊希羅德只等候俾斯麥。布萊希羅德培養如此之多的關系，而且日進斗金，他的精力令人欽佩。他經營多重買賣，同時是利潤和權力的掮客。

不消說，許多德國人不滿布萊希羅德的地位，包括那些聲稱與他友誼深厚的顯貴和官員。俾斯麥的專制風格賦予布萊希羅德要人的光環，俾斯麥的其他助手也對首相這位愛管閑事的猶太人感到不滿。由于工作的不安穩和首相的喜怒無常，他們把布萊希羅德視作在主人面前說他們壞話的伊阿古（Iago） [1](#1_19)  。1885年，德國駐巴黎大使霍亨洛厄親王對自己的職位感到擔心，因為“布萊希羅德和亨克爾等人曾利用報紙反對我，而且會故技重施” [[6]](#6_47)  。其他許多顯貴也害怕布萊希羅德造就或摧毀他們事業的能力，并時常夸大他的影響。

[1]

帝國建立伊始，布萊希羅德推薦的政策與俾斯麥官方顧問們的提議存在分歧。19世紀70年代初的首要工作是創立帝國銀行，取代統一前仍然存在的32家有貨幣發行權的銀行。1872年5月，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很希望首相一直執掌［該行］，因為至少根據愚見，對金融問題而言，許多時候政治判斷比物質判斷更加重要” [[7]](#7_47)  。俾斯麥聽取他的意見，但政府將動議權留給帝國議會中的民族自由黨。1874年末，該黨在昔日的銀行家路德維希·巴姆貝格的領導下準備合適的法律。其中一部分與布萊希羅德的觀點一致，包括首相的保留權力，另一些方面則有出入。他致信俾斯麥：“在金融事務上，閣下常常紆尊聽取我的意見，因此我將乘便對銀行的棘手問題提出幾點看法，因為我非常關心此事。”他特別指出，按照當前的法律草案，股東將沒有足夠的代表權，信貸供應也太容易被切斷 [[8]](#8_47)  。

作為帝國銀行的倡導者和俾斯麥最重要的閣僚，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和奧托·馮·坎普豪森支持金本位。布萊希羅德則不這么看。他擔心實行金本位將危及貨幣的靈活供應。倡導者們對黃金的普世統治力著迷，而布萊希羅德則相信，金本位將導致利率波動，每當必須勸阻從帝國銀行取出金條儲備時，利率就會大幅甚至急劇上升。他擔心出現商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周期性的貨幣和信貸政策將導致衰退時貨幣供應緊縮，擴張時貨幣供應增加。因此，他要求以數量盡可能多的貴金屬為基礎，與當時的主流觀點不同，他始終是雙本位的擁護者。

他知道如何在這個高度技術化的問題上打動俾斯麥。1874年，他警告首相，早早引入純粹的金本位將導致德國依賴英國的黃金市場，而英國人會通過提高貼現率保護其市場。那樣的話，德國就不得不如法炮制。但他指出：“與英國不同，支撐我國工業的并非巨額資本，而是對銀行家和銀行信貸的穩定需求，這點廣為人知……”金本位將讓資金變得更昂貴，從而威脅工業。“甚至現在，我國工業已經無法成功地與外國生產者競爭，因為工資和利率太高了……”布萊希羅德提醒俾斯麥，“帝國的務實者太少……以英國為模板調整我們情況的欲望主導著某些圈子”（俾斯麥也對某些教條主義議員的能力和愛國心感到懷疑）。布萊希羅德敦促俾斯麥咨詢長期擔任普魯士銀行行長的赫爾曼·馮·戴程德，后者將給出類似的建議：“閣下不應忽視我的請求，應該相信這是出于我對祖國的愛。” [[9]](#9_45)

1876年10月，布萊希羅德在一份長篇備忘錄中再次警告不要讓白銀徹底退出貨幣，并指出帝國銀行的黃金儲備不足。采用金本位很可能導致必須從英國借貸大量黃金，這肯定會帶來貼現率上升的危險，并進一步傷害“已經元氣大傷的我國工業”。對備忘錄的措詞稍加修改后，俾斯麥將其發給帝國銀行的現任行長戴程德 [[10]](#10_44)  。一年后，布萊希羅德抱怨說，為了遏制黃金外流，帝國銀行將貼現率提高到5.5%，“必須設法控制銀行持續波動的做法，否則我國工業不可能與外國競爭” [[11]](#11_44)  。

布萊希羅德一直批評德國的貨幣政策。他沒能成功，因為他的看法與傳統觀念背道而馳。他務實地得出遠遠早于自己時代的貨幣政策原則。現實證明他是對的，后來他還可以寄希望以更大的權威談論更關鍵的問題 [2](#2_19)  。

[2]

帝國的最初三年見證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德國沉浸在興奮中：似乎一個無限財富的時代開始了。銀行為大擴張提供資金，這三年里興建的鋼鐵廠、鼓風爐和機械制造廠的數量相當于之前七十年的總和。新成立的合資公司總資本達到28億馬克，幾乎是之前四十四年間所有合資企業的總資本。繁榮是在統一之后到來的：德國似乎注定將在所有領域取得勝利和繁榮，“柏林成了德國經濟的中心” [[12]](#12_42)  。

繁榮標志著從1867年開始的經濟加速上行。法國的50億法郎賠款為其添柴加火，讓公共債務得以提早還清，從而突然為德國提供大量流動資金。充裕的資金、振奮的民眾和允許毫無困難建立合資公司的法律吊起人們的胃口，引發狂熱的活動。

這是一個真正的擴張時代，充斥著各種不誠信的創立活動，在無所顧忌的灰色區域，利潤的誘惑戰勝正常的謹慎。這個時代被稱為“奠基時代”，見證帝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奠基。各階層的德國人都陷入投機熱潮，德國的精英們突然從對經濟的倦怠和緩慢的生活節奏中驚醒，前所未有地受到經濟機會的教育。

著名的銀行和謹慎的銀行家們抵制快速創立的誘惑。早在1871年9月，布萊希羅德的一位助手就在給他的信中談到“奠基幻想”（Gründungsphantasie）滋生的所有公司，顯然布萊希羅德從一開始就與創立者們保持距離 [[13]](#13_38)  。（蒸蒸日上但無所顧忌的新貴與日暮西山但保持尊嚴的舊貴族的斗爭當然是19世紀耳熟能詳的故事，也是《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關鍵主題。）布萊希羅德創立的最重要企業是哥尼斯舍和勞拉舍聯合公司（Vereinigte Königs-und Laura-Hütte，通稱勞拉舍），一家由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伯爵所擁有的私人煤礦和鋼鐵廠組建而成的股份制公司。該公司非常穩健，經受各種考驗。布萊希羅德在1873年組建名為希波尼亞的大型西德煤礦綜合體過程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他還幫助籌建帝國大陸鐵路建設公司（Reichs Continental Eisenbahnbaugesellschaft），后者組織修筑魏瑪至格臘（Gera）和波森（Posen）至克洛伊茨堡（Kreuzburg）的鐵路。這些鐵路運營糟糕，但總體而言，經濟崩潰對布萊希羅德的影響不像對其他銀行和企業家那么嚴重 [[14]](#14_38)  。

正直和謹慎讓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客戶逃過最嚴重的經濟倒退。因此，他的財富和名譽損失相對較小，雖然當時的煽動者們試圖無中生有地詆毀他（在1877年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柏林警方表揚了布萊希羅德的合伙人施瓦巴赫，因為他不參與任何可疑的創立活動） [[15]](#15_36)  。布萊希羅德再次展現自己的精明。

他已經預見到崩潰，并警告俾斯麥，1873年5月維也納市場的突然崩潰也可能影響柏林。1873年夏天和秋天，紐約和柏林股市遭遇災難性的重創，信貸變得稀缺，企業開始倒閉。1874年初，61家銀行、116家工業企業和4家鐵路公司宣布破產 [[16]](#16_36)  。

令包括布萊希羅德在內的許多人吃驚的是，崩潰演變成19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和影響最廣泛的蕭條 [3](#3_17)  。物價、利潤和分紅暴跌，生產下滑，失業率上升 [[17]](#17_30)  。人們遭受災難性的損失，對家庭產生的嚴重影響常常要持續幾十年。關于這場災難的作品少得令人吃驚，部分原因也許在于19世紀70年代中期的損失是早前投機的結果，道德準則仍然羞于公開承認這點 [4](#4_17)  。

崩潰和隨后的蕭條對德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它以前所未有的戲劇化方式表現出那個社會在性質上的改變：它表明德國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盡管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思想仍然流行 [[18]](#18_30)  。普通公眾中流行著從道德角度解讀這次崩潰的強烈傾向，把它看作對過錯的懲罰。（當托妮·布登勃洛克［Tony Buddenbrook］聽說丈夫破產后，“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模糊和可怕的東西在她心中涌起，她還是小孩子時就感受過它們。‘破產’比死亡更可怕，意味著災難、毀滅、侮辱、恥辱、痛苦和絕望” [[19]](#19_26)  。）保守派和天主教批評者將這股道德化傾向轉變成對曼徹斯特自由經濟主義的全面攻擊，指責自由派和猶太人應對國家的困境負責。資本主義當然活了下來，但成了深受懷疑或貶低的資本主義。在1873年后的德國，無論形勢是好是壞，總是存在強大的反資本主義情感—左派和右派都不例外。與此同時，長期的危機推動各種經濟利益團體的出現，提出改變政府自由政策的要求。

危機和不滿對俾斯麥構成巨大的最初無法理解的挑戰。他已經對帝國的財政狀況，對帝國和成員邦（特別是普魯士）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憂心忡忡。他本人的健康也極其糟糕，1875年5月的那次請辭可能是他職業生涯中最真心的一次 [[20]](#20_26)  。威廉拒絕他的辭呈，而俾斯麥也逐漸捏合出帝國財政和經濟政策的新方案。他慢慢明白如何利用不滿浪潮建立新的政治聯盟，將地主與工業家、保守派與右翼自由派聯合起來，讓天主教中央黨加入這個反自由主義色彩鮮明并將從此統治帝國的新聯盟。俾斯麥用四年時間看清這條狹隘新道路的所有可能。經濟危機提供變革的契機，但德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俾斯麥本人的傾向促成這個特定方案的誕生—在后來災難性的幾十年里，它將決定德國歷史的進程。

俾斯麥的部長們（特別是德爾布呂克和坎普豪森）保持了對自由經濟的信心，大部分民族自由黨成員同樣如此。自由經濟的倡導者將蕭條歸咎于生產過剩，認為假以時日，國內外需求將恢復。他們覺得德國不必拋棄自由貿易道路，包括立法取消對鐵制品的剩余關稅。仍在出口糧食的農業代表們同樣支持自由貿易，希望鐵制品價格越低越好。簡而言之，自由貿易得到的支持相當可觀。

德國鋼鐵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它們的代表大聲呼吁保留關稅，宣稱德國工業需要對國內市場的壟斷，盡管那還不夠。德國工業的保衛者們達成的經濟方案只有一條原則：披著經濟愛國主義外衣的保護主義。需要“保護”國家免受外來競爭，“國家的”一詞逐漸染上排外和反猶色彩，還為德國各壓力集團的純粹物質要求提供合理借口。

1874年春，大型鋼鐵生產者組織起來。布萊希羅德在東西兩地分別創立的勞拉舍和希波尼亞兩家大型企業攜手組成代表整個德國的首個壓力集團 [[21]](#21_26)  。布萊希羅德對這些公司的利益并非漠不關心，但作為銀行家的他還要捍衛其他利益，后者不希望看到保護主義。他似乎滿足于讓某些朋友加入戰團，自己仍然置身事外。1874年7月，他仍然對經濟復蘇持有樂觀的態度。他致信俾斯麥，略帶粗俗地描繪了股票癮：“商業生活極為沉寂，股市仍然不想復蘇，但我認為到了深秋時物價將有所改善，因為公眾已經更習慣于好吃好喝而非睡得安穩。” [[22]](#22_26)   [5](#5_17)  但布萊希羅德錯了，到了1875年，強烈的焦慮讓他無法保持淡定。這年春天，他最親密的合作者之一威廉·馮·卡多夫（Wilhelm von Kardorff）成了保護主義勢力的一位領袖。與布萊希羅德一樣，卡多夫也在不同的經濟門類中擁有股份；與布萊希羅德不同，卡多夫是帝國議會議員，擁有相當的影響力。他決心利用這種影響力并四處出擊，無論是議會、公共領域還是創立新的壓力集團。他與布萊希羅德的接觸極為密切，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謂他的庇護人和導師。

布萊希羅德與這位重要的德國政治家的親密聯系此前一直不見經傳，他們當時的敵人也僅僅對此有所猜測，因此需要略微說些題外話。卡多夫比布萊希羅德年輕6歲，來自梅克倫堡的一個小貴族家庭，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卡多夫專修法律，1855年，他不顧巨額債務，買下位于西里西亞的瓦布尼茨（Wabnitz）大莊園。他在這處占地1200英畝的莊園定居下來，沉湎于對狩獵和賽馬的昂貴熱情 [[23]](#23_26)  。1866年，他進入政界，向反對俾斯麥的新保守主義勢力發起反擊，預示著他在后來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將成為俾斯麥強烈的擁護者（雖然也不無批評）。他幫助起草北德帝國議會的經濟立法。到了19世紀70年代初，他已經成為自由保守派的領軍人物，這個政黨或團體由與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利益最為接近的顯貴組成。

卡多夫積極參與19世紀70年代初的“創立活動”，布萊希羅德用他的名字為自己創立的公司提升聲譽。1871年，他被任命為勞拉舍的董事會主席。他還參與波森至克洛伊茨堡的鐵路和普魯士抵押銀行的籌建，兩者都由布萊希羅德創立。簡而言之，卡多夫同時擁有土地和工業利益，因此特別契合第二帝國的政治。但由于同時涉及這兩個經濟分支，他也遭受雙重損失。

在父親的傳記中，卡多夫之子承認父親遭受巨大損失，但沒有提及其與那位“德國領軍銀行家”（他對布萊希羅德的稱呼）最密切的關系 [[24]](#24_24)  。事實上，布萊希羅德與卡多夫的關系非比尋常；他們在信中極為詳細地談論共同的利益，卡多夫接受并常常遵循布萊希羅德的推薦。他向布萊希羅德通報保護主義運動的進展，并不時請求他向俾斯麥傳遞消息。在語氣和內容上，這些信反映了卡多夫熱心為布萊希羅德效勞；銀行家是兩人關系中的主導方 [6](#6_17)  。

這種主導地位的原因之一在于，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屢次將卡多夫從債主們手中救出。早在1871年7月，卡多夫就向布萊希羅德抵押借款2萬塔勒，因為他不愿向自己擔任董事的土地信貸公司（Boden-Kredit）借錢 [[25]](#25_24)  。在1873年的經濟崩潰中，他損失一大筆錢，而且舊債未償又添新債。1875年，他哀嘆說，如果人們決心讓他破產，那么他代表保護主義在議會取得的成功又有何好處呢？作為對他重大貢獻的獎賞，祖國把手槍對準他的腦袋 [[26]](#26_22)  。布萊希羅德提供幫助，農業部長卡爾·魯道夫·弗里登塔爾（Karl Rudolf Friedenthal）同樣施以援手，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說：“雖然我總是樂意遵循你的建議，幫助陷入任何窘境中的卡多夫，但我為自己設立某些限度并遵守它們，因為我的收入水平完全不能和我尊敬的朋友馮·布萊希羅德相提并論。” [[27]](#27_18)  最終，弗里登塔爾貢獻1.2萬馬克抵押貸款，布萊希羅德提供的金額相應更高 [7](#7_17)  。

但卡多夫的狀況越來越糟，除了擔任各種董事的報酬和莊園收益，他別無收入。議員沒有報酬，因為俾斯麥希望避免出現職業政客階層，或者讓無產者參與政治。他放棄賽馬，1877年時還不得不賣掉所有的馬匹。1886年，巨額債務迫使他考慮賣掉瓦布尼茨。他在議會的影響力如日中天，俾斯麥的支持者們終于自1887年的選舉中贏得多數，卡多夫是實際領導者。他還是爭取降低農村釀酒廠稅收的主將，從而惠及包括他和俾斯麥在內的農業階級。所有這些活動讓卡多夫認為，政府將愿意表示感恩。當絕望中的他決定把莊園賣給皇儲的近臣時，感恩的機會來了。他希望得到90萬馬克，鄰居們把這個數字看作“跳樓價”。但黨內同僚、現任農業部長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Lucius von Ballhausen）只愿出價80萬。卡多夫在信中對布萊希羅德說，“這意味著我徹底毀了”，并警告自己將不得不辭職。“我以為他［布萊希羅德］對我愛莫能助，但我知道他會對我離開議會感到失落。”也許他在議會的努力能夠拯救自己：“當我讓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組成聯盟后，鑒于對釀酒廠［有利立法］的前景，我認為我很可能得到90萬馬克，如果與此同時人們不擰斷我脖子的話……”如此公然地承認個人利益與議會活動的聯系非常罕見。卡多夫的沮喪使其直言不諱，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我對生活受夠了，對多年來的麻煩和煩惱受夠了，我甚至對自己是否仍對妻兒有用感到絕望，因為多年來我經手的一切都失敗了。” [[28]](#28_12)

最后，卡多夫希望布萊希羅德能敦促柏林人開出慷慨的報價。但布萊希羅德卻安排了新的抵押協議，他將再借給卡多夫10萬馬克，條件是在還清貸款前，卡多夫將不能從莊園獲得任何收入 [[29]](#29_12)  。

1875年春，現在已經是激進保護主義者的卡多夫開始勸說紡織業利益方支持關稅。他還寫了一本重要的保護主義小冊子《逆流》（Gegen den Strom）。1875年6月初，卡多夫在普魯士議會抨擊財政部長坎普豪森，并告訴布萊希羅德，另兩位部長—弗里登塔爾和奧伊倫堡—特意向他示好，他將其（正確地）解讀為俾斯麥對他抨擊坎普豪森并無不滿 [[30]](#30_8)  。

俾斯麥的其他朋友也沒有對德國工業遭受的災難閃爍其詞。1875年6月，奧本海姆在信中表示，股市的蕭條狀況“反映了我國工商業狀況的徹底癱瘓” [[31]](#31_8)  。隨著危機的加深，沮喪情緒也更加強烈。人們越來越多地要求減輕痛苦，要求改變帝國的經濟政策。

保護主義的大部分擁護者是俾斯麥的忠實支持者。他們希望改變政策，也許還想除掉一些最鐵桿的自由貿易者。但1875年6月末，一場全然不同的攻擊開始了：作為容克貴族和地主利益的權威喉舌（俾斯麥本人也曾為其撰文），《十字報》（Kreuzzeitung）刊登一系列關于“布萊希羅德—德爾布呂克—坎普豪森時代與新奇的德國經濟政策”的文章。這場論戰（將在第十八章討論）指控俾斯麥將德國的利益出賣給猶太人的利益代表布萊希羅德，并從中牟利。《十字報》強烈抨擊一個已經破產的自由體制的腐敗，指責布萊希羅德是“新帝國財政和經濟的‘家神’［spiritus familiaris］……整個經濟政策的主筆人”。他被認為是《十字報》所稱的猶太政治（Judenpolitik）的謀劃者，“德國公眾對‘猶太政治’一詞并不熟悉”，因為猶太人隱藏了自己的支配地位，但“事實上猶太人現在正統治著我們” [[32]](#32_8)  。言外之意顯然是：德國的統治者是猶太人的工具—除了俾斯麥，還有誰稱得上德國的統治者？

這篇文章猶如炸彈。作者弗朗茨·佩洛特博士（Dr.Franz Perrot）自稱金融專家，編輯納圖希烏斯（Nathusius）又對其做了精心潤色，讓老保守派對俾斯麥和猶太人積蓄已久的憎惡公開化。《十字報》堅稱，該文沒有鼓吹任何經濟方案或經濟利益，僅僅希望揭露猶太人的大陰謀。在俾斯麥的縱容下，這個陰謀已經摧毀國家經濟的健康。

在俾斯麥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沒有什么比其他容克貴族的這次攻擊更令他苦惱。他把這次攻擊視作最大的忘恩負義，是嫉妒和愚蠢的結果。俾斯麥被指控為猶太人的奴仆（Judenknecht），受到黃金鎖鏈的束縛。這是他永遠無法原諒的。

布萊希羅德更有理由被這次攻擊震驚。畢竟《十字報》不是八卦小報，而是普魯士貴族的喉舌。盡管該報近來處境艱難，但它的讀者在布萊希羅德客戶中仍然大有人在。卡多夫在信中表示：“《十字報》的文章讓我覺得很好笑：這樣的論戰只會對我們有利，并讓《十字報》進一步墮入體面人羞于閱讀的報紙行列。” [[33]](#33_8)  但布萊希羅德很難表示認同。

布萊希羅德沒有覺得好笑。該文發表的那天，布萊希羅德致信赫伯特·馮·俾斯麥（為了不打擾病中的首相）。他在信中附了該文，表示“它的放肆無以復加。作者更關心的似乎不是打擊個人，而是重新激起屬于悲哀而黑暗的過去的宗教仇恨”。此外，該文把矛頭指向他個人并“號召鄙視”，顯然應該為此提出訴訟。“但我希望遵照您父親的精神行事，是否應該用輕蔑的沉默回應這些可鄙的攻擊。”赫伯特能否“在適當的時機”征詢和轉達他父親的觀點呢 [[34]](#34_8)  ？

兩天后，赫伯特寄來4頁回信。回信得到他父親的許可，很可能還是其口授的。他寫道，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扭轉《十字報》銷量的下滑，訴訟正中編輯的下懷。不過，對攻擊視而不見將鼓勵更多此類行為。因此布萊希羅德應該親自撰文，否認“德國的財政政策部分或全部出自你的建議”，這種看法有抬舉之嫌。“你還可以對帝國的財政政策缺乏任何影響力表示遺憾，因為如果你有這樣的影響力，你本該在許多問題上推薦不同的路線。”赫伯特暗示，“對于《十字報》的乏味謊言，最令人信服的反駁”將是布萊希羅德堅稱自己的觀點與官方政策不同，他無足輕重，因為毫無權力。赫伯特最后表示，具體措詞由布萊希羅德決定，但在公開表達對現行財政政策有異議時要注重“方式的禮貌，不能傷害該政策的代表們” [[35]](#35_8)  。

難以想象有比赫伯特的回信更加令人難堪和冷漠的回答，即使沒有畫蛇添足地提醒布萊希羅德注意體面。當如此忠誠的仆人受到如此可怕的侮辱，俾斯麥一家卻無法表示一丁點同情、團結或遺憾。受到《十字報》的侮辱后，布萊希羅德現在又要自虐式地否認自己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有任何影響。朋友被證明和敵人一樣無情，但收到赫伯特的來信后，布萊希羅德沒有表現出憤怒或憎恨。至少在口吻上，他的回信帶有尷尬的奉承味道：“沒問題……感謝您友好而詳盡的回信。”他的主要意思是無須大動干戈，因為《十字報》的攻擊似乎沒有引起多少反響（文章才發表了一星期！），不值得正式提出否認 [[36]](#36_8)  。布萊希羅德在精神上如此奴性十足，以至于沒有感覺到赫伯特回信中的侮辱嗎？或者他只是假裝沒有注意到而“強顏歡笑”嗎？

本質上，俾斯麥并沒有錯，布萊希羅德一直是帝國貨幣政策的批評者。在收到赫伯特的信和看到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后，他對政府政策的批判更加直言不諱。但此時，俾斯麥本人也開始與德爾布呂克等昔日的朋友和最親密的助手分道揚鑣，持續的蕭條和反自由主義運動成了重新全面評估經濟政策的契機。

反諷而巧合的是，布萊希羅德宣揚的政策正是在《十字報》上詆毀他的人鼓吹的那一套。俾斯麥開始重視布萊希羅德的警告，1875年10月，他告訴一位密友，布萊希羅德“多次嚴厲批評了德爾布呂克和坎普豪森的某些做法，如果他的觀點和預測現在被公之于眾，他看上去就是一個偉大的財政決策者。但布萊希羅德拒絕這樣做，擔心看法曝光后會對他的買賣造成不利影響” [[37]](#37_8)  。同月，俾斯麥向德爾布呂克發出第一封嚴厲的批判信，抱怨無能的理論家、法理學家和學究們將對“真實”利益造成傷害 [[38]](#38_8)  。

到了1875年秋，布萊希羅德開始傾向于緊縮開支，比如，他堅持減少勞拉舍董事會成員的報酬；卡多夫對這種克己的做法感到疑惑。《十字報》的攻擊發表后，卡多夫馬上說要從勞拉舍辭職，主要原因是內部斗爭，但也因為他覺得辭職在政治上有利。也許他擔心自己的政治角色可能被看成經濟利益的衍生品。但他無法下定決心，因為他的朋友們持有100萬股，“我的辭職會讓他們緊張” [[39]](#39_8)  （而且他需要這筆收入）。布萊希羅德情緒低落，他的合作者們同樣如此。亞伯拉罕·馮·奧本海姆男爵承認，他完全認同蓋爾森的悲觀態度。

我看不到任何地方有率先復蘇的跡象。唉！我們沒能減少持股，必須等待時機轉好。我從業已經差不多五十六年了，但想不起來經歷過這么長的危機。在我看來，德國的國民財富縮水三分之一，這是最嚴重的問題……遵照你的要求，我必須告訴你，萊茵地區的工業仍然死氣沉沉，損失慘重。 [[40]](#40_8)

幾天后，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通報令人難過的形勢，盡管“對我而言沒有那么意外，因為我可以事先評估某些做法的后果，而且我預計這些后續影響將會持續”。他認為關于英國和法國欣欣向榮的報告有水分，因為“鑒于歐洲的金融生態，德國這樣的國家受苦而鄰國勢頭良好幾乎不可能”。他警告說，如果目前的趨勢延續，歐洲將出現全面蕭條—事實果然如此 [[41]](#41_8)  。幾周后，卡爾·邁耶爾·馮·羅斯柴爾德男爵向布萊希羅德抱怨說，各地股市的價格都走低：“整個世界成了同一座城。” [[42]](#42_8)

與此同時，萊茵地區的工業家們（馮·奧本海姆男爵是他們的代言人）向威廉請愿，要求保留定于1877年到期的最后那部分鋼鐵關稅。盡管同情他們的請愿，但威廉還是聽從了德爾布呂克關于保護主義無益的精彩分析。進口只占德國市場很小的一部分，因此關稅的效果微乎其微。“保護主義浪潮席卷大半個歐洲”，德爾布呂克警告說，如果自由貿易被拋棄，“幾十年推進國際貿易的努力將付諸東流，整個德國經濟將受到傷害，即使特殊利益會獲得短期好處” [[43]](#43_8)  。

無論是德爾布呂克的反對，還是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冷漠都無法澆滅保護主義者的熱情。1876年1月，德國工業家“推動和保護民族企業”中央委員會成立，卡多夫是第一任會長 [[44]](#44_7)  。關稅要求是該協會的主要信條。盡管布萊希羅德持保留意見—他在1874—1878年間寫給俾斯麥的許多書信顯示，他認為復蘇的關鍵在于不同的貨幣政策，而不是關稅—他還是不可避免地與保護主義者的激進活動越走越近。作為經濟領軍人物，他不得不追隨自己的部隊。隨著經濟狀況的惡化，他們的聲勢也更加浩大。

卡多夫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記錄了勞拉舍的困境：市場的縮水、來自魯爾區的更多競爭、利潤的降低、減產和裁減工人的需要 [[45]](#45_7)  。邁耶爾·卡爾·馮·羅斯柴爾德男爵在信中表示：“貿易和工業奄奄一息……在我四十年的經歷中，我從未遭遇過這樣的狀況……人們看不到改善的起點，因為所有地方的蕭條似乎攜起手來，最好的組合也被摧毀。” [[46]](#46_7)  （被摧毀的還有羅斯柴爾德的健康：“當股價下跌時，我的痛苦卻上升了；我更愿意情況相反。” [[47]](#47_7)  ）羅斯柴爾德希望政府“盡快出手幫助貿易和工業，因為我們正走向大災難” [[48]](#48_7)  ……

1876年4月，帝國司法部長、俾斯麥曾經最受尊敬的副手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出于健康原因辭職，但很少有人相信這個解釋。顯然，俾斯麥對于德爾布呂克的政策和他“傲慢而固執的性格”產生不滿 [[49]](#49_7)  。德爾布呂克被罷免，成了俾斯麥的不滿、布萊希羅德的批評、保護主義者的特別怒火和威廉懷疑的犧牲品。他曾是《十字報》和保守派的頭號靶子。反動風暴的力量比之前意識到的更加強大。

德爾布呂克的被黜削弱了自由貿易者的力量，而持續的蕭條讓組織有序的保護主義者更加大膽。俾斯麥仍然沒有拿定主意，他收到的報告也自相矛盾。1876年7月，自由保守黨領袖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非正式地向俾斯麥提交本黨的競選宣言，請求他的批準。這是該黨與首相親密關系的不尋常證明。盧基烏斯寫道：“國內盛行保守之風。人們受夠了改革，把持續的經濟動蕩的一部分罪責歸咎于新的立法，歸咎于關稅和商業政策。保守黨將在選舉中得益。” [[50]](#50_7)

差不多與此同時，保守黨進行重組。通過采用旨在推進地主階層物質利益的非意識形態平臺，他們希望更受歡迎，從而更容易被俾斯麥接受。但俾斯麥沒有忘記《十字報》的攻擊。1876年2月，他在議會怒斥該報“對身居高位者”進行“最無恥和最虛假的誹謗”。他號召抵制該報，因為“所有的訂閱和購買者間接參與了誹謗和撒謊”。三周后，俾斯麥昔日的朋友和鄰居們—波美拉尼亞最有聲望的牧場主和容克貴族聲明支持俾斯麥的詆毀者，而不是和他站在一邊。這些人后來被稱為“聲明派”（Deklaranten），俾斯麥永遠不會原諒他們，并仍然對這個新黨派充滿懷疑 [[51]](#51_7)   [8](#8_17)  。不過，1876年的選舉證實了盧基烏斯的判斷：風頭從民族自由黨轉向兩個保守黨派。

在那動蕩的兩年里，俾斯麥越來越多地聽從布萊希羅德的意見。布萊希羅德成了固定的、特別的經濟政策顧問。反過來，他的朋友和合作者則敦促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比如，1876年，亞伯拉罕·奧本海姆致信布萊希羅德，歡迎他對“我國商務政策發生改變”的預言，“如果不想讓鋼鐵工業徹底毀滅，這樣做極其必要。如果你能對首相發揮巨大影響，那將是對我們國家的大功一件。但要抓緊時間” [[52]](#52_7)  。邁耶爾·卡爾也從法蘭克福來信表示，如果剩下的鋼鐵關稅被取消，“目前的混亂只會惡化，我們的經濟形勢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未來” [[53]](#53_6)  。布萊希羅德很可能表示認同，但御前會議還是決定，剩余的鋼鐵關稅將在1877年1月被廢止。坎普豪森堅持之前的自由貿易決定，即便他預見到鋼鐵工業將進一步衰落，政府將受到指責 [[54]](#54_6)  。

1877年1月，俾斯麥要求布萊希羅德提交一份關于魯爾區形勢的報告。布萊希羅德回復稱，前景很不樂觀。煤價的進一步下跌將很快引發新的減產，讓1萬名工人失去工作，并導致工人的工資再被削減三分之一 [[55]](#55_6)  。感到不安的政府提出法案，針對法國的出口補貼采取報復措施 [9](#9_15)  。1877年4月，議會中的地主和自由貿易者挫敗了這種缺乏決心的努力。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議會的決定……在受影響的省份引起巨大的痛苦。在工業領域，我們仍將遭受巨大災難”。他還調查了政府敗于自由貿易者之手將可能如何影響坎普豪森的地位 [[56]](#56_6)  。

當政府遭遇失敗時，俾斯麥已經離開柏林。他離開一年多，首先在弗里德里希斯魯，然后在伐爾岑，偶爾前往溫泉 [10](#10_15)  。由于一直在超負荷運轉，他的健康和神經崩潰了。他罹患一系列器質和心理疾病：風濕病、劇痛、面部痙攣和帶狀皰疹。一年前，他已經向朋友抱怨說：

今年我已經忍受了十二個月的病痛……整整一年，我的醫生們都威脅我說，如果不放棄工作，我會死……我只在白天從8點睡到中午或下午1點，然后開始工作，特別是和別人一起？……我對所有人都粗魯無禮，這大大增加我敵人的數量，不僅是那些因為政治和因為我為國盡責而自然產生的敵人。 [[57]](#57_6)

在他著名的不眠之夜中，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強硬賦予敵人。他曾經宣稱：“我整晚都在恨。” [[58]](#58_6)

他白天也在恨。他想象敵人無處不在。他把奧古斯塔皇后看作無法和解的強大敵人，隨時準備通過對丈夫施壓來推行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愿望。離開柏林前，他對奧古斯塔皇后耍花招的自戀式恐懼達到新高；他私下告訴一位朋友：“她的陰謀近乎叛國。” [[59]](#59_5)  他對自己的部長們，對他們的無能和不忠感到絕望；他感到自己敬重的許多人（包括布萊希羅德）看不起那些部長。更糟的是，他知道政府的經濟政策沒能遏制蕭條—經常有人向他提醒這點。最后，他還痛恨許多宵小之徒（有的還有頭銜），他們誹謗他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聲稱其中沾染太多的利益和腐敗。他曾與這些體面人對簿公堂（見第十八章），把其中一些送進監獄。但對于詆毀者本人和站在他們身后的少數沉默者—他的容克朋友們，他仍然無法平息怒火。

與他的其他重要決定和舉動一樣，改變是逐步到來的。他希望加強帝國財政，減少對頑固而狹隘的各成員邦的依賴。就要離開柏林前，他抱怨說：“普魯士更需要德意志化，而不是德意志需要普魯士化。” [[60]](#60_5)  他感受到新經濟政策的必要，也看到新政治聯盟的可能，聯盟可以建立在經濟利益而非原則或意識形態之上。最初，他對重建帝國沒有明確方案，但通過權宜之計，通過半成型的計劃與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的結合，他提出一系列措施。它們對帝國的改變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稱作帝國的第二次誕生。1878年，他談到做出決定時的心理感受：“仿佛指針突然停止，天平靜止了，誰也不知道在經過如此之久的來回擺動后，這種穩定狀態如何突然到來。”指針停止后，他“不再向來自上級和下級的影響讓步” [[61]](#61_5)  。

在指針仍然擺動的那些月份里，除了打理俾斯麥財務和地產的常規工作，布萊希羅德還為他處理大量完全不同的緊要事務。俾斯麥認真聽取布萊希羅德對經濟問題的建議，認同他非教條的保護主義。兩人對國家作為守夜人的自由主義理念都沒有特別的反感；他們都相信國家可以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特別是霍亨索倫王朝。

我們已經看到，布萊希羅德不是經濟理論家。作為一個擁有多重利益和海外密切關系的人，他顯然不會加入保護主義者不加鑒別的高聲叫囂之中。他和俾斯麥都對教條主義立場抱有一些懷疑。早在1876年秋，當俾斯麥向國王抱怨坎普豪森和商務部長海因里希·馮·阿亨巴赫（Heinrich von Achenbach）拒絕保留鋼鐵關稅的“教條主義報告”時，他就已經表達了這種懷疑 [[62]](#62_5)  。布萊希羅德從不認為保護主義本身是好的，或者是治療惡疾的良藥。他的沉默證明近年來的學術結論，即經濟上的需要并非新政策唯一甚至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63]](#63_5)  。布萊希羅德不厭其煩地告訴俾斯麥：“廉價的資金是工業競爭力的首要因素。” [[64]](#64_5)

俾斯麥的親隨仍然意見不一。他的老閣僚們偏愛老路線，包括自由貿易；新顧問們則是熱情的保護主義者，特別是克里斯托弗·馮·蒂德曼（Christoph von Tiedemann）和弗里德里希·馮·法恩布勒男爵（Baron Friedrich von Varnbüler）。1877年6月，法恩布勒致信俾斯麥，表示自己日益肯定，“如果目前的自由貿易狂熱繼續，我們將離經濟毀滅越來越近” [[65]](#65_5)  。

保護主義的官方代表恰好與布萊希羅德關系密切。身為議會自由保守黨重要成員的法恩布勒是布萊希羅德的客戶。他同樣擔心自己在勞拉舍的股份，還向布萊希羅德請教如何選擇既安全又可能升值的投資：“我遠離字面意義上的投機，投機會損害有意從政者的清白。” [[66]](#66_4)  清白是奇妙的東西，雖然保護主義煽動的成功將讓法恩布勒獲得經濟利益，但他似乎并未感到不安。保護主義者的問題如此重要，以至于當布萊希羅德的另一位合作者，來自漢堡（自由貿易的壁壘）的參議員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Gustav Godeffroy）轉向保守主義時，國務秘書恩斯特·馮·彪羅（Ernst von Bülow）在1877年圣誕節向俾斯麥報告此事 [[67]](#67_4)  。

布萊希羅德充當西德德國工業家協會與俾斯麥之間的關鍵紐帶。協會的執行主管是前政府官員威廉·波伊特納（Wilhelm Beutner）。1877年6月協會成立前不久，布萊希羅德與其見面并建立親密的關系 [[68]](#68_4)  。布萊希羅德的任務之一是征求俾斯麥對未來動向的看法。為此，他致信赫伯特，告知協會計劃向威廉發起保護主義請愿，并把一份請愿書交給首相。如果俾斯麥有任何反對，布萊希羅德將嘗試說服協會會長不要這樣做 [[69]](#69_4)  。赫伯特回信說，俾斯麥沒有異議，但要求布萊希羅德避免“以他［俾斯麥］的名義施加任何壓力……因為他必須對會長保持冷淡” [[70]](#70_4)  。赫伯特的信反映出俾斯麥對保護主義者日益友好，打消了布萊希羅德和他在保護主義者陣營朋友們的疑慮。來自德國各地的500名工業家參加集會，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經濟力量的展示。請愿對象被精心安排給皇帝，而不是懷有敵意的議會或存在分歧的政府。請愿催生質詢委員會，讓俾斯麥與保護主義走得更近 [[71]](#71_4)  。集會剛結束，法恩布勒就致信俾斯麥，敦促他實行新關稅，那也將給帝國帶來新的收入。他還表示，坎普豪森會反對這種做法 [[72]](#72_4)  。

1877年秋，俾斯麥開始緩慢行動；就像他在政治生涯的關鍵時刻常常做的那樣，他在確定明確路線前嘗試多種選擇。1878年改變了這一切。這是決定性的一年，俾斯麥展開對德國政治影響深遠的變革同時，在他的控制之外也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事件，比如利奧十三世（Leo XIII）登基和威廉兩次遭遇暗殺企圖。每次事件都被俾斯麥利用。

這場大變革意味著終結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心照不宣的同盟，他試圖建立一個以保守黨、民族自由黨右翼和中央黨為基礎的新聯盟。俾斯麥花了幾周時間，試圖說服民族自由黨的領袖魯道夫·馮·貝尼格森（Rudolf von Bennigsen）按照他的條件加入內閣。他的努力沒能成功，但風向突然開始大變。1878年2月，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公眾預計在新一屆的議會會期內，國內事務上將出現劇震，但人們“普遍相信，如果沒有閣下在場，預期中的改革方案無法通過” [[73]](#73_4)  。

俾斯麥現身了，并戲劇性地揭開新路線。他利用一次不起眼的機會：坎普豪森代表政府為提高煙草稅辯護，否認暗藏任何建立帝國對煙草壟斷的企圖。這時，俾斯麥起身發言，宣稱他希望這樣的壟斷成為帝國財政全面重組的一部分。此舉一箭雙雕，既否定了坎普豪森，又標志著與民族自由黨的決裂—國家壟斷是后者最不想看到的東西。在俾斯麥發言的同時，利奧十三世當選教皇，接替固執的庇護九世（Pio Nono）。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的決裂讓他與中央黨的和解變得更加容易和緊迫。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向貝尼格森示好，請他探討俾斯麥的經濟方案。3月中旬，布萊希羅德為貝尼格森開設賬戶，但安排他們最初接觸的漢諾威中間人提醒布萊希羅德，貝尼格森會“極其矜持”。畢竟，俾斯麥剛剛與民族自由黨決裂 [[74]](#74_4)  。另一方面，俾斯麥總是希望分化民族自由黨，讓貝尼格森留在自己這邊。

新路線需要新的執行者。同情自由主義的守舊者離開了。坎普豪森第一個提交辭呈，但布萊希羅德已經有了繼任人選。他致信俾斯麥稱：“［漢諾威的波托·奧伊倫堡（Botho Eulenburg）］伯爵很有資格擔任普魯士財政部長，甚至可能是副首相；即便他不是畢業于嚴格的金融學校，但熟悉該領域對他來說并不困難，特別是如果在更重要的問題上他可以請教博學的專家，我肯定他會這樣做。” [[75]](#75_4)  布萊希羅德推薦一位極端保守者，這頗有深意；他一定有理由相信，奧伊倫堡認同俾斯麥的新經濟方案。（三周后，波托取代與他姓氏相同的弗里德里希，就任內政部長。在回憶錄中，俾斯麥對兩人都有微詞 [[76]](#76_4)  。）俾斯麥中意的財政部長人選是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對于此人經驗不足的擔心，他自我安慰說：“財政部長是世界上最簡單的工作：如果像波德爾施溫格這樣無能的人都能執掌該部八年，那么誰都能領導它。” [[77]](#77_4)  盧基烏斯拒絕從命，又找不到別的人選，最終完全沒有經驗的阿圖爾·霍布雷希特（Arthur Hobrecht）被拉來湊數 [[78]](#78_4)  。找到合適的部長人選從來不易，一年后，俾斯麥對皇帝抱怨說：“無論如何，對部長職位的申請不是很多；與外在要求相比，薪水太低，只有富人才能擔任部長而不陷入財務困難。” [[79]](#79_4)

1878年的動蕩中，俾斯麥在各式問題上都需要布萊希羅德的幫助；反過來，與帝國時期的其他時間相比，布萊希羅德在那年也更需要俾斯麥的恩寵。因此，兩人只要可能就見面，其他時間則通信 [[80]](#80_4)  。他們在最廣泛的問題上展開合作。

1878年初，俾斯麥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什切青（Stettin）的政府官員們代表約翰尼斯·克維斯托普（Johannes Quistorp）向他求助：克維斯托普的工廠因為什切青銀行的倒閉而受到威脅。顯然，那里的1萬名工人的命運危在旦夕。俾斯麥表示，如果可能的話，他希望伸出援手，因為“我不僅認識和尊敬工廠所有者，而且避免那么多人失業符合我身為官員的利益”。布萊希羅德回復說，克維斯托普事件是“我從業以來遇到過的最復雜和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挽救克維斯托普需要大約150萬馬克，遠遠超過俾斯麥提到的10萬到20萬馬克；布萊希羅德懷疑這樣的幫助是否明智。克維斯托普只雇傭了700或800名工人—完全不是在證明有必要救助這家瀕臨倒閉企業時提到的1萬人。這場交易反映出俾斯麥原則上愿意用國家資金支持瀕臨倒閉的企業，反映出他依賴布萊希羅德的快速幫助，而不是他自己笨重的官僚機器 [[81]](#81_4)  。

1878年5月，布萊希羅德敦促創立代表各種經濟利益的新的全國委員會。這種社團主義 [11](#11_15)  方案將削弱議會對經濟問題決議的影響。俾斯麥欣賞這種想法，與此同時，他致信財政部長，表示自己將永遠為“健康的理智”而戰，反對黨派伎倆：“沒有生意、財產、行當或產業，以薪水、報酬或分紅為生的學者們今后必須服從于生產者的經濟要求，否則就將失去議席。” [[82]](#82_4)

整個1878年春天，俾斯麥一直希望找到讓這些教條主義的議員加快走人的方法。布萊希羅德知道，俾斯麥在考慮提前解散議會。他提醒首相不要因為次要問題而這樣做，因為那會危及“我們的經濟改革” [[83]](#83_4)  。意外事件幫了俾斯麥的忙：對威廉的兩次暗殺企圖讓俾斯麥有了對付民族自由黨的完美武器。威廉的傷勢讓俾斯麥開始擔心未來在皇儲領導下的政府。面對這樣一個自由派統治者，面對完全由俾斯麥所謂的敵人組成，被他戲稱為“格萊斯頓式內閣”的可怕前景，還有什么比打造新的保守派聯盟更好的自保方法呢 [[84]](#84_4)  ？

國王剛剛受傷，俾斯麥就命令閣僚們提交嚴厲的反社會黨人法案，他本人則留在弗里德里希斯魯（人們普遍相信暗殺者是社會黨人—盡管事實并非如此，但這種斷言足以將整個黨派描繪成顛覆陰謀者）。鎮壓迎合民意；就像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所說的：“這次卑鄙的企圖［引起了］無限的激動”，對皇室的擁護從未像現在這么強。布萊希羅德也認為，刺殺是社會黨人所為 [[85]](#85_4)  。俾斯麥找到不容錯失的機會：如果反社會黨人法案獲得通過，民族自由黨將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原則，而社會黨則將失去自由煽動事端的機會；如果法案被否決，那么民族自由黨將背上對社會主義心慈手軟和不顧公共秩序的罪名，而社會黨人得到的也僅僅是緩刑。布萊希羅德顯然理解俾斯麥的政策；就在投票開始前，他在信中寫道：“明天，針對社會黨放肆行為的法案將不幸地被絕大多數議員否決。我擔心這意味著與自由民主黨徹底的決裂。” [[86]](#86_4)  布萊希羅德的兩點預計都是正確的。

6月2日的第二次暗殺企圖幫助了俾斯麥對民族自由黨的發難。這次，81歲的皇帝身受重傷，但俾斯麥的第一反應卻是，“現在我們解散議會”，然后他才詢問威廉的狀況。國家被激怒了，愛德華·拉斯克記得，“整個德意志民族現在處于憤慨和恐懼的真正發作中” [[87]](#87_4)  。九天后，俾斯麥解散議會，以便發起一場“法律與秩序”的選戰，通過夸大紅色恐怖來打敗民族自由黨 [[88]](#88_4)  。

與俾斯麥統治的其他任何時期相比，他與民族自由黨的斗爭最能反映了他愿意用國際沖突中的策略來對付國內的對手。他曾試圖迫使民族自由黨永遠為自己效勞；失敗后，他又決心尋找新的盟友，摧毀昔日的支持者。他為這場分歧嚴重的選戰調動所有的力量；奧古斯特·倍倍爾記得，選戰的“殘酷史無前例”。選戰過程中，貝尼格森抱怨“這種斯文掃地和令人作嘔的形式……它似乎是與政治和黨派體制不可分割的罪惡。現在，我們德國人要對這個歐洲世界最糟糕的東西負責，到目前為止至少我沒有看見普選權的教育價值，除非其教導的是煽動人心和殘酷暴虐” [[89]](#89_4)  。1878年的第二次選舉對帝國變革計劃而言是一次決定性的活動。

[3]

布萊希羅德以前所未有、以后也不會再現的方式，追隨自己的主人，投入這場選戰。在某些方面，他的影響力達到頂峰；俾斯麥的自由派顧問們正在離開，而合格的繼任者尚未找到。不僅如此，布萊希羅德的人脈和財力也幫上忙。選舉的焦點問題是他關心的：反社會黨立法和新的經濟方案。布萊希羅德還有其他動機：我們在下文將看到，第二次暗殺企圖發生時，他的兒子被指控行為與軍人身份不相稱，因此父親有必要為最終的赦免準備好理由。此外，選戰打響時正值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召開，布萊希羅德希望俾斯麥在幫助羅馬尼亞猶太人時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因此，顯示出對俾斯麥和國家的忠心正當其時—當然，兩者在布萊希羅德心目中被畫上等號。

德國工業家協會同樣以有史以來最大的熱情投入選戰，希望把選舉變成對保護主義的公投 [[90]](#90_4)  。就在選舉開始前，協會領導人詢問布萊希羅德的“觀點和愿望，以便我在我們的辯論中能有正確指示”。波伊特納還告訴布萊希羅德，政府應該幫助羊毛業。因為在有重要羊毛業利益的地區，“政府的敵人們”成績可觀：“如果政府做些什么爭取當地的支持，選舉結果肯定會大不相同。” [[91]](#91_4)  布萊希羅德要求協會馬上成立宣傳處，為本會的候選人造勢。他提供5000馬克啟動資金，第二天就雇傭四名編輯 [[92]](#92_4)  。

布萊希羅德的參與沒有被無視。霍亨洛厄親王之前就拜訪了他，并待了90分鐘。

……聆聽他的塔木德式智慧……整個談話過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我意識到布萊希羅德似乎的確能影響俾斯麥的商業政策。盡管他信誓旦旦地稱自己地位卑微，但他的行為看上去就像是政府的一員。關于選舉，布萊希羅德告訴我他已經接到俾斯麥的指示，仿佛他可以搞定選舉。因此，他斷言俾斯麥不希望拉斯克和巴姆貝格繼續留在議會……在我看來，布萊希羅德在商業事務上自私的猶太式策略要對德爾布呂克的下臺和近期其他各種準備不足的財政計劃負責。 [[93]](#93_4)

布萊希羅德的消息一定比霍亨洛厄更加靈通，否則后者就不會驚訝于俾斯麥對拉斯克和巴姆貝格特別的敵意。根據俾斯麥另一位助手的回憶，也許當布萊希羅德向在場官員的耳中“低聲密報”時有點傲慢 [[94]](#94_4)  ，但他報告的內容是正確的。

布萊希羅德還為赫伯特第一次競選議席提供慷慨的幫助。赫伯特在多地展開競選，包括拉斯克的選區；他并未指望擊敗那位老議員，但布萊希羅德聲稱：“他的參選足以證明，候選人對手L不受政府歡迎。” [[95]](#95_3)  通過幫助赫伯特，布萊希羅德也支持了工業家協會的主要努力目標：打敗拉斯克和巴姆貝格。兩人都是自由貿易者和猶太人。協會要求布萊希羅德“痛斥”拉斯克的支持者，布萊希羅德則反過來要求協會支持赫伯特。布萊希羅德建立赫伯特與協會的聯系，通常還充當他主要的競選經理之一 [[96]](#96_3)  。

布萊希羅德知道，俾斯麥家族與他的老朋友拉斯克有強烈的個人仇怨。他還知道，俾斯麥之前曾欣然利用了拉斯克出眾的才能，現在卻報之以不同尋常的侮辱和反猶主義影射。赫伯特寫給未來的姐夫蘭曹伯爵（Count Rantzau） [12](#12_13)  的一封此前未知的信顯示，俾斯麥家族把拉斯克視為主要敵人。在告訴蘭曹如何授意媒體時，赫伯特寫道：“特別重要的是，應該永遠把拉斯克和歐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進步派領袖］與‘宣揚暴動’畫上等號，必須一遍遍搬出根據他們的煽動性言論精心準備的摘要。”通過強調自由黨（“拉斯克的余黨現在應該被稱為‘進步黨’”）對下層階級命運的漠不關心，這些報紙將灌輸拉斯克和他的助手們“在為社會黨人效勞”的觀點。俾斯麥家族特別擅長現代選舉中令人不齒的伎倆 [[97]](#97_3)  。布萊希羅德永遠不會保護拉斯克免罹俾斯麥的怒火，他反而還參與對這位老朋友和極為正直的杰出議員的攻擊，可見他多么奴顏婢膝，至少也是漠視友誼的要求。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對拉斯克的態度和別人對布萊希羅德的態度一樣 [[98]](#98_2)  。

在赫伯特的請求下，布萊希羅德也發揮了他對媒體的影響力。除了與《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交涉，赫伯特還要求他讓某家報紙務必刊文澄清，否認近來關于他加入或親近保守黨的“謊言”：“我從未說過這樣的話，而是一直表示，在這艱難的時期，重要的不是依附特定的議會集團，而是防備所有意圖顛覆的黨派。我很可能不會加入任何議會集團，加入德國保守黨集團更是絕無可能。” [[99]](#99_2)  直到選舉日當天，甚至直到所有決勝投票結束后，布萊希羅德一直在為俾斯麥家族奔忙，直接或通過蘭曹與他們商談，并向媒體提供有利于赫伯特的材料 [[100]](#100_2)  。盡管做了這些努力，赫伯特還是一敗涂地。首相大光其火，將勞恩堡的勢力歸咎于“自由派弄虛作假的競選活動”。他宣稱，如果當局（特別是縣長）更積極地打擊反對派的誹謗，這些活動永遠不會得逞。赫伯特假意對失利表示高興，因為這讓他擺脫了“議會政治必然黏附的骯臟” [[101]](#101_2)  。不過，他還是決定再到別的地區參選。俾斯麥授意奧伊倫堡伯爵和當地縣長們發動支持政府的選民 [[102]](#102_2)  ，但赫伯特再次敗北。

選戰開始時，布萊希羅德想過親自競選議員。不清楚這種冒險想法來自他本人、波伊特納還是胡戈·布朗克（Hugo Blank）。布朗克是哈爾茨機械廠廠長，6月30日，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他很高興聽說后者有意接受不倫瑞克（Braunschweig）地區的候選人資格。他還說，由于現任的民族自由派議員出人意料地決定再次參選，情況變得復雜。不過，如果布萊希羅德有望表現良好，布朗克及其“工業家朋友們”仍然希望他參選 [[103]](#103_2)  。布萊希羅德接受了，條件是“有相當大的機會選民們把票集中到我身上” [[104]](#104_2)  。他成了協會的候選人。

布萊希羅德與民族自由黨的角逐帶有某種鮮明的象征意義—即便在當時，黨派標簽和黨派忠誠的意義遠不如后來。在前民主政治時代，競選壓力的確要輕得多，布萊希羅德可以宣稱，他無法發表競選演說，因為健康問題讓他必須早早休息。應選舉要求，他提交了幾份宣言：

我幾乎無須贅言，我沒有任何野心，如果我在百忙中做出這樣的犧牲，那只是為了我們的祖國德國的利益。鑒于我和帝國政府的關系，我將全力支持其維護國家和公民社會的秩序[die Ordnung der staatlichen und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這不言自明。總而言之，我的政治立場與自由保守黨相同。

還有一次，他寫道：

我與帝國首相俾斯麥親王多年來的關系相當準確地刻畫了我的政治和經濟面貌。我希望看到下屆議會完成的任務包括：承認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快速增加的法律是必要的；放棄自由貿易，設立較輕的保護性關稅，以此為基礎讓我們的貿易和工業實現繁榮；與此相應，為了推行統一和廉價的鐵路運費，應該由帝國接管鐵路。 [[105]](#105_2)

7月中旬，布萊希羅德放棄候選資格。布朗克建議他退出，因為“只有相當確信你能贏得多數時，你才會想要成為候選人……”但在“經濟候選人”出現前，太多的人已經投向在任議員。不過布萊希羅德的參選還是迫使他的對手支持政府的反社會黨人法律和經濟方案。布朗克認為，這意味著布萊希羅德的“間接成功” [[106]](#106_2)  。布萊希羅德應該滿足于這種有限的勝利。他有意進入議會本身就很了不起，特別是考慮到1877年魯道夫·邁耶爾（Rudolph Meyer） [13](#13_13)  對他的諷刺攻擊，他幾乎肯定清楚此事。對于布萊希羅德可能出現在議會，邁耶爾寫道：“任何哪怕只見過布萊希羅德先生一面的人都明白，［想象］他現身議會只會引人發笑。盡管他和他的種族愛慕虛榮，但他明白這點……因此放棄議會的全部榮譽。” [[107]](#107_2)  在不尋常的1878年，布萊希羅德曾有意冒險，他沒能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讓歷史學家感到遺憾，從政本來可以迫使他拋棄慣常的隱蔽角色，讓他本人和他的觀點獲得大得多的曝光。不過，布萊希羅德更喜歡在幕后出謀劃策，這減輕了他的遺憾（如果真有的話）。此外，政治聚光燈可能會損害他的生意。

布萊希羅德和他的朋友們有充分理由對選舉感到滿意。作為俾斯麥的新敵人，民族自由黨損失了10萬票，而保守黨派則在新帝國時期首次取得大捷。自由保守黨的得票數幾乎翻番，78.5萬票是他們在第二帝國選舉中的最高峰。保護主義者的表現也非常好。布萊希羅德最親密的記者朋友之一在信中表示：“結果可以令我們滿足，即使為了贏得可靠多數，我們必須同天主教黨派妥協……社會—民主黨派的得票數實在高得可怕。” [[108]](#108_2)

俾斯麥在選舉中取得大勝，德國自由主義則再次遭遇慘敗。勝利來自無情的抹黑活動，由此開創的先例和取得的結果對德國的政治未來造成巨大傷害。法國駐柏林代辦承認這個時刻的重要性：

德國的專制政治—這是那位獨裁者的理想，在他的頭腦中被越來越多地同德國統一的目標聯系起來—[現在]應該接近實現。這種制度顯然只能在俾斯麥親王治下才能存在，他是唯一有能力主導和支配它的人；在剛剛結束的政治斗爭中，他的人格統一了各自為政和優柔寡斷的力量，是他勝利的首要元素，這難道不證明了上面所說的嗎？ [14](#14_13)

勝利為帝國的保守主義重組鋪平道路。俾斯麥馬上要求新議會通過禁止一切社會黨人活動的法案，盡管該黨仍然可以參加選舉。受到再次解散議會威脅的自由民主黨人（包括拉斯克）為反社會黨人法案投了贊成票，新的反自由主義和自身的無能令他們痛苦不已。對社會黨人而言，生存斗爭拉開他們歷史上的“英雄時期”序幕；該黨獲得的選票穩步增加，反社會黨人運動比文化斗爭敗得更慘 [15](#15_13)  。

反社會黨人運動只是帝國重建的一部分。保護主義者叫囂設立關稅，他們在新議會中占據著微弱多數。1878年7月，布萊希羅德力勸俾斯麥向議會提交關于政府預期經濟方案的清晰藍圖。“工業的關鍵利益”需要這樣的澄清—但俾斯麥批注說，他本人也不知道計劃是什么 [[109]](#109_2)  。

俾斯麥舉棋不定的原因在于，“工業的關鍵利益”并非他唯一甚至首要的考慮。他希望構想出的計劃既得到地主—保守利益的支持，又能加強帝國的財政獨立。1878年秋天，受到進口俄國和海外廉價糧食威脅的地主們終于也開始尋求保護。現在，俾斯麥新政策的內容浮出水面：全面的關稅將滿足工業家和地主，把他們納入同一項政策；與此同時，關稅將為帝國帶來新的收入，此前它一直依賴間接稅和成員邦每年繳納的錢款。此外，俾斯麥還尋求設立新的間接稅，并對煙草和食鹽等商品實行國家壟斷。

俾斯麥的計劃逐漸成形。三年間，他一直拒絕向保護主義者的強烈要求讓步。現在，當一些地主也開始呼吁保護時，他很快就采取行動。據說，當他意識到保守主義政策將惠及作為大地主的他自己時，他就發生了轉變。誠然，俾斯麥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經濟利益，但很少有證據表明，他自己的潛在利益在這件事上扮演了任何角色 [[110]](#110_2)  。

政治考慮是首位的：他希望滿足帝國所有的主要經濟利益集團，將他們團結到新的經濟方案中。鋼鐵業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左右輿論，說服人們只有關稅才能拯救它。布萊希羅德參與純粹經濟力量的首次展示 [[111]](#111_2)  。但俾斯麥也想保留地主—保守勢力。將“生產力”元素團結到自己這邊后，他可以更有信心地對付死守意識形態或教條的反對者。

1878年秋，俾斯麥開始看到，地主和工業家的特殊要求可以用來服務于遠比他們的設想更宏大的計劃。直到多種動機交匯，直到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全面重組似乎迎來良機，俾斯麥才開始行動—他的敏捷和無情果斷讓人回想起他在19世紀60年代的動作。

12月中旬，他向聯邦參議院提交自己的方案。現在，他堅持應該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征收一般性關稅，同時提高間接稅以進一步增加帝國的收入 [[112]](#112_2)  。1879年初，俾斯麥與蒂德曼和法恩布勒一起制訂最終計劃。在弗里德里希斯魯的這次重要戰略會議后，俾斯麥接見了法國大使圣瓦里耶，又一次令人費解地將自己的計劃和盤托出。首先，他希望讓帝國財政站穩腳跟：

為了保證帝國服務的必要運轉，我每年都不得不扮演乞討者的角色：不得不乞求不倫瑞克和梅克倫堡開恩。這可以忍受嗎？我必須浪費時間，耗盡全力卻最終在這些小國代表的面前淪為笑柄嗎？他們馬上開始扮演世界命運的仲裁者角色，使我提心吊膽，好讓他們可悲的人生中有一次機會得意洋洋地以為自己是重要的。

他希望德國效仿法國對間接稅的依賴；他還認識到，和工業一樣，他最熟悉的農業也需要保護。而統一鐵路運價的要求需要國家購買幾條鐵路。

這是他的總體方案。細節將取決于：

我遇到的議會和公眾的意向；我將像在確定航線后遇到逆風的領航員一樣行動；他會或多或少地修改航線，或多或少地用煤，根據反復無常的風暴或多或少地用帆，但航線的目的地永遠不變。我將像他一樣行動，現在你知道了我的目標；至于實現目標的手段，我將保留選擇權，這取決于反對者的把戲和戰斗的激烈程度。 [[113]](#113_2)

戰斗注定將很困難，布萊希羅德幫助爭取必要的盟友。俾斯麥需要中央黨的幫助，該黨擁有穩定的選民基礎，而且日益同情保護主義。但文化斗爭留下沉重的包袱，而且俾斯麥與路德維希·溫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之間的鴻溝似乎無法逾越—一邊是身材高大的首相，處處懷疑教會的陰謀，一邊是矮小謙和的中央黨頑強的領袖，圭爾夫家族利益的維護者，俾斯麥在議會的頭號敵人—直到布萊希羅德讓兩人走到一起。

幾個月前，布萊希羅德和溫特霍斯特開始走近彼此。對布萊希羅德來說，當文化斗爭期間中央黨內出現反猶主義風潮時，溫特霍斯特是該黨少數幾位提出反對的領袖之一；而溫特霍斯特則對布萊希羅德的俾斯麥親信身份感興趣。1878年3月，布萊希羅德在漢諾威的一位猶太銀行家朋友路易斯·邁耶爾（Louis Meyer）來信表示，溫特霍斯特愿意和他談談：“他對談話的目的不置一詞—就像一位老外交官通常所做的……但我確信他心里有事。”邁耶爾在布萊希羅德的銀行為溫特霍斯特開設了賬戶，以便“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他可以比過去更頻繁地來拜訪你” [[114]](#114_2)  。溫特霍斯特的確頻頻來訪，“每周日，當溫特霍斯特在柏林時，他都會拜訪馮·布萊希羅德先生。事實上，他一參加完黑德維希教堂（Hedwigskirche）的彌撒就會前往” [[115]](#115_2)  。既虔誠又世俗的溫特霍斯特從教堂趕往銀行—這是一幅有趣的畫面。溫特霍斯特甚至在幾處溫泉療養地拜訪過布萊希羅德，19世紀80年代還參加了他的正式宴會。

從那時起，布萊希羅德變得比以往更關心被廢黜的漢諾威王室的事務 [16](#16_13)  。1878年6月，流亡的喬治國王去世。此后不久，路易斯·邁耶爾致信布萊希羅德，指出國王的去世讓最初扣留王室財產的理由不復存在。他建議他們兩位銀行家應該在普魯士政府和漢諾威王室間進行斡旋。邁耶爾警告說，如果被沒收的數百萬財產仍然留在普魯士人手中，那么盡管漢諾威人仍然忠于帝國，但他們將重新同情失勢的王室。他還表示“我覺得目前最好不要和W—t先生商談”—很可能是考慮到溫特霍斯特與俾斯麥的長期對立 [[116]](#116_2)  。

但布萊希羅德沒有這么做。1879年3月，他安排俾斯麥和溫特霍斯特的歷史性會面。多年來，俾斯麥一直討厭溫特霍斯特，視其為新帝國下教皇和圭爾夫家族利益狡猾的維護者。俾斯麥表示：“每個人都需要愛和恨的對象。我也有愛和恨的對象。我愛妻子，恨溫特霍斯特。” [[117]](#117_2)  但時過境遷，俾斯麥需要為自己的新經濟方案爭取選票，而溫特霍斯特也認為喬治國王的去世可能會推動圭爾夫家族與德國人的和解。

會見的動議來自溫特霍斯特，他向布萊希羅德表達與俾斯麥見面的愿望。俾斯麥心存疑慮，但最終答應布萊希羅德的請求 [[118]](#118_2)  。布萊希羅德知道，俾斯麥需要選票，而溫特霍斯特想要在金錢上滿足被廢黜的漢諾威王室。他希望兩個如此務實的人可以達成有限的交易。他是對的。會面中，俾斯麥同意從韋爾夫基金（來自被沒收財產的利息）中定期付款給剛剛守寡的漢諾威瑪麗王后。然后，俾斯麥提出關稅問題，堅稱德國農業的存亡取決于此。沒有土地的自由派無法理解這點，但俾斯麥希望溫特霍斯特可以—畢竟中央黨代表了德國農村。

這次會面被證明是轉折點。溫特霍斯特對布萊希羅德“善意的介入”感到高興；更多會面的橋梁被搭建起來，現在可以期待“令人滿意的諒解” [[119]](#119_2)  。溫特霍斯特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他相信“首相的好心腸和你本人的精明”將確保瑪麗王后獲得撫恤金。他還暗示了禮尚往來：“離開柏林后，我在關稅問題上什么都沒能做……回到柏林后，我會隨時拜訪你，打聽事態進展。” [[120]](#120_2)

雖然俾斯麥和溫特霍斯特在原則上同意向瑪麗王后和她的兩個女兒定期付款，但談判遲遲沒有結果。為了讓談判早日結束，布萊希羅德（在幕后）盡其所能。他把這次會面告訴自己的朋友—皇儲宮廷總管奧伊倫堡，后者又向自己的宮廷轉告“這次極為重要的談話……這里的人急切希望，關于那位寡婦和她女兒們的行動將取得切實的成功，人們還希望這次和解可以為我們的總體狀況帶來可喜的結果” [[121]](#121_2)  。5月中旬，溫特霍斯特仍未等到明確的安排，于是向布萊希羅德求助 [[122]](#122_2)  。7月2日，溫特霍斯特獲悉，布萊希羅德已經向王后支付了10萬馬克，向每位公主支付了1.5萬馬克（扣除他0.25%的傭金） [[123]](#123_2)  。這是第一筆半年分期支付，布萊希羅德此后定期從韋爾夫基金中付款。簡而言之，俾斯麥滿足了溫特霍斯特的愿望—距離對政府改革計劃的決定性投票不到兩周 [17](#17_7)  。

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和溫特霍斯特之間的最初斡旋取得重要的成果。兩人的首次私人會談后，溫特霍斯特第一次參加俾斯麥的議員晚會—他受到的款待“就好像文化斗爭從未發生過” [[124]](#124_2)  ！人們開始對新路線議論紛紛，路易斯·邁耶爾和布萊希羅德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高興 [[125]](#125_2)  。為了摧毀昔日的盟友民族自由黨，俾斯麥與昔日的敵人建立策略聯盟。現在，新的經濟方案接近通過，布萊希羅德的角色非常重要—至少與他之前在俾斯麥與自由派領袖翁魯之間的斡旋同樣重要，當時同樣是在大戰前夕。

俾斯麥與溫特霍斯特會見后不久，圣瓦里耶預言俾斯麥將早早取得勝利：

柏林的初來乍到者或膚淺的觀察者經常誤以為那里存在真正的議會制度。但有了更多的經驗和反思后，人們很快發現：德國擁有精美漂亮的門面，表面上裝飾華麗，忠實描繪了議會和憲政制度的畫面；規則被正確地引用，制度被遵守，外在特權得到尊重；黨派游戲、廊下騷動、活躍的辯論、激烈的會議、政府甚至強大的首相遭受的失敗（當然只有在他認為次要的問題上），簡而言之，一切能帶來幻覺和讓人相信辯論之嚴肅性和投票之重要性的安排應有盡有；但在布景背后，在舞臺后面，國王和首相總是在決定性時刻橫加干涉和自行其是，他們得到這個國家重要力量的支持—軍隊的忠誠達到狂熱的地步，官場被首長管得服服帖帖，地方官同樣唯唯諾諾，民眾偶爾對他們的判斷感到懷疑，迅速提出批評，但更加迅速地服從于最高意志。

他斷言，總而言之，一旦俾斯麥拿定主意并得到皇帝的首肯，“［關于改革的］投票肯定已成定局” [[126]](#126_2)  。

結果可能已成定局，剩下的可能只是走過場，但還是包括失態的一幕。在議會辯論中，拉斯克對政府計劃的財政和政治后果提出警告。俾斯麥的反擊是他議會生涯中最尖刻的譏諷之一。對于拉斯克及其同事，他引用了《圣經》：“他們也不種，也不收；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18](#18_7)  ，卻仍有衣服穿。我且不說是如何得到的，但他們至少有衣服穿。這些紳士既曬不著太陽，也淋不著雨—除非他們出門時碰巧忘記帶傘。”言下之意是他們對國家的經濟生活全無實際經驗。他暗示，組成議會的是無知的寄生蟲，而擁有財產的部長們對民眾的需要要清楚得多 [[127]](#127_2)  。盡管俾斯麥深信自己的指控內容，但那只是荒謬的放縱之詞，就連議長都罕見地小心翼翼提出反駁，結果遭到俾斯麥的申斥和解散議會的威脅。即使俾斯麥的支持者也對他“非常易怒和暴躁”感到遺憾 [[128]](#128_2)  。他對國外的敵人有時會心慈手軟，但對國內的批評者從不留情。

民族自由黨人成了他的頭號敵人。他寧愿與中央黨達成協議—即便中央黨堅持的修正案否定他為加強帝國的財政獨立所做的努力—也不愿與本來會接受他財政計劃的民族自由黨人合作。一定程度上由于俾斯麥向中央黨的要求讓步，三位與之前的政治路線關系密切的官員提出辭呈：文化斗爭的擁護者阿達爾貝特·法爾克（Adalbert Falk）、農業部長卡爾·弗里登塔爾和剛剛被任命為財長部長的阿圖爾·霍布雷希特。俾斯麥對這些辭呈提出的時機感到惱怒，但就像圣瓦里耶所說，“他堅持自己的道路……與曾經為自己效勞過的人劃地絕交并將其打倒在地，他們對他不再有用，或者對他無比強大的意志表現出反抗” [[129]](#129_2)  。

俾斯麥用保守派填補空缺的職位：他任命卡爾·比特（Karl Bitter）為財長部長，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為農業部長，羅伯特·馮·普特卡默為法爾克的繼任者。圣瓦里耶把三人形容為“親王首相恭順而聽話的工具”。觀察家相信，通過選擇“像比特先生這樣毫無聲望的人……親王試圖親自掌控內閣，或者由他最樂意聽從的顧問之一布萊希羅德先生掌控，此人的銀行家身份和宗教信仰讓他無法在國家事務中扮演前臺角色” [[130]](#130_1)  。

俾斯麥的勝利在7月中旬到來，即使在勝利面前，他仍然是個不依不饒的對手。他指責民族自由黨迫使自己與中央黨合作。他指責民族自由黨內“潛伏著破壞性力量”，只要一場失敗就會轉化成“憤怒激情”。他無法同這樣的人共事。在訓斥民族自由黨時，他還表達了自己對政治的某些最深刻思考。他表示，在國內外政界，人們總是：

仿佛走在陌生國度，同行的是不知道接下去會有何舉動的陌生人。如果有人把手放進口袋，另一人就已經掏出手槍；如果另一人開火，前者就會射擊。在這種時候，沒有人會停下詢問《普魯士刑法典》關于自衛的前提是否適用，而且由于《普魯士刑法典》對政治無效，人們只能準備好快速的主動防御。 [[131]](#131_1)

這番話是對俾斯麥活動的合適總結，表達了他認為政治是用其他方法延續戰爭的觀點（他如此喜愛兩個陌生人的意象，幾周后又對一位密友提起它，認為其適用于歐洲政治） [19](#19_7)   [[132]](#132_1)  。

他的策略在短期內效果輝煌。7月12日，中央黨、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右翼組成的聯盟接受他的方案—如果他想要，他本可以像1866年那樣歡呼：“我把他們都打敗了。”就像圣瓦里耶所言，他取得“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勝利之一”，而且是在他的敵人認為他無知的領域 [[133]](#133_1)  。

在中央黨和老普魯士保守黨這樣的特殊利益者幫助下，俾斯麥加強帝國的一元性，打造工業家與地主、富有市民和容克貴族間的政治聯盟—這個聯盟注定將支持德國農業，從而保留普魯士保守主義的社會基礎。他分化敵人。他壓制或打擊教條主義者，獎賞追求物質利益者。他本來很樂意將德國政治永遠變成利益政治，可以談論和收買經濟利益，而其他一切事務都掌握在他手中。他野心勃勃地試圖消滅意識形態政治，將政治變成競爭性利益的市場。但轉向保守主義讓未來政治的意識形態基調更加明顯；普特卡默在任時提出新的正統意識形態，帶有相當程度的反猶主義色彩。大蕭條成了催化劑，迫使德國回到之前幾十年確定的發展模式中。盡管立法成就格外豐富，但自由主義的插曲還是畫上休止符，新的政治體制變得更加僵硬和壓抑。

在此期間，布萊希羅德一直是其忠實的副手。他還曾是俾斯麥與德國政治中第一個組織有序的壓力集團的中間人。在所謂的公司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誕生之時，布萊希羅德扮演某種游說者—顧問的角色，盡管在他自己看來，作為有見識的聲音，他無疑代表有利于全民族的方案，而非特別利益。當年年末，布萊希羅德興奮地告訴俾斯麥：“工業的所有部門都生機勃勃，特別是采礦業，這得益于美國的巨大需求。”他表示，物價將很快上漲，工資也將隨之提高 [[134]](#134_1)  。他致信赫伯特：“工業變得日益活躍，我希望今后幾年能讓支持自由貿易的紳士們從骨子里明白，他們的自由貿易體制多么愚蠢。” [[135]](#135_1)  為了保證自由貿易者為他們的罪過受到懲罰，俾斯麥堅持他們都“不應獲得授勛提名”。另一方面，保護主義者的中堅蒂德曼和法恩布勒獲得應有的勛章。在帝國的新階段，保守派贏得大部分榮耀 [[136]](#136_1)  。

[4]

在精神和實質上，新的經濟方案標志著德國放棄短暫的自由主義道路。19世紀50和60年代，自由經濟思想曾流行于商人和受過教育的階層，但尊崇國家是更加古老和根深蒂固的習慣，德國人從未真正接受自由派對國家的懷疑。統一為專制政府做了辯護，19世紀70年代初的繁榮、破產和腐敗很快被解讀為對自由派的道德審判。利益集團嚷著要求“國家”保護；有影響力的學者組成社會改革聯盟，要求終結曼徹斯特自由經濟主義和新的激進主義國家 [[137]](#137_1)  。老自由主義開始式微（甚至在英格蘭同樣如此），俾斯麥開始相信，他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方案將先發制人，遏制革命性或民主性的社會主義。

俾斯麥一直是干預主義者和家長主義者，經濟必要性、政治考慮和個人偏好共同決定他在19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的路線。除了新政策，他還確立了新基調：新帝國應該不僅是收稅者、社會黨人的壓迫者或舊王朝的敵人，也是仁慈的代理人、社會領域的民族保衛者—保護工人免受職業事故、疾病和老年之苦。國家應該提供幫助，好讓臣民感恩。

為了讓帝國買下本國的鐵路，將它們組織成高效的全國系統，使之成為新實現的民族統一的功能性和象征性展示，俾斯麥經歷漫長的斗爭—這預示著他的新干預主義路線。德國統一時，鐵路仍歸成員邦管理，各邦都有自己出色的體制，通常混合國有和私人線路。俾斯麥的計劃有堅定和實際的理由：國有化將自動意味著統一運價和運營，這將允許戰時更有效地使用鐵路，1866年和1870年的經歷已經證明鐵路的戰略重要性。1873年，拉斯克揭露鐵路涉及腐敗行為—這被用作國家控制的理由（并非拉斯克本意），另一個理由是市場崩潰后鐵路股價的大幅下跌。鐵路事務過于重要，不能交由市場或帝國的特殊利益群體。關于鐵路曠日持久的爭議反映了俾斯麥權力的局限性，即使在一個他認為重要的領域。多次遭遇挫折后，俾斯麥的政策終于在1879年獲得部分成功。盡管國有化辯論被稱作德國發展史上的“轉折點”，但俾斯麥政策的真實歷史并未獲得現代人足夠的關注 [[138]](#138_1)  。

我們在這里關注的是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的鐵路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歷史學家此前完全忽視該問題。首先應該指出，他的角色完全局限于政策的執行而非構想。沒有證據表明，布萊希羅德在19世紀70年代初傾向或反對國有化。（1871年8月，以鐵路專家自居的弗朗茨·佩洛特聲稱，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反對他的國有化計劃 [[139]](#139_1)  。）布萊希羅德的第一次相當典型的介入發生在1873年7月。當時，在俾斯麥的堅持下，議會成立帝國鐵路局（Reichseisenbahnamt），表面上是為了運價結構的進一步統一，實際上是為了推動最終的國有化。布萊希羅德對提議的局長人選提出反對，因為此人與另一家銀行關系極為密切。他致信俾斯麥，表示關于弗里德里希·威廉·謝爾（Friedrich Wilhelm Scheele）將被任命為新鐵路局局長的傳言在金融圈里造成“騷動”。在人們看來，謝爾其人“盡管聰明，但有時會受激情和想象左右，這種特點對于領導位置上的執行者算不上優點”。金融圈擔心，作為貼現公司的董事會主席，謝爾每年獲得3萬塔勒的股份收益。只有與先前所在的銀行達成某種持續安排，他才會接受年薪5000塔勒的國家任命。布萊希羅德并不擔心這種利益沖突本身，他介意的是，一位肩負重要財政事務的政府機構首腦與競爭對手銀行有專屬關系。他提醒俾斯麥，議會也會出現類似的擔心，“特別是因為選擇謝爾先生將讓貼現公司在帝國獲得極不尋常的優勢地位，通過該行的董事米克爾 [20](#20_7)  先生，他們在議會已經有了利益代表。我本人當然對謝爾先生沒有意見，只是試圖表達公眾的觀點” [[140]](#140_1)  。兩周后，俾斯麥親筆寫了簡短的回信：“6月以來，政界沒有新動向。我身體感覺好些了，但仍未康復。你關于鐵路局的信來晚了兩個月。” [[141]](#141_1)  這個回復并不完整，也不完全屬實：謝爾是在布萊希羅德來信前兩周而非前兩個月被任命的，威廉皇帝在確認任命時也對與貼現公司關系如此密切的人選感到吃驚 [[142]](#142_1)  。但俾斯麥似乎不為這些疑慮所動。八個月后，謝爾辭職，私人鐵路公司和個別成員邦的阻撓讓他精疲力竭 [[143]](#143_1)  。

俾斯麥任命阿爾伯特·馬伊巴赫（Albert Maybach）為繼任者，此人與鐵路打過多年交道，是少數受到俾斯麥敬重的人之一。但馬伊巴赫同樣遭遇強烈反對，議會拒絕賦予他的部門對全德鐵路的監督權。甚至在法案被提交前，大衛·奧本海姆就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帝國政府似乎決心通過無休止的規定毀掉所有的鐵路公司，從而讓帝國最終廉價購得鐵路。（皈依基督教后，大衛也被稱作達格貝特［Dagobert］，他是銀行世家中的紅色成員：從1841年到1843年，他是《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的創始人之一和編輯，這份進步報紙刊登過馬克思的一些早期文章。后半生，他活躍于萊茵鐵路這家與他的兄弟們關系最密切的公司 [[144]](#144_1)  。）他后來寫道：“在這里，俾斯麥親王被視作聲名狼藉的新鐵路法草案的構想人……居然有人膽敢如此提議，實在是時代的悲哀，特別是它完全忽視促進所有經濟利益的必要性。” [[145]](#145_1)  一年后，在俾斯麥的堅持下，普魯士議會通過法案，為帝國收購普魯士鐵路掃清障礙。這樣的集權方案引發抗議風暴—就連俾斯麥的同僚也反對該計劃，特別是坎普豪森和阿亨巴赫。奧本海姆對所提議的“征用”（正式形式還在構想中）大發雷霆：“盡管我既不能也不愿相信這位偉大政客的計劃—它無所顧忌地拿德意志帝國的經濟和財政毀滅做賭注—會在今后十年間被實施，但仍然令人遺憾的是，俾斯麥親王的計劃無意中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做了幫兇。”他表示，這是一道“在共產主義肉湯中”烹制的菜肴 [[146]](#146)  。遺憾的是，這番激烈言辭沒有傳到俾斯麥耳中，不久之后他向敵人發起類似的指責。

俾斯麥的普魯士同僚不愿將利潤豐厚的鐵路讓給帝國，也不想收購私人鐵路。帝國的其他成員邦同樣反對帝國購買普魯士鐵路。俾斯麥對不斷的破壞活動感到惱火，而布萊希羅德的影射加強了他的懷疑。1877年12月，布萊希羅德寫道：

十天前，我同商務部長[阿亨巴赫]談話，并向他陳述我對什切青鐵路事務的看法。此后，他再也沒有和我接觸，盡管他似乎很高興我提出解決該問題的新方法。閣下將會理解，我在這件事上已經盡力，只能等待商務部長提起該問題。我只是擔心這樣的拖延會損害事情的進展。 [[147]](#147)

四天后，俾斯麥給阿亨巴赫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內容是總體的鐵路問題。12月23日，他堅稱，如果普魯士議會反對他的鐵路計劃，他將辭職—他還表示，該計劃對普魯士的防務絕對不可或缺 [[148]](#148)  。

俾斯麥把鐵路問題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他視其為全國性問題—而包括普魯士部長們在內的特別利益者則從狹隘的自私視角看待它。他的改革提議遭到多次挫折；1878年3月，他在普魯士內閣的頭號敵人阿亨巴赫終于辭職；同年秋天，俾斯麥創立普魯士公共工程部，由阿爾伯特·馬伊巴赫主持，負責鐵路事宜。現在的計劃是收購普魯士剩下的私人鐵路，將它們納入普魯士體系—這樣至少在德國最大的成員邦，統一的體系可以滿足防務和效率的需求。該計劃的執行遇到無盡的困難，布萊希羅德總是抱怨各種拖延和阻撓。

執行俾斯麥的計劃對布萊希羅德有很實際的利益。從1875年和1876年開始，他買斷了他認為將被國有化的兩家公司的股份—他行事盡可能小心，并獲得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定的資金支持。盡快完成買斷而又不推高股價是一項微妙的操作，他似乎把日常策略委托給卡爾·菲爾斯騰貝格，后者幾年后成為一家競爭對手銀行的行長，開始自己的傳奇生涯 [[149]](#149)  。但這項交易必定也包含巨大的風險：鐵路前景黯淡，唯一的希望是某種形式的國有化，布萊希羅德知道政府在該問題上分歧嚴重。普魯士議會剛剛通過首部允許向帝國出售鐵路的法令，邁耶爾·卡爾男爵就致信俾斯麥，表示他們共同創建的波森至克洛伊茨堡鐵路的狀況幾乎不能更糟了：“最好的出路是國家收購這些線路，因為在私人手中它們無法繁榮，只有在沿線擁有產業的地主能通過他們獲利。” [[150]](#150)  1877年夏，漢斯在信中告訴父親，市場勢頭良好，“除了我們可憐的德國鐵路，它們正慢慢地但似乎確定無疑地走向最終的破產” [[151]](#151)  。同年，布萊希羅德創立的大陸建設公司損失600萬馬克，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非常尖刻地記錄了此事 [[152]](#152)  。但布萊希羅德還是把賭注押在早日國有化上，他買入鐵路股票，并不斷提醒俾斯麥，部長們正在阻撓首相的政策。

政策的成功同樣關系到俾斯麥巨大的個人利益。俾斯麥的很大一部分私人財產投資于鐵路股票。授權普魯士向帝國出售鐵路的法令推行三天后，俾斯麥就授意布萊希羅德購入價值3萬馬克的柏林—什切青鐵路4.5%的優先股，以及同樣價值的柏林至安哈爾特鐵路4.25%的股份 [[153]](#153)  。幾年后，柏林—什切青鐵路成了普魯士第一條被國有化的鐵路。我們將看到，在隨后的八年里，俾斯麥連續買入和賣出價值超過100萬的鐵路股票—某些時候，他差不多一半的流動資本都投資于這些股票。這些投資是對他自己的國有化政策最清晰的承諾，因為國有化失敗或耽誤過久可能造成他的經濟損失。

在頻繁寫給俾斯麥的信中，布萊希羅德從未提及兩人在該問題上共同的金錢利益，但他可以指望俾斯麥的強烈關心，直接提及他們的金錢賭注顯得多此一舉。布萊希羅德與官方矛盾不斷，他在許多私信中向俾斯麥報告這些伎倆。在1877年12月的一封長達11頁的書信中，他抱怨說：

自從就任之初，馬伊巴赫部長就對我表達了他對將某些私人線路國有化的觀點，認為這對完成國家經濟改革絕對必不可少，他覺得有必要在下次議會會期內解決此事。與此同時，他一直抱怨在財政部遇到的阻力，這讓他在鐵路問題上無法取得成功。不過，在過去的幾周里，財政部長變得更加配合，于是我成功地安排商務部長與柏林—什切青鐵路[和其他幾條鐵路]的執行官們舉行會談。但此后，財政部長又提出新的反對，上述談判被迫推遲。

書信的其余部分涉及柏林—什切青鐵路，兩人都是它的股東。如果該鐵路被國有化，普魯士政府將向股東支付普魯士國債，計劃的利率將取決于線路通常的回報率。對柏林—什切青鐵路而言，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同意支付5又2/3個百分點的利率（之前的回報率在4到8又1/2個百分點之間）。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還表示，由于凈收入下滑，鐵路公司的董事們取消了1月1日的分紅。因此，部長們決定不向議會提請授權收購該鐵路，而是請求其接受國有化原則。布萊希羅德非常憤怒，因為這樣的拖延可能導致為壓低利率展開更多爭奪，落得股東拒絕整個方案的下場。布萊希羅德指出，馬伊巴赫應該堅持國有化原則，并為什切青主張5又2/3個百分點的回報，如果這被證明不可行，馬伊巴赫仍然可以達成5或4又1/2個百分點的目標。僅僅通過原則還不夠。“閣下寬宏仁厚，定會原諒這些直率的解釋，相信我的主張并非出于自私利益，而是基于鐵路國有化必須與春天將要展開的稅收改革同時進行的觀點，因為若非如此，1879年又將是工商業遭受損失的一年。” [[154]](#154)  布萊希羅德顯然清楚地向俾斯麥表達了自己的想法；赫伯特寫信給弟弟威廉：“布萊希對馬伊巴赫很不滿，堅稱完全無法理解他，并表示到了秋天，我們或者根本買不到鐵路，或者價格要高得多！另一方面，他居然稱贊了霍布雷希特！” [[155]](#155)

1879年1月末，議會預算委員會接受進一步國有化的原則。當天晚上，布萊希羅德在委員會中的朋友寫信給他：“委員會認為，通過經濟規章摧毀私人鐵路，從而廉價收購它們的做法不符合政府的體面。” [[156]](#156)  但當時沒人知道政府收購鐵路的時機和可能的條件。關于政府的內部分歧和股東間爾虞我詐的傳言甚囂塵上。正是在這種眾說紛紜中，布萊希羅德的其他名人客戶開始不斷向他打聽關于國有化確切前景的秘密消息。1878年12月，羅伊斯（Reuss）親王亨利七世詢問某些具體線路的國有化可能。1879年5月，他又詢問是否不應該以119的價格出售他的科隆—明登鐵路股份，因為布萊希羅德曾經預測國有化只會將股價推高到115。1879年7月，萊恩多夫伯爵請求獲得類似的信息。當年8月，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報告說，他見到馬伊巴赫，后者向他提供了關于萊茵和安哈爾特鐵路國有化的計劃條件的真實信息。因此，奧伊倫堡問布萊希羅德，額外購入萊茵鐵路的股票是否“值得”。幾個月后，奧伊倫堡重申對鐵路股票的興趣，但表示一切取決于國有化，而國有化的前景“只有你知道”。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一直向俾斯麥通報情況。1879年6月，他報告說，什切青鐵路的股東們已經接受政府的條件 [[157]](#157)  。不過，他警告說，馬伊巴赫告訴自己，財政部長霍布雷希特似乎不愿支持更多的國家收購 [[158]](#158)  。一個月后，霍布雷希特離職，更加順從的卡爾·比特接管財政部。

但麻煩并未結束：1879年11月，馬伊巴赫終于向議會提交第一份具體的國有化法案。當俾斯麥遠遠地怒稱如果法案被駁回就辭職時，馬伊巴赫卻不得不當場面對強烈的反對者。他覺得攻擊是最好的防御。他承認股票金融家們反對該法案，因為這會讓他們失去投機對象。他宣稱：“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股票交易是一株毒樹［Giftbaum］，向國家的生命投下致命的陰影。”讓馬伊巴赫憤怒的是，盡管采取了最嚴格的保密措施，市場上還是出現了對將要被國有化的鐵路股票的投機。他在公開場合只說了這些；私底下，他完全清楚布萊希羅德及其客戶們已經獲悉政府的計劃。“毒樹”言論引發抗議風暴，他只得收回這種比喻。但他只是說出當時大多數普魯士人的感受—甚至在鐵路問題上的貴族投機者也會假裝對股市不屑 [[159]](#159)  。

布萊希羅德一定對馬伊巴赫的譏諷感到特別痛苦。馬伊巴赫和廣大感興趣的公眾都很清楚他對柏林—什切青鐵路股票的操作。（早在1877年12月，一位記者朋友就致信布萊希羅德，抱怨說《柏林交易所通訊》［Berliner Börsen-Courier］刊登了“一篇如此惡毒的文章，內容是你和商務部長最近因為柏林—什切青鐵路而建立的關系。鑒于你給予過達維德森［Davidssohn，《通訊》編輯］許多恩惠，此文幾乎讓人難以置信” [[160]](#160)  。）但更讓布萊希羅德煩惱的是馬伊巴赫的拖延而非其言辭，于是他繼續向俾斯麥抱怨。

布萊希羅德最大的困難來自一條較小的鐵路：連接萊茵河與薩爾河谷的萊茵—納厄（Rhein-Nahe）鐵路，全長不到80英里。這是一條單軌鐵路，軍方一直希望將其改造成雙軌鐵路，但股東們拒絕，他們覺得這條虧錢鐵路被國有化的唯一機會是讓軍方相信，除了國有化之外沒有可能建造第二條鐵軌。布萊希羅德記得事情的緣起：“1880年5月，我有幸獲得財政部長比特的來訪，他要求絕對保密，告訴我希望將萊茵—納厄鐵路國有化，因為陸軍元帥毛奇伯爵認為這在戰略上很重要，覺得第二條鐵軌絕對有必要。” [[161]](#161)  6月，布萊希羅德在寫給比特的信中提出自己的方案：他報告說該鐵路的名義資本為2700萬馬克（或者票面價值為100馬克的27萬股），其中約5萬股仍然在原始投資者手中，他們不愿虧本出售。為了實現國有化，政府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參加投票的股份支持；過去的經驗顯示，并非所有的股東都會投票，因此政府需要13萬股。布萊希羅德建議，政府應該開價每股25馬克，因為過去三年的股價在11到30馬克間波動。

布萊希羅德已經以18又3/4的價格購買了3萬股，還說服持有2.2萬股的朋友們接受25馬克的價格—因此只需再收購7.5萬股，他提出在四到五個月內完成。他明確表示，整個操作都將為官方著想，以低于25馬克價格購入股份所產生的收益顯然將歸政府所有，從而減少收購鐵路的總成本。比特接受這些建議，但將上限定為24馬克 [[162]](#162)  。布萊希羅德請求盡可能保密，因為任何可能的消息泄露都會抬高價格。七周后，他報告說，盡管遭遇“巨大的苦難”，他還是又購買了1.2萬股，他的朋友們現在持有3.6萬股，而部長持有1萬股。還需購買更多股份，但價格已經上漲到22又1/2，布萊希羅德擔心，泄密肯定刺激了競購。事實上，為了防止價格進一步上漲，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已經購入的股票。9月，經過布萊希羅德的更多幕后運作，公司股東接受政府的方案 [[163]](#163)  。

但最大的困難仍未解決：12月，布萊希羅德一邊重新整理記錄，一邊多次拜訪比特，希望打聽出政府何時向議會提交必要的法案。比特向他保證，只要他對最終結果有信心就會馬上采取必要行動，因為戰爭部長和皇帝都支持該方案。另一方面，根據布萊希羅德的說法，比特拒絕他的提議，即操作中的收益應該歸政府。比特堅稱，政府不能參與這樣的交易，收益應該留給布萊希羅德，因為后者也承擔風險。兩人同意在議會投票結束后再解決該問題。

不過，公共工程部長馬伊巴赫—1880年7月，布萊希羅德在巴德霍姆堡（Bad Homburg）見過他，并向其坦誠自己的操作—突然在議會譴責令他“惡心”的萊茵—納厄鐵路股票“大投機”。投機將股價推高到不合理的地步—受益者是當今的投機者，而非將自己的錢投入鐵路建設并損失一部分投資的誠實之人。馬伊巴赫的這番話危及議會的投票，一位中央黨的反對派領袖也呼應上述指控：大部分股票被“少數大銀行”買走，“因此如果今天我們接受24馬克的價格，那么我們只是在滋養那棵毒樹，就像部長所做的形象比喻” [[164]](#164)  。布萊希羅德擔心股票將因為無法國有化而暴跌，導致自己可能被套牢。他寫道：“對我而言，我相信可以證明，整個交易并非為了我自己，而是誠心為了政府和以政府名義，就像書信所顯示的。因此國有化被拒絕導致的損失也應由政府而非我的銀行承擔。”如果可以讓馬伊巴赫“在議會對國有化進行辯護，從而完全打消對整個公共工程部立場的懷疑”，議會仍有可能被說服接受所提出的協議 [[165]](#165)  。一年后，該鐵路以24馬克的價格被國有化。

我們不知道誰獲得這些收益，盡管可以合理地推斷，出于官僚主義的原因，財政部很難將這筆意外之財納入囊中。因此布萊希羅德很可能留下大約25萬馬克的資本利得—無論他可以想出什么推脫的理由。當時他一定覺得那是自己掙得的：我們沒有證據表明，他在其他任何鐵路交易中遇到如此之多的困難或者獲得如此之高的收益率（他在22個月內獲得了約30%的收益）。

俾斯麥滿足于小得多的收益。1880年11月和1881年5月，布萊希羅德分別為他購買了價值14萬和2.26萬馬克的奧得河右岸鐵路（Rechte Oder Ufer Road）股票；1881年6月和8月，他分別以14.6萬和2.5萬馬克出售了這些股票。在較小的那筆買賣中，他三個月內獲利近10%（這些鐵路最終于1882年國有化）。隨后的兩年間，他又買入和賣出價值約17萬馬克的科隆—明登鐵路股票，收益率更低。1883年7月，在俾斯麥的口頭“授意”下，布萊希羅德通過六次交易買入40萬馬克的上西里西亞鐵路（Upper Silesian Railroad）股票。該鐵路六個月后國有化，俾斯麥賺取略多于2%的收益 [[166]](#166)  。這種操作本質上就是銀行家們所稱的套利：鐵路股票被換成普魯士債券，這是一種以微小折扣購買債券的方法。

俾斯麥購買這些股票時，普魯士鐵路將國有化已經眾所周知。不過，普通投資者無法確定某條鐵路是否將國有化或者有何補償條件。俾斯麥比幾乎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這些情況，此外他還有能力對部長們施壓，盡管就像我們看到的，他在鐵路問題上經常遇到大難題。按照我們的標準，首相投資鐵路股票的時機很奇怪。在某些情況下，這涉及我們所謂的內幕信息，盡管始終都沒有出現巨額或不合適的收益。不過，俾斯麥很可能覺得他在用自己的錢幫助政府，因為作為股東，他將投票支持政府。我們可以肯定，他自己的大量投資維持了他對鐵路國有化的強烈興趣 [21](#21_7)  。

布萊希羅德在普魯士鐵路國有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在普魯士內閣和議會接受原則后，國有化的實際操作方面仍然復雜。每項收購都必須分別立法，需要與議會的漫長談判和股東的批準。布萊希羅德的建議在前者中切實有效，他復雜的市場操作在后者中發揮重要作用。內閣官方需要謹慎、高效和足智多謀的銀行家完成自己的計劃，在國有化之前購買必要數量的股份。布萊希羅德無疑看到這項任務有利可圖。至少他賺取巨額傭金，有時還獲得可觀的收益。

最重要的是，俾斯麥的計劃成功了：他堅持認為鐵路應該屬于普魯士政府，它們是國家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命脈和戰爭時期的防務基石。1876年，國家擁有4683千米的鐵路；到了1890年，它又以超過28億馬克的價格收購另外1.4萬千米的鐵路 [[167]](#167)  。幾乎沒有私人鐵路剩下，國家運營著一個高效、可靠和經濟的模范體系。通過運營已經成為普魯士最大企業的鐵路（而且完全沒有罷工的威脅），國家的力量大大增強。俾斯麥有理由對自己的成功和布萊希羅德的幫助感到滿意：對國家和那些無利可圖的鐵路的昔日擁有者而言，私企的國有化被證明是幸事。

[5]

對俾斯麥而言，1878—1879年的重大改變只是新的保守主義重組的開端。他構想一個積極的社會立法方案，準備把下層階級納入其中，從而保護國家免受社會沖突和黨派爭端所累。新方案需要得到議會批準，他希望投票支持經濟改革的聯盟也將支持他的其他計劃。

但新的權力分配并不像19世紀70年代初的自由民主黨那么穩定和忠誠。俾斯麥仍然無法在議會掌握多數，仍然不得不應對上院的特殊利益元素。為了每一部法案和每一項財政改革順利通過，他都需要收買支持者。十年間，他對議會恩威并施，并考慮削弱其力量。他經常提及修改選舉法的必要；在憤怒和沮喪的時刻，他還認為可能不得不毀掉帝國和動用軍隊。有時，這些威脅是策略性的，作為對付反對者的武器；其他時候，他很可能認真考慮過政變。1886年，他對德國駐俄國大使馮·施魏因尼茨將軍表示：“我也許不得不毀掉我所創造的，這的確可能發生。” [[168]](#168)

俾斯麥樂于相信，國民議會不能代表人民—專制統治者特別容易產生這種幻覺。盡管議會可能無能，但它并非不具有代表性。議會中反映出的分歧是真實的，盡管俾斯麥本人讓它們加深。他不知疲倦地尋求權宜之計來贏得新的支持：有時取笑或揶揄其他德意志成員邦的統治者，有時向受侵害的群體施以物質恩惠，并總是操縱著媒體。在所有上述舉動中，布萊希羅德扮演著謀士和助手的慣常角色。

19世紀80年代，布萊希羅德的角色有了些許改變：他更多充當游說者和請愿者，而非顧問。他與俾斯麥的個人關系仍像以往那樣緊密，盡管我們在下一章將看到，他與赫伯特關系破裂。布萊希羅德與荷爾斯泰因對彼此的關系都變得冷淡。俾斯麥的親隨發生人員流動，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做出調整。俾斯麥的新文書和女婿蘭曹伯爵成了布萊希羅德的親信，俾斯麥的新下屬—外交部的哈茨菲爾特和內政部的卡爾·馮·波蒂謝（Karl von Boetticher）與布萊希羅德特別親密。（波蒂謝寫道：“愿上帝與你同在，愿他獎賞你如此無私和自我犧牲的友誼……請在未來保持這份友誼，它讓我如此幸福。”—也讓他有能力還債。）

布萊希羅德本人的政治觀點仍然與政府的新正統思想保持一致。他同樣是保守主義者、干預主義者和反社會主義者。他對國家家長主義的擁護反映在他1879年12月寫給赫伯特的一封信中，他請求國家立即對上西里西亞進行干預，因為當地遭遇失業、饑荒和疾病的突襲：“遺憾的是，我們的政府對這次緊急情況表現得相當冷漠，但我認為除了各種人類情感，援助那個不幸的省份在政治上也有必要，以免讓社會黨人趁機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卑劣目的賺取資本。”他認為應該花費數百萬馬克提供工作和食物 [[169]](#169)  。

俾斯麥對議會的敵意似乎沒有讓布萊希羅德感到不安；他甚至參與反對左翼自由派的活動，盡管在政府鼓勵和從中受益的新一波反猶主義浪潮中，他們是德國政界唯一提出反對的團體。比如，在1881年的議會選舉中，拉斯克指出“反動派將猶太人問題放到他們運動的核心，以便迎合宗教狂熱主義，利用對猶太人的廣泛憎惡實現自己的目的”。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幫助拉斯克阻止猶太人特別行動，向自由派提供資金支持—但蓋爾森不愿參與反對行動 [[170]](#170)  。

他仍然認為，政府和“他的朋友們”（尤其是后者）是抵御反猶主義的最佳堡壘。他仍然通過宮廷猶太人的視角看待世界。

另一個事件講述同樣的故事：1884年12月，由左翼自由派、中央黨和社會黨組成的議會多數派拒絕了俾斯麥提出的為外交部一個新設立職位提供資金的請求。此舉的目的是對俾斯麥的外交和殖民政策表達不滿，特別是后者。俾斯麥對此惱怒異常，一位與他親近的同僚寫道：“我從未見過親王如此煩惱，我擔心這會對他產生嚴重影響……他反復強調，他將歡迎社會黨人的政變，應該允許為更多的沖突積累材料。”兩天后，布萊希羅德在寫給俾斯麥的私人書信中報告說：

最近在帝國議會發生的事已經引發商業領袖圈子里……對議會的高聲怒斥，比如針對進步黨和中央黨的領導人。我們一致認為，如果現在舉行新的選舉，柏林商界將盡其所能確保路德維希·勒維[Ludwig Löwe，柏林的進步黨議員]和菲爾肖之流不會再次當選。祖國因為閣下認為必要的一小筆資金遭到拒絕而蒙羞，帝國商界對此憤怒異常，也許到了欣然做出犧牲的時候。 [[171]](#171)

布萊希羅德的信象征著對議會拒絕的怨聲載道。一些商業團體甚至提出向俾斯麥提供設立新職位的必要資金。布萊希羅德認為解散可能是對議會的合適懲罰，而俾斯麥傾向于更強硬的回應。

俾斯麥的保守主義轉向包括創立偽代議制機構以削弱議會，以及通過社會立法讓工人們放棄對社會黨效忠的計劃。他很早就有組建國家經濟委員會來為政府提供咨詢的想法。布萊希羅德在1878年提出過此類方案，工業家協會也有過類似提議。1880年秋，俾斯麥親自執掌普魯士商務部，并以御令之名提議創立這樣的委員會。1881年初，委員會成立。在開始審議前，俾斯麥提醒委員們，他們比政府官僚或議員們更有能力和實踐經驗，代表國民中有創造力、務實和有見識的元素，應該幫助普魯士政府在他們最熟悉的領域制定法律 [[172]](#172)  。俾斯麥此舉的反議會目的顯而易見，因此帝國議會反對為帝國創立類似的機構。俾斯麥的計劃收效甚微，它有意識地退回到早前的社團制度，并預示著后來專家和技術官僚在更復雜的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173]](#173)  。

普魯士委員會審議的首份提案是俾斯麥關于工人意外保險的計劃。這標志著俾斯麥雄心勃勃的社會立法（與反社會黨人法同時制定）的開始。以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方式，他希望同時鎮壓顛覆活動和消除其根源。1878年末，他表示：“如果工人再也沒有抱怨的理由，那么社會主義的根源也就枯竭了。” [[174]](#174)  俾斯麥的目標無疑是政治的：在殘酷的依附時刻，下層階級應該明白，只有國家能向他們提供幫助，而不應該依靠貧窮的家庭、冷漠的雇主或社會黨。圣瓦里耶承認俾斯麥方案的宏大：“［它］比其他方案更加全面、大膽和危險；為了打擊社會黨人，他借鑒他們的目標，并讓國家成為所有工人組織的軸心。” [[175]](#175)

俾斯麥稱自己的方案為“國家社會主義”，對于總是相信國家有照顧國民的道德責任，相信基督教的家長主義要求富者照顧貧者的人來說，該方案順理成章 [[176]](#176)  。在農村生活中，“位高則責重”的理想仍然流行。但政治動機同樣強烈，并減輕了袖手旁觀心理的影響。

和后來的其他許多社團主義改革者一樣，俾斯麥過于信仰某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經濟決定論。工人們需要的不僅是面包，甚至不僅是保障；他們自己的黨派能很好地提供剩下的需要，以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將理想訴求和確定性分析結合起來。面對俾斯麥的打壓和讓步，社會民主黨仍然逐漸壯大，他的政策經常被認定失敗。的確如此嗎？這些政策不是幫助造就該黨的修正主義性質和工人們的馴服嗎？這種性質和馴服不是大大有利于俾斯麥的帝國嗎？它們是否在長期內有利于德國政治的發展是另一個問題。

雖然布萊希羅德關心窮人，愿意看到政府擴大管轄范圍，但他反對威斯特法倫工業家路易斯·巴爾（Louise Baare）提出的意外保險方案。在寫給俾斯麥的信中，布萊希羅德質疑巴爾的方案只涵蓋工作中的意外—俾斯麥的批注否認這種說法。然后，布萊希羅德又批評巴爾的養老金提議，認為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真正需要的是一小筆資本；俾斯麥的批注是：“他花完那筆錢怎么辦？？”（Das schlägt er todt？？）布萊希羅德承認，主動提出這種建議是因為他與一家大保險公司關系密切—他在北極星公司（Nordstern）擔任董事 [[177]](#177)  。俾斯麥不喜歡保險公司，后者也擔心被他國有化。他沒有理會布萊希羅德的警告 [[178]](#178)  。

1885年，布萊希羅德幫助俾斯麥的守林員長彼得·朗格（Peter Lange）準備關于俾斯麥莊園的農業工人們現有保險狀況的備忘錄。一年后，意外保險法的適用范圍擴展到農業工人。1889年，為各種類型的工人設計的養老計劃獲得通過，從而完成俾斯麥的方案 [[179]](#179)  。俾斯麥的全面社會立法是他在19世紀80年代最大的成就，讓德國成為該領域無可爭議的領先者。

俾斯麥發現很難說服頑固的議會批準額外的收入用于彌補攀升的開支。但至少他現在有了得力部長的幫助：1882年，比特辭去財政部長，俾斯麥任命阿道夫·馮·朔爾茨（Adolf von Scholz）繼任。他把朔爾茨看作第一位忠于自己的財政部長，他與朔爾茨的親密關系稍稍削弱布萊希羅德的影響 [[180]](#180)  。

不過，俾斯麥鐘愛的一些計劃仍然反復受挫。布萊希羅德被懷疑破壞1883年的普魯士預收收入稅計劃。荷爾斯泰因在當時記錄道：“在純粹的金融問題上，特別是與股票交易相關時，首相本人沒有主見，而是依賴朔爾茨和布萊希羅德的闡述。這兩人很少意見一致，而俾斯麥親王幾乎總是站在舒爾茨那邊……” [[181]](#181)

1884年5月，當朔爾茨提議立法征收營業稅和周轉稅后，兩人的分歧爆發了 [[182]](#182)  。三天后，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寫了長達8頁的信，抨擊這個已經讓股價下挫2到10個百分點的新提議。比起計劃中的稅率，更讓布萊希羅德詬病的是新稅法的形式。“作為商業活動的兩大支柱，榮耀和審慎組成商人的驕傲，要求永遠交出賬簿以最敏感的方式傷害他們……”計劃中的稅率讓潛在的災難雪上加霜。布萊希羅德表示，這種阻礙將迫使“受驚的資本”尋求不受束縛的國外市場。較小的交易將枯竭，數以百計的家庭將受到影響：

一部分奢華[Luxus]……將可能消失。這對我們的經濟狀況是否有好處，我不敢斷言……根據我四十六年的從業經驗，我知道德國大都市逐漸吸引歐洲商業的原因正是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流動，我國的繁榮從中大受裨益……閣下會原諒我的這番直白表態；我總是樂意用自己多年的經驗為國效勞，根據這些經驗，我可以預見到此舉的后果。 [[183]](#183)

布萊希羅德顯然知道這個建議并非出于公心。另一方面，就像后世之人可能說的，對布萊希羅德不利可能也對整個德國商界不利。事實上，商界發出公開的哀號，很像布萊希羅德私下所做的。不過，上議院還是在6月通過該法案。讓俾斯麥足夠煩惱的是，他的一個噩夢—當他沿湖邊行走時，湖水突然波濤洶涌，如果不退避就會被淹死—可能源于他提出的股市稅。

1885年5月，帝國議會批準證券交易稅；布萊希羅德仍不甘心，告訴俾斯麥這種稅收正在迫使投資流向國外。他對荷爾斯泰因表示：

俾斯麥和我一樣清楚，同樣反對證券交易稅，但當《十字報》和《帝國郵報》[Reichsbote]暗示俾斯麥親王對金融家表現出過分的順從時，他覺得停止抗議更加明智。我告訴他：“閣下什么都不必說。我理解閣下，認同您的做法。有時我會夢見眼前出現第二份《帝國之鐘》[Reichesglocke，一份反猶主義報紙，曾攻擊過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 [[184]](#184)

反猶主義影射的威脅強大到足以打消其他考慮—至少從布萊希羅德的說法來看是這樣。這從另一個方面解釋了在19世紀80年代的保守時期，為何他對財政事務的影響下降。

[6]

但他在某些領域的作用仍然很大。俾斯麥對總是阻撓自己的帝國議會惱怒不已，于是更多依賴代表帝國各成員邦政府的機構—聯邦參議院（Bundesrat）。19世紀70年代，他也曾和聯邦參議院發生過沖突，但到了1879年，他意識到如果不得不在“加強25個追求私利的政府或者加強帝國議會的權力之間做出選擇，他寧愿選擇前者” [[185]](#185)  。1880年4月，聯邦參議院否決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法案，俾斯麥馬上提出辭職 [22](#22_7)  。威廉拒絕接受，但俾斯麥借機加強對聯邦參議院的控制，甚至想要大幅修改它的構成，讓普魯士在其中永遠擁有多數 [[186]](#186)  。無論如何，俾斯麥試圖加強與其他王朝的聯系，并反復提醒它們，只有德國的各邦政府密切合作才能遏制顛覆浪潮 [[187]](#187)  。

但俾斯麥知道，意識形態的訴求最好得到更加有形的服務補充，在這點上布萊希羅德和過去一樣有用。他與德意志其他邦國的政府和王朝建立密切的關系—既為了招攬生意，也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畢竟，各邦政府仍在發行自己的貸款，各王朝也仍在頒發勛章。

在俾斯麥與德意志各王朝關系的某些關鍵時刻，布萊希羅德以自己的審慎和財力扮演重要的幕后角色。他有時擔任轉賬代理人（常常與韋爾夫基金相聯系），有時通過特別順從地滿足拮據統治者的愿望來為俾斯麥效勞。

我們已經提到，布萊希羅德在被廢黜的漢諾威王朝的命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參與關于不倫瑞克王位繼承漫長爭端的同樣是溫特霍斯特、不滿的圭爾夫家族、英國王室和布萊希羅德。一位圭爾夫家族成員對王位提出主張，維多利亞女王支持自己的親戚，但俾斯麥決心阻止圭爾夫家族獲得德意志的王位，只要他們仍然拒絕放棄對漢諾威（1866年被普魯士吞并）的主張。1881年，威爾士親王（后來的愛德華八世）要求布萊希羅德提供關于不倫瑞克問題的備忘錄，再由其轉交給他的母親。經過與溫特霍斯特的協商后，布萊希羅德提供了備忘錄，并與親王進行了幾次談話。但努力無果而終，該問題直到1913年才解決 [23](#23_7)   [[188]](#188)  。

比這重要得多的是布萊希羅德與巴伐利亞王朝的聯系。每年，他繼續從韋爾夫基金中向路德維希國王支付30萬馬克的補貼。但這些錢遠遠無法滿足國王著名的“大興土木狂熱，這是他疾病的癥狀之一” [24](#24_5)  。路德維希風度翩翩，喜愛藝術，精神狀況不穩定，他試圖效仿路易十四取得的偉大建筑成就，甚至對波旁王朝最后成員的情婦們懷有性迷戀，卻拒絕了自己身邊準情婦們的所有獻媚。

從1876年開始，關于路德維希即將破產的傳言陸續傳到柏林，人們還經常提到，布萊希羅德是可能的馬伊克納斯（Maecenas） [25](#25_5)  。到了1884年初，國王的債務已經上升到超過700萬馬克，但他雄心勃勃的計劃才剛剛展開 [[189]](#189)  。最終，路德維希決定派遣行政專員菲利普·普菲斯特（Phillip Pfister）向俾斯麥求助。2月9日，普菲斯特匿名抵達弗里德里希斯魯，他發現俾斯麥樂意幫忙，盡管采用什么方式仍不清楚。700萬馬克是筆可觀的數目。俾斯麥詢問威廉是否愿意援助這位身為他外甥的國王 [26](#26_5)  ，與此同時，他向普菲斯特暗示，布萊希羅德也許可以籌到必要的資金。盡管威廉含糊地表示愿意幫忙，俾斯麥還是派首相府的重要參謀弗朗茨·馮·羅滕伯格（Franz von Rottenburg）說服布萊希羅德出手相助。按照荷爾斯泰因的說法，“布萊希羅德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羅滕伯格］剛說明來意就被他一把抱住”。與此同時，赫伯特致信荷爾斯泰因表示：“巴伐利亞的財政事務落入布萊希羅德之手令我惋惜，因為我把那個骯臟的猶太人視作邪惡的化身，對任何現在或將要被迫和他展開業務的人感到遺憾。” [[190]](#190)  （赫伯特真的對自己的父親感到遺憾嗎？）荷爾斯泰因和赫伯特認定，布萊希羅德覬覦這筆巴伐利亞業務。荷爾斯泰因認為他想要巴伐利亞的貴族頭銜或大十字勛章，并惡意將其描繪成一個“總是因為缺乏謙遜而顯眼”的人 [[191]](#191)  。

荷爾斯泰因忽視了布萊希羅德對哈茨菲爾特的抱怨，即他接手巴伐利亞業務只是為了取悅俾斯麥。據說布萊希羅德甚至表示：“巴伐利亞國王有什么能給我的？”這幾乎肯定是布萊希羅德的所說或所想：銀行家（甚至猶太銀行家）不得不在君主寶座前奴顏婢膝的日子已經過去。國王仍然能享有特惠待遇，但無法再讓人放棄謹慎 [[192]](#192)  。沒有銀行家會為了多得一項頭銜或一枚勛章而冒險付出700萬馬克。

布萊希羅德的行動小心翼翼。2月10日，他與普菲斯特在柏林進行談判。返回慕尼黑時，巴伐利亞顧問帶著來自普魯士政府的100萬馬克易兌現證券和來自布萊希羅德的明確報價承諾 [[193]](#193)  。一周后，布萊希羅德提出奉上300萬馬克貸款。路德維希對此表示感激，但遲遲沒有接受，直到他獲悉一個南德財團正在考慮提供1000萬馬克的貸款 [[194]](#194)  。遭到那個財團拒絕后，普菲斯特于3月中旬回到柏林，受路德維希之托請求俾斯麥斡旋，希望布萊希羅德提供600萬馬克的貸款。俾斯麥的回復反映出他本人對此事的興趣：他承諾全力幫助路德維希，如果失敗了，“那是［因為］我的權力和手段有限，而非沒有盡力”。與此同時，他警告國王注意聯邦參議院中再次出現的自由主義騷動，顯然他希望用布萊希羅德的財政幫助來換取巴伐利亞的忠誠 [[195]](#195)  。

4月6日，普菲斯特詢問布萊希羅德，如果以“父系許可”（即由父系親屬承擔連帶法律責任）為基礎，他是否愿意和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借給路德維希800萬到1000萬馬克。但布萊希羅德要求更多保證。4月10日，普菲斯特通知他，“鑒于此事對王室和國家的重要性”，巴伐利亞財政部長已經接管此前秘密為國王進行的談判。但他同樣無計可施，于是再次向布萊希羅德求助。布萊希羅德的回答毫不含糊：這樣的父系許可將提供什么樣的“物質基礎”或擔保？針對違約有何物質保證？

你們提出的不太高的利率和條件完全沒有吸引力，因為目前的一流可兌現俄國債券有望升值，帶來5.5%到6%的利率。這點很容易理解，因此你們應該相信，我樂意簽訂你們提出的協議幾乎完全是因為我有意服從你們的國王陛下。 [[196]](#196)

談判結束幾個月后，巴伐利亞財政部長終于同一個南德財團達成750萬馬克貸款的協議。普菲斯特對布萊希羅德致以最熱烈的謝意 [[197]](#197)  。這些信揭穿了荷爾斯泰因的虛假指責，即布萊希羅德提出非分要求，從而惹惱國王。在荷爾斯泰因等人看來，布萊希羅德永遠都是錯的：他既是諂媚者又是夏洛克 [27](#27_3)  。

荷爾斯泰因惡意枉屈布萊希羅德不計代價地尋求提供貸款。但長達四個月并以失敗告終的談判完全不符合一位迫不及待的銀行家形象。如果條件合適，他愿意相助。為了迫使路德維希順從自己的德意志政策，俾斯麥也愿意幫助他—不過他更愿意通過自己的銀行家，而非自己的君主。最終，巴伐利亞人在短期內實現自救。這個故事的結局令人咋舌。兩年后，當更迫切的新需求出現時，幾近瘋狂的國王命令他的代理人闖入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銀行。那些人去了法蘭克福，但選擇不執行這個不尋常的御令就返回了。

布萊希羅德是第二帝國的政治中獨一無二的存在。在俾斯麥的影子里，他成了謀士和游說者、親信、國王擁立者和金融雜務工；后來的壓力集團、政府委員會或機構將發揮類似的功能。在顯貴政治的最后階段，布萊希羅德試圖扮演重要角色，并取得成功。他本人的收獲毀譽參半，但出于普遍的虛偽和他的自衛性虛榮，他更多感受到公開的榮耀，而非私下的侮辱。

[1.](#1_18) 莎士比亞《奧賽羅》中的反派，喜歡告密和挑撥。——譯注

[2.](#2_18) 布萊希羅德對金本位的反對引發俾斯麥和路德維希·巴姆貝格在帝國議會的激烈交鋒，后者是帝國銀行和統一帝國貨幣的實際創立者。1879年，奧多·羅素勛爵預言德國將采用雙本位的記錄被泄露給媒體。報道并不屬實，巴姆貝格沒能從政府獲得非正式信息，于是在議會提出該問題。在發言之前，他暗示羅素勛爵一定從布萊希羅德那里獲得了信息。俾斯麥怒斥巴姆貝格，表示這是可恥的影射，“由于某些可恥和可鄙的審判，世人都知道這家銀行擔任我的私人銀行家和商業管理者”。然后，俾斯麥反過來譴責巴姆貝格與銀行界的聯系。這件事讓當事人陷入尷尬，讓布萊希羅德深為憂慮，為此悶悶不樂了好幾天。漢斯·菲爾斯騰貝格錯誤地將此事的發生時間標為1876年，見他所編的《卡爾·菲爾斯騰貝格：一位德國銀行家的生平，1870—1914》（柏林，1931年），第77—79頁［Hans Fürstenberg，ed.，Carl Fürstenberg 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Bankiers1870–1914（Berlin，1931），pp.77–79］。另見，卡爾·赫爾費里希編，《路德維希·巴姆貝格關于貨幣和銀行問題的發言與論文選》（柏林，1900年），第102—110頁［Karl Helfferich，ed.，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über Geld-und Bankwesen von Ludwig Bamberger（Berlin，1900），pp.102–110］。

[3.](#3_16) 1873年初，馬克思預言，經濟周期的下行將標志著“普遍危機”的開始，“這樣的危機正再次來臨，盡管才剛剛開始；但它的普遍范圍和影響強度將向人們的頭腦灌輸辯證法，甚至包括新的神圣普魯士—日耳曼帝國中勢頭迅猛的新貴”。……就像我們將看到的，這場蕭條向德國人頭腦中灌輸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而是反猶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卡爾·馬克思，《資本論：資本主義生產的批判性分析》（紐約，1947年），第xxxi頁［Karl Marx，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New York，1947），p.xxxi］。

[4.](#4_16) 布萊希羅德檔案中充斥著名人客戶們抱怨突然遭受損失的書信。有時，客戶的哀嘆中會流露出對布萊希羅德的指責—你怎么能讓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或者更有甚者，你怎么能鼓勵我進行這么危險的冒險呢？有時，素不相識的人也會寫信給布萊希羅德，下面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875年，布萊希羅德收到一位名叫卡岑貝格（Katzenberger）的哲學教授的幾封求助信。他以90馬克的價格為守寡的堂妹買了些帝國大陸公司（Reichscontinental）的股票，現在跌至13馬克。他向帝國大陸公司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布萊希羅德求助，因為朋友告訴他，布萊希羅德“人格高尚……您不僅是金融權威，而且生性仁慈樂善”。布萊希羅德無能為力嗎？畢竟，眾所周知，那位可憐的寡婦帶著一群無依無靠的孩子，要不是柏林“最好的銀行”站在那家公司背后，她不會買那些股票。布萊希羅德的回信讓卡岑貝格發來了更多請求，他甚至承諾知恩圖報，“我的筆將在所有重要報紙上聽您調遣”。卡岑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9月7日、10月23日、11月7日，BA。關于蕭條影響的新證明，見特奧多爾·萊辛的自傳《一次足矣》（古特斯洛，1969年）［Theodor Lessing，Einmal und Nie Wieder（Gütersloh，1969）］。書中寫道，他性格不合而且極不幸福的父母不得不延續婚姻，因為父親輸光了母親的嫁妝—所以離婚無法想象。

[5.](#5_16) 這與布登勃洛克公司早年的座右銘形成鮮明反差：“白天奮發工作，但不要做讓你晚上睡不好的事。”托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個家族的沒落》（柏林，1928年），第58頁［Thomas Mann，Buddenbrooks.Verfall einer Familie（Berlin，1928），p.58］。

[6.](#6_16) 在社交上顯然不是。在寫給妻子的不知所措的信中，卡多夫描繪了布萊希羅德的宴會：“昨晚參加布萊希羅德家盛大的音樂會和舞會；音樂會之后是規模浩大的晚宴，然后是舞會—參加者寥寥無幾，軍官尤其少。俾斯麥王妃和我談了很長時間：親王本人當然沒有來，否則外交官、大臣和所有的大人物將蜂擁而至。”齊格弗里德·馮·卡多夫，《威廉·卡多夫：俾斯麥和威廉二世時代的國民議員，1828—1907》（柏林，1936年），第149頁［S.von Kardorff，Wilhelm von Kardorff：Ein nationaler Parlamentarier im Zeitalter Bismarcks und Wilhelms II，1828–1907（Berlin1936），p.149］。

[7.](#7_16) 1873年，德國馬克取代普魯士塔勒，兌換比為3：1。

[8.](#8_16) 《北德大眾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編輯埃米爾·品特（Emil Pindter）致信俾斯麥，通報他的報紙上刊登了新方案；俾斯麥馬上回信警告說，從支持者來看，新黨只是《十字報》黨的加強版，因此如果《北德大眾報》支持該黨，它看上去就如同“加入反動的反對派”。俾斯麥還表示，政府不會反對這個新黨，“即便新黨的組建削弱甚至還可能傷害了作為政府最堅實支柱的［自由］保守派”。品特致俾斯麥，1876年7月12日；赫伯特·馮·俾斯麥致拉多維茨，1876年7月14日，GFO：I.A.A.a.50，第二卷。

[9.](#9_14) 俾斯麥對該法案的初稿提出反對，他解釋說，報復措施不該是對外國狡猾伎倆的回應：“在與外國簽訂各項契約時，我國官員總是更加誠實、笨拙和直率，與更有技巧和紀律的外國官員相比，我們很容易處于下風。”俾斯麥致霍夫曼（Hofmann），1876年10月，GFO：I.A.A.a.50，第一卷。

[10.](#10_14) 1877年11月，伐爾岑和柏林間開通電話；難怪俾斯麥家的老總管熱妮·法提奧（Jenny Fatio）在信中對布萊希羅德說：“政治帶給親王許多不安，微不足道的滿足感，還有一大堆工作。”1877年12月4日，BA。

[11.](#11_14) 社團主義（corporatism）指將立法的權力交給由工業、農業和職業團體代表的政治制度。——譯注

[12.](#12_12) 俾斯麥的長女瑪麗（Marie）嫁給庫諾·蘭曹（Kuno zu Rantzau，1843—1917）。俾斯麥家與蘭曹家關系密切，俾斯麥的妹妹瑪爾維納（Malwine）正是蘭曹伯爵之母。——譯注

[13.](#13_12) 保守刊物《柏林評論》（Berliner Revue）的編輯。1877年，他在《德國的政治奠基人與腐敗》一書中指責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侵吞國家財產，暗示俾斯麥是背后主謀。——譯注

[14.](#14_12) 德·穆伊（C.De Moüy）致瓦丁頓（Waddington），1878年10月22日，MAE：德國，第25卷。法國駐柏林使館每天向巴黎報告德國的國內狀況。報告具有不同尋常的高水準，鑒于德國的動態對法國獨一無二的重要性，這理所當然。報告沒有被包括在《法國外交檔案》（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中，因此這筆豐富的材料此前未被使用。圣·瓦里耶（St.Vallier）是布萊希羅德密友，1878年到1882年擔任駐柏林大使期間，他的報告經常包括來自或關于布萊希羅德的消息。

[15.](#15_12) 在為反社會黨人法辯護的同時，俾斯麥承認自己很早以前與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有交情—他和布萊希羅德的關系與此不無關系。他告訴議會，拉薩爾“不是那種可以建立明確的‘禮尚往來’關系的人，但我還是遺憾由于我倆的政治立場，我和他沒有太多接觸；如果我莊園的鄰居中有一位如此有才華和風采的地主，我會很高興”。這席話帶有某種顯貴自夸的味道，宣稱自己可以在最不可能的人中選擇朋友，無視階級或宗教。如果他可以樂于同一位不能帶給自己什么的猶太社會黨人為伴，那么他也可以和一位能帶給自己很多的猶太銀行家保持密切關系。在同一段發言中，他還宣稱自己認識到“社會—民主元素是國家和社會需要自衛的敵人”，因為倍倍爾或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在1871年稱贊巴黎公社為“政治制度的模板，認可這些強盜和兇殘縱火犯的信條”。《全集》，卷11，第606—610頁。

[16.](#16_12) 足夠引人注意的是，他還和圭爾夫家族的底層黨羽打交道。19世紀60年代，被廢黜的喬治國王試圖喚起外國對他的同情。他主要依賴一位名叫奧斯卡·梅丁（Oskar Meding）的記者，此人曾擔任巴黎一家支持圭爾夫家族的報紙編輯。就在普法戰爭爆發前，俾斯麥把梅丁爭取到普魯士這邊；作為變節的回報，他承諾向梅丁提供養老金，后來還要求他發表控訴圭爾夫家族的文件。1878年，再次債務纏身的梅丁向布萊希羅德求助。他承諾充當布萊希羅德的新聞寫手，并提出幫助在圭爾夫家族和德國政府間斡旋。當時，俾斯麥警告布萊希羅德不要幫助梅丁，認為此人無法量入為出。但布萊希羅德還是施以援手，而梅丁也撰文恭維他。梅丁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2月3、29日，BA；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3月2日，BA；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月5日，BA。

[17.](#17_6) 直到現在，人們一直認為，俾斯麥同意幫助瑪麗王后是因為來自英國的壓力；迪斯累利的確親自向他提出請求，以避免維多利亞女王采取更正式的行動。不過，迪斯累利的請求比溫特霍斯特和俾斯麥的歷史性會面晚了一星期。俾斯麥更有理由答應溫特霍斯特而不是迪斯累利，盡管他無疑樂意一舉滿足兩人。參見漢斯·菲利皮，《韋爾夫基金史》，第204—212、235—246頁［Hans Philippi，“Zur Geschichte des Welfenfonds，”pp.204–212，235–246］。菲利皮沒有提到布萊希羅德或溫特霍斯特在這件事中的角色，斯圖爾特·斯蒂林也未提到，見《俾斯麥與圭爾夫問題，1866—1890》（海牙，1973年），第200—201頁［Stewart A.Stehlin，Bismarck and the Guelph Problem，1866–1890（The Hague，1973），pp.200–201］。

[18.](#18_6) 見《馬太福音》6：26和《路加福音》12：27。——譯注

[19.](#19_6) 在回憶錄中，俾斯麥提到國內政治與對外戰爭的同一性，他把這種想法歸咎于19世紀70年代自己的對手：“摒棄一切體面和榮耀的東西與對黨派利益（被包裝成祖國的利益）的情感隱隱相關，這種情感認為必須用不同于私人生活的標準來衡量黨派利益，對榮耀和傳統要求的解讀甚至不同于戰爭中面對外敵時的狀況，而且更加寬泛。”《全集》，第15卷，第351頁。

[20.](#20_6) 約翰·馮·米克爾（Johann von Miquel，1828—1901），德國政治家，民族聯盟創始人。——譯注

[21.](#21_6) 他對鐵路國有化的興趣無所不至。比如1881年，他授意馬伊巴赫，在鐵路國有化問題上，應該準備攻擊政府敵人的政治小冊子—就像在私人鐵路上有“進步”報紙出售。他從未放棄宣傳伎倆。《全集》，卷14第2冊，第926—927頁。

[22.](#22_6) 俾斯麥的威脅被信以為真。布萊希羅德的朋友之一紹芬將軍寫信給他：“首相的辭職使我深為震動。讓我們希望還有可能讓這位無可替代者留任。除了他，還有誰能推進德國的發展和維持世界的和平？與這位偉人相比，這些所謂的政治大佬多么渺小。”布萊希羅德表達了同樣的情感。紹芬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4月9日，BA。布萊希羅德收到很多像這樣支持俾斯麥的表態，有些無疑是真誠的，另一些可能只是希望通過布萊希羅德傳遞給那位恩惠和地位的施予者。

[23.](#23_6) 1913年，被廢黜的不倫瑞克公爵恩斯特·奧古斯特二世之子恩斯特·奧古斯特三世與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之女維多利亞·路易絲公主聯姻。恩斯特·奧古斯特二世放棄對漢諾威和不倫瑞克的主張，作為交換，恩斯特·奧古斯特三世繼承了不倫瑞克公國。——譯注

[24.](#24_4) 關于對這位不幸國王的同情描繪，見巴伐利亞駐柏林大使胡戈·萊申費爾德—科菲林伯爵的回憶錄《回憶與銘記》（柏林，1935年），第152—175頁［Graf Hugo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 und Denkwürdigkeiten（Berlin，1935），pp152-175］。萊申費爾德對所有的財政援助守口如瓶，這反映了他本人的審慎，以及幾十年間圍繞該問題普遍的諱莫如深。

[25.](#25_4) 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謀臣和朋友，他的名字成了富有、慷慨的藝術贊助者的代名詞。——譯注

[26.](#26_4) 路德維希二世之母瑪麗公主是威廉一世的堂妹。——譯注

[27.](#27_2)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貪婪而惡毒的猶太富商。——譯注

## 第十章　貪婪與陰謀

唉，沒辦法；這就是當兵的悲哀。

升遷靠推薦和私情，而不是遵照慣例，按資格依次遞補。

——伊阿古（《奧賽羅》，第一幕，第一場）

虛偽是罪惡對美德的致敬。

——拉羅什富科

我總是認為，正直是虛偽的原材料！

——巴爾扎克，《貝姨》（Cousine Bette）

布萊希羅德生活在德意志帝國的高貴世界里，置身于貴族的光輝和權力的威嚴中。他也生活在那個世界的地下部分，社會的統治者很少承認那部分世界的存在，但他們的財富和前途卻在那里被造就和毀滅。布萊希羅德知道，這兩個世界相互連通，許多生活在贊譽陽光下的人為了生活中更陰暗的一面有求于他。

在所有的社會和人類事務中，表象和現實間、流行準則和實際行為間存在距離。這種距離在德意志帝國也許特別大，部分原因在于那里的準則特別嚴格，與存在的物質現實的差異日益擴大。準則是貴族式的，現實則是新富階層的崛起。準則宣揚名譽、勇氣、正直和責任；它崇尚樸素，某種“鐵一般的節儉”或者假裝如此；它譴責市場，譴責對金錢的過度重視，譴責可以用金錢購買一切（甚至榮譽）的觀點 [[1]](#1_52)  。（這當然是一個特別版本的古老歐洲準則，萊昂內爾·特里林曾評價道：“符合這種精神的就是高貴的，達不到或違反它的就是低俗的……我們也許注意到，曾經被認為適合軍隊生活的特征對于高貴自我的形成也是決定性的，它形象鮮明地出現在世人面前，它的目的得到清晰認識和公開承認。” [[2]](#2_52)  ）金錢或性問題上的不負責被認為與準則格格不入。公然違反準則就是“丑聞”，在極端情況下只能通過流放或決斗贖罪；決斗提醒人們，名譽被認為比生命更寶貴。任何丑聞都是等級和準則的潛在污點。

準則一直被暗中違反。在德意志帝國，正直的論調也許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嚴格和嚴厲，對現實的否認也更加普遍。這種正直滋生虛偽，而虛偽帶來虛假和怨恨的基調。既有崇高的請求，也有惡意的私語。就像我們將看到的，還有關于廣泛陰謀和貪婪的懷疑。這種地下精神有多重來源：既有新財富的腐化和誘惑，也有狹隘、專制而又恐懼的統治引發的憤世嫉俗。感傷主義的盛行是被恐懼侵蝕的崇高憧憬的殘余。

我們最關心的是對金錢的看法。和其他地方一樣，在德國，對金錢的聲討無處不在。“物質主義”是罪惡的，受到教會的譴責；它還令人反感，受到道德家的譴責。它是剝削性的，因此威脅到國家統一。金錢還成了相互競爭的階級的戰場。面對新制度下暴發戶的威脅，老地主階級重拾對斂財的偏見—與此同時，經濟現實迫使他們開始與市場打交道。1895年，馬克斯·韋伯談到“普魯士容克貴族在經濟上的垂死掙扎” [[3]](#3_50)  。生活的現實不可能被無視：國家公務員的報酬遵循普魯士的樸素，卻不得不生活在德國的富豪統治下 [1](#1_21)  。暴發戶買下老地主的產業 [[4]](#4_50)  。談及生活在祖先土地上的快樂時，一位虛構的容克貴族在世紀末表示：“誰知道呢，也許到了下一代它已經落入猶太人之手。” [2](#2_21)  面對這樣的威脅，容克貴族學會以孤注一擲的頑強為自己而戰，同時堅持自己仍然是簡單而質樸之美德的唯一捍衛者。反物質主義將永遠擁有強烈的吸引力，不僅對于有產者本身如此，而且將錢從公共話語中去除的愿望可能也是為了麻木無產者和被剝削者的痛苦。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 [3](#3_19)  說：富人和窮人一樣有權睡在橋下—也同樣有責任不談錢。

整個德國社會的基調建立在這種外表的體面和優雅上，建立在德國人所說的“禮貌”（der gute Ton）和“保持禮儀”（Dekorum wahren）上。禮儀要求將真實生活中的許多東西扔到樓梯下 [4](#4_19)  。教育必須被審查，以便去掉生活的殘酷現實。（“我記得我的［父母］要求家庭教師不要在教材里使用任何提及錢或收益的算術例子；事實上，他們親手刪除了這樣的例子。” [[5]](#5_50)  ）談話必須中規中矩和令人興奮，特別是當有女士在場時。金錢總是被視作對情感的冒犯，尤其是對女士和年輕人的情感。（這又是某種歐洲特征的變體，就像狄更斯所說：“一切的關鍵在于，它是否會讓年輕人臉紅？” [[6]](#6_48)  ）低賤的人或資產階級，談論錢和賺錢方法；有文化的人或貴族，談論收成和充盈的谷倉，而不是股票和債券。如果錢的話題不可避免，談到它時也要帶著尷尬的痛苦。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托馬斯·曼把這種矯揉造作稱為“虔誠的貪婪” [5](#5_19)   [[7]](#7_48)  。

德意志帝國的生活經過清洗。金錢和性欲激情的存在，體現在神秘的表述、揚起的眉毛、手勢或雙關語中。公開表達任何形式的欲望都將改變那個社會的本性及其文明觀。在帝國社會中，在藝術和文學中，在上層階級的日常生活中，上演著某種對現實的系統性感傷化。馮塔納曾經抱怨過這種“永遠的美化”和“輕視”（Verniedlichung） [[8]](#8_48)  。德國社會的一個奇怪事實是，這種虛假感傷的最偉大揭露者是猶太人：海涅、馬克思和弗洛伊德 [6](#6_19)  。不過，一邊是那個社會的成就和理想，一邊是對其胃口的否認（哪怕僅僅是口頭否認），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會無視兩者的聯系。

在德意志帝國，沒有誰比布萊希羅德更了解人們的脆弱。人們不斷向他索取幫助、建議和財務救贖。他為這個體制的虛榮和野心提供服務。他方便地滿足精英們的需求，也令他們的價值陷入尷尬。最重要的是，在與他無休止的打交道中，精英們不得不做到誠實：欺騙銀行家就像欺騙化驗員那樣自欺欺人，付錢給兩者都是為了尋找真相。

作為溝通真相和表象的代理人，布萊希羅德的地位獨一無二，不僅在金融界，在一絲不茍和非常謹慎的政界同樣如此。政界也有行為準則：它憎惡陰謀、腐敗、貪贓枉法和鉆營功名。當時的俾斯麥傳說掩蓋了俾斯麥的現實—布萊希羅德對此心知肚明。傳說暗示，統治者是一個仁慈的天才，符合關于正直和美德的未成文法則；而在描繪現實時，當時的德國人和外國人常常提到俾斯麥統治的腐蝕性拜占庭式風格 [[9]](#9_46)  。

布萊希羅德深知帝國的秘密，他參與其中并從中獲利。在一個不那么注重面子的社會，他的大部分工作本可以公開進行；帝國的隱秘作風讓他顯得比實際上更加“多事”和邪惡。在俾斯麥帝國拜占庭式氣氛中，他被視作和被中傷為神秘的幕后操縱者，是寶座和政策背后的邪惡魔鬼。他的如日中天助長了關于其重要地位的傳言。其間他一直受到信賴他的俾斯麥的庇護，并在后者的要求下做了他最不體面的事。

與俾斯麥的關系對布萊希羅德至關重要，其他一切都源于這層關系。但別的帝國官員同樣需要他，就像他也需要他們。通過他們和自己的眼睛，他一定感受到俾斯麥手下人的某些“當兵的悲哀”。

俾斯麥是一位苛刻、喜怒無常和內心憤世嫉俗的主人。他嚴于律己，對他人則更加苛刻。統治已經變成令人沮喪和無比復雜的事；到處是阻撓、對抗和陰謀—至少在他看來如此。19世紀70年代，他的健康非常糟糕，統治者特有的憤怒加劇了他身體的痛苦和折磨。這讓他更加怒火中燒，并影響他的政治風格。抱怨帶來更多的抱怨，形成無休止的循環。只有非常堅強的人才能戰勝這種考驗。一位親密的副手認為他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此人還對同一個對話者透露說，“事實上，他生來喜歡幻想和感傷” [[10]](#10_45)  。那個十年的主基調是痛苦加上自憐，過去的活力和熱情只是偶爾再現。但他足夠堅強地沒有向自己的弱點屈服。他保留自己性格的許多方面。也許他多變的情緒和角色避免他對自己感到厭倦。

他鮮有朋友和地位相當者；世人把他看得高高在上，不僅因為他的天才，也因為他把自己造就成新帝國唯一的權威，僅僅居于君主之下（更多是理論上而非事實上）。1873年羅恩退休時，他在寫給對方的信中反復使用幾乎完全相同的文字：“我的辦公室將變得孤獨，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加如此；老朋友去世或變成敵人，但我再也不會得到新朋友。” [[11]](#11_45)  這是自我實現式的預言。他相信大多數朋友是潛在的對手或敵人，并相應地對待他們，從而加劇自己的孤獨。他的一位贊美者用真正的德國方式表示：“命運賦予他天才的奧林匹斯式孤獨。” [[12]](#12_43)

他的許多容克朋友與他反目。有的在1866年就已經如此，因為他們難以置信地看到，俾斯麥在國內外扮演著革命冒險家的角色。新帝國在自由主義時代的標志是所謂的曼徹斯特自由經濟主義和隨之而來的腐敗，是文化斗爭，是損害容克貴族利益的行政改革，這些又激怒了一大批保守主義者。俾斯麥與猶太人和自由派的合作證實他們的感覺，即他已經背叛自己的階級和原則。另一方面，俾斯麥永遠無法原諒他們的叛國，他確信自己“永遠無法忘記失去政治上的老朋友—保守的老容克貴族” [[13]](#13_39)  。

與宮廷和死敵奧古斯塔皇后的持續斗爭同樣令他苦惱。在與威廉的所有分歧背后，他都懷疑有奧古斯塔的陰謀；眾所周知，她與俾斯麥的政治對手關系密切，但她能做的只是偶爾提醒丈夫注意俾斯麥的詭計。不過，“女人在高層搞陰謀”的強烈想法仍然困擾著他，特別是在19世紀70年代 [[14]](#14_39)  。到了19世紀80年代，即使當他不再那么擔心奧古斯塔近乎叛國的活動時，他仍然對宮廷和皇儲懷有病態的懷疑。19世紀70年代，海因里希·萊恩多夫伯爵是他在宮廷的唯一朋友，在柏林社交界的其他地方，俾斯麥的朋友“用一個手就能數過來” [[15]](#15_37)  。

無論俾斯麥的孤獨是真實還是想象的，他變得更加厭惡與下屬打交道，盡管他時而仍能吸引和打動他們。為了給自憐找理由，一些下屬可能夸大自己遭受的輕蔑。不過，他們處境艱難的證據毋庸置疑。早在1868年，俾斯麥的一位批評者弗朗茨·馮·羅根巴赫（Franz von Roggenbach）就提及“廣泛的崩潰”，原因是“所有現成的秩序都被某個人的陰郁專斷取代……所有的工具漸漸開始失效，被他的濫用和強迫所抑制” [[16]](#16_37)  。五年后，一位贊美者抱怨說：“不幸的是，俾斯麥常常表現出病態的易怒。盡管他不得不經常忍受同僚的懶惰和無能以及宮廷的陰謀，但與他共事同樣足夠困難。” [[17]](#17_31)  多年后，荷爾斯泰因（被認為曾受俾斯麥庇護，后來關系惡化）在日記中寫道：

很遺憾，首長的不信任—他稱之為悲觀主義—與日俱增……懷疑、厭倦和怠慢像酸那樣侵蝕他與其他人的任何關系……由于算計和懷疑，由于對別人的抵觸惱火，由于對他們感到厭倦，他失去對別人的興趣。他與別人的關系可以用情感關系的主導原則來判斷：越新越好。

1885年，荷爾斯泰因感嘆道，俾斯麥不把人“當成朋友，而是僅僅當成工具，就像每道菜后都要更換的刀叉” [[18]](#18_31)  。甚至忠誠的布萊希羅德也曾對霍亨洛厄抱怨說，俾斯麥“完全不考慮別人，像擠檸檬那樣壓榨他們” [[19]](#19_27)  。俾斯麥無疑助長了德國社會的嚴厲氛圍：他出于鄙視不信任別人，他的專制令人難以忍受，這在德國的公共生活中注入某種特殊的毒素。

由于年齡、成功和缺乏有約束力的政治傳統，俾斯麥變得反復無常和蔑視他人。難怪保羅·哈茨菲爾特伯爵（Count Paul Hatzfeldt）曾向布萊希羅德抱怨說，首相總是委任無足輕重的人物擔任重要職位 [[20]](#20_27)  。做他的朋友也許比做他的敵人更難。

俾斯麥的親隨并非一個由忠誠助手組成的快樂小團隊，就像有時被描繪的那樣。他們中既有大量嫉妒和仇恨，也有恐懼和憤怒，不得不將這些隱藏起來讓人更加痛苦。他們還要承擔繁重的工作，因為俾斯麥把如此之多的工作集中到自己手中。在帝國，他甚至沒有名義上的同僚。有時，他一連幾個月不在柏林，作為他助手的工作人員會忙得不可開交，無論他們留在柏林，還是和他一起在伐爾岑、弗里德里希斯魯或某處溫泉療養地 [[21]](#21_27)  。

因此，成為俾斯麥的親隨是種痛苦的特權。在帝國早期的各種風波和丑聞中，還要加上俾斯麥的統治可能不會長久，加上他可能很快被推翻或辭職的危險 [[22]](#22_27)  。相反，在19世紀80年代，看上去俾斯麥的統治將會以俾斯麥王朝的形式持續下去，俾斯麥家族不會終結。這兩種前景都無法帶給下屬們安全感。

即使是俾斯麥的親隨，同時包括外人和他的家人，也于事無補。他最偏愛的助手當然是他親愛的長子：生于1859年的赫伯特。在政治事務上，赫伯特與父親最為親密。小兒子威廉同樣擔任文書。當一位很不起眼的公務員庫諾·馮·蘭曹伯爵娶了俾斯麥的女兒后，他同樣開始為首相效勞。事實上，蘭曹不得不一直住在俾斯麥家，以便身為唯一女兒的妻子能陪伴她的父母。蘭曹的書信（包括與他的朋友布萊希羅德的定期通信）非常重要，因為它們通常由俾斯麥逐字逐句口授 [[23]](#23_27)  。反過來，俾斯麥的家人也必須同他的其他助手合作，包括哈茨菲爾特伯爵和弗里德里希·馮·荷爾斯泰因。這兩人是能干的外交官，因此特別迎合俾斯麥最大的愛好，他們也曾短期擔任過他的私人助手。當科伊德爾不再是內部圈子的成員后，荷爾斯泰因對他的離開和由此對布萊希羅德產生的所謂災難性后果感到幸災樂禍 [[24]](#24_25)  。此外還有過一系列正式助手：洛塔爾·布赫爾、赫爾曼·馮·蒂勒、弗朗茨·馮·羅滕伯格和克里斯托弗·馮·蒂德曼。

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和所有這些人打交道。在俾斯麥的要求下，他們都曾與他有過書信往來。他們都知道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多么親密，有人甚至可能夸大這種密切關系。1884年，荷爾斯泰因在日記中寫道：“除了布萊希羅德，只有赫伯特能施加真正的影響。” [[25]](#25_25)  這種夸張反映了不滿：俾斯麥的許多手下對那位幾乎是他們一員的猶太人嫉恨不已。任何親信都可能受到懷疑，更別提本質上邪惡的猶太人了。

但他們經常需要他。只要俾斯麥仍然接受他的服務和保護他，他們就不能公開侮辱和怠慢他。不過，在這些人內部，他們可以對他大放厥詞，發泄自己強烈的嫉妒。他們害怕他的影響力，懷疑他有卑鄙的陰謀。（比如，羅滕伯格就擔心布萊希羅德可能毀了自己作為俾斯麥秘書長的前程；因此，他既討好又憎惡此人，并告訴荷爾斯泰因：“布萊希羅德是第一流的掘墓人。” [[26]](#26_23)  ）他們在他背后稱其為“骯臟的猶太人”和“猶太豬”，但瞞著彼此在寫給他的信中稱呼其為“尊敬的朋友”。布萊希羅德的通信對象常常請求他把書信保密，甚至隱瞞通信一事本身！這些鬼鬼祟祟的書信表明，他們羞于和這個人的聯系被公開化（遺憾的是，他又不可或缺）。看上去布萊希羅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無視這種虛偽，從而掩蓋人們對他的卑鄙行徑。

隨著時間的流逝，內部圈子的某些成員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逐漸惡化。最引人矚目的（某種意義上也是最坦誠的）是他后來與赫伯特的決裂。緊張關系大多愈演愈烈，特別是與荷爾斯泰因。他懷疑布萊希羅德搞陰謀、以權謀私和非法牟利—荷爾斯泰因本人更有理由被懷疑這些罪名。布萊希羅德經常是投射性憤怒的受害者。在散布關于布萊希羅德的壞話時，荷爾斯泰因將他本人及其圈子的某些不太光彩的行徑和特征投射到布萊希羅德身上。

如果布萊希羅德如此令人討厭，為何人們不無視他？為何他們不得不私下討好他，卻以半公開的方式誹謗他？俾斯麥的庇護只是部分答案。他對俾斯麥的下屬非常有用，因為他們大多入不敷出。德國貴族在政府中擁有特權地位，外交事務幾乎是他們的專屬領地。他們的薪水不高，而且私人財產寥寥，但生活方式已經變得更加國際化和奢侈 [7](#7_19)  。與英國貴族不同，他們既沒有掌握與有錢人聯姻的技巧，也沒有賺錢的本事。貴族的拮據影響到他們作為帝國代表的角色。難怪一位外交官在回憶起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外交生涯時表示，他當時充滿緊張、敵意和反猶主義情感。老貴族看不起富有的新貴族：“他越窮，否定立場就越強硬。他一無所有，只剩下老舊的盾徽見證著殘余的昔日榮光。” [[27]](#27_19)  在社會上出人頭地代價高昂，而且變得日益昂貴 [[28]](#28_13)  。

因此人們需要布萊希羅德，而他有時也會宣揚自己的作用。在新近出版的赫伯特·馮·俾斯麥私人書信集中，第一封信是1872年弗里茨·荷爾斯泰因寫給朋友赫伯特的，這個巧合發人深省。信中痛斥布萊希羅德有所謂的為權勢人物開設虛假賬戶的習慣。荷爾斯泰因解釋說，布萊希羅德向他保證，只要打理得當，存在該行的資本每年會翻番。荷爾斯泰因認為，這番話的意思是：“只要我對他有用，每年他會加入這么多錢。” [[29]](#29_13)  在下一封信中，他擺出高姿態：“我終于決定放棄那個猶太人的錢。” [[30]](#30_9)  無法想象布萊希羅德做出過任何類似荷爾斯泰因所宣稱的承諾。赫伯特顯然知道，布萊希羅德最看重的客戶也得不到這樣的待遇。難道荷爾斯泰因出于某些不良動機，曲解了布萊希羅德的誘惑之詞嗎？他是否想讓俾斯麥生疑—懷疑遭到布萊希羅德的欺騙，或者懷疑此人會用各種不光彩的手段打入自己的圈子呢？又或者也許荷爾斯泰因“希望”相信，的確存在這樣的猶太魔法？

當時大多數手頭拮據的人夸大了布萊希羅德積累財富的能力。經過對奠基時代的曝光，人們普遍認為，俾斯麥通過布萊希羅德的操縱獲得巨額利益，即使一場公開審判也無法完全終結這類指控。19世紀70年代中期，布萊希羅德受到大量通過惡意操縱謀求更高利益、影響和地位的指控。

帝國早年危機和丑聞不斷。陰謀和腐敗的傳言來自和圍繞著最高層。沒有什么像阿尼姆事件那樣震動柏林社會，關于不法和抗命行為的傳言持續多年，經過幾個月的公開調查和審判，事件以一位著名的德國外交官哈里·馮·阿尼姆伯爵（Count Harry von Arnim）徹底被毀滅告終。該事件充滿戲劇性，并對俾斯麥的權威和他與威廉的關系構成威脅；事件的一部分在第四等級的地下世界上演，被收買的報社記者有時充當業余間諜，報紙也會刊登秘密文件。最終，金融違規成了事件的焦點，阿尼姆被懷疑利用外交手段為他的股市投機服務（他被指與法國外交部長德卡茲公爵［Duc Decazes］共謀）。在這場鬧劇的幕后，布萊希羅德扮演了重要但不太光彩的角色，故意煽動對阿尼姆的偏見。

哈里·馮·阿尼姆比俾斯麥小9歲，和后者一樣出身古老的普魯士貴族。1864年到1871年，他曾擔任普魯士駐教廷的代表，這是近代教廷歷史上最戲劇性的時期之一 [[31]](#31_9)  。阿尼姆喜歡居于中心位置，出于同樣的原因，當被任命為德國派往布魯塞爾的兩名首席談判代表之一，負責與被打敗的法國人達成最終和約時，他非常高興。在各項任務中，阿尼姆都試圖特立獨行，這對同事造成傷害，并惹惱上級。根據各種描述，他風度翩翩，與皇帝和奧古斯塔的圈子關系也非常好。能力和野心讓他成為德國派駐戰敗后法國的首任大使。俾斯麥不情愿地做了這個任命，擔心阿尼姆“輕浮而放肆”，特別是為了特立獨行而抗命 [[32]](#32_9)  。俾斯麥的擔心被證明不無道理，而他因此采取的行動也激怒了阿尼姆。在政治陰謀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這兩個地位不同的人都認為錯誤和不懷好意的是對方，從而走上對抗的道路。旁觀者令懷疑更加嚴重，主角們則讓所有可能的出路變得困難重重。

首先，俾斯麥懷疑阿尼姆拖延與梯也爾關于最終賠款支付的談判，以便滿足他本人的金融投機 [[33]](#33_9)  。由于俾斯麥記得阿尼姆是個奢侈和貪婪的年輕人，他更愿意相信此人有罪 [[34]](#34_9)  。作為懲罰，他從阿尼姆手中收回了談判權。

兩人還存在嚴重的分歧。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支持梯也爾，認為他能夠確保國內足夠穩定，從而讓法國兌現和約中的承諾。他們還希望，一位共和主義者組建的政府將讓法國在外交上被孤立。阿尼姆則認為，梯也爾和共和國注定會失敗。他在寫給威廉的報告中公然宣稱，恢復君主制能最好地為德國的利益和歐洲的社會和平服務。當形勢證明他錯了后，他仍然固執己見。“他的恐懼是夸大的，他的預言是錯誤的，他暴露了自己的偏見。但他拒不改正，不承認過失和錯誤。” [[35]](#35_9)

更糟糕的是，阿尼姆總以為自己是國王的使者，不滿俾斯麥對外交政策的控制。另一方面，俾斯麥認定阿尼姆的特立獨行是抗命和不忠的表現，認為他的個人權威和帝國的組織秩序受到威脅。他把阿尼姆的立場看成個人挑釁，并確保它真的變成挑釁。到了1872年秋冬時節，首相與大使已經劍拔弩張。

這時，布萊希羅德出現了，他本人對阿尼姆早已心生恨意。布萊希羅德極其迫切地想在法國賠款支付的所有方面扮演主導角色。阿尼姆阻撓布萊希羅德的企圖，1872年7月，他把漢澤曼召到巴黎，特意為最后50億法郎賠款的支付與法國政府交涉。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抱怨說：“由于我足夠清楚漢澤曼前往巴黎將遭遇什么，我現在更愿意不關心巴黎的整個金融問題。” [8](#8_19)  不到一周后，布萊希羅德又給俾斯麥寫了一封私信—這次是從巴黎。他希望親臨其地做出判斷：“哈貝爾、亨克爾和漢澤曼這些H.馮·阿尼姆的朋友已經把地翻了個遍。從金融角度來看，此行無甚收獲。”不過，他至少與梯也爾多次見面，從而對法國事務有自己的印象。布萊希羅德報告說，梯也爾被指責對德國卑躬屈膝，需要向他提供支持，因為任何接替者只會更糟。畢竟，撇開政治，梯也爾與布萊希羅德頗為親密。他用合宜的漂亮話結束這封信—并略帶尷尬地提及“他們”在凡爾賽的日子—足夠清楚地流露對阿尼姆觀點和政策的不滿 [[36]](#36_9)  。從此，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分別而又相互呼應地與阿尼姆發生了爭執。

兩人都認為要嚴密監視阿尼姆。俾斯麥的親隨從對阿尼姆不滿的秘書荷爾斯泰因那里收到坦誠的報告。1872年，俾斯麥派魯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擔任駐巴黎大使館的媒體專員，負責應對盛行的反梯也爾情緒，據說也是為了監視阿尼姆。43歲的林道（祖上原是猶太人）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作家，游歷過世界各地，早年還在日本橫濱擔任過英文報紙編輯。他對法國政治和法國媒體的理解讓俾斯麥印象深刻。1879年，他被俾斯麥任命為外交部新聞局局長 [[37]](#37_9)  。

布萊希羅德做的也不少：1872年冬天，他讓沃爾夫通訊社雇傭巴黎的一位德籍猶太人記者埃米爾·蘭茨貝格（Emil Landsberg）。1873年10月，布萊希羅德第一次對俾斯麥稱贊蘭茨貝格，“我的記者多年來一直向我提供被證明客觀可靠的消息，他的報告以在巴黎的多年經驗為基礎，對德國的赤誠令它們出類拔萃和令人稱道” [[38]](#38_9)  。

蘭茨貝格希望，這些報告能讓布萊希羅德允許他參與某些利潤豐厚的冒險。他經常提醒布萊希羅德不要忘記自己，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遭遇損失，自己愿意承擔。“我不相信布萊希羅德銀行會讓莽撞的操作毀了我。”首筆投資表現糟糕，蘭茨貝格不得不提醒布萊希羅德，不要再給他開“空頭支票”。但如果布萊希羅德想讓他參加又一次冒險，“我不會限制您久經考驗的好意”。顯然，布萊希羅德的確為蘭茨貝格投資了虛假基金。多年來，他一直請求布萊希羅德讓他參與金融操作，就像我們手中來自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說：把他引薦給“對您恩寵有加的股市女神（Börsengöttin）” [[39]](#39_9)  。

蘭茨貝格給布萊希羅德發來詳細的報告，但只涉及“我可以確保真實性”的東西。他知道如何保護線人和自己，并反復提醒布萊希羅德，巴黎沒有人知道（或應該知道）他們的私人通信 [[40]](#40_9)  。他提交了關于法國形勢的系列評論，譴責應該復辟君主制的流行觀點。他提醒布萊希羅德不要相信身為奧爾良派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復辟的預測。事實上，我們現在知道，他們同樣認定保守共和國將是法國分歧最少的政體 [[41]](#41_9)  。

蘭茨貝格與阿尼姆關系特別密切，但也從不忽視與阿尼姆的下屬交流，包括荷爾斯泰因 [[42]](#42_9)  。他逐漸成為某種雙重間諜，阿尼姆后來有理由為與這樣一個人的親密關系后悔。

最初，蘭茨貝格只是向布萊希羅德通報阿尼姆的活動。1873年10月，蘭茨貝格警告布萊希羅德，大使將他看成“死敵之一”。這是第一封布萊希羅德秘密交給俾斯麥的信，信中還包含對法國事務的全面盤點。此后，蘭茨貝格的信—無論是否有他的署名—常常交給首相 [[43]](#43_9)  。布萊希羅德無疑配得上“死敵”的稱號，甚至在聽說阿尼姆與他的猶太銀行家競爭對手關系親密前，他就有理由憎惡阿尼姆。事實上，阿尼姆無法想象布萊希羅德的敵意有多深，或者會造成多么嚴重的后果。

在一封未具日期的信中（幾乎肯定寫于1873—1874年冬），蘭茨貝格證實了俾斯麥最大的懷疑：他報告說，阿尼姆仍然認為俾斯麥將在幾個月內隱退，曼陀菲爾或阿尼姆將成為接替者。顯然阿尼姆希望加速俾斯麥的倒臺—就像俾斯麥在回憶錄中所說，“你滾蛋，給我讓位”（ôte-toi，que je m’y mette） [[44]](#44_8)  。（幾個月前，英國駐柏林大使曾指出，阿尼姆“不惜使用任何陰謀來推進他取代俾斯麥成為德國首相的計劃” [[45]](#45_8)  。）就在俾斯麥最終說服威廉必須讓阿尼姆走人前，蘭茨貝格報告說，法國政府對阿尼姆的孤立和無能感到疑惑 [[46]](#46_8)  。

1874年2月末，威廉同意召回阿尼姆，把他調往不那么重要的君士坦丁堡任職。阿尼姆拒不接受降職，他與俾斯麥的戰斗打響了：“虛弱的大衛對陣強大的歌利亞，最終敗下陣來。” [[47]](#47_8)

現在，蘭茨貝格定期發來關于阿尼姆的報告，他對“這個人本身”有所同情 [[48]](#48_8)  。阿尼姆很不愿意前往君士坦丁堡，盡管他的金融界伙伴們—埃爾朗格、巴姆貝格和希爾施男爵（Baron Hirsch）—不斷敦促他赴任（想必出于自私）。這些人堅稱，在他們的幫助下，他在巴黎的政治損失可以在土耳其得到金錢補償。顯然，希爾施與土耳其鐵路修建關系密切，希望在當地得到阿尼姆的幫助。但阿尼姆關心的是施普雷河（Spree）而非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他計劃最多只在君士坦丁堡短暫停留。更糟糕的是，阿尼姆毫不諱言可以發動民意反對俾斯麥，蘭茨貝格警告柏林：“他似乎對自己擁有的某些文件非常驕傲，特別是來自他在羅馬時的。他在其中為首相勾畫了反對天主教徒的全盤戰略。” [[49]](#49_8)

4月2日，維也納的《新聞報》（Die Presse）刊發阿尼姆在梵蒂岡大會期間的一些信件，旨在對比阿尼姆的遠見和首相的近視。阿尼姆否認對這些“外交泄密”負責。但俾斯麥的回應如人所料地迅速：他要求國王下令讓阿尼姆立即離職。現在，他需要關于阿尼姆盡可能多的信息，蘭茨貝格變得不可或缺。“外交泄密”震驚歐洲前一個月，布萊希羅德交給俾斯麥一份蘭茨貝格的報告，并引薦此人：“作者是我們通訊社新近委任的一位記者。如果閣下需要特別的信息，我樂意做出安排。”他還請求俾斯麥銷毀報告—有一次，俾斯麥似乎照做了 [[50]](#50_8)  。俾斯麥接受提議。獲悉此事后，蘭茨貝格對新地位感到既榮幸又不安。他不再署名，并表示：“如您所見，現在我這樣寫信，以便您可以隨意處置它們。”但在機密附件中，他請求布萊希羅德保持謹慎，不要習慣于把他的信交給別人，也不要透露它們的來源。“我對俾斯麥極為欽佩，但完全無意被他注意或為他效命……間接承擔警察職責的想法令人厭惡至極……您是我的俾斯麥，我只愿為您效勞。如果同時我也能服務祖國就更好了，但請勿透露我的名字。” [[51]](#51_8)  不久之后，他又請求布萊希羅德不要把他的信交給俾斯麥：“當A和B這樣的兩位大人物，我們這樣的人最好保持得體的距離。”蘭茨貝格警告說，如果兩人和解后俾斯麥把他的信拿給阿尼姆看怎么辦呢 [[52]](#52_8)  ？布萊希羅德沒有那么謹慎，但他知道俾斯麥永遠不會和解。

蘭茨貝格后來的信暗示，他直覺上明白俾斯麥想知道什么，或者他是在回答布萊希羅德提出的具體問題。他提醒說，阿尼姆正變得日益絕望，準備現身柏林，在法庭上做“最后一搏”。目標是打倒俾斯麥 [[53]](#53_7)  。

當阿尼姆不必要地升級關于之前《新聞報》泄密的爭議后，蘭茨貝格確信這位伯爵“極不可靠、傲慢自負和生性狡詐”。阿尼姆現在失敗了，但在漢澤曼或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的幫助下，他可能重啟之前的計劃，在柏林創辦一份重要報紙。不過，鑒于該報現在唯一的口號只可能是“打倒俾斯麥”，這些人對于是否要創辦它猶豫不決。蘭茨貝格還堅稱，阿尼姆與法國外長德卡茲公爵的關系已經逼近所允許的極限。蘭茨貝格此前從未如此充滿惡意地談論阿尼姆。

那封信被工整地轉抄，但沒有署名，這是現存最早的布萊希羅德與赫伯特·馮·俾斯麥的通信 [[54]](#54_7)  。蘭茨貝格馬上被要求提供阿尼姆與德卡茲所謂的非法關系的細節。他的回答暗示共同的金錢利益：“兩人的見面次數比公務需要的多得多；在土耳其人（薩迪克帕夏［Sadick-Pascha］） [9](#9_17)  和雷賽布 [10](#10_17)  事件中，德卡茲幾乎每小時都向他的朋友發送簡報，后者再與埃爾朗格和赫爾施等人商談—他的職責允許這樣做嗎？”一切似乎都與市場投機有關，“但無法證明” [[55]](#55_7)  。這再一次證實俾斯麥早前對阿尼姆搞金融陰謀的懷疑，他已經將此事告知威廉。幾個月后，俾斯麥毫不懷疑地對一位朋友重復這個故事，并表示：“阿尼姆和德卡茲一起通過希爾施銀行操縱市場。” [[56]](#56_7)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繼續追問關于“外交泄密”作者身份的明確信息。蘭茨貝格閃爍其詞，表示被巴黎人懷疑的有多位記者，他本人也在其中，“……但如果我被公開指認，我不會否認” [[57]](#57_7)  。再次追問下，他還是拒絕透露任何更多他可能知道的東西。“這樣做有利于你我的關系：只有知道在恰當時機如何保持沉默的人才會得到有用信息。您稍加思索就會認同我，不再提及這個話題。” [[58]](#58_7)

1874年夏天，蘭茨貝格在巴德霍姆堡與布萊希羅德見面，俾斯麥馬上獲悉他們談話的大意。阿尼姆曾告訴蘭茨貝格，他正嘗試最后一次對德國政治發起突襲，準備向威廉提交結束文化斗爭的計劃。對俾斯麥而言，這無疑是阿尼姆仍然構成威脅和不知疲倦地策劃陰謀的驚人證據。布萊希羅德還告訴俾斯麥，蘭茨貝格與阿尼姆多么親密：

……的確是L博士把阿尼姆伯爵的文件交給了《新聞報》，但寬恕L博士并且不要用任何方式傷害他對大家都有利，否則他與阿尼姆伯爵的關系就會立刻被切斷。L博士相信，他在不久的將來將從伯爵那里獲得更多消息，盡管他非常羞于把信息交給閣下，但我相信我能從他那里得到信息。

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承諾，當兩人從各自的溫泉療養地回到柏林后，他會告知更多能作為阿尼姆罪證的魯莽行徑 [[59]](#59_6)  。布萊希羅德的密探提供了不利于阿尼姆的寶貴證據。

與此同時，俾斯麥在這場斗爭中找到另一個幫兇—阿尼姆本人。6月初，荷爾斯泰因發現巴黎大使館有86份文件失蹤。阿尼姆承認留下其中一些文件，并對俾斯麥發出又一次挑釁—但也向其提供毀掉對手的機會 [[60]](#60_6)  。

1874年10月4日，阿尼姆被捕，罪名與這些失蹤文件有關 [[61]](#61_6)  。被捕當天，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保證，蘭茨貝格會提供更多消息，但“再次懇請閣下注意，我交給您的所有關于此事的消息都僅供您過目，而且無論如何不要透露作者的名字；因為我已經信誓旦旦地向蘭茨貝格做了如是承諾” [[62]](#62_6)  。

蘭茨貝格的匿名愿望沒能實現。最后導致事情曝光的壞事者并非布萊希羅德，而是阿尼姆，因為在搜查他的住宅時發現他和蘭茨貝格聯系的記錄和書信。幾天前，布萊希羅德送給蘭茨貝格一些錢；阿尼姆被捕當天，由于“形勢完全改變”，蘭茨貝格馬上趕往柏林，“非常樂意”效勞 [[63]](#63_6)  。檢方希望證明阿尼姆在否認自己是“外交泄密”的始作俑者時撒了謊，從而讓他名譽掃地。對此，蘭茨貝格將是主要證人。布萊希羅德一度看上去也不得不成為政府的證人，這讓俾斯麥很不高興；最終，檢方沒有征調他。12月11日，蘭茨貝格作證說，是他把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交給《新聞報》，但堅決拒絕透露是誰把那些文件給了他。他援引法律條款表示，如果透露秘密將危害某人的營生時，證人不必提供證據 [[64]](#64_6)  。

法庭接受辯方的許多意見，僅僅認定阿尼姆的一項罪名成立，判處他三個月監禁。判決輕得令人意外，但雙方都計劃上訴 [[65]](#65_6)  。

蘭茨貝格作證后和判決宣布前，俾斯麥秘密召見了蘭茨貝格 [[66]](#66_5)  。他首先斥責后者在審判時保持沉默，但隨后變得友善。與首相的見面讓蘭茨貝格驕傲不已，回到巴黎后，他告訴霍亨洛厄，自己竭盡所能捍衛職業榮譽（Standesehre），但暗示后悔沒有給阿尼姆更多打擊 [[67]](#67_5)  。

阿尼姆鬧劇繼續上演，每一場的主線都是阿尼姆不斷的自毀和俾斯麥不減的仇恨。（一位有見識的觀察者表示：“搞陰謀總是危險的，而對俾斯麥搞陰謀注定沒有好下場。” [[68]](#68_5)  ）最初，布萊希羅德被認為應該在下一場審判中作證，盡管俾斯麥仍不希望看到這幕 [[69]](#69_5)  。蘭茨貝格也意外地拒絕效勞。與此同時，阿尼姆準備做最后辯護。蘭茨貝格提醒柏林，阿尼姆正在將更多秘密文件從巴黎轉移到瑞士的安全場所 [[70]](#70_5)  。阿尼姆自證清白的《徒然》（Pro Nihilo）出版幾周前，蘭茨貝格就警告此人可能用這種手段對付俾斯麥，盡管他并不確定，因為“他終止與伯爵的聯系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71]](#71_5)  。收到預警的柏林立即抄沒了匿名出版的《徒然》，書中對俾斯麥和皇帝進行辱罵。該書出版后，甚至威廉也無法再庇護這位前王國公仆。新的叛國罪審判開始。阿尼姆被判處五年監禁，但他選擇終生流亡國外。布萊希羅德知道阿尼姆過著艱難而羞辱的生活—因為施瓦巴赫在一處瑞士溫泉療養地遇見他，令人動容地描繪他的孤獨 [[72]](#72_5)  。

這是一起骯臟的事件，布萊希羅德在其中的角色并不光彩。他總是熱心為俾斯麥效勞，并對阿尼姆懷有個人仇恨，通過安排蘭茨貝格同時充當俾斯麥的間諜和阿尼姆信任的代理人，他促成阿尼姆的倒臺。

蘭茨貝格因為自己的卑鄙服務獲得豐厚的獎賞：除了金錢，布萊希羅德還把他介紹給阿尼姆在巴黎的接替者霍亨洛厄親王，他曾擔心此人“狂熱地憎惡猶太人” [[73]](#73_5)  。霍亨洛厄抵達巴黎十天后，他們第一次見面，蘭茨貝格對新大使印象深刻，認為其是“正直的典范”，而霍亨洛厄則覺得他是“一個聰明又相當正派的記者” [[74]](#74_5)  。兩人建立友好的關系，霍亨洛厄多次讓他充當匿名代理人，為他在媒體安插故事。蘭茨貝格繼續向布萊希羅德報告巴黎的各種消息 [[75]](#75_5)  。

阿尼姆事件令所有人蒙羞，并埋下積怨。阿尼姆的貴族朋友們記得他們所認為的俾斯麥的惡毒，布萊希羅德記得對手們可能采取的極端手段。一些人的生活永遠蒙上陰影。比如，荷爾斯泰因被懷疑按照俾斯麥的命令或者為討好首相而監視自己的上司。我們現在知道這并非事實，而且是多余的。但傳言沒有平息，并損害了荷爾斯泰因的社會地位 [[76]](#76_5)  。該事件讓荷爾斯泰因更加憤世嫉俗，他和俾斯麥的親隨大多對布萊希羅德介入這樁本來是自己人之間的尷尬糾紛感到不滿。但他們可能不知道布萊希羅德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此事，或者俾斯麥是他的同謀。

荷爾斯泰因不喜歡布萊希羅德，早在1872年就滿懷惡意地向赫伯特·馮·俾斯麥表達過這點。在阿尼姆事件中，他的厭惡更深了。反諷的是，蘭茨貝格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一封“極其私密”的信中贊揚了荷爾斯泰因，當時后者剛剛被調入柏林的外交部：“您認識H.荷爾斯泰因男爵，但也許對您來說是新聞—我該怎么說呢？—他對股市很感興趣。這不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但我還是很確定。”盡管布萊希羅德擁有其他許多更好的聯系人，但他仍然會覺得荷爾斯泰因特別有用，“不過在和他打交道時始終要記住，此人生來是個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這種性格特點已經讓他在這里損失很多錢”。蘭茨貝格還表示，荷爾斯泰因不知道他們倆在通信，因此布萊希羅德永遠不應透露他們的關系。蘭茨貝格是對的：盡管標榜自己對“猶太人的錢”感到恐懼，荷爾斯泰因仍然經常向布萊希羅德咨詢財務問題。他對布萊希羅德與日俱增的仇恨在柏林廣為人知。他在公開場合鄙夷地談論后者，但私下里，誰都不知道他給后者寫去友好和親密的書信，這些信此前一直埋藏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作為鮮有朋友的單身漢，荷爾斯泰因專心政治。與布萊希羅德一樣，他總是希望了解真相；與布萊希羅德不同，他懷有自己的政治野心。1884年前后，荷爾斯泰因與俾斯麥變得疏遠；他擔心蘭曹對首相的影響，甚至開始懷疑他的老朋友赫伯特 [[77]](#77_5)  。因此，他對布萊希羅德的恨意變得更深—這成了他與赫伯特的最后紐帶。

荷爾斯泰因的惡意部分來自害怕，害怕布萊希羅德可能危及他的地位。正因為這個，兩人的關系破裂很少公開。事實上，在不完整的布萊希羅德檔案中，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些熱情而異想天開的信（包括1880年1月的六封信）與1890年后致“可敬的朋友”的親密書信（俾斯麥的被罷免讓布萊希羅德失去政治力量）之間存在空白 [11](#11_17)  。不過，即使在這段時間，荷爾斯泰因仍會求見布萊希羅德，他們仍會像在更加風平浪靜的時期那樣進行荷爾斯泰因所稱的“愉快交談” [[78]](#78_5)  。說得好聽點，他是個不由自主的嚼舌者和兩面派；說得難聽點，他是個虛偽的人，同時詆毀和討好布萊希羅德，他越是在公開場合詆毀，在私底下就越討好，反之亦然。這樣的雙管齊下很可能導致自己不適，并加深他的憤世嫉俗。

阿尼姆事件是19世紀70年代最著名的丑聞。其他丑聞還有很多，大部分暗示金錢與政治的非法關系。新帝國彌漫著濃重的腐敗味道，就連最高層的人，就連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也受到指控。許多此類指控被證明是無中生有的誹謗，旨在讓政治對手名譽掃地。對俾斯麥的指控通常是錯的，他比大多數人更謹慎。

對“奠基活動”（Gründertum）最早的攻擊來自布萊希羅德的自由派朋友和同為猶太人的愛德華·拉斯克，主要目標是俾斯麥三十年的老朋友和內閣高官赫爾曼·瓦格納。1873年2月，在一場被稱為“炸彈”的普魯士議會演講中，拉斯克揭露公務員（特別是伊岑普利茨的商務部）與鐵路建造商的各式勾結，并特別點名參與興建波莫瑞灣中央鐵路（Pommersche Zentralbahn）的瓦格納。他還表示，瓦格納案件屬于臭名昭著的“施特魯斯貝格制度”（System Strousberg） [12](#12_15)  ，得到商務部的大力推動 [[79]](#79_5)  。

拉斯克發表演講前幾個小時，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除了少數例外，議會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反對拉斯克的提議；他本黨的成員也會投票反對他，因此他要求成立質詢委員會的動議將會失敗” [[80]](#80_5)  。事實上，拉斯克的演講大受歡迎，盡管并未對他的動議進行表決。該指控令俾斯麥尷尬不已，因為正是他不顧威廉的反對任命瓦格納，并將其作為社會政策的專家和與普魯士保守黨的紐帶 [[81]](#81_5)  。（拉斯克聲稱完全無意攻擊俾斯麥，但俾斯麥告訴他：“你的子彈離擊中我就差一根頭發絲。” [[82]](#82_5)  ）拉斯克的演講發表前一年，俾斯麥曾致信瓦格納：“在我的親隨中，我只對你坦誠相見。當我不能再這樣做時，我將被怒火憋死。” [[83]](#83_5)  盡管俾斯麥清楚有的人的罪行更為嚴重，他還是無法保護瓦格納。1873年10月，瓦格納被迫辭職。足夠反諷的是，他是曼徹斯特自由經濟的激烈批評者。經濟災難緊跟政治潰敗而來：在一起鐵路破產引發的民事訴訟中，他被判決賠償180萬馬克。俾斯麥保持與他的聯系，最初還委派他從事社會政策領域的特殊任務。1876年秋，瓦格納的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俾斯麥表達了幫助的意愿，不過遭到（或自稱遭到）無法動搖的反對 [[84]](#84_5)  。瓦格納放風說，他可以透露讓首相尷尬的信息。但俾斯麥一直堅稱自己和瓦格納的關系無可指摘，抱怨后者忘恩負義 [[85]](#85_5)  。

布萊希羅德檔案揭示他們最后的痛苦接觸。1876年11月，約翰娜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走投無路的瓦格納夫人剛剛來訪，因為如果她的丈夫不立刻支付5000馬克，她將被沒收財產，但她丈夫不可能拿出這筆錢。情況似乎很糟，我丈夫讓我請你馬上把這筆錢交給瓦格納樞密顧問，暫時算在我們的賬上” [[86]](#86_5)  。在隨后的三周里，瓦格納多次登門向布萊希羅德問計，并以他與俾斯麥在萊茵貝克（Reinbeck）的莊園毗鄰的土地為抵押，請求預支2.4萬到2.7萬馬克 [[87]](#87_5)  。1876—1877年冬，布萊希羅德與瓦格納達成協議，保護其在破產后免遭最壞的結果 [[88]](#88_5)  。三年后，布萊希羅德得到“感謝”：瓦格納通知他，自己代表他人對與布萊希羅德相關的利益提出90萬馬克的主張，在提起訴訟前，他希望給布萊希羅德一個友好解決的機會。他成了怨毒的忘恩負義之徒，充滿無禮的自憐，“作為帝國最顯赫的人物，王公貴族享有不同于我這個小市民官員的標準，在我身上被認定有罪的事絲毫無損于這些紳士的地位，這種矛盾令人震驚” [13](#13_15)  。無論瓦格納多么怨氣沖天，赫伯特·俾斯麥在1881年給他起的有趣綽號“徹頭徹尾的豬玀”（ein ausgemachter Schweinehund）也許更多表明赫伯特對他缺乏了解和同情，而非瓦格納的真實寫照 [[89]](#89_5)  。

瓦格納所言不虛，布萊希羅德對這種雙重標準心知肚明。帝國顯貴對物質好處具有不同尋常的胃口。投機和快速致富的欲望四處蔓延；比起其他許多人，瓦格納不算過分。

風度翩翩的保羅·馮·哈茨菲爾特—威爾登堡伯爵（Count Paul von Hatzfeldt-Wildenburg）來自一個古老的家族，是這種逐利熱情中的一位謹慎人物。盡管在個人生活中有過嚴重的金錢和婚姻過失，盡管間歇性的好逸惡勞為他贏得“懶蟲保羅”（Der faule Paul）的諢號，哈茨菲爾特還是在德國外交界獲得顯赫地位，最終在圣詹姆斯宮（Court of St.James’s） [14](#14_15)  結束職業生涯。他是少數做到這點的天主教徒之一 [[90]](#90_5)  。俾斯麥曾用典型的俾斯麥式表達稱其為“我馬廄中最好的馬” [[91]](#91_5)  。認同斷斷續續地到來，至少哈茨菲爾特這樣認為。在普法戰爭期間寫給妻子的信中，他憤憤不平地抱怨說，在授勛大會上，他和凡爾賽的其他文官完全被遺忘：“一般來說，我對勛章不屑一顧……”不過，在他日記集的扉頁上可以看到，后來的哈茨菲爾特滿身戎裝，胸前掛滿勛章和綬帶 [[92]](#92_5)  。他是個復雜的人，比大多數人更好地展現了在俾斯麥手下擔任公務員的困難。

或許只是因為我們擁有的幾部分哈茨菲爾特書信讓我們對此人和他的職業生涯特別清楚。他恰好是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客戶和債務人，并不斷向其提出要求，關于他們不尋常關系的大量記錄留存下來。

保羅是索菲·哈茨菲爾特伯爵夫人之子，她與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15](#15_15)  的友誼廣為人知，并吸收了后者的某些社會主義理念。后來，她逐漸拋棄這些理念，而且顯然從未用家庭財富實踐它們。她的兒子從未對它們傾心，盡管他可能繼承母親對不合常規的友誼的喜好。作為同時代的荷爾斯泰因的終生朋友，他也是俾斯麥早期的門生。19世紀60年代，他在外交界快速崛起，顯示了俾斯麥對他的信心 [[93]](#93_5)  。他顯然是個精明的觀察者和具有相當政治智慧的人。在那個盛產出色語言學家的時代，他的法語出類拔萃；他和美國人海倫妮·莫爾頓（Helene Moulton）的婚姻也很不尋常。

普法戰爭前，哈茨菲爾特曾是布萊希羅德的客戶。戰爭期間，他加入俾斯麥的親隨，在凡爾賽享用過許多布萊希羅德的雪茄 [[94]](#94_5)  。1871年2月，兩人在司令部再次見面，并時常交談。布萊希羅德在凡爾賽期間，哈茨菲爾特對妻子開玩笑，提及可以讓他賺錢的許多不誠實方式，就像法國所做的那樣：“我們不像他們這里那般腐敗。同時我必須指出，我想用誠實的方式賺些錢，正在絞盡腦汁想辦法。我們所需做的只是想出好點子或發現好投資。現在我們應該能那樣做……” [[95]](#95_4)  布萊希羅德后來將常常聽到這種耳熟能詳的論調，它一度呼應了整個柏林的流行欲望。

幾個月后，布萊希羅德讓哈茨菲爾特加入勞拉舍的董事會，這是他創立的最著名的公司。董事會初始成員享有可觀的好處：以低發行價申購股票，還有大筆董事酬勞。早期的分紅也很高。在最初的六個月，通過向公眾賣出股票，財團賺得349724塔勒，哈茨菲爾特投資的5000塔勒獲利1165塔勒。即使在那個充滿刺激的時代，不到六個月獲利超過20%也令人滿意；甚至連最初的5000塔勒都可能是布萊希羅德預付給哈茨菲爾特的 [[96]](#96_4)  。

快速獲利讓哈茨菲爾特更加貪婪：1871年11月，他在威斯巴登附近買了一處昂貴的莊園—索莫貝格宮（Sommerberger Hof）；隨后，他又請布萊希羅德幫忙在柏林尋找一處合適的住宅，租金不超過2500塔勒：“如果我的收入能相應提高，我將更愿意接受更高的租金。也許很快又能遇上勞拉舍這樣的好買賣，而您則會一如既往地在董事會中為我安排個位置。” [[97]](#97_4)  布萊希羅德當即同意。1872年1月，他在自己新創立的德意志帝國和大陸鐵路建設公司（Deutsche Reichs-und Continental-Eisenbahn-Baugesellschaft）為哈茨菲爾特安排了職位，同時加入的還有卡多夫、法蘭克福的卡爾·邁耶爾·馮·羅斯柴爾德、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等顯要人物 [[98]](#98_3)  。卡多夫和哈茨菲爾特為這些企業帶來貴族派頭。

但哈茨菲爾特的胃口超出布萊希羅德的能力。1872年2月初，他要求布萊希羅德為其購買股票，投機股價突然下跌后的可能上漲。不過，他的真正目的不止于此：

是否有可能讓我獲得鐵路特許權？你手頭很可能有許多這樣的項目，能夠向我推薦其中的某一個。我還要請教你推行鐵路計劃的方式和方法。我沒有理由不能像馮·卡多夫［原文作Kardof］先生一樣在這種計劃中取得成功，人們總能從中預見可觀的好處。 [[99]](#99_3)

一年后，在拉斯克發表演講的當天，另一名貴族投機者弗蘭肯貝格伯爵（Count Frankenberg）感嘆道：“今天，所有沒能取得鐵路特許權的人一定歡呼雀躍。” [[100]](#100_3)  不過，布萊希羅德為他實現了2萬塔勒的收益，大多來自申購新發行的股票，幾乎立刻獲利26%。在表達感謝的同時，哈茨菲爾特又提出新的要求，但布萊希羅德并不能全部滿足它們。

不過，哈茨菲爾特的書信和建議還是蜂擁而至：計劃一個接著一個，越來越多地卷入房地產投機。留存下來的那部分書信記錄了富有想象力和不斷上升的貪婪，這是那個時代的典型癥狀。哈茨菲爾特獲得回報。1871—1873年間，他的總收益可能接近10萬塔勒—對一位囊中羞澀，每年勉強只能承擔2500塔勒租金的貴族和公務員來說，這個成績并不糟。

布萊希羅德的仁慈令哈茨菲爾特大為受益。那么哈茨菲爾特為他做了什么呢？正如布萊希羅德所說，此人為他在1872年舉辦的最初幾場宴會“帶來榮耀”，甚至還邀請其他貴族前往。哈茨菲爾特還為布萊希羅德在巴黎干了些小差事，比如為其挑選一名廚師，并帶來其可能有意購買的一串價值1.2萬法郎的珍珠項鏈。他也會發來巴黎的消息，1872年，他覺得那里“道德淪喪……人口很多，但都稱不上真正的人（viel Volk aber keine Menschen）”。他還暗中試圖推進布萊希羅德在巴黎的利益，不過并不成功。但他首先是布萊希羅德發起活動的裝飾品。猶太財團歡迎基督徒伯爵加入其中 [[101]](#101_3)  。

但布萊希羅德的仁慈是有限度的，當有形的風險開始超過無形的好處時，他可能就會直覺地感受到限度。布萊希羅德的警鐘早早響起；1873年，哈茨菲爾特的賬戶顯示了虧空129409塔勒，施瓦巴赫在例行通信中附言說：“如果當下較為有利的貨幣狀況能讓您有機會減少賬戶虧空，我將表示歡迎。” [[102]](#102_3)  哈茨菲爾特顯然養成了輕易透支賬戶的習慣。當哈茨菲爾特的透支額達到129000塔勒時（可能是其當時年薪的10倍左右），布萊希羅德開始擔心，他通常僅僅允許透支4%。事實上，哈茨菲爾特未經協商或融資貸款程序就借了一大筆錢。

布萊希羅德承認，哈茨菲爾特曾交給他價值5萬塔勒的抵押品，但布萊希羅德的“原則”禁止他處理它們 [[103]](#103_3)  。他反復敦促哈茨菲爾特減少虧空。1875年3月，他終于帶著明顯的怒氣寫道，哈茨菲爾特承諾一旦拿到某筆抵押貸款就還錢，據他所知，貸款現已到手 [[104]](#104_3)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要求他辭去勞拉舍的董事職務，可能是因為自從1874年被任命為駐西班牙大使后，身處他鄉的哈茨菲爾特成了過于顯眼的裝飾。揭露腐敗成為流行，布萊希羅德不得不應對輿論批評 [[105]](#105_3)  。哈茨菲爾特辭去董事職務，但憤憤不平地表示，形勢常常讓人無法按時行使職責，當布萊希羅德沒能按照承諾讓哈茨菲爾特參與某些大買賣時，他一定有所同感。“無論如何請勿忘記，只要能夠，我從不錯過為你提供服務和幫助的機會。” [[106]](#106_3)  債務得到減免，但一年后布萊希羅德還是不得不請求對方償還已經升至近5萬馬克的債務 [[107]](#107_3)  。在中間人的幫助下，布萊希羅德最終協商達成還款日程。但不到一年后，哈茨菲爾特再次違約 [[108]](#108_3)  。

身在馬德里的哈茨菲爾特感到被冷落，認為柏林的官場并不賞識他，渴望看到認可他的舉動。他受到野心的鼓舞，但不時發作的懶病阻礙了他。他的才智配得上高級職位，但除了才智，俾斯麥要求大使具備其他品質。哈茨菲爾特覺得處處都是陰謀的味道，他自己也耍起陰謀，但他希望不必這樣做。他感到沮喪，因為“我接觸過的一切都對我不利”。因此，他更加感激布萊希羅德對他的物質困難施以援手。在俾斯麥長期病休期間，他與柏林的關系變得更糟：“我已經到了不再發表觀點的地步，除非我被明確要求這樣做。” [[109]](#109_3)  哈茨菲爾特變得焦躁不安。他希望得到“提拔和認可”，但兩者似乎都遙不可及。“當我在四年間克服諸多險阻取得這些成就，當我憑借一己之力讓這個國家與我們友好共處”，官方的冷漠澆滅繼續行動的欲望。“［俾斯麥］親王總是忽略他最好和最忠實的支持者，將最顯要的職位交給他無法依靠的無名之輩，這實在讓人無法理解。”他對駐維也納大使職位不抱幻想，認為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也希望渺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對我們來說，取得某些成就并沒有用，職位最終會落入皇太子的某個門下之手，或者某位對外交事務一無所知的親王會被優先考慮。”如果仍然一無所成，他準備徹底離開外交界，只要他承擔得起。布萊希羅德是否愿意相助？能否為他向俾斯麥說情 [[110]](#110_3)  ？這時，布萊希羅德已經成為他的擁護者和財務上的庇護人。

這種私下抱怨持續整個1878年的春天，他還不斷請求布萊希羅德介入。此刻打擾俾斯麥很不是時候，首相仍然因為嚴重的帶狀皰疹而遭受痛苦和失眠。布萊希羅德在信中對身在伐爾岑的赫伯特表示：

我從報紙上看到，君士坦丁堡的羅伊斯親王的職位將很快空缺，我斗膽請示令尊，是否可以讓哈茨菲爾特伯爵填補這個空缺。H伯爵似乎很喜歡該職位，而且根據我聽說的他在西班牙的情況—無論如何，您和令尊都能對此做出恰當的評判，尤其是令尊—他在馬德里為自己贏得很好的地位，在所有圈子里都受到歡迎。 [[111]](#111_3)

二十四小時后，赫伯特終于表示收到信，在致謝的同時，他聲稱父親仍然過于虛弱，沒有精力過問這樣的事 [[112]](#112_3)  。布萊希羅德盡了全力；他的介入證明，他認為推薦高級外交職位的候選人完全無可厚非，而俾斯麥父子同樣認為這種請求司空見慣。幾周過去，哈茨菲爾特在來信中表達感激，但也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布萊希羅德真的成了他在柏林的首要庇護人嗎？無論如何，可憐的伯爵不得不又努力一年才得以前往東地中海。與西班牙這潭死水相比，那里的政局更為動蕩，對布萊希羅德分布廣泛的利益也重要得多。

哈茨菲爾特的職業生涯受到關于他婚姻和財務麻煩的廣泛傳言影響，甚至見諸報端 [[113]](#113_3)  。1879年初，聽到這些傳言后，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寫了五頁長信，談及哈茨菲爾特的復雜問題：“經商那么多年來，我從未在給人解決問題時遇到這么多困難。”甚至哈茨菲爾特的母親也來催債；不過，根據向他的所有債主提出的還款安排，哈茨菲爾特可以在4萬馬克的年薪中保留2.5萬到2.9萬，足以讓他在君士坦丁堡過上體面的生活，“并毫無問題地履行大使的社交義務”。俾斯麥在頁邊批注“幾乎不需要”—這個評語可謂奇怪，因為它來自一位抱怨過財務負擔的前大使。不過，當時的俾斯麥對土耳其宮廷和那里的社交生活嗤之以鼻 [[114]](#114_3)  。

但哈茨菲爾特始終沒有擺脫關注或麻煩。他剛剛動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就有傳言說他可能接替突然去世的外交國務秘書恩斯特·馮·彪羅。當時，布萊希羅德正推薦另一位朋友霍亨洛厄親王出任此職，并對俾斯麥表達了這種想法，但首相再次預見到財務困難。大使的薪俸比國務秘書高得多，同樣債務纏身的霍亨洛厄不得不婉拒成命，這讓布萊希羅德很失望 [[115]](#115_3)  。霍亨洛厄拒絕后，布萊希羅德向赫伯特提交了一份關于哈茨菲爾特情況的長篇報告：“我為保羅伯爵預支了許多錢，好讓這個兼具經驗和才能的人繼續為政府效力……”他的償債前景已經有所改善，只要廣受爭議的海倫妮伯爵夫人不再揮霍無度。“如果她能更低調地和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更好地認清她丈夫的財務狀況，那么保羅的生活將舒坦得多。” [[116]](#116_3)  這種親密關系可能讓赫伯特反感，但他在兩天后的回信中完全沒有流露出此情。“如果能讓哈茨菲爾特伯爵這樣才干出眾的官員避免被迫辭職，你稱得上為我們國家辦了件好事。” [[117]](#117_3)

因為空缺的是外交部的最高職位（盡管薪酬不高），流言和陰謀開始甚囂塵上。俾斯麥的親隨們私下傳言稱，布萊希羅德已決定推薦拉多維茨出任該職（此人在羅馬尼亞事件中曾為他服務），因此不遺余力地加劇哈茨菲爾特的財務困境。他的確曾對霍亨洛厄等人表示，他覺得哈茨菲爾特無法勝任該職。永遠心存懷疑的荷爾斯泰因也在寫給赫伯特的信中談到拉多維茨：“……如果受Bl［原文如此］庇護的人執掌外交部，我會感到非常別扭。你比我更能判斷Bl的影響力范圍。” [[118]](#118_3)  幾乎與此同時，他致信布萊希羅德稱：“在H一事上，我認為在公共利益上—這是唯一關系到局外人的方面—希望我們的朋友能擺脫困境。他的家人作何安排完全是私事。” [[119]](#119_3)

1880年8月，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報告說，保羅有錢的哥哥哈茨菲爾特親王愿意做出某些讓步（俾斯麥曾請他幫助保羅），但需要布萊希羅德預支45萬馬克，利率為4%，分80年還清。如果俾斯麥仍希望哈茨菲爾特出任國務秘書，布萊希羅德愿意滿足該條件。哈茨菲爾特親王還提到一處價值45萬馬克的房產，即所謂的柏林蒂希（Tichy）莊園。保羅用來購買它的抵押貸款即將到期。哈茨菲爾特家族希望國家能買下這處房產，或者由布萊希羅德接手貸款。布萊希羅德向阿爾伯特·馬伊巴赫求助，后者回答說，國家在三年內什么都干不了。能否找到可以幫助哈茨菲爾特的公共基金呢？

赫伯特在信上批注諷刺的話，但第二天親自寫了七頁長的回信。大意是他將致信馬伊巴赫，敦促其立即買下蒂希房產。他所能做的就是這些，但他鼓勵布萊希羅德堅持下去。普魯士政府拒絕按照布萊希羅德的開價購買房產，即購置價加上利息 [[120]](#120_3)  。

1880年夏天，俾斯麥的親隨越來越擔心保羅將無力償還債務；赫伯特估計債務總額為85萬馬克。有人宣稱布萊希羅德已經對哈茨菲爾特置之不理，另一些人則抱怨布萊希羅德—哈茨菲爾特軸心已經過于親密 [[121]](#121_3)  。布萊希羅德不斷敦促對保羅的任命。在俾斯麥王妃的建議下，哈茨菲爾特把女兒海倫妮留在布萊希羅德家，自己前往弗里德里希斯魯。此舉導致流言四起。一家預測哈茨菲爾特將很快獲得任命的報紙在文末寫道：“大使的長女再次住進馮·布萊希羅德樞密顧問家。”更有報紙報道稱，這名18歲的姑娘將嫁給布萊希羅德的一個兒子 [[122]](#122_3)  ！但哈茨菲爾特糾紛不會以如此喜劇收場。兩家聯姻將讓哈茨菲爾特擺脫債務，讓布萊希羅德擺脫猶太人身份，雙方家長也許樂于如此，但主角們不這樣想。

到了1882年，俾斯麥不得不做出永久任命；布萊希羅德向哈茨菲爾特保證，“朋友”（布萊希羅德總是這樣指稱俾斯麥）仍然很看重他。1882年7月，在保羅的婚姻被解除后（“按照羅馬天主教會的規定盡可能做到這點” [16](#16_15)  ），他獲得國務秘書的臨時任命 [[123]](#123_3)  。10月，他被正式任命為國務秘書，盡管他的優柔寡斷和所謂的懶惰徹底激怒赫伯特等人 [[124]](#124_3)  。

布萊希羅德的“合伙人”（莫里茨·布施對新獲任命者的指稱）終于成了外交部的掌門人 [[125]](#125_3)  。兩人經常見面，這種親密關系回報了布萊希羅德的長期努力。荷爾斯泰因同樣感到高興，盡管他像“奶媽般”對哈茨菲爾特一舉一動的關心惹惱了赫伯特 [[126]](#126_3)  。哈茨菲爾特的任期注定不長。為了給赫伯特騰出房間—俾斯麥現在希望和兒子一起主持外交部—他不得不搬到樓上。1885年，哈茨菲爾特被派往圣詹姆斯宮（有人認為此舉過于倉促），令他大受歡迎的不僅是翩翩風度，也因為“在他厭惡運動的同胞中，幾乎只有他熱衷草地網球” [[127]](#127_3)  。這是德國外交官的最佳工作。與此同時，哈茨菲爾特請求布萊希羅德向他在倫敦的前任明斯特伯爵保證，將其擠出倫敦并非他的意圖 [[128]](#128_3)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患難之交哈茨菲爾特被死敵赫伯特·馮·俾斯麥取代令人遺憾。

布萊希羅德還不得不繼續關照哈茨菲爾特混亂的財務狀況，盡管現在有人分擔壓力。保羅過去的投機熱偶爾仍會輕微復發。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告誡他：“我覺得閣下不應該再參與任何新計劃。” [[129]](#129_3)  保羅的前妻和兒子同樣常常向布萊希羅德提出要求，后者仍然打理著哈茨菲爾特的投資，但有時拒絕提供新的信貸。如果所有客戶都像哈茨菲爾特那樣費時和難伺候，布萊希羅德永遠發不了財。

但他也獲得豐厚回報，從留存下來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到這點。他們的親密關系體現在許多方面。赫伯特對蘭曹抱怨過這種關系，因為布萊希羅德泄露給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故事只可能來源于哈茨菲爾特：“從伐爾岑返回后，布萊希羅德在柏林只待了幾個小時，如果H在此期間把消息告訴他，那么顯然兩人一定十分親密，盡管他們對彼此造成傷害。” [[130]](#130_2)   [17](#17_9)  赴倫敦履新前夜，哈茨菲爾特與布萊希羅德共進晚餐 [[131]](#131_2)  。

前往倫敦后，他們繼續時斷時續但異乎尋常坦誠的通信。哈茨菲爾特顯然需要傾訴對象，一吐被真實或想象的不公正對待，被敵人對他的陰謀、被柏林的詭詐和粗魯所傷害的感情。兩人還交換關于各自活動領域和整個政界的消息和觀點。哈茨菲爾特的信涉及私人領域，提及他混亂而多災多難的婚姻和金錢生活。1889年，他在信中偷偷告訴布萊希羅德，他的女兒可能與烏耶斯特公爵之子訂婚，然后是他自己復婚。但赫伯特·俾斯麥提醒父親，再婚將讓保羅背上巨額的新債務，徹底毀了他。事實上，保羅的確因為妻子的債務求助布萊希羅德。俾斯麥家族顯然反對這兩門婚事，只有他們沒向訂婚者表示祝賀。哈茨菲爾特被召到弗里德里希斯魯，他不得不請求俾斯麥同意自己可能的復婚，并對財務狀況重新做了保證。俾斯麥表示首肯，并同意請威廉二世批準此事 [[132]](#132_2)  。

有時，布萊希羅德要求自己的幫助立即獲得有形的回報。這種時候，他會變得極其執著。比如，1888年4月，漢澤曼和貼現公司突然威脅到布萊希羅德在埃及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布萊希羅德動員一切關系對付這些入侵者。他向哈茨菲爾特派出特使并發出急信（埃及事務詳見第十五章）：“我急切地請求閣下同意為我的銀行的利益做一切可能的事。”哈茨菲爾特能做的事情之一是告訴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你們不太看重漢澤曼和他與外交部的關系，但我完全可以打包票說，我與首長有私人友誼”。向德國大使提出這種要求很奇怪，但哈茨菲爾特本人也將得利：布萊希羅德已經把一部分新發行的墨西哥債券歸入其名下，如果埃及事務結果令人滿意，他顯然也會那樣做 [[133]](#133_2)  。后來果然如此。

布萊希羅德與哈茨菲爾特的關系比他與俾斯麥親隨中其他成員的關系更加親密和長久。對他而言，這也是昂貴而復雜的關系。它在本質上象征禮尚往來，那是他與公眾人物打交道所具有的全部私人性特點。

布萊希羅德的野心無疑也延伸到皇帝。宮廷畢竟是社會的頂點，盡管因為對俾斯麥的敬畏而顯得軟弱，國王仍然對政府決策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在艱難時刻，布萊希羅德代表家人和猶太同族向皇帝請命。在平時，他不動聲色地花錢討好威廉及其助手們。

布萊希羅德無法獲得皇家銀行家的榮耀，那個職位已經被同為猶太人的邁耶爾—科恩男爵（Baron Meyer-Cohn）把持。他只能滿足于不那么重要的服務；他慷慨捐助各種愛國慈善團體，每年圣誕節還送給威廉最好的魚子醬和活鱘魚。在特殊的日子—比如威廉第二次遭遇暗殺企圖—布萊希羅德奉上幾桌來自古特戈茨的鮮花，皇帝感激地接受“［布萊希羅德］考慮周到的又一證明” [[134]](#134_2)  。

不過，普魯士的簡樸限制了布萊希羅德的慷慨：1878年冬天，他多次送魚子醬給威廉，但在致謝的同時，佩彭謝伯爵要求他不必送來更多，因為這種美味專供皇帝享用，所以供應充足 [[135]](#135_2)  。反過來，威廉正式到古特戈茨拜訪布萊希羅德，并多次接見他（通常在溫泉療養地這樣的非正式場合）。被召見到皇宮的人鳳毛麟角，奧古斯塔皇后的正式邀請標志著布萊希羅德社交生涯的高峰。

布萊希羅德還與威廉的親隨建立密切的關系—他與威廉的朗讀官路易·施耐德關系特別親密，但最重要的是與威廉的副官長海因里希·萊恩多夫伯爵的關系，此人“幾十年來一直是威廉的頭號親信”，為保持威廉與俾斯麥的密切關系付出了比任何人更多的努力 [[136]](#136_2)  。威廉二世回憶說：“祖父的副官們都對萊恩多夫伯爵極為尊敬，他們也愛戴他，因為鑒于他對君主的默默奉獻，鑒于他的沉著和高貴舉止，他是他們全體的楷模。” [[137]](#137_2)

在外貌和性格上，海因里希·萊恩多夫伯爵是杰出的普魯士軍官的典范……他被視作柏林宮廷中最帥的軍官……他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先后擔任副官和副官長，通過老德意志式的忠誠與國王和皇帝相聯系，這種忠誠完全不包含諂媚和奉承，對他而言是自然地完成家族傳統和真正尊敬所要求的責任。他絕不是野心家。古老的貴族血統和每天在皇帝身邊效命滿足了他的抱負。他別無他求。 [18](#18_9)   [[138]](#138_2)

這是最敏銳的觀察者之一凱斯勒伯爵（Count Kessler）對他的回憶。

但布萊希羅德看到另外一面。與哈茨菲爾特和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一樣，萊恩多夫也非常關心賺錢。布萊希羅德擔任他的銀行家和顧問長達二十年，在他的各類土地和證券投機中扮演核心角色。萊恩多夫參與了一些精明的房地產運作，將讓他從柏林城市鐵路的修建中獲利，他請求布萊希羅德從中相助。1878年11月，他要求布萊希羅德征求馬伊巴赫的意見，并為他的利益尋求可能的幫助。還有一次，他詢問關于可能的鐵路國有化的秘密信息。布萊希羅德還被要求爭取柏林警察總監圭多·馮·馬達伊（Guido von Madai）的幫助。1885年，萊恩多夫請求布萊希羅德說服負責收入稅的官員，因為他們錯誤地把他歸入第28類而非第26類 [[139]](#139_2)  。

為此，萊恩多夫和布萊希羅德一直見面，如果某一方不在柏林，他們就頻繁通信。生意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但不是全部。萊恩多夫還提供關于宮廷、關于皇帝的健康和計劃、關于其政治觀點的私密消息。布萊希羅德則提供金融和政治消息。萊恩多夫經常代表布萊希羅德出面，無論是向皇帝遞交請愿書還是安排訪問。最重要的是，萊恩多夫給予堅實的友誼并在私下證明它，這在布萊希羅德有影響力的貴族客戶中非常少見。1877年，他對兩人通信中斷表示遺憾，在信中詢問布萊希羅德是否安康，“因為我對您有好感，希望你一切順利，聽到您的好消息”。當布萊希羅德為一項利潤豐厚的計劃提供特別重要的幫助時，萊恩多夫寫道：“您知道我無法抱怨自己的命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一切都能有好結果，那么我的財務狀況必須改善。您愿意考慮和參與此事，您的老朋友萊恩多夫對此表示真誠感激。”當布萊希羅德的妻子在1881年去世后，萊恩多夫親自來到他家，希望伸出“真正感懷至深的手” [[140]](#140_2)  。很少有人以如此溫情的方式回報布萊希羅德堅定不移的幫助 [19](#19_9)  。

萊恩多夫的主公同樣需要布萊希羅德的暗中幫助。1884年，82歲高齡的威廉忙著關照一位女性朋友。在親筆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便條中（這在當時非常罕見），皇帝告訴他，德·卡斯基先生（Mr.de Karsky）—“我和他的妻子是老相識”—對一項鐵路計劃感興趣，該計劃將幫助他走出因為房地產投機失敗而陷入的嚴重窘境。卡斯基曾請求威廉與布萊希羅德交涉：“考慮到我對卡斯基家族的關心，考慮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前對該家族的禮遇，我推薦你支持該鐵路計劃，并告知你將如何推行它。回信上請注明由我親啟。”署名是“威廉，皇帝和國王” [[141]](#141_2)  。

和柏林社交界的大部分成員一樣，布萊希羅德也一定知道威廉總是喜歡漂亮女人。威廉年輕時熱情地追求過艾麗莎·拉齊威爾公主（Princess Elisa Radziwill）六年，直到宮廷認定她不符合要求。他按照協議而非愛情娶了奧古斯塔，和她過了六十年相對無愛的生活。人們知道，年輕女子能驅散平日里帝王生活的陰郁—20世紀的人也許更關心她們是如何做到的，這個時代喜歡強調性，而威廉時代的人知道，愛情可以有多種令人滿意的形式 [[142]](#142_2)  。

布萊希羅德查驗了這個途經俄屬波蘭的洛茲（Lodz），連接佩特羅科夫（Petrokov）和庫特諾（Kutno）的鐵路計劃，并與威廉做了討論，后者向他施加不少壓力。無處不在的荷爾斯泰因風聞這次秘密接觸并提醒赫伯特，后者回答說：“無論陛下給布萊希羅德寫了什么，我從不認為有這樣的關系存在。” [[143]](#143_2)  1884年秋，在斯凱爾涅維采（Skiernievice）舉行的三帝會議上 [20](#20_9)  ，威廉特別關照卡斯基，并鼓勵亞歷山大表現出類似的關心 [[144]](#144_2)  。與此同時，卡斯基夫人給布萊希羅德寫來口氣尖銳的信：“我第一次向您求助時，你在最后假裝對我友好—這真是生活給我的一次可悲而殘忍的教訓。”她還表示，布萊希羅德至今什么都沒有為她做，威廉也對此感到吃驚 [[145]](#145_2)  。

卡斯基家族很快不再滿足于原先的鐵路計劃；他們夢想在莫斯科修建新的電車軌道，并在克列梅涅茨（Kremenetz）開發新的煤礦。煤礦至少需要6萬馬克，但“如果宮廷［威廉］的支持和您的好意足夠，借給我們所有的必要資本，比如說18萬馬克，那么我們肯定能大賺一筆” [[146]](#146_1)  。當布萊希羅德仍然猶豫不決時，她反復用略帶毛病的法語發出請求，口吻讓人想起當時的許多小說：“您有勇氣拒絕我嗎？—這筆貸款將讓我們和我們可憐的兒子們生活無憂—相信我……如果沒有孩子，我永遠不會向任何人乞求任何東西—但我是母親……我可憐的丈夫病了……啊！如果您知道求人多么痛苦，知道我多么不幸就好了……”這還不算最糟糕的：在來自蒙特勒（Montreux）的下一封信中，她的丈夫已經瀕臨死亡，她幾乎還沒成年的兒子瘋狂地娶了“一名又丑又窮的32歲女仆”；她本人也幾乎死去，多虧朋友（威廉）和醫生救了她 [[147]](#147_1)  。1866年8月，威廉發出最后的請求：“如果你能幫忙，我肯定你會的，因為顯然這家人的情況確實很糟，但我不知道這樣的幫助是否能得到任何保障。” [[148]](#148_1)  此事終于告一段落，沒有跡象顯示出布萊希羅德聽從了皇帝。卡斯基家族一定會發現，即使皇帝的庇護也無法挽回嚴重的輕率行為。俾斯麥見過許多貧窮但人脈廣泛的貴族上演這樣的鬧劇，盡管他們沒有如此神秘地控制著一位如此強大的恩主。

盡管卷入柏林的陰謀網，但布萊希羅德逃脫了所有致命的陷阱。無論俾斯麥的門徒多么憎惡他的影響，他們還是向現實低頭，承認布萊希羅德的庇護者是德國最有權勢的人。只有一個人敢于公開和布萊希羅德反目，那就是首相的兒子。

與俾斯麥關系最密切的，要數他的兒子赫伯特；因此，對布萊希羅德來說，俾斯麥的親隨中沒有人比赫伯特更重要。經過多年友好甚至親密的接觸，兩人關系破裂，赫伯特成了布萊希羅德的死敵，惡毒地辱罵他（只有他能這么做）。關系的破裂源于導致父子短暫反目的一次個人危機，此前一直不為人知。

赫伯特英俊而聰明，年輕時是個相當活躍和幽默的同伴。他是父親最大的驕傲和親密的合作者，最終成了被選定的繼承人。赫伯特最初立志從軍，后來轉而進入外交領域，選擇在父親手下度過成功而服從的歲月。兒子無疑在兩種情感間左右為難：一邊是欽佩父親的天才（只有赫伯特了解俾斯麥心底的想法和算盤），一邊是厭惡永遠生活在天才的陰影下。赫伯特與父母關系的主基調是披著掛念外衣的依賴。他對他們不可或缺，通過滿足他們的情感和實際需要，他確定自己的目標和使命感。但這種自我安排的角色帶來沉重的心理負擔，很可能限制他的男子氣概。若非如此，怎樣解釋他在19世紀80年代寫給弟弟和姐夫的信中仍然流露出子女對父母的恐懼呢？他曾對蘭曹透露，自己計劃離開在德累斯頓的職所，外出旅行一天，“請千萬不要在那里［伐爾岑］提及此事。因為爸爸可能覺得這是瀆職” [21](#21_9)  。

19世紀70年代，布萊希羅德與赫伯特的關系反映了與他父親的親密。赫伯特給布萊希羅德寫了幾百封信，大多代表俾斯麥。兩人逐漸也建立直接關系。我們看到，當21歲的赫伯特在對法作戰中受傷時，布萊希羅德表現得多么關切。布萊希羅德當時送來的禮物預示后來對整個俾斯麥家的孝敬：魚子醬、雉雞、松雞和鵝肝醬給父親，荷蘭美味給母親，雪茄和28年陳的雪莉酒給父子—禮品源源不斷地到來，赫伯特通常會表示感謝。他常常對布萊希羅德保證，家人在享有這些禮品時“對慷慨的送禮人念念不忘” [[149]](#149_1)  ！不過，他與布萊希羅德的通信大多是傳遞他父親的政治或私人消息。

很快，兩人的聯系不再僅僅是公事往來。布萊希羅德對赫伯特的微薄財產關懷備至。他征詢赫伯特的建議和看法，用許多巧妙的方式恭維他，把這個年輕許多的后輩當做同齡人對待。反過來，赫伯特對布萊希羅德青眼有加，經常用“最尊敬的馮·布萊希羅德先生”這種稱呼特別恭維他。1878年的議會選舉中，赫伯特欣然接受布萊希羅德的幫助。19世紀70年代，赫伯特常常與布萊希羅德家一起進餐或者光顧他們的宴會；當他不得不爽約時，他會送來詳細的致歉信。

在布萊希羅德的背后，赫伯特無疑取笑過他；所有人都這樣 [22](#22_9)  。他可能憎惡布萊希羅德和他父親的親密，他的反猶主義情感如此強烈，以至于荷爾斯泰因可以在他面前譴責布萊希羅德的詭計和“該死的猶太人的錢”，完全不擔心會觸怒他。不過，赫伯特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在19世紀70年代末變得特別親密。由于首相長期病痛不斷，赫伯特承擔了更多的責任。

與此同時，赫伯特即將經歷人生最大的危機；經歷這場危機后，他性情大變而且深受打擊，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不復存在。危機的起因是愛情—俾斯麥對這種激情曾經心知肚明，年屆七旬的他現在擔心這種無法控制的力量將顛覆兒子的忠誠。多年來，作為德國條件最好的單身漢之一，赫伯特一直愛著美麗的伊麗莎白·馮·哈茨菲爾特（Elizabeth von Hatzfeldt，與保羅是遠親），后者與卡羅拉特親王（Prince Carolath）的婚姻并不幸福。1881年春，伊麗莎白終于和卡羅拉特離婚，堅信赫伯特會娶她。報紙預測他們即將攜手。伊麗莎白與赫伯特無疑深愛著對方。

但這對戀人沒有考慮到俾斯麥，后者將不遺余力地破壞兒子的意圖。首相“哽咽著”一遍遍用各種想象得到的災難威脅兒子，包括剝奪繼承權和自殺。當赫伯特想要前往威尼斯探視病倒的伊麗莎白時，俾斯麥表示他將同往，赫伯特知道“因為與整個帝國，與他［俾斯麥］所有的承諾和他的余生相比，他更在乎我，更急于阻止這場婚姻”。如果有哪位俾斯麥能和伊麗莎白交談，那將是首相本人 [[150]](#150_1)  。

俾斯麥對最寵愛的兒子使用過去對死敵使用的無情威嚇。該策略再次奏效，但付出的代價甚至連這位父親都沒有想到。赫伯特在孝道和摯愛間左右為難，如果娶了一位離過婚的女子，他將面臨羞辱和被剝奪遺產，變得一文不名。他無助地掙扎著，直到伊麗莎白意識到他永遠不會娶自己，于是厭惡地取消了兩人間的所有接觸 [23](#23_9)  。赫伯特陷入后悔和懊喪，也許偶爾也感到解脫，因為令人痛苦的彷徨終于結束。

為什么俾斯麥要讓兒子罹受這樣的恐懼？人們通常認為，他對兒子娶一位離過婚的女人感到不安，更讓他惱火的是，伊麗莎白與他最痛恨的某些敵人還有親屬關系。她的姐妹們分別嫁給瓦爾特·馮·洛埃男爵和亞歷山大·馮·施萊因尼茨伯爵（Count Alexander von Schleinitz），兩人都是反俾斯麥的“亂黨”領袖。他們還和一直被俾斯麥視作最危險敵人的奧古斯塔皇后關系密切。他警告赫伯特，他的“恐懼感讓他無法允許自己的名字通過婚姻與所有叫哈茨菲爾特、卡羅拉特和洛埃之類的人聯系起來” [[151]](#151_1)  。

但這些似乎都無法解釋俾斯麥的憤怒。俾斯麥的確憎惡這種聯系，但作為機智過人的外交官，難道他不能設法將未來的姻親從自己和赫伯特的眼前趕走嗎？我懷疑，這幕鬧劇的驅動力是父親無限的嫉妒，擔心這個美麗而老于世故的女人可能削弱兒子對他的完全依賴。俾斯麥不會僅僅因為她那些倒霉的親屬而如此暴怒，真正的威脅是赫伯特的獨立。也許另一些情感和回憶也在潛意識中發揮作用：他本人也迷戀活潑的已婚女子，但還是忠于百依百順和了無趣味的約翰娜。突然躍入都市品位的奢華世界，他的兒子會幸福嗎？事實上，無論俾斯麥有什么樣的嫉妒和恐懼，他都沒有考慮其他問題，比如強硬拒絕赫伯特可能付出的代價。這件事不僅反映出俾斯麥無情的自我主義，也體現了他的某些弱點。

此事無疑讓赫伯特遭受重創。在痛苦彷徨的那幾周里，他覺得就像被五馬分尸。他不敢對不幸的始作俑者抱怨；事實上，他為讓父親如此大發雷霆而自責。與此同時，他自責誤導了王妃—或者說欺騙了她，就像許多人所斷言的。他最深的自責無疑是辜負了自己，沒有抓住能確立自己人生和幸福的機會，沒有成為男子漢。為了給自己的犧牲辯護，他不得不進一步美化父親，由此產生的心理負擔一定極其沉重。分手幾周后，他致信奧伊倫堡，表示他通過埋頭工作尋求解脫，但這讓他更加厭惡“人渣”：“當父親身心俱疲和因為公務精疲力竭時，他會說‘我厭倦了趕豬’，他說得完全對。”無論小俾斯麥在危機前有多少憤世嫉俗的苗頭，這種情感在危機中被放大許多倍，并在他的心靈上留下烙印，他再也不能擺脫他所說的“對人類的無盡鄙視，對被迫共事的官員的惡心” [[152]](#152_1)  。這種新的憤世嫉俗的直接受害者是布萊希羅德—赫伯特現在似乎把所有的仇恨和沮喪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憤怒并非沒有理由，盡管他在攻擊布萊希羅德時從未認清仇恨的真正原因。俾斯麥曾派布萊希羅德向王妃提出某種警告—即便是如此卑鄙的勾當，布萊希羅德仍然恭順地為首相效命。我們對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只知道蛛絲馬跡：4月13日，在離婚被公布前，布萊希羅德交給俾斯麥一份來自他“心腹”的信，要求閱后返還，并表示他聽候俾斯麥的“隨時調遣。也許還有別的辦法實現想要的結果，但對此我只能口頭向閣下報告” [[153]](#153_1)  。俾斯麥顯然授權采取進一步行動，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我們找到一份日期為4月23日的電報副本，抄寫在他的專用信箋上。電報顯然來自布萊希羅德派往威尼斯的秘密代理人萊德曼（Ledermann），報告說卡羅拉特王妃沒打開看就把信退還給他，因為“她不希望第三方介入，畢竟俾斯麥親王可以直接寫信給她”。代理人想知道他是否應該再次嘗試，將發信人的名字改成俾斯麥。1881年4月23日正是離婚令頒布的那天。我們還有另一封布萊希羅德寫給俾斯麥的署名信，日期為第二天，大意是除非首相有不同指示，否則L先生將離開（威尼斯）。布萊希羅德檔案中還有一份未標日期的備忘錄，同樣寫在他的專用信箋上，包含由他在布雷斯勞的銀行家朋友收集的關于卡羅拉特親王的零星信息。卡羅拉特親王同意返還王妃嫁妝中剩余的11.8萬馬克，并支付每年2.4萬馬克的贍養費。備忘錄中還提到卡羅拉特親王的一些心腹，他們也許可以說服親王不要讓4月23日的離婚令生效 [[154]](#154_1)  。

留存下來的零星材料暗示，布萊希羅德不僅試圖收集關于卡羅拉特夫婦的活動和財務信息，而且向兩人（肯定包括卡羅拉特王妃）傳達了俾斯麥的愿望，讓他們不要離婚或者撤銷離婚決定。首相無情地將布萊希羅德拉入這個陰謀，而他愚蠢地接受了俾斯麥的命令，就像往常那么爽快。布萊希羅德將為自己的不謹慎和俾斯麥狡詐的陰謀付出代價。

1881年7月，赫伯特給布萊希羅德銀行寫了一封不太客氣的信。一同寄來的還有布萊希羅德發給他的對賬單，顯示出虧欠3309馬克，來自先前他在那不勒斯時獲得的一筆信貸。赫伯特怒氣沖沖地回復稱，他在3月底已經要求銀行清算收支，他認為這應該被理解為關閉賬戶，那不勒斯的信貸應該從他父親的賬戶收取：“我要求現在就執行，并焚毀我寄來信的賬單，因為從今年3月底開始，我在你們銀行就沒有了賬戶。”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有一封他寫給赫伯特的從未發出的署名信，時間為這封傲慢書信到來之前 [[155]](#155_1)  。赫伯特一反常態地要求焚毀布萊希羅德的信和賬單，這清楚地象征最終的決裂。兩人從此再無直接溝通。

赫伯特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反目的原因，歷史學家至今也沒搞明白原因。也許赫伯特擔心這樣做會牽涉父親。于是，他把永不平息的仇恨發泄到布萊希羅德身上。布萊希羅德清楚真正的原因，但顯然只向國務秘書波蒂謝透露過實情，后者在未發表的遺稿中留有一份“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關系”的備忘錄。備忘錄中提到赫伯特的敵意，并表示布萊希羅德對此給出的原因是：俾斯麥伯爵“憎惡布萊希羅德破壞了他與卡羅拉特王妃的婚姻” [[156]](#156_1)  。當時有少數人知道，布萊希羅德了解此事，可能還參與其中。1881年6月，卡多夫在寫給他的信中表示：“我認為我們在政治事務上仍然受到赫伯特和威尼斯的影響，至少首相再次生病主要歸咎于此。” [[157]](#157_1)

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忍受赫伯特的滿腔怒火，后者粗魯而野蠻的反猶主義更是火上澆油。現在，他向所有親隨發泄對“惡心的布萊希羅德”的怨毒，“那家伙變得越來越無恥。吊死他” [[158]](#158_1)  。赫伯特對樂于接受他觀點的荷爾斯泰因表示：“我把那個骯臟的猶太人看作惡魔……那個惡臭粗魯的布萊希羅德。” [[159]](#159_1)  他甚至對與布萊希羅德關系親密的蘭曹說：“布萊希是豬玀。” [[160]](#160_1)  赫伯特的仇恨沒有隨著時間而消減；親隨們不得不做出復雜的安排，好讓他不要在布萊希羅德被他父親召見時在場 [[161]](#161_1)  。關于赫伯特對布萊希羅德故意做出粗魯舉動的故事開始流傳：比如當失明的布萊希羅德在相府等待時，他大膽地放鞭炮嚇唬前者。顯然，沒有人懷疑這是一個受傷之人試圖通過傷害另一個人獲得慰藉。

斷言赫伯特對布萊希羅德仇恨完全歸咎于他的婚姻受挫并不正確。這次挫折只是加劇了早就懷有的鄙視，點燃了之前得到控制的反猶主義 [24](#24_7)  。但曾經可以容忍的東西現在變得無法忍受。赫伯特憎惡布萊希羅德對父親的影響，嫉妒他們的親密關系。布萊希羅德在1881年春天的干涉是這種親密關系的縮影—赫伯特一定覺得遭到父親的背叛。他可能隱藏了這種感情，只允許表露出對布萊希羅德的憤怒。在某些方面，這是無能者的憤怒，是尼采所定義的有害現代性力量“憤懣”（ressentiment），即無能者的仇恨。

如果赫伯特意識到自己的這些復雜感情，他也許會向父親索取布萊希羅德的頭顱作為對放棄婚姻的回報。俾斯麥可能會同意，因為對兒子的愛要超過對仆人的忠誠。這樣的請求可能從未被提出，而且沒有理由認為俾斯麥知道赫伯特發現布萊希羅德扮演了破壞他愛情的卑鄙角色。

布萊希羅德對自己與赫伯特的關系憂心忡忡。荷爾斯泰因指出：“布萊希羅德恨赫伯特·馮·俾斯麥，因為他知道那是最不可能和解的敵人。” [[162]](#162_1)  布萊希羅德最終請求俾斯麥幫助自己與赫伯特和解，但沒有成功。首相暗示，赫伯特的怒火也對他造成工作上的麻煩，但他無力改變 [[163]](#163_1)  。赫伯特與布萊希羅德都曾被俾斯麥利用和傷害。讓他的受害者們和解對他有何好處呢？最終，布萊希羅德不得不為自己的不謹慎遭受夸張的報復，赫伯特始終將這種報復置于反猶主義的背景下。

布萊希羅德吸取教訓了嗎？我們沒有理由如此認為。為俾斯麥服務已經成為他的第二天性，服務與討好只有一線之隔。討好甚至戰勝謹慎。布萊希羅德對赫伯特的仇恨感到不悅，但他挺了過來。

1882年夏天，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的關切甚至超過他本已夸張的準則，這僅僅是巧合嗎？5月，布萊希羅德試圖向俾斯麥奉上一匹特別的馬—盡管當時俾斯麥還沒有重新開始騎馬（“蘇格蘭矮腳馬是種溫順而美妙的動物……等待著它被展示”）；威廉向布萊希羅德保證，只要價格合適，父親會感興趣。但這匹馬（布萊希羅德可能想把它作為禮物）沒能通過檢驗。俾斯麥擔心它不適應鄉下，“而且有點懶”。8月，布萊希羅德把另一匹“無比溫順和訓練有素”的矮腳馬送到伐爾岑 [[164]](#164_1)  。

那年夏天，俾斯麥的健康非常糟糕。6月，在議會發表的兩次演講中，他指責議員們將休假看得比國務更重—但隨即在伐爾岑連續消失了六個月。布萊希羅德一直非常關心俾斯麥的健康，并認為首相的親隨理所當然地會向自己通報情況。（早在1872年初，洛塔爾·布赫爾就交給他準確的診斷報告：“你知道親王的精神和肉體狀況多么緊密相關。因國事激動或煩惱時，他更容易著涼和沒胃口，而當身體不適時，任何工作都會讓他不耐煩。” [[165]](#165_1)  ）1882年7月，俾斯麥在手寫便條中向布萊希羅德保證，他的精力正在恢復，但“面部疼痛仍未減輕” [[166]](#166_1)  。

布萊希羅德立刻咨詢曾給俾斯麥看過病的柏林頂尖內科醫生弗雷里希斯教授（Professor F.T.Frerichs）。弗雷里希斯為俾斯麥的面部疼痛開了新藥丸，布萊希羅德買下藥丸派人送到伐爾岑。此外，出于對俾斯麥的關心，弗雷里希斯每天多次拜訪布萊希羅德，“他和我都希望閣下仍能下決心前往加斯泰因或維爾德巴德，這對閣下的神經有好處”。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和弗雷里希斯敦促他離開伐爾岑，進行旨在加速其康復的更徹底的溫泉療養。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報告說：“謝天謝地，弗雷里希斯的診斷認為閣下無礙，因為他知道閣下的所有器官都正常。”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送去弗雷里希斯的藥丸和醫療建議，一個特別的波西米亞玻璃酒杯和他本人對俾斯麥神經的祝愿—還有“我對造物主最熱忱的祈禱，希望他能讓閣下在許許多多年里身體康泰，閣下的贊美者們將為此歡欣鼓舞” [[167]](#167_1)  。俾斯麥接受禮物，但沒有聽從建議；他留在伐爾岑，于12月回到柏林—他的胡子完全白了，顯示出他突然變得多么蒼老。第二年，一位年輕得多的醫生施魏寧格（Schweninger）用嚴格的飲食安排和心理安慰讓他奇跡般康復。

俾斯麥無疑對布萊希羅德昂貴的掛念感到得意。他對諂媚的胃口很大。另一方面，赫伯特卻怒火中燒，他在寫給弟弟威廉的信中表示：“那個什么事都要插手的令人作嘔的布萊希羅德昨天代表弗雷里希斯來信……這種主動巴結真是太無恥了。今天，一個羅圈腿的猶太馬夫突然帶著一匹馬上門……很快，那個猶太人還會送來一箱小王冠；那家伙變得越來越無恥。吊死他！” [25](#25_7)  事實上，俾斯麥只把那匹馬留在身邊幾周；10月，蘭曹向赫伯特保證：“那匹猶太馬……昨天被送往柏林，交還友好的送禮人。”盡管蘭曹如此口無遮攔或者說不計后果，赫伯特和荷爾斯泰因還是覺得他對布萊希羅德過于軟弱，擔心他“個性猶如女子” [[168]](#168_1)  。暗中的惡意是俾斯麥手下人普遍的心理宣泄。

布萊希羅德的敵人憎惡他“多管閑事”、詭計百出和猶太人的“野心勃勃”。但他被指摘的行為在他的同伴身上不也都能看得到嗎？他的情感無疑比較遲鈍，但在俾斯麥的德國那個居心叵測、充滿陰謀和虛偽的世界里，真正敏感的猶太人永遠無法攀上頂層。

德國人對友誼的崇拜被恰如其分地贊美為德國文化的重要方面，在布萊希羅德的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許富人和有權勢者很少有朋友，但布萊希羅德不幸地體驗到真正友誼的式微。在俾斯麥的德國，很少有人像布萊希羅德那樣聲稱與那么多人建立友誼，但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完全沒有朋友—如果朋友的標準是忠實和誠實。最后這句話屬于俾斯麥，在俾斯麥被罷免前幾個月，當亞歷山大三世哀嘆俄國“只有一個真誠的朋友”（黑山親王［Prince of Montenegro］）時，他在報告開頭寫下簡短的問話：“但誰有朋友呢？”很難想象，他想到的只是國際政界 [[169]](#169_1)  。

[1.](#1_20) 1894年，特奧多爾·馮塔納注意到：“并非由于自己的錯，公務員的地位不斷下降。一百年前或者甚至五十年前，他們因為自己的職務和教育而地位崇高，財政狀況雖然一般，但也不至于落后；現在，他們在金錢上被超過十倍，導致在其他所有方面同樣如此。因為除了少數引人矚目的例外，財產也決定所有和教育相關的問題。”《家書》（柏林，1924年），第二卷，第302頁［Briefe an seine Familie（Berlin，1924），II，302］。

[2.](#2_20) 金錢是這部關于19世紀70和80年代一個普魯士家族的小說的主題。一位少校感嘆道：“該死的錢！永遠是錢！”身為一家之長的退休內閣部長回應稱：“比起無辜的金屬，那些有罪的人更該死。”從商的敗家子曾告訴他的貴族兄弟，他的孩子們應該擁有“今天勝過其他一切的東西，它取代過去時代的武器，降服一切，打開所有的大門—那就是錢……刀劍變得無用，我們今天的戰場是股市、貿易、商業和工業”。當對方回答說，貴族絕不能把成為股票經紀人當成目標時，貴族商人警告說：“貴族不必成為股票經紀人，但他們能戰勝好逸惡勞，能適應時間帶來的改變。簡而言之，他們能從事生產性工作，否則就會走向毀滅。”格奧爾格·馮·奧姆普泰達男爵，《埃森：1900年前后的德國貴族》，第1卷（柏林，1902年），第38、42、364—366頁［Georg Freiherrn von Ompteda，Eysen：Deutscher Adel um1900，I（Berlin，1902），38，42，364–366］。

[3.](#3_18) 阿納托爾·法郎士（1844—1924），法國作家。——譯注

[4.](#4_18) 舉一個我在檔案中找到的例子，交流雙方是普魯士檔案主管海因里希·馮·聚貝爾和俾斯麥。聚貝爾代表一位年輕歷史學家馬克斯·萊曼（Max Lehmann）致信俾斯麥：萊曼在檔案中找到散落各處的大約二十封來自陸軍元帥布呂歇爾（Blücher）的書信，并希望發表它們。聚貝爾承認，信中包含一些偏激的表達，但沒有此前未知的事實：“萊曼博士立刻去掉了布呂歇爾與哈登貝格［Hardenberg，當時的普魯士政府首腦］間不太愉快的通信，涉及前者極其糟糕的財務狀況。”關于錢的內容馬上被去掉。但俾斯麥還是拒絕請求，這些信一直沒有發表。聚貝爾致俾斯麥，1876年11月4、10日，GFO：I.A.A.a.50，第2卷。

[5.](#5_18) 或者以馮塔納的燕妮·特萊貝爾（Jenny Treibel）為例，她令人作嘔地表示：“一切都沒有價值；但最沒有價值的是整個世界如此貪婪地追求的東西：有形財富、地產、金錢……我本人堅持理想，永不放棄。”她的一位前追求者看穿她的面具，因為她曾經拋棄此人，轉投富人的懷抱：“她是個危險的人，更危險的是因為她本人不知道這點，真心以為自己有顆善良的心，特別是鐘情于‘更崇高事物’的心。但她的心只鐘情于有形事物，鐘情于一切能賺錢和生利的東西……他們總是宣揚自由和表達感傷，但這些都是鬧劇。到了顯露本質的時候，他們的座右銘是：只有金子是王牌。”馮塔納，《燕妮·特萊貝爾夫人》（柏林，1905年），第32、96頁［Theodor Fontane，Frau Jenny Treibel（Berlin，1905），pp.32and96］。

[6.](#6_18) 最合適的例子來自《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弗洛伊德在書中寫道：“偉大詩人可以允許自己表達受到嚴厲批評的心理真相。就像海涅所說：‘我性格極為平和。我想要的只是一間茅草頂的小屋，但要有一張好床、好的食物、最新鮮的牛奶和黃油，窗前要有鮮花，門前有高大美麗的樹木；如果上帝想讓我盡興，他會讓我看到這些樹上掛著我的六七名敵人。我心潮澎湃，將在他們死前原諒他們生前的所有過錯—是的，我們必須寬恕敵人，但要等到他們將被處決時。’”齊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滿》，第四版（倫敦，1949年），第84頁。

[7.](#7_18) 德國駐外大使的薪水高于國內官員，但花銷也要大得多。薪酬最高的職位是駐圣彼得堡大使，1872年的收入為4萬塔勒。德國大使的薪酬總是低于英國、法國、俄國和奧地利同行。但英國外交官也有類似的苦惱：“很少有人能只靠薪水過活……哈羅德·尼克爾森（Harlold Nicolson）在1919年宣稱，入職十年后，他的稅后真實年薪只有89鎊。”扎拉·斯泰納，《外交部與外交政策，1898—1914》（劍橋，1969年），第174—175頁［Zara S.Steiner，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1898–1914（Cambridge，1969），pp.174–175］；魯道夫·莫塞，《俾斯麥時期的帝國最高行政部門，1867—1890》（明斯特，1957年），第113頁［Rudolph Morsey，Die Oberste Reichsverwaltung unter Bismarck，1867–1890（Münster，1957），p.113］。

[8.](#8_18) 俾斯麥在布萊希羅德的信上潦草地寫了“H.阿尼姆！”，顯然這是他最關心的東西。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7月4日，FA。

[9.](#9_16) 薩迪克帕夏（1825—1901），1875—1877年間任土耳其駐法國大使。1875年，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干地區爆發嚴重動亂，西方列強趁機干預，與代表奧斯曼政府的各國大使展開談判。談判的基礎是奧匈帝國外長安德拉什（Gyula Andrássy）提出的方案，涉及一系列政治、宗教和經濟改革。——譯注

[10.](#10_16) 斐迪南·德·雷賽布（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法國外交官。1858年，他獲得埃及總督賽義德帕夏許可，開始修建蘇伊士運河，并于11年后開通。1879年，他又主持開挖巴拿馬運河，但以失敗告終。——譯注

[11.](#11_16) 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最后一封荷爾斯泰因的來信日期為1893年2月8日，即布萊希羅德去世前兩周，收信人是他的兒子漢斯。荷爾斯泰因談到是否應該告訴布萊希羅德其狀況的嚴重性，建議等急性發作過后就告訴他。荷爾斯泰因并不回避對這樣的最敏感話題發表看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的關系。

[12.](#12_14) 由德國鐵路建造商施特魯斯貝格發明。按照1838年的鐵路法，股東必須全額支付股票的票面價格，且不能低于這個價格出售，因此人們對投資鐵路的熱情不高。施特魯斯貝格想出變通方法：鐵路公司和承包商簽訂合同，承包商按照法規標準負責修建，鐵路公司用股票支付其服務。承包商不受鐵路法限制，可以低于票面價格出售股票，從而便于籌資。——譯注

[13.](#13_14) 在關于奠基活動和腐敗的論戰中，與瓦格納具有相同社會面貌的魯道夫·邁耶爾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議員們的虛偽令人震驚，他們幾乎都清楚自己內部的奠基活動和專業奠基者，卻聆聽拉斯克揭露三個臭名昭著的半吊子的違法行為”—包括瓦格納。魯道夫·邁耶爾，《德國的政治奠基者與腐敗》（萊比錫，1877年），第117—118頁。

[14.](#14_14) 1837年前英國君主生活的王宮，所有的外國大使都在那里受到接見。——譯注

[15.](#15_14) 斐迪南·拉薩爾（1825—1864），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全德工人聯合會創始人。——譯注

[16.](#16_14) 天主教禁止離婚，但滿足一定的條件可以撤銷婚姻，如雙方是血親、沒有完成結合或者婚前隱瞞某些情況等。——譯注

[17.](#17_8) 哈茨菲爾特被普遍懷疑向布萊希羅德泄露信息；當布萊希羅德吹噓自己知道一封威廉寫給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的重要書信的內容時，后者的一位親信立刻猜測是哈茨菲爾特起草該信。菲利克斯·巴姆貝格（Felix Bamberg）致卡爾·安東親王，1883年10月5日，HS。

[18.](#18_8) 萊恩多夫伯爵的孫子與他同名，也是一位風度翩翩和意志剛強的人，1944年7月20日，他參與針對希特勒的政變企圖，后來被納粹處以絞刑。關于他動人而生動的回憶，見瑪麗昂·登霍夫伯爵夫人，《再沒有人叫這些名字》（杜塞爾多夫，1962年），第81—94頁［Marion Gräfin Dönhoff，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Düsseldorf，1962），pp.81–94］。

[19.](#19_8) 萊恩多夫也會幽默地揶揄布萊希羅德。在布萊希羅德家的一次宴會上，主人的同事和猶太人同胞照理被小心地排除在外，萊恩多夫對席上的同伴表示：“要不是這家的主人，有資格參加宴會的人將比現在通常的情況少得多。”馮·布勞爾，《為俾斯麥效勞》（柏林，1936年），第208頁［A.von Brauer，Im Dienste Bismarcks（Berlin，1936），p.208］。

[20.](#20_8) 德皇威廉一世、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和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譯注

[21.](#21_8)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伯爵，1880年9月2日，SA。1967年6月，在研究該檔案時，我找到裝有赫伯特寫給蘭曹書信的特別文件夾。這些信中有許多在政治上很重要，但沒有被包括在1964年瓦爾特·布斯曼（Walter Bussmann）版的赫伯特政治書信集中。那個版本也沒有提及赫伯特與布萊希羅德的大量通信。

[22.](#22_8) 羞辱布萊希羅德似乎還能帶給他惡意的快感。有目擊者稱，赫伯特告訴布萊希羅德，他曾與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提及歐洲主要的銀行，當然也談到布萊希羅德。據說羅斯柴爾德回答說：“布萊希羅德？布萊希羅德算什么？他只是獲得我給的那1%。”布萊希羅德面色難看，但什么都沒說。這個故事經常被講起，但只有一次與赫伯特聯系起來，展現布萊希羅德不得不效力的主子們多么傲慢。見布勞爾，《為俾斯麥效勞》，第207頁。

[23.](#23_8) 赫伯特在信中對最好的朋友說：“除了限定繼承的兩處莊園，我父親一無所有。”《菲利普·奧伊倫堡—赫特菲爾德親王五十年回憶錄》（柏林，1923年），第95頁［Aus50Jahren.Erinnerungen des Fürsten Philipp zu Eulenburg-Hertefeld（Berlin，1923），p.95］。按照新近的規定，地產不能由娶了離婚女子的人繼承。奇怪的是，赫伯特對朋友表示—也許還自欺欺人—父親除了莊園別無財產。當時，俾斯麥的投資已經增至約100萬馬克。赫伯特想要夸大對婚姻的物質障礙，從而逃避情感愧疚嗎？

[24.](#24_6) 六年后，作為國務秘書的他試圖拒絕讓一名猶太人進入外交部—僅僅因為那是猶太人，這個舉動與此無關嗎？通過此舉，他打破了之前實行的略微靈活的政策。他宣稱身居高位的猶太人總是野心勃勃，如果僅僅因為此人的父親“靠做股票經紀人”賺了很多錢就招入“猶太崽子”（Judenbengel），被精心選拔的其他人員會表示反對。莫爾賽，《俾斯麥時期的帝國最高行政部門，1867—1890》，第121—122頁。

[25.](#25_6) 布萊希羅德沒有送來一箱小王冠，而是在俾斯麥70大壽時打造了紀念章：一面是年輕得多的俾斯麥肖像，另一面是其家族紋章。他給了俾斯麥10塊金質紀念章，25塊銀質章—還有1萬塊青銅章的出售所得用于某個俾斯麥慈善基金，這讓俾斯麥非常高興。諾曼·里奇和費舍爾編，《荷爾斯泰因文件》（劍橋，1957年），第二卷，第227頁［Norman Rich and M.H.Fischer，eds.，The Holstein Papers（Cambridge，1955–1961），II，227］。

## 第十一章　第四等級

我曾是新聞強盜。

——威廉·俾斯麥伯爵致荷爾斯泰因，1883年7月16日

謝天謝地！沒人能指望

賄賂或左右英國記者。

但沒有機會看到

未被賄賂的話，記者將做什么。

——洪貝特·沃爾夫（Humbert Wolfe）

威廉·俾斯麥抱怨“我曾是新聞強盜”概括了他父親與新聞媒體的關系 [[1]](#1_53)  。從政治生涯伊始，俾斯麥就認識到和夸大新聞媒體的力量。他在公開場合談論其“可怕的虛偽”，暗中卻試圖利用其為自己的目的服務 [[2]](#2_53)  。他認為大部分記者是失敗者、不負責任的三流作家和文人，他們對政治一竅不通，用粗魯之詞攻擊他。他試圖在新聞界以毒攻毒—或者用他自己最喜歡的格言來說：在紳士面前是紳士，在海盜面前是一倍半的海盜（A gentilhomme，gentilhomme/A corsair，corsair et demi）。俾斯麥在新聞界很少遇到紳士，因為他對此根本不抱指望。他相應地選擇了自己的武器。

在他的整個統治期間，新聞媒體變得日益重要。得益于更高的識字率、更廉價的報紙和對政治事務關注的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俾斯麥戲劇性成功的刺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閱讀越來越多內容更加豐富的報紙。新聞報道和評論決定輿論，這是19世紀后半葉未經檢驗的常見現象。選民被新聞報道左右，政客們同樣如此。與1862年相比，1890年的新聞媒體在德國生活中的影響力要大得多。就像他對待所有重要的對象，他對付新聞媒體的手段也是打壓、操縱和勸誘。

俾斯麥對新聞媒體的評價并非個例。歐洲自由派認為新聞媒體至關重要，它的自由是抵抗暴君的壁壘。保守派也開始利用新聞媒體，但也對它的權力感到遺憾，慨嘆沒有原則的記者手握如此力量是民主影響的例證。俾斯麥對記者的鄙視廣受認同。記者（和股票經紀人）被視作現代性的有毒產物—猶太人在這兩個群體都擁有顯要位置。無論是不是猶太人，記者都最容易遭到辱罵；在大眾眼里，他們常常被看作失敗的作家或老師，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各種誘惑的影響。記者要么唯利是圖，要么意圖顛覆，或者兼而有之 [[3]](#3_51)  。巴爾扎克的《幻滅》（Lost Illusions）是對新聞媒體的權力和腐敗的經典描摹，即使現實早已改變，歧視仍然揮之不去。

幾十年來，德國歷史學家一直認為那位偉大的首相未受現代畸病的影響，比如金錢和新聞界 [[4]](#4_51)  。但布萊希羅德明白，事實并非如此。他知道俾斯麥利用自己的職務、下屬和家人安插故事、反駁文章和抹黑對手。俾斯麥像鷹一樣盯著新聞媒體，有位下屬記得他的命令：“必須粉碎新聞媒體的每一次攻擊，報復每一次侮辱。” [[5]](#5_51)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賄賂是俾斯麥對付新聞媒體的最后一招，資金通常來自韋爾夫基金，常常由聽話的布萊希羅德執行。

當然，布萊希羅德對新聞媒體的關心也由來已久。直到19世紀中葉，媒體報道仍以商業和金融新聞為特色；銀行家和記者都對迅速獲取消息感興趣，搶先發布可以帶來名氣或收益。在布萊希羅德生前，新聞媒體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消息來源，他本人的情報收集網絡顯得捉襟見肘。報紙也可以影響商界輿論：有利的故事可以確保新債券發行成功，不利的故事則會毀了發行。敵對的金融團體在報紙上展開斗爭。布萊希羅德認識到營造正確氛圍的重要性；19世紀70年代初，他常常成為辱罵的靶子。因此，他同樣需要盡可能多地在第四等級中結交朋友。而且他同樣掌握著大量手段。

因此，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對新聞媒體的關心既不同又互補。他們的第一次合作持續幾十年，與柏林的首家通訊社有關。創辦者伯恩哈德·沃爾夫（Bernhard Wolff）原為一名德國猶太醫生，后來成為政客。1849年，從柏林到亞琛的普魯士國家電報線架設完成后僅幾天，沃爾夫就創辦了新聞社，在柏林和萊茵蘭之間傳遞商業新聞。他還逐步加入政治新聞，在19世紀50年代的經濟大繁榮中，柏林和西部的這條連線變得越來越重要和有利可圖。

1849年，沃爾夫以幾天的優勢擊敗競爭者。尤里烏斯·路透（Julius Reuter）1816年生于卡塞爾（Kassel），原名伊斯拉埃爾·貝爾·約薩法特（Israel Beer Josaphat）。19世紀40年代，他皈依基督教后娶了一位柏林銀行家之女伊達·瑪利亞·馬格努斯（Ida Maria Magnus），并在夏爾·阿瓦斯（Charles Havas，有的說法認為此人是猶太移民）1835年創辦的巴黎通訊社工作。1849年，路透曾試圖建立與沃爾夫同樣的線路。他沒有氣餒，而是巧妙地在亞琛和布魯塞爾間開設信鴿服務，將德國和法國的業務連接起來。1851年，路透遷往倫敦，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第一個辦公室 [[6]](#6_49)  。后來，路透超越所有的競爭者，于1871年被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Duke of Saxe-Coburg-Gotha）封為貴族；尤里烏斯·德·路透男爵和布萊希羅德男爵成了朋友。

與此同時，沃爾夫在德國各地擴張業務。他編織起提供者和接收者網絡，并逐漸延伸到國外的站點。他為柏林總部雇傭洛塔爾·布赫爾，此人參加過1848年革命，在倫敦流亡多年，1865年被任命為俾斯麥的主要助手之一 [[7]](#7_49)  。布赫爾的繼任者是著名文人保羅·林道（Paul Lindau），他的回憶錄描繪了通訊社的運作。雇員篩選送來的報告，經過編輯后發送給德國的客戶，重要新聞也被發給國外訂閱者。沃爾夫的雇員比其他大多數人早幾個小時知道世界各地發生了些什么，這種能力得到布萊希羅德的青睞 [[8]](#8_49)  。

沃爾夫一度與倫敦的路透和巴黎的阿瓦斯這兩位外國同行合作。1865年，阿瓦斯試圖在柏林開設辦公室與沃爾夫競爭，并收購后者的業務。沃爾夫向國王求助，請求避免讓普魯士依賴外國人提供新聞 [[9]](#9_47)  。沃爾夫警告說，個人無法與外國公司競爭，需要“愛國金融家”確保自己業務的安穩。他強調保留普魯士通訊社的政治重要性，暗示如果國王的政策與內閣有分歧，通訊社將成為其寶貴的個人工具。威廉斷然拒絕這種建議，但在俾斯麥的支持下，他敦促布萊希羅德這樣的“愛國金融家”出手“鞏固［沃爾夫］的企業” [[10]](#10_46)  。在政府的鼓勵下，布萊希羅德、維克多·馮·馬格努斯、馮·奧本菲爾德（C.D.von Oppenfeld）、斐迪南·薩羅門博士（Dr.Ferdinand Salomon）和另外兩人成立新的股份公司：大陸通訊公司（Continental Telegraph Company）。他們提供33萬塔勒的原始資本，計劃總股本為200萬塔勒。特奧多爾·維莫爾（Theodor Wimmel）和理查·文策爾（Richard Wentzel）被任命為法律上的負責人，任期十年。另一項協議收購了沃爾夫的通訊社，并讓他留任新公司的總經理，新公司將“專業發布政治、商業和金融內容的電報”，擴大現有網絡，并購置所有新的電報設備 [[11]](#11_46)  。

這家公司在普奧戰爭中馬上被俾斯麥派上用場，并成為平息新吞并的漢諾威省反普魯士暴動的重要武器 [[12]](#12_44)  。但阿瓦斯和路透仍然覬覦競爭對手的業務。1869年2月，尤里烏斯·弗洛貝爾（Julius Fröbel，慕尼黑出版商和前激進分子，在1848年曾被判處死刑，在1868年前一直為奧地利的利益服務）警告俾斯麥，哈瓦斯和路透準備收購大陸通訊社。他還表示，向俾斯麥示警犧牲了他自己的利益，因為路透向他開出“優厚的報價”；但計劃中的合并有利于法國人的利益。為了阻止合并，俾斯麥的辦公室開始復雜而隱蔽的行動 [[13]](#13_40)  。幾天后，科伊德爾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俾斯麥建議他趕快出售通訊社，“這符合你［布萊希羅德］的利益”，自己將在第二天口頭告訴他這個不同尋常的建議的理由 [[14]](#14_40)  。（對歷史學家來說，這類口頭交流多么不幸！）

無論如何，俾斯麥改變了主意。在科伊德爾的積極斡旋下，普魯士政府出手阻止外國收購。4月19日，沃爾夫警告布萊希羅德，科伊德爾承諾的干涉可能來得太晚，因為阿瓦斯和路透已經下了最后通牒，威脅撕毀一切讓沃爾夫獲得外國新聞的合約。4月23日，科伊德爾讓布萊希羅德直接與紹芬將軍（普魯士電報局主管）和德爾布呂克交涉，以便獲得政府不出售通訊社的有效承諾 [[15]](#15_38)  。與此同時，阿瓦斯和路透將報價從65萬法郎提升到70萬法郎。文策爾請求布萊希羅德說服政府支持現有公司，對付包括漢諾威人在內的外國利益，“這事關報效祖國和阻止外國煽動” [[16]](#16_38)   [1](#1_23)  。

1869年6月，布萊希羅德的努力獲得成功：與阿瓦斯的談判在之前就已破裂，普魯士內閣與大陸通訊公司簽署正式合同，但在幾十年間一直對公眾保密。合同的核心內容是政府將賦予沃爾夫事實上的壟斷地位，以換取對公司活動的廣泛控制，控制可以變成審查。政府承諾讓該公司的政治報道優先于所有的私人電報，并同意在柏林主要的電報局旁邊設立公司的特別辦公室。顯然，沒有這些特權，競爭者將處于嚴重的不利地位，甚至可能是絕望的。政府還進一步同意借給公司10萬塔勒（第一年免息），并在1871年和1872年又直接贈予10萬塔勒。作為回報，公司承諾向政府和任何政府指定的官員提供除股市和商業消息之外所有收到的電訊。（布萊希羅德顯然能收到各種消息。）此外，公司將擴大網絡，按需求向所有國外的北德官員提供政治報道，并應政府的要求在國內外對任何電報消息進行“最大可能的宣傳”。“大陸通訊公司的通訊社想要傳送的所有政治性質的電報都將事先受到王國政府特別指派的官員控制。”如果發生故意違規，政府可以要求任命新的主管，以糾正通訊社的政治方向。政府還有權要求解雇不可靠的代理人，并在董事會安排自己的觀察員。合同將為期十年 [[17]](#17_32)  。

雙方進行了精明的討價還價，該合同讓普魯士政府擁有最重要的宣傳武器—合同的隱秘性讓它更加重要，使其長期未受懷疑，因此還不受議會掣肘 [[18]](#18_32)  。近來的研究顯示，與沃爾夫的聯系“讓俾斯麥手握影響新聞界的非常有效和決定性的工具，還讓他控制新聞傳播的源頭” [[19]](#19_28)  。令人稱奇的是，即使當經濟自由主義在普魯士如日中天時，也可以創造出這樣的混合壟斷。（德國的傳統改變緩慢；1844年，一位外國觀察者指出：“在德國，政治情報的準備、生產和出售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室壟斷，就像煙草在法國的情形……” [[20]](#20_28)  ）1891年，歐根·里希特譴責最初設立這種壟斷，但他不知道政府在其中享有秘密特權。對于促成如此有違新聞自由原則的合同，布萊希羅德沒有感到不安。他站在政府那邊，也許銀行家和首相對于締造這個迎合他們共同利益的工具只會感到高興。反過來，該公司現在可以與阿瓦斯和路透商談協議，事實上將世界分成不同的利益范圍；沃爾夫獲得“開發”中歐和東歐的獨家權利 [[21]](#21_28)  。

俾斯麥在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時使用各種有力的工具。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韋爾夫基金，該基金來自被扣押的漢諾威王室資產的年收入，俾斯麥可以不通過公共審計使用它。由于俾斯麥把某些漢諾威記者稱為爬行動物，該基金俗稱爬行動物基金。在俾斯麥的整個統治期間，反對派領導人一直認為俾斯麥用該基金喂養“爬行動物”，即賄賂各類記者和報紙。該基金成了俾斯麥腐蝕德國社會的象征；真實的使用情況可能更加適度，更符合當時和后來所有政府的做法 [2](#2_23)  。

1873年，英國大使提到這筆“［議會交給俾斯麥］被他不負責任地使用的秘密服務基金……許多人對此好奇，但沒人敢打聽俾斯麥親王如何使用那1600萬塔勒或240萬英鎊的利息” [[22]](#22_28)  。布萊希羅德比當時大多數人知道得更多。他可能投資或幫助投資被扣押的本金，還肯定是利息的主要支取者之一 [[23]](#23_28)  。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科伊德爾負責監督外交部對韋爾夫基金的使用，那是韋爾夫基金收入的最大受益者 [[24]](#24_26)  。科伊德爾知道布萊希羅德在重要問題上會守口如瓶，因此安排他充當信得過的中間人。我們只有關于該基金的一組賬目，顯示出在1869年的最后九個月里，布萊希羅德匯款超過3萬塔勒，大部分匯給他的朋友馮·勃蘭特少校，后者當時正在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因此，布萊希羅德負責匯付總支出的超過30% [[25]](#25_26)  。他還為較小的數目提供掩護；比如，1868年，科伊德爾指示布萊希羅德向巴黎匯款750法郎，他將以“最高授權”和最秘密的方式花掉這筆錢。科伊德爾還表示，隨后還將有更多支付 [[26]](#26_24)  。

普法戰爭期間，俾斯麥利用新聞界煽動普魯士人吞并洛林—阿爾薩斯的熱情；他還孜孜不倦地推動中立者的親普魯士情感，為此使用包括補助在內的各種手段。和往常一樣，他得到布萊希羅德的幫助。戰爭讓俾斯麥更清楚地認識到新聞媒體的力量。在新帝國，隨著大眾媒體通過廣告取得資金上的獨立，他的操縱變得更加重要和困難。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都對沃爾夫通訊社的戰時表現感到滿意。兩人都獲得優先待遇，俾斯麥甚至試圖要求沃爾夫不要向國王發送消息。戰后，布萊希羅德仍然是沃爾夫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他的朋友理查·文策爾擔任董事。文策爾繼續為布萊希羅德定期提供金融、政治和宮廷消息。1871年，文策爾向布萊希羅德保證：“永遠清醒的眼睛為您效勞。”布萊希羅德檔案也證明，文策爾源源不斷地向柏林辦公室和度假中的布萊希羅德發送各類消息。他定期發來秘密消息，還經常讓布萊希羅德比其他任何人更早收到普通消息 [[27]](#27_20)  。包括皇帝在內的顯要人物常常恭維布萊希羅德，因為他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早地提供某些特定消息。文策爾常常是他的消息來源。

維持沃爾夫通訊社的半官方但獨立的地位殊非易事。外國通訊社仍在尋求建立國際卡特爾，德國政府對是否與該公司保持關系存在分歧。1874年11月，尤里烏斯·路透再次敦促布萊希羅德同意三家通訊社合并。作為對布萊希羅德在沃爾夫通訊社投資的補償，路透愿意提供新公司的股份或6萬英鎊現金。他還承諾，原先的三家公司都將保持完全的政治獨立。

路透和布萊希羅德在普法戰爭期間有過合作，后來又在多處溫泉療養地見過面 [[28]](#28_14)  。大陸通訊社的董事們樂于接受路透的提議，但委派布萊希羅德征求俾斯麥的意見。布萊希羅德正式詢問俾斯麥對合并計劃是否有異議。如果俾斯麥反對，他承諾將試圖駁回同事們的決定；但作為安慰，政府應該馬上延長與該公司的協議，而不是等到1879年協議到期。新合同必須保證，新任電報局主管將延續紹芬將軍時期的優先發報特權 [[29]](#29_14)  。三天后，外交部國務秘書彪羅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俾斯麥對此事非常關心，指示他與布萊希羅德展開商談 [[30]](#30_10)  。

最終，俾斯麥拒絕提前延長協議—理由居然是他無法為遠遠超出他可能任期的事約束普魯士政府。但他也更為中肯地表示，這樣的合同對政府沒有多少好處，如果新的國際公司損害政府利益，政府仍將有足夠的力量消滅它 [[31]](#31_10)  。簡而言之，俾斯麥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接受布萊希羅德的價碼。盡管條件未能被滿足，布萊希羅德還是拒絕合并—這證明與政府的關系對他有利 [[32]](#32_10)  。

政府與沃爾夫通訊社的協議將于1879年到期。1876年，蒂德曼正式提出反對延長；兩年后，一個政府專家委員會接受該詢問。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彪羅堅稱該公司“對政府……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它總是最忠心耿耿地服從政府的政治影響，并采用對政府最方便的方式。對于所有存疑的電報，它都會請示政府，并無條件地遵守政府的指示”。新協議的核心仍將是政府愿意向該公司提供電報發送的優先待遇，而該公司則必須接受政府確認和罷免通訊社主編的權力 [[33]](#33_10)  。與1875年的俾斯麥相比，彪羅對通訊社在政府的新聞政策中的地位重視得多。

1879年10月，現狀的最堅定捍衛者彪羅去世。俾斯麥堅持更具體的權力，如優先審查和對通訊社管理方更大的權限 [[34]](#34_10)  。布萊希羅德試圖至少保留現有的特權。他向荷爾斯泰因求助，但后者從伐爾岑來信，表示：

（俾斯麥已經）竭盡全力，要求延長現有的政治電報優先待遇，盡管其他官員想要徹底取消特權。要求更多會讓他難堪，因為你知道，這種支持太容易引發投機懷疑。這就是為什么你現在應該前往內閣游說，畢竟你的人脈無處不在，在那里也不例外。 [[35]](#35_10)

正式協議沒能達成；即使對溫順的文策爾和布萊希羅德來說，俾斯麥和謀士們的要求也太過苛刻。現有安排通過非正式協議得以延長。俾斯麥仍然認為沃爾夫通訊社有特別的義務滿足他的愿望 [[36]](#36_10)  。通訊社仍是他的工具之一—由于沒有正式的依賴關系，它完全不受議會控制，因而更加有用 [[37]](#37_10)  。

1872年，布萊希羅德與德國政府和新聞界建立新的秘密聯系。多年來，他一直與倫敦的德國記者馬克斯·施萊辛格博士（Dr.Max Schlesinger，又一位學醫的記者）保持接觸。此人從19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編輯一份名為《英國通訊》（Englische Correspondenz）的周刊，向德國報紙提供英國新聞。施萊辛格還向英國新聞界提供德國事務的消息，并對其施加影響。他最早是親奧地利的代理人；在普法戰爭的最初幾周里，柏林政府高度重視很有影響力的英國輿論，試圖購買他的報紙 [[38]](#38_10)  。1872年，通過科伊德爾的斡旋，布萊希羅德試圖說服俾斯麥購買施萊辛格急于出售的《英國通訊》。

俾斯麥同意了，他在寫給財政部長坎普豪森的絕密信中給出理由：

在政治上，不讓《英國通訊》落入敵人之手，不讓它的專欄受到地方主義者、教會或社會主義者的影響無疑很有價值；《英國通訊》幾乎是關于英國政治的唯一消息來源，因此對歐洲所有德語國家的輿論具有重要影響。 [[39]](#39_10)

簡而言之，施萊辛格的報紙迎合1871年后俾斯麥對新聞媒體的首要考慮：現在他專注于影響德國而非外國的輿論，在這點上《英國通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40]](#40_10)  。

盡管俾斯麥缺席，但在坎普豪森的批準下，沃爾夫與普魯士政府簽署秘密協議，然后又與施萊辛格達成協議。布萊希羅德促成這兩份協議的簽署。協議規定，沃爾夫通訊社應“代表［普魯士］內閣”給施萊辛格支付5萬塔勒，從而獲得對《英國通訊》的獨家所有權。按照政府的指示，沃爾夫通訊社將對施萊辛格報社進行資金監管和政治控制。作為交換，沃爾夫之前欠政府的5萬塔勒債務被一筆勾銷。就這樣，最初向沃爾夫注資的韋爾夫基金間接促成對這家外國媒體的收購 [[41]](#41_10)  。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施萊辛格成了倫敦的寶貴聯絡人 [3](#3_21)  。施萊辛格向布萊希羅德提供關于倫敦政治、外交和金融的可靠情報，他的報告凸顯政治與金融的相互關聯：他發給布萊希羅德關于英國和俄土戰爭的秘密報告；早在1877年，他就暗示在某種情況下，英國可能奪取埃及，因此埃及證券有望升值。幾天后，他吹噓說自己的建議“對朋友價值6個百分點”，并遺憾布萊希羅德錯過良機 [[42]](#42_10)  。1878年5月，他又像哲學家那樣分析英俄戰爭的可能性。他寫道，沒人知道今天的信條是“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甚至連耶和華或朱庇特也不知道 [[43]](#43_10)  。

但施萊辛格被證明是一筆糟糕的投資。他的英國小報繼續刊發反政府的報道。俾斯麥相信，他“從博伊斯特［奧地利大使］而非明斯特［德國駐倫敦大使］那里得到信息” [[44]](#44_9)  。1876年2月，德國政府對此忍無可忍，考慮對施萊辛格采取法律行動。盡管施萊辛格是英國公民，但原合同規定最終將采用普魯士法律。不過柏林意識到，如果施萊辛格拒絕接受普魯士法庭的判決，那么就不得不以英國法律起訴他。由此將產生不利的宣傳效果，因為英國可能沒人知道德國政府與施萊辛格的密切關系。政府甚至想過在柏林“保護性地逮捕”施萊辛格，即在不訴諸法庭的情況下迫使他放棄權利 [[45]](#45_9)  。俾斯麥對簽署原協議的手下非常不滿：他在協議副本的頁邊批示“草率的談判” [[46]](#46_9)  。

普魯士政府派布萊希羅德引誘或召喚施萊辛格前往柏林，我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政府有意逮捕施萊辛格。無論如何，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在外交部的助手洛塔爾·布赫爾保證，他已致信施萊辛格，“含糊地暗示”柏林公司及其倫敦代理人之間出現了某些誤解。施萊辛格對這些所謂的“深層次分歧”表示震驚，但還是同意在健康允許的情況下盡快來柏林 [[47]](#47_9)  。

與此同時，德國外交部羅列了施萊辛格的罪名。他主要被指控散布違背德國利益的報道：1874年，他只刊發支持格萊斯頓的報道，無視對后者的批評。當格萊斯頓發表反梵蒂岡的小冊子后，這位首相的支持者陣營發生巨變 [4](#4_21)  。1874年，當英國舉行多場新教徒集會，對俾斯麥與教皇至上主義者的斗爭表達同情時，施萊辛格只報道英國新聞界對此的不利評論，隱瞞許多積極觀點。簡而言之，政府認為施萊辛格和天主教徒一起反對柏林政府—此舉無疑符合奧地利的利益。最終，他被控在英國新聞界有選擇性地刊發反德觀點，導致英國出現這樣的報道：德國對法國重新武裝起來的恐懼可能導致德國爆發預防性的罷工。柏林外交部總結說，施萊辛格一定從“反德來源”獲得這些印象，他有選擇性的報道證明他的反政府立場。難怪俾斯麥和德國政府對把稀缺的資源花在此人身上惱怒不已 [[48]](#48_9)  。

1876年3月，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討論施萊辛格事件，同意由文策爾和布赫爾負責處理此事 [[49]](#49_9)  。一個月后，布萊希羅德把施萊辛格召到柏林，要求布赫爾與他會面。但布赫爾憤怒地回復說，布萊希羅德早前曾認為布赫爾的介入“有害”，因為施萊辛格“沒有榮譽感，我和他說的一切都會被他出賣給博伊斯特伯爵”。如果知道布萊希羅德如此嚴厲地評價自己曾經的受保護人，俾斯麥一定會惱怒；布赫爾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

親王囑托我恭請您試著說服施萊辛格，就像您多次主動提出要做的那樣，今后他要么遵照德國政府的明確利益編輯《英國通訊》，要么解除現在的關系，無論是返還收購款還是交出報紙的管理權。親王相信，鑒于這些關系的由來，如果不采取法律訴訟，只有您能讓事情有所了斷。 [[50]](#50_9)

俾斯麥的信息明白無誤：施萊辛格是布萊希羅德找來的，現在必須由他來對付這個討厭的家伙。

布萊希羅德毫不費力地在俾斯麥和施萊辛格間做出了選擇，特別是因為他曾派兒子漢斯前往倫敦調查施萊辛格的情況，并證實俾斯麥的懷疑：“親愛的父親，您對他的熟人一無所知；這家伙在這里根本算不上人物……他非常聰明，也許擁有重要的政治影響，但他不受歡迎，因為沒人完全信任他。” [[51]](#51_9)

布萊希羅德要求施萊辛格簽署新的協議，發誓“出于施萊辛格博士的個人信念，《英國通訊》的精神和立場將遵循德國政策的原則，支持德國的目標，避免對德意志帝國和普魯士王國重要政客的行動造成任何阻礙”。如果未來出現任何分歧，文策爾博士擔任仲裁。施萊辛格被要求發誓對他的公司付出“全部忠誠和個人力量”，這隱晦地批評了他之前沒有全身心投入 [[52]](#52_9)  。直白地說，他必須同時接受審查和唯命是從—后來的通信顯示，布萊希羅德和政府對施萊辛格的辯解并不滿意 [5](#5_21)  。布萊希羅德和布赫爾合力為施萊辛格尋找適當的“合作者”；最終，他們選擇最廉價的候選人。韋爾夫基金在那段時間頗為吃緊 [[53]](#53_8)  。

在實質問題上，施萊辛格已經就范。現在，布萊希羅德授意施萊辛格在英國報紙上散布消息，然后在《英國通訊》上為德國讀者引用它們。1876年4月，施萊辛格引用幾家英國報紙對俾斯麥的鐵路國有化計劃的稱贊，布萊希羅德無疑也在這些計劃中押了很大的賭注 [[54]](#54_8)  。

但安寧是短暫的。不到兩年后，施萊辛格越來越高的虧空激怒了柏林政府。官員們抱怨他把賺錢的買賣變成虧本生意，即使最初的虧損僅為每季度30英鎊。坎普豪森反復警告俾斯麥這將消耗韋爾夫基金，他的一句題外話更耐人尋味：“我請求內閣對今年那筆被扣留財產的收益使用做出決定，但彪羅部長要求等［您］回來。”簡而言之，韋爾夫基金被視作俾斯麥的私人領域。坎普豪森還表示，《英國通訊》的訂閱量下降近50%，收入也相應減少，但開支繼續上升 [[55]](#55_8)  。

施萊辛格對訂閱量下降的解釋不太可能為他在柏林贏得朋友。除了糟糕的商業形勢和來自通訊公司與日俱增的競爭，他還指責“指定的政治立場”，稱其讓訂閱者抱怨《英國通訊》成了“純粹的俾斯麥報紙……黨派的喉舌……《英國通訊》的衰落不是我的錯” [[56]](#56_8)  ……他無疑是對的—德國報紙不需要施萊辛格來告訴它們俾斯麥的立場。

布萊希羅德向政府轉達上述借口，但遠遠不能說服對方。大發善心的柏林官員們相信施萊辛格的健康正在惡化，他抱怨神經病痛常常讓自己無法工作。但善心在柏林是稀缺商品。作為俾斯麥的助手和保護主義的先鋒，克里斯托弗·馮·蒂德曼相信，施萊辛格和某個沒有“愛國心，認為猶太人是國際公民”的人都“是英國政府的奴仆”；蒂德曼沒有說明這兩人因為信念還是腐敗而淪為奴仆。“他們喜歡在支持自由貿易的德國報紙上為英國的商業利益辯護。” [[57]](#57_8)  隨著1881年馬克斯·施萊辛格的去世，與《英國通訊》的聯系畫上句號，此人雖不起眼，卻是歐洲新聞界一個豐富多彩和多才多藝的人物。

俾斯麥與新聞媒體的許多關系得益于第四等級的許多成員也是猶太人 [6](#6_21)  。俾斯麥曾向法國大使圣瓦里耶抱怨說：“德意志帝國的新聞媒體幾乎完全掌握在猶太人手中。”—這也是大多數德國人的想法，但很少有人說出口 [[58]](#58_8)  。這種指控當然是反猶主義者的陳詞濫調，他們把新聞媒體看作猶太人支配世界的工具 [[59]](#59_7)  。不過，一邊是新聞界存在大量猶太人的歷史事實，一邊是反猶主義者斷言這種存在暗示猶太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或剝削新聞界，兩者間存在重要區別。猶太人紛紛進入新行當，將對文字的特殊喜好帶到新聞業—如果不是被拒之門外或不受歡迎，他們本來也會在舊行當中展現出這點。總而言之，德國的猶太記者彼此差異太大而且過于膽怯，無法將新聞界變成他們自己的利益工具，盡管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能喚起和證實嫉妒、恐懼和仇恨之情。

我們已經提到過布萊希羅德與埃米爾·蘭茨貝格的親密接觸。布萊希羅德的另一位朋友菲利克斯·巴姆貝格博士（Dr.Felix Bamberg）同樣身兼新聞工作和非正規的外交任務，這個職業經歷如此豐富多彩的人再次顯示出19世紀的社會多么開放。巴姆貝格早年是黑格爾研究者，在巴黎成為海涅的朋友，后來逐漸從文學轉向政治。1851年，36歲的他成了普魯士駐巴黎領事。俾斯麥在巴黎與他相識，1862年時曾稱其為“誠實而且完全可靠的人”。俾斯麥讓巴姆貝格監視駐法大使戈爾茨伯爵，擔心后者是可能的競爭對手 [[60]](#60_7)  。奧普戰爭結束后，巴姆貝格敦促俾斯麥增加普魯士對法國新聞媒體的資助，以便對付奧地利人的金錢攻勢，但俾斯麥拒絕這些請求 [[61]](#61_7)  。普法戰爭期間，巴姆貝格負責普魯士司令部的新聞事務。戰后，他成了德國占領軍司令曼陀菲爾將軍的政治顧問。19世紀70年代末，他氣憤地向布萊希羅德抱怨說，作為對他勞苦功高的酬報，柏林的某些紳士讓他轉任無足輕重的墨西拿（Messina）領事—薪水減少了1300塔勒 [[62]](#62_7)  。在痛苦的孤獨中，他為朋友弗里德里希·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 [7](#7_21)  準備了傳記，并寫了一部東方問題的標準史。他還與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建立密切的關系，在通信中交流政治問題和他為親王購買的藝術品。事實上，為卡爾·安東與布萊希羅德牽線搭橋的正是巴姆貝格。布萊希羅德與巴姆貝格同齡，他們經常為相同的目標和主人工作—而且他們至少在出生時擁有相同的信仰。和許多猶太人一樣，巴姆貝格可能皈依了基督教，但洗禮無法消除他在內心深處對猶太同胞的認同。比如，他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一封信中對猶太節日表達熱烈祝賀 [[63]](#63_7)  。

布萊希羅德在記者中還有其他許多朋友和熟人。他足夠重要，能讓媒體人爭相巴結他—他有足夠的野心，但也非常脆弱，為此他尋求所有可以得到的秘密影響。著名的維也納《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的編輯米夏埃爾·艾蒂安（Michael Etienne）請求布萊希羅德提供秘密消息，并承諾守口如瓶。“當時，歐洲大陸沒有哪一份報紙在影響力和地位上能與之相比。” [[64]](#64_7)  1880年，競爭者《維也納大眾報》（Wiener Allgemeine Zeitung）成立，羅斯柴爾德家族稱該報編輯特奧多爾·赫茨卡（Theodor Hertzka）極其“負責”。他試圖與布萊希羅德套近乎，所用的方法曾被人以無數種形式用過：“您將會理解，我從心底希望與像您這樣處于事件源頭的人保持聯系。” [[65]](#65_7)

布萊希羅德不斷地給予和獲得。記者請求他提供信息和接受訪問，甚至像《法蘭克福報》編輯利奧波德·索納曼（Leopold Sonnemann）這樣的著名人物也向布萊希羅德求取消息。個別記者還時常請求金融建議或幫助，布萊希羅德大多滿足。出版者也會請求資助，特別是如果他們可以宣稱為國家利益服務。1877年，著名法學家魯道夫·馮·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請布萊希羅德出資支持《社會通訊》（Social-Correspondenz）周報，該報的宗旨是反對社會民主黨，推動對下層階級“真正”問題的理解 [[66]](#66_6)  。

反過來，布萊希羅德也對編輯和通訊員們提出無數要求。他對這些人的情報需求幾乎就像這些人對他的消息需求一樣迫切。更重要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關注著新聞媒體—任何重要報紙上的任何不利報道幾乎都會立即招來質疑和反駁。如果冒犯足夠嚴重，布萊希羅德在該報的所有廣告都會被取消。1876年，《弗斯報》（Vossische Zeitung）就因為觸怒布萊希羅德而遭受這樣的懲罰 [[67]](#67_6)  。當布萊希羅德要求知道冒犯報道來源的時候，包括索納曼在內的編輯不得不以職業秘密為由搪塞。無論是遵照他人吩咐還是主動，布萊希羅德還經常代表他人出面。俾斯麥家族強迫他為自己服務，其他人也同樣如此：他是如此方便和強大的中間人。

布萊希羅德還需要散布各種故事來支持某些政策，如雙本位制、鐵路國有化或關稅改革。他試圖為俾斯麥煽動輿論。此外，他還常常要求刊發有利于羅斯柴爾德家族（特別是職業生涯早前）和他本人金融操作的報道。他一再為自己的重大投資安排合適的新聞，無論是抵押銀行債券、俄國基金，抑或墨西哥債券。

有時，他會為了獲得有利的宣傳而大費周章，不惜懇求朋友幫忙。1890—1891年冬天，他贊助著名作家和編劇保羅·林道的墨西哥之行，后者正陷入與一位女演員的丑聞。作為回報，林道承諾對那個國家做“引人矚目的描繪”，當時布萊希羅德正在推銷墨西哥證券。林道給施惠者寫了個人報告，在報紙上發表了三十四篇文章，還出版了一本書。林道的傳記作者們都沒提到布萊希羅德贊助了這次墨西哥探險 [[68]](#68_6)  。

一一描繪布萊希羅德與新聞界的廣泛關系令人厭煩，再舉幾個例子就夠了。19世紀70年代，他定期與南德的獨立報紙《法蘭克福報》的出版者利奧波德·索納曼通信。作為來自法蘭克福的帝國國會議員，索納曼在德意志帝國堪稱異類。索納曼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比拉斯克和巴姆貝格等人左傾得多。他反對社會黨人，盡管他確信有必要大幅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他還是猶太人，反對普魯士，支持法德友好—很難想象有什么組合比這更讓俾斯麥厭惡了。俾斯麥兩次用盡手段傷害索納曼：10月，他在帝國議會指控后者為法國效勞；1884年，他敦促右翼支持索納曼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手，導致其競選失敗 [[69]](#69_6)  。

留存下來的寥寥幾封索納曼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透露了前者的興趣。1875年，他表示反對全面保護主義，支持和平外交政策：“如果你有機會那樣做就去做吧。”1877年，他報告說，克虜伯 [8](#8_21)  帶他去了“只有最高級軍官光顧的商店”。軍火生產欣欣向榮，特別是因為俄國的軍購，但其他行業勉強盈虧平衡。索納曼希望更多地與布萊希羅德通信，盡管兩人政見明顯不同，而且他沒有刊發對布萊希羅德的俄國債券有利的親俄報道 [[70]](#70_6)  。19世紀80年代，兩人關系破裂。1880年12月，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透露，“《科隆報》的繼承者們有意出售報紙。我同時從別的地方聽說，著名的社會黨人索納曼想要購買，雖然今天的報價已經高達200萬塔勒”。如果俾斯麥有意，他的一些朋友們將買下該報。事實上，繼承者們改變了主意，但為了迎合俾斯麥的偏見，他莫須有地給索納曼貼上社會黨人的標簽 [[71]](#71_6)  。

布萊希羅德與柏林的幾家最重要的報紙關系特別密切，他的敵人相信他可以在任何恰當的時候在這些報紙上散布政治故事。他定期與自由派刊物《民族報》（National-Zeitung，伯恩哈德·沃爾夫所有）的斐迪南·薩羅門和弗里德里希·德恩堡（Freidrich Dernburg）交換消息。荷爾斯泰因曾建議赫伯特利用該報給布萊希羅德下套：“布萊希羅德知道令尊從來不讀Nat.Ztg［原文如此］，因此肆無忌憚地利用它。”簡而言之，《民族報》可以被用來削弱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的影響，據說后者稱其為“猶太人的報紙” [[72]](#72_6)  。

布萊希羅德與最重要的金融期刊聯系不斷，尤其是《柏林交易所通訊》和《法蘭克福交易所與貿易報》（Frankfurter Börsen-und Handelszeitung） [[73]](#73_6)  。這些報紙的編輯源源不斷地向他提供關于特定鐵路國有化的信息。布萊希羅德還和《柏林交易所報》（Berliner Börsen-Zeitung）特別親密，該報編輯基里施·馮·霍恩（Killisch von Horn）是經驗豐富的股市記者。（當時的一位反猶主義者評價霍恩說：“他的能力和成就超過所有的同行，盡管他并非猶太人，完全是德國血統。” [[74]](#74_6)  ）1877年，在基里施最早的某封書信中，他承諾為布萊希羅德的投資刊發有利報道，同時詢問是否可以馬上見面：“因為我知道您在過去幾天里就柏林—什切青鐵路事宜與商務部長進行了交談，我希望您能指示我在這件事上怎么做最好。” [[75]](#75_6)  不清楚他把自己視作編輯還是投機者：他兩者都是，布萊希羅德關于一條重要鐵路國有化前景的秘密消息顯然令他非常感興趣。兩年后，基里施投機另一條鐵路的股票成功，在四天內就實現收益 [[76]](#76_6)  。難怪他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總是以“最尊敬的施惠者”開頭。

但與記者們的關系即使再好也存在局限—市場上的強大競爭者同樣可以堅持自己的要求。確保在第四等級中獲得權力的最佳方法是擁有一家報紙，就像其他銀行家那樣。比如，布萊希羅德的合作者（有時也是對手）貼現公司就分別從沃爾夫和破產的施特魯斯貝格手中購買《民族報》和《郵報》（Die Post）；敏感的德國傳記作者沒有在漢澤曼傳記中提到他與報紙的聯系。19世紀80年代，銀行直接擁有報紙的做法開始式微 [[77]](#77_6)   [9](#9_19)  。

布萊希羅德在職業生涯中多次考慮過購買一家報紙。1870年，就在普法戰爭爆發前，威廉·貝措爾德（Wilhelm Betzold）—這個聰明的人是猶太后裔，早年有過冒險經歷—建議布萊希羅德和他一起創辦國際金融期刊；貝措爾德的雇主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樣對此感興趣 [[78]](#78_6)  。布萊希羅德還想過購買《科隆報》，并出手拯救曾經興旺的奧格斯堡《大眾報》（Allgemeine Zeitung），讓它以周刊的形式在慕尼黑延續下去。俾斯麥有時會在該報的專欄里安插故事 [[79]](#79_6)  。

布萊希羅德與《北德大眾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關系最為重要。該報由脾氣火爆的德國民主派奧古斯特·勃拉斯（August Brass）創建于1861年，此人參加過1848年的街戰，隨后開始流亡。勃拉斯的首席助手威廉·李卜克內西是民主社會黨人。一年后，俾斯麥就任首相，《北德大眾報》成了他最喜歡的喉舌。勃拉斯出于信念站在俾斯麥那邊，我們沒有記錄顯示出他的轉變有其他原因。俾斯麥的助手中充斥著與其合作的前革命者，這是抑制歐洲革命火焰的方法之一。俾斯麥甚至想過收買卡爾·馬克思。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的知識分子更加左傾。俾斯麥確信，他可以讓這些人為自己所用；如果在此過程中能削弱他的敵人，那就更好了。

1872年，勃拉斯以30萬塔勒的價格將《北德大眾報》出售給奧倫多夫兄弟（Ohlendorff） [10](#10_19)  和北德銀行（由俾斯麥的朋友戈德弗洛伊［Godeffroy］參議員擔任行長）組成的漢堡財團。埃米爾·品特（Emil Pindter）成了新任編輯，此人同樣有動蕩的過去，并流亡多年 [[80]](#80_6)  。成為編輯時，品特已經完全馴服，主要關心頭銜和勛章 [[81]](#81_6)  。

該報成了俾斯麥的喉舌，他不斷在專欄里安插故事 [11](#11_19)  。

品特是布萊希羅德和文策爾的朋友，也是俾斯麥聽話的工具。俾斯麥家族利用該報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安插自己的故事—在1878年和1879年的選戰中，這類故事變得特別頻繁和惡毒。作為俾斯麥行動方式的典型例子，他通過赫伯特對蘭曹下達指示：

此外，你應該召見品特，為那篇反對貝尼格森的文章狠狠訓斥他；千萬不要說貝尼格森壞話，那篇文章讓我父親非常不高興，如果對貝尼格森的攻擊不停止，他會向報紙的所有者抱怨編輯們。反過來，他沒有看到任何對弗肯貝克（Forckenbeck） [12](#12_17)  的攻擊，這類攻擊越尖刻或越頻繁越好。 [[82]](#82_6)

我們也可以把弗肯貝克的名字換成拉斯克、里希特或任何左翼自由派領導人。俾斯麥無疑希望品特配合自己的尖刻基調。俾斯麥下臺后，品特轉而為新統治者效勞，開始攻擊前首相 [[83]](#83_6)  。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偶爾會給品特下達矛盾的指示。1880年5月，該報刊登批評猶太人的故事，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們馬上懷疑俾斯麥是授意者。布萊希羅德向他們保證，這個故事會很快被遺忘。但幾個月后，他又堅持讓品特發文警告德國的“反動幽靈” [[84]](#84_6)  。俾斯麥也借此機會對反動的普特卡默部長解釋說，“在猶太人問題上……不應該認為富有的猶太人和我們一起對新聞界施加巨大影響。巴黎的情況也許有所不同”。他表示，在新聞界惹麻煩的是沒有財產的猶太人 [[85]](#85_6)  。第十八章對俾斯麥在該問題上的總體表態做了討論。

同年，布萊希羅德曾幾乎差不多就買下了《北德大眾報》。奧倫多夫為報紙的一半所有權開價40萬馬克，但要求保留選擇權，因為品特也希望購買該報，而奧倫多夫不愿賣給他。布萊希羅德回復稱，如果俾斯麥批準改變該報的策略，他就接受條件—該報不能再攻擊某些人（布萊希羅德指的也許是拉斯克），也不能再偏向反猶運動。令布萊希羅德吃驚的是，奧倫多夫馬上直接與他接洽此事。俾斯麥批準布萊希羅德的愿望，還“……憤怒地否認他參與日漸減少的［反猶］事件，就像他經常被指責的那樣”。蒂德曼進一步向布萊希羅德做了保證，但談判仍然失敗。1894年，布萊希羅德再次計劃收購，不過還是放棄了 [[86]](#86_6)  。

布萊希羅德與品特的關系中有些奇怪的特點。他們合作密切，有許多共同的合作者，為同一個主人服務。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他們相互幫助和彼此見面，品特經常對樂善好施的布萊希羅德表達熱烈的感情。但在兩人背后，情況并非如此。布萊希羅德愿意在不與品特協商的情況下商談收購他的報紙，而在私人日記中和荷爾斯泰因這樣有同感的聽眾面前，品特透露了他對布萊希羅德令人困惑的鄙視。

新聞界是一個粗暴和充滿競爭的世界。布萊希羅德在其中表現良好。一部分媒體攻擊和污蔑他，但更多有口碑的報紙無法忽視他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它們向他施惠，也得到他的回報。我們將看到，在俾斯麥統治的最后十五年里，布萊希羅德與媒體關系惡化。他常常成為懷疑對象，更重要的是，他的金融計劃出于政治理由而受到攻擊。他不得不做出新的秘密安排。隨著俾斯麥命星的黯淡，布萊希羅德也走向下坡路。

[1.](#1_22) 沃爾夫在這些談判中展現特殊的作用。1869年4月，他從巴黎給布萊希羅德發來密報，表示由于拿破侖的“巨大努力”，帝國當局將贏得選舉，但政府代表不會再“榮辱與共”地支持當局，“因此我對保持和平有信心”。俾斯麥也從沃爾夫通訊社收到私密報告。其中一些報告的基調讓他不安，他詢問了出處，獲悉它們來自親奧地利的巴黎記者埃米爾·蘭茨貝格博士。沃爾夫間接獲得此人的報告，將其轉送給少數幾個人，但沒有發布。沃爾夫致布萊希羅德，1869年4月26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4月27日，DZA：梅澤堡：A.A.I.Rep.4.Nr.721。

[2.](#2_22) 政府如何試圖通過收買外國報紙來影響或顛覆他國的完整故事也許永遠不會被公布。但即使不完全的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現這些政府的期待以及它們對特定個人和總體輿論的相對重要性的評價。一個不可靠的例子見拉法洛維奇，《新聞界骯臟的貪婪：根據俄國檔案（1897—1917）》（巴黎，1931年）［A.Raffalovitch，...L’Abominable Vénalitéde la Presse，D’Après les documents des archives russes（1897–1917）（Paris，1931）］。

[3.](#3_20) 布萊希羅德文件中最早的一封施萊辛格來信（顯然之前還有很多）感謝朋友送來的珍稀魚子醬：“雖然匿名送達，但除了全知的上帝，消息靈通的記者能揭露世上發生的一切善事與惡行。”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12月30日，BA。

[4.](#4_20) 即《梵蒂岡敕令與公民忠誠的關系》（The Vatican Decrees in their Bearing on Civil Allegiance），譴責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通過“教皇無謬誤論”。——譯注

[5.](#5_20) 顯然，施萊辛格在言語上開始表現得像是忠誠的俾斯麥派。他感謝布萊希羅德帶來關于首相健康的好消息，“今天，這比歐洲其他所有兩足動物的健康更寶貴（據我所知，對亞洲、非洲和美洲同樣如此）”。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5月9日，BA。

[6.](#6_20) 歐洲外交官們經常提及這個事實。比如，1869年，法國駐維也納大使抱怨說，當地新聞媒體掌握在猶太人手中，并表現出“反天主教和偽自由主義狂熱”，阻撓博伊斯特的親法政策，支持親德立場。引自昂利·貢塔米納，《外交或領事信件與國內歷史：以奧匈帝國為例（1867—1914）》，刊于《外交史評論》，1961年LXV期，第215—230頁［Henry Contamine，“Dépêches diplomatiques ou consulaires et histoire intérieure：L’Exemple de l’Autriche-Hongrie（1867–1914），”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LXV（1961），215–230］。

[7.](#7_20) 弗里德里希·黑貝爾（1813—1863），德國劇作家和詩人。——譯注

[8.](#8_20) 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ed Krupp，1812—1887），德國財閥和軍火商。——譯注

[9.](#9_18) 奇怪的是，不存在對資本與新聞媒體關系的嚴肅研究。就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兩者關系密切；強大、具批判性且獨立的新聞媒體緩慢的發展，必然令馬克思主義者感到觀點上的混亂，而且這發展也有助于解釋歐洲改良主義的興起。

[10.](#10_18) 阿爾伯特（1834—1894）和海因里希·奧倫多夫（1836—1928）兄弟，漢堡商人，是19世紀下半葉德國最大的海鳥糞進口商。——譯注

[11.](#11_18) 1880年11月，應巴黎的要求，圣瓦里耶報告了德國政府對新聞界的控制。他寫道，俾斯麥掌控著一切，這種壟斷符合德國憲法的奇特性質和首相的政治脾性。這種安排“與‘爬行動物基金有關’，該秘密基金供首相獨家和不受控制地使用。他因此擁有總能發揮效果的強有力工具”。對于哪些報紙愿意接受俾斯麥的故事，圣瓦里耶回答說，列出不愿意的報紙更方便，比如社會黨人和天主教報紙，但后者有時也和所有人一樣，愿意“接受爬行動物基金，迎合全能首長的觀點”。《北德大眾報》一直“最忠誠地”表達他的想法。圣瓦里耶致奧拉斯·德·舒瓦瑟爾伯爵（Comte Horace de Choiseul），1880年11月16日，MAE：CP：德國。

[12.](#12_16) 馬克斯·馮·弗肯貝克（Max von Forckenbeck，1821—1892），德國律師和政治家，民族自由黨的創始人之一。——譯注

## 第十二章　發財的親王

俾斯麥是有史以來最輕視原則的人……他是天才、國家的救世主和感傷的叛徒。他總是以我為尊，當事態不再如意時，他就開始哀嘆忘恩負義和愛哭鼻子的北方德國人的多愁善感。當我覺得俾斯麥是神意的工具時，我向他鞠躬致意；當他只是他本人，是容克貴族、護堤員和謀利者時，我覺得他完全不值得同情。

此人既是超人也是狡猾的逃避者，既是國家奠基者也是馬棚逃稅者，既是英雄也愛哭鼻子，黃油在他嘴里不會融化，我對他充滿復雜的感情，無法對他表達任何純粹的贊美。

——特奧多爾·馮塔納致女兒，1894年1月29日和1895年4月1日（俾斯麥的80歲壽辰）

1871年夏，俾斯麥似乎登上事業和財富的巔峰。作為國家英雄，他即將成為歐洲的仲裁者。他推翻許多國王和一位皇帝，摧毀舊國家，締造新國家。自拿破侖以來，還沒有哪個人對歐洲的生活產生如此革命性的沖擊—而且他還成功扮演保守主義壁壘的角色。

和失敗一樣，成功也有代價。1871年后，當俾斯麥知道大事已經辦完時，他開始感到痛苦。和其他凡人一樣，他開始擔心個人事務，擔心健康、財富和職業的快樂。與其他凡人類似（甚至更加嚴重），他的各種焦慮相互疊加，對他的強健體格構成威脅。但與普通人不同，權力長期以來一直是俾斯麥的鴉片，緩解他的痛苦，減輕他過分的自憐。他逐漸習慣于權力這種鴉片，但當他的權力成為日常，不再令人興奮和帶來光榮時，效果就大打折扣。早年，他熱衷于不確定的游戲，結果對他而言倒是次要的。

即使在這個金錢的世界里，他也害怕勝利的代價將是高昂的。1871年3月，威廉致信俾斯麥，表示希望讓他晉爵為親王。俾斯麥最初的想法（如果我們相信他的回憶錄）是這種榮譽超出他的收入水平。他記得“哈登貝格（Hardenberg）和布呂歇爾（Blücher）這樣入不敷出的親王”，擔心自己的兒子們也會像他們的子嗣一樣無法保住頭銜。（1814年，布呂歇爾被封為親王，并獲得巨額獎賞；隨后的幾年間，他因為賭博把獎賞揮霍一空，而且欠債越來越多。俾斯麥聯想到這個例子令人奇怪 [1](#1_25)  。）無論如何，當俾斯麥當面向國王提出拒絕時，國王眼淚汪汪地抱住他—俾斯麥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此我始終覺得，作為伯爵，即使不令人生厭地顯擺也能過得很好，但作為親王，如果想避免這樣的顯擺，他一定要有錢。” [[1]](#1_54)  讓俾斯麥在財務上成為受人尊敬的親王是布萊希羅德的任務。

國王還給了俾斯麥另一份禮物：古老的薩克森瓦爾德（Sachsenwald），位于勞恩堡公國的漢堡附近。這片國有領地當時價值100萬塔勒，包括15625英畝森林和1250英畝以草地為主的土地。這份新禮物后來被稱作弗里德里希斯魯（Friedrichsruh），它讓俾斯麥成為德國最大的地主之一（到了他的孫輩仍然如此）。1976年，弗里德里希斯魯周圍的俾斯麥莊園估計仍達17290英畝。但最初，新莊園讓俾斯麥付出額外的錢。莊園沒有合適的宅邸，“如果不想生活在原始森林中鬧鬼的獵人木屋里，只有一處地方可以安身”，但那里已經被出售。布萊希羅德以4%的利息借給他87500塔勒，用于修繕那片土地 [[2]](#2_54)  。同樣在1871年，布萊希羅德“不計入［我的］銀行賬戶，從［我的］私人基金中”借給俾斯麥25000塔勒，但沒有透露用途。貸款在十三年后才被償還 [[3]](#3_52)  。

在外人眼中，新親王看上去絕對幸運。甚至他的哥哥也認為他幸運，享盡“塵世之樂”（Erdenglück）。為此，俾斯麥克服“對墨水的恐懼”（Tintenscheu）—他曾是個多產和無與倫比的書信作者，因為工作和內心的憤世嫉俗而變得沉默—致信糾正兄長的說法。在一封表面上為兄長賀壽的信中，他寫道：“我在處理公事上很幸運，在個人冒險上就不太走運了……對國家而言，擁有這樣的首相要比相反的情況更好。我在個人財務上沒有運氣，也許還缺乏才能，無論如何我沒有時間親自關心這些事。”他抱怨說，伐爾岑在燒錢，即使新近獲贈的薩克森瓦爾德目前也只出不進，盡管未來應該能帶來每年3萬塔勒的收益。現在，他不得不靠薪水生活，并出租舍恩豪森。他認為自己是一個貧窮而疲倦的親王，再無體力承擔精神上的負擔；此外，他還拒絕平日里收到的借取或饋贈數千塔勒的請求 [[4]](#4_52)  。俾斯麥夸大自己的煩惱，也許是為了遏制兄弟的嫉妒苗頭。

整個1871年，他無疑特別擔心自己的財務狀況。也許沒有什么比100萬塔勒的獎賞和親王的昂貴榮耀更讓人念念不忘自己的財富了。也許他遺憾沒有更多時間管理財富，但他還是花大量時間關心個人事項和賬戶的細節。有時，他的一絲不茍到了小氣的程度，不過他的關心重點時而有誤，因此他在打理財務事項時有點“小錢精明，大錢糊涂”。約翰娜同樣“一門心思地關心莊園的經濟狀況” [[5]](#5_52)  。

1871年，俾斯麥又有了一個為財務狀況擔心和煩惱的理由。1870年12月，當他在法國為新德國奮戰時，普魯士收入稅委員會大膽地將他歸入收入更高的第19級（年收入約為3.2萬到4萬塔勒），而不是第18級（2.4萬到3.2萬塔勒）—1871年德國的年人均收入是116塔勒。1871年3月，約翰娜提出抗議。7月，在科伊德爾的幫助下，俾斯麥起草多份抗辯書，結論是他甚至不應該被留在第18級—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抗辯書姍姍來遲，但俾斯麥解釋說：“前些年，國事讓我無暇顧及自己的事。” [[6]](#6_50)

俾斯麥與稅務機構較勁的文件提供了關于他的財富和政治立場的某些線索。科斯林（Köslin）縣的官方稅務評估詳細描繪了伐爾岑和附近兩處較小莊園的狀況。伐爾岑本身占地5752英畝，其中4000英畝為森林；另兩處莊園占地8062英畝。根據俾斯麥的估算，1870年這些莊園的收入為15286塔勒，包括一家磚廠和一家石灰廠。他還擁有舍恩豪森莊園，占地856英畝；稅收委員會把他在1868年就賣掉的克尼普霍夫莊園也計算在內，俾斯麥對此勃然大怒：“這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委員會對他的伐爾岑宅邸公允價值的估算也讓他憤怒：“租金被定為500塔勒同樣武斷。我不相信有租客能張羅到50塔勒。我可以按照這個價格租給委員會；另一方面，支付給各類工匠，用于維護這幢快要散架房子的開支超過500塔勒，賬單可以作證。”在下一份憤怒的備忘錄中，俾斯麥又對500塔勒的租金做了補充：“能想出這個數字，你們一定是不熟悉鄉下狀況的城里人……委員會似乎認為波拉諾夫（Pollnower）地區是尋開心的游客們夏天的度假地！”在類似的犀利言詞和花招的幫助下，俾斯麥宣稱他的應納稅收入—包括1.2萬塔勒的薪水，4000塔勒的勞恩堡公爵補貼（1872年將終止）和威廉街上的免租金宅邸（估價2000塔勒）—應為2.45萬塔勒，而不是估算的3.2萬，盡管他補充說，莊園的收入未來有望增加。

科伊德爾征求了司法公務員迪特里希博士（Dr.C.Dietrici）的建議。在仔細查看了俾斯麥的抗議書草稿后，他提醒說，如果將伐爾岑的凈收入估算為4533塔勒，那么最初為該莊園花費的40萬塔勒皇家獎賞（不包括俾斯麥追加投入的10萬塔勒）的回報率只有1.12%。這樣的話，他的總收入將剛剛超過第16級，也就是他在1865年已經接受的水平！他還詢問了親王是否持有任何“計息投資”，俾斯麥用鉛筆在旁邊標注“沒有”以示否認。（但若非“計息投資”，布萊希羅德為他持有的證券又算什么呢？）

迪特里希警告說，不要讓稅務委員會覺得太難以置信。1871年10月，委員會接受俾斯麥的申訴，將他重新歸入第18級 [[7]](#7_50)  。不過，降低等級的好運只持續幾年。1876年，他被歸入更高等級。1877年，在以馬克計量的更精細體系下，他被歸入第31級，估算收入為20.4萬到24萬馬克，應納稅6120馬克 [[8]](#8_50)  （此外，根據個人稅稅率，他還被征收更高的市鎮稅）。1880年，俾斯麥再次對稅務部門提出挑戰，結果直到1890年他仍然屬于第31級。納稅普遍不受歡迎，但對貴族而言（不僅在德國），抗稅被認為是反抗官僚暴政的崇高舉動 [2](#2_25)  。

俾斯麥與稅務部門的斗爭得到布萊希羅德的幫助，就像后者曾經幫助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魯的新莊園購置合適的宅邸。布萊希羅德的服務形形色色而且一絲不茍，總是受人歡迎。俾斯麥變得越富有，他的利益就越多元化，對金錢也越加關心。無論在政治危機中還是在度假時，無論在柏林還是在自家莊園，無論患病還是健康時，俾斯麥無時無地不加強對自己財富的管理。因此，1871年后，布萊希羅德的角色變得比之前更加重要。

在1877年的一次審判中，布萊希羅德描繪了自己的責任：

十五年前，當俾斯麥親王獲得普魯士首相的任命時，他委托我掌管他的全部財務事項。我將打理他的所有收入和開支，買入和賣出他的土地和證券。親王指示說，在投資選擇上，我應該更多考慮基本的安全而非收益。 [[9]](#9_48)

此外，布萊希羅德還要管理抵押貸款，和麻煩的承租人打交道，推銷俾斯麥莊園的主要產品—木材，并處理其他瑣事。他還是俾斯麥家的日常銀行家。對布萊希羅德而言，這種承諾很耗時間。他和下屬們不斷提供一絲不茍的服務，但沒有直接的金錢報酬。俾斯麥有充分的理由感激布萊希羅德的付出，盡管19世紀70和80年代日益流行的關于俾斯麥通過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獲得不法或巨額收益的影射并無根據。俾斯麥痛恨這些攻擊，將它們歸咎于昔日容克朋友們的嫉妒—他認為，這些人都希望能像他一樣擁有聰明的猶太人銀行家。

在整個帝國，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及其家人和下屬圈子關系最為密切。當俾斯麥在柏林時，布萊希羅德頻頻與他見面；他可以馬上得到接見。布萊希羅德經常造訪伐爾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魯，而且從不隱瞞自己的行蹤。當俾斯麥因為養病長期不在柏林時，他和布萊希羅德會定時通信，有時直接寫給對方，有時則通過他的妻子、兒子赫伯特和威廉、女婿蘭曹伯爵或歷任秘書。在秘書中間，布萊希羅德與羅騰堡和蒂德曼建立了特別友好的關系，盡管兩人都不如當年的科伊德爾和他那么親近。

俾斯麥別無選擇，不得不關心自己的額外收入。他的6.3萬馬克年薪（包括勞恩堡的補貼）只夠生活成本的三分之一，即使免租金的首相府也幫不上多少忙。俾斯麥自認為生活儉樸，但國家甚至無法提供必需品。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來確保額外收入能夠充裕地滿足他的需求。在此過程中，他奉行一句古老的德國諺語，并曾在帝國議會引用過它：“商業世界沒有情感。” [[10]](#10_47)

事實上，俾斯麥從政府獲得的現金收入很少超過每年5.3萬馬克。政府以各種稅收的名義扣去0.9萬到1萬馬克，并向他收取生活享樂品的費用，特別是魚子醬、法國葡萄酒和陳年波特酒，這些從國外訂購的東西經常由當地德國使館墊付 [3](#3_23)  。俾斯麥家生活考究，經常有娛樂活動，盡管總是并不昂貴。俾斯麥的官邸相當樸素（有人覺得寒酸），令客人們激動的不是美食，而是他本人在場。他對食物和美酒的奢侈消費廣為人知，但他不愿接受把有限的錢花在其他用途上的建議：“喜歡粉飾門面的人對食物不感興趣，最重要的是吃得好。” [[11]](#11_47)

但俾斯麥關心家人。他的兒子們時而收到補助和禮物。1879年，他命令布萊希羅德每季度匯給剛剛成為他女婿的蘭曹伯爵3000馬克，這也許是分期付款的嫁妝或者對蘭曹秘書工作的酬勞。

喜歡說長道短的柏林人知道，俾斯麥的花銷遠遠超過國家給他的薪俸，許多人聲稱布萊希羅德是首相財富的秘密來源。這個猶太人的詭計據說為俾斯麥帶來巨額收益 [4](#4_23)  。人們廣泛傳說，俾斯麥利用自己無與倫比的消息在股市牟取暴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如果有人在股市中的預感能夠經常成為“自我應驗的預言”，那人就應該是俾斯麥。難怪嫉妒這兩人的敵人們編造了荒謬的故事。然而，此前一直撲朔迷離的真相平淡無奇。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性格讓他們選擇保守的投資組合，讓今天所有“增長導向”的金融家大吃一驚。

無論如何，俾斯麥的大部分財富是土地，很大一部分是他政治辛勞的成果。他的大部分額外收入來自莊園。但這種收入有波動，因為它受到意外的影響，如租戶的效率、木材市場的狀況和修繕支出。大多數年份，他實現盈利，但利潤每年都在變化，而且需要不斷關注。德國歷史學家們荒謬地認為，俾斯麥對生活的這個方面漠不關心，或者忽視對私人事項的打理擴展了他的經濟視野。下面是至今為止對俾斯麥乃至任何近代政客財務狀況的最翔實描繪。

俾斯麥的資本投資是布萊希羅德的專屬領域；他全權負責俾斯麥的投資，但很少私自動用它們。在變更親王的投資組合前，布萊希羅德幾乎都要請示前者。他們的通信中充滿布萊希羅德對未來操作的具體建議，或者“按照閣下指示”完成交易的報告。有幾次，動議無疑來自俾斯麥。對于布萊希羅德的詢問和建議，俾斯麥總會做出回應。請示俾斯麥無疑對布萊希羅德有利：這位銀行家既獲得無與倫比的情報，又預先為他可能犯下的任何錯誤找好借口。

他們共同設計旨在將最大安全性和最高收益相結合的投資組合。俾斯麥沒有參與19世紀70年代初任何重大的公司創立活動，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布萊希羅德試圖讓他參與其中。俾斯麥的賬戶中從來沒有勞拉舍或希波尼亞的股票；因此，他錯過讓哈茨菲爾特和卡多夫受益的意外之財，但也躲過后來市場崩潰的影響。19世紀70年代（并斷斷續續地延續至今），人們指控布萊希羅德通過普魯士土地信貸公司為俾斯麥實現巨額賬面收益。布萊希羅德發誓否認這種指控，他的檔案中也找不到任何東西暗示該說法的真實性 [[12]](#12_45)  。對俾斯麥來說，布萊希羅德更愿意以優惠的發行價或趁著價格低得不合理時購買安全的證券。因此，如果能夠獲得購入價格的1或1.5個百分點的收益，布萊希羅德就會滿意，哪怕收益需要幾年才能實現。有時他做得更好，在幾個月里獲得5到10個百分點的收益。對俾斯麥賬戶的粗略估計顯示，無論市場狀況如何，布萊希羅德在大多數年份里獲得4%的資本利得。

盡管有各種需要，俾斯麥還是試圖盡可能多地將資本利得和利息重新投資。因此，他的資產從1871年的125864塔勒（約合37.7萬馬克）增加到1880年的56萬馬克—1890年達到120萬馬克 [[13]](#13_41)  。19世紀80年代，他為部分地產建立信托基金，還把錢轉到約翰娜和赫伯特名下。

由于這些特殊賬戶，由于布萊希羅德的一些結算單已佚，很難重現他的投資全貌。但列出主要門類應該就夠了。1871年，俾斯麥超過70%的投資是俄國證券，近4.9萬塔勒用于購買俄國抵押債券。布萊希羅德在幾個月前以4.15萬塔勒的發行價買下這些債券—從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他就是柏林市場上俄國證券的主要來源。這樣的快速升值并不常見。另外的4.2萬塔勒被投入1871年的英俄公債和庫爾斯克—哈爾科夫鐵路（Khursk-Kharkov Railroad）債券。在國內證券上，他持有少量普魯士國債和價值2.86萬塔勒、收益率為4.5%的貝爾吉施—馬基施鐵路（Bergisch-Märkisch Railroad）優先股。1871年下半年，這些投資帶來3360塔勒的收益，或5.3%的年收益率 [[14]](#14_41)  。

盡管奠基之年提供大量機會，布萊希羅德還是堅持投資收益率為4到5個百分點的德國和歐洲證券，不過俄國股票的回報要高于名義上的4到5個百分點。俾斯麥以5到8個百分點的收益賣掉他的美國證券 [[15]](#15_39)  。

俾斯麥的外國投資總是令人非常感興趣的話題，因為人們認為他可能有意在這個他最喜歡的領域投機。早年他的確這樣做過。1872年，也就是柏林舉行三帝會議的那年，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購入近8.5萬塔勒的奧地利證券 [[16]](#16_39)  。政策和投資組合在那個點上出現巧合。奧地利的經濟已經從過去二十年的破壞中恢復，但繁榮是短暫的，布萊希羅德購買這些證券的時機并不好。1873年5月發生著名的維也納股市崩潰，沖擊波影響到歐洲各國的經濟 [[17]](#17_33)  。6月10日，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會面。第二天，這些奧地利證券被出售，獲利300塔勒。

六周后，布萊希羅德從馬林巴德給俾斯麥寫了長信，報告總體形勢：

被通稱為維也納崩潰（Krach）的奧地利金融動蕩源于過度投機……股市中的聰明人幾周前還相信災難即將結束，但現在他們都同意這只是末日的開始。投機熱已經發展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影響首都和外省的所有社會群體……

他還表示，奧地利崩潰也將影響德國市場，盡管兩者發展模式不同，德國也存在過度投機：

特別是房地產；如果可以，我將不客氣地指出，[這里的]人行事有點不誠實，盡管必須強調，與維也納相比，作為德國首都的柏林有望實現快速和大幅增長。但土地、房屋和租金價格上升如此之快，下調將不可避免。這可能帶來痛苦的損失，特別是那些被迫變現的社會成員。 [[18]](#18_33)

1874年8月，俾斯麥從伐爾岑寫來親筆信，作出一些不同尋常的指示：

[幾周前]我離開時，你談到出售我的俄國證券，并建議推遲購買同種證券。現在我請你如此行事，但不用著急，只是因為市場價格看起來合適這樣做。我想拋掉[全部]俄國證券……但就像我剛才說的，不用過分著急。操作完成后，我們也許可以考慮投資抵押債券。鑒于你的承諾，等你來訪時我們再詳談。不過，不必等到那時開始操作。 [[19]](#19_29)

三天后，布萊希羅德以9.85萬塔勒賣掉所有的俄國證券—比成本高了差不多1.3萬塔勒 [[20]](#20_29)  。俾斯麥并不急需現金，布萊希羅德對突然變現感到不安，于是直截了當地詢問俾斯麥是否擔心政治動蕩。他收到不太肯定的回復：

類似你向我提出的關于政治形勢判斷的問題永遠不好回答；我可以提醒你，直到1870年6月，形勢還非常風平浪靜。無論如何，今天我看不到任何對和平的威脅，特別是來自你提到的那個國家。如果我希望改變自己的投資，那并非因為我擔心和平受到威脅，而是因為我覺得那些債券的價格已經夠高，因為我覺得下跌時很難做出拋售決定。 [[21]](#21_29)

俾斯麥明白投資心理，知道市場操作和高層政策一樣，時機意味著一切。

三年后，俄土戰爭爆發，俄國證券大幅下跌。俾斯麥曾吹噓說，布萊希羅德稱贊他早早套現，并宣稱他的理由很簡單：1874年，當他聽說彼得·舒瓦洛夫伯爵（Count Peter Shuvalov）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時，他想：“如果在這種時候，俄國人送走他們中最聰明的人，那么我們可以十拿九穩地認為，他們即將干出蠢事。因此是時候賣掉俄國國債了。”他記得，第二天早上，他通過電報向布萊希羅德下達指示 [[22]](#22_29)  。與三年后的詩意回顧相比，他在1874年的先見平淡無奇：俾斯麥并非在舒瓦洛夫被調離后第二天，而是三個月后才賣掉債券。此外，舒瓦洛夫在倫敦取得巨大成功，但他之前擔任警察三處（負責行政和安全）的處長，在外交政策上很少有機會發表決定性的言論 [[23]](#23_29)  。

俄國證券甚至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下跌。約翰娜、赫伯特和女仆熱妮·法提奧沒有賣掉他們持有的俄國證券，1875年秋天，兩個女人對手里俄國證券的下跌懊喪不已 [[24]](#24_27)  。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通知赫伯特，他已經推遲重新購買俄國證券的計劃，“因為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的動蕩令人擔心”對俄國的投資 [[25]](#25_27)  。顯然，政治情報會影響市場。

后來，俾斯麥宣稱他在1874年后再沒買過任何外國證券，表示“這些東西蒙蔽了外交部長的眼睛，實在不該購買” [[26]](#26_25)  。事實上，他在1885年6月忘記這條克己原則，指示布萊希羅德將20萬馬克投入最新的英俄公債。反諷的是，購買俄國債券的錢似乎來自一個特別賬戶，里面是為了祝賀1885年4月俾斯麥70大壽而向公眾募集的國家基金 [[27]](#27_21)  。一周后，由于布萊希羅德對俄國政策提出警告，俾斯麥賣掉這些債券，沒有遭受損失 [[28]](#28_15)  。1889年，俾斯麥還投資大量埃及和墨西哥證券。

從1874年到1889年，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次例外，俾斯麥的錢都被投資于國內證券。投資主要包括三大類：政府債券，特別是普魯士統一公債，1877年后為德意志帝國公債（Reichsanleihe），收益率均為4%；抵押債券，大多來自與布萊希羅德關系最為密切的俄國抵押銀行；1876年到1884年間的各種鐵路股票。

到了1889年，俾斯麥的投資組合以政府債券為主，比如德意志帝國公債。從1889年到1890年，親王的投資發生最后一次重大變化。1889年夏天和秋天，他賣出部分帝國公債，買入25.1萬馬克的埃及債券和23.2萬馬克的墨西哥債券（利率為6%）。布萊希羅德在兩者中顯然都有特殊利益。有史以來，俾斯麥資本的最大一筆交易發生在1890年3月8日到14日之間。當時他正身處自己最后的危機，為了政治生命與年輕的皇帝展開較量，但敗下陣來。那個星期里，他變現75萬馬克的政府債券，將其中近一半投入埃及債券 [[29]](#29_15)   [5](#5_23)  。當時他正準備向帝國議會提交注定將被否決的挑釁性軍隊法案，這次變現是否與此有關呢 [[30]](#30_11)  ？俾斯麥是否像人們常常宣稱的那樣在考慮發動政變，導致帝國解體和國債下跌？或者說，這更可能是俾斯麥最后的投機—投機對象是他本人的下臺？他是否認為，趕走最能干之人的帝國將很快在政治上做出蠢事，就像他很久以前對舒瓦洛夫事件的斷言？他的確認為“皇帝讓自己最好的將軍［卡普里維（Caprivi）］當首相，讓最好的首相當陸軍元帥，這非常奇怪” [[31]](#31_11)  。這次，他在三點上都猜對了：他被罷免后，市場出現短暫但劇烈的下跌 [6](#6_23)  ；埃及債券繼續上漲；帝國的確踏上權力不受限制和犯蠢的新道路。

他最后的投機成功了。1890年6月，在布萊希羅德的建議下，俾斯麥出售持有的埃及債券，獲利3.3萬馬克，或者說在三個月和九個月里分別實現5%的收益 [[32]](#32_11)  。1891年7月，親王詢問拋售持有的墨西哥債券是否明智，他聽說墨西哥正處于巨大投機性繁榮的陣痛中；也許他覺得人生有過一次從“奠基時代”中幸存下來的經歷已經足夠 [[33]](#33_11)  。布萊希羅德的墨西哥冒險讓俾斯麥賺到了錢。

現存最晚的俾斯麥證券對賬單的日期是1890年12月31日，顯示的投資組合價值為1215831馬克，或者說相當于那時的30萬美元。如果不是之前轉給赫伯特數十萬和轉給約翰娜30萬馬克，總額應該還要更大。此外，俾斯麥在其他賬戶中也存有巨款，有的是與幾處莊園相關的信托基金。他還用為他70大壽而募集的基金購買了一些證券，利息被他用于各種慈善活動。當1893年2月布萊希羅德去世時（據說他此時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他把自己最中意的客戶的事務打理得井井有條，財富總價值達好幾百萬。

俾斯麥不是柏林人，不喜歡大都市的生活。（他曾對帝國的議員們說：“我更愿意生活在鄉下，而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盡管你們很有魅力。” [[34]](#34_11)  ）他也不是安于莊園生活的容克地主，視野不超過最近教堂的尖頂或者對下次收成的預期。事實上，俾斯麥需要他的多種生活：他需要莊園的平靜，讓自己從柏林的斗爭中恢復過來。僅有柏林的都市生活會要了他的命，但純粹的田園生活會讓他無聊死。

沒有哪個近代政客像俾斯麥那樣長時間地離開首都和職守。伐爾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魯成了另兩個首相府，但沒有任命、會議和演講，只有一兩位受到信任的秘書。弗里德里希斯魯至少還比較容易到達，但從柏林前往伐爾岑要經過一天的車馬勞頓 [[35]](#35_11)  。即使在他最喜愛的環境中，他也從未徹底與政治隔絕。在某個無憂無慮的時刻—讓人聯想起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他對女兒說：“甚至在這里，政治也不讓我徹底安寧……但由于這里沒有人幫倒忙，歐洲總是在早餐的十或十五分鐘里得到打理和被梳洗。” [[36]](#36_11)  在帝國早年，他有時一連幾個月住在伐爾岑；后來，他轉而偏愛弗里德里希斯魯，并在1895年永遠退居那里。

1871年后，俾斯麥擁有三處大莊園：柏林西面的舍恩豪森；位于波美拉尼亞，距離波羅的海不遠的伐爾岑；漢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魯（也有人用舊名薩克森瓦爾德稱呼它）。三處莊園共占地約4萬英畝，投資至少500萬到600萬馬克。擴大后的伐爾岑占地約2萬英畝，包括七處相鄰的莊園。弗里德里希斯魯占地近1.7萬英畝 [[37]](#37_11)  。伐爾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魯的房屋較為原始，但擁有龐大而壯麗的森林，其間生活著大量野獸。廣闊的薩克森瓦爾德出產優質木材，能夠帶來可觀的收入。俾斯麥擁有德國最大的未被砍伐林地，因此對尋找和維護國內外市場的問題有直接了解。

俾斯麥愛這些莊園，認為地主身份擁有其他生活方式所不具備的特殊美德和崇高。俾斯麥的標準傳記（特別是德國人所寫的）動人地描繪他對自然的愛、對樹木的熱情、與農夫們快樂（有時不太快樂）的領主關系—或者說與莊園相關的一切，但不包括管理。有的傳記提到俾斯麥自詡對土地懷有饑渴之感，提到他每天晚上看到鄰居土地時想要把它們吞并的強烈欲望，但很少有傳記承認他對龐大地產的運營傾注的無盡關心 [[38]](#38_11)  。

布萊希羅德知道管理這些莊園多么復雜。事實上，他覺得比起幫助這些莊園盈利，投資俾斯麥的錢更容易。布萊希羅德負責處理新購置土地的法律和財務事項，掌管著與限定繼承的莊園相關的幾處賬戶，收取和支出來自莊園的資金，與麻煩的租戶談判，還要監督管家。（1867年，恩斯特·威斯特法爾［Ernst Westphal］被任命為伐爾岑的護林員長，兩年后受命全權管理莊園 [[39]](#39_11)  。幾年后，彼得·朗格［Peter Lange］受命在弗里德里希斯魯扮演類似的角色—兩人都不斷和布萊希羅德保持接觸。）

由于俾斯麥并不從事傳統農業，布萊希羅德的幫助顯得更加重要和適當。俾斯麥的收入并不依靠種植糧食和養牛，而是來自木材銷售和莊園里開辦的制造企業。這是正確的選擇，因為1870年后，海外競爭導致谷價逐步下跌。他還認為這個選擇有利于國家：他曾在帝國議會表示，產業工人的背包里放著元帥的指揮棒；農業工人沒有這種抱負，因此推動農村工業是有益的—還能減少對外移民 [[40]](#40_11)  。

早在1871年，布萊希羅德就安排收購與薩克森瓦爾德毗鄰的兩處莊園：奧穆勒（Aumühle）和弗里德里希斯魯，這兩座農莊至今仍是俾斯麥家族產業的核心。親王對價格和交易的速度都很滿意 [[41]](#41_11)  。

布萊希羅德了解俾斯麥的貪得無厭，有時也提出購置建議。1873年11月（購入弗里德里希斯魯后僅兩年！）他致信俾斯麥，表示根據“可靠消息”，布魯門塔爾伯爵可能準備出售與伐爾岑毗鄰的雅諾維茨（Janowitz）莊園。“現在的開價是100萬塔勒，首付20萬塔勒。我不了解那處莊園，但我得到的信息暗示，布魯門塔爾伯爵會接受大幅砍價。”如果俾斯麥感興趣，布萊希羅德樂意協商。俾斯麥馬上親筆寫了四頁回信：“雅諾維茨莊園完全超過我的承受能力和需要，盡管我很樂意買下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伐木權爭議的影響，莊園現在價值60萬或70萬塔勒。“這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更希望還清債務。如果要買的話，我現在更想要霍洛夫，只需6萬塔勒現金，總成本為10萬塔勒。” [[42]](#42_11)

隨后幾年間，俾斯麥先后購入伐爾岑附近的老霍洛夫（Alt-Chorow）和新霍洛夫（Neu-Chorow） [7](#7_23)  。購置細節由布萊希羅德安排，包括結束和延長現有的抵押貸款 [[43]](#43_11)  。1882年，他又以26.4萬馬克買下舍寧施泰特（Schöningstedt）莊園。布萊希羅德再次為他提供利率為4%的抵押貸款，每年還需攤銷1%的本金 [[44]](#44_10)  。1883年底，布萊希羅德提交他所持有的俾斯麥抵押貸款完全清單，大多用于伐爾岑莊園。最初的成本為94.8萬塔勒，還有84.4萬塔勒未償還。利率為4%，大部分抵押貸款的攤銷率特別低。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提供100萬馬克的抵押貸款—能讓他這樣做的客戶寥寥無幾—因此俾斯麥無須變現其他資產就能購置新土地，這些投資的收益要高于抵押貸款的成本 [[45]](#45_10)  。

布萊希羅德開設和管理著幾個不同賬戶，分別被俾斯麥指定用于不同的莊園。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定長子繼承的施瓦岑貝克—薩克森瓦爾德莊園（Schwarzenbeck-Sachsenwald）。1872年8月，俾斯麥親筆致信布萊希羅德，要求開設該賬戶，并授意他將總價值4萬塔勒的特定證券轉入新賬戶：“如果你覺得合適，可以出售這些證券，所獲款項或新購買的證券仍然存入該賬戶。” [[46]](#46_10)  其他時候，他還開設和關閉類似賬戶，用于支付修繕、抵押貸款利息和偶爾的擴建。

俾斯麥關注自己廣泛利益的每個方面。他要求管理者和監督者們恪守節儉，并提供最翔實的信息：“我對自己一無所知的地產不感興趣，股票的收益率要高于地租。” [[47]](#47_10)  后來，約翰娜承擔更多責任，這讓赫伯特非常擔心：“雖然已經年老體衰，但她獨自打理著家中的一切—所有的書籍、賬單、與供應商的通信和與仆人的關系—一切都依靠她。” [[48]](#48_10)

布萊希羅德還要承擔無窮無盡的瑣事。但俾斯麥特別擔心時，他會委派布萊希羅德審計某處地產的賬簿。1880年，俾斯麥再次請他調查幾個賬戶：

感謝你承諾幫助審計與我的莊園相關的賬簿和開支。如果你現在能派人來伐爾岑幫忙，我愿意接受你的好意。在威斯特法爾管理下的那部分莊園—伐爾岑的森林和農場—運營良好。但對于里徹先生（Mr.Ritsch）管理的[毗鄰的]普迪格—米斯多夫（Puddiger-Misdow）農場……我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只是間接聽說為尚未收割的燕麥簽訂了5000馬克的預售合同。對于隨時可以從我這里拿到錢的人來說，這種交易奇怪而不經濟。如果你愿意遵照我的愿望，我將允許你全權調遣我的所有管理人員，但目前僅限普迪格—米斯多夫農場，因為我沒有收到那里的任何消息。我一直沒有等到你的造訪，但無論你何時來，我都會感到高興。恐怕我等不及身體完全康復就要返回柏林，因為我不得不對付那些讓我的工作變得更困難的[政治]反對者。我工作的額外成本超過額定要求，把我的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在信尾附言中補充說：“為了一視同仁，伐爾岑也應被審計，但先從普迪格開始。” [[49]](#49_10)

深受布萊希羅德信任的代理人西貝特調查了各處莊園并提交了詳細報告。俾斯麥后來對舍恩豪森的審查顯示，從1873年到1878年，親王在那里的支出超過收入27153馬克 [[50]](#50_10)  。朗格和威斯特法爾很可能討厭布萊希羅德的監督，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恭敬地合作。

1882年，朗格和布萊希羅德密切合作，為弗里德里希斯魯制定合適的保險計劃。1879年，俾斯麥終于在弗里德里希斯魯購買了可居住的房子—一座未經修繕的老客棧，房門外側還留有編號—并堅持要對房子和家具提供足夠的保險 [[51]](#51_10)  。他們隨之展開了冗長乏味的通信，布萊希羅德不僅要核對清單上將被投保的物件，還要四處尋找能為俾斯麥提供比之前條件更優厚的保險公司。俾斯麥親自評估所有物件，弗里德里希斯魯的房子和家具分別被投保12萬和8萬馬克。威廉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我父親］希望在為清單上所有物件定價時，確保總額正好是8萬馬克。他希望避免根據幸存物品來估算被火災燒毀的物品，因為這會大大減少賠償，甚至導致一無所得。” [[52]](#52_10)  在大多數方面，俾斯麥是個謹慎的容克貴族。

但并非總是如此。在與格奧爾格和莫里茨·貝倫德的關系中—他們經營的加工廠是伐爾岑收入的主要來源—俾斯麥既不走運也不謹慎。他與這兩人的關系始于1868年，一直延續到布萊希羅德去世后，給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帶來無盡的麻煩 [8](#8_23)  。貝倫德兄弟在距離伐爾岑12英里的科斯林擁有一家紙漿廠和造紙廠，他們是猶太人，盡管莫里茨決定“讓自己和家人接受洗禮；他的兒子恩斯特在馬炮兵部隊服役過一年，成了預備軍官，還在親王家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經常受邀和他們一起進餐” [[53]](#53_9)  。

1868年，俾斯麥買下伐爾岑附近被焚毀的福克斯磨坊（Fuchsmühle）。他在原址修建紙漿廠，用莊園里的木材制造紙張，并以4550塔勒一年的價格將其租給貝倫德兄弟。1870年4月，俾斯麥和貝倫德兄弟簽訂合同，修建并出租名為哈默磨坊（Hammermühle）的紙漿廠和造紙廠。后來又增加第三家工廠：坎普磨坊（Campmühle）。俾斯麥經常帶著訪客們參觀這些工廠，對它們的現代機械感到自豪—但只有他的密友知道承租人給他帶來多少曠日持久的麻煩 [9](#9_21)  。

布萊希羅德是知情者，因為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一次次試圖讓俾斯麥走出貪婪引起的輕信；但俾斯麥不顧他的警告，繼續向這些磨坊注資，而貝倫德兄弟總是處于違約的邊緣。第一次危機發生在1876年7月，貝倫德兄弟的合伙人小阿貝爾（W.Abel，Jr.）破產。布萊希羅德馬上警告當時身在巴德基辛根的俾斯麥，貝倫德兄弟也可能面臨破產，而且他們沒有按時支付7000馬克的福克斯磨坊半年租金。因此，他已經停止向貝倫德兄弟支付一切款項。俾斯麥很快從當事人那里聽說這場可能的災難：在他度假期間，格奧爾格·貝倫德現身向他求助。布萊希羅德建議俾斯麥萬分謹慎，現在應該放棄修建坎普磨坊的計劃 [[54]](#54_9)  。但赫伯特表示，俾斯麥愿意允許貝倫德兄弟延期還債，只要他的法務參謀德魯斯司法顧問（Councillor Drews）和布萊希羅德同意。德魯斯向布萊希羅德解釋說：“你知道親王對貝倫德兄弟的仁慈，特別是對莫里茨。”德魯斯看不到拯救貝倫德兄弟財產的希望：“樞密顧問先生，你在多年前就看到了結局。” [[55]](#55_9)  但麻煩永遠不會結束。

俾斯麥既沒有聽從布萊希羅德“不要急著資助貝倫德”的警告，也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即趁著破產可能以低價購入工廠的機器。俾斯麥表示反對：“鑒于我的情況，我更愿意出租而不是親自運營，盡管收益要低得多。”俾斯麥不愿經營額外業務，或者增加自己的債務。最終，他決定盡可能地防止貝倫德破產，授意布萊希羅德繼續按照合同約定付款給坎普磨坊 [[56]](#56_9)  。

在從基辛根前往伐爾岑的途中，俾斯麥在柏林逗留了兩天，終于見到布萊希羅德。幾天后，布萊希羅德無奈地來信表示：“閣下仍然可以確信，我幾乎每個鐘點都在考慮這件重要的事，努力尋找兩全之策，既在各方面都滿足閣下利益，又顧及閣下對貝倫德兄弟的仁慈。” [[57]](#57_9)  與此同時，俾斯麥要求貝倫德兄弟向布萊希羅德請教如何籌集更多資本，但后者不會直接借錢，“以免產生誤會” [[58]](#58_9)  。或許是為了避免他自己的損失？

在一封十二頁的長信中，俾斯麥提到新的麻煩。莫里茨—貝倫德兄弟中的那個好人—可能徹底退出買賣，將其交給不可靠的格奧爾格經營。兩兄弟也可能分家，莫里茨需要籌集7.5萬塔勒，他愿意為此支付10%的利息，但即使那樣也找不到貸款者。無論如何，“格奧爾格·貝倫德的下一次破產”將讓莫里茨痛苦不已，“鑒于他的揮霍無度，這很難避免” [[59]](#59_8)  。俾斯麥束手無策—這封信的長度顯示出他深深的關切。他在那些日子里樂意寫多少十二頁長的信呢？

最終的權宜之計是，格奧爾格仍然是承租人和麻煩制造者，而莫里茨獲得大筆貸款，用于完成坎普磨坊。

下一次危機發生在1877年10月，什切青騎士私人銀行（Ritterschaftliche Privatbank）第一董事突然神秘地去世。布萊希羅德馬上警告俾斯麥，該行可能破產，并讓格奧爾格也遭遇滅頂之災。該行持有來自貝倫德的160萬馬克有疑問票據，如果突然要求兌現，貝倫德將破產，債主們將奪走福克斯磨坊 [[60]](#60_8)  。貝倫德逃過破產，但資本大大減少。12月，他不得不關停哈默磨坊的生產 [[61]](#61_8)  。

與此同時，俾斯麥借給莫里茨的錢越來越多；除了最初預計的22.5萬馬克，他又追加15萬馬克。布萊希羅德多次反對這種策略和程序，但大多被俾斯麥駁回。布萊希羅德可能把此事看成拿錢打水漂，而俾斯麥想要他的磨坊，出于某種原因，他不愿與貝倫德兄弟鬧翻和尋找新的承租人 [[62]](#62_8)  。

19世紀70年代末，貝倫德兄弟幾乎每個月都會帶來新的危機。俾斯麥對兩兄弟的爭執感到擔憂：“我們聽說關于格奧爾格的令人疑慮的報告。他以27馬克的凈價生產紙板，以12馬克出售，只是為了壓他兄弟的價。我相信，莫里茨的單價為15馬克……”另一些傳言讓俾斯麥擔心格奧爾格“將很快徹底破產”（dass er sehr bald eine grosse Pleite machen wird）—他在這個合適的場合用了猶太人關于破產的流行表達 [[63]](#63_8)  。布萊希羅德回復說，格奧爾格已經被迫將福克斯磨坊的實際控制權交給一個銀行家財團，包括著名的柏林貿易公司（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他的個人行為將很快導致另一場災難 [[64]](#64_8)  。

貝倫德兄弟帶來的麻煩永無止境。1879年7月，格奧爾格沒能按時支付6906馬克的福克斯磨坊半年租金，俾斯麥最終決定起訴他。赫伯特向布萊希羅德做了必要指示，但幾天后格奧爾格付清租金，采取極端行動的理由消失了 [10](#10_21)  。當年晚些時候，格奧爾格試圖為磨坊添置蒸汽鍋爐。在俾斯麥的要求下，布萊希羅德調查此事，發現柏林貿易公司反對新的冒險。該公司認為格奧爾格不名一文，希望終止與他的關系，并要求“警告所有人都不應把錢托付給他” [[65]](#65_8)  。12月，原有的蒸汽鍋爐破裂。圣誕節當天，赫伯特代表父親給布萊希羅德寫了長信，解釋說格奧爾格的疏忽造成鍋爐被毀，很長時間無法工作 [[66]](#66_7)  。但俾斯麥還是拒絕布萊希羅德的建議，不愿終止與格奧爾格的協議；他更愿意“不主動發難……而是繼續順勢而為……鑒于格奧爾格·貝倫德目前的狀況，他自己很快就會撐不下去” [[67]](#67_7)  。

事實上，俾斯麥借出更多的錢，新的麻煩也隨之而來。1888年，磨坊因為被水淹而停工。貝倫德通知布萊希羅德，他只能履行部分義務，日期也不確定。俾斯麥被激怒了，向布萊希羅德下達嚴厲的指示。但在格奧爾格的請求下，他在兩天后又改變主意。1889年10月的一天夜晚，奧穆勒的磨坊被燒毀，俾斯麥親眼目睹火災 [[68]](#68_7)  。

從這幾十年麻煩不斷的交易中，我們看到一個通情達理得令人奇怪的俾斯麥。不過，俾斯麥從與貝倫德兄弟的關系中獲益良多。每年的基本租金達到78018馬克，還不包括額外收取的利息。后來，為了給自己在伊利湖（Lake Erie）畔的公司籌資，莫里茨·貝倫德把伐爾岑的磨坊改組成股份公司，每年付給俾斯麥87105馬克—這個數字更接近俾斯麥曾經提到過的金額 [[69]](#69_7)  。貝倫德兄弟還購買俾斯麥的伐爾岑莊園出產的木材，并為用水付錢。總而言之，他們是俾斯麥收入的最大單項來源。

但俾斯麥不僅要忍受格奧爾格令人難堪的不可靠，還因為與貝倫德兄弟的關系受到誹謗。反猶主義者將此視為俾斯麥與猶太人打得火熱的又一個證據，他們宣稱他以8%的利率借錢給貝倫德兄弟，還讓兄弟倆享有壟斷地位，獨家向帝國郵政局和帝國鐵路供應紙張—后來的歷史學家們重復這個故事，但沒有證據。（1881年，俾斯麥向貝倫德兄弟保證，他“極不贊成對猶太人的這種打擊，無論是基于宗教，或者更糟糕的，是基于［種族］出身” [[70]](#70_7)  。）布萊希羅德檔案并未提及貝倫德與帝國政府有過任何利潤豐厚的合同。如果格奧爾格擁有如此堅實的收入基礎，俾斯麥還用為他如此擔心嗎？

俾斯麥對樹木的喜愛廣為人知 [11](#11_21)  。他的熱情貨真價實，并深諳養護和培育森林之道。這種喜愛還有助于他的真正德國人形象；他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意識到，森林也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 [12](#12_19)  。

1879年，在為木材關稅計劃辯護時，俾斯麥對議會抱怨說，對錢感興趣的人再也不愿種樹了；未來，森林將變成荒漠—只有少數像他這樣的“樹癡”（Holznarren）“以看見森林成長為樂，不計較錙銖小利” [[71]](#71_7)  。俾斯麥也許是“樹癡”，但與議會演講不同，他在現實生活中并不認為喜愛和利潤有矛盾。

多年來，俾斯麥從木材賺得的錢超過薪水。因此，他特別關心為自己的產品找到便捷和可靠的市場。1882年，他決定只通過安排好明確支付方式的特別銷售令出售。他在謝菲爾德（Sheffield）的客戶也許會有異議，不僅因為價格和質量，而且就像他對布萊希羅德所說的，因為“英國人不希望接受其他方式，他們習慣于自己決定商業條件” [[72]](#72_7)  。

不過，俾斯麥的主要客戶是德國批發商弗里德里希·弗溫克爾（Friedrich Vohwinkel），此人因為自己的買賣與布萊希羅德有過間接接觸。1882年，俾斯麥在弗里德里希斯魯的護林員致信布萊希羅德：“您應該從親王財務的管理者了解到，來自蓋爾森基辛（Gelsenkirchen）的弗里德里希·弗溫克爾先生長期從薩克森瓦爾德供應礦井的木支架。因此，親王的管理者非常希望那位總是及時付款的弗溫克爾先生能保住自己的市場。”這些市場中包括希波尼亞大煤礦，那里將很快簽訂購買木支架的新合同。“由于……合同的決定權在您手中，我冒昧地代表親王的管理者，恭請您再次選擇弗溫克爾先生。” [[73]](#73_7)

布萊希羅德是希波尼亞的董事，他的兒子和施瓦巴赫后來也是。他無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盡管他通常不太可能親自過問購買木支架的事。不過，他還是為俾斯麥的主要客戶成功爭取到合同。1886年，朗格再次提出請求，指出弗溫克爾從1878年開始就是俾斯麥的客戶，但未來的購買將取決于希波尼亞繼續以優厚價格向他購置木支架。他寫道：“價格已經大幅下跌，如果繼續下跌，我擔心可能失去這位寶貴的客戶。”這位客戶的確寶貴：弗溫克爾已經向親王的莊園支付了“整整100萬”，從未有過一次分歧。布萊希羅德一如既往地同意了。一年后，朗格對他的幫助表示感謝：“因為您，我們得以保住最好的客戶，免去尋找其他可靠市場的尷尬，而且市場可能非常難找。親王大人……對這種有利的商業地位感到高興，這多虧了您。” [[74]](#74_7)  首相被罷免幾天后，朗格再次代表弗溫克爾請求布萊希羅德，并表示比起其他礦井，弗里德里希斯魯的橡木更適合希波尼亞。三天后，布萊希羅德得到希波尼亞的回復，表示鑒于弗溫克爾過去令人滿意的表現，延長他的合同應該沒有問題 [[75]](#75_7)  。

在幫助俾斯麥維持與弗溫克爾的關系過程中，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具有某種鮮明的典型性。這是俾斯麥與魯爾區工業家最密切的商業聯系，而且對他非常重要。畢竟，弗溫克爾給他的比國家給的更多。容克貴族和工業利益間的這種聯系也不無政治意義：在路易斯·巴爾非常活躍的波鴻（Bochum）商會中，弗溫克爾是重要成員。該商會從1873年開始推動征收鐵礦石關稅。布萊希羅德創建的希波尼亞（也是俾斯麥的間接客戶）屬于同一個壓力集團 [[76]](#76_7)  。俾斯麥有充分的理由考慮他們堅持的要求。

俾斯麥的莊園還有其他收入來源，但相對不太重要。比如臭名昭著的羅特維勒火藥廠（Pulverfabrik Rottweiler），最初年收入1.09萬馬克，到了19世紀80年代末翻了一番 [13](#13_17)  。俾斯麥從莊園里的釀酒廠也獲得一些收入，盡管布萊希羅德的記錄中沒有提到細節。此外，弗里德里希斯魯莊園還有一眼礦泉水，裝瓶后以“俾斯麥泉”（Bismark-Quelle）這個恰如其分的名字出售。上述這些增加了三處莊園的收入，但都算不上重要收益。

俾斯麥的賬戶極為復雜。它們消耗他和布萊希羅德的大量時間，盡管我們手頭不乏資料，但理清它們仍然非常困難。俾斯麥極其仔細地檢查某些半年對賬單，核對許多項目的用途。布萊希羅德一次性交給俾斯麥家人、他們的老仆人恩格爾（Engel）或者總管熱妮·法提奧6000馬克，用于家庭開支。1878年，這筆開支似乎上升到15.6萬馬克，1879年達到18.5萬馬克，1883年降至138989馬克 [[77]](#77_7)  。

我們擁有1884年俾斯麥在布萊希羅德銀行賬戶的完整清單。當年年末，俾斯麥共支出526692馬克，收入為408425馬克，虧欠118267馬克，需要向布萊希羅德支付4%的年息。在支出中，119500馬克被交給俾斯麥家，每年還要給蘭曹伯爵1.2萬馬克和給威廉一筆較小的款項。一些開支被直接交給各種供應商，包括購買葡萄酒的4000馬克單筆花銷。弗里德里希斯魯的護林員得到11萬馬克，可能用于與莊園正常運營相關的購置、修繕和意外開支。俾斯麥還花了18.5萬馬克重建貝倫德的磨坊，12萬馬克用于償還抵押貸款的利息和本金。

1884年的收入分類賬目也許并不典型，盡管每年的比例可能變化相對較小。最大款項來自貝倫德的各種租金，總額達8.53萬馬克；弗溫克爾那年支付了76242馬克。俾斯麥的投資利息為56613馬克，薪水為52294馬克。伐爾岑的護林員威斯特法爾上交了3.5萬馬克，羅特維勒火藥廠僅僅貢獻了10910馬克。賬目看上去大多是出售證券，被記作收入。這些數字證明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重要收入來源中的核心角色。

六個月后，俾斯麥親自粗略計算了布萊希羅德提供的半年詳細清單，他記錄道：伐爾岑（包括貝倫德兄弟）收入118769馬克，舍恩豪森收入22萬馬克，弗里德里希斯魯（包括弗溫克爾）收入86538馬克，薪水26324馬克，利息7618馬克—最后一項低得不同尋常。在那六個月里，俾斯麥為抵押貸款的本息支付了5.3萬馬克，為貝倫德的建筑工程支付了2.02萬馬克，為伐爾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魯的護林員分別支付了3.7萬和1.5萬馬克。個人總支出為6.2萬馬克。

在與稅務部門有關的另一次麻煩中，俾斯麥請布萊希羅德提供1887年到1889年來自其三處莊園的凈年均收入清單。布萊希羅德提供的數字是：伐爾岑（包括貝倫德租金），125200馬克；弗里德里希斯魯，130400馬克；舍恩豪森，9800馬克。考慮到對伐爾岑和貝倫德的投資（包括最初的國家獎賞）接近300萬馬克，對弗里德里希斯魯的投資更是遠高于300萬馬克，上述收益率相對寒酸，幾乎肯定低于每年4%。不過，在俾斯麥晚年，莊園收入顯著上升，他的巨額投資開始有了回報 [14](#14_17)  。

俾斯麥被免職意味著他的薪水將立即停發，轉而領取相當于薪水三分之一的養老金。他每年的總津貼減至2.7萬馬克，包括作為勞恩堡大臣的養老金；他還失去了免租金的柏林宅邸 [[78]](#78_7)  。此外，公使基金要求俾斯麥立即補上1890年3月最后十天的薪水和養老金的差額，這是普魯士的規定還是皇帝的報復？俾斯麥本人輕蔑地表示：“此舉讓普魯士當局變得偉大。” [[79]](#79_7)   [15](#15_17)  政府還為“去年在俾斯麥柏林官邸所做的工作”收取586.4馬克，這是強詞奪理還是規規矩矩 [[80]](#80_7)  ？俾斯麥經常被指錙銖必較，他剛剛被解放的下屬青出于藍。

在任時，俾斯麥把很多時間花在投資上。退休后，錢只是他的次要愛好。他覺得管理自己的數百萬財富就像半個世紀前打理他微薄的遺產一樣乏味。權力和政治是他一生最大的熱情，沒有它們，金錢對他的心靈價值寥寥 [16](#16_17)  。他最后的舉動是用自己的政治熱情謀利：他預售了回憶錄，每卷10萬馬克—這是有史以來德國出版商為作者預付的最高金額 [[81]](#81_7)  。

俾斯麥去世后，關于他的巨額財產的流言立即甚囂塵上—這不可避免，可能也并不意外。最終，與這位前任首相關系特別密切的《漢堡消息報》（Hamburger Nachrichten）報道說：“根據權威說法……財產的總資本和現金價值不到250萬馬克，這筆錢要承擔他的繼承人每年的債務和開銷。” [[82]](#82_7)  現在我們知道，俾斯麥的遺產接近于那個數字的三倍—盡管晚年他把一部分錢和土地轉到赫伯特名下。如果親王知道他的財富被低估，他也許會露出微笑，他明白這可能是為了對付貪婪的稅務評估員。不過，他也許希望后世知道自己做的要更好—而布萊希羅德無疑希望人們知道，俾斯麥的財富在他生前增值了許多倍。

俾斯麥對他的個人商業冒險從不滿意。也許他認為，如果將自己的智慧、雄心和無盡的利己主義投入物質追求，他可能已經是商業巨擘了。事實上，他做得相當好。和他的政治生涯一樣，他在個人商業冒險中的成功讓他成為現代化的容克貴族。俾斯麥在商業和政治上取得成功，這得益于他對當下的機會出色的適應能力，得益于他對自身目標不懈甚至無情的追求。

就像我們在上述對俾斯麥財務狀況的描述中所看到的，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帶來巨大便利，但他并不提供非法財富或可疑投機。相反，俾斯麥對同時代人的某些虔誠感到不耐煩：在推進自己的利益時，他有時無視傳統道德；有時，他會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甚至量身定做法律；他還恐嚇官僚，逃避稅務部門。不過，在他的個人利己主義中，令我吃驚的不是他的胃口，而是他的錙銖必較。

下面的例子體現俾斯麥追求物質利益時的冷靜：他決定用作為他70大壽禮物的公眾籌款購回新舍恩豪森（比他1830年出售的祖產面積大得多），售價為150萬馬克。數以千計的捐贈者曾以為，俾斯麥會用他們的貢獻（被稱為“奧托基金”，參照教皇們設立的“彼得基金”）創立愛國基金。但他們只是一廂情愿，俾斯麥在籌款委員會的朋友們堅持讓他購買新舍恩豪森。媒體報道了委員會中的不同意見，但像拉提波爾公爵這樣的堅定支持者（俾斯麥在羅馬尼亞風波中幫了他大忙）說服其他三十四名成員投票接受舍恩豪森方案（另外六人反對）。于是，基金的一半（115萬馬克）被用來購回祖產，其余的35萬馬克來自以布萊希羅德和銀行家門德爾松為首的一群富有贊助人 [[83]](#83_7)  。就這樣，舍恩豪森被順利購回，讓俾斯麥非常高興。布萊希羅德在回購中出了很多力（該莊園當時已經被指定由赫伯特繼承），他對荷爾斯泰因說：“真是咄咄怪事。那家人得到舍恩豪森多虧了我，赫伯特有一天將繼承它，但如果我要見他卻可能被趕出來。” [[84]](#84_7)

俾斯麥愿意把剩下的錢捐給國家慈善機構。在寫給威廉一世的私信中，俾斯麥解釋說，他計劃設立基金會支持中學老師，因為“教育是民族情感的搖籃。教師職業的理想主義意識……能在道德上平衡我們時代的物質主義”。他繼續表示，基金會將位于舍恩豪森而非柏林，“以避免它和柏林市政當局有任何接觸，受到后者任何可能的影響”。俾斯麥在信中道貌岸然地譴責物質主義，但他沒有提到那筆錢一部分將被用來成立信托基金，幫助俾斯麥莊園里的窮人。他也沒有提到，這些信托基金的本金由布萊希羅德管理，一部分將被用于俾斯麥莊園的抵押貸款，從而贖回布萊希羅德持有的部分抵押權 [[85]](#85_7)  。

俾斯麥沒有與約翰娜或兒子們商量就決定了分贓計劃。特別是他的兒子們“認為那位猶太人大銀行家的貢獻討厭透頂”。赫伯特被激怒了，因為父親的這個決定令皇太子的宮廷和南德的許多人蒙羞。很少有人像巴伐利亞駐柏林大使那樣，稱贊俾斯麥將公眾禮物用于私人利益是“道德上的勇敢之舉”。他認為，常人可能假裝“高尚”而不愿接受這樣的禮物，“但在全世界面前這樣惺惺作態不是俾斯麥的風格” [[86]](#86_7)   [17](#17_11)  。收購過程出人意外地復雜，布萊希羅德提供了大量幫助。書信往來持續幾個月，無論赫伯特多么討厭布萊希羅德和假裝憎惡這筆交易，他卻是主要受益者，幾乎立即成為這座大大擴張的莊園的繼承人。

俾斯麥的朋友和敵人（許多人兩者都是）經常提及他本人的經濟利益與他的商業政策的巧合。1884年，荷爾斯泰因寫道：“不可否認，在木材和酒精等商品的關稅上，首相考慮了自己的利益，人們曾用這個事實向他發難。但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與廣大公民利益相同，因此他絕不只是為了一己私利。” [[87]](#87_6)  1879年，俾斯麥警告戰爭部長，高估美國木材的質量將對國內產生有害影響 [[88]](#88_6)  。1887年，他的同事盧基烏斯注意到，每當討論釀酒稅時，俾斯麥都會很快算出稅收對自家買賣的影響，“從而對所建議稅率的水平獲得實際印象” [[89]](#89_6)  。路德維希·巴姆貝格報告說，1833年3月，在俾斯麥家的一次宴會上，有人提到德國木材價格太低。俾斯麥隨口回答，他不再關心此事，因為他把所有木材都賣到英國。巴姆貝格不懷好意地補充說：“不久之后就出現要求提高木材關稅的法案。” [[90]](#90_6)  巴姆貝格不知道，俾斯麥關于英國市場的話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現實的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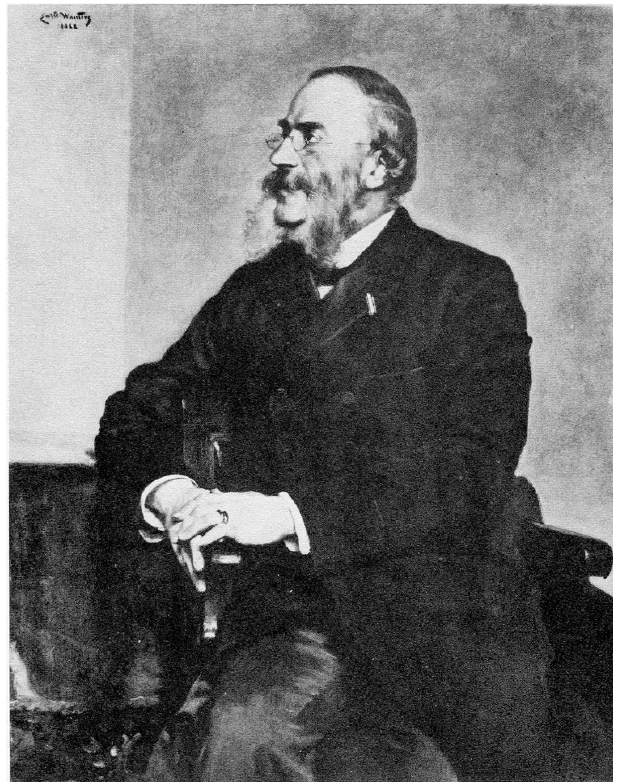
近來有人提出“俾斯麥為自己，有時也為同僚獲取幾乎數不盡的行政和法律上的物質利益” [[91]](#91_6)  。事實上，俾斯麥最多只是偶爾擔心個人和公共活動可能的“利益沖突”，當他出于其他理由不愿做某件事時，他會把這種沖突作為借口。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沒有更多證據表明俾斯麥利用公共政策來推進個人利益。我們看到，俾斯麥的鐵路政策為他提供投資機會，但將鐵路國有化的決定顯然獨立于他的投資。另一方面，就像荷爾斯泰因所說，俾斯麥的確從19世紀80年代末的某些稅收中獲益，特別是木材關稅，他還試圖讓釀酒稅符合自己的需要。

俾斯麥認為，地方的道路或稅收政策應該由大地主的利益決定。面對違背這種預期的地方當局時，他可能表現得無比專橫。俾斯麥對官員的恐嚇廣為人知，但布萊希羅德似乎與此全無關系。不過，在首相任期的最后，布萊希羅德再次目睹俾斯麥不愿交稅。從1882年在帝國議會的一次重要講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俾斯麥對普魯士的收入稅多么反感。他宣稱，正是普魯士的稅收讓那么多德國人移民海外，還有許多付不起稅的公民被國家收稅官逼迫自殺。俾斯麥的夸張指控與其說指出了德國人大規模移民海外的原因，不如說表達了他對“不諳世事的城市人、科學家、官僚和立法者圈子”征收直接稅的看法 [18](#18_11)   [[92]](#92_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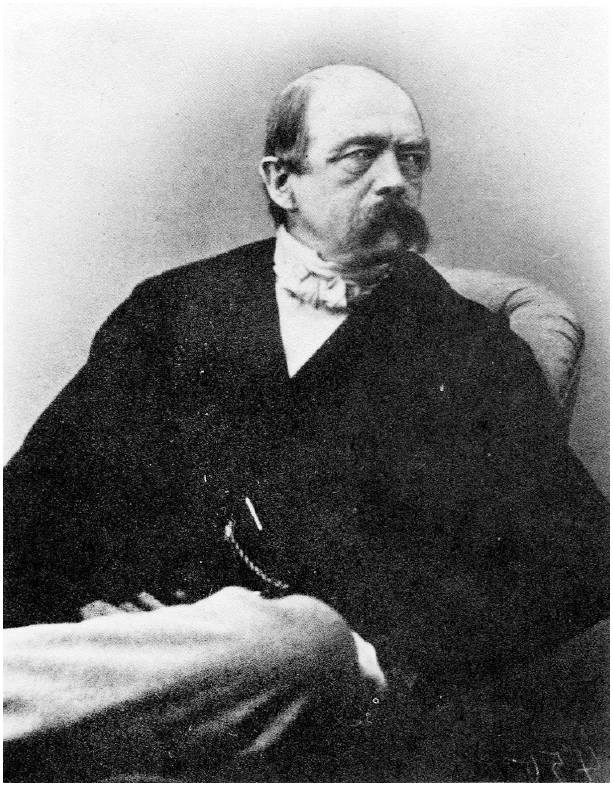
1890年3月，當稅務委員會通知俾斯麥將被歸入第31級時—估算收入為20.4萬馬克到24萬馬克之間，每年納稅6120馬克—整個普魯士只有1500人的估算收入超過10萬馬克。（讀者們應該記得，高得多的市鎮稅也以對收入稅的評估為基礎。）他從1877年起就處于那個等級。被罷免并失去薪水和免租金的宅邸后，俾斯麥想要申訴更改自己的等級，于是讓布萊希羅德提供他的收入信息。布萊希羅德提交了對1890年的盤點：總收入為33.2萬馬克（包括2.7萬馬克的退休金和4.3萬馬克的利息，其余來自莊園）。俾斯麥的收入比官方的估算高9萬馬克，他應該歸入第33級，納稅9000馬克—這似乎無可辯駁。俾斯麥放棄了向官方申訴的計劃。沒有記錄顯示，他試圖糾正那些低估他的數字。官方估算與實際數字間的差距可能讓他感到高興 [[93]](#93_6)  。套用俾斯麥的話：此舉讓這位普魯士容克貴族變得富有。



雅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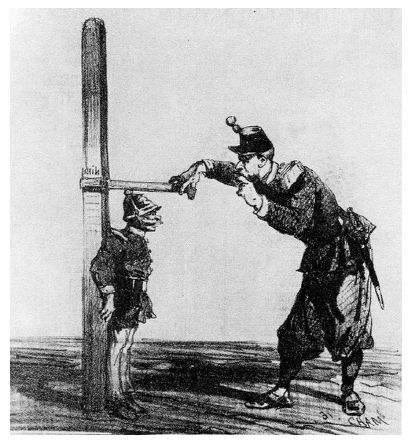
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埃米爾·旺特斯（Emile Wanters）于1888年繪



奧托·馮·俾斯麥，1864年



德皇威廉一世



《龐奇》（Punch，1867年）雜志漫畫描繪法國警告普魯士：“現在你已經夠高了，不能再長個。我告訴你這些是為了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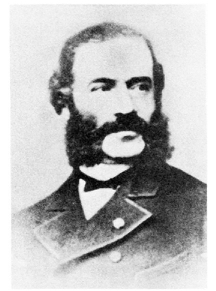
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前排右一）、俾斯麥（前排左二）與毛奇（前排右二），1866年克尼格茨戰役開戰日早上



雅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的費里埃爾城堡



布萊希羅德銀行正面，柏林貝倫街63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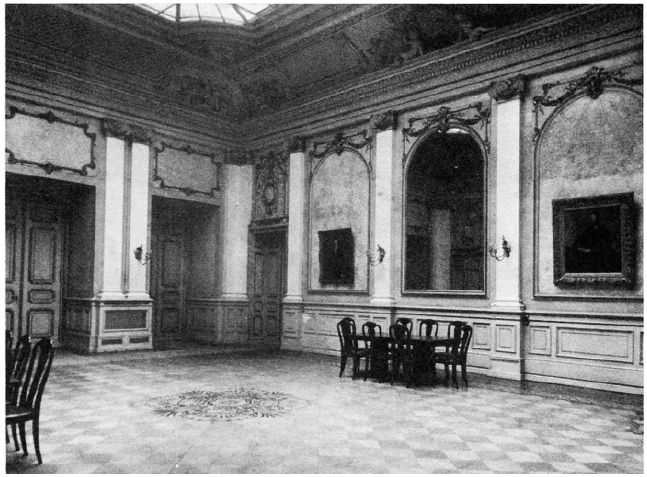
19世紀50年代的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



阿道夫·馮·漢澤曼



亨克爾·馮·多納斯馬克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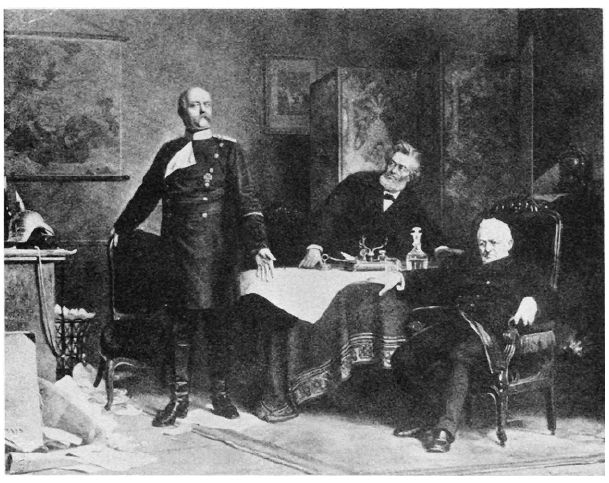
布萊希羅德銀行大堂。右側掛著蓋爾森的肖像



陸軍元帥毛奇（中坐者）在普法戰爭期間眺望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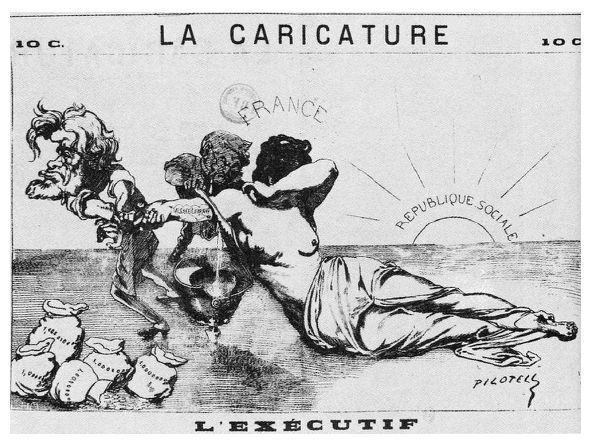
俾斯麥和助手們在凡爾賽宮，1871年；左起：阿貝肯、科伊德爾、俾斯麥、德爾布呂克、哈茨菲爾特、俾斯麥—波倫



俾斯麥（左）與儒勒·法夫爾（中）和阿道夫·梯也爾（右）“談判”，卡爾·瓦格納（Carl Wagner）繪



當時的法國漫畫：左側，俾斯麥與威廉一世在清點法國的賠款；右側，劫掠阿爾薩斯—洛林



另一幅法國漫畫，描繪1871年《巴黎和約》簽署后，法夫爾和梯也爾在為德國人工作，1871年



諷刺普魯士《十字報》（Kreuzzeitung）反猶主義論戰的漫畫（約1875年）。畫中畫把布萊希羅德描繪成國王，把德爾布呂克、俾斯麥和坎普豪森描繪成侍從



1889年蒂爾（E.Thiel）所繪的柏林證券交易市場，刊于發行量很大的《畫報》（Illustrierte Zeitung）。請注意許多交易者都帶有刻板印象的猶太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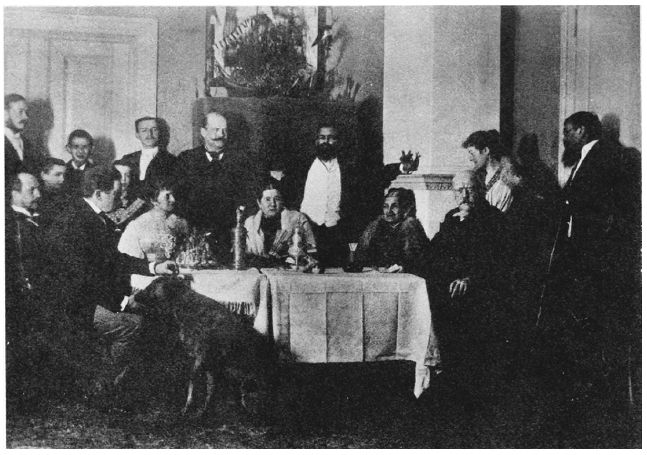
約翰娜·馮·俾斯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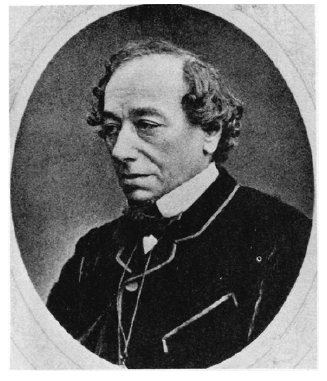
赫伯特·馮·俾斯麥



俾斯麥（左）和威廉二世（右）在弗里德里希斯魯，1888年10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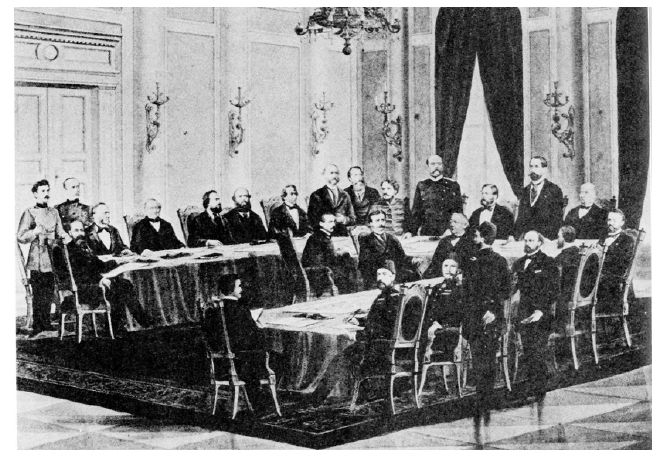
俾斯麥與家人和朋友在弗里德里希斯魯，1893年。桌邊左起：赫伯特·馮·俾斯麥、蘭巴赫夫人（Frau Lenbach）、蘭曹伯爵夫人（俾斯麥之女）、約翰娜·俾斯麥和俾斯麥。蘭巴赫夫人和蘭曹伯爵夫人之間是威廉·馮·俾斯麥



本杰明·迪斯累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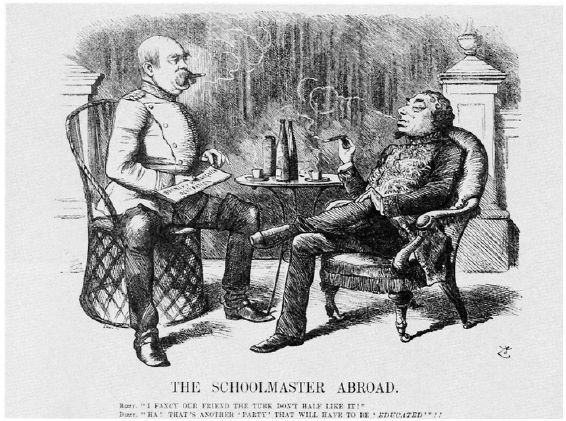
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喬治·里奇蒙德（George Richmond）繪，1874年



柏林議會，1878年



“吞下它，鳥兒，不然就去死！”指涉1878年俾斯麥堅持讓帝國議會通過他的反社會黨人法案，不然就解散



《龐奇》雜志漫畫，描繪俾斯麥和迪斯累利在柏林會議期間討論奧地利對波黑的占領，1878年



海因里希·馮·萊恩多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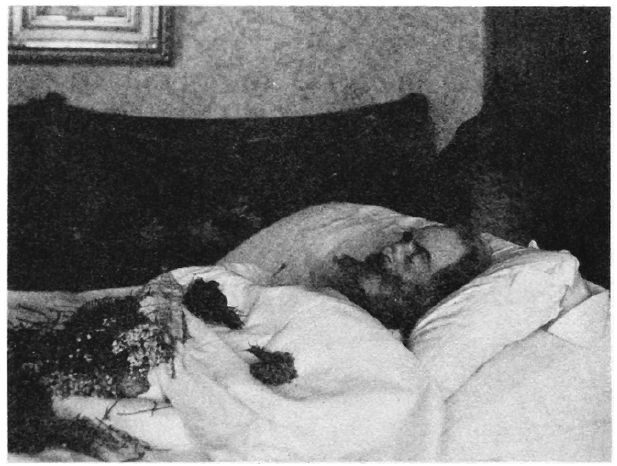
約瑟夫·瑪利亞·馮·拉多維茨



保羅·馮·哈茨菲爾特



里德里希·馮·荷爾斯泰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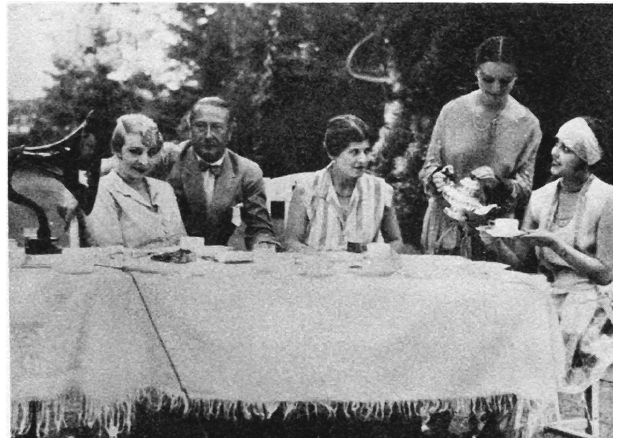
臨終的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18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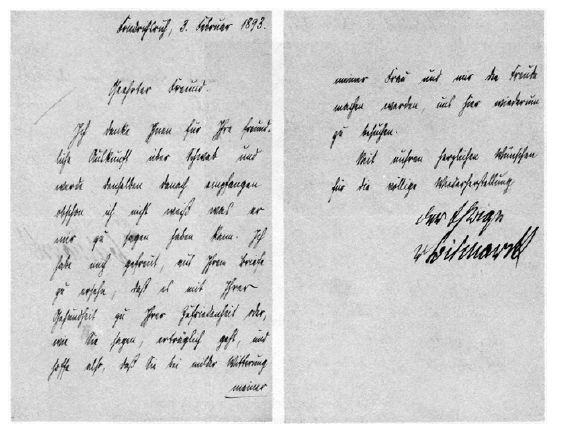
保羅·馮·施瓦巴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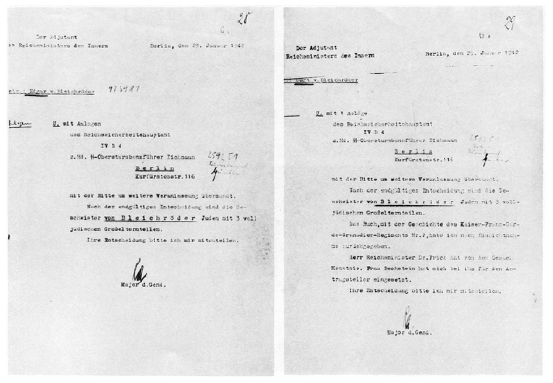
運動迷格奧爾格·馮·布萊希羅德駕駛自己的汽車



小漢斯·馮·布萊希羅德和朋友們一起聽廣播，1927年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的最后幾封信之一，寫于后者去世前三周



內政部給黨衛軍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的備忘錄，宣布埃德加和庫爾特·馮·布萊希羅德為猶太人，因為他們的祖輩中有三人是猶太人。他們的命運交由艾希曼處置

[1.](#1_24) 讀者應該還記得，1876年，俾斯麥拒絕發表布呂歇爾的一些書信，即使當信中的財務內容被去除后（見第十章）。特奧多爾·馮塔納也把布呂歇爾和俾斯麥聯系起來。馮塔納記得布呂歇爾曾向國王抱怨說，沒人再愿意和他打牌。腓特烈·威廉三世回答說，人們知道他作弊。對此，布呂歇爾回應稱：“‘是的，陛下，小小的作弊再好不過。’那也是俾斯麥的原則：在他看來，‘小小的作弊（比如抓鬮）’總是最美好的東西”。特奧多爾·馮塔納，《家書》（柏林，1924年），第二卷，第300頁。

[2.](#2_24) 俾斯麥遵循其他容克貴族的傳統，就像一位后來的變節者對他們的尖刻描摹：“‘盡可能多地從國家索取，盡可能少地給國家’是他們的座右銘！他們只在納稅時顯得儉樸。他們認為，昂貴的馬匹、花園、狩獵、教師和女管家等的花銷屬于必要的家庭預算。”赫爾穆特·馮·格爾拉赫，《從右派到左派》（蘇黎世，1937年），第36頁［Hellmut von Gerlach，Von Rechts nach Links（Zurich，1937），p.36］。

[3.](#3_22) 比如，1873年，公使基金扣去購買波特酒的2275塔勒和購買魚子醬的56塔勒，并按慣例扣去175塔勒的收入稅（布萊希羅德結算單，1873年4月1日，SA）。每季度購買15到20磅魚子醬并不少見—每當有特別好的魚子醬從圣彼得堡運抵時，布萊希羅德還常常向親王贈送這種美味。

[4.](#4_22) 法國媒體在普法戰爭期間最早提出這種指控，一家報紙報道說：“通過與布萊希羅德先生……的卑劣投機……俾斯麥的貪婪讓他積累了巨額財富。”這份報紙還特別談到俾斯麥的性放縱：“人們說，他在柏林有大約五十個私生子。”莫里茨·布施，《日記選》（萊比錫，1899年），第一卷，第384頁［Moritz Busch，Tagebuchblätter（Leipzig，1899），I，384］。

[5.](#5_22) 出于金融而非政治原因，在俾斯麥被罷免前幾周，柏林市場大幅下跌。1890年3月9日，重要的金融周刊《股東》（Der Aktionär，第37卷，第157頁）提到：“上周……定期的恐慌籠罩［股票交易］……周末情況有所好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人的干預，特別是布萊希羅德銀行。”也許值得一提的是，3月5日的《股東》刊載的頭版文章評論說，埃及的財政狀況大有好轉—布萊希羅德早就對那里感興趣。

[6.](#6_22) 對熊市推波助瀾的是，“與首相的關系廣為人知的柏林第一大銀行大量拋售”。《股東》，第37卷（1890年3月23日），第197頁。在俾斯麥被罷免前幾天，布萊希羅德顯然就已經知道他的位置岌岌可危。

[7.](#7_22) 即今天的霍洛沃（Chorowo）和霍洛夫科（Chorówko），現屬波蘭。——譯注

[8.](#8_22) 這段關系也留下一些有趣的軼聞。貝倫德兄弟中的一人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朋友講過這樣的故事：有一次，俾斯麥詢問工廠監督（他常常與這類管理人員發生爭執）的薪水是多少，當被告知是1000塔勒后，俾斯麥說：“那么你肯定收了賄賂。”這位朋友向奧古斯特·倍倍爾轉述那個故事，用以證明俾斯麥的粗魯。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書信，1884年10月11日，《致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考茨基等人的信》，第一部分（莫斯科，1933年），第361頁［Briefe an A.Bebel，W.Liebknecht，K.Kautsky und Andere，Part I（Moscow，1933），p.361］。

[9.](#9_20) 特奧多爾·馮塔納曾評價“親王作為造紙廠主”的矛盾之處：“這實在是非常奇怪；事實上，一切與書寫有關的東西，特別是所有的印刷用紙都讓他難以忍受，現在他卻創辦了造紙廠。”《艾菲·布里斯特》（柏林，1895年），第105頁［Effi Briest（Berlin，1895），p.105］。

[10.](#10_2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7月7日，SA。俾斯麥在信的背面寫了回信草稿，內容與赫伯特同一天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相同（BA）。包括此事在內的一些例子表明，俾斯麥的兒子和女婿代表他寫給布萊希羅德的商業信件其實是由俾斯麥本人起草或口授的。

[11.](#11_20) 他所欽佩的迪斯累利也有這個愛好，而他討厭的格萊斯頓則沒有。1887年，他給后者發去不懷好意的留言：“告訴他，當他揮動斧頭砍樹時，我正忙著種樹。”阿諾德·奧斯卡·邁耶爾，《俾斯麥：人和政客》（斯圖加特，1944年），第448頁［Arnold Oskar Meyer，Bismarck.Der Mensch und der Staatsmann（Leipzig，1944），p.448］；羅伯特·布雷克，《迪斯累利》（倫敦，1966年），第410、414頁［Robert Blake，Disraeli（London，1966），pp.410，414］。

[12.](#12_18) 1882年，他特別擔心自家木材的收入。他告訴財政部長阿道夫·馮·朔爾茨，自己剛剛種下的一大片花旗松瀕臨死亡：“我的兒子們不應對此感到憤怒！別的父親因為馬匹、紙牌和女人等東西讓兒子們遭受大得多的損失—所以我不應該因為森林管理上的錯誤而受到任何嚴厲指責。”《全集》，第八卷，第456頁。

[13.](#13_16) 阿爾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強調，俾斯麥在軍火業的利益可能引發不當行為：《俾斯麥的財富》，刊于《中歐史》，1968年第1期，第216—217頁［“Bismarck’s Fortune，”CEH（1968），I，216–217］。但他的利益是固定的，盡管后來租金價格上升。因此，與瓦格茨的觀點相反，有利可圖的戰爭帶來的突然繁榮并沒有使俾斯麥獲益，他的其他投資反而可能因為戰爭爆發而遭受損失。瓦格茨沒有提到俾斯麥與魯爾區大亨們的重要關系（通過弗溫克爾）。

[14.](#14_16) 下臺幾周后，當著布萊希羅德的面，俾斯麥向來訪的護林員抱怨說：“除了舍恩豪森，我的莊園都沒有給我帶來任何東西—只有舍恩豪森有好土地。”感到難以置信的馮·布萊希羅德先生露出微笑，甚至親王似乎也沒太把這句話當真。《全集》，第九卷，第29頁。

[15.](#15_16) 布萊希羅德檔案中一張未署名的便條提到他的養老金，便條最后表示：“大人需要為3月21日到3月底的薪水退回1500馬克。”俾斯麥明確批準支付。克里桑德（Chrysander）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6月1日，BA。

[16.](#16_16) 退休后和布萊希羅德去世后一個月，俾斯麥回想起他的銀行家的貢獻：“他讓我不必對如何安全和有利地投資與管理我的錢憂心忡忡，由于公務在身，我當時幾乎無力獨自處理這些事；他為我收取莊園和其他地方的收入，反過來還為我的日常開支提供幾乎無限的信貸。他總是按時寄來賬單，而且完全不需要任何修正。”《全集》，第九卷，第336頁。

[17.](#17_10) 作為奇特的心理巧合，當俾斯麥與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談起回購祖產時，俾斯麥突然提到自己的母親，并留下了名言：“她非常聰明，但冷靜透頂。”魯道夫·費爾豪斯編，《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日記》（哥廷根，1960年），第218頁［Rudolf Vierhaus，ed.，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Göttingen，1960），p.218］。

[18.](#18_10) 一年后，俾斯麥再次向國王申請稅收豁免。1866年和1871年的獎賞已經變成伐爾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魯的限定繼承權莊園。在威廉的命令下，通常需要為此支付的3%印花稅被免去。1883年，俾斯麥希望為這些莊園可觀的擴大部分也免去通常需要繳納的稅款。在兩位部長的建議下，國王同意了。朔爾茨和弗里德貝格致威廉，1883年4月23日，DZA：Merseburg：Geh.Civil Cabinet，Rep.89H，XXIII，12ff。

## 第十三章　銀行業與外交界

后來，外交報告被再次討論，似乎總是輕視它們的首長表示：“它們大多只是被墨水弄臟的紙……如果有朝一日被用作歷史材料，上面將找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我相信檔案將在三十年后對公眾開放—但也可能大大提前。即使報告中的確包含信息，如果不了解所涉及的人和他們的相互關系，仍然很難看懂。三十年后，誰會知道作者是何許人，他對事情的看法如何，他的個性如何影響這些事情？誰會真正熟悉他報告中提到的人？人們必須知道當戈爾恰科夫、格萊斯頓或格蘭維爾發表信件上所記錄的言論時，他們在想些什么……重要內容總是在私人書信和秘密交流中，有時是口頭的，而這些永遠不會進入檔案。”

——莫里茨·布施，1871年2月22日

在昨天的《泰晤士報》副刊上，我看到俾斯麥對“報告”和“國家文件”等可能對蘭克學派非常重要的材料的觀點。他認為這些材料的價值微乎其微。他問道：“目前的所有報告中提到多少我、格萊斯頓或梯也爾的真正政策？”顯然，它們提到民族情感和真正創造歷史的沖動（而非政客的政策）—得到比肯斯菲爾德勛爵（Lord Beaconsfield）和蘭克的首肯—就更少了。

——格林（J.R.Green）致弗里曼

（E.A.Freeman），1878年11月20日

我在電報中告訴你，俾斯麥親王通過他的秘密代理人布萊希羅德給我發來私人秘密消息。

——安特希爾勛爵（Lord Ampthill）

致格蘭維爾勛爵，1881年11月26日

二十多年間，俾斯麥一直是歐洲舉足輕重的政客。他的專橫跋扈和德國的實力讓他在歐洲領導人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事實上，后來再沒有政客能超過他的任期或影響力。那些年里，外交事務中一直可以看到他的特別助手和“秘密代理人”布萊希羅德的身影—既不在他的身側，也不在他的影子里 [[1]](#1_55)  。這是此人在歐洲人眼中的形象。

就持續時間、范圍和強度而言，這段關系在歐洲也獨一無二。再沒有哪位仆人為俾斯麥服務如此之久；沒有誰私底下與他進行如此之多的坦誠交談，無論是在柏林還是在俾斯麥的某個休養地。這三十年見證范圍廣泛的談話、習慣性的盤點，以及請求、給予和拒絕恩惠。我們沒有這些談話的記錄或錄音帶，只能從他們的通信和他們與其他顯貴的談話中找到蛛絲馬跡。

兩人為彼此提供各種幫助，包括從私人到公共的各種事項、官方和非官方業務、金融和外交問題。兩人都扮演一系列角色：布萊希羅德是俾斯麥的銀行家，還受人之托或出于熱心傳播信息；他也是俾斯麥與某些政客打交道時的代理人，是首相的非正式無任所大使，是他本人或德國銀行界利益的代表；他有時為自己的客戶謀求高位，有時為國外被迫害的猶太人請命。他請求給予自己恩惠，以便增進自己的角色或買賣：俾斯麥在適當時候的一句話可能讓布萊希羅德對國內外競爭者擁有決定性的優勢。在談話或通信中，所有這些話題被不斷涉及，方式可能讓一個更加官僚主義的世界反感。

俾斯麥發現，這位無所不在的銀行家是對他官方下屬的極好補充：“我習慣于通過布萊希羅德獲取來自巴黎或圣彼得堡的重要政治消息，通常要比通過我自己的大使們早八天。” [[2]](#2_55)  但布萊希羅德的服務值得稱道的不僅是速度：俾斯麥學會通過自己銀行家的眼睛觀察世界，后者與世界上的新生力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乃至整個競爭與合作的銀行網絡建立私人關系。不僅如此，他還委派布萊希羅德在國外執行特殊任務。鑒于這些任務的微妙或臨時性，它們最好不通過官方渠道。歐洲人重視布萊希羅德的話，因為他與俾斯麥的特殊關系盡人皆知。

對布萊希羅德而言，這些談話是無價的。它們賦予他地位、重要性和無所不知的光環。它們也帶給他實際的好處：他由此了解那位當時舉足輕重的政客的想法和計劃，并相應地制訂自己的計劃。他能輕易接近俾斯麥，這意味著他可以同樣容易地接近權力階梯更低的部分。他的話受到重視，他在外交部或海外使館的例行活動還經常得到幫助。他希望成為富有的幕后謀士—俾斯麥的其他下屬不得不接受他的地位，有時還向他表示尊重，甚至競相爭取他的青睞。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關系象征著金融和外交、國內和國外事務、私人和公共問題間許多相互重疊的利益。它還暗示在俾斯麥眼中，外交過于重要，不能交給外交官。它表明銀行家也需要政治意識這第二雙眼睛，就像水手需要對天氣的預感。這一切對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來說不言自明：他們對三十年的相互關系習以為常，但那些將世界看成互不關聯部分的人對此并不太滿意。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凸顯僅從外交記錄再現歷史的困難乃至徒勞，哪怕只是外交界的歷史。這種關系也不符合某些現代史學家或理論家的觀點，他們認為歷史的結構涇渭分明，其中的某種因素（通常是社會經濟因素）占據“首要地位”。與其反差最大的是那種曾經流行的觀點，它把國際銀行家描繪成惡棍和戰爭的幕后操縱者。但至少從布萊希羅德的例子來看，現實遠沒有那么聳人聽聞；它展現了一個比人們設想的更加復雜、糾結、變化多端、迷人和不確定的世界。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特別關系要求對一個宏大體系的構建保持謹慎。就像我們在開頭所說，雖然這種關系名義上總是互利的，布萊希羅德有能力施加壓力并的確這樣做了，有時甚至是可觀的壓力，但權力總在他的偉人朋友手中，天平永遠偏向對俾斯麥有利的一方 [[3]](#3_53)  。

19世紀時，外交仍然是特權者的專屬領域。大多數外交官是貴族，因為人們認為只有貴族子弟擁有這項工作需要的天生優雅、與生俱來的謹慎、得體舉止和老于世故；只有他們能確保立刻進入所在國家的頂層社交圈。

但讓外交成為特權者專屬領域的不僅是等級或地位：整個外交政策領域—德國人所謂的“大政治”（die Grosse Politik）或法國人所謂的“高級政治”（la haute politique）—被認為高于其他領域，特別是骯臟的國內政治。外交是“高級”的，因為參與者是卓越的典范，賭注是最終的戰爭與和平。在這個浮華而神秘的小號世界中，出入威廉街、奧塞碼頭（Quai d’Orsay） [1](#1_27)  或唐寧街的人們覺得自己是歷史劇中的偉大演員—該劇決定國家的命運。他們頭戴羽帽，身著制服，保衛著國家利益這一神秘的寶藏，認為自己扮演無比重要的角色。

外交是閃耀而神秘的世界。在君主訪問和正式會議的光芒之下透著神秘，那里有國家的真正企圖和統治者的野心。外交不僅是偶爾的決定時刻，也是對線索的日常搜尋—線索存在于模棱兩可的聲明、新聞活動和經濟計劃、君主的話語或姿態、軍備和軍隊動向中。光芒之下，是最多只能一知半解，需要不斷為相互矛盾的要求尋找權宜之計的世界。外交官們相信，多虧他們的才能，歐洲國家才沒有發生沖突；他們是世界體系的醫生，如果沒有他們的小調整，那個體系將病痛不斷。和他們在軍中的貴族同胞一樣，這些人將自己描繪成國家安全的保衛者。與此同時，外交和戰爭仍然是貴族的職業，兩者都向參與者提供榮耀的誘惑 [2](#2_27)  。

外交是俾斯麥的生命。對他來說，外交政策的優先并非某種學院教條：外交事務是他的世界和激情。在外交的盾牌下，他帶領普魯士參加了三場絕緣的戰爭；1871年后，他意識到統一的德國很難再打一場如此沒有風險的戰爭。他的德國由外交和戰爭創造，他害怕它毀于勝利者聯盟之手。他想要和平與越來越大的權力，因為國際事務并非靜態系統，因為他知道在許多個世紀的失敗和分裂后，他的民族愿意為了對外榮耀而原諒國內的失望。因此，對俾斯麥而言，外交是生存的根本。

外交意味著將事物看作相互聯系的。在逼仄的歐洲，任何大國的任何舉動都會產生上百種深遠的影響—即使小國也能引起大風波。最重要的是，形勢在不斷改變，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新的問題和危機總是威脅著岌岌可危的權力平衡。利益和聯盟發生著變化，盡可能地預測和主導這些變化是俾斯麥的目標。

外交事務也是布萊希羅德的領域。在歐洲的幾乎每個國家和歐洲之外的許多國家，他同樣擁有實際或潛在的利益。他同外國政府談判，與外國銀行家和辛迪加結盟或者為敵。擁有國際關系的金融家是身著便服的政客。外國政府和銀行家需要他的幫助，他則需要他們的買賣。他的客戶名單很長，他的利益必然和國家利益產生交集。

布萊希羅德是典型的國際銀行家，既深受尊敬，又廣受詬病。這些銀行家是古代權貴的現代翻版—有時他們希望得到類似的尊重 [3](#3_25)  ，他們集結數以百萬計的資產，花起錢來就像過去的權貴派遣自己的人馬。

在投錢之前，布萊希羅德需要知道當地的狀況；他的計劃還要考慮到短期前景和長期戰爭或和平的可能。與更加有利的時候相比，戰爭前夕，購買俄國公債將面臨更多風險。和許多成功人士一樣，布萊希羅德也熱衷于某種本質上務實的行為：他希望了解一切人和事，并躋身偉大的外交界。在此過程中，他無疑還獲得受到許多人稱贊的精明判斷力，并擁有自己的整合能力，能從當下的可見事實推斷出未來的可能后果，這讓他有了第二雙眼睛。

布萊希羅德總是向往和平，他的愿望廣為人知。英國駐柏林大使曾表示：“俾斯麥對土希戰爭可能性的無動于衷讓布萊希羅德非常不安，作為銀行家，他是和平人士。”和平能帶來繁榮，而戰爭意味著不確定。股市憎惡不確定，就像自然憎惡真空。在談到奧地利和德國的軍事預算時，布萊希羅德的朋友戈德施密特曾寫道：“……我只能痛苦地哀嘆……為了我們的勛章，數十億資金被從工業和有用的生產中抽走，軍國主義犧牲了人民的福祉。”我們沒有布萊希羅德的類似表態，而且我們當然知道他在早年曾為戰爭籌款。但他無疑更看重和平，這是由他的世俗智慧和私心決定的 [[4]](#4_53)  。

不同于外交史學家或精心編輯過的檔案集所描繪的奧林匹斯神祇或冷漠的象棋大師，工作日的俾斯麥務實地看到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所有方面的相互聯系。正是由于他的更加務實，也許還因為他親身參與國家的經濟生活，他欣賞自己的銀行家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在俾斯麥看來，經濟事務是國家健康和意向的晴雨表—有時，他對該晴雨表擁有有限的權力。但他也知道，在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時，至少有時“激情比算計更有力” [[5]](#5_53)  。

俾斯麥的廣泛視野反映了他身兼多種職務：他是首相和外交部長，有時也擔任商務部長；英國大使將他形容為“德國的獨裁者”，擁有對所有領域的權力 [[6]](#6_51)  。與其他政客一樣，他有時也將國內和國外領域描述成分離或可分離的，但他知道世界并不那么簡單，對他和他的外交主角都是如此。外交是在明確的國內限制條件下在國外實現可能的目標。兩者永遠相互影響，俾斯麥還知道戰爭與革命緊密交織在一起：巴黎公社讓他想起這條歷史經驗。這兩個領域在經濟事務中的交集更加明顯。他總是認為國家應該在國內外推動商業利益，只要不損害與其競爭的更高利益。

因此，俾斯麥關心布萊希羅德的主要業務：外國貸款的發行。按照今天的術語，歐洲的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先進國家向欠發達國家提供的各種貸款。即使大國也非常需要外國信貸，就像俄國和奧匈帝國不斷表現的那樣。比起倫敦和巴黎，柏林的資本市場非常有限，面臨著想要為擴張融資的國內企業的巨大需求 [[7]](#7_51)  。因此，必須按照最好的經濟和政治標準明智地投資有限的資本。俾斯麥知道，將德國資本投資到國外能為德國帶來權力、影響和威望，還能擴大德國的市場。另一方面，他也擔心將德國資本投到國外將影響國內需求，或者讓外國（特別是俄國）具有戰略或政治優勢。簡而言之，資本流入和流出德國總是帶有政治意義。布萊希羅德整天與這些問題打交道，并不斷向俾斯麥報告情況。銀行家們希望在某些交易中得到政府的關照，不僅出于愛國理由，也因為在遇到麻煩時他們需要政府的支持。俾斯麥也極其密切地關注著經濟問題。

布萊希羅德的報告反映了任何操作的多面性。以1880年他寫的一封長信為例，他在信中警告俾斯麥，英國正在購買大量普魯士統一公債，導致價格抬得很高。比起英國投資者，德國投資者習慣于更高的利率，因此可能開始拋售所持債券，轉而把錢投到國外。他用自己的古怪方式補充說：“沒有辦法否決目前的動向；但根據我的愚見，有一個辦法可以阻止統一公債的快速上漲。”—那就是加快鐵路的國有化，這需要發行新的統一公債，從而擴大此類債券的市場。“從政治角度來看，英國人的購買行為應該受到歡迎，因為它們表達了英國公眾對德國政治與德國和平的信心。”盡管行文風格上有點不精確，但信息毫不含糊。俾斯麥在信底的批示字跡模糊，似乎表示布萊希羅德的信應該轉交給馬伊巴赫，“尋求政治指示” [4](#4_25)   [[8]](#8_51)  。我們知道，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都有其他理由加快鐵路的國有化。

俾斯麥知道，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影響是無數因素作用的結果。從政治生涯伊始，他就明白國內外政治的經濟方面，對這些關系持有現實主義甚至霍布斯式的觀點。他善于使用被后世稱為“經濟戰”的武器。在這個詞匯被發明前很久，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已經演繹過它的實質。對俾斯麥而言，戰爭與和平或者對立與結盟都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存在被假定為對立的巨大灰色區域。俾斯麥知道，經濟政策和他手中的許多武器在這個區域同樣有用。武器范圍從向被打敗的敵人索取巨額賠償到向潛在的朋友提供貸款—布萊希羅德參與這兩種情形中的重要案例。除了上述極端情形，還有征收選擇性關稅—通常有利于國內利益，打壓國外利益—或者采取進口限制，或者實施《抵押貸款禁令》（Lombardverbot），禁止中央銀行接受某種外國證券作為抵押品 [5](#5_25)  。有時，俾斯麥假意表示，這些商務政策應該被視作純粹的經濟行為，對外交沒有影響 [[9]](#9_49)  。但從根本上說，他知道它們相當于財政領域的戰爭與結盟，因此非常重視專業地使用它們。

俾斯麥一直密切關注著其他國家的經濟和金融狀況。1879年4月，他擔心奧俄開戰，并向法國大使提起俄國希望從法國獲取一筆信貸：“如果今年春天沒有俄國貸款，和平將得到保證；如果借錢給俄國，任何事都有可能。”1882年，他感到緊張，因為“……法國擁有的黃金超過它的需要” [[10]](#10_48)  。有時，他告誡大使們不要以為處于破產邊緣的國家肯定不會生事。錢是戰爭的驅動力，但空空如也的錢柜也不是和平的保證。國家可能為了獲利而走向戰爭。與此同時，外交官們關注著股市，金融家也關注著外交官們。市場根據其對政治消息的理解而波動；因此，它本身也成了政治的風向標。就像俾斯麥曾經指出的，對戰爭恐懼而引發的證券價格下跌常常會加劇那種恐懼 [[11]](#11_48)  。布萊希羅德不斷為俾斯麥點評政治的經濟方面或者市場的政治方面。比如，以1877年8月俄土戰爭期間他的書信為例，他報告“股市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股價因為土耳其的勝利而大幅上漲。這是因為投機者們仍然相信，俄國的虛弱將讓奧匈帝國置身沖突之外，從而增加和平的希望” [[12]](#12_46)   [6](#6_25)  。

由于大多數公使略去了這種骯臟的情報，布萊希羅德在提供和解讀經濟消息中的角色變得更為重要。公使們專注重要人物的意圖，將經濟事務交給領事們—后者沒有頭銜，在外交事務中不受待見。在德國外交部，高級政治和下層政治的區別被制度化，分成兩個不平等的部門：政治部門和商業—法律部門，后者在威望和影響力上遠遠低于前者，甚至容許吸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 [[13]](#13_42)   [7](#7_25)  。

因此，在俾斯麥的世界里，布萊希羅德是對官方渠道受歡迎的補充—當然，特別是因為他不可能被懷疑藏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希望成為俾斯麥的對手。（對俾斯麥的其他手下而言，“任何自立門戶或自作主張的嘗試都會被他［俾斯麥］立刻扼殺” [[14]](#14_42)  。）所以，俾斯麥頻繁和不斷地把他作為特使，作為與外國勢力和政客的額外與非正式聯系。政客們總是樂于擁有大量聯系人，用來試探反應、傳遞暗示、加強威脅或減輕恐懼。有時，布萊希羅德也會被正式委派執行這些任務；大多數情況下，他是俾斯麥主要的非官方發言人，因此，所有的對話者都能輕易地否定他。這種非正式補充的便利顯而易見：無論多么微妙，正式渠道總可能造成反應難以更改或限制以后的靈活性。相反，受到信任的第三方的話可以為官方交流增添砝碼。布萊希羅德的重要性正在于他的“不用負責”。不消說，布萊希羅德樂于扮演這樣的角色，而俾斯麥也知道此人的虛榮和自私讓他成為不知疲倦的助手。

舉兩個例子就夠了。1887年10月，當德俄關系特別緊張時，蘭曹向赫伯特·俾斯麥報告說：

爸爸早就對布萊希羅德發表長篇大論，指出舒瓦洛夫[俄國駐柏林大使]自欺欺人地以為我們擔心俄法聯手發難，因此向我們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我們希望避免戰爭，因為那會帶來財政和經濟問題……但我們不怕戰爭，我們的力量包括300萬訓練有素的戰士。爸爸希望布萊希羅德把這一切轉告舒瓦洛夫。 [[15]](#15_40)

在此之前，荷爾斯泰因曾致信赫伯特（對布萊希羅德最為嫉妒的敵人），表示在某場危機中，英國突然變得更加配合：“布萊希羅德也是馬雷特［英國駐柏林大使］的顧問，他的狡猾和對親王性格的了解不容否定，無論人們對他有什么別的看法。” [[16]](#16_40)

“對親王性格的了解”也許是歐洲各國政府最垂涎的情報。政客們總是在猜測俾斯麥，因為他的外交風格依賴刻意的模棱兩可—布萊希羅德可以幫助解開謎團。在秘密外交的時代，俾斯麥顯得特別神秘，就連他自己的下屬也被蒙在鼓里。他更喜歡不把敏感話題訴諸文字，曾經要求威廉二世焚毀他的一封來信，因為信中涉及的“事情和問題我通常不愿付諸文字，只要它們尚未真正開始發展，我只做口頭討論” [[17]](#17_34)  。俾斯麥總是“真誠地”做出各種表態，換句話說，他總是傳達部分事實。在模棱兩可中經常有坦誠之光閃過—當然，他的下屬或外國合作者仍然常常猜不出他的目的和政策，因為他本人并不遵循明確的道路，而是多管齊下。模棱兩可或令人生畏的城府是他常用的武器；有時，俾斯麥也會恐慌、威脅、拉攏和懇求—因為他的風格，難怪歐洲人經常把他稱作斯芬克斯；人們還注意到，威廉街入口臺階的兩側守衛著一對黑色石頭雕成的斯芬克斯 [[18]](#18_34)  。

人們都知道，布萊希羅德是那個斯芬克斯的親信和私人銀行家，他因此變得大受歡迎。在柏林會議期間，當布萊希羅德為歐洲政客們舉辦奢華的晚宴后，迪斯累利致信維多利亞女王：“布萊希羅德先生……是俾斯麥親王的密友，每天上午都要見他。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是唯一敢向首相說真話的人。” [[19]](#19_30)  迪斯累利幾乎肯定美化了布萊希羅德原本就夸大的話，但他抓住了布萊希羅德想要在世人面前展現的形象的實質。漸漸地，世人開始這樣看待布萊希羅德，幫助他成了他所渴望成為的人。我們將看到，梯也爾、迪斯累利、利奧波德二世和歷任俄國財政部長都試圖利用這條特殊渠道。柏林的外交團體常常討好他，并總是把他作為主要的線人之一 [8](#8_25)  。

不過，布萊希羅德也是德國世界的特殊使者，特別是對于俾斯麥的大使們和外交部的正式隨員而言。俾斯麥讓他們也蒙在鼓里；他對他們中的許多人缺乏信任，還擔心某些人是對手。他們被告知需要知道的，但僅此而已；他們同樣需要猜測俾斯麥在某個時刻的特別意圖。他們不像布萊希羅德那樣可以長期方便地接觸到俾斯麥，因此對前者趨之若鶩：哈茨菲爾特、明斯特、霍亨洛厄、拉多維茨和荷爾斯泰因—雖然他們都覺得這樣做有失身份，但沒有辦法回避布萊希羅德。作為外交部的常任官員，阿圖爾·馮·布勞爾（Arthur von Brauer）回憶說：“與老布萊希羅德交談總是令人愉快。我們不得不忽略他的猶太人舉止，但他智慧而敏銳的頭腦知道很多東西，他還用出色的政治意識把事物組合起來。”明斯特伯爵是俾斯麥最杰出的大使之一，先后在倫敦和巴黎任職，他與布萊希羅德保持著非常活躍和坦誠的通信，并對后者的消息深表謝意—比起微不足道的官方報告，這些消息更加權威和迅捷 [[20]](#20_30)  。

荷爾斯泰因對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和所謂的影響而抓狂；赫伯特對自己的父親與布萊希羅德的親密關系感到憤怒，這種關系正好涵蓋赫伯特被安排繼承父親衣缽的那個領域。但早在赫伯特還穿開襠褲時，布萊希羅德就是他父親的親信了。

不過，赫伯特有最特殊的理由憎惡布萊希羅德的“骯臟干涉”，他總是認為父親與布萊希羅德的密切關系源于后者的誘惑和假意效忠。更糟糕的是，赫伯特和荷爾斯泰因等人認為，布萊希羅德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支持或打擊俾斯麥的下屬。（荷爾斯泰因寫道：“羅騰堡私下里討厭布萊希羅德，但更多的是害怕。他認為，如果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說他的壞話，他就毀了。昨天他還對我說：‘是的，布萊希羅德是第一流的掘墓人。’”）赫伯特和荷爾斯泰因總是抱怨布萊希羅德腐蝕見錢眼開的人，包括他們的朋友和親屬（比如蘭曹）。此外，他們還懷疑布萊希羅德利用對俾斯麥的神秘控制和無限的資金打造諂媚者的網絡。1887年，赫伯特表示，布萊希羅德正在散布他希望離開柏林的謠言。他致信蘭曹說：“我完全相信，布萊希羅德更希望讓能被他收買的人留在這里，但目前他的陰謀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21]](#21_30)  蘭曹表示贊同，并向赫伯特保證，“當那頭討厭的‘布萊希’豬后天”來見俾斯麥時，他將狠狠地給其顏色看 [[22]](#22_30)   [9](#9_23)  。

當然，外交官們與布萊希羅德的親密關系還有另一個理由：他們大多是窮貴族，在各自所在的國家被迫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支出不僅超過薪水，還常常超過全部收入。重要的外交崗位仍然大致按照《哥達年鑒》（Almanach de Gotha） [10](#10_23)  分配，但財富不再如此。1877年，當帝國議會拒絕將明斯特伯爵的薪水從3萬馬克提升到15萬馬克時，他威脅辭職。可以言之鑿鑿地說，甚至在19世紀初，英國的外交已經“顯然是紳士的職業；很少有人能靠薪水過活” [[23]](#23_30)  。因此，對于肩負代表重任的大部分公使而言，錢讓他們一直不得安寧。許多人選擇成為布萊希羅德的客戶：這又是對首相的模仿。他們都對他的建議表示感激。這樣一個對市場狀況和歐洲形勢同樣了解而且能感受到兩者相互作用的人，對他們特別有吸引力。顯然，關系中的這個方面讓他們更加坦誠：布萊希羅德的“無所不知”與他所有的客戶利害攸關。

對布萊希羅德的自尊和買賣而言，上述多重角色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他通過這些角色收獲好處。但記錄顯示，他也接受一些無利可圖的投資委托，而且俾斯麥政府有時無視他的請求，不愿改變立場。簡而言之，盡管與政府關系密切，他還是飽嘗職業上的失望，比如被國際財團拒之門外，或者利益被競爭勢力侵犯。不過，偶爾的挫折以及與俾斯麥或羅斯柴爾德家族間歇性的爭執讓他保持警醒。他已經成為柏林最富有的銀行家，擁有最顯赫的聯系人—他還努力保持和擴展自己的角色。

在開始講述布萊希羅德在外交事務中的某些具體任務前，也許有必要先勾勒一下他行動的政治背景，總結他的聯系人和通信所透露的東西—更多的不是外交史實，而是當時“未被說出的假設”。布萊希羅德的同時代人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呢？

最簡要地回顧政治結構就足夠了 [[24]](#24_28)  。隨著德國的統一，歐洲的力量平衡發生改變，柏林成了歐洲大陸最重要的首都。大國仍然是原先的五個（俄國、奧匈帝國、德國、法國和英國），意大利不斷在努力，但很少達標 [11](#11_23)  。在大國中，法國對德國永遠懷恨在心，俾斯麥最大的夢魘是法國有朝一日成為新的反德同盟的核心。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向歐洲保證，德國已經志得意滿，因此不會惹事（但在德國境內有太多喜歡惹事的外國人）。與此同時，他為擴大德國的影響展開不斷的斗爭。作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德國處于人們懷疑的目光之下。俾斯麥希望德國令人恐懼而不是愛戴，因為恐懼是最好的震懾。沒有人想當然地相信他的仁慈或和平意圖，在和平聲明背后總有足夠的金戈之聲，提醒歐洲勿忘俾斯麥好戰的過去和德國當下的強大。

俾斯麥關心權力的實質而非形式。可見的霸權或持續的擴張將促使其他國家擱置矛盾，共同應對德國的威脅。他交替利用和調解他國的矛盾，這是讓其他大國依賴德國外交的方式之一。

在大國中，由于國內的動蕩和對外的仇恨，法國被認為最不穩定。英國被認為是一個在近東和印度擁有重要利益的帝國，除了俾斯麥的死敵—在道德上毫不妥協的格萊斯頓曾威脅把激進原則強加給英國政治，英國的國內形勢一直保持穩定。奧地利和俄國的國內體制不穩，對外利益相互沖突。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俄國擁有巨大經濟潛力，但需要大量資本才能實現。布萊希羅德希望德國提供資本。

在俾斯麥執掌外交的二十年間，具體的危機區域和敵我陣營常常改變。直到1875年，法德重開戰端的危險一直籠罩著歐洲外交。1875年后，東方問題成了對和平的主要威脅。腐朽的土耳其帝國再也不能控制巴爾干臣民的民族主義愿望；這個帝國注定將分崩離析，俄國、奧地利和英格蘭都希望獲得豐厚遺產，至少也不能讓他國得手。

在第一個階段，俾斯麥重建三帝同盟—與其說這是對聯合行動的有形承諾，不如說是在意識形態上重申保守勢力的團結 [12](#12_21)  。在第二階段，他試圖扮演“誠實的掮客”—他在1878年柏林大會上的主席身份象征這個角色。很早就有傳言稱，布萊希羅德曾提醒俾斯麥，不存在誠實的掮客這樣的東西，而俾斯麥也發現俄國不滿他的斡旋，開始反對德國。俄國擴張主義和法國復仇主義的結合對德國構成致命威脅。

1879年，俾斯麥一改自己在歐洲政治中偏好的靈活立場，與奧匈帝國結成牢固的防務聯盟。威廉強烈反對疏遠俄國，布萊希羅德也警告俾斯麥，“與奧匈帝國結盟無異于把我們和一具尸體捆綁起來” [[25]](#25_28)  。俾斯麥逐漸將更多國家納入自己的新聯盟網絡，并希望與法國簽訂盟約。他的首要目標仍然是限制奧俄在巴爾干的矛盾。隨著東方出現新的沖突，俾斯麥不得不有所偏袒，而英國也選擇了塞浦路斯和埃及。19世紀80年代初，在仍然尋求與法國和解的同時，他不時在殖民地問題上對英國表現出敵意。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德國已經儼然是奧地利的保護者，俄法聯盟的可能性變得更大。最終，他的外交越來越多地陷入國內難題中。面對突然登基的魯莽而年輕的威廉二世，年事漸高的首相采取了各種即興政策，但似乎都與國內外的政治力量對不上調。甚至布萊希羅德也不認同俾斯麥違背原則和自身利益的反俄政策，嘆息著回憶起主人似乎是真正統治者的日子。

歷史學家的事后觀點很少能真正反映出前人不確定的預見。布萊希羅德屬于這樣的人，他們的成功取決于對未來的正確評估；他的朋友和客戶們在來信中特別坦誠，從他的書信中—數以千計的信此前未被研究過—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他所在世界的環境、政治狀況和判斷風格。這些信為那代人的主張和價值觀提供新的信息。

歐洲最重要的外交官和政客如此頻繁和坦誠地給布萊希羅德寫信，這個事實暗示他們的某種觀點：盡管高層被隱秘籠罩（在某些方面正因為如此），世界仍被認為是完全可知的。政治被認為掌握在相對少數人手中—因此，關于這少數人及其期望、健康和計劃的消息變得寶貴。甚至同盟關系也被認為不可靠，因為就像俾斯麥曾經對奧多·羅素勛爵說的，同盟“有時依賴個人的生命” [[26]](#26_26)  。顯然，這些書信反映了政客的個人恩怨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俾斯麥被盛贊為“務實的政客”，但他讓自己的反感和仇恨超越國界，對戈爾恰科夫（Gorchacov） [13](#13_19)  和格萊斯頓的反感幾乎決定他的政策。

當時的人知道國際政治不可預測。從普法戰爭結束到19世紀90年代出現敵對集團間的和平歲月里，這些書信描繪了當時的動蕩與緊張。對觀察者來說，歐洲永遠無法確保長久的和平。戰爭的陰云先后籠罩著西歐和東歐，只要一有危機，人們就開始擔心戰爭。后人對那個時代的概括也許會讓布萊希羅德的通信者們吃驚：“人們忙著賺錢，沒時間考慮戰爭……他們開始相信和平與安全是‘常態’，其他的一切只是意外和反常。” [[27]](#27_22)  相反，這些人認為自己注定將在戰爭的陰云下追求財富。某處爆發戰爭的威脅總是伴隨著當時的人，但比起后來，戰爭的可能并不那么令人恐怖—既因為戰爭的性質，也因為威脅無時不在。

在那個各國間關系非常緊張但還算安穩的世界，對線索的尋找從未停止。由于人們普遍相信，每個人都喜歡威脅其他所有人—這是所謂的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基本規則，從道德和政治上說，任何選擇都是開放的，盡管事實上很可能并非如此—每個舉動都值得仔細玩味。人們永遠不能放松。就像1883年法國外交部長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所說的：“我和你一樣認為目前歐洲的和平沒有受到威脅；但不可見的力量總是在人類事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絕對相信現在是明智之舉。”一年后，明斯特伯爵抱怨說，即使天邊萬里無云，突降的暴風雨仍能帶來致命的威脅 [[28]](#28_16)  。俾斯麥樂于提醒布萊希羅德等人：有時戰爭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發生；他喜歡舉1870年的例子—也許有點口是心非。

極端的變化無常有時會凝結成特別的夢魘，比如當一系列負責的英國人害怕俄國進軍印度，或者像迪斯累利和圣瓦里耶這樣的重要政治家擔心德國吞并荷蘭時 [[29]](#29_16)  。如果不是對外交官如何做出反應和決定提供了某些線索，我們可以忽視恐懼的突然升級和固化，就像大多數歷史學家那樣。反復出現的恐懼幫助描繪當時的“氣候”：陽光總被認為是暫時的反常，每次真正的暴風雨背后是幾十次錯誤的預報。換一種比喻：人們認為，決定國際政治的是人而非盲目的力量，上述紛繁迷離的景象似乎印證這種假設。人們很少關心歷史學家所謂的根本狀況，這種對事物表象的執迷—也許人們永遠無法擺脫它—是造成習慣性（也許并不讓人反感）緊張狀態的原因之一。

這些專業人士對祖國和自己的利益同樣關心，他們的坦誠書信的不尋常之處在于對政治的深層次或“根本”原因的恐懼和集體忽視。這些書信反映了國際秩序的脆弱，反映了人們普遍擔心國家會像捍衛某些更加有形的利益那樣堅決捍衛自己的威望和地位，總是認為失敗或外交挫折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俾斯麥言辭犀利地警告不要實行威望政治，不要為成功的表象付出高昂代價，他認為大國不需要如此故作姿態。不過，大國很少這樣做，盡管發表了上述言論，但俾斯麥也知道威望是權力的元素之一，因此需要被特別保護。明斯特伯爵曾致信布萊希羅德：“在這個時代，所有人都想變得強硬（schneidig）。我討厭這個詞，強硬只是對野蠻和力量的混淆。” [[30]](#30_12)

銀行家和外交家談論和害怕戰爭，總是向往和平。他們夸大了自己面臨的危險嗎？布萊希羅德的通信似乎暗示這點，信中同樣充斥著從未發生的戰爭。但戰爭一直與歐洲為伴，沒有誰能保證這代人可以逃過共同的災難。無處不在的恐懼可能還有實際作用：它也許產生了抵消戰爭威脅的力量。

恐懼的作用可能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它讓外交官們確信自己有價值。對這個職業來說，危險的幻覺可能相當于尋求冒險。另一個理由也許是：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對戰爭的恐懼可以被用來對付國內的騷動。布萊希羅德的通信者屬于特權精英，他們都含蓄地（也有人明確地）表達對國內敵人、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擔憂。俾斯麥是編造外國威脅的大師—但在專業人士圈子里，通過夸大外國威脅來抑制國內激進主義的民族主義煽動者并不受到同情。他們無疑都憎惡民主，更別說社會主義了。但他們似乎認為，與戰爭或沙文主義相比，和平更有助于帶來繁榮和抑制革命。

此外，這些書信中很少流露出對所謂的社會帝國主義沖動的認識，更別說縱容了。與布萊希羅德同時代的德國人的世界以歐洲為中心，新的殖民主義以及對非洲和亞洲的瓜分只是邊緣。如果按照近來的說法，帝國主義在1890年前就在德國精英中成為焦點，那么當時的主角們很少意識到這點—否則在與自己銀行家的親密通信中，他們一定會吐露心聲。事實上，布萊希羅德卷入薩摩亞（Samoa）和剛果（Congo）的殖民地事務，并參與對奧斯曼帝國和埃及財政的監督。19世紀80年代末，他又開始對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前景產生興趣。但不能認為在19世紀70和80年代，布萊希羅德的同時代人特別關心帝國的誘惑力—除非他們對彼此隱瞞。相反，他們的信中只是順帶提到在非洲、南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的真正帝國競賽。他們以歐洲為中心—也許到了過分的地步。

法國是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投入最多和最持久興趣的國家。俾斯麥生于滑鐵盧戰役打響的那年，記得法國軍隊和法國革命理念曾經引發的混亂；無論是1870年的戰敗、巴黎公社抑或共和國的不穩定都沒有讓俾斯麥忘記那個“偉大國家”的力量和威脅。他非常了解法國，在那里度過了人生中某些最幸福的時光。他喜歡用法語交談，展現出像他的德語那樣的獨特靈活性。對布萊希羅德來說，法國是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故鄉，該家族幫助自己父親的公司聲名鵲起。與巴黎的聯系是他最重要的海外關系。他同樣非常了解法國，與法國外交官和政客關系特別親密。

對俾斯麥來說，比起曾經的法蘭西帝國，戰敗、分裂和懷恨在心的法國是個麻煩得多的鄰居。一切確定性都消失了：梯也爾和他的保守共和國能維持多久？他會被君主復辟取代嗎？法國會陷入無法預計的混亂、雅各賓派主義和新的軍事獨裁嗎？哪種統治最有能力統一這個國家并在歐洲找到盟友，從而把復仇欲望（俾斯麥對此深信不疑）轉變成務實態度？

多年來，俾斯麥一直關注著法國，特別是因為他的主要下屬（司令官曼陀菲爾將軍和德國大使阿尼姆伯爵）自作主張，執行與他相反的政策。俾斯麥把梯也爾看作德國所能期待的最佳人選，因為此人有足夠的力量在規定時間里還清戰爭賠款，但又不足以推行復仇主義政策。正是這種想象中的復仇危險讓俾斯麥考慮或至少威脅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他對法國的擔憂持續到1877年，直到他對溫和共和國的希望成為現實和東方的新危險轉移他的注意力。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試圖與法國簽訂盟約，但在統治的最后三年重新變得好戰。

布萊希羅德同樣被法國事務深深吸引。與俾斯麥的密切關系影響了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他們仍然重視與他的關系，但反感他們的代理人轉向普魯士主義，反感他對一位令法國人恐懼和憎惡的暴君卑躬屈膝。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戰爭賠款是他的金融和政治成功的試金石。1871年2月，他前往凡爾賽，來到俾斯麥的身邊，并希望以這種榮耀為跳板通向下一個有利可圖的任務：收取巨額賠款。歐洲從未有過如此復雜的金融交易，政治影響讓它變得更加復雜。簡而言之，法國越快付清賠款，德軍就會越早結束對法國領土的占領。大衛·蘭德斯關于賠款的論文權威地描繪了這個史無前例的事件的復雜和相關的陰謀 [[31]](#31_12)  。

蘭德斯指出，賠款的支付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法國人如何籌錢以及如何“把這筆錢交給德國人，但不打破國際收支平衡……？”德國人規定可以接受的錢和票據（金條和大銀行的支票）。第一筆10億賠款將在梯也爾政府打敗巴黎公社和回到巴黎后的一個月內付清。法國政府必須決定如何籌錢（它選擇以資本課稅或稅收為抵押尋求連續貸款），如何轉賬，如何在短短一個月內完成全部工作。它不得不依靠歷史悠久的歐洲私人銀行。這些銀行開始相互競爭，為了爭奪一席之地，它們陷入最為混亂的陰謀和對抗，一切都在不擇手段的氣氛中和無情的最后期限面前展開。布萊希羅德希望，與俾斯麥和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能讓他擁有決定性的優勢；但其他人試圖將其排擠在外，包括他長期的合作者，貼現公司的阿道夫·馮·漢澤曼。與銀行家的狂熱競爭相對應的是兩國政府的談判，由于德國人眾說紛紜（曼陀菲爾和阿尼姆都自行展開談判），談判變得更加復雜。盡管布萊希羅德提出請求，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是把首批貸款分配給全歐洲，他只獲得很小的份額。讓布萊希羅德滿意的是，法國人交給德國占領軍當局的德國銀行支票大部分由布萊希羅德承兌—這反映出他的地位，并帶來一小筆（比起早前的預期）收益 [[32]](#32_12)  。

在第一輪賠款期間，布萊希羅德的眼疾大大加劇，不得不暫時讓表弟和合伙人尤里烏斯·施瓦巴赫主管此事，后者比他本人更加強硬和直率。不過，施瓦巴赫事無巨細都向布萊希羅德做了請示。幸運的是，他在1871年夏天的來信完整留存下來。

仿佛銀行家之間的對立和鉤心斗角還不夠讓布萊希羅德煩惱—施瓦巴赫安慰說，他的病完全是“神經性質的”—他還被卷入德國官場的貪婪。俾斯麥從不信任自己的下屬，對軍人插手政治更不放心。法國的德國占領軍司令是埃德溫·馮·曼陀菲爾，此人在19世紀60年代就反對過俾斯麥的政策。法方派到曼陀菲爾那里的全權代表是圣瓦里耶伯爵，1871年春天和夏天，他們都待在南錫，兩人的接觸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尊敬和個人溫情，這在19世紀的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就非常罕見，在我們的時代更是聞所未聞。他們都是貴族，都極其老派，可能都擔心德國人的嚴厲會讓“惡徒”（canaille）的革命力量死灰復燃（巴黎公社剛剛被鎮壓） [[33]](#33_12)  。曼陀菲爾主張對法國人采取懷柔政策，并直接向威廉和俾斯麥提出這點。1871年7月，在法國付清第一筆分期賠款后，他要求馬上從三個被占省份撤軍。

在干涉俾斯麥勢力范圍的同時，曼陀菲爾還做了另一件冒險的事—鑒于他的偏見，此事令人驚訝。他發電報給布萊希羅德，要求后者來貢比涅（Compiègne）商討“一件非常重要的金融事務”。布萊希羅德仍然因病在溫泉療養，于是派遣自己信任的助手萊曼前往。布萊希羅德猜測，曼陀菲爾希望得到關于法國付款方式的專業建議。事實上，他要求布萊希羅德把1000萬塔勒拿去投資，這筆錢是他從法國支付的占領軍費用中省下來的。保密事出有因：占領軍費用應該用于實際支出，而不是巨額賠款的一部分。俾斯麥明白占領的骯臟性質，早在1870年12月，他就“把占領軍比作樹上的毛蟲，啃遍了整棵樹” [[34]](#34_12)  。

曼陀菲爾的要求讓萊曼、施瓦巴赫和布萊希羅德吃驚。三人當時的通信留存下來，大多使用暗語（可能是施瓦巴赫臨時想出的），“帝國”（Der Reiche）是俾斯麥，“異教徒”（der goi）是曼陀菲爾—這個詞既帶有貶義，又沒有特指。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通報了這次召見。等他發現曼陀菲爾試圖向俾斯麥隱瞞該交易時，為時已晚。二十年后，在向布萊希羅德索取一大筆捐助時，施托什將軍告訴他，那筆交易的目的正是為了繞開“內閣賬戶”的中介 [[35]](#35_12)  。布萊希羅德的老朋友科伊德爾仍然與俾斯麥的手下非常親近，他同樣聲稱自己參與安排曼陀菲爾的征召。“我很高興能把這件事交到你手中，特別是考慮到之前發生的陰謀，因為我確信王國政府再也找不出哪家銀行能提供更加寶貴和無私的服務。” [[36]](#36_12)  盡管有科伊德爾的來信，布萊希羅德仍然擔心自己犯了大疏漏，讓俾斯麥知道曼陀菲爾有意為軍隊設立小金庫。他請求俾斯麥“不要告訴曼陀菲爾將軍，我擅自向您通報這些情況”。俾斯麥沒有回復，這讓布萊希羅德更加焦慮。十天后，布萊希羅德又給俾斯麥寫信，“擔心我那不起眼消息的命運”，并報告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關于法國下一筆賠款提出的新建議。幾天后，布萊希羅德收到簡短的回信，表示來信已收到，但沒有保證將布萊希羅德的信息保密；俾斯麥還拒絕羅斯柴爾德提出的用法國公債支付賠款的建議，并輕描淡寫地把類似的建議此前已被拒絕作為理由：“我們沒有理由與人方便。”（Zu Gefälligkeiten haben wir keine Ursache.） [[37]](#37_12)

布萊希羅德覺得整件事令人尷尬，但施瓦巴赫向他保證，俾斯麥對其沒有惡意，事實上還希望他盡快造訪伐爾岑。不過，此事是俾斯麥的下屬們不得不在秘密和不確定氛圍中工作的早期例證。在這件事中，布萊希羅德只是提心吊膽地過了些日子，而曼陀菲爾的小金庫很可能落入了某個公共戰爭基金。記錄中再也沒有提到這筆錢。

回到賠款：法國人準時完成第一筆支付，而且出奇地順利。這要歸功于人們對法國信用的信心和國際銀行財團的高效運作。俾斯麥對這次大獲成功印象深刻，但也有點擔心。不過，賠款問題又拖了兩年，經過無數官方和非官方談判。（下一次的重大賠款是一戰后德國的賠償，如果不是十二年后德國違約，可能會拖上六十年。）對銀行家來說，賠款過程的每個階段都牽涉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包括出售公債、存入收取的錢、資金轉賬和收取傭金。對這兩個國家來說，賠償牽涉關系的正常化，對法國來說還牽涉驅走“德國毛蟲”。

1871年法國付清第一筆賠款后，曼陀菲爾與俾斯麥的分歧馬上變得尖銳起來。前者與法國財政部長舉行談判，并直接向威廉提出建議，這惹惱了俾斯麥。曼陀菲爾對圣瓦里耶吐露心聲，認為俾斯麥的怒火源于他對曼陀菲爾可能取代自己的恐懼，也源于他不愿結束緊張局面，因為他通過“經常合作的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伯爵和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等人”參與某些股票交易運作 [[38]](#38_12)  。當然，俾斯麥也曾譴責阿尼姆有類似行徑。令人稱奇的是，對立的德國領導人常常覺得他們反對的政策背后存在某種骯臟的投機。如果不考慮其他原因，這些懷疑暗示人們始終沒有忘記從股市牟利，但仍然恥于這些想法，很樂意把它們投射到對手身上：俾斯麥在他的法國政策中沒有物質利益。

在曼陀菲爾給圣瓦里耶寫這封密信的第二天，俾斯麥在與法國駐柏林代辦德·加布里亞克（M.de Gabriac）初次見面時就狠狠地斥責了后者。俾斯麥對法國人與曼陀菲爾的關系表示憤怒，指責法國人陰謀報復（當時還是1871年8月！），只愿意支付20億，“當剩下的30億在1874年到期時，你們將對我們開戰”。俾斯麥展現了跋扈而直率的自我。加布里亞克指出，俾斯麥喜歡氣勢洶洶地冤枉別人，以便為自己不懷好意的計劃尋找借口 [[39]](#39_12)  。當時，法國駐柏林的代表們擔心，即使法國支付了4999999999法郎，在付清最后一個法郎前，沒有一名德國士兵會離開法國。德國人究竟想要金幣還是一磅肉—或者像某些法國人所擔心的，兩者都想要呢 [[40]](#40_12)  ？

在1871年8月末的一次此類危機中，俾斯麥讓布萊希羅德充當他的“秘密代理人”，威懾反對梯也爾的法國人。與俾斯麥和威廉同在巴德加斯泰因的科伊德爾致信布萊希羅德，談到來自法國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以及復仇主義者和反梯也爾騷動。

我請您讓您在巴黎的朋友們不要懷疑，我們認為形勢非常嚴峻；如果新政府不能像現政府這樣令我們有信心，占領軍的數量將馬上增加。如果對方把此舉視為敵意，那么我們認為應該先發制人，發動進攻阻止這種苗頭。對我們來說，如果對方不愿遵循和平道路，重開戰端的想法很正常，而且一切都做好了準備。

通過對巴黎“有影響人物的暗示”，布萊希羅德也許可以避免那里做出不利的決定：“也許我們這里把情況看得太悲觀了。” [[41]](#41_12)  科伊德爾設法保證讓布萊希羅德和施瓦巴赫收到這些悲觀的消息，好讓他們向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施壓—后者對此感到厭惡。在執行俾斯麥的委托時，布萊希羅德總是更加高調，而施瓦巴赫則更加謹慎。但俾斯麥授意的游說很少考慮到緩和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布萊希羅德之間已經相當緊張的關系。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度既不回信，也不與這家柏林銀行展開日常業務。有一次，施瓦巴赫甚至承認他“擔心”這些信惹惱羅斯柴爾德家族。他想要的是他們的生意：“你知道，否則我對這類事毫無興趣。” [[42]](#42_12)  與布萊希羅德不同，施瓦巴赫并不覬覦政治角色。就像這個例子所顯示的，政治角色既可能幫助也可能損害生意。

從1871年到1873年，布萊希羅德扮演多重角色，常常相互矛盾。在與賠款問題相關的所有技術事項上，他是俾斯麥的顧問。在俾斯麥的要求下，他與法國人舉行間斷性的非官方談判。他還試圖保持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特殊關系，并實現自己最大的目標，即在負責最終賠款支付的任何國際財團中擔任德方的首腦。他經常請求俾斯麥采取更加懷柔的政策—這不僅有利于和平和財政健康，也符合布萊希羅德本人的利益。他還常常請求法國公眾（特別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加配合，因為“毫無疑問，只有當最后的德國軍隊離開法國土地時，法國的繁榮才會開始……只有當政府停止賠款時，仇恨的刺痛才會變得可以忍受”。或者按照他更樂觀的說法：只有當賠款問題解決和德國撤兵后，“兩個國家才能結盟” [[43]](#43_12)  。梯也爾也認為，“我們的土地有德軍存在就像傷口上有異物” [[44]](#44_11)  。

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取決于他同時與俾斯麥和羅斯柴爾德保持著關系。不過，他也因為這種角色而付出代價，像所有的中間人那樣經歷挫折。有時，雙方都對他不滿。羅斯柴爾德家族接受他的信息（但常常向他隱瞞消息），和他一起對敵人和干涉者的詭計表示憤怒，但仍然遵循自己的路線。所有人都為自己考慮，巨大的金額和如何執行這筆龐大交易的不確定性吊起所有人的胃口和懷疑。

1871年10月，法國財政部長奧古斯特·普耶—凱爾蒂耶（Auguste Pouyer-Quertier）來到柏林，俾斯麥把他引薦給布萊希羅德。兩人討論下一筆支付的方式，后續談判轉至巴黎，由布萊希羅德信任的下屬伊莫爾曼（Imelmann）負責。法國人擔心找不到可接受的支付工具，普耶—凱爾蒂耶建議布萊希羅德銀行接受2億法郎的銀行支票，只要德國政府認定支票是有效的支付方式 [[45]](#45_11)  。布萊希羅德試圖讓俾斯麥對該方案感興趣，但俾斯麥厭倦了他的游說。1872年1月，俾斯麥寫信給他，表示他的提議不夠清晰，而且“除非法國政府提出與我們的談判有關的官方動議……我才會開始考慮這些提議” [[46]](#46_11)  。

這正是布萊希羅德敦促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去爭取的，他希望新的法國駐柏林大使也能提供支持。梯也爾選擇德·貢托—比隆子爵（Vicomte de Gontaut-Biron）擔任此職—此人是新共和國所能找到的一位藍血保守貴族，雖然他沒什么外交經驗，對德國事務也缺乏了解。俾斯麥對他的缺乏經驗頗有微詞，但威廉回應說，貢托—比隆的“古老高貴出身”要重要得多。布萊希羅德立即請求羅斯柴爾德家族讓貢托—比隆來見自己，“因為也許我能提供柏林其他人無法提供的幫助” [[47]](#47_11)  。兩人開始密切合作，貢托—比隆把布萊希羅德視作俾斯麥的秘密代言人；他設法維持這種關系，特別是因為1872年初俾斯麥盡可能地不見人。貢托—比隆對梯也爾報告說，俾斯麥更愿意使用中間人。法國人也逐漸意識到，俾斯麥很少相信自己的官方下屬，他和阿尼姆開始互相憎惡—這種仇恨也加深了他們本質上的差異。在寫給梯也爾的首批報告中，貢托—比隆表示，“布萊施羅德”（Bleischröder，他在兩人的所有通信中都用這種拼法）是“一位非常富有的銀行家，與俾斯麥非常親密，為后者打理生意”。他還提出一個在隨后的二十年間將讓外國代表們犯難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布萊希羅德？他的回答是：對布萊希羅德的信任應該“適度，但他的游說和溝通肯定為俾斯麥所了解并得到批準，因此值得特別注意”。梯也爾要求他聽取布萊希羅德的觀點，“他被認為比其他所有人更受普魯士信任，從他那里可以得到啟發我們的有用線索” [[48]](#48_11)  。梯也爾還屢屢更進一步，要求貢托—比隆向布萊希羅德提出具體建議，事實上把他作為所有金融事宜上的主要對話者。

1872年3月末，剛剛與俾斯麥見過面的布萊希羅德重申希望法國人就支付方式提出新的動議，并表示作為交換，德國人手中的法國戰俘將很快被釋放 [[49]](#49_11)  。4月，當法國人提出最初動議后，剛剛見過“我的朋友”的布萊希羅德提醒貢托—比隆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柏林“并不完全認同T先生的立場”，即梯也爾的軍事準備和在圣彼得堡的提議。“我希望您……利用對T的影響，說服他放棄剛剛選擇的方式，更加配合我國政府的想法。請您在看完信后立即銷毀。”—但羅斯柴爾德家族沒有從命，盡管他們幾乎不在乎信上的任何內容 [[50]](#50_11)  。

當布萊希羅德自愿充當喉舌，傳達俾斯麥的不滿時，阿尼姆伯爵在一個德國財團的支持下自行與法國人展開談判，布萊希羅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面臨被冷落的危險。這完全出乎布萊希羅德的意料：5月18日，他向巴黎保證，秋天之前不會做出任何決定；5月19日，他明顯帶著絕望向剛剛開始在伐爾岑休假的俾斯麥求助，告訴他阿尼姆正在與法國人談判，身邊是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和一群反對布萊希羅德的銀行家。（亨克爾得到威廉的支持，這被認為將讓俾斯麥與他為敵，因為當時國王和首相關系緊張。）布萊希羅德報告說，亨克爾率領的財團——

把我排除在外！在這項龐大的金融運作開始時，我非常榮幸地得到閣下的召喚，但現在伯爵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嚴重威脅到我的地位；我將此事告知閣下，以免今后被您埋怨：“如果你早點告訴我，我就會讓亨克爾伯爵知道，在這個金融問題上，他應該與你合作！” [[51]](#51_11)

俾斯麥的回信沒有留存，很可能不置可否。只要方便，俾斯麥就會設法相助。但當時的情況過于混亂，他可能不愿意為自己的私人銀行家做得太過分。他的文書洛塔爾·布赫爾一直向布萊希羅德通報情況，當布萊希羅德繼續不斷懇求俾斯麥時，布赫爾終于斥責前者，表示只有他膽敢打擾首相的休假 [[52]](#52_11)  。

1872年6月末，法國和德國簽署新的協議，協調法方的賠款支付和德方的撤軍計劃。7月初，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抱怨說，漢澤曼已經在巴黎待了十天，并在阿尼姆的幫助下成為新貸款的德方代理人。布萊希羅德準備忽略整件事，但表示“最后的10億賠款和將持續到1875年的占領及其開支令梯也爾憂心忡忡。他擔心議會的強烈反對—無論是真實的還是嚇唬人……”布萊希羅德說，他無意把俾斯麥的錢投入法國公債—當然，存在投資的可能性本身表明，盡管俾斯麥不時叫囂“世世代代的敵人”，他仍然和之前一樣信任法國的經濟實力，希望在投資時不以意識形態為根據 [[53]](#53_10)  。

布萊希羅德的煩惱沒有持續多久，不到一周后，他就在俾斯麥的關照下前往巴黎。他與梯也爾多次會面，但繼續抱怨阿尼姆的小團體把一切據為己有：“從金融角度來看，此行無甚收獲。”失望中的布萊希羅德至少加深了俾斯麥對阿尼姆的懷疑。他報告說，梯也爾擔心自己的政治前途，因為法國人認為新協議比和約更糟糕。他提醒俾斯麥，“梯也爾下臺后，局勢將惡化……似乎應該保住此人”。這條明智的建議同樣在與阿尼姆對著干 [14](#14_19)  。他還表示，凡爾賽的面貌比1871年時“無聊得多”；他仍然懷念當時飄飄然的氣氛 [[54]](#54_10)  。

他的巴黎之行遠非徒勞。他似乎架空了阿尼姆的小團體，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達成協議，由他的銀行擔任一部分法國貸款的德方代表。不過，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仍然緊張，而且維系的代價高昂。比如，在日常業務中，羅斯柴爾德家族要求對大額短期存款采用通常的利率—當柏林資金充足時，布萊希羅德發現很難賺得這么高的利息。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曾威脅徹底退出合作，布萊希羅德馬上謙恭地回應說，為了保持與他最尊敬的巴黎朋友們的關系，他會竭盡所能并承擔各種犧牲。失去這種關系將讓布萊希羅德難堪不已，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俾斯麥一樣）喜歡提醒客戶注意自己的從屬地位。無論如何，在最后一輪賠款中，布萊希羅德扮演核心角色并獲得豐厚回報。

法國的恢復勢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布萊希羅德。經過慘敗和內戰，經過艱難的和約和支付沉重的占領成本后，法國以驚人的速度重建了自己的軍隊和經濟。1872年10月，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保證，法國將無法像梯也爾預計的那樣在1873年底前付清全部賠款 [[55]](#55_10)  。1872—1873年冬天，布萊希羅德仍然習慣于傳達俾斯麥不時的挑釁，他還威脅（然后安慰）貢托—比隆，俾斯麥可能接受軍方的請求，不在原先約定的日期撤出貝爾福 [[56]](#56_10)  。但第二期法國貸款取得巨大成功，國際財團隨即順利地把法郎兌換成德國人愿意接受的金條和債券。1873年9月，法國人付清最后一個蘇（sou，當時法國的一種銅幣），最后一名德軍士兵也終于從法國土地上撤離—比計劃早了十八個月。梯也爾有資格得到國家的感謝。1873年5月，當他的政策確定將取得成功時，君主立憲派把他趕下臺。俾斯麥一直反對的君主復辟似乎近在眼前。法國仍然讓人非常擔心。

俾斯麥還懷疑新的法國統治者與他在國內的天主教敵人合謀。反過來，法國人也從來無法確定俾斯麥不會尋求預防性的戰爭，就像他的某些軍隊領袖所希望的。1875年4月，當俾斯麥禁止向法國出口馬匹后，危機爆發。德國報紙稱“戰爭近在眼前”，法國人也帶著半真半假的擔憂向歐洲其他國家求助。但俾斯麥做了讓步，戰爭的威脅煙消云散。他的動機仍不清楚。也許他想為與法國結盟消除誤會 [15](#15_19)  。6月初，赫伯特再次向布萊希羅德保證，目前他的父親看不到“和平有任何危險” [[57]](#57_10)  。當年年底，布萊希羅德的老朋友戈德施密特從維也納來信說：“除了瘋子，誰希望看到世界陷入戰火？……但還是有蠢人相信俾斯麥將重新與法國開戰，以便向法國人索取數十億錢財。” [[58]](#58_10)  多年來，法國人一直對德國人的意圖憂心忡忡；1877年5月，當俾斯麥通過布萊希羅德在巴黎的一位可靠的代理人得知，盡管法國的經濟恢復迅猛，“對德國的恐懼仍然超出一切想象！如果德軍沿著孚日山脈（Vosges）向巴黎進發，這看上去將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59]](#59_9)  ，他一定相當滿意。

俾斯麥維持著這種沒有根據的恐懼，但隨著1877年法國建立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他自己的恐懼消失了。在新的歐洲格局中—東方問題和加快步伐的帝國主義成了主導—他尋求與法國結盟。為了轉移法國的不滿，俾斯麥試圖為其尋求殖民領域的“補償”，支持法國在羅馬尼亞和近東的政策，并讓德國認可其在拉丁民族中的“卓越性”，理由是法國具有更高的文明程度和“融入更多日耳曼血統” [[60]](#60_9)  。當時，他甚至對法國大使表達吞并阿爾薩斯—洛林的遺憾，表示那是迫于軍方的壓力。俾斯麥指責他人的能力只有他靈活而又不斷自我美化的記憶堪能匹敵。他希望與法國實現真正的諒解，為此不惜犧牲其他大國的次要利益。他對法國大使表示：“我希望你們原諒色當，就像你們曾經原諒滑鐵盧。” [[61]](#61_9)  但法國人如何能原諒德國人無法忘記的東西呢？

對于這個新的階段，更換大使顯得很有必要，這對布萊希羅德來說是重大利好。共和政府召回貢托—比隆，俾斯麥已經開始討厭他，因為他被認為要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危機負責，而且和奧古斯塔皇后關系密切。圣瓦里耶伯爵成了他的繼任者—此人同樣具有無可挑剔的血統和保守觀點，但對德國事務熟悉得多。我們已經提到他成功地與德國占領軍司令曼陀菲爾建立親密關系。圣瓦里耶是理想的選擇，他年過四十，是個英俊的單身漢，德語流利，作為愛國者的他認為復仇沒有前途。在與布萊希羅德交往的外交官或政客中，圣瓦里耶可能是關系最親密和最真誠的一個。兩人經常見面，并持續合作。作為老派人物，圣瓦里耶覺得回報布萊希羅德的熱心和感情很容易。他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體現真正的友誼，以及對布萊希羅德健康和福祉的真正關心，很少有人表現得這樣。

圣瓦里耶抵達柏林幾周后，布萊希羅德安排他前往弗里德里希斯魯拜訪俾斯麥 [[62]](#62_9)  。這次長時間和不尋常的拜訪是俾斯麥與圣瓦里耶親密關系的開始。歐洲的麻煩來自東部；柏林會議后，俾斯麥不得不警惕俄國的憤恨；1879年4月，為了摸清俄奧緊張關系不斷加劇時德國的政策，圣瓦里耶在一周內與布萊希羅德多次見面 [[63]](#63_9)  。1880年后，俾斯麥的眼中釘格萊斯頓再次上臺。這是改善法德關系的良機，特別是如果可以讓法國把注意力轉向殖民冒險（如突尼斯），或者讓它和英國爭奪埃及。圣瓦里耶明白俾斯麥的意圖，在帝國戲劇性的“第二次奠基”時，他恰好在柏林。他認識到，德國的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一樣變幻莫測，而且同樣重要。他給法國外交部寫了關于德國國內政治的透徹報告，其中只有幾份被收入后來出版的《法國外交檔案》；不過，它們在這里都派上了用場。

布萊希羅德在這些報告中扮演突出的角色。他被看作俾斯麥的權威代言人，甚至比德國官場更加重要，因為俾斯麥被認為對布萊希羅德特別坦誠。布萊希羅德還一再被視為俄國財政和某些金融細節方面的專家，比如羅斯柴爾德在埃及的貸款和羅馬尼亞事件背后的主要推手。

圣瓦里耶從一開始就發現，他在柏林的任期既愉快又危險。他與柏林的關系非常好，但隨著法國政府越來越左傾，他在巴黎的庇護人瓦丁頓已不見蹤影。他的保守觀點成了不合時宜。早在1879年6月，俾斯麥就敦促圣瓦里耶為報效祖國而留任，不要顧及國內的激進浪潮；俾斯麥向他保證，自己永遠不會接受一位激進的大使 [[64]](#64_9)  。圣瓦里耶也多次向布萊希羅德求助：如果俾斯麥只對巴黎的新政府說恰當的話，圣瓦里耶就會被允許留在柏林。布萊希羅德動員赫伯特乃至整個德國官場，而俾斯麥也終于同意發揮自己的影響，因為就像他告訴奧多·羅素勛爵的，圣瓦里耶“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法國駐柏林大使” [[65]](#65_9)  。

圣瓦里耶暫時獲救—足以有時間回報布萊希羅德的恩惠。1881年7月，為了表彰其對法國戰俘的幫助，布萊希羅德被授予司令官級法國榮譽軍團勛章；對于十年前曾參與讓法國背上巨額賠款的人來說，這是很不尋常的榮譽。惡俗的巴黎媒體叫囂該榮譽被授予給“德國的猶太吸血鬼布萊希羅德”，并嘲笑說俾斯麥著名的看門狗“蘇丹”（Sultan）將是下一個獲勛者。霍亨洛厄親王向俾斯麥報告了這些抗議 [[66]](#66_8)  。

幾個月后，隨著曾經的激進共和派（現在是負責的政客）甘必大上臺，圣瓦里耶的命運無可挽回。他的位置被庫爾塞爾男爵 [16](#16_19)  取代，在甘必大很快倒臺后，此人又阻撓了旨在讓圣瓦里耶返回柏林的幕后操作。法國貴族把柏林大使視作美差，郁郁寡歡的圣瓦里耶不得不回到巴黎當一名普通的參議員 [[67]](#67_8)  。他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發泄怒火，并反復向后者保證，在柏林期間的所有朋友中，他只對皇帝夫婦和布萊希羅德還有感情。圣瓦里耶的信完美地記錄了貴族對平民政治日益強烈的反感，這種政治的代表包括“大惡棍”甘必大，他的“工具和卑鄙的靈魂”弗雷西內 [17](#17_13)  ，以及所有的共和派領導人—這些人在埃及的膽怯讓法國蒙羞，而像圣瓦里耶這樣的愛國者卻沮喪地被掃地出門。他是一個精明而感傷的保守主義者，滿懷受傷的尊嚴和敏感的絕望。他對布萊希羅德與庫爾塞爾和巴黎新政客們的關系感到遺憾，他的信中流露出某種“你居然也這樣”的驚訝。1886年，傷心欲絕的他無法接受被迫退居二線，年僅52歲就去世了。

資產階級共和派試圖收獲圣瓦里耶為法德和解播下的種子，布萊希羅德也很快開始與儒勒·費里（Jules Ferry） [18](#18_13)  和夏爾·德·弗雷西內等新人合作。他和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的校友萊昂·薩伊（Léon Say）頻頻通信。薩伊是參議院議長，還多次出任財政部長，他在當時的各種貨幣會議上扮演重要角色，這些會議主要涉及美國和歐洲的金融關系。布萊希羅德和薩伊一次次在馬林巴德舉行“會談”。

俾斯麥覺得法國政治令人困惑，而布萊希羅德的評論被證明有幫助—特別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俾斯麥對大使們的不信任不降反升。在數以百計的信中，布萊希羅德常常正確地預言將發生什么，或者揭示某些議會舉動和市場波動的“內幕”故事。俾斯麥讀了這些報告，還不時加上批注。即使僅僅想概括這些報告也是不可能的，舉幾個例子就夠了。1882年初，他正確地預言甘必大的倒臺和隨之而來的市場動蕩 [[68]](#68_8)  。幾天后，他提醒俾斯麥，聯合總銀行（Union Générale Bank）的倒閉將讓法國右翼的某些重要人物身陷囹圄或身無分文 [[69]](#69_8)  。（該事件還引發可觀的反猶主義者浪潮，因為受害者把銀行倒閉歸咎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陰謀。）他還常常進行更加一般性的盤點，1882年6月來信中的這段話算得上典型的例子：

在巴黎，人們擔心弗雷西內可能下臺。比起埃及問題，對法國市場打擊更大的是人們感到法國和英國不合。兩國間的嫉妒似乎接近高潮，英國可能希望與法國斷絕關系。客氣地說，法國對土耳其的政策非常幼稚。 [[70]](#70_8)

這里談到的是埃及問題，布萊希羅德對形勢的總結—在現代人聽來可能有點不成熟—接近當時俾斯麥本人的觀點。

當然，布萊希羅德也向法國的外交官和政客們通報情況。由于國際形勢如此變幻莫測，而俾斯麥的行為又常常令人費解，對文字或舉動的解釋變得非常有用。1881年圣瓦里耶離職時，俾斯麥正好開始加強拉攏法國人和轉移他們注意力的努力：他看到他們在埃及卷入與英國的糾紛，希望讓他們與意大利爭奪威尼斯。此外，法國人還涉足印度支那。俾斯麥樂于看到法國人把精力分散到新的地區，同時樹立新的敵人。很多時候，他盡可能表現得仁慈，真心希望德法同盟可以幫助遏制格萊斯頓。簡而言之，俾斯麥考慮和法國達成影響深遠的協議，后者可能逐漸變成對抗英國的新大陸同盟 [[71]](#71_8)  。

事實上，俾斯麥不斷變換著口風。因此，法國人極難讀懂來自柏林的大量不同信號。布萊希羅德的復雜角色表明，法國人對俾斯麥意圖的擔心遠遠超過俾斯麥對法國最嚴重的復仇動亂的擔心。法國人仍然害怕德國的力量，并對俾斯麥的行事風格疑惑不解，就像法國大使在1887年所描述的：“事實上，當俾斯麥想把某些政府置于其政策的控制之下時，恩威并施是他馴服手段的特征之一。” [[72]](#72_8)  法國人知道布萊希羅德經常充當俾斯麥的非官方代言人—但他總是如此嗎？他們不得不揣測他何時是俾斯麥的喉舌，何時代表政治的自我。不過，他們仍然注意聽他的話，并不時在背后嘲笑他。

圣瓦里耶的繼任者庫爾塞爾男爵和儒勒·埃貝特（Jules Herbette） [19](#19_11)  把布萊希羅德介紹給歷任外交部長。1883年，庫爾塞爾男爵請求時任外交部長的夏勒梅爾—拉庫爾（Challemel-Lacour）接見布萊希羅德：“這位銀行家是俾斯麥親王的心腹，為后者充當與某些大使間的官方中介。”會面過程中，布萊希羅德解釋了俾斯麥“對法國的友好感情”和他對法國殖民政策的支持。（圣瓦里耶對布萊希羅德與“敵人”見面并為他在柏林的繼任者說好話感到遺憾 [[73]](#73_8)  。）在這些場合，布萊希羅德儼然就是要人，他有時向霍亨洛厄親王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通報自己的行程，有時則偷偷出入巴黎，導致傳言夸大他此行的重要性 [[74]](#74_8)  。幾個月后，布萊希羅德再次來到巴黎（這次與他的土耳其生意有關），告訴德國大使館：“我們決不能允許弗雷西內走上前臺，因為他會把局面導向紅色，這將導致社會革命和隨后的反動報復。” [[75]](#75_8)

1884年初，庫爾塞爾建議新任外交部長儒勒·費里接見布萊希羅德。兩人進行多次“親密的對話……盡管命星近來略有黯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消息靈通，與首相的私人關系使得俾斯麥的重要舉動不可能完全逃脫他的注意” [[76]](#76_8)  。1884年春，俾斯麥延長三帝同盟，但試圖向法國保證，此舉的唯一目的是維持近東的和平形勢。與此同時，他還派遣布萊希羅德作為自己的私人特使前往巴黎。我們有費里對此行的描述：“當時，這個幾近失明的狡猾的老猶太人是首相的秘密代言人。他以‘秘密和完全私人的方式’來見我……［布萊希羅德說］那個老人想告訴你，我們非常非常友好。”布萊希羅德還表示，德國希望進一步改善與法國的關系，但俾斯麥不太敢公開這樣說，擔心影響費里在國內的地位。“他真誠而強烈地希望您長期執政。” [20](#20_11)  布萊希羅德傳達俾斯麥的意思，希望法國在埃及扮演領導角色。費里正確地指出，這將導致法國卷入與英國的糾紛，正中俾斯麥的下懷。俾斯麥還提出在土耳其問題上他會暗中相助。

然后，“老鱷魚”—費里在這次會議的記錄中如此稱呼布萊希羅德—傲慢地解釋說，在偏遠的弗里德里希斯魯，俾斯麥常常夸大諸如無名法國報紙上的反德文章這樣的東西。但他又表示：“為了讓他能繼續為德國服務，我們說服他去那里休養……您不會相信除了像我這樣的私人朋友，見到他變得有多難。”他繼續說：“您無法想象親王痛恨格萊斯頓到了什么程度！他憎惡這個人，也反感他的觀點。”布萊希羅德請求費里不要把他的此行告訴任何人，特別是霍亨洛厄。費里問，霍亨洛厄是否仍然受到親王的信任。布萊希羅德回答說：“是的，但并非完全信任。如果您想向親王傳遞什么私人信息，我將全力為您效勞。” [[77]](#77_8)  布萊希羅德的此行當然沒有逃過霍亨洛厄的眼睛，后者因此對他更加懷疑。霍亨洛厄認為布萊希羅德在陰謀反對自己，沒有意識到可能是俾斯麥希望利用布萊希羅德的弱點與權勢人物打交道。霍亨洛厄猜測，布萊希羅德試圖加深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奧爾良派的同情 [[78]](#78_8)  。在布萊希羅德的一生中，人們眼中他的邪惡其實常常是他的虛榮—他對此難辭其咎。

布萊希羅德對“法德同盟”的前景感到高興，并對自己的推動者角色洋洋得意 [[79]](#79_8)  。1885年2月，庫爾塞爾再次敦促費里接見布萊希羅德。他表示，無需夸大此人的角色，但“對我們來說，他仍然是睿智而樂于幫忙的中間人。您對他說的一切都會被非常準確地轉達給德國首相”。于是，費里接見了布萊希羅德—他稱其為“無照親信”（le confident marron）—多年后，他還記得這次談話涉及兩個話題：皇太子繼位后俾斯麥的命運以及法國涉足印度支那。對前一個話題，布萊希羅德預測皇太子將用大筆金錢換取俾斯麥退休；如果沒能奏效，皇太子將用其他辦法強迫他走人。對第二個話題，布萊希羅德熱心地表示，印度支那戰爭“不受歡迎”，法國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盡快結束它。“您想要柏林對此表態嗎？”當費里露出不悅時，布萊希羅德向他保證：“啊，完全不必正式。您無需向首相提出任何請求，只要把您想說的告訴我布萊希羅德就可以。”費里拒絕了他，看著布萊希羅德離開時喃喃自語：“‘您知道，我隨時待命，您只要對布萊希羅德說句話就行了。’一邊用手杖摸索著道路，因為他已經近乎失明。” [[80]](#80_8)  一位宮廷猶太人步履蹣跚離開的樣子生動地躍然紙上。

布萊希羅德尊重費里；這次見面后不久，他形容費里是“最好的總理”，但認為此人很快將因為印度支那下臺。印度支那戰爭的確導致費里的下臺，溫和共和派失去最好的成員。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在遙遠國度推行帝國主義都缺乏“對民眾的吸引力” [[81]](#81_8)  。法德同盟的希望沒有隨著費里的下臺而破滅，但變得日益渺茫。只有巴黎和柏林的強有力政府才能堅持這樣不受歡迎的道路—換句話說，只有強有力的政府才有足夠的自信忽視被認為總能調動選民情緒的沙文主義戰鼓。1886年，法國的民族主義熱情集中到一個新的人物—布朗熱（Boulanger）身上。除了他是個馬上將軍，具有不祥的吸引力和野心，對此人的一切看上去都沒有定論。他似乎利用了復仇主義情緒，在法德同盟尚未正式啟動前，他和其他壓力就讓同盟的希望破滅。

即使當主人早已放棄對親法政策的全部嚴肅希望，布萊希羅德仍然對此念念不忘。1885年，布萊希羅德在巴黎有了一個出色和意想不到的新盟友。俾斯麥最能干的大使之一明斯特伯爵被從他熱愛的倫敦召回，派往他討厭的巴黎—更讓他憤怒的是，巴黎大使的薪水不如倫敦。明斯特從巴黎繼續給布萊希羅德發來尖刻而敏銳的報告，即使今天看來仍是佳作。甚至像弗雷西內這樣的頂尖法國政治家也贊賞明斯特不凡的洞察力 [[82]](#82_8)  。此外，布萊希羅德還與費里的繼任者弗雷西內建立了個人關系。1886年9月，他與弗雷西內見面，并向俾斯麥報告此人的和平意圖以及對被其任命為戰爭部長的布朗熱的不滿。但只有等到布朗熱犯下大錯才能沒有后顧之憂地罷免他。弗雷西內“想要擺脫他，但什么都不敢做，擔心反而會導致自己下臺”。他“對埃及事務非常激動”，因為英國即將宣布成為埃及的保護國，法國輿論對此無法容忍—但布萊希羅德表示，持有埃及債券的法國人將對此表示歡迎。弗雷西內還提到英國在地中海沿岸的擴張，希望得到俾斯麥的支持。最后，布萊希羅德報告說，弗雷西內任命他的密友和下級儒勒·埃貝特擔任駐柏林大使，此舉將帶來“一位極其勤奮的人……但此人能否勝任仍然存疑！人們意見不一”。布萊希羅德將口頭報告其他消息 [[83]](#83_8)  。這是埃貝特第一次離開外交部任職，47歲的他仍然不為人知。布萊希羅德開始與弗雷西內通信，并交給后者對埃貝特“有利的”報告 [[84]](#84_8)  。

布萊希羅德與埃貝特本人的關系也很好，盡管不如與他的前任們親密。也許布萊希羅德對“第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法國大使”（《民族報》對埃貝特的稱呼，這讓他很惱火）的興趣要稍低一些 [21](#21_11)  。他和埃貝特頻繁見面，但盡管兩人相互依賴，卻稱不上推心置腹。埃貝特把布萊希羅德提供的信息轉交給弗雷西內，比如俾斯麥仍然對埃及不感興趣，但他補充說：“我越來越懷疑布萊希羅德先生的真誠。他出于本民族的天性和金融利益而參與政治。此外，他還與各個國家的大銀行家有生意關系，是他們誠實的代理人。” [[85]](#85_8)

1886—1887年，布萊希羅德憧憬的法德同盟夢想突然被對戰爭的擔憂取代，這是十年來的第一次。由于保加利亞問題的爆發和英國在埃及地位的穩固，國際形勢總體上變得更糟，但法國和德國并未產生新的矛盾—除了布朗熱制造的大量噪音，出于國內原因，俾斯麥對此小題大做。他必須迫使不友好的帝國議會接受新的軍備法案，對戰爭的擔憂正中他的下懷。

1886年，明斯特提醒布萊希羅德警惕布朗熱。與此同時，他不厭其煩地指出，雖然法國的沙文主義勢頭強勁，但仍然比不上對和平的渴望。共和政治令他反感，他曾寫道：“該死的，這是個什么國家。”—不過他反復提到的還是和平 [[86]](#86_8)  。然而，俾斯麥只聽到自己愿意聽的。1886年，當戰爭部長布隆薩特報告說，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正在購買大量馬匹，買主可能是法國人時，俾斯麥馬上要求禁止出口馬匹。他表示，這樣的禁令“除了軍事上的謹慎考慮，也會對議會產生有用的影響……如果進行新的選舉，它將正確地為選民指明形勢”。內閣接受該禁令，證據僅僅是說法語的代理人在某地訂購馬匹，據說還是為比利時！俾斯麥私下還指出俄國試圖從法國獲得貸款，并反復表示擔心法國一旦與俄國結盟就會開戰 [[87]](#87_7)  。俾斯麥逐漸相信自己的話，立場變得更為好戰。明斯特在信中對布萊希羅德說：

在這里，開戰的想法似乎不像在柏林那么流行。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個國家不想要戰爭。共和派知道，戰火燃起之時將是共和國末日的開始；原本有意戰爭的立憲派也不想看到開戰，因為他們無法確保勝利，知道失敗的后果將是最可怕的無政府主義。我仍然希望，一旦帝國議會接受法案，霍霍的磨刀聲將會有所平息。 [[88]](#88_7)

明斯特還表示，無論如何，真正的危險來自東方。如果不是德國的壓力，布朗熱將會很快失勢：在德國的威脅下，沒有法國政客能罷免他 [[89]](#89_7)  。

1886年12月23日，正當俾斯麥謀劃馬匹出口禁令時，布萊希羅德匆匆找到埃貝特，向他保證德國的任何公共騷動只是為了推動軍隊法案，“如果法國在這場風波中被提及，那只是因為‘不可能’提到這一切的真正元兇，比如俄國” [[90]](#90_7)  。（威廉一世反對公開表達任何對俄國的不滿。）在布萊希羅德的斡旋活動中，也許沒有哪一次像現在這么重要或迅速，盡管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直接得到俾斯麥的授意。隨后的幾周內，布萊希羅德多次向埃貝特重申這種說法。1887年1月和2月，德國的軍事準備讓法國人緊張。1887年2月，他們更為擔憂，因為法國情報部門截獲布萊希羅德的報告，“開戰決定已經做出”，只待俄國承諾中立 [[91]](#91_7)  。但當俾斯麥贏得選舉后，氣氛開始緩和，而且他不再需要布朗熱。

不過，那位將軍走上自取滅亡的道路。1889年2月，布萊希羅德正確地向俾斯麥報告說，布朗熱掌權的可能性正在變大，但此人間接地接受他的建議，正在與金融界高層鞏固關系；如此聽話的將軍不會對德國開戰 [[92]](#92_7)  。幾個月后，失去推翻一個弱勢共和政府機會的布朗熱開始流亡。

在俾斯麥任期最后三年的復雜外交中，法國不再扮演核心角色。讓俾斯麥擔心的是俄國的力量和奧匈帝國的敵意，而法俄結盟是他最害怕的。1887年6月與俄國簽訂的再保險條約只是為了降低危險，就像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反復向法國保證的，德國完全無意戰爭。另一方面，俾斯麥也對這兩個國家提出威脅，布萊希羅德有各種理由為德國的搖擺不定擔心。他在那個時期經歷復雜的掙扎，背景正是俾斯麥孤注一擲的最后任期。

俾斯麥下臺后，布萊希羅德與法國繼續保持著特殊關系。俾斯麥最令人不滿的對法舉動之一是1888年推行的護照規定，旨在盡可能地讓法國人前往阿爾薩斯—洛林變得困難。布萊希羅德和阿爾薩斯—洛林的新任帝國總督一直反對這種做法，但俾斯麥我行我素—也許是為了避免軍方提出更苛刻的要求。法國人被激怒了，明斯特伯爵也對這種做法提出強烈批評：“從一開始就錯了，這屬于那些甚至偉人也會犯的錯誤。”布萊希羅德請求俾斯麥允許暫停該規定。1891年9月，布萊希羅德在卡普里維和埃貝特之間展開非官方斡旋，終于徹底廢除那個挑釁式規定。對埃貝特和明斯特等人來說，法德關系緩和是政治上的熱望和職業上的驕傲，他們因此非常高興，并向布萊希羅德致謝 [[93]](#93_7)  。

在與法國打交道的幾十年里—面對不斷更迭的政府和永遠苛刻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布萊希羅德既收獲利潤和榮耀，也遭遇羞辱。他經常同時受到德國人和法國人的懷疑。他不是沒有利害關系的一方，這不可想象。但正因為布萊希羅德是銀行家，他才扮演了真正的調停者和法德關系特使的角色：好關系意味著好生意。不過，信任和懷疑他的人也許是同樣的，在這個領域也不例外，他可謂毀譽參半。

布萊希羅德與法國的關系—比他和任何其他國家的關系更加豐富和親密—也是他崛起的清晰縮影。他的父親曾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辦些小差事，而蓋爾森幾乎與他們平起平坐。就我們所知，他的父親從未去過巴黎，而蓋爾森卻在法國外交部參加“會談”。

他與英國的聯系沒有那么密切；他的英語不流利，而且從未去過那個國家。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分支的關系不像與巴黎分支那么親密。英國政府不像較窮國家的政府那樣需要他的金融服務。但英國是唯一真正的世界大國，每個國際銀行家都關心該國的廣泛利益，尤其是在近東和埃及。不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也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英國政治主要由迪斯累利和格萊斯頓的競爭主導，愛爾蘭問題使其遭受沖擊，由此新產生的激進勢頭讓一些觀察者感到擔心，特別是俾斯麥。當時，歐洲大陸人亟須關注英國事務。

無與倫比的高貴以及各種榮耀和聲譽也讓英國擁有特殊的光環。許多德國人還能感受到昔日英國熱的激動。布萊希羅德有充分的理由發展與英國的最親密關系—公共關系可以提高他的地位，私人關系可以在做出實際決定時幫助他。讀者應該還記得他被任命為英國駐柏林總領事。這只是開始。

這讓他在柏林的英國人圈子中擁有正式角色；他的兒子也因此獲得副領事的頭銜，他當時在容克貴族眼中顏面掃地，亟須重整形象。更重要的是布萊希羅德與奧多·羅素勛爵特別親密的關系，后者從1871年到1884年去世一直擔任英國駐柏林大使，在當地的外交官中絕對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羅素同時受到俾斯麥和皇太子妃的青睞—兩人很少有其他共同的朋友—還結交形形色色的德國朋友，并對德國的情況形成自己的敏銳判斷。他不僅是老派外交官和貴族，能夠流利地使用除俄語之外的所有主要歐洲語言交流，而且具有政治智慧、個人判斷力和“令人愉快的樂觀主義” [[94]](#94_6)  。

1871年，羅素勛爵在凡爾賽第一次見到俾斯麥，可能也在那里見到布萊希羅德。一年后，他在寫給兄弟的信中說：“俾斯麥把財產交給布萊希羅德，后者使其翻番。” [[95]](#95_5)  羅素家也把一部分財產交給布萊希羅德打理，也許希望能有同樣的意外之喜。1882年，羅素勛爵興奮地寫信給他：“我帶著無法言表的滿意讀了您友好的來信，在您的呵護和專業打理下，我的私人賬戶快速增長。為此，我想向您表達最熱烈和真誠的感謝。你無法想象這讓我多么高興！” [[96]](#96_5)  丈夫去世幾個月后，羅素夫人對余額表達不滿，因為“我聽說部分投資最近表現很好”…… [[97]](#97_5)  布萊希羅德還為英國大使館在柏林購買合適的辦公場地展開長時間談判。羅素剛赴任時，英國人與土耳其大使共同租借阿尼姆伯爵的一棟房子辦公 [[98]](#98_4)  。在羅素勛爵的要求下，尋找新辦公地點必須匿名進行，以防在戰后繁榮的柏林房地產市場被漫天要價。最終，布萊希羅德安排買下施特魯斯貝格宮，該宅邸由那位著名發起人建造，但他本人沒能享用多久。

熱情的私人關系也逐漸建立，羅素家是布萊希羅德家的常客，布萊希羅德也記住了羅素全家，包括六個孩子。羅素夫人在圣誕節時肯定能收到玫瑰和丁香花，羅素家的小孩子們則為特別的禮物和紀念品親筆寫了感謝信。

當然，最重要的是兩人不斷交換消息和觀點。布萊希羅德的名字頻頻出現在羅素勛爵發往本國的報告中，而對于布萊希羅德來說，羅素對英國政策的坦誠觀點極其重要。

布萊希羅德關于英國事務的另一大消息來源是明斯特伯爵，后者從1873年起擔任德國駐倫敦大使。這位漢諾威貴族是“少數把國家理想置于地方感情之上的貴族之一”。他為俾斯麥工作，還對普魯士君主具有封臣般的感情，當威廉遭遇刺殺企圖后，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說：“我愛那位親愛的老人，仿佛他是我父親。” [[99]](#99_4)  明斯特是保守的大貴族和熱情的運動家：他娶了一位英國女子，因此英國社交界的所有大門都對他敞開。從1875年到1893年，他先后從倫敦和巴黎源源不斷地給布萊希羅德寫來坦誠的書信。沒人懷疑他與布萊希羅德的特殊聯系—甚至連作為傳記作者的明斯特外孫也對這種親密的關系一無所知，當然也包括布萊希羅德的銀行服務，兩人的通信可能因此更加坦誠 [[100]](#100_4)  。

明斯特的書信涉及歐洲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高級政治和八卦稗史：比如俄土戰爭期間他在倫敦的秘密外交，以及對戰爭與和平前景的日常評論。俾斯麥對明斯特并不滿意，不僅因為當年輕的赫伯特在倫敦使館短暫工作時，明斯特對其頗有微詞。事實上，俾斯麥認為明斯特比英國人更像英國人。還有傳言稱他試圖取代俾斯麥，為此維多利亞女王向威廉表達了擔憂，此舉對提高明斯特在俾斯麥心目中的地位幾乎沒有好處 [[101]](#101_4)  。

明斯特毫不隱瞞自己的偏見和感情；他極端保守，擔心自己眼中的歐洲顛覆分子，如英國和德國的社會黨人，以及俄國的虛無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的信中經常提到這種危險，并提出如何打擊他們的個人主張：比如他曾敦促英國人起訴約瑟夫·莫斯特（Joseph Most）等德國流亡社會黨人，因為他猜到布萊希羅德會歡迎這些動議 [[102]](#102_4)  。

明斯特的所有書信都帶有悲觀基調，也許與他童年時的重病經歷不無關系 [[103]](#103_4)  。1877年，他在俄土戰爭期間預測俄國和英國將不可避免地攤牌，還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英國人可能在君士坦丁堡或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陸。1878年春，他幫助阻止那場戰爭，并暗示自己在英國和俄國人之間的調停勞苦功高。當柏林會議似乎解決了東方問題時，他的口氣有所改變，并寫道：“我認為歐洲和平在今后十年間不會受到威脅……在政治上，我不像以前那么悲觀了。”但幾年后，他又老調重彈，預言英國和俄國將因為阿富汗而開戰，并對德國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愚蠢表示悲觀。1884年，他請布萊希羅德購買7萬馬克的新一期俄國公債；1885年，擔心戰爭的他致信布萊希羅德：“我想把請你購買俄國公債的7萬馬克投資到其他地方，希望你馬上賣掉公債，因為現在賣還不會有任何損失。” [[104]](#104_4)  這是最寶貴的情報。布萊希羅德得以看到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何時和為何轉移資金，這讓他對潛在的麻煩有新的判斷依據。

布萊希羅德與明斯特的秘密關系極為寶貴。但他在英國最著名的聯系人是迪斯累利，盡管他們的關系更多只是情投意合，而非能立刻派上用處。兩人在柏林會議期間相遇，布萊希羅德曾請求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勛爵引薦自己。就像前文所引述的，我們對布萊希羅德為會議所舉辦宴會的最佳描繪來自迪斯累利筆下，這毫不奇怪 [22](#22_11)  。

兩人開始數量不多但重要的通信。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迪斯累利的信具有重要地位：它們不是敷衍了事的感謝信或者大人物的買賣指令，而是真實和經過反思的聲音。

1878年10月，在與迪斯累利相遇幾個月后和與俄國財政部長會談幾天后，布萊希羅德寫了第一封信：“……我將冒昧地對歐洲財政形勢加以簡要和有甄別的概括……”俾斯麥把重點放在俄國財政上，他知道迪斯累利對此最感興趣：“俄國需要14億盧布用于在東方的開支，并將因此新征稅6500萬到7000萬盧布，以便以此為基礎請求歐洲國家提供資本。”俄國仍然擁有1700萬到1800萬盧布的外匯儲備，因此無須立刻貸款。目前，它可以靠發行更多貨幣維持局面。“當然，一切遲早都會貶值，并引發一定程度的懷疑。但我必須客觀地指出，德國和法國目前對俄國財政仍然很有信心，如果再次打響戰爭，它可以籌集40億到50億盧布……”俄國財政將受到沖擊，但還挺得住。

“奧匈帝國的情況更加糟糕。”占領波斯尼亞將帶來難以彌補的新虧空。

英國的危機遠未達到最后階段，受害者人數和后果仍然不明……我很少愿意談論外交，因為在該領域沒有誰比勛爵大人的消息更加靈通；但您也許對我們這里的流行觀點略感興趣。這里的人覺得歐洲不會很快爆發戰爭，至少在不久的未來不會：東方的事務被認為尚不明朗，俄國不愿馬上執行《柏林條約》。

布萊希羅德最后談了德國的國內政治。

迪斯累利的親筆回信迅速而親切：“很高興收到你的信，我興致勃勃地讀了這封禮貌的來信，希望它不會是唯一一封。”對于俄國在歐洲的金融儲備，他表示：“我覺得如果俄國政府不馬上決定讓《柏林條約》生效，該國的貸款能力將很快受到考驗。”迪斯累利希望布萊希羅德把英國決心推動條約生效的信息傳遞給俾斯麥 [[105]](#105_4)  。1878年末，布萊希羅德送出慣常的禮物，并收到不同尋常的感謝：

今年的魚子醬風味不同尋常。我認為這是和平的味道—我們的大人物朋友怎么樣？我希望他和他可愛的全家都好，我很愛他們。我相信他會支持我讓《柏林條約》完全生效。這同樣維系著他和我的榮譽。如果我們能用相同的手段在相同的時間保住我們的個人榮譽并推動人類的普遍幸福，我們應該滿足。 [[106]](#106_4)

通信似乎中斷了超過一年；1880年4月，迪斯累利下野；6月，他派自己的朋友和親信羅頓勛爵（Lord Rowton，即昔日的蒙塔古·科利）去見布萊希羅德，后者馬上回了一封長信，表示“英國發生無法理解的政治變故……德國人對此很不高興，特別是在最高層”。輝格黨政府（布萊希羅德對格萊斯頓內閣的稱呼）被認為可能“讓歐洲陷入令人不快的混亂，該黨天生的不確定元素讓外國隱隱感到不安”。英法結盟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別受人歡迎。布萊希羅德寫道，但新的困難可能會阻止結盟的實現，他指的無疑是埃及問題以及俾斯麥決心加劇英法之間現有的矛盾。“在外交上，格萊斯頓先生將不得不遵循勛爵大人為他開辟的道路，并伴隨著令人討厭的搖擺不定，就像我們在戈申先生 [23](#23_11)  的高調出使中看到的。東方問題注定將繼續吸引列強政府最多的注意力。”與土耳其帝國關系破裂將是“可怕的災難……幾乎肯定將把歐洲拖入全面戰爭”。書信的其他部分再次關注德國的國內事務和俾斯麥的巨大困難。布萊希羅德寫給迪斯累利的信不像通常那樣表現得過于恭敬—他似乎本能地知道迪斯累利反感這種媚態，不像本國權貴那樣接受甚至期待奉承。這也許只是形式問題，但也反映出更深層次的東西 [[107]](#107_4)  。

迪斯累利馬上寫了回信—當時他沒有與許多人保持通信的習慣。鑒于它提供關于迪斯累利和英國政治的重要信息，我們有必要全文引用，這在本書中絕無僅有。

親愛的馮·布萊希羅德先生：

你的來信讓我很高興，還要感謝你對羅頓勛爵的熱情接待。我會永遠牢記你的熱情和智慧。這里發生重大變故，但并不像國內外的人們所以為的那么出乎意料。我的上屆政府遭遇史無前例的一連串災難性狀況：商業蕭條、收入下滑和連續幾季的農業歉收。在我看來，我們能堅持那么久，很了不起，這要感謝上屆議會的奉獻和忠誠。

我本人不相信英吉利民族完全改變了對外交事務的看法；只不過因為他們遭受那么多痛苦，又處于如此不幸的狀況，這讓他們只能考慮自己的家庭。當耐心耗盡時，他們求助于改變，對此我并不驚訝。我自己本來也應該這么做。

現在，我的全部愿望和希望是，英國應該驕傲地維系和平，如果新內閣秉承這種精神，我將支持他們。但很難明白他們的目標是什么，也許他們自己也幾乎不明白。內閣過于龐大，包括太多沒有經驗的人，有些只是煽動者；他們的領袖雖然很有才干，但唯獨缺乏領導能力。

外交大臣格蘭維爾勛爵是一位紳士和政治家，但他已經失去年輕時的活力，而且不幸地被某些老邁特征所光顧，比如極度耳背。因此，我們的外交事務管理大多落到新任副大臣查爾斯·迪爾克手中。此人在任職前一直是公認的共和派，不僅是甘必大的朋友，也是他的弟子，與他保持著持續的書信往來，甚至每天如此。新任法國大使將與他共事。

這就是我們的危險所在！迪爾克希望在外交事務中做出些驚人之舉，以便證明自由黨像保守黨一樣忠君愛國：甘必大認為，如果能誘使法國和英國合作—比如在希臘問題上—讓英國深陷對法國的同情，那么當更重大的問題出現時，它必然會繼續成為法國的盟友。

我相信，這就是真正的現狀。我感到不安，因為我覺得普遍的和平受到威脅。

我遺憾地聽說，你的大人物朋友因為國內事務而煩惱不已，盡管此刻外部事務需要他的卓越智慧。我一直記得在柏林興致勃勃地與他交談，他令我感到由衷的尊敬。我很高興聽說你們安好。 [[108]](#108_4)

兩人的通信斷斷續續地持續到1881年4月迪斯累利去世。書信并沒有全部保存下來。1880年9月，迪斯累利給布萊希羅德寫了一封關于希臘問題的短信，信的開頭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對現狀完全不滿意”。布萊希羅德在回信中描述俾斯麥的東方政策和格萊斯頓的錯誤。1881年2月，迪斯累利描繪格萊斯頓內閣的困境，布萊希羅德把信的副本轉交給俾斯麥，后者又將其交給威廉，信封上寫著“英國前首相習慣于經常與馮·布萊希羅德先生通信”。讓威廉看到對格萊斯頓的權威批評沒有害處，俾斯麥一直擔心宮廷中支持格萊斯頓的小團體。兩個月后，迪斯累利去世，這是俾斯麥眼中唯一能與他比肩的政客，他為此感到悲痛 [[109]](#109_4)  。

迪斯累利去世后，布萊希羅德與英國的關系再次有所失色。他向戈申勛爵提出關于雙金屬本位制和威爾士親王訪德計劃的建議，并為德語報紙提供一些秘密服務。他仍然與羅素勛爵及其繼任者們保持著很好的關系；他從明斯特伯爵那里獲得悲觀的報告，從其繼任者哈茨菲爾特伯爵那里獲得的報告則相當樂觀。他與俾斯麥分享重要的消息，就像他曾經說的：“鑒于政局的動蕩，閣下應該對我今天從倫敦收到報告和信件有些興趣。” [[110]](#110_4)  明斯特希望英德建立最親密的同盟，1883年他寫道，羅斯柴爾德勛爵也有此愿，就像“大多數理性的英國人，除了少數大臣”。一年后，他又寫道，“絕大多數”英國人支持德國：“我只是希望，我國民眾現在也能意識到像我們這樣的兩個國家保持良好關系多么有用。畢竟，對我們來說，英國人比俄國人或法國人安全得多。無論您怎么認為，后兩者是我們天生的敵人。”當時，俾斯麥對英國人懷有戒心，他曾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身體不適讓自己遠離政治，但又語帶譏諷地說：“我很好奇，和平使徒布萊特 [24](#24_9)  同事們的好戰傾向最終會發展成什么樣。” [[111]](#111_4)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布萊希羅德對英國的主要興趣在于歐洲對埃及和土耳其債務的管理，那里有他的實際利益。此外，他還遺憾地關注著英國和德國因為殖民地問題而不時出現的緊張關系。

布萊希羅德在俄國事務中扮演的角色反映了他在事業和影響力上的非凡成長。19世紀50和60年代，他的興趣主要在經濟方面；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他的政治關系開始擴張，因為他在柏林的特殊地位，歷任俄國財政部長喜歡向他咨詢和與他協商。最終，沙皇的部長們和猶太人布萊希羅德開始秘密通信。這些不為人知的書信經常涉及俄國政策和俄國的反猶主義，當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后，反猶主義再次成為官方的政策工具。到了19世紀80年代末，布萊希羅德對俄國的興趣變得非常強烈，以至于冒險長時間與俾斯麥持不同意見，后者希望至少暫時阻止德國人投資俄國債券。

長久以來，德國的銀行家和投資者一直認為俄國經濟潛力巨大，但目前財政狀況堪憂，因此不得不以高收益吸引必需的外國資金。門德爾松銀行幾十年來都是德國對俄投資的主要渠道。19世紀50年代，布萊希羅德的合伙人奧本海姆開始積極參與俄國鐵路建設。1868年，布萊希羅德會同巴黎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發行新成立的俄國土地信貸協會的抵押債券，以后又發行更多期。據估計，在前十年里，僅這些債券就為布萊希羅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獲利650萬馬克 [[112]](#112_4)  。就像我們看到的，布萊希羅德把一部分這種抵押債券賣給他最著名的客戶（包括俾斯麥），這筆業務只是俄國事務所帶給他利益的開胃菜。

金融利益也意味著政治上的關心—況且布萊希羅德扮演著俾斯麥“親信”的角色，特別是因為當時俄土戰爭威脅到歐洲和平與俄國的財政穩定。布萊希羅德再次建立不尋常的信息網，包括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洛夫特斯勛爵，以及德國駐倫敦大使明斯特伯爵 [25](#25_9)  。早在1876年10月，布萊希羅德就通知威廉街，俄國正在大規模備戰。有證據顯示，俾斯麥在1877年承諾向俄國政府提供1億到2億金盧布，由布萊希羅德籌集 [[113]](#113_4)  。1878年最初的幾個月里，當俄土戰爭有可能升級為英俄戰爭時，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經常交換俄國事務的消息，布萊希羅德多次敦促俾斯麥在圣彼得堡秘密斡旋，以便確保老邁的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俾斯麥討厭此人）被理智的“西方派”舒瓦洛夫而非伊格納季耶夫（Ignatieff）這樣的泛斯拉夫主義激進分子接替 [[114]](#114_4)  。最終，舒瓦洛夫與英國人的談判成功地避免戰爭—這個結果在1878年夏天的柏林會議上得到適時的確認。

柏林會議后，布萊希羅德在俄國財政和政治中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對他來說，1878年10月俄國財政部長格萊格將軍（General S.A.Greig，一位姓麥克格雷格［McGregor］的蘇格蘭移民后裔）在柏林為期一天的逗留是決定性的事件。布萊希羅德預感到，在格萊格前往巴黎前截住他非常重要。格萊格赴巴黎名義上是為了休息，但事實上就像布萊希羅德私下警告俾斯麥的那樣，“是為了與歐洲的金融家們接觸，向他們了解歐洲資本希望以何種形式或方式參與計劃發行的俄國貸款。我相信，如果能成功地在格萊格逗留柏林期間與他見面，那將是一筆特別大的買賣” [[115]](#115_4)  。布萊希羅德事先就獲悉格萊格的到來，消息來自他在俄國最重要的私人渠道—圣彼得堡貼現銀行的猶太人行長薩克（A.Sack），在要求“閱后即焚”的來信中，他敦促俾斯麥盡一切可能見到這位“不太聰明”的部長 [[116]](#116_4)  。10月14日，布萊希羅德見到格萊格；不清楚俾斯麥是否提供了直接幫助，但也許間接幫助就足夠了：格萊格覺得有必要見見俾斯麥的金融專家。

第二天，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報告與格萊格的“長談”，后者“居高臨下地”談論俄國財政，表示國外信貸足以維持至少兩年的利息支出，國內的償債能力也沒有問題。布萊希羅德質疑格萊格解決俄國長期經濟問題的能力 [[117]](#117_4)  。他還讓其他人知道自己最近介入俄國事務。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次見面十天后，他給迪斯累利寫了信。不久，圣瓦里耶就布萊希羅德與格萊格的談話專門給法國外交部發報告，強調布萊希羅德提出的關于貸款的政治先決條件 [[118]](#118_4)  。整個歐洲都知悉了布萊希羅德與格萊格的談話。

成為俄國通正當其時，因為柏林會議后，俾斯麥的心中充滿對俄國可能行動的擔憂。俄國的勝利只為它帶來少得可憐的政治利益，該國國內的權勢集團似乎將此歸咎于德國。與此同時，俾斯麥對俄國的軍事準備表達真實或假意的擔憂。此外，德國的關稅計劃威脅到俄國的糧食出口，那是俄國地主精英的命脈，還是俄國海外信貸的基礎和工業現代化的動力。當涌入的德國資本幫助俄國的同時，德國關稅卻傷害了它。在一定范圍內，俾斯麥也可以把這些經濟手段當作外交武器 [[119]](#119_4)  。1879年4月，他多次同布萊希羅德討論俄國事務，要求他為了和平而拒絕俄國人所有新的貸款請求 [[120]](#120_4)  。俾斯麥對俄國的懷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對老戈爾恰科夫的憎惡，他還非常擔心威廉的親俄傾向可能影響到他自己的行動自由。各方面都出現越來越深的敵意。新聞戰讓關系進一步惡化；1879年8月，主要的俄國報紙突然停止攻擊，因為就像布萊希羅德告訴德國外交部那樣，俄國財政部長警告說，持續的新聞戰將對“俄國債券的價格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121]](#121_4)  。

俾斯麥逐漸下定決心推進德奧同盟，但遭到威廉及其親隨的激烈反對，被迫再次祭出終極武器：威脅辭職。歷史學家對俾斯麥為何選擇這條道路疑惑不解。最可能的解釋是，他認為德奧同盟能防止奧地利在西方尋找盟友，一旦奧地利被安全地和德國綁定，他就能回到親俄路線上。布萊希羅德的信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俾斯麥的舉動莫衷一是，并指出一種附帶的擔憂：1879年夏天，奧匈帝國的親德外交部長安德拉什伯爵（Count Andrássy）可能辭職令德國官員憂心忡忡，奧地利可能一邊繼續反俄政策，一邊加大尋找西方盟友的努力。在俾斯麥的心中，俄國的實力和奧地利的背叛這兩種威脅會相互加強—雪上加霜的是，他懷疑某種國內保守勢力可能阻撓他的外交政策。1879年10月，他不顧威廉的顧慮，強行與奧地利建立防務同盟 [[122]](#122_4)  。

在隨后與俄國逐漸恢復關系的過程中，布萊希羅德扮演重要角色。他與俄國官場的廣泛關系此前不為人知，但在俄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克里米亞戰爭失利后，俄國歷任統治者都試圖推進現代化，從而縮小與英國和德國的差距。俄國的人力不再充足；俄國政府在推進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首要角色，工業對軍隊的需要是原因之一。“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機構是財政部。” [[123]](#123_4)  俄國財政部長擔負著重任：他們負責為國防和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從1866年到1885年，陸軍和海軍的花費達到政府開支的32%，債務支出則占28% [[124]](#124_4)  。一系列總體上相當能干的開明派財政部長全力應對這些問題，希望通過引入西方技術和吸引西方資本來推進俄國的現代化。“財政部長更喜歡與俄國天主教徒資本家合作，其次考慮外國資本家，即使其中有些是猶太人。俄國的猶太公民只是第三種選擇……” [[125]](#125_4)

鑒于布萊希羅德作為銀行家和俾斯麥代理人的雙重身份，俄國財政部長們自然越來越多地向他求助。不過，猶太人問題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亞歷山大二世時期，俄國猶太人仍然被限制在“柵欄定居區”（settlement of Pale） [26](#26_7)  ，但命運慢慢有所改善。這種趨勢成了某些樂觀情緒的依據，尤其是像布萊希羅德那樣對樂觀情緒很感興趣的人。布萊希羅德本人與俄國的聯系反映了俄國官場內部的分歧，擔憂和恐懼現代化的那部分人也對猶太人避之不及，而支持現代化并意識到俄國的經濟發展和財政穩定依賴外國資本的那部分人則對猶太人更加友好。

甚至在與格萊格會面前，布萊希羅德就已經與亞歷山大手下的一位重要官員瓦魯耶夫伯爵（Count P.A.Valuyev）常有書信往來。按照俄國的標準，此人是改革派，甚至有些自由派傾向；但與布萊希羅德的通信顯示出他是嚴格的保守派。1879年春，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俄國對俾斯麥外交政策和計劃中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的攻擊沒有道理—他隱晦地批評戈爾恰科夫和俄國地主們，目的也許是安撫俾斯麥，他的辦公室里掛著后者的畫像。瓦魯耶夫還說：“當然，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在議會中完勝拉斯克集團。至于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最好什么都不說。” [[126]](#126_4)  瓦魯耶夫和格萊格都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提到，他們對薩布羅夫伯爵（Count Saburov）被任命為俄國駐柏林大使抱有厚望。瓦魯耶夫稱贊薩布羅夫的智慧，表示該任命特別令人高興，因為駐柏林大使已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職位。格萊格則認為，作為財政專家，薩布羅夫“既聰明又有同情心，是貴國首相最熱情的贊美者之一，也是與德國結盟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格萊格還表示，“隨著年事漸高，我們的老部長［戈爾恰科夫？］越來越力不從心，已經完全從舞臺上消失。他保留著頭銜，但政治上已經不復存在……” [[127]](#127_4)  薩布羅夫很快成為布萊希羅德的密友，最終還成了后者的客戶。比如，他曾要求布萊希羅德把他的25萬馬克存款投資于“最可靠的股票” [[128]](#128_4)  。荷爾斯泰因認為“兩人總是在一起”，并提到布萊希羅德曾散布不可思議的故事：1884年被任命為薩布羅夫繼任者的奧洛夫親王請求布萊希羅德幾乎馬上貸款100萬馬克 [[129]](#129_4)  。無論如何，布萊希羅德與俄國駐柏林大使們的關系極為親密。

剛剛敲定與奧地利結盟，俾斯麥就開始著手改善對俄關系。在此過程中，布萊希羅德成了俾斯麥的幫手，除了他的私人關系，他還與俄國政府達成各種互利的金融協議。1880年初，他借給俄國政府200萬英鎊，并對大量購買西南鐵路的股份很感興趣。離任后的格萊格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我開創了帝國政府和貴銀行的正式關系，這仍是我在財政部長任內最美好的記憶之一。” [[130]](#130_3)  （布萊希羅德的兒子漢斯已經在憧憬父親獲得俄國勛章，并敦促他爭取獲得比競爭對手更高的榮譽 [[131]](#131_3)  。）思想開明的阿巴薩（A.A.Abaza）接替格萊格，繼續與布萊希羅德保持著私人關系。反過來，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寫了長篇備忘錄，提及俄國財政糟糕透頂的前景和各種傳言，比如阿巴薩可能讓俄國紙幣貶值40%，又如亞歷山大二世的財富據說高達3600萬盧布，全部投資于用黃金支付的外國股票，沒有任何一股用俄國盧布支付。俄國的困難至少排除了會引起“新的不便和負擔”之對外政策的可能性 [[132]](#132_3)  。1881年6月，隨著三帝同盟重新訂立，俄德關系顯著改善。

亞歷山大二世在準備新一輪改革的過程中遇刺身亡，他的兒子亞歷山大三世繼位，此人不那么親德，具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布萊希羅德馬上表示哀悼，阿巴薩以沙皇的名義正式致謝 [[133]](#133_3)  。新政府在國內實施嚴厲的反猶政策，盡管在能干的財政部長本格（N.K.Bunge）的主導下，經濟現代化道路得以延續。布萊希羅德一直關心著猶太同胞的命運，多次向俄國官員提出他們所受待遇的問題 [27](#27_5)  。瓦魯耶夫伯爵曾試圖讓他不要擔心某些新的法律，但也提醒他，無政府主義者圈子里的大批猶太人的確引起對“猶太族裔”的懷疑 [[134]](#134_3)  。布萊希羅德人生中的一個反諷之處是，他像任何保守派一樣憎惡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但他恐懼地意識到，這些人中有足夠多的猶太人，他們的存在可以被反猶主義者利用—甚至他本人的地位也會激起反猶主義情感。19世紀80年代，作為著名財閥、拉斯克式的中產階級激進派或者無政府主義暴徒的猶太人，開始被不同的群體當作猶太人威脅上升的證據。

新政府拋棄亞歷山大二世逐漸減輕歧視的政策，新實行的俄國化政策對猶太人的影響特別大 [[135]](#135_3)  。布萊希羅德向他人吐露自己的擔憂—這種擔憂反映出他對不幸同胞的真正同情，以及他害怕俄國的反猶措施可能波及德國所謂的“東方猶太人”（Ostjuden），那也是德國政府所害怕的。（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將在后文繼續討論。）1881年發生了幾次屠殺猶太人事件，1882年3月又頒布了禁止猶太人在空曠地區購買土地的命令。布萊希羅德在信中對俾斯麥說：“基輔又開始迫害猶太人，這次由政府發起。我們的股市本來勢頭很好，但因為此事而在收盤時下挫，特別是俄國證券。”第二天，布萊希羅德對荷爾斯泰因說起俄國重新抬頭的反猶主義（他希望鼓動后者嗎？），表示自己剛剛就此事致信本格，“要求他不要忘記，1868年，當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第一次遭受迫害后，一個柏林猶太人委員會號召世界各地的猶太同胞停止交易羅馬尼亞債券，導致它們下跌30%” [[136]](#136_3)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對本格用這種措詞，不過本格的回信保留下來，雖然措詞不失優雅，但更加令人厭惡：

我們關于猶太人的立法存在缺陷，現有法律的實施更是如此。如果德國的開明階層也缺乏寬容，那么在俄國發生這樣的事毫不奇怪，因為按照這里的法律，猶太人是異族，矛盾也更加強烈……但我并不懷疑可以找到公正的解決辦法。 [[137]](#137_3)

由于政府的行動和日益流行的反猶主義，俄國猶太人的處境不斷惡化。但布萊希羅德完全沒有組織任何抵制，繼續擔任沙皇政府的銀行家，并與沙皇的部長們通信。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影響緩和局面，并加強本格等人的力量，這些人反對擴大歧視性和在經濟上倒退的立法。

在隨后的幾年間，盡管俄德關系經歷種種起伏，布萊希羅德仍然保持著與俄國部長們的聯系，并向俾斯麥等人通報俄國的動態。1881—1882年，他承認對俄國財政非常悲觀。1882年7月，他向俾斯麥報告自己在馬林巴德與舒瓦洛夫伯爵的“約會”，后者希望沙皇推進立憲改革，并和本格一樣對俄國的對外信貸表示樂觀。布萊希羅德不這樣認為，因為“歐洲公眾已經失去信任”，更愿意賣掉之前的俄國債券，而不是買入新的。至于舒瓦洛夫本人，他眼下沒有希望成為部長，最渴望成為駐柏林大使 [[138]](#138_3)  。

1883年，門德爾松再次在柏林市場上發行俄國貸款；布萊希羅德不太看好這次發行，不清楚是出于無私的想法，還是因為他被排除在外。媒體譴責這次發行，俾斯麥把敵意歸咎于布萊希羅德。包括開明的《柏林日報》在內，多家報紙指出，貸款條件本身（6%的利息，用黃金支付，再加上購買價3.5%的貼現）顯示了俄國財政多么岌岌可危—甚至羅馬尼亞都做得更好。此外，《柏林日報》還要求德國人不要把錢投給一個試圖對德國發動“毀滅戰爭”（Vernichtungskrieg）的政府。俾斯麥警告外交部，官方媒體不應使用這樣的語言，但要求暗中告訴可能的始作俑者布萊希羅德，他忘記提到“俄國金融形勢糟糕的主要原因，即之前的貸款未被用于生產目的，而是完全用于軍事需要……俄國應該被視作唯一可能的和平破壞者。一旦開戰，誰都不知道結果如何，特別是波蘭的命運”。他在最后想到波蘭，這也許反映了他經常對俄國提出的威脅，包括恢復某種形式上獨立的波蘭 [[139]](#139_3)  。

不過，從1883年開始，布萊希羅德越來越多地參與俄國財政，理由是參與俄國的發展不僅有利可圖，還有助于德俄兩國保持友好的外交關系。1884年，布萊希羅德牽頭發行利率為5%的3億馬克俄國貸款，他也許得到俾斯麥的授意，而且肯定聽到首相的保證：“歐洲的和平已經無虞，俄國不會發動戰爭。”在俾斯麥的命令下，普魯士國有的海貿銀行也申購了該協議—從而給予該貸款某種官方許可。布萊希羅德報告說，貸款被超額申購20倍，表現出“對俄國和平保證的完全信心” [[140]](#140_3)  。發行業務以他和海貿銀行行長的爭執告終，引發對布萊希羅德賺得“大約幾十萬盧布特別費用”的懷疑 [[141]](#141_3)  。

赫伯特覺得給俄國錢“極其遺憾”，這些錢“只會被用于陸軍、海軍和宣傳目的” [[142]](#142_3)  。

在經濟學領域有過出色學術經歷的本格稱贊他“用精彩的方式回報帝國政府的信任。您僅僅以這筆新貸款教父的角色自居，這過謙了。我高興地看到，這筆重要業務的構想、動議和執行幾乎由您一手包辦” [[143]](#143_3)  。俄國政府欣然肯定這番贊美之詞，授予布萊希羅德圣斯坦尼斯拉斯大十字勛章（Grand Cross of St.Stanislas）—與此同時，他和著名的俄國銀行家賀拉斯·德·古恩茨堡（Horace de Guenzburg）正在往來書信中談論俄國愈演愈烈的反猶主義 [[144]](#144_3)  。

1884年后，俄國事務對布萊希羅德來說變得更加困難。他的金融利益不斷與政治現實發生沖突。1885年，所有人都預測英俄將因為阿富汗開戰（“瓦德西伯爵把俄國和英國在亞洲的戰爭看作歷史的必然之一”）。同年4月，明斯特伯爵授意布萊希羅德賣掉他投資的7萬馬克俄國債券。布萊希羅德“非常緊張，曾經試探著請示他的首相朋友，是否可以做些什么來避免可能的戰爭”。與此同時，他試圖向英國人保證，俄國人沒有在為戰爭做財政準備。英國駐柏林代辦評價布萊希羅德的報告說：“他應該很清楚俄國的財政狀況，因為他經常向德·吉爾斯先生（M.de Giers）咨詢此事，擁有最靈通的消息來源。” [[145]](#145_3)

6月3日，在伐爾岑與俾斯麥進行特別誠懇的會面后（俾斯麥最后擁抱了他），布萊希羅德“按照口頭指令”購買了20萬馬克最新一期的英俄貸款；幾天后，仍然極為誠懇的俾斯麥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盡管他不相信后者電報中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但應該在不虧本的情況下賣掉他的俄國債券。布萊希羅德照做了 [[146]](#146_2)  。當年夏末，當布萊希羅德與俄國外交部長吉爾斯舉行會談后，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都認為這年秋天爆發英俄戰爭不可避免 [[147]](#147_2)  。這一次，戰爭再次沒有如約而至。但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在商議這些事時的隱秘方式惹惱首相的親隨，特別是他的兒子們。

從1886年到1890年，俾斯麥的對俄政策變得越來越有疑問，布萊希羅德的直接利益也因此受損。在德俄關系惡化的時期，作為為俄國人服務的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的角色成了俾斯麥統治最后歲月里的熱門話題，實際上還加深了俾斯麥與威廉二世的裂痕。布萊希羅德的活動與俾斯麥最后的危機緊緊交織在一起，必須放在后者下臺的背景下講述。我們在這里只需強調，布萊希羅德堅持自己的親俄觀點。事實上，1887年1月，他曾試圖親自前往俄國。而在1883年，他還曾希望把一個兒子派去那里。前一次，薩布羅夫請求他不要這樣做，因為很難為私人安排邀請；后一次，薩克要求他不要來 [[148]](#148_2)  。對俄國的部長們來說，與布萊希羅德通信或者在柏林和他見面是一回事，但讓他們在本國土地上會見他完全是另一碼事。他們可以接受他的錢，但不能接受他本人。無論是這些拒絕還是俾斯麥更加強硬的態度都無法讓布萊希羅德改變主意—為了豐厚的回報加強與俄國的聯系。

通過布萊希羅德與三個重要歐洲國家所打的交道，我們回顧了他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他與其他地方也建立了極好的關系，通過為奧匈帝國、塞爾維亞、西班牙、希臘發行貸款獲利豐厚。這些努力都不無政治意義，因為它們都需要他與德國外交部密切合作。人們普遍認為，政治、軍事和經濟動機間存在互動，但很少被清楚地表達出來。布萊希羅德為其提供例證。有時，政治壓力和經濟誘惑會發生巧合，就像在奧匈帝國、塞爾維亞和曾經的俄國。不過，19世紀90年代，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出手拯救意大利的財政，好讓后者繼續留在三國同盟中—與這種窘境相對應的當然是他為了繼續回報豐厚的俄國業務而與俾斯麥產生的不合。有時，布萊希羅德認為自己手握王牌—比如在他與羅馬尼亞人錯綜復雜的關系中，他暗中對這些人心懷鄙視，就像許多貴族對他那樣。

[1.](#1_26) 位于塞納河畔，對面是法國外交部，因此成為后者的別稱。——譯注

[2.](#2_26) 布萊希羅德的法國駐柏林使館的一位朋友，其下面這番話反映了大使們覺得自己的角色多么高尚和重要。在深情回憶自己的人生時，德·穆伊伯爵寫道：“我從中找到……對重大國事的各種強烈興趣，找到活躍生活、四處旅行以及和世界上最優雅與最正確的人建立持久關系的誘惑，找到我所承擔的并比其他所有人做得更好的重要職責的吸引力，找到超越一切黨派、只為祖國服務的信念。”夏爾·德·穆伊伯爵，《一個外交官的回憶與漫談》（巴黎，1909年），第iii頁［Comte Charles de Moüy，Souvenirs et Causeries d’un Diplomate（Paris，1909），p.iii］。

[3.](#3_24) 國際銀行家享有特別的特權，只要他們獲得成功。19世紀80年代末的英國駐柏林大使愛德華·馬雷特爵士—他和布萊希羅德接觸頻繁—描繪了英國使館所在地前主人的（短暫）榮光：“這座房子由一個名叫施特魯斯貝格的銀行家建造，他極其富有，曾經像彗星般照耀金融界。如日中天時，他在柏林最高貴的街道建造這座豪宅。但此人注定無法享受它……我認為那一定是1874年……我抵達巴塞爾的三王旅館時又冷又餓，看見旅館的所有工作人員在大廳列隊。當我走近一個派頭看上去像是經理的人時，他要求我站在一邊。我躲到角落里，猜想某位國王（至少也是親王）將隨后到來。在我翹首以盼時，一個侍者拿著點燃的燭臺走來，他下了臺階來到街上，領著一個身穿非常漂亮的毛皮大衣的小老頭回到旅館，老頭身后跟著一位清秀的猶太女子。在手持燭臺的侍者引領下，他們上了樓，大廳里的侍者們也散了。我從角落里出來。門童看上去恢復了與身份相稱的平靜表情，我問他剛才來的是誰。他似乎對我的問題感到驚訝，回答說：‘這是施特魯斯貝格先生。’我沒聽說過這個名字，問道：‘誰是施特魯斯貝格先生？’門童看上去越來越驚訝，他說：‘你不知道施特魯斯貝格先生，那位柏林的大金融家嗎？’”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施特魯斯貝格的不幸遭遇。愛德華·馬雷特，《變換的場景：對許多地方的許多人的記憶》（倫敦，1901年），第166—167頁［Sir Edward Malet，Shifting Scenes.Or Memories of Many Men in Many Lands（London，1901），pp.166–167］。

[4.](#4_24) 三個月前，當統一公債下跌時，布萊希羅德向財政部長提出類似的請求，希望可以更方便地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購買公債，從而實現普魯士債券的國際化。多年來，布萊希羅德一直倡導這樣做，但遭到財政部長的反對—部分原因是這有違普魯士的傳統和大國的自給自足。海因里希·施托伊貝爾，《國家和銀行在普魯士債券領域的關系，1871—1913》（柏林，1935年），第34—37頁［Heinrich Steubel，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Staat und Banken auf dem Gebiete des preussischen Anleihewesens von1871bis1913（Berlin，1935），pp.34–37］。

[5.](#5_24) 1887年11月10日發布的《抵押貸款禁令》針對俄國債券，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報復同年5月俄國拒絕將所占波蘭的土地賣給外國人的決定。——譯注

[6.](#6_24) 當然，他還向其他人提供同樣的消息。1882年，安特希爾勛爵報告說：“在拜訪布萊希羅德時，我見到一封來自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電報，要求馬上了解微染風寒的皇帝的真實健康狀況。我問布萊希羅德，法國金融家們認為皇帝去世會對巴黎交易所產生什么影響。他回答說：‘股價將普遍下跌10到15個百分點，因為在新君主手下，俾斯麥的地位將面臨不確定。’”保羅·納普倫德編，《柏林大使館來信》（華盛頓，1944年），第283頁［Paul Knaplund，e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Washington，1944），p.283］。

[7.](#7_24) 在這點上，英國外交使團并不比德國人好，也許更加糟糕。以經濟事務為主責的英國領事總是外交人員中的底層，正經外交官對英國的商業利益或來訪的商人表現出極大的不屑。一位在巴西的年輕英國外交官回憶1907年他與上司（英國駐當地大使）的談話，“我鼓起勇氣向他提出，我不認為今后領事們不能像海軍和陸軍軍官一樣被上帝和人們接受……［大使］小心地戴上單片眼鏡，仿佛那塊地方很疼。他瞪著我，脫口而出：‘親愛的坎貝爾，領事算得上人物嗎？’”引自普拉特的開創性作品，《英國外交政策中的金融、貿易和政治，1815—1914》（牛津，1968年），第xxii頁。為德國編寫類似作品很有必要。

[8.](#8_24) 有趣的是，德國的大型戰前外交文件出版物《歐洲內閣的大政治，1871—1914》（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1871–1914）僅僅不起眼地三次提到布萊希羅德；《法國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中提到的次數要多得多，德國和法國外交部的檔案顯示，他是官場邊緣的重要人物。

[9.](#9_22) 在另一些人看來，布萊希羅德并無大罪，他們描繪他結交朋友的方式時無疑更加準確。1880年，俾斯麥在外交界最信任的助手拉多維茨在日記中寫道：“消息靈通的布萊希羅德—他喜歡讓人覺得他對俾斯麥的了解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多次來訪，告訴我‘首長’（他習慣于這樣稱呼俾斯麥）對施托爾貝格和我在夏天提供的支持很滿意。他對此毫不懷疑，并清楚地聽見俾斯麥提到，我應該成為馮·彪羅國務秘書的繼任者。”拉多維茨的另一番話形象地描繪兩人的關系：“‘布萊希’對此的確信程度從他新年時給我送來昂貴的新鮮小體鱘可見一斑。他習慣于每年這個時候從俄國進口幾車，分送給他最尊敬的政治人物。無論如何，我喜歡這種鮮嫩孝敬的味道。”其他無數人同樣如此。哈約·霍爾伯恩編，《約瑟夫·瑪利亞·馮·拉多維茨大使生平記錄和回憶》（柏林和萊比錫，1925年），第二卷，《1878—1890年》，第114頁。

[10.](#10_22) 歐洲各國王室和貴族的譜系名錄，1763年開始在哥達出版。——譯注

[11.](#11_22) 另一些國家尋求披上大國的外衣，但沒有大國的實質。它們遭到拒絕（有時是粗暴的），就像俾斯麥曾經抱怨西班牙人的“大使熱”（Ambassadomanie），并告訴他們：“我不關心大使的任命，但不要請求我給你們送來一位；無論現在還是今后，我都不會這樣做。”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8年4月24日，MAE：德國，第23卷。

[12.](#12_20) 在三帝會議的最后一天，布萊希羅德正確地向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指出：“他們只是就自己的和平意向達成協議，我認為三位君主只是分別承諾在所有重大政治問題上合作—我相信自己沒說錯，但請您指教。”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9年9月12日，RA。

[13.](#13_18)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戈爾恰科夫（Alexander Mikhailovich Gorchakov，1798—1883），俄國政治家，1856—1882年間擔任俄國外交部長。——譯注

[14.](#14_18) 反過來，梯也爾也不斷要求貢托—比隆與布萊希羅德保持親密關系，“他友好而且希望保持友好，他還是首相的人。前些天，他送給梯也爾夫人（他經常在梯也爾家吃飯）一些德國人非常看重的珍饈，味道相當粗獷，有點超過文明人胃的承受能力。梯也爾夫人向他表示感謝，我想請您處理所附的書信，因為我不知道那位大金融家的具體地址”。《領土的被占與解放，1871—1875》（巴黎，1903年），第二卷，第179—180頁［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 du Territoire，1871–1875（Paris，1903），II，179–180］。不用說，梯也爾夫人頻繁的感謝信使用了不同的措詞。BA。

[15.](#15_18) 這是泰勒（A.J.P.Taylor）的解釋，他還表示“和其他德國人一樣，俾斯麥把恐嚇視作友誼的最佳前奏”。見《對歐洲霸權的爭奪，1848—1918》（牛津，1954年），第225頁［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225］。

[16.](#16_18) 阿爾方斯·德·庫爾塞爾（Alphonse de Courcel，1835—1919），法國外交家。——譯注

[17.](#17_12) 夏爾·德·弗雷西內（Charles de Freycinet，1828—1923），法國政治家，曾任戰爭部長和總理。——譯注

[18.](#18_12) 儒勒·費里（1832—1893），亦作茹費里，法國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長和總理，推行政教分離和殖民擴張。——譯注

[19.](#19_10) 儒勒·埃貝特（1839—1901），法國外交家。——譯注

[20.](#20_10) 恭維也常常可以通過第三方傳達。前任法國外交部長圣伊萊爾曾讓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并稱贊俾斯麥是“得到驗證的天才”。圣伊萊爾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11月19日，BA。

[21.](#21_10) 事實上，埃貝爾曾向布萊希羅德抱怨說，刊發此文的報紙本身是“大資產階級的喉舌”。法國大使館經常請求布萊希羅德介入媒體事宜。最著名的使館與報紙的沖突發生在1883年，有人宣稱，法國代辦德·奧比尼伯爵（Comte d’Aubigny）的夫人是臭名昭著的作品《柏林社交界》（Berlin Society）的作者之一，發表時用了筆名瓦西里伯爵（Count Vasili）。德·奧比尼伯爵代表美麗的伯爵夫人給俾斯麥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圣瓦里耶也寫了。布萊希羅德要求《民族報》插入正式聲明，伯爵對此非常感激。《柏林社交界》中對布萊希羅德的描繪明顯帶有敵意，這讓人們議論紛紛，開始猜測可能的作者—其中甚至包括布萊希羅德最親密的助手的妻子萊奧妮·施瓦巴赫（Leonie Schwabach）。真正的作者是卡特琳·拉齊威爾親王夫人。埃貝特致布萊希羅德，1896年10月22日，BA；德·奧比尼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3月28日、4月8日，BA；赫爾穆特·羅格，《荷爾斯泰因與霍亨洛厄》（斯圖加特，1957年），第208—210頁［Helmuth Rogge，Holstein und Hohenlohe（Stuttgart，1957），pp.208–210］。

[22.](#22_10) 根據迪斯累利的私人秘書蒙塔古·科利（Montague Corry）的日記，我們可以想見布萊希羅德毫不遲疑地向迪斯累利提供了關于宴會的某些美好紀念品：“自從我們受到您殷勤備至的款待后，比肯菲爾德勛爵兩次告訴我，您的拉菲是他品嘗過的最美佳釀！所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您的熱情讓他獲得罕見的款待！”科利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6日，BA。

[23.](#23_10) 喬治·戈申（George Goschen，1831—1907），英國政治家，時任駐土耳其宮廷特使，參與劃定與希臘和黑山的邊界。——譯注

[24.](#24_8) 雅各布·布萊特（Jacob Bright，1821—1899），英國自由黨議員。——譯注

[25.](#25_8) 1876年，當施特魯斯貝格在俄國被囚禁和受審時，洛夫特斯勛爵“發現”自己欠此人1.5萬馬克。洛夫特斯急于不讓公眾知道此事，布萊希羅德立即同意幫助掩蓋—作為回報，他收到有用的信，有時還將其轉交給俾斯麥。洛夫特斯勛爵與布萊希羅德的不定期通信，1876年2月7日到6月21日，BA；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8年5月6日，FA。

[26.](#26_6) 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遷移和定居有嚴格限制，不愿皈依東正教的猶太人全部被遷移到“柵欄定居區”，該制度由葉卡捷琳娜女皇在1791年創立，定居區主要位于西部和西南部邊境。——譯注

[27.](#27_4) 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樣不安。1880年5月，阿爾方斯男爵寫道：“我無須告訴你我多么關心與世界各地我的猶太同胞有關的一切事情。”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5月3日，BA。

## 第十四章　羅馬尼亞：權宜的勝利

我在乎羅馬尼亞人就像在乎我空了的酒杯……[沒人關心羅馬尼亞的獨立，除了德國]猶太人，我需要討好和拉攏這些人，在德國他們可以對我很有用，我將用羅馬尼亞回報他們；您難道不認為那是敷衍搪塞嗎[n’appelez-vous cela de la monnaie de singe]？

——俾斯麥致圣瓦里耶，1879年2月27日

對羅馬尼亞獨立的完全承認耽擱了很久，這是最艱難的政治分娩之一……你可以對自己說，確實沒有一個問題是順利或簡單的。時至今日，你已經走過各種復雜得可怕的混亂，克服和整理這些混亂并使其變成穩定的形式是對精力和耐心的超人考驗。

——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致

他的兒子，羅馬尼亞的卡羅爾大公，1880年2月27日

根據俾斯麥老生常談的故事，布萊希羅德從羅馬尼亞掙得他的貴族頭銜—對于一位贏得普魯士貴族封號的德國猶太人來說，這是個奇怪的地方。從蠻荒的羅馬尼亞（布萊希羅德無疑這么認為），他獲得自己最大的榮耀；在超過十年的時間里，他還把自己的全部資源投入那里。這被證明是他在外國事務中最復雜的冒險。

與布萊希羅德生命中的其他段落相比，羅馬尼亞的故事更好地展現他為通常互不相干的世界間架設橋梁的角色。這個故事還在微縮尺度上體現19世紀的某些重大主題：民族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的擴張以及西方理想和東歐現實間的沖突。19世紀中葉，羅馬尼亞陷入民族主義者獨立熱情的陣痛中。為了獨立，羅馬尼亞人需要大國們的幫助和承認。為了經濟發展，特別是鐵路建設，缺乏本土資本和技術的羅馬尼亞人需要求助外國。作為落后民族，他們既需要也反感幫助。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他們發現自己依賴外國勢力，更為難堪的是，大國們宣稱，承認羅馬尼亞獨立的條件是后者接受西方的公民平等理念。這個條件得到國際猶太人群體的大力推動，要求羅馬尼亞解放當地特別巨大的猶太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中歐或西歐任何地方都高），其中許多剛剛從情況更糟的俄國移民而來，尚未被融合。這個故事還是人權（在這里是猶太人的）和物質權利（在這里是德國投資者的金錢利益和大國們的政治利益）如何經常相互沖突的微縮模型。兩者都能實現的愿望被證明不切實際；最終，人權為物質利益讓路。

在本書中，這個故事第一次以廣泛的新資料為基礎被講述，它的各種元素在布萊希羅德身上融合。在羅馬尼亞的糾葛中，他同樣重視捍衛人權和物質權利。一方面，他不得不執行俾斯麥的決定，挽回因為考慮不周的羅馬尼亞鐵路建設計劃而似乎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德國投資；另一方面，以他為首的西方猶太人試圖保護羅馬尼亞的猶太人免受壓迫和歧視。由于在鐵路問題上幫了俾斯麥的忙，他一度很有希望贏得俾斯麥對猶太人的支持。他的全部關系人、效忠者和依附者都被卷入進來。

對俾斯麥來說，介入羅馬尼亞事務帶來無盡的麻煩。不過，他神秘的政策最終取得巨大成功，既證明他是一位狡猾而無情的大師，也顯示出他的外交舉動中對內和對外考慮的糾結。

羅馬尼亞的冒險發生在一個經過連續臣服于土耳其人和俄國人的歷史后尋求獨立的國家，但只能夠通過大國們的施恩實現目標。羅馬尼亞是腐朽的土耳其帝國身上掉落的碎片之一，它的強鄰俄國和奧地利虎視眈眈地把獨立的羅馬尼亞看作潛在的衛星國。對羅馬尼亞人來說，既利用列強的矛盾又不淪為它們的犧牲品殊非易事—沒有人會考慮呼吁崇高的政治道德。權宜是家常便飯，欺騙常常成為成功的手段。

羅馬尼亞是19世紀的發明。從羅馬時代以降，并沒有這樣的國家存在；14世紀時，那里出現兩個公國：摩爾達維亞（Moldavia）和瓦拉幾亞（Wallachia），兩國居民說同一種語言，具有相同的拉丁人祖先，并或多或少地處于土耳其人及其助手—被稱為法納爾人（Phanariots） [1](#1_29)  的希臘人直接統治下。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俄國人階段性地把勢力范圍擴展到這兩個公國，他們的統治總體上比土耳其宗主更加開明。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失敗后，“歐洲協調”在1856年的《巴黎條約》中決定俄國不再擔任保護國，兩個公國應該留在土耳其宗主的統治下，并成為歐洲的保護國。羅馬尼亞人強烈要求兩國同意，并向他們的拉丁人兄弟—法國人求助。法國人很快答應了，因為拿破侖三世自視為各民族的保護者。當然，各大保護國之間發生爭執，并各行其是。奧地利堅持要羅馬尼亞從俄國獨立，以便對前者確立事實上的壟斷影響。另一方面，奧地利人擔心羅馬尼亞的民族主義，因為那很容易滲透到生活著大量羅馬尼亞人的匈牙利。羅馬尼亞人想要民族獨立—他們逐步向目標邁進，既依賴大國，又借機挑撥它們。

這里不是介紹羅馬尼亞歷史的地方 [[1]](#1_56)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記住這兩個公國的首位共同統治者庫薩親王（Prince Cuza）于1866年被廢黜，而在羅馬尼亞政客伊翁·布拉提亞努（Ion Brătianu）的安排下，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親王被選為繼任者。卡爾來自霍亨索倫王朝的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小宗；卡爾的父親將小公國齊格馬林根的主權交給柏林的國王（他的堂親），事實上開始為普魯士效勞。卡爾是個27歲的美男子，他勇敢而且雄心勃勃，正在尋找自己的命運。他希望接受這個挑戰，無論面對什么風險，并得到俾斯麥的鼓勵。卡爾不同尋常的血統讓他更容易被所有人接受，他不僅與統治普魯士的王朝有親，還與拿破侖三世是表親 [2](#2_29)  。卡爾親王和他的新臣民都對彼此一無所知，但他通過公投順利當選，投票結果是令人驚訝和帶有欺騙性的685969票對224票 [[2]](#2_56)  。羅馬尼亞人早就想要一位外國大公，顯然他與普魯士的關系讓羅馬尼亞在俾斯麥的眼中更加重要。此外，卡爾前往羅馬尼亞任職開創了先例。1870年時，俾斯麥希望西班牙人能夠效仿。出口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可以提升普魯士和德意志的影響。

卡羅爾大公發現，懶惰的庫薩給他留下一個爛攤子。“很少有統治者在登基伊始便不得不面對如此沮喪的工作。” [[3]](#3_54)  庫薩留下的是空空如也的國庫、巨額的公共債務、已經六個月沒領到薪水的官員們，還有腐敗而低效的原始行政體系。羅馬尼亞的政客們急于標榜自己的西方身份和強調他們與法國特別的親緣關系，以1831年的《比利時憲章》（Belgian Charter）為藍本起草自由主義憲法。在異教徒土耳其人和專制的俄國人環伺下，羅馬尼亞想要成為模范的西方子民。

這些原則在一個經濟落后和政治經驗欠缺的國家很難實現。在制憲過程中，猶太人問題爆發。一些羅馬尼亞人試圖把西方原則擴展到猶太人身上，建議將他們解放。隨之而來的是聲勢浩大的抗議，布加勒斯特的一座新建猶太教堂也被焚毀。猶太人被定性為外國人，憲法第七條規定，“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外國人才能被歸化” [[4]](#4_54)  。簡而言之，猶太人永遠不可能獲得公民權。

在羅馬尼亞猶太人歷史的撰寫中，爭論一直超過事實。很難找到客觀證據—首先是羅馬尼亞猶太人的人數和來源問題。19世紀60年代，500萬羅馬尼亞人中估計有20萬到30萬猶太人。1869年，摩爾達維亞首府雅西的普魯士領事向俾斯麥報告說，羅馬尼亞政府的宣傳冊聲稱500萬羅馬尼亞人中有40萬猶太人（或1比12.5）的說法不正確，事實上只有23萬猶太人，因此“1比19.5的數字低于俄國等地” [[5]](#5_54)  。他們大多生活在摩爾達維亞，大多是為了逃避尼古拉一世的迫害從俄國逃難而來。1829年的《亞得里亞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簽訂后出現猶太移民的涌入潮，該條約標志著俄土戰爭的結束，為從前被奧斯曼人封鎖的地區帶來貿易和商業機會。猶太人既急于逃離可怕的俄國柵欄定居區（包括前波蘭的土地），又被這片看似充滿希望的土地強烈吸引。一些猶太人更早以前就從波蘭和烏克蘭移民到這里。他們經常被稱作加利西亞猶太人，這個稱呼在各式人群中都帶有特別的貶義，包括在猶太人中間。在摩爾達維亞，猶太人與當地人分開居住，根據羅馬尼亞人的報告，他們甚至不說當地的語言。當然，土生或富有的猶太人不在此列。由于被禁止擁有土地和從事大多數職業，他們成了工匠、小商人、放貸者和酒館老板。羅馬尼亞人認為他們放高利貸和鼓動農民酗酒。更讓羅馬尼亞人難堪的是，到了19世紀50年代，包括雅西在內的大多數摩爾達維亞城市中，猶太人數量占優。到1866年和1867年，甚至連最終的平等承諾都讓羅馬尼亞人越來越不安。

卡羅爾登基后，羅馬尼亞眾議院開始通過新的限制猶太人法律，不僅恢復過去的禁令，還加入新的。1867年的一項法令重申，猶太人被禁止擁有土地，被禁止生活在村鎮中或者擁有酒館。地方命令和“自發”暴動完成了剩余工作。同年，雅西當局宣布猶太區對衛生構成威脅，并驅逐一些所謂的猶太人流浪漢，其中也有富人。在加拉茨（Galatz），羅馬尼亞人試圖將猶太人趕過邊界，但土耳其人不愿接受他們，一些受害者溺死在多瑙河。

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不同于俄國或匈牙利。羅馬尼亞的統治階層并不像普通人那樣歧視商業。相反，羅馬尼亞人效法在獨立前那個世紀地位顯赫的希臘人，成了精明的企業家。不同于匈牙利貴族或俄國貴族（dvoryanstvo），他們從一開始就把猶太人視作經濟上的對手。不過，和俄國人一樣，他們也在東正教會的影響下對猶太人懷有宗教上的敵意。簡而言之，經濟對立一直助長著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因此該國猶太人的狀況比匈牙利糟糕得多，盡管比俄國要好上不少 [[6]](#6_52)  。

西歐的猶太人竭盡所能幫助東方的同胞。在今天看來，我們可以說19世紀60年代是歐洲對正式的反猶主義最反感的時代，歐洲公眾最不能坐視歧視和暴行，這些行為一直被認為屬于上個時代的宗教狂熱。較為富有和影響力更大的歐洲猶太人建立非正式的合作網絡，在那個以寬容和啟蒙人性為驕傲的時代，他們手握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宣傳。他們利用新聞媒體揭露和指責羅馬尼亞人（或者后來的俄國人）的反猶舉動，并希望他們的開明讀者能做出恰當的反應，希望他們的政府能采取正式或非正式的行動，希望受到批評的那個國家能感受到公眾不滿的壓力。西歐和中歐的猶太人意識到，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特別嚴重，但也是唯一可能屈服于國外壓力的國家，這讓他們更加堅決地采取行動。通過媒體和私人渠道，他們讓羅馬尼亞人的惡行受到關注，并訴諸被普遍接受的原則以喚醒歐洲人的良心。

從一開始，布萊希羅德就在猶太人動員歐洲輿論指責羅馬尼亞反猶主義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們無從得知他內心深處關于該問題的感受，但即使他希望表現出緘默和謹慎，他有權勢的國外朋友仍會要求他參與其中，因為他們把他與俾斯麥的關系看作非常重要的工具。1867年5月，當雅西爆發第一次嚴重的反猶暴行后，他收到來自維也納的朋友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的特別召喚，后者無疑也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鑒于普魯士對統治布加勒斯特的大公擁有最直接和最大的影響力，鑒于俾斯麥伯爵非常寬容，我肯定您會過問此事。維也納教眾很關切此事，這樣的善舉必將得到上帝的獎賞。”一天后，普魯士駐倫敦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致信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對雅西的猶太人遭到迫害一事非常激動，敦促我提請王國政府關注，并請求大人代表他們的猶太人同胞與羅馬尼亞親王進行友好交涉。”布萊希羅德也向俾斯麥提出請求。接到這些請求后，首相命令駐布加勒斯特領事調查情況，“如果合適的話，委婉地向當局提出此事” [[7]](#7_52)  。這些抗議令被卡羅爾大公稱為“基督徒民族中最寬容者”的羅馬尼亞人不安。幾天后，路易·波拿巴致信卡羅爾：“公眾對以色列人［israélites］事件反應強烈，因為這種迫害屬于另一個時代，被視作以討好大眾的低級本能為目的。” [[8]](#8_52)   [3](#3_27)  甚至卡羅爾的父親也奉勸他向現實低頭：法國是羅馬尼亞唯一的支持者，猶太人的錢統治著法國媒體，因此猶太問題總會激怒巴黎 [[9]](#9_50)  。整個世界都試圖教會羅馬尼亞人如何對待他們的猶太人。不過，羅馬尼亞人被證明是頑固不化的學生，最終耗盡道德先生們的熱情。

布萊希羅德繼續向俾斯麥通報新的暴行。1868年2月，他向巴黎以色列聯盟德高望重的會長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保證，自己將試圖幫助羅馬尼亞的猶太人 [[10]](#10_49)  。救助迫在眉睫。部分“激進”的羅馬尼亞議員提出的新法案幾乎剝奪猶太人的全部公民權利，雅西的猶太人社群也發電報給布萊希羅德，表示某些地方長官自作主張地準備把議會意圖馬上變成可怕的現實。電報談到“滅絕”計劃，并報告說在巴考（Bacau）地區，“五百個猶太家庭在二十四小時內被從鄉間驅逐，只能餓著肚子，悲慘而漫無目的地流浪。他們遭遇無限的悲慘，不幸無法言表”。為了打消廣泛的懷疑，布萊希羅德要求獲得上述事件的細節，他的要求馬上得到滿足。他把這些報告交給俾斯麥 [[11]](#11_49)  。

俾斯麥的駐倫敦大使已經在電報中向他報告說：“十二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請求我緊急尋求王國政府的友好干預。”俾斯麥警告卡羅爾大公不要批準“如此可怕的迫害，因為這些人的用處超過他們的威脅，他們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同胞將把這場迫害轉變成［羅馬尼亞］政府的危機”。一周后，他再次敦促政府“對摩爾達維亞的迫害猶太人事件采取強硬立場”。俾斯麥還試圖讓俄國加入這樣的非正式警告，但沒有成功；戈爾恰科夫用羅馬尼亞人也喜歡的方式對普魯士大使羅伊斯親王說，他總體上不愿“把羅馬尼亞人對國家瘟疫（當地猶太人）所采取的行動視作犯罪……如果所有的猶太人都像羅斯柴爾德或克雷米厄家族一樣，那么情況就另當別論。但在當前的形勢下，不應該指責政府為保護民眾而對這些吸血鬼采取的行動” [[12]](#12_47)  。羅馬尼亞猶太人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圣人，他們不是西歐猶太人—這在隨后的幾十年間成了反復被提起的陳詞濫調；誠然，雅西的猶太人與巴黎的猶太人不同，不過似乎很少有觀察者記得，布加勒斯特人也不同于巴黎人—但他們仍然強烈主張自己的權利。

在布萊希羅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敦促下，俾斯麥要求卡羅爾扮演摩爾達維亞猶太人的守護天使角色，這讓后者非常惱火，他把猶太人視作討厭的異族，認為他們利用高人一籌的勤奮和低人一等的道德剝削自己的臣民 [[13]](#13_43)  。德國猶太人—包括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奧本海姆男爵、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男爵和作家貝托爾德·奧爾巴赫（Berthold Auerbach）—不斷代表羅馬尼亞猶太人向卡羅爾的父親卡爾·安東求情，這讓親王更加煩惱。雪上加霜的是，1868年4月，猶太人領袖們安排柏林和維也納的各大報紙對羅馬尼亞迫害猶太人事件發起聲勢浩大的嚴厲抨擊。行動取得成功，卡羅爾告訴父親和全世界，他的政府一直反對新的法律草案 [[14]](#14_43)  。在大國的支持下，猶太人成功阻止更苛刻法律的實行。六十五年后，英國最著名的羅馬尼亞史學家給出相當有代表性的總結：“1870年后，［反猶主義］浪潮逐漸平息，但在整個70年代仍有針對猶太人的周期性騷亂和攻擊，特別是在瓦斯盧伊［Vasluĭ］、普洛耶什蒂［Ploeşci］和達拉巴尼［Darabani］，以色列聯盟對此做足文章。” [[15]](#15_41)

布萊希羅德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但前臺的以色列聯盟和幕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可能發揮更大的影響。1870年法國戰敗后，法國猶太人的力量不復往昔，如果想繼續保護羅馬尼亞猶太人，那么柏林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正在此時，看似幸運的巧合出現了：1871年，俾斯麥請求布萊希羅德為德國人的錢介入羅馬尼亞事務。

自1862年上臺以后，俾斯麥就一直關注羅馬尼亞的情況。他對羅馬尼亞輕蔑但持續的關注驗證早前有人對他的看法，即俾斯麥“是個政治上的棋手，知道如何評估哪怕是最小的棋子；雖然并不首先使用它們，但他知道如何把它們留作后手” [[16]](#16_41)  。他密切關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領事們的報告（本書是首次使用這些報告），它們反映出當地歐洲領事們的地位：他們是“歐洲受保護國的支柱；對于這個誕生中的國家而言，顯然沒有更敏銳的觀察者了” [[17]](#17_35)  。

“這些公國最需要兩件東西：良好的初級學校和可通行的道路。”1863年，普魯士總領事如是向俾斯麥概括羅馬尼亞的問題—他的表述也經典地適用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出于貿易和聲望的原因，羅馬尼亞的領導者希望建立盡可能大的鐵路網。普魯士總領事支持這些計劃，認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旨在打破奧匈帝國對多瑙河航運的壟斷 [[18]](#18_35)  。俾斯麥也支持羅馬尼亞的鐵路修建計劃，因為這將“有利于我們的商業” [[19]](#19_31)  。

俾斯麥對羅馬尼亞鐵路的興趣從一開始就兼顧商業和政治：如果可以方便地避免，沒有必要允許奧地利在任何地方擴大影響力。事實上，1866年春，當奧地利和普魯士開始為決定性的攤牌動員軍隊時，卡羅爾大公就動身前往羅馬尼亞。在奧地利的后方有一位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對俾斯麥來說是誘人的前景，他有各種理由支持卡羅爾大公雄心勃勃的修建鐵路計劃。不過，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資本、機械和許多技術必須進口。來自英國和奧地利的多家公司都表示興趣，卡羅爾顯然略微傾向于德國財團，比如貝特爾·亨利·施特魯斯貝格所組建的。（由于羅馬尼亞決定不再發行對外貸款，施特魯斯貝格建議，由他和財團籌集必要的資本，由羅馬尼亞政府負責擔保利息。）

施特魯斯貝格來自一個在東普魯士的奈登堡（Neidenburg）生活了三到四代的猶太人家庭。童年時的他就皈依基督教；他在英國生活多年，在新聞、保險乃至藝術展覽業賺了一小筆錢。1863年，他返回柏林，先后為英國公司和他自己的公司工作，成功地在東普魯士修建多條鐵路。他逐漸將自己的帝國擴展到采礦業和在國外修建鐵路 [[20]](#20_31)  。

施特魯斯貝格說服一些著名的西里西亞權貴，如拉提波爾和烏耶斯特公爵、萊恩多夫—施泰諾特侯爵和他共同組成財團。他們的名字令新公司熠熠生輝。卡羅爾大公把修建龐大的鐵路網視作“關鍵問題”，而柏林也在發給他的報告中對施特魯斯貝格的可靠信誓旦旦。幾周后，卡羅爾也許有點不放心，他請求俾斯麥親自對施特魯斯貝格的“資質和能力”做出評價。俾斯麥親筆寫給普魯士總領事的回復是典型的搪塞之詞：

你和我一樣清楚拉提波爾和烏耶斯特的情況。施特魯斯貝格多次出色地參與過各種鐵路項目，因此做成一些出色的交易；當然，我對他現在的財產狀況一無所知，也無論如何不能對個人的能力提供官方意見，因為即使這樣的意見也意味著間接的擔保，我無法代表王國政府這樣做。 [[21]](#21_31)

俾斯麥急于撇清一切責任，沒有咨詢布萊希羅德就馬上做了回復。一年后，布萊希羅德主動提醒俾斯麥小心施特魯斯貝格的可能命運。他提到，在奧地利財政糟糕至極的時候，施特魯斯貝格試圖在維也納為塞爾維亞的鐵路籌資。布萊希羅德還表示：“此人非常聰明，但他用新冒險彌補舊虧空的做法很危險，如果遇到［突然的］障礙，他的整個部署可能崩潰，把數百萬輕信的股東埋在廢墟下。” [[22]](#22_31)

普魯士領事繼續向俾斯麥通報各國人士對羅馬尼亞鐵路特許權的爭奪。施特魯斯貝格的主要對手是奧地利鐵路建造商奧芬海姆伯爵（Count Ofenheim），此人從利沃夫（Lvov）到切爾諾維茨（Cernowitz）的鐵路賺不到錢，他相信如果讓該鐵路穿過羅馬尼亞延伸到黑海就能走出困境。奧芬海姆和施特魯斯貝格為這個羅馬尼亞沒錢推行的項目展開競爭。一些羅馬尼亞要人提出反對，認為鐵路是一種將引入現代罪惡的昂貴投資。更重要的是，許多人相信，外國人將犧牲羅馬尼亞的利益，用鐵路特許權為自己牟利。在此過程中，他們將讓該國遍布各種討厭的外國人。奧芬海姆將引入骯臟的波蘭人，而施特魯斯貝格則將帶來普魯士軍隊，利用羅馬尼亞領土對俄國或土耳其開戰。為了減輕這樣的恐懼和推進自己的目標，奧芬海姆和施特魯斯貝格都忙著賄賂羅馬尼亞立法者—或者說有這樣的傳言。普魯士領事們無疑相信企業家已經送出了和羅馬尼亞議員收受了大筆好處 [[23]](#23_31)  。施特魯斯貝格的財團報價較低，因此贏得卡羅爾大公的全力支持。最終，政府決定修建兩條鐵路，把特許權同時授予兩人。1868年4月，卡羅爾利用自己的權威迫使頑固的眾議院批準施特魯斯貝格的特許權。同年7月，曾因不聽話而被解散的參議院也批準授權。

施特魯斯貝格試圖修建多條線路（從北部的羅曼［Roman］經加拉茨到布加勒斯特，然后前往匈牙利邊界），總長942千米。該公司將最多發行價值25434萬法郎、利率為7.5%的債券 [4](#4_27)  ，每千米造價估計為27萬法郎。債券發行在柏林進行，由羅馬尼亞政府的代理人—普魯士高級財政顧問阿穆布隆（Ambronn）監督，此人與卡羅爾大公家族早就私交甚密。政府將為利息擔保，不過并未明確其完全責任將馬上開始還是等到鐵路竣工后。協議規定，竣工日期將不晚于1872年 [[24]](#24_29)  。

施特魯斯貝格熱情飽滿地開始新工程。在加拉茨，他像將軍對軍隊訓話那樣告誡工人們“不要失去普魯士人的性格，不要陷入德國人的懶散（Dusel），而是要堅持守紀律、有干勁、謹慎和頑強的普魯士方式”。按照普魯士人的效率，工程將于1869年底完成—至少施特魯斯貝格這樣對羅馬尼亞人保證 [[25]](#25_29)  。與此同時，他還在商談獲得更多特許權。

但技術困難、羅馬尼亞人的掣肘和現實中的管理不善給施特魯斯貝格強烈的樂觀主義澆了一盆冷水。工程進展不如預期，當競爭者奧芬海姆的公司大張旗鼓地開通他們的鐵路時，施特魯斯貝格的團隊卻被越拉越遠。1870年初，新任普魯士總領事馮·拉多維茨（J.M.von Radowitz）抵達布加勒斯特。拉多維茨來自一個古老的、政治上顯赫的家族，他本人才智過人，剛剛開始出色的外交生涯。1870年1月，當他離開柏林時，俾斯麥囑咐他把施特魯斯貝格“當作大人物對待，為了此人在當地所代表的廣泛德國利益與其和諧相處”。拉多維茨在赴任前與施特魯斯貝格見了面，馬上就對后者產生反感。但他意識到，整個柏林都中了這位偉大“推動者”（Macher）的魔法：“從親王和頭牌貴族到最小的資本家，所有人都參與施特魯斯貝格的發起活動。”施特魯斯貝格也被稱為“鐵路之王”，他生活極端奢侈，他的炫耀本身當然證明了他公司的穩定。無論如何，拉多維茨馬上抱怨說，他為施特魯斯貝格事件付出的時間超過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一切事，卡羅爾大公和布萊希羅德等人也將發出同樣的抱怨。施特魯斯貝格將讓許多人損失金錢，還有少數人自認為損失了人生中的多年時光 [[26]](#26_27)  。

拉多維茨報告說，有敵意的羅馬尼亞媒體再次叫囂外國人正在騙羅馬尼亞人的錢，但也一直盼望這些外國人“用金錢收買媒體的沉默”。在羅馬尼亞，普魯士使節并不像一般外交官那樣傾向于認同所在國或為其辯護。在他們看來，羅馬尼亞人的貪婪令人震驚—普魯士人自覺保持正直，羅馬尼亞人則對腐敗問題滿不在乎，也許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大的文化反差。拉多維茨警告說，“像瓦拉幾亞人這么興奮、沒耐心和極度貪婪的人”不會為了外國人出于私利而開展的項目無限期地等下去。他擔心反德情感的巨大浪潮將席卷羅馬尼亞，讓卡羅爾大公父子尷尬不已，因為兩人都被認為參與施特魯斯貝格事件。拉多維茨拒絕施特魯斯貝格代理人的要求，即總是假裝卡羅爾大公支持此人的一舉一動。在這份二十八頁報告的最后—俾斯麥討厭長報告—他希望至少部分鐵路能很快開通；那樣的話，即使有拖延和流言，股東們也不會遭遇真正的危險。施特魯斯貝格即將展開的布加勒斯特之行關系重大，如果他能夠表現得謹慎！也許普魯士內閣能夠引導他走上更明智的道路 [[27]](#27_23)  。

但形勢越來越糟。施特魯斯貝格不斷遇到新的障礙：所有的機械、鐵軌和技術工人都必須進口，通過不存在的道路運往工地。他解雇了代理人，并與羅馬尼亞的下屬發生爭吵。拉多維茨報告說，“鐵路之王”習慣于輕蔑對待他的手下，但總能“用金錢上的滿足撫慰他們的感情” [[28]](#28_17)  。施特魯斯貝格的帝國中存在管理不善和不滿。

拉多維茨的報告變得越來越不祥，盡管忙于普法戰爭事務，俾斯麥還是密切關注這場醞釀中的災難。到了1870年春末和夏天，施特魯斯貝格的股票開始下跌，拉多維茨收到來自德國各地的焦急問詢，打聽該公司的命運。他提醒俾斯麥，許多“小人物”可能失去積蓄，當然“大人物們”的資本損失也同樣不樂觀。涉及金額約為5000萬塔勒，幾乎都來自德國人 [[29]](#29_17)  。

到了1870年8月，股價已經從70塔勒左右下跌到約43塔勒。股市只是更多災難的預兆：人們發現，鐵路債券發行的羅馬尼亞代表阿姆布隆先生同意施特魯斯貝格把金邊債券 [5](#5_27)  （公司在需要全部現金用于建設開支前的投資選擇）換成有疑問的債券，由施特魯斯貝格其他不可靠的公司擔保。施特魯斯貝格把為羅馬尼亞籌集的錢用于拯救他處于危險中的其他公司。

9月，阿姆布隆徹底失蹤。他的逃跑證實人們最大的擔憂，布加勒斯特也炸開了鍋。與此同時，摩爾達維亞的地主們開始為施特魯斯貝格的鐵路建設用地開出天價，盡管這些土地根本不值錢。人們本以為“征用委員會”會標明必要用地，并向所有者開出合理的補償。但事實上，地價突然躥升，羅馬尼亞法庭也支持這些不合理的要求。拉多維茨變得日益焦慮，他對俾斯麥解釋說，布加勒斯特的所有外國代表都認同，“是時候考慮采取嚴肅措施，拯救受我們保護之人的利益，使其免受日益腐敗的羅馬尼亞司法和官僚之害” [[30]](#30_13)  。俾斯麥迅速從凡爾賽發來令人絕望的回復：他命令拉多維茨嚴守中立，甚至不能為德國人的利益使用個人影響。遭到駁回和拒絕的拉多維茨回信說，他當然會遵守新指示，但就連卡羅爾大公也總是支持他向羅馬尼亞內閣施壓 [[31]](#31_13)  。

俾斯麥對整件事感到惱火，他的克制并非出于對羅馬尼亞人的感情。當拉多維茨早前私下向他提出，8000馬克的薪水不足以滿足卡羅爾大公眼中德國代表所應有的生活方式時，俾斯麥拒絕了請求，表示他覺得卡羅爾的想法有點幼稚：“約束如此墮落的民族不能靠幾場豐盛的宴席，而是需要幾營強大的士兵。” [[32]](#32_13)  俾斯麥對羅馬尼亞人懷有無限的鄙視，普法戰爭期間席卷布加勒斯特的狂熱親法情感無疑讓他更加厭惡。親法也暗示反對卡羅爾，布加勒斯特流傳著這樣的話：“我們無法去法國打德國人，但我們可以在這里打。” [[33]](#33_13)

1870年秋天，比起羅馬尼亞事務，俾斯麥更擔心俄國意圖指責《巴黎條約》中的黑海條款，擔心此舉可能對英國產生的影響。他命令外交部嘗試聯合奧地利、俄國和土耳其，在布加勒斯特發起聯合行動。同時，他還授權拉多維茨發表非正式聲明，表示普魯士不會坐視自己的利益受損。俾斯麥希望其他國家也能認識到，施特魯斯貝格的垮臺將威脅到羅馬尼亞的所有外國企業 [[34]](#34_13)  。他的奧地利同僚博伊斯特伯爵馬上采取強硬立場，但沙俄政府表示不信任施特魯斯貝格，拒絕一切合作。

將施特魯斯貝格的麻煩國際化的嘗試來得太晚。與此同時，普法戰爭導致股市下跌，這威脅到施特魯斯貝格資產的流動性，也威脅到他的整個錯綜復雜和大膽建造起來的鐵路、房地產和實業帝國。12月中旬，施特魯斯貝格向俾斯麥發出絕望的請求，后者當時正在凡爾賽進行自己的艱苦戰斗。這位大金融家擔心，他可能無法在兩周后支付250萬塔勒的羅馬尼亞債券半年利息。他聲稱自己已經損失400萬塔勒，因為他不得不低價拋售證券，以便維持各項買賣—其中一些對普魯士的戰事必不可少。所有的柏林銀行家都嫉妒和反對他，因此國家應該借給他250萬塔勒，以他名下其他公司價值500萬塔勒的股份作為擔保。他認為這個請求合情合理：

但不幸的是，在這個我生活的國家，在這個我相信為之付出很多的國家，我遇到的只有敵意和討厭的逆境……盡管在戰爭期間遭受損失，我相信我仍能自詡為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之一。不過，我毫不看重這點，因為金錢對我沒有用…… [[35]](#35_13)

施特魯斯貝格還動員烏耶斯特對俾斯麥施壓—結果出人意料，俾斯麥在親筆批示中敦促王國政府和威廉幫助施特魯斯貝格。“據我所知，許多家庭的生計和財產維系于施特魯斯貝格的幾家企業。”施特魯斯貝格無法支付利息意味著“災難” [[36]](#36_13)  。

俾斯麥愿意動用國家資金幫助私人企業（還是在戰爭期間），這暗示他在這類事務上比后世史學家們所認為的更加通融和靈活。無須經歷19世紀70年代的蕭條、1879年正式轉向保護主義或帝國主義冒險，俾斯麥就愿意拯救陷入麻煩的國內企業 [[37]](#37_13)  。

俾斯麥在柏林的同僚們提出異議。他們懷疑施特魯斯貝格是否有能力償還貸款。坎普豪森向俾斯麥解釋說，他們認為大部分羅馬尼亞債券“屬于一小群被相對較高的利息和巧妙的宣傳所吸引的將積蓄投入這場冒險中的人。這些債券價格的下跌很可能讓其中一些人遭受重創。但我不認為這樣的財產損失是一場帝國政府必須動用國家信貸來阻止的災難，任何購買投機性債券的人都會面臨風險，羅馬尼亞債券顯然屬于此類” [[38]](#38_13)  。

盡管得到俾斯麥的支持，但施特魯斯貝格阻止災難的最后努力還是流產了。隨之而來的風暴甚至超出俾斯麥的想象。1月11日，施特魯斯貝格宣布無法支付半年利息，但承諾將在3月支付。他還聲稱，為利息做“擔保”的羅馬尼亞政府將為支付負責，但羅馬尼亞政府卻堅持責任需要以鐵路完工為條件。股票價格驟跌，因為德國投資者認為自己被羅馬尼亞人欺騙，而羅馬尼亞人則認為自己再次被外國人欺詐，這次連他們的王室都成了幫兇。甚至在這最新一擊到來前，羅馬尼亞的形勢已經惡化：國庫仍然空空如也；議會兩大黨派爭執不休，只有在對卡羅爾大公的敵意上保持一致；而所謂的保護國們對卡羅爾保證，它們出于好意不會干涉羅馬尼亞事務。卡羅爾孤立無援—到了1871年2月末，他的父親認為兒子很可能退位，已經在國內為他安排好出路 [[39]](#39_13)  。

施特魯斯貝格事件具有重大糾葛的一切特點：巨額金錢被牽扯其中（根據不同的估計，金額在1.5億到2億馬克之間；與之相比，1879年普魯士的全部國家債務只有13億馬克）；施特魯斯貝格和羅馬尼亞政府最初簽署的協議很不仔細，導致爭議債券的責任模糊，為法律上的相互指責留下無限空間。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至少還得到了民族偏見的慰藉，互相認為對方才是罪魁禍首。卡羅爾大公被夾在中間，無法隨意指責任何一方，反而遭到所有人的責難。難怪整個施特魯斯貝格事件讓他“沒有一刻安寧” [[40]](#40_13)  。不過，所有不幸被卷入其中的人都不得安寧。該事件一度有可能上升為重大國際危機。

俾斯麥的策略仍然和過去一樣：他試圖通過在布加勒斯特建立大國的統一陣線來威嚇羅馬尼亞人。但只有奧地利人全力支持他。與此同時，他感受到來自德國的羅馬尼亞股票持有者的強大壓力；2月，他們組織起來，大聲要求政府提供幫助。“旨在保護羅馬尼亞鐵路債券受到威脅的利益之委員會”向俾斯麥提交正式請愿書—共有580名持有者簽名，債券價值2117700塔勒—要求他說服羅馬尼亞政府支付承諾的利息。他們解釋說，“由于［施特魯斯貝格的］特許權合作者們在西里西亞被認為非常可靠和極度可信”，西里西亞人的損失最為慘重。拉多維茨估計，在德國人投資的5000萬塔勒中，有一半來自西里西亞人 [[41]](#41_13)  。俾斯麥意識到，受到威脅的不僅是小投資者的小錢，也包括國王的某些最顯赫臣子的財富和信用。王室不會坐視數以千計的臣民遭受損失，因為正是國王的臣子誘使他們參與這場帶有欺詐色彩的投機冒險。

在羅馬尼亞議會討論鐵路特許權的未來之時，施特魯斯貝格發出“最后通牒”（憤怒的拉多維茨如是形容）。事實上，施特魯斯貝格要求以羅馬尼亞政府的名義授權他發行新債券，盡管人們認為他還有900萬塔勒的建設資金。他還威脅提出模糊的“賠償”要求。與此同時，拉多維茨對俾斯麥堅稱，承擔支付利息責任的是施特魯斯貝格而非羅馬尼亞政府；但在回憶錄中，他持相反的觀點。按照拉多維茨的解讀，施特魯斯貝格的最后通牒證明他試圖逃避責任，把“即將到來的災難”歸咎于羅馬尼亞政府。更糟糕的是，拉多維茨抱怨說，施特魯斯貝格的行為“非常錯誤，雖然他無疑在羅馬尼亞人手中遭遇不公和傷害，但這無法減輕他為一場可能災難所負的重要責任”。唯一的希望是，施特魯斯貝格的特有權合作者們在“最后一刻”堅持支付利息，在此之后仍有可能達成妥協。若非如此，“認為盡可能傷害外國人是‘愛國之舉’”這種典型的羅馬尼亞人態度將會盛行，導致外國人的財產被全部沒收。拉多維茨對爭執各方都沒有什么同情，但他關心德國在布加勒斯特的威信和保護小投資者 [[42]](#42_13)  。

最終，羅馬尼亞人無意中救了施特魯斯貝格。5月22日，一伙羅馬尼亞暴徒闖入拉多維茨和德國僑界正在為威廉祝壽的大廳。暴徒們放肆了幾個小時。幾名德國人在由此引發的混亂中受傷，而羅馬尼亞警察和軍隊卻袖手旁觀。拉多維茨勃然大怒，因為在那個風平浪靜的時代，外交官仍然認為禮貌是可以辦到的準則。事件發生后幾個小時，拉多維茨要求卡羅爾解散整個政府—后者照做了。隨后，他把退位詔書交給前攝政者們，并請拉多維茨“求告俾斯麥，在鐵路問題上應該對特有權合作者施加巨大壓力，讓他們支付1月的利息”。大公的榮耀維系于可接受的妥協。即使在退位之時，鐵路問題仍是卡羅爾心中的頭等大事 [[43]](#43_13)  。

最終，卡羅爾被說服留任，一個保守而有能力（按照過去的標準）的政府接管局面。但現在，俾斯麥可以比以前粗暴得多：普法戰爭已經結束，而且羅馬尼亞人讓他有足夠的理由保持強硬。他要求對暴行作出補償，并威脅羅馬尼亞人說，如果不能讓德國人滿足，他將馬上訴諸他們的宗主國土耳其。這種武器是對羅馬尼亞人最大的冒犯，提醒他們在法律上從屬于那個老帝國（這正是意圖所在）。羅馬尼亞人窩著火賠了錢。在下一輪麻煩中，俾斯麥不忘繼續使用這種威脅。

不過，施特魯斯貝格事件仍然懸而未決。1871年春末，羅馬尼亞政府和施特魯斯貝格達成妥協，但羅馬尼亞眾議院否決該方案，而且頒布法令取消原先的特許權，并在事實上沒收已經建成的鐵路（事后再給予賠償）。俾斯麥被激怒了，向土耳其蘇丹提出賠償要求；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糾紛，拉多維茨用不尋常的方式發泄不滿，在柏林的諷刺雜志《噼里啪啦》上發表了指責羅馬尼亞人欺詐的匿名詩歌 [[44]](#44_12)  。卡羅爾大公開始相信，俾斯麥發動了“［對羅馬尼亞的］外交戰……施特魯斯貝格問題不再是權利問題，而是武力問題” [[45]](#45_12)  。但俾斯麥無法使用他更強的物質力量—今天的大國對此并不陌生，它們也見到過試圖沒收他國財產的較貧窮民族做出的憤怒和瘋狂的反應。

在這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中，急需解決的是究竟由施特魯斯貝格還是羅馬尼亞人重新支付利息；如果雙方都不支付，公司將垮臺。俾斯麥為此陷入無盡的煩惱，雪上加霜的是，威廉堅持不能讓其貴族朋友們損失投資。對羅馬尼亞人來說，這個問題事關自尊和權力；對卡羅爾大公來說，這事關個人名譽和政治生存。如果向德國人屈服，那么他就冒犯本國人民的感情；如果為羅馬尼亞人辯護，那么他將在應對俄國和土耳其時失去德國人的支持。沒有別的事讓他如此發愁，或者像他常常說的，耗去每天的許多時間，甚至生命中的許多歲月。這個故事如此錯綜復雜，導致后世史學家在此事上既不準確又不客觀 [[46]](#46_12)  。

俾斯麥的威逼和恐嚇舉動沒有收到成效。他希望國際性的聯合行動能讓羅馬尼亞因為害怕被歐洲資本市場孤立而屈服。但格蘭維爾勛爵拒絕一切合作，因為他覺得這“完全是商業問題”。與此同時，俾斯麥遇到的壓力越來越大，羅馬尼亞債券的不幸持有者們組織起來，既通過印發小冊子向公眾求助，也用更加平和與有效的方式向國王請命 [[47]](#47_12)  。1871年秋，俾斯麥最終把整件事丟給布萊希羅德和貼現公司的阿道夫·漢澤曼。他對前者解釋說，德國政府已經竭盡所能：“如果他［布萊希羅德］能夠找到解決辦法，‘他將得到上帝的獎賞’，他為祖國和帝國政府所做的貢獻無論怎么評價都不會過分。” [[48]](#48_12)  布萊希羅德同意了，但希望得到更加世俗的獎賞。

布萊希羅德對羅馬尼亞危機已經關注一段時間。1871年7月，施瓦巴赫在寫給他的信中談到這次“瘋狂的事件”，并報告說，他的客戶羅伊斯親王對自己在羅馬尼亞的投資憂心忡忡，并抱怨說當股價還沒有下跌那么多的時候，布萊希羅德曾敦促他不要賣掉股票。布萊希羅德還與威廉討論這場危機，后者最親信的侍從們有可觀的錢被牽扯進該事件 [[49]](#49_12)  。威廉的副官海因里希·馮·萊恩多夫是施特魯斯貝格一位特有權合作者的兄弟。布萊希羅德樂意介入羅馬尼亞事件讓萊恩多夫和威廉“感激和安心” [[50]](#50_12)  。布萊希羅德希望說服國王把他對德國投資者的仁慈關心轉化成積極的政策。威廉深表謝意，可能還偷偷幫助他的一些騎士 [[51]](#51_12)  。

10月，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接管羅馬尼亞的亂局，盡管肯定很不情愿。對布萊希羅德來說，這將成為長達十一年的刑期。兩位金融家為此耗費大量的時間、耐心和資本。兩人沒有賺到一文錢，但都獲得對普魯士財閥來說比金錢更珍貴的東西：貴族頭銜。下文將引述俾斯麥對羅馬尼亞糾葛的理想化盤點，聲稱布萊希羅德把貴族頭銜作為介入的條件。這個頭銜無疑是他掙來的。

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不得不多線出擊，并達成非正式的分工。在德國外交部和外國政客看來，布萊希羅德是與羅馬尼亞人的首席談判者。漢澤曼則負責與施特魯斯貝格協商，更重要的是，他還籌劃將陷入困境的鐵路真正建成的方法和手段。

詳細敘述隨后的復雜過程將會枯燥至極—《噼里啪啦》在一幅漫畫中對其進行恰如其分的描摹。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必須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接管原施特魯斯貝格公司的利益；他們請求原先的持有者們交出債券，到了1871年11月，已經有價值5000萬塔勒的原始債券掌握在他們手中。但新公司還需要找到1500萬塔勒完成鐵路修建，不得不與施特魯斯貝格達成協議（他承諾為將建設資金變成可疑證券而賠償600萬塔勒，但幾年后違背了承諾） [6](#6_27)  ，并與羅馬尼亞政府簽訂新的合同（還需得到疑慮重重和排外嚴重的議會批準）。此外，漢澤曼也宣稱“我沒有能力在羅馬尼亞造鐵路”，希望經驗豐富的奧地利皇家鐵路公司接管這些鐵路的修建和運營 [[52]](#52_12)  。

布萊希羅德必須說服羅馬尼亞政府批準他和漢澤曼制訂的新計劃。羅馬尼亞眾議院對于另一家外國公司的介入特別惱火，議員們斥之為新的“強暴”。這是布萊希羅德的一場斗爭，一邊是他的執著，一邊是羅馬尼亞部長和議會的狡猾推諉。

布萊希羅德手中有幾張王牌：他與俾斯麥合作密切，后者對羅馬尼亞人怒火難消，有時也會發泄到布萊希羅德身上。德國外交部不斷向布萊希羅德提供關于羅馬尼亞事務和他在當地行動的通信。布萊希羅德還成功地發動布加勒斯特的外國人施壓。通過與奧地利駐柏林大使卡洛伊伯爵的會談，他說服奧地利向羅馬尼亞施壓。通過動員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他成功地讓法國在布加勒斯特宣布：“為了避免羅馬尼亞政府陷入更大的困境，作為保護國之一的法國建議接受與布萊希羅德先生及其同伴們的妥協。”法國駐布加勒斯特領事勒蘇爾（Le Sourd）遞交了這條消息，他知道此舉摧毀了羅馬尼亞人對外國支持的最后希望。幾周后，羅馬尼亞財政部長馬弗洛格尼（Mavrogheni）來到柏林，與布萊希羅德建立“互信”關系，并討論按計劃完成鐵路修建的前景 [[53]](#53_11)  。

羅馬尼亞人最終讓步，同意讓新的德國公司委托奧地利公司修建本該已經完工的羅馬尼亞鐵路。甚至卡羅爾大公也對德國人的壓力大光其火，對俾斯麥因為“某些資本家把錢投入實業投機”就大張旗鼓地調動國家力量非常不滿。就像格蘭維爾勛爵之前所說的，在卡羅爾看來，這完全是商業事件。卡羅爾的父親卡爾·安東盡管經常批評俾斯麥的無情，但這次批評了兒子：他同樣指責羅馬尼亞人違背擔保承諾，更重要的是，他叮囑卡羅爾記住“德國元素目前最有生命力和未來，只有與那種元素保持合理的聯系，羅馬尼亞人才有繼續主宰自己未來的基礎” [[54]](#54_11)  。不用說，這種傲慢無助于相互諒解。

1872年，幾項新協議簽訂，鐵路建設也得到更有效的推動，但總有需要布萊希羅德與羅馬尼亞人緊急協商的新危機出現。鐵路主線在1873年5月竣工—那個月恰逢維也納股市崩盤，中歐進入新的經濟危機。羅馬尼亞鐵路受到貿易下滑的影響，到了1874年，施特魯斯貝格原先規劃的最后一條線路尚未運營，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的公司需要新資金償付上升的開支。

從布萊希羅德寫給漢澤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場特別危機的態度。這是兩位朋友留存下來的寥寥幾封書信之一，他們通常口頭交流。布萊希羅德提醒漢澤曼，他的銀行已經為新的羅馬尼亞鐵路公司預支近200萬塔勒；根據他們最初的協議，他估計貼現公司一定已經預支近400萬塔勒。現在，布萊希羅德斷然拒絕再預支“哪怕一個塔勒”。他還表示，借給施特魯斯貝格的錢能否全數歸還令人懷疑（后來果然沒有）。新需求可以由貼現公司或奧地利鐵路公司滿足（布萊希羅德認為后者一直故意拖延）。

或者還有第三種選擇，我提出供你參考：如果貼現公司和奧地利鐵路公司都不愿意預支，那么是時候向我們的老伙計尋求新貸款了，比如海貿銀行、邁耶爾·阿姆歇爾·馮·羅斯柴爾德、所羅門·奧本海姆和達姆施塔特銀行。他們通常不愿只在公司中掛名，對所持股份要求多多益善。海貿銀行已經為匈牙利做了那么多，應該愿意為羅馬尼亞付出同樣多，后者的狀況要好得多。 [[55]](#55_11)

布萊希羅德招募名義合伙人的如意算盤似乎沒能實施。

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布萊希羅德的潛在損失甚至超過他向漢澤曼提到的200萬塔勒。如果參照他與俾斯麥多次向他國外交官所做的表述，布萊希羅德似乎借給被施特魯斯貝格連累的大佬們可觀的金錢，以他們高風險的羅馬尼亞股票為擔保。因此，解決羅馬尼亞糾紛關系到布萊希羅德本人的巨大利益。

在解決過程中，柏林和布加勒斯特再次因為新股的發行條件產生爭執。絕望的舞蹈再次開始：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求助，后者推動其他力量對羅馬尼亞人施壓，而羅馬尼亞人則覺得新要求無法忍受，并對壓力感到恥辱。卡羅爾大公對俾斯麥和父親抱怨說，德國人讓他陷入無法忍受的困境。1875年1月，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表示，羅馬尼亞人正在與奧地利人展開貿易協議的談判，但“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鐵路問題，那么沒有哪個大國會和我們簽署協議—俾斯麥親王將確保如此” [[56]](#56_11)  。另一項妥協剛剛達成，巴爾干就陷入混亂，隨之而來的俄土戰爭再次讓局勢陷入混亂。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一次次取得階段性勝利，但德國投資者的命運仍然沒有脫離危險。到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現有線路的收入大幅下滑，股價同樣如此。那時的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只有一個目標：迫使羅馬尼亞政府收購鐵路，把全部剩余股份轉成有擔保的羅馬尼亞國債。羅馬尼亞人拒絕接受強行高價國有化，此事又拖延幾年 [[57]](#57_11)  。

當布萊希羅德繼續為了德國容克貴族和自己而努力時，國際猶太人社會也加大力度幫助被壓迫的東方同胞。19世紀70年代標志著該幫助行動的高峰。西方猶太人仍然對自己新獲得并不斷提高的地位很有信心，仍然尚未遭遇本國的第一波新反猶主義浪潮，他們決定發揮自己的力量和影響，組織全歐洲向東歐各國政府施壓，要求改善猶太人少數族裔的命運。

1871年后，猶太人的合作形式發生改變。以色列聯盟由法國人主導，非法國猶太人開始不滿巴黎在猶太人事務中的權力 [[58]](#58_11)  。70年代末，布萊希羅德的一些英國通信人開始對聯盟發表不屑之詞。（“難道萬國以色列聯盟不是個大騙子嗎？它有什么影響力？！” [[59]](#59_10)  ）各國團體開始叫板聯盟，盡管后者仍然是重要的集體機構—即使在走下坡路之時仍能成為國際猶太人力量的象征。事實上，通過相互通信、與報界和議會的猶太同胞磋商以及向各自政府求助，富有的猶太人比聯盟做得更多。對于所有這些努力，有人評價說：“歐洲猶太人有某種默契。” [[60]](#60_10)  不過，某些人眼中的默契在另一些人看來是不協調的陰謀。

羅馬尼亞成了猶太人力量的試金石。羅馬尼亞人的反猶情緒仍然特別強烈，但也特別容易屈服于外國壓力。19世紀70年代，羅馬尼亞成了主要目標，各地的猶太人團體試圖發動輿論，迫使羅馬尼亞人停止歧視和反猶暴動。甚至美國猶太人也扮演重要角色；通過銀行家塞利格曼（Seligmann）的出色游說，美國猶太人說服格蘭特總統任命一位美籍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 Jews）本杰明·佩肖托（Benjamin Peixotto）擔任沒有薪水的美國駐布加勒斯特領事。

不過，西方猶太人社會的主要政治武器是布萊希羅德。他發現自己既受俾斯麥之托處理鐵路糾紛，又受猶太人同胞之托為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爭取俾斯麥的支持。這個角色并不輕松，常常招致各方的不滿。不過，他具有得天獨厚的地位—畢竟俾斯麥仍然需要他介入羅馬尼亞事務—很長時間里，他一直認為俾斯麥會考慮自己的請求。

1872年3月，剛剛被封為貴族的布萊希羅德提醒俾斯麥：“生活在羅馬尼亞的猶太人曾多次遭受卑鄙的迫害，現在又在伊斯梅爾（Ismail）等地遭到狂熱暴徒的侵擾。”他懇求俾斯麥表現出“著名的仁慈”，讓德國和英國、法國和奧地利領事一起為這些猶太人提出抗議。俾斯麥在布萊希羅德請求書頁邊批示“照準”，授意總領事支持這些抗議——

并私下口頭告訴卡羅爾大公，新的迫害猶太人事件給德國和其他國家留下很壞的印象……特別是因為他們的同胞在媒體、政界和范圍廣大的圈子里擁有不可小視的影響力。因此，卡羅爾大公政府在這個方面的任何弱點都會削弱他本人的地位。

卡羅爾應該意識到，即使不考慮道德，反猶主義也不明智。俾斯麥告訴布萊希羅德，他已經向布加勒斯特下達合適的命令 [[61]](#61_10)  。

布萊希羅德把結果告訴以色列聯盟。巴黎的聯盟成員曾祝賀他獲封貴族，在給俾斯麥寫信的當天，他也感謝他們的祝賀：“……你們可以確信，［獲封貴族］給我帶來的喜悅中有相當一部分源于我把此事看作我們民族遭受的歧視正在消失的象征。現在，我更加覺得有義務利用我微小的影響力幫助受壓迫的羅馬尼亞同胞……”幾天后，他報告說，他對俾斯麥的請求取得“巨大成功”，并“秘密地”向巴黎轉達俾斯麥告訴他的一切 [[62]](#62_10)  。

在布萊希羅德進行個人努力的同時，柏林成立羅馬尼亞猶太人委員會—它的組織本身隱含與以色列聯盟分庭抗禮的意味。這個委員會不乏名流，包括著名學者莫里茨·拉撒路（Moriz Lazarus）、知名猶太作家貝托爾德·奧爾巴赫和布萊希羅德的弟弟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本人沒有參加，他無疑認為自己更適應一向以來的幕后角色，那樣最能發揮他的作用 [[63]](#63_10)  。

柏林委員會向巴黎炫耀自己的成功：他們已經籌集一大筆錢。“后續工作即將展開。接下去的幾天，我會向你展示我們在媒體活動的證據。你可能已經聽說柏林股市中的反羅馬尼亞騷動。” [[64]](#64_10)  柏林委員會還呼吁召開國際會議商討羅馬尼亞猶太人問題。委員會的臨時主席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致信巴黎，表示這樣的大會（1872年秋天在布魯塞爾召開）應該探討如何“通過齊心協力，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改善羅馬尼亞猶太人的物質和道德狀況” [[65]](#65_10)  。

這些行動受到廣泛關注。從1872年5月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奧多·羅素勛爵寫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猶太人多么成功地喚起基督徒的感情：“如果你能為保護羅馬尼亞的猶太人做些什么，你將在德國獲得金質桂冠。” [[66]](#66_9)  俾斯麥的柏林成了羅馬尼亞猶太人的庇護者—這是新自由德國的面貌嗎，就像許多反猶主義者所聲稱的？

我們不必記錄布萊希羅德或廣大猶太人的所有不同行動。下一個重大問題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到來：羅馬尼亞政府希望同大國們簽訂貿易協議，此舉既出于商業理由，也為了讓該國的獨立地位獲得某種事實上的認可。與德國的協議當然是關鍵；羅馬尼亞猶太人向柏林委員會呼吁，要求協議中規定所有宗教平等，否則即使在羅馬尼亞從商的德國猶太人也會受到羅馬尼亞人的限制。柏林委員會發動議會中的朋友們，特別是拉斯克，以便在沒有平等條款的情況下阻止協議通過。羅馬尼亞人對該條款提出反對，但德國政府持開明立場，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不應簽署協議。各大猶太人團體對此歡欣鼓舞 [[67]](#67_9)  。

猶太人的壓力是俾斯麥政策的決定性因素嗎？1877年11月，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寫了密信，表達“羅馬尼亞鐵路公司對高層如此仁慈之保護的最深切感謝；延遲簽署商務協議讓我們得以與羅馬尼亞政府達成合約”，這將加快德國債權人與羅馬尼亞政府的妥協。事實上，俾斯麥早在1877年初就發出過其他威脅，試圖讓羅馬尼亞人意識到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在鐵路問題上讓步—此舉是在布萊希羅德的明示請求下做出的，后者相信外交部會支持他的行動 [[68]](#68_9)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布萊希羅德心中，與羅馬尼亞人關于鐵路的無休止談判和猶太人問題的壓力是兩碼事，只在他身上產生交集：通過在鐵路問題上滿足俾斯麥的要求，他更有底氣呼吁保護猶太人。俾斯麥也持同樣看法嗎？或者說他何時注意到兩者的聯系，就像布萊希羅德信中近乎直白地提出的：在猶太人問題上保持強硬也許可以迫使羅馬尼亞人在鐵路問題上妥協？多年間，俾斯麥也許把這兩個問題看作互補的。他無疑更關心德國人的財富和威望，而不是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但他一度愿意同時為了這兩個問題威嚇羅馬尼亞人，特別是因為這樣的威嚇符合他的總體政治觀點，而且反映出他同樣鄙視羅馬尼亞人和猶太人。

1876—1878年，俾斯麥沒有特別的理由拒絕猶太人群體或者公開質疑西方的開明論調。當然，他也有務實考慮。他可能認為，羅馬尼亞猶太人能在羅馬尼亞起到些許有用的“德意志化”影響 [7](#7_27)  。當然，最重要的是俾斯麥對德國投資者的關心，這種關心成了布萊希羅德在猶太人問題上的“特殊武器”。1878—1879年間的某個時刻，俾斯麥一定意識到，他可以把國家社會對羅馬尼亞猶太人的關心當作工具，迫使羅馬尼亞人在鐵路問題上讓步。俾斯麥的思想逐步發生變化，反映出政治現實的改變。布萊希羅德似乎沒有很快意識到俾斯麥改變優先考慮，這種改變將危及他自己的希望。

1877—1879年，俾斯麥摸索著為帝國尋找新的秩序。東歐問題的突然卷土重來，逐漸迫使俾斯麥在外交上也做出根本性改變。對羅馬尼亞人來說，新危機同時帶來新的機會和危險，羅馬尼亞的形勢發展因此加快，包括與猶太人命運相關的事件。

1875年，除了羅馬尼亞人之外的巴爾干各民族開始反抗土耳其人的統治。土耳其人鎮壓了叛亂，但大國們希望讓土耳其人接受有利于他們基督徒臣民的新改革，為此于1877年1月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大使會議。可以想見，涉及羅馬尼亞的問題也會被討論。關心羅馬尼亞的各個猶太團體試圖將猶太人問題納入大會日程。

俾斯麥的國務秘書彪羅在會議上承諾德國將支持猶太人的主張，但會議無果而終。1877年4月，俄國對土耳其宣戰 [[69]](#69_9)  。戰爭放大羅馬尼亞的窘境：它被夾在中間，一邊是江河日下但仍然頤指氣使地宣稱對其擁有主權的土耳其，一邊是氣勢洶洶的俄國，為了與土耳其人交戰，俄軍已經進入羅馬尼亞領土—他們的最低戰爭目標是重新征服羅馬尼亞北部的比薩拉比亞省（Bessarabia）。羅馬尼亞人被迫尷尬地與潛在的掠奪者結盟，但他們（歐洲也一樣）驚訝地發現，俄國人沒有那么強，土耳其人也沒有預想的那么弱。著名的普列文（Plevna）守衛戰（“少數幾場改變歷史進程的交鋒之一”）讓俄國人直到1877年12月都無法前進，導致羅馬尼亞軍隊與土耳其人直接交鋒 [[70]](#70_9)  。次年1月，雙方達成停火。隨后的幾個月里，歐洲的和平取決于俄國是否愿意大幅降低對土耳其的要求，以及英國是否放棄為土耳其宣戰。在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中，俾斯麥扮演重要角色—而為了迫使大國們堅持東方問題的任何重要國際協議中必須包括承認巴爾干猶太人的平等地位，布萊希羅德在最終的協同努力中也居功至偉。

戰爭的結束向國際猶太人社會發出信號，是時候采取決定性行動了。人們普遍認為，和約將認可羅馬尼亞的獨立；一旦羅馬尼亞成為主權國家，大國們將不得不放棄干涉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包括聲援羅馬尼亞猶太人的權力。因此，猶太人決心竭盡所能迫使羅馬尼亞承認該國猶太人的平等，將其作為該國獨立的條件。在猶太人和自由派看來，這完全無可厚非—即將加入歐洲國家行列的新國家應該遵循西方人的寬容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但在羅馬尼亞人看來，這是對國家主權的粗暴干涉。這場斗爭注定不會輕松。

人們馬上向布萊希羅德求助。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非常明確地告訴他：

我請求你發揮對貴國政府的巨大影響，讓[東方]猶太人的狀況作為專門條款被寫進和約；不然的話，鑒于羅馬尼亞目前明顯存在的反猶情緒，可以想見戰后猶太人將遭遇悲慘的命運。另一方面，你可以自信地指出，在所有那些給予猶太人平等地位和人性尊嚴的國家，我們的同胞都是政府的忠誠支持者。考慮到俾斯麥親王的仁慈，如此行事對你應該不難。我對此事非常關心，迫切盼望收到你的相關報告。 [[71]](#71_9)

布萊希羅德不太需要這種暗示，但直到收到羅斯柴爾德的來信二十四小時后才采取行動。1月中旬，布萊希羅德建議德國較大的猶太人社群應該向俾斯麥請愿，“要求德國外交部門為了猶太人的平等權利向準備建國的羅馬尼亞施壓”。他對德國的猶太人領袖保證，“如果我的微弱影響能引起熱心的俾斯麥親王對我們在羅馬尼亞同胞的關心”，他將很高興。“由于我知道自己很受大人的青睞，我認為我們也許可以期待理想的結果。” [[72]](#72_9)  就這樣，德國猶太人發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集體行動，這讓一些猶太人領袖也深感意外。至少以色列聯盟的當地領袖為了之前的懷疑向布萊希羅德道歉時是這樣形容的 [[73]](#73_9)  。

請愿書很快準備完畢：它請求俾斯麥繼續提供幫助，以便德國政府在后續談判中堅持“羅馬尼亞猶太人應該享有與基督徒同樣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就像大人從真實的報告中所看到的，在幾乎任何一個歐洲的文明國家，猶太人都不會像在羅馬尼亞那樣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和遭受如此無情的迫害”。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通報這次請愿，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收到赫伯特的保證，表示他父親“樂意接受［請愿書］，并滿足其中包含的愿望” [[74]](#74_9)  。到了月底，彪羅代表俾斯麥正式對柏林的猶太人社群承諾：“德國全權代表將支持一切旨在讓被考慮國家的各宗教群體所有成員獲得德國憲法所規定之同樣權利和自由的努力。” [[75]](#75_9)  俾斯麥的幫助承諾不能再明確了，事實上它超過請愿者最初的要求。

布萊希羅德贏得第一輪。他向巴黎的以色列聯盟轉達彪羅的回復，并表示：“從附件中你們可以看到，我成功地喚起我們的偉大政治家對猶太人利益的關心……” [[76]](#76_9)  此時，布萊希羅德顯然處于舞臺的中心，正是他籌劃從1878年1月中旬到6月中旬柏林會議正式召開期間猶太人的全部努力。他不斷與猶太人團體和重要政客保持接觸。他從維也納獲悉對于安德拉什回復的積極報告，羅馬、阿姆斯特丹和蘇黎世也傳來類似消息。圣瓦里耶向布萊希羅德和阿道夫·克雷米厄保證，如果真的舉行會議并且他參加的話，他一定會“把設法改善東歐猶太人的命運視作正義和人性的責任，秉承法國一貫慷慨的政策傳統” [[77]](#77_9)  。當然，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在巴黎和倫敦爭取到類似的承諾。但這些協調一致的行動的發起者知道，這次的關鍵點在于柏林，而柏林是布萊希羅德的“領地”。

不過，猶太人陣營內部也爭執不斷。布萊希羅德經常收到來自羅馬尼亞不同團體的報告，其中布加勒斯特的一些富有的猶太人強烈反對外國對“他們”政府施加任何壓力，而雅西等地的猶太人則不斷請求布萊希羅德發起國際行動 [[78]](#78_9)  。以色列聯盟同樣認為，在對大國們進一步施壓前，猶太人應該直接向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政府請愿。布萊希羅德對此表現出罕見的憤怒，警告不要這樣做：“我應該向你們明言，我相信只有憑借歐洲意志的強大力量才能改善我們在羅馬尼亞同胞的命運。過去幾周，羅馬尼亞財政部長正在柏林。在許多會議上，他總是回避我的詢問，我確信羅馬尼亞政府和人民都對我們的要求毫無同情。” [8](#8_27)  他繼續說，為了喚起歐洲的意志，必須要求一切宗教平等，無論是天主教徒、新教徒還是猶太人 [[79]](#79_9)  。巴黎方面同意了，但即使在德國猶太人內部也存在強大的呼聲，對布萊希羅德現在所致力的行動提出警告。比如，1878年3月，德國的官方猶太人出版物警告不要對俾斯麥施壓，因為羅馬尼亞人會把此舉視作“在歐洲人眼中抹黑羅馬尼亞和逼其就范的陰謀” [[80]](#80_9)  。

但布萊希羅德繼續全面出擊。他仍然對俾斯麥無保留的支持有信心—畢竟，他還要迫使羅馬尼亞人接受鐵路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為此，布萊希羅德在1878年4月“接見”羅馬尼亞首相伊翁·布拉提亞努，后者在合適的場合發表自己的煽動性反猶主義言論。在與俾斯麥達成共識后，布萊希羅德要求布拉提亞努把比薩拉比亞“賣給”俄國，這筆交易被認為（盡管沒有明示）將讓羅馬尼亞有足夠的錢買下那些不幸的鐵路。羅馬尼亞人買下鐵路是拯救德國人投資的唯一方法。布萊希羅德敦促俾斯麥在布加勒斯特施加同樣的壓力，盡管仍不清楚為何俄國人會為一個他們本來決意奪取的省份付錢。布萊希羅德在給俾斯麥的報告最后表示：“就猶太人問題［Judenfrage］而言，布拉提亞努很樂意讓羅馬尼亞政府做些什么，但他看上去堅決不希望完全解放。” [[81]](#81_9)  使用“猶太人問題”一詞時，布萊希羅德表現出某種超然。在俾斯麥面前，他覺得自己是為高級政策問題尋找解決辦法的外交官；而在猶太人面前，他覺得自己是為同胞們尋求幫助的猶太人。他向克雷米厄更加全面地描述布拉提亞努的觀點；布拉提亞努暗示，他樂意解放土生土長的羅馬尼亞猶太人，但“猶太移民數量龐大，將對羅馬尼亞民族構成持久威脅，因為一旦他們掌握公民和政治權利，這些人就會很快奪取議會席位，從而控制羅馬尼亞” [[82]](#82_9)  。奇怪的是，布萊希羅德對羅馬尼亞人的偏執敵意如此了解，卻仍然相信可以把歐洲的意志強加給他們。

無論感受如何，他在行動上毫不松懈。5月，籌備已久的德羅新貿易協議即將簽署；在最后時刻，羅馬尼亞政府拒絕一個條款，即生活在羅馬尼亞的德國猶太人不受該國對猶太人的現行一般性禁令影響，比如對居住和職業的限制。奧地利沒有堅持這樣的條款就簽署協議，但布萊希羅德和其他活動家希望德國政府不要如此。帶著布萊希羅德提供的論據，彪羅在帝國議會發表強硬的講話，聲稱德國政府永遠不會容忍以信仰為理由歧視本國公民，這樣的歧視與德國憲法背道而馳。帝國議會一致同意公民平等不可侵犯，并嚴厲譴責任何德國可以容忍“二等公民”的想法。在這個問題上，那個威嚴的機構還會再次如此一致嗎？羅馬尼亞政府拒絕讓步，柏林則拒絕簽字 [[83]](#83_9)  。

這是猶太人的重大勝利。布萊希羅德對克雷米厄宣布：“我們處在解放的前夜。”克雷米厄祝賀布萊希羅德“在帝國議會取得巨大成功，這要歸功于您和猶太議員們的出色努力”。德國的行動被認為將成為先例，其他所有的大國也會紛紛效仿，拒絕簽署允許不平等的商業協議 [[84]](#84_9)  。

布萊希羅德變得越來越像猶太人行動的領袖；他曾經假意謙虛，拒絕任何特殊榮耀，并對克雷米厄保證，自己只是試著“追隨他的腳步” [9](#9_25)  。他新獲得的榮耀無疑在德國猶太人和基督徒中引發怨恨。但他開始覺得領袖的斗篷已經落到身上。

德國拒絕簽署貿易協議后，他馬上第一次寫信給倫敦的猶太耆碩，94歲的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他把拒絕簽署協議稱為“特大好運”，還表示：

我以自己的卑微方式追隨著您的腳步，同樣熱心關注我們在多瑙河畔的可憐同胞。我成功贏得俾斯麥親王對我們在羅馬尼亞受難同胞的重要支持。生性仁慈的親王承諾在會議上全力支持一切宗教平等的要求，我們希望會議很快召開。

布萊希羅德回憶說，三十年前他在父母的家中見過摩西爵士。

摩西爵士贊揚他的工作，并向他保證說，“女王陛下的政府表達了看到正義和宗教寬容的原則被完整應用于羅馬尼亞猶太人的最殷切希望，并愿意竭盡所能實現這個目標”。這位大慈善家還提出，如果布萊希羅德覺得有需要，他愿意前往柏林。此外，他也記得從大馬士革歸國途中曾造訪布萊希羅德家：“我很高興在朋友的兒子身上看到他父親的誠摯同情和積極善舉。” [[85]](#85_9)

德國人拒絕簽署貿易協議，這讓羅馬尼亞人意識到，德國在至關重要的柏林會議上也會毫不讓步。會議于6月13日召開，是維也納會議后規模最大的政治家聚會。俾斯麥被選為主席，他第一次自己和與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為伍：迪斯累利、索爾茲伯里、戈爾恰科夫、舒瓦洛夫和瓦丁頓都參加會議，與會的還有英俊而聰明的馬札爾人安德拉什，“此人具有某種特別的魅力，融合了貴族和吉普賽人” [[86]](#86_9)  。會議的日程很多，關于保加利亞和波黑的爭議仍有可能導致其無果而終。人們希望確立巴爾干的政治新秩序（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既反映了俄國對土耳其的勝利，又不大幅增加俄國的力量。這樣的新秩序能被歐洲接受，而且又一定可能維持下去。與維也納會議不同，柏林會議冷靜而有效率。大國們希望工作進展迅速—因此如果有必要的話，小國的主張會被聽取，但它們只是特別的求助者，而不被看作參與者，就像迪斯累利所說：“所有問題被公開提出，然后私下解決。” [[87]](#87_8)

布萊希羅德的辦公室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國際猶太人的總部。所有人都在那里碰面，在他的努力下，德國報紙刊發關于羅馬尼亞猶太人受難和向會議所提交請愿書的長篇報道。會議召開后，他馬上安排來自以色列聯盟的代表們與彪羅見面。他本人與俾斯麥討論主請愿書的草案，在會議召開前一天再次同其見面，并再次得到嚴肅的支持保證 [[88]](#88_8)  。布萊希羅德還拜見其他與會者，包括迪斯累利，以及風度翩翩、老于世故的舒瓦洛夫伯爵，與他的上級戈爾恰科夫不同，后者并不反對猶太人的主張。

對大人物們來說，猶太人問題雖然無法回避，但顯然并不重要。6月24日，法國外交部長瓦丁頓在談及保加利亞時率先提出該問題。那個國家只有不到1萬名猶太人，會議要求該國所有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權利，無論信仰如何。這條最重要的原則首先被應用于影響最小的地方；很快，它被接連擴大到魯米利亞（Rumelia） [10](#10_25)  和黑山。當輪到塞爾維亞時，戈爾恰可夫提出反對。他堅稱“英國和德國有教養的猶太人”與東歐猶太人之間存在差異，后者常常是“他們國家的吸血鬼”。俾斯麥回應說，猶太人的缺陷也許要歸咎于他們遭遇的多種形式壓迫。瓦丁頓和其他西方政客也堅持人性原則，要求新的國家必須承認所有信仰平等。羅馬尼亞人傳統的反駁理由甚至未被考慮，即猶太人是外國人，因此沒有權利。7月1日晚上，會議通過著名的第44條款，事實上要求羅馬尼亞人將包括歸化權在內的平等政治權利擴大到該國的全體民眾，以此作為國際社會承認其獨立的條件 [11](#11_25)  。

猶太人歡呼雀躍。布萊希羅德四處發送電報，宣布這場重大勝利。作為回報，他收到來自西方和雅西猶太人的最夸張贊美（甚至有首詩把他比作摩西，但他請求取消發表計劃）。克雷米厄在電報中“對一項如此偉大工作中出色的主要合作者致以最熱烈的祝賀”，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也祝賀他的“不懈努力取得成功……您出于善心，利用您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在最有影響的場合為我們同胞的福祉付出努力。我確信在上帝的祝福下，這一切努力注定會收獲最讓人滿意的結果” [[89]](#89_8)  ……類似的評價從四處涌入。當猶太名流們在他家中臨時聚會時，“在場者起立向布萊希羅德致敬” [[90]](#90_8)  。

7月3日，布萊希羅德宴請柏林會議的代表。迪斯累利、瓦丁頓、安德拉什和赫伯特·俾斯麥等所有重要和不太重要的人物都出席了—但俾斯麥除外，他從不參加私人應酬。一位奧地利外交官在寫給國內的信中談到“本地‘羅斯柴爾德’布萊希羅德家的盛宴，那是我參加過的最佳宴會” [[91]](#91_8)  。我們在下文還將提到迪斯累利的描述（第十七章）。這是布萊希羅德的巔峰時刻，為一度看上去將圓滿告終的羅馬尼亞工作迎來合適的高潮。

在勝利的鼓舞下，布萊希羅德試圖更進一步，迫使俄國也作出解放猶太人的承諾。為此，他約見在倫敦大使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舒瓦洛夫伯爵，試圖說服后者，俄國也有必要接受歐洲剛剛對巴爾干人提出的平等原則。舒瓦洛夫向他保證，“他已經多次建議解放俄國猶太人，但至今仍未成功；不過，他相信和約簽署后，俄國將給予本國民眾各種自由，包括宗教平等”。兩人都認為，布萊希羅德應該敦促俾斯麥為了這個目標對俄國駐柏林大使施壓。和俾斯麥一樣，布萊希羅德也被舒瓦洛夫迷惑。他致信克雷米厄和蒙特菲奧雷，提及“這個高貴而崇高的人……擁有杰出的智慧和偉大的心……無論發生什么，他都會恪守承諾”。布萊希羅德預計，他將很快成為俄國首相 [[92]](#92_8)  。

蒙特菲奧雷和其他猶太人領袖警告布萊希羅德不要孤注一擲；俄國不是羅馬尼亞，任何逼迫俄國的做法都將失敗。蒙特菲奧雷對布萊希羅德透露自己的原則：

……取得俄國沙皇和大臣們配合的最佳方法是表示我們相信他們有意改善猶太人的狀況……歷史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龐大宗教社群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只能逐步提高，我不必再向你提醒這一點……我還認為，最重要的是應該不遺余力地敦促我們在東方的較富有同胞，讓他們竭盡所能教育和提高他們不幸的同伴。 [[93]](#93_8)

猶太人真誠地對個別政治家表示感謝，布萊希羅德還組織特別演講向俾斯麥致謝。在猶太人的歷史上，1878年7月是不尋常的時刻，因為憑借著他們自己的力量和影響，憑借著被普遍接受的原則，東西歐猶太人的命運似乎終于變得安全和有利。平等原則得到正式奉行；羅馬尼亞人被迫不情愿地接受它，而大多數西歐猶太人的觀點也得到清晰印證，即解放范圍將不斷擴大。難怪在柏林會議接受平等原則幾小時后，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寫了他最激情洋溢的書信之一：

對于經歷那么多年的壓迫和迫害后終于恢復尊嚴和人權的數十萬人來說，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對造物主深情祈禱，乞求上帝賜福那位積極而崇高地推動人性和文明原則實現的人。今天，我只能用卑微的筆和他們一起祈禱……愿閣下相信，沒有哪顆心像布萊希羅德的那樣忠誠地為閣下跳動。 [[94]](#94_7)

各猶太社群也用更加克制的口吻給俾斯麥發來正式致謝：“在德意志帝國首相主持的會議上，德國首都發生的壯舉讓我們興奮而驕傲……我們深表謝意，相信每當人類需要保護者時，德國都將振臂高呼，永遠不容忽視。” [[95]](#95_6)

如果布萊希羅德知道，他的私信上被批注“猶太人的感謝”—幾乎肯定出自俾斯麥之手—他還會覺得如此滿意嗎？他是否讀過《泰晤士報》上的報道—“俾斯麥親王同意……大力支援［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作為交換，柏林猶太人承諾在下次選舉中支持保守黨？” [[96]](#96_6)  類似這樣的交易曾被明確提及嗎？他是否知道，幾個月后威廉將對朋友說：“［柏林會議］做出的許多決定令我不悅，比如解放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但我當時生病，什么都不能做和不能說。” [[97]](#97_6)  也許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同伴們都沒有充分重視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在會議期間對一個猶太人代表團的警告：“不過，如果你們相信外國干涉會迫使我們給予你們平等的權利，那么你們大錯特錯了。我們是獨立的，是自己家園的主人。” [[98]](#98_5)  在會議做出決定的翌日，一家重要的羅馬尼亞報紙不屑地寫道：“我們不會放棄比薩拉比亞；我們不會接受多布羅加（Dobrudja） [12](#12_23)  ，也不會給予猶太人權利；我們將用武力反抗，而不是接受強加給我們的條件。” [[99]](#99_5)

最初幾周的激動過去后，布萊希羅德開始意識到他的工作遠未完成，猶太人和容克貴族都尚未獲得救贖。他真以為羅馬尼亞人會不情愿地放棄反猶主義恐懼，順從地服從歐洲的意志嗎？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他如此信賴強大保護的全部效力。似乎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如何對付頑固不化的羅馬尼亞。大國們會像在提出平等原則時那么團結，一致拒絕承認羅馬尼亞嗎？當俾斯麥認為他在國內的最大對手是有原則的自由派，其中大部分被他歸為猶太人時，他還會繼續表現出對羅馬尼亞猶太人的關心嗎？大國們會允許猶太人問題決定它們在羅馬尼亞和整個近東的全部政策嗎？布萊希羅德將發現，羅馬尼亞事件將不斷拖延下去，而且情況遠比柏林會議前不利。他再次需要多線出擊，確保各路盟友不拋棄他。現在，他陷入最復雜的局面以及歐洲大國的利益沖突中。對猶太人而言，他仍是關鍵人物，掌握著決定性的影響。他覺得要對他們負責，但逐漸發現自己的力量在下降。

各階層的羅馬尼亞人一致決心不讓猶太人獲得完全的權利。1878年，反猶主義騷亂可能讓這些流行情感有爆發的危險 [13](#13_21)  。卡羅爾大公意識到，他的民眾幾乎一致反對歐洲的命令；他的政府愿意裝出接受的姿態，比如立刻歸化那些參加過羅馬尼亞軍隊的猶太人。多數議員反對一切讓步。民族主義的驕傲和對解放猶太人后果的廣泛恐懼造成普遍的頑固，偶爾被恭敬的虛偽面紗所掩蓋。羅馬尼亞人根本不相信歐洲會真的堅持這些沉重的犧牲。羅馬尼亞按照條約獻出比薩拉比亞還不夠嗎？

最初，羅馬尼亞人對歐洲人可能無動于衷的猜測似乎得到驗證。在休會的三周里，安德拉什告訴羅馬尼亞政府，鑒于平等原則實施上的困難，維也納無論如何都會很快派全權大使前往布加勒斯特 [[100]](#100_5)  。

俄國也隨即照做，羅馬尼亞則派出第一批使節，希望歐洲把含糊的承諾當作真實的履行。現在，布萊希羅德和整個西歐猶太人網絡開始專注于阻止大國們在平等權被授予前承認羅馬尼亞。

1878年10月初，布萊希羅德對彪羅抱怨說，羅馬尼亞人已經開始迫害猶太人。他提醒后者，承認羅馬尼亞的獨立和卡羅爾的“國王陛下”新頭銜應該等到羅馬尼亞滿足條約要求之后。彪羅接受布萊希羅德的立場，并對德國大使們作了相應指示 [[101]](#101_5)  。彪羅是俾斯麥在外交事務上的親信秘書，也是布萊希羅德的朋友。他在1879年10月的突然去世讓布萊希羅德失去唯一真正相信解放猶太人之正義本質的柏林盟友。

1878年秋，布萊希羅德試圖向巴黎和倫敦施加合適的壓力。共同陣線逐漸形成。布萊希羅德敦促83歲的克雷米厄同瓦丁頓交涉。瓦丁頓對克雷米厄作出最堅決的保證，表示法國不會派使節前往布加勒斯特，除非“猶太人獲得我們一致同意給予他們的東西。這是法國的意愿，英國也遵循相同的路線和想法”。迪斯累利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私信中作出類似承諾：“英國堅決認為，《柏林條約》的精神和內容都應該得到遵守。我很難想象你的要人朋友會滿足于其他任何結果。”甚至在迪斯累利的書信到來前，俾斯麥就通知列強，德國將等到羅馬尼亞履行義務后才予以承認。在平等權利問題上，選擇相反路線的羅馬尼亞人自欺欺人地以為，他們無論如何都能獲得承認。但德國輿論不愿接受其他任何解決方案。10月末，當羅馬尼亞請求獲得列強承認時，彪羅清楚地表示，承認的前提是解放猶太人和確立完全的宗教平等 [[102]](#102_5)  。

但布萊希羅德及其同伴們幾乎沒有片刻安寧。克雷米厄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他有“糟糕的預感”，羅馬尼亞人的陰謀將會得逞：“唉！對于為此付出如此之多的你來說，這將是巨大的痛苦。你的朋友俾斯麥是我們的依靠，他的立場本來應該和能夠決定一切，但隨著他和教皇走得更近，他放棄自己的立場，不再保護猶太人……”不過，布萊希羅德可以向巴黎方面保證，俾斯麥給他最明確的保證，在條約要求被滿足前，德國不會承認羅馬尼亞的獨立 [[103]](#103_5)  。從那時起，作為羅馬尼亞猶太人的保護者，俾斯麥的態度變得越來越激烈—只有他對羅馬尼亞人的夸張怒火可能泄露玄機，他的真正動機不是無私地遵循原則，甚至不是為了滿足某個國內壓力集團。

1878年秋，俾斯麥的堅決挫敗所有尋求提前承認的努力。不過，意大利政府卻幾乎證實克雷米厄的預感：它任命駐布加勒斯特大使，但羅馬議會中支持猶太人的議員們制止了這個舉動—更別提俾斯麥對意大利人的憤怒斥責。后來，當意大利再次發生動搖但還是回到法德陣營時，彪羅告訴圣瓦里耶：“我們很高興它重新加入我們……但經驗告訴我們將來不要過于相信它。” [[104]](#104_5)

由于本國的原因，甚至英國也有所動搖。羅馬尼亞人焦急地散布消息稱，俄國人對他們提出新條件，要求給予該國軍隊穿越羅馬尼亞領土的特權；仍然對俄國深感恐懼的英國人試圖支持羅馬尼亞的抵抗，為此希望盡快承認該國獨立。索爾茲伯里把意圖告知瓦丁頓和明斯特伯爵。但俾斯麥的回應強硬得出人意料。索爾茲伯里向羅素報告說：“明斯特伯爵非常懇切地請求我在猶太人的桎梏被解除前不要承認羅馬尼亞。當發現我不愿等待后，他試圖說服法國大使站在德國一邊，在這個問題上孤立英國。” [[105]](#105_5)  瓦丁頓告訴英國人：“德國政府在此事上非常強硬；他猜想，俾斯麥親王一定對布萊希羅德先生或柏林猶太人社群的其他重要成員作出某些相關承諾。” [[106]](#106_5)  俾斯麥在此事上態度強硬，對可能從統一陣線叛逃的國家警告說，如果它們承認羅馬尼亞，那么德國將對執行條約中的其他條款不再感興趣。

事實上，俾斯麥的策略遠比這復雜，策略的不可捉摸推動了它的成功—這是俾斯麥的經綸之道中耳熟能詳的情節。在柏林會議后的幾乎一整年里，他阻止一切減輕對羅馬尼亞壓力的嘗試。他的政策符合他與法國建立密切關系的愿望，但也出于其他原因，包括外交、國內和純粹個人的。他始終沒有忘記鐵路問題，盡管他在1878年冬天很少提到。比如，1879年1月末，索爾茲伯里詢問大國們，羅馬尼亞給予“土生非基督徒”平等權利能否令它們滿意—也就是暫時擱置外國猶太人的問題，后者通常能獲得出生國的一些保護 [14](#14_21)  。但德國人表現出高姿態，教導英國人重視條約的神圣性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107]](#107_5)  。2月末，俾斯麥表現出更加典型的好戰態度。他對羅素表達“對羅馬尼亞人的憎惡，由于用詞太過激烈，無法寫入官方報告”……“他譴責他們在《柏林條約》的規定上弄虛作假，對俄國傲慢，對德國不敬。他遺憾地表示，如果他們在自己的控制范圍內，他會給予這些罪有應得的人一頓皮鞭。” [[108]](#108_5)  俾斯麥還帶著驚人的坦誠對圣瓦里耶表示，他告訴羅馬尼亞人：“只要羅馬尼亞人不履行《柏林條約》確定的關于他們躋身獨立國家行列的條件，我就不想聽人提起他們……我在乎羅馬尼亞人就像在乎我空了的酒杯。”在羅馬尼亞事件中，他有機會幫助“猶太人，我需要討好和拉攏這些人，在德國他們可以對我很有用，我將用羅馬尼亞作為回報；您難道不認為那是敷衍搪塞嗎” [[109]](#109_5)  ？還有一次，他繪聲繪色地為圣瓦里耶描述羅馬尼亞事件和布萊希羅德在其中的角色 [15](#15_21)  。

布萊希羅德還向圣瓦里耶吐露心聲：“‘羅馬尼亞人’不講信用，他們只有一個目標：欺騙和搶劫我們。”雖然是德國人和霍亨索倫家族成員，但卡羅爾大公“已經變得比其他人更糟，他在靈魂上已經成為羅馬尼亞人。為了獲得擁戴，他試圖變得比他的臣民更加狡詐。我向俾斯麥親王提供確鑿證據……以卡羅爾為首的人試圖一面在猶太人問題上用甜言蜜語欺騙我們，一面在鐵路問題上毀了我們”。卡羅爾無意接受條約中的義務；獲得承認后，羅馬尼亞人將“繼續在遭到欺騙和藐視的歐洲面前迫害他們的奴隸和奶牛，也就是猶太人”。布萊希羅德解釋說，在鐵路問題上，羅馬尼亞人令人無法容忍。歐洲為該項目投入4億法郎；其中2.5億來自德國，1.5億來自法國的小食利者（這個相當巨大的法國投資數額似乎出于事后考慮或權宜夸大）。大部分德國投資來自“我國的大貴族和一些宮廷要人，按照俾斯麥親王的要求和皇帝的愿望，我借給他們一大筆錢，避免他們徹底毀滅，現在掌握著他們的鐵路股票或債券作為抵押”。羅馬尼亞人已經停止為鐵路支付利息（1877年），而且試圖避免重新開始支付。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出售鐵路，但羅馬尼亞人正試圖阻撓鐵路運營和破壞設施，以便低價購入。和俾斯麥一樣，布萊希羅德也愿意把鐵路賣給俄國人，但他表示，他最關心的是猶太人問題。“我們有證據表明，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遭遇全體羅馬尼亞人針對歐洲利益的大陰謀，從大公到普通議員都牽扯其中。” [[110]](#110_5)

當俾斯麥意識到整個羅馬尼亞的糾葛變得嚴重，而且他的慣用武器這次也似乎失效時，他變得更加怒不可遏。該問題帶給俾斯麥的煩惱超過外交事務中的其他任何問題，這在柏林已經是公開的秘密。1879年春末，英國人再次推行只給予土生猶太人歸化權的折中方案，試圖為承認羅馬尼亞獨立掃清障礙。但俾斯麥再次警告說，在這件事上的機會主義偏離將削弱他對執行條約其他部分的興趣。俾斯麥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法國身上，他告訴圣瓦里耶：“只有法德聯盟才能……迫使一個因為虛弱而傲慢的小國政府履行《柏林條約》中最重要的條款之一。” [[111]](#111_5)  6月末，俾斯麥再次威脅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大使會議，并堅稱如果會議失敗，土耳其應該恢復對羅馬尼亞的宗主權。沒有什么比這番威脅更讓羅馬尼亞人憤怒。

俾斯麥嘗試所有途徑，甚至對奧地利向羅馬尼亞施壓寄予一定的希望。他向安德拉什提出派德國軍艦穿越達達尼昂海峽，以便封鎖羅馬尼亞海岸線。難怪安德拉什向本國駐布加勒斯特領事解釋說，德國人毫不妥協，盡管俾斯麥的怒火并非出于他“對猶太人的仁慈”（原話是“對布萊希羅德先生的同族”），而是因為羅馬尼亞侵害德國的物質利益。安德拉什的警告在布加勒斯特產生效果 [[112]](#112_5)  。

1879年7月，談判的步伐突然加快。5日，為第44條款進行修憲準備的羅馬尼亞特別議會決定重申羅馬尼亞人長久以來的非正式理由：“現在和過去都不曾有過羅馬尼亞猶太人；他們只是出生在本公國的猶太人，但在語言或習俗上從未融入羅馬尼亞民族。” [[113]](#113_5)  因此，所有的猶太人都要經歷歸化程序，而且議會堅持必須逐個進行。面對這種公然否定《柏林條約》的行為，卡羅爾大公的政府提出自己的折中方案，但議會拒絕讓步，導致政府辭職。

歐洲被這些提議激怒了，后來的一位親羅馬尼亞的歷史學家稱其為“幾近挑釁歐洲的提議” [[114]](#114_5)  。為了平息輿論，羅馬尼亞人描摹了解放后的猶太人將對羅馬尼亞造成的可怕影響。奧地利領事報告說，在猶太人問題上，羅馬尼亞政府甚至沒有收集最基本的統計信息，所有的表述都隨心所欲：“這無疑是讓該問題更加難以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把問題搞得一團糟，導致誰也無法分辨理想與真相……” [[115]](#115_5)  羅馬尼亞議會迫使政府尋找別的方式安撫德國。

羅馬尼亞人派財政部長迪米特里·斯圖爾扎（Dmitri Sturdza）前往柏林，與布萊希羅德商討鐵路問題，與德國政府和法國大使商討猶太人問題—這位政客在德國受過教育，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相對溫和。人們知道布加勒斯特希望妥協：為了換取斯圖爾扎在鐵路問題上的讓步，俾斯麥應該在猶太人問題上做出讓步 [[116]](#116_5)  。他從布加勒斯特帶來能讓雙方保住面子的讓步：為了安撫歐洲，他提出五類猶太人可以立刻被歸化—主要是那些生于羅馬尼亞，并通過某種方式脫穎而出的猶太人，比如教育或服兵役。7月8日，圣瓦里耶被告知，德國政府認為這些提議“完全不合適”。法國政府表示同意，在這個月余下的時間里，兩國政府就妥協的可能性展開磋商。斯圖爾扎是個足智多謀的談判者。他鄭重告誡柏林，羅馬尼亞人永遠不會接受完全解放猶太人，認為后者是“社會的災難”。強迫羅馬尼亞接受第44條款將引發混亂，進而導致卡羅爾大公辭職和羅馬尼亞立刻被俄軍重新占領。事實上，俄國間諜已經涌入摩爾達維亞，煽動民眾反對西方的親猶政策；布萊希羅德也獨自確認了這些俄國間諜的存在。鑒于英國的舉棋不定，這是個聰明的威脅；它甚至比羅馬尼亞人所認為的更加聰明，因為俾斯麥正試圖與奧地利建立聯盟，而奧地利把俄國人重返羅馬尼亞看作對自己的重大威脅。

值得一提的是，圣瓦里耶指出，甚至布萊希羅德也認為提議中的五類人包括絕大多數真正想要被歸化的猶太人 [16](#16_21)  。斯圖爾扎也告訴圣瓦里耶，羅馬尼亞人正在認真考慮回購鐵路。圣瓦里耶提醒瓦丁頓，這對俾斯麥乃至法國都很重要，因為8000萬法郎的法國資本也牽涉其中 [[117]](#117_5)  。

整個7月，斯圖爾扎和布萊希羅德都在為那些棘手的鐵路討價還價。雙方都急于找到解決辦法：一方面，斯圖爾扎開始意識到，如果羅馬尼亞解決鐵路問題，俾斯麥可能放棄對猶太人的高姿態；另一方面，俾斯麥希望擺脫整個羅馬尼亞事務，而布萊希羅德想要減少損失。斯圖爾扎（被布萊希羅德稱為“羅馬尼亞最正派的人之一”）足夠聰明地誘使布萊希羅德相信，比起鐵路問題，羅馬尼亞人更急于解決猶太人解放的問題。布萊希羅德無疑也希望相信是這樣。7月21日，布萊希羅德通知俾斯麥，與羅馬尼亞政府關于鐵路收購的談判破裂，因為斯圖爾扎堅持新的鐵路公司的總部將設在布加勒斯特。“我和我的繼承者無法接受這樣的責任。我在價格上已盡可能做了讓步，但對方在這個法律觀點上拒不松口，談判因此破裂。” [[118]](#118_5)  沮喪的俾斯麥要求進一步了解“布萊希羅德想要的交易的性質”。如果新公司的總部仍然設在柏林，俾斯麥擔心“羅馬尼亞鐵路事務將給我們帶來比過去更多的麻煩” [[119]](#119_5)  。臨時在外交部供職的拉多維茨給布萊希羅德寫了“非常機密”的信，透露俾斯麥突然變得不耐煩，并隱晦地威脅稱他將不會無限期地支持德國股東們的利益 [[120]](#120_5)  。布萊希羅德幾乎不需要這樣的告誡。他有自己的理由為鐵路糾葛找到滿意的解決辦法，在純粹的金融事務中表現得比漢澤曼更加靈活。在猶太人問題上，斯圖爾扎告訴布萊希羅德，他認為“［解放］原則必須得到承認，但在方式上還需要考慮更多”。像這樣的模糊保證和關于鐵路的艱難談判讓布萊希羅德無法離開柏林，他寫信給正和父親一起在巴德基辛根享受溫泉的赫伯特，表示：“你可以想見，鐵路問題的最終解決對鄙銀行的金融狀況多么至關重要。盡管我的身體很不好，但我還是選擇留在這里，等事情更加明朗后再去霍姆堡休假。” [[121]](#121_5)

經過一番艱難的討價還價，斯圖爾扎終于在鐵路問題上做了讓步。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報告說，協議即將達成，斯圖爾扎已經前往巴德基辛格休假。俾斯麥能否接見他，哪怕只是匆匆一面？俾斯麥很不情愿。但布萊希羅德苦苦相求，表示這會讓斯圖爾扎在他頑固的同僚面前更有底氣；不過，斯圖爾扎曾向圣瓦里耶透露，俾斯麥的蠻橫令他害怕。最終，布萊希羅德說服不情愿的俾斯麥接見戰戰兢兢的斯圖爾扎。在一封簡短的電報中，赫伯特拒絕布萊希羅德希望了解俾斯麥對這次會面印象的請求；赫伯特寫道，他的父親目前無意與布萊希羅德談論細節 [[122]](#122_5)  。

俾斯麥對布萊希羅德的無禮中包含某種善意的欺騙。俾斯麥對斯圖爾扎說的話令后者振奮，但可能讓布萊希羅德沮喪。俾斯麥談到了第44條款對羅馬尼亞造成的困難，告訴他該條款如何由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提出（首先是后者），德國如何無法反對它。他意識到在這類事上不能強行冒進，必須循序漸進。不過，小國必須遵守國際法，該條款是條約的一部分，對應著所有文明國家通行的一般原則。他對羅馬尼亞人過去允許猶太移民自由進入表示遺憾，現在他們能做的只有在經濟競爭中打敗猶太人。“為了改善德羅關系，必須解決鐵路問題。”只有到那時，羅馬尼亞才能充分受益于德國的友誼，夾在兩大敵對國家之間的羅馬尼亞需要這樣的友誼。

俾斯麥為羅馬尼亞人指明道路。他還沒有放棄猶太人問題，部分原因是他顧及其他大國。但更重要的是，他把猶太人問題留作后手，以防羅馬尼亞人在鐵路問題上頑固不化。如果羅馬尼亞人對柏林的態度還有任何疑問，威廉寫給卡羅爾父親的一封信應該能讓他們放心。威廉一直反對解放的要求，但在柏林會議期間無法理事：“我憑經驗知道，那些地方—首先是波茲南、柏林、立陶宛和烏克蘭—的猶太人是什么樣的，據說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甚至更加糟糕！英國人熱情地為整個猶太人問題辯護……他們把每個猶太人都看作有教養的羅斯柴爾德。” [[123]](#123_5)

1879年夏天，俾斯麥遭遇人生和職業的又一次突然危機，政治上的困難還對他的精神狀況產生影響。他終于在帝國議會取得勝利，并確立新的國內路線—但他發現威廉堅決反對他設想的新的對外路線。我們在前文看到，為了讓威廉接受他的德奧同盟計劃，他再次使出最后一招：威脅辭職。在這一切中，羅馬尼亞總是扮演著惱人的角色。羅馬尼亞對俾斯麥造成的煩惱源于他本人的厭惡和國家利益；在政治上，與奧地利的更親密同盟意味著需要減輕對羅馬尼亞的敵對態度，而無論多么不可靠，奧地利都把羅馬尼亞視作對付俄國的前哨。俾斯麥希望擺脫羅馬尼亞問題，唯一還讓他在乎的是德國股東們的物質利益。

羅馬尼亞人感到風向有變，他們的拖延開始收到成效。8月，他們派新任外交部長博埃雷斯庫（B.Boerescu）巡訪歐洲，希望通過承諾和欺騙讓本國獲得承認。由布萊希羅德的一位“絕對可信”的通信人提供，圣瓦里耶給瓦丁頓發了關于博埃雷斯庫的報告。根據報告，那個羅馬尼亞人完全沒有原則，曾經背叛政治盟友并投入敵人懷抱，他似乎只有一個觀點始終不變，即猶太人是羅馬尼亞無法忍受的瘟疫 [[124]](#124_5)  。博埃雷斯庫此行總體上失敗了，但他或內閣肯定注意到，當他和布萊希羅德在霍姆堡舉行秘密會談時，甚至布萊希羅德也不再堅持要求完全實行第44條款。布萊希羅德要求宗教自由原則應該得到承認，出生在羅馬尼亞并沒有外國保護的猶太人應該在成年時獲得公民身份，非羅馬尼亞猶太人應該在十年后獲得公民身份 [[125]](#125_5)  。布萊希羅德在寫給克雷米厄的信中談到與博埃雷斯庫的會面，并解釋說，大國們非常急于同羅馬尼亞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暫時滿足于實現我們的一部分愿望，希望我們的計劃能在未來完全實現” [[126]](#126_5)  。奧地利駐巴黎大使認為，博埃雷斯庫將直接與以色列聯盟交涉，那是第44條款背后運動的真正發起者 [[127]](#127_5)  。

現在，兩大問題到了最后解決階段。9月末，斯圖爾扎帶著新條件回到柏林，雖然比不上他之前向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所提出的，但雙方還是在10月3日草簽令人滿意的協議。俾斯麥要求加快速度；隨著德奧同盟條約在9月底簽署，他希望從羅馬尼亞抽身。新協議還要經過羅馬尼亞議會批準；俾斯麥明確告訴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他無法再為他們提供許多保護或外交幫助。他正試圖讓自己從整個羅馬尼亞問題的困境中解脫出來，這意味著拯救鐵路股東和拋棄猶太人。無論如何，猶太人自由派成為他在國內舞臺上的特別靶子，他的一部分怒火可能殃及池魚。

10月，羅馬尼亞議會討論關于猶太人問題的憲法修正案的最終措詞。拒絕對憲法做出任何修改的議案以微弱劣勢被否決，給予土生猶太人歸化權的政府議案獲得通過（列出1000名將被立即歸化者的名單，包括去世和虛構的人），但逐個歸化的要求令其大打折扣。當羅馬尼亞議會作出歪曲第44條款的這個最后決定時，布萊希羅德致信聯盟，表示他認為德國希望英國和法國帶頭拒絕承認；到了10月中旬，他認定一切都已無可挽回 [[128]](#128_5)  。

形勢從此急轉直下。布萊希羅德很難否認自己一敗涂地。11月中旬，他收到德國駐布加勒斯特領事的秘密報告。報告評估了猶太人在新法規下的命運：他們仍然被禁止在農村購買或持有地產；而城市中的情況則各不相同，他們被禁止成為律師、藥劑師或酒店老板。“如果擁有財富”，他們也許有權在城鎮或鄉間定居 [[129]](#129_5)  。不過，布萊希羅德還是致信已經開始對他不滿的巴黎以色列聯盟，表示他希望“盡可能地”挽救之前的希望，但無論如何，羅馬尼亞猶太人似乎對10月的新法規感到滿意，這非常令人吃驚 [[130]](#130_4)  。

另一些人則沒有那么樂觀。德國猶太人領袖之一，重要猶太人報紙的編輯路德維希·菲利普森（Ludwig Philippson）請求布萊希羅德作出最后的努力，在羅馬尼亞議會“駭人的欺騙后”阻止承認該國獨立。他的理由是：“在德國，一些黨派正在大肆活動，明目張膽地試圖讓我國關于猶太人的立法出現倒退……如果立法者認可羅馬尼亞人的這種騙局，那么這些德國的邪惡黨派也將受益……” [[131]](#131_4)  卡羅爾親王的父親表達了類似觀點，盡管情感有所不同：

所有的事都有滑稽的一面：在普魯士，新教徒的“牧師黨”（Pastorenpartei）發起的反猶主義運動取得一定成功，保守黨也支持這場相當危險的實驗。與此同時，德國政府全力支持或至少支持過以色列聯盟在羅馬尼亞的活動—仿佛東歐猶太人比西歐猶太人更好！……如果這樣的局面繼續下去，我們可能在這里目睹迫害猶太人，如果其他大國繼續忠于《柏林條約》的要求，他們將譴責德意志帝國！ [[132]](#132_4)

羅馬尼亞人繼續在鐵路問題上拖延。該國議會一再試圖修改布萊希羅德和斯圖爾扎最終達成的協議，為股東提供擔保和新公司的最終所在地一再成為最大的絆腳石。布萊希羅德堅稱，股東們應該對羅馬尼亞國有壟斷的煙草公司享有優先留置權，但羅馬尼亞人認為這個條件是種羞辱。公司總部的選址也涉及實際利益和面子，被證明是最棘手的一個問題。

羅馬尼亞人堅持要把總部放在布加勒斯特，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則拒不接受；俾斯麥對此惱怒不已，因為他希望了結此事，更愿意把麻煩的中心搬到布加勒斯特。在寫給俾斯麥的多封書信中，布萊希羅德試圖解釋自己的強硬立場。該問題沒有明確的法律先例；如果新公司立刻遷往布加勒斯特，德國的商業法可能不再適用，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擔心被股東們起訴，因為他們批準了這次可能損害股東利益的搬遷 [[133]](#133_4)  。雙方都充滿懷疑。經過十二年的糾葛和欺騙，如果有哪方特別配合或好心反倒讓人吃驚。

鐵路問題又拖延了三個月，這讓俾斯麥非常煩惱。其他大國也開始顯得不耐煩，希望最終讓羅馬尼亞糾紛成為歷史。俾斯麥希望在鐵路問題解決前保持團結—為了確保其實際目的，他故作高尚地強調條約的神圣。他還通過各種可能渠道向布萊希羅德和漢譯曼施壓，要求他們結束談判，并表示他們無法再指望從政府獲得保護。與此同時，他帶著同樣的怒火，用手頭的各種武器威脅羅馬尼亞人。當布萊希羅德告訴他，俄國和土耳其已經對羅馬尼亞提出可疑的巨額財政要求時，俾斯麥授意拉多維茨明確告訴羅馬尼亞人：“目前我們對這些財政主張保持中立……但如果他們反對或阻撓鐵路問題，我們將把他們看作政敵，并相應地對待他們，特別是支持這些主張。” [[134]](#134_4)  面對這樣的待遇，難怪卡羅爾大公抱怨說：“柏林的老爺們準備像對待埃及那樣對待我們。”柏林的老爺們當然會這樣—但羅馬尼亞人也并不比埃及人更喜歡外國人吧 [[135]](#135_4)  ？

同時，俾斯麥還試圖阻止法國和英國承認羅馬尼亞，盡管人們普遍認同，對猶太人問題已經再不可能有更多期待。他告訴圣瓦里耶：“在允許羅馬尼亞人享受他們根本不配的獨立前，讓窒息再持續幾周對他們有好處。” [[136]](#136_4)  與此同時，帶著同樣微妙的嘲諷，德國政府告訴羅馬尼亞外交部長，除非他們立刻批準鐵路協議，柏林政府將宣布“猶太人問題尚未解決” [[137]](#137_4)  。俾斯麥敦促法國人和英國人在猶太人問題上和他保持共同陣線，好讓他在鐵路問題上對羅馬尼亞人施壓 [[138]](#138_4)  。他在這點上大言不慚：他不愿再為猶太人做任何事，不過想要把他們留作最后的底牌。

可是，俾斯麥的煩惱愈演愈烈。11月末，當布萊希羅德再次按照慣例對他提起羅馬尼亞問題時，赫伯特回信說，父親病體沉重，請勿再打擾：“現在，他對羅馬尼亞問題完全無能為力。由于他總是親自打開和閱讀你的全部信件，如果你愿意為他的康復著想，你最好暫時不要來信，除非在政治上的確重要。” [[139]](#139_4)  于是，布萊希羅德轉而送給他一些對健康無礙的珍稀陳年雪莉酒 [[140]](#140_4)  。事實上，俾斯麥當時的健康狀況的確非常堪憂。

但沒有人阻止布萊希羅德每天繼續費力地與羅馬尼亞人打交道。12月中旬，羅馬尼亞議會批準經過幾處修改的協議，卻遭到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的拒絕。雙方似乎又要陷入僵局。卡羅爾大公認為，“是時候讓皇帝做出決定性的表態了；特別是這一定會對布萊希羅德產生效果”。然而，德國政府再次威脅不再姑息，奧古斯塔皇后還私下請求卡羅爾的父親對他施壓，以便讓羅馬尼亞最終接受協議，為整件事畫上句號。布萊希羅德也敦促卡羅爾的父親介入，因為協議草案的最終失敗將意味著羅馬尼亞內閣垮臺，“那時我們將直接面對混亂” [[141]](#141_4)  。

1880年2月2日，距離施特魯斯貝格首次違約已經過去將近十年，羅馬尼亞議會終于投票通過略加修改過的最初協議，漢澤曼和布萊希羅德也正式接受新的文本。所有人都大出一口氣。

現在，羅馬尼亞人希望馬上獲得無條件承認；他們認為這是柏林對他們所付出代價的補償 [[142]](#142_4)  。在奧地利的幫助下（德國和羅馬尼亞都曾向其求助），德國政府說服瓦丁頓起草合適的通告，宣布各大國將承認羅馬尼亞。經過關于具體措詞的更多爭論—盡管羅馬尼亞堅持認為，作為對解決鐵路問題的回報，德國人承諾無條件承認—最后的通告上還是表示，（關于非基督徒的）10月立法沒有“完全符合”大國們的預期，但“另一方面，我們相信大公的政府有意以此為契機，一步步實現大國們秉持的自由理念……”因此這些國家現在承認羅馬尼亞的獨立 [[143]](#143_4)  。危機終于結束了，歐洲的政客們如釋重負。威廉一直對“因為猶太人問題”而無法給布加勒斯特的皇侄派去大使感到不悅，而新任法國外交部長弗雷西內也高興地看到，他前任遺留下的兩大難題之一得到解決 [[144]](#144_4)  。

布萊希羅德為羅馬尼亞問題奔忙十年。結果如何呢？他獲封貴族，但他在羅馬尼亞的同胞們仍然受到歧視。1878年，在俾斯麥的全力支持下，大國們強迫羅馬尼亞接受自由原則，他曾經為此慶祝過勝利。在柏林會議后的決定性階段，俾斯麥逐漸意識到可以利用整個猶太人問題迫使羅馬尼亞人在鐵路問題上作出讓步。用他在私底下可能都沒用過的直白方式來說，俾斯麥把支持猶太人的活動視作可以用來對付羅馬尼亞人的武器。通過鼓勵國際社會支持猶太人，他打造了一件對付羅馬尼亞人的武器，這是其他容克貴族永遠無法得到的。他逐漸讓羅馬尼亞人意識到，如果希望繼續壓迫他們的猶太人，那么他們必須還清欠德國的錢。簡而言之，被布萊希羅德稱為“熱心而仁慈”的俾斯麥實際上見利忘義，善于利用西歐的親猶和自由原則實現自己的目的，就像他即將利用國內保守派的反猶和非狹隘原則 [17](#17_15)  。他利用猶太人拯救了容克貴族。

面對這位大投機者的技巧和力量，大受吹捧的國際猶太人社會被證明完全不是對手。事實上，1878年的短暫勝利也許還加速了他們的失敗：他們炫耀自己的力量，因此更加成為柏林會議后卷土重來的反猶主義的靶子—就像羅馬尼亞故事所顯示的，反猶主義者利用了他們的外強中干。

截至1913年，羅馬尼亞只有361名猶太人被歸化 [[145]](#145_4)  。剩下的人中有許多移民美國。與留下來的更富有同胞不同，他們的后代逃過了在兩代人之后的蹂躪整個歐洲的德國鐵蹄—反猶主義是那場災難最重要的信條。另一方面，俾斯麥曾認為，可以隨意和不受懲罰地像操縱人類本身一樣操縱人類的偏見。

如果布萊希羅德一生中有某個階段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卻渾然不覺，那就是羅馬尼亞糾葛。沒有理由相信，也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布萊希羅德曾經意識到自己親手推動自己的失敗 [18](#18_15)  。不過，他試圖把失敗描繪成有限的勝利，就像當大國們無條件承認羅馬尼亞后，他在致信以色列聯盟悼念克雷米厄時所說的：

不過，我知道大國們要求羅馬尼亞代表按照第44條款的意旨和精神推進解放。所以，這個問題的解決正處于非常有利的階段，因為和我一樣，那些清楚羅馬尼亞形勢的人也會認識到，當這個國家正經歷騷動而且民眾蠢蠢欲動的時候，完全和突然的解放將導致我們的同胞受到迫害，而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在不引發動亂的情況下實現目標，畢竟那個國家首先還是會和我們的朋友們站在一起。 [[146]](#146_3)

布萊希羅德對羅馬尼亞問題的預期目標和實際結果間存在落差，這封信表明，他試圖盡力減少這種落差給自己帶來的不適。他的信反映了某種無知，但一切無知也包含自欺欺人的成分。正是那種自欺欺人的成分讓他很難適應本國隱晦的和不太隱晦的反猶主義。

[1.](#1_28) 指來自君士坦丁堡法納爾區的希臘人或希臘化家族。18世紀時，由于這兩個公國面臨俄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不斷威脅，奧斯曼當局決定讓忠于自己的法納爾人擔任大公。——譯注

[2.](#2_28) 拿破侖·波拿巴的妻子約瑟芬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奧唐斯嫁給路易·波拿巴，生下拿破侖三世。卡爾是約瑟芬前夫堂兄弟的女兒斯蒂芬妮的外孫。——譯注

[3.](#3_26) 開明的法國人常常使用“以色列人”而非“猶太人”，因為后一種稱呼已經帶上強烈的貶義。德國人使用“摩西信仰者”，有時也說“以色列人”，被同化的猶太人有時同樣如此。但俾斯麥很少在意委婉說法。

[4.](#4_26) 從后文來看，這種債券（obligation）似乎是股票，屬于有固定分紅的優先股。按照最初的協議，股東們將組成協會，在鐵路竣工后負責管理九十年，然后再將其轉交給羅馬尼亞政府。為統一起見，仍把bond和obligation譯作債券，share譯作股票。參見弗雷德里克·凱洛格，《羅馬尼亞的獨立道路》（普渡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75頁［Frederick Kellogg，The Road to Romanian Independence（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95），p75］。——譯注

[5.](#5_26) 金邊債券（gilt-edged securities）原指英國國債，由于帶有金黃色邊而得名，后來也泛指所有的國債。其因有政府擔保而具備很高的資信等級。——譯注

[6.](#6_26) 1875年，施特魯斯貝格博士因為破產而在俄國鋃鐺入獄；在老友們（特別是萊恩多夫—施泰因諾特［Lehndorff-Steinort］）的請求和俾斯麥的敦促下，德國外交部試圖設法將施特魯斯貝格開釋，至少讓他有足夠的時間處理完在德國的糾葛。不過，曾經幫助過自己貴族朋友們的威廉一世卻對他們的這位同伴沒有好感，聽說施特魯斯貝格獲刑后，他如是問候烏耶斯特公爵：“日安，烏耶斯特博士，施特魯斯貝格公爵怎么樣了？”赫伯特·俾斯麥致拉多維茨，1876年6月24日，GFO：土耳其104。瑪麗昂·登霍夫伯爵夫人，《再沒有人叫這些名字》（杜塞爾多夫，1962年），第186頁。

[7.](#7_26) 1888年，新任德國領事抵達雅西。他后來回憶說：“全部貿易都掌握在猶太人手中。憑著勤勞、儉樸、精打細算和緊密團結，他們阻止羅馬尼亞商人的崛起……我開始非常透徹地了解猶太商人。對德國的出口貿易而言，他們是很有價值的工具，多虧他們的靈活和創新才取得巨大的成功。”威廉·奧納塞特，《在黑白紅三色旗下：帝國總領事回憶錄》（柏林，1926年），第34頁［Wilhelm Ohnesseit，Unter der Fahne schwarz-weiss-rot：Erinnerungen eines Kaiserlichen Generalkonsuls（Berlin，1926），p.34］。

[8.](#8_26)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的說法更加夸張：“在可愛的羅馬尼亞，在這個大國們的污點而非保護國［Schmutz-nicht Schutzstaat］，可憐的猶太人正在受難，沒有夸大其詞，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至今尚未被曝光，那么統治者的恐怖和領事們的軟弱難辭其咎。”戈德施密特希望任何猶太商人都不要與“這些粗魯的掌權者”發生任何關系，“好讓他們在自己所謂的文明中窒息”。事實上，戈德施密特最初不相信猶太人在羅馬尼亞受難的說法，但維也納聯盟進行的正式調查打消他的懷疑。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月30日，BA。

[9.](#9_24) 布萊希羅德的孩子們也追隨克雷米厄的孩子們的腳步，后者在19世紀40年代皈依天主教，這讓克雷米厄沒能當選以色列聯盟的首任主席。布萊希羅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6月30日，AI：IDI；另見波斯內，《阿道夫·克雷米厄》（巴黎，1934年），第二卷，第140—163頁［S.Posener，Adolphe Crémieux（Paris，1934），II，140–163］。

[10.](#10_24) 指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南巴爾干，包括今天的希臘中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以西地區、保加利亞和馬其頓等地。——譯注

[11.](#11_24) 爭議性的第44條款內容如下：“在羅馬尼亞，不得以宗教信仰的差異為由排斥或禁止任何人享有公民和政治權利，獲得公共職務和榮譽，或從事不同的職業或行業。應該保證羅馬尼亞國家的所有公民和外國人自由而公開地開展任何宗教活動，不對各種宗教團體的等級組織或者它們與精神領袖的關系設置任何障礙。各國公民，無論是商人或者其他，無論信奉何種宗教，都應在羅馬尼亞被完全一視同仁。”塞頓—沃特森，《羅馬尼亞人史》（劍橋，1934年），第350頁［R.W.Seton-Watson，A History of the Roumanians（Cambridge，1934），p.350］。

[12.](#12_22) 根據1878年俄土戰爭后簽訂的《圣斯特法諾條約》，位于巴爾干半島東北部的多布羅加地區被劃歸俄國和保加利亞。隨后，俄國人提出用自己占有的北多布羅加交換羅馬尼亞的南比薩拉比亞，從而獲得多瑙河的入海口。——譯注

[13.](#13_20) 著名的羅馬尼亞歷史學家約爾加（N.Iorga）—他的民族主義熱情超過治史的嚴謹—對此作了奇怪的表述：“這種新的羞辱可能很容易引發羅馬尼亞的第一波反猶迫害，但非常智慧的內閣避免了這種不幸。”他把之前的事件歸咎于猶太人自己。《建國背景下的羅馬尼亞民族》（哥達，1905年），第二卷，第363頁［Geschichte des Rumänischen Volkes im Rahmen seiner Staatsbildungen（Gotha，1905），II，p.363］。

[14.](#14_20) 一位淵博的羅馬尼亞猶太人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生活在羅馬尼亞的25萬到30萬猶太人中約有六成是土生土長的。但他強調不可能獲得確切數字。赫施博士（Dr.H.Hirsch）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2月10日，BA。

[15.](#15_20) 圣瓦里耶報告說，俾斯麥首先發泄對羅馬尼亞人，“對那些騙子和蠻族”的怒火，他“非常激動和粗魯，就像人們在評價他時常常提到的那樣”。大使如實復述談話內容：“我［反對羅馬尼亞人］的另一個動機與私事有關，對我們來說非常緊急和痛苦；你了解施特魯斯貝格事件，知道它讓德國資本損失多么慘重；這些羅馬尼亞鐵路已經吞下2億法郎卻全無產出，而且價值幾乎還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我們的大貴族和擦鞋匠都認為施特魯斯貝格會給他們帶來金礦，許多人相信這位冒險家的承諾，冒險投入大部分財產。這一切現在都被埋入羅馬尼亞的泥沼，兩位公爵、一位擔任皇帝副官的將軍、六名侍女、十二名侍從、一百名咖啡店老版和柏林所有的出租馬車夫發現自己徹底被毀了。皇帝同情公爵、副官、侍女和侍從，命令我救他們脫難。我向布萊希羅德求助，他同意救助拉提波爾公爵、烏耶斯特公爵和萊恩多夫［原文作Lehndorf］伯爵，條件是讓他獲得猶太人所珍視的貴族頭銜；兩位公爵和一位副官得救了—坦率地說，好心的布萊希羅德配得上獲得‘馮’。但侍女和車夫等人還在水里，甚至布萊希羅德的三位摩西［他把他們打撈上岸］也沒有完全得救，每年都不得不面臨難堪的審判，被要求賠償200萬或300萬馬克。他們無法支付賠償，因為拉提波爾和烏耶斯特等人已經把他們的財產完全抵押給布萊希羅德，以換取后者的保證。只有一個辦法能救所有人脫難，那就是試著賣掉羅馬尼亞鐵路……［目前］羅馬尼亞政府利用所有者們的困境進行野蠻盤剝；通過騷擾、不公正和敲詐，它想要迫使他們以微不足道的價格把鐵路出讓給自己……每天都有我們的德國工程師和工人們被毆打、虐待、監禁、欺騙和奪走一切，我們完全無法幫助他們伸張正義。這就是為什么我剛才告訴你，我希望可以利用軍艦達到目的，就像在尼加拉瓜那樣；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沒有氣球把德國軍隊送到那里。”他敦促公爵們賣掉鐵路，也許可以賣給奧地利或俄國，但必須要收現金，因為借錢給這些大賴賬者將是錯誤。公爵們認為俾斯麥也許會反對把羅馬尼亞鐵路賣給俄國，但他向他們保證，“即使羅馬尼亞鐵路乃至整個羅馬尼亞都落入俄國人之手，我也毫不在乎”。法國大使提醒法國外交部，這對法國來說也許前景不妙。1879年2月26日，MAE：CP：德國，第27卷。

[16.](#16_20) 整個1879—1880年秋天和冬天，戈德施密特都堅稱，完全和立即解放羅馬尼亞的所有猶太人將是個錯誤。他并不認為“羅馬尼亞猶太人希望取得的一切能一次性實現；在那些國家，也許最好不要因為完全解放而傷害基督徒，從而避免做得過頭。在奧地利，我們只是逐步取得今天的局面，而且我們肯定比羅馬尼亞的同族更優秀”。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2月5日和之前的書信，BA。

[17.](#17_14) 俾斯麥的助手拉多維茨在回憶錄中用簡潔而實事求是的方式談及此事：“1879年，我們不得不終結倒霉的鐵路事務……但只能通過猶太人和獨立問題。我們不得不用這種方式對布加勒斯特的政客們施壓。”見哈約·霍爾伯恩編，《約瑟夫·瑪利亞·馮·拉多維茨大使生平記錄和回憶》（斯圖加特，1925年），第二卷，第84頁。

[18.](#18_14) 唯一的證據來自一位1879年11月隨代表團訪問柏林的羅馬尼亞猶太人，他公開表示不友好和受到傷害。代表團試圖在最后一刻請求布萊希羅德和德國政府不要拋棄羅馬尼亞猶太人，布萊希羅德接見了這些人。根據一位在場者的說法，他告訴他們，德國政府直到現在仍要求完全執行《柏林條約》：“不過，對所有政府來說，本國的利益必然優先于對人性理想的關心。猶太人問題讓我國首相有機會拯救德國人數以百萬計的財富。如果這筆錢掌握在你們政府手中，無論哪派當權都非常危險。這樣的代價讓德國人必須毫不猶豫地展開［鐵路問題］談判。”據說，布萊希羅德還要求代表團直接與羅馬尼亞政府磋商，并為俾斯麥親王準備一份備忘錄。羅馬尼亞代表團無疑對布萊希羅德突然的“現實主義”深感委屈，也許還對他的話添油加醋。引自蓋爾伯（N.M.Gelber）關于羅馬尼亞猶太人問題未發表的手稿，第228—229頁，BA。

##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相信我，老兄，要是我也有這么一筆買賣在外洋，我一定要用大部分的心思牽掛它；我一定常常拔草觀測風吹的方向，在地圖上查看港口碼頭的名字；凡是足以使我擔心那些貨物的命運的一切事情，不用說都會引起我的憂愁。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1場

我國的殖民努力受制于這樣的現實：與英國相比，我國的資本和熱情較少集中在同一人身上。德國資本家一般缺乏信心，作為新貴，他們還不敢涉足有遠見的冒險，而熱情的企業家精神反倒廣泛分布于我們的無產者中間……掌握大量德國財富的人（與英國的富人不同）仍然非常擔心可能失去到手不久的東西。這種現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在與英國進行殖民競爭中處于劣勢……這也是為什么在德國，無產者對本國有產公民的妒忌要比在英國嚴重得多，大部分民眾對少數富人（特別是銀行家）的敵意在我國產生的影響也要超過英國……鑒于妒忌是德國人的民族病，我們可以理解（特別是從人的角度），對沒有百萬財產的人來說，百萬富翁的樣子一定不太討人喜歡。

——來自準備在報紙上發表的政府備忘錄，俾斯麥親自做了修改，1889年6月

布萊希羅德登上權力巔峰之時正值歐洲的擴張進入最后的狂熱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歐洲大國們確立或擴大了對亞洲與非洲大片地區的控制。到了1900年，歐洲對世界其他部分的統治達到最高峰，然后開始不確定的退潮。

這波帝國主義最后巨大浪潮的起因曾經讓歷史學家困惑和莫衷一是。為什么歐洲和美洲人不再滿足于“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非正式統治，而是補充正式吞并和殖民化企圖這樣的昂貴新制度，甚至用其取代前者呢？關于新帝國主義的辯論并非無關利害的學術練習，我們今天的政治觀念影響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人們可能用“教化使命”、拯救靈魂或為祖國效勞等想法自欺欺人，而今天的人們則普遍認為，歐洲和美洲的帝國主義是無情剝削和把物質進步的偽神強加給原始社會的可恥故事，原始人本來幸福或者至少滿足地生活在世界邊緣，對機械時代的福音和國際沖突的詛咒一無所知。

帝國主義帶有負面意味。在今天的政治語匯中，它與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象征著邪惡，前者與它聯系在一起，后者則常常被視作帝國主義遭受挫折或威脅時特別惡性的衍生物。在某些史學家和許多理論家看來，“帝國主義的經濟主根”（霍布森［J.A.Hobson］在1902年的開創性研究中如此稱呼它）已經成為信條。根據這種觀點，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直接統治、間接統治和經濟滲透）的首要根源是物質利益。霍布森甚至特別指出，“大金融機構”這類特殊群體主導了帝國的掠奪：

它們被最堅固的組織紐帶聯系在一起，總是彼此保持著最親密和最迅捷的接觸，位于各國資本業務的最核心，至少在歐洲，它們主要由某個單一種族的人控制，這些人的背后是許多個世紀的金融經驗，在操縱國家政策上，它們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金融操縱著政客、士兵、慈善家和商人們創造的愛國力量…… [[1]](#1_57)

布萊希羅德似乎完全符合上面的描述，但他具有典型性嗎？

分析布萊希羅德對帝國主義的反應應該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關于帝國主義主發條的一般性辯論，更直接的是，它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俾斯麥為何曾短暫地轉向殖民主義，盡管首相此前堅稱德國不會走帝國主義道路，此后也表達了對此的厭倦和冷漠。鑒于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世界中的地位，此人對帝國主義冒險的看法特別重要。他對出現在面前的大量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誘惑作何反應呢？他是否按照計劃行事，是否促使俾斯麥獲取殖民地，讓德國突然擁有相當于本土面積五倍的海外土地？

他顯然清楚擴張主義的力量，也知道帝國主義者某些最粗俗的物質野心，就像我們將在他與利奧波德二世的關系中所看到的；商人和其他銀行家也經常不斷地向他提出要求。與此同時，他通過明斯特伯爵等人了解到，擴張主義威脅到德國與歐洲的良好關系。布萊希羅德也許沒有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和一致性觀點，但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他面臨著一系列抉擇，仔細分析這些抉擇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線索，了解他對殖民冒險的營利性和吸引力的總體態度。

布萊希羅德早就涉足帝國事務。他意識到，英國收購蘇伊士運河股份以及此后加快在近東和非洲擴張利益的舉動意義重大。更重要的是，他被邀請直接參與德國在薩摩亞的首個海外領地事務，而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也試圖把他拉入從1878年開始的剛果冒險。

德國在南太平洋的利益由來自漢堡和受人尊敬的約翰·策扎爾·戈德弗洛伊（Johann César Godeffroy）公司開創。這家公司在19世紀中葉的老板被稱為“南太平洋之王”。從19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戈德弗洛伊家族擴大在中美和南美太平洋沿岸的領地，擁有自己的貿易船隊。他們主要的海外冒險集中在薩摩亞群島，逐步在那里購置超過10萬英畝土地，勢力范圍的長度接近5000英里，寬度超過2000英里。戈德弗洛伊家族建立種植園，他們的代理人報告說，那里什么都能生長。主要產品是椰仁干，它們被運往德國榨油，殘渣用作動物飼料。每年出口的椰仁干達到7500噸到8000噸。此外，那里還采集珠母貝和種植海島棉，這類異國產品讓人們更有理由把薩摩亞想象成一片無比豐饒的土地 [[2]](#2_57)  。

到了19世紀60年代，南太平洋約70%的貿易掌握在德國人手中。有時，戈德弗洛伊家族和薩摩亞的德國領事（該家族的代理人）會向德國海軍求助，請求威嚇被分化和掠奪的薩摩亞人。德國人在當地的利益本來可能讓德國對薩摩亞實施直接統治。但主要出于戰略和政治原因，其他國家也把目光對準薩摩亞。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對其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英國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開始關注它。隨著美國成為太平洋地區的強國，它同樣對薩摩亞打起算盤。19世紀70年代，英國和美國都在那里建立對立據點。戈德弗洛伊家族的私人帝國受到這些強大入侵者和當地政府持續混亂的威脅 [[3]](#3_55)  。

19世紀70年代末，戈德弗洛伊家族有了更加迫在眉睫的擔憂。薩摩亞的利潤反而可能成了他們的災難：由于在奠基之年把利潤投入工業發起活動，他們擴張過度，到了1873年面臨馬上破產的危險。他們的得救，一定程度上多虧亨利·施羅德（Henry Schroeder）的英國公司。幾年后，他們遭遇新的麻煩。為了至少拯救他們在薩摩亞的產業，一家名為德國貿易和種植園公司（Deutsche Handels-und Plantagen-Gesellschaft）的新公司于1878年成立，戈德弗洛伊家族只享有該公司的部分權益，只有一部分股份可以出售。為了籌集必要的資本，公司不得不以薩摩亞的產業為抵押向英國的巴林銀行（Baring）貸款 [[4]](#4_55)  。

布萊希羅德在遠處旁觀這一切；他的主要聯系人是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Gustav Godeffroy），此人于1872年離開家族公司（盡管最初還保留著一部分經濟利益），成為漢堡北德意志銀行的一名董事（該行也是半官方的《北德大眾報》的主要股東之一），并開始貴族政治生涯。在漢堡商人和德國銀行家中，古斯塔夫是個異類：19世紀70年代中期，他成了狂熱的保護主義者，高調支持俾斯麥的新經濟政策。另一方面，他也投機礦業和鐵路股票，就像家族的其他成員一樣—結果同樣慘淡。他與布萊希羅德關系密切，曾對后者抱怨說，某些鐵礦讓他虧了一大筆錢。他想誘使布萊希羅德出手拯救這些鐵礦，為此他描繪它們美好的未來，聲稱美國的鐵路建設需要大量鋼鐵。布萊希羅德愿意慷慨地提供建議，對于自己的錢則小心謹慎 [[5]](#5_55)  。

不過，新的種植園公司并不比老戈德弗洛伊公司表現得更好。1879年1月，戈德弗洛伊公司的掌門人向彪羅求助：新公司需要250萬馬克才能活下去。彪羅承認政府一直很關心德國在薩摩亞的利益，但他的答復是否定的：讓戈德弗洛伊公司屢遭打擊的經濟狀況也導致帝國的任何機構都不可能籌集到所需的數目。幾周后，戈德弗洛伊再次提出公司正面臨“災難性的狀況”，并表示“憑著德國人的精神和勤勞，不用多長時間就能在南太平洋創造一個真正的黃金國” [1](#1_31)  ……1879年7月，戈德弗洛伊公司請求300萬馬克貸款，但遭到拒絕，理由是內閣質疑國家提供這筆貸款的正當性 [[6]](#6_53)  。

1879年12月1日，戈德弗洛伊公司宣布破產，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馬上得到消息。普魯士駐漢堡大使致信俾斯麥，表示“那家享有盛譽的老公司”破產讓漢堡商界震驚。同一天，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也告訴他的合伙人，自己的家族企業（他已經不再與其有關系）將無法償還債務。他還給“老朋友和庇護人”布萊希羅德寫了私信，解釋“這場讓他失去全部生活樂趣的沉痛的家庭變故”的原因 [[7]](#7_53)  。戈德弗洛伊家是歷史悠久的胡格諾派家族，屬于漢堡的貴族階級。類似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們的存亡也受到國家和商界的關注。在沒有收到正式求助的情況下，布萊希羅德就為戈德弗洛伊家族“在薩摩亞群島非常重要的種植園”致信赫伯特·馮·俾斯麥—僅僅一周前，赫伯特還提醒他不要在親王健康如此不佳的時候提起羅馬尼亞問題—他表示“根據我的信息，英國有意利用［戈德弗洛伊家族的］困境在那里站穩腳跟。如果閣下對此感興趣，那么請您示下，我將向家族成員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詳細了解整件事”。赫伯特馬上回信說，雖然父親因為健康而無法商討此事，但他對薩摩亞感興趣，歡迎布萊希羅德提供更多信息。盡管如此，他不會主動要求政府提供資金 [[8]](#8_53)  。赫伯特回信的速度和主動提起政府幫助的可能性一定讓布萊希羅德明白，首相對此事極感興趣。

另一方面，布萊希羅德也聽取古斯塔夫的不斷請求。拯救南太平洋的種植園不需要太多資本，而且幾乎沒有風險；但讓它們落入英國手中將會削弱或摧毀德國在太平洋的地位。戈德弗洛伊和布萊希羅德習慣于在書信往來中談論所有買賣的應有目的：賺錢。但在這件事上，即使在私信中，古斯塔夫也用了不同的口吻向布萊希羅德求助：“您如此忠誠而有影響，又與首相如此親近，定會保證到了新世界，我們的鐵血首相在舊世界里戴在額頭的桂冠上不會有任何一片重要的葉子掉下。”不過，除了詩意表達，古斯塔夫的信也不乏務實之處：他敦促布萊希羅德馬上接洽漢澤曼及其小舅子—外交部商業法律處的主管海因里希·馮·庫塞羅夫（Heinrich von Kusserow），以便協調拯救德國在南太平洋利益的行動 [2](#2_31)   [[9]](#9_51)  。

在古斯塔夫的堅持下，布萊希羅德在12月14日組織戈德弗洛伊家族、漢澤曼和他本人的會談；第二天，在外交部派來參加會議的帝國國庫局（Reichsschatzamt）主管阿道夫·馮·朔爾茨的見證下，各方制定成立新公司的方案。外交部臨時主管施托爾貝格（彪羅于1879年10月突然去世）向俾斯麥通報了方案：新公司的資本將為1000萬到1200萬馬克，但“先決條件”是政府愿意提供“得到帝國法律批準的補貼分紅擔保”。俾斯麥的批注僅僅是“多少？”，顯然他對銀行家們的方案感到滿意（政府將為股東提供4.5%的分紅擔保，但每年的責任總額不超過30萬馬克，而且公司必須全額償還這筆錢），并授權向議會提交這樣的議案。

12月末，威廉接受該議案，因為人們讓他相信，如果不這樣做，薩摩亞的土地將落入英國人之手。從開始到完成，俾斯麥政府只用了一個月就制定政策，做出決定的速度（眾所周知，當時俾斯麥的健康正處于低谷）和決定被接受的容易程度暗示，政府并不認為此舉嚴重背離一貫方針，此事似乎還印證老生常談的說法，即帝國是在一次次心不在焉中建立起來的。俾斯麥為薩摩亞做出重要動議，當時很少有人能預見到，無論成功與否，這次動議都將持續影響他對帝國主義冒險的看法 [[10]](#10_50)  。

政府表面上的漫不經心沒有阻止另一些人非常嚴肅地看待這些計劃。崇尚自由貿易和重商主義的報紙反對任何可能的政府干涉，漢堡商人們同樣如此；他們的一家報紙表示：“即使德國政府希望實行殖民政策（盡管所有證據顯示出它無意這樣做），它選擇的起點也不能再糟糕了。鐵路國有化之后必須把海外投機也國有化嗎？” [[11]](#11_50)  自由貿易主義者認為，幫助戈德弗洛伊公司的計劃延續俾斯麥的保護主義和加強國家干預的政策。不清楚俾斯麥是否也這樣看，因為對于向在海外遭遇困難的德國公司提供國家幫助，他總是顯得務實，甚至有騎士風范。1879年7月的保護主義勝利無疑讓他在六個月后的薩摩亞問題上更加堅決。

自由貿易主義者不是唯一感到不安的群體。同樣忠于俾斯麥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明斯特伯爵接連給布萊希羅德來信，譴責在薩摩亞的一切政府行動。1879年12月中旬，他再次警告任何政府擔保：“漢堡公民是最糟糕的德國人，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會為一己私利而利用帝國政府。”他在圣誕節當天寫道：“如果現在帝國首相府有人開始執行殖民政策，我將非常遺憾……”明斯特希望俾斯麥能拒絕下屬們的野心，他還為布萊希羅德羅列反對德國殖民主義的理由：比如成本極其高昂，而且只要赫里戈蘭島（Heligoland）仍然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保護海外基地將是不可能的。此外，巴林銀行等倫敦銀行無意購買戈德弗洛伊公司的產業，英國政府也不愿為增加本國在當地的利益效舉手之勞：“因此不要再干殖民的蠢事，不要再參與薩摩亞的騙局了！”12月的最后兩周里，明斯特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五次激烈抨擊計劃中的薩摩亞冒險，認為那是他所擔心的政策的開始。他無疑希望布萊希羅德能讓柏林的熱情降溫，也許還能對病重的首相施加影響。明斯特的警告一定對布萊希羅德有所影響 [[12]](#12_48)  。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圣瓦里耶一直擔心德國在中南美洲、非洲（特別是摩洛哥）和太平洋的利益。他提醒巴黎注意這種擴張傾向，并認為盡管德國政府專注國內政治，但還是可能把薩摩亞作為殖民地吞并，特別是因為皇太子有意這樣做 [[13]](#13_44)  。當圣瓦里耶聽說戈德弗洛伊公司破產時，他再次提醒巴黎，德國人在波利尼西亞的意圖將威脅到法國在塔希提的利益。他認為，法國應該擴張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帝國，而不是被動地看著德國和英國擴張（他的請求是所謂的“先發制人帝國主義”的典型例子，即為了遏制他國而擴張。這也是帝國主義動力的重要來源之一）。為了增加提醒的分量，圣瓦里耶再次強調皇太子對保護德國在薩摩亞的利益“很感興趣”。皇太子顯然卷入首起殖民事件，這讓我們對某種常見的說法產生懷疑，即俾斯麥開始殖民活動是為了讓反對殖民的親英派皇太子尷尬。

圣瓦里耶最后表示：“昨天，我從布萊希羅德先生那里得知，在俾斯麥親王的要求下，他剛剛籌建一家大型金融公司……并得到政府的保護和支持。”新公司準備維護和擴大戈德弗洛伊公司受到威脅的產業 [[14]](#14_44)  。

1880年2月，布萊希羅德、漢澤曼和德意志銀行的瓦里希（Wallich）果然成立了名為德國海貿公司（Deutsche Seehandels-Gesellschaft）的新公司。他們接管戈德弗洛伊公司在薩摩亞的利益，并與巴林銀行達成協議—后者完全不像德國政府所以為的那樣急于主張在薩摩亞的權利—然后等待議會批準政府所承諾的支持。支持政府的報紙開始宣揚愛國主義，圣瓦里耶則認為，整個事件只是徹底吞并薩摩亞和德國在各地加快殖民活動的前奏。在他看來，德國擴張的主要動力來自德國對外移民的加速，這種現象愈演愈烈的部分原因是“沉重的稅收、兵役負擔和工農業危機；但與國內形勢和經濟危機無關，這種［移民］傾向屬于德國人精神中的冒險元素，屬于德國人對流浪生活的想象，注定將會延續” [[15]](#15_42)  ……圣瓦里耶從大得多的視角看待薩摩亞，認為它測試了柏林對帝國擴張日益濃厚的興趣。

帝國議會的左翼自由派反對者們也對薩摩亞提案持類似觀點，盡管它的資金要求如此微不足道。巴姆貝格率先斥之為殖民主義的“試驗場”，表示此舉行帝國主義和保護主義之實，卻一直假裝出于國家利益的要求。1880年4月，提案以128票反對、112票贊成和140票棄權的結果未能通過 [[16]](#16_42)  。圣瓦里耶將此歸咎于俾斯麥的長期缺席 [[17]](#17_36)  。事實上，大部分棄權者去看了新上演的《浮士德》，舞臺上的浮士德精神比政策中的更吸引他們。

俾斯麥充分利用自己的失敗。多年來，他一直對帝國議會的“薩摩亞多數派”嗤之以鼻，后者總是破壞他擴大政府對海外德國利益援助的努力。他找到另一條“愛國主義”大棒來對付作為自己死敵的左翼自由派。他們再次證明自己更加忠于對自由貿易的教條式幻想，而非愛國主義的必要性。俾斯麥不斷試圖幫助戈德弗洛伊公司的利益，這讓他越來越深地卷入薩摩亞事務。到了1889年，這幾乎導致德國和美國兵戎相見 [[18]](#18_36)  。

薩摩亞提案的失敗讓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可以自由地終止拯救行動。不過，在俾斯麥的鼓勵下，他們設計了新的操作方式。在寫給他們的正式信件中，俾斯麥表示很高興看到銀行愿意“出于國家利益”保住現有企業，他們做出重要的愛國舉動，將受到皇帝和帝國其他有關人士的歡迎 [[19]](#19_32)  。關于新公司的談判遲遲沒有結果，雪上加霜的是，戈德弗洛伊公司拒絕提供必要的數據，海貿協會在薩摩亞提案失敗后不愿繼續合作，還有形形色色的障礙讓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差點放棄整個計劃。讓他們堅持下來的是俾斯麥持續的興趣和漢澤曼的信念：“如果失去薩摩亞，德國就失去在南太平洋的全部利益。”經過幾個月的焦頭爛額，他們終于在1880年秋天解散幾個月前成立的南太平洋公司，恢復并大大加強德國貿易和種植園公司 [[20]](#20_32)  。

漢澤曼開始對德國在薩摩亞和新幾內亞的地位越來越感興趣 [3](#3_29)  。在其中一些行動中，他也邀請布萊希羅德參與。1884年，兩人牽頭成立新幾內亞財團。一年后，俾斯麥批準該財團在（無利可圖的）新幾內亞本土成立受政府保護的公司 [[21]](#21_32)  。布萊希羅德的名字確保了獲得俾斯麥的批準，但除此之外，他仍然謹慎地保持消極態度。沒有證據顯示，他對這場錯誤投機真正感興趣。自始至終，他在薩摩亞事務中的角色都是不起眼和不情愿的。根據今天的流行觀點，他本該是推動者，但證據卻顯示出他被別人推著走。推動他的是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此人身為他的親密合作者和一家重要銀行的董事，還間接參與當時布萊希羅德為收購半官方的《北德大眾報》的一半股份而正在進行的談判 [[22]](#22_32)  。在某種程度上，布萊希羅德受制于自己的力量：當俾斯麥“出于愛國理由”對破產的戈德弗洛伊公司在薩摩亞的產業感興趣時，如果布萊希羅德不參與此事，他的地位可能受到損害。薩摩亞提案失敗后，紹芬將軍在信中告訴他：一旦愛國富人表明立場，即使遭遇這次挫折還要幫助首相，那么布萊希羅德的名字出現在他們中間（而且位列榜首）就毫不奇怪。紹芬本來還可以說：布萊希羅德的缺席將令人吃驚 [[23]](#23_32)  。

就這樣，布萊希羅德帶著不多的錢和少得可憐的熱情參與其中；記錄顯示，他只給赫伯特寫過一封關于薩摩亞的信。對于自己關心的問題，他不會如此沉默。他沒有動員任何議會或報界的朋友。他迫于商業聯系和與俾斯麥的特殊關系才涉足薩摩亞事務；他沒有做出動議，也沒有擴大自己的影響。南太平洋的那大片群島理應被命名為俾斯麥群島，正是俾斯麥的興趣維持和擴大了德國在太平洋的存在。

俾斯麥在德國帝國主義引起的第一波騷動中扮演不起眼的角色，但在利奧波德二世國王在剛果實現巨大野心的過程中，他起到重要作用。薩摩亞加快德國的帝國主義步伐，而利奧波德國王對剛果的逐步吞并則是瓜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信號。布萊希羅德近距離見證歐洲帝國主義的重生，看到推動帝國主義的權力、利潤和冒險激情。他目睹爭奪戰，但很少投入自己的錢。

19世紀70年代中期，布萊希羅德與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成為朋友，兩人初識于奧斯坦德的浴場。利奧波德身上匯聚推動歐洲發起最后一波海外擴張高潮的所有動機，他是熱情的旅行家和平庸的冒險家，還充滿民族主義野心（1861年，距離登基還有四年時，他遺憾比利時的中立限制了國家的發展，但表示“大海拍打著我們的海岸，宇宙就在我們面前”）。在他身上，發現新世界的理想中越來越多地加入務實和貪婪。當時的自由貿易者可能會像柯布敦 [4](#4_29)  那樣譴責“沾染鮮血的帝國癖”，而利奧波德則主張殖民地既是比利時出口商的需要，也是人道主義的要求。他聲稱必須廢除奴隸貿易，卻引入一種殘忍得無法想象的新奴隸制。在那個毫不掩飾的物質主義時代，所有潛在的殖民者都用金錢來解釋自己的愿望；利奧波德總是表示，獲得殖民地和新市場將為比利時制造商帶來收益。但商人們仍然不為所動，于是他越來越多地決心為自己追求權力和收益。在建立后來成為帝國主義歷史上最大私人領地的過程中，利奧波德發現布萊希羅德是個謹慎而有用的助手。另一方面，布萊希羅德也被利奧波德的帝王派頭所吸引，并對這位君主的貪婪印象深刻 [[24]](#24_30)  。

利奧波德游歷廣泛。他曾對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前景著迷，還曾經去過遠東。傳說他早年從雅典衛城回來后發誓要讓比利時擁有殖民地。登基后，他沒有放棄這個夢想；但實行中立和采用自由憲法的小國比利時讓他的野心很難施展—他的鄰國中有的已經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比如荷蘭），有的則在歐洲建立大帝國（比如普魯士），這更加刺激他的愿望。利奧波德在地圖上搜尋殖民地，他想到太平洋，于是就收購菲律賓與西班牙人展開間接談判。1876年，他在布魯塞爾召開以探索非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第二年，他迅速意識到史丹利 [5](#5_29)  在剛果河上游驚人的發現意義，非洲的中心發出召喚。1878年11月，他建立上剛果研究委員會，這個名字看似無害的組織是后來成為他私人統治工具的剛果國際協會的前身 [[25]](#25_30)   [6](#6_29)  。幾天后，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一封長信中，利奧波德重新提起他們在奧斯坦德談到過的一個話題：“各地的工業狀況都不佳，有必要開拓新的渠道，對象是那些現在產品還沒進入、公共工程也尚未展開的國家。從這兩點來看，非洲大陸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利奧波德概括他的各種計劃，并宣布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格林德爾男爵（Baron Grindl）將拜訪布萊希羅德，更詳細地描繪他們的方案。“他會告訴您，如果您和您的朋友們覺得可以加入我們的計劃，我會多么高興……”格林德爾男爵拜訪布萊希羅德，但后者婉拒一切誘惑，只是禮貌地表示對剛果冒險感興趣。他和利奧波德開始友好的通信，通報德國的政治形勢、俾斯麥的精神和健康狀況、皇室的健康。他還提供一些有趣的細節，比如教皇利奧十三世委托弗朗茨·馮·倫巴赫（Franz von Lenbach） [7](#7_29)  繪制俾斯麥肖像—這無疑標志著梵蒂岡和德國的關系進入新的階段。布萊希羅德也為利奧波德最親密的顧問們投資。利奧波德最初的書信不那么有趣，但親切地署名“您的朋友”或者“你親愛的好友” [[26]](#26_28)  。

在差不多五年時間里，利奧波德頗為秘密和迅速地推行著自己的計劃。為了掩蓋它們，他一直堅稱開發中非是國際性工作，出于科學和人道主義理由。當利奧波德把史丹利派回剛果時，法國人也派出另一位著名探險家薩沃爾尼安·德·布拉柴（Savorgnan de Brazza）勘探剛果河北岸，并對那里提出主張。后來，葡萄牙人也變得警覺，而英國人雖然因為埃及無法脫身，但希望和葡萄牙人一起阻止利奧波德。隨著勘探工作的完成和剛果國際協會在剛果河沿岸站穩腳跟，利奧波德需要國際社會承認自己的統治。在這件微妙的事情上，布萊希羅德成了他的重要依靠。利奧波德在剛果的活動是私人性質的，無法正式依靠比利時在國外的外交官，于是布萊希羅德成了他在柏林的特使，是他決定性的資本。

1883年5月，利奧波德向布萊希羅德求助，這是他眾多請求中的第一個。他首先總結剛果國際協會的歷史，表示靈感來自紅十字協會以及古代的馬耳他和圣約翰騎士團。過去的五年間，協會已經沿著剛果河瀑布修建道路，將該地區向各國商人開放。“協會……擁有自己的旗幟，不服務于某個國家的目標，它的代理人來自所有國家。它從未向任何政府請求保護或經濟援助，依靠私人捐贈維持……”現在它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中立承認，讓它不對任何國家負有任何義務：

剛果河谷前景廣闊，我們已經打開那里。我們的工作不會阻礙任何人，全世界都能從中受益。男爵先生，鑒于德國政府如此關心工業，如此致力于推動工業發展和普遍繁榮，您相信它有意承認我們各基地的中立地位嗎？如果您能夠以您慣常的才能探究此事并告知您的看法，我將不勝感激。 [[27]](#27_24)

布萊希羅德的回復似乎沒有留存下來。利奧波德的“中立”計劃（當年晚些時候，一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也提出類似方案）逐漸被更高的要求取代：承認新的獨立國家。

兩人的通信似乎中止了，但并非因為剛果變得不再重要。事實上，利奧波德的大肆侵占讓其他國家警覺，非洲的未來突然成了歐洲各國政府關注的問題。1884年2月的《英葡條約》最直接地挑戰利奧波德的地位。根據條約，英國承認葡萄牙對剛果大片土地的有爭議主張。條約讓利奧波德陷入煩惱，也激怒俾斯麥—事實上，《英葡條約》導致英德關系進入前所未有的緊張時期。現在，俾斯麥倚重法德同盟，展開自己的殖民吞并活動，他一度成為非洲的主宰，就像他曾經斷斷續續地在歐洲取得過同樣的地位 [[28]](#28_18)  。

1884年春，利奧波德成功地讓美國承認他的協會對剛果擁有實際主權。為了說服法國，他向其提供協會一旦清算資產時的優先購買權。現在，他的主要目標是正式承認，只有柏林能確保他實現目標。于是，他在5月15日再次向布萊希羅德求助—那是他通過布萊希羅德這個謹慎而非官方的渠道給俾斯麥寫的大量書信中的第一封。他寫到，協會的下一個任務是——

讓在其庇護下建立的中非獨立邦……躋身國際社會。我們現在正忙著為新的國家制定憲法和起草基本法律。我們希望該憲法能讓德國滿意，這個新的國家將大力服務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向我們提出的所有意見和建議，它向我們表達的所有愿望都會得到應有的尊重。 [[29]](#29_18)

隨后的四個月間，利奧波德不斷向布萊希羅德發出求助和暗示，就像后者在寫給俾斯麥的信中所說的：“比利時國王……非常強烈地想要結束剛果事件。我昨天回信表示，這主要取決于剛果協會，但該協會仍然不愿做出某種約束性的宣言。” [[30]](#30_14)  整個夏天，布萊希羅德都是利奧波德在柏林的主要代表，這段時間被證明是剛果談判的關鍵階段。他不斷向雙方通報情況，試圖為最終解決鋪平道路。利奧波德每周（有時甚至每天）都向布萊希羅德簡述自己的立場，布萊希羅德則在回信中盤點柏林的情況。

5月和6月初，布萊希羅德向利奧波德保證，外交部和威廉已經同意與剛果協會建立關系 [[31]](#31_14)  。另一方面，利奧波德對布萊希羅德承諾：“我們希望新國家的邊境不設任何稅關。”他表示，大國們因此應該同意劃定邊界 [[32]](#32_14)  。按照布萊希羅德的說法，俾斯麥堅持要求這樣做，讓剛果市場繼續對德國產品開放。1883—1884年，槍支、彈藥和烈酒出口有了大幅增長。在非洲尋找“德國的印度”的想法開始在德國流行起來，俾斯麥也認為，對德國的利益而言，由利奧波德統治中非自由貿易區遠遠好于由法國或葡萄牙的保護主義者統治，更別提英國人的可能侵入。在與俾斯麥交談后，布萊希羅德提醒利奧波德“不要對英國進行任何這樣的游說，因為英國和德國目前的緊張關系正源于跨大西洋問題，而且嚴重到向英國請求最小的恩惠都不太可能的地步” [[33]](#33_14)  。與此同時，在利奧波德的提議下，布萊希羅德試圖安排國王和俾斯麥見面，但俾斯麥態度曖昧。他在外交部官員面前嘲笑利奧波德說，此人“行事天真而苛刻，自私得就像意大利人，以為所有人都會無償地（pour ses beaux yeux）為他做很多事，不要求任何回報” [[34]](#34_14)  。

利奧波德變得不耐煩，布萊希羅德不得不一再提醒他，俾斯麥只會接受讓德國人享有自由貿易的最具體保證，而且是永久性的，即使剛果的權利最終落入法國人之手。8月，一名葡萄牙特使出現在柏林，利奧波德有了最壞的預感。他馬上向布萊希羅德求助，要求后者提醒德國政府，只有他的剛果協會承諾貿易自由，而葡萄牙人會馬上征收高昂的關稅。因此，只有趕快承認利奧波德的統治才能避免麻煩。在俾斯麥和外交部的授意下，布萊希羅德沒有立刻平息利奧波德的擔心：

我被告知，葡萄牙人開出的條件非常優厚，他們只想設立幾項不高的關稅用于滿足行政開支。既然我有幸向陛下解釋此事，我認為必須讓協會及其可能的繼承者法國盡快做出自由貿易的保證。如果這樣做了，“我在這里的朋友們”將愿意提議召開國際會議，以確定新國家的邊界。 [[35]](#35_14)

整個8月，布萊希羅德都在為國王的事奔走。他多次與哈茨菲爾特商談，并于11日獲得威廉召見，他致信利奧波德說：“我沒有忘記提出陛下的觀點。” [[36]](#36_14)  當月晚些時候，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小隊親隨來到奧斯坦德的浴場大酒店。這類宮殿式酒店價格高昂，但可以讓新貴們感受老貴族的生活。28日，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女兒在王宮與國王共同進餐；席間，他們談論剛果的命運 [8](#8_29)  。

9月，利奧波德通過布萊希羅德交給俾斯麥一幅籌建中的國家的地圖，懇求獲得德國的承認，這會讓其他國家“亦步亦趨地”效仿 [[37]](#37_14)  。與此同時，葡萄牙特使回到柏林，利奧波德開始焦急地打聽消息 [[38]](#38_14)  。布萊希羅德第一個告訴他，俾斯麥已經決定承認新的國家（“承認聯盟毫無疑問”），但方式仍需與法國協商，特別是關于邊界。最終，他在10月6日來信表示：

我剛剛收到非常機密的消息，法國和德國在非洲問題上已經完全達成一致，在不久的將來，剛果問題將被提交給國際會議。這次會議幾乎肯定將在柏林召開，很可能就在下個月。 [[39]](#39_14)

布萊希羅德的消息是正確的，他的工作似乎已經完成。會議召開前一周，俾斯麥批準正式承認那個新國家。但法國仍然拒絕承認，利奧波德于是請求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求助：“我們希望與法國結盟，愿意為此做出犧牲。但您應該明白，我們不會自殺。法國無中生有地對史丹利湖（Stanley Pool） [9](#9_27)  左岸提出主張……”他認為那將威脅到對新國家最富有省份的開發。利奧波德聲稱，受到法國人威脅的那部分剛果土地本來也許可以補償協會的巨額開支。“親愛的男爵，您知道我在為大眾利益操勞，并不想收回個人的支出。但如果當聯盟建立各處基地后，法國人跑來說那是他們的，那么我的努力就不再是為了推進所有國家的利益，而只是滿足法國人的貪婪。” [[40]](#40_14)

會議持續三個月。布萊希羅德為與會者舉辦盛宴，向利奧波德的代表們“大獻殷勤” [[41]](#41_14)  。在各國的堅持下，會議確定了自由貿易和自由航行的國際原則。利奧波德和俾斯麥都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前者希望獲得國際承認，后者想要在非洲中部得到大片自由貿易區—或者不受阻礙地進入“德國的新印度”。比利時議會全然無所謂地批準利奧波德的擴張，此舉為1884年一家英國報紙所稱的“瓜分非洲”拉開序幕。一位最犀利的當代帝國主義史學家寫道：

歐洲人的傲慢時代在1885年的柏林剛果會議上達到華麗的頂峰，歐洲國家開始“瓜分非洲”，搶在其他國家之前將地圖上的每個白點涂上自己的顏色成了關乎國家聲望的問題……在這場競賽中，一切理性、經濟和人道主義動機僅僅成為借口，每個國家都為自己搶占大片未知的土地，但就像我們知道的，他們永遠無法真正組織、利用或把它變成殖民地。 [[42]](#42_14)

布萊希羅德幫助利奧波德實現野心。幾個月來，他安排非官方的談判，并私下探聽口風，這些是對布魯塞爾和柏林正式交流的必要補充。在布萊希羅德看來，剛果的未來就像利奧波德和德國宣傳者所描繪的那么美好樂觀嗎？記錄顯示，他的態度要謹慎得多。布萊希羅德從未興奮地與人談起過剛果問題。到了為計劃中的剛果鐵路籌資階段，他的角色顯得矜持或消極。（史丹利宣稱：“沒有鐵路，剛果將一文不值。”）在1884年9月的談話中，布萊希羅德給利奧波德留下這樣的印象，即他有意成立公司開發剛果，包括修建一條鐵路 [[43]](#43_14)  。利奧波德會不時談到那條鐵路，但布萊希羅德從不提及。這樣的沉默不是俾斯麥慣常的行事方式。如果對在剛果建造鐵路有一丁點興趣，他本可以利用自己極為有利的地位推進主張。但他等了五年才加入在剛果修建鐵路的國際財團，而且自己只投了很少的錢 [10](#10_27)  。

柏林會議結束后，剛果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但布萊希羅德和利奧波德仍然保持親密關系。事實上，利奧波德還有另一件事要求助于布萊希羅德。1885年3月，俾斯麥終于誘使頑固的帝國議會同意提供政府補助，開設一條前往遠東的班輪航線。北德意志—勞埃德公司（Norddeutsche Lloyd）將建造必需的船只和運營特定的航線。利奧波德多次請求布萊希羅德利用自己的“巨大影響”說服勞埃德和其他航運公司選擇安特衛普作為在歐洲大陸的主要港口。在從奧斯坦德給俾斯麥寫的信中，布萊希羅德表示，“我在這里多次與比利時國王交談”，國王對俾斯麥在剛果問題上的幫助表達“最誠摯的感謝”，現在他希望德國船只能使用安特衛普這個“對德國出口最重要的港口”，不然將被英國航運公司占得便宜。布萊希羅德的兒子格奧爾格（Georg）恰好是勞埃德公司的董事，布萊希羅德可以適時向國王和同樣執著的部長們進言說，勞埃德公司的船只應該停靠安特衛普 [[44]](#44_13)  。

利奧波德有充分理由感謝布萊希羅德“為我們的事慨然付出的全部辛勞……親愛的男爵，你對協會的支持非常寶貴。在表達我最強烈感激的同時，我請求您繼續關注我們的工作” [[45]](#45_13)  ……國王經常表達的強烈感激沒有被完全浪費。布萊希羅德向利奧波德提出的唯一請求被欣然接受：他希望鋼琴家朋友格羅澤夫人（Mme.Grosser）受邀到王宮舉辦獨奏會。柏林傳言說，吸引布萊希羅德的不僅是格羅澤夫人的音樂才能。當人們意識到這場特別演出多么大費周章時，傳言變得有點可信 [11](#11_27)  。國王的副官杜特爾蒙伯爵（Count D’Oultremont）親自為這位受到布萊希羅德青睞的女士提供關照，國王也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格羅澤夫人充滿魅力，她的演奏令人愉快……我樂意授予夫人她想要的頭銜，她愿意把這些話捎給您讓我很高興。” [[46]](#46_13)  這是對布萊希羅德勞動的友好回報，無論格羅澤夫人獲得什么頭銜，那都是利奧波德在剛果建立統治的最無害副產品之一 [12](#12_25)  。

當利奧波德鞏固自己在剛果的私人領地時，俾斯麥也讓世界大吃一驚，創造了一個相當于德意志帝國本土面積五倍的殖民帝國。1884—1885年，為了宣布德國的主權，德國國旗突然被插上廣袤的不毛之地，那里幾乎沒有德國利益，也很少有德國公民涉足。俾斯麥的同時代人對這種突然轉變疑惑不解，因為長久以來，他一直對帝國擴張表示冷漠。早在1868年，他就在寫給羅恩的信中表示，人們經常提到擁有殖民地的好處，但那只是幻覺，這樣的冒險應該由私人公司進行，不能讓納稅人來支持一項只會讓少數商人獲利的政策。普法戰爭期間，一些商人開始呼吁奪取包括西貢在內的法國殖民地。但俾斯麥認為：“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殖民地就像波蘭貴族的絲袍和貂裘，下面卻連襯衫也沒有。” [[47]](#47_13)  整個19世紀70年代，他始終持這種觀點，無論是出于戰略、政治還是經濟原因。薩摩亞提案標志著這種限制政策表面上第一次有所松動，盡管此舉似乎仍然符合他的觀點，即德國政府應該僅僅支持德國商人的行動，而不是走在他們前面。1884年，俾斯麥在非洲建立德國殖民地，他在兩年間獲得的土地遠遠超過不安分的威廉二世通過廣受吹捧的“世界政策”將要獲得的。到了1886年，俾斯麥再次表現出厭倦和冷漠，他的殖民階段結束了。

俾斯麥突然跨越原則和大洋，這讓同時代的人納悶，也讓后來的歷史學家們困惑。近年來，關于俾斯麥動機的討論變得日益激烈和有爭議。問題的關鍵仍然是他的決定背景：他主要考慮對外政策還是國內政策？如果是后者，他主要受到政治動機還是經濟動機驅使？他把殖民地看成歐洲棋盤上的卒子嗎？他的擴張行為是否意在反英，并打擊國內的親英（和反俾斯麥）勢力，比如皇太子和殘余的左翼自由派？他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工具嗎，就像某些東德史學家所聲稱的？或者影響他的是對政權經濟基礎的更深層次擔憂，因為1882年的新一輪蕭條再次構成威脅？或者說，促使他做出突破的是一系列動機的結合，就像亨利·特納 [13](#13_23)  所提出的常識性觀點？特納還指出當時普遍的“關門恐慌”（Torschlusspanik），“人們擔心大門正在迅速關閉，最后的機會就在眼前” [[48]](#48_13)  。

這場爭論超出本書的范圍。顯然，作為本書的關注點，布萊希羅德的角色不僅僅是略表興趣。作為俾斯麥在經濟問題中的主要顧問和許多事務中的親信，他是否強烈地支持過俾斯麥的想法？是否啟發或者說理解俾斯麥被公認的復雜經濟思想？布萊希羅德對殖民地誘惑的反應方式一定能為俾斯麥的政策提供某些線索。

此外，讀者必須牢記俾斯麥舉動的直接背景。俾斯麥的殖民政策在1884年達到頂峰，那年也是選舉年。連續的失敗惹惱他，這次他決心徹底擊敗左翼自由派，后者恰好支持自由貿易和反對殖民主義。同樣在那年，利奧波德試圖實現對剛果的主張，法國人卷入印度支那的糾紛，而英國人仍然忙于埃及。局面非常有利。

俾斯麥的第一次嘗試選擇當時仍然獨立的非洲西南沿岸。1882年，不萊梅的煙草商人魯德里茨（F.A.E.Lüderitz）試圖在那里建立貿易點，并尋求“德國旗幟的保護”。魯德里茨的要求不高，但對俾斯麥來說還是難以接受。1883年初，德國政府詢問倫敦是否對那些地區享有權力，如果那樣的話，德國“將很樂意看到英國將有效保護延伸到那里的德國定居者” [[49]](#49_13)  。英國人拖延幾個月；出于自滿和傲慢，他們的效率低得令人難以置信，外交部的格蘭維爾勛爵和殖民部的達比勛爵（Lord Derby）一定被當成俾斯麥帝國的守護圣人。一直對格萊斯頓心存懷疑的俾斯麥把拖延解讀為反德情感的證明，特別是因為英國人時而讓人難以捉摸，時而主張對整個南非實行英國式的門羅主義。1883年底到1884年4月，俾斯麥決心讓英國人面對既成事實；4月，他要求將魯德里茨的領地安格拉佩克尼亞（Angra Pequeña）置于帝國的保護下；等到英國人發現俾斯麥不再像過去常常聲稱的那樣不愿做殖民主義者時，為時已晚 [[50]](#50_13)  。當他們意識到占領埃及讓自己失去行動自由時，為時已晚。他們陷入兩難選擇，一邊是在埃及問題上尋求德國支持的需要，一邊是南非提出阻止德國人入侵的最后請求。一位南非代表團成員語出驚人地向索爾茲伯里勛爵呼吁：“我的老爺，我們被告知德國人是好鄰居，但我們更希望沒有鄰居。” [[51]](#51_13)  在波利尼西亞、非洲、中亞和美國西部，人們突然有了鄰居，整個世界陷入提早到來的幽閉恐懼。

1884年8月，德國國旗開始飄揚在安格拉佩克尼亞上空，朝著想象中的偉大邁出第一步，盡管當時的有識之士認為，非洲西南部甚至不適合用作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英國人接受無法阻止的事實；在官方宣布幾天前，安特希爾勛爵致信布萊希羅德：“殖民地問題以首相的勝利告終，如果可能的話，還會把他推上更高的神壇。” [[52]](#52_13)  隨后，借助以強烈的反英元素為首要成分的法德同盟，俾斯麥加快行動 [[53]](#53_12)  。當英國因為埃及和中亞而無暇旁騖后，憑借著歐洲大陸主要國家的外交支持或漠不關心，俾斯麥授權吞并更多土地（德屬東非、喀麥隆和多哥蘭［Togoland］）。

德國殖民主義無疑帶有反英元素，布萊希羅德經常感受到它的回響 [14](#14_23)  。眾所周知，明斯特伯爵反對德國擴張，他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比他的官方報告更加直言不諱。1884年10月，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在與俾斯麥見面后，他覺得首相“能正確理解德國的殖民狂熱，而許多著迷者卻對其一無所知”。1884年圣誕夜，明斯特抱怨自己不得不應付德國對英國潑的各種“臟水”（Pöbeleien）。而且這些臟水并無必要：他對布萊希羅德保證，英國人不反對德國的殖民主義，甚至將其視作對法國和美國的制衡。“要不是知道我們德國人是什么樣的理論販子和巧舌如簧的演說家，是什么樣的理想主義者（在遠離我們的地方），我將無法理解為何我們的殖民熱突然與狂熱的沙文主義混在一起。” [[54]](#54_12)   [15](#15_23)  令明斯特遺憾的事卻受到另一些人的歡迎，比如彼得·薩布羅夫就致信俾斯麥說：“我們祝賀貴國的新殖民政策取得成功。”—因為它具有反英性質 [[55]](#55_12)  。

布萊希羅德的多種利益讓他了解支持和反對擴張主義的理由。但后世的歷史學家只看到一個方面：“漢澤曼和布萊希羅德……在說服俾斯麥實行殖民政策的過程中扮演并非不重要的角色。”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更加言之鑿鑿，他問道：“希望將私人資本投資到海外謀利的人的利益和影響對［俾斯麥轉向殖民主義］產生重要影響嗎？答案是肯定的。作為俾斯麥的銀行家朋友，馮·漢澤曼和布萊希羅德對支持殖民政策施加巨大影響……”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把布萊希羅德視作帝國主義的主要操縱者之一，他們中的一位最近還給布萊希羅德貼上“支持殖民主義”（kolonialfreudig）的標簽 [[56]](#56_12)  。但他的確如此嗎，或者說這屬于歷史學家們在只有飄忽的證據支持固定設想時所做的假設？俾斯麥常常對德國資本的怯懦表達憤慨，指責德國人不愿投資海外冒險，布萊希羅德是否印證這種說法，或者正是他引發這種言論呢 [16](#16_23)  ？

在對德國擴張主義的任何描述中都可以看到布萊希羅德的名字和資本。甚至在德國殖民主義的宣傳籌備中也間接出現布萊希羅德的名字。1882年，德國殖民聯盟成立，口號是殖民地將提供廣闊的新市場。這在正遭受又一波嚴重商業緊縮的德國（盡管1879年實行新關稅）引發特別的共鳴 [[57]](#57_12)  。一些政論家以及幾位著名的民族自由黨和自由保守黨議員簽名支持聯盟的第一次請愿，比如與布萊希羅德關系密切的法恩布勒和弗里登塔爾。萊茵大實業家和民族自由黨議員弗里德里希·哈馬赫（Friedrich Hammacher）熱衷殖民主義，包括他在內的少數人希望海外擴張能緩解國內的社會緊張 [[58]](#58_12)  。但布萊希羅德沒有簽名。聯盟的大部分普通成員是相對無名的市民，一些名人也逐漸加入。1885年，聯盟在柏林開設分會。“來自實業、銀行、政界和學界的少數幾個名字代表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力量元素。” [[59]](#59_11)  在這些重要人物中，柏林的“大銀行”得到應有的代表，漢澤曼和代表布萊希羅德銀行的施瓦巴赫都名列其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布萊希羅德本人沒有參加—盡管他通常并不習慣置身事外或甘當背景。

1884年春，德國政府重新開始考慮之前提出的創立海外德國銀行的計劃，該行將為德國的出口提供便利，打破英國銀行對這個行當事實上的壟斷。1884年5月，帝國銀行行長戴程德和他的老朋友漢澤曼、布萊希羅德以及西門子 [17](#17_17)  等人進行商談。銀行家們對計劃感興趣，但想要政府也加入其中，并希望得到史無前例的特許權。俾斯麥感到失望，如果私人利益繼續表示反對，他準備在秋天考慮設立政府銀行。戴程德請求在與其他銀行家商談前先與布萊希羅德進行秘密會談。最終，由于銀行家們的謹慎和俾斯麥另有打算，計劃沒能實現 [[60]](#60_11)  。

在俾斯麥購買第一塊殖民地（安格拉佩克尼亞）的過程中再次出現布萊希羅德的名字。早在1884年6月，就有傳言說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買下了魯德里茨領地附近的某些所謂銅礦的所有權。領地獲得德國保護后，魯德里茨卻沒有錢維持他受人艷羨的領地，更別說發展了。1885年春，他威脅將自己的權益賣給英國人，這讓俾斯麥非常惱火。那將意味著德國的殖民活動迅速而羞恥地終結，也將刺痛新貴們自負的承諾。于是，施瓦巴赫、哈馬赫和漢澤曼軟硬兼施地迫使不情愿的魯德里茨把領地賣給他們為此成立的財團。1885年4月，又是在漢澤曼和布萊希羅德的牽頭下，德國西南非洲殖民公司（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für Südwestafrika）宣告成立，總資本為80萬馬克，其中20萬馬克由布萊希羅德署名提供。一位新公司的主要宣傳者聲稱，在這樣的“愛國責任”中，經濟考慮應該被放在一邊。出資者“在某種意義上做了犧牲” [[61]](#61_11)  。新公司的董事會包括哈馬赫、烏耶斯特伯爵（布萊希羅德在賠本買賣中的老合作者）、施瓦巴赫和格奧爾格·布萊希羅德 [[62]](#62_11)  。盡管事先獲得某些稅收優惠，公司仍然經歷多年的停滯和不賺錢 [[63]](#63_11)  。一位英國駐柏林大使館的官員回憶起布萊希羅德的反應：

如果把安格拉佩克尼亞作為在非洲建立第一個落腳點的嘗試，那么這次冒險沒能獲利。銀行家布萊希羅德后來承認他損失了1萬英鎊。魯德里茨發現那塊地方全無價值，不愿再砸下任何資本。首相獲悉此人考慮把那里賣給我們，他非常憤怒，因為那片定居點讓他花了不少力氣。于是，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出資維持那一小片殖民地的運營，避免俾斯麥淪為笑柄。 [[64]](#64_11)

與他家結姻的漢澤曼的傳記作者也遺憾地表示，漢澤曼拯救海外殖民地的愛國舉動直到他1903年去世后才開始盈利 [[65]](#65_11)  。

布萊希羅德學會躲避殖民主義的要求。俾斯麥曾支持過卡爾·彼得斯（Carl Peters）在東非建立德國殖民地的計劃，但希望不由德國政府而是由特許公司統治，效法經常被提到的東印度公司或北婆羅洲公司。德國東非公司應運而生，但從一開始，彼得斯的狂熱自大、工作能力差和長期缺乏資金就讓公司陷入困境。政府開始尋求幫助，但就像一位東歐史學家所說，“經驗豐富的金融資產階級強盜們”要求的保證超過政府或公司的承受能力。在威廉和萊茵蘭銀行家馮·德·海特的私人資金幫助下，該公司最終獲救，但與后世歷史學家的說法相反，布萊希羅德并未施以援手 [[66]](#66_10)  。到了1886年夏天，俾斯麥本人也覺得沒有必要再拯救東非公司：“他可以心平氣和地設想東非公司破產，不擔心我們的國家聲望將因此受損……對于我們的殖民政策，他仍然堅持遵循指導原則，但不會為德國開拓者鋪路。”東非公司能干什么呢？咖啡種植園似乎是唯一不會與德國國內產品競爭的可行活動。“但誰來喝種植面積可達3萬平方英里的全部咖啡呢？” [[67]](#67_10)  除了皇帝和海特，為該公司提供幫助的還有一些著名的猶太人或前猶太人銀行，如門德爾松—巴托爾迪銀行和羅伯特·瓦紹爾銀行等—當重組后的公司罷免壞脾氣的彼得斯時，他的偏執狂同事們開始憤恨地抱怨猶太人的陰謀 [[68]](#68_10)  。

一旦俾斯麥為殖民主義亮起綠燈，所有的探險家和潛在的利文斯通都試圖為自己建立小帝國。但殖民活動成本高昂，每次遠征都需要特別籌資。布萊希羅德經常收到這類愛國冒險的求助，但他學會說不 [[69]](#69_10)  。有時，他會提供一小筆啟動資金。比如，1884年他給鄧哈特（Denhardt）兄弟1000馬克，后者多年來一直在探索東非沿岸的維圖（Witu）周圍的土地。1885年12月，鄧哈特請求與布萊希羅德見面，好向后者報告為德國開設貿易區的進展，他稱其為“中部東非”，包括今天的肯尼亞。幾個月后，他再次寫信給布萊希羅德及其助手格洛納博士，請求額外資助。建立開發該地區的股份公司需要50萬馬克，他本人已經籌集一半，他想向布萊希羅德貸款至少5萬馬克，至多50萬馬克。如果沒有這筆貸款，他將不得不將相關業務出售給英國人，后者非常急于抓住這次機會。當然，那將令德國的外交部和殖民活動的參與者非常失望。無論是否屬實，貪婪英國人的幽靈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借口，非常類似近代的反共需要。鄧哈特問道，為什么德國資本寧愿支持非德國人的海外冒險，卻忽視德國企業家的要求呢 [[70]](#70_10)  ？最終，1887年12月，經驗豐富的“不成功殖民計劃專家”，霍亨洛厄—朗根堡家族的赫爾曼親王（Prince Hermann zu Hohenlohe-Langenburg）出手相助，組建維圖公司。布萊希羅德和其他幾位顯貴也象征性地貢獻資金，公司前十八個月運營的收入是4120馬克 [[71]](#71_10)  。

上述對布萊希羅德參與德國殖民活動的簡短描述足以證明，他從一開始就審慎介入建立海外德國殖民地的虧錢生意。從最初對薩摩亞的猶豫舉動到非洲的幾塊殖民地，總能看到布萊希羅德的身影。不僅如此，他還幫助建立19世紀80年代的最大殖民帝國：利奧波德的剛果。他向殖民活動提供自己的名字和才能，還一貫低調地提供自己的金錢。

為什么他要這樣做？按照許多著作的暗示或假設，最簡單的答案是他想要賺錢。認同這種說法是對布萊希羅德金融智慧的侮辱；1885年8月，當俾斯麥搞砸與西班牙人關于有望帶來豐厚回報的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的談判時，就連布萊希羅德的兒子漢斯也表示，把錢投入非洲是“胡鬧”，與太平洋正好相反 [[72]](#72_10)  。布萊希羅德可能相信殖民地的最終未來，相信它們將有潛力提供新市場或帶來豐富的礦藏資源嗎？他認可身邊的殖民狂熱者提出的任何標準的經濟理由嗎？證據顯示出他沒有。他似乎也不相信近來大受吹捧的社會帝國主義觀點，即19世紀80年代的激進分子應該已經意識到，德國的殖民主義可以“輸出”國內的社會問題，甚至可能將其扼殺。布萊希羅德無疑認同上層階級對各類革命者的恐懼，特別是對社會民主黨。不過，他關于如何對付革命者的想法遠比社會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原始：他基本上認為鎮壓就夠了 [18](#18_17)  。簡而言之，完全沒有證據顯示出布萊希羅德在任何時候接受過德國殖民主義的任何經濟或理念觀點。在他的書信中找不到任何這類情感的回響，沒有一封信表達殖民熱情。在他的通信者中，明斯特式的偏執比利奧波德式的自私熱情更典型。另一方面，布萊希羅德的行動雖然謹慎，但始終顯示出對殖民主義的適度支持。

為什么他要支持德國的殖民主義？首先，他也許對德國的擴張持有同俾斯麥類似的務實觀點。他幾乎肯定和俾斯麥一樣擔心，德國工業需要自由進入海外市場，但法國等保護主義勢力的侵擾將破壞這個目標。他也許還像俾斯麥和德國政府的其他成員那樣，對殖民地感到某種“關門恐慌”。如果有殖民賽跑的話，德國人必須“足夠強硬地”（man enough）參與和勝出 [19](#19_13)  ，必須搶在其他國家之前。布萊希羅德無疑相信，德國的海外利益值得保護，這從他在羅馬尼亞的漫長斗爭中可見一斑。此外，他從未低估國家聲望的重要性；銀行家們善于利用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們也許比大多數人更清楚聲望能反映和增強力量。他明白，殖民主義也許有助于俾斯麥在選舉年大力推行反自由主義路線。他本人對激進分子的看法或許比俾斯麥更復雜，但同樣不客氣。

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觀點可能存在模糊的共鳴。但更重要的是，布萊希羅德支持殖民主義的原因是俾斯麥和德國政府希望他這樣做，因為俾斯麥對德國商人在推動德國海外利益時的猶豫非常憤怒，不希望他的私人銀行家也讓自己失望。想要理解布萊希羅德為何支持殖民主義，也許應該先搞清楚如果他不那么做會發生什么：他本人或者殖民活動將會名譽掃地。有他參與的冒險受人尊敬，并獲得商業上可靠的光環。布萊希羅德明白，他的銀行參與與否將反映俾斯麥的意圖 [20](#20_13)  。簡而言之，布萊希羅德受制于自己的地位，如果想要保住在德國銀行家中的特殊地位，他就不得不支持政府。

這樣看來，霍布森關于猶太銀行家是帝國主義重要支持者的觀點有了新的解釋，至少適用于德國猶太人。他們的參與（在我看來，他們常常是不情愿的）也許源于他們特別難以承受的來自國家的任何壓力。他們總是特別樂意證明自己愛國，因此最難以質疑國家觀點。隨著19世紀80年代反猶主義在俾斯麥時代達到高峰，這種情況變得尤為突出。反諷的是，反猶主義在某些領域與殖民主義走到了一起。

因此，布萊希羅德的故事反映了俾斯麥經常被人遺忘的觀點，即德國銀行家過于謹慎，不愿冒險投資殖民活動。它還證明，俾斯麥不是貪婪的金融資本家的工具，銀行家們反而常常執行或預判俾斯麥的意志 [21](#21_13)  。如果德國殖民主義沒有在19世紀80年代興起，布萊希羅德或他的朋友們也不太可能發明它。

這種冷淡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熱衷于另一種形式的剝削：他們常常以苛刻的條件把錢借給欠發達國家，希望既能擴大商業機會，又能收獲比國內投資更高的利潤。俾斯麥被罷免約一個月后，布萊希羅德前往外交部拜會馬克斯·馮·貝謝姆（Max von Berchem），后者是俾斯麥后期商務政策的推動者。貝謝姆為新上任的外交國務秘書，概括這次談話：布萊希羅德表示，君士坦丁堡的德國債券持有者對他提出的新安排感到滿意，他希望當地的帝國使館能繼續支持他的銀行的利益。貝謝姆不置可否。然后，布萊希羅德又通報德國和意大利的金融集團已經達成協議，德國利益方將接管意大利人的某些運作。貝謝姆報告說：“按照最高指示，我趁機指出，陛下對［布萊希羅德］參與該協議的達成感到高興。”貝謝姆還表示，德國政府希望英國“大金融集團”也能加入那家意大利公司，盡管布萊希羅德認為，從純金融角度來看沒有必要。隨后的話題是奧地利的財政，特別是因為布萊希羅德剛剛帶著重要信息從維也納回來。接下來，布萊希羅德又談到俄國財政；為了購買一系列小型俄國鐵路，俄國財政部長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維什涅格拉茨基（Ivan Alekseyevich Vishnegradski）新發行3億馬克貸款。德國政府對這筆貸款有何看法？貝謝姆認為，柏林持有的俄國債券已經減少到之前的三分之一，不應該再次增加。雖然布萊希羅德回應稱，維什涅格拉茨基的經濟狀況很好，但貝謝姆反駁說：“波斯國王的狀況也很好，因為他像維什涅格拉茨基先生一樣不關心自己國家的物質利益。” [[73]](#73_10)

這是關于布萊希羅德當時感興趣的一番常規談話，內容包含整個世界，盤點涉及與土耳其、奧匈帝國、意大利、英國和俄國的政治經濟關系。有時，布萊希羅德也會和貝謝姆或卡普里維討論他和德國政府感興趣的其他地區，如東歐國家、埃及、墨西哥、中國和美國。由于布萊希羅德和帝國政府的興趣遍及世界，他們保持著最親密和互利的接觸，就像在俾斯麥時代那樣 [22](#22_13)  。

經常有人表示，比起包括管理和保護殖民地的正式帝國主義，非正式帝國主義的回報要高得多，風險則低得多 [[74]](#74_10)  。如果“帝國主義”一詞被擴展到用來表示某個國家或國際集團對另一國的財政政策的控制，那么布萊希羅德無疑參與了帝國冒險。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他變化不定的興趣：從一開始，他的銀行和歐洲的其他許多商業銀行家就專門為政府運作貸款。進入19世紀后，大多數發達國家逐漸可以通過稅收或發行只需銀行家提供例行服務的貸款籌集到足夠的錢。于是，這些銀行家開始轉向還沒有足夠現代化的國家，如奧斯曼帝國這樣的老朽帝國或者它名義上的屬國埃及，或者像俄國這樣處于現代化過程中但仍然落后的國家，或者像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這樣的新國家。金融獨立需要一定水平的金融知識，需要合理的管理結構和總體上誠實的官僚體系，還需要對政體的政黨達成些許共識。如果沒有這些先決條件，政府經常將被迫依賴外國銀行家籌集初級運作所必需的資金。國家越不發達或越動蕩，風險就越高，需要用更高的收費和更苛刻的條件來補償，可能的收益與安全成反比。同樣需要的還有更好的判斷，指導何時和以什么價格發行貸款。在與外國政府打交道方面—本國政府也總是對此感興趣—布萊希羅德成了國際認可的權威。他無疑屬于“國際大銀行家”群體（霍布森所說的惡棍），他們一直明白，繁榮而獨立的國家是最好的客戶 [[75]](#75_10)  。

沒有必要回顧布萊希羅德的每次外國冒險，舉幾個典型的例子就夠了。他很早就卷入奧斯曼帝國不幸的財政。從1854年到1875年，奧斯曼政府共借了2億英鎊的外債，新貸款被用來償還先前的貸款和滿足奢侈生活：據估計，只有不到10%的貸款“被用于增強該國的經濟實力” [[76]](#76_10)  。歐洲病夫也是個窮人。1875年，奧斯曼政府將現有債務的利率減半，一年后完全停止付息。巴爾干叛亂和俄土戰爭完成了剩下的工作，甚至最強硬的歐洲債主（貪婪讓他們變得容易受騙）也開始絕望。在柏林會議和最迫切必要的驅使下，土耳其政府于1881年頒布了著名的《穆哈蘭姆月法令》（Decree of Mouharrem），重組整個債務結構，并第一次允許歐洲人控制帝國的部分收入。名為奧斯曼公共債務管理局的機構應運而生，該機構由七名成員組成，代表國內外的主要債券持有人。在德國外交部的幫助下，布萊希羅德銀行獲得任命德國代表的權力，因此布萊希羅德的話對博斯普魯斯海峽具有一定的分量 [[77]](#77_10)  。

柏林大會后，特別是英國占領土耳其的埃及行省后，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蘇丹成了堅定的親德派，而俾斯麥雖然一直害怕德國被卷入近東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但隨著對俄國的敵意更加擔憂，他也相應地緩和對土耳其的態度。于是，他允許幾位俄國士兵向遭受重創的土軍提供建議，支持德國擴大在當地的經濟活動，并歡迎布萊希羅德對土耳其財政時刻關注 [[78]](#78_10)  。布萊希羅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代表是商務顧問普利姆克（Primker），此人曾為德國政府擔任法律顧問。

布萊希羅德對土耳其的胃口大起來。1882年，作為公共債務局的成員，他受到無所不在的希爾施男爵啟發，試圖會同一個奧地利財團修建一條連接土耳其和奧匈帝國的鐵路。布萊希羅德顯然希望俾斯麥為這次冒險提供特殊保護，于是請求哈茨菲爾特和拉多維茨為自己向俾斯麥說情，但后者拒絕一切保護。俾斯麥告訴對該項目感興趣的奧地利政府，他必須“對奧地利人的通信中提到的談判極其小心，因為談判中有他的銀行家的名字，因為親身經驗不幸地告訴他，丑聞散布者多么樂意利用這樣的機會”。事實上，一家德國報紙已經譴責“某個特別種族的特別成員”在搞金融陰謀，假借德國的庇護剝削土耳其 [[79]](#79_10)  。

1883年，公共債務局將土耳其煙草收入的管理權出租給一家新的公司，簡稱“專賣公司”（Regie），由布萊希羅德銀行、羅斯柴爾德所有的維也納信貸公司和奧斯曼帝國銀行組成。專賣公司每年必須支付75萬土耳其鎊的租金，并在收入超過支出8%以上時分享利潤 [[80]](#80_10)  。德國官場祝賀布萊希羅德的這次運作取得成功，并紛紛向他提出專賣公司的管理者人選。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拉多維茨（也是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和客戶）敦促他不要任命某位泰斯塔先生（Mr.Testa），此人與德國大使館關系密切，不宜擔任此職。“必要的工具應該保持純潔，好讓它們不失鋒芒。鑒于您比任何人都更尊重政治工作，我確信您將認同這點的重要性。”經過大量書信往來，布萊希羅德接受拉多維茨提出的人選巴爾塔齊（Baltazzi） [[81]](#81_10)  。

但布萊希羅德對奧斯曼帝國的興趣不僅是扮演遙控的財政總督；他在希爾施龐大的土耳其鐵路網絡中擁有一筆不算大的股份，價值約為150萬馬克。1886年冬，希爾施決定出售自己的巨大戰略性資產。布萊希羅德可能第一個提醒俾斯麥和德國外交部注意這筆極其復雜的意向交易。1886年11月，拉多維茨對布萊希羅德承諾：“如果他問我，我將總是愿意支持你在這里代表捍衛德國資本的利益。”他還表示：“對于總體的政治前景，特別是東方事務，在貝倫街的你無疑要比在金角灣的我理解得更好。” [[82]](#82_10)

不過，即使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有時也難以理解東方的糾葛。把鐵路賣給財團前，希爾施必須與蘇丹完成財務清算。布萊希羅德在寫給俾斯麥的私信中表示：“盡快完成清算對于德國利益同樣具有最深遠的意義，最好與土耳其政府直接達成協議，因為仲裁程序肯定會造成拖延。” [[83]](#83_10)

歐洲各國政府同樣有理由擔憂可能的買主；最初的傳言是俄國人將買下它，但通過在圣彼得堡的朋友薩克，布萊希羅德獲悉真相。經常從布萊希羅德那里獲得消息的奧地利外交部長非常希望阻止法國對土耳其政府施加更大影響，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同樣支持德國涉足當地，因為這必將激起俄德對立。這筆交易涉及很高的經濟賭注：據估計，通過二十多年來修建的東方鐵路，希爾施的總收益達到可觀的大約1.5億法郎，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東歐猶太人的慈善項目。希爾施以一己之力扮演土耳其財富的再分配者 [[84]](#84_10)  。政治賭注同樣很高：大國們對土耳其的財富擁有戰略利益。如果新流入的資本讓此前置身事外的國家登上舞臺（比如德國），那么政治平衡也會受到影響。俾斯麥不愿因為巨大金融利益的突然闖入危及他在政治上的超然，特別是因為他認為土耳其財政岌岌可危。

1888年2月，施瓦巴赫向外交部保證，希爾施將不會在柏林找到任何可能的買主；人們對土耳其的償債能力沒什么信心，事實上，布萊希羅德還試圖擺脫他持有的相對較小的投資 [[85]](#85_10)  。兩個月后，德意志銀行的格奧爾格·馮·西門子通知外交部，表示他對希爾施的股份感興趣，因為這樣的安排將避免德國資本流入更不安全的地方（俾斯麥在這里打了問號），并阻止法國利益的擴大。不過，“只有帝國政府不從政治角度提出反對”，他才愿意與希爾施進行談判。盡管俾斯麥把法國人的進入看作加劇英法對立的途徑（“英國人的反法興趣對我們有利”），他還是正式批準西門子的計劃，并承諾提供外交支持。但他警告說，不要以為德國政府會在未來中東的任何糾紛中保護投資者 [[86]](#86_10)  。

這是德國決定性地進入奧斯曼帝國的開始信號，西門子和德意志銀行為其提供保護。俾斯麥建議讓英國或法國人也參與進來，而奧地利外交部長卡爾諾基（Kálnoky）則哀嘆“奧地利和德國的金融家一個比一個怯懦” [[87]](#87_9)  。在卡爾諾基的抱怨基礎上，布萊希羅德進一步指責銀行家們不夠愛國，特別是對土耳其業務不太感興趣的奧地利羅斯柴爾德家族。1888年秋天，布萊希羅德從奧斯坦德致信俾斯麥，告知多位金融家正在那里“商談修建亞洲鐵路。如果德國參加的話，那么德國工業應該通過提供鐵路材料和鐵軌獲利” [[88]](#88_9)  。如果德國工業盈利，那么在其中擁有利益的布萊希羅德也會獲利。在外國冒險中，銀行和工業經常具有共同利益，這種聯系是所謂的金融資本或金融帝國主義的核心。

1888—1889年，德意志銀行大舉進入：它首先為蘇丹提供一筆貸款（英法主導的奧斯曼帝國銀行拒絕提供），然后接管和大大擴張希爾施公司的規模，并朝著柏林至巴格達鐵路邁出決定性的第一步。

布萊希羅德扮演先驅者角色，盡管并不顯眼。在土耳其還很少有德國投資的時候，他是監督土耳其財政的國際機構中的重要德方代表 [[89]](#89_9)  。在煙草專賣公司，他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并無疑獲利頗豐—盡管參與土耳其財政也導致他被卷入一起累人的訴訟：德國的債券持有人泡姆加藤伯爵夫人（Countess Paumgarten）起訴布萊希羅德對股東的利益管理不當。案件經過多次審理，直到布萊希羅德死后才判決他勝訴 [[90]](#90_9)  。新的安納托利亞鐵路的修建由工程師奧托·卡普（Otto Kapp）監督，此人最初是在布萊希羅德的請求下開始關注土耳其鐵路的 [[91]](#91_9)  。

介入土耳其事務也讓布萊希羅德可以向朋友們提供照顧。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任代表是魯道夫·林道，此人在俾斯麥下臺后失去工作而且不被賞識。他對布萊希羅德保證：“我從未忘記是您的友誼讓這成為可能。” [[92]](#92_9)

當布萊希羅德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有了一定的根基和權力時，他更有冒險精神的西歐同行們則撲向埃及。從19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埃及就像是吸引冒險家的磁石：資源匱乏但充滿夢想的埃及渴望現代化，它的統治者伊斯梅爾總督（Khedive Ismail）試圖讓國家和自己富起來。受人尊敬的銀行家和商人紛至沓來，投機者和股票經紀人也隨后到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像禿鷲般蜂擁撲向債務纏身的埃及。埃及不止是糟糕財政管理的奇葩，不僅有總督的習慣性破產—歐洲銀行家們總是利用這點，試圖從埃及的混亂中擠出最后一點可能的利潤，就像總督剝削和驅使他挨餓的臣民那樣，埃及也是一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國家。拿破侖讓這種意義戲劇化，而在他侄子的統治下，德·雷賽布修建的蘇伊士運河增強了那種戰略地位，并使其變得無法回避。

法國、英國的領導人把埃及視作他們帝國的有缺陷基石，或者就像俾斯麥曾經在談到英國時所說的：“埃及就像帝國的脊索，連接著脊椎骨和大腦。” [[93]](#93_9)  除了政客，銀行家和數以千計的債券持有人同樣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懷有強烈的興趣。從1875年迪斯累利買下蘇伊士運河的股份到1878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的第一筆貸款，到1880年總督下臺，到1882年英國占領埃及（布萊希羅德的對頭格萊斯頓不情愿地做出這個決定），再到以后的幾十年間，那個國家一直被困于歐洲政治和金融的漩渦中。在令人沮喪的依賴狀況下，它令自己感到害怕，對其他國家則是昂貴的誘惑，這幕景象讓高尚者學會刻薄，讓刻薄者變得絕望和殘忍 [23](#23_13)   [[94]](#94_8)  。

布萊希羅德通過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德國官員們的通信關注著埃及事務，大多出于一個嗅到不確定收益的銀行家的視角。1882年6月，當民族主義叛亂讓開羅陷入混亂并可能導致英法干預后，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報告說，“恐慌”襲擊倫敦和巴黎的股價，由于沒有別的政治事件發生，這一定是由于英法在埃及的數以百萬計資本受到威脅 [[95]](#95_7)  。德國在埃及的經濟利益微不足道 [24](#24_11)  。就像蘭格 [25](#25_11)  所說：“巴黎和倫敦的猶太人大銀行—如羅斯柴爾德家族、弗魯林家族（Frühlings）、奧本海姆家族和畢肖夫斯海姆（Bischoffsheim）—都以高貼現率發行貸款，并收取高額傭金。” [[96]](#96_7)  無論如何，在被英國人占領時，埃及的公共債務已經升至近1億英鎊，每年的利息支出達500萬英鎊，而政府的總年收入只有1000萬英鎊 [[97]](#97_7)  。布萊希羅德也許擁有附帶利益，但重要性微不足道。不清楚他是否像銀行家同行們一樣普遍保持謹慎，還是曾有意獲得更大份額，只是沒能成功。

1882年英國人占領埃及后，情況有了變化；英國總領事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后來的第一代克羅默勛爵［Lord Cromer］）對埃及實現有效控制，在處理如何既滿足歐洲債券持有人的利益又不導致埃及經濟完全癱瘓的緊要問題時，他得到26歲的專家埃德加·文森特（Edgar Vincent）的幫助。后者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英國駐柏林大使，獲得“德國護國公”的綽號 [[98]](#98_6)  。在法國人的主導下，債務局想要收回某些埃及官員可能借過的每一個蘇，即使他們常常沒有收到錢；而英國人則認為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最低限度上穩定和能夠運行的國家。俾斯麥也會間歇性地介入，主要是為了讓英國人感到（和反感）他們有賴他的好意。經過三年的占領，英國人邁出拯救埃及債務的第一步，他們安排了940萬英鎊的新貸款，利率為3%（即便是十年前，30%的利率也不算罕見），并得到債務局六國代表的擔保—為此，德國和俄國也被吸納為成員。

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提出他本人對貸款條件的建議；他推薦3.5%的利率，但遭到外交部的反對。最重要的是，布萊希羅德銀行被指定為1885年新貸款（第一筆真正受到信賴的貸款）的唯一支付代理 [[99]](#99_6)  。就埃及債券而言，布萊希羅德為自己在德國贏得獨一無二的地位—但他馬上希望獲得更多。在此過程中，他越過自己的底線。1886年3月，他向俾斯麥遞交正式請求，希望后者授意開羅債務局的德國代表，讓布萊希羅德銀行也被指定為過去發行的所謂統一和優先埃及債券的支付代理。布萊希羅德聲稱，新的3%利率的貸款引發德國資本家對埃及債券的興趣，但必須通過把票據提交給巴黎或倫敦的指定銀行來將對他們造成不便。在之前與俾斯麥一次談話的鼓勵下，布萊希羅德一改平日的謹慎，直接與德國代表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Richthofen）接洽。里希特霍芬表示，他需要俾斯麥對此的特別授權，盡管埃及官方很樂意接受布萊希羅德的方案。與此同時，俾斯麥也咨詢了財政部長阿道夫·馮·朔爾茨，但后者反對布萊希羅德的請求：“讓德國資本市場輕易獲得埃及債券對我們的狀況沒有好處。”不僅不應該加大對埃及資產的投入，從而導致增加政治負擔——

政府還必須拒絕支持國內資本在國外尋求更高利率的任何舉動，特別是當這類票據的信用可疑，就像眼前的埃及債券，損失資本或利息的危險很大。我認為，還有必要盡可能地把國內資本留給國內用途和企業，在發生不測時也能用于我們自己的國家信貸。少數個人銀行家的經濟利益很難比得上這些重要考慮。

如果有人向他征詢意見，朔爾茨本來還會反對在柏林設立新貸款的代理機構 [[100]](#100_6)  。布萊希羅德的做法和請求內容觸怒德國政府的多個部門；樞密顧問馮·布勞爾代表俾斯麥正式指責布萊希羅德，并告訴開羅，布萊希羅德因為“行為不端”受到訓誡 [[101]](#101_6)  。

布萊希羅德對這類指責已經不太習慣，他深感懊悔，但也非常執拗。他用最浮夸的口氣給俾斯麥寫信，并在信的最后表示，如果完全把事情澄清，“我相信閣下不會對我的行為那么嚴厲，我也不會因為被回絕而那么痛苦”。他曾試圖通過在埃及的一位共同的熟人間接接洽里希特霍芬，從未想過干涉官方事務。他希望這番簡短的解釋能讓俾斯麥“息怒” [[102]](#102_6)  。也許下屬們夸大了俾斯麥的憤怒，他們總是嫉妒布萊希羅德。俾斯麥比大多數人更能理解利益的誘惑。

不過，這對布萊希羅德來說仍然是尷尬的挫折。尷尬發生時，他的兒子漢斯碰巧（更可能是有意的）在開羅，后者前往那里的理由可能不僅是旅游。其他德國銀行也在推行類似的計劃，包括漢堡的貝倫家族（Behrens）。但蓋爾森不得不暫緩自己的行動。8月，他直接向埃及政府提出請求。1886年10月，他又給俾斯麥寫了八頁長的信。這次，他給出更加有力的理由：在此期間，即使沒有德國的支付代理人，即使必須“痛苦地”在巴黎或倫敦兌現全部票據，埃及債券仍然變得極為流行。布萊希羅德還表示，埃及政府支持設立德國代理機構，除了為投資者提供方便，它認為這樣的機構也許還能終結法國和英國在清算德國與埃及貿易時的中間角色。“我希望閣下不再反對埃及政府的努力，在這樣的動議被提交給債務局時馬上授權德國代表批準它，這更多并非為了增加［我的］利益，那實在算不上什么，而主要是為了德國資本的利益，讓它享有和英法資本家同樣的優勢。” [[103]](#103_6)  這次，外交部的專家們支持布萊希羅德的請求，盡管可能出于他們自己的理由。布勞爾回復俾斯麥說，鑒于德國資本家傾向于在國外尋求更高利率，最好把這些資本導入國際市場，而不是讓東歐債券進一步增加。投資于俄國債券的金額已經“驚人”。俾斯麥也反對投資巴爾干，他授意外交部將新政策通知財政部長朔爾茨，并授權開羅的里希特霍芬做好必要安排 [[104]](#104_6)  。

朔爾茨沒有被征詢意見，只是被告知俾斯麥已經改變主意，因為分化海外的德國資本將把政治困難降到最低：“除了數十億俄國債券，德國市場上的奧地利、塞爾維亞和土耳其債券也已經到了令人擔心的規模。” [[105]](#105_6)  俾斯麥原則上同意布萊希羅德的請求，但具體方式還有待在開羅做出，并需要經過開羅和柏林的協商。布萊希羅德提交的建議不僅將讓他獲得債務局向倫敦和巴黎銀行支付的1%傭金的八分之一和開支，他還希望通過按照法郎對英鎊的固定匯率賺錢，這將讓他按照更優惠的每日匯率獲得更高的收入。又經過幾個月的角力，柏林獲得英國政府和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許可，布萊希羅德終于被任命為早前貸款的支付代理人，但他必須按照每日匯率支付給德國債券持有人。支付代理人的主要和可觀的利潤源于這樣的事實：將要支付給債券持有人的錢被存在布萊希羅德的銀行，他可以在收款人和付款日之間利用這筆錢，即使只有幾天；巨大的金額足以使其成為可觀的業務。到了1887年3月，布萊希羅德在埃及債券中大大提升的角色正式獲得承認 [[106]](#106_6)  。

布萊希羅德的成功與其說得益于俾斯麥的關照，不如說要歸功于后者外交政策的逐步轉型。到了1886年，他試圖在埃及事務上稍稍變得親英，部分原因是法俄和解的初步跡象讓他不安。他還試圖阻止德國資本流入俄國。出于上述原因，他支持布萊希羅德擴大在埃及的角色—他的支持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1889年，他本人也投資了將近15萬馬克的利率4%的埃及債券 [[107]](#107_6)  。

布萊希羅德的成功很快帶來更多苦惱。1888年，新的危機爆發，起因顯然是新發行的貸款：布萊希羅德在柏林的朋友和偶爾的對手阿道夫·馮·漢澤曼入侵他的地盤。布萊希羅德陷入史無前例的恐慌，他給自己的客戶和德國駐倫敦大使哈茨菲爾特寫了兩封信，請求他在埃及事務中提供幫助。哈茨菲爾特應該提醒與漢澤曼合作的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高估了漢澤曼與德國外交部的關系，而布萊希羅德本人與俾斯麥的關系重要得多。布萊希羅德對自己在埃及的地位感到擔心，此事“對他的銀行至關重要”；他甚至不加掩飾地承諾讓債務纏身的哈茨菲爾特全面參與埃及貸款，并在墨西哥冒險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這是留存下來的布萊希羅德商務信件中最急迫的求救信號 [[108]](#108_6)  。最終，他的努力獲得成功，保住獨一無二的地位。

布萊希羅德在埃及事務上表現出不尋常的執著，為了捍衛自己的地位不惜對最親密的政治和金融盟友采取不尋常的嚴厲手段，這暗示他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成為可怕的對手。他在埃及的固執與他在德國自己的殖民地的謹慎舉動形成鮮明的反差。埃及業務屬于他的特別領域：為政府貸款服務。他獲得的利潤—1%傭金的八分之一和所存資金的利息—不可能很高，但他的許多業務都建立在這樣的可靠收入之上，來自每周數以百計的貸款。從他向哈茨菲爾特的請求來看，他真正擔心的是自己在銀行界的地位。在這點上，銀行業和政治相類似：威望和權力（或收益）不可分割，銀行家之間的同盟可以很容易變成對立，就像國家間的同盟那樣。對于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而言，永遠的懷疑是權力的代價，盡管兩人處于不同層面 [26](#26_9)  。

1886—1887年，俾斯麥希望德國的對外投資不再壓倒性地集中在東歐，這同時反映了短期政治考慮和長期商業現實。德國的對外貿易絕大部分位于歐洲的保護主義市場；如果想在高度競爭的新市場發展貿易，德國資本和銀行設施的先行進入將帶來便利。一位英國史學家最近指出，1914年前，“德國只在四塊地理區域有可能通過競爭勝出—近東和中東（特別是小亞細亞、黎凡特和波斯灣）、赤道非洲、中南美洲、中國和遠東。在所有這些地區，它都面臨著激烈的挑戰，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間進展甚微” [[109]](#109_6)  。

布萊希羅德對德國的影響力進入這些地區做出貢獻。他在中東扮演開拓者的角色。1888年，布萊希羅德讓德國的影響力進入另一個國家：在墨西哥政府迫切需要歐洲幫助的時候，他為其組織巨額國際貸款。墨西哥的需求很大，但歐洲人興趣寥寥；德國駐墨西哥大使認為，墨西哥政治健康發展的唯一保證是總統波費里奧·迪亞茲（Porfirio Díaz），其他跡象都不樂觀。由于所有人的懷疑，布萊希羅德可以為自己的財團（包括幾位英國銀行家）要求格外有利的條件。這些銀行將為墨西哥政府提供105萬英鎊，關稅收入的23.5%將作為擔保，利率被定為6%，銀行家將得到1.25%的開支補貼和0.25%的貸款服務傭金，發行價將是票面價格的70%。此外，協議還包含一個秘密條款：布萊希羅德將獲得未來所有墨西哥貸款的期權。債券被超額申購二十倍：“債券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參與交易的銀行家們的顯赫地位。” [[110]](#110_6)

布萊希羅德試圖確立自己在墨西哥的壟斷地位，就像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西所做的—至少德國駐墨西哥大使如是向俾斯麥報告 [[111]](#111_6)  。一年后，新的墨西哥貸款引發激烈競爭，布萊希羅德最終勝出—他利用了各種手段，甚至有傳言說，他向墨西哥財政部長提供了30萬英鎊的秘密“傭金” [[112]](#112_6)  。布萊希羅德大費周章地保持在墨西哥的地位，但逐漸被他的繼承者們丟失。他第一次涉足墨西哥事務時正值美國、英國和德國商業利益競爭加劇；德國貿易繼續落后于其他兩國，但若非布萊希羅德的舉動，情況還會更糟。這個十年通常被稱為“布萊希羅德時代”，德國對墨西哥出口增長四倍。當然，布萊希羅德扮演間接角色，正如他送給墨西哥政府的兩支克虜伯槍所象征的。此舉是為了向政府和克虜伯公司示好，他曾為雙方籌資，還支持它們在其他地方尋找新的市場 [[113]](#113_6)  。

布萊希羅德在墨西哥冒險中下了大賭注，并鼓勵其他人效仿。這對他是一項利潤極其豐厚的買賣。俾斯麥追隨他投資墨西哥債券，就像之前投資埃及債券那樣。但布萊希羅德還計劃讓廣大公眾相信墨西哥的前景遠大而美好；就像我們看到的，他資助友人保羅·林道的美國和墨西哥之行，后者承諾對墨西哥進行“引人入勝的描繪”。布萊希羅德死后，墨西哥冒險變得更加艱難，施瓦巴赫與厄內斯特·卡塞爾爵士（Sir Ernest Cassel，愛德華七世國王的銀行家）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爭執 [[114]](#114_6)  。

俾斯麥的大膽商業想象和德國資本家的謹小慎微形成鮮明反差，這個特點也體現在德國與中國的關系上。德國人的第一次中國考察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俾斯麥上臺伊始，船上搭載著一批當時無籍籍名但后來事業輝煌的年輕人，比如后來成為布萊希羅德朋友的拉多維茨和馬克斯·馮·勃蘭特。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提高了對中國的興趣；他同樣認為中國市場在向自己招手，德國供應商應該滿足中國人對鐵路和武器的需求，而英國和美國在當地的利益也在與德國爭奪先機。

19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的柏林大銀行家們組建了非正式的“中國研究組”，并派代表團前往中國考察和爭取機會。漢澤曼也試圖與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達成獨立協議—漢澤曼與他們的親密關系讓布萊希羅德感到威脅 [[115]](#115_6)  。1886年，施瓦巴赫給德國駐華公使馬克斯·馮·勃蘭特寫了“非正式”書信，表示布萊希羅德銀行愿意為所有的金融交易和鐵路建設提供服務。他提醒勃蘭特，布萊希羅德與勞拉舍冶金廠和大輪船公司北德意志—勞埃德有聯系，因此在滿足中國的需求上至少能做得像任何德國競爭者一樣好 [[116]](#116_6)  。如果勃蘭特向有關部門談起過此事，他應該已遭到冷遇。無論如何，什么都沒有發生。

俾斯麥一直希望設立德國海外銀行，好讓德國商人不必總是通過倫敦和巴黎的銀行結算賬戶，因為那樣做費時費錢。這個想法在1881年被首次提出，五年后，當許多德國政論家呼喚“德國的香港”時，他再次試圖推動德國銀行家們設立這樣的機構。

布萊希羅德在此事中的獨特角色此前一直被忽視。1887年9月，他向俾斯麥報告說，討論該計劃的銀行家們陷入絕望的內部爭執：“由于符合德國的經濟利益，我知道閣下很支持成立德中銀行，因此我斗膽提議……最好通過會議推行該計劃，會議應由海貿銀行主管以及屬于著名的海貿銀行財團的各銀行主管和各位銀行家召集。”海貿銀行主管埃米爾·馮·布夏德（Emil von Burchard）心存疑慮。他認為，布萊希羅德的提議聽上去“無害”，但會讓整個計劃帶有政府色彩。布夏德察覺到銀行家尋求國家支持時的慣常手法—他為此拒絕提議，指出銀行家們沒能達成協議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他們內部的矛盾。在私下談話中，施瓦巴赫證實布夏德的懷疑：布萊希羅德、貼現公司和德意志銀行沒有達成協議是“因為激烈的外國競爭（特別是美國），因為中國業務總體上不夠安全和可靠”，也因為他們之間對于銀行的規模存在分歧。然后，施瓦巴赫告訴布夏德，布萊希羅德的提議的確是為了“改變該計劃的基礎，通過政府資金的加入使其獲得重生，因為完全私人的形式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最終，俾斯麥命令很不情愿的財政部長阿道夫·馮·朔爾茨授意布夏德召集這樣的會議 [[117]](#117_6)  。

不到兩個月后，俾斯麥接受布萊希羅德的提議，盡管遭到部長們的一些反對。但參與者的極度不情愿—主要成員包括漢澤曼、布萊希羅德和德意志銀行的瓦里希—導致談判又持續了十五個月。漢澤曼曾對外交部解釋說，在這類計劃上“我們［過于］保守了”，而布萊希羅德也堅稱他在歐洲的投入已經太多。1889年2月，當俾斯麥再次表達“濃厚的興趣”和愿意“為該計劃的進展進行更多斡旋”后，德國亞洲銀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終于成立。貼現公司認購最多股份，然后是布萊希羅德、德意志銀行和有海外利益的大部分德國銀行，海貿銀行也被說服認購象征性的股份 [[118]](#118_6)  。

布萊希羅德再次正確估計德國銀行家的極度謹慎—他本人無疑也對其做出貢獻。新銀行的前幾年令人失望，似乎印證創始人的觀點，即整個計劃只是為了“向帝國政府示好”（勃蘭特對他們情感的輕蔑解讀）。對布萊希羅德來說，為德國海外擴張所做的這次特別努力產生令人不快的余波。一位在中國的德國商人卡爾·帕什（Carl Paasch）與他昔日的朋友勃蘭特鬧翻。回到德國后，他出版惡毒的小冊子，譴責勃蘭特與商人的親密關系，并污蔑布萊希羅德對外交部施加邪惡的影響。這次偏執的攻擊導致勃蘭特提前離任駐華大使（后來他又回到北京，擔任德國亞洲銀行的主管），也讓布萊希羅德晚年更加痛苦 [[119]](#119_6)  。

鑒于德國資本輸出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俾斯麥一直對此懷有強烈興趣。有時，這兩種興趣會產生矛盾：出于經濟和商業理由，俾斯麥希望鼓勵德國的對外投資轉向，以便同時為德國貿易打開新市場，在某些對外投資上尤其如此。但政治考慮要求繼續對德國的盟友提供金融支持，并阻撓可能的敵人，特別是俄國。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俾斯麥的外交遭遇越來越多的困難，“高級政治”和“高級金融”間永遠存在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大國的政客們（特別是德國和法國）越來越多地試圖讓銀行家成為他們外交政策的附屬代理 [[120]](#120_6)  。只要舉幾個布萊希羅德經歷中的例子就夠了。

1879年，奧匈帝國成了德國的首要盟友。布萊希羅德并不很看好這個二元帝國的財政，但早在結盟前就對其很感興趣 [[121]](#121_6)  。1879年后，他和漢澤曼為奧地利政府提供出色的服務，將大量德國資本導入帝國。1881年，他們完成最了不起的工作，成功地把價值4億、利息為6%的匈牙利國債轉換成價值5.45億、利息為4%的貸款—此舉顯然對匈牙利的經濟和聲望大有幫助。作為獎賞，漢澤曼于1880年被任命為奧地利駐柏林總領事。通過為二元帝國的服務，兩人都名利雙收 [[122]](#122_6)  。

但布萊希羅德也知道如何以消極和安全的方式滿足俾斯麥的愿望：他拒絕巴爾干利益的誘惑，讓對手們完成誘人的交易（很快被證明失敗）。塞爾維亞是焦點案例。自從1878年獲得獨立，塞爾維亞一直依賴外國投資。法國人幾乎從一開始就占據主導，主要通過邦圖著名的聯合總銀行。保羅—歐仁·邦圖（Paul-Eugène Bontoux）出道于維也納羅斯柴爾德家族，后來成為其對手；家族對他的敵意一直持續到1882年他的末日來臨。

塞爾維亞是奧地利的政治衛星國，奧地利人本來樂意讓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接管塞爾維亞的業務，但法國國有貼現銀行的出現很快重新確立法國人的主導。1884年，布萊希羅德的前助手卡爾·菲爾斯騰貝格接手一大筆塞爾維亞貸款，就此讓德國投資者登上舞臺。1885年的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戰爭讓俾斯麥對前者的財政更加關心。他要求知道細節，于是維也納的羅伊斯和貝爾格萊德的布拉依伯爵都對法國人在塞爾維亞的主導地位做了形象的描繪：法國人如何利用無限的魅力和世俗，利用胸有成竹的外表周旋于貪婪的塞爾維亞官場中（包括米蘭國王［King Milan］），如何讓整個國家陷入“腐敗的沼澤”，而他們自己則成為金融霸主 [[123]](#123_6)  。

1886年1月，布萊希羅德與奧地利外交部卡爾諾基伯爵進行長談，詳細討論塞爾維亞的財政。布萊希羅德的出訪（1885年除夕，他在臨行前剛剛與俾斯麥見過面）是俾斯麥一直被忽視的戰略的一部分，即利用塞爾維亞財政問題試探奧匈帝國的忠誠。在1885年12月30日寫給羅伊斯的特別指示中（從未被發表過），俾斯麥提到塞爾維亞與法國間的親密關系，這種關系以法國的金融控制為基礎，但得到奧地利土地銀行的支持。鑒于德國對塞爾維亞的可能責任，不能對這種親密關系“視而不見”。米蘭國王對賄賂來者不拒，也許還包括來自法國政府的賄賂，“此事同樣令人不安”。但羅伊斯（也許還包括布萊希羅德）的主要任務是從卡爾諾基那里探聽一個微妙得多的問題：

奧地利是否容忍塞爾維亞對法國的明顯青睞，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與奧地利的關系。法國各黨派的沙文主義元素越強烈，摸清奧地利的立場對我們就越重要。如果我們必須不情愿地與法蘭西共和國或者可能誕生的法蘭西帝國交戰，我們就需要考慮到奧地利的立場。

俾斯麥提醒羅伊斯，奧地利拒絕承諾在發生這種情況時提供支持—因此有必要利用塞爾維亞與法國的關系獲得“癥候式”回答，從而讓德國獲得關于奧地利可能選擇的線索 [[124]](#124_6)  。卡爾諾基告訴布萊希羅德和羅伊斯，他對法國的主導地位感到不安，視其為“系統性掠奪”。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鄙視塞爾維亞人的貪婪，但堅稱法國的介入完全以金融為目的。

德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布拉依伯爵也簡明地談到這個問題：“簡而言之，法國人在這里的影響力非常大，對任何競爭都做了準備，但僅限于金融領域。”法國政府沒有試圖以任何方式支配塞爾維亞的政策。法國人“想要榨取該國仍然擁有的全部生命力……這個目標應該會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到了那時，持有塞爾維亞貸款的德國人將會后悔。當俾斯麥獲悉卡爾·菲爾斯騰貝格和其他銀行家購買這筆貸款時，他批注道：“輕浮的人。” [[125]](#125_6)  俾斯麥放心了，布拉依對塞爾維亞財政“狀況凄慘”的估計也被證明是正確的。19世紀80年代末，在債務中陷入絕望的塞爾維亞政府再次玩起古老的把戲：它拖延支付利息，但不承認破產，希望手中債券因此下跌的銀行家們會趕忙來救自己。菲爾斯騰貝格迎來艱難的日子，而布萊希羅德可以對自己逃過那個陷阱感到慶幸 [[126]](#126_6)  。和大多數巴爾干國家的首都一樣，貝爾格萊德也喜歡自稱東方的巴黎；但在金融事務上，它更應該自稱“小埃及”。

不過，布萊希羅德沒能完全逃過巴爾干的糾葛。他與法國貼現銀行和奧斯曼銀行一起為東魯梅里亞的一條支線鐵路提供資金。1888年7月，布萊希羅德緊急向俾斯麥求助，因為鐵路剛建成就被保加利亞人沒收，大部分管理人員也遭到逮捕。俾斯麥回信說，他在索菲亞無能為力，布萊希羅德最好動員法國介入，因為法國人投入的資本要超過德國人 [[127]](#127_6)  。布萊希羅德沒有氣餒，當年晚些時候，他和漢澤曼一起為羅馬尼亞發行大筆貸款，在對手面前維持他們在羅馬尼亞“強大和幾乎不可戰勝的地位”。1889年，他又加入一個為希臘發行貸款的國際財團 [[128]](#128_6)  。這些對布萊希羅德來說基本上是日常業務，是他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

在俾斯麥統治的最后三年里，當他編織的精巧盟友網絡越來越難以維持時，布萊希羅德曾經幫過他一個忙。在這個案例中，大國們特別肆無忌憚地用經濟武器實現政治目的。19世紀80年代，從三國同盟形成開始，意大利與德奧同盟越走越近。一系列舉動（包括1887年末意大利軍官訪問柏林，協商在歐洲爆發戰爭時派意大利遠征軍前往萊茵河畔的計劃）促使法國對意大利財政展開全面攻擊，盡管此前它一直熱心地對后者提供支持。在本國政府的支持下，法國銀行和投資者開始變現他們的意大利證券，出售意大利房產，他們的高調行動引發意大利經濟的重大危機。

1888年2月15日，意大利駐柏林大使勞納伊伯爵告訴俾斯麥，親德反法的意大利總理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非常擔心巴黎市場上的意大利資產。由于無法當面強迫意大利，法國人決定展開“沉默戰爭”懲罰意大利人的朝三暮四。俾斯麥能說服柏林銀行家們立即出手相助嗎？幾天后，“最著名的關稅戰爭”爆發，導致法意交惡長達十年之久 [[129]](#129_6)  。

俾斯麥召見了布萊希羅德，后者一直警覺地關注著意大利財政。早在1875年，荷爾斯泰因就建議布萊希羅德應該試圖取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獲得對意大利財政的控制，也許可以和一些英國銀行合作。這將讓意大利擺脫“對法國的依賴……而且由你掌握它的金融債務也許在政治上對德國有利”。當時，布萊希羅德曾向俾斯麥提出此事，赫伯特立即給出答復：“從與我父親的對話中，你應該知道我們希望對意大利包容。此外，目前他看不到任何對和平的威脅。” [[130]](#130_5)  法國人保住了控制權。1880年秋，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意大利政府正向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尋求一大筆貸款，以便穩定里拉的國際地位。布萊希羅德還記得之前與俾斯麥的談話，于是自信地要求意大利大使“牢記意大利貸款應該秉持‘世界性政策’，而不是僅僅把寶押在法國身上，這點非常重要”。意大利也應該與英國和德國談判 [[131]](#131_5)  。不過，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法國銀行業總體上維持了在意大利的地位。布萊希羅德對此心知肚明，因為從1880年到1887年，巴黎羅斯柴爾德銀行頻頻讓他代表意大利政府，從該行賬戶上把數以百萬計的法郎轉給克虜伯的軍火公司 [[132]](#132_5)  。

但1888年的情況已經不同。布萊希羅德不再請求和意大利人做買賣，意大利人反倒需要他和其他德國銀行馬上提供幫助，否則他們搖搖欲墜的信貸結構將徹底垮掉，特別是因為法國人的行動正趕上意大利陷入經濟蕭條 [[133]](#133_5)  。勞納伊伯爵向俾斯麥求助的第二天，施瓦巴赫被召到外交部，因為布萊希羅德在結束與卡爾諾基的會談后即前往尼斯度假。施瓦巴赫表示，如果首相認為有必要，“布萊希羅德銀行完全樂意與某些合作銀行一起參與談判，通過大量購買那些被看好的［意大利］公債抵消巴黎的做空—我們將采用絕對秘密的方式，不會讓政府承擔任何責任”。俾斯麥的批注簡短而犀利：他在施瓦巴赫的提議旁邊寫了“好”，但能把“倫敦也拉進來嗎？”在施瓦巴赫請求政府批準的文字邊，他批注了“就這樣辦” [[134]](#134_5)  。

布萊希羅德馬上開始行動：他的銀行在幾天內買入數以百萬計的意大利公債，價格穩定下來。但各種副作用隨之而來。其他德國銀行家—達姆施塔特銀行和德意志銀行—直接找到意大利政府并奉上新的貸款。克里斯皮認為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正在利用布萊希羅德變現他們在柏林市場上持有的意大利債券，于是要求德國政府對布萊希羅德施壓，盡管不清楚克里斯皮是希望讓布萊希羅德停止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工作，還是僅僅希望他本人購買更多。施瓦巴赫的回復毫不含糊：“他的銀行完全不關心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否在做空意大利［債券］。考慮到我們的利益，他將堅決盡可能地提升意大利債券的價格。”為了這個目標，他在之前幾天里已經購買價值1800萬法郎的意大利公債，其中200萬來自他的私人賬戶。俾斯麥希望勞納伊了解施瓦巴赫的立場，他還向克里斯皮保證，“在意大利與巴黎交易商的斗爭中”，德國將繼續竭盡所能地保護該國的金融利益 [[135]](#135_5)  。

1888年3月初，布萊希羅德提議與意大利國家銀行（Banca Nationale）組成財團購買意大利公債，其他德國銀行則利用別的手段和渠道開出比他更低的報價。當貝謝姆伯爵得意洋洋地向俾斯麥報告說，克里斯皮和意大利人應該多么感激所獲得的幫助時（大部分歸功于布萊希羅德），索爾姆斯也從羅馬發來報告說，一個對立德國團體的領袖告訴他：“布萊希羅德被完全排除在外。我們與德意志銀行、巴黎的信貸銀行和維也納土地銀行合作……”俾斯麥感到厭倦，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再也不管這檔子錢的事了。” [[136]](#136_5)

但俾斯麥不會長時間對意大利財政感到厭倦。雖然布萊希羅德及其合作者們避免了1888年迫在眉睫的危機，但意大利經濟繼續衰退，導致一連串銀行破產。國家本身也面臨破產威脅，克里斯皮的政府當然也無法幸免—后者的存亡對俾斯麥關系重大。1889年，布萊希羅德幫助組織又一個德國財團；1890年，他牽頭成立“土地信貸公司（Instituto di Credito Fondiario），通過這家銀行可以向公共信貸提供特別支持” [[137]](#137_5)  。俾斯麥下臺后，索爾姆斯馬上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這個消息動搖了克里斯皮的位置，但只有經濟問題能讓他垮臺。在經濟領域，他指望布萊希羅德的支持。同一天，布萊希羅德給克里斯皮發了電報：“我很高興能向閣下宣布，我和一個銀行家集團組成同盟了。”克里斯皮需要布萊希羅德的支持，索爾姆斯也敦促布萊希羅德這樣做 [[138]](#138_5)  。布萊希羅德繼續努力著，盡管可能并不情愿。他曾對外交部商務專家路德維希·拉施道（Ludwig Raschdau，此人的父親在羅馬尼亞鐵路上損失了所有的錢）表示，俄國貸款遠遠優于意大利業務。按照拉施道的說法，布萊希羅德甚至抱怨那個“意大利猶太人不可靠”—他指的可能是意大利財政部長路易吉·盧扎蒂（Luigi Luzzatti）。19世紀90年代初，當意大利的私人信貸結構受到威脅時，布萊希羅德組建包括漢澤曼在內的德國財團。1894年，在奧地利和瑞士的幫助下，該財團在米蘭創立意大利商業銀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o），初創資本為7億里拉 [[139]](#139_5)  。該銀行直到布萊希羅德去世一年后才真正成立，但稱得上他為意大利財政所做的五年努力的高潮。和布萊希羅德職業生涯中做過的其他許多事一樣，此舉既是為了他本人的利益，也是為了俾斯麥的國務需要。事實上，布萊希羅德的意大利冒險讓他與俾斯麥的繼任者們有了親密接觸，反映出他與德國政府關系的延續，無論掌舵人是誰。

和俾斯麥的許多話一樣，他對于德國資本家怯懦的哀嘆也不能從字面理解。他本人相信這種說法嗎，或者那只是掩蓋他殖民政策失敗的眾多托詞之一？隨著年事和在任時間的增長，他對溫馴的德國人越來越不滿，越來越鄙視他親自教會他們的溫馴。為什么不譴責德國資本家呢？這些人沒能在殖民領域扮演俾斯麥為他們所設想的角色。也許他們應該對那個讓俾斯麥越來越有偏見的時代負責，即19世紀80年代中葉的整個殖民時期。或者說，德國資本家的確不如西方的同行們那么富有冒險精神嗎？俾斯麥的抱怨并非沒有理由嗎？因為直到1913—1914年，德國53%的對外投資集中在歐洲國家，而英國的相關數字則是5% [[140]](#140_5)  。

在銀行界，俾斯麥最了解布萊希羅德。布萊希羅德不正代表了俾斯麥對某種怯懦的譴責嗎？銀行家們意識到，盡管也許缺乏魅力，但安全本身就是回報，而追求高收益往往也意味著高風險。出于原則和習慣，布萊希羅德偏好安全，安全可能來自處理政府的金融需求，但不可能來自某片非洲沙漠不確定的未來。在這點上和其他許多方面，布萊希羅德是老派的：他不相信殖民地的虛假誘惑，就像他仍然有點不愿意充分利用德國新產業代表的巨大機會。國家貸款領域才是布萊希羅德的擅長，那里對各地的國際銀行家充滿吸引力，上演著最激烈的競爭。他頑強地戰斗著，和國務領域的俾斯麥一樣，他知道今天的死敵可能是明天的盟友，在競爭性行業中，忠誠是罕見的美德，漢澤曼這樣的老朋友和合作者很可能會加入一個將布萊希羅德排除在外甚至與之為敵的財團。此外，國家貸款能給他帶來確定的收入，可以讓他與本國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他可以繼續把自己看作“首長”的助手，就像在19世紀60年代那樣。助手、顧問和懇求者，但永不平等，更別提做主人了。在擴大德國對俄投資的問題上，布萊希羅德曾試圖違抗首相的意志。從經濟和政治角度來看，他也許是對的，但處境艱難的首相還是勝出。即使在布萊希羅德去世后，國家仍然至高無上。

[1.](#1_30) 對于稍早些的時期，一位歷史學家評價說：“19世紀中葉，關于薩摩亞黃金國的消息既源于刻意包裝，也出于誤判和一廂情愿。”吉爾森，《薩摩亞，1830—1900：多民族社群的政治》（墨爾本，1970年），第185頁［R.P.Gilson，Samoa，1830–1900：The Politics of a Multi-National Community（Melbourne，1970），p.185］。

[2.](#2_30) 庫塞洛夫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熱情的殖民主義者……無私的帝國主義者，激發這類人想象力的正是祖國控制大片海外領地的前景，即使他們自己在殖民世界中沒有經濟利益”。見亨利·特納，《俾斯麥的帝國主義冒險：源于反英嗎？》，收錄于《英國和德國在非洲》，吉福德教授和羅杰·路易斯編（紐黑文，1967年），第66頁［Henry A.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Anti-British in Origin？”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ed.by Prosser Gifford and Wm.Roger Louis（New Haven，1967），p.66］。在帝國建立的過程中，“無私的帝國主義者”扮演的角色比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更大，特別是因為利益相關的帝國主義者完全不像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宣稱的那么多。

[3.](#3_28) 但幾乎沒有證據支持近來一種關于漢澤曼在新幾內亞活動的說法，即他“迷戀……這樣的想法……只有殖民地……才能保證德國制造商們的產品有市場，把對外移民留在德意志帝國內，并為大眾提供另一個烏托邦，轉移他們對社會革命的興趣”。同樣不能斷言漢澤曼是懇求者，而俾斯麥是謹慎的拍板者。弗斯，《新幾內亞公司，1885—1899：一個不盈利帝國主義的案例》，刊于《歷史研究》，1972年第15期，第361頁［S.G.Firth，“The New Guinea Company，1885–1899：A Case of Unprofitable Imperialism，”Historical Studies，XV（1972），361］。

[4.](#4_28) 理查德·柯布敦（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國制造商和自由黨政客，自由貿易運動領袖，曾發起反《谷物法》聯盟，并與法國簽訂《柯布敦—舍瓦利埃條約》，讓英國廢除對所有制造品的關稅。——譯注

[5.](#5_28) 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英國記者和探險家，曾赴中非尋找英國傳教士大衛·利文斯頓，并探索和開發過剛果地區。——譯注

[6.](#6_28) 后來出現與布魯塞爾委員會類似的國際組織。1878年11月，撒哈拉探險家古斯塔夫·納赫蒂加爾（Gustav Nachtigal）在柏林創立非洲協會，協會的三項目標與在布魯塞爾提出的一致：發現非洲仍然未知的地區，讓它們向文明、貿易和商業開放，和平地廢除奴隸制。納赫蒂加爾邀請布萊希羅德擔任創始成員，價格是300馬克。但直到三個月后，經過特別談話和幾封書信交流后，布萊希羅德才加入。1880年，他秘密地為利奧波德向柏林非洲協會轉賬4萬法郎。

[7.](#7_28) 弗朗茨·馮·倫巴赫（1836—1904），德國畫家，現實主義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譯注

[8.](#8_28) 幾天后，《柏林交易所通訊》刊登了一首關于布萊希羅德與國王共同散步的打油詩。布萊希羅德沒有感到不悅，還把它送給利奧波德：“在多風但溫暖的極好天氣里/消息被刊上報紙：/布萊希羅德手挽手/與比利時國王散步。”

[9.](#9_26) 今稱馬萊博湖（Malebo Pool），是剛果河下游湖泊狀的擴大部分。——譯注

[10.](#10_26) 布萊希羅德檔案披露布萊希羅德與布魯塞爾的更多聯系。1885年秋，利奧波德將布萊希羅德的親信助手格洛納（Gloner）召到布魯塞爾，但電報往來暗示，布萊希羅德拒絕利奧波德的請求。格洛納的加密電報上說：“剛剛結束國王的召見，他請我向您轉達最友好的問候，并對您的缺席表示遺憾。他相信您的好意……我將于周日上午回到辦公室。”格洛納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1月13日，BA。1889年，布萊希羅德聯合貼現公司購買籌建中的從馬塔迪（Matadi）到史丹利湖鐵路的股份，價值200萬法郎；這筆錢中，貼現公司出資87.5萬法郎，布萊希羅德只是剩余部分的名義出資人，其中90萬法郎由其他投資者承擔。結果，布萊希羅德在剛果的最大一筆投資僅僅是22.5萬法郎—檔案顯示，這個數字在后來的談判中被進一步減少。

[11.](#11_26) 喜歡收集丑聞的單身漢弗里德里希·馮·荷爾斯泰因告訴赫伯特·馮·俾斯麥：“你的朋友‘布萊希’［Bleiche］愿意給予他心愛女子的丈夫，一位姓格羅澤的記者［特殊地位］。”荷爾斯泰因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3年12月13日，FA。

[12.](#12_24) 杜特爾蒙沒有理由為討好布萊希羅德感到后悔。多年后，他對布萊希羅德表示：“我們上次在奧斯坦德見面時，您好心地告訴我，如果有機會做筆有利可圖的小交易，你樂意幫我的忙。我們這里似乎相信盧布將很快大幅上漲，如果您也這么認為，我想請您代理我的賬戶，做筆這種貨幣的小交易。”生性謹慎的他提出只能承擔不超過2000馬克的損失。三個月后，他從布萊希羅德那里收到2000馬克—那是投機盧布的收益，而且顯然沒有動用杜特爾蒙自己的錢。杜特爾蒙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12月7日、1891年3月31日，BA。

[13.](#13_22) 亨利·阿什比·特納（Henry Ashby Turner，1932—2008），美國歷史學家。——譯注

[14.](#14_22) 1885年，保守黨內閣取代格萊斯頓，首相索爾茲伯里對德國帝國主義持不同看法：“通過在加羅林群島和桑給巴爾島做出讓步，我在俄國、土耳其和埃及贏得俾斯麥的幫助。他很像猶太人，但總體而言物有所值。”引自保羅·肯尼迪，《薩摩亞糾葛：英美關系研究，1878—1900》（紐約，1974年），第48頁［Paul M.Kennedy，The Samoan Tangle：A Study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878–1900（New York，1974），p.48］。

[15.](#15_22) 明斯特本人從未接受德國的擴張主義。直到1890年，當俾斯麥已經下臺后，他還在信中對布萊希羅德表示，即使“真正的成功也無法讓他改變”對這種“殖民鬧劇”的反對。他還表示：“如果非洲這個黑色國度不存在，我們外交官就沒什么事可做。如果我們避開那里，如果愚蠢的德國人米歇爾沒有染指那碗黑粥，我們現在就能心平氣和地看著英國、法國、意大利、葡萄牙人和剛果會議為它爭執不休。我們把這個角色留給俄國佬！！！您知道，這不是我的錯。”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6月30日、12月26日，BA。

[16.](#16_22) 讓熱衷非洲的人士憤慨的不僅是德國資本家。索爾茲伯里勛爵的門徒哈里·約翰斯通（Harry Johnston）本人也是探險家，他給外交部的一位非洲事務官員寫信說：“英國商人是今天最不可理喻的人—他們希望政府為他們包辦一切，自己卻什么都不做。他們希望吞并、開放、教化、清理、打掃和裝飾像乞力馬扎羅這樣的大片領土，然后交由他們開展方便和有利可圖的買賣。”羅杰·路易斯，《大英帝國和德國在非洲的擴張，1884—1919》，收錄于《英國和德國在非洲》，吉福德和路易斯編，第14頁［Wm.Roger Louis，“Great Britain and German Expansion in Africa，1884–1919，”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ed.by Gifford and Louis，p.14］。

[17.](#17_16) 格奧爾格·馮·西門子（Georg von Siemens，1839—1901），德國銀行家。——譯注

[18.](#18_16) 1883年4月，他致信利奧波德國王說：“如果歐洲政治目前風平浪靜，那是因為各國間的關系非常好，至少從外部看來如此。不過，必須承認幾乎所有國家都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急迫問題困擾，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運動。各國很快將不得不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對付這些煽動者。”他依次討論各國形勢，希望諸如德國的反社會黨人法案等措施成為有效救濟。布萊希羅德致利奧波德二世，1883年4月23日，BA。

[19.](#19_12) 這個詞來自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它讓人想起對于探險家、商人和政客而言，尋找殖民地是男子氣概的冒險。這也是需要被銘記的擴張主義動機。

[20.](#20_12) 以1886年7月施瓦巴赫寫給德國駐中國大使的信為例。信中表示，由于中國正與“法國發生軍事糾紛”，他無法貸款給中國。這會讓“德國遭遇不利的指責，因為所有人都認為—無論正確還是錯誤，我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這筆貸款得到親王的特別許可”。引自赫爾穆特·施托克，《19世紀的德國和中國》（東柏林，1958年），第279頁［Helmuth 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 im19.Jahrhundert（East Berlin，1958），p.279］。

[21.](#21_12) 這還讓人想起1711年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的斷言：與其說“有錢者必有權”，還不如說“有權者將有錢”。引自《獻給劉易斯·納米爾爵士的文章》，理查德·帕爾斯和泰勒編（倫敦，1956年），第53頁［Essays Presented to Sir Lewis Namier，ed.by Richard Pares and A.J.P.Taylor（London，1956），p.53］。笛福的話是我的朋友羅伯特·韋布（Robert K.Webb）告知的。

[22.](#22_12) 漢堡大金融家馬克斯·瓦爾堡（Max Warburg）曾清晰地描繪德國銀行家與德國政府的關系。他的紐約合伙人試圖讓他對某些日本貸款感興趣，瓦爾堡在日記中寫道，他“驅車前往柏林的外交部，就像所有優秀銀行家在這種情況下都會做的”。簡而言之，在把錢投到國外前，你先請示外交部。引自阿爾弗雷德·瓦格茨，《瓦爾堡公司，德國世界政治中的一家銀行，1905—1933》，刊于《社會經濟史季刊》，1958年第45期，第302頁［Alfred Vagts，“M.M.Warburg&Co.Ein Bankhaus in der deutschen Weltpolitik1905–1933，”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XLV（1958），302］。

[23.](#23_12) 埃及也不乏傳言。比如，當時有傳言說，為了讓總督下臺，羅斯柴爾德家族曾“求助俾斯麥，后者自從法蘭克福的歲月后一直向這個猶太人大家族提供某種令人不齒的保護”。維爾弗里德·布倫特，《英國占領埃及秘史》（倫敦，1907年），第65—66頁［Wilfrid Blunt，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London，1907），pp.65–66］。

[24.](#24_10) 而且很難評估。1876年，當控制埃及財政的第一個國際機構“公共債務局”（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與土耳其的類似）成立時，其中甚至沒有德國代表。1884年4月，格蘭維爾勛爵寫道：“德國在債務局的經濟利益不超過可憐的100萬馬克。”6月，俾斯麥對“1億馬克德國人的錢被投入埃及證券”表示驚訝。格蘭維爾的數字更接近事實。埃德蒙·喬治·菲茨莫里斯，《格蘭維爾勛爵傳》（倫敦，1905年），第二卷，第339頁［Edmond George Fitzmaurice，The Life of Lord Granville（London，1905），II，339］；保羅·克納普倫德編，《柏林大使館來信，1871—1874，1880—1885》（華盛頓，1944年），第232—233頁［Paul Knaplund，e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1871–1874，1880–1885（Washington，1944），pp.232–233］。

[25.](#25_10) 威廉·蘭格（William L.Langer，1896—1977），美國歷史學家。——譯注

[26.](#26_8) 幾乎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還同樣努力地爭取讓西班牙政府任命他為西班牙國債的唯一德國代理人。他授意自己的客戶，德國駐馬德里大使索爾姆斯伯爵（Count Solms）確保他從西班牙政府獲得這項特許權。索爾姆斯報告說，德意志銀行和門德爾松家族也在爭取同樣的特權—他試圖用昂貴的消遣拉攏西班牙部長們，這是影響他們的最佳方式，但他難以承擔。索爾姆斯還說，西班牙財政部長支持布萊希羅德，因為“您代表了柏林最有影響的銀行”。德國政府拒絕介入；最終，布萊希羅德獲得任命，然后請求索爾姆斯再為他尋求一枚西班牙勛章。作為回報，索爾姆斯繼續獲得布萊希羅德的財務建議，開始投資埃及債券。索爾姆斯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月23日、1月24日、2月2日、3月19日，1886年3月10日，1887年2月1日，BA。

## 第十六章　俾斯麥的倒臺

俾斯麥的悲劇在于，他留下的偉大遺產無法被吸收。

——亨利·基辛格

我是俾斯麥的頭號仰慕者；每當妻子把他的演講、書信或話語讀給我聽，我都會感到絕對的快感；世上很少有過更偉大的天才，很少有過更勇敢或個性更鮮明的人，很少有過更機智的人。但他缺少一種特質：寬宏；他的人生表現得正好相反，最終呈現為令人反感和極端小氣的刻薄（要不是同時具有可怕的幽默，他可能早就令人無法忍受），這種不寬宏最終也毀了他，導致在他離開時，甚至連他的仰慕者們也表現得相對冷漠。

——特奧多爾·馮塔納致格奧爾格·弗里德蘭德，1890年5月1日

俾斯麥的體系在他倒臺前就已經動搖。在他統治的最后歲月里，他的國內體系的所有裂縫和弱點變得越來越明顯，而他對外的威嚇性和平政策也越來越不與其他大國的政治憧憬合拍。最后三年里，特別是最后三個月，俾斯麥不斷采取應急手段，而且經常鋌而走險，他在國內權威的逐漸削弱令其雪上加霜。

他的權威建立在不可動搖的支柱上：威廉一世的支持。若非如此，俾斯麥的統治可能早就垮臺了。這種支持從不是自動的，俾斯麥對此的依賴讓他懷疑其他所有人對國王的影響。但二十六年來，俾斯麥贏得了他在乎的每一次較量。但在德國政治的其他方面就不是這樣了；即使在自己的普魯士內閣，他也常常陷入困境（他曾抱怨說：“每次希望喝一勺湯都要獲得八頭驢子的許可。”）；他在帝國議會幾乎從未獲得過絕對多數；他總是不得不爭取帝國成員邦政府的支持—簡而言之，他覺得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掣肘，就像他在1882年對帝國議會所暗示的，他內心深處從不懷疑，專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組合比愛國主義和他親自引入的半憲政制度更密切 [[1]](#1_58)  。

1888年，90歲的威廉一世去世。三個月后，他的兒子腓特烈三世跟著進了墳墓。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婿和德國自由派的希望，腓特烈登基時已經罹患喉癌。公認的自由派沉默地統治著，繼任者卻是最啰唆的霍亨索倫王朝君主。29歲的新皇帝威廉二世與老式普魯士人截然相反：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樸素或單純；他是一個有著痛苦的不安全感的復雜人物—他的左臂萎縮失靈—試圖通過華麗和威勢，通過粗俗地展現男子氣概來掩蓋自己的缺陷，顯示出他對自己神圣統治權的虔誠信仰。他還渴望那種權力獲得肯定，期待被敬愛和偶像化。除了個性缺陷，他也是一個有智慧和遠見的人，決心在德國留下自己的印記。他認為，德國注定將成為令世界畏懼的世界大國。威廉的災難性統治延續了三十年；他的權力如此之大，他的影響如此有害，他的個性如此專斷，以至于他的統治可以提醒人們，盲目的力量和結構無法塑造世界的一切東西。

俾斯麥和威廉二世在思想、經驗和個性上完全不同。更糟糕的是，俾斯麥已經習慣于獨裁權力，而威廉則渴望當家做主。諂媚者早就告訴威廉，如果有俾斯麥在身邊，即使腓特烈大帝也不會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潛在的個人矛盾以及跋扈的首相和新皇帝間日益加深的隔閡，還存在著實質性矛盾，兩人在政策選擇上分歧嚴重。

隨著君主的更迭和一位年輕而有魅力（許多人這樣認為）的皇帝登基，俾斯麥自己的親隨突然發現另一個他們可以支持、吹捧和取悅的對象。俾斯麥的同僚、對手和下屬對他日益難以理解的政策感到煩惱，實質性分歧再次讓個人背叛變得容易。在俾斯麥統治的最后十八個月里，陰謀變成集體性的不忠，為了破壞他的政策，他的下屬們向他的敵人和外國勢力泄密，特別是荷爾斯泰因。（私下里，荷爾斯泰因哀嘆俾斯麥的精力和目光下降，虛偽、專制和不可靠則逐漸上升，還漸漸對嗎啡上癮—這些癥狀都是他為自己的不忠找的借口 [[2]](#2_58)  。）多年來的怨恨在最后的那幾個月里凝結成毒汁。

更重要的是，在俾斯麥統治的最后幾個月里，他創造的國家表現出本質上的無法控制。沒有誰比首相本人更清楚和更擔心這種失控的可怕影響。與威廉那一代的許多人不同，他知道國內不穩定和對外冒險可能摧毀德意志帝國。

俾斯麥逐漸失勢的那些年里，布萊希羅德過得非常艱難。在保守的19世紀80年代，他對國內問題的影響已經開始削弱，盡管人們對其剩余影響的怨恨仍在擴散。他仍是令人敬畏的存在，受到俾斯麥特別信任的保護。但隨著俾斯麥地位的動搖，隨著老宮廷讓位于新的宮廷和新的親信，布萊希羅德的地位更加風雨飄搖。他復雜的相互關系和聯系網絡被削弱并逐漸崩潰。

在發電報告知布萊希羅德威廉的死訊時，萊恩多夫伯爵毫不夸張地說：“我該說什么呢？我完了，被毀了。愿上帝憐憫我們。” [[3]](#3_56)  布萊希羅德主要通過萊恩多夫精心地與威廉的宮廷建立關系，他的老客戶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則是他與腓特烈宮廷的紐帶。這些聯系都斷了—布萊希羅德感到新皇帝將有所不同。

威廉去世后不久，埃米爾·品特拜訪了布萊希羅德，他不懷好意地寫道：“布萊希羅德家的前廳總是洋溢著歡樂的氣氛：奧伊倫堡伯爵在里間，萊恩多夫將軍在外間。后者一邊喝著干邑，一邊問道：‘嘿，奧古斯特［奧伊倫堡］，能也給我一點時間嗎？’這些是寶座和王朝的支柱！！！！爭相與布萊希羅德見面！！！” [[4]](#4_56)  隨著時間的流逝，布萊希羅德家的前廳安靜下來。萊恩多夫當即退休。奧伊倫堡雖然在1890年被任命為宮廷總管，但再也沒有扮演同樣的角色，他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也變得不再那么親密。

俾斯麥在新的宮廷沒有朋友，他也不認為俾斯麥會有。（后來他回憶說，1888年春天，仍然激動不已的俾斯麥告訴他，自己剛剛和年輕的皇儲宣誓永遠相互效忠，據說布萊希羅德這樣回答：“您相信皇儲的承諾嗎？” [[5]](#5_56)  ）布萊希羅德有充分的理由擔心新皇帝。威廉二世仰慕布萊希羅德的老對手施托克，而俾斯麥也曾經指責皇儲公開支持這位身為反猶主義者的牧師。威廉二世身邊圍繞著激進的反猶主義者—雖然后來他也有了自己的猶太人親信，而且他本人也成了惡毒而偏執的反猶主義者的靶子。

這些對布萊希羅德都不是好兆頭：他注定將在權力和野心家的洗牌中成為失敗者。更糟糕的是，新宮廷和老首相在實質性問題上存在分歧，雙方懷疑的加深讓這些問題變得更加棘手。皇帝對國內外政策有自己的想法，他還希望逐步削減俾斯麥的權力。俾斯麥不同意威廉的一切動議，并動員同僚們反對他—當意識到威廉希望剝奪他的權力時，他更加堅決地這樣做。

在俾斯麥與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矛盾中，布萊希羅德不幸成為核心人物。更糟糕的是，在捍衛自己的利益時，布萊希羅德與兩人的政策都發生分歧。那就是德俄關系問題，俾斯麥所有外交政策中最復雜和最有爭議的部分—這個問題表面上的難以駕馭威脅到俾斯麥的整個體系。

在俾斯麥統治的最后階段，德俄關系讓政治的相互聯系戲劇化：在這兩個國家，國內利益對外交官和外交施加巨大壓力；從未完全實現的外交事務獨立性明顯呈現崩潰之勢。金融和經濟利益開始走到前臺，記者們也試圖高調地影響輿論。1886—1890年是1911—1914年的某種預演，隨著民族主義熱情在俄國和法國升溫，隨著這些熱情引發德國的好戰舉動，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因為官方的分歧而變得更難預測。好在19世紀80年代末的危機最終平息。

最簡單地說，德國受制于1879年與奧地利的同盟和對那個二元帝國存亡的興趣；奧地利在巴爾干與俄國關系緊張，俾斯麥則試圖在當地實行積極而公正的政策，旨在保持對立雙方的信任。柏林會議后，俄國對德國的怨恨與日俱增—聰明的《莫斯科時事報》（Moscow Gazette）編輯卡特科夫（M.N.Katkov）充分利用這種怨恨，他不斷宣揚俄國不需要謹慎政策，而是需要“騰出手來”，即擺脫德國的束縛。卡特科夫令俾斯麥感到擔憂，他的政治地位上升正值復仇主義者和極受歡迎的布朗熱將軍在法國受到熱捧之時。

俾斯麥認為，由于巴爾干的亂局，德國就像被夾在兩條惡狗之間的人，一旦松開束縛，它們就會立即向對方撲去 [[6]](#6_54)  。俾斯麥希望不要讓它們擺脫束縛，同時希望英國和意大利能幫助奧地利限制俄國，讓他有機會安撫后者。

俾斯麥的俄國政策集中體現他在不確定中生活的能力。他有最充分的理由維持與俄國的和平關系；他把俄德的親密視作和平與君主團結的壁壘，視作對叛逆的波蘭人和有顛覆企圖的社會黨人的障礙。他最大的夢魘是俄法同盟—在卡特科夫和布朗熱的時代，第一次有人開始叫囂這種同盟。俾斯麥不斷試圖安撫和強迫俄國，通過恩威并施與其維持密切關系。對于永遠束縛巴爾干那兩條惡犬，或者阻止俄國惡犬與法國配對的可能，他沒有多少幻想。對于某些德國將領把先發制人地打擊俄國看作救贖手段的輕浮而愚蠢的想法，他完全不抱希望，就像他在1888年對駐維也納大使所說的：“最輝煌的勝利也沒有用：俄羅斯民族的帝國不可摧毀，它的強大來自氣候、沙漠和節儉，來自只需守衛一側邊界的優勢，它被打敗后仍將是我們的死敵，渴望著復仇，就像今天在西方的法國。” [[7]](#7_54)  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俾斯麥對與俄國關系的擔憂加深了。他比過去更頻繁地選擇強硬立場，希望威嚇那里的擴張主義派別。與柏林的軍方不同，他拒絕讓兩國永遠為敵的想法，因此也拒絕快速解決問題的誘惑。

俾斯麥的俄國政策只有他的幾位下屬理解，支持者則可能完全沒有。最著名的破壞者是荷爾斯泰因，他暗中與柏林和維也納的反俄黨派合作。威廉二世最終站在俾斯麥的批評者那邊，皇帝和首相間的核心分歧由此凸顯—矛盾焦點是帝國的安全，再加上個人的懷疑和敵意引起的實質性分歧。

布萊希羅德被夾在這場沖突的中間。他的利益很簡單：由于在19世紀80年代的巨額貸款中的角色，他與門德爾松和漢澤曼一起成了為俄國服務的主要銀行家。貸款和兌換的收益非常高，而且業務有望不斷擴大，因為俄國的需求和經濟潛力非常大。此外，布萊希羅德還認為，自己和帝國的利益是一致的。1884年，俾斯麥曾要求他推動俄國貸款的發行，他也認為延續德國在俄國財政中的最重要角色增強了前者的影響。但到了1886年，風向發生變化；其他經濟利益強烈要求對俄國采取強硬立場，而政治軍事考慮也不利于促進對俄信貸。

這個問題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值得說幾句題外話。19世紀80年代，俄國走上工業化的昂貴道路，并計劃修建連通龐大帝國的鐵路網。俄國的國內資本不足，因此依賴外國投資—吸引投資的是高利率和俄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俄國的海外借款方法昂貴而笨拙，為了把程序合理化，亞歷山大三世時期的歷任財政部長合并了之前的高利息短期小額債務。通過這樣的合理化，俄國財政部希望削減巨額債務支出。

德國成了俄國主要的資本提供者。德國資本輸出的大約20%到25%流入俄國；到了1887年1月，估計有價值超過20億馬克的俄國債券掌握在德國人手中 [[8]](#8_54)  。這個巨大的數字大大超過俄國全部外債的一半。兩國的貿易同樣勢頭強勁，直到19世紀80年代，俄國因為民族主義和商業愿意提高關稅（就像德國在1879年所做的），對德國工業出口造成重大影響。簡而言之，金融和商業利益發生分歧。

對布萊希羅德來說，與俄國的關系是巨大收益和政治威望的來源。他不是第一個涉足俄國的銀行家（門德爾松比他更早），而且那里的競爭很激烈。但布萊希羅德擁有特別的優勢，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俄國人看重他與俾斯麥的關系，稱之為“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財團” [[9]](#9_52)  。布萊希羅德的名字顯然提高了俄國債券在德國的信譽，他還說服自己的一些最著名的客戶投資俄國債券，包括俾斯麥 [[10]](#10_51)  。他變得聞名遐邇，就連美國駐俄國大使也把1884年貸款的巨大成功歸功于布萊希羅德，這件事證明“俄國信貸的恢復” [[11]](#11_51)  。俄國人很高興，1885年，沙皇把圣斯坦尼斯拉夫騎士勛章授予布萊希羅德。但布萊希羅德更多成功的先決條件是俾斯麥的仁慈支持；否則，德國銀行家將陷入麻煩，對布萊希羅德來說尤其如此。

然而，德俄關系開始惡化。就像我們在第十三章看到的，1886年秋，俾斯麥警告布萊希羅德，他已經對長久與俄國保持良好關系失去信心 [1](#1_33)  。布萊希羅德很快意識到，政治關系的惡化也將對金融產生影響。多年來，他一直提醒俾斯麥，俄國可能轉而向法國尋求資本；1886年12月，他發現俄國人試圖在巴黎籌集5億法郎貸款，認為巴黎銀行可能邀請自己參與。布萊希羅德馬上找到俾斯麥在帝國首相辦公廳的助手弗朗茨·馮·羅騰堡，并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希望俾斯麥能同意和支持自己參與：“我該怎么做？如果俄國人從巴黎籌到錢，親王將會不悅；他多次告訴我，這兩個國家的金融關系將是政治接觸的最堅實基礎。但如果我拒絕，俄國將會惱火，首相也不想看到那樣……”

羅騰堡認為布萊希羅德出于擔心“因為此事損失本可賺到的數百萬”，試圖讓俾斯麥做出某些支持的姿態，好向德國投資者證明俾斯麥支持自己對俄國債券的新冒險。于是羅騰堡把此事壓下，希望不讓在弗里德里希斯魯休養的俾斯麥知道。他自作主張地告訴布萊希羅德：“我們通過自己的經驗深刻體會到，金融關系并不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親密。否則，我們就該和俄國連在一起了。” [[12]](#12_49)  俾斯麥的確傾向于不參與，布萊希羅德在深夜和圣誕節對羅騰堡的多次急切造訪無果而終。更糟的是，赫伯特也想嘲弄他，于是命令羅騰堡向布萊希羅德轉達沙皇最近關于“該死的猶太人”的言語。羅騰堡報告說，布萊希羅德“對沙皇的言語并不生氣；他微笑著低聲說道，‘輕浮的人’。在貸款面前，他愿意忍受更糟糕的東西” [[13]](#13_45)  。羅騰堡關于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總是很不客氣；一年前，為了在赫伯特面前為自己接待布萊希羅德辯護，他編造了瘋狂的故事。不過，他仍然對布萊希羅德表現得友好，并覺得圣誕節的談話頗有裨益：“布萊希對我分析歐洲政治的方方面面，俾斯麥也許對其中一些內容感興趣。” [[14]](#14_45)  告知布萊希羅德不要參與一周后，俾斯麥又命令他參與—否則俄國人會把他的冷漠歸咎于首相的反對 [[15]](#15_43)  。最終，那筆貸款不了了之。

俾斯麥的動搖和突然轉向應該讓布萊希羅德為更壞的情況做好準備。作為其復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1887年初，俾斯麥試圖建立英奧同盟來限制俄國，好讓他有機會向俄國示好，就像6月秘密簽署的《再保險條約》所顯示的），俾斯麥開始系統性地對俄國財政下手。他的動機有很多：他既試圖威嚇俄國和阻止其獲得信貸，也想要報復該國一系列傷害德國利益的經濟舉措。由于新的關稅，德國工業家在對俄出口上遭受重創，另一些法律則限制他們在那里做生意的權利。德國農民擔心，俄國鐵路網的進一步擴張將導致對德糧食出口增加。俾斯麥可能還想警告俄國新任財政部長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維什涅格拉茨基，后者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者。（布萊希羅德的俄國朋友薩克向其保證，盡管維什涅格拉茨基被認為是卡特科夫的門徒，但此人也在薩克的銀行投資很多錢，務實的他不太可能遵循卡特科夫的荒唐計劃 [[16]](#16_43)  。）此外，俾斯麥真正對太多俄國的錢掌握在德國人手中感到擔心。1887年夏，他授權對俄國債券發動新聞戰，俄國債券的價格下跌5%。10月，倫敦的《經濟學人》評價說：“俄國金融家們一定意識到，德國市場在今后很長時間內實際上對他們關閉了。” [[17]](#17_37)

1887年10月，布萊希羅德受命警告舒瓦洛夫不要想當然地以為德國無意戰爭。11月，在赫伯特的慫恿下，俾斯麥不顧布萊希羅德的請求，繼續采取行動。11月10日，他頒布著名的《抵押貸款禁令》，要求帝國銀行停止接受把俄國債券作為貸款抵押品 [[18]](#18_37)  。此舉更多是象征性和戲劇性的，而非為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人們認為這將是暫時性的舉措，如果持續下去，它顯然將削弱對所有俄國債券的信心。但此舉帶有挑釁意味，特別是因為它是在亞歷山大三世訪問柏林前一周頒布的。在某些方面，這是俾斯麥慣用技巧的翻版：利用威嚇讓對手成為朋友。但這次，此計適得其反，因為法國很樂意取代德國在俄國的金融地位—事實上，就像我們看到的，法國已經朝著那個方向邁出第一步 [2](#2_33)  。

俾斯麥對俄國的“金融戰”讓布萊希羅德感到沮喪。此舉導致現有的全部俄國債券貶值，還讓德國銀行家們幾乎不可能展開新的操作。俄國債券幾乎立刻開始從德國流向法國，俾斯麥希望減少德國資金投入俄國債券的愿望很快達到。但布萊希羅德認為這一切是個巨大的錯誤，在幕后試圖改變政策。顯然，俄國官場認為他對俾斯麥的行動具有特別的影響。俾斯麥告訴布萊希羅德，他對與亞歷山大三世的會談“非常失望”。12月，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來自圣彼得堡的消息顯示出“沙皇不希望戰爭……俄國對奧地利的敵對態度確定無誤，集結在與奧地利邊界上的軍隊無疑是為了激怒該國” [[19]](#19_33)  。《抵押貸款禁令》超越布萊希羅德的個人利益：就像他一直警告的那樣，巴黎現在加入對利潤豐厚的俄國業務的競爭，在從柏林到巴黎的歷史性轉向過程中，各銀行之間還上演了激烈的對抗。

在隨后的斗爭中，布萊希羅德保持自己與俄國財政部長的秘密關系，這種關系把他與歐洲政治的地下世界中一個富有魅力的小人物聯系起來。布萊希羅德與別名伊利亞·法捷耶維奇·奇翁（Ilya Fadeyevich Tsion）的俄國猶太人伊利·德·基翁（Elie de Cyon）有公開和秘密的聯系。基翁生于1843年，師從菲爾肖和克勞德·貝爾納（Claude Bernard） [3](#3_31)  ，曾是圣彼得堡醫學院的著名教授，后來被憤怒的激進學生驅逐。1876年，基翁移民法國，他改名易姓，擅自加上代表貴族的“德”，作為《高盧人報》（Le Gaulois）的編輯開始記者生涯，后來又接替他的庇護人亞當夫人（Mme.Adam）擔任《新評論》（Nouvelle Revue）的主編。1880年，他獲得騎士級法國榮譽軍團勛章。19世紀80年代末，他被廣泛視為卡特科夫的朋友和代理人，因此也被認為反對德國。1887年2月，新任俄國財政部長維什涅格拉茨基將基翁召到圣彼得堡，希望他幫助發展與巴黎市場的新關系。19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基翁被看作法俄同盟的推動者，就像他自己所標榜的那樣。他還是研究這種關系的首位史學家。

從1887年開始，基翁也和布萊希羅德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早在1884年，他就向布萊希羅德提出不同尋常的建議，請求資助創辦一家由基翁和科特科夫聯合編輯的報紙；如果布萊希羅德愿意資助，該報將支持俄德建立親密關系。布萊希羅德拒絕邀請。1893年，彪羅 [4](#4_31)  后悔沒有像法國人“那么大膽。犧牲幾百萬比做出真正的讓步要好” [[20]](#20_33)  。）在返回俄國途中，基翁在柏林停留并向布萊希羅通報自己的使命，包括在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俄國財政部長間首次建立直接聯系。布萊希羅德則向基翁保證俾斯麥的和平意圖 [[21]](#21_33)  。

基翁發現與布萊希羅德相交能讓自己獲利（是真正的“利潤”），于是在隨后的三年里保持了這種關系。1887年5月末，他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我從5月20日起擔任［俄國］財政部長的特使。因此一切重要事務都會經過我手”。他還保證將繼續感謝布萊希羅德之前的服務（沒有解釋是什么），并承諾在未來也不忘記。布萊希羅德希望確保獲得基翁的服務，他在回信中提出為基翁將要進行談判的那筆交易預付傭金。基翁接受了120萬法郎的預付款，但要求被允許在真正掙得傭金前承擔預付款的利息。考慮得多么周到 [[22]](#22_33)  ！隨后，基翁陸續給布萊希羅德發來一系列書信和加密電報，最初是從巴黎，1887年夏天開始從圣彼得堡，因為他再次被維什涅格拉茨基召見，后者希望他幫助打破柏林對俄國貸款的壟斷—至少法國人如此看待他的此行。在這次俄國之行中，他還放棄了法國國籍，恢復俄國公民身份。他從圣彼得堡對布萊希羅德發出警告：在德俄交易的前景再次變得光明之時，德國對俄國債券的新聞戰正在威脅布萊希羅德的利益。與此同時，基翁公開指責俾斯麥是新聞戰的煽動者，而布萊希羅德向他轉達俾斯麥對這些指控的否認 [[23]](#23_33)  。在布萊希羅德看來，基翁始終是德俄關系的支持者。在俄國，基翁總是支持法俄同盟和卡特科夫—后者在那年夏天去世，希望基翁能夠繼承自己的編輯職務和俄國民族主義捍衛者的身份。

但基翁更愿意在巴黎為俄國和他自己工作。隨后的兩年里，他為布萊希羅德提供關于維什涅格拉茨基與其他法國和德國銀行家談判的內幕消息。有時，基翁不得不“言簡意賅”，因為“G［可能是外交部長吉爾斯，卡特科夫的特別目標］要求打開我的所有通信”。他提醒布萊希羅德，在俄國他被視作俾斯麥敵對政策的幫兇，盡管俄國意圖和平 [[24]](#24_31)  。

為了自己的目的，基翁為許多主人效過力。所有人都知道他，但也都懷疑他。1887年4月，正當布萊希羅德為基翁尚未履行的服務付錢給他時，俾斯麥也向德國駐圣彼得堡代表伯恩哈德·馮·彪羅（后來成為德國首相）打聽此人，并得到經典的回答：“體面和愛國的俄國人把記者基翁看作有革命傾向的虛偽而貪婪的猶太人。不過，基翁是卡特科夫的密友。這僅僅證明卡特科夫要么瘋了，要么本人是個秘密革命者。” [[25]](#25_31)  吉爾斯也表示，亞歷山大三世曾經稱基翁為“惡棍……壞蛋” [[26]](#26_29)  。與此同時，法國警方懷疑基翁有親德傾向，強調他經常指責法國媒體和議會貪婪，并認為他能為俄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所有“秘密和見不得人的需求”服務。1889年，他被控和布萊希羅德一起試圖為俾斯麥和布朗熱牽線搭橋。他承認自己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但否認指控。不過，一些疑慮仍然未被打消 [[27]](#27_25)  。

19世紀90年代末，他撰文抨擊維什涅格拉茨基的繼承者維特（Witte），為此失去俄國公民身份。德國人因為反俾斯麥小冊子驅逐他，法國人也拒絕他的重新入籍申請（他們擔心觸怒俄國朋友：基翁成了他幫助推動的同盟關系的受害者），他最終在瑞士定居，有時偷偷地前往巴黎看望他的情人。1912年基翁去世，在教會圣禮的幫助下，他接受基督教葬禮，帶著秘密走進墳墓，沒有透露為何一位如此有前途的科學家要如此揮霍自己的天賦和才能 [[28]](#28_19)   [5](#5_31)  。

從1888年到1890年，布萊希羅德陷入俄國事務，情況變得越來越復雜，以較小規模展現了布萊希羅德在一個相互聯系且如此錯綜復雜的世界中面臨的危險。作為銀行家，他希望保持與俄國的關系；作為俾斯麥的心腹，他很難忽視首相的愿望，更別說違抗—首相的愿望本身也搖擺不定，受到不斷變化的考慮驅使。與此同時，柏林的俄國債券價格下跌，并以較低的價格逐漸流入法國人手中。1888年5月，布萊希羅德受命阻止盧布在柏林的緩慢貶值，從而有機會同時滿足自己和普魯士的利益 [[29]](#29_19)  。

整個1888年春天，他一直試圖說服俾斯麥改變反俄政策，但沒能成功。布萊希羅德焦躁不安，對于俾斯麥的強硬感到憤怒和疑惑。有時，他把反俄路線歸咎于普魯士地主的壓力；有時，他認為俾斯麥試圖阻止俄國人武裝自己。布萊希羅德對這兩種想法都不滿意，5月，他告訴法國大使：“我完全不理解俾斯麥親王目前的政策，我清楚我們在走向何方。” [[30]](#30_15)

在差不多七個月的時間里，俾斯麥不為所動。1888年7月，當威廉二世登基以及維什涅格拉茨基和法國銀行展開第一次嚴肅談判時，他開始有所松動。1888年秋，法國和德國銀行家紛紛前往圣彼得堡，為獲得貸款展開競爭。布萊希羅德派出施瓦巴赫，但顯然帶著各種方案而不是明確條件；基翁解釋了施瓦巴赫的失敗：“維什涅格拉茨基是個數學家，對于任何不是以清楚和明確的數字提交給他的東西帶有某種本能的反感。” [[31]](#31_15)  當競爭對手們各自在圣彼得堡展開談判時，布萊希羅德請求俾斯麥正式批準他參與俄國貸款。

10月，羅騰堡兩次告訴布萊希羅德，俾斯麥希望向俄國“提供方便”，不反對他提出的安排，只要德國人手中的俄國債券總價值不變，并且不用任何方式鼓勵公眾投資俾斯麥認為“不安全”的債券即可 [[32]](#32_15)  。不過，我們不清楚他認為不安全的究竟是債券還是親俄宣傳。同月，布萊希羅德在弗里德里希斯魯與俾斯麥討論他的俄國計劃，但幾天后又希望得到更多保證。最終，羅騰堡給他寫了“非常機密”和非常嚴肅的信，提醒他剛剛在弗里德里希斯魯已與俾斯麥討論此事，現在不應該再打擾俾斯麥：

此外，大人覺得書面表達他對此事的看法很不符合他的官方身份。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我應該向你指出，目前至少有兩個俄國兵團正向奧地利邊境進發，而且前線得到大量物資補充，因此在這個時候與俄國簽訂貸款協議將普遍給人留下戰爭貸款的印象。

貸款尤其會讓羅馬和維也納緊張。“你本人對政治事務如此有洞察力，不必由我提醒你注意這個方面。” [[33]](#33_15)

在這件事上，布萊希羅德沒有從俾斯麥不情愿的改變主意中獲益。1888年末，以巴黎和低地國家銀行（Banque Paris et Pays Bas）為首的法國財團（羅斯柴爾德家族被排除在外）擊敗根深蒂固的德國對手，與維什涅格拉茨基簽署協議。他們提出在巴黎市場上發行5億法郎的貸款，門德爾松和菲爾斯騰貝格的柏林貿易公司也參與其中，但布萊希羅德被拒之門外。這筆貸款帶來政治轟動和金融勝利：法國食利者們第一次發現，與看上去不穩定的本國債券相比，可靠而高收益的俄國債券更具吸引力，盡管后者常常受到政治風暴和金融丑聞的影響。參與的銀行馬上獲利近1100萬法郎。布萊希羅德有充分的理由為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懊喪，他試圖重整旗鼓 [[34]](#34_15)  。

現在，俾斯麥回歸更加親俄的政策。1889年3月，布萊希羅德參與俄國貸款。4月，他和漢澤曼（代表曾經的羅斯柴爾德財團）在柏林為一筆大型轉換操作進行談判。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借機向布萊希羅德施壓，要求他保持耐心，等待他們首先行動，因為即使以后俄國人索取更高的發行費，“我們仍將有利潤，不管利潤多大，只要安全和確定即可”。此外，阿爾方斯男爵還抱怨說，德國人的著急似乎不成體統，因為大部分新債券將在巴黎市場出售；德國人還一直在減持手中的俄國債券。不過，漢澤曼和布萊希羅德還是繼續談判。5月底，他們代表羅斯柴爾德財團與維什涅格拉茨基簽署協議—兩人各自獲得26%，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顯然遠沒有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獲得33%。價值2.5億馬克、利率為5%的俄國鐵路債券被轉換成利率為4%的新債券；俄國政府成了這些債券事實上的擔保人，既讓它們變得更有吸引力，又因為降低利率而省了錢。德國媒體歡迎這些操作，認為它們得到俾斯麥的批準。在金融上，這次轉換取得成功，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賺走最大一部分收益。不過，布萊希羅德也成為史無前例的攻擊的唯一靶子。他的最后一筆重大俄國業務也成了他在國內最大的政治負擔 [[35]](#35_15)  ，對他來說可謂得不償失。

這筆業務通常被稱為布萊希羅德轉換，它幾乎立刻成了俾斯麥與威廉二世第一次嚴重沖突的焦點，后者受到他野心勃勃的反猶主義者顧問們的慫恿。為俄國人提供的這次服務激怒了瓦德西和荷爾斯泰因等人，因為他們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有必要。他們希望與俄國開戰，而不是賺它的錢，至少也希望俾斯麥對俄國繼續展開更加嚴厲的金融戰。他們沒費什么勁就激起威廉二世的怒火，后者已經從親俄轉向反俄，決心在治國上給俾斯麥一個無法忘記的教訓。對威廉一派來說，問題似乎非常清楚：他們在保衛德國的國家利益，而俾斯麥卻允許他的猶太人為了私利傷害它。

威廉確信，這筆操作每年將為俄國人節省2000萬馬克的利息支出，將會加強他們的信貸和充實他們的戰爭儲備，并促使他們對德國全面發難。他要求俾斯麥停止轉換，無論是直接向布萊希羅德施壓，還是間接向柏林股市施壓，讓后者拒絕新的俄國債券上市。根據廣為流傳的說法，在寫給俾斯麥的一封信中，威廉指責布萊希羅德是“沒有祖國的混蛋，只想著他的買賣” [[36]](#36_15)  。俾斯麥不為所動，回復說：“我無法……影響他［布萊希羅德］的事，因為如果要他做虧錢的事，他總是提出超過我能力范圍的要求作為交換。威嚇柏林銀行家和外國企業家的工作最好交給媒體，而且媒體已經在這個方向采取積極行動。”此外，轉換操作不會增強俄國的軍事潛力，官方的禁令反而會危及俄德關系與歐洲和平 [[37]](#37_15)  。不過，俾斯麥還有另一個理由拒絕在當時觸怒俄國。由于瑞士對顛覆分子的包庇，他與該國的矛盾正值高峰，并聯合德國、奧地利和俄國一起向瑞士施壓。俾斯麥對皇帝語出驚人，建議他“把社會黨看得比通過貸款增加俄國的實力更加危險” [[38]](#38_15)  。最終，柏林市場允許新債券上市，威廉因為布萊希羅德而罷免俾斯麥的迫切威脅也解除了，沒有像荷爾斯泰因熱心地為赫伯特描繪的那樣 [[39]](#39_15)  。

但沖突仍在繼續：皇帝派不愿錯過這么好的機會。他們求助于所有認為銀行家腐敗和猶太人“沒有祖國”的高貴靈魂，求助于許多憎惡布萊希羅德影響力的人，認為此事至少能迫使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分道揚鑣以及令他們雙雙受辱。赫伯特扮演曖昧的角色。他對皇帝最親密的朋友菲利普·奧伊倫堡說：“我很想破壞那群幫助俄國人降低利息的銀行家的伎倆，但不幸的是我在這件事上無能為力。” [[40]](#40_15)  表明自己站在皇帝一邊后，他又仔細向蘭曹解釋威廉憤怒的原因：

（俾斯麥的敵人們）告訴陛下布萊希羅德到處散布謠言，說首相不反對轉換操作—不幸的是，他們所言不虛。通過多年來對爸爸所說的輕率謊言，布萊希羅德在柏林交易所確立這樣的地位：其他所有交易者都相信他的交易得到政府批準，否則他不會參與。多年來，我一直希望爸爸不要再讓這個猶太人當自己的銀行家，他是個太輕率的說謊者，爸爸因為他而遭遇的麻煩和煩惱比他本人知道的還多；如果這個貪婪的猶太人有機會掙個幾百萬，他不會顧及對爸爸或祖國的影響。

俾斯麥見到這封信，他在關于布萊希羅德無所顧忌的話旁邊批注道：“誰會呢？” [[41]](#41_15)  但俾斯麥的敵人們不理會他對人類的普遍鄙視：他們一再強調俾斯麥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的近乎叛國行徑。

瓦德西是俾斯麥的頭號死敵。1888年，他的朋友威廉二世任命他接替毛奇擔任總參謀長。就在此前，俾斯麥剛剛向布萊希羅德透露，他認為應該把瓦德西調離柏林 [[42]](#42_15)  。瓦德西是典型的政客將軍，他決心左右政策，最好能成為俾斯麥的繼任者。他確信德國正在走向“世界戰爭”，應該先發制人，尤其是對俄國 [[43]](#43_15)  。瓦德西和俾斯麥過去有過爭吵，現在他利用布萊希羅德離間首相和皇帝。

當威廉希望在媒體上攻擊布萊希羅德時，瓦德西堅稱：“這已經不夠，首相必須親自介入。如果猶太人知道他明確反對［俄國貸款］，他們就會放手，否則便不會。”隨后，威廉又因為布萊希羅德的罪惡批評赫伯特，后者帶著可以理解的憤怒回復說：“但陛下知道我和他完全沒有關系。”威廉答道：“我知道，但我不管，因為他進出你父親的家。” [[44]](#44_14)  威廉還要求赫伯特的下屬和布萊希羅德的密友魯道夫·林道譴責布萊希羅德的俄國計劃。林道現在經常為威廉的愿望服務，因此毫不介意攻擊俾斯麥的銀行家和他兄弟的恩人。林道用了卡爾·菲爾斯騰貝格寫的一些文章，后者曾是布萊希羅德的門徒，現執掌柏林貿易公司，該公司沒能參與這筆俄國業務 [[45]](#45_14)  。這段時間對所有人來說都是艱難的。

俾斯麥鼓勵官方媒體攻擊布萊希羅德的計劃，而布萊希羅德的報紙（《民族報》和《柏林交易所通訊》）則支持這筆俄國業務。威廉對媒體的鼓噪感到滿意，他和俾斯麥的裂縫正式彌合 [[46]](#46_14)  。不過，俾斯麥仍然對瓦德西怨恨不已。1889年夏，《北德大眾報》批評瓦德西是干涉外交政策的戰爭販子。憤怒的瓦德西致信戰爭部長威爾第·杜·維爾努瓦（Verdy du Vernois），尖刻地指責風波的幕后主使：“整樁媒體丑聞的起因是最高當局試圖阻止這筆轉換貸款，因此它的發起者是金融利益受到威脅的人，即‘布萊希羅德集團’，或者猶太人和他們的伙伴，或者那些對陛下表達或實現他本人看法感到不安的人。” [[47]](#47_14)  隨后的幾個月里，瓦德西到處散布怨毒之詞，竭盡所能地惡毒攻擊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軸心。多年后，在撰寫回憶錄時，他承認“對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關系的攻擊可能嚴重夸大”。出于這個原因—也許還因為害怕招來誹謗訴訟—他決定在出版時刪去最得罪人的段落 [[48]](#48_14)  。從出版的內容來看，我們也許可以設想，瓦德西的確用強烈的反猶主義情感來為自己的反俾斯麥活動助力。瓦德西取得成功，他寫道：1889年的布萊希羅德轉換標志著皇帝“心中與俾斯麥父子般關系的決裂……從那時起，皇帝只與首相逢場作戲” [[49]](#49_14)  。

當時，布萊希羅德深深陷入俾斯麥倒臺前的斗爭。他此前一直是反俾斯麥寫手們最喜歡的靶子 [6](#6_31)  ；現在，皇帝派也為了相同的目標而利用他。他在權力減弱時受到攻擊—顯然俾斯麥無視布萊希羅德對自己俄國政策的異議。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布萊希羅德的影響有限。反諷的是，遭到最惡毒的攻擊時，他已經過了巔峰—而且他當時的選擇既是為了私利，也有利于國家。俾斯麥的反俄路線加速法俄兩國從金融著手建立同盟，俾斯麥一直正確地把它們的同盟視作對德國最大的威脅。不過，假以時日，俄國可能無論如何都會與法國建立新的經濟和政治關系 [7](#7_31)  。

布萊希羅德知道自己有了一些很強大的敵人，也許他甚至察覺到自己的存在加深皇帝與首相的裂痕。他的“朋友們”—荷爾斯泰因、品特和魯道夫·林道等人—樂意告訴他針對他的最新行動。他看到當權者的分裂，在威廉與俾斯麥關于其俄國計劃的爭議達到高峰時，布萊希羅德發出哀嘆：“但我必須知道俾斯麥是否會繼續統治，或者由誰統治！”—換種形式的話，那也是對威廉統治的標準哀嘆 [[50]](#50_14)  。

布萊希羅德的選擇顯而易見。他希望俾斯麥繼續統治 [8](#8_31)  。情感和私利要求他做出同樣的選擇：不遺余力地維護俾斯麥的統治。除了忠誠，布萊希羅德還知道威廉是激進反猶主義者的朋友。俾斯麥的敵人也是他的敵人，而且更加如此。反諷的是，布萊希羅德能為俾斯麥做的最大貢獻是他本人從政治中消失。他不能也不愿付出這個代價。

俄國貸款爭議只是俾斯麥最后危機的序曲—布萊希羅德見證俾斯麥的結局，就像他曾經在凡爾賽見證俾斯麥對德國統治的開始。1889年秋天和冬天，當俾斯麥在弗里德里希斯魯休養，而出訪近東的皇帝荒唐地對俾斯麥炫耀自己的勝利時，政治形勢逐漸惡化。

1887年，利用布朗熱派的復仇主義和卡特科夫反德活動的幽靈，俾斯麥喚起對戰爭的嚴重恐懼，并制造了一場“愛國”選舉。右翼的保守黨、自由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組成執政聯盟。這是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唯一一次擁有某種意義上的議會多數。維持這個不穩定的聯盟很難，而且俾斯麥似乎故意加速它的分崩離析。在他的指揮下，聯盟毫無組織地參加1890年2月的選舉，并以失敗告終。民族自由黨和自由保守黨失去一半議席，激進黨和社會黨的議席數分別是原先的兩倍和三倍。這是一場大敗，俾斯麥過去的保守黨—中央黨聯盟計劃現在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威廉或他的顧問們并不喜歡這樣。

2月20日的選舉結束后，俾斯麥開始實行“最糟糕的政治”（politique du pire），加劇現有的各種沖突，以便再次像一開始那樣成為不可或缺的領袖。選舉結束幾天后，他制定了與新議會為敵的路線；他暗示說，君王們創造帝國，他們也可能毀了它。他試圖拋棄自己設計的憲法，柏林的其他人則更愿意拋棄那部憲法的締造者。

到了3月初，布萊希羅德深感憂慮。在維也納之行中，他告訴自己的朋友和客戶，擔任德國大使的羅伊斯親王亨利七世，俾斯麥很可能倒臺。對布萊希羅德來說，這仿佛是“世界末日”。他還把瓦德西視作俾斯麥的頭號敵人 [[51]](#51_14)  。

布萊希羅德急著趕回柏林。從5月6日到13日，俾斯麥三次召見他 [[52]](#52_14)  。布萊希羅德可能還在其他時候見過俾斯麥，并見了后者的親隨。3月7日，他在俾斯麥府上待了一個半小時，他們決定展開俾斯麥生平最大的一筆金融交易，布萊希羅德隨即開始拋售俾斯麥的國債。他懇求俾斯麥不要辭職，兩人還討論了生存策略。俾斯麥希望迫使皇帝接受政變或中央黨—保守黨聯盟—無論哪種選擇都會使其失去獨立地位。現在，布萊希羅德主動提出—或者應俾斯麥請求—接洽中央黨領袖溫特霍斯特，就像1879年他上次安排兩人見面一樣 [[53]](#53_13)  。

布萊希羅德早就與一些天主教要人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就像我們知道的，他與溫特霍斯特和采邑主教科普（Prince-Bishop Kopp）尤其親密。溫特霍斯特和科普都批評天主教的反猶主義，但他們代表天主教的兩個極端。科普是教士外交官，擔任利奧十三世和俾斯麥的溝通者，對中央黨的“民主”傾向心存懷疑。作為獎賞，俾斯麥提名這位保守主教進入普魯士上議院，他在那里繼續秉持同國家配合與和解的路線。布萊希羅德認識這兩個人，現在希望利用他們來為俾斯麥辯護。科普“作為政府和中央黨的紐帶，似乎在整個［首相］危機中扮演關鍵角色”。科普還試圖說服威廉相信中央黨的可靠性 [[54]](#54_13)  。

科普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這位真正的采邑主教管理著微妙的布雷斯勞教區，那里不僅有對德國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的西里西亞天主教徒，還有作為上帝和波蘭虔誠信徒的數百萬波蘭人。他與布萊希羅德在1887年之后的書信顯示出（盡管兩人的通信顯然開始得更早）他是一個友好而有魅力的人。他的信總是表達與布萊希羅德見面的“渴望”，以及他“最深切和強烈的贊美”。在1890年的前三個月，當俾斯麥的命運正在被決定時，科普經常拜訪布萊希羅德，因為有“許多重要的東西”要告訴他 [[55]](#55_13)  。1890年3月，他五次請求被接見，有時甚至沒有實現書面通知就來訪。科普多次稱贊布萊希羅德的仁慈，這很可能也與物質方面有關，布萊希羅德可能向教區慈善提供過大量幫助。

3月9日，布萊希羅德與溫特霍斯特進行談話，第二天又與俾斯麥見面。3月12日，布萊希羅德安排兩位領袖會面，盡管荷爾斯泰因警告說那將是危險的 [[56]](#56_13)  。俾斯麥展現出坦誠的一面：他在會談伊始就宣稱皇帝準備罷免他。溫特霍斯特希望他留任，而俾斯麥表示，那只能通過中央黨的支持。兩人討論支持的代價；如果達成協議，德國政界將掀起軒然大波。溫特霍斯特要求廢除所有剩余文化爭端（Kulturkampf）的法律，并獲得對教育的獨立控制。俾斯麥聽上去愿意接受，但溫特霍斯特不知道他是否還有能力實現這些讓步。另一方面，溫特霍斯特懷疑俾斯麥繼任者的權力將更小。俾斯麥倒臺后，他說：“至少對我們而言，他離開得太早。”結束會談后，溫特霍斯特提醒羅騰堡一定要完全保密，因為此事曝光將傷害俾斯麥。他還對其他人說：“我來自一位臨終偉人的床前。” [[57]](#57_13)

這次著名的會面匆匆收場。俾斯麥的敵人們（很可能包括內政國務秘書波蒂謝）很快向威廉報告此事。報紙上滿是溫特霍斯特與俾斯麥見面的報道，這次會談被稱為“布萊希羅德的拜訪” [[58]](#58_13)  。會談結束三天后，威廉把俾斯麥從床上拖起，嚴厲斥責他接見了溫特霍斯特。俾斯麥非常惱怒，就像在德意志帝國常常發生的那樣，此事以對帝國公敵的隱晦指涉告終。這次，威廉指責俾斯麥與“總是同氣連枝的猶太人和耶穌會成員”打交道。威廉被俾斯麥擅自的政治行動激怒，更讓他惱火的是，俾斯麥的猶太人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根據皇帝重要心腹的說法，俾斯麥承認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并解釋說此人是他的銀行家，“猶太人通常是人類社會有用的一部分，他通過他們完成其他更重要的工作，甚至包括與外國政府打交道”。“布萊希羅德……一直是皇帝的眼中釘。” [[59]](#59_12)  在激烈爭執的最后，威廉要求俾斯麥辭職。

危機又持續了幾天。布萊希羅德直到最后都希望能夠避免最壞的結局，并對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表達這種想法 [[60]](#60_12)  。17日，他再次見了俾斯麥；現在，他意識到俾斯麥的被黜只是幾小時或幾天的問題。結束見面后，品特發現他“非常激動，抽泣著，心口發痛” [[61]](#61_12)  。布萊希羅德試圖說服威廉的親隨，至少應該讓俾斯麥留任外交部長，但沒能成功。在荷爾斯泰因的要求下，他顯然試圖說服俾斯麥至少讓赫伯特留在外交部，不過同樣沒能成功 [[62]](#62_12)  。

17日，皇帝兩次要求首相辭職。木已成舟，俾斯麥時代結束了。布萊希羅德直到最后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最后幾周的不確定中，他是活動和陰謀的中心。形形色色的人和派系都試圖利用他，但他為俾斯麥所做的努力失敗了。他甚至要為此承擔些許責任。因為在俾斯麥統治的最后—就像帝國在凡爾賽誕生之時—布萊希羅德的形象讓德國精英潛在的反猶主義公開顯現出來。1889—1890年，反猶主義出現在政界的最高層，即宮廷本身。它被用作對付俾斯麥的武器，后者直到那時都認為自己可以不受懲罰地利用猶太人和反猶主義者，就像他利用其他大部分凡人一樣。

布萊希羅德的眼淚是真心的。他與俾斯麥的親密關系已經維持二十八年，與那個偉大人物的相處無論有時多么艱難，它都讓布萊希羅德在感覺和實質上擁有重要性，那是他身份的一部分。輕視和痛苦已被遺忘；和許多下屬一樣，他也忘記自己曾抱怨俾斯麥“不懂得體諒，像擠檸檬那樣壓榨別人” [[63]](#63_12)  。剩下的只有悲傷，因為他與權力的聯系被切斷，他為大人物服務的習慣被打破。俾斯麥的倒臺也意味著布萊希羅德的失勢，他特殊的太陽落山了。眼淚是為自己而流。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們當然認為他需要安慰。聽到這個消息后，羅斯柴爾德男爵從巴黎來信說，巴黎家族對俾斯麥辭職的悲傷是布萊希羅德難以企及的：

我們不便表態支持德國首相。不過，如果你有機會見到他，我們請求你告訴他：出于世界和平的考慮，我們對他的離開深表遺憾，因為我們確信，過去這些年的和平局面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的努力。如果我們不認為和平受到威脅，那主要是因為我們相信，鑒于親王的巨大影響，他可以在幕后為和平努力，就像他過去做的那樣。 [[64]](#64_12)

無所不在的基翁寫道：“過去幾天里的大事……無疑讓您非常痛苦。即使國外的最大死敵也認為，他留在德國的最高層被看作和平的保證，但您三十年的老朋友卻在此時離開政治生活。” [[65]](#65_12)  德國駐羅馬大使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克里斯皮首相把俾斯麥的離開看作重大的個人和政治打擊 [[66]](#66_11)  。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信表達同樣的看法。歐洲的悲痛遠遠超過德國。

在柏林，獨裁者的最終離開讓人感到解脫和興奮，人們高興地看著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狼狽。作為俾斯麥的老朋友，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在他被罷免當天寫道：“［俾斯麥］一家正遭受粗暴而殘忍的復仇。他們并非完全無辜，因為他們曾用同樣的方式將許多大大小小的人物打倒在地：但這幕景象并不令人愉快。我的天啊，經歷昔日各種拜占庭式的卑躬屈膝，現在將出現什么樣的卑鄙行徑？” [[67]](#67_11)

布萊希羅德的地位顯然受到傷害。1890年4月，品特寫道：“布萊希羅德現在幾乎完全消息閉塞。他唯一的親信是奧伊倫堡伯爵；大使們似乎也在離他而去；當然，布萊希羅德不再是俾斯麥。” [[68]](#68_11)  反俾斯麥風潮和人們突然轉而效忠新的統治者讓布萊希羅德陷入困境。

但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很久。布萊希羅德本人并非沒有政治適應力，他對俾斯麥的個人忠誠也沒有妨礙他努力與新統治者們建立密切的關系。俾斯麥倒臺后，一些人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更近了，比如荷爾斯泰因；他不再對荷爾斯泰因構成那么大的威脅，因此他們恢復甚至超越了過去的親密。現在，荷爾斯泰因稱布萊希羅德為“尊敬的朋友”，兩人不斷交流消息。他維持與國務秘書波蒂謝的良好關系，盡管俾斯麥鄙視此人，視之為叛徒 [9](#9_29)  ；他還結交阿爾弗雷德·馮·基德倫—威徹（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和路德維希·拉施道這樣的政治新星以及新任外交秘書馬紹爾·馮·畢伯施泰因男爵（Baron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并時常接觸他們的助手 [[69]](#69_11)  。他繼續與政府商議，相信沒有政府希望拒絕他的消息或觀點。這位銀行家與俾斯麥關系的很大一部分是實用性的，他認為自己理所當然能夠與任何政府打交道。1891年12月，正值事業巔峰的卡多夫在與布萊希羅德見面后寫道：“他總是消息靈通。他對我保證，卡普里維受到皇帝的尊敬，因為此人愿意做皇帝希望的一切……” [[70]](#70_11)

布萊希羅德充當新的集體政府與那位被黜獨裁者的橋梁。柏林和弗里德里希斯魯之間只有懷疑。俾斯麥竭盡所能讓新的統治者們尷尬，確信他們正在破壞他的成果。那些人則非理性地擔心他卷土重來，因此不遺余力地阻撓他。布萊希羅德不時成為有用的溝通者，并打破關于俾斯麥與皇帝可能和解的一切傳言。按照布萊希羅德的說法，俾斯麥說如果他試圖和解，妻子就會和他離婚。之前，布萊希羅德還表示，俾斯麥恨他的敵人直到第四代，而約翰娜則恨他們直到第一千代 [[71]](#71_11)  。

落魄中的俾斯麥甚至更加珍視布萊希羅德，而且更加公開。布萊希羅德的忠誠和熱心從未動搖。他與倒臺后的首相保持最親密的關系。在俾斯麥抵達弗里德里希斯魯的當天上午，受他們信任的施魏寧格醫生給布萊希羅德發了電報：“親王夫婦睡眠安穩，感到精力充沛。” [[72]](#72_11)  令大部分柏林人高興的是，他們不必再擔心俾斯麥敏感的健康。退隱后的第二天，俾斯麥慶祝自己的75歲生日—布萊希羅德當然是少數向他表示祝福的人之一。兩人進行長談，俾斯麥解釋說，對他傷害最深的是皇帝虛偽地在世人面前假裝與自己友好分手 [[73]](#73_11)   [10](#10_29)  。

俾斯麥繼續向布萊希羅德透露自己的想法。他們繼續通信、見面和交換消息，并相互信任。俾斯麥擔心他們的親密關系會招來監視；1890年6月，布萊希羅德的一封來信丟失，俾斯麥要求柏林和弗里德里希斯魯的郵局仔細調查。在主人的要求下，他的秘書寫道：“懷疑某個部門搗鬼，可能是本地的，或者更可能是柏林的。這樣的事可能再次發生。我們不相信柏林的所有部門完全不對大人和您的通信感興趣。” [[74]](#74_11)  俾斯麥的擔心顯示出他多么重視與布萊希羅德的通信。他通過親身經驗知道，很容易下令監視某人的通信。他總是相信，敵人和他自己一樣無情與狡猾。此外，被黜的統治者總是自負地認為，他們會讓繼任者坐臥不安。

布萊希羅德定期拜訪俾斯麥，總是受到熱情的歡迎。俾斯麥急于了解消息，常常詢問布萊希羅德對于爭議問題的“專業看法”，比如卡普里維的新貿易條約 [[75]](#75_11)  。兩人見面時會討論現在和回憶過去。有時，布萊希羅德還會提出建議，比如1890年6月，他敦促俾斯麥緩和在報紙上的論戰。俾斯麥回答說：“當我受到攻擊時，我會還擊，否則我睡不著覺。” [[76]](#76_11)  幾天后，俾斯麥接受《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五個小時的采訪，并要求布萊希羅德把發表后的訪談內容寄給他。布萊希羅德告訴品特，他更希望“親王稍稍沉默些” [[77]](#77_11)   [11](#11_29)  。

由于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的親密關系，柏林的達官顯貴們仍然找他幫忙；他關于俾斯麥想法和計劃的報告廣為流傳，還常常傳到威廉的耳朵里 [[78]](#78_11)  。有時，他還為俾斯麥及其昔日的伙伴或熟人斡旋，這些人擔心俾斯麥已經斷絕同他們的關系。最令人唏噓的例子也許是科普，他對布萊希羅德抱怨說，俾斯麥的報紙沒有正當理由地攻擊他。“盡管我對報紙的行徑無所謂，但我無法對親王的評價無動于衷。”關于他支持波蘭暴動的指控不是真的：

不幸的是，我所處位置的部分困境在于，我同時扮演著波蘭人抱負的幫助者和敵人……我本人無意選舉或影響中央黨……為了政治目的而犧牲我肩負的教會職責，這有違我對自身位置和責任的理解。

鑒于布萊希羅德的善心，科普認為他知道如何利用“這番誠摯的表白……我不希望親王認為我已忘記過去—我終于記住，永遠心懷感激和贊美” [[79]](#79_11)  。幾周后，當科普成為紅衣主教時，俾斯麥給他寫了熱情的賀信，保證對他的看法沒有改變 [[80]](#80_11)  。

布萊希羅德是俾斯麥退隱后少數仍然對他忠誠的人之一，他對此心懷感激。他現在幾乎沒有什么能給布萊希羅德；他知道布萊希羅德的忠誠代表真正的尊敬，于是也對后者抱以熱情的敬意。1893年，俾斯麥回憶說，無論布萊希羅德的個人生活如何，“在我面前，他總是一位無私、極為聰明、謹慎和高效的商人，思維非常縝密”。然后，俾斯麥提到布萊希羅德的全部服務，并總結說：“簡而言之，我本人受過他的恩惠并感激他。”俾斯麥還曾對一位記者表示，即使在他隱退后，布萊希羅德仍然對他表現出“熱心和令人愉快的忠誠，可以作為我們的愛國基督徒同胞的榜樣” [[81]](#81_11)   [12](#12_27)  。

俾斯麥信中經過仔細斟酌的稱呼形式反映了這種更加親密的關系。在布萊希羅德去世前兩年的信中，俾斯麥的信以“尊敬的朋友”開頭，并幾乎總是以“您的”（Der Ihrige）結尾，這種形式特別用于同僚和老友，比如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和馬伊巴赫。他寫道：“尊敬的朋友，您的熱情鼓勵和精美的［生日］禮物再次證明您對我的情誼，這本身對我是最寶貴的。” [[82]](#82_11)  俾斯麥在圣誕節回贈給布萊希羅德一張他自己的簽名照，并把關懷延伸到布萊希羅德的孩子們身上。現在，他們也被邀請前往弗里德里希斯魯，受到雖非無條件但不失熱情的歡迎。

俾斯麥經常對布萊希羅德的健康表示關切。布萊希羅德去世前幾周，他寫道：“我很高興在您的來信中看到，您的健康令人滿意，或者像您說的，過得去。因此我希望當天氣暖和些時，您能賞光再次拜訪我們夫婦。” [[83]](#83_11)  這是俾斯麥寫給布萊希羅德的最后一封信。布萊希羅德死后，俾斯麥致信施瓦巴赫：“馮·布萊希羅德先生的去世讓我失去各種情況下都忠心耿耿的真正朋友。我很高興貴行狀況如常，我希望在未來延續與貴行多年來的關系。” [[84]](#84_11)  俾斯麥派女兒為代表出席布萊希羅德的葬禮，并送上一個很大的花圈。這是他最后一次公開表達對布萊希羅德的尊敬和友誼。

退隱后的俾斯麥最初生活在伐爾岑，從1894年起搬到弗里德里希斯魯，生活對他來說變得日益孤獨。他把自己離開柏林形容為“哀榮備至的國葬” [[85]](#85_11)  。1894年，他的文書洛塔爾·布赫爾、銀行家和約翰娜先后去世。他身邊的世界變得寂靜，健康狀況也更加糟糕。等到1898年死亡降臨時，他其實早在幾年前就已失去生機。

俾斯麥在回憶錄中沒有提到布萊希羅德，他的編輯和傳記作者也同樣假裝布萊希羅德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布萊希羅德生前，他所謂的邪惡影響常常被夸大，死后卻不應該地被漠視。但布萊希羅德也許感覺到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在三分之一個世紀里，他在俾斯麥的德國扮演重要角色，幫助塑造那個德國，并讓該國首相越來越依賴他。他不明白的也許是，他的成功與羞辱的奇特組合反映出德國人與猶太人關系的嚴重缺陷。

[1.](#1_32) 不安的警惕是治國的一部分。1886年8月，俾斯麥聽到傳言，俄國政府向仙靈公司（Schering）訂購4000千克碘。碘通常被用來給傷口消毒；俾斯麥對這樣的疑似戰備交易“感到不安”，要求馬上展開秘密調查。羅騰堡致外交部，1886年8月18日，GFO：I.A.A.a.50，adh，secreta，vol.3a。

[2.](#2_32) 《經濟學人》用在今天的人看來相當尖刻的方式評價《抵押貸款禁令》與沙皇來訪的巧合：“當急需用錢的俄國財政部發現德國首相的命令讓他們的債券被本來最方便進入的交易所拒之門外時，他們一定不高興。這些宮廷人物得過且過，總是面臨缺錢，在政府從不拮據的英國人看來，他們對金融的看法相當有失體面。”1887年11月26日，第1490頁。

[3.](#3_30) 魯道夫·菲爾肖（Rudolf Virchow，1821—1902），德國醫生和生物學家。克勞德·貝爾納（1813—1878），法國生理學家。——譯注

[4.](#4_30) 伯恩哈德·馮·彪羅（1849—1929），前帝國外交國務秘書恩斯特·馮·彪羅之子，1900—1909年擔任帝國首相。——譯注

[5.](#5_30) 關于他重新入籍可能性的警方最終報告（被提交給內閣第二辦公室）提供了一些線索，也讓我們罕見地見識警方對傳統道德的看法：“他可能希望從各種活動中［包括巴拿馬丑聞］實現巨大利益，但我們沒有找到任何表明他不誠實的證據。德·基翁先生的生活一直極為舒適……他的舉止并非無可指摘，但符合或基本符合我們時代的大部分浪蕩子。雖然已婚而且是一家之長，但他有多位情人，特別是與女演員瑪麗·勒古爾（Marie Legoult）保持著關系。勒古爾為他生下一個孩子，被他接到自己家里。”巴黎警察局塞納河檔案，1895年5月28日。

[6.](#6_30) 當然后來仍然如此：1889年秋，布萊希羅德獲得沙皇頒發的圣安妮騎士勛章，幾家報紙“借機批評猶太人缺乏愛國心，毫不赧顏地利用自己的信用壯大德國的敵人”。漢澤曼也獲得勛章，但未受指責。貿易與工商業部致馮·里希特霍芬，1889年10月9日，DZA：波茨坦，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羅馬導報》（Le Moniteur de Rome）剪報，1889年10月13日，GFO：俄國71，編號1，第5卷。

[7.](#7_30) 通常喜歡強調長期趨勢重要性的漢斯—烏爾里希·維勒持老派觀點，把同盟歸咎于俾斯麥的體系，并援引俄國保守派外交部長吉爾斯的名言作為證據：“俾斯麥把我們趕到法國人手中，特別是通過他的金融手段。”但在1893年，吉爾斯還能對德國大使說些什么呢？見維勒，《帝國的重重危機，1871—1918》（哥廷根，1970年），第178—180頁［Hans-Ulrich Wehler，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öttingen，1970），pp.178-180］。

[8.](#8_30) 他已經為俾斯麥的可能離開擔心了一段時間。1888年5月，在腓特烈三世的短暫統治期間，他懇求俾斯麥不要因為與皇儲威廉觀點不和而辭職。按照經過荷爾斯泰因精心編排的句子，布萊希羅德告訴俾斯麥：“閣下，當一對馬受驚狂暴，車夫是被甩下車好呢，還是留在座位上繼續對它們施加一點控制好呢？”諾曼·里奇和費舍爾編，《荷爾斯泰因文件》（劍橋，1957年），第二卷，第374—375頁。

[9.](#9_28) 1891年，報紙上出現下面的故事，可能是俾斯麥本人泄露的：幾年前，波蒂謝的岳父，一位帝國銀行的官員對官方資金處置不當（可能挪用了那筆錢）。在俾斯麥的要求下，布萊希羅德和其他銀行家據說幫助波蒂謝籌措了35萬或100萬馬克。后來，俾斯麥也給了波蒂謝同樣多的錢，可能來自韋爾夫基金，讓他還給銀行家們。這個故事真假莫辨，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為了抹黑波蒂謝而將其泄露感到震驚。俾斯麥在回憶錄中重復這個故事，但沒有提到布萊希羅德的角色。恩斯特·菲德爾編，《俾斯麥的宏大游戲：路德維希·巴姆貝格的秘密日記本》（法蘭克福，1932年），第462頁［Ernst Feder，ed.，Bismarcks Grosses Spiel.Die Geheimen Tagebücher Ludwig Bambergers（Frankfurt a.M.，1932），p.462］；赫爾穆特·羅格，《荷爾斯泰因與霍亨洛厄》（斯圖加特，1957年），第357頁［Helmuth Rogge，Holstein und Hohenlohe（Stuttgart，1957），p.357］；《俾斯麥全集》，第15卷，第481頁；諾爾·馮·德·納莫，《俾斯麥的爬行動物基金》（美因茨，1968年），第190—201頁［Robert Nöll von der Nahmer，Bismarcks Reptilienfonds（Mainz，1968），pp.190–201］。

[10.](#10_28) 俾斯麥被罷免時，威廉給他寫了公開信，封他為勞恩堡公爵，并承諾給他一張真人大小的皇帝像。對于新頭銜，俾斯麥表示他會在想要匿名旅行時使用；我們沒有對于真人大小肖像的評論，但可以想見會是什么樣。一個月后，威廉向施魏寧格發出無理要求，命令他繼續照顧俾斯麥的健康，并經常向皇帝報告。霍斯特·科爾編，《俾斯麥大事記》（萊比錫，1892年），第二卷，第499頁［Horst Kohl，ed.，Bismarck-Regesten（Leipzig，1892）II，499］；威廉致施魏寧格，1890年4月24日，DZA：Merseburg：Rep.89H，Zivilkabinett XXIII，12ff。

[11.](#11_28) 在訪談中，俾斯麥表現出新的和平姿態—德國完全滿足了：“我們不想冒風險。”他對法國特別關心，以至于編輯總結說：“與他人生中的其他任何時候相比，今天的俾斯麥先生是和平必不可少的保衛者。”俾斯麥對個人的困境感到悲哀：“我花了四十三年改掉自己的鄉紳習慣；我很難再變回農民；政治仍然抓住我并不愿離去……［但］我忘記自己再沒有什么可做的。”《小日報》，1890年5月29日。

[12.](#12_26) 感激并非不能與惡意交替，特別是當惡意符合時機。1890年8月，在與一名反猶主義者編輯交談時，俾斯麥對布萊希羅德做了最輕蔑的評價：“我完全知道布萊希羅德是何許人和做過什么，知道這類沒受過多少教育、缺乏堅實的道德基礎、在無窮財富中養尊處優之輩習慣于做的各種事和擁有的各種喜好。但我不能而且不應該對他無禮，因為那違反先人對貴族禮貌的要求。”他贊揚布萊希羅德的金融服務，后者沒有為此獲得任何回報，沒有獲得任何國家機密：“我知道布萊希羅德可能會喜歡（這樣的機密），也許還會向第三方炫耀他是俾斯麥的銀行家，但那是這個種族和行當的一部分。即使我改變自己的銀行家，我也無法改變那些。”《全集》，第9卷，第86—87頁。

# 第三部分　融合的痛苦

## 第十七章　作為愛國新貴的猶太人

但這個世界上最無意義的事情之一是罪責問題受到的嚴肅對待，至少在我看來如此。我覺得無意義的并非發出指責；痛苦中的人無疑會向方方面面發出指責（在最痛苦的狀態下當然除外，因為那時人們無力指責）；同樣可以理解，人在激動和混亂時會對這些指責耿耿于懷；但我完全無法理解的是，人們認為可以像爭辯任何如此清楚、能決定日常行為的普通算術問題那樣對罪責問題進行爭辯。你當然應該受到指責，但然后你的丈夫也難辭其咎，然后再是你，接著再是他，因為這在人類的共處中不可避免，指責不斷堆積，最終到達曖昧的原罪。但對于我的今天和去伊舍看醫生來說，在永恒之罪中糾纏有什么用呢？

——弗朗茨·卡夫卡，《致米萊娜的信》（Letters to Milena）

布萊希羅德的成功和德國一樣迅速而不尋常，但也和德國一樣脆弱。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職業生涯反映了他所屬的兩個世界的某些基本過程，其中一個是他誕生的地方，另一個是他迫切渴望的地方。他生來是猶太人，選擇成為德國人。多年來，他認為自己可以把這兩個世界合而為一，與猶太世界的私人和松散的關系不會與在德國世界中的公共和更重要的角色發生矛盾。事實上，他的中年見證德國人與猶太人社會最風平浪靜的融合時期，他的晚年則出現對這種融合的第一次有組織否定，他的成功本身被視作否定的理由。

德國在19世紀崛起的故事耳熟能詳。經過許多個世紀的分裂，這個國家終于由上而下實現統一，它的誕生密不可分地與領袖們維持專制政府本質的意志交織在一起。剛剛統一的國家因為現代化的力量和工業資本主義的全面沖擊而分裂，這些影響導致傳統的統治階級陷入經濟上的困境，導致市民階級擔心社會主義的興起。在象征意義上和實踐中，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都試圖捍衛舊階級—在經濟上給予保護，重申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準則至高無上—并剝奪已經受到威嚇的中產階級的政治意愿。獲封貴族后的布萊希羅德沒有追求某種獨立的貴族生活方式，而是以富豪的身份效仿傳統封建階級。而那個階級雖然受他很多恩惠，卻因為他的富豪身份和平民出身而憎惡他。

德國猶太人的融入反映了19世紀德國社會所走的特別道路，與法國、英國和荷蘭的道路截然不同。德國人不情愿地解放猶太人，解放者們認為，比基督徒低等的猶太人將提高自己的道德—最好通過皈依。解放者們不可能知道，解除障礙后，一個相對封閉的社群將很快變得充滿動力，機會將大量出現，新富者將挑戰昔日的特權者。解放解除障礙，但給予猶太人史無前例飛躍機會的是社會現代化，是突然有可能通過教育和財富出人頭地。德國猶太人從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受益，其他德國人同樣如此。但流動性對某些人意味著自由，對另一些人則意味著心理和社會的可怕動蕩。當猶太人在經濟領域春風得意時，那些失去位置、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經常與猶太商人和貸款者有過直接接觸和競爭）回想起解放者的愿望，即猶太人將會提高自己的道德。19世紀70年代，批評者宣稱，猶太人不僅遠沒有“提高”（成為德國人），反而把德國人拉低到他們的層次，用他們的物質主義方式污染德國人。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一個新的反猶主義團體認為猶太人象征現代性，象征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從中牟利。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德國的自由主義較為弱勢，在意識形態上也有所區別。德國的市民階層也從未像法國或英國資產階級那樣獲得自信和歷史意義，這意味著德國猶太人社群沒有自由之盾，以普遍承認的人權法則之名保護他們的權利。貧窮而貪婪的武士—地主階級的道德支配意味著金錢話題滿載虛偽和禁忌，比類似情感以某種沉默形式存在的其他國家更加嚴重。一門心思關心錢沒有好處，但就像德國的例子所展現的那樣，否認錢的重要性，或者向往由榮耀或美德而非金錢決定地位的田園詩般的過去是一種愜意但危險的幻覺。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民族主義出現好斗和排外的特點；比起其他地方的狹隘，它甚至更加無法容忍多元文化，或者既在國內保持團結又與國外維持特殊關系的少數族裔。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狹隘民族主義的鼓吹者，但他們在德國社會領導階層中能引起更大的共鳴 [[1]](#1_59)   [1](#1_35)  。

我們概括了決定布萊希羅德人生和時代的某些歷史力量。他只是隱約感受到自己職業生涯的這些更大衍生品；很少有人理解主導他們時代的潮流。除了金融事務，布萊希羅德的眼光并不比大多數同時代的人更銳利。因此，他很難理解決定德國人和猶太人普遍生活的特殊狀況與力量。他無法理解為何德國人對待猶太人的方式看上去如此反復無常，也許沒有其他哪個民族以同樣令人費解的方式混合熱情與敵意 [2](#2_35)  。布萊希羅德是柏林的商人之王；在他之前，從未有猶太人，也很少有平民達到他的高度；在尊敬、諂媚和低聲咒罵中，德國社會處處對他打開了門—但通常是后門。他沒有理解過去或含糊的現在，因此也不可能預見未來。和大多數人一樣，他根據現在進行推斷，看見一個融入變得日益方便、猶太人被社會接受（如果有必要，還會被國家保護）的世界。19世紀60和70年代，他有理由感到樂觀：未來顯然屬于融合和融入，屬于像他這樣獲得被國家封為貴族之榮譽的猶太人。迫害猶太人已經成為歷史，成為不幸的過時之事 [[2]](#2_59)  。他不可能理解自己人生的歷史狀況，對自己主觀經驗的認知也存在偏頗。

法律說，你是平等的。俾斯麥和國王授予布萊希羅德的貴族證書說，你高人一等。基督徒世界說，你低人一等，并在他背后嘀咕道：“骯臟的猶太人……他骯臟的猶太人的錢……和塔木德的智慧……猶太豬。” [[3]](#3_57)  他內心的聲音說，你不是他們的一員，你和你的同族比你們生活于其間的那些人低等—但在智力、敏銳、精明和刻苦上更勝一籌。世界還記得弒神和罪惡，而渴望被接受的自己仍然沒有完全忘記信仰，即猶太人畢竟是上帝的選民。近代的猶太人和德國人在一件事上看法相同：兩者有天壤之別，法律上斷言的平等只是讓他們在交往時更不自在。

事實上，一些猶太人的這種不自在感更加強烈。19世紀中葉，德國的50萬猶太人大多更喜歡生活在看不見的隔離區中，他們比鄰而居、共同工作和相互通婚。在法律解放—最后的限制于1869年被廢止—和日益融合的時代，他們逐漸冒險跨過了不可見的界線，進入中學和大學里的基督徒世界，成為商人和士兵，醫生和科學家，銀行家、記者和律師。

在德國人與猶太人糾結而悲劇性的歷史中，布萊希羅德象征著一個重要時刻。作為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猶太商人，他的人生代表猶太人所能企及的高峰，以及攀爬過程的痛苦和危險。作為俾斯麥的朋友和國王的通信人，作為大企業的投資人和貧窮貴族的物質救世主，布萊希羅德證明德國人和猶太人的共處能給雙方帶來多少好處。他的成就和社交成功令人驚訝。他贏得德國猶太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認同和地位。他顯然也代表成功與融合的可能。但族群的歷史顯然不能由外在的行為或成功來書寫，特別是德國猶太人的全部歷史。舉止和行為的核心取決于人們的態度，無論是否有意識，無論是否表達出來。當接近出身隔離區的布萊希羅德獲封貴族時，他的態度也發生改變：和許多猶太人同胞一樣，他對施予和奪走恩惠的國家產生最強烈的忠誠。他向國家證明，猶太人極其有用，幾乎是資產階級的替代品。他還把國家看作使自己免遭反猶主義迫害的保護者 [3](#3_33)  。

布萊希羅德的人生是德國猶太人的超大畫像，他們（特別是成功的猶太人）的許多行為方式和價值觀都反映在此人身上 [4](#4_33)  。新帝國的建立惠及幾乎所有的猶太人，但布萊希羅德的獲益獨一無二。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成了熱情的愛國者甚至超級愛國者，但在新帝國，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的依附象征這種忠誠。大多數猶太人繼續把國家看作潛在的施惠者，但布萊希羅德證明，國家可以提供重要恩惠，有時甚至還能動員它幫助國內外受到威脅或虐待的猶太人。

不過，布萊希羅德的人生也表明，這種有利可圖的共存也有另一面。有時，他在與當局的關系中表現出卑躬屈膝和諂媚。本可以懇求時他會乞求，本可以要求時他會懇求，本該堅持時他會屈服，本該自豪時他會虛讓。他不吝向施惠者和朋友們奉上禮物，也慷慨地向公共慈善捐款。常言道：施予者受到雙倍祝福；但布萊希羅德的施予行為更加復雜，他不僅像常人那樣期待回報，而且感到慈善是職業必要和一種心照不宣的納貢 [[4]](#4_57)  。

比起同時代的其他任何德國猶太人，布萊希羅德生活在基督徒世界的邊緣。因為他的有用和貴族身份，只有他進入德國社會的最高層。他是唯一能“出入宮廷”的猶太人。某些榮譽會帶來羞辱。他急于尋求被那個社會接受，阻力越大，他對成功的欲望就越強烈。成功必須是可見的—于是就有了對勛章的追逐、宴會上的炫耀和熱衷于提供柏林最好的款待。布萊希羅德是雙重意義上的新貴：他的金錢和地位都是新得的。新貴的生活從不令人愉快或給人教益：在德國社會，猶太人新貴或賤民出身的商人之王處境特別艱難。

布萊希羅德遭遇各種敵意。他的許多朋友都是“禮貌”和背后的反猶主義者，他還不可避免地因為某些“猶太式”失禮而受到嘲笑。他在社交上遭到某些貴族的蔑視，比如反復拒絕他熱情的邀請。他與赫伯特·馮·俾斯麥決裂，并遭到后者親隨的惡作劇。也許布萊希羅德忽視這些輕視，也許他不為所動。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他的孩子們一事無成卻渴望一切，他對他們的失敗不可能不為所動。他們皈依新教，但沒有接受新教的倫理，這種對工作福音的無條件接受是他們父親人生的指導原則。

他也無法忽視德國反猶主義的興起，他是這場風暴的首要目標。反猶主義文人和精心組織的運動把他描繪成解放和奠基活動的最大牟利者。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毀譽參半。回過頭來看，最令人吃驚的是，那些曾經帶給他榮耀并從他那里獲利的人完全沒有保護他。布萊希羅德只得獨自一人對付敵人，有時也會請求國王和首相保護全部猶太人。但即使俾斯麥有所行動，那也不是為了布萊希羅德、猶太人或正義，而是因為他看到有些攻擊的目標是他本人和財產。他認為兩者都神圣不可侵犯。

作為德國猶太人，布萊希羅德最主要的感情無疑是滿足和安全。他已經取得可觀的成就，并獲得安全。但他和猶太人同胞的崛起并非沒有受到挑戰；用今天的話來說，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反彈變得越來越強烈。長久以來，對國家和“熱心”的俾斯麥的信賴打消了他的恐懼，讓他覺得反猶主義有望再次消失 [5](#5_33)  。

對他和他的同族的攻擊加強他作為猶太人的奇特自卑感。通過熱烈擁護一個把他排除在外的精英階層的價值觀，通過按著這些主流價值和習慣塑造自己的生活，他讓自己和孩子們永遠變得脆弱。被德國社會最高層真正接受只是幻覺，引誘蓋爾森和他的孩子們走上不歸路，在無法實現之雄心的荒野中越陷越深。

蓋爾森有別的選擇嗎？我們將會看到，他的弟弟尤里烏斯的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評價蓋爾森時 [6](#6_33)  ，我們必須記住他試圖融入的德國社會的特點。在某種意義上，獲封貴族是一種御前表演。他被強行賦予新角色，雖然他曾經對此如饑似渴。他把自己看作開拓者。其他同樣受到青睞的猶太人將追隨他的腳步，但目前他的模板只有自己。他的憧憬也并非完全不切實際。德國猶太人的崛起如此驚人，以至于不斷融合的希望似乎也顯得合理。德國人和猶太人的命運在友誼和婚姻中發生交會。對于成功者而言，接受似乎變得可能；殘留的偏見可以被無視（或者以牙還牙）；新教徒與天主教徒、普魯士人與巴伐利亞人之間，不也有根深蒂固的對立嗎？

蓋爾森身上令人驚奇的地方并非融合與接受的希望，而是追求這個目標的方式。但比他年輕得多、出生在反猶主義再次興起時的人“渴望不僅是客人，不被視作外人。他們不希望做被邀請的客人，或者出于同情和善良而得到寬容，最重要的是，并非因為主人愿意忽視他的種族和出身而被接受” [[5]](#5_57)  。19世紀70年代初，在柏林的一位英國觀察者對猶太人的顯赫身份和他們在基督徒中的地位印象深刻：“事實上，柏林基督徒遠比英國基督徒寬容。” [7](#7_33)  在幻覺和雄心上，布萊希羅德并不唯一。

但我們必須注意避免把布萊希羅德可能陌生的感情和敏感性放到他的身上。他內心深處的感情從未被記錄：他沒有留下日記，他的信中只有寥寥幾封帶有私密或坦誠的內容。他顯然為人遲鈍，對許多輕視不敏感，滿心以為他的財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擋來自下層的攻擊。遲鈍也許是社交成功的關鍵，就像智慧是他物質成功的關鍵。他全無海涅那樣的情感，在心理意識上甚至不如卡爾·菲爾斯騰貝格或瓦爾特·拉特瑙 [8](#8_33)  。人們普遍認為，解放剛剛開始，隨著德國人意識到猶太人的巨大用處，反猶主義偏見將會消亡，這種想法可以減輕他的任何擔憂或恐懼。在對持續進步的簡單假設中，他反映了許多富有猶太人的態度。但現實要無情得多。甚至布萊希羅德的失明也帶有某種殘酷的象征意義：當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一個充滿或明或暗仇恨的世界時，他無法看見危險。

布萊希羅德的猶太人同胞對未來抱有同樣的信心。無論在其他問題上多么意見不一，大多數猶太人都認為，緊跟著完全解放到來的新帝國宣示了他們的新時代。他們流露出對德國事物的驕傲和對他國同族的不滿。早在1866年，布萊希羅德的普魯士愛國主義就惹惱了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這種忠誠和驕傲維持下去，直到1916年，一位法國觀察者注意到：“今天，德國仍然存在著普魯士人、薩克森人、巴登人、符騰堡人和巴伐利亞人。只有猶太人完全是德國人。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他們組成帝國的支架。” [[6]](#6_55)  ）但他們的忠誠、熱愛和超級愛國主義并未獲得回報 [9](#9_31)  。因為偏見仍然非常強烈，憎惡不減反增。

這里不便對反猶主義情感的歷史做出哪怕最簡單的描繪 [[7]](#7_55)  。反猶主義是一種源于宗教的古老歧視（猶太人被認為手上沾染耶穌的鮮血），對猶太人的強制身體隔離讓這種歧視更加強烈，因為他們被驅逐到隔離區繼續自己的宗教生活。由于基督徒的意愿和后天習得的技能，猶太人成了早前時代的“賤民資本家” [[8]](#8_55)  。法律和習俗禁止他們從事大部分行當。夏洛克式的猶太人耳熟能詳—但他們的故事也非常復雜，就像莎士比亞的夏洛克提醒我們的。

取消大部分法律上的限制，但非正式的限制和偏見仍然存在。反猶主義總是帶有仇富成分。就像我們看到的，在新的德國，隨著資本主義的傳播，對它的反感也日益擴散。貴族們繼續讓“家族猶太人”為自己打理生意，因此他們同時表達對追求者和追求行為的鄙視—這也表明他們認為猶太人擅長此道。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相對寬容的自由主義插曲是短暫的。民族國家給予猶太人被昔日等級國家拒絕的權利。但隨著猶太人從種種限制中解放出來和參與德國社會的競爭，他們引起激烈的反應，而民族國家，尤其是德國，對任何形式的越軌或多元主義開始形成一種極度的不寬容。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民族主義變得狹隘，猶太人—曾經被視作違背信仰的罪人—成了意圖對國家不利的陰謀者 [[9]](#9_53)  。文化絕望的政治融合民族主義、反現代和反資本主義，猶太人在其中成了罪惡的象征。1870年后，逐漸有傳言說，這股異族力量是巨大國際陰謀的一部分，“致力于毀滅然后統治其他人類” [[10]](#10_52)  。

猶太人有自己的一系列偏見和情感，在變化的外表下，它們同樣顯得特別根深蒂固。首先，即使融入程度最高的猶太人也相信自己屬于單獨的群體，最初依靠共同的信仰、儀式和苦難來維系著；但這些共同體驗消失時，某些早前時代形成的特征留下來。無論他們是否想這樣，但他們在外表、思想和感覺上是猶太人。但這種身為猶太人特征是什么呢？和新教徒一樣，宗教在猶太人中間同樣逐漸式微，對科學的信仰削弱對超自然的迷信。在啟蒙時代，猶太宗教還剩下些什么呢？為了這些宗教殘余，值得總是強調不同的身份和潛在的敵意嗎？

開明派新教徒們不這樣認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應該把他們現在已經式微的信仰放在普通德國人的祭臺上。他們希望猶太人欣然為了解放的特權而放棄自己的宗教。啟蒙者把猶太教看作特別的反啟蒙力量—激烈的反猶主義無疑受到了它的影響—這種觀點開始與興起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導致最寬容和開明的新教徒也無法接受猶太人在宗教上的自成一體 [10](#10_31)  。許多德國人希望放棄猶太教，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討厭猶太人，也因為他們討厭多元文化，一個仍然擁有強大內部凝聚力的群體對此感到不安。

他們很難理解猶太人的命運。就像布萊希羅德的人生所展現的，猶太人的狀況經常通過微妙和不確定的方式隨著時代而變化。1830年到1880年間，基督徒很少明確表達希望猶太人用皈依換取解放的想法。猶太人認為自己有權獲得解放，同時又保留德國化的獨立性。現在他們用德語提供服務，并以德國人自居，這難道還不夠嗎？他們不能作為猶太信仰或摩西信仰（當時的委婉說法）的德國公民融入嗎？不過，瓦爾特·拉特瑙直到1911年仍然表示：“每個德國猶太人在少年時都將經歷終生難忘的痛苦時刻：他第一次充分意識到，自己以二等公民的身份踏入世界，任何成就和服務都無法讓他擺脫這種處境。” [[11]](#11_52)  也許出路是接受洗禮，反猶主義壓力迫使一些人這樣做，也讓另一些人望而卻步。拉特瑙還指出：猶太人會為了獲得物質利益而猶豫是否要放棄祖先的精神遺產嗎—即使他早就接受基督教倫理？皈依難道不相當于接受“前提上倒退、虛偽、不合適和不道德的普魯士猶太政策”嗎 [[12]](#12_50)  ？保留猶太人身份常常事關榮譽，而非宗教信念；改變信仰帶有投機意味，盡管一些皈依者是出于真正的宗教情感。對于不在乎宗教的猶太人而言，選擇皈依他們同樣不在乎或同樣“開明”的新教意味著在矛盾的沖動間做出艱難選擇。在被問及為何不皈依時，那位法國老婦人 [11](#11_31)  表示：“我的信仰少到無法改變。” [[13]](#13_46)  —某些猶太人也許有同感。

來自外部世界的敵意讓一些猶太人下定決心保持獨立，讓另一些人更加堅決地抵制德國元素，還有許多人同時選擇兩者。尤其對于那些以德國人自居，和同胞們一起崇敬祖國，對德國文化有真正認同并對猶太習俗幾乎完全陌生的人來說，無法自由或集體地談論自己的狀況是他們面臨的困境之一。這阻礙了抵抗興起的反猶主義的所有集體和個人努力。反諷的巧合是，在布萊希羅德去世的1893年，猶太人成立他們的第一個抵抗組織，拋棄對國家仁慈的依賴 [[14]](#14_46)  。

布萊希羅德的人生和家庭反映了德國猶太人面對的某些相互沖突的可能。當然，相對不那么發達的同族而言，富有和成功的猶太人對融入的誘惑更加強烈。蓋爾森本人總是相信，他可以同時是德國人和猶太人。他希望自己的個人地位和保守信念能夠有利于他和他的族群的利益。過去，他可能被稱作“宮廷猶太人”；后來，在不同的民族中間，他可能被稱作“湯姆叔叔”。他的弟弟尤里烏斯走了另一條道路，支持自由主張和領導猶太人的抵抗活動。蓋爾森的孩子們選擇皈依，尤里烏斯的孩子們則沒有。許多猶太人無疑希望擺脫猶太人身份，但怎么做到呢？少數人認為洗禮是答案，其他人則希望被默默地接受。由于這么多人追求如此不同的目標，難怪德國猶太人群體被內部的矛盾和緊張撕裂得四分五裂。

作為一個群體，德國猶太人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識，并進行尖銳的自我批評。“自我憎惡”是猶太人的普遍特征，猶太人的反猶主義不僅僅是刻薄的矛盾字眼。他們生活在一個被視作低人一等甚至可鄙的社會。他們沒有逃脫被踐踏者的墮落，自殘式地接受了統治群體對他們本人和同族的評價。他們的自我鄙視反映和加強了在德國人面前的自卑感。作為僅次于拉斯克的重要德國猶太議員，路德維希·巴姆貝格認為“猶太”特征包括：“一意孤行和笨拙、貪婪、粗魯、虛榮和熱衷功名、‘思想上的暴發戶’和卑躬屈膝。” [[15]](#15_44)  猶太人即使在自我批評時仍然喜歡自夸。

但經過許多個世紀的受難和從迫害中幸免于難，他們的集體自我意識中留下某種類似自豪的烙印，并對迫害者表示不屑。他們對自己看法不高，但很自豪屬于一個能把自我批評作為美德的堅強而智慧的民族。即使融入程度最高、一心希望被基督徒接受的猶太人，當他們有機會或者被激怒時也會—哪怕只是自言自語—使用“異教徒”（goy）這樣的排外字眼表達對外族和麻木靈魂的鄙視。如果能指望用一個詞描繪德國猶太人的精神痛苦，那就是矛盾。他們對自己感到矛盾，也對德國人同胞感到矛盾；也許矛盾是一種現實主義，但德國猶太人并不特別現實。在德國猶太人為他們的驚人成功所付出的心理代價中，矛盾占了很大比例。

從1869年在法律上徹底解放到1933年再次失去自由不過是人一生的時間，但在這段時間發生了何等驚人的變化！強調猶太人對德國生活的貢獻已經成為感傷的老生常談。也許沒有其他哪個歐洲國家的猶太人扮演像在德國那么多樣和突出的角色。在如此的敵意和矛盾中，我們如何理解這個成功時刻呢（在某些領域還取得成果豐碩而又獨一無二的合作）？

海涅曾說，猶太人會變得像他們生活于其間的民族，而且比后者更加典型。德國人與猶太人共處的故事印證這點，他們并非交替相互吸引或排斥的兩極。為了理解布萊希羅德，我們必須回顧幾個這種共同特征，其中有的受到普遍尊敬，有的如果被注意到的話會令人遺憾。這種必要性，教會猶太人擁有特殊光環的“能干”（Tüchtigkeit）美德，德國人無疑早就擅長這點。德國人和猶太人都是認真、嚴肅和細致的民族，他們建立親密的家庭紐帶，在生活中注入某種儀式化的溫暖和感傷。受過教育的德國人和猶太人都特別重視知識：他們既尊重活著的學者，也崇敬過去的文化遺產。他們還有其他許多共同的價值，但與其羅列這些價值，也許不如談談這兩個群體遠沒有那么清楚地意識到的共同態度更有意義。

由于德國人和猶太人都有過漫長的分裂和民族意識不穩固的歷史，他們的身份感都存在危機。還有哪個民族會像德國人那樣經常問自己：什么是德國人？或者像被解放的猶太人那樣自問：什么是猶太人？帝國的德國人用刺耳和強硬的超級愛國主義作為回答，而德國猶太人也常常表示附和。身份感的危機與另一種出于多種更深層次原因的特征有關：公民責任的缺失、公民感的不完善和政治奴性的流行。康德認為，啟蒙將帶領德國人走出青澀（Unmündigkeit）。但在政治上，德國人處于一種常常被掩飾的奴役狀態中，他們甚至不知道俾斯麥的獨裁和皇帝間斷性的專制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心理上的傾向正好對應剝奪他們政治體驗的嚴酷政治現實。巴姆貝格曾經宣稱“這個民族生來就不是自由的”，但他沒有意識到，這也適用于他的許多德國猶太人同胞 [[16]](#16_44)  。（19世紀60年代，在被問及最痛恨哪種惡習時，卡爾·馬克思的回答是“奴性”—后來，他還譴責了意見不一的追隨者 [[17]](#17_38)  。）德國人和猶太人都習慣于浮夸的恭順，這既可能造成奴性，也可能導致突然出現關于帝國命運或社會重生的烏托邦式美夢。德國人和猶太人特別善于快速改變情緒；二戰期間，丘吉爾對此做了精辟而夸張的評價：“匈奴人要么直取你的咽喉，要么跪在你的面前。”—德國反猶主義者常常把這種行為歸給猶太人。這是我們所謂的獨裁性格的普遍特征。

布萊希羅德代表許多這類共有的特征。與許多富有的猶太人同胞一樣，他也極其愛國和保守。不過，這位德國最富有的人卻沒有歸屬可言，生活在幾個世界的邊緣。盡管擁有巨大的財富和權力，但他的思想反映了德國人和猶太人公民的猶豫不決。他還證明奴性可以帶來回報（他的回報非常豐厚）。但他的人生也顯示了德國人和猶太人融合的陰暗面，如虐待、攻擊、猶豫、怯懦和腐敗。

布萊希羅德的人生既展現德國社會的體面世界，也揭露骯臟、陰謀和不斷懷疑的地下世界。富人和窮人一樣體驗人性的刻薄。在德意志帝國，強大的猶太人吸引那個社會所有的潛在惡意。

布萊希羅德的人生開端相對簡單。他作為猶太人出生和長大，這本身就讓他的人生具有某種確定性。19世紀20和30年代，身為普魯士的猶太人仍然是相當簡單的事；猶太人身份意味著信仰和道德準則，遵守某些儀俗和禁忌。最重要的是，這種身份提供相當緊密的團結。外部世界過于陌生和充滿敵意，使人不得不忠于自己的同族。1832年，年僅10歲的布萊希羅德無法想象自己將升入普魯士貴族的行列。對蓋爾森而言，這像月亮一樣遙不可及。

同樣無法想象布萊希羅德不娶猶太女子。比起今天或他的孩子們的時代，婚姻在他那個時代無論如何都更簡單。作為終生的選擇，婚姻通常由父母之命和經濟條件決定，只有在很少和可疑的情況下會被終止。27歲的蓋爾森對于此事足夠重視，這從他前往維也納相親時發給父親的報告中可見一斑。老薩穆埃爾推薦他與利普曼（Lippmann）的女兒們見面，蓋爾森最初不確定哪位是長女，后來發現她丑陋而令人反感。這家人很“隨和”，讓他感到親切，“但即使那姑娘在百萬錢財中游泳，我也不想向她求婚。自尊是我的信條，如果帶給您這樣的媳婦，我的靈魂最深處都會感到恥辱”。他承諾接下去與布雷斯勞的馬克（Mark）的女兒見面，“因為我習慣于欣然遵從您的愿望”。但他對前景同樣感到懷疑，并表示“您必須說服自己，只憑物質條件無法讓我做出一個將讓我和與我在一起的那個人永遠不幸福的決定”。父親在這句話旁邊寫了“同意” [[18]](#18_38)  。

就像我們看到的，他最終娶了艾瑪·古騰塔格，后者的父親是布雷斯勞的一位銀行家。我們對艾瑪所知甚少。就攀升社會地位而言，蓋爾森比艾瑪更加艱難。總有傳言說，這位平凡的女子虛榮、苛刻而且不善交際。我們在下文將引用迪斯累利對她的可怕描繪，另一些人對她的記憶則更加厚道。

布萊希羅德過著正派猶太人的生活。1864年，他成了柏林猶太人社群董事會的成員—這清楚地表明他在柏林猶太人中是個受到尊敬的人物 [[19]](#19_34)  。他遵守部分習俗和所有的節日，并為猶太人慷慨解囊。他把古董祈禱書作為禮物送給像奧本海姆這樣的朋友 [[20]](#20_34)  。沒有理由認為，在他人生的差不多前四十年里，他曾經想過改變虔誠的生活方式。這些方式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與虔誠的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親密關系也證明他本人的虔敬。冷漠是不可思議的，更別提叛教了。

當然，猶太人身份早就不是他唯一忠誠的對象。在德國猶太人中，對信仰和君主的忠誠早就同時存在，就像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 [12](#12_29)  。1848年革命前，和大部分德國人一樣，德國猶太人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海涅的激進主張很少有追隨者。富有的猶太人當然比同族兄弟更加傾向于保守。遵循這個傳統，蓋爾森的老朋友亞伯拉罕·奧本海姆于1846年作為保守派候選人參加科隆市議會的選舉 [[21]](#21_34)  。1848年革命讓一大批猶太人登上政治舞臺，絕大部分站在自由派一邊。革命的失敗再次導致猶太人脫離政治，直到1858年所謂的新時代到來。現在，猶太人傾向于同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合作 [[22]](#22_34)  。

布萊希羅德選擇不同的道路。像其他一些富有的猶太人那樣，他保持保守傾向。他忠于那個曾經給其先人和自己提供保護和榮耀的王朝。與俾斯麥建立關系后，他的忠誠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首相。和那些甚至地位比他更高的人一樣，他無疑希望獲得更多恩惠。我們在前文看到，卡爾·邁耶爾·馮·羅斯柴爾德曾向俾斯麥乞求另一枚勛章。如果強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能夠為了獲得提拔而如此卑躬屈膝，那么布萊希羅德拜倒在普魯士強權面前就更是自然得多。畢竟，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世界性力量和得到舉世公認的王朝，得到許多君主的施恩，而布萊希羅德才嶄露頭角。

到19世紀60年代，布萊希羅德的成功依賴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俾斯麥的關系。除了富有猶太人傳統的“國家虔誠”（Staatsfrömmigkeit），布萊希羅德還與有史以來最杰出的德國政客建立私人關系。傳統和特殊機遇讓布萊希羅德對國家日益忠誠；后來，某種形式的普魯士沙文主義和德國民族主義也影響了他。新的情感處處居于優勢地位，隨著布萊希羅德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俾斯麥成就的一部分，他接受這種情感。當他在凡爾賽與勝利者們談笑風生時，他已經完全轉向德國民族主義，無論他是否意識到轉變的過程。

布萊希羅德的新德國主義顯然刺激了他想要自己的德國人身份被明確承認的欲望。大多數德國人具有所謂的“紐扣孔恐慌”，害怕自己的紐扣孔和胸口沒有勛章。對裸露的羞恥感有多種形式，有人需要遮羞布，有人則需要鑲嵌珠寶的勛章。我們已經看到布萊希羅德如何成功地追逐頭銜：第一枚勛章于1858年到來，八年后他被任命為樞密商務顧問，1871年他獲得鐵十字勛章，最后是1872年獨一無二的獲封貴族。他的朋友奧本海姆寫道：“很快您的胸前將戴不下來自各位君主的全部高貴勛章。”—奧本海姆本人同樣覬覦這些榮耀 [13](#13_25)  。事實上，他積累了來自巴伐利亞、奧地利、俄國、法國和巴西等國的勛章。它們代表對他所提供服務的贊賞，后世將用更加庸俗的方式實現同樣的目的。

這些外在榮耀的問題在于，它們永遠無法帶來長久的滿足：總有更多的榮耀被覬覦。榮耀意味著更高的知名度，更多的殖民地不僅意味著更大的開支，也意味著更容易受到嫉妒者的惡意攻擊。就像奧本海姆在布萊希羅德獲得鐵十字勛章時所寫的：“最近，您獲得巨大的聲望，但也深受嫉妒。” [[23]](#23_34)  相比之下，他的弟弟尤里烏斯似乎對頭銜的誘惑相對無感。尤里烏斯的后人告訴我們，他對過一種比蓋爾森樸素得多的生活感到自豪。1898年，當他被授予商務顧問的頭銜時，他帶著某種受傷的自尊拒絕了，因為榮耀來得太晚。

蓋爾森則不是這樣。他渴望眼前的每一項榮耀—為了給自己的貪婪找借口，他也許會認為這些榮譽將令全體猶太人獲益。他再為他人鋪路，通過確保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同族兄弟。在他獲封貴族時，奧本海姆無疑是這樣想的：“這是我們猶太同胞的勝利。” [[24]](#24_32)  1885年，當維多利亞女王最終不情愿地封納撒尼爾·羅斯柴爾德為世襲貴族時，“英國猶太人以近乎瘋狂的興奮歡迎［這個消息］……英國猶太人的解放終于真正完成” [[25]](#25_32)  。蓋爾森也許感受到某些類似的驕傲，認為自己在為同族贏得榮耀。

但他的情況比納撒尼爾更加復雜。在布萊希羅德贏得榮耀的那個國家，反猶主義情感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再度興起，那里的社會同化壓力很大，對“異類行為”的接受度也遠不如英國。人們對布萊希羅德的期待是同化，而這也是他最想做的。但同化舉動招致憎惡和嘲笑，他既與同族稍稍疏遠，又沒有被試圖加入的群體所接受。最糟糕的是，他成了笑柄。不懷好意的人喜歡提及布萊希羅德為了慶祝獲封貴族而舉辦的盛大宴會，他請求一位宮廷高官列出合格的軍官，并表示：“別邀請平民，我希望參加者全是我們貴族。” [[26]](#26_30)  這個故事也許不實，但并非完全無中生有。外省報紙上刊載過它的一個變體。布萊希羅德指責上尉帶著一位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赴宴：“我的朋友，我們不能那么墮落。”在上尉的示意下，軍官們紛紛起身離席，直到布萊希羅德當場做出正式道歉才歸座。軍官們延續非正式的抵制，再也不光顧這位“傲慢的猶太炫富者”的家 [[27]](#27_26)  。

這樣的事件一定發生過，甚至早在他被封為貴族之前。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證實，布萊希羅德的某些所謂的“愚蠢行為”導致柏林最優秀的群體抵制光顧他的家。1872年2月，他們的缺席導致無法舉行“正式舞會”。但時機和賓客（包括俾斯麥親王妃）還是讓舞會取得巨大成功，雖然“與通常的柏林舞會相比，燕尾服［而不是制服］占有更明顯的優勢”。施皮岑貝格是柏林社會的敏銳觀察者，對莫里茨·拉撒路等文化猶太人仍然遭受的某些限制感到憤怒。另一方面，她和大多數人一樣討厭某種猶太富人。她在描繪在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及其對手漢澤曼家度過的一個愉快夜晚時，表示參加者是“體面的平民，沒有股市猶太人和富豪勢利眼” [[28]](#28_20)  。早在被封為貴族和被召往凡爾賽之前，布萊希羅德就專門設宴款待過貴族（常常令人生厭），把自己的親屬和大部分猶太人排除在外 [[29]](#29_20)  。施皮岑貝格不會忽視這點：此類丑陋行為印證對暴發戶的全部偏見。貴族以自己的祖先和家族為榮，暴發戶卻以他們為恥。當然，德國貴族也不樂意邀請自己的猶太親屬。但布萊希羅德的虛偽“排外”同時針對基督徒和猶太人，而且在他獲得貴族的新身份后顯然變本加厲。

1874年的警方檔案里有這樣的報告：

自從被擢升為貴族以來，馮·布萊希羅德先生變得傲氣十足，不再公開招待昔日的朋友與合作者，甚至在散步時也和他們保持距離：在勝利大道[Sieges-Allee，沿著蒂爾加騰的柏林時髦大道]散步時，他走在西側，而不是和大部分行人（幾乎都是猶太人）一起走在東側。在被問及為何走在另一側時，據說他回答說，東側的大蒜味太濃。布萊希羅德從前的幾位熟人聽說了這番話，幾天前在散步時為此責備他，從此他們就不太和睦。 [[30]](#30_16)

無論是否真的屬實，警方報告暗示典型的暴發戶形象—他們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貴族。布萊希羅德暗中否定自己的過去，與昔日的朋友和同族保持距離，并使用食物—味覺歧視—在德國反猶主義者看來，大蒜味是猶太人的共同特征—強調自己更高和氣味更甜美的地位。

心理學家可能會提供另一種富有啟發性的解釋。布萊希羅德正在逐步摸索新角色和新身份。他既為被接受而做了公開努力，在下意識中也可能在尋求新身份以取代猶太人身份。他希望在俾斯麥的基督徒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作為秘密智囊團的顯眼角色是獲得新身份的途徑之一。同樣的，布萊希羅德對新身份的執著可能惹惱他的基督徒敵人，他們把“［自己］心靈世界中的形象”投射到他身上，這樣做可以讓他們更好地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內在威脅之擾。因此，基督徒需要布萊希羅德保持猶太人身份，當他試圖竭力縮小與周遭基督徒的差別時，他們的心靈感到了威脅 [[31]](#31_16)  。

柏林充滿關于這類改變的傳言。在猶太人和反猶主義者中間，布萊希羅德都背上虛榮和虛偽之名。1876年，施瓦巴赫向蓋爾森報告說，有記者問他，蓋爾森是否會使用古特戈茨（他的莊園）男爵作為新名字。施瓦巴赫認為很不可能，“因為如果人們那么稱呼他，他就不會放棄這個名字” [[32]](#32_16)  。這種傳言的存在本身就頗有深意。大多數人的看法可能和布萊希羅德的朋友菲利克斯·巴姆貝格類似，他在寫給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的信中表示：“布萊希羅德不屬于較為謙虛的那類人。” [[33]](#33_16)

不過，在進入基督徒世界一事上，布萊希羅德受到的誘惑和主動的意愿同樣重要。他在尋找適合新地位的生活方式。財富和貴族身份要求他炫耀自己的杰出。蓋爾森試圖追求卓越，就像一直以來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所有的富有君主所做的那樣。在此過程中，他做了可笑和懦弱的事。我們必須再次指出，他只是夸大當時大部分德國富人的行為：富豪們模仿貧窮貴族，他們的自愿奉承，幫助貴族延續社會霸權。相比之下，法國的資產階級發展出自己的風格，雖然無法擺脫貴族式的欲望，而且在小說家和觀察者眼中沒有特別的教益，但資產階級而非貴族價值觀畢竟在整個國家得以傳播 [[34]](#34_16)  。

布萊希羅德的財富要求顯眼的消費。生命的最后階段，官方估計他的年收入為200萬到220萬馬克—換算成今天的美元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根據非官方的估計，他在1892年的收入達到334萬馬克，總資產在3600萬到4000萬馬克之間 [[35]](#35_16)  。他是柏林迄今為止最富有的人，在整個帝國也只有阿爾弗雷德·克虜伯被認為能與他匹敵。他必須以配得上自己財富的方式生活。或者就像一位同時代的人在其關于柏林社交界的著名作品中所說的：“［他］是我們時代最聰明的人之一，對政治和金融問題具有獨到眼光。甚至在肯定導致某些事件發生的情況出現前，他就能預見到那些事件……不過，他缺少必需的道德力量控制自己的一個弱點，即不惜代價地希望在上流社會扮演不同于錢袋子的角色。” [[36]](#36_16)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猶太人和富豪也有類似的欲望。柏林的情況尤其艱難，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那里的“商業、工業和金融［尚未］能夠進入特權者的接待室。但一些顯貴會參加大銀行家布萊希羅德舉辦的盛宴”……在柏林，很少有能被稱為“社交界”的東西，因此像萊奧妮·施瓦巴赫（Leonie Schwabach）等人舉辦的這類猶太人沙龍很受推崇 [[37]](#37_16)  。布萊希羅德認為，自己的豪華宴會將吸引大人物。奧里奧拉伯爵夫人馬克塞·馮·阿尼姆（Maxe von Arnim，countess of Oriola）是一位擁有沙龍的貴婦，吸引了藝術家和作家加入。19世紀70年代初，她寫道：“［布萊希羅德］喜歡邀請最顯赫的權貴參加盛宴，他是宴會上唯一的非德國人。”（反諷的是，反猶主義文人堅稱伯爵夫人嫁入一個猶太血統的葡萄牙家族。）她表示老毛奇曾請求獲得她的邀請，并解釋說：“我必須這樣做，因為我剛剛拒絕布萊希羅德的邀請，理由是我已經接受您的。” [[38]](#38_16)  神秘的瓦西里伯爵也在1884年寫道：“柏林社交界分成兩個陣營：有的接受布萊希羅德的邀請但嘲笑他，有的嘲笑他但不賞光。” [[39]](#39_16)

賞光者必須獲得回報。外交人員和德國官員總是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些顯貴總是“有請必到”，他們知道在布萊希羅德家，“國事和腸胃極好地融為一體” [[40]](#40_16)  。布萊希羅德的宴會享有盛名，就像他希望的那樣。曾經多次得到布萊希羅德幫助的著名作家路德維希·皮徹（Ludwig Pietsch）曾對艾瑪解釋說，《弗斯報》拒絕他為她最近的宴會所寫的報道。但皮徹希望她知道，他“沒有無視在您好客的府上舉辦的神奇宴會。它的品位、盛大和魅力超過我在私人家中見過的一切” [[41]](#41_16)  。更重要的是迪斯累利的描繪，他本人對于融入的嘗試并不陌生。他在柏林會議期間向維多利亞女王報告說：

1878年7月3日—布萊希羅德先生是柏林的大銀行家。他最初是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但普魯士的戰爭為其提供大量機會，現在他看上去幾乎可以和昔日的主人相匹敵。他為自己建造一座真正的宮殿，宏偉的宴會廳讓他可以邀請所有的全權代表、使館秘書和帝國的主要部長。這些部長全部到場，但不包括從不出現的俾斯麥親王，他只是偶爾與皇帝共同進餐。但布萊希羅德先生是親王的密友，每天早上都要陪伴后者。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是唯一敢對親王說真話的人。高大寬敞的宴會廳甚至整座宅邸都用各種稀有的大理石建成，不是大理石的地方則使用黃金。廊臺上的音樂家只演奏瓦格納，這讓我很興奮，因為我很少有機會欣賞這位大師。宴會結束后，我們被帶領穿過豪華的沙龍、畫廊和童話般的舞廳。沙發上獨自坐著一個看上去非常刻薄的小個子婦人，身上戴滿珍珠和鉆石，她就是布萊希羅德夫人，是他早年身無分文時娶的。她和丈夫不同，完全配不上她令人驚嘆的財富。 [[42]](#42_16)

現實和幻想美好地融為一體，很適合創造西多尼婭（Sidonia） [14](#14_25)  這個神秘銀行家形象的小說家。

宴會需要一絲不茍的計劃。在賓主展開社交欺騙游戲的背后，籌備過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苦惱和費用 [[43]](#43_16)  。一切都必須具有無與倫比的質量，無論是客人、食物抑或娛樂。異國食物需要從歐洲的偏遠角落進口，警方不得不派出兩名警官維持交通。競相炫耀制造奢華和耀眼的豐碑。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有一封皇家管弦樂團指揮本雅明·比爾澤（Benjamin Bilse）的來信，比爾澤婉拒在一次這樣的宴會上表演，因為他和他的樂團不喜歡指定的場地，而且在演出的同時還要進行槌球游戲。但最終他還是同意表演 [[44]](#44_15)  。再多的錢都換不來品位、舉止自信和營造合適氛圍等優點。

布萊希羅德的宴會招引大量談論和光顧。宮廷總管阿道夫·施托克對宴會本身和在四旬齋期間舉行感到憤怒，在給國王的抗議中特別提到它們。普魯士社會無與倫比的記錄者特奧多爾·馮塔納認識布萊希羅德一家，他的妻子和蓋爾森是童年玩伴，晚年的他和蓋爾森還互致問候和互贈禮物。馮塔納曾寫道，真正的財富總是讓他印象深刻，龐大資本的力量總是讓他驚愕：

從年輕時開始，我就對一切偉大事物著魔，毫不嫉妒地向它們拜服。但“資產階級”只是對偉大事物的可笑模仿，他們的渺小和永遠想要免費獲得贊美讓我憤怒。資產階級父親花1000塔勒請人給自己畫像，希望我把這幅拙劣之作當成是委拉斯開茲[Velásquez]的。資產階級母親給自己買一件蕾絲披風，把這次購物當成大事。一切購置或“呈獻”的東西都伴隨著仿佛在說“你能吃這蛋糕和喝這酒多么幸福”的目光。一切都是對某種生活和經濟方式的幼稚夸張，與我的生活一樣廉價……一片面包從來不是便宜貨，它是某種崇高之物，是生活和詩。而如果女主人滿臉堆笑地端上配有策爾丁格葡萄酒（Zeltinger）和蛋白酥皮甜餅的烤鵝，并以為可以在兩小時里讓我脫離平日的生活時，那只鵝本身就是便宜貨，而她的想法讓鵝更加廉價。資產階級不知道如何給予，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禮物不值錢。 [[45]](#45_15)   [15](#15_25)

盡管花費數以千計的馬克，但布萊希羅德的崇高宴會永遠帶有某些廉價品的味道。

不過，財富還需要用更加持久的方式展示。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各地的富人一樣，慈善是布萊希羅德的重要職責。例外可以證明規則。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去世時，蓋爾森的兒子漢斯正好在倫敦；他在信中表示：“很少有人真正哀悼，因為萊昂內爾不知道如何受人愛戴，幾乎沒有為窮人做過什么。” [[46]](#46_15)  慈善是一種悔罪金，或者一種自我頌揚的形式，但無論混合什么動機，富人的錢畢竟為病人或孤兒提供了（不充分的）醫療和社會服務，并提高了衣食無憂者的文化水準。布萊希羅德也不例外：他公開和私下進行捐贈，對象包括德國人、猶太人和外國人，永遠都有人向他求助。他的捐贈單令人驚嘆。路德維希·皮徹表示：“得益于您的慷慨，您的成就惠及全人類。” [[47]](#47_15)  —這番話一定會讓布萊希羅德滿意，但很少會讓他吃驚。

他的慈善的確是普世的。他向所有宗派的窮人和病人提供捐助：從柏林的天主教議員到紐約的希伯來孤兒院。他幫助在柏林建造圣公會教堂，在奧斯坦德建造猶太教堂，在一座萊茵小鎮建造新教教堂（因為施托什元帥請求他資助），在勃蘭登堡侯國建造天主教堂。《天主教大眾報》（Katholische Volkszeitung）報道布萊希羅德的慷慨，該報援引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話說：“當其他一切都失敗時，我就找馮·布萊希羅德樞密顧問。”最終，他獲得9000馬克用于完成他的教堂 [[48]](#48_15)  。

王室的要求可能特別高。皇太子妃急于在柏林建造裝飾華麗的英國教堂，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親生女兒，她要求總管寫信給布萊希羅德，表示教堂將在她的生日那天隆重開放，她聽說后者可能再為教堂捐款。早在奠基之前，他已經“捐了一大筆錢”，他是否想好更多捐款的具體金額？他愿意捐贈管風琴嗎？—“可以裝上捐贈者的銘牌” [[49]](#49_15)  。布萊希羅德同意了，他的舉動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16](#16_25)  。除了施恩，還有貴族的索取。

事實上，大人物常常索取施舍，就像曾經幫過布萊希羅德各種忙的前部長弗里登塔爾在1889年所寫的：“我們相交多年，我從未像乞丐那樣討擾你，但現在我必須打破那個習慣。”深受皇后青睞的一家尼斯的德國療養院需要“大筆捐助” [[50]](#50_15)  。當權者向富人提出請求，這樣的情況每年都會出現。事實上，這是一種稅收。布萊希羅德為慈善花費數百萬，在哀悼他的去世時，瑪麗·拉齊威爾親王夫人吐露許多人的心聲：“布萊希羅德去世了；人們普遍對他表示哀悼，他的離開讓我悲痛；他樂善好施，在我們的天主教醫院工作中幫了我很多忙，我很感激他。整個柏林金融界也大為震動。布萊希羅德是我國首都的羅斯柴爾德。” [[51]](#51_15)

即使在去世時，布萊希羅德仍然無法擺脫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陰影。他給予很多，但他們給予的更多；他很有名，但他們是傳奇。在某些方面，他們造就了他，他對他們的感情也因此存在矛盾。但他效仿他們不斷向猶太人同胞提供慈善支持，有時還同他們合作。

布萊希羅德不僅要在德國慈善中同漢澤曼家族和西門子家族競爭，還不甘落后于其他主要的猶太人庇護者。比如，他為此與猶太人慈善家領袖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走到一起，兩人交換猶太人事務的消息，直到蒙特菲奧雷101歲那年去世。蒙特菲奧雷年輕時就發了財，40多歲時退出買賣，把隨后的差不多六十年用于幫助歐洲、俄國和近東的猶太人同胞。布萊希羅德不準備如此專注，但他看重并渴望得到蒙特菲奧雷的贊許。他有一批要求嚴格的模板。

很多錢被用于東歐猶太人。布萊希羅德支持法國以色列聯盟分布廣泛的活動，包括在耶路撒冷建立學校；在向學校捐助1000法郎時，他致信聯盟，詢問“猶太人是否仍在移民離開俄國” [[52]](#52_15)  ……除了幫助與本國較近地區的猶太人，他還為救助巴格達和摩洛哥的窮苦猶太人向聯盟捐款。我們已經看到他為羅馬尼亞猶太人所做的努力，盡管最終沒能成功。對于第一代羅斯柴爾德勛爵，據說“作為［他的慷慨］的回報，他獲得更多的不是效忠（因為這在好爭論的猶太人中是不可能的），而是神化：在倫敦東區和東歐擁擠的隔離區里，他在生前就成了傳奇” [[53]](#53_14)  。沒有人能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競爭，但無論哪里的猶太人遭受不幸時，布萊希羅德的名字也會被提到。

慈善和政治常常相互交織。和其他人一樣，布萊希羅德也關心俄國猶太人日益變糟的命運。比如1891年，各地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新的大屠殺違背俄國的承諾。大批猶太人足夠幸運地逃脫；在這波逃離潮的高峰，布萊希羅德估計每天有700名難民抵達柏林，但這個數字完全難以置信。他向英國大使保證，他“已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竭盡所能防止這些窮困潦倒的猶太人移民英國”。他要求管理猶太難民的中央委員會警告他們不要移民英國，那里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飽和”。他建議把這些難民送往巴勒斯坦或美洲，因為顯然這些東歐猶太人在德國和英國一樣不受歡迎。1891年6月的《泰晤士報》刊登了布萊希羅德和愛德華·馬雷特爵士（Sir Edward Malet）的通信 [[54]](#54_14)  。

幫助隔離區對布萊希羅德來說天經地義，但他還想要扮演德國文化的馬伊克納斯（Maecenas） [17](#17_19)  。這是德國猶太人最喜歡扮演的角色，代表他們為偉大的德國精神所做的貢獻（符合這個詞的全部意義）。他結交一批苦苦掙扎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幫助籌建博物館，如紐倫堡的日耳曼博物館，還贊助展覽，購買了一批愛國紀念品。他最大的單筆捐助當屬在醫學領域：1890年，為了紀念自己的父母，他匿名贈給結核桿菌的發現者羅伯特·科赫位于柏林的16英畝上等地塊和100萬馬克，用于修建新的醫院和使用科赫的新療法救治窮苦的病人 [[55]](#55_14)  。

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相當于他資產的3%左右。此舉還象征商界對科學越來越多的關心。布萊希羅德的名望如此之高，以至于當他的朋友保羅·林道聽說科赫獲得匿名捐贈時，他馬上知道捐贈者一定是布萊希羅德 [18](#18_19)  。

但和美第奇家族一樣，富人還試圖留下本人形象的合適紀念。布萊希羅德委托德國最好的肖像畫家弗朗茨·馮·倫巴赫為俾斯麥畫像。幾年后，他又請倫巴赫為自己畫像。俾斯麥喜歡說這樣的故事：倫巴赫為布萊希羅德的畫像開出的價格是俾斯麥的兩倍，在被問及為何如此時，倫巴赫回答說，他喜歡為首相畫像。布萊希羅德為倫巴赫歷時三年完成的肖像支付3萬馬克 [[56]](#56_14)  。他還以1.7萬法郎的價格請埃米爾·旺特斯（Emile Wanters）為自己畫像。他與柏林的官方雕塑家賴因霍爾德·貝加斯（Reinhold Begas）夫婦關系良好，特別是與夫人葛蕾特（Grete）—至少她的書信這樣暗示。富人總是希望用和藝術家的友誼裝點自己；布萊希羅德的名字還浪漫地與鋼琴家“甜美的格羅澤夫人”（葛蕾特·貝加斯語）聯系在一起，盡管我們對兩人關系的真正性質一無所知。布萊希羅德委托貝加斯設計家族陵墓，貝加斯同意了，并建議使用卡拉拉大理石 [19](#19_15)  。他估計將耗資7.5萬馬克—當時超過70%的人的年收入不到900馬克 [[57]](#57_14)  。布萊希羅德需要設計高貴而令人難忘的歸宿。

更別說設計高貴而舒適的生活了：就像狄更斯對波德斯納普風格（Podsnappery） [20](#20_15)  的夸張諷刺那樣，布萊希羅德的生活經過精心計劃和安排。人們在他的生活中很少能感覺到即興或沖動，工作、旅行和療養的節奏有條不紊。他每天工作許多小時，即使在周六和周日也要接見重要的客戶或親信，拜訪或接待俾斯麥，并總是不忘處理自己的信件。娛樂、運動或任何與生意無關的消遣，都不屬于布萊希羅德的生活方式。他幫助藝術家并和他們交往，還參加音樂會，但他似乎缺乏審美能力。

食事是當時富人們的共同弱點—那個壓抑和工作主導的社會允許在味覺上放縱自己。布萊希羅德早就知道，美食也是出色的禮物；19世紀50年代初，亞伯拉罕·奧本海姆讓他在圣誕節前后四處搜尋新鮮蘆筍。后來，奧本海姆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提出更多要求，宮廷有時也這樣做。他們的目標是普通的反季節食物、各個季節的異國食物和一切最優質的食物。魚子醬是終極珍饈，這種著名美味來自遙遠的里海，它如此美味，如此容易消化，但又如此難以保鮮。布萊希羅德派自己的信使把它帶到柏林。他一生中肯定購買過幾噸魚子醬，大部分作為禮物，也有一些供自家享用。蓋爾森還特別鐘愛水果，從歐洲各地購買它們。在那個時代，獲得美食仍然需要考驗個人的才智：當時沒有冰箱，柏林也不像巴黎那樣有供應奢侈食物的鋪子。食物是所有人的消遣，猶太人可能對其特別熱衷。

對食物的關心與對健康的嚴重關切不無關系。除了具體的疾病（布萊希羅德患有一種可怕的疾病，最終導致他失明），人們還擔心自己的健康、消化、神經和醫生。當時的人們直覺地感到心理和身體的病痛會相互影響，他們的信中常常流露出對自己健康的悲觀。就像我們看到的，俾斯麥有過大量怨言。施瓦巴赫去世前二十年，他寫信給蓋爾森，表示自己快要死了 [[58]](#58_14)  。無論這些病痛是否真實，去浴場療養都是重要的治療方法。每年檢修“機器”和給身體做大掃除已經成為歐洲富人的習慣。盡管浴場風景如畫，但療養是嚴肅的事。人們飲用泉水，節食，愉快地接受折磨，還常常進行病后康復。

和其他一切類似，浴場也有等級。年輕時的布萊希羅德選擇弗朗岑布倫（Franzenbrünn）這類不太時髦的地方。后來，他前往加斯泰因或奧斯坦德等著名浴場，并一再光顧馬林巴德 [21](#21_15)  。即使在療養期間，布萊希羅德也沒有擱下生意。某種程度上，浴場在功能上是高爾夫球場和俱樂部的結合體。為了滿足富人的賭博本能，浴場常常還配備賭場。歐洲各地的要人云集于此，相互交換消息。布萊希羅德特別勤奮：每天上午，其銀行的部門經理們都會發報告給他，他的兒子漢斯或合伙人施瓦巴赫也會發來私密和補充的消息。即使沒有電話，他也從不遠離生意。

作為習慣和地位的象征，浴場療養主要是健康的人減輕不健康生活方式影響的手段。真正的疾病是另一碼事，只有好醫生能幫得上忙。當時還沒有合成藥物，醫生的技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布萊希羅德聘請了一批名醫，陸續或共同為他服務。1871年春天和夏天，他病倒了，整體狀況和消化系統都受到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右眼。他罹患青光眼已有多年，玻璃體的潰瘍性感染導致情況突然惡化—這也許是他各種操勞的結果。1870年，他咨詢著名的格萊費（Graefe）教授，后者轉而推薦自己最好的助手埃維斯博士（Dr.Evers）。埃維斯向布萊希羅德保證，在健康環境中的徹底休息“將對您稍稍受到疾病和過勞影響的神經系統有益” [[59]](#59_13)  。1871年秋天，他的狀況有所改善，但眼疾日益惡化。后來，他還患上失眠和輕度的糖尿病 [[60]](#60_13)  。

他有充足的理由咨詢最好的并尋找最有名的醫生。有時，他會找維也納舉世聞名的外科醫生比爾洛特（Billroth）或者柏林的著名內科醫生貝格曼（Bergmann）看病。他還去拜訪每個能找到的眼科專家。在威廉一世遭遇兩次暗殺企圖之后，他與威廉的私人醫生馮·勞爾博士（Dr.von Lauer）建立親密的關系。通過勞爾，布萊希羅德可以奉上皇帝可能想要的各種美味，并獲得關于皇帝狀況的直接消息。勞爾是布萊希羅德的內科醫生之一，直到80多歲時退休。與此同時，布萊希羅德還找弗雷里希斯博士看病，并一度把古特戈茨莊園借給后者使用。作為回報，弗雷里希斯為他提供最熱情的醫療服務，并承諾將給予就連他都需要的唯一東西：“深情的友誼、忠誠和感情，無論順境還是逆境，永遠樂意犧牲……這在我們的時代變得日益罕見，只有擁有非常敏感之心的人才懂得欣賞，就像您，我親愛的朋友。” [[61]](#61_13)  多年來，布萊希羅德一直向俾斯麥提供弗雷里希斯的建議和服務，他確信俾斯麥長期沒能得到恰當的醫療服務（事實的確如此） [22](#22_15)  。

一切東西都要求最好的，這總是布萊希羅德的目標。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天生貴族是他的模板，他試圖采取一種符合他們預期的生活方式。古特戈茨是他的費里埃爾，他喜歡那里遠離柏林的喧囂。此外，盡管擁有無限的資源，但他并無顯眼的怪癖；他沒有留下個性或出色品位的紀念碑—他熱愛生意和政治。除了這些，他只是個才智有限甚至害羞的人，不敢表露自己的愛好或品位。

養育孩子殊非易事，在奢侈環境中養育孩子更加艱難。對年輕人來說，享樂的誘惑取代了現實的針砭：如果家資充盈，父母的生活又講究排場，那么為什么要工作、節約和克制自己的欲求呢？如果有父母的得力榜樣，再加上嚴格的信仰和某種新教倫理，也許可以克服富家青年所受的誘惑。但蕭伯納的解決辦法—像恩德夏夫特（Undershaft）軍火廠這樣的大企業，每一代都應該由棄兒繼承 [23](#23_15)  —巧妙地評價了同時把才干和金錢留給自然繼承人的困難。父母的怯懦和社會的不確定可能加劇這種困難。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是特例，他們迫使年輕一代接受自己的倫理；布萊希羅德則不是。

麻煩早早到來，而且相當無辜。長子漢斯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孩子；1865年，家庭教師向他的父親抱怨說，12歲的漢斯缺乏他弟弟格奧爾格那樣的“單純、自然的誠實與友善”，“其他孩子們馬上就察覺到這種缺陷。兩個男孩沒有多少對彼此的愛，非常令人遺憾” [[62]](#62_13)  。在不完整的商業檔案中很少能有這樣的記錄，布萊希羅德檔案在這方面尤其匱乏。我們找到漢斯寫給父親的幾封信，來自他第三個兒子雅姆斯（James，得名于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那個偉大成員）的信就更少了。

漢斯的信顯示出他不討人喜歡的性格：10多歲的他要求正在度假的父母給他買一個特制的手杖—柏林的都不夠好。從他偶爾提到某位退休的仆人或其他助手來看，此人易怒而無情。25歲以后，盡管與父親的銀行保持著正式聯系，并廣泛游歷歐洲和美洲，他仍然極為懶散，關心自己的健康和浴場療養—簡而言之，他是個被慣壞的富豪子弟，除了放縱，對什么都沒有熱情。希望成為不同于自己之人的愿望進一步傷害他的身份和自尊；但父母的金錢和榜樣甚至更早就腐蝕了他 [24](#24_13)  。

蓋爾森對兒子們有什么期待呢？某種程度上和當時的大多數父親一樣，他希望兒子是自己的復制品：勤勞、成功、出人頭地、贏得正直和虔誠之名。他一再失望了。

他的兒子們都沒有學會工作。漢斯很年輕時就參與父親的生意，他討厭繼續受到父母監管，多次因為自己無所謂的工作習慣引起父親不悅而道歉。26歲的漢斯向父親承諾，他將改正自己的習慣，不會再招致不滿。還有一次，他報告說自己從8點30分一直工作到下午6點30分，只有吃午飯時休息半個小時。漢斯堅持，他只想成為自己的主人；1881年，他成了銀行的合伙人 [[63]](#63_13)  。困難仍未解決，漢斯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父親的陰影里。他一面令人同情地渴望獨立，一面表達強烈的父子之情（24歲時，他寫道：“以孩子的愛，您忠誠的兒子。”），我們從中感受到類似赫伯特·俾斯麥在父親面前的艱難。身為名人父親的最愛并不輕松，注定將被父親的權威和從屬地位壓得喘不過氣來。

但赫伯特的處境要比漢斯好得多！赫伯特至少知道對自己的期待，對舉止、態度和職業生涯沒有疑問。反過來，蓋爾森的孩子們反映了他們父親復雜的野心和忠誠。他們從他那里獲得矛盾的信號：一方面，布萊希羅德專注于工作；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視外在，重視與社會保持一致。在布萊希羅德一生中，社會角色與工作總是保持著實用關系。他的孩子們卻把被接受當成目的本身。

布萊希羅德自然希望孩子們擁有他所不具備的優勢。但在那之外是特殊身份和價值的世界，是榮耀和頭銜的世界。在當時的德國社會，那個世界仍然非常復雜和重要。布萊希羅德希望他的孩子們在基督徒的世界里獲得與身份相當的接受，同時又對猶太人保持一定的忠誠。在最有利的情況下，這也幾乎相當于化圓為方。

我們知道他教導孩子們過猶太節日，但不知道歸屬猶太教是否還意味著別的行為，或者他們過重要節日的習慣維持了多久。布萊希羅德與猶太人群體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從不否認自己的出身，直到最后仍保留著溝通者的身份，但他很少公開把自己和猶太人群體聯系起來。書信暗示，他主要在家中做禮拜，由于失明，這種高貴的習慣在他看來更加方便 [25](#25_13)  。

我們看到布萊希羅德為了自己被接受而做的奮斗，他自然希望竭盡所能地為孩子們營造條件，無論是財富還是關系。男孩們上了文法高中和大學，但成績平平。（漢斯顯然非常令人討厭，不得不轉學到另一所高中。）在社交上，被精英學生聯誼會接受對孩子們很重要：布萊希羅德花了很大力氣試圖讓漢斯進入著名的薩克森—普魯士聯誼會，但沒能成功，至少在最初如此。反猶主義者宣稱他多次逃避強制性的決斗，簡而言之，他是個懦夫 [[64]](#64_13)  。較小的幾個兒子可能更加幸運。

但德意志帝國的最高威望來自軍事榮譽：在哪個部隊服役，軍銜是什么，最重要的你是否是預備役軍官。漢斯最初干得不錯，他在伯恩的皇家輕騎兵團服役，甚至獲得令人艷羨的預備役軍官委任狀。德國年輕人會把它印在自己的名片上，因為這是他們最重要的憑證。它代表男性的勇敢，尤其是它證明對愛國和封建價值的接受 [[65]](#65_13)  。

即使在19世紀70年代，猶太人也很少成為預備役軍官；得益于父親的獲封貴族和影響力，漢斯做到了。

布萊希羅德家族遇到的第一起公開丑聞，讓漢斯失去衛隊的中尉軍銜。細節并不清楚，但似乎在1878年6月2日威廉一世第二次遭遇刺殺企圖時，漢斯身著制服出現在皇家城堡前混亂而悲傷的人群中，和他在一起的是幾個名聲不佳的女子—有人說是蕩婦，也有人說是妓女。他被控舉止有違軍官身份，在榮譽法庭上，他被部隊開除。按照傳統，榮譽法庭的判決是保密的，因此這次指控和判決仍然撲朔迷離 [[66]](#66_12)  。

布萊希羅德遭到羞辱：很難想象他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有過更大的挫折或更糟糕的時刻。以他為主要目標的反猶主義騷動正在不斷升溫；柏林會議即將召開，布萊希羅德正在努力幫助羅馬尼亞猶太人。同樣在當時，布萊希羅德還短暫地考慮過競選議員。漢斯于8月被開除，這是可怕的羞辱，而且難以掩蓋 [[67]](#67_12)  。

布萊希羅德希望獲得皇室的寬大處理。1879年2月，當威廉康復后，布萊希羅德把致威廉的請愿書草稿交給俾斯麥，希望皇帝能讓漢斯加入后備軍或民兵。這樣的話，盡管有榮譽法庭的判決，漢斯仍能再次佩戴皇帝的紋章。布萊希羅德還表示，如果請求得不到批準，他本人可能不得不離開德國。他無法忍受這樣的羞辱。

我們不知道最終的版本是否包括這個嚴厲的最后通牒，但至少它讓俾斯麥看到，他的銀行家多么孤注一擲。多年后，俾斯麥只記得布萊希羅德曾徒勞地向他求助：“他愿意用自己最寶貴的財產—他的第一個1000萬—交換銀質劍鞘插。” [[68]](#68_12)  雖然忍受過各種侮辱和詆毀，但布萊希羅德無法想象當兒子名譽掃地，被剝奪身著制服的權利后，自己如何在德國生活 [26](#26_11)  。

蓋爾森發動所有的朋友和關系。1879年5月26日，他致信俾斯麥，表示萊恩多夫將在第二天把渴望寬大處理的請愿書呈送給皇帝——

如果閣下能大發慈悲，為這份請愿書美言幾句，您必將得到我最深情的感激。我聊以自慰的是，如果我的兒子觸怒的是仁慈的上帝，陛下將會更樂意做出憐憫的舉動。 [[69]](#69_12)

沒有關于回復的記錄。

奧伊倫堡伯爵和萊恩多夫伯爵將請愿書交到皇帝手中，并表達了“強烈支持” [[70]](#70_12)  。也許俾斯麥的確為布萊希羅德求了情，布萊希羅德的老客戶馮·阿爾貝迪爾（General E.L.von Albedyll）也承諾幫助，此人是軍事內閣長官，從1871年起就“陪王伴駕”。多年來，阿爾貝迪爾一直為了妻子的投資討擾布萊希羅德，這次他有機會做出回報 [[71]](#71_12)  。但皇帝并不著急。雖然他有意赦免舉止不端的漢斯，但他也不得不對付那些等待合適時機干掉漢斯的人。事實上，事件發生后不久，赫伯特·馮·俾斯麥向包括查爾斯·迪爾克在內的一些英國朋友吹噓漢斯如何被干掉。

他[赫伯特]對席上的所有人言之鑿鑿地表示，不應該允許猶太人加入普魯士衛隊或俱樂部。席上有人說：“但你們的衛隊里有一個猶太人。”赫伯特對此回應說：“我們很快就把他驅除了。”[迪爾克繼續說]那個被驅除的人是俾斯麥親王的銀行家之子，此人的父親還是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和英國駐柏林領事，在簽署《凡爾賽和約》時還是俾斯麥的秘密顧問。 [[72]](#72_12)

對布萊希羅德特別痛恨的赫伯特表達了19世紀80年代初開始流行的更強硬的新態度。漢斯屬于最后一批成為普魯士預備役軍官的猶太人，從1885年到1914年，再沒有猶太人獲得提拔。普魯士軍官團體和政府認為猶太人配不上這種榮譽，而上層對猶太人事實上的排斥也鼓勵了底層新的反猶主義。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不意味著軍隊中的平等，也許因為軍隊自認為高于法律 [[73]](#73_12)  。

布萊希羅德不斷為恢復兒子的聲譽努力著。1879年7月，他克服巨大的困難，說服英國外交部任命漢斯為英國駐柏林的副領事 [[74]](#74_12)  。當年年底，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抱怨說，他還沒有收到皇帝的回復 [[75]](#75_12)  。最終，國王似乎做出罕見的決定，把榮譽法庭的判決放到一邊，但漢斯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部隊 [[76]](#76_12)  。他也沒有收到其他任何委任。

此事讓漢斯更加不屑于努力。他知道自己的壞情緒惹惱了父親，于是致信道歉說：

很遺憾，我缺乏足夠的性格力量控制這種精神沮喪，但[1878年]遭遇的不幸深深地影響我的心靈，因此我多次想要請求您把我送到世界的偏遠地方，讓我自生自滅。但既然我[在柏林]獨自一人，我慢慢恢復自信，更加誠摯地希望在生意上做出些成績，因為我并不比普通人更笨，而且天才很少從天而降，但我必須被允許成為自己的主人…… [[77]](#77_12)

由于漢斯遭受如此的羞辱，蓋爾森忙著爭取讓次子進入合適的部隊。他成功地動員奧伊倫堡、萊恩多夫和阿貝爾迪爾三巨頭 [[78]](#78_12)  。1882年，輪到他最小的兒子雅姆斯被提攜。這次，羅森貝格上校制定策略，并向布萊希羅德保證，他認為沒有理由“不讓如此能干和來自如此忠于皇室的家族的人成為軍官”。但羅森貝格警告說，別人不這么看，需要采取相當巧妙的手段。他將盡其所能，而布萊希羅德也應該向皇儲求助。他認為阿爾貝迪爾將友好地保持中立。經過十個月的斡旋，在某個未具名的敵人離開后，一位新的預備役軍官誕生了 [[79]](#79_12)  。

軍銜是進入帝國社交圈的最佳途徑，與體面的基督徒家庭聯姻是另一條途徑，第三條也是最激進的途徑則是皈依。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布萊希羅德家的孩子們嘗試了所有的途徑。他們既受到基督徒世界的誘惑，也誘惑著后者。財富讓他們炙手可熱，而沉迷聲色讓他們輕易成為自身欲望和他人貪念的俘虜。傳言和丑聞甚囂塵上。

1881年，布達佩斯著名的《佩斯勞埃德報》（Pester Lloyd）以《皈依天主教》為頭版標題刊發一則大新聞，顯示出人們心目中的布萊希羅德可能在融入的道路上走多遠：

近來柏林有傳言說，布萊希羅德一家將皈依天主教。《德國地方報》（Deutsche Landes-Zeitung）告訴我們，近來[關于皈依]的故事……在羅馬得到證實。我們可以透露更多，但因為此事涉及家庭隱私，我們不便多言。

《帝國信使報》（Reichsbote）還表示，布萊希羅德的一個兒子將娶天主教姑娘為妻，新娘是保羅·哈茨菲爾特伯爵的女兒 [[80]](#80_12)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們認為這個傳言是可信的。菲利克斯·巴姆貝格領事致信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表示德國和意大利的報紙聲稱，“馮·布萊希羅德先生一家被認為將前往羅馬皈依天主教” [[81]](#81_12)  。

我們沒有發現這則沸沸揚揚的傳言的來源線索。對于所有認識布萊希羅德和了解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關系的人來說，這個故事一定顯得很不可能。但它的不可信還出于另一個理由。普魯士猶太人通常皈依新教，很難想象有人認為布萊希羅德會為了加入另一個受到懷疑的少數群體而叛教，他的朋友俾斯麥顯然對天主教持保留態度。無論布萊希羅德皈依新教還是天主教都將在歐洲引起轟動。這次什么都沒有發生，他的后代們做了更加容易和正統的決定，選擇皈依新教。

1881年末，艾瑪·布萊希羅德突然去世。蓋爾森感到喪親之痛，無論他們內心深處的關系如何，兩人已經達到和諧互補的境界。他的檔案中保存著大量吊唁信。比如，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Edmond de Rothschild）表示，他知道蓋爾森心中充滿對“你人生的甜蜜伴侶的柔情，她給予你所配得上的一切愛”。埃德蒙不愿含糊其辭，他又說，在如此悲痛的時刻，“只有宗教感情能帶來一些幫助；我知道你的宗教感情多么莊嚴，我相信你的虔誠會在這場可怕的考驗中予以支持” [[82]](#82_12)  。

葬禮堪稱盛事，至少在一家外省報紙的報道中是這樣：

馮·布萊希羅德夫人的去世完全出人意料……她直到最后都非常健康和生機勃勃；嬌小而優美的身材讓她看上去很年輕，盡管她已經五十出頭。她是一個富有魅力、仁慈和端莊的女人，沒有因為她財富的光芒而迷了眼……伴隨著來自猶太教堂的合唱團的精彩歌聲，猶太教士的發言顯然打動了[布萊希羅德家中]的大批悼念者。高級貴族和外交團體出席葬禮，包括俾斯麥親王夫人和安特希爾夫人。

宮廷也正式派了代表 [[83]](#83_12)  。

布萊希羅德以她的名義向受皇后庇護的一家天主教醫院做了特別捐贈，因此得到奧古斯塔的親切贊揚：

我迫不及待地表達我對您善舉的由衷感謝，由于此舉與對您夫人的懷念緊密相連，它更加顯得寶貴。通過您的善舉，您夫人的仁慈將被許多窮人銘記，在她過世后繼續發揮作用。現在我更能理解她的過世在您和您孩子們的生活中留下了最痛苦的空缺—這個空缺永遠無法填補。 [[84]](#84_12)

我們將看到，艾瑪的去世正趕上布萊希羅德當時面對的另一場危機。昔日的輕率行為可能被曝光，讓布萊希羅德處于公共丑聞的邊緣。他生活中的矛盾加劇了：顯赫而可敬的外表下是恐懼和受到威脅的卑鄙，公開的贊揚和私下的辱罵共存，一邊是對幸福的家長制生活的渴望，一邊是孤獨不斷加劇和子女日益冷漠的現實。

布萊希羅德的孩子們沒有為他爭光。他們忙于自己的事，滿足于花他的錢，并在他孤獨而多病的晚年冷落他。當回想起自己如何對待父母時，他也許更加傷心。艾瑪死后不久，他沉浸于回憶中，并由秘書記錄下來。他描繪自己的幸福童年：有興趣的工作，親密的伙伴，母親有時會大聲朗讀庫柏或布爾維的小說 [27](#27_7)  ；夏天，一家人在潘科夫租下房子，直到蓋爾森有能力在布科夫（Bukow）鎮上為父親買下一處莊園。蓋爾森談起母親時帶著“動人的虔誠”，他還很年輕時母親就去世了，但在他的記憶中，母親象征著完美的女性。他回憶起自己對父親的熱愛，后者非常節約，就連用于從避暑地前往柏林辦公室的馬車都是租來而非買下的。在父親晚年的某次生日時，蓋爾森送上一輛體面的馬車。他記得父親流下了感激的淚水。這些記憶也許是由于艾瑪的去世而重新浮現，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個人化記錄。蓋爾森顯然有感傷的一面，在稍后寫給兒子漢斯的信中，蓋爾森表示他“深情地拜訪了”自己父母的墳墓，而在重要的節日時，“我將照常祈禱，不會忘記你” [[85]](#85_12)  。他有時可能會嫉妒尤里烏斯，后者的生活更加和諧，更接近古老的根。

對自己過去的回憶讓他罕見地抱怨起自己的孩子們。“老板表示”，他的秘書繼續寫道——

在教育自家孩子這件事上，出于最好的意圖和思考，他曾經認為不同的方法更適合當前時代，因此他不把他們拴在家里，甚至在他們更小時就給予他們更大的自由，也不焦急地阻止他們與現代世界的一切接觸。他的本意是好的，但現在他意識到自己錯了。

秘書還寫道：“難道他不經常感到孤獨嗎？他有時不是幾乎無法和四個孩子中的任何一人見面或者交談嗎，因為他們都不愿花時間陪伴他？” [[86]](#86_11)

但布萊希羅德是個寬容的父親；他還相信“如果你必須裝傻，那么就裝親切的傻子，而不是憤怒的傻子” [[87]](#87_10)  。他的孩子們冷落他，有時甚至羞辱他，但他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最讓他痛苦的也許是他的孩子們皈依新教，放棄他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拒絕同他來往，但他仍然愛著他們。

19世紀80年代他寫給漢斯的兩封信留存下來，信中洋溢著不尋常的溫情，他在信尾的簽名是“永遠愛你和忠于你的父親” [[88]](#88_10)  。他把特別的愛給了最小的孩子和唯一的女兒埃爾澤（Else），叫她“小埃爾澤”（Elschen）或“小囡囡”（Töchterchen）。埃爾澤同樣遭受過著名的冷落；根據一個經常被說起但也經常被歪曲的故事，在她參加的第一場舞會上，軍官們拒絕她，她“因此有很大的危險淪為背景……不過，皇儲要求［伯恩斯托夫伯爵—時任衛隊軍官，后來成為駐華盛頓大使］與這位小姐跳舞……皇儲很清楚，我和他一樣把反猶主義看作德國文化盾徽上的污點” [[89]](#89_10)  。在反猶主義者的頻繁重述中，這個故事的焦點不再是皇儲的舉動，而是如此勇敢地羞辱一位年輕姑娘的軍官們，從而保護他們作為普魯士人的榮譽 [[90]](#90_10)  。

這是布萊希羅德家較小的孩子們成長的環境—他們試圖從中逃脫。1887年，埃爾澤嫁給伯恩哈德·馮·于希特里茨男爵（Baron Bernhard von Uechtritz）。在關于他們不可避免的流言蜚語中—男爵獲得250萬馬克的嫁妝，埃爾澤獲得貴族姓氏—他們的婚姻幾乎馬上就走到盡頭。1889年，她又嫁給一位來自維也納的皈依猶太人魯道夫·馮·畢德曼—圖羅尼（Rudolf von Biedermann-Tourony）。婚禮在柏林的圣三一教堂（Dreifaltigkeitskirche）舉行，凈花費為45馬克。（賬單保存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 [[91]](#91_10)  。）在這場基督教婚禮中，老蓋爾森的感覺一定非常奇怪和矛盾。布萊希羅德在布雷斯勞附近為新人買了一處大莊園；他對自己的新女婿很滿意，一語雙關地對朋友魯道夫·林道表示：“事實上，新郎是個非常老實的人［biederer］ [28](#28_3)  。我毫不懷疑兩人的結合能帶來真正的幸福。”同樣令他高興的是，他們被正式邀請前往俾斯麥家做客。去世前不久，他致信林道說：“我和女兒、女婿以及迷人的外孫在一起，從心底里感到滿足。” [[92]](#92_10)  他渴望成為猶太家長，被忠誠、親愛和順從的家人所環繞。但命運讓他更接近李爾王 [29](#29_3)  。

1888年，他的第一個孫子小漢斯出身，然而是個私生子。在軍隊遭遇挫折后不久，漢斯與一位基督徒洗衣工的女兒瑪麗·布雷貝克（Marie Brebeck）建立親密但不唯一的關系。1892年，另一個孫子魏爾納出生，也是個私生子。1904年，已經是布萊希羅德銀行合伙人的漢斯娶了瑪麗，而16歲的小漢斯做出了布萊希羅德家族的典型舉動，他為同班同學們舉辦香檳酒會，慶祝自己剛剛獲得的嫡子身份 [[93]](#93_10)  。

1888年，布萊希羅德的小兒子雅姆斯娶了19歲的哈麗葉特·亞歷山大（Harriet Alexander），新娘是漢堡一位富有的商務顧問之女。婚禮在漢堡的圣彼得教堂（St.-Petri Churuch）舉行。布萊希羅德也活著看到他們給自己生了兩個孫輩，他認為薩克森州小德雷薩（Klein-Drehsa）的那處美麗的大莊園會讓雅姆斯幸福。但雅姆斯的婚姻充斥著偷情和丑聞，最終同樣以離婚收場。

在外人眼里，布萊希羅德看上去是一個被成功和好運眷顧的人。1879年，紹芬將軍在布萊希羅德家中向他表示祝賀時說：“也許其他德國銀行的歷史同樣悠久，但很少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這要特別歸功于你。”在1885年的新年祝福中，俾斯麥的助手克里斯托弗·蒂德曼寫道，對于像布萊希羅德那么幸運的人，人們只能為他的健康送上最誠摯的祝福 [[94]](#94_9)  。事實更加復雜。他是一個孤獨和受到中傷的人。他的孩子幾乎沒有為克服他的孤獨做些什么，他的敵人卻為讓他更加孤獨做了很多。

[1.](#1_34) 我在《成功的負擔》（“The Burden of Success”）一文中進一步展開這些想法，收錄于紀念萊昂內爾·特里林的文集，1977年由Basic Books出版。

[2.](#2_34) 在19世紀80年代的一本經常被提到的書籍中（匿名出版，但一般被認為出自卡特琳·拉齊威爾親王夫人之手），有一章被獻給“馮·布萊希羅德先生和財政親王”。這章的開頭寫道：“柏林不是巴黎。和俄國一樣，在新的德意志帝國的首都，法國早就消失的偏見仍然存在。這些偏見中必須包括厭惡當著旁人的面與猶太人握手、去他的家或者在自己家接待他。我特意強調當著旁人的面，因為在親密的私下交談中，所有這些小顧及都會消失。在整個世界上，沒有其他哪個地方的社會如此鄙視以色列的族裔，但又如此之多地利用他們。”保羅·瓦西里伯爵，《柏林社交界》（巴黎，1884年），第152—153頁［Comte Paul Vasili，La Sociétéde Berlin（Paris，1884），pp.152–153］。

[3.](#3_32) 路德維希·波恩（Ludwig Börne）早就指出：“由于我生來沒有祖國，我對祖國的渴望比你更強烈，因為我的出生地僅限于猶太街，被鎖住的大門背后的一切對我而言是陌生國度。因此，現在對我來說，祖國不僅是城市、領地和省份。對我來說，只有祖國語言所及的那個龐大世界才算夠。”引自羅伯特·伯達爾，《對德國民族主義的新思考》，刊于《美國歷史評論》，1972年第77期，第78—79頁［Robert M.Berdahl，“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AHR，LXXVII（1972），78–79］。

[4.](#4_32) 在這部分，我有時會提到“德國”猶太人，盡管新帝國不同成員邦的猶太人生活狀況存在顯著不同。我也明白在猶太人群體內部同樣存在財富、地位和面貌上的巨大差異。大約三分之二的德國猶太人生活在普魯士，我的大部分表述將貼近他們的經歷。

[5.](#5_32) 反諷的是，在布萊希羅德去世那年，19歲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對于猶太人對德國反猶主義視而不見發出最嚴厲的指責。在與他所任教的猶太人學校校長談話時，后者相信一旦“德國人睜開眼睛看到猶太人的優點”，他們就會停止反猶。魏茨曼被激怒了，他吼道：“博士，如果人的眼睛里進了什么東西，他只會想著把它弄出來，無論那是一塊泥土還是一枚金幣。”魏茨曼，《試錯》（紐約，1949年），第32頁［Weizmann，Trial and Error（New York，1949），p.32］。

[6.](#6_32) 我在這里使用“蓋爾森”，部分原因是為了與他的弟弟尤里烏斯相區別。兩兄弟的反差是蓋爾森故事的關鍵內容，就像克里斯蒂安與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沖突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核心主題。“蓋爾森”代表他的個人身份，而非那個公共人物。

[7.](#7_32) 謝帕德·托馬斯·泰勒，《1870—1871年普法戰爭期間的柏林回憶錄》（倫敦，1885年），第238頁［Shephard Thomas Taylor，Reminiscences of Berlin during the Franco-German War of1870–71（London，1885），p.238］。泰勒如此評價猶太人的財富：“……當柏林的基督徒通常不得不忍受白天的負擔和熱浪時，多得不成比例的面包和魚落到更幸運的猶太人手中……［猶太人］生活在城中最好街區的最好房子里，乘坐最精美的馬車在公園里到處游蕩，總是出現在歌劇院和劇場中的前排座位上，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不那么幸運的基督徒同胞心中激起強烈嫉妒。”泰勒還表示，如果猶太人在英國享有類似的地位，他們將招致強烈得多的仇恨。他認為整個問題很快將會消失，因為“看上去猶太教在柏林幾乎即將走向終點”。他的意思是猶太人特征正在減少（第236、237、241頁）。

[8.](#8_32) 由于信息的匱乏，也許可以參考別人在布萊希羅德無法回避的情形下作何反應。1898年，為了猶太復國主義目標，特奧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前往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在里本貝格（Liebenberg）的莊園，拜訪布萊希羅德的這位老朋友。他描繪自己的復雜感情，首先是在火車站遇到伯爵派來接他的馬車夫：“我可能是他載過的第一個猶太人……現在我置身于鄉紳施皮爾哈根（Speilhagen）的世界，我曾經生活在一群愛挖苦人的開明猶太人中間，他們對此人只有仇恨、恐懼和嘲笑。此行的不尋常之處在于，我并非為了融入而惟命是從和乞憐，而是作為一個自豪的猶太人……伯爵馬上走出來。他身著獵裝，我覺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我的衣著……誠然，作為他認為的更高等種族的成員，他覺得高我一等。但想到‘更高等的’猶太人—也就是與他有過接觸的那些—對待我們理想的可鄙行徑，我又如何憎惡他呢？順便說一句，他似乎承認能與猶太人赫茨爾聯系在一起的事實。”當時，赫茨爾希望德國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復國主義者定居點，奧伊倫堡則表示威廉對于建立一個德國的保護國感興趣。赫茨爾在日記中寫道：“保護國！許多人會對此搖頭。但我相信唯一正確的道路是感激地接受……生活在這個強大、偉大、有德、治理出色、組織嚴密的德國的保護下只會對猶太民族的性格產生最有利的影響。”拉斐爾·巴塔伊編，《特奧多爾·赫茨爾日記全集》（紐約和倫敦，1960年），第二卷，第687、688、693頁［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ed.by Raphael Patai（New York and London，1960），II，687，688，693］。

[9.](#9_30) 富有的愛國猶太人常被稱為“皇帝的猶太人”（Kaiser-Juden），哈伊姆·魏茨曼不客氣地把他們描繪成“比德國人更德國人，諂媚，超級愛國，熱切地揣測德國主子的愿望和計劃”。《試錯》，第143頁。

[10.](#10_30) 見卡爾·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收錄于《早期作品》，大衛·麥克勒蘭編（牛津，1971年），特別見第108—114頁［Karl 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Early Texts，ed.by David McLellan（Oxford，1971）］。在早年的馬克思如此頻繁地受到歌頌的時代，他在那個時期對猶太人問題的表態值得深思。他把大眾的偏見放到哲學背景中，宣稱：“猶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討價還價。他們的世俗之神是什么？金錢。所以，擺脫討價還價和金錢，擺脫實踐和真正的猶太教將是我們時代的自我解放。”（第110頁）有時我們會忘記（或者認為不重要），馬克思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之子，祖上是著名的拉比家族；他娶了一位貴族女子。他帶著強烈的貴族口吻指責作為資本家的猶太人（或者作為猶太人的資本家），上述事實完全與此無關嗎？

[11.](#11_30) 指法國沙龍女主人熱內維埃芙·阿萊維（Geneviève Halévy），她的父親雅克—弗洛芒塔爾·阿萊維和第一任丈夫喬治·比才都是作曲家。她還被認為是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中的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和奧黛特的原型。——譯注

[12.](#12_28) 雖然很少有猶太人能像路德維希·菲利普森（Ludwig Philippson）那樣在1837年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生日上向國王表達如此熱烈的敬意：“我是普魯士人。因此，8月3日對我來說是個神圣而幸福的日子。我的國王出生在這天。一個神和一個國王……他是普魯士一切的國王。我是普魯士人，盡管我也是猶太人。”菲利普森是主要的猶太報紙《猶太人大眾報》的編輯。引自雅各布·圖利，《德國猶太人的政治傾向：從耶拿到魏瑪》（圖賓根，1966年），第21頁［Jacob Toury，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von Jena bis Weimar（Tübingen，1966），p21］。

[13.](#13_24) 事實上，1871年，奧本海姆的妻子曾請求布萊希羅德試著為她的兒子爭取一枚鐵十字勛章。小奧本海姆因為在法國的服務而被許諾將獲得勛章，但顯然不了了之。亨里耶特·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28日。另見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3月12日、1875年1月19日，BA。

[14.](#14_24) 迪斯累利1844年的小說《康寧斯比》（Coningsby）中的人物，原型可能是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和作者本人。——譯注

[15.](#15_24) 相比之下，在儉樸的普魯士貴族家庭中，孩子們被禁止稱贊食物（更別說批評了）；不允許談論食物，對違反者的懲罰是羞辱的耳光，至少在一位出色歷史學家的童年記憶中是這樣。約阿西姆·馮·迪索，《過渡中的貴族》（斯圖加特，1961年）［Joachim von Dissow，Adel imÜbergang.（Stuttgart，1961）］。迪索的作品是我們關于老普魯士家庭生活的少數回憶錄之一。

[16.](#16_24) 1883年2月2日，倫敦的《猶太人編年報》（Jewish Chronicle）評論道：“……該項目的首筆也是主要的一筆捐助是來自德國的英國總領事馮·布萊希羅德男爵的1500英鎊。盡管這筆慷慨的捐助無疑是男爵以官方身份提供的，但同時不應忘記他是個猶太人的事實，在稱贊此事將鞏固不同信仰者之間的善意紐帶的人看來，他的猶太人身份讓捐助更有價值。這樣的惺惺相惜之舉在我國聞所未聞……”

[17.](#17_18) 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重要文化贊助人，提攜了維吉爾、賀拉斯和普洛佩提烏斯等詩人。——譯注

[18.](#18_18) 在布萊希羅德進行這筆捐贈的同一年，馮塔納寫道：“至少在柏林，人們主要通過猶太富人接觸到所有的自由和高等藝術。人們不得不最終接受這個事實，而作為藝術家或文人，我們不得不欣然接受（若非如此，我們將不可能存在）。”《特奧多爾·馮塔納書信集》，第二輯（柏林，1909年），第二卷，第245頁［Briefe Theodor Fontanes，2nd series（Berlin1909），II，p.245］。

[19.](#19_14) 卡拉拉（Carrara）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當地出產的大理石是建筑和雕塑的上佳材料。——譯注

[20.](#20_14) 波德斯納普是狄更斯小說《我們共同的朋友》中的人物，為人極其自以為是。——譯注

[21.](#21_14) 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告訴我，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馬林巴德，人們仍然會唱一首關于布萊希羅德的流行歌曲。根據另一種口頭傳說，一戰時的俄國士兵有一首關于向布萊希羅德進軍的戰歌。常駐馬林巴德當地的一位著名醫生回憶說，晚年的布萊希羅德“在人行道上慢慢挪動步子，他完全失明，用墨鏡保護眼睛，步履蹣跚，倚在秘書的手臂上，但更多時候倚在一位美女的手臂上。他是光有錢買不到幸福的典型例證”。海因里希·基什博士，《經歷與追求》（斯圖加特和柏林，1914年），第268—269頁［Dr.E.Heinrich Kisch，Erlebtes und Erstrebtes（Stuttgart and Berlin，1914），pp.268–269］。

[22.](#22_14) 1883年，年輕的恩斯特·施魏寧格醫生接管俾斯麥的醫療服務，并馬上說服后者接受醫囑和飲食節制。“第一次見面時，俾斯麥不客氣地說：‘我不喜歡被提問。’施魏寧格回答說：‘那就請個獸醫。他不向自己的病人提問。’”泰勒，《俾斯麥》（紐約，1955年），第196頁［A.J.P.Taylor，Bismarck（New York，1955），p.196］。

[23.](#23_14) 見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譯注

[24.](#24_12) 托馬斯·曼在《瓦爾松家族的血》（The Blood of the Walsungs）中對墮落的財富和虛偽所做的可怕描繪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著讓漢斯沉湎和受到折磨的環境。這個故事講述一對銀行家子女的墮落，作者沒有明言他們的父親是猶太人，但不難想象是這樣。應猶太人岳父的要求，托馬斯·曼在故事首次發表后撤回了它。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和其他作品中，曼暗示猶太人新貴的不幸福，但沒有指明他們的身份。

[25.](#25_12) 費里埃爾最漂亮的一個房間曾是私人猶太禮拜堂（古老家族常常在祖宅中設置私人禮拜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主人娶了一位基督徒后，猶太禮拜堂被改造成家庭藏書室，稱為“狩獵室”（hunting room）。

[26.](#26_10) 在《夢游者》（Sleepwalkers）的第一部分，赫爾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諷刺地描繪了制服在普魯士軍官生活中的象征意義。布萊希羅德的請求提醒我們，德國人和猶太人似乎覺得，制服是讓他們免遭社會歧視的終極保障。

[27.](#27_6) 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國小說家。愛德華·布爾維—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英國小說家和政治家。——譯注

[28.](#28_2) 新郎的姓氏Biedermann在德語中有老實人的意思。——譯注

[29.](#29_2) 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中的人物，他所寵愛的兩個女兒背叛了他，把他趕到荒郊野外。愛她的小女兒前來救他，卻不幸身亡。最終他也悲痛而死。——譯注

## 第十八章　新反猶主義的人質

你我屬于不容失敗的種族。

——迪斯累利致萊昂納德·蒙特菲奧雷，約1870年

布萊希羅德的猶太人身份主導著他的人生。在最后的二十年里，他幾乎沒有哪天不被以某種方式提醒屬于一個少數群體，無論那個群體的命運如何，他都遭人憎惡。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里，他的猶太人和德國人身份很少發生沖突，他可以生活在這兩個世界中，并在其間斡旋。19世紀70年代，獲封貴族后的他試圖將新榮譽轉變成社會現實。他遭遇私下和公開的怠慢、拒絕和侮辱。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親隨中的反猶主義流言蜚語變得更加普遍。妻子死后，布萊希羅德出于各種原因降低了社會野心。擁有影響力和某種形式的權力已經足夠，不必再炫耀社會地位。在許多方面，他的人生反映了德國人和猶太人關系的周期：他在風平浪靜的19世紀50和60年代開始崛起，在隨后的幾十年里達到巔峰和陷入痛苦。

就像我們看到的，布萊希羅德總要面對所謂的流行或可接受的反猶主義，那是對一個被視作唯利是圖和本質上低人一等之異族的不屑和懷疑的殘留。這種情感如此普遍，看上去如此自然和無害，因此很少有德國人羞于承認。事實上，布萊希羅德的大部分最好的朋友就是反猶主義者。同樣類型的反猶太人思想也存在于法國、英國和美國，乃至整個文明世界。“體面”人認為，除了少數例外，猶太人“非我族類”。猶太人不被允許作為平等的社會成員進入俱樂部或其他機構性聯誼場所；有特長（才干或金錢）的猶太人會被家庭雇傭。這是一種殘留的偏見，在社會地位顯赫的群體中特別根深蒂固，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共和派還是保皇派。

但在19世紀70年代的德國，情況發生劇變，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永久性的。反猶主義情感和感情留存下來，而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并轉換為新的反猶主義教條和騷動。“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一詞誕生于19世紀70年代的德國，開始代表對猶太人不可動搖的原則性敵意，以及將這種敵意轉化為政治行動的意志—限制他們的權力或者消滅他們的存在 [[1]](#1_60)  。經過在公開場合二十年的相對沉寂，“猶太人問題”在許多地方被高調和持續不斷地提出。反猶主義有許多變種，但核心思想都是：賤民已經成為新德國的真正力量，猶太人不僅可鄙而且具有致命危險，因為德國人特別容易遭到猶太人的顛覆。自始至終，德國反猶主義都是對猶太人權力的這種偏執恐懼：最初，他們被描繪成德國經濟的主宰，但早在希特勒之前就逐漸出現這樣的神話，即猶太人有能力摧毀德國人的特征，在經濟、道德、優生學和性方面腐蝕德國人。

布萊希羅德是這種新反猶主義的主要見證者。由于他的顯赫和權力，他成了特別的目標，尤其是他的生活方式為詆毀者提供了充足的彈藥。他的名字不可小覷，能夠引發嫉妒和懷疑。他代表社會弱勢群體憎惡的一切：他是一個擁有傳奇般財富和權力的猶太人，一個動搖傳統等級秩序的新貴和富豪。他似乎符合反猶主義者的一切刻板印象：作為推動者、陰謀家、腐蝕者和永遠的幕后操縱者的猶太人，簡而言之，猶太人擁有不正當的權力—這種權力讓基督徒不安，讓反猶主義者抓狂。他通過股票投機積累財富，違反人們應該靠汗水掙得每日食糧的神圣原則。新的反猶主義包含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元素；作為國際銀行家和可敬的放高利貸者，布萊希羅德是猶太人和資本家所有罪惡的證據 [1](#1_37)  。

我們將會看到，布萊希羅德覺得難以應付這些攻擊。當與偉人交好并看似平起平坐的布萊希羅德成了底層的靶子時，精英階層尷尬地保持沉默。更糟糕的是，他們自己的“禮貌”反猶主義也帶上更加惡毒的基調，就像俾斯麥的親隨所展現的。精英們不愿譴責布萊希羅德的詆毀者或者整個反猶主義，這種態度和布萊希羅德本人不安的抵抗預示將要發生的事情。最糟糕的是，曾經以各種方式利用布萊希羅德，并為其提供仁慈保護的政府似乎拋棄對猶太人的中立，至少暫時性地采取反猶主義態度和行動。最壞的情況下，這將縱容或引發確立猶太人二等公民身份的行動（比如軍官的任命）。

整個過程中，布萊希羅德保持了猶太人身份。他繼續為國內外的猶太人同胞斡旋。盡管有資格進入基督徒社會，盡管他非常渴望被接受，但他并未追隨孩子們皈依新教。他有很多理由不背棄自己的信仰，和他的孩子們不同，這種信仰造就他。他還是個精明的人，謹慎地權衡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在考慮皈依時，他可能本能地感到這樣做得不償失。1818年皈依的路德維希·伯爾納（Ludwig Börne）感嘆道：“這就像奇跡！我已經體驗上千遍，但它仍然每次都是新的。有人指責我是猶太人，也有人因為我的猶太人身份而寬恕我，還有些人為此稱贊我，但他們都對此念念不忘。” [[2]](#2_60)  布萊希羅德反思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知道周遭世界將永遠對此念念不忘，無論他可能做什么。

布萊希羅德的經歷還提醒我們“反猶主義”一詞的矛盾性。大屠殺之后，它還能怎樣呢？奧斯維辛之后的大約三十年，“反猶主義”一詞的使用比以往更加寬泛和不祥。人們開始認為，過去或現在對猶太人的任何批評都是反猶主義，過去的一切反猶主義（特別是德國的）為最終的悲劇鋪平道路。因此，出于完全可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無意識的理由，1933年之前的所有猶太人獲得某種含蓄和回溯性的豁免。顯然，無論歐洲猶太人可能有過什么疏失或集體性錯誤，比起納粹對受害者施加的終極恐怖都算不了什么。但猶太人行為與納粹反應的不可比性也能激勵我們坦然而無謂地研究那個較早的時期。

也許這個詞本身存在缺陷。一邊是仇恨的煽動者，比如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叫囂滅絕猶太人的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一邊是特奧多爾·馮塔納或雅各布·布克哈特警告說，如果猶太人不變得更加低調和降低訴求，他們將被災難擊垮—把兩者混為一談有意義嗎？一邊是阿爾瓦特或德呂蒙 [2](#2_37)  這樣生活在精心編織的幻想世界里的狂熱分子，一邊是有猶太人朋友，但對猶太人懷有潛在懷疑，不時爆出反猶論調的商人或政客—對兩者應該使用同一個詞嗎？ [3](#3_35)  反猶主義沖動流行于歐洲和美洲，猶太人被看作可疑的異類，盡管有些好處，但罪行累累 [4](#4_35)  。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前，旨在打擊猶太人或他們影響的大眾運動在許多國家并未盛行，只有過短暫爆發。簡而言之，即使在后來成為猶太人權利捍衛者的人中也普遍存在反猶主義情感，但同心協力把反猶主義情感轉變成政治行動的反猶主義主要在德國和奧地利得以壯大 [5](#5_35)  。

布萊希羅德的故事還暗示某些關于反猶主義起因的理論存在缺陷。僅舉一個著名的例子：讓—保羅·薩特宣稱：“如果猶太人不存在，反猶主義者也會發明他們……反猶主義者……創造了猶太人。”這番話反映了許多啟蒙觀點，盡管他關于反猶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才會消失的結論在今天看來令人失望 [[3]](#3_58)  。布萊希羅德是反猶主義者的人質。他們不可能創造他。他的權力、關系和疏失不是反猶主義者的發明。我們將會看到，反猶主義者所做的是把特例變成普遍，把意外變成固有，從現實跳到幻想。他們堅稱，個人的舉動證明存在預設的陰謀模式。抵抗這樣的攻擊幾乎不可能。

最后，我們必須重申一個明顯的事實。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大部分猶太人同胞并不相信反猶主義的突然興起會真正威脅他們新獲得的平等憲法權利。雖然因為反猶主義而不安和困惑，但他們仍然認為這種現象將會式微。他們顯然不認為反猶主義將變成日益強大的政治工具。1880年時沒人能想象希特勒，就像1933年時沒人能想象奧斯維辛。19世紀70和80年代，除了沉湎于樂觀的完全人性的欲望，還有許多理由認為猶太人將繼續不斷取得進步。

19世紀70年代初，一種新型的反猶主義開始出現，不同于昔日的傳統、程式化和以宗教為主的反猶主義 [6](#6_35)  。老式反猶主義厭惡和鄙視猶太人，新反猶主義鄙視和恐懼猶太人，或者至少宣揚對他們的恐懼。新的教條堅稱，猶太人制定統治德國人的陰謀，猶太人本身（不再是個體）對德意志民族構成致命威脅。19世紀70年代，這種世界觀成了德國的一股強大力量。我們關心布萊希羅德在新意識形態中的地位，但我們必須弄明白該意識形態如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獲得信賴和尊崇。

經常有人認為，1873年開始的大蕭條（被認為是欺詐性投機的結果）滋生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就像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那樣 [[4]](#4_58)  。納粹的興起同樣被歸咎于后來的一次更嚴重的蕭條，但在這兩件事上，歷史學家們可能都在著作中犯了錯置具體性的錯誤。在19世紀70年代，其他因素也扮演重要角色，證實這種事件和情感的交會有助于新教條的興起。19世紀70年代的德國社會處于變革之中，人們突然開始意識到現代化的不良后果。歌頌民族統一延續了1871年的興奮，但這也是適合一個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的世俗信仰 [[5]](#5_58)  。此外，基督教國家與基督教會之間的文化斗爭傷害了特定群體的利益，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因此，19世紀70年代是一個經濟、精神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動蕩時期。新國家將往何處去，新社會有何特點，誰將決定新的方向和特點？

在上述變革和痛苦中，德國猶太人的地位發生無可爭議的戲劇性變化。在此之前，也許沒有哪個歐洲少數民族的崛起速度或進步程度比得上19世紀的猶太人。他們的成功取決于解放，得益于經濟大變革；這次崛起迎合了猶太人的習慣和野心，但也被剩余的無形障礙所扭曲。曾經被德國社會主流拒之門外的猶太人撲向新機會，也許比其他任何群體更驚人地證明“唯才是舉”可能帶來的活力。1871年，猶太人僅占德國人口的1.25%，但這個數字很難體現他們在德國社會中的地位。他們被一些領域排斥，于是群集于另一些領域，并取得成功。19世紀中葉，柏林猶太人占總人口的2%到3%，該城的早期企業家中有約一半是猶太人。1881年，柏林猶太人占總人口的4.8%，公務員的0.4%，作家和記者的8.6%，貨幣市場從業者的25.8%，批發商、零售商和承運商的46%。在西里西亞的許多城市，猶太人占人口的約4%，但納稅額占比超過20%，反映了他們不成比例的收入。1871年，漢堡居民中有43%的年收入低于840馬克，但其中只有3.4%是猶太人。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駐柏林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隨著工業開始蠶食昔日的農業利益，這個國家的首都正快速落入一小群猶太人大富翁之手。” [[6]](#6_56)

猶太人對知識的傳統尊重和社會回報的新承諾讓他們特別有動力在德國教育中脫穎而出。因此，他們在文理高中和大學里占有不尋常的高比例。19世紀80年代中期，普魯士大學近10%的學生是猶太人，相當于他們在人口中占比的七倍。在大城市的文理高中里，比例失調甚至更加明顯，班上那么多活生生的猶太孩子可能也與中學老師的反猶主義有關，加之既如此接近大學老師但地位上又遠不如后者讓中學老師產生職業憎惡，他們的反猶主義情感因此更加強烈。

簡而言之，在大城市、商業以及通常可以確保收入和影響遠遠超過普通德國人的行業，猶太人的活躍超乎尋常比例。布萊希羅德只是這種新角色的一個顯眼典型，在應召前往凡爾賽和1872年獲封貴族后，他還象征新富豪和當權者之間的聯系。鑒于過去德國人對猶太人、商業和普遍社會價值的情感，如果猶太人的突然崛起沒有引發憎惡反倒是咄咄怪事。

猶太人的崛起正趕上新德國的生活和精神的普遍變革，這種變革讓許多人感到遺憾。厭惡資產階級標準或資本主義價值的不一定是反猶主義者。該時期的小說和日記證明了這種厭惡。比如，小說家弗里德里希·施皮爾哈根（Friedrich Spielhagen）試圖揭露新的金錢社會的刻薄、腐敗和丑陋。反猶主義者最大的花招是把歐洲流行的這種反資產階級情感與猶太人捆綁起來，通過堅稱猶太人要對新的價值和做法負責，他們為德國被“猶太化”的指控找到某些似是而非的邏輯。

除了資本主義，有人還對新帝國的基調和精神感到絕望。1872年，在與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7](#7_35)  的大論戰中，尼采警告說：戰勝法國后，德國人的狂妄可能導致“德國精神的滅亡”。作為路德宗牧師之子和俾斯麥曾經的贊美者（后來變成批評者），康斯坦丁·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以類似的口吻—可能更加尖刻和在政治上更狹隘—譴責新帝國的道德腐敗，1872年，他將其歸咎于志得意滿的民族自由黨人無孔不入的精神。他譴責這些人“拋棄基督教，轉向新的異教”—謊言和財神的統治，“整個世界充斥著欺詐”。充斥著現代性罪惡的柏林，失去“成為德國精神之大都市”的資格。1866年后，他又表示德國人已經陷入新的傲慢，但他們只在“股市欺詐和投機恐怖”上超過法國人。對財神和現實政治的崇拜加劇富人與窮人的矛盾，從而提升社會主義的力量。“我們贏得對外和平，但沒有內部滿足。” [[7]](#7_56)  對于1872年的弗朗茨來說，敵人是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毒瘤和俾斯麥的不道德政策所象征的民族自由黨精神。猶太人沒有出現在這次指控中，但四年后（時間間隔之短暗示反猶主義思想流行的迅速）他寫道：“誰在真正統治新帝國？如果不是首先為了推進猶太人的統治，薩多瓦（Sadowa）和色當的勝利取得了什么，數十億的戰利品為了什么，文化斗爭為了什么？” [[8]](#8_56)  1878年，他宣稱國家已經成為猶太人統治的工具，很快“甚至連鑄幣權都將拱手交給銀行家，布萊希羅德或羅斯柴爾德未來將出現在我們的貨幣上……如果已經如此也許最好，因為那樣的話所有人都會知道誰統治著今天的社會” [[9]](#9_54)  。

對于腐敗意識的不斷提高，推動新反猶主義的被接受。弗朗茨不是上述指控的始作俑者。1873年2月，愛德華·拉斯克指責政府與發起者相互勾結。1873年的經濟崩潰為所有的腐敗指控提供戲劇性的證據，并造就陰謀理論可以大行其道的理想氛圍。鑒于腐敗假設，很容易猜想和影射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的關系也是腐敗的證明，因為要不是從這種關系中獲得非法利益，俾斯麥永遠不會與一個猶太人合作并獎賞他。

腐敗指控吸引眾多憤憤不平的群體和階層，他們因為變革的后果遭受損失，但不理解損失的原因。文化斗爭時期，正統的新教徒和基督教徒都為自己的精神霸權擔心，開始感到流離失所和無家可歸。日益貧困的容克貴族擔心新貴崛起，反對俾斯麥與新的商人階級眉來眼去。工匠受到工廠的威脅，被新的商人所取代。工人階級已經遭受各式各樣的剝削，包括可怕的居住條件，現在他們又受到失業的威脅—這導致柏林出現巴黎公社的陰影。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19世紀70年代，保守派對俾斯麥的懷疑達到頂峰，但正面攻擊政府首腦和人民偶像并不容易。想要抹黑俾斯麥的名字，還有什么辦法比通過暗示他是肆無忌憚的陰謀的受害者更好，并把矛頭指向布萊希羅德，從而暗示俾斯麥不是無辜的受害者？俾斯麥的“禮尚往來”原則讓這種做法顯得可行；以可行性為背景，聰明的筆桿子們可以影射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散發著非法獲利氣味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俾斯麥與猶太人的所有奇特交往。對于民眾來說，沒有什么比經常聽到的指控更令他們不安，即他們的痛苦來自被掌握實權的幕后陰謀者收買和迷惑的腐敗官員。俾斯麥的敵人們礙事，首相受到由布萊希羅德主導的猶太人陰謀的影響。“在這些圈子里，對俾斯麥的敵意和對猶太人的斗爭是同一個問題。” [[10]](#10_53)  他們需要的只是一些證明，因為所有的大陰謀理論（歷史上屢見不鮮）需要某些可見的事實作為依據。提供必要證據的工作（事實的標準很低）留給奧托·格拉高（Otto Glagau）、奧托·馮·迪斯特—達伯（Otto von Diest-Daber）和魯道夫·邁耶爾。

奧托·格拉高是職業記者，1874年12月，他開始在《園亭》（Gartenlaube，一家品位低下但銷量巨大的家族期刊）上發表一系列關于腐敗和資本家發起人活動的文章。當時，該雜志賣出46萬份，讀者接近200萬 [[11]](#11_53)  。格拉高發明一種聰明的論戰形式，將其偽裝成時事的樣子，并偷偷加入反猶主義元素。這些文章后來被編成兩卷出版，并多次再版，它們大多揭露公司的發起制度，涉及何人以何種虛假條件和在何種貴族信譽的外衣下創立什么公司。格拉高把矛頭指向控制這些新公司的相互勾結的董事，指向給予它們信譽的顯赫名字，并把布萊希羅德銀行和貼現公司列為最大的“主要發起人”。他描繪布萊希羅德創立的各種公司和提攜的對象，特別是后者與卡多夫和哈茨菲爾特的親密關系 [[12]](#12_51)  。通過語帶譏諷的旁白和不時的影射，格拉高強調猶太人的角色，但他最猛烈的攻擊來自他最初的文章受到公開和私下的攻擊之后，它們被指復辟中世紀的偏見和散布偏執。《園亭》的編輯也受到各種壓力。格拉高隨即發起反擊，試圖描繪猶太人統治的可怕畫面：

虛偽的寬容和感傷、該死的軟弱和恐懼不應再阻止基督徒對猶太人這個放肆而傲慢的毒瘤發難。我們再也無法忍受看到猶太人四處登上前臺，看到他們四處攫取領導權和控制輿論。他們一直在排擠我們基督徒，把我們推到墻邊，奪走我們的空氣和呼吸……柏林最富有的人是猶太人，猶太人虛偽至極而且窮奢極欲，遠遠超過貴族或宮廷。坐在我們的劇場、音樂會、歌劇院和教室等場所的主要是猶太人……操縱議會和帝國議會選舉的主要也是猶太人……愿上帝憐憫我們這些可憐的基督徒。

在這些憤怒的抗辯中，他第一次宣稱90%的發起人和股市牟利者都是猶太人 [[13]](#13_47)  。

布萊希羅德有理由感到煩惱。格拉高混雜各種事實和謊言，布萊希羅德不是最大的發起人之一，但他的確有同族在媒體和議會。格拉高給布萊希羅德扣上腐敗的帽子，并設法把他的名字與當時的某些最放肆的人物聯系起來，比如布萊希羅德曾經親自警告過的施特魯斯貝格。這一切都是在銷量巨大的雜志上完成的。剩下的工作留給其他熱衷揭露腐敗的人。

保守政客弗朗茨·佩洛特追隨格拉高的腳步，1875年夏天，他在《十字報》上發表了幾篇聳人聽聞的文章。（我們已經在不同背景下討論過這些“新時代”文章。佩洛特給俾斯麥和德爾布呂克的經濟政策貼上“猶太人政策”的標簽，直指“大銀行家”布萊希羅德是這些政策的主要策劃者，旨在讓他和他的猶太人同胞獲利 [[14]](#14_47)  。）《十字報》是新教正統派的喉舌，該報以讀者群而非思想基調聞名，布萊希羅德的許多客戶也是它的讀者。俾斯麥建議布萊希羅德公開否認對政府政策有任何影響，但這樣做既無法帶來安慰，也不是可接受的解決辦法 [[15]](#15_45)  。最終，布萊希羅德默默地忍受痛苦，而俾斯麥后來對《十字報》的攻擊也無果而終。他昔日的保守派同僚們拒絕否定自己的報紙，而是繼續反對俾斯麥的政策。事實上，指控被四下傳播。俾斯麥確信，孜孜不倦的嚼舌者已經把謠言散布到宮廷最核心的圈子里，傳到他的最大敵人奧古斯塔皇后的耳中。

與此同時，主要的天主教報紙呼應了這些攻擊。其中一家報紙寫道：“我們國家的法律制定者，以及在金融、科學、藝術和媒體一言九鼎的人都有猶太血統。” [[16]](#16_45)  新教徒報紙刊發“新時代”文章后，重要的天主教日報《日耳曼尼亞》（Germania）也發表系列文章，譴責盛行的“猶太人經濟”并要求抵制猶太人的公司。文章指責猶太金融家申購1870年的法國戰爭貸款，卻不愿意接手北德聯邦貸款。簡而言之，猶太人不愛國（天主教徒也常常受到類似指控）。對于《日耳曼尼亞》來說，向自由派（“自由派”總是被等同于“猶太人”）發起反擊的誘惑太大了：“在事實上和許多表現上，文化斗爭完全是猶太人事務的結果。對于文化斗爭，我們同樣很高興地看到，猶太人問題在近期已經被清晰而明確地提出。” [[17]](#17_39)  該報還表示：“真正的‘文化斗爭’并不針對猶太人的宗教或猶太人本身，而是針對危及基督教和德國人性格的猶太精神，針對將終結我們民族繁榮的猶太人的金錢統治，這場斗爭已成迫切需要，幸運的是，它已經變得廣為流行。” [[18]](#18_39)  《日耳曼尼亞》還暗示另一位反俾斯麥作者肆無忌憚地提出的看法：“保守派和著名的中央黨人經常認為，俾斯麥親王發動對天主教和新教同樣有害的文化斗爭是為了把公眾的注意力從他與布萊希羅德的聯系及其后果上轉移開。” [[19]](#19_35)  外省的天主教報紙傳播了同樣的看法。

天主教的反猶主義根深蒂固，可以上溯到許多個世紀之前。當猶太人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對天主教徒構成威脅時，他們需要不尋常的自我克制才能不吐露自己的反猶主義。難怪布萊希羅德尋求與溫特霍斯特和采邑主教科普交好，因為兩人都試圖緩和天主教的反猶主義。

正統新教徒和憤怒的天主教徒呼應威廉·瑪爾（Wilhelm Marr）當時正在精心構思的關于猶太人統治的主題，此人是最早的激進和被公認的非宗教性反猶主義者之一。在寫于1873年并被多次重印的小冊子《猶太人對德國人的勝利》（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中，瑪爾宣稱：“猶太人成了19世紀重要的社會政治力量，這個事實顯而易見。消除猶太人對我們的影響已經超過我們的形體和頭腦能力。”德國人的軟弱讓猶太人獲得這種力量，成為“國家金融體系的獨裁者”。沉浸在絕望中的瑪爾表示：“猶太人的專制只是時間問題……世界的統治權屬于猶太人。” [[20]](#20_35)  猶太人顯而易見的卓越證明他們暗中的統治，這種恐懼是新反猶主義的主流。

不過，大部分政論家沒有那么宿命論，而是在尋找個體肇事者和腐蝕者。在這些政論家中，奧托·馮·迪斯特—達伯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迪斯特—達伯的父親是一位獲得過功勛勛章（Pour le Mérite）的普魯士將軍，他本人在萊茵蘭擔任過縣長，也曾是普魯士議會的一名保守派議員。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他變得越來越不滿。擔任縣長期間，他發現富人花錢讓兒子們離開軍隊，于是他馬上提出腐敗指控。但很快，他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有罪者和無辜者，開始熱衷于誹謗。1870年的戰爭期間，50歲的他志愿參軍擔任上尉；他獲得一等鐵十字勛章的承諾，但從未收到勛章—他總是感到失望，認定世界已經朽壞。他處處聞到罪惡和腐敗的味道，有時還會發現他人沒有看見的痕跡 [[21]](#21_35)  。

1868年，他和其他不滿的保守派一起與俾斯麥發生爭執。19世紀70年代初，他不斷給俾斯麥寫信，請求后者切斷跟猶太人和金融家的關系。在迪斯特—達伯看來，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聯系象征首相與財神的勾結—對俾斯麥不滿的助手蒂勒在1870年第一次向他透露這種聯系。發現泄密后，俾斯麥把蒂勒稱作“一個危險的人……非常無能” [[22]](#22_35)  。迪斯特等人對俾斯麥感到憤怒，因為他在志得意滿之時拋棄昔日的朋友們，背叛過去的信條，讓自己置身于猶太人和自由派中間。反過來，俾斯麥認為迪斯特—達伯等人是一群“嫉妒而不滿的貴族成員”—這個刻薄的批評并不完全屬實。他們的批評任性而嫉妒，有時還顯得瘋狂，但表達的憎惡遠遠超過俾斯麥當時所能理解的。在同一段文字中，他更加切中要害地指出：“奇怪的是，不滿者比滿足者更加勤奮和繁忙，覬覦者比滿足者更有野心，如果不適用于全人類，至少對德國人是這樣。”他認為，自己的敵人比支持者們更活躍，前者的動力不僅來自原則，也“來自野心……或者來自對政治和信仰之敵的憎惡” [[23]](#23_35)  。

迪斯特—達伯無疑很忙。多年后，他宣稱自己在1874年與陸軍元帥毛奇有過交談，發現這位德國的頭號軍事英雄同樣相信“拜金主義”和發起者們正對新帝國構成威脅。毛奇認同迪斯特的觀點，即“必須打擊金錢的權力，因為它正中社會主義的下懷。他遺憾地看到，俾斯麥親王與布萊希羅德關系密切，并授權這個猶太人代為打理自己的財產。我們必須消除這種影響，將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分開”。與此同時，迪斯特還拜見陸軍元帥曼陀菲爾，后者不意外地同樣對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關系感到憤怒 [[24]](#24_33)  。在這些顯赫人物的支持下，迪斯特開始向布萊希羅德發難。

毛奇和曼陀菲爾的名字此前并未與針對俾斯麥的反猶主義運動聯系起來；事實上，迪斯特提到的這些談話也許只是他的想象，但很有理由認為它們就像所描述的那樣真的發生過。我們已經看到在凡爾賽司令部的反猶主義暗流。像毛奇這樣的樸素軍人，認為文化斗爭隱含的拜金主義和世俗主義將帶來毀滅。毛奇的反物質主義態度還出于其他原因，他是莎士比亞的譯者，從美學上反對新的富豪統治。軍方對許多我們稱之為現代的東西懷有反感，這無疑是過去百年間的一個重要主題。寫手們宣揚毛奇的傲慢想法，這樣做常常有利于他們自己。

我們將會看到，這些攻擊性質各異，但都集中在布萊希羅德身上，并都使用了影射、暗示和謊言。它們的伎倆是在普遍的偏見中加入已知的事實，并對由此產生的怪物大驚小怪。布萊希羅德是俾斯麥的猶太人銀行家和親信，而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天生放肆而貪婪。俾斯麥只有為了自己的巨大利益才會背上布萊希羅德這個負擔，這種想法似乎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布萊希羅德的巨大關系網讓他更容易被描繪成一只可怕的蜘蛛。顯然，這些寫手的偏執天分讓他們本能地感覺到布萊希羅德的某種意義。

早在1874年，迪斯特就撰文譴責新的物質主義孕育了社會主義，必須摧毀這條“金色的九頭蛇”。他送給俾斯麥一份名為《金錢權力和社會主義》（Geldmacht und Sozialismus）的小冊子，宣稱自己仍然是首相的支持者 [[25]](#25_33)  。他一度希望幫助俾斯麥擺脫這條九頭蛇，但沒能成功。于是，他開始證明俾斯麥通過與蛇頭布萊希羅德的聯系獲得巨大利益。1876年，他出版關于國家道德基礎的小冊子，包含第一場運動的核心指控（后來常常被重申），即首相給了以布萊希羅德為首的財團某些特權，于1870年創立普魯士中央土地信貸股份公司。布萊希羅德因此賺得巨額利潤，而俾斯麥以私人身份也獲得豐厚的回報。迪斯特斷言，布萊希羅德以108塔勒的發行價向俾斯麥轉讓公司股票，然后以128塔勒的價格在股市上售出，為俾斯麥賺得83000塔勒。又一項指控聲稱，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的資本提供18%的年收益率。如果是合法所得，俾斯麥應該會樂于接受這樣的意外之財，但布萊希羅德并沒有上演如此的奇跡。俾斯麥因為從未獲得的利益受到中傷，他的怒火可想而知。迪斯特的指控還涉及其他人，特別是卡多夫 [[26]](#26_31)  。

一系列訴訟和反訴訟隨之展開。無盡的糾紛由此產生，樞密顧問馮·威德邁耶爾（Geheimrat von Wedemeyer）的自殺為此事增添可怕的基調，此人是迪斯特主要的消息來源，和迪斯特一樣，他也是貴族地下世界偏執的失敗者。魯道夫·邁耶爾主編的激烈反對俾斯麥的報紙《帝國之鐘》（Reichsglocke）重復迪斯特的指控。1877年2月，邁耶爾被起訴誹謗，布萊希羅德是這場著名審判的主要證人。為了讓自己的證詞具有效力，他不得不承認自己作為俾斯麥銀行家和顧問的角色。除了本書第十二章已經引用過的證詞，他還表示：“俾斯麥親王不久前問我他是否擁有普魯士中央土地信貸股份公司的股票，這也許可以說明他很少有時間關心自己的私事。”布萊希羅德仔細地做了核查，確信俾斯麥從未擁有過該股票，從未從那家公司獲得任何收益，“我可以斷言，任何相反的指控都是惡意誹謗”。俾斯麥擁有的是該公司的抵押債券而非股票，但那些并非投機性投資 [[27]](#27_27)  。保存在俾斯麥檔案中的常規檔案完整記錄布萊希羅德在宣誓后所做的反駁。審判以邁耶爾被判有罪告終，但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親密關系也已大白于天下。

1877年5月，迪斯特—達伯出現在法庭。布萊希羅德再次作證，他在寫給赫伯特·俾斯麥的信中表示，自己“相當犀利地挫敗迪斯特的盤問”。他威脅對迪斯特提起反訴，如果后者繼續聲稱布萊希羅德的一位雇員用秘密信息交換1萬塔勒的賄賂。迪斯特支支吾吾，而布萊希羅德的態度則得到朋友們的“贊美” [[28]](#28_21)  。幾天后，布萊希羅德致信赫伯特·俾斯麥，表示迪斯特僅僅被判三個月監禁。他把這種令人遺憾的“輕判”歸咎于其他證人，包括俾斯麥從前的秘書蒂勒和卡爾·邁耶爾·羅斯柴爾德。另一位證人漢澤曼也對寬大處理感到遺憾，赫伯特認同對迪斯特的懲罰的確很輕：“我不知道法官們出于什么動機做出判決！” [[29]](#29_21)

迪斯特覺得三個月監禁一點也不輕，這毫不奇怪。1878年，他起訴俾斯麥，但后者堅稱，作為騎兵將軍，自己有權要求案件在軍事法庭審理。施瓦巴赫在另一場審判中作證（布萊希羅德銀行總是牽扯其中） [[30]](#30_17)  。更早之前，軍隊榮譽法庭判決迪斯特必須辭去騎兵上尉，并交出制服 [8](#8_35)  。這兩項懲罰讓迪斯特堅信，自己是受迫害的犧牲品和真理的殉道者。多年來，他糾纏著宮廷和要人，主張自己無辜，指責別人暗算自己，并對所有人發起肆無忌憚的指責—其中永遠包括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俾斯麥的銀行家成了他個人的死敵，他重復并編造了一些關于布萊希羅德作偽證的指控。布萊希羅德死后，迪斯特出書總結跟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曠日持久的戰爭，書中充滿真相和幻想，大量加入對于他本人無盡的凄苦悲哀。他的偏執中也有些令人憐憫的地方，如果他不是那么好戰，也許人們能夠對他感到些許同情。但剛剛從威廉二世那里獲得強烈渴望的赦免（允許他重新穿上制服），他就卷入與格奧爾格·馮·布萊希羅德的糾紛，起因是后者父親所謂的不當行為 [[31]](#31_17)  。迪斯特屬于那些注定將要遭受和制造痛苦的政治地下世界的成員。

在專門揭露丑聞的褊狹的記者陣營中，魯道夫·邁耶爾也許是最吸引人和最豐富多彩的一個。他曾是自然科學和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與卡爾·洛貝爾圖斯（Karl Rodbertus） [9](#9_33)  和赫爾曼·瓦格納是朋友，還與卡爾·馬克思和奧古斯特·倍倍爾關系密切。邁耶爾相信，無產階級的崛起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他的理想是致力于下層階級的利益并得到共同宗教信仰保護的社會主義君主制 [10](#10_33)  。他推崇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但反感在他看來的俾斯麥對自私和腐敗的曼徹斯特自由經濟的支持。多年來，他一直希望讓俾斯麥脫離自由派合作者，但俾斯麥不愿聽從。1877年，邁耶爾出書大量揭發腐敗商人和腐敗政客之間的聯系。這是一部嚴肅而有力的作品，包含大量細節，語調清晰而尖銳，并對拒絕其請求的俾斯麥進行惡毒攻擊。罪魁禍首是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和猶太人，兩者的同一性很容易在布萊希羅德身上得到體現。邁耶爾聲稱就連威廉也受到股市的影響，并表示：“通過柏林最顯赫的商人G.布萊希羅德先生，股市……總能接觸到俾斯麥，甚至連外國大使都做不到這點，剩下的只是同樣腐化的議會。” [[32]](#32_17)  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的關系是邁耶爾觀點的典型例證，即“德國已經出現涉政商人和涉商政客的組合，他們打入議會，通過各種手段讓公務員高層為自己服務，處處獲得影響，并借此推行只服務于他們自己短視利益的經濟政策” [[33]](#33_17)  。

在史無前例的蕭條中，對于勾結、腐敗和愚蠢的指控變得流行。邁耶爾用俾斯麥最喜歡的武器對付后者，指責他縱容——

社會上層階級的如此腐敗……那個社會已經成為社會民主黨的囊中之物……這要歸咎于那個從未利用自己的巨大權力遏制這種腐敗的人。任何像俾斯麥親王那樣在時代上留下自己印記并宣稱有權這樣做的人都要為我們社會的額上污點負責。 [[34]](#34_17)

邁耶爾反對俾斯麥的主要證人也是布萊希羅德。作為俾斯麥的“家庭朋友”，具有“可恥貪婪和骯臟商業習慣”的布萊希羅德被描繪成俾斯麥政策的邪惡謀士。“眾所周知，俾斯麥親王對經濟事務一竅不通。”因此他讓布萊希羅德打理韋爾夫基金的投資，操縱帝國銀行和發起無數半欺詐性質的公司。幾乎每一頁上都出現布萊希羅德的名字，但他很少受到具體不當行為的指控，一切都通過暗示和表面上的言之鑿鑿。但俾斯麥為何允許布萊希羅德擁有不尋常的影響，并因此縱容社會主義的興起呢？在書的開頭，邁耶爾援引迪斯特—達伯的指控，表示俾斯麥從布萊希羅德發起的活動中收益：“如果它們被證實的話，那么就能以最痛苦但最充分的方式解釋事實上已經讓德國受苦多年的猶太人統治。” [[35]](#35_17)  這是典型的耍花招：如果某項具體指控被證明屬實，那么因為籠統性質而無法被證明的幻想（猶太人的統治）就能得到“解釋”。對俾斯麥的這次指控被證明不符合事實，但幻想得以延續，它的創造者們無疑在等待新的證明。

邁耶爾對布萊希羅德的權力擁有不尋常的意識：

如果俾斯麥抓住歐洲最貪婪和最臭名昭著的發起人之手，讓他成為自家的常客，那么熱衷于研究俾斯麥如何清嗓子和如何吐痰的各階級崇拜者們自然會認為與這個[腐敗]集團的首領建立最親密的關系是種榮耀。難怪宮廷貴族、宮廷典禮官、禮賓司長和宮廷貴婦們會把積蓄交給他打理，并參加他家的宴會……在所有的歐洲國家，沒有哪個政客同拜金主義思想的新興代表保持著像俾斯麥親王同他的家庭猶太人布萊希羅德那樣友好的關系。 [[36]](#36_17)

差不多兩百頁的這種誹謗和曝光被證明非常有效，但也足以讓邁耶爾走上法庭。他因為侮辱俾斯麥和其他部長而被判處十八個月的監禁，他的書遭到查禁。邁耶爾選擇流亡，懷著更猛烈的滿腔怒火繼續攻擊“讓德國人民陷入文明世界絕無僅有的奴役狀況的俾斯麥體系” [[37]](#37_17)  ……邁耶爾的事實和虛構的大雜燴充斥著恐懼和怨毒，預示后來右翼的激進攻擊；他還以自己的方式預示激進右翼和激進左翼的接近。邁耶爾沒有白白結識馬克思，19世紀90年代，他為馬克思主義雜志《新時代》（Neue Zeit）寫各種文章。當時的反猶主義相當于不道德的社會主義，就像在工人階級中，社會主義也許是反猶主義的替代品。難怪反猶主義者把馬克思看作猶太人陰謀中的重要人物：他發明的學說轉移了無產階級對他族人的憤怒。

現在，我們看到這種新毒酒的主要成分：偽裝成反猶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并加入少許德國社會主義。奧古斯特·倍倍爾經常引用“反猶主義是白癡的社會主義”這句話 [[38]](#38_17)  。此言很能說明問題，但帶有典型的樂觀主義。說反猶主義是白癡的信仰并不完全屬實。反猶主義也是感到失去地位、家園和財產的暴躁和憤憤不平者的抗議。只有牢記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本質上世俗的文化存在缺陷并引發不滿，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反猶主義和后來的法西斯主義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說它是白癡的信仰掩蓋了這樣的事實，即人們想要信仰，覺得官方文化是貧瘠的空話。19世紀70年代出現針對政治上自由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上猶太主義的浩大運動，到了這個十年的最后，它在德國獲得新的力量，因為政府本身也選擇褊狹的路線。從那時起，地下世界和政府開始同仇敵愾。

還必須從另一個背景下看待新反猶主義。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種族主義開始成為流行和排外的神話，因為科學主義的外衣而更受尊敬。猶太人或非白人開始被視作在生物學上（因此無可救藥）低人一等。并非所有的反猶主義者都是種族主義者，反之亦然。種族主義為由來已久的流行觀點提供某種科學依據，即可以從特定的體貌特征上認出猶太人：深色的油膩頭發、鷹鉤鼻、肥厚肉感的嘴唇和矮胖的身體。（布萊希羅德不符合上述任何特征，但人們還是常常提到他具有猶太人的面相。）這種流行思潮甚至影響那些并不接受它的人。比如，俾斯麥有時滿口種族主義的蠢話，但不能認為他接受了種族主義。這是他詞匯的一部分，本身無法忽視，但也不能小題大做地以為發現了新大陸。種族主義只是懷疑猶太人的另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布萊希羅德成了地下世界最喜歡的目標。他很可能因為這些不斷的攻擊而感到困惑和煩惱，法律訴訟也讓他無法忽視它們 [11](#11_33)  。不過，他可能把這些來自下層的狙擊看作身居高位的自己不可避免受到的騷擾—大人物戴著自己的十字架。讓他感到安慰的是，俾斯麥與他同病相憐。將他和俾斯麥聯系起來的所有言論讓布萊希羅德苦樂參半—他也許不愿面對更常見的把他和猶太人聯系起來的其他言論。無論如何，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反猶主義者的社會接受度甚至還不如他們的受害者猶太人。反猶主義者是局外人、麻煩制造者和反俾斯麥的怪人，他們缺乏尊嚴和體面。但在短得令人吃驚的時間里，他們將獲得兩者。

決定性的改變發生在1878—1880年。那段時間，布萊希羅德正在希望羅馬尼亞會接受公民平等的原則，讓那里的猶太人獲得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條件。正是在羅馬尼亞局勢塵埃落定的過程中，俾斯麥的政策發生變化。1878—1879年，他拋棄與民族自由黨的盟友關系，選擇新的保守路線。在羅馬尼亞猶太人的相關事務上，布萊希羅德曾認為俾斯麥“熱心而寬容”。但到了1879年，俾斯麥在國內的主要敵人成了進步黨，該黨領袖大多是猶太人。俾斯麥變得不再“熱心”；事實上，他對反猶主義者越來越寬容，并意識到自己在與進步黨的激烈斗爭中用得上他們。敵人對他的影響永遠要超過朋友，猶太人在他敵人中占據顯著位置，這讓他對猶太人逐漸采取的中立態度面臨巨大壓力。布萊希羅德為德國猶太人所做的請求能像他之前為羅馬尼亞猶太人所做的請求那樣取得俾斯麥的同情嗎？以犧牲他人之舉擺高姿態永遠是更容易的。

到了1879年，帝國氣氛的變化已經顯而易見。那年，兩位信譽無可指摘的重要人物用得體的語調對猶太人構成的危險提出警告，從而讓“猶太人問題”的存在合法化。其中之一是阿道夫·施托克，此人擔任宮廷牧師，因此被看作皇室和教會的代表。另一位是海因里希·馮·特萊奇克，他被廣泛稱贊為普魯士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柏林大學的驕傲。作為民族德性的保衛者，擁有無與倫比的威望的牧師和教授讓反對猶太人和自由派的運動變得受人尊敬。施托克和特萊奇克也許受到政府轉向的鼓勵，他們的鼓動反過來又激勵其他人。來自下層的呼聲中有某種原始的理想主義，新信息把早前運動的實質帶到德國—基督教思想的“更高”領域。

施托克的反猶主義路線本身具有典型性。他出身貧寒，多虧父母的巨大犧牲才獲得新教神職。施托克在普法戰爭期間擔任隨軍牧師，他的愛國熱情使其被任命為柏林的宮廷牧師。這個職務擁有顯赫的光環；事實上，其他牧師與宮廷的關系還要親密得多。他的職務讓他有充分的時間研究柏林的生活：他對富人的世俗主義和窮人的社會主義感到驚愕—兩者都顯示出教會的可怕衰弱。在貧窮中長大的他認為窮人沒有理由不保留對教會和國家的信仰。1878年，他成立基督教社會工人黨，希望用新的社會福音吸引工人，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他的黨派將成為保守黨的附屬，他的改革旨在回歸舊式父權傳統。他是第一個走進柏林工人階層聚居地區尋找選民和選票的教士，他的同事們偏好更安全的地區。但即使他那樣的“強大人格和迷人口才”也無法戰勝社會主義教條 [[39]](#39_17)  。用甜蜜的話語或承諾無法打動柏林工人，他們記得教會曾經一邊倒地支持現有秩序。在1878年的選舉中，施托克的黨派遭遇慘敗，只獲得柏林不到1%的選票 [[40]](#40_17)  。

施托克從自己的失敗中吸取顯而易見的教訓。他開始向不同的對象宣傳反資本主義福音和民族主義，如無組織的店主和工匠，或者那些覺得自己是新富豪統治受害者的人。新的受眾需要新的策略。施托克一度猶豫是否加入反猶主義陣營；最終，在1879年9月的一次集會上，他發表題為“我們對現代猶太主義的要求”的演講，終于踏上一條有前途的道路 [12](#12_31)  。

施托克提到關于猶太人影響的各種傳統警告，他采用克制和得體的方式，更多流露出悲哀而非憤怒。這是好基督徒可能采取的唯一立場。在第一次演講中，他遺憾地表示，自由媒體談論一切，唯獨不包括猶太人問題。他對猶太人的要求帶有反諷的合理味道，甚至許多保守的猶太人也表達類似的觀點 [[41]](#41_17)  。他要求猶太人更加莊重一點，更加寬容一點，更加平等一點。換句話說，這些要求在改寫和戲謔了猶太人對基督徒的傳統要求。他帶著威脅的口氣表示：“猶太人必須放棄成為德國主人的目標”，他們必須停止做“不信教的力量”，這些人失去自己的信仰，現在試圖顛覆基督教—因此有了寬容的要求。猶太人也應該停止依靠基督徒的勞動生活—因此有了平等的要求。施托克還希望減少猶太人的數量。他聲稱柏林有4.5萬猶太人，相當于生活在法國和英國的總和（這種說法并不正確）。他的話仍然是老調重彈：猶太人太多、太強大、太格格不入。這就是為什么他認為“現代猶太人對德國人的生活構成巨大威脅”。這就是為什么他要求對猶太人設置各種限制，否則“我們罹患的腫瘤將會增大”。在克制的外表下，他的本意是：猶太人構成致命威脅。他警告說，如果不滿足他的適度要求，更激進的猶太人之敵將會得勢并訴諸更強硬的手段—他一語成讖 [[42]](#42_17)  。

施托克的反資本主義路線已經讓一些柏林的富人產生警覺，他對猶太人的攻擊似乎只是對一個危險的主題火上澆油。在施托克第一次向猶太人發難幾天后，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卡多夫敦促他提醒俾斯麥公開與施托克劃清關系，否則人們會認為首相是施托克的庇護者 [[43]](#43_17)  。卡多夫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公眾可能把俾斯麥視作施托克的庇護者：他不是在激烈地向拉斯克和巴姆貝格等人發難，并私下稱他們為“猶太人”嗎 [[44]](#44_16)  ？卡多夫對沉默的危險很敏感，但他從未公開表態，而且幾乎肯定沒有直接給俾斯麥寫過信。在這種時候，布萊希羅德無疑會歡迎基督徒采取主動。

布萊希羅德在等待。他仍然要為羅馬尼亞猶太人做足夠多的事。但幾周后，第二波打擊降臨，這次是特萊奇克在很有影響力的《普魯士年鑒》（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發起的攻擊。特萊奇克同樣譴責了猶太人的主導地位和他們對德國理想的顛覆。他和施托克對德國人軟弱的擔憂和對猶太人力量的恐懼同樣強烈。對于特萊奇克來說，攻擊猶太人只是重申他對德國的熱愛，重申維系國家的純粹民族主義。猶太人是外來者，如果希望享有德國公民身份的全部特權，他們應該放棄自成一體，加入基督教—盡管許多反猶主義者警告不要鼓勵這些種族上墮落的人通過假裝叛教獲得特權 [[45]](#45_16)  。但特萊奇克和施托克都不是種族主義者，特萊奇克想要的只是信仰基督教的德意志民族。外來者是敵人，聰明而放肆的外來者是更大的敵人，用特萊奇克的著名結語來說：“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 [[46]](#46_16)

特萊奇克一舉讓反猶主義變得可敬，將其變成德國愛國主義的一部分，為舊有偏見披上理想主義的新外衣。他在自己著名的年度政治講座上重復這些批評—從那時起，反猶主義煽動者可以指望來自上層的同情相應，至少也能得到體面階層有分歧和矛盾的回應。追隨特萊奇克步伐的可以是各種群體，包括德國學生，他們把猶太人驅逐出自己的聯誼團體，并在他們的民族組織中接受反猶主義原則。德國學生擁有支持褊狹主張的悠久歷史。特萊奇克讓反猶主義脫離地下世界，讓舊有情感和新的恐懼在公眾面前獲得尊嚴。以無可指摘的愛國主義為名，他扼殺對寬容的開明信仰。特萊奇克之后，身為反猶主義者成了某種美德。

特萊奇克的文章激起巨大的爭議，但主要是在猶太學者中間。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做出回應，有的只是辯護，也有的咄咄逼人。其中一位歷史學家的反駁似乎指涉布萊希羅德：“基督徒圈子并不充分了解定居在城市中的普通猶太人大眾，他們以和平而勤勞的中產階級方式生活，沒有富有貴族的炫耀奢華，也沒有放貸者和小商販的骯臟墮落。”（特萊奇克的一位支持者馬上對“好猶太人”或“安靜猶太人”的提醒進行反擊，堅稱“銀行家的頭銜掩蓋欺騙，商人的頭銜掩蓋股票經紀人—只要有可能，到處都是放貸者。頭銜是周日的華麗外衣” [[47]](#47_16)  。）特萊奇克引發許多猶太人的反省，也遭到一位偉大的開明同行的有力反駁。蒙森預見特萊奇克釋放的邪惡力量，他的辯護鏗鏘有力，他關于基督徒和猶太人“內戰”的警告有先見之明。他在結語中請求已經失去強烈宗教信仰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教，從而完全融入德意志民族和主流國際文明。他解釋說，民族國家痛恨一切特殊主義的殘余。簡而言之，就連他也把皈依視作解放的遲來代價 [[48]](#48_16)  。

和許多富有的猶太人一樣，布萊希羅德可能也希望新的反猶主義（仍然帶著反資本主義的鋒芒）會很快再次消失 [13](#13_27)  。但布萊希羅德無法長時間扮演鴕鳥。因為他過于顯赫，早晚會成為單獨的靶子。1880年6月，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對社會黨人關于教會兩千年來從未幫助過下層階級的詰問，施托克一如既往地用轉移焦點的方式回應說：“你們為什么只對教士提出社會援助的要求？為什么不向猶太人提出？馮·布萊希羅德先生的錢比所有新教教士加起來還多。” [[49]](#49_16)

這對布萊希羅德來說太過分了。他已經被動忍受各種謊言和誹謗，但一位宮廷牧師對他的財產（可能的確超過所有新教牧師的財產總和）這種公開煽動讓他馬上采取行動。他在當周就向威廉一世遞交請愿書：“我斗膽請求陛下對我提供慈父般的保護，或者說不僅是我，也包括一整類陛下的忠實臣民，他們絕非國家的無用公民。”猶太人并非唯一的目標。施托克正把“對猶太人的激烈斗爭［轉變成］對財產本身的社會斗爭”。他曾經公開指責布萊希羅德通過放貸（“欺騙基督徒”）積累了700萬塔勒，“現在，我的名字滾動在每個基督教社會黨煽動者的舌尖上，它不僅是迫害的目標，也被視作為一切資本、股市、繁榮和罪惡的典型”。布萊希羅德明白自己的困境和無助。起訴施托克只會讓丑聞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當局沒有向他提供任何幫助。反過來，公眾認為“有影響力的高層人物”保護了煽動者。但基督教社會黨的煽動與社會民主黨的區別僅僅在于前者“更加危險……民眾從心底受到鼓動”。他警告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任何意外都足以引發無人能夠控制的運動。布萊希羅德用笨拙而隱晦的語言暗示，他當時極度痛苦，可能不得不離開祖國。

他警告說，對他的煽動只是將危及所有社會的“可怕社會革命之不幸的開始”。在請愿書的最后，布萊希羅德懇求皇帝用“慈父般的心和杰出的智慧設法避免他的臣民和國家遭到毀滅” [[50]](#50_16)  。請愿書混亂而笨拙，這種風格反映了起草時的匆忙和作者的尷尬 [14](#14_27)  。

布萊希羅德的請愿書是他第二次威脅自我流亡，值得加以反思。他一定把這種威脅看作武器，也許心照不宣地效仿俾斯麥別有意圖的辭職威脅。國王愿意失去像布萊希羅德這樣有用的仆人嗎？愿意讓世人看到德國最著名的猶太人選擇流亡嗎？但此舉不僅僅是威脅：難道我們不應該把它解讀成布萊希羅德承認自己對無家可歸的擔憂（也許并不完全有意識）？他已經變得更像德國人而非猶太人，成年后的他依靠簡單的互惠關系為生：我為國家效勞，國家保護我。如果這種禮尚往來不復存在，布萊希羅德的角色將會消失，他的生意也將損失慘重。國家真的會任由他成為民眾煽動者的靶子嗎？他是受保護的猶太人，在適當的時機，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自己的方式為不那么幸運的猶太人同胞求情，他的整個角色和身份都有賴于此。除了威脅，布萊希羅德的悲傷中還有他可能并未完全意識到的痛苦事實：沒有保護的話，他可能不得不離開他深愛著并為之效勞和取得成功的國家 [15](#15_27)  。

布萊希羅德的請愿書成了政府內部曠日持久的爭議焦點。普魯士政府如何在最重要的猶太人和宮廷牧師間做出裁決呢，誰對王室的忠信堪稱典范？人們說了和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沒有說和做什么—讓我們有難得的機會了解官員們在面對當時的反猶主義煽動時的想法和予設立場。

布萊希羅德把請愿書的副本寄給俾斯麥：“如果您認同它的內容，我將非常高興。” [[51]](#51_16)  沒有記錄顯示出俾斯麥書面承認收到信。他是擔心加劇布萊希羅德的擔憂，還是不便寫這樣一封勢必觸及微妙事件實質的信？事實上，對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關系有一個不尋常的評價，即在留存下來的任何俾斯麥書信或兩人談話的書面記錄中都沒有涉及德國反猶主義的話題。布萊希羅德寫給外國朋友（比如羅斯柴爾德家族或迪斯累利）的已知書信中也都看不到這樣的話：“新的反猶主義讓我熱心的朋友驚愕。”對布萊希羅德來說幸運的是，施托克當時對俾斯麥沒什么用，此人也攻擊政府。此外，政治反猶主義被用來對付俾斯麥已經將近十年，他有理由對此感到厭倦。

威廉也不太可能支持施托克。除了其他理由，他也有自己寵幸的猶太人銀行家，盡管他可能不喜歡必須在猶太人和牧師間做出選擇。9月的《柏林交易所通訊》（一份與布萊希羅德關系特別親密的報紙）正確地報道說，威廉在埃姆斯接見布萊希羅德，并向其暗示對施托克的不滿。其他報紙轉載這種說法。施托克當即憤然向威廉提交請愿書，他在提到《柏林交易所通訊》上的報道時表示：“那家純粹的猶太人報紙……是柏林，可能也是全歐洲最惡毒的”，該報試圖將威廉描繪成“德國運動的敵人”。施托克請求威廉不要否定他對猶太人的斗爭，特別是因為斗爭的對象不是所有的猶太人，而只是“反對輕薄、放貸和欺詐的猶太人，他們的確是我們民族的不幸”。他承認自己提到過布萊希羅德的名字，不過只是“以最無害的方式……但馮·布萊希羅德先生的確是猶太人顯赫地位的支柱。每年四旬齋期間，他都會放肆地在圣周就要開始前舉辦舞會；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的宮廷和國家官員都會光顧那場宴會。此事在我國民眾中留下最痛苦的印象” [[52]](#52_16)  。這封信讓威廉更加難以保持中立。他向俾斯麥和羅伯特·馮·普特卡默（極端保守的普魯士新任公共信仰和教化部長）問計。兩人意見不一，普特卡默同情施托克，盡管對此人混淆教士身份和政治可能略感擔憂；俾斯麥則希望以反社會黨人法起訴他。1880年夏天，布萊希羅德似乎有望成為勝利者。

俾斯麥一直害怕政界的教士力量，尤其讓他惱火的是，施托克批評政府的社會政策和俾斯麥要求提高富人納稅額的“社會主義”請求。（在這點上，施托克觸及俾斯麥敏感的神經。）此外，他認為施托克對猶太人的攻擊選錯目標。在征詢關于一個重要新主題的意見時，俾斯麥對普特卡默抱怨說，就猶太人問題而言，不應認為——

在我們這里，富有的猶太人對媒體施加的影響更大。巴黎的情況也許不同。在我們的媒體和代議機構發揮重要影響的并非有錢的猶太人，而是猶太人政治改革者。有錢的猶太人離不開我們的國家制度，更愿意致力于維護它們。幾乎沒什么可失去的卻能得到很多的無產猶太人才是危險的。

他們可以與各式反對派顛覆勢力勾結，包括社會主義和施托克 [[53]](#53_15)  。

換句話說，富有的猶太人有用而保守，普通猶太人則容易激進或具有顛覆性。這是一種粗糙的階級分析：俾斯麥似乎暗示，階級對猶太人的分化超過宗教對他們的聯系。反猶主義者可能把富有的猶太人趕進激進陣營，因此有必要阻止施托克的社會主義反猶活動。保護猶太人免受施托克這樣的煽動者攻擊能帶來回報，此舉能把富有的猶太人拉到他這邊，也許還能減少自由主義對其他猶太人的吸引力 [16](#16_27)  。另一方面，他可能覺得“一點點反猶主義”讓富有的猶太人更加聽話；但無論如何，像這樣激烈地譴責反猶主義會觸怒作為他的新支持者的保守派。考慮到這些壓力，加上俾斯麥不受任何原則性主張之累，他傾向于權宜之計：以煽動階級不合為理由對施托克大加斥責。

11月中旬，俾斯麥仍在譴責媒體和議會中的“猶太人無產者”，認為施托克的煽動正在驅使思想正確的富有猶太人投入進步黨的懷抱 [[54]](#54_15)  。這成了俾斯麥不斷重申的重要主題，并得到布萊希羅德的響應。

俾斯麥向普特卡默保證，促使他干預的不是施托克的反猶攻擊：“對我來說，他的演講和煽動中的社會主義元素遠比反猶主義元素重要。” [[55]](#55_15)  這無疑是俾斯麥的真實感受，但也是安撫普特卡默的很好理由，后者非常不愿意對施托克采取任何法律行動。以反社會黨人法起訴施托克既能取悅俾斯麥的猶太人選民，又不會觸怒反猶主義者。這是俾斯麥式的解決辦法。

普特卡默沒有那么重視區分猶太人；他討厭任何類型的猶太人，把特萊奇克的斷言看作歧視的理由。在普特卡默和俾斯麥尚未就提供給威廉的建議達成一致前，施托克事件被卷入1880年秋天更加普遍的反猶主義爆發之中。反猶主義突然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俾斯麥對施托克的看法因此急劇轉變。

就像想要成為改革者的人經常遭遇的那樣，施托克很快被更加激進的煽動者搶去風頭。1880年秋，各種反猶主義團體開始史無前例的浩大運動，為向政府請愿收集簽名，要求取消猶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禁止他們擔任政府公職，并限制猶太移民流入。關于猶太人問題的爭議突然上升到新的高度，包括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圣瓦里耶在內的一些人認為，猶太人自己要對聲勢日益浩大的煽動負責 [17](#17_21)  。

1880年11月，在菲爾肖、里克特 [18](#18_21)  和里希特等著名同僚的支持下，右翼的進步黨議員漢內爾博士（Dr.Hänel）將反猶主義請愿書問題提上普魯士議會的日程，要求政府對請愿書上“取消猶太人完全憲法平等”的要求表態 [[56]](#56_15)  。進步黨人希望政府在請愿書被提交前就批評反猶主義，若非如此，政府可能暴露對反猶主義心照不宣的支持。

俾斯麥的態度馬上發生改變。他回應的憤怒和果斷此前一直未被注意。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魯對這種“進步黨毫無根據、粗魯和輕浮的揣測”大發雷霆，要求同僚們忽視這一質詢；當發現無法忽視時，他提醒政府避免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對施托克“哪怕最小的”支持。內閣接受他的請求，普特卡默只是做了有趣的保留，“如果有人提出施托克事件是普特卡默系統造成的”，他將不得不表態。在這樣的指控面前，他將不得不為自己辯護—他對如此指控的預期和他用“系統”形容自己的政府都耐人尋味 [[57]](#57_15)  。

兩天的辯論突然展現出反猶主義者的優勢和自信，也反映了進步黨的孤立和他們的論點處于守勢。漢內爾解釋質詢的理由，指出反猶主義煽動旨在限制猶太人的權利，并提醒議會注意柏林大會新近通過和得到俾斯麥支持的原則。德國要違背這些原則嗎？漢內爾承認猶太人有許多令人討厭的特點，但要求肯定他們的法律權利。他警告說，通過接受種族主義，通過以無法選擇的出身對個人進行這種無可補救的譴責，反猶主義已經做出最背信棄義的舉動。他表示，種族主義是反基督教的。普魯士副首相說了幾句冷冰冰的話，最后表示：“王國政府無意改變憲法安排。”他完全沒有提到煽動，難怪菲爾肖稱他的回答“正確，但冷到骨子里”。保守黨和大多數中央黨的發言者對猶太人大加侮辱和指責，不斷翻著花樣指責他們通過放貸和欺詐在德國經濟中取得統治地位，而對所有其他群體造成傷害，指責猶太人在公共生活的其他領域取得同樣有害的力量。漢內爾關于柏林會議的言論也遭到反駁，被指展現“這一小群人在各國已經取得的無法衡量的國際力量”。猶太人的可憎角色已經不言自明，無須再做辯論。一位保守黨發言者呼吁“解放基督徒” [19](#19_17)  。一位中央黨議員表達強烈的敵意，聲稱天主教徒最初支持猶太人的解放，盡管后者有許多令人反感的地方，但在過去十年間卻“換來這些人最極端和最暴力的敵意與迫害”。溫特霍斯特的態度更加溫和，呼吁結束所有反猶和反天主教煽動。

兩場辯論的記錄描繪了當時的可怕氣氛：反猶主義的噓聲、惡毒的諷刺和高漲的仇恨。辯論的基調比內容本身更加不祥 [[58]](#58_15)   [20](#20_17)  。

這個時刻無法讓普魯士議會感到光榮，也無法讓德國猶太人感到寬慰。布萊希羅德的朋友貝托爾德·奧爾巴赫陷入無助 [21](#21_17)  。路德維希·巴姆貝格想移民國外 [[59]](#59_14)  。葡萄牙最著名的小說家埃薩·德·奎羅斯（Eça de Queiroz）完全沒有無視猶太人的罪惡和權力，但政府的反應讓他吃驚：

它讓猶太人群體不受保護地面對廣大德國人的怒火，像本丟·彼拉多那樣洗凈自己高貴的雙手。它甚至沒有表示自己將確保執行保護作為帝國公民的猶太人的法律；它僅僅表達暫時不改變這些法律的模糊意向，模糊得就像早上的云。 [[60]](#60_14)   [22](#22_17)

布萊希羅德曾期待截然不同的結果。辯論當天，他致信俾斯麥：“關于猶太人問題的煽動在這里非常激烈，但隨著今天議會會議的召開，它將畫上句號。” [[61]](#61_14)  就在辯論開始前，他獲得保證（或者以為如此），政府將對反猶主義煽動采取強硬立場。他在兩封信中對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被其轉交給迪斯累利）表達自己的樂觀：

面對關于猶太人問題的質詢，政府將回復說請愿書尚未被交到它的手中，但它甚至現在就會聲明，它永遠不會違反給予所有公民平等權利的憲法，無論他們屬于何種宗教信仰。

在討論質詢時，政府將聲明對已經發生的放肆行為遺憾至極。不過，更重要的是，皇帝將在幾天內親自聲明，他完全反對所有此類不可取的煽動。

鑒于公眾中已經有傳言稱，最高層對迫害猶太人表示認同，這種聲明顯得更加重要。皇帝很有可能以回復我在6月份提交的卑微請愿作為聲明的形式，授權我發表他的回復。我非常遺憾無法用反社會黨人法起訴宮廷牧師施托克，該法令只適用社會民主黨人，不能用于其他性質的煽動。我希望這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能隨著議會討論而終結。

第二天他寫道：

今天的議會議程還未結束。我只想確認昨天給你的信息，即政府言簡意賅地指出自己在此事上所持的憲法立場。它無疑會進一步聲明對于已經發生的放肆行為極其遺憾……

我相信結果會對猶太人有利，煽動將會停止。

布萊希羅德的期待落空了。如果他知道羅斯柴爾德對迪斯累利說了下面這些誅心言論，他的沮喪將無以復加：

布萊希羅德本人無疑是猶太人受到迫害的原因之一。因為經常受雇于德國政府，他變得傲慢，忘記自己常常只是“測風氣球”。

等我們見面時，我們還可以詳細討論大量其他理由，比如不斷涌入的波蘭、俄國和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他們剛剛到來時饑腸轆轆，在變得富有前一直是社會主義者。

猶太人還擁有一半的報紙，特別是那些反俄報紙。圣彼得堡無疑為鼓動這次迫害提供了很多錢。

我還聽說馮·布萊希羅德夫人非常令人厭惡和傲慢。 [[62]](#62_14)

這是對布萊希羅德，也是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可悲描繪 [23](#23_17)  。

政府沒有譴責放肆的行為，甚至未發一言。政府誤導布萊希羅德，從而避免他發動自己的力量嗎？這樣做并不難，因為他希望聽見自己想聽見的，而且這也符合他對俾斯麥有意對施托克所做回應的了解。或許俾斯麥和同僚們決定在最后一刻讓自己的態度強硬起來。1880年，俾斯麥既不反猶也不明顯親猶：他對猶太人懷有范圍廣泛的各種看法，既有正面的（因為他們得到證明的作用和力量），也有許多負面的（因為殘留的敵意和對立的立場）。進步黨的質詢突然迫使他做出決定；他在壓力下采取行動，壓力總能激起他的怒火。用他過去的比喻來說，指針總要在某個位置停下。在1880年11月的那個星期里，指針決定性地停在反猶主義的位置。這是臨時做出的決定，但具有相當的意義。它確立了先例。此外，做出這樣的臨時決定后，人們根據所采取的行動相應重置了過去的想法。這正是在俾斯麥和德國官員們身上所發生的。對猶太人的看法更狹隘了。進步黨完全事與愿違：政府的路線變得更加褊狹，在面向媒體的半官方表態中，政府吹噓新的路線：

……進步黨試圖通過質詢實現魯莽的目標，即讓議會對所謂的反猶主義運動提出譴責。該目標完全沒有實現……這場運動通過辯論顯露力量……并因為對力量的認識而獲益……它更可能獲得新的勇氣，而不是在任何方面感到灰心。 [[63]](#63_14)   [24](#24_15)

倫敦《泰晤士報》報道柏林人的共識，“即便沒有公開鼓勵，當權者至少也傾向于默許一場旨在遏制猶太人提升在帝國的勢力和影響的運動” [[64]](#64_14)  。此外，政府的做法足夠正確，使其對反猶主義心照不宣的支持不至于被進步黨拿作把柄。事實上，反猶主義者屬于進步黨的敵人，德國的政治由他們的敵人主導。

布萊希羅德一定感到失望，無論他多么努力地試圖掩蓋失敗。可能令他略感安慰的是，在議會辯論進行期間，七十五位柏林重要的人物發表聲明，譴責反猶主義煽動破壞國家團結。猶太人“為祖國帶來榮耀和利益”。德國人應該拋棄中世紀的狂熱主義，珍惜“萊辛的遺產。我們已經可以聽到要求采取歧視性立法，要求把猶太人排除出這個或那個行當、榮譽和親信地位。再過多久普通民眾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呢？”簽名者包括大學和市政府的重要成員、幾位商人和一位有過叛逆記錄的牧師，許多簽名者是著名的進步黨人 [[65]](#65_14)  。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和客戶中無人簽名，包括萊恩多夫、哈茨菲爾特和卡多夫這樣的正直貴族，盡管他們常常向他標榜感激和友誼。他們也沒有發起自己的公開請求，以免染上與左翼合作的污點。其中的某些人可能在私下里和口頭上向布萊希羅德表示過關切，盡管我們沒有相關記錄。在公開場合，辯論雙方是反猶主義者和進步黨人，而龐大的中間派一如既往地袖手旁觀。當威廉在11月底表示自己“不認同宮廷牧師施托克的活動……但整件事將會平息……這次混亂有助于讓猶太人更加節制一點” [[66]](#66_13)  時，許多人可能有同感。

如果1880年前后的基督徒和猶太人有共同的老生常談，那就是對“節制的猶太人”的渴望。這種渴望具有不同的動機和意圖，但總是隱含對不那么炫目、艷俗和喧囂的模糊渴望。有教養的猶太人醫生（與基督徒病人關系和諧）以及低調的猶太學者或作家希望猶太人出于美感和謹慎的理由保持謙虛。貝托爾德·奧爾巴赫在1877年寫道：“當然，在大西洋兩岸，猶太人有許多可以被指摘的地方 [25](#25_15)  。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低調的教養，通過自我改善和內部升華獲得自我滿足。他們沉湎于炫耀和浮華的顯擺，特別是在猶太婦女當中。”但他反問道，在基督徒新貴中不也有類似的特征嗎 [[67]](#67_13)  ？1880年初，雅各布·布克哈特同樣在一封信中警告說：

我奉勸猶太人表現得非常睿智和節制，但即使那樣，我仍然不相信目前的騷動將會平息……猶太人特別需要為他們完全沒有理由地干涉各種事務贖罪，報紙必須擺脫猶太人編輯和記者才能生存下去。這種事[反猶主義]可能突然爆發，并一天天蔓延開去。 [[68]](#68_13)

布克哈特對“節制”的呼吁表達了保守派希望削弱自由派猶太人，但也流露了擔心社會仇恨遠遠超過“基督徒”反猶主義者的想象，可能吞噬和摧毀猶太人。

我們不能忽視在19世紀80年代的觀察者中非常普遍的想法，即在新的反猶主義出現時，猶太人的行為和顯赫地位與正在升溫的激烈反應之間的確存在某種關系。長期來看，幻想、種族主義或偏執很可能終將戰勝事實，但大多數人并不考慮“長期”，而是以過去的選擇性記憶作為引導，希望在短期內發達和生存下去。因此，許多猶太人，他們的自衛同樣理所當然地需要自我提高—但對這種需要的意識無法減輕圍繞著自衛的不確定性 [[69]](#69_13)  。

“節制的猶太人”還再次提醒我們，反猶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最初密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不謙虛的猶太人通常是富有的猶太人，而富有的猶太人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德國的庸俗理想主義中，“資本主義”通常被稱為“物質主義”，暗示這是一種精神的扭曲，而非經濟秩序的運行方式 [[70]](#70_13)  。

此外，“節制的猶太人”還讓人想起德國人和外國人對新帝國的德國人如何自負、張狂和傲慢的無數描繪，特別是當他們來到外國的土地上。（許多德國猶太人也許下意識地感覺自己永遠在外國的土地上 [26](#26_13)  。）德國人下意識地認為，猶太人夸張地展現德國人自己的粗俗和社會焦慮，對此憎惡不已。最重要的是，布萊希羅德的人生以另一種方式展現反猶主義的力量：他的錯誤或疏失總被說成是猶太人的錯誤；普遍的做法是將猶太人和負面特征聯系起來。基督徒的過錯屬于個人，猶太人的過錯則是他們民族特性。

政府仍然需要回復布萊希羅德的請愿，議會的辯論有利于施托克，對布萊希羅德造成傷害。在談判之前，俾斯麥曾希望用反社會黨人法對付施托克，甚至威廉也“忿忿然地”對普特卡默談起此人。施托克在教會中的上級認為他很快將失去宮廷牧師的職位 [[71]](#71_13)  。但談判改變一切，特別是對俾斯麥來說。他不再認為自己和普特卡默應該向威廉提交不同的意見。俾斯麥又多次強烈批評施托克不可饒恕地要求實行累進稅，然后突然緩和下來，在議會辯論后放棄之前“更嚴厲的要求”。赫伯特寫道：“里希特和里克特等人厚顏無恥的攻擊讓我父親下定決心不再對施托克表達如此嚴厲的看法。”“避免任何可能被看作贊同政府最大敵人的舉動”，是俾斯麥突然對施托克表現出寬容的動機 [[72]](#72_13)  。在俾斯麥對進步黨的強烈仇恨面前，他對猶太人矛盾而無情的看法起不到什么影響。如果他可憎的敵人支持猶太人，那么俾斯麥就不能那么做，甚至不能以最曖昧和最不直接的方式。進步黨后來被稱為“猶太人護衛軍”（Judenschutztruppe），有了這樣的朋友，猶太人注定將招惹上強大的敵人。

12月初，俾斯麥和普特卡默終于向威廉提交共同報告。他們反對施托克“煽動階級仇恨和做出無法兌現之承諾”的集會，敦促皇帝“嚴正警告不要煽動敵意和分裂”。威廉的最終聲明措詞更加和緩，僅僅表示“不認同”施托克具體提到某些巨額財富和批評政府的社會政策。他責成施托克“維持我的臣民中各階級的和平，就像好牧師應該做的那樣” [[73]](#73_13)  。這雖然是批評，但就連不像施托克那么好戰的人也能接受，而且完全回避猶太人問題。

威廉等了更長時間才回復布萊希羅德的請愿。12月末，布萊希羅德向俾斯麥抱怨說，皇帝尚未回復他。俾斯麥不得不再次催促普特卡默，后者認為簡短的確認信足以打發布萊希羅德。提交請愿書七個月后，在俾斯麥的堅持下，布萊希羅德終于收到來自宮廷的六行回復，表示皇帝已經對施托克做了“適當的”訓話 [[74]](#74_13)  。這件事就以如此簡短而委婉的回復告終。布萊希羅德是否想過，如果猶太人頭面人物都受到這種待遇，那么不太出名的同族的處境是否更加糟糕？

我們知道，對于布萊希羅德乃至德國內外的整個猶太人群體，民眾反猶主義的突然爆發令他們不安。如果德國反猶主義成為持久的力量，他在國際猶太人群體中的地位將受到影響。在1880年6月向威廉提交請愿書的同時，他還向摩西·蒙特菲奧雷通報新的反猶主義運動。布萊希羅德可能認同老前輩的自信回答，即盡管形勢嚴峻，“但一方面通過我們的慎重和謹慎，一方面通過非猶太人以人性原則為基礎的進一步啟蒙，我希望仍能影響我們同胞的生存狀況” [[75]](#75_13)  。布萊希羅德無疑相信慎重和謹慎。蒙特菲奧雷不是唯一向他提起德國反猶主義的人，來自國外的關心可能讓他安心，即使外國人對德國人的隨意污蔑也許會觸怒他的愛國心。早在1875年，老朋友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就在信中表達某種擔憂：“找時間告訴我為什么你們國家的反猶主義又變得如此聲勢浩大。對于在教會問題上如此開明的普魯士，這種現象令人悲哀。”多年來，戈德施密特不斷向布萊希羅德打聽新的德國反猶主義的消息。1880年11月，他對反猶主義聯盟表達“不安”：“最高層無意對付施托克一伙嗎？” [[76]](#76_13)  巴黎的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布萊希羅德經常與他討論猶太人同胞在俄國或摩洛哥等半野蠻國家的苦難）也在議會辯論結束后立即對他表達同情：“在猶太人問題上，我們非常遺憾地看到貴國政府采取如此矛盾的立場，很不合適地試圖從中賺取政治資本。我們對這種有違時代精神的立場感到遺憾，特別是因為我們無法對貴國的決定施加任何影響。” [[77]](#77_13)  這是在挖苦布萊希羅德的無能嗎？或者更可能是承認，盡管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力量在需要他們金錢的國家如此有效，卻在德意志帝國遇到對手？歐洲的猶太人對此憂心忡忡，因為他們感到德國的反猶主義可能馬上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引起反應。

很難重現布萊希羅德內心深處對反猶主義突然卷土重來的反應。如果他沒有被選定為主要目標，他可能也會將煽動歸咎于其他猶太人的不端行為，比如下層“愛出風頭的猶太人”，或者越來越多在語言和習慣上與德國人格格不入的東歐猶太人，或者攻擊俾斯麥的自由派猶太人。當時，布萊希羅德曾經的朋友路德維希·巴姆貝格警告說，處境優越的猶太人不理解對猶太人攻擊的嚴重性；他也許想到了布萊希羅德 [[78]](#78_13)  。

布萊希羅德繼續謹慎和請愿的道路。1880年12月1日，杰出猶太人集會上成立由重要人物組成的委員會，旨在制定抵抗反猶主義運動的計劃和推動“猶太人的自我提高”，在委員會中扮演活躍角色的是他的弟弟尤里烏斯 [[79]](#79_13)  。蓋爾森對這類政治冒險敬而遠之。

布萊希羅德本人對1880年事件的反應再次證明他對政府的忠誠。他煞費苦心地強調自己不屬于猶太人反對派，他與自由派媒體的關系被大大夸大。他特別急于撇清與《柏林交易所通訊》的關系，并在權威的《北德大眾報》上刊文澄清。他向蒂德曼解釋這種做法，指出此舉“將推動保守的猶太人與進步黨中的猶太人分離”。蒂德曼轉而對俾斯麥報告這種舉動，并表示他認為應該鼓勵布萊希羅德這樣做，盡管對此事的介紹不盡準確。赫伯特同意了 [[80]](#80_13)  。

布萊希羅德有兩個目標：他希望俾斯麥和德國官場知道自己仍然是堅定的保守派，但反猶主義的興起（被普遍認為得到政府的首肯）將導致“除了他之外的全部猶太人”投票給進步黨。他向人們保證，他與自由派媒體沒有聯系；當荷爾斯泰因表示驚訝，因為所有人都認為布萊希羅德“主宰”《柏林交易所通訊》時，布萊希羅德問有誰這樣認為，荷爾斯泰因回答說：“你最好還是問麻風病人身上哪里有斑點。”布萊希羅德一次次表達對“反猶主義運動發展”的沮喪，這場運動最終將把他的所有同族趕入進步黨陣營 [[81]](#81_13)  。他試圖以好猶太人的形象出現，同時警告政府，對反猶主義的露骨支持將破壞它的政治目的。

布萊希羅德有很好的時機意識。威廉對施托克不痛不癢的批評沒有平息反猶主義騷動，相反，它在德國和東歐愈演愈烈。俾斯麥面臨著反猶主義勢頭的上升，而越來越多的猶太人相信他與反猶主義相勾結，于是在德國市民階層內部組織反俾斯麥派別 [[82]](#82_13)  。是時候提醒俾斯麥了，一些猶太人仍然留在保守陣營。

1881年，反對猶太人的民眾運動再次爆發。最著名的事件發生在距離俾斯麥的伐爾岑莊園不遠的新什切青（Neustettin），反猶主義煽動者對猶太人進行特別尖刻的謾罵后，當地的猶太人教堂被焚毀，城中的頭面猶太人被控縱火，以便用獲得的保險金建造新教堂 [[83]](#83_13)  。

這次，政府的確禁止在波美拉尼亞和西普魯士的反猶主義演講 [[84]](#84_13)  。1881年4月，一份由25萬人簽名的請愿書被提交給俾斯麥，要求對猶太移民入境和擔任公職加以法律限制。一年后，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的俄國出現屠殺猶太人的浪潮；5月的內閣會議上，俾斯麥討論隨之而來的東方猶太移民入境的威脅，敦促采取措施將“不受歡迎的元素”擋在德國之外。在內政部長奧伊倫堡的建議下，內閣下令在與俄國的邊界展開特別巡邏，阻止“看上去不受歡迎的人”入境。俾斯麥還表示，在有大量猶太難民涌入的奧珀倫（Oppeln）的上西里西亞地區，任何明顯靠放貸為生的人都應該被驅逐 [[85]](#85_13)  。對于柏林猶太人來說，移民威脅長久以來也是一個微妙的問題。柏林的發言人一度警告巴黎的以色列聯盟，如果后者繼續鼓勵俄國猶太人穿越德國首都，他們將暫停與聯盟的一切合作 [[86]](#86_12)  。

但對猶太人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反猶主義從1881年開始成為國內政治中的重要武器。在1878—1880年決定性的全面重組中，民族自由黨最終分裂，由路德維希·巴姆貝格和愛德華·拉斯克（兩個俾斯麥憎惡的猶太人）領導的左翼組建新黨。盡管所謂的分離黨（Secessionists）中也有基督徒，甚至連德意志銀行的支柱格奧爾格·西門子也屬于該黨，但俾斯麥還是稱他的敵人為“格萊斯頓內閣”，認為它是猶太人黨派。施托克及其伙伴們不遺余力地試圖將柏林從進步黨和猶太人手中奪走。施托克本人是保守黨候選人，對手是菲爾肖。威廉·俾斯麥也投入選戰，流露出父親對分離黨和進步黨的仇恨。但俾斯麥看到問題的復雜性，他致信兒子表示：“施托克當選是理想的結果：首先，這將意味著他的對手［菲爾肖］落選；其次，因為他是個特別、好斗和有用的戰友。”不過，他隨后警告兒子不要公開支持施托克，因為那將暗示他支持過去的反猶主義活動，這是俾斯麥無法容忍的 [[87]](#87_11)  。幾個月前，進步黨領袖歐根·里希特曾經指出這種心照不宣的新聯盟：“［反猶主義］運動開始抓住俾斯麥的后衣襟，雖然他不希望這樣，有時還會讓自己的媒體譴責它放肆，但它的領導人繼續挨近他和提到他，就像吵鬧的孩子們圍著父親不放。” [[88]](#88_11)

保守黨和反猶主義者：公然的反猶主義選戰為他們贏得一些額外選票，但反俾斯麥勢力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進步黨和分離黨表現極佳，進步黨不僅保住在柏林的議席，還在全國新獲得33個議席，所獲民眾選票增加近70% [[89]](#89_11)  。

反猶主義沒有得到回報，俾斯麥暗中拉開與它的距離。選舉剛結束，他就授權自己在伐爾岑的商業伙伴貝倫德發表他們早前一次談話的主旨。俾斯麥在對話中表示：“我非常堅決地不支持這場對猶太人的斗爭。”在對話的其他部分（直到1895年才發表），他特別強烈地譴責任何以血統為根據的歧視：“有朝一日，人們會擁有同樣的權利攻擊波蘭或法國血統的德國人，聲稱他們不是德國人。”他還向貝倫德保證，他永遠不會同意對猶太人的憲法權利做任何限制 [[90]](#90_11)  。一年前，這樣的表態可能在議會辯論中產生巨大影響，但1881年在不知名的外省報紙上，它的意義相對寥寥。不過，這場激烈的選戰影響深遠：在政治危機中，體面的保守派將毫無愧疚地煽動反猶主義行動。其次，猶太人現在發現自己只有一個盟友，即進步黨和分離黨，他們是德國政治的自由派，恰好也是俾斯麥仇恨的主要目標。因此，雖然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希望把猶太人留在保守陣營，但現在卻發現他們越來越左傾，更多出于必要而非選擇。在后來的選舉中，為了對付進步黨，甚至民族自由黨有時也會支持反猶主義候選人。1881年后，大部分德國猶太人把票投給左翼自由主義黨派。蓋爾森的弟弟尤里烏斯就公開表明屬于這大部分人 [[91]](#91_11)  。兩大敵對集團的相互排斥再次加深他們的恐懼與偏見。排斥的力量導致猶太人把票投給左翼，反過來又給反猶主義者新的借口。

這些事件提供難得的機會，讓我們看到德國政府、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對第一波政治反猶主義的爆發有何反應。那幾個月里做出的反應將持續很長時間。政府拒絕對反猶主義煽動者采取明確的反對立場，這讓煽動更加受人尊敬，并預示后來的推諉搪塞，還掩蓋政府方面的歧視。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政府開始暗中實行歧視猶太人的政策，這種政策在威廉二世時期的行政部門中得到延續 [[92]](#92_11)  。在確立新政策的過程中，俾斯麥本人的角色遠比以往所注意到的更加關鍵。

俾斯麥道德上的滿不在乎隱藏更復雜的機會主義。反猶主義不屬于他的信條，他已經發現猶太人對國家和他本人的用處。此外，可以推定他反對極端的煽動，部分原因在于擔心外國的反應 [[93]](#93_11)  。另一方面，俾斯麥缺乏能自動保護他免受政治反猶主義誘惑的原則。他對我們所謂的公民權利沒有基本信仰，對任何形式的平等缺乏感情，這種想法令他反感。他最多接受猶太人的平等公民權，但如果他的敵人提出這種平等在實踐中存在缺陷時，他寧愿質疑敵人，也不愿以任何方式承認他們的抱怨可能不無道理。

法國人說：“我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俾斯麥生平則相信，他敵人的敵人必定是他的朋友，特別是當他們很有影響時。換句話說，對俾斯麥而言，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卒子。

早前的政治反猶主義還暗示，這不僅是統治階級對付下層階級的工具。反猶主義無法吸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但可以有效地對付一部分有產精英，也就是自由主義者。保守派希望用該問題吸引一部分下層中產階級元素加入右翼愛國黨派。

1884年3月，距離下次帝國議會選舉還有幾個月，分離黨和進步黨合并組建自由思想黨（Freisinnige Partei）—經常被譯作激進黨。新黨代表與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相對立的老式自由主義，以及與他的獨裁方式相對立的憲法改革—因此代表他最厭惡的一切。“俾斯麥像一頭瘋狂的公牛沖向這個新敵人，后者因為自身的力量和與皇儲的關系而變得危險。” [[94]](#94_10)

再次為了選舉而與反猶主義調情的舞臺已經搭好。布萊希羅德顯然察覺到這點，他馬上向威廉請愿。與之前的嘗試相比，這次的請愿個人色彩較淡，內容更加發人深省。1884年5月21日，他上書皇帝，談到“猶太人迫于反猶主義煽動而面臨的政治形勢。我不是政客，不敢對政治事務妄加判斷”。但反猶主義煽動的力量正在增強，試圖贏得政府和保守黨的青睞，一些保守黨領袖“已經把最激進的反猶主義煽動者稱為‘他們親愛和尊敬的朋友’”。反猶主義者相信政府青睞自己，他們注意到政府似乎接受議會對反猶主義的支持。保守黨正在逐漸響應反猶主義情感。“這種趨勢……必將把猶太人趕出保守黨。他們越是被保守黨拒絕，就越是強烈地傾向自由主義黨派，包括作為其極端代表的進步黨和激進黨。”簡而言之，猶太人正被趕往反對派，“因為他們發現只有自由派明確承認和尊重他們的權利，并保護他們免受惡意攻擊。我從最可靠的來源獲悉，完全出于對反猶主義運動的擔憂，猶太人已經把大量原本留給保守派的精力和資金提供給自由派”。俾斯麥在“原本留給保守黨的資金”這句話旁打了問號。

布萊希羅德向皇帝保證，在他的猶太人臣民中，持有保守觀點者的比例至少與基督徒中一樣高，但他們面臨著可怕的兩難境地。比如，在1881年的柏林選舉中，保守黨推舉反猶主義候選人：“我不得不在進步黨人與用最無恥的方式污蔑我、我的出身和我的家族的反猶主義者之間做出選擇。我決定不參加選舉。”其他人也有類似經歷，甚至是在柏林之外：“因此，由于反猶主義，我們猶太人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出于道德原因而無法行使選舉權。”布萊希羅德還表示，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反感投票給支持反猶主義的保守黨。最后，布萊希羅德提出請求和承諾：

但如果反猶主義運動能被取締，那么我確信猶太人將因為被從巨大的痛苦中解救和從這種非自然的壓力下解放而深懷感激，我們將用自己的全部能量和方式在選舉中表達對皇帝、德國和政府的真正愛國信念。我們寄希望于陛下卓越的智慧和對全體德國臣民的愛，找到引領祖國及其公民走向幸福的道路。 [[95]](#95_8)

布萊希羅德的請愿中有許多事實：反猶主義者的確認為政府心照不宣地支持他們。大部分德國猶太人遭受挫折，像布萊希羅德這樣的人在政治上正變得無家可歸。據我們所知，他在拒絕支持反猶主義的保守黨一事上從未動搖。但并非所有的猶太富人堅持類似的道路，甚至包括他的密友。布萊希羅德提交請愿書一年后，巴黎的以色列聯盟從柏林收到這樣的報告：“在不久前舉行的柏林初選中，布萊希羅德的合伙人施瓦巴赫把票投給反猶主義候選人，盡管布萊希羅德男爵的弟弟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是自由派指定的候選人。”德國通訊記者還表示，近來有人提議由施瓦巴赫擔任以色列聯盟德國分支的負責人：“絕妙的安排。” [[96]](#96_8)

反猶主義的高漲讓猶太人不安，并分化了他們。過去，他們得到國家的保護。但現在，經過多年的解放，當許多猶太人內心已經德國化之后，國家卻暗中利用反猶主義煽動。布萊希羅德的整個生活取決于同政府及其偉大領導人的密切關系，19世紀80年代初的事件一定令他非常痛苦。他認識到危險，并訴諸傳統的防御策略，即低聲下氣和私下向皇帝請愿。

如果德國猶太人中有誰能向國家辯護猶太人的用處，那就是布萊希羅德。不過，他的請求中存在某些令人悲哀的缺陷：首先，他高估國王制止新騷動的能力。國王沒有魔棒來驅散所有的反猶主義思想和派別，盡管政府的否定無疑將讓反猶主義失去可敬的外衣，如果政府不再心照不宣地支持，許多德國人將猶豫是否接受這種新的恐懼。但更糟糕的是，如果布萊希羅德不得不僅僅以德國的自身利益為理由向政府提出請求，那么其他人（比如恐慌的保守派）可以宣稱反猶主義的確有價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事件說明它是一次受歡迎的轉向。猶太人唯一可以訴諸的先驗原則是對平等權利和寬容的自由主義信仰，但布萊希羅德沒有考慮這些，德國官場也把此類原則看作非德國式的胡扯。沒有被普遍接受的政體原則能至少在理論上譴責反猶主義煽動。自由派猶太人可以訴諸自由主義信條，即便德國自由派也開始不再支持猶太人既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又作為具有不同身份的宗教群體 [[97]](#97_8)  。布萊希羅德不可能想過公開譴責或公然反對政府，這不符合他的性格或者他心目中的利益。布萊希羅德只剩下一個理由，即反猶主義的不明智。這個理由令人討厭和信心不足，但也許并不完全不切實際。在俾斯麥的德國，這也許是唯一能起到效果的理由。如果它失敗了，那么就像布萊希羅德多次暗示的那樣，他“在國內”或者國外都將無家可歸。

沒有關于威廉對布萊希羅德新請愿的回復或者任何政府內部相關討論的記錄。但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反猶主義的確降溫了。俾斯麥需要新的政治盟友，覺得施托克成了累贅。經過連續的選舉失利，俾斯麥于1887年建立由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組成的政治聯盟。作為保守黨的重要成員，施托克的角色冒犯了民族自由黨，而布萊希羅德據說收買了一位反猶主義候選人，好讓猶太人和自由派把票投給政治聯盟 [27](#27_9)  。對布萊希羅德用錢干涉選舉過程的指控經常被重復和添油加醋 [[98]](#98_7)  。

另一方面，令俾斯麥更加不安的并非他的自由派敵人們，而是施托克的朋友們。1887年冬天，施托克與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領導的另一個反俾斯麥集團越走越近。瓦德西說服皇帝的孫子威廉對施托克表現出友好的興趣。俾斯麥對“新教徒中的溫特霍斯特”的攻擊讓年輕的威廉皇子退縮，但也導致他開始對俾斯麥不滿。施托克的聲望不斷下降：在信奉自由主義的腓特烈三世短暫統治期間，反猶主義被視作對國家的真正威脅。當時，俾斯麥出于自己的理由幫助他逃過被罷免的命運。最終，就連登基后的威廉也不愿與引起不和的施托克聯系起來。1890年3月和4月，威廉先后罷免俾斯麥和施托克。但施托克為美化反猶主義貢獻力量。其他人用更加激進的方式延續這場運動，而布萊希羅德仍然是無比寶貴的目標。在反猶主義煽動開始時，布萊希羅德是明星證人。如果他不存在，反猶主義者將無法創造出這樣的形象。他是反猶主義的人質，直到后者成了如此盛行的恐懼，不再需要他作為證據。

[1.](#1_36) 在對“美國政治的偏執風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的研究中，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強調“賣弄學問的特性”：“偏執作品幾乎總是包含論證，它給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正是對論證的極度關心。我們不應該被這種政治風格特有的奇特結論誤導，以為它們并非由事實推導而來。結論的奇特引發尋找‘證據’的英勇努力，以證明無法相信的才是唯一可以被相信的……得體的偏執作品不僅源于某些可以被許多非偏執者認可的道德承諾，而且細心甚至過度地積累‘證據’。”《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和其他論文》（紐約，1965年），第35—36頁［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5），pp.35–36］。

[2.](#2_36) 赫爾曼·阿爾瓦特（Hermann Ahlwardt，1846—1914），德國反猶主義記者。愛德華·德呂蒙（Édouard Drumont，1844—1917），法國記者和作家，反猶主義報紙《自由言論》（La Libre Parole）的創始人。——譯注

[3.](#3_34) 詞典上對這個詞的定義顯示了其總括性：“對猶太人和猶太文化等的反對、偏見或歧視，或者不容忍。”芬克和瓦格納爾斯，《標準大學詞典》（紐約，1963年），第65頁［Funk and Wagnalls，Standard College Dictionary（New York，1963），p.65］。

[4.](#4_34) 歷史學家們總是專注于有組織的反猶主義，對歐洲不同國家潛在和非正式的反猶主義的研究是困難但回報巨大的冒險。作為這種潛在反猶主義的一個例子，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描繪了巴黎和會上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如何突然痛斥法國財政部長克洛茨（Klotz）。克洛茨拒絕允許德國人用黃金進口食品，希望將黃金用于賠款。“你見過克洛茨嗎？這是個又矮又胖、留著濃密八字胡的猶太人，衣著得體，保養得當，但眼神游移不定……勞合·喬治一直憎惡和鄙視此人，現在一度想要殺了他。喬治吼道：女人和孩子們在挨餓，克洛茨先生卻在這里大談特談他的‘金子’。喬治身體前傾，向所有人做出丑陋的猶太人抓住錢袋的手勢。他兩眼放光，話中帶著如此強烈的鄙夷，仿佛在向克洛茨吐口水。在這樣的會議上，反猶主義本就沒有被隱藏得很深，這時更是在所有人的心中涌起。眾人都一度用鄙夷和憎惡的目光看著克洛茨……”凱恩斯，《隨筆和生平梗概》（紐約，1956年），第229頁［J.M.Keynes，Essays and Sketches in Biography（New York，1956），p.229］。

[5.](#5_34) 1890年或1900年前后的世界充滿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身上那種令人吃驚的偏見，因為她后來成了如此堅決反對各種宗族或宗教偏見的戰士；但在1904年，她問富蘭克林是否在哥倫比亞法學院的第一天“遇到老熟人，還是只能和猶太紳士合作！”她評價菲利克斯·弗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是“一個有趣的小個子，但猶太人氣質太濃”。她還表示“猶太人的聚會真可怕。我再也不想聽人提起錢、珠寶……或貂皮”。約瑟夫·拉什，《埃莉諾和富蘭克林》（紐約，1971年），第135、214頁［Joseph P.Lash，Eleanor and Franklin（New York，1971），pp.135，214］。

[6.](#6_34) 顯然，對于猶太人的存在和影響的某種抱怨之聲從未停止。俾斯麥的朋友赫爾曼·瓦格納就是其中之一，1862年他寫道：“猶太一族在血質上的確不同于歐洲的基督教民族，他們擁有不同的身體和體質，不同的情感與熱情，與體質相關的是他們的異質性［Fremdschaft］。”由于無法創造自己的家園，猶太人“被他人統治，渴望被壓迫和剝削……除了這些特點，如果再加上又肥又厚的皮膚以及易激動和大多容易染病的血質，我們面前的猶太人就像白種的黑人，但他們不具備黑人的活潑天性和體力工作的能力。相反，猶太人大腦的體積和活動讓他們接近高加索人”。引自威廉·鮑爾博士，《1830年到1870年的德國文化》，收錄于《文化史手冊》，海因茨·金德曼編（波茨坦，1937年），第216—217頁［Dr.Wilhelm Bauer，“Deutsche Kultur von1830bis1870，”Handbuch der Kulturgeschichte，ed.by Dr.Heinz Kindermann（Potsdam，1937），pp.216–217］。

[7.](#7_34) 大衛·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1808—1874），德國神學家。他的《耶穌傳》將耶穌描繪成歷史人物，否定其神性。——譯注

[8.](#8_34) 在迪斯特的文件中有他妻子提交給國王的請愿書，請求恢復丈夫的軍銜。為了支持自己的主張，她引用迪斯特生平的一則往事，用一句話概括她那個時代與今天截然不同的道德世界：“當他臨終的父親痛苦不已地躺在床上時，兒子日夜守在父親身邊，帶著最深情的愛哭喊道：‘要是我能為您受苦和去死就好了。’父親回答說：‘別這樣，我的孩子，你必須參軍報效你的祖國。’”梅塔·馮·迪斯特（Meta von Diest）致威廉一世，1877年6月12日，DZA：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迪斯特—達伯對俾斯麥親王的攻擊和恢復軍銜的請求，第401號，第1卷。

[9.](#9_32) 卡爾·洛貝爾圖斯（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譯注

[10.](#10_32) 邁耶爾曾經相當干脆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把宗教從人民奪走都是罪犯，但如果那個人還屬于有產階級，那么他還是個傻瓜—因為無論是誰把天堂從人民奪走，他必須給他們土地。”《德國土地報》（Deutsche Landeszeitung），1871年7月25日，引自庫爾特·法伊貝爾曼，《魯道夫·赫爾曼·邁耶爾》（維爾茨堡，1933年），第38頁［Kurt Feibelmann，Rudolf Hermann Meyer（Würzburg，1933），p.38］。

[11.](#11_32) 另一方面，一位拉比代表兩名因為布萊希羅德的發起活動而損失金錢的猶太人寫信給他，提醒他注意，如果他的商業榮譽受到玷污，他將給自己和其他人帶來危險：“到時候，你將無法帶著你的數百萬財產出現在上帝的面前，你將拋下塵世的財產，在最高審判者的寶座前，重要的是我們是否保持自己的榮譽不受玷污，只有在那方面我們才會受到檢驗，如果被發現不合格，我們將被無情地驅逐。”但即使在塵世間也有危險，布萊希羅德一定知道“其他信仰的人如何經常無情地……把以色列人稱為吸血鬼和放貸者”。布萊希羅德必須保證不為這類指控提供口實。大拉比蘭茨貝格博士（Dr.Landsberger）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4月24日，BA。

[12.](#12_30) 施托克的傳記作者瓦爾特·弗朗克（Walter Frank）是納粹黨員，他這樣描繪新的受眾：“除了小商人和小業主，還有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軍官、公務員和青年學者，雖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陷入經濟上的困境，但他們感覺在經濟上更加強大的猶太人威脅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后者非常清楚如何如何把經濟力量轉化成教養，把教養轉化成權力。他們的職業和社會階層觀點的形成與普魯士軍國政府關系密切，而唯利是圖的猶太人否定這些觀點，這是他們反對猶太人的另一個原因。”瓦爾特·弗朗克，《宮廷牧師阿道夫·施托克和基督教社會運動》，第二版（漢堡，1935年），第76—77頁［Walter Frank，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2nd.ed.（Hamburg，1935），pp.76–77］。

[13.](#13_26) 他一定寫信安慰過國外的朋友們。莫里茨·馮·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他希望自己能認同布萊希羅德的觀點，即施托克“像你說的那樣并不危險，只是［他的鼓動］以某種奇特的方式迎合了你們馬伊巴赫部長的毒樹言論”。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3日，BA。

[14.](#14_26) 瓦爾特·弗朗克評價說，布萊希羅德的“抱怨混雜了東方拜占庭風格、膽怯、隱藏的威脅和不地道的德語，對于文化史學家和心理學家來說，這并非沒有吸引力”。這份文件無疑發人深省，但被弗朗克嘲笑的混雜并非布萊希羅德的特有風格。除了稍顯獨特的德語，它符合德國市民階層的一般風格。弗朗克，《宮廷牧師阿道夫·施托克和基督教社會運動》，第85—86頁。

[15.](#15_26) 布萊希羅德把威脅移民國外作為最后一招，這種想法可能是對的。1908年，威廉二世宮廷的一位要人回憶道：“我的父親顯然是堅定的保守黨人，但在猶太人問題上，他無法忽視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相關政策不僅狹隘和不公正，而且有違道德。我們因為逐步迫使一些最好、最有事業心和最富有的家庭離開這個國家而傷害了自己，并因為驅使猶太人成為反對者而招致危險。”羅伯特·策德利茨—特魯弛勒伯爵，《在德意志帝國宮廷的十二年》（倫敦，無日期［可能是1924年］），第217—218頁［Count Robert Zedlitz-Trutzschler，Twelve Years at the Imperial German Court（London，n.d.［1924？］），pp.217–218］。

[16.](#16_26) 俾斯麥不是唯一認識到19世紀猶太人保守性格的人。迪斯累利筆下的猶太人銀行家西多尼婭表示：“……如果你允許人們積累財產，而他們又充分利用這種許可，那么權力將與那些財產不可分割，讓任何有權階級的利益反對他們所處的制度極不明智。比如，除了他們擁有的勤奮、克制以及思想的能量和活躍等主要的公民品質，猶太人本質上是保皇和宗教上非常虔誠的民族，像逃避災難一樣躲避皈依者，并總是急于看到他們所在國家的宗教體系欣欣向榮……”盡管有時持激進立場，“猶太人本質上是保守黨”。鑒于迪斯累利還認為他們掌握著巨大的秘密權力，這種事實令人安心。《康寧斯比，或新的一代》（紐約，1961年），第302—303頁［Coningsby or，the New Generation（New York，1961），pp.302–303］。

[17.](#17_20) 1880年11月，圣瓦里耶伯爵為德國的反猶主義運動寫了特別報告：“近來，德國媒體和外國媒體先后開始大力關注部分民眾發起的反猶太人運動，這場奇怪運動更符合中世紀而非我們時代的理念。”攻擊始于一年前，由施托克發起，矛頭對準“猶太種族迅速而連續的篡權”。圣瓦里耶以戲劇性的細節總結施托克對猶太人壟斷的指控，指出新成立的反猶聯盟對施托克的主張提供更多支持。聯盟由教士、教授和其他社會知名成員組成，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他們準備向政府提交請愿書，要求對猶太人采用限制性法律，“讓人想起14和15世紀的迫害”。政府仍然無動于衷，但在議員、教授和作家中已經出現譴責新聯盟的“強烈反應”。媒體論戰已經開始，所有的重要報紙都為猶太人辯護，只有五六家報紙在攻擊他們。圣瓦里耶寫道，如果沒有這場論戰，反猶主義騷動將完全消失，媒體的喋喋不休只能歸因于“主要報紙的出版人和編輯幾乎都是猶太人。他們在請求保衛家園”，希望到處喚起對反猶主義的譴責。圣瓦里耶最后解釋說，之所以提到如此“局部和短暫”的話題，只是因為他意識到駐柏林記者同樣大多是猶太人的巴黎媒體夸大了該事件。圣瓦里耶致圣伊萊爾，1880年11月16日，MAE：德國，第38卷。

[18.](#18_20) 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1833—1902），德國政治家，左翼進步黨成員。——譯注

[19.](#19_16) 施托克結語中的畫面說明一切：“先生們，最近距此不遠的地區發現一具尸體。尸檢時在場的有一名該地區的猶太人內科醫生、一名猶太人外科大夫、一名猶太人法官和一名猶太人律師，只有尸體是德國人。［聽眾大笑］先生們，我們不希望柏林或其他大城市遭受這樣的命運，我們希望通過本民族自己的生命力讓我們活下去，確保人民支持我們的努力。”《猶太人問題：普魯士下議院關于議員漢內爾博士質詢的記錄》（柏林，1880年），第138頁［Die Judenfrage：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über die Interpellation des Abgeordneten，Dr.Hänel（Berlin，1880），p.138］。

[20.](#20_16) 倫敦的《泰晤士報》刊載這樣的報道：“下面的事實可以說明人們對這場辯論多么感興趣……辯論開始前，所有的旁聽席就被擠爆。目前的爭議讓所有人深感興趣，所有人都被牽扯其中，盡管相對很少有人敢于通過語言或行動表達自己的態度……宮廷包廂和外交旁聽席早早座無虛席。在普通公眾中……可以看到有比例驚人的男人和女人具有明顯的猶太人特征。甚至議會外的人行道上也站滿沒能進場的人……有趣的是，辯論中針對的某些罪惡正以較小的規模出現在外面的街道上。幾位相當懶散但聰明的紳士（無疑來自東歐）平日里在菩提樹下大街叫賣歌劇票……他們設法獲得幾張公眾旁聽證，現在正試圖以高價出售……這一切讓我們想起俾斯麥親王的比喻，即獵人用來射鷹的箭上安了從那只鷹胸前拔下的羽毛。”《泰晤士報》，1880年11月22日。

[21.](#21_16) 年事已高的猶太作家奧爾巴赫在德國人中間度過整個文學生涯，并珍視自己的德國人身份。他痛苦而憤怒地旁聽全部議會辯論，感嘆道：“我白活了嗎？”當幾個月后他試圖回應施托克時，拉斯克說服他不要這樣做。安東·貝特爾海姆，《貝托爾德·奧爾巴赫》（斯圖加特，1907年），第376頁［Anton Bettelheim，Berthold Auerbach（Stuttgart，1907），p.376］。

[22.](#22_16) 埃薩·德·奎羅斯繼續解釋說：“這股反猶主義怒火的主題是猶太人群體的日益興旺……高級金融和小買賣都掌握在［猶太人］手中……在自由職業中，他們占有一切：猶太律師接到更多的案子，猶太醫生接到更多的病人……但如果猶太人的財富觸怒他［德國人］，看到猶太人賺錢絕對會讓他發瘋……［猶太人］總是像踏著被征服的土地那樣高聲談笑……他們身上戴滿珠寶，馬車的裝飾都是金的，還喜愛粗俗和顯擺的奢華……在德國，猶太人慢慢地和偷偷地占有兩大社會力量：交易所和媒體……”然后，埃薩·德·奎羅斯列舉德國人對社會和經濟的各種不滿，如果是在過去，俾斯麥本可以用戰爭來消除它們。但戰爭已經不再可行，“由于戰爭希望渺茫，為了轉移饑餓的德國人的注意力，俾斯麥親王把矛頭對準富有的猶太人。他自然不會暗示我主耶穌基督的死，但他提到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和猶太教會的勢力。這解釋了政府奇怪而災難性的聲明”。《英國來信》（俄亥俄州，阿森斯，1970年），第51—55頁［Letters from England（Athens，Ohio，1970），pp.51–55］。

[23.](#23_16) 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喜歡將反猶主義歸咎于猶太人。1875年，卡爾·邁耶爾·羅斯柴爾德致信布萊希羅德說：“猶太人自己要為反猶主義情感負責，目前的騷動必須歸咎于他們的傲慢、虛榮和無以言表的無禮。”恰好一百年后，吉·德·羅斯柴爾德家族男爵（Baron Guy de Rothschild）公開表示：“對猶太人群體的最大單個威脅常常是猶太人。”擁有無與倫比的財富和力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難道對反猶主義全無貢獻嗎？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9月16日，BA；《紐約時報》，1975年3月30日。

[24.](#24_14) 一本在維也納匿名出版，題為《俾斯麥親王與反猶主義》（Fürst Bismarck und der Antisemitismus，維也納胡戈·恩格爾［Hugo Engel］出版社，1886年，第143頁）的書清醒地指出，即使最激進的反猶主義者也把俾斯麥視為“他們沉默但最有用的領袖”，盡管他們表現出各種激烈言行，“但據我們所知，德國首相迄今為止沒有真正說過任何反對這一切的話，而且肯定沒有發表過公開聲明”。

[25.](#25_14) 他在這封寫給流亡美國的德國民主黨人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的信中提到那件“可怕的事”，即薩拉托加溫泉一家酒店的所有人希爾頓（Hilton）禁止紐約銀行家賽里格曼（Seligmann）入住，因為后者是猶太人。此事在美國和歐洲猶太人中引起軒然大波。

[26.](#26_12) 關于這點，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參加1919年初關于為德國公民提供食物的談判中對德方代表的描繪。當時，凱恩斯竭盡所能地幫助德國人和減輕他們對協約國的仇恨：“當時，德國人見到我們……肥胖而惡心的埃茨貝格［Erzberger］身著毛皮大衣，走下講臺前往元帥沙龍。他身邊是一位將軍和一位海軍上尉，后者脖子上掛著鐵十字，面龐和體態非常像《愛麗絲漫游仙境》里的豬。這些人極其貼近大眾對匈奴人的想象。那個民族的個體外貌實在非常令人反感。誰知道這是不是戰爭的真正原因呢！”凱恩斯，《隨筆和生平梗概》，第202頁。

[27.](#27_8) 布萊希羅德的名字馬上出現在俾斯麥與施托克的新爭議中。在1887年的關鍵選舉中，政治聯盟提名天主教徒克里斯托弗·約瑟夫·克萊默為柏林選區的候選人，對手是進步黨領袖歐根·里希特。克萊默是施托克的朋友和合作者，據說還是70年代中期刊登在《日耳曼尼亞》上的一篇反猶主義文章的作者。此人很可能令自由黨或猶太人的感情陷入尷尬。他在選舉前夕退出，有傳言說布萊希羅德為此花了1萬馬克。里希特和施托克提到這些傳言，克萊默最終出版一本小冊子《馮·布萊希羅德先生所謂的1萬馬克》，辯解說他本人沒有收布萊希羅德的任何錢，而布萊希羅德支持他認同的主張無可厚非：“我們不應該首先考慮馮·布萊希羅德先生可能至少是民族自由黨人還是自由保守黨人。或者他最終是否會變得更加‘保守’，因為他通過婚姻讓女兒躋身西里西亞的貴族，并多次散布消息稱，他本人已經皈依基督教。”克萊默宣稱，令人吃驚的不是布萊希羅德可能給了政治聯盟委員會1萬馬克，而是他沒有給10萬或20萬馬克。不過，克萊默當時真正的敵人是施托克—這并不奇怪，因為德國反猶主義者內部總是爭吵不休，他們的受害者有時也這樣。克里斯托弗·約瑟夫·克萊默，《馮·布萊希羅德先生所謂的1萬馬克》（柏林，1889年）［Christoph Joseph Cremer，“Die angeblichen10，000Mark des Herrn von Bleichröder”（Berlin，1889）］。

## 第十九章　苦澀的結局

……但依我看來，

吃得太飽和完全沒東西吃的人

同樣痛苦。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2場

反猶主義不是布萊希羅德唯一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但它刻薄而且無處不在，讓其他所有的不快更加難以忍受。布萊希羅德遭受著富人的苦惱，每天都有求助性請求，無論是來自著名的慈善組織還是聽聞布萊希羅德傳奇般仁慈的陌生窮人。有時，人們也會采取其他做法。在反猶主義騷動期間，布萊希羅德多次成為勒索的受害者。1880年11月底，他收到三封匿名信，對方索要的金額并不大，從1500到3000馬克，要求他把錢放到預先指定的地點。如果他拒絕，他的一位家人將被殺害。幾乎與此同時，一位前記者要求得到500馬克，否則就會揭露某個可怕的丑聞。1881年4月，自由派的《柏林日報》以《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勒索企圖》為題刊載其中一些威脅的概況。布萊希羅德對被報告感到憤怒，馬上向他的朋友，柏林警察總監圭多·馮·馬達伊抱怨此事 [[1]](#1_61)  。馬達伊之前曾試圖阻止媒體獲悉勒索企圖。同樣在1880年冬天，布萊希羅德的女兒埃爾澤遭遇威脅或無禮言行，馬達伊承諾暗中派警察保護她 [[2]](#2_61)  。

19世紀80年代末，有名婦女試圖勒索布萊希羅德，威脅曝光她丈夫與埃爾澤的通奸行為。布萊希羅德將此事交給檢察官，法庭判處那名婦女三個月監禁；反猶主義媒體看到了這條新聞 [[3]](#3_59)  。布萊希羅德的財富和地位既讓他獲得保護，也給他帶來危險。

布萊希羅德與馬達伊的關系不僅僅具有象征意義。馬達伊是個有點神秘的人物，符合他的警察頭子身份。社會黨人特別憎惡他，認為他是“實際上的帝國警察部長”，主管著包括審查在內的事務 [[4]](#4_59)  。有作家稱他為“最糟糕的反動者”和施托克的保護傘，而當時的一些反猶主義文人則指責他是猶太人，并與猶太人關系密切，特別是布萊希羅德 [[5]](#5_59)  。馬達伊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非常親密，常常以“親愛的朋友和施恩者”開頭。這種關系毫不意外地以禮尚往來為基礎。布萊希羅德給馬達伊的妻子送過禮物，并向她的慈善團體捐贈過，更重要的是，他把馬達伊的兒子康拉德從自身無能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來。身無分文、沒有工作和處于極度絕望中的康拉德致信布萊希羅德，表示他離開了父親給他找的工作，因為雇主是“典型的民主派”，但他無法向父親承認此事。布萊希羅德同意保護那個孩子“免遭最可怕的不幸……為了贏得我父母的愛，我會日夜工作”—但他在蕭條中找不到工作，布萊希羅德的幫助至關重要 [[6]](#6_57)  。反過來，老馬達伊不時向布萊希羅德提供信息，并試圖（沒能成功）在布萊希羅德的岳父金婚時為其“索取”三等王冠勛章，但遭到內政部長奧伊倫堡的拒絕，理由是金婚不足以授勛 [[7]](#7_57)  。馬達伊還為布萊希羅德各種宴會提供特別警衛。不過，布萊希羅德也不斷接到馬達伊手下某些警官的請求，記錄顯示，他和門德爾松以及瓦紹爾等銀行家一起以300馬克的小筆款項“支持”幾名警官，但回報不明 [[8]](#8_57)  。

但馬達伊的主要角色是幫助布萊希羅德解決個人麻煩。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布萊希羅德卷入可怕的丑聞，就像那個世紀經常發生的一樣，他同時遭遇通奸指控和敲詐企圖。德高望重的他幾乎被控作偽證。他的警方檔案對此做了一些記載，而司法部厚厚的文件包含大部分正式材料。大量低俗下流的小冊子向公眾描繪不堪入目的細節，并提出偽證和腐敗指控。當時的法庭和今天的歷史學家唯一忽視的是此事的完整真相，但我們對這件事有足夠了解。

不容置疑的事實很少，但簡單而可恥。從1868年起，一位名叫朵蘿提·科洛納（Dorothee Croner）的柏林離婚婦女開始向布萊希羅德提出金錢要求，理由是她的丈夫在家中發現布萊希羅德后與她婚姻破裂。很久以后真相大白，法庭允許科洛納夫人離婚的理由是她的丈夫通奸，而且被認定為唯一的過錯方。這個女人提出要求后，布萊希羅德馬上找到警察局局長馮·德里加爾斯基（von Drygalski）和警官霍普（Hoppe），希望他們做出某種和解安排。布萊希羅德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警官作為自己的代表，霍普后來還為他服務多年—霍普的主管和布萊希羅德的朋友馬達伊對此心知肚明。收到錢和更多補償的承諾后（具體數字仍有爭議），科洛納同意前往哥本哈根，德里加爾斯基的下屬，刑事警察胡戈·馮·施魏林（Hugo von Schwerin）護送她前往。19世紀70年代初，科洛納返回柏林，根據霍普的官方記錄，她一直試圖提高自己的定期補償：“她抓住一切機會保持和加劇馮·布萊希羅德先生的神經緊張……每天給他寫一到兩封長信，或者在他散步時突然出現在他身邊。” [[9]](#9_55)  她交替使用威脅和乞求的游戲引起同樣的交替反應，對方時而慷慨，時而試圖通過切斷一切資金來迫使她投降。1875年1月，布萊希羅德的法律調解人卡利什博士（Dr.Kalisch）去世，我們手中的第一封馬達伊就此事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正是從那年6月開始的 [[10]](#10_54)  。后來，馬達伊承認“布萊希羅德曾請求我親自干預科洛納夫人令人無法忍受的不斷騷擾和乞求。不過，我所做的只是讓她來見我，并向她提出嚴正警告” [[11]](#11_54)  。警察總監的親自干預無疑對她產生一些震懾效果。

但這種效果既不長久也不足夠。1880年4月，她再次向布萊希羅德發起1.8萬馬克的民事訴訟，聲稱他們在1865—1866年間有過親密關系，并因此導致離婚。她還表示，通過卡利什先生，布萊希羅德在書面協議中同意在她有生之年每月支付給她30塔勒，在每年的四個重要猶太節日支付25塔勒，并為她的孩子們提供一筆錢 [1](#1_39)  。這些數字微不足道，相當于馬達伊付給他的最廉價線人的報酬 [[12]](#12_52)  。作為協議的一部分，科洛納承諾不向布萊希羅德的妻子透露此事。問題在于，她那份所謂的協議已經神秘地失蹤了。在隨后的調查中（顯然完全不為公眾所知），布萊希羅德兩次發誓。首先是文書誓（Editionseid），他發誓自己沒有所謂的協議文書；然后是履行誓（Erfüllungseid），內容有些拗口：“我發誓，我簽署了以在對方有生之年每月支付30塔勒等承諾為條件交換她不向我妻子透露我與她關系的文件不屬實。”根據這些誓言，加之法庭認為“擁有如此出色商業頭腦的……著名商人”不會在這樣一份旨在保守秘密的協議上簽署自己的名字，科洛納的案件被駁回。檢察官交給她一份對案件的詳細回顧，強調“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杰出商人之一的被告”會“愚蠢到”提供給她關于某件希望她守口如瓶之事的證據是絕無可能的 [[13]](#13_48)  。

檢察官從審判過程中得出唯一可能的推斷：布萊希羅德的確與科洛納有不合法的關系，事實上向她支付了一大筆錢，并得到普魯士警方最高層的幫助 [[14]](#14_48)  。歷史學家也無法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此關注社會地位的布萊希羅德居然會與這樣的女人偷情實在是咄咄怪事，根據所有人的描述，她完全不具備美貌、魅力和地位。布萊希羅德第一次見到她時，可能還不知道她在19世紀50年代末已經因為勒索被判三個月監禁。法庭文件形容她是文盲。能夠買得起最上等奢侈品的男人顯然與一位平凡、愚蠢和刻薄的女人（不友善的傳言有時也把這些特點安到他妻子身上）有過短暫的偷情。通奸沒有品位可言，我們也許可以想象布萊希羅德希望謹慎地“出軌”（Seitensprung）。但朵蘿提·科洛納并不謹慎—因為短暫的不法放縱，蓋爾森遭受多年的勒索、流言和卑鄙的曝光。不那么富有的人和不那么顯赫的公民可能不會遭受那么大的痛苦。

他的兩次起誓結束了第一階段的法律程序，但也帶來無窮無盡和日益糟糕的影響。科洛納覺得受了委屈，正在此時，一個典型的地下世界怪人和她走到一起，此人集偏執、自負和無限憤恨于一身，并對個人利益擁有狡猾的嗅覺。1880年，刑警胡戈·馮·施魏林因為被指與賭徒勾結而遭到開除，他本人的說法當然不是這樣，顯得他完全無辜 [[15]](#15_46)  。他認為自己是陰謀的犧牲品。被從警局開除后，他失去養老金，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在憤怒和絕望中，施魏林顯然想起自己曾代表布萊希羅德的保護者護送科洛納前往哥本哈根。現在，他開始給科洛納幫忙，這樣做既有利可圖，因為他將獲得科洛納從布萊希羅德那里爭取到錢款的十分之一，而且帶有報復意味，因為施魏林認為他可以讓前老板和布萊希羅德的生活陷入痛苦。另一項心理回報是，他可以讓科洛納不以被告身份出現（據說兩人當時已經同居），而是作為純潔的普魯士正義的捍衛者—在這個案例中，正義顯然受到侵害。

1883年，科洛納和施魏林一起要求檢察官對布萊希羅德提出作偽證的指控，理由是他在1881年第二次起誓時說謊。作偽證顯然是嚴厲的指控，如果被判有罪，布萊希羅德可能身陷囹圄，人生和事業將毀于一旦。檢察官開始重新調查，召集證人起誓作證。1883年11月，他宣布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施魏林和科洛納直接向最高法院請愿，試圖推翻這個決定。但在準備過程中，科洛納正式撤回請愿，因為現在她確信“被告無辜”。經過全面考慮，法庭認定沒有足夠的證據發起訴訟，于是撤銷了該案件 [[16]](#16_46)  。

很難理解她為何突然變卦，除非假設布萊希羅德說服科洛納宣稱他無辜，這樣做對兩人都有好處。根據從未被否定的傳言，布萊希羅德的調解人是他前雇員、前柏林市長韋伯（Weber），此人給了科洛納7.5萬馬克 [2](#2_39)  。唯一的麻煩是她拒絕分給施魏林十分之一，導致后者變得比以往更加憤憤不平。布萊希羅德的調解人最終說服不情愿的施魏林接受直接來自布萊希羅德的6000馬克，施魏林本人承認這筆交易 [[17]](#17_40)  。但這6000馬克進一步刺激施魏林的良心。現在，他單槍匹馬地為科洛納辯護和控訴布萊希羅德。他確信上層的腐敗保護了布萊希羅德，正義遭到拋棄。從1884年開始，布萊希羅德在普魯士司法部的文件中加入大量施魏林的請愿書；他向檢察官和法官、普特卡默和弗里德貝格、威廉一世和皇儲發出憤怒的請求—在所有這些請求中，施魏林用無禮而諂媚的語氣暗示，被不公正地開除的他是法律神圣性的唯一捍衛者。他的指控逐漸升級，斷言布萊希羅德受益于最高等級的司法保護。文件顯示，司法部長海因里希·馮·弗里德貝格本人對此事感興趣，要求用特別函件把報告直接發給他，雖然施魏林當時不可能知道這點。顯然，弗里德貝格的下屬們知道布萊希羅德是俾斯麥的特別親信。檢察官和法官們相信，布萊希羅德在1881年做了誤導性證言，卡利什為了滿足科洛納的要求曾經制定過某種協議，但他們都不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認定布萊希羅德作偽證。（畢竟，布萊希羅德只是起誓自己沒有簽署過任何協議，完全沒有提到他的代理人卡利什。）沒有司法上的瀆職行為，施魏林等人多年來抓住不放的只是強烈的偏袒氣息。

政府最高層不得不應付施魏林的指控。人們不得不向威廉通報情況，弗里德貝格和普特卡默開始官方通信，而皇儲則詢問施魏林的指控是否誹謗，是否應該為此被起訴。但這同樣遭到否定，因為私人請愿傳統上被免予起訴 [[18]](#18_40)  。地下騷動繼續維持一段時間。

1884年，部長會議討論此事。布萊希羅德曾邀請全體內閣赴宴，但弗里德貝格覺得“有必要警告人們暫時與布萊希羅德保持距離，因為他正面臨不光彩的案件”。弗里德貝格（荷爾斯泰因聲稱他是布萊希羅德的遠親）向內閣全面通報案件，特別提到科洛納已經將偽證指控從不情愿的公訴部門轉到法院本身—荷爾斯泰因認為，這暗示弗里德貝格主管的檢察官和布萊希羅德勾結，但也可以解讀為科洛納被允許用盡各種法律手段。一周后，布萊希羅德再度發出邀請，這次弗里德貝格接受了，因為“那個女人已經撤回指控”。荷爾斯泰因本人的評價發人深省，也許還具有典型性。他指出，“弗里德貝格的焦慮……首先是擔心布萊希羅德這個猶太人可能在當下的反猶主義時代引發丑聞，導致檢察官的辦公室無法運行”。（弗里德貝格是個皈依猶太人。）簡而言之，荷爾斯泰因相信司法受到干涉；他同樣認為布萊希羅德有罪，因為無罪者會堅持高調宣傳指控，而不是買通科洛納撤回案件。但布萊希羅德也可能在法律上無罪，卻不愿面對公開審判的羞辱。

荷爾斯泰因還更加憤怒地表示，“因為擔心觸怒首相大人”，俾斯麥的女婿蘭曹拒絕向岳父通報布萊希羅德的案件和內閣的討論。相反，處于麻煩漩渦中的布萊希羅德還被邀請到弗里德里希斯魯，因此“鞏固了自己的聲望……［他］回來時容光煥發” [[19]](#19_36)  。由于荷爾斯泰因知道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相信他是傳播者。如果荷爾斯泰因懷疑布萊希羅德有罪和與官方勾結，其他人可能也有類似的懷疑。面對這樣的良機，反猶主義者無法保持沉默。

從1884年到1886年，施魏林滿足于提交關于布萊希羅德所謂作偽證的請愿，有時也請求恢復他自己的職務。他沒有收到滿意的答復，到了80年代末，特別是俾斯麥被罷免后，他開始與反猶主義領袖赫爾曼·阿爾瓦特聯合，后者和施魏林一樣，也是來自地下世界的道學家。在發現反猶主義這個神圣使命前，阿爾瓦特曾因為挪用公款而被免去校長職務 [[20]](#20_36)  。他身經百戰而且擅長抹黑，成了反猶主義運動的領袖。1891年，他出版《雅利安民族與猶太人的殊死斗爭》（Der Verzweiflungskampf der arischen Völker mit dem Judentum），該書第二部分《猶太人的誓言》中的六十四頁文件和評論只可能由施魏林提供。在阿爾瓦特的手中，臆測和道聽途說變成事實，編造出一個看似真實的縱欲、作偽證和腐敗的故事，堪稱反猶主義暢銷書的完美程式。在羅列“事實”后（包括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布萊希羅德讓科洛納把密信藏在胸部，帶給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他最后傳遞了必要的反猶主義信息：“讓猶太人滾出我們的司法體系，否則德國就完了。”布萊希羅德的故事再次展現猶太人的邪惡力量，但罪魁禍首是被罷免的首相：1871年，“俾斯麥將德國交給那個‘大猶太人’，后者將它榨干” [[21]](#21_36)  。作為帝國議會議員，阿爾瓦特指控布萊希羅德作偽證，并與司法當局勾結，特別是與“猶太人”弗里德貝格。他的小冊子售出數千冊，“引起了巨大轟動” [3](#3_37)  。這對布萊希羅德和當局發起明白無誤的挑戰。

阿爾瓦特的指控馬上引起共鳴。重要的社會報紙《前進報》（Vorwärts）將布萊希羅德的故事描繪成資本主義社會腐敗的證據：

馮·布萊希羅德男爵是股市的小酋長和圍繞金牛犢起舞的領舞者，我們對他的情事不感興趣。但阿爾瓦特的小冊子指責柏林警方幫助布萊希羅德掩蓋和壓制這樁丑聞……這涉及公共利益。這個問題就是安全部門是否真的協助富人—我們不在乎他是否代表受過或沒受過割禮的資本家。

阿爾瓦特以假定的文件證據為基礎指控警方與布萊希羅德勾結，這是否屬實？如果警方的確有阿爾瓦特所控訴的行為，“那將是對法律的公然違背、對公共安全的巨大威脅、對官方權力的惡意濫用，法庭最直接的干預應該是不言自明的結果” [[22]](#22_36)  。早前，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也在社會黨人的《新時代報》（Neue Zeit）上提到阿爾瓦特的指控：

特別是猶太人大資本家通過作偽證來逃避向被拋棄的情婦支付贍養費，而一些警官協助他干了私下擺脫不利證人的骯臟事，此事已被證明非常有可能。令人非常難以理解的是，為何官方不對證據展開調查，畢竟此事給“敬畏上帝的虔誠帝國”抹了黑。 [[23]](#23_36)

社會主義者的視角是階級正義，反猶主義者則從種族正義的角度出發。19世紀90年代，阿爾瓦特領導下的反猶主義運動卷土重來，他的偽證和勾結指控對追隨者具有無法抵擋的吸引力。有時，指控變得更加異想天開：警方代理人報告說，在一場有1800名聽眾參加的柏林反猶主義集會上，有位阿克斯博士（Dr.Ax）指控一名猶太醫生試圖毒死科洛納，并提供各種必要的可怕細節。另一位發言者的叫囂贏得滿堂喝彩：“趁著猶太人還沒把你們鎖進基督徒區，先把猶太人鎖在他們的老巷子里。” [[24]](#24_34)  數以百計的集會響應這些指控，數十種報紙和寬幅印刷品到處宣揚它們，政府也不斷收到要求重開布萊希羅德案件的請愿—因為根據申訴時限規定，他在1891年后將無法被定罪。警方一度沒收阿爾瓦特的小冊子并起訴他，這為該案件染上壯烈的色彩 [[25]](#25_34)  。

1891年秋天，在這樣的混亂中，幾名內閣成員調查該案件。司法部長正式質詢檢察官和總檢察長，阿爾瓦特的新證據是否足以要求重開此案。低俗和體面的報紙都聽說了這次質詢，紛紛報道可能會有新的起訴。

重新仔細核查全部證據后，主檢察官傳喚了一些證人，并發現阿爾瓦特的小冊子中披露的某些19世紀80年代初的文件已經失蹤。他得出的結論是，沒有理由重開此案。他回憶說，布萊希羅德沒有用訴訟來對付阿爾瓦特的公然挑釁“令人吃驚”，但原因可能是害怕丑聞擴大。他認為無法獲得足夠的證據，說服法庭相信布萊希羅德發了偽誓。鑒于該案的“特殊性”，加之過去所有的尋找無可辯駁證據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他建議目前不要重開此案 [[26]](#26_32)  。檢察官和司法部長先后表示認同，1891年10月末，他們正式決定不重開此案 [[27]](#27_28)  。

對布萊希羅德而言，這一定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他在陰霾下生活多年，情況有時較為不利，有時有所好轉。幾位朋友對他表示同情。1890年12月，保羅·林道在寫給布萊希羅德的信中談到兩人正遭受的可怕侮辱：“您同樣不幸地撞上世界上最卑劣的賤民。” [[28]](#28_22)  但和布萊希羅德本人一樣，大部分伙伴尷尬地保持沉默。

即使申訴有效期已過，即使司法部長竭盡所能地保持“最嚴格的機密”，風暴也沒有減弱 [4](#4_37)  。《北德大眾報》刊載官方聲明，否認新調查將導致重開此案，已經決定不這樣做 [[29]](#29_22)  。1893年1月，一份匿名出版的小冊子（幾乎肯定出自施魏林之手）問世，題為《施魏林與布萊希羅德》（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它傳遞的意思非常簡單：

男爵、伯爵、親王和許多最高層的國家顯貴紛紛向他[布萊希羅德]示好，德國人已經如此接受一個腐化千年的外來種族，他們以錢袋為上帝，以欺詐為信仰。德國人，團結起來，為德國的法律體系而戰，否則你們將再無出頭之日。 [[30]](#30_18)

小冊子的其他部分如出一轍，以早前訴訟過程中的無數文件作為佐證。布萊希羅德可能也看到了這本小冊子，警方和政府各個部門當然也不例外。

公共煽動和私下勒索都沒有停止。無數文章和影射讓案件無法平息。1892—1893年冬天，朵蘿提·科洛納回到柏林，找到另一個愿意起訴布萊希羅德的“保護人”。甚至連她的女兒也加入戰團，請求以作偽證為由審判布萊希羅德。這次起訴同樣被正式駁回 [[31]](#31_18)  。《大眾報》（Volks-Zeitung）的消息表示，剛剛返回的科洛納再次找到檢察官，因為她向布萊希羅德索要數十萬馬克的請求仍未得到答復。她聲稱布萊希羅德在1891年給過她4萬馬克，想要堵住她的嘴，但她的現任丈夫偷走了其中的四分之一。該報在1893年2月18日報道這個故事，并起了恰如其分的標題：《舊事新說》 [[32]](#32_18)  。

公開的影射讓布萊希羅德的生活直到最后都苦惱不已。與此同時，直到去世前幾天，他仍然扮演著自己的公共角色，同部長們會談，并招待顯貴們 [[33]](#33_18)  。盡管身體日益虛弱，但他直到最后都忙碌著。對他的最后一次公開攻擊發生在1893年2月18日。第二天，布萊希羅德在短暫的發病后死于肺水腫，享年71歲。

布萊希羅德人生的各種矛盾也體現在他的結局中。人們為他舉行奢華的葬禮。普魯士掌禮局收到一份關于這位逝世貴族最后榮耀的全面報告。布萊希羅德的宅邸變成莊嚴的悼念廳。“他的宮殿頂上飄揚著降到一半的黑旗”，隨處可見精美的棕櫚枝和鮮花，還有布萊希羅德、俾斯麥和威廉的半身像，棺材的腳下放了四個墊子，上面擺放著他的勛章和獎章—棺材頂部是他自家的花圈，還有來自俾斯麥的插在鮮花中的棕櫚枝，以及來自英國大使館的兩個花圈。“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派特使從巴黎送來一個巨型花圈，一半是紫羅蘭，一半是‘尼爾元帥’玫瑰。”波蒂謝部長和萊恩多夫伯爵獻上巨大的棕櫚枝，商業公司競相奉上最好的插花。鐵十字騎士們也在棺材附近放置花圈。參加葬禮的有外交使團和政府成員，高官和國際商界代表。馬伊鮑姆拉比（Rabbi Maybaum）宣讀長篇悼詞，列舉布萊希羅德的偉大成就，但主要稱贊了顯示出“他憑借自己的力量戰勝財富之巨大危險”的特點和行為。“我們在這里首先強調他的虔誠和父母。他很少錯過在猶太教堂舉行的緬懷活動，并建立基金會緬懷父母—愿他們在天堂安息。” [[34]](#34_18)  “壯觀的送葬隊伍”最終經過布萊希羅德的出生地，來到位于舍恩豪澤大道（Schönhauser Allee）的猶太公墓，按照猶太人的儀式將他安葬。最后的盛大儀式就此結束—根據官方的報告，這幾乎堪稱國葬 [[35]](#35_18)  。

報紙也紛紛刊發長篇悼詞：“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國金融界］失去最杰出的代表。”但主要的猶太人報紙出言謹慎：

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的去世結束了他充實而成功的人生，但他的人生也沒有逃過人類的悲傷和煩惱……取得如此偉大的物質成功并非沒有經過艱苦的斗爭，并非沒有遭遇過伴隨人們終生、對人生產生巨大影響的嫉妒和其他敵意。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最大程度地經歷這些，在其他方面，命運同樣多次重創他。 [[36]](#36_18)

掌禮局或報紙都沒有記錄警方文件中的一份官方記錄。這份由奧伊倫堡伯爵提供的記錄寫道：“布萊希羅德的后人很擔心反猶主義示威”可能會干擾送葬隊伍；他們還擔心，有人會在前往公墓的沿途發放關于這位“最卑鄙猶太人”死亡的惡毒小冊子 [5](#5_37)  。警方負責人里希特霍芬做了必要安排，暗中部署特別的保護，葬禮得以平安無事。第二天，布萊希羅德的后人送給柏林市長10萬馬克，用于公共目的和紀念先父 [[37]](#37_18)  。

布萊希羅德滿載著榮譽安息了，但他仍然需要國家的保護。為了獎賞他的服務，普魯士王室和德意志帝國給了他豐厚的回報。他唯一沒有得到的是歸屬感和安全感，是確保獲得接受的感覺。也許那就是融合之痛苦的本質。

[1.](#1_38) 第二項要求強烈暗示她是猶太人。在重要節日支付的規定是否可以追溯到贖罪日的傳統習俗呢？即如果罪人表示懺悔，并向受害者道歉，那么即使受害者仍然心懷怨恨，過錯方也不再會受到指責。我的朋友杰伊·溫特（Jay Winter）向我提出這種解釋。

[2.](#2_38) 根據1896年科洛納寫給司法部長的信，從1884年到1893年，她每年通過前市長韋伯收到6000馬克。當韋伯減少支付，并最終在布萊希羅德死后停止支付后，她變得窮困潦倒。科洛納致朔恩施泰特，1896年4月30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64。

[3.](#3_36) 阿爾瓦特知道自己對事實經常相當漫不經心，在被要求證明某項指控時，他曾回答說：“如果我無法證明某事，那么我就下斷言。”赫爾穆特·馮·格爾拉赫，《從右派到左派》（蘇黎世，1937年），第114頁［Hellmut von Gerlach，Von Rechts nach Links（Zurich，1937），p.114］。

[4.](#4_36) 1892年，萊比錫出現又一份匿名的反猶主義小冊子，真正的作者是巴爾德（Balder）。《俾斯麥的真相：致德意志民族的公開講話》（Die Wahrheitüber Bismarck：Ein offenes Wort an die deutsche Nation）重復關于布萊希羅德為俾斯麥所做的各種欺詐交易的老掉牙傳言：“通過俾斯麥，布萊希羅德得到權力和聲望；通過布萊希羅德，俾斯麥得到同樣的—他們是一對當代的名人。”（第117頁）小冊子還指控布萊希羅德控制了50家報紙，積累了7億馬克的財富。

[5.](#5_36) 家人的擔憂并非全然沒有理由。一家新教徒報紙對于他去世當天“整個猶太人媒體稱頌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為‘圣人’”感到憤怒，指責他們忘記針對他的所有嚴重指控。該報試圖揭穿“一個虛假時代的虛假膜拜”。《大眾路德福音教會報》（Allgemeine evangelische-lutherische Kirchen-Zeitung），1893年3月21日，引自《真理封印：猶太人詞典》（埃爾福特，1929年）［Sigilla Veri.Lexikon der Juden（Erfurt，1929）］，第646頁，“布萊希羅德”詞條。

# 后記　家族的衰敗

思想先于行動，就像閃電先于雷聲。德國的雷聲具有真正的德國人性格：它并不非常靈活，有點遲緩地隆隆而來。但它終會到來，當你聽見世界歷史上從未被聽見過的碰撞聲時，你就知道德國的霹靂終于降臨。在這混亂中，老鷹會從空中墜亡，非洲最偏遠荒漠中的獅子會咬住自己的尾巴，爬進它們高貴的巢穴。比起德國將要上演的劇情，法國大革命將顯得只是單純的田園詩。

——海因里希·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歷史》

（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決定是今天逃走還是可以等到明天所需的智力，可以讓你在幾十年前創造出不朽的杰作。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逃亡者對話》（Flüchtlingsgespräche）

作為布萊希羅德的公共遺產，帶有他姓氏的銀行繼續在柏林扮演著顯赫的角色—但從他去世后不久，銀行就開始走下坡路，不過最初幾乎注意不到。其他私人銀行遭遇類似的命運，它們被大銀行排擠或者吞并 [[1]](#1_62)  。布萊希羅德死后，他的銀行與德國政府的聯系不像過去那么親密。銀行業務由高級主管尤里烏斯·施瓦巴赫接管；蓋爾森的長子漢斯·馮·布萊希羅德是任職合伙人（active partner），他從1881年就開始在父親的銀行工作，但他的工作熱情并未隨著年齡或職責的上升而提高。

布萊希羅德銀行仍然享有國際聲譽，是歐洲的精英私人銀行之一，伴隨德國新的世界政策，它的業務領域不斷擴大。布萊希羅德銀行與貼現公司、羅斯柴爾德家族和門德爾松家族等老伙計合作，參與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政府貸款項目。該行繼續在羅馬尼亞、意大利和墨西哥金融中占據主導地位；布萊希羅德還在世時，紐約的拉登堡和塔爾曼公司（Ladenburg，Thalmann and Company）就已經成為該行事實上的財產 [[2]](#2_62)  。施瓦巴赫屬于“國際高級金融界無視邊界的杰出代表”。從1898年到1914年，在法國和德國銀行的許多合資項目中，布萊希羅德銀行首屈一指。即使各自的政府漸行漸遠，萊茵河兩岸的銀行家們仍然偏愛延續他們低調和有利可圖的和平合作 [[3]](#3_60)  。

我們對蓋爾森去世后該行的狀況了解較少；施瓦巴赫時代沒有私人文件留存，而該行本身也失去許多獨立聲望。它保留了在德國的顯赫客戶和在國外的地位。1897年，尤里烏斯·施瓦巴赫慶祝自己加入布萊希羅德銀行五十周年。根據警方的報告，為了紀念這個日子，他向慈善機構捐贈10萬馬克，盡管作為唯一已知的接受者，柏林的猶太人改革協會只收到2萬馬克。他對猶太人群體非常慷慨，但他的孩子們都放棄信仰，選擇皈依新教。施瓦巴赫的年收入估計為250萬馬克，總資產達2700萬馬克。政府拒絕再授予他一枚勛章作為紀念。一年后他去世 [[4]](#4_60)  。

即使在施瓦巴赫生前，蓋爾森的孩子們在銀行中扮演的角色影響也很小。漢斯是銀行成員，雅姆斯是隱名合伙人—根據警方檔案，后者入股1400萬馬克。從1896年到1903年，警方估計雅姆斯的財富從1600萬馬克增加到2200萬馬克（想必反映了該行的興旺），他在1903年的年收入估計為80萬馬克 [1](#1_41)  。格奧爾格也一度是隱名合伙人。

該行在某種程度上生活在自己過去的榮耀之上，甚至在尤里烏斯·施瓦巴赫生前便是如此。從馬克斯·瓦爾堡寫給他在紐約的兄弟保羅的信中可以推斷出，該行的國際聲譽已經不如過去，因為施瓦巴赫憤憤不平地抱怨被伊利諾伊中央證券的發行“完全排除”。馬克斯敦促兄弟與庫恩和勞埃布公司（Kuhn，Loeb and Company）討論布萊希羅德銀行未來對美國事務的參與，他同時哀嘆自從布萊希羅德死后，該行管理者的素質大不如前：“這仍然是我們首屈一指的猶太人銀行；此外，我們對此事非常感興趣，因為我聽說布萊希羅德銀行一度與貝倫家族關系緊張。”—該行與瓦爾堡家族的關系同樣如此 [[5]](#5_60)  。

隨后的三十年間，該行繼續由施瓦巴赫的兒子保羅執掌。保羅最初有過別的職業規劃，他學的是歷史，寫過關于17世紀法國稅收管理的令人稱道的論文。1896年，29歲的保羅加入布萊希羅德銀行，兩年后接替去世的父親擔任主管。年邁的俾斯麥幾乎馬上將其召到弗里德里希斯魯，他回憶過去更加美好的時光，嚴厲指責威廉二世和在1890年拋棄他的保守黨，并短暫地提到延續布萊希羅德銀行與他的金融關系。在會面結束前，俾斯麥說：“我還有兩個愿望：希望再次見到伐爾岑和再次用冷香檳把自己灌醉。” [[6]](#6_58)  這是他最后的幾次會面之一，四個月后俾斯麥去世 [2](#2_41)  。俾斯麥家族與布萊希羅德銀行的良好關系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 [[7]](#7_58)  。

保羅·施瓦巴赫很快開始在柏林社交界扮演重要角色，比起當年的蓋爾森，他進入社交界更加容易。1893年，當他申請預備役軍官的委任狀時，他的部隊向柏林警方提出各種問題，首先是（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尤里烏斯·利奧波德·施瓦巴赫家族仍然追隨摩西信仰嗎？”警方馬上做出回復，雖然這家的父母仍然追隨摩西信仰，但“三個兒子都皈依福音教會”—原稿上的“信仰”被劃去，代之以“教會” [[8]](#8_58)  。這個障礙被去除后，加之他在1896年娶了一位漢堡的著名銀行家之女埃莉諾·施羅德（Ellinor Schröder），保羅可以開始社交生涯。

施瓦巴赫家族在柏林開設了一家光鮮的沙龍，供外交官和官員們聚會。他們還在克爾岑多夫（Kerzendort）擁有一處專屬莊園，卡爾·菲爾斯騰貝格這樣的特殊朋友經常造訪那里 [[9]](#9_56)  。保羅獲得巨大的社會聲望。1907年，他被封為貴族；就在不久前，他幫助威廉二世在科孚島（Corfu）上買了一處地產。現在兩人都有了“太陽下的位置” [3](#3_39)  ，保羅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船舶建造商阿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對此“深惡痛絕……［因為］猶太富人的社會野心只會加劇反猶主義” [[10]](#10_55)  。但施瓦巴赫是荷爾斯泰因的密友，并時常參加威廉的宴會和狩獵活動，他不再覺得自己是猶太人，即便其他人對此念念不忘。不過，與布萊希羅德的后人類似，施瓦巴赫及其后人也無法避免調和猶太人血統和融入熱情的問題。

和蓋爾森一樣，保羅無法抵抗外交的誘惑。但和蓋爾森不同，在為外國政客和銀行家（當然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執行各種使命時，保羅非常小心謹慎。他多次主張節制，特別是在幾次摩洛哥危機中，并受柏林官員的委托向法國和英國政客傳遞表達和平意圖的私信。他與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他童年時的朋友埃爾·克勞爵士（Sir Eyre Crowe）關系最為親密，完全沒有察覺到后者的反德情感。他是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但并非無條件的沙文主義者或擴張主義者。一戰爆發后，他回到自己的部隊。后來，他與比利時的德國占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系，并試圖拯救伊迪思·卡維爾（Edith Cavell）的生命 [[11]](#11_55)   [4](#4_39)  。懷著和平意愿的國際銀行家們在戰時的柏林扮演次要角色。保羅不贊成許多工業家的擴張主義計劃，反對無限制潛艇戰。（1917年5月，他寫道：“我不確定潛艇戰的延期是否真的要歸功于馮·貝特曼—霍爾維格先生 [5](#5_39)  。如果是這樣，那么他為祖國立下大功，很難高估他的貢獻。” [[12]](#12_53)  ）

保羅不是皇帝統治的無條件贊美者；他抱怨該政權的拜占庭風格，對醉心權力的泛日耳曼主義者感到警覺。但和大部分德國人一樣，德意志帝國的覆滅給他帶來可怕的打擊。1918年，他加入民主黨，盡管他后來可能再次右傾。1921年，在慶祝自己加入布萊希羅德銀行二十五周年時，他回想起蓋爾森，稱其為第一個認識到和體現政治與金融間密切關系的德國人：“馮·布萊希羅德先生知道，如果個體商人想要成功，他們的活動就永遠不能離開祖國的共同目標。” [[13]](#13_49)  這也是他本人的看法，整個魏瑪共和國時期，他與當權者和重要人物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通過與馮·萊賓夫人 [6](#6_37)  的親密友誼，他繼承了與蓋爾森亦敵亦友、對其最為怨恨的弗里茨·馮·荷爾斯泰因的遺稿。戰爭結束后，他重新開始與外國友人通信，試圖讓英國政客和銀行家相信，貧困潦倒的德國將毀掉歐洲。1925年5月，他在寫給一位英國合作伙伴的信中表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最大的危險：

根據我所說的，唯一的出路是改變俄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我認為，如果歐洲所有國家的內閣采取積極的政策，形成所謂的統一陣線，它們應該能找到讓俄國發生改變的方法。我所說的改變并非讓沙皇回歸寶座，政府的形式只是無關大局的細節，我們所關心的是經濟體制。 [[14]](#14_49)

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讓他沒有對國內的致命危險做好準備。

加入銀行二十五周年之際，保羅在談到漢斯和格奧爾格·布萊希羅德時流露出某種優越感，這兩人原先是他的合伙人，“但主要忙于別的事” [[15]](#15_47)  。（1902年，運動發燒友格奧爾格死于車禍。漢斯于1917年去世。）隨著布萊希羅德的后人繼續迅速變得墮落、放縱和懶惰，保羅的角色的確顯得愈發重要。蓋爾森的兒子們嘲弄他本人的傳統 [7](#7_37)  。在他兒子們卷入的所有丑聞中，雅姆斯與一位名叫弗洛拉·德·圣里基耶（Flora de Saint Riquier）的女子的關系也許最具典型性。他與這位比他幾乎年輕20歲的女子生活很長時間，后者在柏林相當有名，但名聲不太好。弗洛拉甜美的名字是偽造的，她是一個名叫海曼（Heymann）的柏林猶太馬販子的女兒，1889年被貪污犯馮·霍赫貝格（von Hochberg）收養。她可能在英國與一位擁有優美姓氏圣里基耶的法國人有過短暫的婚姻。警方猜測，“通過被馮·霍赫貝格收養獲得貴族姓氏和嫁給圣里基耶都來自布萊希羅德的授意” [[16]](#16_47)  。最終，雅姆斯娶了弗洛拉，并試圖讓柏林社交界接受她。幾年后，她拋棄了雅姆斯，帶著昂貴的珠寶與一位南美外交官再次私奔。媒體盡責地報道這些情況 [[17]](#17_41)  。雅姆斯的兒子們試圖成為預備役軍官。一戰期間，雅姆斯本人成了國內的一名后備騎兵上尉，他的一個兒子戰死，“沖在隊伍的最前列”。戰爭爆發前不久，他的女兒嫁給來自古老普魯士家庭的約爾丹·馮·坎普（Jordan von Campe） [[18]](#18_41)  。

下一代人并不更加出色。反猶主義者稱小漢斯是“伊西多類型的青年 [8](#8_37)  ”。漢斯還是全職的情場高手，他與薩克森—魏瑪公國的索菲亞公主（Princess Sophia of Sachsen-Weimar）的戀情最為著名。1913年，索菲亞因為父母反對她與漢斯的婚姻而飲彈自盡，她的家人禁止漢斯參加葬禮 [[19]](#19_37)  。

布萊希羅德家族的衰敗甚至比它的崛起更加迅速。這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經常有家族被財富腐化和摧毀。德國社交界的誘惑也許比其他地方更大。抵制這些誘惑離不開家族意識和自我意識，后者尤為重要。但年輕的布萊希羅德家族渴望成為他們永遠無法成為的另一種人，因此他們雖然富有，卻沒有什么自尊。聲色驅散雄心，父輩的辛勞滿足子女的放縱。這一切在富豪中耳熟能詳，但背景和最終的結局是獨一無二的。

在戰后的經濟風暴中，布萊希羅德銀行的生存變得艱難。它的公共聲望仍然很高，在戰后德國經濟最困難的1923年，該行慶祝自己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隨后，它開始迅速衰敗。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經過一場骯臟的官司，布萊希羅德的后人們（主要是雅姆斯的兒子庫爾特·馮·布萊希羅德）被清理出家族生意，保羅一度希望獨自運營。但該行急需新的資本和人才。早期與奧夫霍伊澤（H.Aufhäuser）的慕尼黑銀行的合作效果不理想；1931年，在巨大的經濟危機中，該行與德累斯頓的阿恩霍爾德兄弟銀行（Gebrüder Arnhold）組成親密的利益共同體。這家欣欣向榮和管理有序的銀行創建于1864年，1875年到1926年期間由格奧爾格·阿恩霍爾德執掌。相比之下，布萊希羅德銀行已經大不如前。同年，保羅把自己的沃爾夫通訊社股份賣給帝國政府，就此結束了存在超過六十年的聯系 [[20]](#20_37)  。

希特勒上臺后發起的雅利安化運動最終讓該行壽終正寢。1938年，該行在德國不復存在，而倫敦和紐約先后建立名為阿恩霍爾德和布萊希羅德銀行（Arnhold and S.Bleichroeder）的新公司，老名字獲得新聲望。新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布魯納（F.H.Brunner）的突出貢獻，他曾是那家柏林銀行的重要成員，還搶救了布萊希羅德檔案。

希特勒上臺是該行衰敗和消失的有形原因。布萊希羅德和施瓦巴赫許多后人的徹底茫然和道德混亂是無形原因。新政權規定，按照納粹的法律，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仍然是猶太人。在切斷與猶太教的聯系和無保留地接受德國價值后，他們該對這個新政權作何反應呢？保羅·馮·施瓦巴赫的兒子小保羅遭受的打擊尤為殘酷，這個認真而能干的人深深愛上一個古老普魯士家族的美麗后人卡門·馮·維德爾（Carmen von Wedel），但《紐倫堡法令》禁止兩人結婚。1936年2月，孤注一擲的保羅向內政部長提交特別請愿，希望認定自己是半雅利安人（Halbarier），從而獲準娶他心愛的姑娘。他甚至試圖動員有影響力的人物向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 [9](#9_35)  施壓。施瓦巴赫試圖讓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yoyd George） [10](#10_35)  直接與希特勒交涉，但后者和其他幾位英國人一樣婉拒了。1937年6月，他的請愿被駁回。在阿爾弗雷德·達夫·庫珀（Alfred Duff Cooper）和鄧肯·桑茲（Duncan Sandys） [11](#11_35)  的幫助下，他不情愿地嘗試獲得英國的永久居留權。在上述計劃過程中，35歲的保羅在短暫患病后突然去世，以至于一些著名的瑞士報紙聲稱他因為傷心欲絕而自殺。這很可能并不屬實，但他的生存意志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的確受到致命的打擊 [[21]](#21_37)  。

老保羅一直沒有從他的朋友、合伙人和兒子的去世中恢復過來。無論在私人還是公共領域，他的生活遭到毀滅，也無法理解圍繞著他的各種榮譽。在他最后的某一封信中（寫于他去世前幾周，恰逢《慕尼黑協定》簽署不久），他憤怒地抱怨《凡爾賽條約》，聲稱條約制定者“不是笨蛋就是壞蛋。我在后一類中為克列孟梭和威爾遜 [12](#12_33)  安排了榮耀的位置” [[22]](#22_37)  。1938年11月的納粹反猶事件爆發幾天后，他去世了。

蓋爾森的一些孫輩逃到國外，其他人則試圖通過請愿和屈膝來逃避。德國內政部的檔案中有一封1942年1月7日庫爾特·馮·布萊希羅德的來信，他是雅姆斯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兒子。庫爾特在信中請求內政部長弗里克豁免他按照新法令的規定佩戴作為猶太人標志的黃星，讓他免于被遣送，“此外請給我機會，讓我通過雅利安化重新成為有用的軍官”。作為理由，他指出自己在一戰期間曾擔任前線的后備軍官，并三次負傷。“在戰后的第一次國內騷亂‘卡普政變’（Kapp-Putsch） [13](#13_29)  中，我忠于職守”。作為“鋼盔團”（Stahlhelm） [14](#14_29)  成員，他參加了“對伏爾鏗造船廠（Vulkan-Werft）的沖鋒”。他的一個兄弟在前線犧牲，另一個兄弟埃德加也在行動中被子彈擊中。他的父親雅姆斯盡管當時已經55歲，但還是以騎兵上尉的身份在軍隊服役。庫爾特在信上寫了“希特勒萬歲！”隨后，埃德加也另外提交請求，主要以兩位“黨員”（埃德加用納粹的術語）的證詞為依據。他們的證詞將證明埃德加支持納粹運動。埃德加寫道，其中一位黨員“堅稱他在1930年入黨是受到了我的鼓動”。這位黨員還提出要為埃德加作證，證明他了解自己的種族出身，一直想要實現“雅利安化”。有位貝西施泰因夫人（Frau Bechstein，可能來自鋼琴生產商貝西施泰因家族）正式為庫爾特向弗里克求情，但最后的決定將由黨衛軍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做出。1942年5月7日，艾希曼的辦公室拒絕了請求，理由是布萊希羅德家族是猶太人，特別是根據“元首關于如何對待這類請求的反復聲明”。由于他們在一戰中負過傷，他們將被免于遣送到東方，“但在帝國領土上的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前，他們將被安置在帝國土地上的老年猶太人隔離區” [[23]](#23_37)  。

這些乞求所展現的墮落無需評論。它們的象征意義幾乎再明白不過。在赤裸裸的絕望乞求中，它們顯得如此毫不含糊。不過無論這個最后的自我貶低舉動中折射出多少蓋爾森本人的卑躬屈膝，我們都不能忘記他們所處的混亂正在演變成難以置信的災難，兄弟們試圖從中拯救自己的性命。

為了保住性命，他們最終逃到瑞士，紅十字會給了身無分文的庫爾特一件大衣。1942年8月，庫爾特的妹妹馮·坎普男爵夫人被作為“女猶太人”遣送到里加（Riga）的集中營 [[24]](#24_35)  。戰爭結束后，這個已經流離失所的家庭的成員們因為對布萊希羅德遺產的處置而陷入激烈的爭執 [[25]](#25_35)  。《紐約時報》刊載的一則聲明為布萊希羅德銀行在德國歷史漩渦中的離奇故事寫下最后一筆。聲明表示，紐約阿恩霍爾德和布萊希羅德銀行主合伙人的孫女將嫁給奧托·馮·俾斯麥的曾孫。經過兩次戰爭和兩場革命，這將標志著布萊希羅德銀行和俾斯麥家族最終平等地攜手。不過，婚約后來被取消。小愛神破壞了歷史女神的愿望，布萊希羅德的故事沒有以大團圓告終。

布萊希羅德沒有墓志銘。他留下一個成就、勝利和毀滅的故事，一個徒勞的希望被歷史潮流撕碎的故事。他是德國社會大轉變的一部分；他的人生（包括成功和痛苦）折射出那個社會的活力和有缺陷的特點 [[26]](#26_33)  。他的多重公共角色使他成為那個時代的重要人物，但甚至他的私人生活也被他與一個迷人但不友好的社會的茫然斗爭所支配。他同時是那個社會的主人和奴隸。德國最富有的人遠非最自由的人。他的故事講述他本人和他人對他的狂妄，講述黃金鎖鏈如何蒙蔽人們的雙眼，讓他們接受鋼鐵般無情的奴役。他人生中的某些教訓遠比他的影響或財富更加重要：它們是他永恒的紀念碑。

[1.](#1_40) 據說雅姆斯屬于保守的農場主聯盟（Bund der Landwirthe），與競爭對手和更加平民主義的農民聯盟（Bauernbund）不同，該組織接納猶太人，盡管并不情愿。該組織也非常積極地參與反猶主義煽動。見《論帝國議會選舉》，刊于《歷史政治雜志》，1893年，II，60［“Über die Reichstagswahlen，”Historisch-politische Blätter（1893）］。同年，布萊希羅德的又一位后人在政治版圖的另一頭變得臭名昭著。自由派的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的女婿利奧·亞隆斯（Leo Arons）是社會黨人，此人是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的主要資助者，也是柏林大學的物理學私人講師。圍繞著這樣的“顛覆分子”是否有資格任教展開激烈的爭論，最終不得不出臺名為“亞隆斯法”的特別法令。關于民主德國對此事的描述，見迪特·弗里克，《威廉時代德國精神生活的軍事化：利奧·亞隆斯事件》，刊于《歷史科學期刊》，1960年第8期，第1069—1107頁［Dieter Fricke，“Zur Militarisier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lebens im wilhelminischen Kaiserreich：Der Fall Leo Arons，”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VIII（1960），1069–1107］。

[2.](#2_40) 《紐約時報》如此描繪他的墓地：“花圈極其美麗。來自馮·俾斯麥伯爵夫婦的花圈上題寫著‘威廉和西比爾’，來自布萊希羅德銀行的花圈特別巨大，需要整輛馬車裝載。”1898年8月3日。

[3.](#3_38) 威廉二世的名言。他上臺后推行殖民擴張，聲稱要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下的位置”。——譯注

[4.](#4_38) 伊迪絲·卡維爾（1865—1915），英國護士，以平等地救治交戰雙方的傷員而聞名。因為幫助協約國士兵逃離被德國占領的比利時而被捕遇害。——譯注

[5.](#5_38) 特奧巴德·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國政治家，1909年至1917年間任德意志帝國首相。——譯注

[6.](#6_36) 海倫娜·馮·萊賓（Helene von Lebbin，1849—1915），德國沙龍女主人，父親是總參謀部成員海因里希·馮·勃蘭特。她與荷爾斯泰因和卡普里維等人是朋友。1909年，她得到荷爾斯泰因的遺稿，但因為內容有爭議而一直深藏箱底，直到去世前不久才把它們交給保羅。——譯注

[7.](#7_36) 唯一的重要例外是，他們延續他對醫學研究的慷慨資助。1914年5月，布萊希羅德家族（聲明中如此表示）向柏林的內科醫生弗里德里希·克勞斯（Friedrich Kraus）和柏林慈善醫院捐贈100萬馬克，用于以新的物理療法“治療有困難的病人，特別是包括那些來自中產階級的”。克勞斯，《布萊希羅德基金》（Bleichröderstiftung），刊于《德國醫學周刊》（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1914年5月14日，第1023頁。

[8.](#8_36) 這里玩了一個文字游戲，將法語jeunesse dorée（花花公子）改成jeunesse isidorée，伊西多是許多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所取的名字，相當于以賽亞（Isaiah）。——譯注

[9.](#9_34) 魯道夫·赫斯（1894—1987），納粹德國的副元首，統管除外交政策和武裝部隊以外的一切事務。——譯注

[10.](#10_34) 大衛·勞合·喬治（1863—1945），英國自由黨領袖，曾任英國首相。——譯注

[11.](#11_34) 阿爾弗雷德·達夫·庫珀（1890—1954），英國保守黨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鄧肯·桑茲（1908—1987），英國保守黨政治家，丘吉爾的女婿。——譯注

[12.](#12_32) 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理。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國總統。兩人都參加了巴黎和會。——譯注

[13.](#13_28) 1920年3月，對《凡爾賽條約》不滿的守舊保皇派發動政變，成立由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領導的國民政府，試圖取代魏瑪政權，但僅四天后就宣告失敗。——譯注

[14.](#14_28) 1918年德國軍國主義者組織的義勇兵團。——譯注

# 注釋

序言

[1．](#_1) 《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第五幕，第10場。

[2．](#_2)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理解社會學基礎》，第5版（圖賓根，1972年），第531頁[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5th ed.（Tübingen，1972），p.531]。

[3．](#_3) 《凡勃倫便攜選集》，馬克斯·勒納編（紐約，1950年），第475頁[The Portable Veblen，ed.by Max Lerner（New York，1950），p.475]。

[4．](#_4) 里徹博士備忘錄，卡爾曼·施泰因（Kalman Stein）引述，《1866–1914年呂貝克的勞工運動：社會民主發展的另一種模式》（“The Labor Movement in Lübeck1866–1914.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Democracy”），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1976年。

[5．](#_5) 德國歷史學家魏爾納·約赫曼（Werner Jochmann）近來指出：“德國史學界突如其來的想法在19世紀催生猶太人研究學科及其后來的繁榮。但對于這個當時絕大部分生活在歐洲的活躍少數民族的歷史，德國史學界本身從未想要給予其哪怕一點關注。”[《帝國時期的猶太人與德國社會》（“The Jews and German Society in the Imperial Era，”LBY），1975年第20期，第5頁。]1911年，魏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寫了富有爭議的《猶太人與經濟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而馬克斯·韋伯對猶太人在資本主義和德國社會中的角色做了零星但重要的點評，可惜他始終沒有系統分析該問題的復雜性，雖然他本可以做得很好。

[6．](#_6) 萊昂內爾·特里林，《自由的想象：文學與社會隨筆》（紐約，1950年），第212頁[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50），p.212]。

[7．](#_7) 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惡的彼岸：未來哲學序曲》，瓦爾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譯（紐約，1966年），第80頁[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trans.by Walter Kaufmann（New York，1966），p.80]。

[8．](#_8)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紐約，1948年），第viii頁[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New York，1948），p.viii]。

[9．](#_9) 萊昂內爾·特里林，《誠與真》（馬薩諸塞州，劍橋，1972年），第15頁[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1972），p.15]。

第一章　初逢：容克貴族與猶太人

[1．](#_1_1) 里斯貝特·蒙西，《威廉二世時代普魯士政府中的容克貴族，1888–1914》（普羅維登斯，1944年）[Lysbeth W.Muncy，The Junker in the Prussian Administration under William II，1888–1914（Providence，1944）]，p.15。

[2．](#_2_1) 雅各布·雅各布森編，《柏林城的猶太市民名錄，1809–1851》（柏林，1962年），第108、494頁[Jacob Jacobson，ed.，Die Judenbürgerbücher der Stadt Berlin，1809–1851（Berlin，1962），pp.108，494]。

[3．](#_3_1) 雅各布·卡茨，《走出隔離區：猶太人解放的社會背景，1770–1870》（馬薩諸塞州，劍橋，1973年），第26、61、80–81頁[Jacob Katz，Out of the Ghetto：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Jewish Emancipation，1770–1870（Cambridge，Mass.，1973），pp.26，61，80–81]。

[4．](#_4_1) 關于宮廷猶太人，見海因里希·施尼，《宮廷金融與近代國家：專制時代德意志宮廷的宮廷商人歷史和制度》，三卷本（柏林，1953–1955年）[Heinrich Schnee，Die Hoffinanz und der moderne Staat：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Hoffaktoren an deutschen Fürstenhöfen im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3vols.（Berlin，1953–1955）]；另見塞爾瑪·斯特恩，《宮廷猶太人》（費城，1950年）[Selma Stern，The Court Jew（Philadelphia，1950）]。

[5．](#_5_1) 赫爾曼·薩姆特，《五代人：布萊希羅德家族史》，刊于《柏林猶太人團體團報》，1935年6月16日[Hermann Samter，“Fünf Generationen.Die Geschichte der Familie Bleichröder，”Gemeindeblatt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zu Berlin，June16，1935]。

[6．](#_6_1) 見迪特里希·艾希霍爾茨，《1848年之前普魯士鐵路史上的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東柏林，1962年）[Dietrich Eichholtz，Junker und Bourgeoisie vor1848in der preussischen Eisenbahngeschichte（East Berlin，1962）]。

[7．](#_7_1)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38年4月18日、5月5日、11月5日和6日，1839年1月9日，RA。

[8．](#_8_1)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40年9月16日、1843年1月9日，RA。

[9．](#_9_1)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1831年9月14日、11月11日、12月15日，RA：倫敦；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家族，1848年5月8日，BA。

[10．](#_10) 材料來自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1831年10月8日，RA：倫敦。材料由大衛·蘭德斯從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取得。

[11．](#_11)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40年7月17日，RA。

[12．](#_12)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43年2月28日，RA。

[13．](#_13) 見胡戈·拉謝爾、約翰尼斯·帕普利茨和保羅·瓦里希，《柏林的大商人和資本家》，卷三：《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1806–1856》（柏林，1967年），第126–127頁[Hugo Rachel，Johannes Papritz和Paul Wallich，Berliner Grosskaufleute und Kapitalisten，Vol.III：Übergangszeit zum Hochkapitalismus，1806–1856（Berlin，1967），pp.126–27]。

[14．](#_14)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安塞爾姆·所羅門男爵，1839年11月17日，RA。

[15．](#_15) 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43年2月28日，RA。

[16．](#_16) 哈約·霍爾伯恩，《近代德國史，1840–1945》（紐約，1969年），第122頁[Hajo Holbor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40–1945（New York，1969），p.122]。

[17．](#_17) 西奧多·哈梅洛，《德國統一的社會基礎，1858–1871：理念和制度》（普林斯頓，1969年），第1章各處和第31頁[Theodore S.Hamerow，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1858–1871：Ideas and Institutions（Princeton，1969），ch.1passim，and p.31]；大衛·蘭德斯，《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至西歐的技術變革和工業發展》（倫敦，1969年），第4章[David S.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1750to the Present（London，1969），ch.4]；赫爾曼·明希，《阿道夫·馮·漢澤曼》（慕尼黑，1932年）[Hermann Münch，Adolph von Hansemann（Munich，1932）]。

[18．](#_18) 亞伯拉罕·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55年7月12日、1859年6月5日，BA。

[19．](#_19) 見Münch，Hansemann，pp.77–78；赫爾穆特·波姆，《德國的大國之路：帝國奠基時代經濟與國家的關系研究，1848–1881》（科隆和柏林，1966年），第57–82頁[Helmut Böhme，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während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1848–1881（Cologne and Berlin，1966），pp.57–82]。

[20．](#_20) 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紐約，1939年），第一卷，309頁[Leo Tolstoi，Anna Karenina（New York，1939），I，309]。

[21．](#_21) 《俾斯麥全集》，第XIV1卷，第14頁。GW，XIV1，14.

[22．](#_22) 同上，p.58。

[23．](#_23) 同上，p.16。

[24．](#_24) 同上，p.179。

[25．](#_25) 即使是對俾斯麥最細致的刻畫也極力關注他在宗教上的巨大轉變，但幾乎忽略1848年革命的影響，比如奧托·普弗朗茨的論文《對俾斯麥的心理分析詮釋》，刊于《美國歷史評論》，1972年第77期，第419–444頁[Otto Pflanze，“Toward a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Bismarck，”AHR，77（1972），419–44]。亨利·基辛格，《白色革命家：反思俾斯麥》，刊于《代達羅斯》，1968年第77期，第888–924頁[Henry A.Kissinger，“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Daedalus，97（1968），888–924]。

[26．](#_26) 《奧托·馮·俾斯麥親王思想和回憶錄》（斯圖加特，1898年），第一卷，第31–32頁[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von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tuttgart，1898），I，31–32]。以下簡稱Gedanken。

[27．](#_27) GW，XIV1，150.

[28．](#_28) Gedanken，I，72.

[29．](#_29) GW，XIV1，187；轉引自Pflanze，“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p.424。

[30．](#_30) GW，XIV1，228.

[31．](#_31) 同上，p.214。

[32．](#_32) 同上，p.213。

[33．](#_33) 同上，p.222。

[34．](#_34) 埃根·凱撒·孔特·科爾蒂，《鼎盛時期的羅斯柴爾德家族，1830–1871》（萊比錫，1928年），第334–350頁[Egon Caesar Conte Corti，Das Haus Rothschild in der Zeit seiner Blüte，1830–1871（Leipzig，1928），pp.334–50]。

[35．](#_35) 同上，pp.290–319；另見埃爾里希·埃克，《俾斯麥：生平與作品》，三卷本（埃倫巴赫—蘇黎世，1941–1944年），第一卷，第197–200頁[Erich Eyck，Bismarck：Leben und Werk，3vols.（Erlenbach-Zürich，1941–1944），I，197–200]；卡爾·德米特爾，《俾斯麥在法蘭克福時的圈子》，刊于《勃蘭登堡與普魯士歷史研究》，1936年第48期，第294–326頁[Karl Demeter，“Aus dem Kreis um Bismarck in Frankfurt am Main，”FBPG，48（1936），294–326]；轉引自Böhme，Deutschlands Weg，p.56。

[36．](#_36) Corti，Haus Rothschild，pp.353–55.另見GW，I，278。

[37．](#_37) Gedanken，I，200–206.

[38．](#_38) GW，III，343.

[39．](#_39) GW，XIV1，1851年1月書信，特別是1月25日，p.191。

[40．](#_40) Gedanken，I，191.

[41．](#_41) 沃爾夫蘭·費舍爾（Wolfram Fischer）教授友好地向我提供布萊希羅德搬家的日期，他依據的是1860、1861和1863年的《普通住宅指南》（Allgemeiner Wohnungs-Anzeiger）。

[42．](#_42) 瓦格納和柯西瑪·彪羅的匯票保存在巴黎羅斯柴爾德兄弟檔案。

[43．](#_43) 德爾布呂克（Delbrück）致警察總監，1861年9月22日；警方關于布萊希羅德的報告，1861年10月4日，勃蘭登堡州首府檔案，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文件，編號30。關于商務顧問的頭銜，見哈特穆特·凱爾布勒，《工業化初期的柏林企業家：出身、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柏林，1972年），第273–275頁[Hartmut Kaelble，Berliner Unternehmer während der frühen Industrialisierung.Herkunft，sozialer Status und politischer Einfluss（Berlin，1972），273–75]。

第二章　俾斯麥的生存斗爭

[1．](#_1_2) 引自威廉·波特，《1862年到1866年俾斯麥與普魯士議會的斗爭》（布雷斯勞，1932年），第14頁[Wilhelm Bothe，Bismarcks Kampf mit dem preussischen Parlament1862bis1866（Breslau，1932），p.14]。關于普魯士憲法沖突的最佳近作，見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普魯士自由主義與德意志民族國家：德國進步黨研究，1861–1866》（圖賓根，1964年）[Heinrich August Winkler，Preussischer Liberalismus und Deutscher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1861–1866（Tübingen，1964）]；另見Eugene N.Anderson，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Prussia，1858–1864（Lincoln，Nebr.，1954）。

[2．](#_2_2) Holborn，Modern Germany，p.141.

[3．](#_3_2)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2年3月11日，BA。

[4．](#_4_2) Böhme，Deutschlands Weg，pp.116–120.

[5．](#_5_2) 以Böhme為首的當代史學家強調政府與反對派在物質利益上的一致，這是早前的歷史學家常常忽視的。但當下的這種過分強調可能導致低估1862年的局勢所產生的絕望感：只有重新設定沖突雙方的要求才能打破僵局，但在俾斯麥之前，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做到這點。

[6．](#_6_2) GW，XIV1，228.

[7．](#_7_2) 關于俾斯麥的作品當然數不勝數。超過7000種書籍被列入卡爾·埃爾里希·波恩編輯的《俾斯麥書目：關于俾斯麥及其時代歷史的材料和作品》（科隆，1966年）[Bismarck-Bibliographie.Quellen und 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Bismarcks und seiner Zeit，（Cologne，1966）]。較好的新書目可以見瓦爾特·布斯曼，《俾斯麥時代，1852–1890》（法蘭克福，1968年）[Walter Bussmann，Das Zeitalter Bismarcks，1852–1890（Frankfurt am Main，1968）]；關于1862年俾斯麥觀點的最佳分析之一仍然是埃格蒙特·策希林，《俾斯麥與作為大國的德國之奠基》（第二版，斯圖加特，1960年）[Egmont Zechlin，Bismarck und die Grundlegung der deutschen Grossmacht（2d ed.；Stuttgart，1960）]的第2章和第3章，盡管他同樣不夠重視俾斯麥對政治中物質利益的必要關心。

[8．](#_8_2) 就像之前提到的，關于俾斯麥的作品數量驚人。除了已經提到的那些，我覺得古斯塔夫·施莫勒的觀點很有見地，見《關于俾斯麥的社會政治與國民經濟立場與解釋的四封書信》，收錄于《憶俾斯麥》，古斯塔夫·施莫勒、馬克斯·倫茨和埃爾里希·馬科斯編（萊比錫，1899年）[Gustav Schmoller，“Vier Briefeüber Bismarcks sozialpolitische und volkswirtschaftliche Stellung und Bedeutung”，Zu Bismarcks Gedächtnis，ed.by Gustav Schmoller，Max Lenz，and Erich Marcks（Leipzig，1899）]。

[9．](#_9_2) GW，II，142.

[10．](#_10_1) 引自Zechlin，Bismarck，p.369。

[11．](#_11_1) 基辛格做出過類似論斷，“The White Revolutionary”，Daedalus，97（1968），888–924。

[12．](#_12_1) 引自Robert Blake，Disraeli（London，1966），p.430。

[13．](#_13_1) Zechlin，Bismarck，pp.369–75.

[14．](#_14_1) APP，III，131–32.

[15．](#_15_1) GW，XIV1，223.

[16．](#_16_1) 利奧波德·馮·蘭克，《日記》，瓦爾特·彼得·福克斯編（慕尼黑—維也納，1964年），第139–140頁[Leopold von Ranke，Tagebücher，ed.by Walther Peter Fuchs（Munich-Vienna，1964），pp.139–40]。

[17．](#_17_1) GW，XIV1，223.

[18．](#_18_1) GW，IV，28–33.

[19．](#_19_1) 關于此事，見路德維希·德希奧的生動論文《俾斯麥與沖突時期的軍隊草案》，刊于《歷史期刊》，1931年第144期，第31–47頁[Ludwig Dehio，“Bismarck und die Heeresvorlagen der Konfliktszeit，”HZ，144（1931），31–47]。

[20．](#_20_1) 西奧多·哈梅洛，《德國統一的社會基礎，1858–1871：斗爭與成就》（普林斯頓，1972年），第158–159頁[Theodore S.Hamerow，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1858–1871：Struggles and Accomplishments（Princeton，1972），pp.158–59]。

[21．](#_21_1) Schmoller，“Vier Briefe，”p.17.

[22．](#_22_1) 雅各布·圖利，《德國猶太人的政治傾向：從耶拿到魏瑪》（圖賓根，1966年），第115頁[Jacob Toury，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von Jena bis Weimar（Tübingen，1966），p.11]。

[23．](#_23_1) 對1862年議會的新近社會學研究估計，根據收入和資本，超過八成的議員是富人。阿達爾貝特·黑斯，《違抗俾斯麥的議會：沖突時期普魯士議會的政治和社會構成，1862–1866》（科隆和奧普拉登，1964年），第56頁[Adalbert Hess，Das Parlament das Bismarck widerstrebte：zur Politik und sozialen Zusammensetzung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 der Konfliktszeit，1862–1866（Cologne and Opladen，1964），p.56]。

[24．](#_24_1)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2年9月24日，RA。

[25．](#_25_1) 引自奧托·普弗朗茨，《俾斯麥與德國的發展：統一時期，1815–1871》（普林斯頓，1963年），第177頁[Otto 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The Period of Unification，1815–1871（Princeton，1963），p.177]。

[26．](#_26_1)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2年12月30日，1863年1月18、24日，RA。

[27．](#_27_1) 同上，1863年1月25日、2月9日，RA。

[28．](#_28_1) Zechlin，Bismarck，p.436；Bleichröder to Baron James，21Feb.1863，RA.

[29．](#_29_1) 曾在1863年抨擊過俾斯麥對波蘭政策的海因里希·馮·聚貝爾（Heinrich von Sybel）后來寫下這樣的代表性頌詞：“通過干涉波蘭起義，她[普魯士]贏得俄國的真正友誼。”聚貝爾，《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國》（紐約，1890–1898年），卷三，第431頁[Sybel，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by William I（New York，1890–1898），III，431]。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當然是A.J.P.Taylor，他在這件事和其他許多事上顛覆傳統觀點，見泰勒，《俾斯麥：人和政客》（紐約，1955年），第65–66頁[Taylor，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New York，1955），pp.65–66]。另見Pflanze富有見地的總結，Bismarck，pp.185–189。

[30．](#_30_1)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2月21日，RA。

[31．](#_31_1) 舒爾特斯編，《歐洲歷史年表，1860–1940》，81卷本（諾德林根，1861–1941年），1863年，第123–124頁[H.Schulthess，ed.，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1860–1940（81vols.：Nördlingen，1861–1941），1863，pp.123–24]；以及伊爾姆加德·戈德施密特，《普魯士議會對1863年波蘭起義的商議》（科隆，1937年）[Irmgard Goldschmidt，Der polnische Aufstand von1863in den 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Cologne，1937）]。

[32．](#_32_1) 羅恩致俾斯麥，1863年3月1日，DAZ：梅澤堡，齊特爾曼遺稿。

[33．](#_33_1)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2月28日，RA。

[34．](#_34_1) I.Goldschmidt，Der polnische Aufstand，p.29；APP，III，239–335passim.

[35．](#_35_1)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3年2月22日，3月9、10日，4月9日，RA。

[36．](#_36_1) 參見赫伯特·羅特弗里茨的重要研究，《普魯士駐巴黎大使羅伯特·馮·德·戈爾茨伯爵的政策，1863–1869》（柏林—格林瓦爾德，1934年）[Herbert Rothfritz，Die Politik des Preussischen Botschafters Grafen Robert von der Goltz in Paris，1863–1869（Berlin-Grünewald，1934）]；以及奧托·施托爾貝格—維爾尼格羅德伯爵著，《羅伯特·海因里希·馮·德·戈爾茨伯爵，1863–1869年駐巴黎大使》（柏林，1941年）[Otto Graf zu Stolberg-Wernigerode，Robert Heinrich Graf von der Goltz.Botschafter in Paris，1863–1869（Berlin，1941）]。

[37．](#_37_1)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3年5月15日，RA。

[38．](#_38_1) GW，XIV2，639.

[39．](#_39_1) 參見Pflanze，Bismarck，pp.192–212。

[40．](#_40_1) Gedanken，I，287.

[41．](#_41_1)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5月17日，RA。

[42．](#_42_1)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3，pp.130–31.

[43．](#_43_1) 引自Bothe，Bismarcks Kampf，p.49。

[44．](#_44) 見Pflanze，Bismarck，pp.207–212。

[45．](#_45)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3年5月24日，RA。

[46．](#_46) 引自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164。

[47．](#_47)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3年5月24日，RA。

[48．](#_48) 同上，1863年6月9、3日，RA。

[49．](#_49) 引自Bothe，Bismarcks Kampf，p.52。

[50．](#_50) 關于“民族統一時期各種主張和習慣的交匯”顯示了“新的機會主義治國方法”的觀點，見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192and ch.5passim以及Böhme，Deutschlands Weg，pp.120–138。

[51．](#_51)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3年6月9日，RA。

[52．](#_52) 同上，1863年9月28日，RA。

[53．](#_53) 漢斯—約阿希姆·舍伊普斯盛贊俾斯麥的成就，認為那是其他普魯士政客無法復制的，見《法蘭克福諸侯會議與普魯士的民意》，刊于《作為科學和教學的歷史》，1968年第19期，第73–90頁[Hans-Joachim Schoeps，“Der Frankfurter Fürstentag und dieöffentliche Meinung in Preussen，”GWU，19（1968），73–90]。

[54．](#_54)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5月1日，RA。

[55．](#_55)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3年9月29日，RA。

[56．](#_56) 同上，1863年11月19日，RA。

[57．](#_57) Gedanken，I，297–98.

[58．](#_58) 羅伯特·馮·科伊德爾，《俾斯麥親王夫婦：1846–1872年的回憶》（柏林和斯圖加特，1901年），第194–195頁[Robert von 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Erinnerungen aus den Jahren1846–1872（Berlin and Stuttgart，1901），pp.194–95]。

[59．](#_59) 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的檔案中包含許多雙方提出的會面請求。比如，在1864年2月24日寫給俾斯麥的信中（FA），布萊希羅德請求約見對方，因為他新收到一封信。在寫給雅姆斯男爵的信中，我們得知第二天他的確見了俾斯麥。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假設，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見面的次數比他向雅姆斯男爵報告的更多。

[60．](#_60) GW，V，474.

[61．](#_61) GW，VII，66.

[62．](#_62) 弗里茨·赫爾維希，《薩爾爭奪戰，1860–1870：論拿破侖三世的萊茵地區政策》（萊比錫，1934年），第152–156頁[Fritz Hellwig，Der Kampf um die Saar，1860–1870：Beiträge zur Rheinpolitik Napoleons III（Leipzig，1934），pp.152–56]。赫爾維希認為，內閣討論了布萊希羅德的建議。

[63．](#_63) 漢斯—約阿希姆·馮·科拉尼，《憲法沖突時期普魯士政府的財政狀況，1862–1866》（杜塞爾多夫，1939年），第26頁[Hans-Joachim von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zur Zeit des Verfassungskonfliktes，1862–1866（Düsseldorf，1939），p.26]。另參見Pflanze不太令人滿意的敘述，Bismarck，p.263。

[64．](#_64)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3，pp.146–47.

[65．](#_65)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12月21日，RA。

[66．](#_66) 《議會下院商談速記報告》（SBHA），1864年1月15日，第九卷，第525–538頁。

[67．](#_67) 洛塔爾·維克特編，《特奧多爾·蒙森與奧托·雅恩通信集，1842–1868》（法蘭克福，1962年），第302頁[Lothar Wickert，ed.，Theodor Mommsen-Otto Jahn：Briefwechsel，1842–1868（Frankfurt，1962），p.302]。甚至在1890年俾斯麥被罷免后，蒙森仍用《浮士德》中的這句引文形容他。

[68．](#_68) 卡洛伊致萊西貝格，1864年1月22日，HHSA：PA III：普魯士。

[69．](#_69)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12月21日，RA。

[70．](#_70)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4年1月29日，RA。

[71．](#_71) 肯尼斯·波恩，《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外交政策，1830–1902》（牛津，1970年），第107–110頁[Kenneth Bourne，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1830–1902（Oxford，1970），pp.107–10]。另見凱斯·桑迪福德，《英國內閣與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危機，1863–1864》，刊于《歷史》，1973年第58期[Keith A.P.Sandiford，“The British Cabinet and the Schleswig-Holstein Crisis，1863–1864，”History，58（1973），360–83]。

[72．](#_72)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p.26–27.

[73．](#_73) 保羅·埃姆登，《19和20世紀歐洲的金錢勢力》（倫敦，1937年），第397頁[Paul H.Emden，Money Powers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London，1937），p.397]。

[74．](#_74)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2月4日，RA。

[75．](#_75)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4年2月17、19日，RA。

[76．](#_76) 關于俾斯麥同波德爾施溫格的會面，見霍斯特·科爾編，《俾斯麥親王：德意志帝國首任首相科學傳記的大事記》，兩卷本（萊比錫，1891–1892年），第一卷，第222–224頁[Horst Kohl，ed.，Fürst Bismarck：Regesten z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Biographie des ersten deutschen Reichskanzlers，2vols.（Leipzig，1891–1892），I，222–24]。

[77．](#_77) 奧斯瓦爾德·施耐德，《俾斯麥的財政與經濟政策》（慕尼黑，1912年），第1–3頁[Oswald Schneider，Bismarcks Finanz-und Wirtschaftspolitik（Munich，1912），pp.1–3]。

[78．](#_78) 《戰爭部長，陸軍元帥馮·羅恩伯爵回憶錄》，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勞，1897年），第二卷，第214–215頁[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210，214–15]。

[79．](#_79)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4年2月25日，RA。

[80．](#_8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4年3月14日，SA。

[81．](#_81)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加里波第和他的敵人們：意大利建國過程中的兵戈與個性之爭》（波士頓，1966年），第338–344頁[Christopher Hibbert，Garibaldi and His Enemies：The Clash of Arms and Personalities in the Making of Italy（Boston，1966），pp.338–44]。

[82．](#_82)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3月14日，RA[Bleichröder to Baron James，14March1864，RA]。

[83．](#_83)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27.

[84．](#_84) 同上。

[85．](#_85)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4年5月5日，RA。

[86．](#_8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4年5月6日，FA。

[87．](#_87) 普魯士內閣會議紀要原件，1864年6月14日，DZA：Merseburg，編號90a。

[88．](#_88)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29.

[89．](#_89) 同上，pp.29–30。

[90．](#_90) 同上，p.31。

[91．](#_91) 肖泰克致萊西貝格，1864年6月14日，HHSA：PA III：普魯士。

[92．](#_92) 沃爾夫岡·措恩，《德意志帝國奠基時的經濟與社會史背景（1850–1879）》，收錄于維勒編輯，《近代德國社會史》（科隆和柏林，1966年），第254–270頁[Wolfgang Zorn，“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Zusammenhänge der deutschen Reichsgründungszeit（1850–1879），”in H.-U.Wehler，ed.，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Cologne and Berlin，1966），pp.254–70]。

[93．](#_93) 普魯士內閣會議紀要原件，1864年7月6日，DZA：Merseburg，編號90a。

[94．](#_94) 同上，1864年7月12日。

第三章　寶座和絞刑架間

[1．](#_1_3) Pflanze，Bismarck，p.237.

[2．](#_2_3) 萊昂內爾·特里林編，《約翰·濟慈書信選》（紐約，1951年），第92頁[Lionel Trilling，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New York，1951），p.92]。

[3．](#_3_3) 該表述來自魯道夫·施塔德爾曼，《1865年與俾斯麥的德意志政策問題》（慕尼黑，1933年），第41頁[Rudolf Stadelmann，Das Jahr1865und das Problem von Bismarcks Deutscher Politik（Munich，1933），p.41]。

[4．](#_4_3) 他指的可能是阿尼姆—波伊岑堡（Arnim-Boitzenburg）的請愿書，要求吞并兩個公國，或者建立普魯士的保護國。請愿書得到“兩萬個簽名，主要來自保守派和自由派右翼”[Pflanze，Bismarck，p.266]。

[5．](#_5_3)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5月13日，RA。

[6．](#_6_3) 同時，1864年9月7日，RA。

[7．](#_7_3) GW，IV，545.

[8．](#_8_3) 同上，p.484。

[9．](#_9_3) 同上，p.554。

[10．](#_10_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4年8月3日，DZA：Merseburg：科伊德爾遺稿。

[11．](#_11_2) Roon，Denkwürdigkeiten，II，258.

[12．](#_12_2)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12月9日，RA。

[13．](#_13_2) Roon，Denkwürdigkeiten，II，268.

[14．](#_14_2)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10月26日，RA。

[15．](#_15_2) Pflanze，Bismarck，p.271.

[16．](#_16_2) Roon，Denkwürdigkeiten，II，326–27，387–88.

[17．](#_17_2) GW，X，252.

[18．](#_18_2)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5，pp.156–66；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31.

[19．](#_19_2) GW，X，252.

[20．](#_20_2)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65年6月，未署日期；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6月，未署日期，BA。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5年6月5日和9日，RA。

[21．](#_21_2) DPO，IV，371–82.

[22．](#_22_2) 同上，p.387。

[23．](#_23_2) GW，V，95.

[24．](#_24_2) APP，V，700.

[25．](#_25_2) 同上，p.701。

[26．](#_26_2) 赫爾曼·馮·戈德施密特，《舊日回憶》（維也納，1917年），第7–13頁[Einige Erinnerungen aus längst vergangenen Tagen（Vienna，1917），pp.7–13]。

[27．](#_27_2) 切斯特·克拉克，《弗朗茨·約瑟夫與俾斯麥：1866年戰爭前的奧地利外交》（馬薩諸塞州，劍橋，1934年），第212頁[Chester W.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The Diplomacy of Austria before the War of1866（Cambridge，Mass.，1934），p.212]。

[28．](#_28_2)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3月1日，BA。

[29．](#_29_2) 同上，1865年3月7日，BA。普魯士外交部文件中發現這封信的復本，但沒有寫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重新刊印在APP，V，753–754，日期被錯標為1865年3月14日。顯然布萊希羅德把戈德施密特來信的復本送交俾斯麥，后者批注“存檔”并將其轉交給蒂勒（Thile）。

[30．](#_30_2)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3月9日，BA。

[31．](#_31_2) 同上，1865年3月11日，BA。

[32．](#_32_2)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3月14、16日，BA。

[33．](#_33_2) APP，V，752–754.

[34．](#_34_2)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3月11日，BA。

[35．](#_35_2) DPO，IV，606.

[36．](#_36_2)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5年3月19日，RA。

[37．](#_37_2) DPO，IV，638.

[38．](#_38_2) 同上，p.733。

[39．](#_39_2) 御前會議紀要，樞密院，1865年6月19日，DZA：Merseburg，編號90a。

[40．](#_40_2) Münch，Hansemann，pp.81–82.

[41．](#_41_2)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5年6月5日，BA。

[42．](#_42_2) 科伊德爾，《俾斯麥親王夫婦》，第211頁[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211]。

[43．](#_43_2) GW，XIV2，697.

[44．](#_44_1) 阿道夫·比爾，《19世紀的奧地利貿易》（維也納，1891年），第332–333頁[Dieösterreichische Handelspolitik im19.Jahrhundert（Vienna，1891），pp.332–33]；另見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p.278。

[45．](#_45_1) 約翰·洛爾的觀點依據未發表的俾斯麥寫給弗里茨·奧伊倫堡的書信。見《戰爭威脅與加斯泰因條約。1865年夏天的俾斯麥，奧伊倫堡和普奧戰爭的延期》，收錄于《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政治中的德國》，伊曼紐爾·蓋斯和伯恩德·尤爾根·文特編（杜塞爾多夫，1973年），第89–103頁[“Kriegsgefahr und Gasteiner Konvention.Bismarck，Eulenburg und die Vertagung des preussisch-österreichischen Krieges im Sommer1865，”in Deutschland in der Weltpolitik des19.und20.Jahrhunderts，ed，by Imanuel Geiss and Bernd Jürgen Wendt（Düsseldorff，1973），pp.89–103]。

[46．](#_46_1) GW，XIV2，699.

[47．](#_47_1) Röhl，“Kriegsgefahr，”p.97.

[48．](#_48_1) 同上，p.98。

[49．](#_49_1) 亞歷山大·貝爾根格魯恩，《奧古斯特·馮·德·海特男爵部長》（萊比錫，1908年），第40–53頁[Alexander Bergengruen，Staatsminister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Heydt（Leipzig，1908），pp.40–53]；另見1865年12月18日關于布萊希羅德代表科隆—明登鐵路活動的警方報告，BLHA：王國警察總局，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編號30。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 ... Struggles，pp.24–27.

[50．](#_50_1) 公共工程部的文件中有此前從未被注意的布萊希羅德備忘錄原件（1862年12月20日）和其他科隆—明登鐵路的相關文件，DZA：Merseburg：編號93C。

[51．](#_51_1)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5，p.174；也有人認為，協議簽署日期為8月10日，因此忽視它對俾斯麥政策的全部影響。

[52．](#_52_1)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p.40–41.

[53．](#_53_1) GW，V，240.

[54．](#_54_1) Roon，Denkwürdigkeiten，II，354–55.

[55．](#_55_1) 肖泰克致門斯多夫，1865年8月12日，HHSA：PA III：普魯士。

[56．](#_56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5年7月19日，DZA：Merseburg：Zitelmann檔案。

[57．](#_57_1) APP，VI，318.

[58．](#_58_1) Röhl，“Kriegsgefahr，”p.102.

[59．](#_59_1)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馮·波伊斯特伯爵，《1809–1885：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回憶與記錄》（斯圖加特，1887年），第一卷，第279頁[Friedrich Ferdinand Graf von Beust，Aus drei Viertel-Jahrhunderten：Erinnerungen und Aufzeichnungen，1809–1885（Stuttgart，1887），I，279]。

[60．](#_60_1) GW，V，271.

[61．](#_61_1) 肖泰克致門斯多夫伯爵，1865年9月15日，HHSA：PA III：普魯士。

[62．](#_62_1)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9月25日，BA。

[63．](#_63_1) Böhme強調這點，但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Deutschlands Weg，第2章和第3章各處。

[64．](#_64_1) DPO，V1，4.

[65．](#_65_1) Stadelmann，Das Jahr1865，p.54.

[66．](#_66_1) 施瓦巴赫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5年9月11日，RA）。

[67．](#_67_1) GW，V，299.

[68．](#_68_1) 同上，pp.309，316。

[69．](#_69_1) 貝特朗·吉爾，《羅斯柴爾德家族史》，兩卷本（巴黎，1965–1967年），第二卷，《1848–1870年》，第449頁[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2vols.（Paris，1965–1967），II，1848–1870，p.449]；另見Kohl，Bismarck-Regesten，I，265。

[70．](#_70_1) APP，VI，420.

[71．](#_71_1) Stadelmann，Das Jahr1865，pp.16–17.

[72．](#_72_1) 關于奧地利貸款，見勞倫斯·斯蒂費爾，《羅斯柴爾德家族與1865年的奧地利貸款》，刊于《近代史期刊》，1936年第8期，第27–39頁[Lawrence D.Steefel，“The Rothschilds and the Austrian Loan of1865，”JMH，8（1936），27–39]；關于法國人對這筆貸款的政策，見安妮·波丁格的出色研究，《拿破侖三世與德意志危機，1865–1866》（馬薩諸塞州，劍橋，1966年），第42–47頁[E.Ann Pottinger，Napoleon III and the German Crisis，1865–1866（Cambridge，Mass.，1966），pp.42–47]。

[73．](#_73_1) 戈德施密特的書信不在BA中，而是見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p.312。

[74．](#_74_1) DPO，V1，52.

[75．](#_75_1) Eyck，Bismarck，II，105.

[76．](#_76_1) Roon，Denkwürdigkeiten，II，380，319.

[77．](#_77_1) 肖泰克致門斯多夫，1865年10月7日、11月20日，HHSA：PA III：普魯士。

[78．](#_78_1) GW，X，256.

[79．](#_79_1) SBHA，19Jan.1866，I，pp.15–31.

[80．](#_80_1) Eyck，Bismarck，II，118.

[81．](#_81_1) Roon，Denkwürdigkeiten，II，420.

[82．](#_82_1) 尤里烏斯·海德霍夫編，《俾斯麥時代的德國自由主義：政治書信集》，第四版（奧斯納布呂克，1967年），第一卷，第273頁[Julius Heyderhoff，ed.，Deutscher Liberalismus im Zeitalter Bismarcks.Eine politische BriefSammlung（2nd ed.，Osnabrück，1967），I，273]。

[83．](#_83_1)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2月3日，RA。

[84．](#_84_1) GW，X，209.

[85．](#_85_1) 同上，p.264。

[86．](#_86_1) APP，VI，615，617.

[87．](#_87_1) Heyderhoff，Deutscher Liberalismus，I，286.

[88．](#_88_1) Roon，Denkwürdigkeiten，II，400–401.

[89．](#_89_1)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45.

[90．](#_90_1)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2月11、18日，BA。

[91．](#_91_1) 海因里希·弗里德容，《德意志霸權爭奪戰，1859–1866》（斯圖加特，1897–1898年），第一卷，第165頁[Heinrich Friedjung，Der Kampf um die Vor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1859–1866（Stuttgart，1897–1898），I，165]。顯然，霍亨塔爾收到如果開戰普魯士人將入侵的警告。他的消息來源可能并非布萊希羅德，而是某位普魯士高級軍官—也可能兩人都向他提供信息。DPO，V1，267，273–74.

[92．](#_92_1) DPO，V1，253，400–401.

[93．](#_93_1)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3月17日，BA。

[94．](#_94_1) 同上，1866年3月20、26和31日，5月1日，BA。

[95．](#_95) 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pp.375–79.

[96．](#_96) 引自理查德·米爾曼，《英國外交政策和法普戰爭的來臨》（牛津，1965年），第13頁[Richard Millman，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Oxford，1965），p.13]。

[97．](#_97) 弗里茨·洛文塔爾，《普魯士憲法沖突，1862–1866》（慕尼黑，1914年），第276頁[Fritz Löwenthal，Der preussische Verfassungsstreit，1862–1866（Munich，1914），p.276]。

[98．](#_98) 引自瓦爾特·萊希爾，《國家與教會之間：普魯士文化部長海因里希·馮·穆勒的人生與工作》（柏林，1938年），第174頁[Walter Reichle，Zwischen Staat und Kirche：Das Leben und Wirken des preussischen Kultusministers Heinrich v.Mühler（Berlin，1938），p.174]。

[99．](#_99) 雅姆斯男爵致布萊希羅德，1862年5月25日，RA。

[100．](#_100) 關于羅斯柴爾德的哀怨，見Corti，Haus Rothschild，pp.422–428和Pottinger，Napoleon III，p.123；關于法國人對奧地利勝利的預期，見Pottinger，pp.82–105；關于德國人的類似情感，見Böhme，Deutschlands Weg，pp.197–207。

[101．](#_101) 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2月16日，RA。

[102．](#_102) 參見Hellwig，Der Kampf，pp.161–162。

[103．](#_103) DPO，V1，215–16.

[104．](#_10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6年3月9日，FA。

[105．](#_105) 波德爾施溫格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3月12日，BA。

[106．](#_106)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3月17日，RA。

[107．](#_107)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67；and Hellwig，Der Kampf，p.170.

[108．](#_108) Reichle，Mühler，p.172.

[109．](#_109) APP，VI，728.

[110．](#_110) GW，V，415.

[111．](#_111) APP，VI，731–32.

[112．](#_112) GW，V，451.

[113．](#_113) APP，VI，645.

[114．](#_114) Reichle，Mühler，p.173.

[115．](#_115) 貝埃納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4月7日，BA。

[116．](#_116) 布萊希羅德致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男爵，1866年4月11、13日，RA，New Court檔案館。蘭德斯教授見到這些書信，并友好地把他做的摘要交給我。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只允許展示很少的幾封信和其他少量轉錄件。

[117．](#_117) 尤爾根·舒夏特，《1866年以來的德國經濟危機》，刊于《經濟史年鑒》（東柏林，1962年），第二卷，第91–141頁[Jürgen Schuchardt，“Die Wirtschaftskrise vom Jahre1866in Deutschland，”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II（East Berlin，1962），91–141]。

[118．](#_118) Reichle，Mühler，p.173.

[119．](#_119) OD，VIII，78.

[120．](#_120) 雅姆斯男爵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4月3、15日，BA；布萊希羅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4月18日，RA。

[121．](#_121) Hellwig，Der Kampf，pp.225，169.

[122．](#_122) GW，V，474–75.

[123．](#_123) 很少有歷史學家注意過這次內閣會議。普魯士內閣，內閣會議紀要，1866年5月2日，DZA：Merseburg，編號90a。

[124．](#_124) 有趣的是，1866年8月28日，內閣要求重新討論這個問題，但1867年1月16日，內閣又對國王提出，鑒于形勢已經改變，應該取消出售煤礦的計劃。內閣會議紀要，1866年8月28日，DZA：Merseburg，編號90a。那些年里與薩爾煤礦有關的檔案材料（歸入礦業類，編號89和90）大多在二戰中或二戰后佚失。

[125．](#_125) Hellwig，Der Kampf，pp.174–175.

[126．](#_126)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5月18日，BA。

[127．](#_127) 摘自樞密院和內閣會議紀要，1866年5月3日，GFO：I.A.A.a27，第1卷。

[128．](#_128) 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生平回憶，1817–1867》，兩卷本（萊比錫，1905年），第2卷，第370頁[Rudolf von Delbrück，Lebenserinnerungen1817–1867，2vols.（Leipzig，1905），II，370]。

[129．](#_129)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69.另見阿爾弗雷德·施特恩，《1848年到1871年的歐洲史》（斯圖加特和柏林，1923年），第3卷，第468頁[Alfred Stern，Geschichte Europas von1848bis1871（Stuttgart and Berlin，1923），III，468]。

[130．](#_130)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5月2日，RA。

[131．](#_131) 格奧爾格·布斯，《1865–1913年的柏林證券市場》（柏林，1913年），第116頁[Georg Buss，Die Berliner Börse von1865–1913（Berlin，1913），p.116]。

[132．](#_132) Delbrück，Lebenserinnerungen，II，371–72.

[133．](#_133) Löwenthal，Preussischer Verfassungsstreit，p.275；另參見海因里希·馮·波辛格編，《俾斯麥親王經濟政策文件匯編》，兩卷本（柏林，1890–1891年），第2卷，第84–85頁[Heinrich von Poschinger，ed.，Aktenstücke zur Wirthschaftspolitik des Fürsten Bismarck，2vols.（Berlin，1890–1891），II，84–85]。

[134．](#_134) 布萊希羅德致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男爵，5月4、7日，RA，New Court檔案館。

[135．](#_135)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5月5、11日，BA。

[136．](#_136) 貝納利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5月11、22日，BA。

[137．](#_137) 普魯士外交部檔案中有一張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的便條，日期為1866年5月9日，內容是轉交來自維也納的一封重要書信。書信已經丟失，或者被歸檔到其他地方，它很可能來自貝納利或戈德施密特。DZA：Merseburg：I.A.A.l.41.sec.

[138．](#_138) 戈登·克雷格，《克尼格雷茨戰役：1866年普魯士對奧地利的勝利》（費城和紐約，1964年），第6頁[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Prussia’s Victory over Austria，1866（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1964），p.6]。這是關于那場戰役及其意義的出色研究。

[139．](#_139)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45.

[140．](#_140) Münch，Hansemann，p.116.

[141．](#_141) Bergengruen，Heydt，p.327；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69.

[142．](#_142)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49.

[143．](#_143) 同上，p.53。

[144．](#_144) 戈爾茨致俾斯麥，1866年5月21日，DZA：Merseburg：I.A.A.l.41.sec。

[145．](#_145)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66年5月26日，RA。

第四章　銀行家與俾斯麥的勝利

[1．](#_1_4) Zechlin，Bismarck，p.341.

[2．](#_2_4) 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p.263–64.

[3．](#_3_4) Heyderhoff，Deutscher Liberalismus，p.312；Eyck，Bismarck，II，203–204；卡爾·特維斯騰，《我們還能拯救什么：一些直言》（柏林，1861年），第24、52頁[Karl Twesten，Was uns noch retten kann.Ein Wort ohne Umschweife（Berlin.1861），pp.24，52]。

[4．](#_4_4) GW，VII，131.

[5．](#_5_4) GW，XIV2，623.

[6．](#_6_4) GW，VII，132.

[7．](#_7_4) Bergengruen，Heydt，pp.322–24.

[8．](#_8_4) 參見海特的備忘錄，1865年1月1日，1866年2月15日，BA。

[9．](#_9_4) GW，IV，373；V，349–350；奧托·貝克著，亞歷山大·沙夫編，《俾斯麥的德意志形態斗爭》（海德堡，1958年），第114–117頁[Otto Becker，Bismarcks Ringen um Deutschlands Gestaltung，ed.by Alexander Scharff（Heidelberg，1958），114–117]。

[10．](#_10_3) 舒夏特，《經濟危機》，刊于《經濟史年鑒》，1962年第2期，第113頁[Schuchardt，“Die Wirtschaftskrise，”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2（1962），113]。

[11．](#_11_3) 海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5月16、18日，BA。

[12．](#_12_3) 摘自樞密院和內閣會議紀要，1866年6月4日，GFO：I.A.A.a27，第1卷。

[13．](#_13_3) Münch，Hansemann，p.27.

[14．](#_14_3) 同上，p.117。

[15．](#_15_3) 俾斯麥親手修改過的備忘錄，1889年6月，DZA：Potsdam：帝國首相辦公廳工商業檔案，No.18，Vol.6。

[16．](#_16_3) Pflanze，Bismarck，p.321.

[17．](#_17_3) 格洛·曼，《德意志第二帝國：從未存在的帝國》，收錄于孚希特萬格編，《突變與傳承：德國歷史的一個世紀》（匹茲堡，1974年），第31頁[Golo Mann，“The Second German Empire：The Reich That Never Was，”in E.J.Feuchtwanger，ed.，Upheaval and Continuity：A Century of German History（Pittsburgh，1974），p.31]。

[18．](#_18_3) 引自古斯塔夫·阿道夫·賴因，《俾斯麥政策中的革命》（哥廷根，1957年），第144頁[Gustav Adolf Rein，Die Revolution in der Politik Bismarcks（Göttingen，1957），p.144]。

[19．](#_19_3) 鮑迪辛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5月22日，BA。

[20．](#_20_3)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6月14、21日，BA。

[21．](#_21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6年6月19、20日，FA；海因里希·馮·波辛格編，《漢斯·維克多·馮·翁魯生平回憶錄》（斯圖加特，1895年），第241–243頁[Heinrich von Poschinger，ed.，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von Hans Viktor von Unruh（Stuttgart，1895），pp.241–43]。

[22．](#_22_3) 關于1866年俾斯麥與翁魯的談話，見Poschinger，Unruh，pp.243–250；關于1859年的談話，見GW，VII，37–40；關于他與王儲的談話，見GW，VII，137。

[23．](#_23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6月21日，RA。

[24．](#_24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6月19日，RA。

[25．](#_25_3) Heyderhoff，Deutscher Liberalismus，p.307.

[26．](#_26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6月25日，RA。

[27．](#_27_3) 布萊希羅德的便條，1866年6月29日，SA。關于舍恩豪森檔案（SA），見第十二章，注釋14。

[28．](#_28_3) Craig，Battle of Königgrätz，p.26.

[29．](#_29_3) 同上，pp.163–164。

[30．](#_30_3) 似曾相識的感嘆，引自亞當·萬德魯茨卡出色的《1866：命運之年》（格拉茨，1966年），第13頁[Adam Wandruszka，Schicksalsjahr1866（Graz，1966），p.13]。

[31．](#_31_3) 見卡爾·海因里希·霍費勒，《克尼格雷茨與1866年后的德國人》，刊于《作為科學和教學的歷史》，1966年第17期，第393–416頁[Karl Heinrich Höfele，“Königgrätz und die Deutschen von1866，”GWU，17（1966），393–416]。

[32．](#_32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6年7月4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33．](#_33_3) GW，VI，120.

[34．](#_34_3) Rein，Die Revolution，p.148；愛德華·馮·維特海默，《政治斗爭中的俾斯麥》（柏林，1930年），第236–237頁[Eduard von Wertheimer，Bismarck im politischen Kampf（Berlin，1930），pp.236–37]。

[35．](#_35_3) GW，V，537–38.

[36．](#_36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7月3日，RA。

[37．](#_37_3) Holborn，Modern Germany，p.135；尼古拉斯·基斯（Nicolas Kiss）致俾斯麥的書信草稿，1866年5月21日，科蘇特檔案，布達佩斯，國家檔案1，4405。

[38．](#_38_3) 俾斯麥的草稿，1866年7月5日，DAZ：梅澤堡，I.A.A.l.41.sec.，另見GW，VI，37。

[39．](#_39_3) Wandruszka，Schicksalsjahr，p.177.

[40．](#_40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6年7月8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41．](#_41_3) GW，VI，20.

[42．](#_42_3) 霍斯特·科爾編，《俾斯麥年譜：1894–1899年》，6卷本（萊比錫，1894–1899年），第六卷，第186頁[Horst Kohl，ed.，Bismarck-Jahrbuch1894–1899，6vols.（Leipzig，1894–1899），IV，186]。

[43．](#_43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6年7月18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44．](#_44_2) 理查德·施維默，《法蘭克福自由市史》，第III2卷：1814–1866年（法蘭克福，1918年），第349頁和第8、9章各處[Richard Schwemer，Geschichte der freien Stadt Frankfurt a.M.，Vol.III2：1814–1866（Frankfurt a.M.，1918），p.349and chs.8，9，passim]。

[45．](#_45_2) 同上，p.344。

[46．](#_46_2)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66年7月23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47．](#_47_2) GW，VI，63，90；Eyck，Bismarck，II，268–72.

[48．](#_48_2)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7月25日，BA。

[49．](#_49_2) Schwemer，Frankfurt，p.383.

[50．](#_50_2)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7月8日，RA。

[51．](#_51_2) 關于談判的后續情況，見Schwemer，Frankfurt，第9章。

[52．](#_52_2)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7月18日，BA。

[53．](#_53_2)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7月19日，BA。

[54．](#_54_2)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66年7月23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55．](#_55_2) 同上。

[56．](#_56_2) 參見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66年7月29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Kohl，Bismarck-Regesten，I，291。

[57．](#_57_2) 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367.

[58．](#_58_2)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66年7月8日，DAZ：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59．](#_59_2)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75；另見格哈德·里特，《1866年賠償草案的提出》，刊于《歷史期刊》，1915年總第114期，第18–64頁[Gerhard Ritter，“Die Entstehung der Indemnitätsvorlage von1866，”HZ，114（1915），18–64]。

[60．](#_60_2)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8月8日，RA。

[61．](#_61_2) 基辛格，《白色革命家》，刊于《代達羅斯》，1968年總第97期，第888–924頁[Kissinger，“The White Revolutionary，”Daedalus，97（1968），888–924]。

[62．](#_62_2) 見《非政治德國人的政治后果》（“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political German”），來自拙作《狹隘主義的失敗：論近代德國的政治文化》（紐約，1972年），特別是第11–15頁[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New York，1972），esp.pp.11–15]。

[63．](#_63_2) 引自Becker，Bismarcks Ringen，p.258。

[64．](#_64_2) GW，VII，140.

[65．](#_65_2)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8月1日，BA。

第五章　俾斯麥的錢袋和布萊希羅德的地位

[1．](#_1_5) 莫里茨·布施，《日記選》，3卷本（萊比錫，1899年），第二卷，第65頁[Moritz Busch，Tagebuchblätter（3vols.，Leipzig，1899），II，65]。

[2．](#_2_5) 見夏洛蒂·贊佩爾，《俾斯麥的無名書信》，刊于《歷史期刊》，1968年總第207期，第609–616頁[Charlotte Sempell，“Unbekannte Briefstellen Bismarcks，”HZ，207（1968），609–616]。

[3．](#_3_5) 米夏埃爾·魏爾納編，《與海涅相會：同時代人的報告》（漢堡，1973年），第二卷，第241頁[Michael Werner，ed.，Begegnungen mit Heine：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Hamburg，1973），II，241]。

[4．](#_4_5) 引自阿爾弗雷德·瓦格茨，《俾斯麥的財富》，刊于《中歐史》，1968年第1期，第203–233頁[Alfred Vagts，“Bismarck’s Fortune，”CEH，1（1968），203–33]。瓦格茨的文章是對俾斯麥金融交易最早的認真總結之一。總結顯然不完整，而且非常依賴烏爾里希·庫恩策爾（Ulrich Küntzel）很不準確的《偉人的金融》（維也納和杜塞爾多夫，1964年），第447–511頁[Ulrich Küntzel，Die Finanzen grosser Männer（Vienna and Düsseldorf，1964），pp.447–511]。

[5．](#_5_5) Sempell，“Briefstellen Bismarcks，”pp.609–13.

[6．](#_6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59年5月3日，SA，以及隨后的賬戶賬單。

[7．](#_7_5) Küntzel，Die Finanzen，p.477.

[8．](#_8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59年4月4日，1861年1月11日，SA。

[9．](#_9_5) 同上，1861年4月11日。

[10．](#_10_4)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61年11月8、12日，BA。

[11．](#_11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2年1月22日，SA。

[12．](#_12_4) Küntzel，Die Finanzen，p.478

[13．](#_13_4) 布萊希羅德的賬單，1863年12月31日，SA。

[14．](#_14_4) SA：布萊希羅德文件。

[15．](#_15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3年5月6日，SA。

[16．](#_16_4) 同上，1864年4月5日；1864年4–9月賬單。

[17．](#_17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4年9月12日；1865年5月31日賬單，BA。

[18．](#_18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3年11月23日，FA；布萊希羅德致齊特爾曼，1863年12月4、5、8日，DAZ：梅澤堡，齊特爾曼檔案。布萊希羅德寫給齊特爾曼的其他書信似乎已佚，檔案中的留存少得可憐。

[19．](#_19_4) 年度賬單，1866年12月31日。

[20．](#_20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7年7月4日，SA。

[21．](#_21_4) 同上，1867年7月12日。

[22．](#_22_4) Kohl，Bismarck-Regesten，I，311–12.

[23．](#_23_4) GW，XIV2，725.

[24．](#_24_4) 同上，p.729。

[25．](#_25_4) 恩斯特·威斯特法爾，《地主俾斯麥：伐爾岑護林人的回憶》（萊比錫，1922年），第12頁[Ernst Westphal，Bismarck als Gutsherr：Erinnerungen seines Varziner Oberförsters（Leipzig，1922），p.12]；阿諾德·奧斯卡·邁耶爾，《俾斯麥：人和政客》（斯圖加特，1949年），第382–389頁[Arnold Oskar Meyer，Bismarck.Der Mensch und der Staatsmann（Stuttgart，1949），pp.382–89]。

[26．](#_26_4) A.O.Meyer，Bismarck，p.382.

[27．](#_27_4) 引號中的文字原文為英語，GW，XIV2，761、753。

[28．](#_28_4) 同上，pp.727、739。

[29．](#_29_4) 伯恩哈德·馮·普特卡默致俾斯麥，1867年9月28日，BA。

[30．](#_30_4) GW，XIV2，725.

[31．](#_31_4) Westphal，Bismarck，p.20.

[32．](#_32_4) 同上，pp.48–49。

[33．](#_33_4) Busch，Tagebuchblätter，I，468.

[34．](#_34_4) 《約翰娜·馮·俾斯麥：書信中的人生，1844–1894》（斯圖加特，1915年），第215頁[Johanna von Bismarck.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1844–1894）（Stuttgart，1915），p.215]。

[35．](#_35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8年9月2日，SA。

[36．](#_36_4) 同上，1867年11月6日。

[37．](#_37_4) 同上，1868年9月6日。

[38．](#_38_4) 同上，1868年9月15日；另見GW，XIV2，762。

[39．](#_39_4) 見Münch，Hansemann，pp.298–333；齊格弗里德·馮·卡爾多夫，《威廉·馮·卡爾多夫：俾斯麥和威廉二世時期的國民議員，1828–1907》（柏林，1936年），第89–95頁[Siegfried von Kardorff，Wilhelm von Kardorff：Ein Nationaler Parlamentarier im Zeitalter Bismarcks und Wilhelms II，1828–1907（Berlin，1936），pp.89–95]。

[40．](#_40_4) 1868年7月–12月賬單，SA。

[41．](#_41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7月1日、12月31日，SA。

[42．](#_42_4)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8年1月25日，RA。

[43．](#_43_4) 明希致博伊斯特，1869年9月25日，HHSA：PA III：普魯士。

[44．](#_44_3) Busch，Tagebuchblätter，I，467.

[45．](#_45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11月25日，SA。

[46．](#_46_3) 胡戈·萊申費爾德—科菲林伯爵，《回憶與銘記》（柏林，1935年），第254頁[Graf Hugo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 und Denkwürdigkeiten（Berlin，1935），P.254]。

[47．](#_47_3) 普特卡默致俾斯麥，1867年11月28日，1868年1月15日，BA。

[48．](#_48_3) 普特卡默致俾斯麥，1868年11月25日，BA。

[49．](#_49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7年7月12日，1868年9月6日，SA。

[50．](#_50_3) 施特魯克（Struck）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4月29日，BA。

[51．](#_51_3) Becker，Bismarcks Ringen，p.185.

[52．](#_52_3) 關于該項目的后續情況，見Münch，Hansemann，pp.138–148。

[53．](#_53_3) 尤里烏斯致蓋爾森·布萊希羅德，1864年3月29日，1868年4月，1869年6月1日，1870年7月2日，BA。

[54．](#_54_3) 警方報告，1861年10月4日，BLHA：王國警察總局，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編號30。

[55．](#_55_3) 雅姆斯男爵致布萊希羅德，1864年5月8日，BA。

[56．](#_56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7年10月14日，RA。

[57．](#_57_3)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8月27日，BA。

[58．](#_58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11月10日，12月18日，RA。

[59．](#_59_3)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68年6月6日，RA。

[60．](#_60_3) 理查德·馮·弗里森男爵，《生平回憶》（德累斯頓，1880年），第二卷，第305–306頁[Richard Freiherr von Friesen，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Dresden，1880），II，305–6]。

[61．](#_61_3)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66年11月10日，RA。

[62．](#_62_3) 加斯克爾（Kaskel）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7月18日，BA。

[63．](#_63_3) Friesen，Erinnerungen，p.340.

[64．](#_64_3)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10月18、22日，11月8、16日，12月1、17日，RA。

[65．](#_65_3)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家族，1866年11月8日，RA。

[66．](#_66_2) 薩克森駐柏林大使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2月15日，BA。

[67．](#_67_2) Friesen，Erinnerungen.pp.351–52.

[68．](#_68_2) 漢斯·菲利皮，《韋爾夫基金的歷史》，刊于《下薩克森州地方史年鑒》，1959年總第31期（新序號），第190–199頁[Hans Philippi，“Zur Geschichte des Weifenfonds，”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n.s.，31（1959），190–99]；埃伯哈德·納烏約克斯，《俾斯麥與官方媒體的組建》，刊于《歷史期刊》，1967年總第205期，第69頁[Eberhard Naujoks，“Bismarck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Regierungpresse，”HZ，205（1967），69]。

[69．](#_69_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10月1日，SA。

[70．](#_70_2) GW，XIV2，762.

[71．](#_71_2) Bergengruen，Heydt，pp.367–369；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10月15日，SA.

[72．](#_72_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11月6、21日，SA。

[73．](#_73_2) 弗里德里希·琮克爾，《1834–1879年的萊茵—威斯特法倫企業家：19世紀德國市民階層史論文集》（科隆和奧普拉登，1962年），第118–122頁[Friedrich Zunkel，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 Unternehmer1834–1879：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im19.Jahrhundert（Cologne and Opladen，1962），pp.118–22]。

[74．](#_74_2) 給俾斯麥的報告，1865年12月18日，BLHA：王國警察總局，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編號30。另見布萊希羅德致伊岑普利茨，1865年12月26日，科布倫茨聯邦司法部檔案。該材料來自紐約萊奧·拜克學會的弗雷德·格魯貝爾博士（Dr.Fred Grubel）。

[75．](#_75_2) 致警察總監的信，1867年3月1、7日，BLHA：王國警察總局，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編號30。

[76．](#_76_2) F.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5月7日，BA。

[77．](#_77_2) Zunkel，Rheinisch-Westfälische Unternehmer，p.314.

[78．](#_78_2) 書信，1868年8月27日，10月15、16日，11月10日，BLHA：王國警察總局，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編號30。

[79．](#_79_2) 布萊希羅德的備忘錄，1870年10月10日，1871年3月31日，BA。

[80．](#_80_2) 羅斯柴爾德致俾斯麥，1863年11月12日（斜體為原文所標），SA；羅斯柴爾德致俾斯麥，1863年12月30日，SA。

[81．](#_81_2) 奧古斯特·奧伊倫堡致菲利普·奧伊倫堡，1890年5月31日，科布倫茨聯邦檔案：奧伊倫堡檔案。該材料來自約翰·洛爾（John Röhl）。

[82．](#_82_2) 不幸的是，只有寥寥幾封信留存下來，盡管它們包含不尋常的信息量。關于俾斯麥和內塞爾羅德，參見尤里烏斯·海德霍夫編，《在俾斯麥的敵人圈子里》（萊比錫，1943年），第134、191頁[Julius Heyderhoff，ed.，Im Ring der Gegner Bismarcks（Leipzig，1943），pp.134，191]。

[83．](#_83_2) 內塞爾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7月17日，1867年5月21日、7月3日和6日，BA。

[84．](#_84_2) 海因里希·奧托·麥斯納編，《陸軍元帥阿爾弗雷德·瓦德西伯爵回憶錄》，3卷本（斯圖加特和柏林，1922–1923年），第一卷，第10頁[Heinrich Otto Meisner，ed.，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3vols.；Stuttgart and Berlin，1922–1923），I，10]。

[85．](#_85_2) 勃蘭特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3月28日，BA。

[86．](#_86_2) 拉斯克致布萊希羅德，1869年12月19日，1870年3月11日，BA。

[87．](#_87_2) 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5月4日，1869年3月28日，1870年1月26日，BA。

[88．](#_88_2) 同上，1870年4月2日。

[89．](#_89_2) 魯道夫·費爾豪斯編，《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日記：對霍亨索倫王朝宮廷圈子的記錄》，（哥廷根，1960年），第15頁[Rudolf Vierhaus，ed.，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Aufzeichnungen aus der Hofgesellschaft des Hohenzollernreiches（Göttingen，1960），p.15]。

[90．](#_90_2) APP，X，223–24.

[91．](#_91_2) 《皇室文件與通信》（巴黎，1870年），第一卷，第230–234頁[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Paris，1870），I，230–34]。關于斯托費爾，見Vierhaus，Spitzemberg，p.122。

[92．](#_92_2) 關于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社交界取得的非凡成功的簡要描繪，參見Gille，Maison Rothschild，I：Des Originesà1848，pp.467–488。

[93．](#_93_2)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8年1月3日（兩封），1868年1月11日，BA。

[94．](#_94_2) F.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1869年4月25日，BA。

[95．](#_95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6年12月28日，BA。

[96．](#_96_1) 收據，1868年10月4日，BA。

[97．](#_97_1) Vierhaus，Spitzemberg，p.88.

第六章　第三場戰爭

[1．](#_1_6)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67年3月22日，RA。

[2．](#_2_6) 貝納利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4月11日，BA。

[3．](#_3_6)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4月26日，BA。

[4．](#_4_6) 布蘭代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5月1日，BA。

[5．](#_5_6)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5月7日，BA。

[6．](#_6_6) 布蘭代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5月16日，BA。

[7．](#_7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7年7月25日，FA。斜體為作者所加。

[8．](#_8_6) 萊曼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8月14日，BA。

[9．](#_9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8年10月2日，SA。

[10．](#_10_5) APP，X，223–24.

[11．](#_11_5) Papiers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I，230–34.

[12．](#_12_5) Busch，Tagebuchblätter，I，303.

[13．](#_13_5) 明希致博伊斯特，1869年3月13日，HHSA：PA III：普魯士。

[14．](#_14_5) Pflanze，Bismarck，第17章，《民族運動的失敗》，“The Failure of the National Movement”。

[15．](#_15_5) 明希致博伊斯特，1869年10月9日，HHSA：PA III：普魯士。

[16．](#_16_5) 洛塔爾·加爾，《作為執政黨的自由派：復辟與帝國建立之間的巴登大公國》（威斯巴登，1968年），第467–471頁[Lothar Gall，Der Liberalismus als regierende Partei.Das Grossherzogtum Baden zwischen Restauration und Reichsgründung（Wiesbaden，1968），pp.467–71]。

[17．](#_17_5) GW，VI，166–168；關于該問題，見約瑟夫·貝克爾，《俾斯麥與1870年初接受巴登加入北德邦聯的問題：1870年2月24日拉斯克議會質詢檔案》，刊于《上萊茵史期刊》，1971年總第119期，第427–470頁[Josef Becker，“Bismarck und die Frage der Aufnahme Badens in den Norddeutschen Bund im Frühjahr1870.Dokumente zur Interpellation Laskers vom24.Februar1870，”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119（1971），427–70]。

[18．](#_18_5) 維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5月21日，HHSA：PA III：普魯士。

[19．](#_19_5) 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419.

[20．](#_20_5) GW，VI2，202–3.

[21．](#_21_5) 關于近年來對西班牙亂局所造成國際沖擊的概述，見理查德·科內茨克，《西班牙，1870年戰爭的由來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刊于《歷史期刊》，1972年總第214期，第580–613頁[Richard Konetzke，“Spanien，Die Vor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1870und die Deutsche Reichsgründung，”HZ，214（1972），580–613]。

[22．](#_22_5) 霍亨索倫家族的候選資格與普法戰爭的源頭一直以來都是爭議重重的話題，至今仍然如此。近年來最好的概述包括約瑟夫·貝克爾的《俾斯麥在1870年西班牙王位之爭中的政策問題》，刊于《歷史研究》，1971年總第212期，第529–607頁[Josef Becker，“Zum Problem der Bismarckschen Politik in der Spanischen Thronfrage1870，”HZ，212（1971），529–607]；以及威廉·哈爾佩林的《重溫普法戰爭的源頭：俾斯麥與霍亨索倫家族的西班牙王位候選資格》，刊于《近代史期刊》，1973年總第45期，第83–91頁[S.William Halperin，“The Origins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Revisited：Bismarck and the Hohenzollern Candidature for the Spanish Throne，”JMH，45（1973），83–91]。全方位描繪這場戰爭的最佳著作是邁克爾·霍華德的杰作《普法戰爭：德國人入侵法國，1870–1871》（紐約，1961年）[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New York，1961）]。

[23．](#_23_5) 維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3月19日，HHSA：PA III：普魯士。

[24．](#_24_5) 勞倫斯·斯蒂費爾，《俾斯麥，霍亨索倫家族的候選資格和1870年普法戰爭的源頭》（馬薩諸塞州，劍橋，1962年），第39頁[Lawrence D.Steefel，Bismarck，the Hohenzollern Candidacy，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anco-German War of1870（Cambridge，Mass.，1962），p.39]。

[25．](#_25_5) Pflanze，Bismarck，p.449.

[26．](#_26_5) 約瑟夫·貝克爾致作者，1969年10月17日。有人反復斷言布萊希羅德參與此事，但沒有證據，比如巴斯蒂安·肖特的《德法戰爭的源頭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收錄于赫爾穆特·波姆所編的《帝國建立時期的問題，1848–1879》（科隆和柏林，1968年），第276頁[Bastian Schot，“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 und die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in Helmut Böhme，ed.，Probleme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1848–1879（Cologne and Berlin，1968），p.276]。

[27．](#_27_5) 勃蘭特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5月22日、7月9日，BA。

[28．](#_28_5)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0年6月25、29日，RA。

[29．](#_29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0年6月26日，SA。

[30．](#_30_5)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7月1日，BA。

[31．](#_31_5)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10月1日，BA。

[32．](#_32_5)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0年7月5日，RA。

[33．](#_33_5) 約翰·莫利，《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傳》（修訂版單卷本，紐約，1921年），第二部分，第325頁[John Morley，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Revised edition in1volume；New York，1921），II，p.325]。

[34．](#_34_5) 赫爾曼·翁肯，《1863年到1870年拿破侖三世的萊茵地區政策與1870年到1871年戰爭的源頭》（斯圖加特，1926年），第三部分，第416頁[Hermann Oncken，Die Rheinpolitik Kaiser Napoleons III von1863bis1870und der Ursprung des Krieges von1870/71（Stuttgart，1926），III，416]。喬治·博南所編的《俾斯麥與霍亨索倫家族的西班牙王位候選資格：德國外交檔案文件》（倫敦，1957年，第228頁）刊印了布萊希羅德比這封信早幾個小時發出的電報，“召回”（Abberufung）一詞被誤譯為“辭職”[Georges Bonnin，ed.，Bismarck and the Hohenzollern Candidature for the Spanish Throne.The Documents in the German Diplomatic Archives（London，1957），p.228]。

[35．](#_35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0年7月8日，FA。

[36．](#_36_5)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0年7月6日，RA。

[37．](#_37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0年7月9日，GFO：西班牙32。另見Bonnin，Bismarck，pp.237–238。

[38．](#_38_5) 約翰娜·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BA。

[39．](#_39_5) GW，VI2，349.

[40．](#_40_5)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0年7月10日，RA。

[41．](#_41_5) Corti，Haus Rothschild，p.441.

[42．](#_42_5) 羅伯特·霍華德·洛德，《1870年戰爭的源頭：來自德國檔案的新文件》（馬薩諸塞州，劍橋，1924年），第163、178–180頁[Robert Howard Lord，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1870：New Documents from the German Archives（Cambridge，Mass.，1924），pp.163，178–80]。

[43．](#_43_5) 瓦德西致勃蘭特，1870年7月8日；勃蘭特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7月9日，BA。另參見Meisner，Denkwürdigkeiten...Waldersee，I，75。

[44．](#_44_4) 佩彭謝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7月12日，BA。

[45．](#_45_4) GW，VI2，353.

[46．](#_46_4) 關于俾斯麥在7月12、13日發起的外交反擊，參見威廉·朗格精彩的探索性論文，《劇作家俾斯麥》，收錄于薩基希安所編的《外交史與史學史研究—紀念古奇》（倫敦，1961年），第199–216頁[William L.Langer，Bismarck as Dramatist，”in 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Honour of G.P.Gooch，ed.by A.O.Sarkissian（London，1961），pp.199–216]。

[47．](#_47_4) Lord，Origins of the War，pp.60–61，196.

[48．](#_48_4) 赫伯特·俾斯麥戰時日記，FA，第28柜，1870年7月12日；我要感謝克勞斯—彼得·霍伊普科博士（Dr.Klaus-Peter Hoepke），他幫助編輯赫伯特·俾斯麥的通信，并向我提供這段摘要。

[49．](#_49_4) 見Langer，“Bismarck”，另見約亨·迪特里希近來的簡短概要，《1870–1871年德法戰爭的源頭和爆發》，收錄于特奧多爾·希德和恩斯特·多伊萊因所編的《帝國建立，1870–1871》（斯圖加特，1970年），第88–91頁[Jochen Dittrich，“Ursachen und Ausbruch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1870–71，”in Reichsgründung1870–71，ed.by Theodor Schieder and Ernst Deuerlein（Stuttgart，1970），pp.88–91]。

[50．](#_50_4) 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57.

[51．](#_51_4) Münch，Hansemann，pp.89–96；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p.400–403.

[52．](#_52_4) 維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8月13日，HHSA：PA III：普魯士。

[53．](#_53_4)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7月13、19日，8月20日，BA。

[54．](#_54_4) 關于民族情感的這種轉變，見卡爾·海因里希·霍費勒，《1870–1871年德國的使命信仰和時代意識》，刊于《宗教和精神史期刊》，1963年第15期，第265–276頁[Karl Heinrich Höfele，“Sendungsglaube und Epochenbewusstsein in Deutschland1870–71，”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15（1963），265–76]。

[55．](#_55_4) 《俾斯麥的筆桿子：海因里希·阿貝肯傳》（倫敦，1911年），第292頁。由他的妻子根據其書信和日志整理而成，查爾斯·愛德華·巴雷特—倫納德夫人和霍佩翻譯[Bismarck’s Pen：The Life of Heinrich Abeken，edited from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 by his wife，trans.by Mrs.Charles Edward Barrett-Lennard and M.W.Hoper（London，1911），p.292]。

[56．](#_56_4) Otto Becker，Bismarcks Ringen，p.797.

[57．](#_57_4) 瓦克（Wacker）致外交部，1870年8月5日，GFO：法國70。另參見瓦爾特·利普根斯，《俾斯麥，輿論和1870年吞并阿爾薩斯—洛林》，刊于《歷史期刊》，1964年總第199期，第64頁[Walter Lipgens，“Bismarck，die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die Annexion von Elsass und Lothringen1870，”HZ，199（1964），64]。

[58．](#_58_4) 蒂勒致科伊德爾，1870年8月4日；科伊德爾致蒂勒，1870年8月16日，GFO：法國70；君特·里希特，《弗里德里希·馮·荷爾斯泰因：俾斯麥的合作者》（呂貝克和漢堡，1966年），第33–34頁[Günter Richter，Friedrich von Holstein：Ein Mitarbeiter Bismarcks（Lübeck and Hamburg，1966），pp.33–34]。

[59．](#_59_4) 伯恩斯托夫致外交部，1870年8月4日，GFO：法國70，機密。

[60．](#_60_4) 羅伯特·亨雷編譯，《巴黎來信，1870–1875》（倫敦，1942年），第72頁[Letters from Paris，1870–1875，trans.and ed.by Robert Henrey（London，1942），p.72]。作者C.de B.是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族長的一名政治線人。

[61．](#_61_4) 佩格拉斯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7月29日，BA；魯道夫·倫茨，《1870–1871年德法戰爭的開支和籌資：以符騰堡、巴登和巴伐利亞為例》（萊茵河，波帕德，1970年），第82–84頁[Rudolf Lenz，Kosten und Finanzierung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1870–1871.Dargestellt am Beispiel Württembergs，Badens and Bayerns（Boppard am Rhein，1970），pp.82–84]。

[62．](#_62_4) 埃伯哈德·魏斯，《從戰爭爆發到帝國建立》，刊于《巴伐利亞地方史期刊》，1970年第33期，第806–808頁[Eberhard Weis，“Vom Kriegsausbruch zur Reichsgründung，”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33（1970），806–8]。

[63．](#_63_4) 參見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3月27日，引自威廉·許斯勒，《路德維希二世“勸進信”的秘密》，收錄于《歷史性的力量與決定：奧托·貝克爾賀壽集》（威斯巴登，1954年），第209頁[Wilhelm Schüssler，“Das Geheimnis des Kaiserbriefes Ludwig II，”Geschichtliche Kräfte und Entscheidungen，Festschrift für Otto Becker（Wiesbaden，1954），p.209]。關于普魯士的補助與“勸進信”聯系的更謹慎觀點，見漢斯·拉爾，《俾斯麥的帝國建立與來自巴伐利亞的金錢要求》，刊于《巴伐利亞地方史期刊》，1969年第22期，第408–409頁[Hans Rall，“Bismarcks Reichsgründung und die Geldwünsche aus Bayern，”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22（1959），408–9]。

[64．](#_64_4) 漢斯·菲利皮，書評，《下薩克森地方史年鑒》，1968年新序列第40期，第194–197頁[Hans Philippi，review，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 n.s.40（1968），194–97]。

[65．](#_65_4) Otto Becker，Bismarcks Ringen，p.798.

[66．](#_66_3) 奧古斯特·洛夫特斯，《奧古斯特·洛夫特斯勛爵外交回憶錄，1862–1879》，兩卷本（倫敦、巴黎和墨爾本，1894–1895年），第一卷，第317–318頁[Augustus Loftus，The Diplomatic Reminiscences of Lord Augustus Loftus，1862–1879，2vols.（London，Paris，and Melbourne，1894–1895），I，317–18]。

[67．](#_67_3)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70年8月3日，DZA：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68．](#_68_3) 布萊希羅德致阿爾方斯男爵，1870年9月9日，RA。

[69．](#_69_3) 布萊希羅德致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1871年5月6日，RA，倫敦。

[70．](#_70_3) 布萊希羅德致門德爾，1870年12月3日，BA。

[71．](#_71_3)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70年8月13日，DZA：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庫爾特·萊茵多夫，《英國與1870–1871年德法戰爭》（波恩和萊比錫，1923年），第44–45頁[Kurt Rheindorf，England und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Krieg1870–1871（Bonn and Leipzig，1923），pp.44–45；Loftus，Reminiscences，I，318；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0年9月5日，RA]。

[72．](#_72_3)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0年9月2、3日，RA；布萊希羅德致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1870年9月2日，RA，倫敦；Münch，Hansemann，p.90。

[73．](#_73_3) 布萊希羅德致阿爾方斯男爵，1870年8月19日，RA；布蘭代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8月26日，BA。

[74．](#_74_3) 同上，1870年9月7日，BA。

[75．](#_75_3) 所有日期為9月15日之后的布萊希羅德書信都蓋有羅斯柴爾德的戳記：“巴黎收訖，1871年2月18日”，RA。

[76．](#_76_3) 伊麗莎白王后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0月3日，BA。

[77．](#_77_3) 參見德國救濟傷病士兵協會中央委員會1870年12月28日的書信，BA。

[78．](#_78_3) 施耐德，《威廉皇帝傳，1849–1873》，兩卷合訂本（柏林，1888年），第二卷，第132–134頁[L.Schneider，Aus dem Leben Kaiser Wilhelms，1849–1873，2vols，in1（Berlin，1888），II，132–34]。

[79．](#_79_3) 威廉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1月28日，BA。

[80．](#_80_3) 施耐德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月13日，BA。

[81．](#_81_3) 約翰娜·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30日，BA。

[82．](#_82_3) 約翰娜·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1月22日，BA。

[83．](#_83_3) 施耐德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8月19日，BA。

[84．](#_84_3) 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227–28.

[85．](#_85_3) 施耐德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22日，BA。

[86．](#_86_3) Schneider，Leben Kaiser Wilhelms，II，257.

[87．](#_87_3) 引自Busch，Tagebuchblätter，I，217。

[88．](#_88_3) 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347–48.

[89．](#_89_3) GW，XIV2，793.

[90．](#_90_3) 保羅·哈茨菲爾特，《哈茨菲爾特信札：保羅·哈茨菲爾特伯爵與夫人書，1870–1871》（萊比錫，1907年），第72頁[Paul Hatzfeldt，Hatzfeldts Briefe.Briefe des Grafen Paul Hatzfeldt an seine Frau，1870–71（Leipzig，1907），p.72；Busch，Tagebuchblätter，I，214–15]。

[91．](#_91_3) 參見施耐德致布萊希羅德，BA。

[92．](#_92_3)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5日，BA。

[93．](#_93_3) 參見佩彭謝、拉齊威爾和溫特菲爾特的書信；布萊希羅德的禮單；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BA。

[94．](#_94_3) 保羅·布隆薩特·馮·舍倫多夫，《秘密戰時日記，1870–1871》，彼得·拉索編（伯恩，1954年），第349頁[Paul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Geheimes Kriegstagebuch1870–1871，ed.by Peter Rassow（Bonn，1954），p.349]。

[95．](#_95_2)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70年8月5、13日，DZA：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96．](#_96_2)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8月16日，BA。

[97．](#_97_2) GW，VI2，442ff.

[98．](#_98_1) 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p.448–50.

[99．](#_99_1) 《恩格斯與馬克思往來書信》，倍貝爾和伯恩斯坦編（斯圖加特，1913年），第四卷，第316頁[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ed.by A.Bebel and Ed.Bernstein（Stuttgart，1913），IV，316]。

[100．](#_100_1) 關于吞并問題的著作數量繁多；最近的爭議由利普根斯的《俾斯麥》引起（第31–112頁）。另見洛塔爾·加爾，《阿爾薩斯—洛林問題》（Das Problem Elsass-Lothringen），收錄于特奧多爾·希德和恩斯特·多伊萊因所編的《帝國建立，1870–1871》（第366–385頁），關于后利普根斯作品的評論，見第367頁。

[101．](#_101_1) 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181–82.

[102．](#_102_1) GW，VI2，454–55.

[103．](#_103_1) 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220–222.

[104．](#_104_1) 關于俾斯麥之前的媒體活動，見Lipgens，“Bismarck”，pp.31–112。

[105．](#_105_1)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70年8月14日，DZA：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106．](#_106_1)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70年9月10日；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11日，GFO：法國70。

[107．](#_107_1) 伯恩斯托夫致俾斯麥，1870年9月12日，同上。俾斯麥也許會對這種類比感到震驚，因為當時他常常稱贊美國。

[108．](#_108_1) 門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13日，BA。不幸的是，門德爾后來的書信（直到1870年12月底）不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可能被布萊希羅德轉交給外交部。

[109．](#_109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29日，BA。

[110．](#_110_1)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Kriegstagebuch，pp.93–94.

[111．](#_111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29日，BA。

[112．](#_112_1) 蒂勒致俾斯麥，1870年10月14日，GFO：法國70。

[113．](#_113_1) 同上，1870年10月26日，11月8、21日。

[114．](#_114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0月20日，BA。

[115．](#_115_1) 布萊希羅德致科伊德爾，1870年10月28日，DZA：梅澤堡，科伊德爾檔案。

[116．](#_116_1)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8月20日、10月21日，BA。

[117．](#_117_1) 施魏因尼茨（Schweinitz）致俾斯麥，1870年10月25日，GFO：法國70。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1月3日，BA。

[118．](#_118_1) 同上，1870年11月3日、12月12日，BA。

[119．](#_119_1) 同上，1870年12月13日，BA。參見Heinrich Abeken，p.297。

[120．](#_120_1) GW，VI2，625–28.

[121．](#_121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2月18日，BA。

[122．](#_122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0年12月13日，FA。

[123．](#_123_1) 關于當時的反俾斯麥和反德意志情緒，參見Lipgens，“Bismarck”，pp.84–88；莫斯，《歐洲諸強與1848–1871年的德意志問題：特別涉及英國和俄國》（劍橋，1958年），第11章各處[W.E.Mosse，The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848–1871.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and and Russia（Cambridge，1958），ch.11，passim]；奧多·羅素勛爵當時告訴外相格蘭維爾，如果俾斯麥“對歐洲版圖的改變遠遠超過拿破侖皇帝被認為能做到的”，他將不再感到意外。他還表示，“我們必須對許多令人不快的意外做好準備”。同上，第354頁。

[124．](#_124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9月5日、11月26日，BA。

[125．](#_125_1) 同上，1870年12月12日。

[126．](#_126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0年12月13日，FA。

[127．](#_127_1) 阿爾布萊希特·馮·施托什，《回憶錄：書信和日記選》，烏爾里希·馮·施托什編輯（斯圖加特，1904年），第227頁[Albrecht von Stosch，Denkwürdigkeiten.Briefe und Tagebuchblätter，ed.by Ulrich von Stosch（Stuttgart，1904），p.227]。

[128．](#_128_1) 參見門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2月29日，1871年1月1、2、8、9、14、20、21和25日，BA。當時，門德爾還經常給普魯士大使伯恩斯托夫寫信。

[129．](#_129_1)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月23日，BA。

第七章　凡爾賽宮里的狂妄

[1．](#_1_7) 關于這場矛盾，見埃伯哈德·科爾布（Eberhard Kolb），《作戰與政治，1870–1871》（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1870–71），收錄于特奧多爾·希德和恩斯特·多伊萊因所編的《帝國建立，1870–1871》，第95–118頁，特別是第95、99和113頁。

[2．](#_2_7) 引自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419。

[3．](#_3_7) 理查德·米爾曼，《英國的政策與普法戰爭的到來》（牛津，1965年），第217頁[Richard Millman，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Oxford，1965），p.217]。

[4．](#_4_7) Busch，Tagebuchblätter，I，77.

[5．](#_5_7) 同上，I，236；II，161。

[6．](#_6_7) 利普曼致菲利普森，1870年12月21日；菲利普森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2月23日，BA。

[7．](#_7_7) GW，VII，479.

[8．](#_8_7) Stosch，Denkwürdigkeiten，p.230.

[9．](#_9_7) Busch，Tagebuchblätter，II，110.

[10．](#_10_6) 同上，p.125。

[11．](#_11_6) 勃蘭特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1日；理查德·文策爾（Richard Wentzel）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月31日；彪羅（Bülow）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月30日，BA。

[12．](#_12_6) Busch，Tagebuchblätter，II，155；阿貝肯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6日，BA。

[13．](#_13_6) GW，VI2，691.

[14．](#_14_6) Stosch，Denkwürdigkeiten，p.232.

[15．](#_15_6) 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71年2月12日，RA。

[16．](#_16_6) 維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8月13日，HHSA：PA III：普魯士。

[17．](#_17_6) 1815年的先例引自David S.Landes未發表的論文《大賠款》（“The Great Indemnity”）。

[18．](#_18_6) GW，XIV2，793.

[19．](#_19_6) 摘自樞密院和內閣會議紀要，1870年9月26日，GFO：I.A.A.a27，第1卷。

[20．](#_20_6)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10月20日，BA。

[21．](#_21_6)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月23、31日，BA。

[22．](#_22_6) 摘自樞密院和內閣會議紀要，1870年9月26日，GFO：I.A.A.a27，第1卷。

[23．](#_23_6) 在這點上，必須遺憾地指出，為了反襯德國人的寬宏大量和法國人的斤斤計較，漢斯·赫茨菲爾德（Hans Herzfeld）對1871年和談的描繪有失偏頗。見《德國與戰敗的法國，1871年：和約，戰爭賠款與占領期》（柏林，1924年）[Deutschland und das geschlagene Frankreich，1871：Friedensschluss，Kriegsentschädigung，Besatzungszeit（Berlin，1924）]。

[24．](#_24_6) 赫爾曼·翁克爾編，《巴登大公腓特烈一世與1854–1871年的德國政治：書信、備忘錄與日記》，兩卷本（斯圖加特，1927年），第二卷，第365頁[Hermann Oncken，ed.，Grossherzog Friedrich I von Baden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1854–1871：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Tagebücher（2vols.；Stuttgart，1927），II，365]。

[25．](#_25_6) Meisner，Denkwürdigkeiten Waldersee，I，162.

[26．](#_26_6)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Kriegstagebuch，p.348.

[27．](#_27_6)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14日，BA。

[28．](#_28_6) 施瓦巴赫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71年2月11日，RA。

[29．](#_29_6) 布蘭代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17日，BA。

[30．](#_30_6) 布萊希羅德致布蘭代，1871年2月20日，RA。

[31．](#_31_6) 萊曼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20日，BA。

[32．](#_32_6) 關于梯也爾，見西奧多·澤爾丁，《法國，1848–1945》，第一卷，《野心、愛情和政治》（牛津，1973年），第606、610頁[Theodore Zeldin，France，1848–1945，Vol.I：Ambition，Love，and Politics（Oxford，1973），pp.606，610]。

[33．](#_33_6) GW，VI2，705–6.

[34．](#_34_6) 阿林森編，《腓特烈三世皇帝戰時日記，1870–1871》（倫敦，1927年），第312頁[A.R.Allinson，ed.，The War Diary of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I，1870–1871（London，1927），p.312]。

[35．](#_35_6) Meisner，Denkwürdigkeiten…Waldersee，I，162；Busch，Tagebuchblätter，II，169.

[36．](#_36_6) Loftus，Reminiscences，I，328.

[37．](#_37_6) 儒勒·法夫爾，《1871年1月29日到7月22日的國防政府》（巴黎，1875年），第三卷，第96頁[Jules Favre，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du29janvier au22juillet1871，（Paris，1875），III，96]。

[38．](#_38_6) 同上，pp.96–97。

[39．](#_39_6) Allinson，War Diary of the Emperor，p.313.

[40．](#_40_6) Rheindorf，England und der Krieg，pp.156–57.

[41．](#_41_6) Allinson，War Diary of the Emperor，p.325；and Corti，Haus Rothschild，pp.446–53.

[42．](#_42_6) GW，VI2，708；法伊特·瓦倫丁，《英國外交官對俾斯麥建立帝國的評價》（阿姆斯特丹，1937年），第452–455頁[Veit Valentin，Bismarcks Reichsgründung im Urteil englischer Diplomaten（Amsterdam，1937），452–55]。

[43．](#_43_6) GW，XIII，218.

[44．](#_44_5) 見BA中出處不明的剪報，以及1871年2月23日的《科隆日報》。

[45．](#_45_5)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20日，BA。

[46．](#_46_5) 參見布萊希羅德致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1871年2月17日，RA。他要求向哈茨菲爾特的岳父穆爾頓先生（Mr.Moulton）支付1800法郎。另見Hatzfeldt，Briefe，p.73等處。

[47．](#_47_5)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Kriegstagebuch，pp.348–49，360–63.

[48．](#_48_5) 赫爾曼·鮑姆加藤和路德維希·約利，《約利首相》（圖賓根，1897年），第212頁[Hermann Baumgarten and Ludwig Jolly，Staatsminister Jolly（Tübingen，1897），p.212]。

[49．](#_49_5) Hatzfeldt，Briefe，p.314；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475；Kolb，“Kriegführung，”p.117.

[50．](#_50_5) 萊曼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2月20日，BA。

[51．](#_51_5) 門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3月12日，BA。

[52．](#_52_5)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3月9、18日，BA。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1．](#_1_8) 引自霍費勒，《1870–1871年德國的使命信仰和時代意識》，刊于《宗教和精神史期刊》，1963年第15期，第267頁[Höfele，“Sendungsglaube und Epochenbewusstsein，”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15（1963），267]。

[2．](#_2_8) Vierhaus，Spitzemberg，p.121.

[3．](#_3_8) 《來自馬克斯·韋伯：社會學論文》，格斯和賴特·米爾斯編（紐約，1946年），第391頁[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New York，1946），p.391]。

[4．](#_4_8) Vierhaus，Spitzemberg，p.127.

[5．](#_5_8) 柏林藝術學院，《奠基時期面面觀，1870–1890》（1974年，展覽目錄），第45–46頁[Akademie der Künste（Berlin），Aspekte der Gründerzeit，1870–1890（Catalogue of Exhibit，1974），pp.45–46]。

[6．](#_6_8) 見拙作《金錢、道德和社會支柱》（“Money，Morals，and the Pillars of Society”），收錄于《狹隘主義的失敗》（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特別是第27–30頁。

[7．](#_7_8) 《柏林城國民經濟和統計年鑒》，第32卷（柏林，1913年），B部分，第3頁；第4卷（柏林，1978年），第15頁；第15卷（柏林，1890年），第8頁[Berliner Städtisches Jahrbuch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tatistik，Vol.32（Berlin，1913），section B，p.3；Vol.4（Berlin，1878），p.15；Vol.15（Berlin，1890），p.8]。

[8．](#_8_8) 《卡爾·菲爾斯騰貝格：一位德國銀行家的生平，1870–1914》，漢斯·菲爾斯騰貝格編（柏林，1931年），第64–65頁[Carl Fürstenberg.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Bankiers，1870–1914，ed.by Hans Fürstenberg（Berlin，1931），pp.64–65]。

[9．](#_9_8) 引自格哈德·馬蘇爾，《帝國時期的柏林》（紐約，1970年），第74頁[Gerhard Masur，Imperial Berlin（New York，1970），p.74]。

[10．](#_10_7) 同上。

[11．](#_11_7) 羅伯特·米歇爾斯，《社會哲學問題》（萊比錫，1914年），第150頁[Robert Michels，Probleme der Sozialphilosophie（Leipzig，1914），p.150]；另見羅伯特·貝達爾，《德國民族主義新思索》，刊于《美國歷史評論》，1972年第77期，第65–70頁[Robert M.Berdahl’s“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AHR，77（1972），65–70]。

[12．](#_12_7) Michels，Probleme，p.151.

[13．](#_13_7)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9月14日，BA。

[14．](#_14_7) 沃爾特·白芝浩，《倫巴底街：貨幣市場寫照》（紐約，1897年），第267頁[Walter Bagehot，Lombard Street：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New York，1897），p.267]。

[15．](#_15_7) 漢斯–烏爾里希·維勒，《俾斯麥與帝國主義》（科隆與柏林，1969年），第97頁[Hans-Ulrich Wehler，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Cologne and Berlin，1969），p.97]。

[16．](#_16_7) 見阿爾弗雷德·魯本斯，《諷刺畫中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猶太歷史學會《1968–1969年學報》，1970年第22期，第76–87頁[Alfred Rubens，“The Rothschilds in Caricature，”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Transactions，1968–1969，22（1970），76–87]。

[17．](#_17_7)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6.

[18．](#_18_7) 奧特馬爾·馮·莫爾，《為國效勞五十載：生平回憶》（萊比錫，1921年），第46頁[Ottmar von Mohl，Fünfzig Jahre Reichsdienst.Lebenserinnerungen（Leipzig，1921），p.46]。俾斯麥的父親在柏林的貝倫街53號度過許多個冬天，他本人也于生命中的不同時間在貝倫街20號和60號生活過。見格奧爾格·施密特博士，《舍恩豪森與俾斯麥家族》（柏林，1897年），第156、167、172頁[Dr.Georg Schmidt，Schönhausen und die Familie von Bismarck（Berlin，1897），pp.156，167，172]。

[19．](#_19_7) Mohl，Fünfzig Jahre，p.72.

[20．](#_20_7) 見格奧爾格·施魏策爾，《柏林證券交易所》，刊于《柏林石子路：柏林人生活畫卷》，雷蒙德和曼策爾編輯（柏林，1891年），第325頁[Georg Schweitzer’s“Berliner Börse，”in Berliner Pflaster.Illustrierte Schilderungen aus dem Berliner Leben，ed.by M.Reymond and L.Manzel（Berlin，1891），p.325]。

[21．](#_21_7) 甚至尼采也在一段明顯帶有親猶色彩的文字中最后寫道：“也許那個年輕的猶太證券交易員是人類最惡心的發明。”弗里德里希·尼采，《作品集》，卡爾·施萊希塔編（慕尼黑，日期不明），第一卷，第686頁[Friedrich Nietzsche，Werke，ed.by Karl Schlechta（Munich，n.d.），I，686]。

[22．](#_22_7)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9月11日，BA。

[23．](#_23_7) 古騰塔格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8月13日，BA。

[24．](#_24_7) 俾斯麥致奧伊倫堡，1872年3月8日，DZA：梅澤堡，王國掌禮局關于馮·布萊希羅德的文件，VI.B.154。

[25．](#_25_7) 貴族書信，1872年3月8日，同上。

[26．](#_26_7) 拉瑪爾·塞西爾，《普魯士的貴族受封，1871–1918》，刊于《美國歷史評論》，1970年第75期，第757–795頁[Lamar Cecil，“The Creation of Nobles in Prussia，1871–1918，”AHR，75（1970），757–95]。

[27．](#_27_7) 《猶太人大眾報》，1872年4月16日。

[28．](#_28_7) 參見GW，VIII，462；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8。

[29．](#_29_7) 維尼弗雷德·塔夫斯，《俾斯麥的大使：奧多·羅素勛爵》（倫敦，1938年），第302頁[Winifred 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Lord Odo Russell（London，1938），p.302]。

[30．](#_30_7)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7；另見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1年1月22日，SA。

[31．](#_31_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3月13日，SA。

[32．](#_32_7) GW，XIV2，818–19.

[33．](#_33_7) 希爾弗里德（Hillfried）致布萊希羅德，1873年1月13日，BA。

[34．](#_34_7) Vierhaus，Spitzemberg，p.16.

[35．](#_35_7) 引自海因茨·戈爾維策，《直屬貴族：德國社會史論文》（哥廷根，1964年），第325頁[Heinz Gollwitzer，Die Standesherren.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Göttingen，1964），p.325]。

[36．](#_36_7) 1872年3月21日提交的紋章草圖和對其未具日期的描述，見DZA：梅澤堡，王國掌禮局關于馮·布萊希羅德的文件，VI.B.154。

[37．](#_37_7) 喬治娜·布拉基斯頓，《威廉·羅素勛爵和夫人，1815–1846》（倫敦，1972年），第337–338頁[Georgiana Blakiston，Lord William Russell and His Wife，1815–1846（London，1972），pp.337–38]。

[38．](#_38_7) 奧多·羅素勛爵致恩菲爾德子爵（Viscount Enfield），1872年9月28日，PRO：FO，64/749。

[39．](#_39_7) 格蘭維爾的便條，同上，1872年10月8日。

[40．](#_40_7) 羅素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10月12日，BA。

[41．](#_41_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10月21日，SA。另見俾斯麥給勃蘭登堡州行政長官的正式通知，1872年11月26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文件，編號30。

[42．](#_42_7) 同上，1870年12月17日，1873年10月4日，1873年11月5日：布萊希羅德申請接受巴伐利亞、意大利和巴西的勛章；1872年12月13日，通知布萊希羅德佩戴薩克森和奧地利勛章的申請獲得批準。

[43．](#_43_7) 施瓦巴赫的書信，1871年9月8日，1877年10月1日，1878年2月6日，同上，關于尤里烏斯·利奧波德·施瓦巴赫的文件，編號30。

[44．](#_44_6) 庫洛（Kühlow）的便條，BA。

[45．](#_45_6) Roon，Denkwürdigkeiten，III，358.羅恩的后人記錄他出售古特戈茨，但沒有提及買家，這并不出人意料。

[46．](#_46_6) 關于售價的信息來自勃蘭登堡地方史學會主席格哈德·庫希勒（Gerhard Küchler）寫給作者的信，1973年2月24日。

[47．](#_47_6) 關于吉利對古特戈茨的改造，見漢斯·赫茨菲爾德編，《柏林與勃蘭登堡州》（柏林，1968年），第564頁[Hans Herzfeld，ed.，Berlin und die Provinz Brandenburg（Berlin，1968），p.564]。

[48．](#_48_6) 參見漢斯·羅森貝格，《騎士有產階級的偽民主化》，刊于《當代德國社會史》，漢斯–烏爾里希·維勒編（科隆和柏林，1966年），第287–308頁[Hans Rosenberg，“Die Pseudodemokratisierung der Rittergutsbesitzerklasse，”in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ed.by Hans-Ulrich Wehler（Cologne and Berlin，1966），pp.287–308]。

[49．](#_49_6) 羅恩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9日，BA。

[50．](#_50_6) 西貝特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7月12、23日，BA。

[51．](#_51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8月13日，SA。

[52．](#_52_6) 施耐德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8月22日和幾封更早的書信，BA。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8月15日，他在信中附上1877年8月13日《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的剪報，BA。

[53．](#_53_5)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91.

[54．](#_54_5) 瑪麗·馮·本森，《我生活的世界：回憶幸福時光，1860–1912》（萊比錫，1929年），第49頁[Marie von Bunsen，Die Welt in der ich lebte.Erinnerungen aus glücklichen Jahren1860–1912（Leipzig，1929），p.49]。

[55．](#_55_5) Mohl，Fünfzig Jahre，p.87.

[56．](#_56_5) 阿洛伊斯·布勞德爾（Alois Braudl）語，引自卡爾·海因里希·霍費勒編，《俾斯麥時代的精神與社會，1870–1890》（哥廷根，1967年），第221頁[Karl Heinrich Höfele，ed.，Geist und Gesellschaft der Bismarckzeit（1870–1890）（Göttingen，1967），p.221]。

[57．](#_57_5) 特奧多爾·馮塔納，《通奸者》（柏林，1891年），第1頁。

[58．](#_58_5) 恩斯特·路德維希·馮·格拉赫，雅各布·馮·格拉赫編，《生平與工作記錄：1795–1877年》第二卷，《1848–1877年》（什未林，1903年），第361頁[Ernst Ludwig von Gerlach，Aufzeichnungen aus seinem Leben und Wirken1795–1877，ed.by Jakob von Gerlach，Vol.II：1848–1877（Schwerin，1903），p.361]。

第九章　政治和經濟上的帝國風格

[1．](#_1_9) 關于他以辭職威脅為手段，見米夏埃爾·施蒂爾默，《俾斯麥帝國中的政變想法》，刊于《歷史期刊》，1969年第209期，第566–615頁[Michael Stürmer，“Staatsstreichgedanken im Bismarckreich，”HZ，209（1969），566–615]。

[2．](#_2_9) GW，XIV2，921.

[3．](#_3_9) 羅素致索爾茲伯里，1878年4月15日，PRO：FO，64/904，no.269，秘密。

[4．](#_4_9) 欽格勒，《霍亨索倫親王卡爾·安東》（斯圖加特和萊比錫，1911年），第224、226頁[K.Th.Zingeler，Karl Anton Fürst von Hohenzollern（Stuttgart and Leipzig，1911），pp.224，226]。

[5．](#_5_9) 盧基烏斯·馮·巴爾豪森，《回憶俾斯麥》（斯圖加特和柏林，1921年），第236頁[Lucius von Ballhausen，Bismarck-Erinnerungen（Stuttgart and Berlin，1921），p.236]。

[6．](#_6_9) 弗里德里希·庫爾提烏斯編，《克洛德維希·霍亨洛厄–希靈斯菲斯特親王回憶錄》（斯圖加特和萊比錫，1907年），第二卷，第367頁[Friedrich Curtius，ed.，Denkwürdigkeiten des Fürsten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Stuttgart and Leipzig，1907），II，367]。

[7．](#_7_9)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12月20日，FA。

[8．](#_8_9) 同上，1874年12月11日，FA。

[9．](#_9_9) 同上，1874年12月11日和19日；關于帝國銀行的成立，另參見恩斯特·魯道夫·胡伯，《1789年以來的德國憲法史》（斯圖加特，1969年），第四卷，第1053–1057頁[Ernst Rudolf Huber，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1789（Stuttgart，1969），IV，1053–57]。

[10．](#_10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6年10月25日，SA。

[11．](#_11_8) 同上，1877年10月3日。

[12．](#_12_8) Wehler，Bismarck，p.57.赫爾穆特·波姆，《大企業、壓力集團和俾斯麥的保守主義轉變，1873–1879》，刊于《歷史期刊》，1967年第10期，第221頁[Helmut Böhme，“Big Business，Pressure Groups and Bismarck’s Turn to Protectionism，1873–1879，”Historical Journal，10（1967），221]。

[13．](#_13_8) 伊莫爾曼（Imelmann）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9月5日，BA。

[14．](#_14_8) 關于對詐騙的著名曝光，見奧托·格拉高，《柏林的證券和奠基詐騙》，第四版（萊比錫，1876年）[Der 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 in Berlin，4th ed.（Leipzig，1876）]。書中沒有列出布萊希羅德創辦的其他企業。

[15．](#_15_8) 1877年10月1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尤里烏斯·利奧波德·施瓦巴赫的文件，編號30。

[16．](#_16_8) 曼弗雷德·波爾博士，《奠基危機中的德意志銀行（1873–1876）》，收錄于《德意志銀行：經濟和幣制問題與銀行史論文集》，第11卷，1973年[Dr.Manfred Pohl，“Die Deutsche Bank in der Gründerkrise（1873–1876），”Deutsche Bank，Beiträge zu Wirtschafts-und Währungsfragen und zur Bankgeschichte，no.11，1973]。

[17．](#_17_8) 對繁榮和隨后蕭條的最佳快速盤點見Wehler，Bismarck，特別是第53–84頁。

[18．](#_18_8) 關于蕭條對文化的沖擊，見拙作Failure of Illiberalism，pp.26–57，以及《資本主義與文化史學家》，收錄于《自帕爾納索斯山：致雅克·巴爾贊文集》，朵拉·維納和威廉·凱勒編（哈珀和洛出版社，1976年）[“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From Parnassus：A Volume of Essays for Jacques Barzun，ed.by Dora B.Weiner and William R.Keylor（Harper&Row，1976）]。

[19．](#_19_8) 托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個家族的衰弱》（柏林，1928年），第209頁[Thomas Mann，Buddenbrooks.Verfall einer Familie（Berlin，1928），p.209]。

[20．](#_20_8) 這種看法來自Otto Pflanze.GW，VI3，58–60。

[21．](#_21_8) 見Helmut Böhme，“Big Business”，pp.224–225。

[22．](#_22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7月25日，1874年7月27日，SA。

[23．](#_23_8) Kardorff，Kardorff，pp.22–25.

[24．](#_24_8) 同上，第87、86–115及其他多處。

[25．](#_25_8)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7月6日，BA。

[26．](#_26_8)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1月18日，BA。

[27．](#_27_8) 弗里登塔爾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0月29日，BA。

[28．](#_28_8)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4月1日，BA；描述卡多夫財務困境的另一個版本完全無視布萊希羅德的角色，也沒有提及卡多夫的個人財產與他支持某項特別立法間的聯系，見Kardorff，Kardorff，pp.192–193。

[29．](#_29_8) 從1887年4月到6月，布萊希羅德共收到10封關于卡多夫陷入麻煩的信，BA。

[30．](#_30_8)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8月18日，BA。

[31．](#_31_8)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24日，BA。

[32．](#_32_8) 《十字報》，1879年6月29日，由赫伯特·馮·俾斯麥還給布萊希羅德，BA。

[33．](#_33_8)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7月3日，BA。

[34．](#_34_8)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5年6月29日，FA。

[35．](#_35_8)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7月1日。俾斯麥檔案中保留著首相親自修改過的草稿。當時，奧托·馮·俾斯麥也在考慮起訴《十字報》，但因為擔心該報將從一場“轟動性審判”中獲利而猶豫不決。GW，VI3，61–62.

[36．](#_36_8)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5年7月5日，FA。

[37．](#_37_8) Lucius，Bismarck，p.78.

[38．](#_38_8) 俾斯麥致德爾布呂克，1875年10月23日，GFO：I.A.A.a.50，第一卷。

[39．](#_39_8)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8月29日，BA。

[40．](#_40_8)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0月31日，BA。

[41．](#_41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5年11月7日，SA。

[42．](#_42_8)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2月13日，BA。

[43．](#_43_8) 德爾布呂克致威廉，1875年8月31日，DZA：梅澤堡：民事內閣，89H III號柜，第6卷；另見關于1875年6月30日奧本海姆請愿的大量政府內部通信。

[44．](#_44_7) 伊沃·尼科萊·蘭比，《德國的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1868–1879》（威斯巴登，1963年），第115–116頁[Ivo Nikolai Lambi，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Germany，1868–1879（Wiesbaden，1963），pp.115–16]。

[45．](#_45_7)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2月6日，1877年9月15日，BA。

[46．](#_46_7)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4月16日，BA。

[47．](#_47_7) 同上，1876年10月9日。

[48．](#_48_7) 同上，1876年4月17日。

[49．](#_49_7) Lucius，Bismarck，pp.76–78，87.

[50．](#_50_7) 盧基烏斯致俾斯麥，1876年7月2日，GFO：I.A.A.a.50，第2卷。

[51．](#_51_7) Kardorff，Kardorff，pp.100–101.

[52．](#_52_7) 亞伯拉罕·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9月4日，BA。

[53．](#_53_6)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10月27日，BA。

[54．](#_54_6) 奧伊倫堡致俾斯麥，1876年10月25日，GFO：I.A.A.a.50，第1卷。

[55．](#_55_6)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月31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1月31日，FA。

[56．](#_56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4月30日，FA。

[57．](#_57_6) 尼科萊·奧洛夫親王，《俾斯麥與卡特琳娜·奧洛夫：高層政治中的田園詩》（慕尼黑，1936年），第164頁[Fürst Nikolai Orloff，Bismarck und Katharina Orloff.Ein Idyll in der hohen Politik（Munich，1936），p.164]。

[58．](#_58_6) A.J.P.Taylor，Bismarck，p.137.

[59．](#_59_5) Lucius，Bismarck，p.110.

[60．](#_60_5) Kohl，Bismarck-Regesten，II，140.

[61．](#_61_5) Lucius，Bismarck，p.137.

[62．](#_62_5) 俾斯麥致威廉，1876年10月7日，DZA：梅澤堡：民事內閣，89H III號柜，第6卷。

[63．](#_63_5) 卡爾·哈達赫的《1879年德國重設鋼鐵和糧食關稅的經濟因素意義》（柏林，1967年）強調這點[Karl W.Hardach，Die Bedeutung wirtschaftlicher Faktoren bei der Wiedereinführung der Eisen-und Getreidezölle in Deutschland1879（Berlin，1967）]。

[64．](#_64_5) 克里斯托弗·馮·蒂德曼，《在俾斯麥親王手下擔任帝國首相辦公廳主任的六年》，第二版（萊比錫，1910年），第355頁[Christoph von Tiedemann，Sechs Jahre Chef der Reichskanzlei unter dem Fürsten Bismarck，2nd ed.（Leipzig，1910），p.355]。

[65．](#_65_5) 法恩布勒致俾斯麥，1877年6月29日，GFO：I.A.A.a.50，第2卷。

[66．](#_66_4) 法恩布勒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20日，1879年10月29日，1879年11月19日，BA。

[67．](#_67_4) 彪羅致俾斯麥，1877年12月25日，DZA：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關于1877–1888年德國貿易和經濟改革的文件，第408號，第1卷。

[68．](#_68_4) 施瓦茨科普夫（Schwartzkopf）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6月4日，BA。

[69．](#_69_4)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7年6月4日，FA。

[70．](#_70_4)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6月6日，BA。

[71．](#_71_4) GW，VI3，85；布埃克，《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柏林，1902年），第一卷，第177–179頁[H.A.Bueck，Der 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Berlin，1902），I，177–79]。

[72．](#_72_4) 法恩布勒致俾斯麥，1877年6月29日，GFO：I.A.A.a.50，第2卷。

[73．](#_73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2月2日，SA。

[74．](#_74_4) 路易斯·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3月1、15日，BA。

[75．](#_75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3月4日，SA。

[76．](#_76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3月4日；Huber，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IV，145；Gedanken，II，179，188–198。

[77．](#_77_4) Lucius，Bismarck，p.134.

[78．](#_78_4) Tiedemann，Sechs Jahre，pp.235–44.

[79．](#_79_4) GW，VI3，156.

[80．](#_80_4) Tiedemann，Sechs Jahre，pp.249，252.

[81．](#_81_4)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月25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2月1日，FA.

[82．](#_82_4)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20日，BA；Bueck，Centraiverband，I，364–65；GW，VI3，111–112。

[83．](#_83_4)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8年5月21日，1878年5月18日，FA；Kardorff，Kardorff，pp.139–141。

[84．](#_84_4) Gedanken，II，188–97.

[85．](#_85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5月11日，SA。

[86．](#_86_4) 一封關于布萊希羅德的信，1878年5月23日，致某位“樞密顧問”，保存于SA；該信很可能是寫給布萊希羅德的朋友，帝國首相辦公廳主任克里斯托弗·馮·蒂德曼。

[87．](#_87_4) 愛德華·拉斯克，《議會十五載，1866–1880》（柏林，未具日期），第141頁[Eduard Lasker，Fünfzehn Jahre parlamentarischer Geschichte，1866–1880（Berlin，n.d.），p.141]。

[88．](#_88_4) Eyck，Bismarck，III，227.

[89．](#_89_4) 奧古斯特·倍倍爾，《我的人生》（斯圖加特，1911年），第二卷，第418頁[August Bebel，Aus meinem Leben，II（Stuttgart，1911），418]；保羅·文茨克編，《在新帝國，1871–1890自由黨領袖遺物中的政治書信》（波恩和萊比錫，1926年），第215頁[Paul Wentzcke，ed.，Im Neuen Reich，1871–1890.Politische Briefe aus dem Nachlass liberaler Parteiführer（Bonn and Leipzig，1926），p.215]。

[90．](#_90_4) Bueck，Centraiverband，I，373.

[91．](#_91_4) 波伊特納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20日、6月1日，BA。

[92．](#_92_4) 同上，1878年6月12、13日。

[93．](#_93_4) 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234–35.

[94．](#_94_4) Tiedemann，Sechs Jahre，p.252.

[95．](#_95_3) 布萊希羅德致波伊特納，1878年7月6日，BA；布萊希羅德的信被歸回檔案，標明波伊特納已經離開柏林。

[96．](#_96_3) 波伊特納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6月28日，1878年7月4日；馮·施魏因男爵（Freiherr von Swaine）致波伊特納，1878年6月29日，BA；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8年7月2日，FA。

[97．](#_97_3)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1878年7月28日，SA。

[98．](#_98_2) 關于拉斯克政治生涯的出色概述，見厄內斯特·韓伯格，《德國公共生活中的猶太人：1848–1918年君主制時期的政府成員、官員和議員》（圖賓根，1968年），第269–284頁[Ernest Hamburger，Die 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 Deutschlands.Regierungsmitglieder，Beamte und Parlamentarier in der monarchischen Zeit，1848–1918（Tübingen，1968），pp.269–84]。

[99．](#_99_2)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8日，BA。

[100．](#_100_2) 蘭曹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28日、8月4日，BA。

[101．](#_101_2)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1878年8月，S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102．](#_102_2) 俾斯麥致弗倫斯堡（Flensburg）的行政專區主席波蒂謝（Bötticher），1878年8月11日，以及俾斯麥致施托兒貝格伯爵（Count Stolberg），1878年9月1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帝國議會選舉，候選人赫伯特與威廉·馮·俾斯麥伯爵，編號3，第1卷。

[103．](#_103_2) 布蘭克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6月30日，BA。

[104．](#_104_2) 布萊希羅德致布朗克，1878年7月3日，副本，BA。

[105．](#_105_2) 1878年7月8日，寫在德國工業家中央協會的信箋上，以及1878年7月3日，布萊希羅德致布朗克的信件草稿，BA。也許值得注意的是，布萊希羅德一定曾要求波伊特納歸回關于他參選的文件，不然它們不可能出現在今天的布萊希羅德檔案中。他可能想要抹掉關于這次失敗嘗試的所有證據。

[106．](#_106_2) 布朗克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13日，BA。

[107．](#_107_2) 魯道夫·邁耶爾，《德國的政治奠基人與腐敗》（萊比錫，1877年），第34–35頁[Rudolph Meyer，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Leipzig，1877），pp.34–35]。

[108．](#_108_2) 理查德·文策爾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13日，BA。

[109．](#_109_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7月19日，GFO：I.A.A.a.50，第3卷。

[110．](#_110_2) 相反的觀點見Wehler，Bismarck，pp.92–93。

[111．](#_111_2) Hardach，Bedeutung，p.193.

[112．](#_112_2) Kohl，Bismarck-Regesten，II，171–72.

[113．](#_113_2)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1月8日；關于俾斯麥對鐵路問題觀點的詳細闡述，參見1879年4月8日，出處同上，MAE：德國，第27、28卷。

[114．](#_114_2) 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3月26日，BA.

[115．](#_115_2) 許斯根，《路德維希·溫特霍斯特》，第三版（科隆，1911年），第272頁。E.Hüsgen，Ludwig Windthorst，3rd ed.（Cologne，1911），p.272.

[116．](#_116_2) 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2月13日，BA。

[117．](#_117_2) 埃爾里希·埃克，《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倫敦，1950年），第205頁[Erich Eyck，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London，1950），p.205]。

[118．](#_118_2) 溫特霍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3月28日，BA。

[119．](#_119_2) 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4月6日，BA。

[120．](#_120_2)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4月8、22日，MAE：德國，第28卷；溫特霍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4月13日，BA。

[121．](#_121_2) 奧古斯特·馮·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4月3日，BA。

[122．](#_122_2) 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5月16日，BA。

[123．](#_123_2) 諾爾特（E.Nolte）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7月2日，BA。

[124．](#_124_2) Vierhaus，Spitzemberg，p.178.

[125．](#_125_2) 邁耶爾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5月4日，BA。

[126．](#_126_2)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4月8日，MAE：德國，第28卷。

[127．](#_127_2) Kohl，Bismarck-Regesten，II，188.

[128．](#_128_2) Lucius，Bismarck，pp.158–59.

[129．](#_129_2)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7月2日，MAE：德國，第29卷。

[130．](#_130_1)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7月5日，同上。

[131．](#_131_1) GW，XII，117–28.

[132．](#_132_1) Orloff，Bismarck，p.168.

[133．](#_133_1)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7月15日，MAE：德國，第29卷。

[134．](#_134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2月3日，SA。

[135．](#_135_1)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12月12日，FA。

[136．](#_136_1) 赫伯特·馮·俾斯麥的備忘錄，1880年12月14日，GFO：I.A.A.a.adh.secr.；以及俾斯麥致威廉，1879年7月12日，DAZ：梅澤堡：民事內閣，第89H III號柜，第7卷。

[137．](#_137_1) 關于這點，見詹姆斯·希漢，《盧約·布連塔諾的生涯》（芝加哥，1966年），第3–4章[James J.Sheehan，The Career of Lujo Brentano（Chicago，1966），chs.3–4]。

[138．](#_138_1) 拉爾夫·達倫多夫，《德國的社會與民主》（紐約，1967年），第39頁[Ralf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New York，1967），p.39]；阿爾弗雷德·馮·德·萊恩的《俾斯麥親王的鐵路政策》（柏林，1914年）仍然不可或缺[Alfred von der Leyen，Die Eisenbahnpolitik des Fürsten Bismarck（Berlin，1914）]；另見魯道夫·莫塞，《俾斯麥時期的帝國最高行政部門，1867–1890》（明斯特，1957年），第139–160頁[Rudolph Morsey，Die Oberste Reichsverwaltung unter Bismarck，1867–1890（Münster，1957），pp.139–60]，以及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作品集》（東柏林，1962年），第19卷，第172–175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East Berlin，1962），XIX，172–75]。

[139．](#_139_1) 弗朗茨·佩洛特，《俾斯麥與猶太人》，菲爾德穆勒—佩洛特編（柏林，1931年），第63頁[Franz Perrot，Bismarck und die Juden，ed.by L.Feldmüller-Perrot（Berlin，1931），p.63]。

[140．](#_140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7月25日，SA。

[141．](#_141_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3年8月13日，BA。

[142．](#_142_1) Morsey，Reichsverwaltung，p.143.

[143．](#_143_1) 同上，pp.143–146。

[144．](#_144_1) 庫爾特·格倫瓦爾德，《歐洲鐵路與猶太企業》，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67年第12期，第201頁[Kurt Grunwald，“Europe’s Railways and Jewish Enterprise，”LBY，12（1967），201]。

[145．](#_145_1) 大衛·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2月2日、5月9日，BA。

[146．](#_146) 同上，1876年6月5日。

[147．](#_14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12月11日，SA。

[148．](#_148) Morsey，Reichsverwaltung，p.153；GW，VI3，96.

[149．](#_149)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72.

[150．](#_150)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6月22日，BA。

[151．](#_151) 漢斯·布萊希羅德致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1877年7月26日，BA。

[152．](#_152)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1月14日，BA。

[153．](#_15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6年6月8日，SA。

[154．](#_15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12月16日，SA；關于利率，見薩托利烏斯·馮·瓦爾特斯豪森，《德國經濟史，1815–1914》，第二版（耶拿，1923年），第298頁[A.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1815–1914，2nd ed.（Jena，1923），p.298]。

[155．](#_155)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威廉·馮·俾斯麥，1879年1月11日，S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156．](#_156) 科恩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月25日，BA。

[157．](#_157) 羅伊斯親王亨利七世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2月1日，1879年5月2日；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7月15日；奧古斯特·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8月29日、11月20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6月1、12日，SA。

[158．](#_15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6月3日，SA。

[159．](#_159) 弗里德里希·容尼克爾，《阿爾伯特·馮·馬伊巴赫部長》（斯圖加特，1910年），第73–81頁[Friedrich Jungnickel，Staatsminister Albert von Maybach（Stuttgart，1910），pp.73–81]。

[160．](#_160) 基利施（Killisch）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2月6日，BA。

[161．](#_161) 萊茵—納厄鐵路國有化事務備忘錄，未具日期，BA。

[162．](#_162) 布萊希羅德致比特，1880年6月14日；比特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6月28日；布萊希羅德致比特，1880年6月29日，BA。

[163．](#_163) 布萊希羅德致比特，1880年6月29日；1880年7月5日、9月5日，BA。

[164．](#_164) SBHA，1881年1月11日，I，pp.896–904。

[165．](#_165) 未具日期的備忘錄，BA。

[166．](#_166) 見1880年11月16日、1881年5月4日、1881年6月30日、1881年8月8日的賬目，1884年1月24日的賬單；另參見Jungnickel，Maybach，pp.90–91。

[167．](#_167) Leyen，Eisenbahnpolitik，p.129；Jungnickel，Maybach，p.92.

[168．](#_168) 約翰內斯·齊庫施，《新德意志帝國政治史》，三卷本（法蘭克福，1925–1930年），第二卷，第374頁[Johannes Ziekursch，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3Vols.；Frankfurt，1925–1930），II，374]；在該書第357–375頁，齊庫施提醒讀者注意19世紀80年代的這番話；施圖爾默分析稱，這是俾斯麥策略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見Stürmer，“Staatsstreichgedanken”。

[169．](#_169) 波蒂謝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9月10日，1888年1月11日，BA；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12月7日，FA。

[170．](#_170) Wentzcke，Im Neuen Reich，p.383.

[171．](#_171) Lucius，Bismarck，pp.306–307；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4年12月17日，FA；Morsey，Reichsverwaltung，pp.115–6。

[172．](#_172) GW，XII，146–48.

[173．](#_173) 參見拉爾夫·鮑文對俾斯麥社團理念的出色概括，《德國的社團國家理論》（紐約，1947年），第148–156頁[Ralph H.Bowen，German Theories of the Corporative State（New York，1947），pp.148–56]。

[174．](#_174) 引自漢斯·羅特菲爾斯編，《奧托·馮·俾斯麥：德意志國家》（慕尼黑，1925年），第387頁[Hans Rothfels，ed.，Otto von Bismarck.Deutscher Staat（Munich，1925），p.387]。

[175．](#_175) 圣瓦里耶致巴泰勒米·圣伊萊爾（Barthelemy Saint Hilaire），1880年11月1日，MAE：德國，第38卷。

[176．](#_176) Rothfels，Bismarck，p.414.

[177．](#_17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9月29日，FA。

[178．](#_178) 參見瓦爾特·福格爾，《俾斯麥的工作保險》（不倫瑞克，1951年），第34–50、138頁[Walter Vogel，Bismarcks Arbeiterversicherung（Braunschweig，1951），pp.34–50，138]。

[179．](#_179) 朗格致俾斯麥，1885年11月3日、12月4日，SA。

[180．](#_180) 威廉·馮·朔爾茨編，《阿道夫·馮·朔爾茨部長：與俾斯麥的經歷和談話》（斯圖加特和柏林，1922年），第36、60、70–71頁[Wilhelm von Scholz，ed.，Staatsminister Adolf von Scholz，Erlebnisse und Gespräche mit Bismarck（Stuttgart and Berlin，1922），pp.36，60，70–71]。

[181．](#_181) 諾曼·里希和費舍爾編，《荷爾斯泰因文件》，第1–3卷（劍橋，1955–1961年），第2卷，第56–57頁[Norman Rich and M.H.Fischer，eds.，The Holstein Papers，Vols.I–III（Cambridge，1955–1961），II，56–57]。

[182．](#_182)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4，p.60.

[183．](#_18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4年5月24日，SA。

[184．](#_184) Holstein Papers，II，227–28；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4，p.63；GW，VIII，511.

[185．](#_185) 引自漢斯·戈德施密特，《帝國與普魯士的領導權爭奪戰》（柏林，1931年），第69頁[Hans Goldschmidt，Das Reich und Preussen im Kampf um die Führung（Berlin，1931），p.69]。

[186．](#_186) 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內（Freycinet），1880年4月7、8和13日，MAE：德國，第34卷。

[187．](#_187) GW，XIV2，917–18.

[188．](#_188) 漢斯·菲利皮，《普魯士與不倫瑞克王位繼承問題，1866–1913》（希爾德斯海姆，1966年）[Hans Philippi，Preussen und die braunschweigische Thronfolgefrage，1866–1913（Hildesheim，1966）]；斯圖爾特·斯蒂林，《俾斯麥與圭爾夫問題，1866–1890：特別利益者對國家統一的反對研究》（海牙，1973年），第6章[Stewart A.Stehlin，Bismarck and the Guelph Problem，1866–1890：A Study in Particularist Opposition to National Unity（The Hague，1973），ch.6]。

[189．](#_189)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165；漢斯·菲利皮，《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與韋爾夫基金》，刊于《巴伐利亞地方志期刊》，1960年第23期，第90頁[Hans Philippi，“König Ludwig II.von Bayern und der Weifenfond，”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23（1960），90]。

[190．](#_190) Holstein Papers，III，104.

[191．](#_191) Holstein Papers，II，75–80.

[192．](#_192) 同上。

[193．](#_193) 關于這100萬馬克，參見Philippi，“König Ludwig”，p.94；菲利皮的文字全盤接受荷爾斯泰因的證詞，有時還引證不當。

[194．](#_194) 普菲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2月14、23日，BA。

[195．](#_195) GW，XIV2，949–50.

[196．](#_196) 布萊希羅德致普菲斯特，1884年4月26日，草稿，BA。

[197．](#_197) 普菲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6月19日，BA；另見Philippi，“König Ludwig”，pp.95–96。

第十章　貪婪與陰謀

[1．](#_1_10) 關于節儉和貴族生活總體狀況的少數優秀描述之一，見約阿西姆·馮·迪索，《過渡中的貴族：一位批判性貴族成員來自城中和莊園宅邸的報告》（斯圖加特，1961年），第24頁[Joachim von Dissow，Adel imÜbergang.Ein kritischer Standesgenosse berichtet aus Residenzen und Gutshäusern（Stuttgart，1961），p.24]。

[2．](#_2_10) 萊昂內爾·特里林，《誠與真》（馬薩諸塞州，劍橋，1972年），第37頁[Lionel Trilling，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1972），p.37]。

[3．](#_3_10) 馬克斯·韋伯，《政治作品集》（慕尼黑，1921年），第14頁[Max Weber，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Munich，1921），p.14]。

[4．](#_4_10) 我在《德國的土地精英》（German Landed Elites）進一步展開該主題，收錄于大衛·斯普林編，《歐洲的土地精英》（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European Landed Elites，ed.by David Spring（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另見漢斯·羅森貝格（Hans Rosenberg）的重要論文，“Die Pseudodemokratisierung，”in H.-U.Wehler，ed.，Sozialgeschichte，pp.287–308。

[5．](#_5_10) Dissow，Adel，p.25.

[6．](#_6_10) 查爾斯·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紐約，1960年），第134頁[Charles Dickens，Our Mutual Friend（New York，1960），p.134]。

[7．](#_7_10) Thomas Mann，Buddenbrooks，p.49.

[8．](#_8_10) 特奧多爾·馮塔納，《致格奧爾格·弗里德蘭德的信》，庫爾特·施萊內特編（海德堡，1954年），第2頁[Theodor Fontane，Briefe an Georg Friedlaender，ed.by Kurt Schreinert（Heidelberg，1954），p.2]。

[9．](#_9_10) 最簡單的例子見同上，第305頁；以及彭里斯的霍華士勛爵，《人生劇場，1863–1905》（倫敦，1935年），第一卷，第84頁[Lord Howarth of Penrith，Theatre of Life，1863–1905，Vol.I（London，1935），p.84]。

[10．](#_10_9) Lucius，Bismarck，pp.21，56；另見A.O.Meyer，Bismarck，pp.485–505passim。

[11．](#_11_9) GW，XIV2，85.

[12．](#_12_9) Kardorff，Kardorff，p.114.

[13．](#_13_9) Lucius，Bismarck，p.78；GW，XV，343–355；格哈德·里特，《普魯士保守派與俾斯麥的德意志政策，1858–1871》（海德堡，1913年），特別見第361–378頁[Gerhard Ritter，Die preussischen Konservativen und Bismarcks deutsche Politik1858–1871（Heidelberg，1913），esp.pp.361–78]。

[14．](#_14_9) Lucius，Bismarck，p.111；另見Heyderhoff，Im Ring各處。

[15．](#_15_9) Kardorff，Kardorff，p.112.

[16．](#_16_9) Heyderhoff，Im Ring，p22.

[17．](#_17_9) Lucius，Bismarck，p.28.

[18．](#_18_9) Holstein Papers，II，64–65，228.

[19．](#_19_9) 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20.

[20．](#_20_9)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4月15日，BA；另見Lerchenfeld-Koefering透徹的評論，Erinnerungen，pp.229–233。

[21．](#_21_9) 漢斯·戈德施密特（Hans Goldschmidt）的《俾斯麥外交斗爭中的合作者》（Mitarbeiter Bismarcks im aussenpolitischen Kampf）一文提供關于其親隨的大量信息，但忽視不愉快的氣氛。《普魯士年鑒》，1934年第235期，第29–48、125–156頁[Preussische Jahrbücher，235（1934），29–48and125–56]。

[22．](#_22_9) 瓦爾特·布斯曼編，《國務秘書赫伯特·馮·俾斯麥伯爵：政治私信集》（哥廷根，1964年），第15頁[Walter Bussmann，ed.，Staatssekretär Graf Herbert von Bismarck.Aus seiner politischen Privatkorrespondenz（Göttingen，1964），p.15]。

[23．](#_23_9) Hans Goldschmidt，“Mitarbeiter Bismarcks，”p.30.

[24．](#_24_9)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71.

[25．](#_25_9) Holstein Papers，II，103.

[26．](#_26_9) 同上，p.131。

[27．](#_27_9) 安東·蒙茨伯爵，《大使的所憶所想》，卡爾·弗里德里希·諾瓦克和弗里德里希·蒂姆編（柏林，1932年），第50頁[Graf Anton Monts，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des Botschafters，ed.by Karl Friedrich Nowak and Friedrich Thimme（Berlin，1932），p.50]。

[28．](#_28_9) Vierhaus，Spitzemberg，p.17.

[29．](#_29_9)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71.

[30．](#_30_9) 同上，pp.71–73。

[31．](#_31_9) 最佳相關描述見喬治·肯特，《阿尼姆與俾斯麥》（牛津，1968年）[George O.Kent，Arnim and Bismarck（Oxford，1968）]；另見，諾曼·里奇，《荷爾斯泰因與阿尼姆事件》，刊于《近代史期刊》，1956年第28期，第35–54頁[Norman Rich，“Holstein and the Arnim Affair，”JMH，28（1956），35–5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15–17。利用布萊希羅德和俾斯麥檔案，我獲得比肯特的描述更多的信息。

[32．](#_32_9) GW，XIV2，844.

[33．](#_33_9) Kent，Arnim，p.83；Rich，“Holstein，”p.42.

[34．](#_34_9)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3月5、11日，BA。

[35．](#_35_9) Kent，Arnim，p.97.

[36．](#_36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7月10日，BA。

[37．](#_37_9) Kent，Arnim，p.98；諾曼·里奇，《弗里德里希·馮·荷爾斯泰因：俾斯麥與威廉二世時期的政策與外交》（兩卷本，劍橋，1965年），第一卷，第77–78頁[Norman Rich，Friedrich von Holstein：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helm II（2vols.，Cambridge，1965），I，77–78]；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73–75；Morsey，Reichsverwaltung，p.122；海因里希·施皮羅，《魯道夫·林道》（柏林，1909年），第7頁[Heinrich Spiero，Rudolf Lindau（Berlin，1909），p.7]；另見埃伯哈德·瑙約克斯的精彩論文，《魯道夫·林道與俾斯麥對外新聞政策的新定位，1871–1878》，刊于《歷史期刊》，1972年第215期，特別是第299–318頁[Eberhard Naujoks，“Rudolf Lindau und die Neuorientierung der Auswärtigen Pressepolitik Bismarcks（1871–1878），”HZ，215（1972），esp.pp.299–318]。

[38．](#_38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10月13日，GFO：II B.10，卷五。魏爾納·波爾斯（Werner Pöls）忽視這封信，未能看清蘭茨貝格與布萊希羅德通信的全貌。布萊希羅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波爾斯想象的更大。見《布萊希羅德與阿尼姆事件》，刊于《歷史期刊》，1968年第211期，第65–76頁[“Bleichröder und die Arnim-Affäre，”HZ，211（1968），65–76]。

[39．](#_39_9)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4月12日；未具日期，可能是1875年11月20日；1880年11月19日，BA。

[40．](#_40_9) 同上，1873年2月3日。

[41．](#_41_9) 讓·布維耶，《羅斯柴爾德家族》（巴黎，1960年），第184–186頁[Jean Bouvier，Les Rothschilds（Paris，1960），pp.184–86]。

[42．](#_42_9) Holstein Papers，III，33.

[43．](#_43_9)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3年10月10日，BA；另見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10月13日，GFO：II B.10，卷五。

[44．](#_44_8) GW，XV，346.

[45．](#_45_8) 保羅，克納普隆德編，《柏林大使館來信：英國駐柏林代表和外相格蘭維爾勛爵私人通信選，1871–1874，1880–1885》（華盛頓，1944年），第91頁[Paul Knaplund，e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at Berlin and Foreign Secretary Lord Granville，1871–1874，1880–1885（Washington，1944），p.91]。

[46．](#_46_8)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1月14日，BA。

[47．](#_47_8) Kent，Arnim，p.vi.

[48．](#_48_8)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3月4日，BA。

[49．](#_49_8) 同上，1874年3月5、11日。

[50．](#_50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4年3月6日，SA。

[51．](#_51_8)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未具日期，可能是1874年3月初，BA。

[52．](#_52_8)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4月29日，BA。

[53．](#_53_7) 同上，1874年4月14日。

[54．](#_54_7)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5月12日，原信見BA，副本見俾斯麥檔案中的布萊希羅德文件，歸于致赫伯特的信，FA。

[55．](#_55_7)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5月20日，BA。

[56．](#_56_7) Lucius，Bismarck，pp.65–66.

[57．](#_57_7)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5月20日，BA。

[58．](#_58_7) 同上，1874年5月27日。

[59．](#_59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4年7月2、27日，SA。

[60．](#_60_6) Kent，Arnim，pp.144–153.

[61．](#_61_6) 同上。

[62．](#_62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4年10月4日，SA。

[63．](#_63_6)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10月6日，BA。《阿尼姆審判》（柏林，1874年），第25–26頁[Der Arnim’sche Prozess（Berlin，1874），pp.25–26]。

[64．](#_64_6) Kent，Arnim，pp.160–161；保利（Pauly）致俾斯麥，1874年12月8日；Der Arnim’sche Prozess，p.217。

[65．](#_65_6) 彪羅致威廉一世，1874年12月26日，DZA：梅澤堡：民事內閣，89H VI，卷3b，馮·阿尼姆。

[66．](#_66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4年12月15日，FA；布萊希羅德告訴俾斯麥，蘭茨貝格將返回巴黎，除非首相想見他。俾斯麥在信上批注道：“L博士，今晚9點。”

[67．](#_67_5) 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41.英譯本令人遺憾。

[68．](#_68_5)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82.

[69．](#_69_5) Kent，Arnim，p.172.

[70．](#_70_5)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3月12日、6月18日，BA。

[71．](#_71_5) 同上，1875年10月24日。

[72．](#_72_5)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6月6日，BA。

[73．](#_73_5)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未具日期，可能是1874年3月，BA；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20。

[74．](#_74_5)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5月27日；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23。

[75．](#_75_5)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1月20日，BA。

[76．](#_76_5) 關于對荷爾斯泰因角色的最佳評價，見Rich，“Holstein”。

[77．](#_77_5)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4月21日，BA；另見Rich，Holstein，I，162–173。

[78．](#_78_5) 未具日期的信，1890年后，BA。

[79．](#_79_5) 《議會下院商談速記報告》，1873年2月7日，第二卷，第940頁。另見拉斯克早前的演講，同上，1873年1月14日，第一卷，第521–547頁。

[80．](#_80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2月7日，FA。

[81．](#_81_5) 沃爾夫岡·薩伊勒，《赫爾曼·瓦格納和他與俾斯麥的關系》（圖賓根，1958年），第114–122頁[Wolfgang Saile，Hermann Wagener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Bismarck（Tübingen，1958），pp.114–22]；Ritter，Preussischen Konservativen，p.370。

[82．](#_82_5) Kardorff，Kardorff，p.96.

[83．](#_83_5) GW，XIV2，828.

[84．](#_84_5) 赫爾曼·瓦格納，《經歷：1848年到1866年以及1873年至今我的回憶》（兩卷合訂本，柏林，1884年），第二卷，第58頁[Hermann Wagener，Erlebtes：Meine Memoiren aus der Zeit von1848bis1866und von1873bis jetzt（2vols.in one；Berlin，1884），II，58]；Saile，Wagener，pp.122–124。

[85．](#_85_5) Lucius，Bismarck，p.116.

[86．](#_86_5) 約翰娜·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11月23日，BA。

[87．](#_87_5) 瓦格納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12月6日，BA。

[88．](#_88_5) 同上，1876年12月4日，1877年2月13、28日。

[89．](#_89_5) 同上，1880年6月24日；Saile，Wagener，p.120。

[90．](#_90_5) Morsey，Reichsverwaltung，p.248.

[91．](#_91_5)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120.

[92．](#_92_5) Hatzfeldt Briefe，p.256.

[93．](#_93_5) Rich，Holstein，I，9–10.

[94．](#_94_5) Hatzfeldt Briefe，p.275.

[95．](#_95_4) 同上，p.310。哈茨菲爾特以四個點結束這封信。

[96．](#_96_4)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71年11月23日，HN。巴德內恩多夫（Bad Nenndorf）的格哈德·埃貝爾博士（Dr.Gerhard Ebel）曾編輯過哈茨菲爾特的政治通信，我們交流了哈茨菲爾特和布萊希羅德的信。關于勞拉舍的成立，另見Glagau粗俗但內容豐富的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p.200–201。

[97．](#_97_4)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1月13日，BA。

[98．](#_98_3)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72年1月29日，HN；Glagau，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p.200–201。

[99．](#_99_3)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2月9日，BA。

[100．](#_100_3) Kardorff，Kardorff，p.96.

[101．](#_101_3)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72年1月18日，HN；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1月5、10日和7月12日，1873年1月1日，BA。

[102．](#_102_3)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73年8月9日，HN。

[103．](#_103_3) 同上，1873年3月22、24日和4月5日。

[104．](#_104_3) 同上，1875年2月28日、3月6日。

[105．](#_105_3) 同上，1875年3月6日。

[106．](#_106_3)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3月13日，BA。

[107．](#_107_3)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76年3月21日，HN。

[108．](#_108_3)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9月13日，1877年9月24日，HN。

[109．](#_109_3)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3月4日，BA。

[110．](#_110_3) 同上，1878年5月15日。

[111．](#_111_3) 另見荷爾斯泰因對哈茨菲爾特駐節馬德里的溢美之詞，Holstein Papers，I，193；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8年4月28日，FA。

[112．](#_112_3)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4月29日，BA。

[113．](#_113_3) Holstein Papers，III，44.

[114．](#_114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月30日，SA。

[115．](#_115_3) 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278–279.

[116．](#_116_3)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10月31日，FA。

[117．](#_117_3)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1月2日，BA。

[118．](#_118_3)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96–97；赫爾穆特·羅格，《荷爾斯泰因與霍亨洛厄》（斯圖加特，1957年），第149–150頁[Helmuth Rogge，Holstein und Hohenlohe（Stuttgart，1957），pp.149–50]。

[119．](#_119_3) 荷爾斯泰因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月1日（不確定），BA。

[120．](#_120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8月1日，FA；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8月2日，BA；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0年8月19日，FA。

[121．](#_121_3)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1880年8月31日，SA；Rogge，Holstein，pp.89，149–150；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95–96；蘭曹致外交部，1880年11月10日和11日；GFO：I.A.A.a.50adh.secr.，第三卷。

[122．](#_122_3) Rogge，Holstein，pp.104–105；德國《周一報》（Montagsblatt），1880年2月2日，FA；Holstein Papers，II，31。

[123．](#_123_3) 《泰晤士報》，1885年10月15日。

[124．](#_124_3) Morsey，Reichsverwaltung，pp.119–120.

[125．](#_125_3) 莫里茨·布施，《俾斯麥：人生的秘密篇章》（三卷本，倫敦，1898年），第三卷，第67、73–74頁[Moritz Busch，Bismarck：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3vols.；London，1898），III，67，73–4]。另參見哈約·霍爾波恩編，《約瑟夫·瑪利亞·馮·拉多維茨大使生平記錄與回憶》（兩卷本，萊比錫，1925年），第二卷：《1878–1890》，第204頁[Hajo Holborn，ed.，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des Botschafters 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2vols.（Leipzig，1925），II，1878–1890，p.204]。

[126．](#_126_3)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139–41.

[127．](#_127_3) 《泰晤士報》，1885年10月16日。

[128．](#_128_3)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85年11月21日，HN；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0月7日，BA。

[129．](#_129_3)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82年8月5日，HN。

[130．](#_130_2)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42.

[131．](#_131_2) 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1月5日，BA。

[132．](#_132_2) 同上，1889年9月17、27日和10月11日；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546。

[133．](#_133_2)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88年3月2日和4月7、9日，HN；哈茨菲爾特致布萊希羅德，1889年1月30日，BA。

[134．](#_134_2) 伯克內廷參事（Hofrath Bork）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26日，BA。

[135．](#_135_2) 佩彭謝伯爵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2月6、13日，BA。

[136．](#_136_2) 赫爾曼·馮·埃卡德斯泰因男爵，《生平與政治回憶》（萊比錫，1919年），第一卷，第35–40頁[Freiherr Hermann von Eckardstein，Lebenserinnerungen und Politische Denkwürdigkeiten（Leipzig，1919），I，35–40]。

[137．](#_137_2) 威廉二世，《我的早年》（倫敦，1926年），第89頁[William II，My Early Life（London，1926），p.89]。

[138．](#_138_2) 哈里·凱斯勒伯爵，《面容與時間：回憶錄》（柏林，1962年），第79–80頁[Graf Harry Kessler，Gesichter und Zeiten.Erinnerungen（Berlin，1962），pp.79–80]。

[139．](#_139_2) 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1月23日，1878年11月8、19日，1879年7月15日，1880年10月10日，1885年3月31日，BA。

[140．](#_140_2) 同上，1877年7月21日，1880年5月5日，1881年11月29日。

[141．](#_141_2) 威廉一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7月6日，BA。我沒能找到神秘的加布里埃拉·德·卡斯基（Gabrielle de Karsky）的信息—信上署名為de Karski。她在華沙有家，可能是波蘭人。

[142．](#_142_2) 關于對拉齊威爾的愛，見埃爾里希·馬克斯，《威廉一世皇帝》（第八版，慕尼黑和萊比錫，1918年），第29–34頁[Erich Marcks，Kaiser Wilhelm I（8th printing，Munich and Leipzig，1918），pp.29–34]；另見Kessler，Gesichter，pp.45–46。

[143．](#_143_2) Holstein Papers，III，128.

[144．](#_144_2) 布萊希羅德致威廉一世，1884年8月18日，附威廉一世致布萊希羅德的便條，1884年8月19日；威廉一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8月20日，BA；庫蒙特（Coumont）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0月4日，BA。

[145．](#_145_2) 加布里埃拉·德·卡斯基致布萊希羅德，2月11日（無年份，可能是1885年），BA。

[146．](#_146_1) 同上，9月5日（無年份，可能是1885年）。

[147．](#_147_1) 同上，12月28日（無年份，可能是1885年）。

[148．](#_148_1) 威廉一世致布萊希羅德，1886年8月27日，BA。

[149．](#_149_1)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9月19日，BA。

[150．](#_150_1) 《菲利普·奧伊倫堡—赫特菲爾德親王五十年回憶錄》（柏林，1923年），第95頁[Aus50Jahren.Erinnerungen des Fürsten Philipp zu Eulenburg-Hertefeld（Berlin，1923），p.95]。奧伊倫堡是當時赫伯特最親密的心腹，他的記錄是我們手頭最可靠的資料。另見路易斯·斯奈德，《赫伯特·馮·俾斯麥婚姻事件的政治影響，1881–1892》，刊于《近代史期刊》，1964年第36期，第155–169頁[Louis Snyder，“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Herbert von Bismarck’s Marital Affairs，1881，1892，”JMH，36（1964），155–69]。

[151．](#_151_1) Aus50Jahren，p.93.

[152．](#_152_1) 同上，pp.102，105。

[153．](#_153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1年4月13日，FA。

[154．](#_154_1) BA.

[155．](#_155_1)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1年7月5日；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7月6日；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1年7月8日，BA。

[156．](#_156_1) 波蒂謝遺稿，科布倫茨聯邦檔案。感謝約翰·洛爾博士提供材料。

[157．](#_157_1)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6月20日，BA。

[158．](#_158_1)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威廉·馮·俾斯麥，1882年8月9日，FA。感謝Bussmann所編的《國務秘書赫伯特·馮·俾斯麥伯爵：政治私信集》的助理編輯克勞斯—彼得·霍伊普科博士提供材料。

[159．](#_159_1) Holstein Papers，III，104–5.

[160．](#_160_1) 蘭曹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2年8月11日，FA。感謝霍伊普科博士。

[161．](#_161_1) 比如，蘭曹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2年8月11日。感謝霍伊普科博士。

[162．](#_162_1) Holstein Papers，II，57.

[163．](#_163_1) 同上，p.277。

[164．](#_164_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2年5月24日和8月3、9日，SA；威廉·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6月7、8日，BA。

[165．](#_165_1) 布赫爾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11月16日，BA。

[166．](#_166_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7月17日，BA。

[167．](#_167_1) 布萊希羅德之俾斯麥，1882年8月3、7和9日，SA；另見GW，XIV2，950。

[168．](#_168_1)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威廉·馮·俾斯麥，1882年8月9日；蘭曹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2年10月7日，霍伊普科博士提供；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210。

[169．](#_169_1) GP，VI，355.

第十一章　第四等級

[1．](#_1_11) 魯道夫·莫塞，《俾斯麥的新聞政策：外交部新聞司的由來（1870）》，刊于《傳播》，1956年第1期，第180頁[Rudolf Morsey，“Zur Pressepolitik Bismarcks.Die Vorgeschichte des Pressedezernats im Auswärtigen Amt（1870），”Publizistik，I（1956），180]。

[2．](#_2_11) GW，XII，349.

[3．](#_3_11) 見萊諾爾·奧博伊爾出色的《法國、德國和英國的記者形象，1815–1848》，刊于《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1968年第10期，第302–312頁[Lenore O’Boyle’s excellent“The Image of the Journalist in France，Germany，and England，1815–1848，”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0（1968），302–12]。

[4．](#_4_11) 直到近年來，俾斯麥與新聞媒體的關系才開始被仔細研究。關于這段歷史早期的出色作品，見埃伯哈德·瑙約克斯，《俾斯麥的對外新聞政策與帝國奠基，1865–1871年》（威斯巴登，1968年）[Eberhard Naujoks，Bismarcks Auswärtige Pressepolitik und die Reichsgründung，1865–1871（Wiesbaden，1968）]；另見瑙約克斯的“俾斯麥與官方媒體的組織”，刊于《歷史期刊》，1967年第205期，第46–81頁[“Bismarck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Regierungspresse，”HZ，205（1967），46–81]。伊蓮娜·費舍爾—弗勞恩迪恩斯特與魯道夫·莫塞的其他研究見下文。諾爾·馮·德·納莫（R.Nöll von der Nahmer）的《俾斯麥的爬行動物基金》（Bismarcks Reptilienfonds，Mainz，1968），不可靠而且算不上學術作品。

[5．](#_5_11) 奧托·格洛特，《報刊：報刊學體系》，第二卷（曼海姆，1929年），第199頁[Otto Groth，Die Zeitung.Ein System der Zeitungskunde，Vol.II（Mannheim，1929），p.199]。

[6．](#_6_11) 格雷厄姆·斯托雷，《路透社：收集新聞的世紀故事》（紐約，1951年），第3–31頁[Graham Storey，Reuters：The Story of a Century of News-Gathering（New York，1951），pp.3–31]。

[7．](#_7_11) 參見Naujoks，“Regierungspresse”，pp.46–81。

[8．](#_8_11) 保羅·林道，《只是回憶》（兩卷本，柏林，1916–1917年），第一卷，第234–241頁[Paul Lindau，Nur Erinnerungen（2vols.；Berlin，1916–1917），I，234–41]。

[9．](#_9_11) 參見一份未具日期的備忘錄，幾乎肯定是理查·文策爾在1869年所寫，BA。另參見埃伯哈德·瑙約克斯稍有不同但沒有說服力的版本，《俾斯麥與沃爾夫通訊社》，刊于《作為科學和教學的歷史》，1963年第14期，第19–20頁[“Bismarck und das Wolffsche Telegraphenbüro，”GWU，14（1963），19–20]。

[10．](#_10_10) 文策爾備忘錄，BA。另參見施蒂伯博士，《大事記：來自他的遺留文件》，利奧波德·奧爾巴赫編（柏林，1994年），第246–247頁。施蒂伯描繪1865年的協議，但隱瞞1869年的協議[Dr.Stieber，Denkwürdigkeiten：Aus seinen hinterlassenen Papieren，ed.by Leopold Auerbach（Berlin，1884），pp.246–47]。

[11．](#_11_10) 見成立大陸通訊公司的最初協議，1865年5月22日，BA。

[12．](#_12_10) Naujoks，“Wolffsche Telegraphenbüro，”pp.19–20.

[13．](#_13_10) 尤里烏斯·弗洛貝爾致俾斯麥，1869年2月6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另見尤里烏斯·弗洛貝爾，《人生歷程：大事、回憶和自白》（兩卷本，斯圖加特，1890–1891年），第一卷，第521–522頁。書中談到了路透的努力，但沒有提及他寫給俾斯麥的私信[Julius Fröbel，Ein Lebenslauf：Aufzeichnungen，Erinnerungen，und Bekenntnisse（2vols.；Stuttgart，1890–1891），I，521–22]。

[14．](#_14_10)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9年2月20日，BA。

[15．](#_15_10) 同上，1869年4月23日。

[16．](#_16_10) 文策爾致布萊希羅德，1869年4月24日，BA。

[17．](#_17_10) 參見1869年6月10日的合同，6月11日獲得俾斯麥批準，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18．](#_18_10) 羅森貝格（Rosenberg）致俾斯麥，1870年3月10日，同上。

[19．](#_19_10) 伊蓮娜·費舍爾—弗勞恩迪恩斯特，《俾斯麥的新聞政策》（明斯特，1963年），第29頁[Irene Fischer-Frauendienst，Bismarcks Pressepolitik（Münster，1963），p.29]。

[20．](#_20_10) 引自O’Boyle，“Journalist”，p.305。

[21．](#_21_10) Storey，Reuters，p.53.

[22．](#_22_10)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101.

[23．](#_23_10) 漢斯·菲利皮致作者，1970年4月20日。

[24．](#_24_10) 菲利皮，《韋爾夫基金史》，刊于《下薩克森州年鑒》，新系列，1959年第31期，第190–199頁[Philippi，“Zur Geschichte des Welfenfonds，”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n.s.，31（1959），190–99]。

[25．](#_25_10) 埃伯哈德·瑙約克斯，《韋爾夫基金結算，1869年4月1日–12月31日》，刊于《傳播》，1969年第1期，第16–29頁[Eberhard Naujoks，“Eine Abrechnungüber den Welfendonds（1.April–31.Dezember1869），”Publizistik（1969），I，16–29]。

[26．](#_26_10)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68年1月29日，BA。

[27．](#_27_10) 文策爾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8月2日，BA。

[28．](#_28_10) 路透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12月29日；文策爾致路透，1875年1月1日，副本，BA。

[29．](#_29_1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5年2月20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30．](#_30_10) 彪羅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2月23日，BA。

[31．](#_31_10) 彪羅備忘錄，1875年3月10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32．](#_32_10) 大陸通訊公司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2月30日，BA。

[33．](#_33_10) 博斯（Bosse）備忘錄，1879年3月4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34．](#_34_10) 文策爾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6月4日、11月24日；協議草案，1880年2月5日，BA。

[35．](#_35_10) 荷爾斯泰因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8月28日，BA。

[36．](#_36_10) 參見Naujoks，“Wolffsche Telegraphenbüro”，pp.26–28。

[37．](#_37_10) 阿瓦斯和路透又為收購沃爾夫通訊社做了幾次嘗試；最后一次收購嘗試發生在1889年，但再次以失敗告終。愛德華·勒拜（Eudard Lebey）致布萊希羅德，1889年3月28日，BA。

[38．](#_38_10) Busch，Tagebuchblätter，I，304；Naujoks，Bismarcks Auswärtige Pressepolitik，p.333.

[39．](#_39_10) 俾斯麥致坎普豪森，1872年1月14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40．](#_40_10) 見瑙約克斯，《林道》，刊于《歷史期刊》，第215期，第299–344頁各處[Naujoks，“Lindau，”HZ，215：299–344，passim]。

[41．](#_41_10) 普魯士內閣與大陸通訊公司的協議副本，1872年3月4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42．](#_42_10) 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6月11日，BA。

[43．](#_43_10) 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9日，BA。

[44．](#_44_9) Holstein Papers，II，140–41.

[45．](#_45_9) 政府備忘錄，1876年2月2日，GFO：I.A.A.a.33。

[46．](#_46_9) 未具日期和署名的備忘錄，記錄1872年談判的過程和后續，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47．](#_47_9) 布萊希羅德致布赫爾，1876年2月21日，附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2月19日，GFO：I.A.A.a.33。

[48．](#_48_9) 未署名備忘錄，1876年3月1日，同上。

[49．](#_49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6年3月15日，SA。

[50．](#_50_9) 布赫爾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4月12日，BA。

[51．](#_51_9)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父親，1876年4月20日，BA。

[52．](#_52_9) 布萊希羅德、施萊辛格和文策爾簽署的協議，1876年4月14日，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53．](#_53_8) 布萊希羅德致布赫爾，1876年4月21日；布赫爾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4月27日，同上；Naujoks，“Lindau”，308–309。

[54．](#_54_8) 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4月19日；《英國通訊》，1876年4月29日，BA.

[55．](#_55_8) 坎普豪森致俾斯麥，1878年2月26日，1878年2月28日（標為機密），DZA：梅澤堡：A.A.I.Rep.4.No.721，秘密國家檔案，一般類。

[56．](#_56_8) 施萊辛格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9日，BA。

[57．](#_57_8) Tiedemann，Sechs Jahre，pp.298–99.

[58．](#_58_8)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2月26日，MAE：德國，第27卷。

[59．](#_59_7) 瓦爾特·海德對新聞界和猶太人的研究結合德國人的嚴謹和納粹的論調。瓦爾特·海德編《新聞學手冊》（萊比錫，1940–1943年）[Walter Heide，ed.，Handbuch der Zeitungswissenschaft（Leipzig，1940–1943）]。

[60．](#_60_7) GW，VII，66.

[61．](#_61_7) 詳細描述見Naujoks，Bismarcks Auswärtige Pressepolitik，pp.68–78。

[62．](#_62_7) 巴姆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9月24日，BA。

[63．](#_63_7) 同上，1880年9月13日。

[64．](#_64_7) 艾蒂安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5月3日，BA。

[65．](#_65_7) 赫茨卡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2月20日，BA；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3月3日，BA。

[66．](#_66_6) 格奧爾格·馮·本森（Georg von Bunsen）和魯道夫·馮·格奈斯特，1877年4月3日，BA。

[67．](#_67_6)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7月4日，BA。

[68．](#_68_6) 保羅·林道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12月16日，1891年3月16日、5月15日，BA。

[69．](#_69_6) 關于索納曼，見Hamburger，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311–321。另見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8年10月9日，MAE：德國，第25卷。

[70．](#_70_6) 索納曼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11日，1877年2月10日，BA。

[71．](#_71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12月11、21日，FA。

[72．](#_72_6)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96；Busch，Tagebuchblätter，III，40.

[73．](#_73_6) 見1875年–1880年間赫斯多弗（Hersdörfer）與布萊希羅德非常活躍的通信，BA；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77；庫爾特·科齊克，《德國新聞界的歷史：19世紀的德國新聞界》（柏林，1966年），第二卷，第151–152頁[Kurt Koszyk，Deutsche Presse im19.Jahrhundert.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Berlin，1966），II，151–52]。

[74．](#_74_6) Glagau，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p.316–17.

[75．](#_75_6) 基里施·馮·霍恩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2月5日，BA。

[76．](#_76_6) 同上，1879年10月20、24日。

[77．](#_77_6) Groth，Die Zeitung，II，193，574–577；Münch，Hansemann；Koszyk，Deutsche Presse，II，291；另見弗朗茨·梅林，《全集》（柏林，1960年），第二卷，第396–397頁[Franz Mehring，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1960），II，396–97]。

[78．](#_78_6) 貝措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4月9日，BA；關于令人著迷的貝措爾德，見Eckardstein，Lebenserinnerungen，I，240–246。

[79．](#_79_6) 弗朗茨—克薩維爾·克勞斯，《日記》（科隆，1957年），第618頁；Koszyk，Deutsche Presse，II，182。

[80．](#_80_6) 約阿西姆·伯梅，《北德大眾報》，刊于《新聞學》，1926年第1期，第56、73、92、103頁[Joachim Boehmer，“Die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Zeitungswissenschaft，1（1926），56，73，92，103]。

[81．](#_81_6)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387；Busch，Tagebuchblätter，II，570.

[82．](#_82_6)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1878年8月9日，FA，魏爾納·波爾斯博士提供。另見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99–101。

[83．](#_83_6) 見赫爾曼·霍夫曼，《俾斯麥親王，1890–1898》（斯圖加特，1914年），第一卷，第76–90頁[Hermann Hofmann，Fürst Bismarck，1890–1898（Stuttgart，1914），I，76–90]。

[84．](#_84_6) 品特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8月8日，BA；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5月20日，BA。

[85．](#_85_6) GW，VI3，198–99.

[86．](#_86_6) 奧倫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2月8、9、16、18日，BA；蒂德曼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2月27日，BA；Fischer-Frauendienst，Pressepolitik，p.170。

第十二章　發財的親王

[1．](#_1_12) GW，XV，346–47.

[2．](#_2_12) GW，XIV2，821。俾斯麥的說法是8.5萬塔勒，但真實數字被證明是8.75萬塔勒。關于弗里德里希斯魯現在的規模，見1976年1月31日的《漢堡晚報》（Hamburger Abendblatt）。

[3．](#_3_1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4年5月1日，SA。

[4．](#_4_12) GW，XIV2，820–21.

[5．](#_5_12) 根據布萊希羅德助手的報告；西貝特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7月15日，BA。

[6．](#_6_12) 俾斯麥致科伊德爾，1871年7月15日；迪特里希博士致科伊德爾，1871年8月3日，SA。關于人均收入，見瓦爾特·霍夫曼等人所編的《德國人的收入，1851–1957》（圖賓根，1959年），第39頁[Walther G.Hoffmann，et al.，Das deutsche Volkseinkommen，1851–1957（Tübingen，1959），p.39]。

[7．](#_7_12) 柏林地區稅收委員會，1871年10月20日，SA。

[8．](#_8_12) 1877年3月15日，SA。

[9．](#_9_12) Kardorff，Kardorff，p.107.

[10．](#_10_11) GW，XII，103.

[11．](#_11_11) Taylor，Bismarck，p.112.

[12．](#_12_11) 各種指控和隨后的審判將在第十八章討論；關于對指控不加鑒別的重復，見《明鏡周刊》（Der Spiegel），1965年3月31日，第67頁。

[13．](#_13_11) 1881年1月1日，1890年10月31日，SA。

[14．](#_14_11) 這些和下面的數字來自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的財務清單，是我在三個貼有舍恩豪森檔案標簽的包裹中找到的，存放于現任俾斯麥親王馬棚的閣樓上。布萊希羅德給俾斯麥寄來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清單，這些并沒有全部留存下來。他有時還寄來投資組合列表，有一部分留存下來。哈佛大學的布萊希羅德檔案中也有幾張布萊希羅德的清單。

[15．](#_15_11) 關于19世紀70年代初的一般情況，參見Böhme，Deutschlands Weg，pp.320–44。

[16．](#_16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8月4日，SA。

[17．](#_17_11) Böhme，Deutschlands Weg，pp.341–45.

[18．](#_18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7月25日，SA。

[19．](#_19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8月22日，BA。

[20．](#_20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4年8月25日、9月2日，SA。

[21．](#_21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4年10月1日，SA。

[22．](#_22_11) GW，VIII，212，383.

[23．](#_23_11) 關于彼得·舒瓦洛夫，參見休·塞頓—沃特森，《沙俄帝國》（牛津，1967年），第378頁[Hugh 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Oxford，1967），p.378]；亦見羅伯特·威廉·塞頓—沃特森，《迪斯累利、格萊斯頓和東方問題》，新版（愛丁堡，1962年），第40頁，R.W[Seton-Watson，Disraeli，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new ed.（Edinburgh，1962），p.40]。

[24．](#_24_11) 約翰娜·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9月29日；熱妮·法提奧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0月31日，BA。

[25．](#_25_11)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5年10月2日，FA。

[26．](#_26_11) GW，VIII，383.

[27．](#_27_11) 參見布萊希羅德信上的手寫記錄。

[28．](#_28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5年6月11日，SA。

[29．](#_29_11) 同上，1890年3月8、14日，SA。

[30．](#_30_11) 洛爾，《沒有俾斯麥的德國：第二帝國的政府危機》（伯克利，1967年），第52–55頁[J.C.G.Röhl，Germany without Bismarck：The Crisis of Government in the Second Reich（Berkeley，1967），pp.52–55]。

[31．](#_31_11) 赫伯特用英語向羅斯貝里勛爵（Lord Rosebery）如此報告，1890年3月30日；Bussman，Herbert von Bismarck。p.567。

[32．](#_32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90年6月4、7日，SA。

[33．](#_33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91年7月23日，BA。

[34．](#_34_11) GW，XII，365.

[35．](#_35_11) GW，XIV2，909.

[36．](#_36_11) GW，XIV2，834.

[37．](#_37_11) A.O.Meyer，Bismarck，p.446；Westphal，Bismarck，p.12.

[38．](#_38_11) 關于對土地的饑渴，見A.O.Meyer，Bismarck，p.382。

[39．](#_39_11) Westphal，Bismarck，p.56.

[40．](#_40_11) GW，XII，374.

[41．](#_41_11) 西貝特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7月15日，BA。

[42．](#_42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3年11月12日，SA；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3年11月16日，BA。

[43．](#_43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0月20日，以及俾斯麥手中關于收購的草稿，SA。

[44．](#_44_10) 同上，1882年12月1、2、6、20日，SA。

[45．](#_45_10) 布萊希羅德的對賬單，1883年12月31日，SA。

[46．](#_46_10)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8月25日，BA。

[47．](#_47_10) 引自Vagts，“Bismarck’s Fortune”，CEH，1，213。

[48．](#_48_10)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459；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1887年7月2日，F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49．](#_49_10)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0月29日，BA。他試圖保住里徹的面子。四年后，布萊希羅德兩次提到里徹，當時此人已經是商品市場中的投機常客，據說損失100萬馬克。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4年6月30日、8月11日，SA。另見Westphal，Bismarck，p.112。

[50．](#_50_1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1年1月24日，SA。

[51．](#_51_10) A.O.Meyer，Bismarck，pp.448–49.

[52．](#_52_10) 原保險公司的要求，祖國火險公司（Vaterländische Feuer-Gesellschaft）致朗格，1882年11月24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3年2月27日，SA；威廉·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12月21日，BA。

[53．](#_53_9) Westphal，Bismarck，pp.49，54.

[54．](#_54_9)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6年7月8日，FA。

[55．](#_55_9)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7月9日；德魯斯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7月9日，BA。

[56．](#_56_9)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6年7月11、13日，FA；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8月6日；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10月12日，BA。

[57．](#_57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6年8月2日，SA。

[58．](#_58_9)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8月6日，BA。

[59．](#_59_8) 同上，1876年10月3日。

[60．](#_60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10月9日和10日，SA。

[61．](#_61_8)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2月3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12月8日，SA。

[62．](#_62_8)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8年1月10日；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2月5日、10月2日、11月4日，SA。

[63．](#_63_8) 威廉·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月13日，BA。

[64．](#_64_8)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1月16日；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月15日，SA。

[65．](#_65_8)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11月11日，SA。

[66．](#_66_7)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25日，BA。

[67．](#_67_7) 同上，1879年12月31日。

[68．](#_68_7) 布萊希羅德的對賬單，無日期（1883年）；威廉·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月30日，BA；蘭曹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9月26日；伯恩哈德·貝倫德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10月1日；羅騰堡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10月7、22、25、27日，11月5日，BA；Kohl，Bismarck-Regesten，II，492。

[69．](#_69_7) Westphal，Bismarck，p.55；GW，VIII，489.

[70．](#_70_7) GW，VIII，423–24.見奧托·約林格，《俾斯麥與猶太人》（柏林，1921年），第105、129頁[Otto Jöhlinger，Bismarck und die Juden（Berlin，1921），pp.105，129]。

[71．](#_71_7) GW，XII，106.

[72．](#_72_7) 威廉·馮·俾斯麥親筆備忘錄的副本，1882年2月6日，BA。

[73．](#_73_7) 朗格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7月20日，BA。

[74．](#_74_7) 同上，1886年8月21日，1887年11月6日。

[75．](#_75_7) 希波尼亞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3月29日，BA。

[76．](#_76_7) Böhme，Deutschlands Weg，pp.318–19，508.

[77．](#_77_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月1日，1880年1月6日，1884年1月，SA。

[78．](#_78_7) 布萊希羅德的備忘錄，致格洛納博士（Dr.Gloner），1891年2月1日，BA。

[79．](#_79_7) Taylor，Bismarck，p.251.

[80．](#_80_7) 羅騰堡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5月21日，BA。

[81．](#_81_7) Vagts，“Bismarck’s Fortune，”p.230.

[82．](#_82_7) 引自Kohl，Bismarck-Jahrbuch，VI，399。

[83．](#_83_7) 各種賬戶清單，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5–1890，SA；另見Holstein Papers，II，204–205。

[84．](#_84_7) Holstein Papers，II，178，181，277；Küntzel，Die Finanzen，pp.483–484；《弗斯報》，1885年3月23、24、25日，DZA：梅澤堡：民事內閣，馮·俾斯麥親王受封檔案，Rep.89H XXIII，No.12f。

[85．](#_85_7) 各種賬戶清單，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5–1890，SA；另見Holstein Papers，II，204–205；俾斯麥致威廉一世，1885年6月13日，DZA：梅澤堡：民事內閣，馮·俾斯麥親王受封檔案，Rep.89H XXIII，No.12f.

[86．](#_86_7) Vierhaus，Spitzemberg，pp.218–219；Holstein Papers，II，178–179；另見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255。

[87．](#_87_6) Holstein Papers，II，82.

[88．](#_88_6) GW，XIV2，900–1.

[89．](#_89_6) Lucius，Bismarck，p.382.

[90．](#_90_6) 恩斯特·菲德爾編，《俾斯麥的宏大游戲：路德維希·巴姆貝格的秘密日記本》（法蘭克福，1932年），第333頁[Ernst Feder，ed.，Bismarcks Grosses Spiel.Die Geheimen Tagebücher Ludwig Bambergers（Frankfurt a.M.，1932），p.333]。

[91．](#_91_6) Vagts，“Bismarck’s Fortune，”p.216.

[92．](#_92_6) GW，XII，348，371.

[93．](#_93_6) 威爾莫夫斯基（Wilmowski）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5月17日；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5月22日，BA。布萊希羅德的賬戶清單，1890年12月31日；官方稅務評估，1890年3月8日，SA。赫爾穆特·馮·格爾拉赫，《從右派到左派》（蘇黎世，1937年），第96–101頁[Hellmut von Gerlach，Von Rechts nach Links（Zurich，1937），pp.96–101]。關于普魯士的稅務評估，見格爾德·霍霍斯特，尤爾根·科卡和格哈德·里特，《社會史練習手冊：帝國統計材料，1870–1914》（慕尼黑，1975年），第106頁[Gerd Hohorst，Jürgen Kocka，and Gerhard 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1870–1914（Munich，1975），p.106]。

第十三章　銀行業與外交界

[1．](#_1_13) 這句話來自安特希爾勛爵，1881年12月10日，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35。

[2．](#_2_13) Kardorff，Kardorff，p.108.

[3．](#_3_13) 當然，有大量作品談到外交政策的各種因素和老式外交史的缺陷。1954年，外交史大師皮埃爾·勒努萬（Pierre Renouvin）提出在外交史研究中應該更加關注經濟和金融因素，在評估因果關系時也要保持“謹慎”，見《國際關系的當代史：研究方向》，刊于《歷史研究》，1954年第211期，特別見第234–242頁[“L’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orientation de récherches，”Revue Historique，211（1954），esp.234–42]。埃克哈特·科爾（Eckart Kehr）對德國外交政策之國內源頭的開創性研究（該主題在當時面臨很多禁忌）和漢斯—烏爾里希·維勒（Hans-Ulrich Wehler）“國內政策優先”觀點。比如，見科爾的《國內政策優先：19世紀普魯士—德意志社會史論文集》，維勒編（柏林，1965年）[Kehr，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19.Jahrhundert，ed.by Hans-Ulrich Wehler（Berlin，1965）]。另見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理性而簡明的陳述，《戰爭的經濟原因》（倫敦，1939年）[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London，1939）]；以及詹姆斯·喬爾（James Joll）的就職演講，《1914：未說出的假設》（倫敦，1968年），1914[The Unspoken Assumptions（London，1968）]。

[4．](#_4_13)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193.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1月27日，BA。

[5．](#_5_13) GP，VI，165.

[6．](#_6_13)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56.

[7．](#_7_13) 見赫伯特·費斯，《歐洲：世界的銀行家，1870–1914》（紐黑文，1930年），第160頁[Herbert Feis，Europe：The World’s Banker，1870–1914（New Haven，1930），p.160]。

[8．](#_8_1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2月3日，SA。

[9．](#_9_13) GP，V，320.

[10．](#_10_12) DDF，II，482；羅騰堡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11月28日，BA。

[11．](#_11_12) GP，VI，165，169.

[12．](#_12_1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8月8日，SA。

[13．](#_13_12) 見Morsey，Reichsverwaltung，pp.104–122；以及Monts，Erinnerungen，pp.39–53。

[14．](#_14_12)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08.

[15．](#_15_12)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477.

[16．](#_16_12) 同上，p.268。

[17．](#_17_12) GP，VI，343.

[18．](#_18_12) 馬丁·溫克勒，《俾斯麥的結盟政策和歐洲的平衡》（斯圖加特，1964年），第31頁[Martin Winckler，Bismarcks Bündnispolitik und das europäische Gleichgewicht（Stuttgart，1964），p.31]。

[19．](#_19_12) 威廉·弗拉維爾·莫尼佩尼和喬治·厄爾·巴克爾，《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本杰明·迪斯累利傳》，新修訂版（兩卷本，紐約，1929年），第二卷，第1202頁[William Flavelle Monypenny and George Earle Buckle，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new and rev.ed.（2vols.；New York，1929），II，1202]。

[20．](#_20_12) 阿圖爾·馮·布勞爾，《為俾斯麥效力》（柏林，1936年），第206–277頁[Arthur von Brauer，Im Dienste Bismarcks（Berlin，1936），pp.206–77]；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6月8日，BA。

[21．](#_21_12)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蘭曹，1887年10月17日，F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22．](#_22_12) Holstein Papers，II，131；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476.

[23．](#_23_12) 溫弗雷德·許洛，《格奧爾格·赫伯特·明斯特伯爵》（希爾德斯海姆，1968年），第140頁[Winfred Sühlo，Georg Herbert Graf zu Münster（Hildesheim，1968），p140]；扎拉·斯泰納，《外交部與外交政策，1898–1914》（劍橋，1969年），第174頁[Zara S.Steiner，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1898–1914（Cambridge，1969），p.174]。

[24．](#_24_12) 關于俾斯麥時代的歐洲外交的作品數量眾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專論很多，但大型的綜合性重構作品寥寥無幾，且多有缺陷。最好的研究是威廉·蘭格的《歐洲的同盟與陣營，1871–1890》，第二版（紐約，1956年）[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2nd ed.（New York，1956）]；泰勒的《對歐洲霸權的爭奪，1848–1918》（牛津，1954年）[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以及皮埃爾·勒努文的《國際關系史》，第六卷，《19世紀》，第二部分，《1871–1914年》（巴黎，1955年）[Pierre Renouvin，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Vol.VI：Le XIXe siècle，Part2，De1871à1914（Paris，1955）]。對一般性作品的有用盤點見阿蘭·米切爾，《俾斯麥與法蘭西民族，1848–1890》（紐約，1971年）[Allan Mitchell，Bismarck and the French Nation，1848–1890（New York，1971）]；安德里亞斯·希爾格魯伯，《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弗萊堡，1971年）[Andreas Hillgruber，Bismarcks Aussenpolitik（Freiburg，1972）]。漢斯—烏爾里希·維勒（Hans-Ulrich Wehler）的《俾斯麥與帝國主義》（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出色地運用原始素材和二手記述，支持一個特別的觀點。

[25．](#_25_12) DDF，VII，4.

[26．](#_26_12) 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66.

[27．](#_27_12) Taylor，Mastery in Europe，p.255.

[28．](#_28_12) 圣伊萊爾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月3日；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月1日，BA。

[29．](#_29_12) 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70；Blake，Disraeli，p.613；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8年4月24、25日，MAE：德國，第22卷。

[30．](#_30_12)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1月21日，BA。

[31．](#_31_12) 大衛·蘭德斯的未發表手稿《大賠款》（The Great Indemnity）涵蓋1871年6月第一期貸款的時間段。

[32．](#_32_12) 瓦德西致俾斯麥，1871年7月1日，GFO：法國70。

[33．](#_33_12) 相關內容見昂利·多尼奧爾，《梯也爾先生，圣瓦里耶伯爵和曼陀菲爾將軍》（巴黎，1897年）[Henri Doniol，M.Thiers Le Comte de Saint Vallier Le Général de Manteuffel（Paris，1897）]。我還使用梅澤堡檔案中的曼陀菲爾遺物，其中有對圣瓦里耶寫給曼陀菲爾的迷人信件的完整記錄—我相信該材料此前從未被使用過。

[34．](#_34_12)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34.

[35．](#_35_12) 施托什致布萊希羅德，1892年4月16日，BA。

[36．](#_36_12)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7月25日，BA。

[37．](#_37_1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1年7月22、24、25、28、31日；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8月10日，GFO：法國70。

[38．](#_38_12) DDF，I，60.

[39．](#_39_12) DDF，I，61–65.

[40．](#_40_12) 德·布羅伊公爵，《貢托—比隆先生在德國的使命》，第二版（巴黎，1896年），第22頁[Le Duc de Broglie，La Mission de M.de Gontaut-BironàBerlin，2nd ed.（Paris1896），p.22]。

[41．](#_41_12) 科伊德爾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8月28日，BA。

[42．](#_42_12)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8月30日，9月5、9日，BA。

[43．](#_43_12)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1年9月29日、12月29日，RA。

[44．](#_44_11) Hans Herzfeld，Deutschland und das geschlagene Frankreich，p.127.

[45．](#_45_11) 關于對這些談判幾乎逐字逐句的記錄，見伊莫爾曼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2月7日，BA。

[46．](#_46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1月6日，BA。

[47．](#_47_11) 《領土的被占與解放：1871–1875，通信》（兩卷本，巴黎，1903年），第一卷，第131頁[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 du Territoire，1871–1875，Correspondances（2vols.；Paris，1903），I，131]；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1年12月29日，RA。

[48．](#_48_11) 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I，157，170.對布萊希羅德的典型歷史待遇是：在與德法關系相關的無價檔案中，他的名字一直被提到，貢托—比隆與他的密切關系也有大量佐證，但布羅伊描繪貢托—比隆在柏林任期的《使命》一書多少有點理想化，布萊希羅德只是被偶爾提到（第26、27頁）。那么，與宮廷猶太人合作是否能提高一個人的名聲呢？另見DDF，I，132–133。

[49．](#_49_11) 布萊希羅德致羅斯柴爾德，1872年3月24日，RA。

[50．](#_50_11) 同上，1872年4月20日；Broglie，La Mission，pp.26–27。

[51．](#_51_11)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5月19日，GFO：法國72。

[52．](#_52_11) 布赫爾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6月16、17日，BA。

[53．](#_53_1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7月4日，FA。

[54．](#_54_10) 布赫爾致科伊德爾，1872年6月12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7月10日，FA。

[55．](#_55_1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10月21日，FA。

[56．](#_56_10) 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II，162ff，266ff.

[57．](#_57_10)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10日，BA。

[58．](#_58_10)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2月27日，BA。

[59．](#_59_9)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5月6日，BA。

[60．](#_60_9) GP，III，395–396；另見《德法諒解的開始，1878–1885》[“Beginnings of a German-French Understanding，1878–1885”]，GP，III，379–454，但該文缺陷很多。

[61．](#_61_9) Taylor，Bismarck，p.214.

[62．](#_62_9)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2月7日，BA。

[63．](#_63_9) DDF，II，469–73，477–78，481–82.

[64．](#_64_9) 同上，p.526。

[65．](#_65_9) 同上，III，243。

[66．](#_66_8) 霍亨洛厄致俾斯麥，1881年7月25日，另附有《民族統一報》（L’UnitéNationale），1881年7月26日刊，GFO：法國87。

[67．](#_67_8) 霍亨洛厄致俾斯麥，1882年2月13日，同上。

[68．](#_68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2年2月2日，同上。

[69．](#_69_8) 同上，1882年2月6日。

[70．](#_70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2年6月17日，SA。

[71．](#_71_8) 見Taylor，Mastery in Europe，pp.281–303。

[72．](#_72_8) DDF，VI，440.

[73．](#_73_8) DDF，V，49；圣瓦里耶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0月12日，BA。

[74．](#_74_8) Rogge，Holstein，p.132.

[75．](#_75_8)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75.

[76．](#_76_8) DDF，V，212.

[77．](#_77_8) 同上，pp242–244。

[78．](#_78_8) Rogge，Holstein，pp.205–206，210；圣瓦里耶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3月22日，BA。

[79．](#_79_8)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85年1月10日，BA。

[80．](#_80_8) DDF，V，566–67.

[81．](#_81_8) 布萊希羅德致卡爾·安東·馮·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1885年3月30日，HS；戈登·賴特，《近代法國》（芝加哥，1960年），第310頁[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Chicago，1960），p.310]。

[82．](#_82_8) 弗雷西內，《回憶錄，1878–1893》，第七版（巴黎，1913年），第438–439頁[C.de Freycinet，Souvenirs，1878–1893，7th ed.（Paris，1913），pp.438–39]。

[83．](#_83_8)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6年9月26、29日，GFO：法國87。

[84．](#_84_8) 弗雷西內致布萊希羅德，1886年10月8日、11月29日，BA。

[85．](#_85_8) DDF，V，342–43.

[86．](#_86_8)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6年2月9日，1885年12月31日，BA。

[87．](#_87_7) 俾斯麥致布隆薩特，1886年12月22日；內閣會議，1886年12月23日，DZA：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普通外交政策相關事務文件，第1號，第2卷。

[88．](#_88_7)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1月1日，BA。

[89．](#_89_7) 同上，1887年2月10日。

[90．](#_90_7) DDF，VI，397.

[91．](#_91_7) 同上，p.453。

[92．](#_92_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9年2月22日，GFO：法國105，編號3a。

[93．](#_93_7) DDF，VII，660–63，683.埃貝特致布萊希羅德，1891年8月13、15、19日，9月24日；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

[94．](#_94_6) 夏爾·德·穆伊伯爵，《一個外交官的回憶與漫談》（巴黎，1909年），第114頁[Comte Charles de Moüy，Souvenirs et Causeries d’un Diplomate（Paris，1909），p.114]。1881年，羅素勛爵被封為安特希爾勛爵。

[95．](#_95_5) 奧多·羅素致亞瑟·羅素，1872年4月3日，羅素文件，PRO，阿列克·蘭道爾爵士（Sir Alec Randall）提供。

[96．](#_96_5) 安特希爾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1月5日，BA。

[97．](#_97_5) 艾米麗·安特希爾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9月21日，BA。

[98．](#_98_4) 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4.

[99．](#_99_4) Holborn，Modern Germany，pp.193–194；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11日，BA。

[100．](#_100_4) 赫伯特·馮·諾斯蒂茨，《俾斯麥不馴服的大使：明斯特·馮·德內堡親王，1820–1902》（哥廷根，1968年）[Herbert von Nostitz，Bismarcks unbotmässiger Botschafter.Fürst Münster von Derneburg（1820–1902）（Göttingen，1968）]。該書和其他一些近年來的專著都沒有提到布萊希羅德。

[101．](#_101_4)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4月25日，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內，1880年5月30日，MAE：德國，第28、35卷。

[102．](#_102_4)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3月31日，BA。

[103．](#_103_4) 他的外孫和不盡如人意的傳記作者諾斯蒂茨（Nostitz）強調他的病；Bismarck unbotmässiger Botschafter，pp.19–25。

[104．](#_104_4)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17日，1879年3月7日，1884年5月12日，1885年4月4日，BA。

[105．](#_105_4) 布萊希羅德致比肯斯菲爾德，1878年10月24日，迪斯累利文件，休恩登莊園（白金漢郡）；比肯斯菲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1月2日，BA。

[106．](#_106_4) 比肯斯菲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月5日，BA。

[107．](#_107_4) 布萊希羅德致比肯斯菲爾德，1880年6月10日，休恩登莊園。

[108．](#_108_4) 比肯斯菲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6月16日，BA。

[109．](#_109_4) 同上，1880年9月24日；布萊希羅德致比肯斯菲爾德，1880年10月6日，1881年3月1日，迪斯累利文件，休恩登莊園。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1年2月19日，GFO：英國69；俾斯麥致威廉，1881年2月19日，同上。

[110．](#_110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10月10日，FA。

[111．](#_111_4)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0月23日，1884年7月1日，BA；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8月6日，BA。

[112．](#_112_4) 關于這點和其他細節，見約阿西姆·馬伊，《俄國的德國資本，1850–1894》（東柏林，1970年），特別見第74–77頁[Joachim Mai，Das deutsche Kapital in Russland，1850–1894（East Berlin，1970），esp.pp.74–77]；馬伊在其透徹的研究中使用蘭德斯教授和我向DZA提供的某些布萊希羅德的材料（作為交換，我們獲準使用他們的檔案，并對一些文件拍了微縮照片）。不過，他的政治態度幾乎就是諷刺畫，讓人看到被政治權力支持下的意識形態體系所束縛的德國學者會變成什么樣。

[113．](#_113_4) 同上，p.115。

[114．](#_114_4)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8年4月28日；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5月16日，FA。

[115．](#_115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10月5日，SA。

[116．](#_116_4) 薩克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0月21日。關于薩克，見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p.109–110，該書描繪戰前俄國銀行家的大量生活狀況。

[117．](#_117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10月15日，FA。

[118．](#_118_4)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8年11月8日，MAE：德國，第24卷。

[119．](#_119_4) 關于這點，亦見漢斯—烏爾里希·維勒，《帝國的重重危機，1871–1918》（哥廷根，1970年），第163–180頁[Hans-Ulrich Wehler，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öttingen，1970），pp.163–80]。

[120．](#_120_4) DDF，II，469–73，477–78.

[121．](#_121_4) 指明布萊希羅德為信息來源的備忘錄，1879年8月31日，GFO：俄國65，附件1，卷1。

[122．](#_122_4) 奧古斯特·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8月21、24、29、31日；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9月24日，BA。

[123．](#_123_4) Hugh Seton-Watson，Russian Empire，p.517.

[124．](#_124_4) 見特奧多爾·馮·勞厄的一般性分析，《謝爾蓋·維特與俄國的工業化》（紐約，1963年），第22頁和第一章各處[Theodore H.von Laue，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New York，1963）]。

[125．](#_125_4) Hugh Seton-Watson為發表的講稿《中歐的民族主義、超民族主義和壓迫》（Nationalism，Supra-Nationalism and Repression in Central Europe）。

[126．](#_126_4) 瓦魯耶夫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3月7日，BA；布魯斯·沃勒，《十字路口的俾斯麥：柏林會議后德國外交政策的重新定向，1878–1880》（倫敦，1974年），第125頁[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1974），p.125]。

[127．](#_127_4) 瓦魯耶夫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月23日；格萊格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5月9日，BA。

[128．](#_128_4) 薩布羅夫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2月，BA。

[129．](#_129_4) Holstein Papers，II，83.

[130．](#_130_3) 格萊格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1月12日，BA。

[131．](#_131_3)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8月6、8日，BA。

[132．](#_132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11月25日。

[133．](#_133_3) 阿巴薩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3月15日，BA。

[134．](#_134_3) 瓦魯耶夫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4月23日，BA。

[135．](#_135_3) Hugh Seton-Watson，Russian Empire，pp.493–96.

[136．](#_136_3) Holstein Papers，II，16–17.

[137．](#_137_3) 本格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3月30日，BA。

[138．](#_138_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2年7月20日，SA。另見1881年8月16日，1882年3月21日，GFO：俄國71。

[139．](#_139_3) 蘭曹致外交部，1883年12月5日，同上；迪特爾·弗里德，《被隱瞞的俾斯麥》（維爾茨堡，1960年），第167–168頁[Dieter Friede，Der Verheimlichte Bismarck（Würzburg，1960），pp.167–68]。

[140．](#_140_3)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392；布萊希羅德致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1884年5月9日，HS。

[141．](#_141_3) Holstein Papers，II，131.

[142．](#_142_3) Holstein Papers，III，107.

[143．](#_143_3) 本格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5月1日，BA。

[144．](#_144_3) 賀拉斯·德·古恩茨堡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8月10日，BA。

[145．](#_145_3)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4月4日，BA；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p.396，395。

[146．](#_146_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5年6月5、11日，SA；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6月9日，BA；Holstein Papers，II，202–203。

[147．](#_147_2) 同上，p.230.

[148．](#_148_2) 薩布羅夫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5月，BA；薩克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1月24日，BA。

第十四章　羅馬尼亞：權宜的勝利

[1．](#_1_14) 英語的標準作品是塞頓—沃特森的《羅馬尼亞人史：從羅馬時代到完成統一》（劍橋，1934年）[R.W.Seton-Watson，A History of the Roumanians：From Roman Times to the Completion of Unity（Cambridge，1934）]。該書對我們的故事只是做了概述，而且明顯站在羅馬尼亞一邊；關于羅馬尼亞的建國，另見萊克的生動作品《羅馬尼亞的誕生：1856–1866年的國際問題研究》（倫敦，1931年）[T.W.Riker，The Making of Roumania：A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1856–1866（London，1931）]。

[2．](#_2_14) 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15.

[3．](#_3_14) Riker，Roumania，p.554.

[4．](#_4_14) 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47.

[5．](#_5_14) 雅西領事致俾斯麥，1869年12月24日，GFO：土耳其24。西蒙·杜布諾夫（Simon Dubnow），《猶太民族的最新歷史：第一波倒退和第二次解放時期（1815–1881）》[Die neueste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Das Zeitalter der ersten Reaktion und der zweiten Emanzipation（1815–1881）]，《從起源到現在的猶太民族世界史》第九卷[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von seinen Uranfängen bis zu seiner Gegenwart]，施泰因貝格博士（Dr.A.Steinberg）譯自俄語（柏林，1929年），第483頁。該書中提到的數字是20萬，而包括布萊希羅德線人在內的其他記錄則認為是30萬。

[6．](#_6_14) 感謝休·塞頓—沃特森閱讀本章草稿并對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發表評論，我的一些話以他的評論為根據。

[7．](#_7_14)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67年5月26日、6月1日，BA。伯恩斯托夫致俾斯麥，1867年5月27日；俾斯麥致圣皮埃爾，1867年5月28日，GFE：土耳其24。

[8．](#_8_14) 《羅馬尼亞卡羅爾國王生平記事：來自目擊者的描述》（四卷本，斯圖加特，1894–1900年），第一卷，第210頁[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 von Rumänien.Aufzeichnungen eines Augenzeugen（4vols.；Stuttgart，1894–1900），I，210]。

[9．](#_9_14) 同上，p.213。

[10．](#_10_13) 俾斯麥致克雷米厄，1868年2月22日，羅馬尼亞猶太人，AI：ID2。

[11．](#_11_13) 雅西猶太人聯盟致布萊希羅德，1868年4月6、10日，BA。

[12．](#_12_13) APP，IX，821，835；伯恩斯托夫致俾斯麥，1868年3月27日；羅伊斯致俾斯麥，1868年5月28日，GFO：土耳其24。

[13．](#_13_13)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257.

[14．](#_14_13) 亞伯拉罕·馮·奧本海姆致卡爾·安東，1868年3月28日；卡爾·馮·羅斯柴爾德男爵，1868年4月8日；奧爾巴赫致卡爾·安東，1868年4月7、24、26日；《交易所報》（Börsenzeitung），1868年4月20日；《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1868年4月4日，HS。

[15．](#_15_13) 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50.

[16．](#_16_13) 哈約·霍爾波恩，《德國與土耳其，1878–1890》（柏林，1926年），第1頁[Hajo Holborn，Deutschland und die Türkei，1878–1890（Berlin，1926），p.1]。

[17．](#_17_13) Riker，Roumania，p.vii.

[18．](#_18_13) 圣皮埃爾致俾斯麥，1863年8月15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19．](#_19_13) 俾斯麥致圣皮埃爾，1863年9月29日，同上。

[20．](#_20_13) 1876年在俄國壞事后，施特魯斯貝格寫了一本有趣的辯解書，名為《施特魯斯貝格博士和他的成就》（柏林，1867年）[Dr.Strousberg und sein Wirken（Berlin，1876）]。

[21．](#_21_13)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 I，243；凱澤林（Keyserling）致俾斯麥，1868年3月13日；俾斯麥致凱澤林，1868年3月15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22．](#_22_1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69年11月6日，SA。

[23．](#_23_13) 來自雅西的約林（Jorring？）致俾斯麥，1868年3月22日；凱澤林致俾斯麥，1868年6月5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24．](#_24_13) 拉多維茨致俾斯麥，1870年4月8日，同上；Münch，Hansemann，pp.149–150。

[25．](#_25_13) 布呂什致外交部，1868年9月21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26．](#_26_13) Holborn，Radowitz，I，189ff.

[27．](#_27_13) 拉多維茨致俾斯麥，1870年4月8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28．](#_28_13) Münch，Hansemann，pp.157–158；拉多維茨致俾斯麥，1870年4月22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29．](#_29_13) 拉多維茨致俾斯麥，1870年5月6日，同上。

[30．](#_30_13) 同上，1870年10月2日。

[31．](#_31_13) 同上，1870年10月21日。

[32．](#_32_13) Holborn，Radowitz，I，196.

[33．](#_33_13)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159.

[34．](#_34_13) 俾斯麥致外交部，1870年11月9、11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35．](#_35_13) 施特魯斯貝格致俾斯麥，1870年12月13日，同上。

[36．](#_36_13) 俾斯麥致坎普豪森，1870年12月23日，同上。

[37．](#_37_13) 不同的觀點見Wehler，Bismarck，pp.215–223。

[38．](#_38_13) 坎普豪森致俾斯麥，1870年12月31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39．](#_39_13)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144–170.

[40．](#_40_13) 海因里希·施托伊貝爾，《國家和銀行在普魯士債券領域的關系，1871–1913》（柏林，1935年），第34頁[Heinrich Steubel，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Staat und Banken auf dem Gebiete des preussischen Anleihewesens von1871bis1913（Berlin，1935），p.34]；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203。

[41．](#_41_13) 拉多維茨致俾斯麥，1871年3月10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

[42．](#_42_13) 同上；Holborn，Radowitz，I，215。

[43．](#_43_13) 拉多維茨致俾斯麥，1871年3月24日，DZA：梅澤堡：A.A.II.Rep.6.No.4205，國家秘密檔案，羅馬尼亞鐵路。Holborn，Radowitz，I，217–222；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174–178。

[44．](#_44_12) Holborn，Radowitz，I，231；《噼里啪啦》報，1871年7月30日、8月13日。

[45．](#_45_12)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213.

[46．](#_46_12)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學家沒有查看過檔案記錄。比如，研究羅馬尼亞的最優秀的英國歷史學家就有過錯誤的觀點：“俾斯麥對聲名狼藉的施特魯斯貝格的堅定支持一直有點令人費解。有人試圖這樣解釋：后者依賴布萊希羅德開設在柏林的大銀行，而俾斯麥在所有的金融問題上也幾乎無保留地依賴該行。”見R.W.Seton-Watson，Roumanians，pp.330–331。Münch的敘述同樣有誤，見Hansemann，pp.148–167。

[47．](#_47_12) 加布里亞克（Gabriac）致雷穆薩（Rémusat），1871年8月12日，MAE：德國，第1卷。

[48．](#_48_12) 明希致博伊斯特，1871年10月9日，HHSA：PA III：普魯士。

[49．](#_49_12)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7月31日、8月15日，BA。

[50．](#_50_12) 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12月24、25日，BA。

[51．](#_51_1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8月26日，FA。

[52．](#_52_12) Münch，Hansemann，pp.154ff.

[53．](#_53_11) 俾斯麥的便條，1872年1月24日；布赫爾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6月16日，BA；蒂勞（Thielau）致俾斯麥，1871年12月28日，1872年1月7日；阿貝肯致威廉一世，1872年4月25日，GFO：土耳其104。

[54．](#_54_11)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246.

[55．](#_55_11) 布萊希羅德致漢澤曼，1871年4月1日，BA，布萊希羅德私人辦公室。

[56．](#_56_11)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414.

[57．](#_57_11) Münch，Hansemann，pp.158–60.

[58．](#_58_11) 關于這點，見索薩·沙伊科夫斯基，《世界以色列聯盟內部的沖突以及英國猶太人協會、維也納聯盟和互助聯盟的成立》，刊于《猶太人社會研究》，1957年第19期，第29–50頁[Zosa Szajkowski，“Conflicts in 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Anglo-Jewish Association，the Vienna Allianz and the Hilfsverein，”Jewish Social Studies，19（1957），29–50]。

[59．](#_59_10) 圭達拉（H.Guedalla）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2月23日，BA；圭達拉是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的合伙人，并娶了后者的侄女。

[60．](#_60_10) 見勞埃德·加特納博士（Dr.Lloyd P.Gartner）的出色研究：《羅馬尼亞、美國和世界猶太人：駐布加勒斯特領事佩肖托，1870–1876》，刊于《美國猶太史季刊》，1968年第58期，第54頁[“Romania，America，and World Jewry：Consul Peixotto in Bucharest，1870–1876，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Quarterly，58（1968），54]。

[61．](#_61_1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2年3月30日；俾斯麥致蒂勞，1872年4月2日；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2年4月2日，GFO：土耳其24。

[62．](#_62_10)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2年3月30日、4月2日，AI：ID1。

[63．](#_63_10) 關于柏林委員會，見蓋爾伯，《德國猶太人對柏林會議的干預，1878》，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60年第5期，第223頁[N.M.Gelber，“The Intervention of German Jews at the Berlin Congress，1878，”LBY，5（1960），223]。另見他關于同一主題的未發表手稿，他非常慷慨地把手稿借給蘭德斯教授。

[64．](#_64_10) 諾伊曼博士（Dr.S.Neumann）致萊文（N.Leven），1872年5月10日，AI：IA1。

[65．](#_65_10) 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2年8月16日，同上。

[66．](#_66_9) 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63.

[67．](#_67_9) Gelber，“Intervention”，pp.225–227；柏林委員會致以色列聯盟，1876年4月24日、7月20日和8月22日，AI：IA1。

[68．](#_68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7年11月13日，FA。

[69．](#_69_9) Gelber，“Intervention，”p.227.

[70．](#_70_9) Taylor，Mastery in Europe，p.245.

[71．](#_71_9)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月12日，德國通信，RA。

[72．](#_72_9) 引自Gelber，“Intervention”，p.229。

[73．](#_73_9) 諾依曼博士（Dr.S.Neumann）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6月4日，BA。

[74．](#_74_9)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2月7日，BA。

[75．](#_75_9) 彪羅書信的副本，1878年2月28日，BA。

[76．](#_76_9)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8年3月4日，AI：ID1。

[77．](#_77_9) 維也納以色列聯盟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2月1日，3月6、26日，BA。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8年3月27日，MAE：德國，第22卷。

[78．](#_78_9) 丹尼爾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3月13日，BA。

[79．](#_79_9)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8年2月21日，AI：ID1。

[80．](#_80_9) 《猶太人大眾報》，1878年3月5日。

[81．](#_81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4月10日，FA。

[82．](#_82_9) 布萊希羅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2月12日，AI：ID1。

[83．](#_83_9) 《議會下院商談速記報告》，1878年5月14日，第三卷，第1314–1325頁；拉斯克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18日；彪羅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22日，BA。

[84．](#_84_9) 布萊希羅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5月19日，AI：ID1。伊西多·勞埃布（Isidore Loeb）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5月20、29日，BA。

[85．](#_85_9) 布萊希羅德致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1878年5月23日；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6月5日，BA。

[86．](#_86_9) Holborn，Radowitz，II，28.

[87．](#_87_8) 引自R.W.Seton-Watson，Disraeli，Gladstone，p.434。

[88．](#_88_8) 彪羅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6月15日；Gelber，“Intervention”，pp.236–238。

[89．](#_89_8) 克雷米厄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2日；摩西·蒙特菲奧雷爵士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2、11日，BA，

[90．](#_90_8) Gelber，未發表手稿，第87頁。

[91．](#_91_8) 同上，p.87c。亞歷山大·諾沃特尼，《柏林會議歷史探源與研究》，第一卷（格拉茨和科隆，1957年），第115頁[Alexander Novotny，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erliner Kongresses，Vol.1（Graz and Cologne，1957），115]。

[92．](#_92_8) 布萊希羅德致蒙特菲奧雷，1878年7月9日，BA；布萊希羅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7月9日，AI：ID1。

[93．](#_93_8) 蒙特菲奧雷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28日，BA。

[94．](#_94_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8年7月2日，FA。

[95．](#_95_6) 柏林社群領袖致俾斯麥，1878年7月11日，DZA：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普通外交政策相關事務文件，第1號，第1卷。

[96．](#_96_6) 《泰晤士報》，1878年7月4日。

[97．](#_97_6) 卡特琳·拉齊威爾，《腓特烈皇后》（紐約，無日期），第150頁[Catherine Radziwill，The Empress Frederick（New York，n.d.），p.150]。

[98．](#_98_5) 引自Gartner，“Romania”，p.111。

[99．](#_99_5) 《泰晤士報》，1878年7月5日。

[100．](#_100_5) 安德拉什致施塔德勒（Stadler）領事，1878年8月8日，HHSA：PA XVIII：羅馬尼亞。

[101．](#_101_5)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pp.58–59.Waller把羅馬尼亞故事的最后階段放在俾斯麥外交活動的背景下；他對鐵路糾葛和猶太人問題的敘述非常簡略，并重復了阿道夫·漢澤曼是猶太人的常見錯誤。

[102．](#_102_5)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8年8月31日，9月16、18日，AI：ID1；以色列聯盟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9月4日，BA；比肯斯菲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1月2日，BA；彪羅致德國大使，1878年10月6日，GFO：土耳其24。

[103．](#_103_5) 克雷米厄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0月12日，BA；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8年10月14日，AI：ID1。

[104．](#_104_5)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4月12日，MAE：德國，第28卷。

[105．](#_105_5) 索爾茲伯里致羅素，1878年11月22日，PRO：FO，64/900，no.499。

[106．](#_106_5) 引自梅德利科特，《承認羅馬尼亞獨立，1878–1880》，刊于《斯拉夫評論》，1933年第11期，第369頁[W.N.Medlicott，“The Recognition of Roumanian Independence，1878–1880，”Slavonic Review，11（1933），369]。梅德利科特的論文是關于該問題的最佳研究，不過“出發點是英國的外交政策”（第355頁）。但在談到羅馬尼亞事務中俾斯麥的動機和布萊希羅德的角色時，甚至他也犯了嚴重錯誤：“猶太人待遇的問題被危險地與鐵路問題糾纏在一起，部分原因是羅馬尼亞鐵路的許多下級官員是德國猶太人，部分原因是鐵路的大部分利益掌握在猶太大銀行家漢澤曼和布萊希羅德之手，俾斯麥與他們的個人和政治關系變得日益親密。”（第356頁）

[107．](#_107_5) 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p.573–75.

[108．](#_108_5) 同上，p.574。

[109．](#_109_5)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2月27日，MAE：德國，第27卷。

[110．](#_110_5) 同上，1879年4月12、24日，第28卷。

[111．](#_111_5) 同上，1879年6月28日，第29卷。

[112．](#_112_5) Waller，Bismarck，p.169；安德拉什致霍約斯（Hoyos），1879年7月6日，HHSA：PA XVIII：羅馬尼亞。

[113．](#_113_5) 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577.

[114．](#_114_5) 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51.

[115．](#_115_5) 霍約斯致安德拉什，1879年7月9日，HHSA：PA XVIII：羅馬尼亞。

[116．](#_116_5) 霍約斯致安德拉什，1879年7月16日；另見波西齊奧（Bosizio）致安德拉什，1879年8月15日，同上。

[117．](#_117_5)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7月19日，MAE：德國，第29卷。

[118．](#_118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7月21日，FA。

[119．](#_119_5)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拉多維茨，1879年7月23日，GFO：土耳其104。

[120．](#_120_5) 拉多維茨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7月11、25日，BA。

[121．](#_121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7月22日；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7月28日，FA。這封信否定Waller的說法，即到了7月，布萊希羅德“已經……收回個人預支給鐵路公司的錢”（Bismarck，p.171）。

[122．](#_122_5)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7月25、28日；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7月26、29日，BA；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7月28日，MAE：德國，第29卷。

[123．](#_123_5)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33–37.

[124．](#_124_5)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1879年7月28日，MAE：德國，第29卷。

[125．](#_125_5) 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584.

[126．](#_126_5) 布萊希羅德致克雷米厄，1879年8月11日，AI：ID1。

[127．](#_127_5) 博伊斯特致外交部，維也納，1879年8月26日，HHSA：PA XVIII：羅馬尼亞。

[128．](#_128_5)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9年10月1、3、18日，AI：ID1。

[129．](#_129_5) 羅騰海恩（Rotenhein）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1月25日，BA。

[130．](#_130_4)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79年11月16日，AI：ID1。

[131．](#_131_4) 菲利普森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1月25日，BA。

[132．](#_132_4)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88–89.

[133．](#_133_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2月12、13日，GFO：土耳其104。

[134．](#_134_4)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拉多維茨，1879年11月18日，同上。

[135．](#_135_4)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51.

[136．](#_136_4) 引自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587。

[137．](#_137_4)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72.

[138．](#_138_4) 圣瓦里耶致瓦丁頓，DDF，II，597–598。

[139．](#_139_4)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1月28日，BA。

[140．](#_140_4) 同上，1879年12月21日。

[141．](#_141_4)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76–280.

[142．](#_142_4) 塞切尼（Szecheny）致海默勒（Haymerle），1880年1月31日，HHSA：PA XVIII：羅馬尼亞。

[143．](#_143_4) 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94；海默勒致奧地利各大使館，1880年2月5、7、11日；博伊斯特致維也納，1880年2月12日，HHSA：PA XVIII：羅馬尼亞。

[144．](#_144_4) 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內，1880年3月14日，弗雷西內致圣瓦里耶，1880年6月16日，MAE：德國，第33、34卷。

[145．](#_145_4) Gartner，“Romania，”p.112.

[146．](#_146_3)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80年2月14日，AI：ID1。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1．](#_1_15) 霍布森，《帝國主義研究》（密西根州，安娜堡，1965年），第56–59頁[J.A.Hobson，Imperialism：A Study（Ann Arbor，Mich.，1965），pp.56–59]。

[2．](#_2_15) 吉爾森，《薩摩亞，1830–1900：多民族社群的政治》（墨爾本，1970年），第259頁[R.P.Gilson，Samoa，1830–1900：The Politics of a Multi-National Community（Melbourne，1970），p.259]。

[3．](#_3_15) 保羅·肯尼迪，《薩摩亞糾葛：英美關系研究，1878–1900》（紐約，1974年），第28頁和第一章各處[Paul M.Kennedy，The Samoan Tangle：A Study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878–1900（New York，1974），p.28and ch.1，passim]。

[4．](#_4_15) 赫爾穆特·瓦斯豪森，《漢堡與德意志帝國的殖民政策，1880–1890》（漢堡，1968年），第55–57頁[Helmut Washausen，Hamburg und die Kolonial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1880bis1890（Hamburg，1968），pp.55–57]；另見庫爾特·施馬克編，《戈德弗洛伊父子公司：漢堡商人，一家世界貿易公司的成就與命運》（漢堡，1938年）[Kurt Schmack，ed.，J.C.Godeffroy&Sohn，Kaufleute zu Hamburg.Leistung und Schicksal eines Welthandelshauses（Hamburg，1938）]。

[5．](#_5_15) 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3月24日、6月15日，BA。

[6．](#_6_15) 戈德弗洛伊致彪羅，1879年1月25日；彪羅致戈德弗洛伊，1879年2月6日；戈德弗洛伊致彪羅，1879年3月9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貿易與航運事務：澳大利亞。

[7．](#_7_15) 文策爾致俾斯麥，1879年12月1日，同上；戈德弗洛伊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2日，BA。

[8．](#_8_15)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9年12月5日，FA；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7日，BA。

[9．](#_9_15) 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10日，BA。

[10．](#_10_14) 施托爾貝格致俾斯麥，1879年12月17日；俾斯麥致施托爾貝格，1879年12月21日；菲利普斯波恩（Philipsborn）致俾斯麥，1879年12月25日，菲利普斯波恩致威廉，1879年12月31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貿易與航運事務：澳大利亞；Münch，Hansemann，p.224；另見尤金·斯塔利，《戰爭與私人投資者：國際政治與國際私人投資的關系研究》（芝加哥，1935年），第109–127頁[Eugene 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vestment（Chicago，1935），pp.109–27]。關于薩摩亞，見馬克·沃克，《德國與對外移民，1816–1885》（馬薩諸塞州，劍橋，1964年），第206–213頁[Mack Walker，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1816–1885（Cambridge，Mass.，1964），pp.206–13]；另見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斯，《歷史的腳注：在薩摩亞動蕩的八年》（紐約，1901年）[Robert Louis Stevenson，A Footnote to History：Eight Years of Trouble in Samoa（New York，1901）]。

[11．](#_11_14) 《改革報》剪報，1879年12月13日，第296期，DZA：波茨坦：Ausw.A.Rep.VI，貿易與航運事務：澳大利亞；Washausen，Hamburg，p.58。

[12．](#_12_14)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16、20、25、31日，BA。

[13．](#_13_14) 圣瓦里耶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7月14日、11月21日，MAE：德國，第24、25卷。

[14．](#_14_14) 同上，1879年12月8、27日，第31卷。

[15．](#_15_14) 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內，1880年3月27日，同上，第33卷。

[16．](#_16_14) 見Wehler，Bismarck，p.219，pp.215–225；魯道夫·伊貝肯，《德意志帝國的外交問題、政府與經濟，1880–1914》（石勒蘇益格，1928年），第44頁[Rudolf Ibbeken，Das aussenpolitische Problem，Staat und Wirtschaft in der deutschen Reichspolitik，1880–1914（Schleswig，1928），p.44]。

[17．](#_17_14) 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內，1880年4月28日，MAE：德國，第34卷。

[18．](#_18_14) Kennedy，Samoan Tangle，ch.2.

[19．](#_19_14)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和漢澤曼，1880年5月7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貿易與航運事務：澳大利亞；Münch的Hansemann中有這封信的部分影印。

[20．](#_20_14) 漢澤曼致霍亨洛厄，1880年7月29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貿易與航運事務：澳大利亞；漢澤曼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8月14日，BA。

[21．](#_21_14) 關于這點，見弗斯，《新幾內亞公司，1885–1899：一個不盈利帝國主義的案例》，刊于《歷史研究》，1972年第15期，第361–377頁[S.G.Firth，“The New Guinea Company，1885–1899：A Case of Unprofitable Imperialism，”Historical Studies，XV（1972），361–77]；Wehler，Bismarck，pp.391–400；Münch，Hansemann，pp.226–46。

[22．](#_22_14) 見本書第十一章。

[23．](#_23_14) 紹芬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4月9日，BA。

[24．](#_24_14) 班寧，《政治與外交回憶錄：剛果如何建立》（巴黎和布魯塞爾，1927年），第xiv頁[É.Banning，Mémoires Politiques et Diplomatiques：Comment fut fondéle Congo（Paris and Brussels，1927），p.xiv]；W.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284。

[25．](#_25_14) 魯斯·斯雷德，《利奧波德國王的剛果：剛果獨立邦的種族關系面面觀》（倫敦和紐約，1962年），第35–39頁[Ruth Slade，King Leopold’s Congo：Aspects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London and New York，1962），pp.35–39]；另見尼爾·阿舍森，《公司化的國王：信托時代的利奧波德》（倫敦，1963年），第39–58頁[Neal Ascherson，The King Incorporated：Leopold II in the Age of Trusts（London，1963），pp.39–58]。

[26．](#_26_14)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12月5日，BA；馬塞爾·呂維爾（Marcel Luwel）的論文在一定程度上以布萊希羅德檔案為基礎，概括他們的關系，見《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利奧波德二世與俾斯麥的共同朋友》，刊于《非洲—特爾菲倫》，1963年第8期，第93–110頁[“Gerson von Bleichröder，l’ami commun de Leopold II et de Bismarck，”Afrika-Tervuren，8（1963），93–110]。

[27．](#_27_14)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5月4日，BA。

[28．](#_28_14) 關于這個時期的外交，見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p.299–307。

[29．](#_29_14)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5月15日，BA。

[30．](#_30_1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4年8月6日，SA。

[31．](#_31_14) Luwel，“Bleichröder，”p.98.

[32．](#_32_14)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6月1日，BA。

[33．](#_33_14) Luwel，“Bleichröder，”pp.99–100.

[34．](#_34_14) 引自羅貝爾·通松，《剛果獨立邦的建立：瓜分非洲歷史中的一章》（布魯塞爾，1933年），第182頁[Robert S.Thomson，Fondation de l’état indépendent du Congo.Un chapitre de l’histoire du partage de l’Afrique（Brussels，1933），p.182]。

[35．](#_35_14) Luwel，“Bleichröder，”p.103.

[36．](#_36_14) 同上，p.104。

[37．](#_37_14)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9月8日，BA。

[38．](#_38_14) 同上，1884年9月16日。

[39．](#_39_14) Luwel，“Bleichröder，”p.106.

[40．](#_40_14)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1月19日、12月12日，BA。

[41．](#_41_14) 同上，1884年10月29日。

[42．](#_42_14) 赫伯特·魯蒂，《殖民與人類的塑造》，刊于《經濟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487頁[Herbert Lüthy，“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ankind，”JEH，21（1961），487]。

[43．](#_43_14) 見Banning，Mémoires，pp.24–25。

[44．](#_44_13)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5，pp.55–62；Wehler，Bismarck，pp.239–257；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8月20日、10月31日、12月24日，BA；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5年9月8日，SA。

[45．](#_45_13) 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1月12日、12月12日，BA。

[46．](#_46_13) 杜特爾蒙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1月28日；利奧波德二世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1月29日、12月12日，BA；庫蒙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0月3日，BA。

[47．](#_47_13) Busch，Bismarck，I，552.

[48．](#_48_13) 今天的相關作品非常多。除了較早的作品，如瑪麗·湯森德的《德國殖民帝國的興衰，1894–1918》（紐約，1930年）[Mary E.Townsend，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1884–1918（New York，1930）]，權威性的基本作品是Hans-Ulrich Wehler的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該書材料豐富，作者認為俾斯麥的政策主要出于國內考慮，反映了相關的經濟現實。Weler的書催生各種對它的批判作品，尤其招致批判的是他著力強調俾斯麥政策的“社會帝國主義”基礎。關于這點，見保羅·肯尼迪，《德國的殖民擴張：“被操縱的社會帝國主義”為時過早嗎？》，刊于《過去與現在》，1972年第54期，第134–141頁[Paul M.Kennedy，“German Colonial Expansion：Has the‘Manipulated Social Imperialism’been Ante-dated？，”Past and Present，54（1972），134–41]。另見亨利·特納更靈活的詮釋，亨利·特納，《俾斯麥的帝國主義冒險：源于反英嗎？》，收錄于《英國和德國在非洲：帝國對立和殖民統治》，吉福德教授和羅杰·路易斯編（紐黑文，1967年），第47–82頁，特別是第51頁]Henry A.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Anti-British in Origin？”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ed.by Prosser Gifford and Wm.Roger Louis（New Haven，1967）]；另見泰勒令人激動但現在飽受批評的研究，《德國的首次殖民地嘗試，1884–1885：俾斯麥歐洲政策的轉變》（倫敦，1938年）[A.J.P.Taylor，Germany’s First Bid for Colonies，1884–1885：A Move in Bismarck’s European Policy（London，1938）]；以及弗里茨·斐迪南·穆勒，《德國—桑給巴爾—東非，1884–1890》（東柏林，1959年）[Fritz Ferdinand Müller，Deutschland–Zanzibar–Ostafrika1884–1890（East Berlin，1959）]。

[49．](#_49_13) 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p.57.

[50．](#_50_13) Knapla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p.87–89，119.

[51．](#_51_13) 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296.

[52．](#_52_13) 安特希爾勛爵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7月3日，BA。

[53．](#_53_12) A.J.P.Taylor斷言，俾斯麥的“首次殖民地嘗試”主要是一次外交行動，旨在為法德同盟尋找可行的理由；Turner強烈反駁這種觀點：“事實恰好相反：俾斯麥向法國示好是他殖民政策的結果而非原因。”[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p.77]事實上，對布萊希羅德的研究暗示，從1878年，萊茵河兩岸就在積極展望法德和解。

[54．](#_54_12) 明斯特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0月17日、12月24日，BA。

[55．](#_55_12) 薩布羅夫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2月9日，BA。

[56．](#_56_12) 亨德森，《德國殖民歷史研究》（倫敦，1962年），第46頁[W.O.Henderson，Studies in German Colonial History（London，1962），p.46]；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pp.431–432；Müller，Deutschland，p.425；菲爾德豪斯，《經濟學與帝國》（伊薩卡，1973年），第331頁和第一章各處[D.K.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1830–1914（Ithaca，1973），p.331and part I，passim]。另見本杰明·科恩的一般性討論，《帝國主義問題：主宰與依賴的政治經濟》（紐約，1973年）[Benjamin J.Cohen，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New York，1973）]。

[57．](#_57_12) Wehler，Bismarck，pp.163–68.

[58．](#_58_12) 阿萊克斯·拜恩，《弗里德里希·哈馬赫，1824–1904》（柏林，1932年），第88–90頁[Alex Bein，Friedrich Hammacher，1824–1904（Berlin，1932），pp.88–90]。

[59．](#_59_11) Wehler，Bismarck，p.165.

[60．](#_60_11) 同上，pp.236–238；戴程德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8月23日，BA。

[61．](#_61_11) Wehler，Bismarck，pp.282–85；Bein，Hammacher，pp.92–93.

[62．](#_62_11) 施瓦巴赫，1885年6月18日，BA。

[63．](#_63_11) Münch，Hansemann，pp.246–48.

[64．](#_64_11) 詹姆斯·雷內爾·羅德爵士，《社交與外交回憶錄，1884–1893》（倫敦，1922年），第一卷，第65頁[Sir James Rennell Rodd，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1884–1893（London，1922），I，65]。

[65．](#_65_11) Münch，Hansemann，pp.246–48.

[66．](#_66_10) 關于這點，見庫爾特·布特納，《德國在東非的殖民政策的開始》（東柏林，1959年），第104–105頁[Kurt Büttner，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k in Ostafrika（East Berlin，1959），pp.104–5]；Müller，Deutschland，各處；Wehler，Bismarck，pp.343–367。

[67．](#_67_10) 羅騰堡致貝謝姆（Berchem），1886年7月17日，GFO：I.A.A.a.50，adh.secr.，Vol.III。

[68．](#_68_10) Müller，Deutschland，pp.174–76.關于彼得斯扭曲的人格以及這種民族主義變態心理如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德國的殖民主義，見Wehler尖刻而敏銳的評論，Bismarck，pp.337–339。

[69．](#_69_10) 比如，黃金海岸的一位德國探險者曾向布萊希羅德求助。此人將自己的發現與史丹利的相提并論，身無分文而又疾病纏身的他從阿克拉（Accra）來信，乞求貸款2000馬克。克勞澤（Krause）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11月2日，BA。

[70．](#_70_10) Müller，Deutschland，p.297；鄧哈特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2月14日，1886年5月13日；另見鄧哈特致格洛納，1886年5月13日，BA。

[71．](#_71_10) Wehler，Bismarck，pp.369–70.

[72．](#_72_10)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8月31日，BA。

[73．](#_73_10) 貝謝姆備忘錄，1890年4月29日，GFO：俄國71。關于貝謝姆，見Wehler，Bismarck，p.237。

[74．](#_74_10) 見約翰·加拉格和羅納德·羅賓遜，《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刊于《經濟史評論》，1953年第6期，第1–15頁[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6（1953），1–15]。該文討論英國的案例，但也涉及德國。

[75．](#_75_10) 大衛·蘭德斯，《關于經濟帝國主義本質的一些思考》，刊于《經濟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505頁[David S.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JEH，21（1961），505]。

[76．](#_76_10) Feis，Europe，p.313.

[77．](#_77_10) 唐納德·布萊斯戴爾，《歐洲對奧斯曼帝國的財政控制》（紐約，1929年），第1–107頁和其他各處[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New York，1929），pp.1–107，passim]。阿爾伯特·瓦蘭，《論國債與對外國債券持有者利益的保護》（日內瓦，1907年），第225頁[Albert Wuarin，Essai sur les Emprunts d’états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s porteurs de fonds d’étatsétrangers（Geneva，1907），p.225]。

[78．](#_78_10) Holborn，Deutschland，p.46；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30；關于對蘇丹以及德國在其帝國影響力提升的通俗描述，見瓊·哈斯利普，《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傳》（倫敦，1958年），第189–205頁[Joan Haslip，The Sultan：The Life of Abdul Hamid（London，1958），pp.189–205]。

[79．](#_79_10) Holstein Papers，II，18，23；庫爾特·格倫瓦爾德，《土耳其的希爾施：企業家和慈善家莫里斯·德·希爾施男爵研究》（耶路撒冷，1966年），第46–47頁[Kurt Grunwald，Türkenhirsch：A Study of Baron Maurice de Hirsch，Entrepreneur and Philanthropist（Jerusalem，1966），pp.46–47]。

[80．](#_80_10) 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pp.113–14.

[81．](#_81_10) 拉多維茨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0月6日，1883年未具日期的信；霍亨洛厄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1月1日，1884年4月20日；羅伊斯親王亨利七世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1月10日，BA；泰斯塔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0月6日；蘭曹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10月27日，BA。

[82．](#_82_10) 鮑爾（Bauer）備忘錄，1887年1月26日；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7年1月30、31日，GFO：土耳其144；拉多維茨致布萊希羅德，1886年11月20日，BA。

[83．](#_83_10)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8年1月14日，BA。

[84．](#_84_10) 見Grunwald，Türkenhirsch，pp.58–62及書中各處。

[85．](#_85_10) 施瓦巴赫致外交部，1888年2月15日，GFO：土耳其144。

[86．](#_86_10) 卡爾·赫爾菲里希，《格奧爾格·馮·西門子：德國偉大時代的人生肖像》（柏林，1923年），第三卷，第28–29頁[Karl Helfferich，Georg von Siemens.Ein Lebensbild aus Deutschlands grosser Zeit，Vol.III（Berlin，1923），pp.28–29]。

[87．](#_87_9) 羅伊斯致俾斯麥，1888年12月20日，GFO：土耳其144；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88年8月15日，BA。

[88．](#_88_9)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8年9月8日，SA。

[89．](#_89_9) Feis，Europe，p.318.

[90．](#_90_9) 關于以布萊希羅德銀行最初提供的材料為基礎的細節，見Wuarin，Les Emprunts d’états，pp.223–235。

[91．](#_91_9) Helfferich，Siemens，III，46；關于西門子在鐵路建設中的角色，見pp.15–132。

[92．](#_92_9) 魯道夫·林道致布萊希羅德，1893年1月22日，BA；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236。

[93．](#_93_9) Busch，Bismarck，III，52.

[94．](#_94_8) 關于埃及依賴地位的整個故事同時包含金融、政治和人的因素，沒有誰比大衛·蘭德斯更好地把握其復雜性，他的著作《銀行家與帕夏：埃及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帝國主義》（倫敦，1958年）可謂名不虛傳[Bankers and Pashas：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London，1958）]。不幸的是，對英國人占領后的埃及沒有可與之媲美的研究。但可參考馬蒂爾德·克萊因，《德國與埃及問題，1875–1890》（格賴夫斯瓦爾德，1927年）[Mathilde Kleine，Deutschland und dieägyptische Frage，1875–1890（Greifswald，1927）]；查爾斯·伊薩維，《1800年后的埃及：畸形發展研究》，刊于《經濟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1–25頁[Charles Issawi，“Egypt since1800：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JEH，21（1961），1–25]；沃爾夫岡·蒙森，《埃及的帝國主義》（慕尼黑，1961年）[Wolfgang J.Mommsen，Imperialismus inÄgypten（Munich，1961）]；以及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ch.8。關于埃及在英國人的心目中和戰略計劃中的核心角色，見羅納德·羅賓遜和約翰·加拉格爾，《非洲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帝國主義的官方思維》（倫敦，1961年）[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London，1961）]。

[95．](#_95_7)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2年6月19日，SA。

[96．](#_96_7) 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254.

[97．](#_97_7) 亞瑟·克勞奇利，《近代埃及的經濟發展》（倫敦，1938年），第145頁[Arthur E.Crouchle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gypt（London，1938），p.145]。

[98．](#_98_6) Emden，Money Powers，p.399.

[99．](#_99_6) 阿圖爾·馮·布勞爾備忘錄，1885年4月19日；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5年4月20日，GFO：埃及5。

[100．](#_100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6年3月24日；德倫塔爾（Derenthall）致俾斯麥，1886年4月6日；朔爾茨致俾斯麥，1886年4月10日，GFO：埃及5，附件1。

[101．](#_101_6) 布勞爾致德倫塔爾，1886年4月14日，同上。

[102．](#_102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6年4月13日，同上。

[103．](#_103_6) 同上，1886年10月1日。

[104．](#_104_6) 布勞爾備忘錄，1886年10月6日，同上。

[105．](#_105_6) 布勞爾致朔爾茨，1886年10月12日，同上。

[106．](#_106_6) 施密特致俾斯麥，1886年11月22、29日；哈茨菲爾特致俾斯麥，1887年1月28日；德國外交部駐開羅通訊員，1887年2月20日，同上。

[107．](#_107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對賬單，1889年12月31日，SA。

[108．](#_108_6) 布萊希羅德致哈茨菲爾特，1888年4月7、9日，BA。

[109．](#_109_6) 普拉特，《拉丁美洲與英國貿易，1806–1914》（倫敦，1972年），第101頁[D.C.M.Platt，Latin America and British Trade，1806–1914（London，1972），p.101]。

[110．](#_110_6) 埃德加·圖靈頓，《墨西哥和她的外國債主》（紐約，1930年），第213頁[Edgar Turlington，Mexico and Her Foreign Creditors（New York，1930），p.213]。亦見弗里德里希·卡茨，《德國、迪亞茲和墨西哥革命》（東柏林，1964年），第100頁[Friedrich Katz，Deutschland，Diaz，und die Mexikanische Revolution（East Berlin，1964），p.100]。另見德國駐墨西哥大使馮·策特維茨男爵（Freiherr von Zedtwitz）致拉施道，1888年12月26日；穆倫堡（Mühlenberg）備忘錄，1898年2月5日，GFO：墨西哥1，Alfred Vagts提供。

[111．](#_111_6) 引自F.Katz，Deutschland，p.100。

[112．](#_112_6) 同上，p.103。

[113．](#_113_6) 同上，pp.107，131；Wehler，Bismarck，p.226；另見Platt，Latin America，pp.298–302。

[114．](#_114_6) 厄內斯特·卡塞爾爵士致布萊希羅德，1893年12月1日，BA。

[115．](#_115_6) 關于德國進入中國的主要著作，見赫爾穆特·施托克，《19世紀的德國和中國：德國資本主義的進入》（東柏林，1958年）[Helmuth 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 im19.Jahrhundert.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East Berlin，1958）]。該書參考德國公使們在北京的殘留檔案。另見Wehler，Bismarck，p.409；Münch，Hansemann，p.218。

[116．](#_116_6) H.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pp.193–94，279–80.遺憾的是，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沒有后一時期的勃蘭特來信，而Stoecker只引用這一封信；考慮到他想要追尋德國“剝削者”在中國的角色，也許可以推斷北京的檔案中沒有其他的信留存下來。

[117．](#_117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7年9月9日；施瓦茨科本（Schwartzkoppen）備忘錄，1887年9月17日；Reichskanzlei，關于與施瓦巴赫會面的備忘錄，無日期；俾斯麥致朔爾茨，關于遠洋航運、貿易關系和殖民地的檔案，第18號，第4卷。Stoecker似乎沒有用到Reichskanzlei中的材料。

[118．](#_118_6) H.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pp.207–8；Münch，Hansemann，pp.215–20.路德維希·拉施道，《在俾斯麥和卡普里維手下：一位德國外交官的回憶，1885–1894》（柏林，1939年），第18頁[Ludwig Raschdau，Unter Bismarck und Caprivi.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 aus den Jahren1885–1894（Berlin，1939），p.18]。

[119．](#_119_6) H.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pp.261–62.卡爾·帕什，《德國的摩西五經：與猶太人戰斗的工具，用于所有黨派的政客和議員》（萊比錫，1892年）[Carl Paasch，Ein deutscher Pentateuch：Rüstzeug zum Kampfe gegen das Judenthum.Für Politiker und Abgeordnete aller Parteien（Leipzig，1892）]。

[120．](#_120_6) 最早分析該問題的是雅各布·維納的《國際金融與外交權力平衡，1880–1914》，重新刊發于他的《國際經濟學》（格倫科，1951年），第49–85頁[Jacob Viner，“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1880–1914，”International Economics（Glencoe，1951），pp.49–85]。另見Ibbeken，Staat und Wirtschaft。兩人的研究都未使用檔案材料。

[121．](#_121_6) 維也納羅斯柴爾德家族致布萊希羅德，各處，BA。

[122．](#_122_6) 見Münch，Hansemann，pp.111–113，196–198。Münch娶了漢澤曼的孫女，他的傳記無論多么一絲不茍，總是受到這種關系的影響。他把漢澤曼描繪成“德國第一銀行家”（p.88）。

[123．](#_123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4年10月14日；羅伊斯致俾斯麥，1882年3月28日，1886年1月5日；GFO：塞爾維亞7。

[124．](#_124_6) 俾斯麥致羅伊斯，1885年12月30日，同上；大部分為俾斯麥親筆。

[125．](#_125_6) 布拉依致俾斯麥，1886年1月21日；外交部備忘錄，1886年1月15日，同上。

[126．](#_126_6) 同上，1888年12月7日。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p.278–98；Feis，Europe，pp.258–68。

[127．](#_127_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8年7月17日；備忘錄，1888年7月19、22日；電報，1888年7月21日；蘭曹致布勞爾，1888年7月28日，GFO：土耳其133，附件22。

[128．](#_128_6) 彪羅致俾斯麥，1888年6月5、18日，GFO：羅馬尼亞4；另見Helfferich，Siemens，III，4；勒·邁斯特爾（Le Maistre）致俾斯麥，1889年5月18日，GFO：希臘44。BA中還有《羅馬尼亞石油工業的發展以及貼現公司和布萊希羅德銀行的參與》（Die Entwicklung der rumänischen Petroleum-Industrie und die Beteiligung der Disconto-Gesellschaft und des Bankhauses S.Bleichröder daran）一文，沒有其他信息，但顯然發表于1907年左右。

[129．](#_129_6) 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p.447–448；Staley，Private Investor，pp.92–93；Viner，“International Finance，”pp.59–63.勞納伊致俾斯麥，1888年2月15日，GFO：意大利73，秘密。謝潑德·克拉夫，《近代意大利經濟史》（紐約，1964年），第117頁[Shepard B.Clough，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Italy（New York，1964），p.117]。

[130．](#_130_5) 荷爾斯泰因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5日；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10日，BA。

[131．](#_131_5)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9月1日，10月1、4日，FA。

[132．](#_132_5) 副本，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80–1887年，RA。

[133．](#_133_5) Clough，Modern Italy，p.126.

[134．](#_134_5) 勞納伊致俾斯麥，1888年2月15日；備忘錄，1888年2月16日，GFO：意大利73，秘密。

[135．](#_135_5) 貝謝姆致俾斯麥，1888年2月29日；羅騰堡致俾斯麥，1888年3月1日；俾斯麥致索爾姆斯，1888年3月3日，同上。

[136．](#_136_5) 貝謝姆致俾斯麥，1888年3月21日；索爾姆斯致俾斯麥，1888年3月30日；老納伊致俾斯麥，1888年3月7日，同上。

[137．](#_137_5) Feis，Europe，p.238；Clough，Modern Italy，pp.124–32；Münch，Hansemann，pp.204–6.

[138．](#_138_5) 索爾姆斯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4月3日，BA；吉納·盧扎托，《1861年到1914年的意大利經濟》，第一卷：1861–1894年（米蘭，1963年），第244頁[Gina Luzzato，L’economia italiana del1861al1914，Vol.1：1861–1894（Milan，1963），p.244]。

[139．](#_139_5) Münch，Hansemann，p.206；Feis，Europe，p.239；Ludwig Raschdau，Unter Bismarck，pp.188–89.另見他的《我如何成為外交官：生平故事》（柏林，1938年），第9頁[Wie ich Diplomat wurde：Aus dem Leben erzählt（Berlin，1938），p.9]。

[140．](#_140_5) 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p.11.

第十六章　俾斯麥的倒臺

[1．](#_1_16) GW，XII，390.

[2．](#_2_16) Holstein Papers，II，書中各處，特別是第362、369頁。

[3．](#_3_16) 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3月10日，BA。

[4．](#_4_16) 《1888–1890年與蓋爾森·馮·布萊希羅德或關于他的談話，來自埃米爾·弗里德里希·品特的日記》（Gespräche mit undüber Gerson von Bleichröder in den Jahren1888–1890.Aus den Tagebüchern von Emil Friedrich Pindter），第7頁，1888年3月29日。由他的孫子，弗萊堡的約阿西姆·品特編輯和提供。

[5．](#_5_16) 伊利·德·基翁，《法俄同盟史，1886–1894》（巴黎，1895年），第379頁[Elie de Cyon，Histoire de I’entente Franco-Russe，1886–1894（Paris，1895），p.379]。

[6．](#_6_16) 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370.

[7．](#_7_16) 引自彼得·拉索夫，《德國在大國圈子中的地位，1887–1890》（美因茨，1959年），第211頁[Peter Rassow，Die Stellung Deutschlands im Kreise der Grossen Mächte，1887–1890（Mainz，1959），p.211]。

[8．](#_8_16) Mai，Das deutsche Kapital，pp.131，vi，195.

[9．](#_9_16)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96.

[10．](#_10_15) 鑒于俄國債券在布萊希羅德客戶中的受歡迎程度，一位東德歷史學家近來的說法值得仔細商榷。他宣稱，普魯士容克貴族總是“不贊成”向與德國競爭的農業國家輸出資本。布萊希羅德因為自己的工業利益而反對向俄國投資的說法同樣證據不合。齊格里德·孔普夫–科費斯，《俾斯麥的“俄國牽線”》（東柏林，1968年），第125、154頁[Sigrid Kumpf-Korfes，Bismarcks“Draht nach Russland”（East Berlin，1968），pp.125，154]。

[11．](#_11_15) 美國外交部，《1884年外交文件》，第449–450頁。

[12．](#_12_15) 羅騰堡致蘭曹，1886年12月16日，FA，Pöls博士提供。

[13．](#_13_15) 羅騰堡致蘭曹，1886年12月24、25日，FA。

[14．](#_14_15) Holstein Papers，II，253；羅騰堡致蘭曹，1886年12月26日，FA。

[15．](#_15_15) Holstein Papers，II，327.

[16．](#_16_15) 薩克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1月24日，BA。

[17．](#_17_15) 《經濟學人》第45期，1887年10月15日，第1306頁；勒內·吉洛爾，《俄國貸款與法國在俄國的投資，1887–1914年：國際投資研究》（巴黎，1973年），第141頁[RenéGirault，Emprunts russes et investissements français en Russie，1887–1914.Récherches sur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Paris，1973），p.141]。

[18．](#_18_15) Kumpf-Korfes，“Draht nach Russland，”p.157.

[19．](#_19_15) 《德國周一報》剪報，1887年11月28日，GFO：德國122，No.1a4。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7年12月1日，FA，Pöls博士提供。

[20．](#_20_15) 巴黎大使館的雷登（Redern）致俾斯麥，1886年9月10日，GFO：法國105，No.2；彪羅致奧伊倫堡，1893年3月13日，奧伊倫堡遺稿，John Röhl博士提供。

[21．](#_21_15) Cyon，L’entente Franco-Russe，pp.302–7.

[22．](#_22_15) 基翁致布萊希羅德，1887年5月29日、6月4日，BA。

[23．](#_23_15) 同上，1887年7月24日。Cyon，L’entente Franco-Russe，pp.349–350.

[24．](#_24_15) 基翁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2月24日，BA。

[25．](#_25_15) 彪羅致俾斯麥，1887年4月13日，GFO：法國105，第2號。

[26．](#_26_15) 施魏因尼茨致外交部，1887年3月19日，GFO：俄國91，第1號。

[27．](#_27_15) 巴黎警察局塞納河檔案，BA1023；另見Cyon，L’entente Franco-Russe，pp.395–405。

[28．](#_28_15) 直到現在，基翁仍然作為科學家或歷史學家—記者被銘記。比如，《猶太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Judaica，1971年版）就只記錄他出色的科學生涯，作為卡特科夫的代理人，他的名字還出現在歷史學家中間。我因為基翁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而對他產生興趣，在德國外交部和法國警方的檔案中尋找他的更多信息。感謝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喬治·凱南教授（George F.Kennan）與我就基翁以及整個法俄關系進行幾番談話。我還非常感激他讓我讀他尚未出版的關于1894年法俄同盟的著作手稿中的幾個章節。

[29．](#_29_15) Girault，Emprunts russes，pp.156–58.

[30．](#_30_15) Pindter，“Gespräche”，1888年1月1日，4月7日，5月12、17日；DDF，VII，131。

[31．](#_31_15) 基翁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11月6日，BA。

[32．](#_32_15) 羅騰堡致布萊希羅德，1888年10月3、6日，BA。

[33．](#_33_15) 同上，1888年11月9日。

[34．](#_34_15) Girault，Emprunts russes，pp.159–70.

[35．](#_35_15) DDF，VII，431.Kumpf-Korfes，“Draht nach Russland，”pp.165–71；Mai，Das deutsche Kapital，pp.151–53.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89年4月8、10、23日，BA。

[36．](#_36_15) Pindter，“Gespräche”，1889年6月26日，P.21。

[37．](#_37_15) Kumpf-Korfes，“Draht nach Russland，”pp.166–7.

[38．](#_38_15) 理查德·赫茨，《沃爾格穆特事件》，刊于《歷史季刊》，1939年第31期，第760頁[Richard Hertz，“Der Fall Wohlgemuth，”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31（1939），760]。

[39．](#_39_15)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537.

[40．](#_40_15)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奧伊倫堡，1889年6月24日，奧伊倫堡遺物，John Röhl博士提供。

[41．](#_41_15) 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540–41.

[42．](#_42_15) Rogge，Holstein，p.330.

[43．](#_43_15) 馬丁·基欽，《德國軍官團，1890–1914》（牛津，1968年），第4章和第68頁[Martin Kitchen，The German Officer Corps，1890–1914（Oxford，1968），ch.IV and p.68]。

[44．](#_44_14) Meisner，Denkwürdigkeiten ... Waldersee，II，55.

[45．](#_45_14) 見洛爾，《執政聯盟的瓦解與俾斯麥下臺的政治，1887–1890》，刊于《歷史期刊》，1966年第9期，第79頁[J.C.G.Röhl，“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Kartell and the Politics of Bismarck’s Fall from Power，1887–1890，”Historical Journal，9（1966），79]；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p.244–246。

[46．](#_46_14) Rich，Holstein，I，253；Raschdau，Unter Bismarck，p.18.

[47．](#_47_14) Meisner，Denkwürdigkeiten ... Waldersee，II，66–67.

[48．](#_48_14) 同上，p.112。

[49．](#_49_14) 同上，pp.54–55。另見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496。

[50．](#_50_14) Pindter，“Gespräche”，1889年6月18日，第20頁。

[51．](#_51_14) 麥斯納編，《陸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伯爵書信選》，第一卷（斯圖加特，1928年），第351頁[H.O.Meisner，ed.，Aus dem Briefwechsel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Vol.I，（Stuttgart，1928），p.351]。

[52．](#_52_14)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3月6、10、13日，BA。

[53．](#_53_13) Pindter，“Gespräche”，1890年3月8日，第28頁。我對俾斯麥最后行動的總結基于Röhl的Germany without Bismarck第一章。

[54．](#_54_13) 關于科普，見弗朗茨·施納貝爾（Franz Schnabel）的敏銳研究，《科普紅衣主教對德國天主教政治力量的意義》，收錄于《論文與演講，1914–1965》，海因里希·盧茨編（弗萊堡，1970年），第1–13頁[“Kardinal Kopps Bedeutung für den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Abhandlungen und Vorträge，1914–1965，ed.by Heinrich Lutz（Freiburg，1970），pp.1–13]；魯道夫·莫塞，《文化斗爭與一戰間的德國天主教徒和民族國家》，刊于《歷史年鑒》，1970年第90期，第31–64頁[Rudolf Morsey，“Die deutschen Katholiken und der Nationalstaat zwischen Kulturkampf und Ersten Weltkrieg，”Historisches Jahrbuch，90（1970），31–64]；Röhl，“Disintegration of the Kartell”，p.86；威廉·許斯勒，《俾斯麥的倒臺》（萊比錫，1922年），第159–160頁[Wilhelm Schüssler，Bismarcks Sturz（Leipzig，1922），pp.159–60]。

[55．](#_55_13) 科普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3月23日，BA。

[56．](#_56_13) Röhl，“Disintegration of the Kartell”，p.87；Pindter，“Gespräche”，1890年3月8日，第28頁。

[57．](#_57_13) 巴謝姆遺稿，第63卷，科隆城檔案。這些內容由John Röhl博士提供；另參見Eyck，Bismarck，III，588。

[58．](#_58_13) Kardorff，Kardorff，p.223.布萊希羅德的斡旋廣為人知，但關于誰是策動者存在很多猜測。1891年11月28日的《弗斯報》上再次討論這個問題，俾斯麥寄給布萊希羅德一份該報，保存在布萊希羅德檔案中。另見GW，IX，336–337。

[59．](#_59_12) Eulenburg，Aus50Jahren，p.234；GW，VIII，696.

[60．](#_60_12)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3月19日，BA。

[61．](#_61_12) Pindter，“Gespräche”，1890年3月17日，第30頁。

[62．](#_62_12) Holstein Papers，III，332.

[63．](#_63_12) Hohenlohe，Denkwürdigkeiten，II，120.

[64．](#_64_12) 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3月19日，BA。

[65．](#_65_12) 基翁致布萊希羅德，無日期，BA。

[66．](#_66_11) 索爾姆斯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4月3日，BA。

[67．](#_67_11) Vierhaus，Spitzemberg，p.272.

[68．](#_68_11) Pindter，“Gespräche”，1890年4月12日，第32–33頁。

[69．](#_69_11) 基德倫致布萊希羅德，1891–1892年，BA；拉施道致布萊希羅德，1891年，BA；卡普里維致布萊希羅德，1892年2月1日，BA；備忘錄，1890年12月9日，GFO：德國131。

[70．](#_70_11) Kardorff，Kardorff，p.247.

[71．](#_71_11) Raschdau，Unter Bismarck，p.155；路德維希·萊納斯，《俾斯麥奠基帝國，1864–1871》（慕尼黑，1957年），第二卷，第263頁[Ludwig Reiners，Bismarck gründet das Reich，1864–1871（Munich，1957），II，263]。

[72．](#_72_11) 施魏寧格醫生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3月30日，BA。

[73．](#_73_11) Pindter，“Gespräche”，1890年4月7日，pp.31–32。

[74．](#_74_11) 克里桑德（Chrysander）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6月17日，BA。

[75．](#_75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91年12月9日，BA。

[76．](#_76_11) Pindter，“Gespräche”，1890年5月15日，第33頁。

[77．](#_77_11) 克里桑德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6月30日；Pindter，“Gespräche”，1890年6月2日，第34頁。

[78．](#_78_11) Rogge，Holstein，p.364.

[79．](#_79_11) 科普致布萊希羅德，1892年9月11日，BA。

[80．](#_80_11) GW，XIV2，1008.

[81．](#_81_11) GW，IX，336；薩姆特，《五代》，來自《柏林猶太人社群檔案》，1935年6月16日[Samter，“Fünf Generationen，”Gemeindeblatt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zu Berlin，June16，1935]。

[82．](#_82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91年4月7日，BA。

[83．](#_83_11) 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93年2月3日，BA。

[84．](#_84_11) 俾斯麥致施瓦巴赫，1893年2月23日，BA。

[85．](#_85_11) Taylor，Bismarck，p.253.

第十七章　作為愛國新貴的猶太人

[1．](#_1_17) 這是對一個相當龐大的話題的高度概括。我在之前的研究中涉及過這個核心主題，特別是《文化絕望的政治：德國意識形態興起研究》（伯克利，1961年）[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Berkeley，1961）]；《自由主義的失敗》[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和最近的《評論》，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75年第20期，第79–83頁。對于將猶太人的故事置于正確的德國背景下的任何研究，下面的作品不可或缺：萊昂納德·克里格，《德國的自由理念：政治傳統史》（波士頓，1957年）[Leonard Krieger，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History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Boston，1957）]；拉爾夫·達倫多夫，《德國的社會與民主》（紐約，1967年）[Ralf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New York，1967）]。

[2．](#_2_17) 關于門德爾松家族的類似觀察，見菲利克斯·吉爾伯特編，《銀行家、藝術家和學者：19世紀門德爾松家族的未公開書信》（紐約，1975年），第xxxvii頁[Felix Gilbert，ed.，Bankiers，Künstler und Gelehrte.Unveröffentlichte Briefe der Familie Mendelssohn aus dem19.Jahrhundert（New York，1975），p.xxxvii]。

[3．](#_3_17) Holstein Papers，III，10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71，73；Curtius，Denkwürdigkeiten ... Hohenlohe，II，234.

[4．](#_4_17) 德國猶太人大多會強調慈善是他們的特殊使命。見Toury，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pp.147–148。

[5．](#_5_17) 雅各布·瓦澤曼，《我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生活》（紐約，1933年），第24頁[Jacob Wassermann，My Life as German and Jew（New York，1933），p.24]。

[6．](#_6_17) 引自Hamburger，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551–552。

[7．](#_7_17) 關于這個話題的作品非常豐富。現有的反猶主義思想研究包括喬治·莫斯，《德國意識形態的危機》（紐約，1964年）[George 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New York，1964）]；諾曼·科恩，《種族滅絕的許可》（倫敦，1967年）[Warrant for Genocide（London，1967）]。關于反猶主義組織和政治，見彼得·普爾澤，《德國和奧地利政治反猶主義的興起》（紐約，1964年）[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New York，1964）]；保羅·馬興，《毀滅演練：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反猶主義研究》（紐約，1949年）[Paul 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New York，1949）]。關于反猶主義的背景，見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紐約，1951年）[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1951）]。關于自由新教和猶太教，見烏里爾·塔爾，《德國的基督徒和猶太人：第二帝國的宗教、政治和意識形態，1870–1914》（伊薩卡，1975年）[Uriel Tal，Christians and Jews in Germany：Religions，Politics，and Ideology in the Second Reich，1870–1914（Ithaca，1975）]。關于猶太人有組織的自衛，見伊斯瑪爾·紹爾什，《猶太人對德國反猶主義的反應，1870–1914》（紐約，1972年）[Schorsch，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1870–1914（New York，1972）]。我們尚無從1869年德國猶太人群體被解放到1944年它遭遇滅絕的綜合研究，幾乎沒有作品類似邁克爾·馬魯斯令人激動的《融合的政治：德雷弗斯事件發生時法國猶太人群體研究》（牛津，1971年）[Michael R.Marrus，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A Study of the French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Oxford，1971）]。

[8．](#_8_17) 這個表述來自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紐約，1958年），第271頁[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1958），p.271]。

[9．](#_9_17) 關于19世紀反猶主義的演變，特別見埃利奧諾·施特林，《他就像你：來自德國反猶主義的早期歷史，1815–1850》（慕尼黑，1956年）[Eleonore Sterling，Er ist wie Du.Aus der Frühgeschichte des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1815–1850）（Munich，1956）]。

[10．](#_10_16) Cohn，Warrant for Genocide，p.16.

[11．](#_11_16) 瓦爾特·拉特瑙，《作品全集》，第一卷（柏林，1918年），第188–189頁[Walther Rathenau，Gesammelte Schriften，Vol.I（Berlin，1918），pp.188–89]。

[12．](#_12_16) 同上，p.190。

[13．](#_13_16) 引自Marrus，Politics of Assimilation，p.61。

[14．](#_14_16) 關于上述內容，特別見Schorsch，Jewish Reactions。

[15．](#_15_16) Toury匯編，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p.151。

[16．](#_16_16) 巴姆貝格，p.286。

[17．](#_17_16) 布魯門貝格，《來自馬克思生活的未知資本：與荷蘭親戚的通信》，刊于《國際社會史評論》，1956年第1期，第107–108頁[W.Blumenberg，“Ein Unbekanntes Kapitel aus Marx’Leben.Briefe an die holländischen Verwandt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1956），107–8]。

[18．](#_18_16) 蓋爾森·布萊希羅德致薩穆埃爾·布萊希羅德，1850年6月8日，BA。

[19．](#_19_16) 亞伯拉罕·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64年3月19日，BA。

[20．](#_20_16) 同上，1858年9月19日。

[21．](#_21_16) Toury，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p.16.

[22．](#_22_16) 同上，p.111。

[23．](#_23_16) 奧本海姆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3月12日，BA。

[24．](#_24_16) 同上，1871年3月24日。

[25．](#_25_16) 塞西爾·羅斯，《輝煌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1939年），第125頁[Cecil Roth，The Magnificent Rothschilds（London，1939），p.125]。

[26．](#_26_16) 《真理封印：猶太人詞典》（埃爾福特，1929年）[Sigilla Veri.Lexikon der Juden（Erfurt，1929）]，第638頁，“布萊希羅德”詞條。

[27．](#_27_16) 《新弗蘭肯和圖林根大眾報》（Neue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Franken und Thüringen），1879年4月25日，BA。

[28．](#_28_16) Vierhaus，Spitzemberg，pp.132，136，138.

[29．](#_29_16) 同上，p.88。

[30．](#_30_16) 警方報告，1874年1月16日，FA，由Allan Mitchell提供。

[31．](#_31_16) 這一段得益于大衛·德·勒維塔（David J.De Levita）的驚人觀察，《身份的概念》（巴黎和海牙，1965年），第86–95、187–189頁[The Concept of Identity（Paris and The Hague，1965），pp.86–95，187–89]。作者討論了“秘密”的角色和反猶主義的投射性屬性。

[32．](#_32_16)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4月20日，BA。

[33．](#_33_16) 巴姆貝格致卡爾·安東，1883年10月5日，HS。

[34．](#_34_16) 見Theodore Zeldin讓人浮想聯翩的作品，France，1848–1945，第一卷；另見恩斯特·布拉姆斯泰特，《德國的貴族和中產階級：德國文學中的社會類型，1830–1900》書中各處，修訂版（芝加哥，1964年）[Ernest K.Bramstedt，Aristocracy and the Middle-Classes in Germany：Social Types in German Literature，1830–1900，rev.ed.（Chicago，1964）]。

[35．](#_35_16) 備忘錄，1888年10月9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魯道夫·馬丁編，《普魯士百萬富翁的財產與收入年鑒》（柏林，1912年），第138頁起[Rudolf Martin，ed.，Jahrbuch des Vermögens und Einkommens der Millionäre in Preussen（Berlin，1912），pp.138ff]。

[36．](#_36_16) 保羅·瓦西里伯爵，《柏林社交界》（巴黎，1884年），第156–157頁[Comte Paul Vasili，La Sociétéde Berlin（Paris，1884），pp.156–57]。

[37．](#_37_16) Sir James Rennell Rodd，Social and Diplomatie Memories，p.60.關于整個問題，見拉瑪爾·塞西爾，《帝國時期柏林的猶太人和容克貴族》，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75年第20期，第47–58頁[Lamar Cecil，“Jews and Junkers in Imperial Berlin，”LBY，20（1975），47–58]。作者稍稍低估基督教社會的自給自足。

[38．](#_38_16) 《馬克塞·馮·阿尼姆，貝蒂娜之女，馮·奧里奧拉伯爵夫人》，約翰尼斯·魏爾納編（萊比錫，1937年），第269–279、305頁[Maxe von Arnim，Tochter Bettinas/Gräfin von Oriola，ed.by Johannes Werner（Leipzig，1937），pp.269–79，305]；關于奧里奧拉伯爵夫人，見Vierhaus，Spitzemberg，pp.137–138。

[39．](#_39_16) Vasili，La Sociétéde Berlin，p.158.

[40．](#_40_16) 關于娛樂嚴肅的一面，見退休的巴登外交官歐根·馮·雅格曼的佐證，《七十五年的經歷和遭遇，1849–1924》（海德堡，1925年），第209頁[Eugen von Jagemann，Fünfundsiebzig Jahre des Erlebens und Erfahrens，1849–1924（Heidelberg，1925），p.209]。

[41．](#_41_16) 路德維希·皮徹致艾瑪·馮·布萊希羅德，1879年3月7日，BA。

[42．](#_42_16) Monypenny and Buckle，Disraeli，II，1202.

[43．](#_43_16) 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描繪這些宴會和席間的勾心斗角。我們感興趣的例子見查爾斯·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特別是第一卷第2章[Charles Dickens，Our Mutual Friend]；安東尼·特羅洛普，《如今世道》，第59章[Anthony Trollope，The Way We Live Now]。

[44．](#_44_15) 比爾澤致布萊希羅德，BA。

[45．](#_45_15) 引自赫伯特·羅赫，《馮塔納》（柏林，1962年），第107–108頁[Herbert Roch，Fontane（Berlin，1962），pp.107–8]。

[46．](#_46_15)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6月3日，BA。

[47．](#_47_15) 皮徹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12月26日，BA。

[48．](#_48_15) 《天主教大眾報》，第53期，3月5日（無年份），BA。

[49．](#_49_15) 塞肯多夫（Seckendorff）致布萊希羅德，1885年10月30日，BA；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374。

[50．](#_50_15) 弗里登塔爾致布萊希羅德，1889年4月26日，BA。

[51．](#_51_15) 瑪麗·拉齊威爾王妃，《瑪麗·拉齊維爾王妃寫給德·羅比朗將軍的信，1889–1914》，第一卷，《1889–1895》（博洛尼亞，1933年），第152頁[Princesse Marie Radziwill，Lettres de la Princesse Radziwill au Général de Robilant，1889–1914，Vol.I：1889–1895（Bologna，1933），p.152]。

[52．](#_52_15) 布萊希羅德致以色列聯盟，1883年1月11日，AI：IIB13。

[53．](#_53_14) Roth，Magnificent Rothschilds，pp.126–27.

[54．](#_54_14) 明斯特致卡普里維，1891年6月3日，梅特涅致卡普里維，1891年6月20日，GFO：俄國73。

[55．](#_55_14) 格斯勒（Gossler）致布萊希羅德，羅伯特·科赫致布萊希羅德，《北德大眾報》，1890年12月2日，BA。

[56．](#_56_14) GW，IX，476；倫巴赫的收據，1882年8月10日，BA。

[57．](#_57_14) 魏爾納·桑巴特，《19世紀的德國國民經濟》（柏林，1927年），第648頁[Werner Sombart，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Berlin，1927），p.648]；貝加斯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6月23日，BA。

[58．](#_58_14) 施瓦巴赫致布萊希羅德，1876年5月15日，BA。

[59．](#_59_13) 格萊費教授致布萊希羅德，1870年5月20日；埃維斯博士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7月9日；另見埃維斯的醫學報告，1871年8月29日；赫茨貝格博士（Dr.Herzberg）致布萊希羅德，1871年8月19日、9月2日，BA。

[60．](#_60_13) 弗雷里希斯博士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7月31日，BA。

[61．](#_61_13) 勞爾致布萊希羅德，1889年1月1日；弗雷里西斯博士致布萊希羅德，1883年9月8日，BA。

[62．](#_62_13) 埃伯哈德博士（Dr.A.Eberhard）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8月6日，BA。

[63．](#_63_13)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78年8月14日，BA。

[64．](#_64_13) 埃伯哈德博士致布萊希羅德，1865年8月6日；勞爾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0月20日，BA。

[65．](#_65_13) 關于預備役軍官，見埃克哈特·科爾的經典論文，《德意志王國預備軍官的起源》，收錄于《內政的特權》，維勒編，第53–63頁[Eckart Kehr，“Zur Genesis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Reserveoffiziers，”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ed.by H.-U.Wehler，pp.53–63]；以及戈登·克雷格，《普魯士軍隊的政治，1640–1945》（牛津，1955年），第237–238頁[Gordon 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1640–1945（Oxford，1955），pp.237–38]。

[66．](#_66_12) GW，IX，86.

[67．](#_67_12)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8月14日，BA。

[68．](#_68_12) 草稿副本見FA，原稿似乎已經丟失；GW，IX，86。

[69．](#_69_1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5月26日，SA。

[70．](#_70_12) 奧伊倫堡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6月27日，BA；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5月27日，BA。

[71．](#_71_12) 阿爾貝迪爾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10月8、16日等，BA；另見Craig，Prussian Army，p.225。

[72．](#_72_12) 斯蒂芬·格溫和格特魯德·塔克維爾，《查爾斯·迪爾克從男爵議員閣下傳》，第一卷（紐約，1917年），第432頁[Stephen Gwynn and Gertrude M.Tuckwell，The Life of the Rt.Hon.Sir Charles W.Dilke，Bart.，M.P.，Vol.I（New York，1917），p.432]。

[73．](#_73_12) 見魏爾納·安格雷斯出色的《一戰前的普魯士軍隊與猶太預備役軍官爭議》，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72年第17期，第19–42頁[Werner T.Angress，“Prussia’s Army and the Jewish Reserve Officer Controversy Before World War I，”LBY，17（1972），19–42]。

[74．](#_74_12) 外交部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7月28日，PRO：fo，62/944。

[75．](#_75_12)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79年12月29日，FA。

[76．](#_76_12) Sigilla Veri，“Bleichröder，”p.653.

[77．](#_77_12)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8月14日，BA。

[78．](#_78_12) 萊恩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89年1月19日，BA。

[79．](#_79_12) 羅森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1月27日、6月13日、10月19日，BA。

[80．](#_80_12) 《佩斯勞埃德報》，1881年2月19日。

[81．](#_81_12) 巴姆貝格致卡爾·安東，1881年2月20日，HS。

[82．](#_82_12) 菲利普斯伯恩（Philipsborn）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12月3日；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12月1日，BA。

[83．](#_83_12) 《漢諾威信使報》，1881年12月12日，BA。

[84．](#_84_12) 奧古斯塔皇后致布萊希羅德，1882年1月4日，BA。

[85．](#_85_12) 庫洛（Kühlow）的記錄，1882年5月17、22日；布萊希羅德致漢斯·馮·布萊希羅德，1884年9月28日，BA。

[86．](#_86_11) 庫洛，1882年5月17日，BA。

[87．](#_87_10)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7.

[88．](#_88_10) 布萊希羅德致漢斯·馮·布萊希羅德，1884年9月28日、10月19日，BA。

[89．](#_89_10) 《伯恩斯托夫伯爵回憶錄》（倫敦，1936年），第12頁[The Memoirs of Count Bernstorff（London，1936），p.12]。

[90．](#_90_10) Sigilla Veri，“Bleichröder，”p.656.

[91．](#_91_10) 1889年6月8日，BA。

[92．](#_92_10) 布萊希羅德致魯道夫·林道，1890年12月3日，1892年11月30日，聯邦檔案：科布倫茨，Kl.Erw.，310。

[93．](#_93_10) 這里和下面的花絮來自約阿西姆·施普林茨博士（Dr.Joachim Sprinz），他曾多年擔任德國駐尼斯領事，是漢斯和魏爾納的親密伙伴。他被稱為布萊希羅德的跟班（Begleiterscheinung）。我在1967年見過他，對他的幫助深表謝意。

[94．](#_94_9) 紹芬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8月25日；蒂德曼致布萊希羅德，1884年12月31日，BA。

第十八章　新反猶主義的人質

[1．](#_1_18) 關于這個術語及其內涵的簡明歷史，見托馬斯·尼佩代和賴因哈德·呂魯普的《反猶主義》，收錄于《基本歷史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的歷史詞典》，布魯納等人編，第一卷（1972年），第129–153頁[Thomas Nipperdey and Reinhard Rürup，“Antisemitismu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ed.by O.Brunner et al.，I（1972）pp.129–153]。現在重新刊印在呂魯普的《解放與反猶主義：市民社會的“猶太問題”研究》上（哥廷根，1975年）[Rürup，Emanzipation und Antisemitismus.Studien zur“Judenfrage”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Göttingen，1975）]。

[2．](#_2_18) 引自Schorsch的Jewish Reactions，p.5。

[3．](#_3_18) 讓—保羅·薩特，《反猶主義者肖像》（倫敦，1948年），第10、120頁[Jean-Paul Sartre，Portrait of the Anti-Semite（London，1948），pp.10，120]。

[4．](#_4_18) 長久以來，蕭條和新反猶主義之間被認為存在聯系。漢斯·羅森貝格對此做了最有力的斷言，見《大蕭條與俾斯麥時代》（柏林，1967年），第88–117頁[Hans Rosenberg，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zeit（Berlin，1967），pp.88–117]。關于對羅森貝格的簡要批判，特別是根據烏里爾·塔爾（Uriel Tal）對新反猶主義思想起源的分析，見赫爾曼·格萊夫，《1870–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反猶主義探源》，刊于《猶太人》，1971年第27期，第184–192頁[Hermann Greive，“Zu den Ursachen des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von1870–71，”Judaica，27（1971），184–92]。關于蕭條與美國反猶主義的聯系，見約翰·海格姆，《鍍金時代的反猶主義》，刊于《密西西比河谷歷史評論》，1957年第43期，第559–578頁[John Higham，“Antisemitism in the Gilded Age，”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3（1957），559–78]；另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時代》（紐約，1955年），第77–81頁[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pp.77–81]。另見拙作“Money，Morals，and the Pillars of Society”，Failure of Illiberalism。

[5．](#_5_18) 見貝達爾（R.M.Berdahl）對德國民族主義富有洞見的評論，《美國歷史評論》，第77期，第65–80頁。

[6．](#_6_18) Kaelble，Berliner Unternehmer，pp.79–80.另見Schorsch，Jewish Reactions，特別是pp.14–15；莫妮卡·理查茲，《解放時期德國猶太人的社會流動（1790–1871）》，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875年第20期，第69–77頁[Monika Richarz，“Jewish Social Mobility in Germany during the Time of Emancipation（1790–1871），”LBY，20（1975），69–77]。Sir James Rennell Rodd，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p.56.

[7．](#_7_18) 康斯坦丁·弗朗茨，《民族自由黨的宗教》（萊比錫，1972年），第v、59、213、217、221、235–237頁[Constantin Frantz，Die Religion des Nationalliberalismus（Leipzig，1872），pp.v，59，213，217，221，235–37]。

[8．](#_8_18) 引自Nipperdey and Rürup，“Antisemitismus”，p.137。

[9．](#_9_18) 引自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78。

[10．](#_10_17) 庫爾特·瓦夫里齊內克，《德國反猶主義黨派的誕生（1873–1890）》，刊于《歷史研究》，1927年第168期，第11頁[Kurt Wawrzinek，“Die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Antisemitenparteien（1873–1890），”Historische Studien，168（1927），11]。

[11．](#_11_17) 赫爾曼·燦恩，《作為政治工具的〈園亭〉》（維爾茨堡，1935年），第14頁[Hermann Zang，“Die Gartenlaube”als politisches Organ（Würzburg，1935），p.14]。

[12．](#_12_17) Glagau，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24.

[13．](#_13_17) 同上，pp.xxx，150；xxv，30。

[14．](#_14_17) Wawrzinek，“Entstehung，”p.9.

[15．](#_15_17) 同上，pp.9–11。

[16．](#_16_17) 同上，p.12。

[17．](#_17_17) 引自瓦爾特·波里希編，《柏林反猶主義斗爭》（法蘭克福，1965年），第56頁[Walter Boehlich，ed.，Der 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Frankfurt，1965），p.56；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pp.14–15]。

[18．](#_18_17) 《日耳曼尼亞》，1875年9月10日，引自Nipperdey and Rürup，“Antisemitismus”，p.142。

[19．](#_19_17) 奧托·馮·迪斯特—達伯，《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德國的權利意識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慕尼黑，1897年），第40–41頁[Otto von 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Deutsches Rechtsbewusstsein und 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e（Munich，1897），pp.40–41]。

[20．](#_20_17) 瑪爾，《猶太人對德國人的勝利：非懺悔者的視角》（伯爾尼，1879年），第33、46、48頁[W.Marr，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Vom nicht confessionellen Standpunkt aus betrachtet（Bern，1879），pp.33，46，48]。

[21．](#_21_17) 理查德·萊溫森，《政治中的金錢》（柏林，1931年），第43–45頁[Richard Lewinsohn，Das Geld in der Politik（Berlin，1931），pp.43–45]。

[22．](#_22_17) Busch，Bismarck，II，312.

[23．](#_23_17) Gedanken，II，160.

[24．](#_24_17) 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pp.4–6.

[25．](#_25_17) 奧托·馮·迪斯特—達伯，《關于俾斯麥親王和德國權利意識的回憶中不實之處的報告》（蘇黎世，1899年），第8頁[Otto von Diest-Daber，Berichtigung von Unwahrheiten in den Erinnerungen des Fürsten Bismarck und Deutsches Rechtsbewusstsein（Zurich，1899），p.8]；迪斯特—達伯致俾斯麥，1874年10月11日，DZA：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迪斯特—達伯對俾斯麥親王的攻擊和恢復軍銜的請求，第401號，第1卷。

[26．](#_26_17) Kardorff，Kardorff，pp.101–105；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p.10和書中各處。

[27．](#_27_17) Kardorff，Kardorff，p.107.

[28．](#_28_17) 蘭茨貝格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6月1日，BA。

[29．](#_29_17) 布萊希羅德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77年5月25、28日，FA；赫伯特·馮·俾斯麥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5月27日，BA。

[30．](#_30_17) 法庭判決，1878年3月28日，DZA：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迪斯特—達伯對俾斯麥親王的攻擊和恢復軍銜的請求，第401號，第1卷；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10月27日，BA。

[31．](#_31_17) Kardorff，Kardorff，p.110；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pp.106–201.另見Diest-Daber，Berichtigung，書中各處。

[32．](#_32_17) Rudolph Meyer，Politische Gründer，p.27.

[33．](#_33_17) 同上，p.2。

[34．](#_34_17) 同上，p.200。

[35．](#_35_17) 同上，p.4。

[36．](#_36_17) 同上，pp.77，104，185，200–201。

[37．](#_37_17) Rudolph Meyer，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I，pp.709，740.另見，Politische Gründer，p.202；Kardorff，Kardorff，pp.106–107。

[38．](#_38_17) 赫爾曼·巴爾，《反猶主義：國際訪談》（柏林，1894年），第12頁[Hermann Bahr，Der Antisemitismus.Ein internationales Interview（Berlin，1894），p.12]。

[39．](#_39_17) 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后來如此形容他；Vierhaus，Spitzemberg，p.386。

[40．](#_40_17) 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92.

[41．](#_41_17) 關于當時猶太人的自我批評，見Schorsch，Jewish Reactions，pp.47–48；以及邁克爾·邁耶爾，《反猶主義大辯論：猶太人對德國新敵意的反應，1879–1881》，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66年第11期，第164頁[Michael A.Meyer，“Great Debate on Antisemitism：Jewish Reaction to New Hostility in Germany，1879–1881，”LBY，11（1966），164]。

[42．](#_42_17) 阿道夫·施托克，《基督教社會黨：演講和論文》（比勒菲爾德和萊比錫，1885年），第143–154頁[Adolf Stoecker，Christlich-Sozial.Reden und Aufsätze（Bielefeld and Leipzig，1885），pp.143–54]。

[43．](#_43_17) 卡多夫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9月30日，BA。

[44．](#_44_16) Lucius，Bismarck，pp.163–64.

[45．](#_45_16) 參見拙作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p.140。

[46．](#_46_16) 見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11；另見安德里亞斯·多爾帕倫，《海因里希·馮·特萊奇克》（紐黑文，1957年）[Andreas Dorpalen，Heinrich von Treitschke（New Haven，1957）]；另見Hamburger對特萊奇克攻擊之意義的出色總結，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99–100。

[47．](#_47_16) 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p.76，190.

[48．](#_48_16) 特奧多爾·蒙森，《演講與論文》（柏林，1905年），第410–426頁[Theodor Mommsen，Reden und Aufsätze（Berlin，1905），pp.410–26]。

[49．](#_49_16) 瓦爾特·弗朗克，《宮廷牧師阿道夫·施托克與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漢堡，1935年），第85頁[Walter Frank，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Hamburg，1935），p.85]。

[50．](#_50_16) 布萊希羅德致威廉一世，1880年6月18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51．](#_51_16)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6月18日，同上。

[52．](#_52_16)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9月23日，BA。Frank，Stoecker，pp.89–90；書信草稿見DZA：梅澤堡：施托克遺稿。

[53．](#_53_15) GW，VI3，199；這封信的草稿見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54．](#_54_15) 俾斯麥致蒂德曼，1880年11月15日，同上。另見Lucius，Bismarck，p.216。

[55．](#_55_15) 俾斯麥致蒂德曼，1880年11月21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Frank，Stoecker，p.96。

[56．](#_56_15) 1880年11月13日，漢內爾的質詢，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57．](#_57_15)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蒂德曼，1880年11月17、18日；蒂德曼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0年11月19日，同上。

[58．](#_58_15) 《猶太人問題：普魯士眾議院對眾議員漢內爾博士的質詢所做的討論》（柏林，1880年），第211頁和其他各處[Die Judenfrage.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über die Interpellation des Abgeordneten，Dr.Hänel（Berlin，1880），p.211]。

[59．](#_59_14) 關于巴姆貝格，見斯坦利·祖克，《路德維希·巴姆貝格與德國反猶主義的興起，1848–1893》，刊于《中歐史》，1970年第3期，第332–352頁[Stanley Zucker，“Ludwig Bamberger and the Rise of Anti-Semitism in Germany，1848–1893，”CEH，3（1970），332–52]。

[60．](#_60_14) 埃薩·德·奎羅斯，《英國來信》（俄亥俄州，雅典，1970年），第47頁[Eça de Queiroz，Letters from England（Athens，Ohio，1970），p.47]。

[61．](#_61_14)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11月20日，GFO：I.A.A.a.50，第3卷。

[62．](#_62_14) 吉·德·布萊希羅德致迪斯累利，1880年11月22日，休恩頓莊園，B/XXI，R/263及附件。這條資料由我的同事Marvin Swartz提供。

[63．](#_63_14) 引自《泰晤士報》，1885年11月25日。

[64．](#_64_14) 同上，1880年11月23日。

[65．](#_65_14) 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p.337–338；漢斯·利伯舒茨，《從黑格爾到馬克斯·韋伯的德國歷史畫面中的猶太人》（圖賓根，1967年），第341–342頁[Hans Liebeschütz，Das Judentum im deutschen Geschichtsbild von Hegel bis Max Weber（Tübingen，1967），pp.341–2]；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p.202–204。

[66．](#_66_13) 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307.

[67．](#_67_13) 安東·貝特爾海姆，《貝托爾德·奧爾巴赫》（斯圖加特，1907年），第375頁[Anton Bettelheim，Berthold Auerbach（Stuttgart，1907），p.375]。

[68．](#_68_13) 《雅各布·布克哈特寫給友人弗里德里希·馮·普萊恩的信，1864–1893》（斯圖加特和柏林，1922年），第137頁[Jakob Burckhardts Briefe an seinen Freund Friedrich von Preen，1864–1893（Stuttgart and Berlin，1922），p.137]。

[69．](#_69_13) 關于這點，見Schorsch，Jewish Reactions，pp.47–48和書中各處。

[70．](#_70_13) 關于庸俗理想主義，見拙作Failure of Illiberalism，pp.17–19。

[71．](#_71_13) 蒂德曼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0年11月19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72．](#_72_13) 赫伯特·馮·俾斯麥致蒂德曼，1880年11月29日，同上。

[73．](#_73_13) 俾斯麥和普特卡默致威廉，1880年12月4日，威廉的草稿，1880年12月27日，同上；Frank，Stoecker，p.100。

[74．](#_74_13) 布萊希羅德致俾斯麥，1880年12月29日，FA；威爾莫夫斯基（Wilmowsky）致布萊希羅德，1881年1月26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75．](#_75_13) 蒙特菲奧雷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6月13日，BA。弗朗茨·柯布勒編，《東西歐書信中的猶太人歷史》（維也納，1938年），第352頁[Franz Kobler，ed.，Jüdische Geschichte in Briefen aus Ost und West（Vienna，1938），p.352]。

[76．](#_76_13) 戈德施密特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9月29日，1880年11月5日，BA。

[77．](#_77_13) 阿爾方斯·德·羅斯柴爾德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12月4日，BA。

[78．](#_78_13) 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176.

[79．](#_79_13) M.A.Meyer，“Great Debate on Antisemitism，”p.169.英格里德·貝爾克編，《莫里茨·拉撒路與赫爾曼·施泰因塔爾：書信中的大眾心理奠基者》（圖賓根，1971年），第154頁[Ingrid Belke，ed.，Moritz Lazarus und Hermann Steinthal.Die Begründer der Völkerpsychologie in ihren Briefen（Tübingen，1971），p.154]。

[80．](#_80_13) 蒂德曼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0年12月31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81．](#_81_13) 荷爾斯泰因致赫伯特·馮·俾斯麥，1880年12月22日，FA，由Hoepke博士提供。

[82．](#_82_13) Zucker，“Ludwig Bamberger，”pp.338–350.

[83．](#_83_13) 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1，p.31；普特卡默報告，1881年5月22日，1881年8月21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84．](#_84_13) Schorsch，Jewish Reactions，p.39.

[85．](#_85_13) 普魯士王國內閣，1882年5月22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86．](#_86_12) 以色列聯盟柏林委員會，1881年12月29日，AI：IA1。

[87．](#_87_11) Frank，Stoecker，pp.109–110.

[88．](#_88_11) 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p.37.

[89．](#_89_11) 古斯塔夫·希伯，《倍倍爾和俾斯麥之間》（東柏林，1965年），第77頁[Gustav Seeber，Zwischen Bebel und Bismarck（East Berlin，1965），p.77]。

[90．](#_90_11) 《郵報》（Die Post）剪報，1881年11月6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GW，VIII，423–424。

[91．](#_91_11) 警方報告，1894年5月8日，1897年12月31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的報告，編號30；另見Hamburger，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136–138；Toury，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pp.182–185。

[92．](#_92_11) 瑪杰里·蘭貝蒂，《普魯士政府與猶太人：威廉時代的政府行為與政策制定》，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72年第17期，第17頁[Marjorie Lamberti，“The P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Jews：Official Behavior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Wilhelminian Era，”LBY，17（1972），17]。

[93．](#_93_11) Jöhlinger的Bismarck und die Juden主張這種觀點，pp.43–45。

[94．](#_94_10) 約翰內斯·齊庫施，《新德意志帝國政治史》，第二卷：《俾斯麥時代》（法蘭克福，1927年），第366頁[Johannes Ziekursch，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Vol.II：Das Zeitalter Bismarcks（Frankfurt，1927），p.366]。

[95．](#_95_8) 布萊希羅德致威廉，1884年5月12日，DAZ：波茨坦：帝國首相辦公廳，猶太人事務，第16號，第1卷。

[96．](#_96_8) 齊吉斯蒙德·齊梅爾（Sigismund Simmel）致伊西多·勞埃布，1885年11月6日，AI：IA1。

[97．](#_97_8) 見Tal，Christians and Jews，書中各處。

[98．](#_98_7) 克里斯托弗·約瑟夫·克萊默，《馮·布萊希羅德先生所謂的1萬馬克》（柏林，1889年），第3、7、17、21頁[Christoph Joseph Cremer，Die angeblichen10，000Mark des Herrn von Bleichröder（Berlin，1889），pp.3，7，17，21]。

第十九章　苦澀的結局

[1．](#_1_19) 布萊希羅德致馬達伊，1881年4月10日，以及后續的報告，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

[2．](#_2_19) 馬達伊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9月26日，1880年12月，BA。

[3．](#_3_19) 《國家市民報》（Staatsbürger-Zeitung）剪報，1889年9月5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

[4．](#_4_19) 迪特·弗里克，《俾斯麥的禁衛軍：鎮壓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柏林政治警察（1871–1898）》（東柏林，1962年），第62頁[Dieter Fricke，Bismarcks Prätorianer.Die Berliner politische Polizei im Kampf gegen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1871–1898）（East Berlin，1962），p.62]。

[5．](#_5_19) Jöhlinger，Bismarck und die Juden，pp.46–47；卡爾·帕什，《猶太惡魔》，兩卷本合訂本（萊比錫，無日期，可能是1891年），第145頁[Carl Paasch，Der Jüdische Dämon（2vols.in1；Leipzig，n.d.）（1891？），p.145]。另見赫爾曼·阿爾瓦特，《對曼謝和布萊希羅德的審判》（萊比錫，1891年），第一章，第4節[Hermann Ahlwardt，Die Prozesse Manchéund Bleichröder（Leipzig，1891），I，4]。

[6．](#_6_19) 康拉德·馬達伊致布萊希羅德，1877年3月18、24日，BA。

[7．](#_7_19) 馬達伊致布萊希羅德，1879年6月18、22日，BA。

[8．](#_8_19) 漢斯·馮·布萊希羅德致布萊希羅德，1880年7月3、24日，BA。

[9．](#_9_19) 霍普，1884年11月22日；另見馬達伊致普特卡默，1883年12月4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10．](#_10_18) 馬達伊致布萊希羅德，1875年6月11日，BA。

[11．](#_11_18) 馬達伊致普特卡默，1883年12月4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12．](#_12_18) Fricke，Bismarcks Prätorianer，p.53.

[13．](#_13_18) 檢察官致科洛納，1883年11月13日，副本，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14．](#_14_18) 王國地方法庭第一檢察官致王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官的報告，1891年10月15日，同上。

[15．](#_15_18) 《施魏林與布萊希羅德：貴族與猶太人》（德累斯頓，1893年），書中各處[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Edelmann und Jude（Dresden，1893）]。這本小冊子出自施魏林之手，或者為他而寫。

[16．](#_16_18) 最高檢察官致司法部長弗里德貝格，1884年2月12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17．](#_17_18) 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p.82.

[18．](#_18_18) 私人副官佐莫菲爾德中尉（Adjutant Oberstleutnant）致弗里德貝格，1884年12月30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19．](#_19_18) Holstein Papers，II，84–85，93–9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210–3.

[20．](#_20_18) 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p.112–3.

[21．](#_21_18) 赫爾曼·阿爾瓦特，《一個猶太人的誓言》（柏林，1891年），第45、61頁[Hermann Ahlwardt，Der Eid eines Juden（Berlin，1891），pp.45，61]。

[22．](#_22_18) 《進步報》剪報，1891年7月10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

[23．](#_23_18) 《新時代》，1890年7月27日；引自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p.266。

[24．](#_24_18) 政治警察，1891年10月28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

[25．](#_25_18) Ahlwardt，Prozesse Manché，p.8.關于這類寬幅印刷品的另一個例子，見埃爾文·鮑爾博士，《布萊希羅德事件》（萊比錫，1891年）[Dr.Erwin Bauer，Der Fall Bleichröder（Leipzig，1891）]。

[26．](#_26_18) 第一檢察官致最高檢察官，1891年10月15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27．](#_27_18) 司法部長備忘錄草稿，1891年10月29日，同上。

[28．](#_28_18) 保羅·林道致布萊希羅德，1890年12月3日，BA。因為各種缺乏良好品位的行為和對柏林舞臺實行某種獨裁統治，林道正遭受公開侮辱。Paasch，Jüdische Dämon，II，125ff.

[29．](#_29_18) 第51警區，1891年10月13日；《北德大眾報》，1891年10月23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30．](#_30_18) 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p.vii

[31．](#_31_18) 王國最高法院，1892年2月1日，DZA：梅澤堡：司法部，對樞密商務顧問馮·布萊希羅德的調查，文件8，編號746。

[32．](#_32_18) 《民眾報》剪報，1893年2月18日，同上。

[33．](#_33_18) Kardorff，Kardorff，p.278.

[34．](#_34_18) 《柏林交易所通訊》剪報，1893年2月22日，《柏林日報》剪報，1893年2月22日，DZA：梅澤堡，王國掌禮局關于馮·布萊希羅德的文件，VI.B.154。

[35．](#_35_18) 引自彼得·迪格，《宮廷猶太人》（紐倫堡，1939年），第454–457頁[Peter Deeg，Hofjuden（Nuremberg，1939），pp.454–7]。

[36．](#_36_18) 《國際銀行和貿易期刊》（Internationales Bank-und Handels-Journal，維也納），1893年2月20日，BA；《猶太人大眾報》，1893年2月24日。

[37．](#_37_18) 警方報告，1893年2月21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蓋爾森·布萊希羅德的檔案，編號30；另見BA。

后記：家族的衰敗

[1．](#_1_20) 大衛·蘭德斯，《布萊希羅德銀行：一份中期報告》，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1960年第5期，第211頁[David S.Landes，“The Bleichröder Bank：An Interim Report，”LBY，5（1960），211]。

[2．](#_2_20)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117.

[3．](#_3_20) 關于布萊希羅德銀行在法德合作中的角色，見雷蒙·普瓦德文的重要作品，《1898年到1914年間法德的經濟與金融關系》（巴黎，1969年），第83頁等處[Raymond Poidevin，Les relations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de1898à1914（Paris，1969），p.83and passim]。

[4．](#_4_20) 備忘錄，1897年5月12、15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尤里烏斯·利奧波德·施瓦巴赫的檔案，編號30。

[5．](#_5_20) 馬克斯·瓦爾堡致保羅瓦爾堡，1898年10月22日，瓦爾堡檔案，由舍爾曼（J.A.Sherman）提供。埃里克·瓦爾堡（Eric M.Warburg）致信作者，允許引用這段摘錄，1976年6月9日。

[6．](#_6_20) 保羅·馮·施瓦巴赫，《我的檔案》（柏林，1927年），第334頁[Paul H.von Schwabach，Aus meinen Akten（Berlin，1927），p.334]。

[7．](#_7_20) 同上，第330頁，以及來自布魯納的個人信息。

[8．](#_8_20) 部隊質詢，1893年1月4日；警察總監的回復，1893年2月11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尤里烏斯·利奧波德·施瓦巴赫的檔案，編號30。

[9．](#_9_20) 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399.

[10．](#_10_19) 拉瑪爾·塞西爾，《阿爾伯特·巴林：德意志帝國的商業與政治，1888–1918》（普林斯頓，1967年），第109頁[Lamar Cecil，Albert Ballin：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1888–1918（Princeton，1967），p.109]，另見他的《猶太人與容克貴族》，刊于《萊奧·拜克學會年鑒》，第20期，第47–58頁[“Jews and Junkers，”LBY，20：47–58]。

[11．](#_11_19) 《泰晤士報》，1938年11月19日。

[12．](#_12_19) Schwabach，Aus meinen Akten，p.313；另見弗里德里希·提姆，《外交政策與高級金融：來自保羅·馮·施瓦巴赫的文件》，刊于《歐洲對話》，1929年第7期，第317–318頁[Friedrich Thimme，“Auswärtige Politik und Hochfinanz.Aus den Papieren Paul H.von Schwabachs，”Europäische Gespräche，7（1929），317–8]。

[13．](#_13_19) Schwabach，Aus meinen Akten，p.386.

[14．](#_14_19) 同上，p.440。

[15．](#_15_19) 同上，p.387。

[16．](#_16_19) 警方備忘錄，1903年4月1日，BLHA：王國警察總監，關于尤里烏斯·利奧波德·施瓦巴赫的檔案，編號30。

[17．](#_17_19) 警方備忘錄，1909年4月24日；《真理報》（Die Wahrheit）剪報，1909年4月24日，同上。

[18．](#_18_19) 部隊的質詢，1913年12月5日，1917年1月12日；《柏林午報》（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剪報，1913年6月13日。

[19．](#_19_19) Jagemann，Fünfundsiebzig Jahre，p.271.

[20．](#_20_19) Emden，Money Powers，p.254；齊格蒙德·卡茨尼爾森編，《德國文化領域的猶太人》，第三版（柏林，1962年），第725–726頁[Siegmund Kaznelson，ed.，Juden im deutschen Kulturbereich，3rd ed.（Berlin，1962），pp.725–6]；莫德里斯·埃克斯泰因斯，《理性的極限》（牛津，1975年），第76頁[Modris Eksteins，The Limits of Reason（Oxford，1975），p.76]。

[21．](#_21_19) 布萊希羅德檔案中有詳細記錄。Sprinz博士也向我談起過自殺的可能。

[22．](#_22_19) 保羅·馮·施瓦巴赫致布魯納，1938年10月18日，BA。施瓦巴赫與布魯納的全部通信令人辛酸地看到，對納粹的反應多么各不相同，但遭受的痛苦又多么一致。

[23．](#_23_19) 庫爾特·馮·布萊希羅德致帝國內政部長弗里克，1942年1月7日；埃德加·馮·布萊希羅德致帝國內政部長副官，1942年1月23日；帝國內政部長副官致帝國安全負責人，提請黨衛軍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注意，1942年1月29日；帝國黨衛軍和德國警察總監，1942年5月7日，德國內政部，聯邦檔案，科布倫茨：R18/5246。

[24．](#_24_19) 信息來自Sprinz博士。國際紅十字會追蹤服務處致作者，1976年6月28日。

[25．](#_25_19) 美國法院提交給盟軍駐德國最高委員會的歸償請求，1953年11月23日，案件第611號，副本，BA。

[26．](#_26_19)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ch.4.

# 致謝

本書的撰寫歷時漫長，我也因此得到許多重要的幫助。如果沒有美國和歐洲的個人與機構的幫助，本書將不可能完成。

首先，我要對紐約阿恩霍爾德和布萊希羅德銀行的布魯納表示感謝，他把布萊希羅德檔案帶到紐約，交給大衛·蘭德斯使用。后來，布魯納先生和我變得非常熟悉，我從他的實用智慧和豐富經驗中學到很多。他沒能等到他寄予厚望的本書完成就去世了，但我給他看過幾乎每一章的草稿，并獲得他的批評性指教。

我的朋友大衛·蘭德斯首先邀請我和他一起從事這項研究。在快速瀏覽了布萊希羅德檔案后，我確信它的重要性，于是接受蘭德斯的合作邀請。那是在二十年前，當時我們的計劃都是寫一本能很快完成的小書。

我們從1960年起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銀行展開工作。1961年和1962年，我們去了民主德國的檔案館，并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一起工作。我們希望有所分工，由蘭德斯負責經濟方面，我負責社會和政治領域。我們的日程逐漸發生分歧，1970年，他決定暫停對布萊希羅德的研究，轉向其他更緊迫的工作。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受益于他對19世紀歷史的出色了解，他對歷史和人文事物的自信判斷，以及他對商業檔案的熟悉。我們彼此分享研究，閱讀對方的章節，他總是不吝提供建議和幫助。1973年，他讀了本書的初稿。1974年，他又讀了經過大幅修改的幾個章節。

從一開始，我就得到各種機構的不可或缺的幫助，讓為本書所做的廣泛研究成為可能。1960—1961年，得益于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補助金，我可以利用公休前往巴黎。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還以幾項暑假補貼和基金的形式向我提供更多支持，為我提供微縮膠卷的費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鄧寧基金（Dunning Fund）讓我可以把一些最重要的微縮膠卷打印出來。

我還要感謝各處檔案保管人的慷慨。首先要感謝巴黎羅斯柴爾德銀行允許我查看它無與倫比的檔案；我要感謝貝特朗·吉爾（Bertrand Gille）和皮埃爾·杜邦—費里耶（Pierre Dupont-Ferrier），我尤其要感謝吉·德·羅斯柴爾德男爵，他很久以后還允許我參觀費里埃爾城堡。我還要感謝不久前去世的弗里德里希斯魯的奧托·馮·俾斯麥親王，他從1961年到1967年間允許我查閱關于布萊希羅德的無價材料。最后，我要感謝聯邦德國外交部管理政治檔案的官員，特別是已故的前負責人烏爾里希博士（Dr.Ullrich），在持續多年的研究過程中，我還一直得到薩斯博士（Dr.Sasse）和魏因南迪博士（Dr.Weinandy）的幫助。我要對波茨坦和梅澤堡的德國中央檔案的負責人勒茨克博士（Dr.Lötzke）和威爾弛博士（Dr.Weltsch）表示特別的感謝，他們想盡辦法讓我們在檔案館期間的生活愉快而多產。我還要感謝上述檔案的所有其他保管人。我要特別感謝哈佛大學克萊斯圖書館（Kress Library）的館長肯尼斯·卡朋特（Kenneth E.Carpenter）。哥倫比亞大學的各個圖書館在幫助不斷提出要求的申請人方面堪稱表率。海牙的皇家圖書館也特別樂于助人。

另一些贊助讓我查閱上述和其他檔案成為可能：1966年，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補助金讓我可以利用公休前往牛津，我在那里受到來自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和圣安東尼學院（St.Antony’s College）的熱情接待和鼓勵。哥倫比亞大學歐洲研究所多次向我提供旅行和文書開支的補貼；我至今仍然感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E.Mosely）的鼓勵。

在漫長的研究過程中，我得到幾位朋友和同事的幫助。在關鍵的節點和尋找必要材料的過程中，我獲得漢斯—烏爾里希·維勒（Hans-Ulrich Wehler）和現任萊茵蘭—巴拉丁州（Rhineland-Palatinate）教育部長伯恩哈德·福格爾（Bernhard Vogel）的鼎力支持。如果沒有喬治·加斯特朗（Georges Castellan）在巴黎的幫助，我懷疑我們可能無法進入民主德國檔案館工作。我還得到彼得·拉索（Peter Rassow）、瓦爾特·布斯曼（Walter Bussman）和維克多·布隆貝爾（Victor Brombert）。我要特別感謝沃爾夫蘭·費舍爾（Wolfram Fischer），他專業而迅速地回答我的問詢。我遭遇了所有研究歐洲史的美國學者必然曾經面對過的困難：意外所需的檔案或圖書館距離遙遠。但同事們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在自己的研究中碰巧得到的更多關于布萊希羅德的材料，這對我幫助很大。我特別想到約翰·洛爾（John Röhl）、克勞斯—彼得·霍伊普科（Klaus-Peter Hoepke）和阿爾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此外還有馬爾文·斯瓦茨（Marvin Swartz）、舍爾曼（J.A.Sherman）、阿蘭·米切爾（Allan Mitchell）、魏爾納·波爾斯（Werner Pöls）、奧托·普弗朗茨（Otto Pflanze）和埃伯哈德·瑙約克斯（Eberhard Naujoks）。我還要感謝倫敦薩繆爾·蒙塔古有限公司（Samuel Montagu&Co.Limited）的魯道夫·布萊希羅德，他非常友好地與我分享他對蓋爾森和尤里烏斯·布萊希羅德的回憶。

我得以在幾處學術避風港寫完本書的許多內容。1969—1970年，在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幫助下，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一年。1972—1973年，我在荷蘭高等研究院工作，在米塞特博士（Dr.Misset）的關切注視和埃爾斯·古拉斯特拉·范隆—布恩（Els Glastra van Loon-Boon）的熱心幫助下，那里成立歐洲首家跨學科研究院。同一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蘭德斯和我在塞爾貝羅尼別墅（Villa Serbelloni）度過短暫但很有收獲的時光。

許多朋友和同事們與我討論了我的作品，我要特別感謝雅克·巴贊（Jacques Barzun）、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小威廉·迪波爾德（William Diebold，Jr.）、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大衛·德·勒維塔（David De Levita）和沃爾特·索科爾（Walter Sokel）。我的一些朋友很早就對個別章節提出意見：彼得·凱南（Peter Kenen）、亞瑟·米茨曼（Arthur Mitzman）、休·塞頓—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和魯道夫·費爾豪斯（Rudolf Vierhaus）。萊昂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讀了經過修改的本書第一部分，他的評論不僅帶來啟迪，而且鼓勵了我。我還把完成后的書稿交給菲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克里斯托弗·基米奇（Christoph M.Kimmich）、羅伯特·韋布（Robert K.Webb）和杰伊·溫特（Jay Winter）審閱，我非常感謝他們能從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時間承擔如此繁重的工作。他們的意見在許多重要方面改進了書稿。菲利克斯·吉爾伯特還讀了本書的導言，他對歐洲歷史理解透徹，并具有歷史學家的責任感。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有過無數次對話，令我受益匪淺。大衛·羅斯曼（David Rothman）、伊斯瑪爾·紹爾什（Ismar Schorsch）和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也讀了導言。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和達倫多夫都是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我在此后所寫和所做的一切都留下他的思想和我們的友誼的印記。

多年來，我得到一系列研究助理的幫助，包括沃伊塔·馬斯特尼（Vojta Mastny）、馬丁·蘭迪（Martin Landy）、漢斯·托爾克（Hans Torke）、拉里·艾布拉姆斯（Larry Abrams）、亞瑟·多普爾特（Arthur Doppelt）和馬丁·紐豪斯（Martin Newhouse）；1974年夏天，我有幸雇傭耶魯的古典學家黛博拉·羅伯茨（Deborah Roberts）為尋書員和打字員，她還對本書的缺陷做了隨性評論。大部分書稿由艾妮·瑟維特（Ene Sirvet）憑借出色的技巧和耐心打出；伊內克·費爾布里夫—范·艾格蒙德（Ineke Veilbrief-van Egmond）和露絲·伊爾曼（Ruth Earman）之前也幫助謄寫筆記。在工作的最后階段，米歇爾·凱米（Michelle Kehmi）整理筆記的技巧對我幫助巨大。過去十個月里，我還得到卡塔琳娜·齊默（Katharina J.Zimmer）耐心和機敏的幫助；在準備將書稿付梓的最后階段，她的幫助大膽而不可或缺。

我非常感謝我的朋友和編輯阿什貝爾·格林（Ashbel Green），如果沒有他，本書的篇幅會更長，各種疏失將會更多。他的忠告和寬容令人鼓舞，令我感到莫大的榮幸。

本書的撰寫和修改經歷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創作的關鍵時期恰逢哥倫比亞大學遭受動蕩，在之前的二十五年里，那里一直是我的思想家園，要求并值得我付出全身心的熱愛。我在這段時間還遭受巨大的個人損失。哈約·霍爾波恩（Hajo Holborn）于1969年去世，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導師。不久之后，與我認識時間最長的兩位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亨利·羅伯茨（Henry L.Roberts）也去世了。過去五年間，我長久以來的老師和朋友萊昂內爾·特里林對本書非常感興趣。最重要的是，他對工作的熱情投入不斷激勵著我。他在幾個月前去世。我希望可以在本書中找到他們的思想和鼓勵的痕跡。

在過去這些年里，家人的支持讓我堅持下來。他們的奉獻是對我最大和最無形的幫助。多年來，我的妻子理解和包容這本書，以各種我無法描繪的微妙方式期待著它的完成。我的孩子們也以許多互補的方式幫助我。我的兒子弗雷德從文學角度出發，幫助我從新的視角看待事件和情感。直到最后，他還要求我努力解決導言中的某些痼疾。我的女兒凱瑟琳本人也是歷史學家，她和我一起讀了長條校樣。在此過程中，她憤怒的嘆息和她許多出色的改進建議一樣大有幫助。

我得到大量幫助。這是一次令人生畏的體驗，任何判斷或事實錯誤都歸咎于我。

弗里茨·斯特恩

佛蒙特州羅切斯特

1976年7月28日

# 參考書目

為了簡約起見，我決定不一一列出我使用過的所有檔案中的所有文件。那樣的話，名單將會很長；當然，我引用的文件在前面的注釋中都已提到。

我覺得列出我讀過的所有書目同樣顯得啰唆。我引用的書籍和文章已經在前面的注釋中列出。這里列出的是對我具有特別價值的書目，有的加深我對本書中心主題的理解，有的拓寬我對其歷史背景的觀點。這份書目并不完整，但我希望它能對某些讀者有用。遴選過程容易產生不公正，我擔心無意中可能略去某些本該被包括進來的書目。

就像我在導言中所提到的，我覺得19世紀的偉大小說以及易卜生和蕭伯納的戲劇具有極高的價值，這點在正文和注釋中一定也顯而易見。我相信自己不僅是為了樂趣才閱讀和思考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狄更斯、特羅洛普、托馬斯·曼和特奧多爾·馮塔納的小說。

在理解19世紀70年代的社會方面，我覺得《噼里啪啦》雜志特別能給人啟發。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紐約，1951年［Arendt，Hannah，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1951］。

羅伯特·貝達爾，《德國民族主義新思索》，刊于《美國歷史評論》，1972年第77期，第65—70頁［Berdahl，Robert M.，“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AHR，77（1972），65–70］。

羅伯特·布雷克，《迪斯累利》，倫敦，1966年［Blake，Robert，Disraeli.London，1966］。

赫爾穆特·波姆，《德國的大國之路：帝國奠基時代經濟與國家的關系研究，1848—1881》，科隆和柏林，1966年［Böhme，Helmut，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während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1848–1881.Cologne and Berlin，1966］。

卡爾·埃爾里希·波恩編，《俾斯麥書目，關于俾斯麥生平及其時代的材料和作品》，科隆，1966年［Born，Karl Erich，ed.，Bismarck-Bibliographie.Quellen und 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Bismarcks und seiner Zeit.Cologne，1966］。

瓦爾特·布斯曼編，《國務秘書赫伯特·馮·俾斯麥伯爵：政治私信集》，哥廷根，1964年［Bussmann，Walter，ed.，Staatssekretär Graf Herbert von Bismarck.Aus seiner politischen Privatkorrespondenz.Göttingen，1964］。

戈登·克雷格，《普魯士軍隊的政治，1640—1945》，牛津，1955年［Craig，Gordon A.，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1640–1945.Oxford，1955］。

大衛·德·勒維塔，《身份的概念》，巴黎和海牙，1965年［De Levita，David J.，The Concept of Identity.Paris and The Hague，1965］。

約阿西姆·馮·迪索，《過渡中的貴族：一位批判性貴族成員來自城中和莊園宅邸的報告》，斯圖加特，1961年［Dissow，Joachim von，Adel imÜbergang.Ein kritischer Standesgenosse berichtet aus Residenzen und Gutshäusern.Stuttgart，1961］。

埃爾里希·埃克，《俾斯麥：生平與作品》，三卷本，埃倫巴赫—蘇黎世，1941—1944年［Eyck，Erich，Bismarck：Leben und Werk，3vols.Erlenbach-Zürich，1941–1944］。

沃爾夫蘭·費舍爾，《工業化時代的經濟與社會：論文、研究與報告》，哥廷根，1972年［Fischer，Wolfram，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Aufsätze，Studien，Vorträge.Göttingen，1972］。

齊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滿》，第四版，倫敦，1949年［Freud，Sigmun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4th ed.London，1949］。

漢斯·菲爾斯騰貝格編，《卡爾·菲爾斯騰貝格：一位德國銀行家的生平，1870—1914》，柏林，1931年［Fürstenberg，Hans，ed.，Carl Fürstenberg.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Bankiers，1870–1914.Berlin，1931］。

菲利克斯·吉爾伯特編，《銀行家、藝術家和學者：19世紀門德爾松家族的未公開書信》，紐約，1975年［Gilbert，Felix，ed.，Bankiers，Künstler und Gelehrte.Unveröffentlichte Briefe der Familie Mendelssohn aus dem19.Jahrhundert.New York，1975］。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時代》，紐約，1955年［Hofstadter，Richard，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

——《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和其他論文》，紐約，1965年［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5］。

哈約·霍爾伯恩，《德國與歐洲：歷史隨筆》，紐約，1970［Holborn，Hajo，Germany and Europe：Historical Essays.New York，1970］。

——《近代德國史，1840—1945》，紐約，1969年［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40–1945.New York，1969］。

邁克爾·霍華德，《普法戰爭：德國人入侵法國，1870—1871》，紐約，1961年［Howard，Michael，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New York，1961］。

詹姆斯·喬爾的就職演講，《1914：未說出的假設》，倫敦，1968年［Joll，James，1914.The Unspoken Assumptions.London，1968］。

哈特穆特·凱爾布勒，《工業化初期的柏林企業家：出身、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柏林，1972年［Kaelble，Helmut，Berliner Unternehmer während der frühen Industrialisierung.Herkunft，sozialer Status und politischer Einfluss.Berlin，1972］。

雅各布·卡茨，《走出隔離區：猶太人解放的社會背景，1770—1870》，馬薩諸塞州劍橋，1973年［Katz，Jacob，Out of the Ghetto：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Jewish Emancipation，1770–1870.Cambridge，Mass.，1973］。

埃克哈特·科爾，《國內政策優先：19世紀普魯士—德意志社會史論文集》，漢斯—烏爾里希·維勒編，柏林，1965年［Kehr，Eckart，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19.Jahrhundert，ed.by Hans-Ulrich Wehler.Berlin，1965］。

亨利·基辛格，《白色革命家：反思俾斯麥》，刊于《代達羅斯》，1968年第77期，第888—924頁［Kissinger，Henry A.，“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Daedalus，97（1968），888–924］。

大衛·蘭德斯，《銀行家與帕夏：埃及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帝國主義》，倫敦，1958年［Landes，David S.，Bankers and Pashas：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London，1958］。

——《關于經濟帝國主義本質的一些思考》，刊于《經濟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496—512頁［“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JEH，21（1961），496–512］。

——《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至當前西歐的技術變革和工業發展》，倫敦，1969年［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1750to the Present.London，1969］。

威廉·蘭格，《歐洲的同盟與陣營，1871—1890》，第二版，紐約，1956年［Langer，William L.，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2nd ed.New York，1956］。

赫伯特·魯蒂，《殖民與人類的塑造》，刊于《經濟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483—495頁［Lüthy，Herbert，“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ankind，”JEH，21（1961），483–95］。

卡爾·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1848—1850年的法國階級斗爭》［Marx，Karl，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The Civil War in France；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1848to1850］。

赫爾曼·明希，《阿道夫·馮·漢澤曼》，慕尼黑，1932年［Münch，Hermann，Adolph von Hansemann.Munich，1932］。

赫爾曼·馮·彼得斯多夫等人編，《俾斯麥全集》，15卷本，共19冊，柏林，1923—1933［Petersdorff，Hermann von，and others，eds.，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15vols，in19，Berlin，1923–1933］。

奧托·普弗朗茨，《俾斯麥與德國的發展：統一時期，1815—1871》，普林斯頓，1963年［Pflanze，Otto，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The Period of Unification，1815–1871.Princeton，1963］。

——《對俾斯麥的心理分析詮釋》，刊于《美國歷史評論》，1972年第77期，第419—444頁［“Toward a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Bismarck，”AHR，77（1972），419–44］。

諾曼·里希和費舍爾編，《荷爾斯泰因文件》，第1—3卷，劍橋，1955—1961年［Rich，Norman，and Fischer，M.H.，eds.，The Holstein Papers，vols.I-III.Cambridge，1955–1961］。

呂魯普，《解放與反猶主義：市民社會的“猶太問題”研究》，哥廷根，1975年［Rürup，Reinhardt，Emanzipation und Antisemitismus.Studien zur“Judenfrage”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Göttingen，1975］。

漢斯·羅森貝格，《大蕭條與俾斯麥時代》，柏林，1967年［Rosenberg，Hans，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zeit.Berlin，1967］。

讓—保羅·薩特，《反猶主義者肖像》，倫敦，1948年［Sartre，Jean-Paul.Portrait of the Anti-Semite.London，1948］。

伊斯瑪爾·紹爾什，《猶太人對德國反猶主義的反應，1870—1914》，紐約，1972年［Schorsch，Ismar，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1870–1914.New York，1972］。

泰勒，《俾斯麥：人和政客》，紐約，1955年［Taylor，A.J.P.，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New York，1955］。

——《對歐洲霸權的爭奪，1848—1918》，牛津，1954年［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

萊昂內爾·特里林，《自由的想象：文學與社會隨筆》，紐約，1950年［Trilling，Lionel，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50］。

——《誠與真》，馬薩諸塞州劍橋，1972年［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1972］。

雅各布·圖利，《德國猶太人的政治傾向：從耶拿到魏瑪》，圖賓根，1966年［Toury，Jacob，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Von Jena bis Weimar.Tübingen，1966］。

魯道夫·費爾豪斯編，《施皮岑貝格男爵夫人日記：對霍亨索倫王朝宮廷圈子的記錄》，哥廷根，1960年［Vierhaus，Rudolf，ed.，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Aufzeichnungen aus der Hofgesellschaft des Hohenzollernreiches.Göttingen，1960］。

馬克·沃克，《德國與對外移民，1816—1885》，馬薩諸塞州劍橋，1964年［Walker，Mack，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1816–1885.Cambridge，Mass.，1964］。

馬克斯·韋伯，《政治作品集》，慕尼黑，1921年［Weber，Max，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Munich，1921］。

——《經濟與社會：理解社會學基礎》，第5版，圖賓根，1972年［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5th ed.Tübingen，1972］。

漢斯—烏爾里希·維勒，《俾斯麥與帝國主義》，科隆與柏林，1969年［Wehler，Hans-Ulrich，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Cologne and Berlin，1969］。

——《帝國的重重危機，1871—1918》，哥廷根，1970年［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öttingen，1970］。

——《近代德國社會史》（編），科隆和柏林，1966年［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Cologne and Berlin，1966］。

西奧多·澤爾丁，《法國，1848—1945》，第一卷：《野心、愛情和政治》，牛津，1973年［Zeldin Theodore，France，1848–1945，Vol.I：Ambition，Love，and Politics.Oxford，1973］。

約翰內斯·齊庫施，《新德意志帝國政治史》，三卷本，法蘭克福，1925—1930年［Ziekursch，Johannes，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3vols.Frankfurt，1925–1930］。

弗里德里希·琮克爾，《1834—1879年的萊茵—威斯特法倫企業家：19世紀德國市民階層史論文集》，科隆和奧普拉登，1962年［Zunkel，Friedrich，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 Unternehmer1834–1879：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im19.Jahrhundert.Cologne and Opladen，1962］。

# 關于作者

弗里茨·斯特恩曾長期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關于19世紀、20世紀德國政治文化的探索性研究對德國為何墜入極權主義提供了新的理解。和那一代的許多德國歷史學家一樣，斯特恩教授試圖解釋讓他的生活和家庭流離失所的事件背后的原因。2006年，他在兼具回憶錄和歷史作品色彩的《我所認識的五個德國》一書的序言中表示：“雖然在納粹德國只生活了五年，但那段短暫的經歷還是向我提出了一個讓我在整個學術生涯都試圖回答的迫切問題：邪惡的普遍可能如何在德國成為現實？”

1926年2月2日，他出生在布雷斯勞一個被同化了的富裕猶太人家庭，直到1938年因形勢所迫而移民美國。父親魯道夫是外科醫生，母親擁有物理學博士學位，父母家都皈依了路德宗。20世紀50年代初，斯特恩在康奈爾大學任教，后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了剩下的學術生涯。他于1967年被任命為塞斯·洛（Seth Low）歷史學教授，1992年成為校級教授。從1980年到1983年，他擔任大學教務長，并于1996年底退休。2016年，斯特恩在曼哈頓去世。

在處女作《文化絕望的政治：德國意識形態興起研究》（1961年）中，斯特恩博士揭示了讓德國接受納粹意識形態的思想氛圍。他另辟蹊徑，以不太知名的人物為研究對象，如文化批判者尤里烏斯·朗貝恩、圣經學者保羅·德·拉加德和文人阿圖爾·莫勒·馮·登·布魯克，他們的神秘民族主義和對西方自由價值的敵意代表了更廣泛的思潮。在該書第二版前言中，斯特恩表示：“我試圖展現這種新型的文化不滿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促使本質上無關政治的抱怨入侵了政治。”他對政治和文化精英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感興趣，作為文化價值表面上的守護者，他們卻促成了希特勒的上臺，并參與了德國對自由思想的抵制。在收入《非自由主義的失敗：論現代德國政治文化》（1972年）和《夢想與錯覺：德國歷史的戲劇》（1987年）的一系列論文中，他沿著上述思路做了更多探索。

斯特恩的著述遍及整個德國近現代史，探討了從1871年德國統一至今的各種主題和思潮。在《金與鐵》中，他關注俾斯麥的財政代理和顧問，一位在德國統一和普法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普魯士猶太人。此人既有錢有勢，又因身為猶太人而遭到鄙視，是個標志性人物。《經濟學人》對該書的評價是：“他的風格，他對人物性格的理解，對歷史事件的重構和將其置于更廣大背景中的做法，都體現出讓所有學者艷羨的清晰、明智和深厚學養。”

他對20世紀初德國科學文化的興趣催生了一部歷史重構作品：《愛因斯坦恩怨史》（1999）。對納粹時期的道德困惑困擾他終生，2013年與妻子合著的《不凡之人狄特里希·邦霍費爾和漢斯·馮·多南伊：教會和政府中的希特勒反對者》是對這種困惑的表達。斯特恩博士的公共角色對應了他的學術興趣，他是一位德國歷史的詮釋者、自由價值的捍衛者，也是統一和平的歐洲的熱情倡導者。





